

乱世四百年

(魏晋+南北朝+隋朝 全3册)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魏晋：历史大变局下的个人命运

南北朝：帝国黎明前的生存启示录

隋朝：走向伟大帝国的开端

魏晋

历史大变局下的
个人命运

张程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历史大变局下的个人命运 / 张程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1

ISBN 978-7-201-16756-5

I. ①魏...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 - 魏晋南北朝

时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3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8944号

魏晋：历史大变局下的个人命运

WEI JIN: LISHI DA BIANJU XIA DE GEREN MINGYUN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刘庆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总 策 划 赵 易

策划编辑 韩 笑

责任编辑 金晓芸

特约编辑 燕文青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制版印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46千字

版次印次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自序 乱世是成长的朋友

如果将中国古代历史看作一个人的一生，魏晋便是此人记事以后经历的第一个挫折期。

当散布在长江、黄河等地的文明之火，孕育出完备的国家形态后，中国就如呱呱落地的婴儿，开始涂抹自己的历史长卷。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的婴儿期，中国历史进入秦、两汉的孩童期，正式记事。每个人都要经历孩童的天真、迷茫、躁动和十万个为什么，才能告别童真成为少年，期间有磕磕绊绊，会受伤流血，甚至可能面临种种威胁。

从3世纪初到6世纪后期的三百多年，是中国历史的挫折期。反复的分裂混乱和南北征伐，导向了隋唐的辉煌。魏晋乱世是这段挫折期的前半段，到南北朝达到高潮，最终形塑了中国历史的永恒记忆。

魏晋指的是东汉瓦解后的三国、两晋时期。该时期开始于220年曹丕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曹魏，而两晋又脱胎于曹魏，因此得名魏晋。“魏”指的是三国北方政权曹魏，“晋”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晋朝又分为短暂统一全国的西晋和永嘉之乱后司马睿在南方延续的东晋，因此称为两晋。东晋时期，北方主要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个大的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316年，匈奴人刘曜攻占长安，俘获晋愍帝，西晋亡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420年，禁军将领刘裕篡夺东晋政权，建立了刘宋王朝，魏晋时期结束。

本书没有全面展现三国历史，不涉及东吴、蜀汉两个政权的史实，而是从曹魏发展开始，顺延到西晋和东晋、十六国。

魏晋时期，少数民族纷纷涌入原先的汉族地区，开始扎根建立政权，锻造民族融合的伟大熔炉。此时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体融入其中，持续保持对周边地区的各项优势。曹操不拘一格选贤任能，以反既得利益群体的姿态崛起，最终他的儿子却接受了世家大族的交易，开启了门阀政治的序幕。长江以南地区得到了第一批大规模的移民、技术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开始告别茹毛饮血的蛮荒阶段，日渐繁荣，直至成为中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中心。

更深层次的是思想观念的碰撞——正如孩子要在探索中消除迷茫徘徊、辨伪存真一样。

竹林七贤的癫狂不羁，可以解读为对自由的追求、对权威的藐视和反抗，但也暴露了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对自身、对世界及其对两者关系认识的迷茫与徘徊。先前的道法思想，无法解释当今的混乱，归于沉寂。肯定自我、迷恋尘世、洒脱自然的思想大行其道，进而演化为士人的魏晋风度。另一种乘虚而入的思想是讲求报应和避世的佛学。佛教在中国飞速发展，外来的佛经大放异彩，佛学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后世蔚为壮观的北方佛像石刻和隐现在江南烟雨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这个时期佛教大兴的例证。不过，儒家思想在南北朝接纳了玄学、佛学等养分后，儒生们也虚心与僧侣等交游，适应了时局的变化，继续保持了主导思想的地位。土生土长的道教则继续发展，组织更加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儒、释、道三者共同主导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格局开始形成。不同的人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从三者中找到思想的养分乃至归宿。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文人们“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跌宕剧变的时代背景和坎坷曲折的个人际遇，赋予他们南方的

成熟精致和北方的刚健爽朗，逐渐积淀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种底色。

走出魏晋的中国，持续扩展能量与疆土；走出魏晋的中国人，认识到统一、平和与自我的珍贵，更加自信丰盈。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成长，也是中国的成长。

目录

自序 乱世是成长的朋友

第一章 三国终结者

禅让这场戏要演好

曹植与“洛神”的相会

司马懿：一个权臣的崛起

高平陵政变改写了谁的命运

竹林七贤来了

这不是嵇康一个人的悲剧

偷梁换柱司马家

曹髦的儿戏政变

前人种地后人收

第二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

三家归晋

白痴也能当太子

快来围观“西晋首富”

悍妇乱政不得了

八王之乱十六载，同室操戈何匆匆

陆氏兄弟：华亭鹤唳岂可闻

戎狄四起争夺中原

当割据胜地巴蜀遇到流民枭雄

永嘉之乱

天命何所归——西晋的彻底覆灭

第三章 群雄逐鹿

石勒：从奴隶到皇帝

短命的冉魏政权

慕容家的内讧传统

那个叫王猛的猛人

前秦：我统一北方了

陶侃与江南骚乱

第四章 跷跷板上的东晋

司马睿：这皇帝当得太难了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北伐

王与马不敢共天下

王敦“过豪死”的血腥悲歌

“混血皇帝”司马绍

有枪就是草头王

东晋北伐：我就是意思意思

先拿灭蜀练练手

第五章 旧时王谢堂前燕

陈郡谢家兴衰史

谢安：看我东山再起

淝水之战原来是场心理战

复国是永恒的目标

该后秦上场了

乱政父子兵

起义是成是败，还得看老大的能力

第六章 除了战乱，还是战乱

桓玄：篡国虎父无犬子

桓楚：注定短命的伪政权

刘裕：穷人当兵有前途

一百年后再见两京

从刘勃勃到赫连勃勃

别把责任都推给大环境

第七章 魏晋风华

桃花源只是传说

魏晋风骨留给我们的光

行政区划上的较量

魏晋人怎么过日子

魏晋历史年表

十六国兴亡表

第一章 三国终结者

禅让这场戏要演好

—

延康元年（220）二月，新即位的魏王曹丕下令关津减税，恢复什一税制。不久，他又赏赐诸侯将相以下粟万斛、帛千匹、金钱不等，同时煞有其事地派遣使者巡察郡国。这所有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收揽民心。而收揽民心的目的则是推翻立国四百年的汉朝，建立曹魏王朝。

在皇权转移中，意识形态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简单地说，后来者需要往自己脸上贴金。神化自己是最常见的做法，即让淳朴的老百姓相信自己是天人下凡，相信自己的登基是天命所归。巧的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会有大批恰逢其时的“祥瑞”出现。

先是民间开始传言曹丕出生的时候，有青色的云气像车盖一样飘浮在婴儿身上，终日不散。风水师们一致认为这是曹丕至贵的证明。这时，黎民百姓才开始明白：原来曹丕一出生的时候，就不是凡人啊。

此间又出了一个叫殷登的人，说自己记得一件事：在熹平五年（176），谯地，也就是曹操的老家，出现了黄龙祥瑞。大名士、光禄大夫桥玄就悄悄问太史令单颺（yáng）：“这个祥瑞是什么意思啊？”单颺回答道：“说明谯这个地方会有王者兴起。在五十年时间里，黄龙会再次出现。”殷登说自己当时在场，就默默记下了这件事。四十五年后，也就是延康元年（220）三月，黄龙再次在谯出现。当时殷登还在世，大肆宣扬这件事，引起中原轰动。最后曹丕出面召见殷登，和他谈了一次话，赏赐殷登谷三百斛后将他送回家去了。

之后，魏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同月，濊貊（huì mò）、扶余、焉耆、于阗（tián）等部落都派遣使者向中原进贡。四月，饶安县出现典型的祥瑞白雉。曹丕很高兴，免了饶安县的田租，赏赐渤海郡百户牛酒；太常以太牢祠宗庙。

但是事情突然起了波折。当月，大将军夏侯惇（dūn）病逝，曹丕亲自着素服在邺城东门发哀。按礼，帝王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曹丕与夏侯氏并非同姓，却哭于城门，便有人指责曹丕行为失礼。这其实暗指曹丕家族与夏侯家族的“不正常关系”。曹丕的爷爷，也就是曹操的爸爸曹嵩原本是乞丐，被大宦官曹腾收养后才有了姓氏。东汉官场上就一直盛传，曹嵩原来是复姓夏侯的小乞丐。因此在曹操当权时，夏侯家族步步显贵。现在是曹丕登基的前夜，有人重提曹家这件不光彩的往事，杀伤力巨大。

这表明，一部分世家大族还并不认同曹氏家族登基称帝。

曹操在世时，不少名士很瞧不起他，与曹操政权对抗，曹操也不时做出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客观上，曹操必须压制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破坏朋党交游便是举措之一。虽然没有打击到世家大族的根本，但曹操对世家大族的厌恶和压制是明显的。在曹姓代刘几成定局的时候，世家大族需要曹丕给他们保证，维护和

扩大他们的利益。虽然曹丕本人已经完全是一个世家子弟了，但没有明确的承诺和制度上的保护，世家大族们还是不放心效忠于曹氏家族。

这时候，昌武亭侯、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中正法，建议改革官员人事制度。九品中正法的内容是在郡国设置中正，评议本地人才的高下，分九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官职。评议的标准主要看家世，即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其次看道德，最后才看一个人的才能，而担任评议的都是当地的贵族显要。这样的制度到底对谁有利，可想而知。此法一出，获得了世家大族的一片赞赏之声。

这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给曹丕出的考题，是世家大族与曹氏家族进行的权力交换。

世家大族要求确保自己的地位和权益，并希望能够世代相传，九品中正法就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曹丕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制度，开始在全国进行人事改革。它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势力恶性膨胀的制度源头。

时间到了五月，刘协“命令”曹丕追尊其祖父、已故太尉、乞丐出身的曹嵩为太王，祖母丁氏为太王后，封王子曹芳为武德侯。

六月，曹丕在东郊阅兵，集中兵力开始南征。这次南征，公卿相仪，华盖相望，金鼓阵阵，完全是曹丕对个人势力的一次检阅，对天下百姓的一次试探。因此整个军事行动更像是一次盛装游行。曹丕先是到了屡次出现祥瑞的老家谯，在家乡大宴三军，并在邑东召集谯地的父老百姓，设伎乐百戏，与民同乐。欢娱间，曹丕说：“先王非常喜欢家乡，不忘根本。谯，真是霸王之邦。我要减免谯地两年的租税。”当地的三老吏民闻言纷纷向曹丕祝寿，通宵达旦。几天后，曹丕还去祭扫了先人的墓地。

到了冬天，曹丕大军终于到达长江以北，孙权整军以待。曹丕看

到东吴军队军容整齐，说：“东吴还是有人才的，我们暂时先回去吧。”这句话让江对面的孙权听得一愣一愣的。临行，曹丕下令：“大军征伐，有些死亡的士卒还没有得到收殓，我感到非常悲痛。各郡国要为这些人收殓，送到烈士家中，官府还要出资为他们设祭。”临别了他还不忘讨好军队，向天下展示自己的仁慈。

二

自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做足工作的曹丕就等着刘协禅让了。

关于这次禅让，正史和野史的记载截然不同。

《三国志》的曹丕传记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刊登相国华歆（xīn）、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等人的劝进书。刘协一再下诏禅让，曹丕一再推辞。大臣们动不动就聚集一百二三十人集体劝进，而且周而复始，不厌其烦，也不担心曹丕生气。曹丕就是不答应。连刘协都说：“魏王不接受禅让，那怎么办啊？”最后仿佛劝进的大臣们都着急了。尚书令桓阶对曹丕说：“汉朝的气运已尽，史官和耆老们的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天下百姓都唱着歌谣，呼吁明主出现。臣等都认为天命降临大魏，陛下还前后退让。陛下应该响应上天，接受禅让，马上登坛祷告上天。不然就是久停神器，抗拒上天和亿万百姓的意愿啊！这可了不得啊。”曹丕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说了一个字：“可。”于是大臣们和百姓都欢天喜地地开始了庆祝。

这段完美的记载总让人怀疑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融洽，是否如此顺利。

《三国演义》《华阳国志》和其他野史则完全为我们描述了一场

逼宫的闹剧：

华歆等一班文武去见刘协，要求刘协禅让。华歆说：“魏王德布四方，仁及万物，是古今第一人。我们都认为汉祚已尽，请你效法尧舜，以山川社稷为重，禅位魏王。”他还撂下一句狠话：“只有这样，你才能安享清闲之福！我们都商议定了，特来奏请。”平时文质彬彬、以才学震天下的华歆竟然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真是让人吃惊。刘协听大臣们这么说，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终于，刘协压抑着的情绪爆发了出来。他注视着百官哭道：“高祖皇帝提三尺剑，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创造基业，世代相传，到我这里已经有四百多年了。朕虽不才，但也没什么过错，我怎么忍心将祖宗基业舍弃不顾？”刘协顿了顿，真诚地说：“祥瑞图讖（chèn），都是虚妄说不清楚的事情，请各位大臣深思！”与华歆同来且学问更高的王朗说道：“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天底下哪有什么不亡之国、不败之家？汉室相传四百余年，到现在气数已尽。陛下还是早早退避为好，迟了唯恐生变。”一旁的九卿、尚书和禁军将领等人都频频点头。话已至此，刘协只有大哭，逃入后殿去了。

第二天，百官再次云集殿前，命令宦官请出刘协。刘协很恐惧，不敢出来。刘协的皇后是曹操的女儿、曹丕的妹妹曹节，见到丈夫这般窘态，大怒，说：“我哥哥怎么做出这样叛逆的事情来！”外面的百官推举曹洪、曹休两人带剑进入后殿，逼刘协出来。曹皇后大骂自己的这两位叔叔，说：“都是你们这些乱贼，贪图富贵，造反谋逆！我父亲功勋卓著，威震天下，都不敢篡窃神器。现在哥哥登位还没几天，就想着篡夺皇位了。老天爷是不会保佑你们的！”曹洪、曹休两个人不去理会自己的侄女，裹胁着刘协出了殿。刘协万般无奈，只好更衣出来，接受最后的审判。

面对华歆等人的再次逼宫，刘协痛哭流涕：“你们领取汉家俸禄多年，中间还有很多人是汉朝开国功臣的子孙，现在怎么就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华歆冷笑着说：“陛下若不听从我们的话，恐怕马上

要祸起萧墙了。这并非我们不忠于陛下。”

刘协大喝：“谁敢杀我？”

华歆厉声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没有人君之福，导致四方大乱！如果没有魏王父子在朝，杀陛下的人何止一两个？你这么不知恩报德，难道不怕天下人群起而攻之吗？”

刘协受到极大惊吓，拂袖而起。旁边的王朗向华歆使了个眼色。华歆竟然快步走上皇帝宝座，扯住刘协的龙袍，厉声道：“同意还是不同意，就一句话！”刘协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浑身战栗不能回答。他环顾四周，宫殿内外披甲持戈的几百士兵全部是魏王的亲兵。他哭着对群臣说：“我愿意将天下让给魏王，请各位保存我的性命。”

当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在寻找撤退底线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其实生命才是每个政治人物最基本的需求。遗憾的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它不幸成为奢求。

逼宫的贾诩许诺：“魏王必不负陛下。陛下快快下诏书，以安定人心。”

刘协只好让陈群起草禅让诏书，让华歆捧着诏书和玉玺，引导百官到魏王宫前，请曹丕即位。曹丕大喜，但坚决推辞，要求刘协禅让给“真正的大贤人”。在华歆的导演下，刘协又下了一道诏书，再次恭敬地请曹丕登基。曹丕更加高兴了，但还是对贾诩说，怕“不免篡窃之名”。贾诩马上献计说，让刘协筑一坛，名受禅坛，择吉日良辰，集结大小公卿，让当今天子亲自在坛上献上玺绶，禅让天下。

于是，刘协启动了汉王朝的最后一项国家工程，派遣太常院官在繁阳卜地，筑起三层高坛，选择吉日举行禅让大典。河南许昌临颍县繁城镇还保留着这座中国仅存的受禅台。台高约二十米，长宽约三十米。十月庚午日寅时，东汉王朝的禅让仪式正式举行。

禅让原本是传说中推选部落首领的制度，这种只保留在典籍中的神秘制度已经距离曹丕时代两千年之远了。如何“复活”禅让制度和仪式，是对曹丕君臣的巨大考验。曹丕和魏国大臣们以高度的“智慧”，将传说中的“禅让”概念付诸实践，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受禅大典的盛况，裴松之引《献帝传》注云：“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意思是曹丕登上受禅台接受汉献帝的帝位，三公九卿、侯爵贵族、各军将领和前来朝贺的匈奴单于、周边少数民族来宾共好几万人共同见证了这一仪式。整个仪式要燃起巨火，祭告天地、五岳和四渎（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

许昌受禅台前现存的两块石碑——《受禅表》碑和《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在风吹雨打后已面目模糊，却依然忠实地向后人透露了当时的境况。《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内容为四十六位文武大臣给汉献帝刘协上的折子，其中记录了众臣奏请曹丕当皇帝的理由，其实也是写给曹丕的效忠信，就是《三国演义》中的“劝进书”。《受禅表》是曹丕受禅称帝之后，表白自己不愿当皇帝，可是天、地、人都让他当，再三辞让而不得，才登上皇帝宝座的“苦衷”与“救民济世”的心态。

这两块碑文均由汉末名士王朗文，梁鹄书，楷书创始者钟繇（yáo）镌字，被后世称为“三绝碑”，即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钟繇和梁鹄是当时的重臣和著名书法家；王朗是大学问家，对禅让一事最为积极，魏文帝时期由御史大夫迁为司空。民间传说他积极逼杀献帝皇后，催逼玉玺。

惊恐、悲凉、无助的刘协，为了保全性命，只得把祖宗的江山禅让给曹氏。不知道他跪在地上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听昔日的大臣宣读如下公告的：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上皇皇后帝：

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

汉主以神器宜授予臣，宪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将士，泊于蛮夷君长，金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无统。”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

卜之守龟，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群僚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曹丕的这篇布告，主要意思是魏代汉立是上承天意、下顺民心的事，曹丕即位是众望所归，为之后受禅台上的表演奠定了基调。

曹丕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将刘协封在河内郡山阳，为山阳公，邑万户。刘协可以用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其四子降为列侯；更换周边各族印玺，为魏国百官更名。总之是皆大欢喜。

禅让仪式上还有两件小事值得一书。第一件事，根据《魏氏春秋》记载，曹丕在坛上行礼完毕的时候，对周围的功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后人对这句话多有评论，大抵认为曹丕自我感觉过于良好。魏国事实上的创建者应该是曹操，但是曹操满足于“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臣”的自我定位，不愿意登基。曹操如果说这句话，方才是名正言顺。

第二件事是《三国演义》描写的怪事。传说在仪式上，百官请曹丕答谢天地。曹丕刚下拜，忽然坛前卷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身影，坛上的火烛都被吹灭了。曹丕惊倒在坛上，被百官急救下坛，半晌才醒过来。这阵奇怪的风和随即而来的疾病让曹丕在宫中休养了多时。病情老不见痊愈，曹丕就怀疑许昌宫内外有

妖怪，于是决定迁都洛阳，大建宫室。

曹丕受禅后，非常客气地对刘协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意思就是说，天下的珍宝和财富，我都和你山阳公（刘协禅让后的封号）共享。那么刘协是不是真的共享到了所谓的“天下之珍”呢？不得而知。汉献帝刘协逊位后被封为公爵，在封地内行汉正朔，一直到五十四岁才自然死亡。曹丕以天子礼仪把刘协下葬，赐名其陵寝为禅陵。山阳国由刘协的子孙继承，从建国至灭亡共传国八十九年。文人色彩浓厚的曹丕对刘家还算仁慈。

三

曹魏以禅让形式建国，恶化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风气，影响十分恶劣。

在禅让过程中，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刘协是非让位不可，可曹丕又不想背上篡位的名声，就选择了远古传说中的禅让制度来当遮羞布。《读通鉴论》道：“自曹魏以迄于宋，皆名为禅而篡者也。”禅让包裹的道德面纱彻底被篡位者剥去，成为赤裸裸的篡位工具。魏晋南北朝期间，禅让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游戏，规则被固定化、现实化、公开化，失去了之前的神圣和严肃，将政治黑幕中人性的阴暗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将权臣和军事强人推上了政治舞台，而不争气的末代皇帝们更是令那些野心勃勃的权臣有机可乘。

无休止的阴谋和杀戮让人厌倦：曹魏末代皇帝曹奂禅让给了晋武帝司马炎，晋代魏；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给南朝宋武帝刘裕，宋代晋；南朝宋顺帝刘准禅位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齐代宋；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南朝梁武帝萧衍，梁代齐；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位给南

朝陈武帝陈霸先，陈代梁；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位给北齐文宣帝高洋，北齐代东魏；西魏恭帝拓跋廓禅位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代西魏；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给隋朝文帝杨坚，隋代北周。

尽管禅让使得这些黑幕半遮半掩，但天下人对这些游戏规则和把戏早已一清二楚。辽人有首《伎者歌》唱道：“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可以作为魏晋南北朝禅让制度的最好注解。

禅让制度更恶劣的影响是它沉重打压了政治道德，让现实政治大行其道。当一个王朝是通过不道德的禅让形式建立的，它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之前秦朝是通过王朝战争统一的，汉朝是刘邦提三尺剑千辛万苦打下来的，而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则是从一个阴谋走向另一个阴谋而建立起来的，如何令人信服？王朝的开国元勋们，一个个都是阴谋家、表演家和投机者，这个王朝的政治风气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整个魏晋南北朝，谋杀、弑君、骨肉相残、背信弃义、淫秽与乱伦等行为层出不穷，不能说与王朝建立之初的禅让制度没有关系。

东汉末期，道德力量还能在政坛上起到些许作用，儒家经典还为人信服，建立在品德和修行基础上的征辟制度还有一部分在起作用。曹魏王朝从曹操开始就崇尚实务而抛弃虚名，那是应付残酷乱世的需要。曹丕建国前后，没有恢复道德政治，反而变本加厉地在现实政治的道路上狂奔。

曹植与“洛神”的相会

—

曹丕的江山是老爷子曹操费尽心计打下来的，而皇帝的宝座则是他费尽心机从弟弟曹植手里夺来的。

曹操的长子曹昂早年战死疆场，曹操和第二任妻子卞氏生有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彰只有匹夫之勇，曹熊常年生病，只剩下曹丕和曹植两兄弟争夺继承人之位。

曹操一开始属意曹植。曹植不仅一表人才，而且文采飞扬。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在邺城修建的“形象工程”铜雀台落成。他召集天下文士登台作赋，为形象工程增光添彩。在这场文坛巅峰对决中，当时只有十九岁的曹植提笔一挥而就，最先完成了一篇《登台赋》。全文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曹操看后赞赏不止，在场文人也都输得心服口服。曹操本人文学气质就非常突出，曹植因此加分不少。曹操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接班人。

曹植的聪慧是从小出了名的，十岁就能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口成章。而他的缺点就是太聪明，过于浓厚的文人气质反而害了他。曹植沉溺在文学的天地中，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头脑未免简单，人对事缺乏心计。曹丕知道比文才、比能力，自己都不是弟弟的对手，所以就想方设法让曹植在父亲面前留下坏印象。曹操要出征了，兄弟俩去送行。曹植宏篇大论，在父亲面前指点江山；曹丕则痛哭流涕，装出舍不得父亲出征冒险的样子。曹操很自然地认为曹植才

情有余而人情不足，觉得曹丕这个孩子忠厚孝顺。

曹丕和曹植各拉了一批人明争暗斗。曹丕经常在家中召集同党商议方法，为了避免给别人结党营私的印象，就常用大筐把同党带到家中。曹植一派知道后，就兴冲冲地告诉了曹操。曹操查起来，却发现曹丕家门口进出的大筐里装的不是食物就是日用品。

争斗越久，曹植身上的缺点就越扯后腿。一次，曹操已经任命曹植为负责人，率军出征了。这是很重要的荣誉，也是对曹植能力的考验。结果在出征的欢送仪式上，曹操和文武百官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曹植的身影。原来曹植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军队出征不了，曹植这个负责人也被废掉了。

曹操是白手起家的枭雄，节俭成性，最见不惯别人，尤其是家人穿戴奢侈。曹植却不以为意，吃穿用度都率性而为。曹植一生娶过两位妻子，第一位妻子崔氏系出名门，是名士、尚书崔琰的妹妹，穿戴总是求新求好。一次，崔氏“衣绣违制”，估计是穿了描龙绣凤的衣服招摇过市。曹操看到后，勒令儿媳妇崔氏回家自尽。崔氏的死，表明曹操对曹植的不满与日俱增。

最后，曹操对到底把权力传给哪个儿子还是下不了决心，是给轻浮不懂事的曹植呢，还是给忠厚孝顺的曹丕呢？他问老臣贾诩，贾诩沉思了良久。其实他早就暗中被曹丕收买了，在琢磨怎么让曹操下定决心舍曹植而用曹丕。曹操等不及了，问贾诩怎么迟迟不回答。贾诩这才说：“我在想刘表和袁绍的事情。”刘表和袁绍都“废长立幼”，结果导致身后内讧不止，势力灰飞烟灭。曹操听了，默然不语，这才下定决心选曹丕为继承人。

继承人之争，曹丕胜曹植败。政治上的胜负，绝对是零和博弈，胜者全得，输家不仅一无所获，从此之后还要受胜家的欺压凌辱。曹操活着的时候，曹植是高贵的王子，优游宴乐。等到曹操死后曹丕登

基称帝，曹植的噩梦就开始了！

曹丕这个人心眼很小，上台后就开始对看不惯的人反攻倒算，到处整人。张绣在投降曹操之前杀死了曹丕的哥哥曹昂，这才让曹丕成为曹操的长子。说起来，曹丕还要感谢张绣为其“上位”创造了机会。现在曹丕上台了，却把张绣逼死了。于禁战败后投降过关羽，曹丕觉得很丢脸，就派于禁去给曹操守陵，而他事先在陵墓中画上于禁卑躬屈膝向关羽求饶的壁画。于禁一把年纪了，看到壁画后，羞愧难当，气血上涌，死了。

对亲人，曹丕整起来照样心狠手辣。叔叔曹洪是个小气鬼，曹丕登基前向他借钱，遭到了拒绝。现在曹丕就处处和曹洪为难，动不动就训斥罚款。曹洪顶不住了，央求嫂子即曹丕的生母卞太后在曹丕面前求情，曹丕才放过曹洪。

曹彰是曹丕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在皇位争夺战中支持曹植，如今曹丕登基后他又领兵在外，曹丕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召曹彰回朝，在给他吃的饼里下了毒。曹彰中毒后，没有人过来救治。卞太后发现了，慌忙亲自找水来救儿子，却发现宫中所有的瓦罐都被打碎了，最后她光着脚提桶去井里打水。可惜还是晚了，一代勇将曹彰不治身亡。

再说对曹植这个之前的头号对手，曹丕整起来简直是六亲不认、心狠手辣。

曹丕先在制度上建立起了一整套严格限制皇室成员，尤其是成年诸侯王的规定。曹魏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宗室成员限制最苛刻的朝代。曹丕借口皇权巩固，大行限制宗室子弟之实。曹植是皇室至亲，却过着如同囚犯一般的生活。他贵为藩王，却没有行政权力，只能拥有由上百名老弱病残组成的卫队。这支卫队常年不变，没有补充，到最后只剩下五六十名残兵。曹植还不能和朝廷官员交往，没有得到允

许不能和亲戚通信，不能随便来首都朝觐。他能做的就是带着这支可怜的卫队，在方圆三十里的范围内“游猎”。藩王所在地区，曹丕都派了所谓的“监国谒者”监视藩王的一举一动。这些官员随时可以告状，还可以当面“批评”藩王。曹植就被监国谒者参奏过“醉酒悖慢，胁持使者”的罪名。即便这样，为了防止藩王在某个地方固定下来，朝廷频繁徙封诸王，过几年就换一批封号。比如曹植就担任过多个王位，因为死的时候是陈王而被人习惯地称为陈王曹植。

顺便说一下，曹魏苛禁诸侯的政策虽然在表面限制了宗室诸王的势力，巩固了皇帝本人的统治，但从长远影响来看，它严重危害了曹魏的统治。换言之，皇权对同宗势力的绝对排斥，堵住了同宗子弟出力襄助的途径，当皇权面临权臣或其他野心家的觊觎时，皇帝只能孤身作战，得不到宗室力量的帮助。苛禁诸侯的政策来源于曹操父子对东汉末年皇权旁落教训的警惕，它的消极影响日后又被西晋皇室当作历史教训而吸收。

在种种限制之下，曹植的生活很窘迫。吃的是封地的土特产，手头总是很拮据，想做的事情不能做，“谨小慎微”成了生活的关键词。

曹植的浑身才能和满腔建功立业的抱负难以伸展。他一再向朝廷，也就是向哥哥曹丕上书，要求授予自己实际的职务，哪怕是去前线冲锋陷阵也愿意。奏章递上去后，不是得到让他安心当藩王的回复，就是石沉大海。

不给回复并非因为曹丕忘记了这个弟弟，他记着曹植，并且没有放过任何迫害他的机会。

曹丕曾和曹植同辇出游，恰好遇到两头牛在墙角厮斗。一头牛打输了，坠井而死。曹丕当即命令曹植给死牛赋诗，要求诗中不许出现“牛”字、“井”字、“死”字，也不能说相斗之事，但是必须把整件事情说清楚。还要求曹植必须在走马百步之内，写成四十言的长诗。如

果走完了一百步写不出来的话，曹植就要被斩首。结果呢，曹植策马而驰，在马上就揽笔写道：“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幽士头，崒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全诗没有出现一个“牛”字、“井”字或者“死”字，却把斗牛的场面描写得清清楚楚。写完了，曹植还没有走完一百步，他就又写了一首三十言自慰诗：“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最后一句，很快流传开来，成为千古名句。

不知道是实在找不到杀曹植的理由，还是被“本是同根生”的亲情所感动，曹丕最终没有杀曹植。于是，曹植继续过着窘迫、郁闷的生活。黄初六年（225），曹丕踌躇满志地想要征讨东吴，结果到长江边一看，东吴戒备森严、江水激流，立刻打了退堂鼓。撤军途中，曹丕经过了曹植的封地，“御驾亲临”曹植的住所，看到曹植居住的环境实在太差了，生活水准也不高，这才下令增加了曹植五百户封邑。为此，曹植还专门上表“谢恩”。

有人说，这是曹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良心发现，觉得应该对弟弟好点了。因为在第二年（226），曹丕就驾崩了。曹植比皇帝哥哥多活了六年，在太和六年（232）死去。

二

黄初三年（222），当时封地鄆（juàn）城的曹植在京师洛阳朝觐完毕，返回过洛河时，写了一篇《感鄆赋》。在文中，曹植自述是在朦胧之中遇到了洛河水神宓（fú）妃，她“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遗憾的是，他俩人神殊途，最后只能擦肩而

过。曹植继续踏上返程，宓妃继续在洛河为神。

在序言中，曹植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尽管曹植说自己是从洛河水神“宓妃”身上得到的写作灵感，但人们还是把她和曹植的嫂子、曹丕的妻子甄夫人联系起来，演绎出两人的“情感往事”来。

甄夫人的命运和曹植有些相似——难怪人们要把他们俩联系在一起。

甄夫人和曹植一样，从小就文采出众，而且美若天仙、品格高尚。她名声远播，汉末人称“江南有二乔，河北甄氏俏”。河北大军阀袁绍听到甄夫人的名声，就聘娶甄夫人嫁给自己次子袁熙。204年，曹操父子率兵攻下袁绍大本营邺城。城破之时，曹丕一马当先，提剑冲杀进袁府，一眼看到甄夫人就中意了。于是，二十三岁的甄夫人成了十八岁的曹丕的妻子。

曹丕和甄夫人结婚后，一起生活在邺城，度过了几年恩爱幸福的时光。甄夫人将曹丕的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还多次劝曹丕广纳姬妾，曹丕对大度贤良的甄夫人越发喜欢。甄夫人和婆婆卞夫人的关系也很好，常常对卞夫人嘘寒问暖，卞夫人高调夸奖甄夫人是孝顺媳妇。期间，甄夫人为曹丕生下了长子曹叡和长女东乡公主。曹家权势越强大，曹丕就越忙，还长期不在邺城。曹丕在政治上不断上升，甄夫人在曹丕心中的地位却不断下降。

曹丕个性非常进取，不懂得留恋。甄夫人又听任丈夫纳妾，导致曹丕身边美女如云。当皇帝后，曹丕身边的女子就更多了。汉献帝退位后被降封为山阳公，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献给曹丕。甄夫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就是没有搬到首都洛阳去和曹丕住在一起，而是坚持住在河北邺城。夫妻感情开始疏远，她渐渐失宠就在情理之中了。保不

准美女当中还有人嫉妒甄夫人正妻的地位，从中挑拨离间，中伤甄夫人。

甄夫人失宠的明显证明就是曹丕称帝后迟迟不立正妻甄夫人为皇后，而仅封她为“夫人”。甄夫人深感自己处境恶劣，埋怨丈夫无情，写作《塘上行》寄给曹丕。在文中，她自述身陷“边地多悲风，树木何翛（xiāo）翛”的恶劣环境中，过着“独愁常苦悲”“夜夜不能寐”的悲惨生活。她希望这首诗能够唤起曹丕对夫妻间美好时刻的回忆，从而改善自己的境遇。谁曾想，曹丕没有读到爱，没有读到旧情，读到的只有愁苦和哀怨，而这些矛头都对准曹丕。曹丕原本就对甄夫人不满，如今爆发了出来。他勃然大怒，失去理智，派使者前往邺城逼甄夫人服毒酒自杀。甄夫人冤死后，被人披散头发遮住脸庞，口中塞满米糠下葬。这是黄初二年（221），也就是曹丕登基当皇帝第二年的事情。

现在，曹植写了《感鄴赋》，“鄴”和“甄”两字相通，“宓妃”又很容易令人想到甄夫人。后人难免浮想联翩，在曹植和甄夫人之间搭建种种感情线索，试图证明他俩之间有感情瓜葛。南朝的顾恺之充分发挥想象力，从文章出发创作了千古名画《洛神赋图》。画中，曹植恍然若失地看着在河上凌波微步的洛神。两人郎才女貌，近在咫尺却不能牵手，只能以目传情。甄夫人也因为曹植的《感鄴赋》而被后人普遍视为“洛神”。

传言越来越多，编织出了曹植和甄夫人的感情经历。很多人相信曹植也在204年攻陷邺城的战役中看到了甄夫人。两人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无奈哥哥曹丕抢在了前面提亲，甄夫人成了曹植的嫂子。可是两人情丝未断，引起了曹丕的不满。感情矛盾加上政治斗争，曹丕和曹植才成了死对头。这也可以解释曹丕为什么丝毫不念夫妻之情，登基第二年就赐死甄夫人；又为什么丝毫不念手足之情，对曹植百般刁难。

然而，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曹植和甄夫人的这段“绯闻”，会发现里面有许多“不可能”之处。首先，曹丕迎娶甄夫人的时候，甄夫人二十三岁，曹植才十三岁，两人年纪相差十岁。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怎么就早熟开始恋爱了呢？而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子又怎么会对十三岁的小孩子产生爱慕之心呢？其次，这段感情涉及乱伦。弟弟和嫂子偷情是中国人非常忌讳的家丑，更何况是在帝王之家。就算甄夫人和曹植两人能抛弃世俗观念和内心约束，曹家也不会让这段感情持续下去，肯定会早早掐断它。最终，所有认为曹植和甄夫人有感情瓜葛的说法都没有证据。也许《感甄赋》算是最有力的证据了，但是一篇文章是不能说服人的，更何况人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曹植纯粹是在描写自己的幻想或者梦境中的某次神遇。所谓的“感甄”，也可能只是感叹自己这个鄄城王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无奈吧。

三

在甄夫人死后的第五年（226），她的儿子曹叡登基称帝，成了魏明帝。

曹叡本来是没有希望登基的，因为曹丕并不太喜欢这个长子，况且他赐死过曹叡的生母甄夫人。曹丕想立其他姬妾所生的儿子，无奈皇后郭氏没有生育，其他女子生的儿子不是夭折、体弱多病，就是年纪太小，曹叡始终是唯一的继承人选择。于是曹丕就拖着不立太子，对大臣们早立太子的建议也充耳不闻。一直拖到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的身体垮了，即将死去。临终前，在病榻上仓促册立曹叡为太子。

曹叡登基后，在对待生母甄夫人的问题上立即开始“拨乱反正”。首先是即位不久，就追封甄夫人为“文昭皇后”，立寝庙祭祀。其次

是“帝思念舅氏不已”，对甄家子弟大加封赏。甄夫人的几个哥哥除了早死的，都封侯拜将。

在处理曹植的问题上，曹叡对这个三叔的文才非常赞赏，甚至称得上崇拜。但同时又觉得父亲曹丕严格限制诸侯王的政策很对，很合自己的胃口，所以继续执行。曹植依然生活在频繁迁徙、窘迫和受监视的环境中。曹植曾经乐观地认为侄子上台后，可能会让自己承担部分实职，结果大失所望，曹叡对曹植的防范丝毫不比曹丕时期宽松。太和六年（232），曹植逝世。曹魏王朝给他的谥号是“思”，曹植因此被称为“陈思王”。

曹植在晚年，认识到了王朝苛禁诸侯政策的弊端，也可能是有感于司马懿势力的扩大和刘放、孙资等人专断中枢的行为，于是向曹叡递交了《陈审举表》，写道：“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其中明确指出曹魏王朝潜伏着危机，朝廷大臣权势的上升必然威胁皇权。遗憾的是，曹叡对曹植的警醒并未在意。

曹叡对叔叔的《感甄赋》很是喜欢，不过也听到了外面的“桃色”传闻，觉得这篇文章对生母的名誉不利。认为文章的题目就起得不好，《感甄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怀念甄妃”，因此曹叡上台不久就以避母讳为由，下令将《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

如今，我们看到《洛神赋》还是会联想到甄夫人，想到她和曹植两人的不幸命运。

司马懿：一个权臣的崛起

—

魏武帝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看重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而不是东汉最重的品德、门第和声望。他多次求才若渴，发布任人唯贤的命令，广招天下名士。所以，在曹魏王朝建立过程中聚集了许多真才贤士，曹操也基本上能做到人尽其用。但对一个人，他一直看不准，不敢放开了使用。这个人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焦作温县）人，出身世家门第，是东汉末年京兆尹司马防的次子。

曹操和司马防有过交往，知道司马懿是个不错的小后生，后来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在曹操属下为官，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清廉自律，给曹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司马懿比哥哥更出色。东汉末年最知名的评论家崔琰（yǎn）就曾当面对司马朗说：“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晋书》也夸奖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这样的人才，曹操当然要去招揽了。建安六年（201），他便以司空的名义，派人请司马懿到府中任职。

天下大乱，鹿死谁手尚不可知，司马懿当时二十二岁，还很年轻，不想早早地和曹操绑定在一起。他还要待价而沽，决定婉拒。于是当曹操派的人到他家后，司马懿假装风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来人回去汇报，精明的曹操不信，派人在夜里偷偷去侦察。不想，司马

懿料到了曹操会有这一手，还躺在床上装风瘫呢！曹操这才相信，放过了司马懿。

可见，司马懿和曹操都是精明狡猾之人。司马懿年纪虽轻，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没有救国济民、匡扶天下的政治道德印记，完全是赤裸裸地对个人得失的考虑。

建安十三年（208），当了丞相的曹操再次征聘司马懿为下属。他已经知道上次被司马懿骗了，所以对使者说：“如果司马懿耍花招不来，就绑他过来。”这一回，司马懿学乖了。一方面是害怕曹操来硬的，更主要的是时局已经明朗，曹操胜利在望。司马懿觉得曹魏势力是不错的投靠对象。

司马懿初来乍到，年纪又轻，加上曹操内心总有一丝不快，在曹魏最初的十年，他并不如意，历任黄门侍郎、议郎等专为年轻人准备的小官，并没有具体工作，主要就是和曹操的儿子曹丕往来。不过司马懿有个优点，那就是选定了什么事情就好好干，既然投入了曹魏阵营，就勤勤恳恳工作，为人小心谨慎。

慢慢地，曹操把他提拔为丞相属官，留在身边出谋划策。史书上记载了司马懿给曹操出的三次主意。第一次是曹操占领了西北和汉中地区后，司马懿建议曹操乘胜进攻四川，消灭刚刚占领四川的刘备。曹操没有采纳，委婉地批评司马懿的建议不切实际，是“得陇望蜀”。这一成语即出于此。第二次是孙权上表怂恿曹操自立为帝，司马懿在一旁附和，结果被曹操断然拒绝。第三次是关羽北伐大败曹军，威胁到当时的都城许昌。曹操为避关羽锋芒，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蒋济两人及时劝阻，他认为关羽的后方不稳，孙权和刘备两派外亲内疏，迟早会起内讧，所以曹魏一方只要守住前线就能拖死关羽。司马懿的第三次建议终于被曹操采纳，后来事态的发展也如司马懿所言。

也许是司马懿太过现实，虽然能力不错，但曹操始终不喜欢他。

也有说法是曹操打击世家豪族，恰好司马懿是中原著名的世家子弟，所以曹操不肯用他。据说，司马懿的长相很怪，有“狼顾”的本领，就是能把脑袋转一百八十度，用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背后的东西。在相术上，这是一个人野心勃勃的表现。曹操相信相术，所以终生没有提拔重用司马懿。

晚年的曹操某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三匹马在一个槽里吃草。“三马食槽”的梦境让曹操很自然地 and 司马懿的“狼顾”本领联系在了一起，担心司马懿日后对曹家王朝不利。于是曹操不仅只是让司马懿担任一些清闲的虚职，还告诫儿子曹丕要提防司马懿。

但曹丕和司马懿却很合得来。尽管有父亲的多次提醒，曹丕还是将司马懿作为亲信属官，交往甚密。曹操一死，司马懿的机会就来了。曹丕非常放心地让司马懿参与操办丧事，司马懿也把曹操的丧事办得井井有条，内外肃然。不知道曹操地下有知，做何感想。

二

曹丕提拔司马懿担任丞相长史，在这个相当于曹丕秘书长的职位上，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建立魏朝出了大力。登基后，曹丕也知恩图报，使得司马懿在曹魏王朝中的地位扶摇直上，短短五年间，先是担任尚书、封侯，不久升为御史中丞，再升侍中、尚书右仆射，最后当上了抚军大将军、假节、加给事中、录尚书事，负责曹丕的政务中枢。曹丕两次伐吴，都留司马懿镇守许昌。

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驾崩，享年四十岁。司马懿和曹真、陈群、曹休同受托孤的顾命。这四人的名次是：曹真第一，陈群第二，曹休第三，司马懿第四。前三人的资历和声望都比司马懿高。

虽然排名最末，但司马懿能在七年内从一个闲职升到与曹氏皇族并列，触及曹魏王朝的权力核心，可谓是一个奇迹。这主要靠魏文帝曹丕对司马懿的格外赏识和恩宠。

曹丕死后，司马懿大红大紫的日子暂停了好长一段时间。魏明帝曹叡即位后，曹真因为主持对蜀作战，升迁为大司马，获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达到了臣子能够达到的最高权位。而司马懿的境遇就要坎坷一点儿了。

《三国演义》说曹叡即位初期中了蜀汉诸葛亮的反间计，一度罢了司马懿。司马懿只好带着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在宛城（今河南南阳）闲住。正史则记载太和元年（227）六月，魏明帝曹叡命司马懿驻扎宛城，都督荆、豫二州的军事。虽然比演义的说法要好很多，但司马懿还是变相地离开了权力中心。说到底，还是司马懿的权力缺乏扎实的基础。全靠君主恩宠得来的权力是脆弱的，一旦君主易位，原先的权势便可能烟消云散。实实在在的政绩或者私人派系才是最强大的权力来源。

新皇帝曹叡显然不像父皇那样器重司马懿，而是很厚道地让司马懿到外地领兵去了。

司马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干一行爱一行”，把现实思想和超人的才智都用在了干好工作上。当太子宾客的时候，司马懿努力和太子曹叡搞好关系；如今镇守宛地，司马懿就努力维持地方稳定。很快，立功的机会就来了。

宛城西边的上庸地区，就是现在的湖北西北部一带，由从蜀汉投降过来的孟达镇守。孟达和司马懿一样，在曹丕时代飞黄腾达，而在曹叡登基后就靠边站了。他暗中与诸葛亮联络，准备倒戈重返蜀汉阵营。这时，诸葛亮提醒孟达注意司马懿，加紧防范。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认为司马懿知道消息后要先向洛阳的曹叡汇报，然后再前来讨

伐，前后反复，需要大约一个月时间，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整军备战。结果，八天后，司马懿就兵临城下讨伐孟达来了。

原来，司马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亲自率军日夜兼程前来讨伐，大大缩短了时间。孟达惊恐地写信向诸葛亮求援，惊叹：“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最终，司马懿抵挡住了蜀汉和东吴两方面的援军，成功攻破上庸地区，“斩孟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

这一笔大功，让司马懿有了追逐权势的根基。在看到司马懿的真才实学后，曹叡更多地将军事寄托在司马懿身上。诸葛亮不断北伐，严重威胁陇西和关中地区，是曹魏王朝的心腹大患。太和三年（229），诸葛亮出兵攻占武都、阴平二郡。第二年，曹魏王朝决心对蜀汉还以颜色，兴师伐蜀，以大司马曹真为主帅，升司马懿任大将军、加大都督，为副帅。太和五年（231），诸葛亮又率兵攻魏。魏明帝曹叡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派他驻军长安，总督西部各军与蜀军作战。至此，司马懿成为负责对蜀汉作战的主将。

客观地说，司马懿和诸葛亮作战的“成绩”并不怎么好看。他主要是依靠曹魏以逸待劳、兵多粮广的优势，和诸葛亮打持久战，最后总是逼着底子薄的诸葛亮粮尽退兵，算是圆满完成了朝廷交代的任务。

谁负责解决一个王朝最紧迫的矛盾，谁就可以借此聚拢势力。在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战争是王朝的迫切矛盾。司马懿因为长期负责对蜀汉的战斗，而曹魏一半以上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西部战线，因此司马懿家族很容易地笼络了效忠自己的武装，开始了窃取曹魏王朝实权的进程。

这也是司马懿能够超越曹魏王朝的其他谋臣文人，成为窃国大盗的根本原因。曹操父子有许多谋臣，比如荀彧（yù）、郭嘉、贾诩、

陈群、蒋济等，都没有长期掌握某一方面的武装，虽然他们的官爵和司马懿不相上下，可真实权力都不能和司马懿相比。所以，最后篡国的是司马家族，而不是其他大臣及其家族。

三

青龙二年（234）年初，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十万攻魏。曹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在渭水筑垒阻击。这一仗打了大半年都不见分晓，主要原因是司马懿天天高挂免战牌，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壁不出。

司马懿的部下将领忍受不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对蜀汉日日的叫骂和挑战更是义愤填膺，多次集体要求出战。起初司马懿或严词驳回，或好言相劝，就是不准出战。军营里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战斗热情也越来越高，司马懿渐渐有点受不了了。此时，诸葛亮又来火上浇油，派人给司马懿送来“巾帼妇人之饰”，羞辱司马懿不是男人，激他出战。司马懿似乎被激怒了，气愤地向曹叡上表请战。蜀汉将士听了，都很兴奋，觉得司马懿这回总要出来了吧。诸葛亮则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这只是司马懿想搬出皇帝来制止将军出战的伎俩而已。

果然，曹叡不同意司马懿出战，还派了以耿直著称的老臣辛毗杖节来到军前当监军，节制司马懿。辛毗来了以后，司马懿的火气顿时大了许多，面对诸葛亮的挑战，常常和部将们站在一起主张出击。好几次，司马懿都带兵冲出了营帐，只怪辛毗杖节立在营门，以身阻挡司马懿出兵。曹魏军中的不满情绪日渐浓重，不过司马懿始终没有出战，还取得了重大战果：蜀汉相持不下去，主动退兵，而迫切寻求决

战的诸葛亮则死在了军中。

诸葛亮死后，魏蜀边界安静了下来。司马懿因为抗蜀大功于青龙三年（235）升任太尉。

此时的司马懿已然是朝廷的第一功臣兼能臣，名声很大。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家族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政权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在曹叡时代公然独立，与东吴势力相呼应。司马懿顺便带得胜之师讨伐公孙渊。决战前，孙权给公孙渊写信：“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孙权的忧虑一点儿没错，公孙渊哪里是司马懿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全军覆没，政权灭亡了。

就在司马懿聚敛越来越大的权势之时，曹叡对司马懿产生了怀疑，他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虽然提问的前提是司马懿“忠正”，但既然认为他“忠正”，为什么还要怀疑他是不是“社稷之臣”呢？陈矫的回答非常干脆：“司马公在朝廷众望所归，对社稷是否有利，臣就知道了。”

正是在这种怀疑下，景初二年（238），曹叡在病危的时候，最初确定的顾命大臣群体是以叔叔燕王曹宇为首，包括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里面几乎清一色的曹氏宗亲，而将司马懿排除在外。其中曹宇与曹叡虽然是叔侄，但因为年龄相仿，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可是曹宇只当了四大大将军，就坚决要求辞职，曹叡的意思也发生了改变，同意曹宇辞职，亲手否决了最初的顾命大臣集团。其中的关键在于刘放、孙资乘曹叡病危之时，屡屡篡改诏令，迫使曹宇等人无所适从，而司马懿紧急入京抢位置。曹叡最终让太尉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即年仅八岁的曹芳。

曹芳即位，司马懿加封侍中、录尚书事，总督中外诸军，和曹爽

共执朝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算是司马懿的晚辈，加上的确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凡事尊重司马懿的意见，遇到政策难题、边界战争等棘手的事情都推司马懿出面主持。司马懿把这些事情处理得都很好，尤其是把来犯的东吴大军打得屁滚尿流，权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司马家族陆续有子弟十一人封侯，司马懿本人食邑万户，部属门生遍布朝野。

这时候，作为皇室的曹爽兄弟看到了危险：内外倾心、掌握实权的司马懿已经威胁到了曹魏的皇权！这一点曹爽老早就意识到了。于是曹爽势力对司马懿发动突然袭击，夺其实权，排挤司马氏的势力。从正始八年（247）开始，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司马懿进入了政治冰河期。表面上，司马懿装出行将就木的样子，暗地里联络势力蓄养死士，伺机反扑。曹氏宗室因为长期被闲置，短期内难以聚拢强大的势力。正始十年（249），司马懿终于抓住曹爽兄弟麻痹大意的机会，发动了“高平陵政变”。

“高平陵政变”是曹魏政治的分水岭，之前曹魏政权掌握在曹魏皇室手中，之后司马家族开始了谋权篡位的进程。

司马懿的崛起，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他的能力很强，连中国人公认聪明绝顶的诸葛亮都没能打败他；他的忍耐力很强，遇到挫折和困难能够坚韧耐心地克服，迎来柳暗花明，这从他政坛的三个低谷期中能够看出来；司马懿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铁腕执政，甚至有些残忍。战场屠城，将政敌诛灭满门，他都干过。

司马懿一路走来，是踏着成千上万人的鲜血上位的。比如在处理曹爽集团问题上，司马懿认为“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颺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坚持将所有在押人等族诛。结果，曹爽兄弟，党羽何晏、邓颺、丁谧、李胜、桓范、张当等人都被夷灭三族。在讨平辽东时，司

司马懿竟然大开杀戒，将尸体堆积成山，号为京观。总之，司马懿是个挺冷酷凶残的人，导致西晋王朝在胚胎孕育时期便充满血腥。

由于对蜀汉的战争使司马懿获取了牢固的权势根基，因此有人怀疑他举全国之力，没有把兵少将寡的诸葛亮打败，是在“养寇自肥”，同时曹魏王朝对宗室的限制也为司马懿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曹丕心眼小，对宗室不太放心，防范太过，就更不要说让他们掌握实权了。这就让原本可以成为皇室屏障，在关键时刻捍卫皇室的宗室毫无力量。司马懿掌权后，进一步将宗室都集中在洛阳，暗中软禁。司马家族的篡位之心暴露后，忠于曹魏的外姓军队只是在扬州等地发起了零星的反抗，很快就被司马懿父子扑灭了。司马懿还借机向宗室亲王大开杀戮，后者却毫无还手之力。

篡国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没有得力的儿子，老子的篡国成果便很可能半途而废。幸运的是，司马懿有两个好儿子：长子司马师和次子司马昭。兄弟俩继承了父亲的精干坚韧和残忍，继续推动曹魏向西晋转化。西晋建立后，司马懿被孙子司马炎追尊为晋宣帝。

高平陵政变改写了谁的命运

—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叡去世，他年幼的侄子齐王曹芳即位。

经过一番权力的暗箱操作，司马懿和曹爽两人共受遗诏成为辅政大臣。曹叡的意图是希望在身后形成功臣和皇族共治的局面。司马懿是三朝老臣，功勋卓著，是功臣集团的代表；曹爽出身曹氏宗族，血统高贵，是皇族势力的代表。

曹爽是个“权二代”，崛起全靠他的父亲曹真，曹真是曹操的同族子弟。曹真的父亲曹邵是最早随曹操起兵的元老之一，不幸早年阵亡。曹操收养了曹真，和曹丕等人一起教育培养。曹真长大后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开始显贵。曹丕死时，设计了曹真、陈群、司马懿“三驾马车”同受遗诏辅政的权力架构，其中曹真任大将军，为首辅。曹叡在位时，曹真因为主持对蜀作战，再升迁为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达到了臣子能够达到的最高权位。曹真这个人，能力其实一般，除了根正苗红这个优势外，终生小心谨慎，恪守臣子之道，对曹氏祖孙三代忠心耿耿。

曹真死后，长子曹爽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另外五个儿子羲、训、则、彦、皓皆封为列侯。曹爽可以看作父亲曹真的翻版，年少时以“宗室”“谨重”这两个特点为人所知。曹叡从小和同辈、同龄的曹爽走得很近，关系亲密。曹叡即位后当然要依靠曹爽这样的同族兄弟兼

发小了。曹爽顿时平步青云，仕途顺利。平坦的履历虽然让曹爽积累了一定的行政经验，但显然不能参透政治的实质，掌握政治的技巧。

曹爽非常清楚，无论资历、功劳、能力，还是在朝臣中的威望和根基，自己都不能与同朝辅政的司马懿相提并论。当年，司马懿和曹真一起领兵作战的时候，曹爽还在玩捉迷藏呢。曹爽敬重司马懿年德并高，用对待父亲的礼节礼遇司马懿。虽然自己爵位在司马懿之上，但曹爽凡事不敢专断，都和司马懿细心商量。司马懿对曹爽这个晚辈也比较满意。两位辅政大臣一开始还相安无事。

然而曹爽毕竟是在蜜罐里长大的，还没有学会珍惜，也不懂真正的谦虚谨慎。没过多久，曹爽贵族公子的性情就显露出来了。他不像刚主政时那般勤勉政事，身边也逐渐聚集了何晏、丁谧等贵族子弟。这些人虽然能力不济，但从小就在争权夺势的大环境中耳濡目染，劝说曹爽不要将权力与他人分享，要独断专行。其中何晏就多次劝说曹爽：“司马懿有政治野心，而且很得民心，我们怎么可以对这样的人推诚相见呢？”说一两次，曹爽没有反应，说的人多了，说的次数多了，曹爽心里的“小九九”就活动了。他也想专权，也有皇族的尊贵心。最终，曹爽决定首先对司马懿发动进攻。

曹爽让二弟曹羲替自己上表，请皇帝转任司马懿为太傅。太傅虽然地位崇高，但并不直接指挥部队，也没有直接负责的领域，完全是虚职一个。曹爽这一招“明升暗降”，让根本没有防备的司马懿措手不及，只好接受“升迁”，乖乖交出兵权和政权。辅政大臣依然是两个，曹爽依然对司马懿保持着礼貌。但所有的政务都不必经过司马懿了。司马懿干脆长期称病，不上朝。

大获全胜的曹爽立即开始人事大调整。他让二弟曹羲任中领军，三弟曹训为武卫将军，控制了京城洛阳的军队，负责皇宫的警卫，五弟曹彦任散骑常侍，另两个弟弟曹则和曹皓以列侯身份出入宫禁，控制曹芳。同时，曹爽还将因“浮华交会”而在曹叡时期遭贬抑的何晏、

邓飏、丁谧、毕轨等纨绔子弟重新启用，各委要职，作为心腹。

曹爽所用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何晏是曹爽集团的重要人物。他本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他的母亲尹氏，已经嫁入何家，生下何晏了，还被曹操抢走，做了曹家的夫人。有人便怀疑何晏是曹操的私生子。何晏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娶了公主，和曹家的关系既密切又尴尬。平日里，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还公开好色，是扭捏作态的奶油小生和派头十足的公子哥儿的混合体。当然，何晏也有好的一面：他对老庄学说很有研究，是盛行于魏晋的“玄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大凡有点儿小成就的公子哥儿都好卖弄，何晏尤其缺乏自知之明，到处炫耀自己的才学。曹丕特别憎恶他，每次都不呼何晏的姓名，而叫他“假子”，毫不留情地揭何晏的老底。就这么一个人，曹爽将朝野的选举大权交给了他。

集团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邓飏，字玄茂，很小就因为与李胜等人浮华虚夸而闻名于京师。邓飏这个人还贪财好货，在宫中担任职务的时候暗中许诺授予臧艾显要官职，臧艾就将父亲的小妾当作礼物送给了邓飏。京师里流传的段子说：“以官易妇邓玄茂。”邓飏几乎都是这么来推荐与提拔官员的。

何晏等人专政后，共同私自分割洛阳、野王典农屯田系统的桑田数百顷，还将皇家园林等吞为私人产业。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私分国有资产”。他们不仅窃取官物，还公开向地方州郡索取贿赂。相关部门慑于他们的权威，不敢抗拒。何晏等人与廷尉卢毓（yù）素来不和。卢毓的属下官吏有小过，被何晏等人抓住把柄，穷究卢毓的责任。何晏在得出结论之前，迫不及待地派人收取了卢毓的印绶，然后再向朝廷奏闻。对位列九卿的人，何晏都敢猖狂如此，他们作威作福的程度可想而知。

再说回曹爽，他个人的饮食车服，相当于皇帝曹芳；尚方珍玩，家里到处都是；后庭妻妾多位，还私取曹叡生前的才人七八人，并将曹叡的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带到自己家里取乐。后来曹爽的胆子越来越大，伪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到邺台，让曹叡的婕妤教习为伎，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供私家使用。这些都是侵犯皇室、大逆不道的罪行，曹爽都肆无忌惮地做了。他还建造窟室，在四周陈列绮罗，多次和何晏等人在里面饮酒作乐。曹羲非常担心哥哥的行为，多次劝谏曹爽要收敛言行，约束心腹，甚至数回劝到伏地哭泣不起的地步，曹爽就是不听。

曹爽执政几年间最主要的举动是发起伐蜀之役，想借机建立军功。久经战阵的司马懿知道军事并非曹爽所长，且伐蜀时机亦不成熟，劝曹爽不要轻起战事。立功心切的曹爽被美妙的政治前景迷惑，执意在正始五年（244）亲赴长安，征发六七万士兵进击蜀国。因为后勤供应不上，劳民伤财，民怨沸腾，结果无功而返。

司马懿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暗中筹划。他虽然被剥夺了实权，但影响力依然存在。门生故旧中好多人掌握着军队和政权，心向司马家。司马懿打败的政治对手多了去了，这一次他也自信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缺的只是一个合适的进攻时机。

二

曹爽比一般的纨绔子弟还是强很多的，他对司马懿并非没有防范。

荆州人李胜依附曹爽后平步青云。一次，李胜由河南尹任上调任荆州刺史。虽然级别没变，但荆州地处对吴国斗争的最前线，军事政

治地位重要，李胜也算是升了半级。曹爽对终日称病在家的司马懿不放心，就让李胜去探探司马懿的底细。司马懿曾经镇守荆州，李胜就以新官赴任，向前辈请教的名义去司马懿家辞行。

李胜没料到司马懿几年不见，憔悴异常，都离不开下人的搀扶了。他很谦虚地向司马懿陈述，自己功劳浅薄，横蒙特恩，即将回到本州担任主官，特地来向司马太傅拜辞，请太傅多多指教。司马懿根本就沒回答，而是慢腾腾地让两个婢女侍候穿衣。他颤巍巍地拿起衣服，没拿住，衣服滑落；他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表示口渴要喝水。婢女进了一碗稀粥，司马懿端碗饮粥，结果像不会喝水吃饭的婴儿一样，把粥流得到处都是，沾满前胸。

李胜不禁神情黯然，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他对司马懿说：“今主上尚幼，天下还要仰仗太傅。大家都在传说太傅旧病复发，想不到您的身体差到了这种程度！”司马懿好久才缓过劲来，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年老多疾，死在旦夕。使君这次去并州就职，并州和匈奴邻近，你要好自为之。今日与你相见，恐怕日后不复相见了，令人伤感啊！”李胜连忙说：“太傅，我这次是回本州任官，并非并州。”司马懿满脸茫然地问：“噢，原来你刚从并州回来啊，辛苦了！”李胜见司马懿胡言乱语，只好提高声音说：“我去荆州，不是并州。”他回头问在场的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太傅病成这样了啊？”司马师痛苦地点点头。

司马懿在司马师和下人的反复说明下，才恍然醒悟，对李胜说：“我老了，神情恍惚，不解君言。如今你荣归故乡担任刺史，多建立功勋。今日与君一别，我自顾气力转微，要与你永别了。”说着，司马懿怅然泪下，司马师忙上去帮父亲擦去眼泪。司马懿顿了顿，指指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对李胜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希望与君结为好友，盼你日后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多照顾。”说完，司马懿又流涕哽咽。李胜也唏嘘长叹，回答说：“我一定从命。”最后，李胜以参加追悼会的肃穆神态，与司马懿父子动情告别。

李胜辞出后马上跑到曹爽府上，报告说：“司马太傅语言错乱，口不离药，南北不分。最后他还将两个儿子托付给我，分别时依依不舍。”说完，李胜感叹道：“司马懿的病看来是好不了了。”曹爽也感叹了一番，但心里非常高兴。司马懿一死，就再也没有人能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了。从此曹爽集团不再把司马懿放在眼里。

三

正始十年（249）正月初六，魏帝曹芳按照惯例到高平陵（今河南洛阳东南）祭扫魏明帝曹叡的陵墓。曹爽和弟弟曹羲、曹训、曹彦都随驾前往。曹爽及其党羽几乎是全数出动。

曹爽的党羽大司农桓范劝阻说：“大将军兄弟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全部外出。如果有人关闭城门发动政变，怎么办？”曹爽很不高兴地说：“谁敢造反！”他执意率兄弟亲信出发前往高平陵，桓范选择独自留在洛阳。

在曹爽集团出城的前一天晚上，司马懿的小儿子司马昭彻夜难眠。因为这天夜里，父亲郑重告诉他第二天将会有决定司马家命运的大事发生，要他抓紧时间休息。司马昭不知是兴奋或是激动或是紧张，在床上辗转反侧。而哥哥司马师，早已参与了父亲的谋划，一上床就鼾声如雷。

曹爽等人一出城门，“久病”的司马懿就披挂上阵，带领两个儿子跨马冲出了家门。司马师在暗中早已准备了三千死士，这时纷纷发难。城中许多官员都是司马懿的旧同事、旧部下，见状多数加入司马家的队伍，少数采取观望态度，对动乱无动于衷。司马父子关闭了洛阳城的各个城门，之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又带人占据了武器仓库及皇

宫。控制了洛阳城后，司马懿命令高柔假节并代理大将军一职，以王观代理中领军，分别夺取了曹爽和曹羲的军权。曹氏兄弟虽然在洛阳城中留有許多中下级军官和数量可观的军队，但军营群龙无首，接替的又是朝廷三公九卿，这些官兵没有反抗，很轻易地转化成了司马懿家族的军事力量。

一切准备就绪后，司马懿带领朝廷重臣入宫，向皇太后郭氏上奏曹爽祸乱宫廷内外的种种劣迹，事事有据可查，桩桩可以置曹爽于死地。这些都是曹爽平日不注意的后果。郭太后无话可说，追认了司马懿之前叛乱行动的合法性，并授权司马懿成立一个“专案组”，查处曹爽集团的不臣不法行为。有了郭太后的批准，司马懿向远在城外的曹芳上表，将曹爽的罪行一一列举，并亲自带兵占据了洛水桥头，迎接曹爽可能的反抗。

高平陵的曹爽被司马懿的突袭打懵了。接到司马懿给皇帝曹芳的上奏后，曹爽手足无措。司马懿还未全部控制洛阳时，曹爽府上的司马鲁芝和辛敞就突围出去向曹爽报信了。曹爽完全可以及时应对，但他就地踌躇，和手下反复商量，最后“憋”出来两个应对措施：第一是在高平陵地区草草扎营；第二是调拨了周边几千屯田兵增加自己的守卫。小家子气的曹爽没有想如何去积极应对司马懿的进攻，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守卫问题。他那几千兵马和一小群显贵停留在高平陵，不是坐等覆灭，是什么？

司马懿也料到曹爽兄弟几个人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对策。他最担心的就是还留在洛阳城里的曹爽党羽桓范。司马懿封锁洛阳后就立刻以郭太后的名义征召桓范，要任命他为中领军，拉入自己的阵营。桓范也想投入司马懿阵营，司马懿以权力高官来引诱，桓范怎么能不动心呢？但儿子劝他说，皇帝车驾还在外面，曹爽集团还有极大的力量，胜负难料。儿子劝桓范不如出城去和曹爽等人会合，争取做个平乱的功臣。桓范觉得儿子的建议替自己规划了一条更好的道路，下定决心突出城去。

桓范单人匹马冲到洛阳的平昌城门，城门已闭。守卫的门候司蕃是桓范以前的属下。桓范把他叫出来，举起手中的令牌一晃，矫旨说：“皇上有诏召我去高平陵，你快开城门！”司蕃半信半疑，就向桓范求见诏书。桓范严厉训斥他说：“你难道不是我的故吏吗，现在何敢如此放肆？皇上的诏书，也是你这样的人能看的吗？”司蕃被老上司的气势压倒，让人打开了城门。桓范策马迅速出城，回过头来对司蕃说：“太傅造反了，你快跟从我去勤王吧！”司蕃顿时傻了眼。司马懿得知桓范出城后，认为：“桓范虽然善于出谋划策，曹爽却肯定不会采用。”旁边的太尉蒋济也认为：“桓范是很聪明，无奈驽马恋栈豆，曹爽不能用好桓范。”司马懿为了稳住曹爽，先派弟弟司马孚前往高平陵，以皇帝曹芳在外不可露宿为由，送帐幔、太官餐具等给曹芳使用，又接二连三地派曹爽平时的好友去做说客，告诉曹爽说自己只是为了夺权，并无意相害。高平陵那一边，司马懿的使者陆续到达。他们将司马懿的话原般告诉了曹爽，安抚他，还带来了太尉蒋济的书信。信中又重复了承诺，说司马懿只想夺取曹爽集团的权力，并不加害诸位的性命。劝说的人多了，曹爽逐渐相信了这些承诺。

这时候，桓范来到了高平陵。他看曹爽心思动摇，建议说：“临难反扑是人之常情。大将军可以调动天下兵马，洛阳周边就有不少部队。高平陵距离许昌不过一天的路程，许昌的武库足可以支持大军的用度。我身为大司农，又带来了印绶，足以筹集大军的粮草。大将军应马上拥戴皇上南下许昌，宣布讨伐叛逆司马懿！”

桓范“南下许昌，讨伐叛逆”的建议，汇聚了曹爽手中的所有优势。第一，曹爽还掌握着小皇帝曹芳，这就让曹爽占据了政治权威的最高点，也是司马懿不敢对高平陵发动进攻的主要原因。第二，曹爽等人印信都带在身边，权力依然在手，完全有调集军队和司马懿一战的能力。其中曹爽、曹羲兄弟两人有权调动天下兵马讨伐司马懿，桓范作为大司农，可以合法调拨军事物资。第三，高平陵离重镇许昌不远。许昌从东汉末年曹操迎立汉献帝于此，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经

济耕耘，已经成为中原的大据点，粮草充足、城池雄厚、地位崇高。曹爽占领许昌，进可以凭借许昌讨伐洛阳，退可以做长期割据与司马懿争雄的打算。南下许昌，就可以汇聚曹爽的所有优势，只此一招就能瞬间改变局势。

但曹爽对桓范的建议犹豫不决，曹羲也沉默无言。桓范知道曹爽身边就曹羲还是明白人，便对曹羲说：“事情已经很明白了。您读书是为了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在今天这样关系皇室安全的关键时刻下定决心吗？”曹爽兄弟还是沉默不言。桓范再对曹羲说：“您现在还能指挥洛阳城南的驻军，如果调拨他们护驾，快的话半天就能到达许昌。皇上驾临，许昌肯定要开门相迎。匹夫被逼急了，还知道劫持一个人质，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现在我们有天子相随，可以号令天下，谁敢不应？”曹爽和曹羲兄弟等人还是默然不从。最后，大将军曹爽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话来：“诸位勿急，让我好好想想。”

当晚，曹爽在高平陵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紧要艰险的政治选择。一边是司马懿的承诺，一边是冒险的政治搏斗，这一夜，曹爽始终无法合眼。

第二天五更天，初升的太阳照耀在高平陵上。周围的人早早就聚集在曹爽的营帐里面等待着大将军最后的决定。营帐里聚拢的人越来越多。曹爽看看大家，猛地将案上的佩剑掷在地上，说：“太傅之意，不过是争权。我交出权力，仍不失做富家翁。”桓范一下子哭了出来：“曹大将军生了你们这群猪！想不到我今日要受株连灭族了！”曹羲等人默然无声。桓范哭着离开了营帐，孤独地策马返城。

曹爽随即将司马懿弹劾自己的表章上奏了曹芳，主动请求免去官职。曹芳尚未成年，并不理解其中的利益关系，就将曹爽解职。曹爽交出了大将军印绶，送给司马懿。送印使者即将出发的时候，主簿杨综拉住曹爽提醒说：“大将军您一交出此印，恐怕就性命难保了。”曹爽摇头说：“太傅不会失信于我的。”

郊祭高平陵一行就此草草收场。曹爽陪伴着曹芳，君臣默然返回洛阳。曹爽出城时，仪仗遮天，护卫如云，许多人将郊祭看作和曹氏兄弟拉关系的好机会，随从甚多。回城时凄风惨雨，那些附会富贵之徒随走随散，临近洛阳时只剩曹爽兄弟孤零零的几个人了。

经过洛水上浮桥的时候，曹爽原本还想和司马懿打个照面，可是司马懿看都不看他一眼。曹爽兄弟满怀惆怅地回家去了。桓范遇到司马懿，下车向司马懿叩头，说不出话来。司马懿问他：“桓大夫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呢？”桓范依然说不出一句话来，默默走开了。

曹爽回到他的府第后被立即软禁。司马懿调拨了洛阳八百平民将大将军府团团围住，并在四角建高楼密切监视。曹爽被软禁后，计穷愁闷。他非但没有反省思过，也没有谋划反扑，竟然到后园中玩弹弓。府外高楼上的平民见到曹爽就高喊：“前大将军向东南方向走了！”曹爽这才没了玩兴。

曹爽和几个兄弟共议对策，大家思考的都只是对自己的处置问题。因为苦于不知道司马懿的真实意图，曹爽给司马懿写了一封信，说府上的存粮不多了，请求司马懿支援一些粮食。司马懿二话不说，马上送来大米一百斛和充足的肉脯、盐豉、大豆等。曹爽兄弟自以为得计，都很高兴，认定自己肯定是死不了了。

暗地里，司马懿早已任命了之前受曹爽集团迫害的卢毓来“追认”曹爽集团是如何大逆不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曹爽等人劣迹累累。司马懿、卢毓不分昼夜地严刑逼供，最后审出了一个“原大将军曹爽预谋本年三月兵变篡位”的大案子来。

这些幕后审讯都是背着曹爽集团进行的，只对一个人开放，他就是何晏。司马懿让何晏参与了对曹爽集团的审查工作。何晏以为是司马懿重视自己，审讯起曹爽同党和自己先前的同伙来凶凶极恶，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审讯线索和证据，希望能给自己开脱。结案时，司

马懿说：“要族诛八家。”何晏将曹、丁、邓、李等人数了一遍，只有七家，就说只需要族诛七家就可以了。司马懿坚持说：“必须族诛八家。”何晏突然头皮一麻，怯生生地问：“难道也包括我何家？”

正月初十，司马懿以谋反罪将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人下狱。这一天距离桓范劝曹爽兄弟千万不要全部离城去高平陵，只有五天时间。

政变过后的第二个月，曹芳任命司马懿为丞相，并给予司马懿奏事不名的待遇。至此，司马懿独立掌握了曹魏的政权，为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局面的出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高平陵政变其实是一场并没有多大悬念的政变，斗争双方的能力高低一看即知。曹爽只是因为凭借较高的起点和突然袭击，取得了最初权力斗争的胜利。但他所代表的集团堕落无能，政治上极端幼稚，被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抓住机会，一招毙命。当然曹爽集团内部也有能人比如桓范，曹爽在政变中也有翻牌的机会，但他们的出身和性格注定了他们最后失败的命运。

竹林七贤来了

—

正始九年（248），二十四岁的嵇康带着家眷从都城洛阳来到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寓居。这本是历史长河中很细微的一次人口流动，却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起到了惊天动地的杠杆作用。此举引发的历史光芒贯穿将近两千年的时空，至今让我们目眩不已。

嵇康和山阳的结合，是资源的强强联合。嵇康，谯郡铚（zhì）县（今安徽濉溪）人，出身贫困家庭且早年丧父，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长大后精通文学、玄学、音乐等，成了当时文坛的领袖之一。史载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中国的政治喜欢将体制外的青年才俊纳入到体制中来，以免他们成为体制的敌人。曹魏朝廷就喜欢上了表里俱佳的嵇康，有意笼络，嵇康很顺利地迎娶了曹操曾孙女（一说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成了皇亲国戚，官拜中散大夫。这个官职更多是象征意义的，后人查不到嵇康去官署施政的记录，只是习惯性地尊称他为“嵇中散”。

山阳县，地形俊胜，“天下之脊”太行山的南端就始于这里。在这座顶着天下脊梁、矗立在中原核心的小县城里，曾经上演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山阳是春秋时期诸侯逐鹿中原的焦点地区；前朝汉光武帝刘秀据有河内而后完成中兴大业，他的子孙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

禅位于曹魏后被贬至此地，封为山阳公，于魏明帝青龙二年（234）死在山阳。

当年嵇康才十岁，不可能对汉献帝的死有深入的理解。之后嵇康逐渐长大，从民间走上朝堂，经历的事情多了，对十多年前死在山阳的汉献帝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是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环顾朝堂，嵇康看着司马懿父子的势力蔓延开来，侵蚀种种实权，而可能与之抗衡的曹爽等人志大才疏，还浑然不觉。有识之士都预料到，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即将开始！嵇康在感情上亲近曹魏皇室，他毕竟是曹魏的女婿，是曹魏赐予他荣华富贵的，但嵇康不愿意参与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明争暗斗。因为权争之中充满阴谋、虚伪、血腥和其他肮脏的东西，嵇康不愿意为之，也自认为没有能力为之。

身在朝堂又不愿意和黑暗政治同流合污，嵇康只能自我放逐，把目光投向了山阳——在那里，前朝皇帝被拉下龙椅后默默度过了余生。

来到山阳境内，嵇康并没有在县城中寻找宅邸，而是在山阳城外东北约二十里的白鹿山南一处泉水边，盖起了寓所。也许这才符合他自我放逐的本意。住宅四周原本有竹子，嵇康又加种了不少，形成了一片竹林。竹子的洁身独立、高节洒脱、疏疏淡淡、不慕虚华，都让嵇康心生喜爱。

青山脚下、流水岸边的这片竹林，吸引了与嵇康志同道合的精英分子纷至沓来。

紧随其后走入竹林的是三十八岁的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籍。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

从阮籍的成长轨迹和以往思想来看，他似乎不至于走入竹林，和嵇康一起清谈隐居。阮籍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抱有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心态。他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而他，阮籍，自然就是那个没有出现的“英雄”。同时，他也看到了现实政治的黑暗，看到了种种和圣贤教诲不符的事实，可他认为这恰恰是现实需要儒家教化，需要他这样满腹经纶的人才的表现。

遗憾的是，等阮籍真正进入官场，沉浮十数年后，又不得不承认现实政治像墨一样黑，黑得让他完全看不到理想的彼岸在何处。经历了震惊、迷茫和痛苦之后，阮籍学会了逃避，学会了明哲保身和谨言慎行。就在当年，曹爽征召阮籍出任自己的参军，要拉他进入曹氏集团。阮籍不愿意被捆绑在任何派系的战车上，便托病辞官返乡，找嵇康来了。

第三个走入竹林的是四十三岁的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山涛。

山涛和嵇康一样是孤儿，都是从贫苦中自学成才的。他之前的人生经历比嵇康、阮籍要曲折得多，直到四十岁才做了官，当了郡主簿。眼看仕途有所起色，山涛却忧虑地发现了隐藏在平静下面的暗潮。一天夜里，山涛和同事石鉴（此人后来成了西晋的太尉）共宿，半夜他踢醒石鉴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睡觉！你知道司马太傅卧病不出，有什么问题吗？”石鉴睡眼惺忪地回答：“皇上让太傅回家养病，关我们什么事！”山涛骂道：“咄！马蹄声起，眼看就要刀光剑影了，怎么会没事呢！”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不安，山涛也选择了弃官而去，寻找一寸宁静之地，安心思考生活。

嵇康、阮籍、山涛三人构成了竹林中最初的交谈核心。三人之中，嵇康年纪最小，可以算是其他二人的子侄辈，但凭借精深的学问、崇高的声誉和皇亲国戚的光环，成了领袖。三人之中，山涛年纪

最大，生活最为窘迫。家里全靠夫人韩氏操持，一次他和妻子打趣说：“夫人忍忍饥寒，等我日后位列三公，不知道夫人能不能做好高官太太？”山涛又对妻子说：“眼下能做我朋友的，就只有嵇康和阮籍了。”韩氏很好奇，想看看他们。一天，嵇康和阮籍来山涛家做客。韩氏劝山涛将两人留下来住宿，夜里韩氏躲在帘子后面，观察嵇康和阮籍，听他们彻夜长谈。朋友走后，山涛就问妻子有什么感受，韩氏坦率地说：“你的才智、情趣，和嵇康、阮籍相比，差远了！只有你的见识、气度，勉强还能和他俩比一下。”韩氏的判断，也是一般人的观点。在竹林七贤中，才情声望都推嵇康为首，阮籍次之，山涛又次之。

二

阮籍的侄子阮咸，听说叔叔和几个世外高人躲在竹林中，饮酒高歌、畅谈不休，非常羡慕，缠着叔叔介绍自己进入了这个小圈子。

别看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名声并不在阮籍之下，和叔叔并称“大小阮”。阮咸为人狂放，不拘礼法，尤其弹得一手好琵琶。唐代后，人们根据阮咸琵琶的样式制造了许多复古琵琶，为与西域传入的琵琶相区别，干脆将复古琵琶称为阮咸，简称“阮”。可见，阮咸的琵琶功夫了得，影响了上千年。

阮咸和叔叔阮籍这一系，家里比较穷，居住在道南，而居住在道北的阮姓同族都很富有。七月七日，北边的阮家在院子里晒衣服，都是纱罗锦绮。阮咸就在院子里架起杆子，挂了许多布衣烂衫。人们问他为什么把贫困的家底都亮出来，阮咸自嘲道：“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他的未能免俗，不是攀比，不是附庸风雅，而是带有一种朴素的真实，是真性情的表露，远比富裕同族们的炫耀高贵得多。既另类

又真诚的阮咸很快就被三人核心接纳了。

此外，河内怀县的书呆子向秀和沛国（今安徽淮北）人刘伶也加入了清谈行列。刘伶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最擅长喝酒和品酒，还专门写了篇《酒德颂》谈喝酒的好处。他长期酗酒，因此得了病。一次，刘伶酒病又一次发作，还要妻子拿酒来喝。妻子哭着把酒都洒在地上，摔破了酒瓶，恳劝他说：“喝酒伤身，你看你都喝出病来了！一定要戒酒了！”刘伶就回答：“好，戒酒！可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没法戒酒，必须在神明前面发誓，才能戒得掉。麻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妻子信以为真，准备酒肉供在神像前，刘伶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他抢过神像前的酒肉，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结果又喝得酩酊大醉。

刘伶长得又矮又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一次他喝醉酒和人吵了起来，对方卷起袖子就要揍他，刘伶很镇定地说：“我身子像鸡肋一样细小瘦弱，哪能受得了老兄的拳头啊。”对方听了大笑，也不揍他了。但是他的运气不会总是这么好，慢慢地得罪的人多了，刘伶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差，他也越来越不与人交往，对人情世事漠然以对，只是喝酒而已。奇怪的是，刘伶和阮籍、嵇康两人却很投机，一见面就有说有笑。很自然地，他也加入了竹林中的谈话。

竹林的名声散播出去后，山东琅琊人王戎闻风而来。王戎的年纪很小，比嵇康还小十岁，比山涛小了二十四岁，走入竹林的时候还只是个十四岁的毛头小子。

别看王戎年纪很小，却是个神采飞扬的神童。他出生于山东琅琊的官宦人家，从小聪慧，学问日益精进，善于清谈。王戎对老庄清静无为的学说很喜爱，也是嵇康的崇拜者。直到老年，王戎回忆起嵇康来还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阮籍认识王戎也比较早。王戎的父亲王浑担任尚书郎时和阮籍是同事，王戎也跟着父亲

住在官舍中。每次阮籍去拜访王浑，话不投机，说不了几分钟，却和小小的王戎很聊得来。两人一谈就是大半天，成了忘年之交。阮籍很不客气地对王浑说：“你儿子清俊绝伦，你根本比不上他。和阿戎说话，比和你说话有趣多了。”

王戎崇尚清静和清谈，更多的是出于年少时候纯美的理想，其中还掺杂着丝丝叛逆的情绪，缺少山涛、嵇康、阮籍等人对现实无望之后的谨慎与逃避——王戎压根就还没进入社会。其实，王戎内心对功名利禄并没有免疫力，相反对花花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因此，阮籍虽然喜欢王戎的聪慧和清谈，对他的人品并不看好。

几个人里面，王戎是最晚参加竹林清谈的。他刚来，阮籍就高喊：“有俗人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王戎淡淡地反驳说：“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可以败坏你们的兴致呢？”

就这样，山阳城外竹林中的七位常客：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时常聚首，畅饮高谈，醉了就卧倒泉边，醒来继续清谈歌唱，世谓“竹林七贤”。

三

竹林七贤，不仅仅是竹林中的七个人，更代表了魏晋一代苦闷和挣扎的知识分子群体。

首先，竹林七贤都是黑暗现实的逃避者。从东汉末期开始，现实主义政治和弱肉强食的思想在政坛上横行，后来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曹魏建立后，仁义道德虽然重新被提倡，被树立为意识形态的旗帜，但起实际作用的依然是务实残酷的斗争法则。而另一面，曹魏朝廷又不能恢复两汉统一时期的强大权威，不能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就为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思考留下了空间。知识分子多数是读圣贤书成长起来的，信奉仁义道德，多数人崇尚公正自由的生活。当他们满怀抱负地入世之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让他们迷茫、徘徊和痛苦。他们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又不愿意继续受残酷现实的压迫，只能选择逃避，躲进了竹林。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嵇康、阮籍和山涛都是如此。

其次，竹林七贤表面上是礼教的背叛者，实际上却是礼教真正的信奉者。后人谈起竹林七贤，第一印象往往是他们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做派。人们都说竹林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为什么他们好老庄学说呢？因为老庄的清静无为、效法自然，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当高官厚禄变为让知识分子放弃独立和思想的诱惑，当仁义道德变为黑暗政治的遮羞布，当一切规则、规范和礼教变为幌子、棍子和刀枪的时候，现存社会的制度和说教还值得信赖和遵奉吗？既然被朝廷和普通人都奉为宝典的制度规章不值得信赖，逃避而去的知识分子便躲进了道家的无为和清淡之中。

在嵇康他们之前，以夏侯玄、何晏、王弼等为代表的“正始学派”也对现实失望，完全步入了虚无。他们把老庄的虚无主义倾向发挥开来，崇尚世界本无。但令人不解的是，“正始学派”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曹爽集团，介入了曹魏与司马氏的争斗。竹林七贤则把老庄学说中的“自然”发挥开来，讲求一切顺其自然，追求无拘无束的个人生活。

无拘无束的生活表现在竹林七贤的“放达”上。阮籍有言：“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曾和姑姑家的鲜卑婢女私通，母丧期间听说鲜卑婢女要随姑姑到远方去了，阮咸穿着孝服，骑上毛驴就去追，后来载着那个婢女一起回来。阮咸还说：“人种不可失！”原来鲜卑婢女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这在魏晋时期可是惊世骇俗的事情。阮氏族人都善于饮酒，阮咸和族人喝酒，都不用一般的酒杯，而用大瓮盛酒，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喝。一次有一群猪来找大瓮，把酒当水喝起来，阮咸也

无所谓，趴着和猪群一起喝酒。酒鬼刘伶有次赤身裸体地接待客人来访，客人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

很多人凭此来批评竹林七贤，攻击他们行为放荡，不守礼法，进而攻击他们不忠不孝。实际上，竹林七贤才是真正的忠孝仁义的尊奉者。比如阮籍就是个孝子，当他母亲逝世的时候，阮籍正与人下围棋，棋友说下不了，你去办丧事吧，阮籍却坚持把围棋下完，之后还喝了二斗酒。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阮籍不孝的证据。可阮籍喝完酒后就号叫一声，吐血数升。当他母亲要下葬时，阮籍又吃了一个蒸肫子，喝了二斗酒，然后又号叫一声，再次吐血数升，整个人“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可见阮籍的悲痛已经深入血液骨髓，不是一般的痛苦了。裴楷去吊丧，看到阮籍醉醺醺的，散发箕踞，直愣愣盯着客人看，既不招呼也不搭理。裴楷吊唁完毕就告辞而去，别人问他：“吊丧的时候都是主人先哭，客人再行礼。阮籍都没哭，您为什么要哭着行礼啊？”裴楷是真正理解阮籍的，说：“阮籍是方外之士，不崇礼典。我就是个俗人，还要以轨仪自居。”

可见行为方式的不同，并不能掩盖阮籍深沉的悲痛。悲伤不一定要用痛哭流涕来证明，忠君爱国不一定要高喊口号，同样，孝顺、仁慈、关爱、忠诚等价值观也无须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表现。竹林七贤已经将社会现存的制度，包括礼教都抛弃不用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内在感受，表示好恶。在这方面，阮籍的“青白眼”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看到现实中蝇营狗苟的钻营之人，就翻白眼，爱答不理的；嵇康带酒和琴来访，阮籍就立刻翻回青眼，热情相待。人们应该像裴楷一样，不能机械地按照传统礼教的标准来要求竹林七贤照做无误。

他们七个人在竹林中饮酒、弹琴、对弈，高谈阔论，谈论的话题涉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对待自然等。这些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知识分子。竹林七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包括逃避残酷的现实、保持纯洁自然的心灵、追求自然的生活等，也

都吸引着后来者，让后来者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不管后人认同不认同他们的言行，这七个人洁身自好，保持独立自由状态的精神，给后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从这个角度说，竹林中的清谈虽然是务虚的，却有着穿透时空的强大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竹林中的七个人都崇尚独立自由，都信奉道家哲学，但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表现在处理个人和仕途的关系上。嵇康、向秀、刘伶等人是完全藐视政治权威，纯粹地遵从心灵的召唤，要过自然本真的生活。而山涛、王戎两人虽然听到了内心的召唤，知道自由独立生活的可贵，但同时在他们心灵的深处还有世俗的呼唤，知道如何去做社会认同的“正确”的事情。现实中有许多后一种知识分子，他们知道真善良，也有理想，却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思想的不同导致竹林七贤的散去。

那些竹林中的清谈，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正始十年（249）爆发了高平陵政变，曹爽集团血流成河，标志着曹魏王朝的支持力量消失殆尽。“万事贵无”的何晏在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同时，也曾显露出消极避世的态度，可惜未能脱身而出，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正始学派”跟随曹爽及曹氏的失败，整个学派也归于沉寂。而原先动荡不明的政局一下子明朗起来，司马家族成了不可撼动的胜利者。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等人陆续走出竹林，当官去了。阮籍的思想底子是入世的儒家，而非出世的道家，迫于压力也接受了朝廷的征召。只剩嵇康、向秀等人还经常在竹林中聚会，可光景已大不如前。

这不是嵇康一个人的悲剧

—

一群人在竹林中清谈是无害行为，还符合“低碳生活”的要求，但司马氏集团不会允许竹林七贤的存在。

因为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聚群清谈是“反动行为”。清谈的话语体系是非官方的，行为是反礼教的，竹林清谈的存在就是对权威的反抗，对朝廷的藐视。政府权力的一大特性就是强盛的蔓延能力，从政府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吏们希望将社会各个方面、各色人等都管理起来，容不得政府权力存在空白。嵇康、向秀等人坚持在竹林中避世清谈，对政治漠不关心，对主流意识形态离经叛道，很快就引起了司马氏的注意。考虑到在之前的政治斗争中，嵇康等人并没有站在自己一边，虽然其实他们也没有站在曹爽一边，但这是对司马氏的藐视，又考虑到竹林清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不是和司马氏争夺民心吗？司马氏便将嵇康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这里又暴露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弊病：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冷漠和无声反抗，根源在朝廷，而不在知识分子。如果朝廷能够革新政治、唯才是举，建立清明的大环境，想必知识分子都会走出竹林，为朝廷所用。可朝廷极少有自我反省的精神，拒绝承认自身的错误，反而采取打压的方式，要铲平竹林，捕捉其中的人才。

享受着自由和自然的嵇康等人，还没有意识到高平陵政变后日益

强化的司马氏权威统治，延续着清谈高歌的日常生活。山涛、阮籍等人陆续离去后，嵇康喜欢上了打铁，有人说这是兴趣爱好，有人说是以此赚钱糊口。向秀偶尔陪嵇康去洛阳打铁。山东东平人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赶来山阳寻找他们。向秀常约吕安耕田、种菜，收获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取酒食。三人走得很近，常常相约出游，观原野，攀山岚，不计远近，整天整夜地不回家，回来后又喝酒清谈。三人之中，向秀比较文静，不像其他两人那样傲世不羁。嵇康和吕安不时嘲笑他。向秀有感于《庄子》阅读的人很多，却很少有人注解，就沉下心来给《庄子》作注，完成后请嵇康、吕安批评。两人给予了一致的肯定。

这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最终打破了竹林的安逸宁静。先是嵇康把司隶校尉钟会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给得罪了。钟会是司马氏器重的人，也是个“官方知识分子”，想结交嵇康，附庸风雅。他穿戴齐整，带着大批人来找嵇康“交流感情”。嵇康与向秀正在树荫下锻铁，对热情而来的钟会不理不睬。钟会在一旁看两人打铁看了很长时间，没看到嵇康用正眼看过自己，就准备离开。这时嵇康开口了，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恨恨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言下之意是你嵇康恃才傲物，果然有个性，我们走着瞧。

司马昭做了大将军，要聘嵇康为掾吏。嵇康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郡去，驳了大将军的面子。景元二年（261），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接替自己先前的职位。嵇康闻讯，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字巨源），高调宣布和山涛绝交。他在文章中称避世清谈是自己的志向，“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山涛强己所难，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此单方面宣布与山涛绝交。文章借绝交为名，委婉地批评了社会，如“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等，还说了很多重话，如不可“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等。

按照嵇康的个性，如此激烈和高调的行为实在令人疑惑。不想做

官，直接告诉山涛就可以了，有必要弄得沸沸扬扬吗？于是，就有后人解释说，嵇康这是在保护正处于仕途上升期的好友。他知道竹林七贤不容于朝廷主流，宣布与山涛绝交其实是告诉朝廷：山涛被竹林七贤的领袖开除了，以免之前的交往影响山涛的发展。而山涛收到嵇康的绝交信后，也没有发怒，笑笑而已。

话说吕安的妻子非常漂亮。吕安的哥哥吕巽却是好色的奸佞小人，竟然强暴了弟妹。吕安怒气冲冠，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吕巽就请嵇康从中劝解，并发誓改过自新，好好做人。嵇康出面调和，说服吕安将这件事压了下来。不想，吕巽这个卑鄙小人，稳住弟弟吕安后，恶人先告状，向官府控告吕安“不孝”。魏晋都以孝治天下，“不孝”是大罪，当年孔融就是因为“不孝”被曹操诛杀的。吕安于是被抓了，写信向嵇康寻求帮助。他不知道是被激愤冲昏了头脑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信中的内容非常偏激，将嵇康的避世上升为反抗官府的举动，认为自己是被害的，希望嵇康搭救。嵇康也为吕安激愤不平，先写信与吕巽绝交，再跑到官府为吕安作证。结果，吕安没被救出来，后来被流放西北边郡，嵇康反被收押了。

钟会趁机劝司马昭除掉嵇康。他拿出来的证据就包括言辞激烈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钟会认为：“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这条理由是：嵇康才华出众，又不能效忠朝廷，所以是危险人物。钟会还造谣说：“康欲助毋丘（guàn qiū）俭，赖山涛不听。”这里的毋丘俭忠于曹魏，曾和文钦等人在扬州起兵讨伐司马师，失败后被列入叛臣的行列。钟会说嵇康是毋丘俭的同党，只是因为山涛的阻拦才没有参加叛乱。最后，钟会搬出春秋战国时“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的先例来，建议司马昭以“害时乱教”的名义杀掉嵇康，“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钟会要杀嵇康的三条理由中，这最后一条才算是真实的。司马昭当时很信任钟会，下决心杀害嵇康。

嵇康在狱中，仍然未意识到死亡的到来。他写下了《幽愤诗》，

后悔在隐居多年后突然插手吕安的事情，看来自己还是没有将老庄的清静无为学到家。原本就是因为对现实政治失望才隐居的，怎么到头来又走入官府，奢望官府还能给吕安清白呢？嵇康决定，出狱后要“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意拜嵇康为师。这番好意加速了嵇康的死亡。司马昭发现嵇康原来有这么大的支持力量，他那些反权威的行为竟然争取到了如此多的年轻人，这还了得。司马昭断然拒绝了学生们的请求，下令立即处死嵇康。

临刑前，嵇康神色坦然。他看看日影，预计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早年，嵇康游历洛西的一天晚上，住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里，忽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和嵇康畅谈音律，还借嵇康的琴弹了一曲，声调绝伦。这曲子就是《广陵散》。古人将曲子传授给了嵇康，没留下姓名就飘然而去了。之后嵇康一直没将《广陵散》传授他人。在刑场上弹奏完毕后，他把琴放下，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从容就戮，时年四十岁。

二

嵇康临刑前，让子女去投靠山涛。他依然将山涛当成挚友，山涛也没有辜负嵇康的托孤重任。山涛这个人，虽然在现实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始终保持着自然真诚的心灵。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抚养着他的子女。王戎也对嵇康的子女多有照顾。成语“嵇绍不孤”说的就是嵇康的儿子嵇绍虽然是孤儿，但有山涛、王戎两位长辈的悉心关照，并不是无依无靠。嵇绍长大后，一表人才。一次有人对王戎说：“昨天我在众人中见到嵇绍，他气宇轩昂，如同野鹤立

于鸡群之中。”这就是“鹤立鸡群”的来历。王戎听说后，感慨地说：“那是你没见过他的父亲嵇康。”

因为山涛的大力举荐，嵇绍很顺利地进入了仕途——西晋的仕途，而非曹魏的。父亲嵇康是反权威的逍遥派，儿子嵇绍却是勤奋积极的晋朝官僚，不知道嵇康知道后做何感想。八王之乱，在荡阴之战中，时任侍中的嵇绍跟随晋惠帝司马衷出征。混战中，百官、侍卫纷纷溃散，只有嵇绍冠服凌然，用身体捍卫着晋惠帝，最终被乱箭射死在皇帝身边。嵇绍的鲜血溅到了龙袍后，给白痴的晋惠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局势平定后，左右要给晋惠帝浣洗龙袍，晋惠帝不肯，说：“此嵇侍中血，勿去。”“嵇侍中血”日后就成了忠臣的指代物。嵇绍虽然没能在反权威方面继承嵇康的衣钵，但忠君报国的行为也没有辱没家门。

山涛和司马家族有亲戚关系。山涛父亲山曜的姑姑山氏，嫁给了曹魏的粟邑令张某，生下女儿张春华。张春华嫁给了司马懿，为嫡系夫人，是司马师、司马昭的亲生母亲，晋朝建立后被尊为宣穆皇后。山涛算是张春华的表侄子，是司马师和司马昭的远房表亲，司马炎的远方表叔。这层亲缘关系摆起来虽然有些绕，但对山涛来讲是不错的政治资源。司马师执政后，对山涛这个表亲很重视，举他为秀才，拜为郎中，后来升任尚书吏部郎。山涛于是倾心依附，为司马家族出谋划策。他要施展才华，必须要有强大的政治后盾，这是每个务实的知识分子必须承认的事实。因此，山涛的选择，我们可以旁观和漠视，却不能横加指责。

山涛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是在司马昭挑选世子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了司马炎。司马昭当了晋公后，一度想挑选司马攸为世子。山涛主张以司马炎为世子。司马昭征询他的意见，他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司马昭最终挑选了司马炎为接班人。司马炎感激莫名，赶到山涛家当面拜谢。等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山涛的好日子就来了。他历任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尚书左仆射

等，进入了西晋初期的权力核心圈子。

知识分子为了获得一展拳脚的舞台，必须付出辛勤的努力，做出种种牺牲和妥协。很多知识分子不愿意这么做，山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这样的舞台，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负责晋朝的人事工作。他选用官吏，既秉承晋武帝司马炎的意旨，又亲自考核评价，时称“山公启事”。在漫长的人事工作中，山涛经手的那么多官员升迁降黜，几乎都做到了实事求是，考核没有偏离实际。《晋书》说，山涛负责人事期间提拔的官员中，只有陆亮一个人因受贿而出了问题。当初坚持要提拔陆亮的是司马炎本人，山涛反对重用陆亮，最后司马炎不得不亲自下诏任命。山涛发现陆亮受贿，立即将他撤职了。对于山涛的工作，可以用“任人唯贤”“大公无私”来评价，因此他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西晋朝野崇尚奢华，官僚贵族们一个赛一个地穷奢极欲。而山涛对自己约束甚严，身居高位还保持俭朴的生活，家里没有美女仆人，拿到的俸禄和获得的赏赐都接济亲朋好友。因为他掌管着官员的升迁，许多人向他行贿，山涛一概拒绝。鬲（gé）县县令袁毅是个大贪官，向公卿大臣大肆行贿，谋求赞誉和升迁。他向山涛行贿生丝上百斤。山涛不愿意和公卿大臣们格格不入，给人特立独行的感觉——这是他和嵇康不同的地方，就收下了贿赂，藏在阁上。后来，袁毅事情败露，遭到廷尉的审判。他送出去的贿赂，每一笔都遭到追索。山涛取下生丝交给办案人员，上面有多年积存的尘埃，印封如初。凡此种种，山涛实属不易，说明他始终坚持着心中的理想，没有向现实妥协，和黑暗政治同流合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延续了竹林七贤的风范。

山涛活了八十多岁，多次以年老多病辞官，都没有得到批准，在司徒的位置上强辞，才被准许回家养老，最后安详地死在家中。

王戎在西晋也做到了司徒的高官。和山涛不同，王戎的政治高位

是通过明哲保身、阿谀求全得来的，对朝政也没有什么贡献，颇令人不齿。

王戎的政治高峰，正是贾南风揽权、八王之乱的时期，对于贾南风废杀太子、赵王司马伦杀贾南风等事，王戎都保持了沉默。在八王之乱中，晋室面临空前危机，王戎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理应有所作为，却没有一句意见，在各派力量中虚与委蛇，做“老好人”，得以官运亨通，位至司徒。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敛财上。王戎性格极其吝啬，做了高官后，庄园已经遍及天下，还天天拿着算盘昼夜算计财产，贪得无厌。侄子结婚，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自己女儿出嫁，需要用钱，要向王戎借款。王戎借给女儿数万铜板后，天天念叨，女儿回家省亲，见状赶紧把钱还上，王戎这才放松下来。家中的李树产的李子很好吃，王戎都拿出去卖了换钱，可又怕别人得了种子种出好李子来，在卖之前给李子钻孔把核钻破才出手。如此算计的结果，是王戎的田宅、僮牧、膏田、水碓（duì）无数，富贵一方，可他还每天和夫人在烛光下盘算蝇头小利。

如果说王戎身上还有什么当年竹林清谈的风范的话，那就是他还有真情实感。话说司马炎时期，王戎、和峤同时遭遇大丧，和家准备了隆重的丧礼，和峤痛哭着迎接丧客。而王戎却不准备丧礼，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也不回应丧客。司马炎对大臣刘仲雄说：“你去看过王、和二人吗？我听说和峤悲哀过度，让人担心啊！”刘仲雄说：“和峤虽然丧礼周到，但神气不损；王戎虽然没有礼节，但伤痛已经融入了他的骨髓。臣觉得，和峤是生孝，王戎是死孝。陛下不应担心和峤，倒是要担心王戎能否挺过来。”在这里，呆呆坐在床上的王戎，倒还有几分竹林七贤的味道。

嵇康被杀，透露出了朝廷对竹林七贤这类反权威言行的镇压态度，顿时天下知识分子战战兢兢。七贤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担心，不得不对朝廷权威有所退让。

竹林七贤灵魂之一的阮籍，出来当官比较早，却始终没能融入官场之中。钟会多次向他询问时事，想套出阮籍的破绽来，治他的罪。阮籍只有拼命喝酒，用酣醉来抗拒钟会恶毒的骚扰，没让敌人找到把柄。司马昭对阮籍还是相当客气的，曾经想让儿子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两家结为儿女亲家。面对这么大的诱惑，阮籍的对策还是醉酒，酗酒大醉了六十天，愣是让司马昭找不到提亲的机会，联姻一事不了了之。

阮籍和官场格格不入，又不能像之前那样远离官场回归竹林，其中的痛苦只能默默承受。好在阮籍颇能在官场中找乐子，留下两个潇洒的故事。一次，阮籍从容地对司马昭说：“我曾游东平，非常喜欢当地风土。”司马昭大喜，以为阮籍想去东平做点儿实事，当即任命他为东平相。阮籍骑着毛驴去上任了，到任后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把东平官府的围墙给拆了，让官吏和老百姓能内外相望，不再相互隔断；第二是废除了东平繁复的法令，清简政令。十多天后，阮籍又骑着毛驴走了，不做东平相了。他听说步兵校尉官署中有佳酿，贮酒三百斛，又自荐担任步兵校尉。到任后，阮籍并不处理军务，终日在官署内饮酒宴会。

阮籍在政治上比较大的举动是在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的时候，公卿大臣们推举阮籍来写劝进书，推举司马炎称帝。这是大是大非的站队问题，阮籍不答应不行。可答应后，却迟迟不愿意下手，继续用酒精麻醉自己。到了大臣们来取劝进书的时候，阮籍醉趴在案子上酣睡。被叫醒后，阮籍在案子上挥毫写成，没有改动就交了上去。全书言辞清壮，得到了好评。也许是司马炎对阮籍的劝进书很有好感，虽

然不断有人攻击阮籍不拘礼教，卫道士们视阮籍为异类，司马炎每次都保护他，使得阮籍得以善终。

晚年的阮籍，说话越来越空虚玄远，坚决不臧否人物、不谈时事。他常常自己驾着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在大哭中，阮籍才能释放内心的悲凉和痛楚。

山涛掌管官员升迁，对阮籍侄子阮咸的评价很高：“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他提议重用阮咸。但晋武帝司马炎认为阮咸酗酒成性，不予重用。中书监荀勖校太乐，用古尺更铸铜律吕来调声调，调好后乐声很好听。荀勖也很得意。阮咸却不以为然，指出了荀勖所调太乐的一些问题。荀勖就忌恨阮咸，在司马炎面前进谗言，阮咸被外放，贬为始平太守。后来有人发现了周朝时的玉尺，是天下乐声的正尺。荀勖用它来核准自己调校的太乐，果然发现了阮咸指出的那些问题，方才知阮咸的音乐才华远在一般人之上。

嵇康被杀后，向秀不得不结束隐居，进入洛阳为官。司马昭就问他：“听说你有箕山之志，为什么还来洛阳呢？”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人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所以箕山之志就是隐居之志。向秀回答：“巢父、许由都是狷介之士，我并不羡慕他们。”这明显是违心的话，估计连司马昭也不相信向秀的回答，但他对向秀的主动低头和委曲求全的态度非常认可，放过了向秀。在曹魏和西晋时期，向秀历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位不干事，领一份薪水，表明姿态而已。司马昭死后，向秀极不得志。一次，他经过山阳嵇康旧居，看到物是人非，写下了极其隐晦的《思旧赋》一文，揭露了黑暗政治与恐怖权威下自己战战兢兢的心态，想哭祭挚友又不敢哭出声来，只能“思旧”一下。向秀最后死在了散骑常侍的职位上。

醉鬼刘伶也不得不出来做官，做到了建威参军的闲职。晋武帝泰

始年间，刘伶曾经上书，主张“无为而化”的老庄学说，被斥为无益之策。他的命运也最坎坷，遭到了罢官。回乡后的刘伶，加重酗酒，最后可能死于酒精中毒。《晋书》说他后期经常乘着鹿车，抱着酒壶，吩咐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后面，说：“如果我醉死，便就地把埋葬了吧。”

偷梁换柱司马家

—

三国时期，曹魏王朝的基础最好、起点最高，又执行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在南北方的对抗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遗憾的是，最终坐享胜利果实的却是司马家族。

第一代皇帝曹丕时期，曹魏政治平稳发展。曹丕本人文采出众，落笔成章，也执行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比如在他刚继承曹操爵位的时候，下令说：“关卡渡口是用来通商旅的，池塘林苑是用来抵御灾荒的。在这些地方设立禁令，课以重税不符合便民的原则。因此要解除池苑的禁令，减轻关卡渡口的税率，全部恢复为什一税率。”另外，针对汉末皇权衰微导致政权颠覆的教训，曹丕特别警惕防范宗室或后宫专权。曹丕制定了羁縻藩镇的严密制度，还严厉限制太监、嫔妃和外戚干政擅权。曹魏的防范制度很成功，整个王朝始终没有出现宗室或后宫专权的情况。

但是曹丕为人轻浮，按照现代干部评议的标准就是做事不够稳重。他想建立自己的武功，不顾劝谏进行巡游般的南征，沿途犒赏军民。来到长江边上后，曹丕说了句：“嗯，东吴看起来果然是难以轻易拔除了。我们退军吧。”倒显得有几分可爱。司马懿和曹丕关系密切，因此在曹丕统治时期，他才真正开始掌握实权。

总的来说曹丕还是位不错的君主。文人气质让曹丕做了些轻浮躁动的事情，好声色享受，但尚能自抑，没有带来大坏处。曹魏在曹丕

时期获得了稳定发展。

曹丕死后，曹叡即位。曹叡因为是甄夫人的儿子，随着甄夫人的失宠，地位一度危险。也许是因为曹叡脾气禀性与曹丕差不多，曹丕最终还是传位给了曹叡。

曹叡在位，干出了一些政绩。他常说“刑狱攸关天下性命”，朝廷断大狱，曹叡经常亲临旁听。曹叡在对蜀汉作战中委政于司马懿，时刻关注，并多有杰作。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的时候，有人以为蜀军缺乏辎重，粮草必然接济不上，蜀汉必然不击自破，朝廷不需要犒劳军队。还有人想收割上邽（guī，今陕西渭南）一带的生麦，以免被诸葛亮收割了。曹叡都不听从，前后多次派兵增加司马懿的军力，又派人保护上邽一带的生麦。司马懿后来与诸葛亮在上邽周边相持，最后还是仰仗那些小麦作为军粮。可见曹叡在军事筹划方面还是非常有眼光的。诸葛亮最后一次驻屯渭南与司马懿相持，司马懿以持久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诸葛亮死在阵中。司马懿因为对蜀战争的胜利逐渐掌握了军队实权，同时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但是曹叡滥用民力，大兴土木，追求享受。他在洛阳大修宫殿，建造了昭阳宫、太极殿等巍峨壮观的宫室。太极殿，高十多丈，上面又建造了翔凤殿。曹叡还在芳林园中造陂池，楫棹越歌，又在后宫建立八坊，在其中储备美女才人，品秩待遇和百官一样。曹叡挑选知识字的女子担任女性尚书，处理朝廷的奏折。后宫美女歌伎，多达数千。曹叡就在这个安乐乡中游戏饮宴，让博士官马钧制作指南车，制造水转百戏供后宫娱乐。马钧不仅复制了已经失传的指南车，还制作了翻车，解决了从低处向高处送水的问题，大大便利了农耕灌溉，可算是魏晋时期科技发明第一人。

杨阜、高堂隆等大臣多次向曹叡进谏。曹叡对付劝谏者有自己的办法，就是耐心听完，优待进谏的人，但就是不改正自己的缺点。太子舍人张茂在吴蜀边界战事不断、将领们不断征战的情况下，对曹叡

大兴宫室，热衷于玩饰，赏赐无度导致府库空虚，又抢夺民女充斥后宫的行为上书劝谏。曹叡读完张茂的奏章，夸奖了几句，提升张茂担任散骑常侍的虚职了事。

就在曹叡造土山、种香草的时候，已经是三朝老臣的司马懿长年领兵在外，成为帝国的军事支柱。整个曹魏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宗室和后宫干政的情况，却出现了大臣专权的危险。

曹叡没有儿子，大臣们建议他在宗室子弟中过继几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曹叡不听，偏偏收养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曹芳做儿子，并由他即位。曹叡临终遗命司马懿为太尉，与宗室大臣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他为了夺权，表面上推举司马懿为太傅，私下却行架空之实。司马懿于是称病，不预朝政，消除了曹爽集团的戒心。249年，曹爽陪同曹芳出洛阳城，拜谒魏明帝陵墓。司马懿一举收集旧部，封闭城门发动政变，诛杀曹爽集团多人，夺取了朝廷大权。史称“高平陵之变”。

晋朝建立后，这场事变被描述为：曹爽等人趁曹芳生病，开始出现无君不臣之心，密谋推翻曹氏政权，危及社稷，并将篡位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司马懿为了拯救国家和曹氏家族，发动了政变。为此他杀了曹爽及其亲信的整个家族，消灭了反对自己的力量。

事变后，司马懿独掌朝政。曹芳封他为丞相，将他的封地增加到十二个县，邑二万户，并且授予他奏事不名的特权。该年十二月，朝廷给司马懿加九锡之礼，授予他朝会不拜的特权。司马懿觉得时机尚不成熟，坚持推让不受。司马懿抛弃虚名务求实利，致力于整个家族的权势建设。司马懿的孙子和侄子都受封为列侯，家族封侯者十九人。

司马家真正露出篡位谋天下的野心是在司马师废曹芳的事件上。司马懿病死后长子司马师继续掌权。司马师比父亲更要凶狠，一心要建立司马王朝。司马家族的专权和司马师对曹芳的紧逼，不仅使曹芳极为不满，也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抗。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图谋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替代司马师，再逐步清除司马家族的势力。但他们没有躲开司马师的耳目，结果事情败露，凡是牵涉其中的人都被诛杀。也许是杀人实在太多了，司马师同时还大赦天下。在清理了朝臣后，司马师正式向皇帝进攻，逼皇帝废黜了皇后张氏。

曹芳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他将自己的这种不满流露了出来，结果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半年后，司马师决定检验自身的力量，要废去曹芳，另立新帝。他先是在去见皇太后，说皇帝曹芳已经长大了，却不处理朝政，整日“耽淫后宫内宠，沉湎女色，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曹芳不忠不孝，日益悖逆，已经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不能再做皇帝了。逼太后下令：朝廷告于宗庙，曹芳重新归为齐王，以避皇位。

紧接着，司马师拿着皇太后的命令，召集公卿大臣开会。群臣大惊失色，又不敢作声。司马师流着泪说：“这是皇太后的命令，诸君对王室有什么看法？”

群臣只好回答：“昔日伊尹为了商朝放逐了商王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以安定汉朝。为了安定社稷抚慰四海，之前两代都有先例。今日之事，全听司马明公的。”

司马师要的就是这句话。他说：“诸君既然这么推重我司马师，我又怎能推脱躲避呢？”于是，司马师就带着群臣，以朝野代表的身

份操持起整个废立大事来。他先是按照西汉霍光的先例，派人去收曹芳的玺绶，通知曹芳以齐王身份归藩，又派司徒高柔为使节，告祀宗庙，通知曹家列祖列宗有关废立的事情。

当天，年仅二十三岁的曹芳迁居西宫。司马师派人持节护送他前往河内重门。曹芳于此立齐王府，开始以藩王的身分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魏略》记载司马师操作废黜曹芳一事的时候，派遣郭芝入宫禀告皇太后。当时曹芳正在皇太后身边。郭芝对曹芳说：“大将军要废黜陛下，立彭城王曹据为新皇帝。”事已至此，曹芳默默地离开，皇太后很不高兴。郭芝说：“太后有子不能教。现在大将军决心已定，同时率兵在宫门之外，以防不备。太后现在应当顺应大将军的意思，没有其他可以说的了！”太后对郭芝的逼宫非常恼火，说：“我要见大将军，我还有话说。”郭芝说：“为什么要见呢？太后只需要速速取来玺绶就可以了。”太后没有办法，只好交出玺绶。不久，废帝曹芳来向太后辞行，涕泪交下，悲伤地从太极殿南行，永远离开了皇宫。群臣只有几十个人流泪相送，其中就包括悲不自胜的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在嗜权的司马家族中是个另类，让亲戚们头疼不已。

曹芳走后不久，司马师又派人来。太后说：“彭城王曹据，是明皇帝曹叡的弟弟、我的小叔子。现在立他为皇帝，我的地位怎么处理？这么做，难道是想让明皇帝绝嗣吗？高贵乡公曹髦（máo）更合适。曹髦是文皇帝曹丕的长孙，明皇帝曹叡的侄子。按礼，小宗有继承大宗的规定。我小时候见过高贵乡公，立他为新皇帝更合适。”

司马师于是重新召集群臣商议，最后大家决定按照皇太后的意思迎高贵乡公为新皇帝。司马师表示同意，可能他觉得年幼的曹髦不会对自己构成大的威胁。当时出去迎接曹据即位的太常已经出发，两天后到达温县时被紧急召回。朝廷最终改迎了曹髦。

司马师废曹芳的盛大演习获得了巨大成功，也向天下暴露了司马家族的篡逆之心。忠于曹魏王朝的力量发动了多次反对司马懿父子的兵变。先是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发动反对司马懿的讨伐，兵败自杀身亡。接着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再次起兵，连接东吴反叛。司马师正病重，忍痛亲征，斩杀毌丘俭，传首洛阳，文钦逃奔东吴。继任的扬州主将诸葛诞几年后又起兵反司马家族，杀扬州刺史，再次占据淮南一带。司马昭亲征，攻陷寿春城，斩杀诸葛诞。客观地说，三国后期内政都不清静，内斗不息。但司马家族通过三次扬州战役，血洗反对派，止住了内争。曹魏的内乱起得急，也消得快，并没有对司马家族造成沉重打击。

司马父子执政，改变了前两代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和府库积蓄的弊政，继续大力推行富国强兵的战略。可以说，曹魏的国力持续增长，旗帜却逐渐更换了颜色。

曹髦的儿戏政变

—

260年的一天傍晚，洛阳城突降急雨。雨点由疏转密，天空一片灰暗，间或有雷霆闪电。与宫外噼里啪啦的雨声相呼应，皇宫中也是一片鼓噪，人呼马嘶，兵器相交。原来是魏帝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决定出宫亲手杀掉权臣司马昭。曹髦带着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宫廷侍官下了陵云台，穿上铠甲，集合宫中士兵，要出讨司马昭。

宫中顿时大乱。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闻讯赶到。曹髦见三人到来，不等他们开口，大声诉起苦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我忍受不了他的羞辱了，不能坐等被他废黜。就让我们君臣在今天解决此事。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

王经诚恳地劝谏道：“昔日鲁昭公忍受不了专权的季氏，结果败走他方，失去国君之位，为天下取笑。现在国家大权操纵在司马家族手中已经很久了。朝廷四方都有司马家的亲信爪牙，人们不顾逆顺之理已非一日。皇上的宫廷宿卫兵甲寡弱，怎么能够作为成大事的依靠呢？兵势一旦发起，就好像病情可能非但没有祛除，反而会加深！甚至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灾祸。请皇上详加考虑啊。”曹髦听到如此冷酷的现实分析，胸中怒火熊熊燃烧。他掏出怀中的诏令狠狠地掷在地上，厉声说：“我意已决。即使事败身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曹髦抛下三人，匆匆告别太后，率领宫中宿卫、官僮数百人，敲

起战鼓，出云龙门而去。王沈、王业两人见此，决定去向司马昭汇报投诚。他俩招呼王经一起去告密：“事已至此，我等不能自取灭族之祸，应该前往司马公府自首，以免一死。王尚书同去否？”王经回答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王沈、王业见劝不动王经，快步出宫，抄小路报告司马昭去了。

这一边，曹髦率领着数百僮仆，鼓噪而出。皇帝身披新甲，坐在车驾之上，手持宝剑，大呼杀贼，激励士气。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皇帝亲自提刀上阵与大臣拼命的情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佃（zhòu）正好有事入宫，在东止车门遇到震怒的曹髦和宫中的乌合之众，大吃一惊。曹髦左右大声呵斥他，司马佃一行慌忙躲避而走。曹髦“旗开得胜”，对这次肉搏的前途更有信心了，于是他喊得更响了。随从们受到感染，旗帜和兵器也挥舞得更欢了。

在皇宫南阙下，得到消息的司马昭党羽已经在中护军贾充的率领下，集合军队，列阵迎战了。司马父子常年掌握军队，集合的军队战斗力自然不是曹髦的乌合之众可以比拟的。贾充看到宫中缓缓出来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嗤之以鼻。他主动反击，带兵自外而入，扑向曹髦军队。曹髦的军队见状就溃散后退了。

曹髦急了，高喊：“我是天子，谁敢拦我！”他挥舞着宝剑，左右乱砍。司马一边的将士见小皇帝赤膊上阵，不知所措，只好小心躲避，不敢进逼。宫中士兵和仆人们见状，又聚集起来，向宫外继续前进。两边军队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开始胶着。曹髦认为这是上天保佑曹家，自己身为天子，天下无敌，更加起劲地舞剑向前冲。

司马家的军队慌乱躲避，形势开始不利于司马昭。在司马一边的太子舍人成济跑过去问贾充：“事情紧急了！中护军，怎么办？”贾充恶狠狠地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司马家如果失败了，我们这些人还会有好下场吗？还不出击！”他对周围的士兵高喊：“司马家养你们这些人，就是用在今天的。今日之事，没有什么可以迟疑的！”成

济略一思考，说：“没错！”接着挺起铁戈，向曹髦刺杀过去。

曹髦毫无防守之力，被成济的长矛从胸贯入，于背部出来，血溅宫墙，当即身亡。这位被称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小皇帝就以这种罕见却可以理解的、高贵而又屈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二十岁的生命。一场宫闱惊变就此结束。

曹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赤膊上阵、亲手刺杀权臣的皇帝，但是他失败了。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个人英雄主义皇帝是北魏的元子攸。他虽然杀了权臣，但并没有解决权臣当国的问题。相对于当国权臣来说，生长于深宫的皇帝最大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血统。“皇帝”的金字招牌还是可以吓住绝大多数人的。比如曹髦在打斗中，他的皇帝光芒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遗憾的是，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而且是不断钝化的武器。随着权臣权势的巩固和人们对皇室的失望，皇帝的光芒就逐渐暗淡了。更要命的是，对于那些权臣的党羽来说，他们的利益是与皇帝的利益截然相反的。成济之所以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皇帝，就是因为受到贾充的点拨。

二

曹髦本来是无缘于皇位的，而仅仅是高贵乡公。六年前（254），魏帝曹芳被司马师废黜，降封为齐王。曹髦因为是曹丕嫡孙，被选为新皇帝。当时曹髦才十四岁。虽然年少，但是由于过早目睹了家庭变故、宫廷争斗和皇室日衰的政治现实，他显露出了与年龄极不符合的成熟和世故。正史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

曹髦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到洛阳的时候，群臣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在门口下轿，要向各位官员回拜还礼。礼宾官员阻拦说：“礼，

君不拜臣。”曹髦回答说：“我并未登基，现在也是人臣。”最后，曹髦在城门口向群臣恭敬还礼。进城来到皇宫止车门前，曹髦又下轿步行。礼宾官员又说：“天子有资格车驾入宫。”他又说：“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所为何事。”曹髦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曹髦谨慎得体、大方稳重的言行赢得了朝野的称赞，史称“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曹髦不仅会说话办事，而且个人能力非常出众。古代考察一个人的能力主要是看他对儒家作品的理解程度和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曹髦虽然年纪轻轻，却能在太学里与年长的儒者们谈论《易经》《尚书》及《礼记》，而且能谈出新意来。同时曹髦还是古代历史上数得着的画家，画迹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放鸡犬图》《于陵仲子像》《黔娄夫妻像》。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其人物故实，独高魏代”。

也许是个人素质之高，让曹髦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兴复皇室的重任。为了收复已经涣散的人心，革清政治，曹髦在即位初就派遣侍中持节分巡四方，观察风俗，慰劳百姓，纠察失职官员。他以身作则，一改祖父辈大兴土木、奢侈享乐的风气，“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为了赢得军队的好感，曹髦多次下诏哀悼军队伤亡的将士，安抚那些饱经战火创伤的地方。但是他能做的也仅仅是这些象征性的举措而已，司马昭牢固掌握着朝廷实权，曹髦还是逃脱不了金丝笼中鸚鵡的命运。决意中兴和压抑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曹髦心理失衡，加上血气方刚，他就上演了赤膊上阵、身亡殉位的一幕。

在曹髦刚登基的时候，司马师曾经私下问亲信：“新皇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一旁的钟会回答说：“才同陈思，武类太祖。”钟会是大世族大官僚家族出身，他将曹髦与曹植和曹操的文才武略相比，可见对曹髦的能力评价之高。司马师听完，轻声说道：“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社稷有福了啊。”实际上，他用凝重后悔的眼神注视着弟弟

司马昭，心想：“这回，我们哥儿俩可能选错了人。”现在曹髦在进攻的路上被当众刺死了，司马昭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喃喃自语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司马昭所谓的天下其实是指天下的世家大族们，没有权臣会对普通百姓的感受投入过多的关注。东汉开始兴起的世族势力在三国曹魏时期进一步膨胀，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一些家族世代垄断某些官职。司马家族本身就是大世族，又是依靠北方世族的支持上升起来的政治势力。现在小皇帝暴亡，而且是被自己间接杀死的，世家大族们会怎么对待这件事，司马昭心中没底。

他先跑到宫里去，对着曹髦的尸体放声大哭了一场，然后下令召集贵族百官，商量对策。他毕竟对突然的变故心虚，需要将这件事情尽快摆平。他下令收殓皇帝尸首，开始操办丧事。多数贵族百官都应召来到皇宫，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少数贵族官员没有来，其中就包括大世族出身的陈泰。

司马昭需要所有世族的支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去召陈泰入宫，理由是皇帝突然驾崩需要会集大臣商议。司马昭不需要说什么，多次派人催请就是他最明显的态度了；陈泰也不需要问什么，去还是不去也是他最明显的态度了。最后，陈泰还是去了皇宫，这是天下政治力量对比的客观结果。

司马昭紧张地握着陈泰的手，问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陈泰冷静地回答说：“斩贾充，才能稍微平息天下人的议论。”

这段对话发生在两个政治高手之间。司马昭开门见山地刺探陈泰对自己支持的要价。陈泰不追究皇帝的真正死因，只是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他要求杀贾充既是对曹魏王朝做个交代，也是寻个心理安慰。整个对话简洁而直入主题。但是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为司马昭解决了曹髦进攻的难题，是有功之臣。更重要的是，贾家也是一大世

族。杀贾充来掩饰自己的罪行对司马昭来说，代价太大了。因此他不同意陈泰的要价，他还需要贾充这个得力助手协助完成代魏的过程呢。

因此，司马昭又问陈泰：“杀其他人，行吗？”

陈泰坚决地说：“但见其上，不见其下。”皇帝的死事关重大，只能杀官居高位的人，而不能找一两个喽啰顶罪。

司马昭决定抛开陈泰，强硬摆平这件事情。他高声宣布：“成济弑君，罪大恶极，应诛灭九族！”

成济当时正站在司马昭一旁，可能还在想着自己会接受什么样的奖赏，万万没想到等来的会是这个结果。他当即急了，大声嚷起来：“成济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罪不在我！”

司马昭不等成济说出更多的话来，示意将他立即拖出去。兵士涌上来，堵住成济的嘴，把他架了出去。成济全家因刺穿曹髦的那一矛当即被族诛了。司马昭再以“为臣不忠，祸乱朝政”的名义将没有向自己报信的王经族诛。接着，司马派势力迅速地筹办起皇帝的丧事来。

必须承认，司马昭对此事的处理并不完美。他以杀戮来掩盖弑君的真相，反而给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感觉。从王经死的时候起到现在，曹髦死亡的真相一直就不是什么秘密。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昭的叔父司马孚当时就反对侄子的处理方法。曹髦遇害之初，百官因为司马昭的态度不明，没人敢奔赴现场悼念皇帝。司马孚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抚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边哭边说：“杀陛下者，臣之罪。”

司马孚与其他人人云亦云地参加丧礼不同，上奏要求追究杀君主谋之人。司马昭不理睬自己的叔叔。当时太后和司马昭商量，以平民之礼埋葬曹髦。司马孚坚决反对，拉着一批大臣上表要求以王礼安葬曹髦。最后由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领衔，众大臣将此事定

性：“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现在朝廷依西汉昌邑王因罪被废的先例，以平民之礼埋葬他。臣等身居高位，却没有避免这样的祸乱发生，真是肝胆破裂。太后仁慈过隆，臣等心有不忍，特加恩以王礼安葬高贵乡公。”也就是说，曹髦死后被称为他之前的封号：高贵乡公。他的死被归为他的道德缺陷，是咎由自取。因此朝廷将他废黜，以平民之礼安葬。但因为太后可怜他，所以升格为亲王的葬礼。

几天后，高贵乡公曹髦在洛阳西北三十里的瀍（chán）涧之滨安葬。没有贵族和大臣送行，没有旗帜礼乐，整个行列只有几乘破败的车辆。有许多百姓围观，指指点点。有人说：“这就是前几天被杀掉的天子。”说完，有人掩面而泣。南朝的裴松之在注释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叹地说：“司马昭做得太过了，这哪里是王礼安葬啊？”

前人种地后人收

—

曹髦儿戏政变失败，曹魏王朝在实质上已经灭亡了。司马昭杀死了皇帝，竟然没有人质问一下，就被轻易遮盖过去了。司马昭党羽遍布朝野，从司徒、尚书令到太守、县令都在唯司马昭马首是瞻。强弱对比和人心向背，可见一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髦的死，是突发事件，不在司马昭的计划之内。司马昭尚未准备好走到台前，因此决定迎立常道乡公曹奂为新皇帝。曹奂的辈分很高，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与曹叡是同辈，是曹芳和曹髦的叔叔。258年，曹奂受封安次县常道乡公。司马昭派去迎接曹奂的使节是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司马炎因迎立之功升任中抚军，晋封新昌乡侯。这是曹奂与司马炎的第一次见面。

景元元年（260）夏六月，曹奂晋封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封地增为十个郡；朝廷还给司马昭加九锡之礼。司马家族旁支的子弟中还没有封侯的人全部封为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司马昭表示退让，这样大规模的封赏行为才没有付诸实现。六月份还发生了一件小事。汉献帝的夫人到那时才逝世，曹奂亲自过问了这位逊帝夫人的丧事，派人追谥夫人为献穆皇后，以汉朝皇后之礼安葬。

景元四年（263）夏四月，肃慎向曹魏贡献楛矢、石镞、弓甲、貂皮等物品。天子让人把这些都送到大将军府去。按礼，周边国家和民族朝贡的贡品，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接受。司马家族接受贡品的举

动，将替代之心明示天下。

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率大军分三路攻蜀。姜维当时正避祸陇上沓中（约今甘肃舟曲县），率军退回剑阁抵抗钟会军。在东部两路没有进展的情况下，西路的邓艾从陇上轻装出阴平道，冒险越过七百里无人之地，突发奇兵攻下江油、涪城、绵竹等城池，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阻拦，诸葛瞻兵败身亡。刘禅闻讯出降，蜀亡。

最初钟会出伐蜀汉的时候，西曹属邵悌对司马昭说：“钟会这个人不可信任，不能让他出征。”司马昭笑着说：“取蜀易如反掌。但是讨论的时候众人都反对讨伐，只有钟会与我的意思相同。灭蜀之后，北方的将士人心思归，蜀汉的遗民心怀震恐，即使钟会有异志，也无能为力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在司马昭的预料之内。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政治眼光和能力。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多数权臣都是能力出众的人，相反末代皇帝中很少有可与之匹敌的。

景元五年（264）三月，司马昭因为灭蜀的大功劳被封为晋王，增封十个郡。晋国辖地达到二十个郡之多。两个月后，曹奂追加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司马家族完成了王室谱系的建设。同时司马昭通过朝廷制度改革来加强自身权威。他奏请司空荀顗（yǐ）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负责，曹魏开始建五等爵位。

司马昭本来想死后将权力传回哥哥司马师一系去，经过亲信劝谏后，他犹豫再三，最终立中抚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王世子。

景元六年（265）春二月，有藩属贡献贡品，再次归之于相国府。四月，南深郡泽县出现甘露祥瑞。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本年将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五月，司马昭走到了皇帝宝座前的最后一级台阶。曹奂命司马昭配十二旒的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

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晋王王妃晋封为王后，司马炎由世子改称太子。遗憾的是，司马昭的生命也开始走向了结尾。朝廷为此大赦，希望挽回相国的生命。然而到了八月，相国、晋王司马昭还是死去了。司马昭生前，曾经有人劝说他称帝。司马昭指指司马炎，然后对劝说他的人说：“魏武帝曹操也没有称帝。”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做曹操这样的幕后英雄，也的确给太子司马炎留下了扎实的政治基础。

二

在司马昭逝世的当月，襄武县传言出现了一个巨人，有三丈余高，足迹长三尺二寸，白发，黄单衣，黄巾。这个巨人拄着拐杖说：“今当太平。”

司马炎就是在这样的传言中继承父亲爵位后总摄朝政的。一切都非常平稳，就像父亲当相国时一样。九月朝廷大赦。接着司马炎建立了晋国的官员系统，以司徒何曾为丞相，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征东大将军石苞为骠骑将军，征南大将军陈骞为车骑将军。之后，司马炎为司马昭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期间，康居、大宛进献的名马，依然是送到相国府中。朝廷的说法是为了嘉奖相国司马家族怀柔万国、安定天下的功勋。

一切都很明朗，最后的受禅只是程序问题了。《晋书》和《三国志》都对最后的禅让仪式一笔带过。我们综合各史书和《三国演义》的描写，大致还原下当时的情景：

司马炎与何曾、贾充等亲信商议前途举措。贾充等人劝道：“魏国天数已尽。臣等去劝说曹奂不可逆天而动，按照汉献帝的先例重修

受禅台，具大礼禅位于晋王。晋王您应该上合天心，下顺民情，早登大位。”司马炎在亲信的劝说中下定了最终的决心。

曹奂不是傻子，非常清楚自己就是魏国的末代皇帝了。随着司马家族势力日益飞扬跋扈，曹奂心惊胆战地等待着最后审判的来临。这一天，司马炎率领何曾、贾充等人，在没有得到召见的情况下进宫了。曹奂慌忙起身迎接。司马炎问他：“魏国的天下是谁在出力维持？”

曹奂回答说：“皆赖晋王父祖三代之力。”

司马炎点点头。贾充冷冷地说：“陛下文不能论道，武不能经邦。天下深知魏室已经失职很久，而归心于晋王一家。陛下何不禅位于才德出众的司马家族？”

曹奂虽然将这最后的判决设想了许多次，但真正面对这样的结果时还是不能立即接受。他一下子懵在那里，不能言语，许久才点头默认。贾充等人立即着手修筑受禅台。大家挑选了十二月甲子日作为受禅典礼的举行日。

当日，文武大臣和藩属使节云集受禅台周围。曹奂孤孤单单地捧着传国玉玺，站在台上，默然地看着周边的一切。四十五年前，他的伯伯曹丕就是这个台上的主角，等待着汉献帝把玉玺交过来。现如今，他也成了主角，不过是充当汉献帝的角色。群臣都在恭请晋王司马炎登台，没有人关注他。司马炎在众人的瞩目中缓缓地登上台。曹奂将玉玺传给他，便走下台去，穿上官服站在群臣的列首。司马炎则端坐台上。曹奂带头跪拜司马炎，行君臣大礼。群臣在他行礼后，三呼万岁，也行起君臣大礼。这一刻，中国换了统治者。

《三国演义》中有贾充执剑令曹奂伏地听命的情节。贾充狐假虎威，说的一段话值得后人回味。他说：“汉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汉禅，至今已经四十五年了。现在曹魏天祚已终，天命转移到了晋室。

司马氏功德弥隆，极天际地，即皇帝正位，以绍魏统。新朝封你为陈留王，迁居金墉城。立即起程，非宣诏不许入京。”这段话突出了因果报应的意味，也表现了司马家族的无情。

时任魏国太傅的司马懿的弟弟、司马炎的叔祖父司马孚见到此情此景，在曹奂身前跪倒哭泣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司马炎因为司马孚是本家长辈，也不能将他怎么样。司马炎的亲信慌忙将司马孚拉开了。

司马孚这个人温厚谦让，读了很多经史方面的书，是个君子。汉末乱世中，司马孚与兄弟几人有时也处在危亡之中，但是他粗茶淡饭，与世无争，坚持读书不倦。司马孚成年后，正直清白，从不与人结怨，也没担任什么实职。朋友曹植恃才傲物，司马孚就劝他锋芒不要太露。曹植起初不听他的话，在经过沧桑岁月的洗礼后，终于觉得司马孚的话是对的。两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司马懿父子执政后，司马孚因为是血亲，位居高位。但是司马孚对哥哥侄子们的执政是有意见的，常常远离政治，不参与纷争。孙子辈的司马炎图谋受禅的过程，司马孚也没有参与。司马师、司马昭对这个忠于魏室的叔叔很是头疼，但又不敢进逼，只能晋封他为长乐公。司马炎即位后，更是不敢进逼。

话说受禅礼完毕后，司马炎回到洛阳皇宫，在太极前殿正式宣布登基，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定都洛阳，改元泰始，大赦天下。司马家族终于成了天下的主人。

曹奂禅位后，降封为陈留王，魏氏诸王都降封为县侯。曹奂的陈留王规定位在三公之上。晋朝割十县土地、三万户人口建立陈留国。曹奂上奏可以不称臣，接受诏书可以不拜，依然保持天子车服和饮食，郊祀天地的时候继续使用魏国正朔。后来又规定，陈留王排位在皇太子之上。司马炎对曹奂还算宽大，不像后世受禅的皇帝一样对逊帝刀杀药毒，而是让曹奂平稳地度过了余生。他和汉献帝刘协都算是

结局比较好的逊帝了。

曹奂逊位时年仅二十岁，被安顿在金墉城（今洛阳市内）居住。不久，司马炎又命曹奂迁居邺城。曹奂在邺城又生活了三十六年，于302年病死，死后谥号为元帝。史家还习惯称他为常道乡公。这位末代皇帝被葬于邺城东南五公里处，现在临漳县习文乡赵彭城村西还有曹奂墓封土。陈留国在曹奂死后依然保存。后来晋朝大乱，中原陷入异族之手。曹奂的后代跟随西晋王朝南迁，继续做东晋的臣子。陈留国在南方复国，传国到南齐。西晋建立后，朝廷规定没有就藩的亲王是不能设置一系列王国官属的。司马孚被封为安平王，但留在首都，没有直接治理封地，也就没有必要设置完备的官属，但是司马炎特许他配置完备的安平王国官员，作为皇室亲善的榜样。司马孚的辈分实在太高了，内有亲戚，外有交游，经常入不敷出。司马炎就又给他增加了两千匹绢的俸禄。每到朝会的时候，朝廷特允许司马孚乘车上殿，司马炎亲自出宫殿在台阶下拜迎。司马孚坐定后，司马炎亲自捧觞上寿，行家人礼，而不行君臣之礼。

司马孚虽然在新的王朝里备受尊崇，但不以为荣，常常面带忧虑神色。每次皇帝司马炎向他行家庭拜礼的时候，司马孚都要跪地阻止。临终，司马孚交代的遗令几乎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槨，敛以时服。”意思是说魏国忠臣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一生不偏不袒，安身立命，恪守道德，始终如一。死后用薄棺材和平常的衣服入殓即可。司马孚死于泰始八年（272），时年九十三岁。这在古代中国，算是极其高寿了。司马孚对魏国的忠贞固然是信仰使然，这其中更有对自家在夺权过程中过度残杀的对、担忧及后怕的情绪。

第二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

三家归晋

—

西晋建立后的头十五年，都没有统一天下，而是和江南的东吴隔江对峙。

孙权晚年，东吴赋役苛重，社会矛盾加剧。晚年的孙权“性多嫌疑，果于杀戮”，搞得朝臣人人自危。孙权死后，是孙亮即位，孙亮之后是孙休。统治阶层争夺权力，爆发了一连串的宫廷内争和帝位更迭，国家开始陷入混乱。孙休临终前，指定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为顾命大臣，让他们辅助太子。当时蜀汉初亡，东吴南部交趾叛乱，国内震惧，需要年纪大一些的君主。濮阳兴、张布看太子年幼，竟然违抗孙休遗诏，迎立孙权之孙乌程侯孙皓为帝。264年，孙皓称帝。他虽然是成年人，但胡作非为，丝毫没有扭转东吴内忧外患的现状，反而让混乱进一步加剧了。

孙皓是出了名的暴君，动不动就敲碎大臣的脑袋，杀人如麻。濮阳兴、张布很快就后悔了，可惜还没找到后悔药就被孙皓砍了脑袋。孙皓还豪奢铺张，尽情享乐，好酒色，兴土木，搞得吴国“国无一年

之储，家无经月之畜”，人民揭竿而起，朝臣离心离德。孙皓对西晋的威胁，毫无戒心，还好大喜功，主动派兵攻晋，但多因草率而无功。名将陆抗认为晋强吴弱，不止一次上书反对主动攻晋，要求加强备战，他还预见到晋兵会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特别要求加强建平（今湖北秭归）、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西陵峡口）的兵力。可孙皓迷信长江天险可保平安，从未认真在战备上下功夫。

269年，西晋派大将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主持对吴作战。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羊祜每次交战都告知东吴时间，从不发动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一律赏酒灌醉。西晋部队越境抢粮作为军粮，但每次都留下相同价值的绢作为交换。羊祜游猎的范围也往往局限于西晋境内，同时向吴军大施恩惠。

由于孙皓挥霍无度，吴国的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就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香，而且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香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因此，东吴和西晋两军不像敌人倒像是友军，和睦共处。东吴官兵大多对晋军抱有好感。

羊祜的对手是镇守江陵的东吴大将陆抗。陆抗出身东吴世族，孙皓对他非常客气，除了不采纳劝谏外，放手让他负责西段军事。陆抗到任后，积极采取守势，巩固长江防线。

陆抗和羊祜两人交手，多数是在打“心理战”，留下了许多惺惺相惜的佳话。有一次，陆抗生病竟然向羊祜求药，羊祜马上派人送药过来，并说明这是自己新配制的药，还未服，先送给陆大将军吃。部将担心其中有诈，劝陆抗勿服，陆抗认为“羊祜岂鸩人者”，放心服下。同样，陆抗送给羊祜的酒，羊祜也饮之不疑。这看似奇怪，实际上却

是两军在打道德战、士气战，比的是心理素质。陆抗就告诫将士：“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陆抗掌军时，东吴并未在心理上输给西晋分毫。

陆抗本就已经是在勉力维持了，孙皓还在后方捣乱。贪小便宜的孙皓多次派军入侵晋国边界，取得了一些小成绩，便沾沾自喜，大吹大擂。陆抗认为此举惊扰边界百姓，有弊无利，上书劝谏说：“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孙皓还是不采纳，相反对陆抗和羊祜的做法很不理解，派人责问。陆抗回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如果不这么做，正是彰显羊祜之德，灭了我方威风。”

但孙皓还是给陆抗带来了大麻烦。凤凰元年（272）夏天，暴戾无道的孙皓逼反了陆抗镇守西陵的部下、昭武将军步阐。步阐世代为将，不忍孙皓迫害，以本部兵马和西陵城向晋武帝司马炎投降，并送侄子为人质，向西晋求援。司马炎任命步阐为卫将军，兵分三路予以支援：命荆州刺史杨肇进入西陵协防步阐，命车骑将军羊祜率五万军队进攻江陵，命巴东监军徐胤（yìn）率水军进攻建平。西陵是四川出三峡的第一站，也是东吴长江防线的最西站。它的沦陷，将动摇整个长江防线。陆抗抽调西线各处兵马，日夜兼程进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回西陵。

到了西陵，陆抗不急着重城，而是命令各军在西陵外围构筑高墙，割断步阐和西晋援军的联系。筑墙的工程量巨大，时间又紧，东吴官兵昼夜筑围，非常辛苦。诸将多有怨言，纷纷劝陆抗说：“现在三军锐气正盛，可以速攻步阐，不等西晋救兵来西陵城就能攻下。何必大造围墙，浪费劳力和物资呢？”陆抗说，西陵城地处险要，之前又把城墙修得牢固无比，还储存了大量粮草和守城器械，现在如果一味猛攻，不仅城池攻不下来，等西晋援军来了就要内外受敌，没法抵御了。宜都太守雷谭不听，言辞恳切，请求进攻。陆抗为了让大家了解实情，同意雷谭带部分军队攻城，结果大败而归。众将这才相信西

陵是块硬骨头，转而抓紧修筑围墙，在西晋援军到来前将西陵城团团围住。

在西陵战斗胶着之时，羊祜的五万大军到达了江陵。众将请求陆抗去江陵督战。陆抗再次力排众议，认为江陵的情况和西陵类似，城墙坚固，兵精粮足，西晋短时间内是攻不下来的。即使敌人占领了江陵，孤城也守不住，损失不大，但如果西陵落到西晋手里，整个长江防线就破了，“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所以陆抗坚持赶赴西陵督战。当年年底，西晋杨肇部终于抵达西陵，徐胤的水军也进抵建平。陆抗分兵防守这两支敌军，还派人防备羊祜南渡，拦截徐胤水军顺流东下，自率大军依靠抢险修好的围墙与杨肇对峙，以待战机。

吴将朱乔、都督俞赞失去信心，叛逃晋军。陆抗说：“俞赞军中多旧吏，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担心某地防守有漏洞，敌人知道后肯定会先攻此处。”陆抗连夜撤换那处的军队，替换上精兵强将。第二日，杨肇果然集中兵力进攻了防区弱处。陆抗指挥反击，打败晋军。僵持到年关将近，杨肇计穷，在夜幕掩护下逃走。陆抗怕追击后围城力量空虚，被步阐出城袭击，所以只擂鼓佯装追击。杨肇却被吓破了胆，丢盔弃甲狂逃而去。陆抗只派出一队轻兵追击，竟然将晋军逼回了四川。羊祜本来就是掩护军队，知道主力失败后便主动撤兵了。

西陵最终被西晋各军抛弃，陆抗开始督率军队猛攻狂打，很快就攻克了西陵，俘杀步阐及其部属数十人，全都诛灭三族。城内数以万计的胁从者被赦免。陆抗重新修治了西陵城池后，陈军东还。虽然凯旋，陆抗却“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此后因功加拜都护。

凤凰三年（274），西晋益州刺史王濬在巴蜀大造战船，训练水军。部分造船材料和木屑顺流而下，被东吴守军获得。吴建平太守吾彦取之以呈孙皓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当时陆抗已经病重，仍坚持上书说：“西陵和建平两城是国

家的屏障。如果敌人泛舟顺流而下，瞬间就能到达这两地，我军根本来不及救援。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臣父陆逊曾以为西陵是国家的西门，若有闪失，非但失一郡，整个荆州都不再为东吴所有。如果西陵有事，我们当倾全国之力争之。臣所统地区方圆千里，四处受敌，外御强敌，内怀百蛮，内在已经弊端重重，羸弱不堪，难以待变。乞求朝廷加以充实，补足疆场受敌的损失，让臣所部兵马满员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如果军队不增，制度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陆抗抱病直言，深深忧虑局势，隐隐中看到了东吴兵败国亡的命运。但强烈的责任感让他不能不犯颜直谏。可悲的是，孙皓对陆抗、吾彦的建议和警告，一概不予重视，依然置之不理。陆抗在当年死去，从此东吴再无良将。羊祜苦心经营荆州，志在灭吴。但他知道，只要陆抗在世就不容易成功，于是就没有发起进攻。陆抗一去世，羊祜便上书请命伐吴。他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羊祜预测灭吴要比灭蜀容易。贾充、荀勖、冯统（dǎn）等人竭力反对伐吴，司马炎便将伐吴之议搁置。羊祜闻讯感叹：“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天与不取，岂不令人抱憾！”咸宁四年（278），羊祜抱恨去世，临终举荐杜预继任。

二

西晋内部在伐吴问题上出现了持完全相反意见的两派。贾充、荀勖等人明确反对伐吴，认为东吴有长江天险难以取胜，当年曹操率几十万得胜之师都大败而归。在之前的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征服长江天险。贾充、荀勖等人精于权谋，争权夺利是高手，却疏于大势，不是大气的政治家。他们这一派人掌握着中枢实权，和司马炎关系很近，所以在伐吴问题上，反对派占据了上风。

顺带说一句，西晋的天下由阴谋篡位而来，开国君臣都没有经过征战的磨砺。大臣中不乏像贾充、荀勖这样的人，政治操守和素质都欠佳。

张华、杜预、王濬等伐吴派，一再上书求战。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奏：“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西晋建立已经十四年了，王濬等伐吴将领等待多年，再也经不起岁月的无情流逝。杜预也从襄阳七次上书，尖锐地指出贾充等人既不同意出兵伐吴，又说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一些大臣反对用兵就耽误天下统一大业，实在不应该。

杜预的奏折递到之时，司马炎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见了，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没有不想一统天下的皇帝，司马炎更是开国之君，本来就有意伐吴，如今被伐吴派一激，终于下定了决心。

备战多年的晋军大规模伐吴。二十万晋军水陆并举，杜预率荆州之兵在湖北渡江，司马伷、王浑等率军东出江淮，王濬率益州水军出三峡顺江而下。司马炎任命贾充为大都督，统帅伐吴各军。贾充缺乏军事才干，又对伐吴没有信心，推说自己年老体弱不肯受命。司马炎坚持不收回成命，说你如果不率兵出战，朕就要御驾亲征了。贾充无话可说，只好赴任。

各路晋军直扑东吴。荆州东吴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铁锥，长十余丈，中间用粗大的铁链相连，封锁了江面。王濬的水军先是将大竹排放入长江，令善水士兵乘筏先行，铁锥刺到筏上都被筏带去，而后在船头放置了无数根长数丈、麻油浇灌的火炬，遇铁链就点燃火炬，用熊熊烈火烧断铁链。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一扫除了。荆州吴军斗志瓦解，在王濬和杜预的水陆夹攻下望风披靡。

杜预率军攻克江陵后，荆州郡县大多投降，而后杜预率军南下，

王濬则挥军东进。太康元年（280）正月，长江北岸已经能看到王浑所部的晋军。孙皓这才慌张起来，急令丞相张悌等率兵三万渡江迎击。结果晋军大胜，张悌等人战死。吴国上下慌作一团，三月，王濬的水军逼近建业（今江苏南京），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抵抗，无奈吴军斗志全无，望旗而降。张象败后，虽然孙皓还拼凑了两万人的部队，但也都在作战前夜逃亡了。至此，吴国无兵可战，首都建业被各路晋军团团围住。

东吴只剩下投降这一条路了。投降的时候，孙皓耍了一个小伎俩，分别遣使奉书于王濬、司马伷、王浑三处求降，企图挑拨离间，从中渔利。离建业最近的是王濬、王浑两军。出兵前，司马炎规定王濬的水军在荆州受杜预的节制，到扬州后受王浑的节制。收到降书后，王浑以议事的名义要王濬停止进军。王濬不顾王浑的节制，在三月十五日率部鼓噪进入建业，抢占了头功。孙皓面缚出降，东吴灭亡。

西晋统一了全国。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作《西塞山怀古》，专门描写西晋灭吴之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孙皓投降前后，作为各路晋军统帅的贾充驻扎后方，对前线战况并不了解。王濬的大船开进了建业，孙皓都投降了，贾充还上奏，认为春天来了，江南低湿，担心晋军爆发疾疫，建议立即班师，如果晋军战败了，“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奏疏递了上去，前方便传来了吴国投降的捷报，贾充追悔莫及，怕司马炎怪罪，慌忙跑到洛阳请罪。司马炎也没有处分他。

孙皓投降后，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见面时司马炎对他说：“朕设此座待卿已久。”孙皓回答：“臣在南方也设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旁的贾充想献媚，故意揭孙皓的短，想让他难堪：“听说您在南方凿

百姓双眼，剥百姓头皮，这算是什么刑罚？”他以为孙皓必定惭愧请罪，不料孙皓冷言相向：“我这是用来惩罚那些弑君的叛逆之徒的。”这句话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他不就是杀害曹髦的元凶吗？贾充顿时满面羞惭，无言相对。司马炎也没有处分孙皓，一笑了之。

司马炎虽然是西晋的开国帝王，统一了大乱分裂近九十年（194—280）的神州大地，但靠的是祖父和父辈奠定的政治基础，靠的是北方强大的经济基础。他本人就是个平常之人，没有过人的胆略，也谈不上有什么才华。重臣何曾对家人评价司马炎：“吾每宴见，未尝阅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

还有一个段子，说司马炎曾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与汉朝哪一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客气地答道：“汉桓帝、汉灵帝。”司马炎见刘毅将自己比作东汉昏君，大为惊奇：“我还不至于那么差吧？”刘毅答道：“桓灵二帝卖官鬻爵，可钱进了国库，陛下却将卖官的钱占为私有，如此相比，恐怕你还不如桓灵。”刘毅的指责十分尖锐，司马炎却没有生气，反而笑道：“桓灵时没有人说这话，如今朕有直臣，远胜于他们了。”可见司马炎还是比较宽容开明的，能听得进谏言，可惜左耳进右耳出，听了以后没有行动。

总体来说，司马炎资质平平，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后重新统一，恰恰需要一个不爱折腾、安静治国的守成之君。司马炎的宽松个性和政治上的无为，适应了现实的要求。南北统一和若干恢复经济的措施，使西晋初期的社会经济逐年增长，国家赋税收入逐渐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从西晋灭吴的太康元年（280）到司马炎临死前一年的太康十年（289），也被称为“太康繁荣”。

白痴也能当太子

—

西晋初年，全天下都知道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

司马衷的白痴是先天性的，是那种一眼就能看不出来的不正常的白痴。他从小就不会正常走路，快十岁了还口齿不清，分不清大豆和大米的区别，更谈不上读书写字了。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司马衷白痴到了什么程度。

第一件事是说有一年的夏天，成年以后的司马衷带着随从到华林园去游玩。走到一个池塘边，一行人听到池塘里传出咕咕的青蛙叫声。司马衷觉得很奇怪，于是便问随从：“这些咕呱乱叫的东西，是为官呢还是为私？”随从们听到这样的问题，心里觉得好笑，可嘴上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也许是其中一个随从对司马衷的白痴问题习惯了，急中生智说道：“在官家里叫的，就是为官的；若在私家里叫的，就是为私的。”司马衷觉得很有道理，频频点头。

第二件事情说的是有一年天下灾荒，饿殍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在朝廷上，自然有大臣议论起这件事情来。司马衷突然发问说：“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大臣们哭笑不得。但对于司马衷来说，米饭和肉都是他日常吃的，老百姓没有饭吃了，为什么不去吃肉呢？

这么一个明显弱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怎么就成了太子呢？

司马衷是司马炎和杨皇后嫡生的次子。司马衷的哥哥司马轨早夭，司马衷很自然地成为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他被立为太子时，只有九岁。史书上没有任何有关司马衷立太子争议的记载。也许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还没有机会接触朝廷大臣，而且年纪也小，反应迟钝一点儿也并不被视为多大的事情，所以群臣没有就司马衷被立为太子一事提出疑问。同时司马衷的生母是皇后，正得到司马炎的宠爱，大臣们也就没有公开反对。随着司马衷的长大，难以掩饰的智力缺陷暴露了出来。人们不禁在心中发问：太子将来能否胜任天子的“职位”，是不是应该及时更换太子？

最先对司马衷的能力提出怀疑的是他的父亲司马炎。

史载：“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可见司马炎认为自己的这个儿子胜任不了统治天下的重任，曾经悄悄地和皇后透露了想更换太子的意思。但是杨皇后非常袒护司马衷，劝丈夫说：“自古以来，立嫡长子，而不考虑其能力高低。这样的老规矩怎么能更改呢？”晋武帝的另一个宠妃赵氏得到了杨皇后的好处，也跟着为司马衷说好话：“太子司马衷只不过是幼时贪玩，不长进。小时候就显露出超常能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太子将来必大器晚成，继承大统。”耳朵根软的司马炎被枕边风一吹，也就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但朝野大臣对司马衷不满意，希望更换太子。

咸宁元年（275），司马衷到了出居东宫的年纪，开始接触外廷大臣。随着太子独立建立东宫，朝野对其能否治理国家的怀疑也越来越重。咸宁二年（276），晋武帝患病，病情还不轻。朝野一度开始考虑最高权力转移的问题。多数人属意于司马炎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希望以司马攸来取代弱智的司马衷，而齐王妃就是贾充的长女。河南

尹夏侯和对贾充说：“你的两个女婿（司马衷娶了贾充之女贾南风，也是贾充的女婿），亲疏相等。

但是‘立人当立德’，希望你能够参与更立太子的行动。”贾充默默不答。后来晋武帝病愈了，听说这件事，将夏侯和调任为有名无实的光禄勋，并夺去了贾充的兵权，公开表示对太子司马衷的支持。司马炎如此处理，一时间朝野上下不敢再提太子能力不足的问题。

就在大多数朝臣明哲保身，对太子一事默不作声的时候，少数几位重臣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劝谏，试图让司马炎相信司马衷能力确实太差，实在不是做皇帝的料。有着灭蜀大功的卫瓘（guàn）就是其中之一。《晋书·卫瓘传》记载：“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卫瓘很想劝皇帝废掉太子，但每次想开口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和话题。后来有一次司马炎在陵云台举办君臣宴会，卫瓘装着大醉的样子，就势跪在司马炎的榻前说：“臣有些话想启奏皇上。”司马炎就说：“你想说什么呢？”卫瓘三次都欲言又止，最后只是用手抚着司马炎的座位说：“此座可惜了啊！”司马炎非常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将错就错地说：“你真的是喝得大醉了。”卫瓘从此闭嘴，不再就太子废立一事说话。

侍中和峤是另一位勇敢提出太子废立意见的大臣，只是他采取的形式非常直接。和峤怎么看都觉得司马衷是一个白痴，就趁自己经常陪侍皇帝左右的时候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这是好事；但是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恐怕将来就不仅是陛下的家事了。”司马炎闻言，采取的对策是默然不答。

大臣们的劝谏多少还是对司马炎产生了影响。他对群臣的意见虽然可以视而不见，或者采取间接的手段打压下去，但他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帝王，不可能在关系到子孙后代、帝王万世之业的事情上马虎从事。没有比他这个父亲兼皇帝更明白司马衷实际情况的人了，他决定再测试一下已经长大了的太子的实际能力。

司马炎的治疗方法就是派遣几位朝臣去考察太子，看太子能否承担统治大任。他选中的朝臣是和峤、荀顗、荀勖三位侍从近臣。司马炎说：“太子近日入朝，我看他有所长进，你们三人可以一起去拜访太子，谈论世事，看看太子的反应。”三个人就按照皇帝的吩咐去做了，回来的时候荀顗、荀勖两个人都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没有问题。和峤则说：“圣质如初耳！”意思是说还是和以前一样白痴。司马炎很不高兴，离席而去。

司马炎决定亲自考验一下太子，考考傻儿子处理政务的能力。一次，司马炎将东宫大小官属都召到身边来，为他们举办宴会。暗地里，司马炎密封了几件疑难的政务，让人送去给太子处理。他的想法是：我已经将太子身边所有的人都支走了，现在就只能由太子自己来处理这几个疑难问题了。如果处理得好，就证明太子的能力没有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是太子无能。

司马衷连五谷都分不清楚，哪能处理疑难政务，只能呆呆地看着父亲送来的文件。正当他要将纸空白着送还给父亲的时候，太子妃贾南风非常害怕，忙找了外人来做“枪手”，帮傻丈夫作答。估计她请来的是迂腐的学者，在回答的时候旁征博引，义正词严，慷慨激昂。贾南风看了回答，非常满意。但是宫中侍从张泓在旁边看了以后，提醒说：“太子不学无术，这是皇上非常清楚的事情。现在的答诏广泛引用，文采飞扬，皇上肯定怀疑不是太子亲自写的，并且追究作弊的人，根本过不了关的。还不如直接用大白话把问题给说清楚呢。”贾南风大喜，忙对张泓说：“来，你帮我好好回答，成功了与你共享富贵。”张泓平素有些小才，现在用大白话把所有疑难都说清楚了，再让太子抄写一份。

司马炎看了太子抄的答案，觉得虽然用语简陋粗浅，但还是将所有问题都谈到了、谈清楚了，很是高兴。他先将太子“处理”的政务交给太子少傅卫瓘看。卫瓘先是非常吃惊，进而异常惶恐。大家都知道卫瓘先有废立太子的意思，现在见此，忙称万岁。事后，贾充曾暗

地里派人告诉女儿贾南风：“卫瓘老奴，几破汝家。”从此，司马炎基本对司马衷满意了。废立太子的风潮再也没有出现过。

司马衷的太子之位能得以巩固，另一个原因是他生了一个好儿子司马遹（yù）。司马炎非常喜欢这个孙子，这为司马衷太子之位的巩固加分不少。皇孙司马遹乖巧聪慧，司马炎一度想将皇位传给司马遹，因此易换太子的想法也就更加淡薄了。

西晋之后有传闻说司马遹其实是司马炎的私生子，司马炎特别喜欢司马遹，同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也为了以后司马衷传位给私生子，所以才巩固了白痴儿子司马衷的太子之位。

这得从司马遹的生母谢玖说起。谢氏容貌清秀，美丽大方，很小就被选入司马炎后庭做才人。司马衷九岁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朝廷就开始准备挑选太子妃的人选了。“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也就是说，司马炎怕自己的白痴儿子不知道儿女之事，决定先派个人给司马衷做性启蒙。司马炎挑选的就是自己身边的才人谢氏。谢才人陪伴司马衷一晚，就怀孕了。性情残忍嫉妒的贾南风成为太子妃后对东宫的嫔妃随意杀戮，独独对谢才人不敢胡来。谢才人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请求回到司马炎身边，然后生下了司马遹。司马炎对司马遹非常宠爱。几年后司马衷进宫朝见父皇，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和自己的几个弟弟一起玩耍，非常可爱，便走过去拉着那个小孩傻笑起来。司马炎远远望见，走到司马衷跟前，对司马衷说：“这是你的儿子啊。”这段事情被记载在《晋书》中，引来了后人无数的猜疑。

除了司马衷这个白痴外，难道司马家族就没有其他智商正常、能力出众的政治继承人了吗？

有，那就是司马炎“明德至亲”的胞弟齐王司马攸。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声名良好，“才望出武帝（司马炎）之右”。不论是血统还是能力，司马攸都有即位的资格。司马炎的儿子不行了，为什么不传位给亲弟弟呢？

齐王司马攸是司马炎同父同母的弟弟。当年，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见哥哥司马师没有儿子，就把自己的二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做儿子。后来，司马师逝世了，司马昭掌权成为晋王，其间多次想把二儿子司马攸立为世子。当时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都拍着自己的座位亲昵地用小名招呼他说：“桃符，这是你的座位啊。”史载司马攸“几为太子者数矣”。

司马昭老的时候，一度非常想把自己的权力重新转移给哥哥司马师一系，也就是传给司马攸。说到底，传给司马攸也就是传位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司马昭非常希望能够见到这样的结果。但是左右亲信何曾、贾充等人死死劝谏司马昭说：“中抚军（指在魏国担任中抚军、新昌乡侯的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他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他们坚决反对将权力转移回司马师一边。司马昭见亲信反对，加上司马炎毕竟是嫡长子，能力也不错，最终打消了立司马攸为继承人的念头。但是在司马昭临死的时候，他还挣扎着向司马炎、司马攸兄弟讲解汉朝淮南王、魏朝陈思王与当兄长的皇帝之间不相容的故事，劝诫二人友爱相扶。司马昭更是拉着司马攸的手让司马炎好好对待弟弟。

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临死的时候，也流着泪对司马炎说：“桃符性急，而你又不慈爱。我死后，恐怕你们兄弟不能相容。希望你这个当哥哥的能够友爱自己的弟弟，勿忘我言。”

司马炎成为晋武帝后，封齐王司马攸“总统军士，抚宁内外”。司马攸在政治实践中立了许多功劳，威望越来越高。司马攸对晋朝以及自己封地内的官吏和人民恩养有加，“时有水旱，百姓则加振贷，十减其二，国内赖之”。他做人“降身虚己，待物以信”，并不时劝谏司马炎务农重本，去奢即俭。到了司马炎的晚年，各位皇子年幼无力，而太子司马衷又是明摆着的弱智。朝堂内外大多属意由齐王司马攸即位。

司马炎的确像父母担心的那样，对人不够宽容，即使是对亲弟弟也一样。司马攸功劳和威望的增加让司马炎总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威胁，他并不想将皇位传给弟弟。当时司马炎左右一些反对司马攸的大臣看准了皇帝的心思，做出了一些迫害司马攸的举动。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等人害怕司马炎死后司马攸即位会对自己不利，就老在司马炎耳边说司马攸的坏话。他们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司马炎大惊，询问为何，荀勖就乘机说：“朝内朝外官员都归心于齐王，太子又怎么能得立呢？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假装下诏书让齐王回到封地去，肯定会出现举朝以为不可的局面。”冯也进一步说：“陛下让诸侯归国，这是国家制度，亲人理应遵守。皇上至亲莫如齐王，他应该首先响应命令离开京城回自己的封地。”司马炎对弟弟的猜忌被这几个人的话语给挑拨了起来，认为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诏令，先是把济南郡划入齐国封地，增加了弟弟的封地，再是封侄子，即司马攸的儿子司马蹇为北海王，赠六楸（xiū）之舞、黄绒朝车等仪物，最后命齐王司马攸回封地就藩。

诏书下达后，朝中王浑、王骏、羊琇、王济等一帮大臣纷纷直言极谏。大家认为齐王是皇上至亲，应该留京辅政。一些大臣还抬出司马昭、皇太后的遗命，引经据典，劝司马炎收回成命。司马炎不听，认为“兄弟至亲，今出齐王，是朕家事”。

齐王司马攸当时正在生病。他知道哥哥猜忌自己，也知道荀勖、冯统等人于自己不利，就上书乞求去为死去的生母王太后守陵。司马

炎不允许，还连下诏书催促。眼见催促就藩的诏书一道比一道急，司马攸急火攻心，病势加剧。司马炎却更加怀疑弟弟是在装病。为了查明弟弟是否真的生病了，他不停地派宫中御医到齐王府诊视。御医们久在皇帝身边，自然知道司马炎的心思。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回宫后都禀告说齐王身体安康，并没有生病。司马炎便相信弟弟是在装病，对司马攸越发不满了。

司马攸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而司马炎催促上路的诏书也一天比一天多，一道比一道严厉，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司马昭夫妇生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司马攸性情刚烈，见事情无法挽回，就挣扎着换上一身新朝服，梳洗穿戴停当，入宫面辞司马炎。他虽然病得连路都走不稳，精神疲惫到了极点，却还强装着仪表，举止如常。司马炎见了，更加认定弟弟是在装病了。在宫中，兄弟二人例行公事，司马攸辞行回封地去了。没几天，病入膏肓的司马攸就在路上吐血身亡，年仅三十六岁。

司马炎接知齐王的死讯，才知道司马攸不是装病，是真的病死了。他不禁悲从中来，恸哭不已。毕竟齐王是自己的至亲。冯紞却开导司马炎说：“齐王矫揉造作，聚拢天下人心。现在他暴病身亡，是社稷之福。陛下不必如此哀痛。”这话说到了司马炎的心坎里，他想了想，也就停止了哭泣。

朝廷为齐王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临丧之时，司马攸的儿子司马罔伏地号哭，控诉御医指证父亲无病，延误了诊治。司马炎脸面无光，也就顺坡而下，处死了先后派去为齐王诊病的御医。一场皇位继承的较量，就以司马攸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了。

在太子位更易的较量中，司马炎是胜利者。但是没有出场的司马衷也是胜利者，而且是更大的胜利者。

白痴司马衷太子之位的确立和巩固，是许多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杨皇后对晋武帝的劝告，贾充及其党羽对司马衷的支持，太子妃贾南风的精明，皇孙司马遹的聪慧，等等。但是晋武帝司马炎作为决策者，要为白痴皇帝的出现承担主要责任。司马炎受主观意愿的影响，偏听偏信。一方面，他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使看到了儿子的弱智，也下不了更换的决心。在后宫妃子的鼓动下，他在心里彻底确立了司马衷的太子地位。另一方面，即使有更优选择，出于阴暗心理，司马炎也排斥他人，只相信自己一脉的继承者。

很奇怪的是，司马衷自己毫无作为，却轻易地成为太子并巩固了地位。也许他对周边的这一切明争暗斗都毫无感觉，但是他的出身和婚姻关系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司马炎强迫齐王司马攸就藩的时候，驸马王济除了自己陈情外，还和另一个驸马甄德一起发动各自的妻子，入宫规劝父皇司马炎收回成命。面对哭泣的女儿们，司马炎发怒说：“朕和齐王是兄弟至亲，齐王就藩是朕的家事，甄德、王济怎么能屡次让老婆来哭哭啼啼！”王济是司马炎非常喜欢的女婿，才气逼人，招人喜欢，如今也因为这件事情被贬官外放。

不久，司马炎又想召回心爱的女婿，就对和峤说：“我想痛骂王济一顿，然后给他加官晋爵，如何？”和峤提醒他，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结果，司马炎还是召回了亲爱的女婿王济，痛骂了他一顿，然后问他：“你惭愧吗？”王济回答：“民谣说，哪怕只有半尺布一斗粟，兄弟也要共同分享。每当我听到这句民谣，就为陛下感到悲哀。其他人能令亲友疏远，臣不能使陛下兄弟亲爱，感到有愧于陛下。”司马炎闻言，采取了一贯的应对方法：默然不语。

快来围观“西晋首富”

—

西晋武帝和惠帝年间，洛阳城里有一个高调的超级富豪，名叫石崇。

一个人是不是富豪，不是他自己说了就算的，也不是由他的存款数目决定的——富豪是从比较中产生的。那个衬托出石崇富裕程度的冤大头，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

王恺饭后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长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砌墙。反正石崇什么都不求最好，只求比王恺家的更好。

石崇和王恺长期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石崇在日常生活中的三件小事上长期赛过王恺，让王恺很不爽。第一件事情是豆粥很难煮，石崇招待客人的时候，想吃豆粥，只要吩咐一声，下人就能把豆粥端上来。王恺家就做不到。第二件事情是即使在冬天，石崇家也能吃到绿莹莹的韭菜碎末儿。石崇家仿佛有蔬菜大棚，能够生产反季节蔬菜。第三件事情是石崇和王恺出游的时候，都暗中铆劲看谁能先返回洛阳城。石崇家驾车的牛跑得像马一样快，每回都把王恺远远甩到后头。

王恺在这三件事情上老是输给石崇，觉得特别没面子，又找不到原因，就暗中买通了石崇家的一个下人打探消息。那人揭秘说：“大

豆的确很难煮成粥，石家总是事先将大豆煮熟研成末儿保存起来，等客人来的时候，把豆末儿投入白粥，就成了豆粥。冬天吃韭菜末并非全是韭菜，而是混杂了韭菜根末儿的麦苗碎。牛车的快慢，全靠驾车者，石家的驾车者从不约束牛，听凭牛撒开蹄子跑，所以跑得快。”王恺知道秘诀后，照搬到自己家来，于是在以上三件事上都能和石崇一争高低了。石崇发现后，恼怒得很，查遍所有原因才发现是下人走漏的消息，气得把下人杀了。

晋武帝司马炎知道石崇和王恺斗富后，决定帮助舅父王恺打败已经占有优势的石崇。

司马炎可是拥有全天下的财富，他从皇家的珍藏中挑选了一株珊瑚树赐给王恺。那珊瑚树高二尺许，枝条繁茂，树干蔓延，世所罕见。王恺获得如此珍宝，大肆渲染，遍示众人。石崇也跟着大家到王家去参观御赐珊瑚树，只见他拿起一个铁如意就砸了过去，珊瑚树应声而碎。王恺惋惜极了，认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宝贝，声色俱厉地斥责石崇。石崇漫不经心地回答：“这有什么可惜的，我现在就还给你。”石崇吩咐下人把自家珍藏的珊瑚树都搬到王恺家来。结果原本是王恺举办的“珊瑚展览”变成了石崇的“炫富大会”。石崇珍藏的珊瑚树单单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株株条干绝俗，光彩耀目，而司马炎赐给王恺那样的珊瑚树与其相比，都算是小的了。石崇爽快地告诉王恺，看上哪株就搬走，咱俩还谁跟谁啊？

经过如此惨烈的一役，王恺不得不承认石崇比自己富裕，其他人更是甘拜下风。石崇总算是摘取了“西晋首富”的桂冠。

超级富豪的生活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比如他们压根就不和众人住在一起，而是自己开辟出一片土地来造城堡、建庄园。石崇就在洛阳城外洛河北边的金谷造了别馆，取名梓泽，一般的迎来送往和交往应酬都在里面举行。石崇在那里圈了好大块地，有山有水有良田，依照地势高低筑台凿池，建筑了百丈高的崇绮楼，高到“极目南

天”的地步。在园子里，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生活享受极尽奢华，“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总之，晋朝人能够想到的吃穿住行、山珍海味和乐器玩具都能在石崇家里找到。

石崇还养了数以百计的美女。这些美女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装饰着璀璨夺目的珍珠美玉宝石。石崇要求侍女都要嘴含异香，以便讲话的时候能够喷香扑鼻。石崇又在象牙床上洒沉香屑，让所宠爱的姬妾踏在上面，没有留下脚印的赐宝珠一百粒；留下了脚印的人就要节制饮食，以使体质轻弱。

石崇这个首富当得太高调了，连晋武帝司马炎都很好奇，很想到石崇的别馆里一看究竟。为了不至于被石崇比下去，司马炎在穿着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把外国进贡的火浣布制成衣衫，穿上后便去了石崇家。到了那里一看，石崇的衣服倒是非常平常，但是他家五十名下人都穿着火浣布做的衣衫。

大臣刘寮出身贫寒，小时候砍过柴喂过猪，长大后位列公卿还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走路上班，骑马出行，到别人家做客能自己动手的绝不劳费他人。一天，刘寮去石崇家做客，想上厕所了，就自己找了过去。他推开一扇看似厕所的屋子的门，差点没被里面的香气给熏出来。刘寮定睛一看，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里面摆放着绛色的蚊帐，精美的垫子、褥子和各式香水、香膏、香袋，屋里还有十多个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的婢女列队侍候。刘寮还没反应过来，这些婢女就拿着漂亮的衣服迎上来，要给他换衣服。刘寮赶紧退出来，转身遇到石崇。刘寮苦笑着说：“抱歉抱歉，我误入了你家的卧室。”石崇回答：“刘大人搞错了，那是我家的厕所。”

问题是，石崇的财富是怎么来的？

《晋书·石崇传》只有一句话涉及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说是石崇在荆州刺史的任上“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想象一下，荆州地区的最大长官，竟然指使手下抢劫远方的使节和过境的客商，以保护者的身份行强盗之实，那是怎样的情景？石崇这个荆州刺史连上路抢劫都明目张胆，更别说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等小儿科的腐败行为了。荆州辖内有现在的湖北、湖南地区，东汉末年刘表占据这块富庶之地割据数十年，如今石崇在荆州搜刮地皮多年，自然是赚饱赚足了。

除了荆州刺史，石崇一生宦海沉浮，任职无数，其中许多还是辖地管人的肥缺，不乏捞钱的机会。我们可以看看石崇的为官履历。他在二十岁出头就担任了修武县令，很快就被召为散骑郎，镀了几天金就荣升城阳太守，很快又因为伐吴有功被封为安阳乡侯。不知道石崇在伐吴时立下了何功？城阳在今山东江苏沿海一带，距离前线还有段距离，石崇这个城阳太守可能为西晋的水师提供了若干后勤支持，也可能仅仅是伐吴成功后司马炎大封功臣中的一员而已。

石崇因病辞去太守职务，没过几天又被任命为黄门郎，很快被提拔为散骑常侍、侍中。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石崇先是担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又加鹰扬将军衔；然后出任太仆、征虏将军，持节监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最后返回朝廷担任卫尉，与潘岳等人投靠皇后贾南风。贾氏出行，石崇只要遇到了，都主动下车让路，对着贾氏扬起的尘土叩拜。《晋书》直指石崇“其卑佞如此”。

像石崇这样没有政绩却劣迹斑斑，没有操守且人品低下的人，为什么能在西晋王朝屹立不倒、官运亨通呢？

石崇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那就是西晋的勋贵权戚群体。

石崇的父亲石苞，在晋武帝时曾官至大司马。石崇凭着父亲的光

环进入仕途，多次提到“先父之恩”“先父勋德之重”。西晋初年有许多石崇这样的贵戚子弟。司马家族出于招揽人心、篡夺天下的考虑，对权贵和皇室成员采取了宽松优厚的笼络政策，造就了一个勋贵权威的群体。石崇只是其中一员而已。

西晋王朝可算是中国历史上获得天下最容易的朝代。西晋的建立是司马家族成功从一个阴谋走到另一个阴谋的过程。从高平陵政变司马懿扫除曹爽势力开始，司马家族再也没有遇到大的危机。之后除了忠于曹魏王朝的势力在扬州发动了两次反对司马势力的起义外，整个曹魏王朝相对平静地被司马家族篡夺了。曹魏的大臣和精英分子们集体转向司马家族，得到的是司马家族对他们世代高官厚禄的回报。

曹魏的建立者曹丕和西晋的建立者司马炎都是继承家族遗产，逼迫前朝把天下禅让给自己的。不同的是，曹丕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乱世，本人还在乱世中奋斗过；而司马炎则完全是在富贵乡中成长起来的，他不知道创业的艰辛和天下百姓的疾苦。因此，司马炎及其时代是一个弥漫着安乐和享乐的时代，是石崇和王恺等贵戚斗富，皇帝在一旁助阵的时代。盘旋在西晋王朝顶端的是一群和社会现实、普通百姓相对脱节的“食利者阶层”，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就是荣华富贵来得太容易。许多人是含着金汤匙降生，富贵唾手可得。他们没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没有在社会底层挣扎过，甚至连残酷的权谋斗争也不曾参与，这样一群人却把持着一个朝廷，充斥在西晋王朝开创时期的领导阶层中。

食利者的荣华富贵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注定了他们不会珍惜眼前所得，只会率性挥霍。

比如石崇就有两次看似荒诞的罢官经历。一次是石崇被征为大军农，他得知后没等征书到手就擅自卸去了原来的官职，被罢官。还有一次是石崇去徐州监督军事，到任后与徐州刺史高诌争酒相侮，被免官。一般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职业规则，懒散的石崇都做不到，难怪

要被罢官。可人家不怕，反正过几天马上会被官复原职，说不定还会加官晋爵，石崇就是再被罢官几次也无所谓。谁让他是食利者阶层呢，不需辛劳就能坐享其成。

于是，食利者阶层的奢侈和挥霍也就可以理解了。西晋王朝，社会风气“性奢豪，务在华侈”，权贵人家“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西晋墓葬，规格和陪葬品数量都比曹魏时期突然高出了一大截，出现了厚葬风气。太康六年（285），王恺去世后葬在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长四十五里，松柏茂盛。

晋武帝司马炎本人就生活奢华，带了一个坏头。据说司马炎后宫佳丽数万人，他难以选择宠幸哪位佳丽，就经常乘着羊车到处转悠，拉车的羊停到哪里，司马炎晚上就临幸哪位佳丽。

司马炎分别和太原王家、琅琊王家联姻，把两位公主分别嫁给了太原王家的王济和琅琊王家的王敦。王济也是巨富。当时洛阳地价极高，王济却有能力和在洛阳买地做大型马场。别人的马场用黄沙铺地，王济则用金银铜钱铺地，因此王家马场也被称作“金沟”。有一次，司马炎亲临女婿家。王济家百余名婢女穿着绫罗绸缎伺候司马炎，所有的供馔都盛在琉璃器里——当时琉璃还只能通过西域从西方进口，普通人家能有一两件小琉璃玩意儿就了不得了。司马炎对这样的排场自叹不如，心里很不是滋味。吃饭的时候，司马炎觉得王家的猪肉蒸得非常鲜美，就问女婿是怎么做的。王济轻描淡写地说：“猪崽是用乳喂的。”司马炎闻言，大惊失色，放下碗筷拂袖而去。

琅琊王家的发达晚于太原王家，同是驸马的王敦当时还比较贫寒。一天，王敦进宫，找厕所方便。发现厕所里有一个装饰漂亮的漆箱，好奇地打开一看，发现里面装着大红枣，闻闻还有淡淡的香味。王敦大为感慨，到底是帝王之家啊，连厕所里都摆放果品。于是，他一边方便，一边把箱子里的红枣都消灭了。这事很快便传为洛阳城里

的笑谈。原来，那红枣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塞鼻防止异味的。王敦不知道许多富贵人家都在厕所里放红枣，专用名是“厕枣”。

西晋社会的豪奢，已经到达了这样的程度。

三

西晋王朝的短命，与食利者阶层的不珍惜和任意挥霍的行为大有关系。

话说曹魏王朝对皇室成员限制非常严格。曹操、曹丕父子都有多疑的毛病，对同族兄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曹丕对弟弟曹植的防范，已是人尽皆知了。其实不单是针对曹植，曹魏王朝对所有诸侯王和皇室成员都严密控制，不允许他们带兵、干政。诸侯王围猎连扩充数量极其有限的卫队都需要报告朝廷。西晋王朝对此不以为意，认为曹魏王朝的覆灭和对皇室成员的严格限制大有关系，因此厚待司马皇族，广植诸侯王。西晋的皇室诸王有封地和军队，独立发号施令，权力大得很。司马氏诸王也是典型的食利者。他们的脑子里除了享受荣华富贵，就是追求更大的荣华富贵，最后同室操戈，爆发了“八王之乱”。

而石崇最后也死于他高调的富豪生活。

石崇原本依附贾氏。“八王之乱”初期，贾后被诛，石崇因为是贾氏一党而被罢官。石崇一点儿都不担心，罢官后依然在他的安乐窝里过着高调的奢华生活。赵王司马伦、孙秀等人一度专权。孙秀听说石崇的宠姬绿珠美艳，派人来求。石崇勃然大怒：“绿珠是我的，不能给别人。”孙秀派了几次使者来求，石崇都不给。孙秀大怒，刚好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和司马伦有隙，孙秀就劝司马伦诛杀石崇、欧阳

建。石崇则与潘岳、欧阳建暗中联络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来对付司马伦、孙秀，最后事败被杀。

武士来抓石崇的时候，石崇还在高楼上歌舞欢宴。武士冲到了门口，石崇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不过是流徙交州、广州而已。”长期的食利者心理让他连最基本的危险意识都丧失了。结果，石崇全家，包括老母、兄弟、妻子、儿女在内共十五人，无论长幼都被杀。石崇时年五十二岁。他的巨额珍宝货物、田宅奴仆都被罚没。

临刑前，石崇叹道：“这是小人贪图我的家财。”行刑者反问他：“你既然知道多财害命，怎么不早散之？”石崇哑口无言。

悍妇乱政不得了

—

在司马衷的一生中，贾南风的身份是妻子，但更像是司马衷的幕后操纵者。

贾南风是西晋开国功臣贾充的女儿。太子司马衷要娶亲的时候，许多人推荐贾充的女儿。晋武帝司马炎则想为傻瓜太子娶另一个功臣卫瓘的女儿为妃。他告诉杨皇后：“卫家的女儿和贾家的女儿，优劣实在是泾渭分明。贾家夫人好妒残暴，生子不多，生的女儿又黑又丑、身材短小。卫家夫人贤惠，多子多孙，生的女儿白皙漂亮，身材修长。你说该选谁呢？”但是杨皇后平时被贾氏及其党羽包围，收了很多好处，听了很多贾南风的好话，坚持要儿子娶贾氏的女儿。大臣荀勖、荀勗两人又在外边起哄，说贾充的女儿贤惠美丽。司马炎考虑到贾、杨、荀等人都是朝廷的支柱重臣，这才改变主意，决定让儿子迎娶贾充的女儿。

一开始，司马炎选择的是贾充的小女儿，即十二岁的贾午。可是她长得太小了，连结婚礼服都撑不起来。没办法，新娘换成了十五岁的姐姐贾南风。就这样阴差阳错，贾南风嫁给了比自己小两岁的司马衷，成了太子妃。

事实证明杨皇后、荀勖、荀勗等人完全是瞎扯。贾南风身材矮小，面目黑青，鼻孔朝天，嘴唇朝地，眉后还有一大块胎记，完全和美丽沾不上边。从她日后的表现来看，贾南风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贤

惠两个字。贾南风的母亲郭氏是有名的悍妇和醋坛子，看到丈夫贾充俯身抚摩保姆怀中的孩子，就以为两人关系暧昧，竟然杀了保姆。她连续杀了两个保姆，结果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因为找不到保姆都夭折了。贾充被郭氏管得服服帖帖，连女人都不敢多看一眼。贾南风更是深得母亲郭氏的真传。

《晋书》记载，结婚后贾南风“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嬖御罕有进幸者”。她不仅相貌不佳，而且生性残酷。当时东宫中有一些宫女已经怀上了太子司马衷的孩子，贾南风就用戟投掷孕妇的腹部，腹中的婴儿就随着刀刀堕地。据说贾南风还亲手杀掉左右侍女数人。她爱吃醋又有手段，将司马衷弄得服服帖帖，成为东宫一霸，其他宫妃都很难接触到司马衷。

晋武帝知道情况后，开始觉得贾南风不宜做太子妃了。

当时的皇后是司马衷生母杨皇后的堂妹杨氏。杨皇后临终前曾请晋武帝迎娶她的堂妹。晋武帝流着眼泪答应，于是出现了新的杨皇后。这位新的杨皇后不仅继承了堂姐对晋武帝的掌控能力，也继承了堂姐与贾家的良好关系。晋武帝将有意废除贾南风太子妃之位的想法告诉了她。新的杨皇后忙劝晋武帝：“贾充有大功于社稷，是朝廷重臣，其家即使有罪也应再三宽赦，更别说是他的亲生女儿了。太子妃现在还太年轻，正是嫉妒任性的时候，皇上不该以其小过掩其父大德。”

晋武帝的毛病就是很容易被枕边风吹倒，这次又很容易地打消了废除贾南风太子妃之位的主意。外戚杨珧（yáo）在这件事情上也起到了巨大作用。他提醒晋武帝说：“陛下忘贾公闾耶？”意思是提醒皇帝不要忘记了贾家在帮助司马家篡夺曹魏政权上的功劳。最后废太子妃之事不了了之。

就这样，因为晋武帝的优柔寡断和贾充在西晋政权中的显赫权

势，贾南风坐稳了太子妃的位置。而司马衷一边害怕她，一边又受她的诱惑，离不开她。太熙元年（290）四月，晋武帝去世，太子司马衷即皇帝位，是为晋惠帝。贾南风顺理成章被册封为皇后。晋惠帝依然黯弱无能，很自然地，国家政事都由贾南风干预。

如果说晋武帝在世的时候，贾南风还不敢太过分张扬，压抑了自己的欲望，那么现在司马衷即位了，贾南风将欲望和所有的劣性都彻底地暴露了出来，而且丝毫不加掩饰，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堪的记录。

在个人作风上，贾南风广收面首，将后宫弄得乌烟瘴气。《晋书》记载贾南风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人淫乱宫廷。后来她不满于朝廷里的面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民间。洛南有个盗尉部小吏，容貌端庄漂亮，可惜只是衙门的厮役而已。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吏披金戴银，出手阔绰起来。这在官场中是很显眼和招人嫉妒的事情。于是很多人就怀疑他暗中盗窃财物，主管的尉官也怀疑这个小吏是盗贼，将他捉拿起来侦办。刚好贾南风一个亲戚家里被盗了，听说抓了盗贼，就过来旁听审讯，希望能挽回损失。审讯的时候，小吏坦白说：“之前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妪。她说家里有人得了疾病，占卜师说要找一个城南的少年来驱病，所以她想暂时麻烦我去帮忙治病，还说必有厚报。于是我就跟着去了，上车下帷，藏在簏箱中，大概走了十几里路，过了六七道门，簏箱才被打开。我忽然看到楼阁大屋，华丽壮观，就问这是什么好地方，旁边有人说是天上，还用香汤给我洗浴，供应我好衣美食。我又见到一个年纪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妇人，身材短小，皮肤青黑色，眉后有疵。她挽留了我好几个晚上，共寝欢宴。临走的时候，是这个妇人送的我这些东西。”

审讯的官员和贾南风的亲戚听到坦白后，都知道是贾皇后招这个少年去宫中偷欢了，惭笑而去。尉官也了解其中玄妙，将这个小吏释放了事。这个小吏还算是幸运的。当时贾南风在外面找了很多男人入宫，完事后就将这些人杀死，只有这个小吏，因为贾南风很喜欢他，

才放他活着出去。

在政治上。贾南风掌握了大权后，将朝廷变成了地狱。在她还是太子妃的时候，贾南风就已经暴露出了凶残的本性，只是因为尚未掌握朝廷大权，所以没能施展出来。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在掌权后会将凶残成倍地放大。贾南风掌权后，为了巩固惠帝的统治地位，也为了一己私心，甚至有的时候是情绪导致，开始滥杀无辜，草断朝政。贾南风渴望的是权力。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独揽大权的呢？

二

晋武帝灭吴统一天下之后，就不像之前那样勤政了，多数时间沉浸在酒色之中，朝中事务依赖外戚杨氏。当时杨骏、杨珧、杨济位居三公，时称“三杨”，可谓权倾朝野。司马炎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担心傻儿子掌握不了天下，要给他安排辅政大臣。杨皇后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口宣帝旨，任命自己的父亲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当时司马炎还没死呢，据说旨意是杨皇后在他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杨骏在皇后女儿和众人的帮助下，成了辅政大臣。

司马衷即位之后，杨骏辅政，凡朝中之事，必亲自过问，“百官总己”。杨骏害怕朝野上下出现不利于自己的阴谋，也为了镇压异己力量，任命外甥段广、张勋为近侍，还让同党统领了禁兵。杨骏知道贾南风性情强悍，难以压制，心里也有些畏惧。他规定诏书先由自己认可，再通过女儿杨太后交给傻瓜皇帝盖章，不经贾南风之手。

贾家和杨家的关系很好。外戚杨家帮了贾南风许多忙，尤其是两位杨皇后在巩固司马衷和贾南风的地位上出力不少。但是贾南风一点

儿都不感激杨家，反而恨死了阻碍自己掌权的杨家人。

早在晋武帝挑选辅政大臣的时候，尚书褚契、郭奕就上书说：“杨骏小气，不可以托付社稷之重。”武帝不以为然。杨骏也是烂泥扶不上墙，专权后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糕。他大肆封赏朝廷内外人士，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支持率。对于许多重要政务，杨骏并没有成熟的想法，频频失误，而对内外臣工甚至宗室诸王态度强硬，排斥任何潜在的权力威胁，在朝廷上出现了“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的局面。与杨骏交往密切的孙楚劝杨骏说：“公为外戚，居重位，握大权，辅弱主，应效法前贤至诚谦顺之道，不应独断专行。宗室诸王，分藩裂土，拥兵势重，您不与他们共参大事，内怀猜忌，外树私党，恐怕大祸临头的日子不远了。”但杨骏对旁人苦口婆心的劝说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

贾南风发现杨氏在朝野的行为已经激起了多数人的反对情绪，决心利用反对杨骏的势力铲除杨氏，自己上台。贾南风暗中联系汝南王司马亮，请他发兵讨伐杨骏。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子，辈分极高，老成持重，不愿意听从贾南风指挥，拒绝出兵。贾南风又秘密联系楚王司马玮。司马玮是皇帝司马衷的弟弟，年轻气盛，有勇无谋，同意带兵讨伐杨骏。

291年的一个深夜，傻乎乎的司马衷被从被窝里拉起来，贾南风党羽李肇、孟观两人报告说杨骏谋反，要求皇上下诏书命楚王司马玮诛杀杨骏。当时在宫中的段广是杨骏的外甥，听到后跪在司马衷跟前一个劲儿地叩头为舅舅辩解，请皇上仔细考虑。司马衷哪里能想清楚那么复杂的问题，半睡半醒中在草拟好的诏令上签了字。

司马玮随即带兵包围了杨骏府邸。杨骏府邸是原来曹爽的老家，他现在也和几十年前的曹爽一样犹豫不决。主簿朱振认为这是贾皇后和少数几个人做的，建议杨骏集合家丁冲入东宫挟持皇太子，再召集忠于杨氏的兵马，反过来消灭贾南风等人。杨骏不敢冲击宫禁，只寄

希望于党羽、左军将军刘豫率兵来救援。

左军将军刘豫是个老实人，在率大队军马救援杨骏的路上遇到了右军将军裴頠（wěi）。裴頠是贾南风党羽，骗他说杨骏已经逃跑出城去了。刘豫慌了，忙问自己怎么办。裴頠建议他去向廷尉“自首”。刘豫连这鬼话都信了，放弃军队，真的跑去自首了。结果，杨骏待在家中束手就擒，被司马玮的乱军杀死。事后，包括杨家老少在内的数千人被杀，府邸被焚毁，杨骏全族及党羽杨珧、杨济、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杨邈、蒋骏等人和他们的家族无一幸免。

杨太后得到凶讯的时候，宫廷已经戒严了。她想救父亲，苦于没有办法，只好写了“救太傅者有赏”的丝帛射出宫外。不幸的是，贾南风的党羽拾到了帛书。贾南风因此称杨太后参与“谋反”，矫诏废杨太后为庶人，迁往金墉城（洛阳角落的一座冷宫）。第二年，杨太后被迫害致死。

除掉太傅杨骏和杨太后以后，老资格的汝南王司马亮任太宰，同样老资格的卫瓘任录尚书事，两人共同辅政。

司马亮认识到了诸王会威胁皇室和自己的权威，决心削弱诸王的权势。他力主“遣诸王还藩”，也就是要把各位王爷分割限制到封地上去，卫瓘也完全赞成此举。这就引起楚王司马玮对司马亮和卫瓘的极大不满。而贾南风任命司马亮为太宰之后也后悔了，因为司马亮推行的集权政策也制约了她这个皇后的权力。而卫瓘很早就反对过立司马衷为太子，现在对贾南风的恶劣行为也有所批评，贾南风恨卫瓘恨得咬牙切齿，决心铲除司马亮和卫瓘二人。

这回贾南风找的还是楚王司马玮。司马玮诛杀杨氏，立有大功，现在却要遭到司马亮等人的限制，内心严重不平衡，又一次答应了贾南风的请求。291年的又一个深夜，贾南风又让司马衷下密诏，授权司马玮惩办“图谋不轨”的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司马玮接到密诏后，

对司马亮和卫瓘的府邸发动突袭。结果，二人死于乱刀之下。

两位辅政老臣死于非命，第二天早上消息传出后，朝野震动。大臣张华等人指责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要求解散城中的乱军。贾南风顺水推舟，告诉司马衷楚王司马玮拥兵作乱，形同谋逆，应当斩首。司马衷再次不辨真假，在诏书上签了字。头脑简单的司马玮就这样成了替罪羊，身首异处。

先是一出“借刀杀人”，再来一场“卸磨杀驴”，贾南风初出政坛，就“精彩”不断，取得了全胜。障碍一个个被除掉，贾南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终于轮到她独揽大权了。贾南风大肆委用亲信、党羽出任要职，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她的凶残、胡作非为，使她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顽劣的皇后之一。

三

对于贾南风的所作所为，司马衷无动于衷。因为他智商太低，许多事情理解不了。

在司马衷即位前就多次有人向晋武帝提出司马衷的能力问题，怀疑他不能治理政事。果不其然，司马衷登基后一直大权旁落，成为受人摆布的傀儡。

《晋书》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也就是说在司马衷当政时期，纲纪大坏，社会动荡。朝廷上的官员相互推举，就像是拿官职做买卖一样，为人不齿。天下沸腾，很多人写文章讥讽时事。司马衷对这一切

都一无所知。

贾南风可以为所欲为了，唯一不如意的就是没有生育皇子。为了有男性继承人以便她长期有效地控制朝政，贾南风诈称自己怀孕了，在衣服里填充东西伪装。她深居内宫，不见外人，暗地里把妹夫韩寿的儿子韩慰祖收养起来，作为所谓的“皇子”。有了假冒的皇子后，贾南风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现任太子司马遹。

司马遹很聪明，深得祖父司马炎的欢心，可惜当了太子后沾染了糜烂的宫廷恶习，乐于游乐，喜欢在宫中设市肆做买卖。太子属官劝司马遹注意言行，司马遹就变着法子戏弄他们。贾南风就利用了司马遹不知轻重、轻率贪玩的弱点。元康九年（299）的一个冬夜，宫中突然传来消息说司马衷病重，要求太子觐见。司马遹入宫后，没有见到父皇，只有宫女端来三升酒，说是皇上赐给他的。司马遹轻率地喝了下去，喝得酩酊大醉，神志不清。这时，有人拿着一篇表文让司马遹照样抄写一遍。迷迷糊糊中，司马遹抄了一份。谁知，这是一份以太子名义写的逼宫信，要求司马衷退位，不然就要造反。贾南风拿到手后，作为太子谋反的证据，要求严惩司马遹。

司马衷本来就糊涂，如今看到儿子写了大逆不道的表文，就同意了贾南风的处理意见：赐死司马遹。公卿大臣们大多对表文的真实性将信将疑。此事关系重大，有大臣建议核对字迹。核对来核对去，既不能证明造反的表文是伪造的，也不能证明是真实的。贾南风一定要将司马遹处死，部分大臣坚决不同意随意处死太子。最后，贾南风退了一步，要求废太子司马遹为庶人。大家通过了这个折中的意见，司马遹也被送到金墉城囚禁起来。贾南风的让步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迫害司马遹。不久就有一个小太监“投案自首”，供认曾与司马遹谋反。随后司马遹被押到许昌的旧宫幽禁起来，情况进一步恶化。

贾南风自以为对手都被扫清了，可以乾纲独断、为所欲为了。

贾南风的许多党羽是靠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和大臣司马雅、孙秀等人也是野心家，靠着向贾南风献媚，逐步掌握权力。他们不满贾南风胡作非为，又觊觎更大的权势，立即臭味相投，串联了起来。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有辈分有兵权，就是没有人品。司马雅、孙秀与他串通，准备借太子司马遹兴风作浪，推翻贾南风。孙秀提出了一个歹毒的计划，设计让贾南风先除掉司马遹，然后再借口为司马遹报仇，起兵除掉贾南风。于是司马伦等人故意宣扬有人要匡复废太子、废掉皇后。贾南风知道后自然感到恐慌，干脆一了百了，决定除掉司马遹。永康元年（300）三月，贾南风矫诏派宦官前往许昌旧宫毒杀司马遹。无奈司马遹被废后，唯恐遭人谋害，小心谨慎，足不出户，连饮食都自己动手。宦官找不到下手机会，只好撕下伪装，直接逼司马遹吃下毒药。司马遹当然是坚决不肯，最后被宦官用药杵活活打死，年仅二十三岁。司马遹的死，震动天下。宗室诸位王爷对贾南风擅杀废太子的行动普遍很愤怒。赵王司马伦更是乘机秘密联络梁王司马彤（司马懿第八子）、齐王司马冏（司马攸之子）共同发起了政变。

四月三日深夜，司马伦、司马冏等人在宫中内应的帮助下，秘密率兵入宫，劫持了晋惠帝司马衷。司马伦依样画葫芦，向他报告皇后贾南风无法无天的种种劣迹，要求皇上下诏惩办贾南风。司马衷还是难辨真伪，在别人递过来的诏书上签了字。

齐王司马冏带兵擒拿贾南风。贾南风见状大吃一惊，问：“你来干什么？”司马冏高喊：“奉诏收捕皇后！”贾南风更吃惊了：“诏书都是我写的，你奉的什么诏？”司马冏也不搭理，绑了就往外押。跌跌撞撞中，贾南风终于想明白了，问司马冏：“这是谁挑的头？”司马冏直言：“赵王和梁王。”贾南风闻言，悔恨不已：“拴狗当拴颈，我只拴住了你们的尾巴，才会有今天。只恨当年没先杀了那两条老狗（赵王、梁王按辈分是贾南风的叔祖），今日反被他们咬了一口。”世间没有后悔药

吃，贾南风被废为庶人，也成了金墉城的住客，她的党羽被一网打尽。几天后，司马伦有样学样，派人给贾南风送去毒药。贾南风被毒死了。

八王之乱十六载，同室操戈何匆匆

—

贾南风死后，赵王司马伦大权在握。

司马伦有了权力不好好用，竟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要抢自己侄孙司马衷的皇位。一方面是司马伦个人政治野心膨胀，另一方面是孙秀等人在旁撺掇。反对司马伦称帝的部分大臣很好处理，司马伦等人排列出一队武士一吓唬，再把几个挑头反对的大臣拉出去砍头，基本就没有反对的声音了。司马衷就更好对付了。永宁元年（301）初，司马伦把死去多年的老父亲司马懿搬了出来，说司马懿托梦要他做皇帝，让晋惠帝司马衷禅位给他。司马衷这个皇帝本来就当得痴呆，对寻常话都没有分辨能力，更不用说司马伦的鬼话了。于是，又一场禅让上演了。司马衷成了太上皇，搬到金墉城去了。

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完全是利欲熏心，上台后除了大肆封赏，没有任何方针政策。上自赵王的亲信党羽，下到王府的奴役都封官晋爵，朝廷之上顿时高官充盈。西晋的官员冠服要用貂尾装饰。因为突然封赏了大批官员，整个洛阳城储存的貂尾都不能满足新官员官服制作的需要，只好找狗尾巴来代替。成语“狗尾续貂”由此而来。服装不够倒是其次，许多新晋官员连印信都没有。因为国库储蓄根本不足以支撑司马伦的滥封，朝廷没有足够的金银给新封的人铸造印信。因此司马伦的这些党羽被讽刺为“白版之侯”。

司马伦篡夺了侄孙司马衷的皇位，在西晋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转

折意义。之前的种种变乱，贾南风也好，杨骏也好，司马亮和司马玮也好，他们的争权夺利都没有逃脱宫廷政变的范畴，再怎么闹毕竟范围有限，和老百姓的生活离得很远。司马伦的篡位就不同了，它引起的天下讨伐，迅速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战争和杀戮。二十多年后，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司马伦篡位后，齐王司马冏最先反对。司马冏参与了司马伦的政变，是诛杀贾南风的大功臣，事后却被司马伦排挤出洛阳，去镇守许昌。政变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导致司马冏心里很不平衡：凭什么我出力你享受啊？而且你现在还大模大样地自己做了皇帝，更不像样了！于是，司马冏联络镇守各大城市的宗室诸王一起讨伐司马伦。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yóng）起兵响应。战争爆发了，从此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成了战场。

直到307年，晋武帝第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马炽称帝，改元永嘉，这场战争才停止。因为战争主要内容是西晋宗室诸王之间的内讧厮杀，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yì）、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位王爷，因此被称为“八王之乱”。

战争首先突破了洛阳一地的范围。篡位后的司马伦面对多位亲戚的围攻，调兵遣将分头迎击。前线还没有分出胜负，洛阳城中就发生了内乱。部分禁军不看好司马伦，觉得他必败无疑，为“将功赎罪”，杀死了司马伦，迎司马衷复位。司马伦同党被诛灭。

战胜后的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三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分赃。

司马冏是首倡之人，出力最多，战后被重新当了皇帝的司马衷任命为大司马，掌握朝政。这样的安排，两位响应的藩王起初并没有意见。但是权力的腐蚀作用太大了，司马冏掌权后也开始独断专行，排

斥他人。司马衷没有子嗣，存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都是司马衷的弟弟，都希望当“皇太弟”，等傻哥哥哪天死了来个兄终弟继。司马冏不愿意这两位已经成年又掌握兵权的王爷当皇帝，这样显然会削弱自己的权势，就操纵册立了司马衷的侄子，即年仅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下，司马颖、司马乂和司马冏的关系破裂了。

新一轮的战争是太安元年（302）底，由感到分赃不均的河间王司马颙挑起的。他讨伐司马冏，得到了司马颖的响应。但胜利果实则落入了当时在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的手中。司马乂判断司马冏气数已尽，抢先杀了司马冏，掌握了政权。

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更不干了。明明是我们俩出了力气，怎么最后让司马乂捡了便宜！第二年，两人合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数万精兵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二十万从西向东进攻洛阳。前线正打得热闹，洛阳城里又先失火了。当时在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和部分禁军对司马乂失去了信心，合作擒拿司马乂，将他交给张方。张方将司马乂烧死。

这一回合结束后，成都王司马颖担任了丞相，成了胜利者。但他盘踞在老窝邺城，遥执朝政，又废掉太子司马覃，自己当了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转移到了邺城。这就侵犯了在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和禁军将领的利益，引发不满。他们的优势是手里掌握着皇帝。于是，司马越率领禁军挟持晋惠帝司马衷北上进攻邺城，讨伐司马颖。不幸的是，司马越在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中被司马颖杀得大败。不仅皇帝司马衷成了司马颖手中的俘虏，司马越本人也差点当了俘虏，仓皇逃往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地区）。

司马颖先放下喘息未定的司马越不管，派军占领了洛阳。正当他取得胜利之时，后院起火了。并州刺史司马腾是司马越的弟弟，他和幽州刺史王浚联兵，从北往南攻破了邺城。司马颖只好退据洛阳。可

怜的洛阳城经过反复这么多轮的政变和杀戮，每经历一次就血流成河，已经变成断壁残垣的空城了。司马颖在洛阳根本没吃的，将士们只能把人肉和马肉掺在一起充饥。没办法，司马颖只好挟持晋惠帝，放弃洛阳奔赴长安。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两派力量就在关中合并一处了。

永兴二年（305），司马越卷土重来，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司马颙。第二年，司马越迎晋惠帝回到洛阳，并杀死司马颖、司马颙等人，独揽大权。宗室诸王大规模的内讧自此才基本平定下来。司马越笑到了最后。

二

历史上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事件屡见不鲜，但像西晋的各位王爷这样大动干戈，天天动刀动枪，杀得生灵涂炭、天昏地暗的，则仅此一例。

这是西晋王朝制度的积弊。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认为曹魏灭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广树藩王，危急时刻没有人捍卫皇室。于是大封宗室，并且给予这些宗室军政实权。数以十计的司马家族子弟被封为王爷。受封的诸王并没有去藩镇，而是留在京师兼任各种实职。西晋的公卿大臣中有许多是宗室王公。有些藩王还掌握着相当的兵权，包括指挥中央禁军——禁军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曹魏猜忌宗室诸王不同，西晋王朝听任各位王爷参与政务，相互交接联络，很少加以限制。最终，诸王的存在反而威胁到了西晋皇权。

制度问题放大了宗室诸王之间的个人恩怨和利益纠葛。其实内讧诸王中，除了赵王司马伦品行不好外，其他各位王爷人品都还可以，

一些人的声望还很高。比如东海王司马越年轻时就誉满天下，为人谦虚又乐于助人，受到普遍地尊敬。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调节他们的内部矛盾，相反宽松的环境和过大的权力很容易让他们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楚王司马玮，从小就不受父亲司马炎的喜悦，长大后被封的地盘最小，获得的利益最少，心里不满。他积极响应贾南风的两次号召，充当枪手，本意是借机名利双收，并非要置天下于水火之中。遗憾的是，杀戮一旦开始，血腥味就会四散开来，超出个人的控制范围。这是宗室诸王无奈和可悲的地方。

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六年。参战的亲王远远不止八人。这些藩王相继败亡，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也消耗殆尽。在战争中，百姓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破坏严重。在洛阳，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百姓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浪潮。尤其是诸王让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邕；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邕。短暂统一后，西晋王朝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原来隐伏着的民族矛盾迅速爆发，最后是汉化归附的匈奴民族起兵灭亡了西晋。

在整个八王之乱的过程中，作为皇帝的司马衷反倒成了一个旁观者，成了造反谋逆者的争夺目标和军中俘虏，几度易手，颠沛流离，受尽惊吓。从始至终，司马衷没有做出任何有用的决定，发出任何声音。

在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混战的过程中，司马衷一直被裹挟在军中，处境极其危险。一次大战，司马衷脸上被砍了一刀，身中三箭，周围的侍从都跑光了，只有侍中嵇绍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司马衷。两个人被乱兵包围，士兵们上来就要杀嵇绍，晋惠帝大喊：“侍中是忠臣，你们不许害他。”乱兵却说：“奉皇太弟（指司马颖）之命，我等只不伤害陛下一人。”结果嵇绍被乱刀砍死，鲜血溅到了晋惠帝

的衣服上。司马衷后来安全了，依然穿着被鲜血染污的衣服。侍从们要他把衣服换下来清洗。晋惠帝却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为什么要洗呢？”这话听起来傻乎乎的，其实包含着乱世难得的正义光芒，成了司马衷留在历史上的正面名言。南宋的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还特地提出“为嵇侍中血”。

306年，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大肆抢劫，两万多人被杀。是年九月，司马颖俘后被杀。十一月，晋惠帝于长安显阳殿去世。司马衷极可能是被司马越毒死的，据说他在死前吃下了一块毒饼。晋惠帝死后葬太阳陵。豫章王司马炽被司马越立为新皇帝，史称晋怀帝。

西晋迅速衰亡的责任在司马衷，更在他的父亲司马炎。司马炎优柔寡断，既不愿意得罪扶持司马家族夺取天下的杨家、贾家等勋臣势力，又受到枕边风的影响，不能坚持己见，而且厚待并放任藩王势力发展的制度就是司马炎制定的。说到底，司马家族不是通过底层革命夺取的政权，而是靠政治权谋篡国夺权的，终究不敢和权贵家族和藩王势力翻脸。这是西晋王朝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陆氏兄弟：华亭鹤唳岂可闻

—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河北邺城发生了一起冤案。成都王司马颖大开杀戒，将南方世族代表陆机、陆云、陆耽三兄弟，还有陆机之子陆蔚、陆夏等人斩首，诛灭了陆家满门。大将军参军孙惠评论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

一个家族的衰亡为什么值得一书呢？因为吴县陆家是江南氏族的代表，在东吴时期出过陆逊、陆抗等显贵。它的兴亡折射出了西晋王朝的政权移转和人才困境。

东吴末年，孙皓曾问丞相陆凯：“卿家有几人在朝为官？”陆凯回答说：“二相五侯十将。”孙皓赞叹说：“盛哉陆家！”西晋初年，北方贵族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人？”陆机回答说：“如同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卢志正是魏朝司空卢毓的孙子、魏朝卫尉卿卢珽的儿子。晋朝人极重避讳，陆机和卢志两人互称对方父祖名讳，从此结下深仇大恨。诚然这件事情是由卢志挑衅而起的，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陆家父祖姓名，也从侧面表明吴县陆家传到陆机这一代已经门庭下降，大不如往昔了。陆家衰落最主要的原因是东吴政权的灭亡，任何政治世家都需要依托一定的政权，离开了政权的庇护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东吴灭亡后，连孙皓都称赞不已的江东第一世家陆家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封爵和地位，成为

新王朝的平民百姓，已是“亡国奴”的陆机兄弟只能受到北方贵族的奚落了。

陆机兄弟面临着如何适应新朝以及如何从中重夺权柄的艰巨任务。

从能力上看，陆机很有希望复兴家业。《晋书》称陆机：“身長七尺，其声如雷。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可见陆机长得魁梧高大，还精通文章儒术。东吴灭亡的时候，陆机年纪尚轻，在那之后十年的时间里，他和弟弟陆云隐居在吴县华亭（今上海郊区）老家，闭门苦读。勤学苦读的结果是陆机、陆云兄弟成了著名文人，诗词歌赋出色。同时代的文人张华称赞陆机：“别人写文章的时候都恨自己文才太少，你写文章的时候却担心自己文才太多，涌出难以控制。”

陆机还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了作品之中。陆机在吴国灭亡之后，“欲述其祖父功业”，探究东吴灭亡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写了《辨亡论》。在西晋刚统一的政治环境下，陆机的行为是相当冒险的，而他得出来的结论是用贤乃兴国之本。之后，兄弟俩经常追思家族功业，如《陆机集》中有《思亲赋》《述先赋》和《祖德赋》三篇，《陆云集》中也有《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章。政治的文字之旅让陆机兄弟二人恢复祖辈的荣耀、复兴家族的决心更加强烈！

西晋初年的华亭还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远处海天一色，近处满目滩涂，中间点缀着若干芦苇丛和飞翔而过的白鹤。陆机、陆云兄弟徜徉在家乡的土地上，追思过去，畅想未来。他们有高贵的出身、美妙的诗文、满腔的抱负和朴实的心灵。如果东吴还在，他们也会走祖辈父辈济世报国的道路。但是政权更迭了，他们遇到了新问题，老路走不通了，他们必须像眼前的白鹤一样去更广阔的政坛上搏击长空。于是，陆机、陆云兄弟俩与家乡告别，在290年来到了洛阳

——新王朝的首都。

陆家兄弟为什么要入洛阳呢？一年前，晋武帝司马炎下诏“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陆机兄弟是应召前往。“生亦何惜，功名所叹”，他们是来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

陆机兄弟对前途的期望值很高，也做了精心的准备。刚到洛阳之时，兄弟俩造访了太常张华。当时要做官还需要高官的引荐，恰好张华也是文人，很欣赏两个晚辈，与他们一见如故。交谈中，张华诚恳地指出陆机不论说话还是遣词造句，都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希望他改正。新王朝毕竟是北方王朝，陆机兄弟必须要过语言关。所以陆家兄弟回去后就开始学习洛阳官话。驿站里伺候官员的仆役为洛阳人，陆机、陆云就向这些下人学洛阳话。张华又指出洛阳正流行玄学，如果新人不事先揣摩玄学，难免无法应对一些场合。陆机、陆云又开始啃玄学相关的书籍。最后，张华出面做了陆机、陆云两兄弟的推荐人。太傅杨骏辟陆机为祭酒，不久转为太子洗马、尚书著作郎。陆云成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不久出任浚仪县令。陆云到任后为政肃然，将一个号称难治的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百姓爱戴。

吴县陆家是江东的头号名门望族，陆机、陆云兄弟带动了江东士人的入洛潮。南方士人纷纷北上求仕，吴郡陆、顾、张各家，会稽贺、虞等大姓家族中皆有人北上，门第稍低的各家子弟应召北上的更多。这对于南北交流、新政权巩固及对南方的统治来说，都有好处。作为先行者，陆机兄弟在举荐乡里、照顾老乡仕途方面费尽心机。陆云曾写信对陆机说：“近日得到洛阳的消息，某某得了骠骑司马，又云似未成，已访难解耳。某某做了司马参军，此间复失之，恨不得与周旋。某某拜访了大司马。”他俩对待同乡的官运仕途如同自身，患得患失。陆机曾将戴若思推荐给赵王司马伦，称他是“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贺循是东吴名臣之后，入晋后历任阳羨、武康两县县令，多有政绩，但因朝中无人，久久不能升官。陆机就拉人一起上书推荐贺循，认为他的才望资品可担任尚书郎，贺循后来升为太子洗

马、舍人。

陆机、陆云兄弟为什么对同乡仕进这么热心呢？陆机、陆云出身江东的名门领袖，自觉有提携同乡其他大族的责任。而心中对东吴政权隐隐的怀念，也让陆机、陆云兄弟将东吴旧地的名门子弟当作一个整体，希望能够一起在新的王朝共荣共进。

陆机、陆云兄弟对新政权是热心的，但是新政权并没有敞开火热的胸怀拥抱他们。

晋武帝司马炎一再下诏令“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可这只是在开空头支票。南方士人的仕途坎坷低微，而且遭受北方贵族歧视。陆云在给同乡杨彦明的信中也承认：“阶途尚否，通路今塞，令人惘然。”所以南方豪杰之士大多隐居不仕。

陆机、陆云初到北方，认为自家门第高贵，颇有与北方规则抗衡的念头。“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兄弟二人拜见王济。王济指着案上的数斛羊酪问陆机：“你们江东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吗？”这是带有轻蔑的问话，像怀疑乡巴佬的见识一般。陆云回答说：“有千里莼羹，还有未下的盐豉！”这还算好的，卢志先前直呼陆机、陆云祖父辈名字的挑衅更过分。出卢家门后，陆云对陆机说：“何至于闹得这么僵呢？他可能真是不了解我家底细。”陆机愤怒地说：“我祖父、父亲海内知名，岂有不知？”说完，陆机狠狠地骂卢志“鬼子无礼”。传说卢志的远祖卢充曾误入鬼府，与崔少府的亡女结婚生子，所以陆机骂卢志是鬼子（鬼的子孙）。北方士人很少像陆机那样高谈理想抱负，最多是聚在一起谈谈宇宙和人生，谈谈物动心动等虚幻的话题，他们根本不关心陆机所说的那一套。在屡屡受挫之后，陆机等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北方贵族并不友好，自己也很难融入北方政坛。

南北相隔百年后，差异越来越大。江东远离中央集权，思想环境

比较宽松自由。而北方经过东汉末年、曹魏时期的不断思想整肃，从孔融、杨修等人的死到“竹林七贤”受到迫害，北方文人历经政治摧残，不得不与政权妥协，放弃政治上的独立思考。从曹魏早期的王朗开始，到荀勖、贾充之流，为人不齿的文人反而显达于世。陆机等人没有经受过思想洗礼，更没有见过思想迫害，很难理解北方社会相对沉闷又追求虚幻之清谈的逃避态度。南方士人还没学会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而陆机、陆云兄弟门第越高、抱负越大、思想越朴实，受到的伤害可能就越大。

事实上，许多南方士人来北方后很快就察觉到了政治气氛不对，折返家乡。顾荣、戴若思等人就劝陆机，与其在北方郁郁寡欢，不如回老家。陆机依然相信自己的才华和名望，自负地要实现匡世救难的志向，没有听从。家族未兴，何来衣锦还乡？

二

最终，很多人痛心地看到陆机、陆云兄弟变了，变得急功近利、攀附富贵，中了权力之毒。

陆机变得“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贾谧是贾充的外孙，被贾充作为子嗣。贾家出了贾充、贾南风，贾谧又“权过人主”，整家人声名狼藉。正因如此，贾谧为捞取名声，招揽名人雅士。陆机、陆云投身其门，被列入“二十四友”，为正人君子所诟病。有陆机、陆云的崇拜者坚持说陆机兄弟此举是被迫的。既然陆机选择留在洛阳追求功名，就不存在被迫与否一说。陆机、陆云并非一定附逆，但依附权贵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发迹的终南捷径。陆机和贾谧相互利用，未尝没有可能。

遗憾的是，贾谧这棵大树并没有给陆机兄弟带来多大功名。相反却给兄弟俩开了一扇仕途之门，两人从此开始在一个个权贵之间徘徊。

八王之乱爆发，陆机投靠了赵王司马伦。司马伦辅政后，陆机被引为相国参军，并因参与诛杀贾谧一事立功，赐爵关中侯，进而为中书郎。但司马伦这个人并不比贾谧好到什么地方去，他性极贪鄙，才能极其平庸，杀人夺权却是一套一套的。辅政后，司马伦妄想更进一步，篡位当皇帝。陆机竟然参与了赐司马伦九锡的诏书和司马伦禅让诏书的写作，被视为大逆不道。赵王司马伦败亡后，齐王司马冏以陆机附逆，写作九锡文和禅诏的罪名将他投入狱中准备杀头。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等人相救，陆机得以不死。出狱后的陆机声名下降，侥幸逃生的他本应该有所醒悟，洒脱返回故土也不是不可以。但陆机又投靠了成都王司马颖，选择继续留在政治旋涡之中。

成都王司马颖相貌堂堂，但贪婪残暴，优柔寡断，性情多变。陆机怎么总是所投非人呢？可悲之处就在于，文人选择投靠对象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陆机屡受排挤，还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对营救自己的成都王司马颖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加上司马颖正处于势力上升期，陆机又从他身上看到了复兴王朝和家族的希望，因此进入成都王幕府当了名参军。而弟弟陆云在浚仪县令的岗位上干得好好的，却老被嫉妒自己的太守训责，愤而辞官，被哥哥陆机拉入了成都王司马颖的幕府，任清河内史。陆机不久被司马颖升为大将军参军、平原内史。此外，陆家弟弟陆耽，南方士人孙惠、孙拯等都进入了司马颖幕府。其中陆机、陆云二人参与机要，是成都王幕府中南方士人的核心。这群南方士人追随成都王司马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乘乱建功立业。

陆机、陆云兄弟在司马颖手下干得很认真，很起劲，无奈幕府内的权力结构太复杂了。

司马颖宠爱宦官孟玖，卢志又在幕府中担任左长史。孟玖曾打算

让老父亲当邯郸县令，陆云坚决反对，说：“担任大县县令必须具备一定资格，怎么可以任用宦官之父？”孟玖的弟弟孟超被安排为司马颖麾下的将领。孟超放纵部属大肆抢掠，陆机逮捕了肇事官兵，孟超率骑兵一百余人冲进陆机营帐抢走犯人，还骂陆机是“南蛮”。孙拯劝陆机寻机诛杀孟超，陆机没有同意。相反孟玖等人恨死了陆机、陆云兄弟，欲除之而后快。

仿佛是回光返照，事事不顺的陆机突然被司马颖任命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成都王麾下二十余万兵马，讨伐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陆机欣喜若狂，这还是陆家自从东吴灭亡之后第一次领军，而且是如此重大的任务。陆机兴奋地判断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出征前，司马颖向陆机许诺：“如果功成事定，当封卿为郡公，位列台司。将军勉之矣！”

陆机说：“历史上齐桓公任用管仲，建九合之功；燕惠王怀疑乐毅，结果功败垂成。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可见陆机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但对战斗的结果不太自信。他怕司马颖用己而疑己，更担心司马颖设置的出征将领队伍。陆机是主帅，但有冠军将军牵秀、北中郎将王粹分兵协助。王粹、牵秀等主要将领均出身北方贵族，不仅不听从陆机指挥，还在作战时从中作梗。他们联合孟玖、卢志等人，严重限制陆机施展拳脚。司马颖用了陆机，同时又用了一系列的宵小之辈，怎能不让陆机担心呢？同乡孙惠劝陆机让位给王粹，陆机又犹豫不决，最终不愿放弃荣华富贵的希望，领兵奔洛阳去了。

果然战斗一开始，孟超就不听指挥，贪功冒进，以致全军覆没。成都王大军在洛阳郊外被打得溃败而逃，几乎也全军覆没。兵败回来后，全军上下非但不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开始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来自南方与北方政治空气格格不入、看起来上蹿下跳的陆机等人

就是最好的人选。卢志趁机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有异心，故意战败。司马颖不分青红皂白，将陆机、陆云等南方士人逮捕下狱。

江统、蔡克、枣嵩等人上书司马颖，为陆机鸣不平：“如果要为战败负责，诛杀陆机一人就足够了。有关陆家等人叛逆的事情，应该列出证据，不可草率。等证据确凿了，再诛杀陆云等人不迟。”司马颖迟疑不决，拖了三天。蔡克直接指出这是宦官孟玖等人迫害陆云的丑行，远近无人不知。求情的人很多，都言辞恳切。司马颖流露出宽恕陆云等人的表情。一旁的孟玖赶紧把司马颖扶进后房，催促他火速诛杀陆云、陆耽，诛灭陆家三族。陆机知道难逃一死，反而流露出潇洒大度来，洋洋洒洒写下长信，给成都王司马颖，然后从容受刑，面不改色。

为了搜集“证据”，孟玖对孙拯严刑拷打，直到血肉模糊、骨头外露，孙拯都坚称陆机是冤枉的。最后孟玖等人不得不杜撰了一份假口供。司马颖本来对诛杀陆家的事情感到后悔，现在见到孙拯的认罪状，竟然大喜，夸奖孟玖说：“要不是你忠心，怎么能追查出这等叛逆阴谋来。”司马颖此举完全是为自己脱罪。他糊涂成这样，陆机等一代名士屈身相随，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陆机临刑曾对弟弟陆云感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是啊，华亭海边远眺海天一色的壮阔美景，仰头看蓝天中只只飞过的白鹤，听那声声鹤唳，这样的日子他曾经享受过，也多次有机会回去重温，可惜一一错过了，现在已成绝响。功成名就的热望、复兴陆家的责任感，让天性高傲、才华横溢的陆机、陆云兄弟为之奋斗终生。他们赶上了一个坏时代，锋芒毕露又不懂委曲求全，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识人。后人评价陆机“不知机”，急功近利，贪图名利，最终赔上了性命，赔上了整个吴县陆家。

李白《行路难》第三首感叹道：“华亭鹤唳岂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身后千载名。”从此，“华亭鹤唳”成为形容陆机这样的文人步入政坛后后悔的专用词。

戎狄四起争夺中原

—

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在政绩上几无建树可言，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曾经有机会解决日益严重的少数民族内迁问题，却毫无作为。

在广袤的中国北方，各个少数民族从两汉时期就陆续内迁，成了历代王朝必须面对的问题。到西晋建立初年，内迁各族遍布，从幽州（今河北、京津地区）、并州（今山西）到司隶（今陕西中部、河南西部一带）、凉州（今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广大地区，深入益州（四川地区）、冀州（河北地区）等地，繁衍生息。汉末魏晋时期连年征战，华北的汉人背井离乡，向江淮和江南地区迁徙，空出来的土地都被少数民族占据。到西晋初年，北方一些郡县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半数。他们虽然开始汉化，部分也从事耕种，但还保留着扬刀跃马的习俗和部落的形式，有事相互援助连接成军。对中央王朝来说，这些少数民族很危险。因为仅从地理位置上看，各个少数民族呈半月形包围着长安、邺城等重镇，并威胁着首都洛阳。

当时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统称为“胡族”，其中最强大的有五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并称“五胡”。

匈奴人兴起于蒙古高原，是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一度统治着东起辽水、西到西域的北方大地，从战国时就开始侵扰中原，是中原政权的大患。长城就是为抵御他们而修的。汉武帝时，匈奴遭到沉重打击后开始衰落，进而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其中南匈奴在汉宣帝时入

关投降汉朝，西汉王朝将他们安置在并州、司隶等地。南匈奴逐渐在并州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方山县境内）建立了王庭。东汉时，北匈奴继续遭到重创，部分沿着欧亚大陆消失在了西方，不愿意远迁的部众则南下投降了汉朝，也被安置在上述地区。东汉王朝对匈奴安抚与分治并用；曹操则将匈奴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各立酋长为都督，基本上延续了东汉的战略。匈奴民族和汉族的融合时间最久，上层人士汉化很深，很多人担任朝廷官员。

羯人，是归化匈奴的一支，被安置在上党郡的羯室（今山西左权县）。他们和汉人的差别比较明显，多高鼻深目，有欧洲人的特征，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

鲜卑人兴起于东北，晚于匈奴人。匈奴人在中原王朝的打击下西迁或者南附，空余出来的土地被鲜卑人填补。鲜卑人凶悍勇猛，很快成了塞外大地的霸主。但是鲜卑民族的发展历史较短，曹魏时期，鲜卑贵族轲比能曾想统一鲜卑各部，结果被幽州官员诱而杀之。到西晋初年鲜卑民族中依旧部落林立。各部落以酋长的姓氏为号，分别有慕容、拓跋、段、宇文、秃发等部落，其中以慕容和拓跋两个部落最为强大。

氐和羌都属于西南夷，地处益州和凉州（今川陕甘青四省交界地区）之间。三国时期，曹魏和蜀汉都利用氐人和羌人来为己所用，拉拢来攻击对方。许多人被强制迁徙关中各郡。到西晋时期，氐人主要分布在武都郡（今甘肃成县）、略阳郡（今甘肃秦安），人数远少于匈奴和鲜卑。羌人的分布大致相同，但人数更少。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这两个小民族却扮演了大角色。除了这五大民族外，还有乌桓、丁零等其他少数民族。

西晋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族问题，却没有提出可行的政策，除了奴役各个民族并扣押各族人质外，听任各族恣意发展。地方官员奴役各族人民，横征暴敛，把逃亡百姓的税赋强加在少数民族身上；

强征异族子弟入伍，对他们肆意打骂，拆散其家庭。因此，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乱世中，少数民族百姓的生活压力本来就大，如今日子更难过了，便开始倾向通过造反谋求生存的机会。

少数民族的叛乱贯穿了西晋始终。元康四年（294），并州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两年后，其弟郝度元联合关中各郡的羌、氐族百姓起兵反晋。之后，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还推举齐万年为帝，拥兵数十万。关中震动，西晋朝廷不得不集结大军镇压，直到元康九年（299）正月才粉碎这起少数民族叛乱，俘杀齐万年。起义被镇压后，山阴令江统深感四夷乱华，意识到民族问题危重，写作了《徙戎论》，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人思考的第一手资料。

晋惠帝时，“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毕竟少数民族的心理和习俗都与汉族不同，难免起纠纷。江统吸取之前少数民族和汉族屡起纠纷、朝廷费力镇压的教训，建议将胡族百姓迁出汉族区域。

江统的建议是因噎废食的做法，朝廷不想办法解决好内迁少数民族的问题，而是要把他们全部赶出汉族区域。这代表了一大批朝野官员的观点，说起来简单，但没有可操作性。少数民族内迁，生活了上百年，突然要他们全部抛家弃土，回到传说中的塞外故乡去，势必激起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江统的意见递交上去后，晋惠帝看不懂，掌权者则忙于争权夺利，将之束之高阁，没有了下文。此后，各族继续恣意发展。

胡族武装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祸，只是因为西晋王朝实力尚在，还不是哪一支少数民族军队能够倾覆的。八王之乱的空前内讧，掏空了西晋王朝的躯体。晋军损失惨重，再也镇不住胡族武装了。实力的天平开始朝着有利于五大少数民族的方向倾斜。

就在八王厮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关中、陇西一带的百姓正挣扎在生死线上。

元康后期，当地连年荒旱。听说四川粮食充足，天水、略阳、武都等郡数万户百姓携家带小，于元康末年南下“就谷”，希望能讨口饭吃。其中有汉族人，但主要是氐族人，在巴蜀北部形成了连绵的流民潮。沿途不仅要应付管理人员的刁难盘剥，还要组织流民移动、协调纠纷，在这个过程中，略阳氐族人李特、李庠、李流兄弟被推举为流民的首领。李特兄弟雄壮有力，家境不错，曾在西晋王朝担任过中下级军官，有政治经验又仗义疏财，很适合担当流民首领。前后两任益州刺史赵廆（xīn）和罗尚将汹涌而来的流民潮视为洪水猛兽，对素有威望的李特兄弟等人欲除之而后快。矛盾就这么产生了。301年，李特兄弟利用流民的无助和怨怒，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聚众起义，正式拉开了少数民族大规模起义的序幕。

之后，北方和巴蜀地区先后出现了二十个割据政权，主要有十六个国家：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其中只有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四个在纷乱中建立的政权因为地小时短，没有计算在内。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政权此起彼伏、反复交战，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为止。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起于301年的李特兄弟起义，但因为起义局限于巴蜀一地，没能直接撼动西晋王朝。史学界通常将三年后（304）匈奴贵族刘渊的独立称王视为十六国的开始。匈奴贵族为什么姓刘呢？因为匈奴人汉化后，搬出汉高祖刘邦“成亲”制度，自认是汉朝皇室的外甥，

冒姓刘氏，以汉室后裔自居。这也说明匈奴贵族汉化之深。从刘渊的履历上看，他和汉族人无异，从小就酷爱读书，拜上党名士崔游为师，遍习《诗经》《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又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那时乡党品评人物入仕的风气很盛，刘渊就得到了当时太原名流王昶、王浑等人的器重。加上他体貌伟岸、射艺精熟、体力过人，刘渊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刘渊却不能像同学一样入仕，因为他是匈奴人。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其中的左部帅为刘豹，刘渊就是刘豹之子。曹魏咸熙年间，刘渊作为人质，留居洛阳。齐王司马攸见刘渊文武双全且得到众人推崇，就劝哥哥司马炎杀掉刘渊，不然恐怕并州不得安宁。多亏司马炎和司马攸的关系不好，没听弟弟的建议，刘渊才幸免于难。根据后来的史实看，司马攸还是低估了刘渊：此人不仅让并州不得安宁，还直接推翻了西晋王朝。

西晋很快进入乱世，各派势力都借重匈奴武装，刘渊虽然是人质，却在很长时间里成了各派拉拢的对象。杨骏辅政时，署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刘渊原本在匈奴中威望就很高，如今更是礼贤下士、轻财重义，幽冀两州的人才纷纷不远千里依附匈奴，匈奴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了。司马颖逐鹿中原，想以匈奴为外援，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事。他败退长安时，急需重振军势，便让刘渊回并州招募匈奴助战。刘渊很高兴地返回了左国城。

但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匈奴贵族见西晋朝廷呈现崩溃之势，便开始策划“兴邦复业”的大计。刘渊的族祖父刘宣就宣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也。”刘渊一到左国城就被五部匈奴推为大单于。匈奴人尚存的部落

很快就组织起了数万军队。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自称汉王，以恢复汉朝为令号召天下。匈奴连续祭天，大祭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和昭烈帝刘备，还追尊刘禅为孝怀

皇帝。此番举动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摆出要与西晋争夺天下的架势。

匈奴起兵，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汉人王弥、羯人石勒及鲜卑人陆逐延等纷纷拉起队伍造反，名义上公推刘渊为主。中原很快不复是西晋的天下。

刘渊集团很快打败并州的西晋势力司马腾。连绵的战火和激烈的民族矛盾让并州的汉族百姓对生活绝望，集体组织起来要去冀州“乞活”。“乞活”二字，从字面上看就很悲壮，就是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四处闯荡，为了一顿饱饭不惜血汗乃至生命。并州流民组织成“乞活军”，司马腾率领他们东去流亡冀州。刘琨继任为并州刺史，无力回天，只能据守并州西北部的部分城池。刘渊很快占有了河东全境，在永嘉二年（308）正式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为汉。匈奴汉朝建立后，一心要攻占“故都”洛阳。刘渊派儿子刘聪、侄子刘曜等人率精骑进攻洛阳，遭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反击，没有攻下。永嘉四年（310）夏天，刘渊病死。

刘渊在位仅两年，没能将匈奴汉朝推向强盛，但为异族的后来者树立了起兵和建政的榜样。

三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和继立为帝。刘和的能力暂且不论，品德却很差，“内多猜忌，驭下无恩”。卫尉刘锐、宗正呼延攸等人因为没有被刘渊委托为辅政大臣，怀恨在心，就怂恿刘和诛杀刘聪等功勋卓著的宗室。机事不密，刘聪知道后，率军反攻皇宫，杀死了刘和、刘锐、呼延攸等人。

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汉化程度很高，除了通读儒家经典外，还

精通兵法，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他留下了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刘聪杀刘和后自立为帝，将匈奴汉朝推向了强盛的巅峰。他执政时期有两大成就。

第一大成就是在制度建设上做出了努力。汉朝虽然是匈奴王朝，但刘聪深知要长治久安，非采用汉族的政治制度不可。于是他创建了两套行政体制，用游牧民族的“单于”制度治理匈奴各部，用汉族的公卿制度治理汉人，并吸纳汉人进入政权。刘聪努力的方向没有错，但很不彻底，政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匈奴贵族手中，匈奴等胡族和汉族民众的矛盾依然很严重，汉朝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王弥、石勒等强藩在东方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刘聪也奈何他们不得。这注定了匈奴汉朝虽然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也在形式上统一了华北，但很快就会崩溃。

刘聪的第二大成就是终结了西晋，开疆拓土。他派遣族弟刘曜联合中原的王弥、石勒的武装力量，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将黄河南北乃至江淮一带的西晋城池陆续攻克，孤立洛阳。永嘉五年（311），困守洛阳的司马越和晋怀帝不和，率领大批王公大臣和晋军主力离开了洛阳。途中司马越忧郁而死，余部被石勒的武装包围屠杀。西晋王朝最后的主力丧失了。同年，刘曜、王弥、石勒合兵攻破洛阳，杀王公大臣三万余人，俘晋怀帝司马炽，押送平阳，刘聪封怀帝为会稽郡公。这就是“永嘉之乱”。永嘉七年（313），关中西晋残余势力拥司马邺为帝，改号建兴，支撑了四年。建兴四年（316），司马邺向刘曜投降，被送至平阳为奴。至此，西晋灭亡。

此时的北方大地，基本上是匈奴汉朝的天下。北方只有零星地区还在忠于西晋的官吏手中，分别是并州刺史刘琨、幽州刺史王浚与河西的张氏势力。刘聪对刘琨发起了进攻，又命石勒进攻幽州刺史王浚。王浚被石勒杀害，刘琨兵败投奔鲜卑段氏被杀。

取得这些成就后，刘聪开始骄傲享乐起来。其统治后期以荒淫著称，他正式册立了四位皇后，此外，佩带皇后玺绶的又有七人。刘聪沉湎于后宫之中，不理政事，常常出外游猎或干脆在宫中昼夜游戏。汉朝政务很快紊乱，出现党争。刘聪立弟弟刘义为皇太弟，而以儿子刘粲为丞相。刘粲当了丞相以后，把精力都用在了骄奢专政和远贤近佞上。中护军靳准是个野心家，想浑水摸鱼，就百般亲近刘粲，怂恿他对付皇太弟刘义。建武元年（317），刘粲诬陷刘义谋反，刘聪不辨真伪就相信了，废掉刘义皇太弟的称号，杀刘义及其官属约一万五千人，平阳城的街巷为之一空。刘粲被立为太子。此外，刘粲还杀害了投降的晋帝司马邺。

刘聪、刘粲父子享乐无度，朝野公开行贿受贿，纲纪败坏，政权迅速走向衰败。汉朝有功之臣不用，奸佞小人飞黄腾达，内部矛盾激烈。中山王刘曜占据关中地区，王弥旧部曹嶷占领山东，石勒占据河北，都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朝廷实际控制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狭窄地区，只相当于之前三四个郡的地盘。

东晋太兴元年（318），刘聪病死。他在位八年，把王朝推向了高潮，又推向了下坡路。

太子刘粲即位，以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但终日游宴后宫，军国大事都由靳准裁决。最终，靳准发动叛乱，把刘粲抓起来，一条条诉说他的罪名，杀了刘粲，又把居于平阳的刘氏宗室无论老幼都斩于东市。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遣使向东晋称藩。

平阳城大乱，觊觎最高权力的雄藩刘曜和石勒马上拉起队伍，行动起来。

中山王刘曜是呼声最高的匈奴王朝继承人选。据说他“垂手过膝”，有和冒认的祖宗刘备一样的外表，而且性格“与众不同”，也像刘

备。两人都读书求博不求专，喜欢射技，有“神射手”的称号。刘曜是刘渊的养子，在刘渊、刘聪时代战功累累。

刘曜立下的大功有三：一是在河南一带攻城略地，孤立了洛阳；二是在永嘉之乱中会同石勒、王弥攻破洛阳；三是进攻关中，攻克长安，俘获晋愍帝司马邺。此后，刘曜盘踞关中，听到靳准叛乱后亲自带军赶赴平阳“平叛”。可平阳还没走到，刘曜就在途中借口“众望所归”，登基称帝了。这是318年的事情。

同时石勒也正从河北带兵赴平阳，半途听说刘曜抢先当了皇帝，又接到刘曜对自己大将军的任命，勃然大怒。石勒不听刘曜的命令，催军急攻平阳。城中，靳准为部下靳明所杀，靳明出城投降刘曜。石勒更加生气，攻下平阳，抢占了刘聪原先控制的大部分地区。

刘曜同石勒顿时剑拔弩张。刘曜处于弱势，他在关中有后顾之忧，面临陇西张氏的威胁，同时军队数量和战斗力都逊于石勒。石勒咄咄逼人，刘曜便主动示弱，封石勒为赵王，封地是东方的二十四个郡，而这些地盘早就在石勒手里，不需要刘曜分封。第二年（319），刘曜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石勒的赵政权史称后赵，与刘曜常相攻伐。

北方进入了“两赵对立”的混战阶段。

当割据胜地巴蜀遇到流民枭雄

—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地区自古有天险可恃，群山峻岭将富庶的天府之国与中原和江南隔绝开来，是个割据立国的好地方。每逢天下大乱，朝廷权威衰微之时，野心家和枭雄们便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地区。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当李特从汉中经过剑阁进入四川，看到悬崖夹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形势时，大为惊叹，叹息道：“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在李特身边，十余万流民正衣衫褴褛，扶老携幼，缓缓行进在川北的栈道山路之间。之前，关中爆发氏族暴动，混战一场，又赶上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老百姓纷纷逃亡汉中躲避并乞食。这些老百姓中有氐人、羌人，也有汉人。氐族出身的李特和哥哥李庠、弟弟李流、李骧一起加入了逃难的大军。老百姓逃到汉中后，发现本地的情况也不太好，就进一步南下四川，寻找生机。李特曾在州县当过军官，胸怀谋略，所以看到剑阁的雄浑险要后大发感慨。他的一声感慨，得到了兄弟和周边青壮年的附和。大家都惋惜蜀汉亡于曹魏。

随着十多万流民和隐藏起来的豪杰的涌入，西晋在四川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

益州官员最好的对策就是对流民进行疏导，将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免得扰乱社会。可当时的益州刺史赵廋却不这么做，而是琢磨着怎么利用流民实现自己的割据梦想。赵廋看到西晋内乱，而四川偏

远，就起了割据之心。刚好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废杀皇后贾南风，召赵廋去洛阳担任大长秋，派耿腾取代他。赵廋是贾南风的亲戚，接到通知后心中恐惧，干脆正式起兵造反。他依靠的生力军就是关中流民。流民因为生活无着，常常为了生存而扛枪当兵。赵廋开仓放粮，接济流民的同时将他们编组为军队，任命李庠、李特兄弟为部将，杀死了接任的耿腾。这是永康二年（301）初的事情。

李庠率领的流民武装，没有旗帜和烦琐的纪律，行军打仗全靠李庠的表率作用，令行禁止，阵势严正。赵廋看了心中忌惮，找了个机会将李庠抓住并杀害了。杀了李庠后，赵廋竟然还想利用流民武装，前去笼络李特、李流等人。哥哥死后，李特在绵竹聚集七千余人的流民武装，向赵廋的政府军发动进攻，消灭了其十分之八九的战力，一路攻进首府成都。赵廋众叛亲离，带着家眷乘船逃跑，途中为人所杀。四川大乱的时候，朝廷已经任命罗尚为新的益州刺史查办赵廋。李特刚刚和赵廋大战一场，急需休整，而此时罗尚已经带兵七千进入了四川。李特无力抵抗，不得不扮演西晋的忠臣，派弟弟李骧奉迎政府军，并献给罗尚珍玩财宝。罗尚也就默认了李特起兵杀戮赵廋的行为。

罗尚有心安定四川，但也找不出处理流民问题的好方法。他想出了“遣送回籍”的馊主意。先不说关中饥荒战乱，流民回去后衣食无着，就说经过几年的流浪后，流民已经四散到巴蜀各地充当劳力或当兵打仗，因此遣送一事不具备可操作性。然而罗尚依然在七月下达了强制流民返乡的命令。十数万流民闻讯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益州官员又沿途设关卡，掠夺流民的财物，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李特三番两次为流民求情，要求罗尚宽限时日，先是要求等待秋收以后再遣返，后来又因为当年“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乞求再宽限些时日。流民们都非常感激，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李特为首领，唯他马首是瞻。

罗尚认定李特等人是在拖延时间，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政策逼走流

民。官府张贴公告，悬赏缉拿李特兄弟。李特早有异心，想借机把事情闹大，便派弟弟李骧暗改布告为：“能斩获六郡首领李、任、阎、赵、上官及氐、叟酋长首级的，赏布一百匹。”这一改，把罗尚的打击面从李特兄弟扩大到了各大流民首领，甚至连氐、叟等这样四川本地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在打击范围内。矛盾一下子被激化了，所有流民武装和少数民族都簇拥在李特兄弟周围，决心与罗尚为敌而自保。李特在短短一个月内招募了两万人，开始修缮甲冑训练士卒，磨刀霍霍。

罗尚也不是庸庸碌碌之人，入蜀后已将部队扩充到了数万人。他见流民武装不断增长，决定先下手为强，派出精锐步骑三万人，偷袭流民大营。李特事先得到情报，设下埋伏严阵以待。晋军冲入流民大营后，发现营寨中空无一人，罗尚心知中计，可大军已经进营一半，冲在前面的人要后撤，后面的人不知虚实还一个劲往前冲，乱作一团。李特率伏兵从四面包抄，晋军死伤惨重，狼狈逃跑。大胜后，六郡流民共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假借西晋皇帝的名义封官拜爵，正式建立独立的武装，浩浩荡荡占据广汉，造起反来。罗尚无力回天，只能固守成都，同时向朝廷求援。罗尚为人贪婪腐败，为政苛刻，而李特施舍赈济，提拔贤才，主政肃然有序，很快得到了四川百姓的认可。民谚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302年，李特打败了河间王司马颙派来的援军。303年，李特亲自领兵进攻成都。罗尚部队一触即溃。蜀郡太守投降，献出了成都外城，罗尚只守着内城，遣使求和。

胜利在望，李特不合时宜地骄傲轻敌起来。因为战乱和收成不好，四川本地百姓也结村筑堡，自卫自保。李特大军人数众多，本地武装纷纷表示归附。李特因为军粮不足，就分派流民到各个本地村垒里“就食”，这就分散了自身力量，埋下了流民和土著的矛盾隐患。弟弟李流提醒李特，土著未必真心归附，应该让本地的大姓豪族派遣人质过来，作为约束。李特不以为然。益州从事任睿趁机建议罗尚：“李特侵暴百姓，又分散流民到诸村堡，骄怠无备，老天也不想

他活了。我们可以暗中与各村约定时间，内外偷袭李特，必定一击即中。”罗尚欣然答应。任睿又假装投降李特，李特问他城中虚实，任睿谎称：“城里米谷快吃完了，只剩货帛。”李特信以为真，警惕之心更加松懈。任睿请求回家省亲，李特也答应了。任睿转身就去游说各土著武装一起偷袭李特。恰好西晋朝廷为挽救益州局势，从荆州调水军三万逆江而上救援罗尚。各土著武装原本首鼠两端，见罗尚援兵到达，纷纷同意出兵偷袭李特。而李特为了阻挡荆州的援兵，又不得不分兵抵挡，力量再次被削弱。罗尚趁机猛攻李特大营，各处土著居民联合出兵，流民武装大败溃散，李特阵亡。四川形势为之一变。

李特的弟弟李流收拢残余力量，继续与罗尚对抗。他率李特的儿子李荡、李雄与罗尚军队死战，扭转了败退的局面，把罗尚军队逼回成都闭门自守。不幸的是，李特的长子李荡在驰马追击过程中重伤而死。李流见兄长、侄子相继战死，而荆州援军节节逼近，对前途丧失信心。部下李含劝李流投降，李流竟然心动了。侄子李雄见叔叔要投降，自告奋勇要去迎战荆州援军。李流被年轻人的勇气所激励，决定放手一搏，对李雄说：“你如果能打败晋军，三年后我让位给你。”李流把军权交给李雄，让他节制各部奋勇作战。李雄抖擞精神，先集中军队猛攻晋军，遏制住敌人的气焰，使罗尚龟缩在成都不敢外出，再攻占郫（pí）城作为大兵营。但是流民武装的处境依然不妙。四川连年战乱，百姓筑垒自保，城邑皆空，流民武装既没有持续的后勤供给，又和土著百姓隔膜很深，始终处于半饥半饱的流动作战状态。只有争取到四川百姓的支持，李流、李雄叔侄才能站稳脚跟。

如何才能争取四川的民心呢？

罗尚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参军徐舒向罗尚推荐了一个人——范长生，建议罗尚委任范长生为汶山太守。范长生是谁呢？

范长生是魏晋时期的奇人，据说活了一百岁。他本是涪陵丹兴（今四川黔江）人，家族是当地大族。蜀汉初期，涪陵百姓叛乱，诸葛亮讨平后，迁徙百姓充实成都。汉末，张道陵在四川地区开创了“天师道”，蜀汉时期在成都一带盛极一时。天师道是原始道教，讲求与世无争，提倡个人修行，能够给饱受战乱与生活之苦的百姓们以精神慰藉，在乱世的土壤中滋长蔓延。不仅是汉族百姓，就连氏族和羌族百姓也纷纷入教信奉。范长生年轻时就加入了天师道，并逐渐成为魏晋时期的宗教领袖。他长期住在成都青城山，聚集千余家信众百姓独立生活和修行。其他没有上山的百姓也尊重范长生的说教和博学，像敬服神一样地敬服他。

罗尚对范长生没有兴趣，也许是他不愿意和范长生分享权力，所以拒绝了参军徐舒的建议，后者愤愤不平，觉得罗尚缺乏眼光，胜利无望，跑去投降了李流。作为见面礼，徐舒向李流推荐了范长生，说如果争取到范长生的支持，流民武装的军粮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李流果断决定重礼交好范长生，派徐舒去青城山请范长生站出来说说话，支持一下自己。

范长生同情流民，不仅答应倾向流民武装，还亲自出山，以天师道首领的身份号召四川百姓支持李流。流民和四川百姓之间的矛盾顿时缓解，范长生又亲自为流民武装筹集粮秣，招募兵马。流民武装力量大增，声威复振。

李流对李雄之前的反降劝告开始信服了，觉得这个侄子稳重，有勇有谋，有长者之德，逢人便说：“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他要求儿子们尊奉李雄，还公开立李雄为继承人。李流的身体很不好，局面改观不久就病逝了。李雄继任为主。

李雄是李特的第三子。母亲罗氏，曾经梦见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而后生下了长子李荡。后来罗氏在汲水的时候突然打瞌睡，梦见大蛇绕身，醒后竟然怀孕了，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李雄。相士曾预言，罗氏的两个儿子如果有一个先死，那么剩下的那个儿子必能大贵。李荡之前战死了，这个预言就应在了李雄的身上。李雄身材魁梧，容貌出众，乡里都很看重他。道士刘化预言：“关陇之士皆当南移，李雄有奇表，终为人主。”这句大逆不道的话，足以要了刘化和李雄的命，但终因西晋统治衰微，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了。

话说李雄即位后，罗尚以为他年轻好欺负，趁机出兵攻打。李雄正好扬威，大败晋军。叔叔李骧又攻犍为，断绝了罗尚的粮道，晋军士气大减。李雄乘胜急攻成都。如今的流民武装已今非昔比，既有斗志高昂的流民，又有土著百姓的支持，罗尚连战连败，在一天夜里偷偷逃往四川东部，留下牙门将罗特固守。罗尚前脚刚走，罗特就开门投降，李雄攻克成都。

李雄占领成都，标志着西晋的益州地方政权被推翻。李雄又主动造访青城山，来到范长生居住的地方，表示要迎立范长生为君。范长生坚持推辞，再一次申明了对李雄的支持。

永兴元年（304），李雄称成都王，正式建立割据政权。范长生下青城山到成都表示祝贺，李雄出城门迎接，拜他为丞相，尊称范贤。范长生劝李雄称帝。两年后，也就是306年，李雄称帝，定国号为成，史称成汉政权。李雄进一步尊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成汉政权可以看作氏族贵族统治并得到当地百姓支持的割据王朝，在十六国中享国最长。

成汉建立后，向北驱逐西晋的梁州刺史，占领汉中；坚守四川东部巴郡的西晋益州刺史罗尚不久病逝，土地被李骧攻占；西晋宁州刺史投降成汉，南中之地也成了成汉领土。至此，成汉疆域占有益州、梁州、宁州大部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南部、四川大部和云贵部分

地区。

三

成汉地区在李雄统治的三十年间成了世外桃源，在乱世中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可谓是一个奇迹。

李雄是怎么做的呢？

史称李雄“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简单地说，就是李雄执政遵守了一条原则：清静无为，与民便利。西晋末期造成天怒人怨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府统治残暴，苛捐杂税太多，李雄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能安定民心，富国强民。所以李雄废黜西晋复杂而残暴的政令，奉行简单方便的原则。

成汉政权是流民建立的，李雄最清楚百姓田园荒芜、流离失所的痛苦，于是十分注意农业生产。四川本来就是天府之国，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只要政府能保境安民，当政者与民方便，农业生产就会迅速恢复，几年后就呈现出繁荣景象。范长生的涉世思路是“清心寡欲，敬天爱民”，劝告李雄“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李雄把这个执政思想奉行了三十年。范长生活了一百多岁，青城山建立长生宫为其专祠。此山因范长生的缘故开始显赫，道观林立，成了四川名山。

李雄的善政，源于他个人宽容和善的性格。苻成、隗文两人曾是李雄的部将，后来叛变投降了罗尚，在流民武装最艰难的时刻来攻打李雄，曾经伤害了李雄的生母罗氏。四川平定后，苻成、隗文二人又来求降，李雄准许了，并没有因为过去种种罪责二人，而是加以厚待。成汉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国库空虚，李雄一度允许卖官鬻爵，进

贡金银珍宝多的人就能得官。丞相杨褒进谏：“陛下为天下主，当网罗四海，何有以官买金邪！”李雄立即采纳，断然停止卖官。李雄曾醉酒，责罚了中书令和太官令。杨褒又劝谏：“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安有天子酗酒逞凶的！”他也虚心接受了。李雄喜欢出去走走，没什么事也出去逛逛，杨褒就骑马持矛跟着。李雄好奇地问他干什么，杨丞相说：“陛下要以天下为重，不能像我这样乘马持矛，跑快了跑慢了都可能出差错。”李雄虚心纳谏，马上勒马回宫，不再轻易外出。

在外交上，李雄处置的也很得当。成汉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和平相处，不出头，不折腾。割据西北凉州的张骏以东晋藩镇自居，可和江南没有领土相接，要借道成汉政权和建康进行公文和人员的往来。李雄与人方便，从不阻拦凉州和东晋朝廷的往来。张骏借道的同时，顺便对李雄展开“统战”，劝李雄去尊号，向东晋称藩。李雄回信说：“我被士大夫所推为帝，本无心于帝位。我的志向是：‘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可惜啊，‘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如果晋室能够复兴、一统天下，我一定奉土称臣。”

一次，巴郡告急，说东晋在集结大军企图进攻成汉。李雄竟然高兴地说：“我还担心石勒跋扈，司马睿难以对抗，想不到还能对我用兵，令人高兴。”当然了，李雄没有与东晋兵戎相见，始终向东晋示好。对于中原、西北各个割据政权也一样，李雄都谨守天险，与世无争。

有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加之农业逐渐恢复，在草长莺飞的二月天，四川的孩子们又可以去读书了。李雄办学兴文教，文治和武功一样可圈可点。

《晋书》评价李雄治下的成汉政权“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阊门不闭，无相侵盗”。这是相当高的评

价了。

永嘉之乱

—

晋武帝司马炎一共有二十五位皇子，其中最小的儿子叫司马炽，太熙元年（290）被封为豫章郡王。司马炽的豫章王是遥领的，没有“就藩”（到封地去），而是留在洛阳做京官。八王之乱爆发后，司马炽自然没有实力参与同室操戈，而是冲素自守，不交宾客，不问世事，一心攻读史籍。他这么做，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两大效果。一个是得到了舆论的好评：“多好的王爷啊，一点儿名利心都没有，就知道学习！”另一个效果是等八王之乱沉寂下来后，司马炽成了司马炎幸存的三个儿子之一，另两个是分别是晋惠帝司马衷和吴王司马晏。

光熙元年（306），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挑选司马炽即位，次年改元永嘉。司马炽成了晋朝的第三个皇帝，史称晋怀帝。

司马炽和永嘉时代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司马炽在皇帝生涯的多数时光里就是个傀儡，朝政全由司马越把持。司马越以太傅身份辅政，兼任了华北六州的刺史或者州牧，并拉拢大世族王衍为太尉，在朝野中到处安插亲信。晋怀帝司马炽原本就没有根基，如今更没有施展拳脚的可能了。

司马炽即位前，和中庶子缪播关系很好，即皇帝位后任命缪播为中书监，任命缪胤为太仆卿，此外还让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和太史令高堂冲协助自己处理机要事务。这是司马炽能够拼凑起来的可怜

班底。可司马越对这个力量微弱的政务班底也不能容忍，在心腹刘舆、潘滔等人的劝说下，诬陷缪播等一众“谋反”，派将军王秉率领三千士兵进入皇宫，当着司马炽的面逮捕了缪播等十余人。司马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班底被一网打尽，唯有叹息流泪而已。最后，缪播等十余人全部被斩首。

司马越分析了八王之乱以来皇帝被藩王利用的历史，觉得屡次变故成败的根源在于宫殿侍卫力量的人心向背。为了将司马炽彻底控制在手掌中，司马越决定重组宫廷侍卫。当时宫廷中的武官都封了侯，司马越就上奏请求将有侯爵身份的宫廷侍卫全部罢免。很快，司马炽身边的武官都被解职，司马越改派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带领几百名东海国的士兵担任皇宫禁卫，等于将司马炽看管了起来。

司马越个人权力得到了巩固，但洛阳城的形势却不太妙。八王之乱的恶果此时已充分显现了出来：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洛阳府库空虚，而匈奴、羯族等少数民族武装纵横黄河南北，晋朝地方郡县望风披靡。洛阳城就好像是一艘装饰华丽却缺乏水手和给养的大船，周围全是凶神恶煞的异族小舢板。司马越就是这艘大船的舵手，他面临的已经不是大船驶向何方的航向问题了，而是如何保证洛阳不被异族武装攻陷的生存问题。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派出羽檄征调地方军队入援京师，号召藩镇和地方将领们勤王。

在求援问题上，皇帝司马炽和权臣司马越的利益是一致的。使者临行前，司马炽叮嘱使者们，要他们转告地方守臣：“现在增援，洛阳可能还有得救；晚了，洛阳就没有了！”华北、西北的部分州县，南方的大部分州县都还在晋朝官吏的手中，但高度的中央集权和连年征战，使他们势孤力单，而且自身也面临异族武装或者农民起义的问题而自身难保，都不具备增援洛阳的能力。

山涛的儿子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有心报国，派出一支小规模部队前往洛阳，不想走到宛城的时候被当地流民武装消灭了。而派

出援兵后，山简自身力量削弱，不得不闭城自守，后来干脆弃城南逃。另一个有心增援的人是荆州刺史王澄。他的刺史官职是司马越任命的，而且族兄王衍还在洛阳城中，所以派部队前往洛阳。当山简失败的消息传来，王澄害怕步其后尘，赶紧召回了部队，一心保境安民。其他地方官员，情况也类似。所以司马炽望眼欲穿，却没看到一个援兵进入洛阳。

在绝境中坚持了三年多，洛阳的情况更加不妙了。异族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朝廷能控制的郡县越来越少。太傅司马越丝毫没有改变朝廷困局的能力，又揽权专政，声望尽失。永嘉四年（310），司马越阵营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要完蛋，就有谋士建议道：“与其在洛阳坐以待毙，倒不如集合城里尚有战斗力的军队，向外发展，也许能打开一片天地。”司马越接受了这个冒险的建议，穿上戎服去向司马炽辞行。他借口讨伐石勒，当时石勒正在横扫黄河以南和汉水以北地区，要率军向兖州、豫州方向发展。司马炽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胡人日渐逼近首都，洛阳官民斗志全无，朝廷社稷正倚赖太傅支撑。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可以远离洛阳、孤立首都呢？”司马越辩解道：“臣此次出战，如果能够幸运地击破贼军，则国威可振，总比坐待困穷要好。”应该说，司马炽和司马越对时局的看法各有各的道理。晋朝发展到这一步，要么坐以待毙，要么侥幸取胜。

当年十一月，司马越孤注一掷，集合在洛阳城内外的四万军队，声称讨伐石勒，向许昌开拔而去。太尉王衍担任军司，与司马越同行。洛阳官民见司马越军队要弃城而去，人心惶惶，多数人都想搭上司马越这艘救生船，逃离势必沉没的洛阳大船，于是各显神通往军队里面挤。到最后，四万军队膨胀成人数超过十万的逃难大军，里面有大大小小的洛阳各级官吏及其家眷、富翁和其他关系户、难民等。一路上尘土飞扬、人声鼎沸，有拖家带口的，有丢三落四的，有被百姓打乱行伍队列的部队，也有在百姓队伍中横冲直撞的骑兵，场面一片混乱。

当然，司马越也没有完全放弃洛阳——毕竟它是帝国的首都，毕竟晋怀帝司马炽还有政治号召力。他留下了王妃裴氏、世子司马毗在洛阳，并留亲信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率少量军队守卫城池，以防万一。

等庞杂混乱的出征部队都消失在了远处的尘土中，洛阳城顿时变为一座死城。官署中的大多数官吏、军营中的大部分士兵，都随司马越走了，衙门没有人守卫，治安没有人维持，最恶劣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都没有人去埋葬。每天都有人逃离死城。不愿意走和不得不留下的人，也忙于掘壕沟筑工事，以求自保。

司马越此行，能否幸运地击败石勒呢？晋朝的前途又如何呢？

二

晋怀帝司马炽对司马越的冒险出征心怀愤懑。司马越前脚刚走，司马炽就于永嘉五年（311）正月给东边的青州刺史苟晞发去密诏，任命他为大将军讨伐司马越。

晋朝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了，各块尚在晋朝官吏手中的领土，像淹没在异族和农民武装海洋中的一座座孤岛。还算大的势力有以下几个：在黄河以北主要是并州刺史刘琨和幽州刺史王浚，在江南主要是琅琊王司马睿，在关中地区主要是南阳王司马模，苟晞是晋朝在黄河中下游硕果仅存的地方实力派，也是司马炽讨伐司马越的唯一人选。

苟晞是职业官僚，身经百战才跻身高位，有着奋斗成功后的老官僚的精明和市侩。他见朝政日乱，担心有祸害上身，花了很大力气结交达官显贵，每次得到宝物都往洛阳的权贵家里送。他在兖州时，驻地离开洛阳五百里，苟晞怕送往洛阳的土特产到达时不够鲜美，挑选

了千里牛，每天凌晨驮着礼物出发晚上回来，日夜不休，用心良苦。荀晞靠此在乱世中求生存谋发展。在政治上，荀晞是个不折不扣的强权者，建立了庞大的官署和幕僚系统，专断辖区内的人事；他追求战功，对付异族武装和流民起义毫不手软，日加斩戮，血流成河。兖州、青州一带百姓苦不堪言，暗地里骂荀晞是“屠伯”。

荀晞的青州刺史是司马越任命的，司马越还封他为郡公，两人的关系一度很好。如果能够深入合作，司马越有可能借助荀晞的实力，在黄河下游站稳脚跟，和石勒、王弥等人决一雌雄。遗憾的是，两人的关系在司马越出洛阳前不幸破裂了。司马越的亲信潘滔、刘望等人诬陷荀晞，可能是想夺荀晞的官职。荀晞气愤，向司马越要潘滔等人的脑袋，同时向司马越建议了几项人事变动，司马越一概没有答应。荀晞于是认为：“司马越为宰相，不能平定叛乱，使天下淆乱，我怎么能坐视不顾呢？今将诛国贼，尊王室，匡扶天下的霸业可成！”他移告诸州县，公布司马越的罪状，宣布和司马越决裂。

司马炽也正是看中这一点，决定让荀晞去讨伐司马越的。主观上，荀晞有讨伐司马越，甚至取代司马越的心思，可惜客观上，他已经自顾不暇。流民武装领袖王弥的部属曹窋部队之前大举进入青州，志在占领领土长期经营。荀晞抵抗得很辛苦，节节败退，部队日渐零落，完全没有力量讨伐司马越。他能做的，就是在文字上积极响应司马炽的号召，对司马越口诛笔伐。

离开洛阳后，司马越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所谓的讨伐石勒，不过是逃离的借口而已。全军上下，从司马越到普通士兵，都没有战胜石勒的信心。不幸的是，二月，石勒大军从汉江北上，朝着司马越部队的方向冲杀过来。司马越匆忙躲避，向东方逃去。当月，石勒占领了重镇许昌。三月，司马炽又公开发布诏书，讨伐司马越。司马越还截获了荀晞和朝廷往来商议讨伐自己的文书。在石勒、司马炽、荀晞三方的巨大压力下，东海王司马越走投无路，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心力交瘁加上急火攻心，死在了项城。

司马越死后，官民们要推举太尉王衍为首，率领大家谋出路。王衍不敢担当如此大任，百般推辞说：“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欲望，这些年来全是熬资历才升迁到如今的地位。今天的大事，怎能让我这样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他要推举随军的襄阳王司马范为新首领，司马范坚决不答应。最后实在没办法，王衍心不甘情不愿地继承了司马越的位置。

王衍，山东琅琊人，在琅琊王家的兴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后琅琊王家在南方的发达，实在应该感谢他。从年轻时代起，王衍就精通玄理，擅长清谈，专以谈论《老子》《庄子》为事。清谈时，王衍喜欢手持白玉柄的尘尾，手和玉柄的颜色一样白皙。虽然是玄学大师，王衍却没有留下系统的言论，就连只言片语也很少。主要原因是他纯粹是为了清谈而清谈，没有成熟的观点，经常谈着谈着觉得话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随口改过来。世人称之为“口中雌黄”。

正如他承认的，因为资历老、家底硬，王衍被视为士族的首领。在人品和能力上，王衍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的夫人郭氏是个悍妇加守财奴，连亲友的钱财都要霸占。王衍对郭氏的贪财很鄙夷，坚持口中不提“钱”字。郭氏偏要试试他究竟会不会说钱，就让奴婢用钱绕床一圈，把王衍围在床上。王衍醒来后看到钱，大喊：“把这些堵着我的东西拿走！”在政治上，王衍没有丝毫建树，专谋自保，甚至不惜为了讨好贾南风而牺牲女儿的婚姻。王衍的女儿原本许配给了愍怀太子，王衍看贾南风不喜欢愍怀太子，竟然悔婚。可就是他，连续担任尚书令、司空、司徒等宰相级的高官。王衍年轻时曾去拜访山涛，山涛对别人评价王衍道：“王衍看起来很不错，然而亡国败家的，正是这样的人！”

王衍当了东海王部众首领后，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回归洛阳，和司马炽汇合，号令天下，与叛军对抗，维持局面；第二条路是与其他晋朝势力汇合，比如与荀晞的青州势力抛弃前嫌合兵一处谋求自保，或者继续往东南方向发展，渡过长江去与司马睿的势力会

合；第三条道路是就地占领郡县，准备后勤和工事，以之为根据地防御敌人，谋求发展。应该说，这三条路都不失为现实的选择。然而王衍却做出了匪夷所思的选择：对司马越的死秘不发丧，扶着灵柩向东海进发，准备在司马越的封地安葬他。于是以王衍为首，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全军向东踏上了尘土飞扬的征途。

石勒亲自带人追赶东海王的部队，最终在苦县追上了。石勒的部队只有两万人，而王衍统帅的人有十余万之众，可这十余万之众抱着逃难的心离开洛阳，中途又经历首领更迭，漫无目的地在河南游荡，士气越来越消沉。将军钱端勉强出兵与石勒作战，战死，引起了全军大崩溃，十几万人被石勒的军队围困。兵无斗志，大家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跑到东，都在寻找逃生的缝隙，却没有一个人进行抵抗。石勒指挥军队射杀晋军，将一场决战简化成了屠杀。一圈圈的人被射死，尸体一层压着一层，“相践如山”。十多万西晋的官吏、军队和他们的家眷就这么消失了。这是西晋在北方最后的主力。

石勒下令焚烧司马越的灵柩，给司马越极为恶劣的评价：“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石勒是西晋末年黑暗政治的受害者，他是有资格说这些话的。王衍等几十名权贵成了俘虏，石勒把这些人叫到跟前。除襄阳王司马范神色自若拒不畏死外，其余的人都纷纷哀求石勒饶命。

石勒并没有马上大开杀戒，而是询问了王衍许多的朝廷往事。王衍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但解释责任不在自己，并说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参与政事，只求避祸保身。王衍甚至劝说当时还在匈奴汉朝担任将领的石勒称帝，石勒对王衍强言狡辩、卑躬屈膝的行径极为不屑，怒喝道：“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就得到朝廷重用，如今头生白头发了，竟然还说没有参与朝廷政事？天下残破不堪，正是你这类人的罪过！”

把俘虏押下去后，石勒对参谋孙苋说：“我行走天下多年，从来

没有见过如此无耻的人，还应该让他活下去吗？”孙苕说：“王衍一定不会为我们尽力，杀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石勒不屑于用刀杀他，就命令士兵在半夜里推倒墙壁把王衍等人压死了。据说王衍临死前，终于忏悔道：“我们虽然赶不上古代贤人，但如果平时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的下场。”

留守洛阳的司马越王妃裴氏和党羽何伦等人，听到司马越去世的噩耗后，仓皇无措，竟然弃城南逃。洛阳最后一点儿武装力量也被他们带走了，就好像一片枯黄的叶子被抽走了最后一丝绿色。何伦等人也没有逃远，很快就被石勒的军队拦截住。一场接触战过后，何伦、东海王世子司马毗等人都被乱军杀死。王妃裴氏被掳掠卖掉，若干年后辗转来到了江南，才恢复了身份。当时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称帝，他是司马越的党羽，裴氏当年对他也多有帮助。司马睿为司马越举办了象征性的葬礼，并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司马越。这些都是后话了。

三

话说司马越势力离开洛阳被石勒消灭后，洛阳的情势危如累卵。

苟晞看到洛阳无兵无粮，敌人兵临城下，势必陷落，上表奏请迁都，还派出由数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运送了五百名士兵、上千斛谷米进入洛阳。同行的使者请求司马炽前往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避难。这也许是挽救朝廷免于覆亡的最后机会。

司马炽非常愿意迁出洛阳，但公卿大臣们坚决反对：他们有的担心迁到苟晞的地盘后自己官爵不保，朝廷可能被苟晞控制；有的则舍不得洛阳的府邸家财。结果司马炽和大臣们争论了好久，没有马上就走。几天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再不走就要被匈奴人抓走了。司马炽

不想再争论，决心逃亡。他找不到车子，就徒步出宫，身边只有几十名官员和宫人跟从。君臣一行人在洛阳大街上竟然遭遇盗匪抢劫，狼狈异常，只得返回宫殿。没有一定的力量保护，司马炽君臣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逃出洛阳城去的。而城外，刘曜、王弥、石勒各部叛军，正不断逼近。

六月十一日，叛军从南边进入洛阳城，将官署、宫殿中的珍宝和美女抢劫一空。司马炽在宫殿中（一说在逃往长安的路上）被俘。皇太子司马诠、吴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曄、尚书左仆射和郁、尚书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缙、河南尹刘默等人被杀，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洛阳城经过八王之乱和此番洗劫后，成了一座废墟。

永嘉之乱的发生，是西晋开国以来种种矛盾累积的恶果。晋武帝司马炎时期的大臣何曾曾悲观地预测王朝很快就会覆灭，对儿子们说：“你们还能够免祸。”指着孙子们说：“他们一定会遭到国难。”何曾判断的依据是司马炎君臣聚会的时候，都是谈家长里短，谈如何享受，没有一个人关心国计民生。这样的王朝怎么能长久得了呢？即使何曾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也要对王朝覆灭负责。他们何家一顿饭吃几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本身就是穷奢极欲的统治阶层的一员，对国家发展毫无裨益。如果没有八王之乱这样的内乱，西晋可能还能多维持几年。八王之乱的爆发，大大加快了王朝的灭亡。果然到永嘉末年，何曾一家已经没有子孙留存在世了。

永嘉三年（309），匈奴人判断“不出三年，必克洛阳”，他们果然做到了。

天命何所归——西晋的彻底覆灭

—

永嘉之乱在事实上宣告了西晋王朝的覆灭，北方晋朝的残余力量又惨淡经营，勉强把晋朝的旗帜在北方多扛了几年。

永嘉之乱中，皇帝被俘，皇太子遇害，宗室亲王四十八人遇害，但是司马炽的儿子豫章王司马端奇迹般地从乱军中逃了出来。他隐约记得大将军苟晞要迎接父皇司马炽前往仓垣，逃出洛阳后就拼命向东跑，还真让他跑到了仓垣。苟晞得知洛阳的惨状后，先和部下大哭了一阵，然后尊司马端为皇太子，建立了西晋的临时政府。因为司马炽还活着又不能行使职权，所以司马端这个皇太子只能代行皇帝职权。司马端承制任命苟晞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苟晞树起大旗后，带着临时政府从仓垣迁移到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驻扎，希望能走出危局。

苟晞出身孤微，如今位至群臣之上，志颇盈满，不顾时局艰难，反而追求起享受来了。他有奴婢近千人，侍妾美女数十名，终日累夜不出户庭，纵情肆欲。对外，苟晞刑政苛虐，部下阎亨劝谏他要勤奋振作，苟晞大怒，杀了阎亨。另一个部下明预在家养病，抱病劝谏苟晞：“朝廷正当危难之机，明公亲禀庙算，将为国家除暴。阎亨美士，奈何无罪一旦杀之！”苟晞大怒：“我杀阎亨，关你什么事，竟然抱病来骂我！”这样一来，部下为之战栗，再也没有人劝阻苟晞的荒唐行为了。西晋临时政府大失人心，加上又遇到疾疫、饥馑，将军温

畿、傅宣等人纷纷叛变投敌。苟晞实力迅速削弱。

苟晞在危难时刻扛起朝廷大旗，完全有可能把北方还忠于皇室和反对异族统治的人士聚拢在自己周围，可惜白白浪费了机会。很快，在石勒的进攻面前，苟晞地盘越来越少。最后蒙城被石勒偷袭攻陷，苟晞被俘。石勒先任命他为自己的司马，一个多月后又杀了他。皇太子司马端在战乱中下落不明。

话说洛阳沦陷的时候，司马炽的侄子十二岁的秦王司马邺也逃了出来。司马邺跑到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遇到了舅舅朝廷司空荀藩，荀藩收留了他。巧的是，前豫州刺史阎鼎是西北天水人，在密县纠集了数千流民，准备返回西北故乡。荀藩去找阎鼎，阎鼎毅然决定保护秦王，延续王朝血脉。全靠这支流民武装，司马邺暂时稳定了下来。

苟晞势力覆灭后，离司马邺最近的朝廷势力就是关中的司马模了。永嘉之乱发生时，晋朝将军赵染投降了刘聪，引匈奴刘粲的部队进攻长安。司马模战斗失利，竟然献出长安投降了，结果还是被刘粲处死。司马模的儿子司马保继立为南阳王，坚持作战；关中未曾失守的一些地方的官吏也纷纷坚持抵抗。忠于晋室的军队和刘曜、刘粲交战，连连得胜，包围了长安。永嘉六年（312）四月，刘曜、刘粲等人坚守不住，放弃长安逃跑了。阎鼎与关中众人联络，双方一致拥戴司马邺。司马邺随即进入长安。九月，阎鼎等人推举司马邺为皇太子，建立了新的临时朝廷。这个小朝廷一建立就陷入了内战，两大支柱的河南的流民武装和关中的郡县武装，相互不买账。阎鼎与关中诸将争权，抢先痛下杀手，无奈力量不济，遭到关中诸将群起攻之，兵败被杀。

可怜的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后，被送往平阳。匈奴首领刘聪对他的态度很好，封他为左光禄大夫、平阿公，次年又晋封为会稽郡公。当然了，这些官爵都是虚的，司马炽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一次，

刘聪对司马炽说：“爱卿为豫章王时，朕曾经由王济介绍，认识了爱卿。爱卿当时说闻朕名久矣，还把自己所制乐府歌展示给朕看，对朕说：‘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当时与王济都背了篇《盛德颂》，得到卿家的夸奖。爱卿又引朕到皇堂赌博，朕得十二筹，卿与王济都只有九筹。朕赢了，爱卿还送给朕柘弓、银研。爱卿还记得吗？”刘聪一口一句“朕”“爱卿”的，表面看来是叙旧，是恩宠，可对前朝皇帝司马炽来说，却是莫大的讽刺。而司马炽只能回答：“微臣怎敢忘记，只恨当日没有早识龙颜。”刘聪又说：“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再次放低身段，回答道：“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司马炽只能奉承匈奴人建立的汉国取代司马家族的晋朝是“天命所归”。

尽管司马炽战战兢兢，一心委曲求全，刘聪还是对他起了杀心。永嘉七年（313），刘聪命令司马炽在正月的朝会上穿着奴仆的青衣，给大家倒酒。晋朝的侍中庾（yǔ）珉、王俊等人见状号哭不止。刘聪杀心更重了，随即派人毒死了司马炽。司马炽死时只有三十岁，葬处不明。晋朝秘书监荀崧曾对人说：“怀帝天资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之祸。”一个守成之才，偏偏在社稷飘摇、权臣当道的时候被推上皇帝的宝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王朝的不幸。

晋怀帝司马炽遇害的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邺不用再“承制”了，登基称帝，是为晋朝的第四个皇帝晋愍帝。

二

司马邺即位后，最大的手笔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手笔，就是决定对

匈奴汉国发动“总攻”。

根据永嘉七年（313）五月司马邺发布的诏书，这次总攻的目的是“扫除鲸鲵（指汉），奉迎梓宫（晋怀帝的棺木）”，收复中原。具体安排是兵分三路：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出兵三十万直取匈奴都城平阳，任命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率兵三十万保卫长安，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率兵二十万进攻洛阳。整个计划雄心勃勃，规模宏大，可惜无异于痴人说梦。晋朝哪里还有八十万人的军队啊！三路之中，情况最好的是江南的司马睿，估计把正在和南方异己势力作战的军队拼凑一下，能有几万之众；情况最不好是关陇一带的司马保，地方残破，朝不保夕，不要说三十万人，估计连三千人也没有。

接到诏书后，真正采取行动的只有并州刺史刘琨。刘琨一向爱国，苦于手头没有军队，就向北边的鲜卑部落“借兵”。会合了鲜卑援兵后，刘琨勇敢地向平阳进攻了。匈奴人迎头抵抗，鲜卑人惧战退兵。刘琨只能无可奈何地跟着撤退了。有人把祖逖北伐也算在响应司马邺总攻号召的行列中。但他只能算是部分南迁的中原人士出于恢复家园目的的自发行为，只得到了司马睿象征性的支持。祖逖北伐的成果离晋愍帝要求的“进攻洛阳”，相差甚远。

梦境破灭后，现实显得更加残酷。匈奴军队西进侵蚀关中，长安的力量日渐空虚。建兴四年（316）八月，刘曜对长安发动总攻，西晋君臣进行了持续抵抗。到十一月，长安外城失陷，君臣退守小城。城中粮草全无，一斗米贵至黄金二两，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司马邺见国家已是穷途末路，不愿意连累更多百姓，表示要“忍耻出降，以活士民”。有大臣痛哭流涕，拉着司马邺不让他出降。十一日，晋愍帝司马邺按照传统的君主投降仪式，乘羊车，肉袒（去袖，露出左臂）、衔璧（以口衔璧）、舆榱（车子上装着棺木）出城投降。西晋至此彻底灭亡。

刘聪接受了司马邺的投降，将西晋君臣安置在平阳，司马邺被封

为怀安侯。一天，刘聪外出打猎，让司马邺穿上戎装，像卫兵一样执戟前导。沿途老百姓见了，都指点说：“这是原来的长安天子！”有些老人看着司马邺，泪流满面。太子刘粲见状，主张杀掉司马邺以除后患。刘聪没有马上接受。十二月，刘聪大宴群臣，就像当年侮辱晋怀帝司马炽一样，要求晋愍帝司马邺给大家倒酒、清洗杯具。更过分的是，刘聪起身上厕所，命令司马邺执盖随从。在座的不少晋朝旧臣见状流泪涕泣，有的还哭出声来。尚书郎辛宾甚至抢步上前，抱住司马邺大哭。刘聪大怒，命令把辛宾拖出去，立即斩首。几天之后，司马邺也被害死，年仅十八岁。

关陇残余的南阳王司马保，在司马邺死后自封晋王，企图以王朝正统自立，无奈他志大才疏，加上无兵无将，不久在陇西遇害。晋朝存续的希望，就看南方的司马睿的作为了。

第三章 群雄逐鹿

石勒：从奴隶到皇帝

—

刘曜的前赵，定都长安。石勒的后赵，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都城。两个赵国一西一东，基本占据了北方，与南方的东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前赵后赵这对仇家，因为内部都不稳定，需要先处理好内务才有能力对外，所以一开始没有打起来，维持了多年的和平。

前赵的内部麻烦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关中陇右一带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并不服从匈奴的统治，有数以万计的人接连叛乱反抗前赵政权。刘曜采取了安抚和迁徙并举的政策平定叛乱，迁徙二十余万人充实长安。第二个是安定（今甘肃平凉西北）乌氏人张轨趁中原大乱之际，割据凉州建立前凉政权，名义上向东晋王朝称臣，威胁着前赵的后方。前赵对张氏政权用兵，虽然没有消灭前凉，但迫使其服软称臣。

再说后赵的情况。它的建立者石勒值得大书特书。石勒是并州

的羯人，年轻时遇到大灾荒，被当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抓起来当作奴隶押到山东卖出。司马腾是司马越的弟弟，在荒年竟然想出卖异族百姓为奴“以充军实”的馊主意来，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山东，石勒表现突出，很有威望，主人最终释放了他。石勒在山东地区游荡了几年，结识了马牧帅汲桑。305年，石勒和汲桑趁乱集合几十个伙伴，起兵为寇。在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石勒很快就组织起了以羯族为核心的武装力量。他和汲桑曾攻下河北重镇邺城，杀死了贩卖过他的司马腾。汲桑战死后，石勒率部投靠了匈奴刘渊。当时匈奴汉朝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并州、关中和河南地区，山东、河北地区的扩张主要依靠投奔匈奴的各支杂牌军。

除了石勒，当时东部打着匈奴汉朝旗号作战的还有王弥的军队。王弥是汉族人，趁乱起兵，军队以汉族人为主，实力足可与石勒对抗。东部地区基本就是石勒和王弥的天下。他们扫荡了东部地区的西晋军队，并和匈奴的刘聪军队相配合制造了“永嘉之乱”，各自杀戮了西晋数以万计的王公官吏。共同的敌人被消灭后，并肩作战的朋友就变成了敌人。

一山难容二虎，石勒和王弥首先开始内讧。王弥图谋石勒，可惜缺乏政治技巧，思想觉悟也不高。他幻想通过恭维拍马屁的方法，让石勒放松警惕。石勒在青州大获全胜后，王弥故意写信给石勒说：“石公俘获苟晞却赦免了他，何其神勇啊！让苟晞为公左膀，我王弥来做您的右臂，石公就可以平定天下了。”石勒当然不相信王弥的鬼话，开始提防着王弥。王弥军队的人数不少，却兵力分散，分兵攻略地方。他亲自领兵南下，和东晋大军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相持，情况不妙，就向石勒求援。

石勒当时正在和乞活军陈午的队伍鏖战，不想增援王弥。石勒的汉族谋士张宾劝他：“您常常担心王弥的掣肘，这次是个解决他的好机会。‘陈午小竖，何能为寇？王弥人杰，将为我害。’”石勒听从了张宾的意见，亲自率军增援，击败晋军。王弥以为石勒和自己推心置

腹，先对石勒放松了警惕。不久，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不顾部属劝阻，贸然前往，结果在席间被伏兵杀害。王弥的部下或散或降，石勒军队成了东部最强大的势力。

石勒和王弥名义上都是匈奴汉朝的大将。石勒擅自杀害王弥，匈奴朝廷严斥其行为，可又不能追究石勒的罪责，只好默认了他在东部的独尊地位。石勒名义上仍为匈奴之臣，但实际上已开始独立行动。

石勒军队起初都是流动作战，没有后方，没有给养，沿途劫掠，是不折不扣的流寇。永嘉六年（312）初，石勒计划攻克建邺（282年，建业改称建邺），便劫掠富庶的东南地区，在江淮一带遭到晋军的层层抵抗。司马睿会集江南兵力防御石勒，江淮地区又连降大雨，石勒军队陷入了困境。饥饿和传染病夺走了半数官兵的生命。石勒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没有土地和人民就没有立国之本。环顾天下，长江流域、关中和巴蜀都有了主人，剩下的就只有山东、河北。石勒毅然回军北上，去争夺河北和山东。

汉代以来，河北最重要的城市是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内），石勒长驱直入进攻邺城，但苦于邺城的高大牢固，一时难于攻下，退而占领了襄国。从此，石勒以襄国为根据地，四处消灭河北地区的坞堡，收集粮草和人口充实襄国。石勒在襄国做大，逼迫北方幽州的西晋残余势力不能等闲视之。西晋幽州刺史王浚集合数万主力，联合辽西鲜卑段匹磾（dī）等人进攻襄国。

石勒在这场关键战役中，死死支撑了下来，陆续消灭西晋部队，对段氏鲜卑先擒后纵，再赠送厚礼重金。段氏鲜卑感念石勒，与他结盟，并收兵撤还辽西。段氏鲜卑从此倾向石勒。王浚见势不妙，撤军北逃。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的侄子石虎攻克邺城，冀州尽入石勒囊中。

幽州刺史王浚为晋朝坚守北方的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

本区毗连的土地），名为晋臣，却长期脱离朝廷，起了不臣之心，奢纵淫虐，署置百官，就差割据称王了。石勒依张宾之计，利用王浚割据之心进献厚礼，表示拥戴其称帝，还厚贿王浚的女婿枣嵩。为了麻痹王浚，当晋朝的范阳守将游统暗中派遣使者联络石勒投靠时，石勒杀死使者送给王浚。

晋廷为了保住飞地，升王浚为大司马，把幽州、冀州托付给他；升刘琨为大将军，把并州托付给他。晋朝的使者先到襄国，石勒将之视为一个机会，把精锐军队都隐匿起来，在晋朝来使面前故意示弱；写信给王浚，假称要亲赴幽州劝进；写信给枣嵩，吹嘘他功劳显赫，要为他请官晋爵。王浚得到使者回报，相信石勒兵力薄弱，也轻信石勒劝进的假话，毫无戒备。王浚做着白日梦，石勒却领兵日夜兼程偷袭幽州，兵不血刃地迅速推进到了蓟城（幽州州治，今北京西南）城下。途中有官员见石勒来意不善，派人报警。王浚竟然杀死报信人，此后再无人报警了。石勒看到蓟城没有防备，担心有伏兵，借口献礼，先驱赶牛羊数千头入城，塞住街巷，让城内一片混乱，然后杀入城去，俘获王浚，押送襄国斩首。从此，幽州也成了石勒的领土。

之后就发生了匈奴内乱，刘曜和石勒分立。刘曜要处理关中的麻烦，石勒则要与割据青州的曹疑作战。曹疑是汉族人，是王弥的余部。当初王弥分兵派遣曹疑攻略青州。曹疑在王弥死后独立于各派势力，在感情上倾向晋朝。石勒为了笼络曹疑，对他拜将封爵。曹疑势单力薄，觉得东晋过于遥远难以为援，不得不接受了后赵的任命。原来的青州州治淄博地处平原，难以防守，曹疑找了一处靠山临水、易守难攻、交通发达的地方，修建了广固城（今山东益都镇），打算长期坚守。太宁元年（323），石勒派遣石虎率步骑四万讨伐曹疑。曹疑自知不敌，计划避难迁徙海中以保存实力。不想疾疫流行，计划还没成行，石虎大军就包围了广固城。曹疑投降，被押送襄国杀害。攻陷广固城后，残忍的石虎坑杀军民数万人，扬言要杀尽居民。后赵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征说：“没有居民，我还做什么刺史？干脆回去算

了！”石虎这才留下几百人，交由刘征这个青州刺史统治。就这样，青州也纳入了后赵的版图。

双方内部事务都解决了以后，前赵后赵开始兵戎相见。

前赵刘曜的军力弱于石勒，便先下手为强，联合东晋军队抢先对石勒发动进攻。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等人将石勒看作制造“永嘉之乱”的元凶，都愿意与匈奴联军。东晋太宁三年（325），前赵联合东晋的北方军队进攻石勒。

两赵战争正式爆发。

石勒派石虎迎战。双方在成皋（今河南荥阳）激战，战火蔓延到并州，前赵军队大败。刘曜败归长安，东晋军队或南逃或投降后赵。今天的河南地区完全被后赵军队占领。

两年后，即327年，轮到后赵军队进攻了，石虎率兵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刘曜亲率精锐驰救，杀败石虎。石虎狂奔数百里逃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乘胜进军，包围了洛阳。后赵军队坚守城池，刘曜就采取掘堤水淹的办法冲灌城墙，洛阳危在旦夕。石勒很重视洛阳，几乎是倾国而出，分兵三路救援。这时刘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在外线部署军队狙击援军，结果导致后赵援军蜂拥而来。见势不妙，刘曜举止失措，既没有加紧围攻洛阳，也没有后撤进行必要的挽救部署，反而撤围洛阳，将十万大军都排列在洛河以西，和石勒隔河对峙，相当于坐等挨打。

石勒主动出击，命石虎等人攻击前赵大军各处，自己也提刀上阵夹击刘曜。前赵大军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溃败，石勒大获全胜，斩首五万余众。当时是冬天，刘曜骑马从洛河冰面上撤退，结果坠于冰上，身上被创十余处，成了后赵的俘虏。石勒让刘曜写信令留守关中的儿子刘熙投降。刘曜却写信要求刘熙：“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见刘曜刚硬不降，就杀了他。

刘曜本以为儿子刘熙坚守关中，还可同石勒一搏。实际上主力覆灭，刘曜身亡后，前赵立即分崩离析，关中大乱。东晋咸和四年（329）正月，刘熙得知父亲的死讯后，竟然逃离长安，躲到上邽（今甘肃天水）去了。留守长安的前赵军队投降后赵。这时候刘熙又后悔了，在夏天反攻长安，没有成功，将前赵最后的实力也折损了。石虎乘机攻克上邽，前赵灭亡。

至此，除了辽东慕容鲜卑氏建立的前燕政权和凉州河西张氏建立的前凉政权外，石勒统一了北方其他地区。后赵领土东接大海，北到长城内外，西达陇西与张氏政权接壤，南到江淮与东晋王朝对峙。

330年石勒称帝。从奴隶到皇帝，石勒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只有在乱世才有可能发生的奇迹。石勒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出身阶级最低的皇帝。同时期，只有赌棍出身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的经历能和石勒的奇迹有一拼。

二

石勒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出身少数民族，又当过奴隶，对社会实情和百姓疾苦有切身的感受，尤其是对西晋末年百姓流离失所、流民充斥乡镇的乱局记忆深刻，建立赵王政权后，石勒就留意农业生产，派遣使者巡行州郡，招募流民，劝课农桑。随着后赵政权的稳定，流民相继归附石勒，之前农田荒芜、百业凋敝的景象也有所缓解。石勒所代表的羯族，整体汉化水平不高，政治体制比较落后。石勒能够认识到汉族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征战过程中吸纳汉族政治文明。张宾是石勒早期任用的汉人谋主，为后赵建立奉献了许多智慧，石勒非常敬重他，尊称他为“右侯”，凡大事必询问他。张宾死后，石勒一度痛不欲生。石勒不识汉字，就找儒生读书给自己听。一次，儒

生读《汉书》，读到酈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后人时，石勒大惊，说这样做会天下大乱的。后来听到张良劝阻，石勒连忙说：“赖有此耳。”说明石勒对汉族政治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认同。虽然后赵政权也像匈奴政权一样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的制度，但同时也已经采纳了大量汉族的制度。石勒初起时，对西晋王公大臣、坞堡主及士大夫大肆杀戮。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争取汉族上层，尤其是留在北方的世族豪门的支持是多么重要。

石勒在俘虏中区分世族和庶族，将世族集为“君子营”，以示优待，在战乱中下令梳理地方家族谱系，明令不准欺凌或轻视衣冠华族。建立政权后，石勒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吸收世族进入后赵政权。河东裴氏、京兆杜氏、清河崔氏、颍川荀氏中都有人被后赵政权擢用。世家大族出于保全性命和家族利益的考虑，形式上愿意加入后赵政权，却并不能真心地效忠异族统治者。范阳卢堪被后赵委以要职，就一直以屈身事胡为耻，一再告诫子孙，在他死后不要在墓碑上刻写他在异族政权中任职的经历。这一方面体现了北方汉族人坚持“夷夏有别”、奉南方的东晋为正朔的观念，一方面也反映出北方激烈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尽管有所自我约束，石勒骨子里还是个残暴的人，奉行民族压迫政策。石勒忌讳别人提及他的异族出身，后赵法令明确规定：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杀无赦。百姓们不得不将日常食用的胡瓜改名为黄瓜。至于杀戮汉人、强迫移民等措施，更是激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胡族政权在数百年中，从没有真正得到北方汉人的拥戴与合作，以致始终不能在北方建立绝对的权威和牢固的基础。这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迅速崛起开朝立国，却又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建平四年（333）夏，石勒病死，遗诏令太子石弘即位。石勒从极其卑微的起点出发，创下了一份硕大的产业留给子孙，不知道他们能否发扬光大。

短命的冉魏政权

—

石勒死时，后赵的实权被铁腕人物石虎所掌握。石虎是石勒的侄子，为人残暴，善于征战，为后赵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本人也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石虎野心勃勃，就等着石勒死后自己做皇帝，都布置好武士要夺权了。太子石弘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吓得主动声明自己无才无德，石虎才是真龙天子。但石虎考虑到石勒尸骨未寒，强登皇位容易树敌，恐怕还会受到世人的唾骂，就虚情假意地拥戴石弘称帝。石弘称帝后，封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总摄朝政，完全是石虎的傀儡。石虎将儿子亲信纷纷安排在要害部门，进一步控制了政权，终于在延熙元年（334）废石弘，自称居摄赵天王。之后，石虎诛杀了石弘及石勒的其他儿子，从襄国迁都邺城，并于349年称帝。

石虎沿袭了石勒时期的民族压迫政策，掌权后强化胡汉分治，设置大单于，统治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全分开，又强行规定称汉人为“赵人”，胡人为“国人”，并严禁呼羯为胡。为了充实新首都邺城，石虎强迫各族人民迁往邺及其周围地区。据说石勒和石虎两代人杀戮的汉人超过百万，“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

建政后，石虎故意对汉人征发繁重的赋税与徭役，进一步激化了后赵内部的各种矛盾。石虎本人汉化程度不高，对游牧生活很留恋，于是将黄河以北中原地区的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狩猎围场，规定

汉人不能向其中的野兽投一块石子，否则即是“犯兽”，将处以死罪。结果发生了许多百姓被野兽害死或者吃掉的惨剧，汉人地位竟不如野兽。而石虎对此解释说：“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大汉天王冉闵作《讨胡檄文》可描述当时的景象：“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石虎的荒淫无度、恣意胡为，让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把后赵政权推到了火山口上。比如，石虎为追求个人享乐，在邺城修建宫殿台观，又营建长安、洛阳的宫殿，长期役使百姓超过四十万；为征讨前燕，石虎又征召超过五十万百姓准备军资。石虎统治期间，徭役繁兴，征调频仍，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的百姓不过十之二三。更令人发指的是，石虎为了充实后宫，强征民间数万女子入宫。如果女子已经婚配，就将其丈夫杀死强拉妻子入宫，导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百姓纷纷用各种形式加以反抗，石虎只是一味加重刑罚，统治更加残暴。

石虎的家庭生活也是一团糟。太子石邃因为父皇宠爱弟弟石宣和石韬，担心地位不保而阴谋叛乱篡位，事情败露后被杀。石虎立石宣为新太子，却加倍宠爱石韬，再次激化两个儿子之间的矛盾。新太子石宣嫉恨石韬，两兄弟经常发生冲突。348年，石宣残忍地将石韬砍掉手足、刺烂双眼、挑破肚子，致其惨死。石宣借石韬丧礼之际，一不做二不休，计划暗杀石虎篡位。石虎知道真相后，用同样的酷刑将石宣处死。石虎杀太子后，把无辜的东宫官吏、卫士十余万人谪戍凉州。

349年，一万多名获罪的东宫官兵被押送到雍城（今陕西凤翔）的时候，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点燃了大叛乱的引信，关中各族百姓揭竿而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军所向披靡，攻略长安，杀出潼关，人数超过十万。石虎派大司马李农调集重兵镇压，反而被起义军打败。后赵的军队经过一叛一败，元气大伤。石虎不得不利用其他少数民族武装来镇压心腹大患。氐族贵族苻洪和羌族贵族姚弋仲纷纷组织军队，

合兵进攻，终于镇压了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后赵的根基却也被掏空了。后赵自己的军队在重重矛盾中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其他少数民族的武装尾大不掉，开始威胁石虎的统治。石虎在生命的最后，笼罩在一片忧愁和惊恐之中，终于在 349 年一命呜呼。

二

石虎死后，诸子争立，骨肉相残，导致帝国分崩离析。350 年，政权落入一个汉人的手里，这个人就是石闵。

石闵原名冉闵，是并州乞活军的后代。乞活军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西晋末期，北方连年灾荒，大灾之后又赶上瘟疫和之后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丧失了。许多地区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牛羊猫狗都被吃了，老鼠草根也被刨出来吃了，最后更是出现了“易子而食”“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人祸也接踵而来。比如，并州“寇贼纵横，道路断塞”，又“数为胡寇所掠”，到处是跨马持刀的凶徒，弱肉强食，简直是人间地狱。西晋各级官府“府寺焚毁，邑野萧条”“郡县莫能自保”，更谈不上保护百姓。于是，数以十万计的流民四处流徙，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和安全的地方。在流荡哄抢的过程中，流民既要抢掠生存物资又要自卫，逐渐自发地形成了武装组织。军官出身的田甄、李恽、薄盛等人将并州流民组织起来，随司马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这就是乞活军的来历。

乞活军在五胡十六国前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先是跟随司马腾镇守邺城，与成都王司马颖作战。后来石勒和汲桑杀死了司马腾，乞活军在田甄的带领下，替司马腾报仇，杀死了汲桑。失去司马

腾这个首领后，乞活军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在李恽、薄盛带领下投奔了司马腾的哥哥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死后，这部分乞活军流窜在山东、河南等地，与石勒军队多次交战，最后被石勒消灭；另一部分乞活军在田甄的率领下前往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最后也被石勒打败，余部陈午等投降石勒。正宗的乞活军就此消失了。不过日后陆续还有一些流民冒用“乞活”的旗号，悲壮地起兵造反。

传说，在陈午的投降部队中，有一个人叫冉瞻，只有十二岁，却精明能干，很受石虎喜爱。石虎将他收为养子，冒姓石。石瞻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石闵，石虎认石闵为养孙。还有一种说法是石闵是石虎的养子。虽然说法不同，但石闵原名冉闵，是汉人子孙的史实是确定的。《晋史》描述冉闵“身高八尺，善谋略，勇力绝人，攻战无前”。在后赵时期，冉闵临战都冲锋在前，奋勇杀敌，深受石虎的器重，进而掌握了部分军队。

石虎死后诸子争位，当时汉族百姓普遍要求驱逐残暴的羯族统治者，拥护汉族出身的冉闵发动政变，推翻后赵。冉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350年夺取政权称帝的，他改国号为魏，建都邺城，史称冉魏。这是十六国时期唯一一个在中原建立的汉族政权。

冉魏政权非常短暂，仅仅存在了三年时间。它依靠部分汉族武装趁羯族内乱仓促建立，统治区域局限于黄河中游的南北地区——其他地区被后赵残余或趁乱割据的其他少数民族占领。在冉魏有限的统治区域内，民族矛盾进一步恶化。支撑这个政权的精神动力就是驱逐胡族、光复汉家天下。冉闵本人也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掌权后就下令：“今日以后，与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所任之。敕城门不复相禁。”邺城大门昼夜不关，供百姓选择到底是支持新政权还是反对新政权。

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惊恐不安，纷纷逃出城去，而汉族人热诚支持新政权，纷纷涌入城来，“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

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极端激化，百姓互不信任。冉闵见少数民族都不支持自己，杀胡之心顿起。他宣布：“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门牙。”这便是公开的“杀胡令”。

一日之中，数万胡人被杀。积怨已久的汉人大开杀戒，凡是见到具有眼廓深刻、须发发黄等胡人特征的人一律杀死。被冉魏政权屠杀的胡人估计超过二十万。胡人或者拿起武器自卫，反攻汉人，或者成群结队返迁塞外。华北陷入一片混乱，人们相互攻杀，尸横遍野。各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的迁徙征战，依然分布各地，在杀胡令的威胁下群起围攻冉魏政权。形势很快就对冉魏政权不利了。

冉闵对南方的东晋王朝抱有好感，派遣使者联络东晋，希望联合起来驱逐胡族。东晋君臣对冉闵很不信任，听说冉闵竟然已经称帝，断然拒绝联军的要求。冉闵只能靠奋勇作战来挽救局面。冉闵政变后，石虎的儿子石祗（zhī）在襄国自立，并起兵讨伐冉闵。351年，冉闵将后赵残余刘显的部队杀得大败，刘显请降，愿杀石祗以报，冉闵受降。刘显回军杀死了石祗。352年，冉魏攻克襄国，后赵灭亡。

连年作战，使冉闵赖以征伐的军队疲惫不堪。慕容鲜卑的前燕政权趁乱先攻占幽州，如今又趁机大举进攻冉魏。冉闵再次向东晋王朝求援，东晋对冉闵态度依旧，却对一再上表称臣的前燕政权很有好感，所以坐视前燕政权步步强大，冉魏日日削弱。冉闵集结汉族军民，以一万之众抵抗十四万鲜卑大军的进攻。在决战中，冉闵奋勇冲锋，在敌阵杀进杀出。传说他左手执双刃矛，右手执钩戟，杀死燕兵三百余人，最后马倒被擒，死于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同年夏，邺城陷落，冉魏灭亡。

冉魏骤亡后，华北东部地区为前燕占领，关中地区被前秦占领，北方进入了前燕和前秦对立的阶段。

慕容家的内讧传统

—

鲜卑人的祖先居住在鲜卑山（今内蒙古东北），故而称为鲜卑。“鲜卑”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一般认为鲜卑人是东胡的一支，在《三国志》《后汉书》中，鲜卑与乌桓并称东胡。东汉初年，乌桓人大量迁入塞内，与之相邻的鲜卑人也跟着南迁，这些鲜卑部落大多聚居在辽东一带。后来又有鲜卑部落内迁至辽西，因此又有辽东鲜卑、辽西鲜卑之分。慕容鲜卑是辽东鲜卑的一部分。南迁的这些鲜卑部落依然过着豪迈的草原生活，“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尚武崇力，聚散不定，呼啸成军。

话说辽东鲜卑一共有三部。慕容鲜卑部位于辽东鲜卑的中部，东西分别被宇文鲜卑和段氏鲜卑所包围，实力弱于两部。慕容家族的首领莫护跋在曹魏初年率领其部内迁到辽西一带。司马懿讨伐公孙渊时，莫护跋随战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在辽西的昌黎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建国。《晋书·慕容廆（wěi）载记》：“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间讹，遂为慕容焉。”慕容鲜卑以此得姓。莫护跋的孙子慕容涉归也因为协助朝廷征讨立功，被晋武帝封为鲜卑大单于。慕容部又转迁到辽东北部，在不断的迁移过程中，慕容部落越来越接近汉族地区，逐渐汉化。

此时，历史赐予了鲜卑族一位杰出的领袖：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廆。

慕容廆小的时候就被誉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父亲慕容涉归死后，叔叔慕容耐通过政变夺取了部落大单于之位，还派人刺杀慕容廆。年幼的他只好向南逃，开始亡命辽东，幸好被好心的汉人收留掩护才幸免于难。在汉人地区生活期间，慕容廆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汉人的文化和政治智慧，内心深深烙上了汉文明的印记。不久，慕容耐被手下人所杀，慕容族人公迎慕容廆为新单于。

慕容廆上台之初，就将从汉人那里学来的智慧运用到了部族的内政和外交上。他首先发现了并不被祖先和其他部落重视的西晋王朝的价值，主动遣使觐见晋武帝，接受了晋朝授予的官职，表面上自为藩属，实际上使弱小的慕容部鲜卑获得了“尊王”的金字招牌，多了一重保护。其次，慕容部重金联络其他两部鲜卑。段氏鲜卑是当时辽东各部中实力最强的，慕容廆便迎娶了段部单于的女儿为妻。慕容廆深知，称霸必先图强。中原八王之乱正酣，称王称霸者前仆后继。辽东最强的段氏鲜卑排斥避难而来的中原移民和汉族士大夫。而慕容廆政法分明、用人唯才，很快集中了北方五州的大量流亡士人。慕容廆移居大棘城，教人耕种，制定与汉人相似的法令法规。慕容鲜卑加速了汉化过程，迅速繁荣起来。

晋惠帝太安元年（302），慕容部近邻宇文鲜卑的首领宇文莫圭统一了塞外的东胡各部，自称单于，将进攻矛头指向慕容部，气势汹汹的宇文大军进攻慕容部边境各城。慕容廆沉着冷静，亲自迎战，首战告捷。宇文部很快又集结了十万大军卷土重来，将慕容廆包围在大棘城中。一时间，亡国阴云笼罩着慕容部落。慕容廆却谈笑自若，说：“敌兵虽多，却毫无章法可言。胜负早在我的算计之中了。诸位只管拼力一战，没什么好愁的！”他激励士气，主动出战。宇文军队多而不精，面对冲击乱作一团，溃败得一塌糊涂。此战，慕容部追击上百里，斩首数以万计。宇文鲜卑不得不远逃塞外，慕容部一跃由弱者变为强者。

战后，慕容廆又花了多年时间消化和建设已有的疆域，整编训练

军队。他采纳汉王朝的郡县制，建立了完备的政权系统与机构，设宰相、司马、列卿将帅等官职，同时“起文昌殿，乘金根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蹕”。《晋书》也承认慕容氏政权“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晋室早已南逃，司马睿在南京称帝，遥拜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慕容廆继续尊奉东晋为正统，派遣使者由海路通使东晋，从而以东晋皇命讨伐各部，收敛人心。

慕容鲜卑势力的壮大引来了辽东的晋朝残余势力和高句丽、段氏鲜卑、宇文鲜卑等势力的集体敌视。辽东此时是南迁建康的东晋王朝的一块飞地。东晋任命的平州刺史崔毖（bì）表面上是本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实际上他的话只在衙门里算数。而高句丽和两部鲜卑不懂合作共赢的道理，不愿意慕容鲜卑做大，就在崔毖的撮合下组成了四方联军讨伐慕容部，挑起辽东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战。

晋太兴二年（319），联军浩浩荡荡攻入了慕容部的境内。

慕容鲜卑遇到了崛起路上的第一道“大坎”。

四方联军如潮水般涌来，很快就将大棘城围得水泄不通。慕容廆知道本部兵马不足以硬碰硬，在战争初期以逸待劳，拼死顶住。慕容廆透过战火，很快就判断出四方联军的致命缺陷，那就是他们的疯狂进攻只是表象，实际上没有一致的战斗目标，也缺乏统一指挥。宇文鲜卑的斗志最强，段氏鲜卑和高句丽是因妒忌而出兵，而崔毖就是一个空头司令。慕容廆制定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四方联军日日围攻大棘城，慕容廆只管闭门固守。联军长期求战不得，不免开始互相猜忌。这时慕容廆乘机派人带着牛肉美酒出城，以崔毖的名义犒劳宇文鲜卑的军队。宇文部也是太大意了，和来人把酒言欢。段氏鲜卑和高句丽看到宇文部与慕容廆联欢，很自然地怀疑他们在搞对自己不利的把戏，当即领军退却，在战场上观望起来。宇文部首领宇文悉独官得知中计后恼怒异常。他也不向盟军解释，只得尽起本部数万士兵，连营三十多里，单独加紧攻城。

恰巧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翰率领军队从外地回援都城。慕容廆命令儿子回城协防，慕容翰见城内防卫力量足够，认为不如留驻城外充作奇兵，等候时机内外夹攻。于是慕容翰军队游弋战场之外。宇文悉独官感觉慕容翰是个祸患，决定分派数千骑兵突袭慕容翰。慕容翰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事先得知了宇文部的偷袭计划，当机立断，派人冒充段氏鲜卑的使臣半路拦截宇文悉独官的骑兵，请求带路，协助打击共同的敌人。宇文部不长记性，又一次轻易地信以为真，随同来人闯进了慕容大军的埋伏圈。一战下来，宇文部骑兵全军覆没。慕容廆、慕容翰父子乘胜追击，内外夹攻。世子慕容皝（huàng）率领精锐部队突袭宇文悉独官大营。宇文部溃不成军，三十里连营，成为一片火海。

宇文鲜卑被击垮后，晋朝残余势力匆忙撤出辽东，鲜卑其余各部纷纷向慕容部称臣。高句丽之后两次被慕容翰等人击败，从此对辽东事务敬而远之。

慕容廆镇守整个辽东，派使者到建康报捷。司马睿顺势封他为平州刺史，晋封辽东郡公。

晚年的慕容廆日子过得很潇洒，主要在辽东操练兵马，偶尔指点一下越来越混乱的天下局势。据说他曾经写信劝东晋名将陶侃——大文豪陶渊明的爷爷——率军北伐，消灭匈奴人建立的赵国，表示鲜卑族愿为北方接应。然而计划没有执行，陶侃和慕容廆就先后去世了。

二

任何事业的开创都离不开伟大人物的领导。如果伟大人物不止一个，就面临着谁是领袖的选择问题，毕竟最高领袖只能有一位。

对于迅速崛起的少数民族来说，艰苦的环境和复杂的斗争能够锤炼许多领袖级的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崛起之时总是人才济济，于是也就面临着领袖之争。上天眷顾慕容家族，赐予了他们精明强干的头脑。遗憾的是，慕容家族在立国后就爆发了骨肉猜忌的内讧。

慕容廆病逝后，世子慕容皝即位。慕容皝猜忌庶长兄慕容翰的功绩和能力，慕容翰于是投奔了宿敌段氏。段氏大喜，拥慕容翰与慕容皝争国。段氏鲜卑的军队很快涌入慕容部的土地。眼看慕容皝即将大败，慕容翰不忍祖国灭亡，与段氏临阵泪别，跑到宇文部装疯行乞，流落街头。段氏鲜卑由胜转败，慕容皝则转忧为喜。

那一边，同是慕容廆之子的慕容仁和慕容昭看到慕容皝迫害慕容翰，心里不能不有所想。他俩都是经历过刀枪剑雨的人，决定杀掉慕容皝，既为自保，也为权力。慕容皝察觉后，先下了手，将两位同胞兄弟杀死。

经过这件事情后，慕容皝开始想念哥哥了。他派人将慕容翰接回了本国。慕容翰不计前嫌，为弟弟歼灭了宇文部鲜卑，并东败高句丽。随着哥哥功绩和声望日增，慕容皝再次害怕慕容翰会夺位。重燃的猜忌之情迅速膨胀，一次慕容翰受伤在家养病，慕容皝以慕容翰常在家中练剑图谋造反为由，送去毒酒赐死。慕容翰流泪道：“今天我死，命当如此。但是中原还被逆贼占领，国家并不平静，我常常以扫平天下、完成父王遗愿来激励自己，现在不能满足心愿了。命也奈何。”说完饮鸩身亡。

慕容皝死后，其子慕容俊继立。冉魏取代后赵，中原大乱，冉闵又大开杀戒激化矛盾，这给慕容家染指中原提供了可乘之机。349年，慕容鲜卑大举进攻后赵，夺得幽州，迁都于蓟（今北京）。这个发源于辽东的割据政权从此越过了长城，开始进军中原。三年后慕容部击灭冉魏，占有河北，慕容俊正式称帝，定都邺城，国号燕。慕容家

族的第三代人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前燕王朝。前燕在强盛之时，基本继承了后赵除关中之外的其他领土。

前燕建国之后，父辈骨肉猜忌的内讧再次上演。慕容皝的儿子们都能力出众，尤其以慕容俊、慕容恪、慕容霸为最。慕容皝特别喜爱屡立军功的慕容霸，令太子慕容俊非常嫉妒。慕容霸少年时喜欢打猎，有一次从马上跌下来，折断了牙齿。慕容俊登基后，以敬仰春秋时晋人郤缺为借口，命慕容霸改名为“垂夫”，后来又去掉“夫”，定名叫“垂”。“垂”是个非常不吉利的名字，远远不如“霸”字。可慕容霸没办法，只好垂下脑袋听命。慕容俊的老婆吐谷浑皇后以嫉妒强悍著称。慕容垂的结发妻子段氏清廉自守，与丈夫恩爱异常。吐谷浑皇后却寻机将段氏治死，并逼慕容垂迎娶自己的妹妹长安君，而慕容垂竟也喜欢上了段氏的妹妹。恼怒的吐谷浑皇后竟对慕容垂动了杀心。慕容垂不得不委曲求全，韬光养晦，不谈政治，更不去招惹皇帝和皇后。

360年，慕容俊病死，十一岁的太子慕容暉（wěi）即位，慕容俊临死前想把小皇帝托付给慕容恪，可又不信任他，于是试探他说：“我想把社稷交给你。”慕容恪不肯接受。慕容俊假装生气说：“我们兄弟之间何必虚饰！”慕容恪回答：“陛下如果认为臣担当得起天下重任，还怕臣不能辅佐少主吗？”慕容俊这才放心，说：“你能像周公辅佐周成王那样辅佐我的儿子，我就完全放心了。”

新皇登基后，慕容恪以太宰身份辅政。慕容恪被后世称为“十六国第一名将”。在他主政期间，燕国不仅稳固了华北，还一度攻占了东晋的河南、淮北等地，使国家疆域达到极盛。

369年，东晋名将桓温率五万晋军第三次北伐，燕军连败失地。慕容垂临危受命，领兵迎战。他派弟弟慕容德去劫断了晋军粮道，迫使桓温后撤。慕容垂率军追击，在襄邑大败晋军。据说慕容垂在战斗中采用了最早的“拐子马”和“铁浮图”的战术。好在桓温北伐只是为自

己立威，无心再战，逃回江南内斗去了。慕容垂逼退桓温，几乎成了再造国家的功臣。

谁想，慕容垂回到家中得到的却是心爱的段氏已被吐谷浑太后杀死的噩耗，慕容垂品味到了功高震主的危险。好心人还悄悄告诉慕容垂，歹心的吐谷浑太后有将他治死的阴谋。慕容垂只能淡淡一笑，守在家里过起更加谨小慎微的日子。好在他功勋卓著，吐谷浑太后一时难以在肉体上消灭他。

367年，慕容恪走到了生命尽头，临死前对少主慕容暕说：“皇叔慕容垂才能胜我十倍，先帝因长幼的次序，用臣辅政。我死后他可做大司马，号令全国军队。如果那样，我国必能一统天下。”慕容恪又叮嘱慕容暕的兄长慕容臧说：“你们的叔叔慕容垂总统六军。我死之后，以亲疏而言，应该轮到你和慕容冲。你们弟兄虽然才能出众，毕竟年纪还轻，不见得能够挑得起这副担子。慕容垂是人中豪杰，智谋无人能及。你们若能推举他做大司马，必能一统天下。你们千万不要贪恋官职，不以国家为意。”弟弟慕容评来探望，慕容恪再一次推荐慕容垂，认为如果不加重用，恐怕对国家不利。少主慕容兄弟和慕容评等人听了慕容恪的话，却没有遵守。慕容恪死后，皇叔慕容评主政，慕容臧、慕容冲兄弟掌权。

当时的北方格局是前燕和前秦东西对峙。前燕的领土和人口都超过前秦，势力强于前秦。慕容恪死后，前燕国势江河日下，这主要是统治阶层无能造成的。主政的慕容评能力平庸，横征暴敛，百姓连喝水都要交税。贵族官僚大量占有庇荫户，总数超过国家控制的户口，致使国家的赋税徭役减少，府库空虚，士气低落。前燕在短短几年后败落。慕容评等人还将慕容垂看作潜在的权力威胁，一帮人整天想着如何谋害慕容垂。慕容垂决定效仿伯伯慕容翰逃亡，他本意是逃往老家龙城，但没有成功，不得不带着儿子慕容令、慕容宝等投奔了燕国的敌人前秦。

可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只算是慕容垂传奇人生的前期。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他作为主角的表演。

慕容垂投奔的前秦，国势蒸蒸日上。370年，前秦苻坚命王猛率大军攻燕，以慕容垂为先锋，攻破邺城，俘虏慕容，灭亡了前燕。北方进入了前秦的短暂统一时期。

那个叫王猛的猛人

—

后赵席卷中原的时候，青州北海郡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诞生了—一个名叫王猛的汉族人。身逢乱世，王猛年幼即随家人颠沛流离，辗转黄河南北，最后在魏郡（河南河北交界处）住下。

王猛家贫如洗，为了糊口，很小就对外贩卖畚箕。苦难是一所大学，王猛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困境中学会了读书认字。他喜读兵书，学的都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没有沾染上魏晋士人普遍的清谈务虚的风气，性格又有些清高孤傲，而那些口若悬河的名士都看不起出身低微又不合群的王猛。不过就好像那些伟人卑微时总能得到神助一样，王猛虽然不被世俗所喜爱，却得到了世外高人的支持。

传说王猛在洛阳卖畚箕时，一个人要出高价买他的畚箕，因为身上没带钱，请王猛跟他到家里取钱。王猛跟着那人走，一直走到深山里，看到一位须发皓然、侍者环立的老翁。王猛向老翁揖拜，老翁连忙说：“王公，您怎么好拜我呀！”那老翁给了王猛十倍于常价的畚箕钱，还派人送行。王猛出山后，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中岳嵩山。

长大后，满腹经纶的王猛很希望能够有施展的舞台。当时，后赵统治着北方大部分地区。王猛来到后赵都城邺城，观察有无入仕的可能。羯族统治者和达官显贵们都瞧不起出身卑微的汉族求职者，王猛

屡屡碰壁。唯独侍中徐统“有知人之鉴”，觉得王猛与众不同，召他担任自己的功曹。王猛见后赵政权逐渐荒淫，统治者并没有得到百姓的支持，对后赵失去信心，拒绝了徐统的征召，前往华山隐居。在华山，王猛静观世间风云变幻。

不久，后赵政权果然崩溃，东部为前燕取代，关中地区被氏族的前秦政权攻占。354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打败关中的苻健，驻军霸上，与汉人旧都长安仅有一步之遥。关中父老夹道欢迎晋军收复失地，争以牛酒劳军。王猛毕竟是汉人，心中倾向出仕东晋，可又不知道东晋朝廷和桓温的虚实。于是，他身穿麻布短衣，径直前往桓温大营求见。

桓温是一代名士，在待人接物方面有其过人之处。他认真接待了王猛，还请王猛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只见王猛在大庭广众之中，坐在席上一边捉掐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滔滔不绝，旁若无人。桓温暗暗称奇，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统率十万精兵北伐逆贼，为苍生除害，而关中豪杰却无人效劳王师，这是何缘故呢？”王猛直言：“桓公不远千里深入敌境，离长安城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攻城。关中豪杰摸不透您的心思，所以不来。”王猛的话，戳中了桓温的心事。桓温北伐本心并非要解救北方百姓于异族统治和战乱频仍的水火之中，而是想借北伐来提升自己的名望和实力。他之所以没有进攻苻健固守的长安城，就是不愿消耗实力。听了王猛的话，桓温默然良久，无言以对。最后，桓温对王猛感叹道：“江东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的见识啊！”

因为军中乏食，士无斗志，桓温很快就退兵了。临行前，桓温赐王猛华车良马，授予他都护官职，邀请王猛一起南下。王猛知道在世族横行的东晋自己很难有所作为，追随桓温必将因助其篡晋而落下污名，于是他再次拒绝官职，回华山继续隐居读书。

几年后，前秦尚书吕婆楼把王猛介绍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不能向

王猛许诺任何东西，王猛却毅然出山与他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这个人就是苻坚。

二

苻坚是氏族酋长苻洪的孙子。后赵灭刘曜攻占关中后，迁徙了氐、羌共十万余户以充实关东地区。后赵政权任命本民族酋长为首领加以羁縻，苻洪就是氏族的流民都督，率氏族百姓徙居枋头（在今河南浚县西部）。石虎统治后期，不得不借助苻洪等少数民族的力量来维护统治。苻洪大约在这个时候组织起了氏族的武装。石虎死后，冉闵杀戮少数民族，苻洪一度投降东晋。他在冉魏的压力下无法在东方立足，就率领关中流民西归故乡。途中，苻洪被人杀死，其子苻健继领部众，西入潼关。关中氐人纷起响应，苻健很快就攻占了长安，割据关中。永和七年（351），苻健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历史上称之为前秦。

前秦的建国基础非常差。首先，氏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之所以能够迅速在关中建国，主要是在后赵大乱、关中空虚的情况下得了便宜。前秦建立后，关中其他势力群起反对，统治极不安定。境内偏偏又连续遭遇饥荒和蝗灾，草木凋敝，牛马饿死。建国第三年，东晋桓温大举北伐。苻健率军迎战不利，退缩回长安固守，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抢收庄稼，封剿物资，希望能逼退桓温。桓温很快退却了，苻健又花了很大力气去镇压境内的反抗。355年，苻健病重，临终前嘱咐太子苻生：“六夷酋帅和执政大臣，如果不听你的命令，可把他们杀掉。”苻健的遗嘱是在国内动荡、统治不稳的情况下说出的，自然有他的现实考虑。偏偏苻生性格残暴，喜好武艺，误将父亲的遗嘱理解为是要他严苛暴政，因此即位后凶残无比，激化了矛盾。

丞相雷弱儿为人刚直，在朝堂上批评苻生的亲信，苻生竟将他及他的九子、二十七孙全部杀死。苻生身体不舒服，让太医令程延诊治。程延说苻生吃枣子太多吃出问题来了。苻生大怒：“你怎么知道我吃枣子！”立即命人将程延拉出去斩首。一次宴会，气氛不太好，饮酒的宾客不多，苻生借口在宴会上做酒监的尚书令辛牢劝酒不力，当场一箭将辛牢射死。苻生梦见大鱼吃蒲（苻氏本姓蒲），又听说长安有民谣说“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就把太师鱼遵及其七子、十孙都杀了。诸如此类，劣迹斑斑。

苻生的杀戮完全没有标准，只要对谁起疑心或者谁忤逆了他的意思，他就毫不犹豫地杀谁。大臣为他好，劝他几句，苻生就以诽谤的罪名杀之；大臣讨好他，说他的好话，苻生认为这是献媚，杀之。为了杀人方便，苻生接见群臣时，旁边的武士弓上弦、刀出鞘，自己则把锤、钳、锯、凿等放在手边，随时准备杀人。最后，朝中人人自危，都希望苻生早死。

这时，前秦最重要的人物苻坚出场了。他不仅希望苻生早死，而且要取而代之。

苻坚是苻生的堂弟，受封东海王。两人性格迥然不同。苻坚汉化比较深，为人温文尔雅，从小就受爷爷苻洪的喜欢。他八岁的时候，突然请求苻洪聘请两位家庭教师教导自己。苻洪惊喜地说：“我们氏族人从来只知喝酒吃肉，如今你有心向学，实在太好了。”他给孙子请的老师教授的是汉族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苻坚学习后，期待着自己也能做个开创盛世的明君。

苻坚见苻生残暴，有心推翻他，可惜力量单薄。于是找尚书吕婆楼商议对策，吕婆楼就推荐了王猛，夸王猛是世间少有的奇才，得他相助可以成就大事。苻坚通过吕婆楼把王猛请到了府里。他们二人虽然没有刘备访诸葛亮“三顾茅庐”的曲折，却像刘备和诸葛亮一样一见倾心，宾主畅谈甚欢。两人在拨乱反正、发展经济和统一天下等问题

上不谋而合，苻坚对王猛的认识、才能和品格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直呼自己发现了第二个诸葛亮。王猛也为苻坚的抱负和设想所吸引，答应结束隐居，辅佐苻坚一起闯荡天下。

就在苻坚积聚力量准备政变的时候，苻生似乎嗅到了什么味道。升平元年（357）六月的一天夜里，苻生睡觉前对侍婢说：“苻法、苻坚兄弟也不可信任，明天要把他们杀掉。”侍婢痛恨苻生，连夜跑出来把消息泄露给了苻坚。苻法是苻坚的哥哥，受封清河王。兄弟两人一合计，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不能再犹豫了，就算力量不够也要孤注一掷，拼死一搏。

于是，清河王苻法、东海王苻坚领头造反，率领几百人就向皇宫杀去。原以为这是一次以弱搏强的冒险，可是苻生早已人心尽丧，积怨潜伏，就差有人挑头点火了。苻坚等人很顺利地冲进了皇宫，宿卫将士们自动放下武器，有的还倒戈参加了苻坚的政变。苻生当晚喝得酩酊大醉，睡得正熟，听见喧闹，迷迷糊糊醒来，还没弄清楚状况就被人绑了起来。苻坚宣布将苻生废为越王，软禁起来，不久就将他和他的亲信党羽都杀死了。

政变成功后，苻法和群臣都拥戴苻坚为帝。于是苻坚即位，为前秦第三代君主，他以王猛为柱石，开始大展拳脚。

三

关中屡经战乱，前秦领土小而百姓疲弱，在与前燕、东晋等政权的对峙中处于劣势。前秦内部政治黑暗，权力分散，法令不通；社会缺乏公正，豪强横行，普通百姓赋役繁重；自然灾害频发，田地荒芜，乡村颓废。种种不利导致官民对前秦政权普遍缺乏信心，氏族的

统治很不稳定。说不定，前秦也会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割据王朝。

苻坚与王猛面对困难重重、矛盾纷杂的前秦局面，选定的下手点是整顿吏治。他们认为一切的困难和矛盾都需要官府去解决，所以官府本身的巩固与否、效力强弱直接关系到国政的施展。只有先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进行其他创举。而整顿的具体方法，就是“治乱世用重典”。王猛上任之初就杀戮不法豪强。苻坚有些动摇，询问王猛：国家本来就不稳定，百姓持观望态度，骤然杀戮过重是否对国对民不利？王猛认为，国家贫弱人心不附，恰恰是因为之前政府力量不足，没有让天下百姓看到朝廷的实力与决心。现在要拨乱反正，压制豪强，非下猛药不可。苻坚表示赞同，放手让王猛去“下猛药”。

姑臧侯樊世是跟随苻健杀入关中、建立前秦的氏族豪强，与苻氏关系密切。他自恃资历老、功劳大，对苻坚重用王猛非常不满，曾当众骂王猛：“我辈和先帝共兴事业，如今大权旁落。你没有尺寸之功，怎么能执掌大权？这样岂不是我种了田地你收庄稼！”樊世在朝堂上和苻坚说话口气强硬。一次，王猛在旁指责他没有君臣之分。樊世与王猛吵了起来，大发雷霆，竟然捋起袖子就要殴打王猛。被人拉开后，樊世气呼呼地大骂：“不把王猛的脑袋挂在长安城门口，我决不罢休！”苻坚大怒道：“必须杀掉这个老氏，才能整肃百官。”苻坚命令将樊世立即斩首。樊世被杀后，氏族贵族常向苻坚告王猛的状。苻坚一概斥责，甚至在朝堂上鞭打告状之人，公开表示对王猛的支持。从此，前秦公卿以下官吏都畏惧王猛，不敢对他的施政指手画脚了。朝堂为之肃然。

为了压制豪强，王猛兼任京兆尹。光禄大夫强德仗着是太后的弟弟，酗酒豪横，掠人财货、子女，是长安的一大祸患。王猛一上任就抓捕强德，根本不向苻坚禀报就将其杀死，陈尸大道。苻坚得知强德被抓后，连忙派使者前来赦免。可等使者到的时候，强德已经身首异处了。御史中丞邓羌很赞同王猛的强权治理，与王猛通力合作。两人

疾恶纠案，无所顾忌，数旬之间杀戮豪强贵戚二十余人。此后，豪强纷纷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再横行乡里，更不敢与官府作对。王猛施政旗开得胜，前秦王朝权威骤然上升，迅速实现了政令畅通。苻坚感叹道：“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政治改革成功了，王猛迅速着手其他方面的改革。作为统治民族的氏族，文化水平较低，即便是当官的氏族人也许多大字不识几个。苻坚和王猛在统治区大兴文教，恢复儒家思想教学，收氏族和其他民族子弟入学。前秦还规定，俸禄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须“学通一经，才成一艺”，不通一经一艺者，一律罢官为民。自八王之乱以来，北方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倡文教。通过这样的强制措施，前秦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苻坚和王猛还非常重视农业。苻坚招揽流民，鼓励百姓安定下来，从事耕种。为了给百姓安居乐业创造条件，苻坚“与民休息”，尽量不打扰百姓。前秦征发贵族豪强的仆役荫户三万多人，在关中兴修水利，让关中许多荒废的田地重新得到灌溉。苻坚更是亲自参加耕种，他的皇后则在长安郊区开辟田地养蚕，以作天下的表率。

除了政策得当外，王猛的执政风格也值得称道。首先是公平，王猛对跋扈横行、贪赃枉法之人毫不手软，自己也绝对做到了廉洁自律。即使身居相位，依旧克己奉公，生活俭朴，从不骄横凌人，让人抓不住把柄。其次是高效，王猛通过派遣巡查使者，掌握地方情况和政策落实的情况，及时做出反馈。他本人精力旺盛，工作勤勉，从不让政务拖沓，白天决定的事情晚上就开始推行。关中良相唯王猛，他被公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最杰出的丞相。

经过苻坚和王猛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前秦出现了国富民强、安定清平的局面。史载，当时秦境“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贾贩于道”。百姓歌唱道：“长安大街，杨槐葱茏；下驰华车，上栖鸾凤；英才云集，

悔我百姓。”关中地区迎来了十六国期间最稳定和繁荣的时期，而“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前秦：我统一北方了

—

一个政权向外扩张要建立在国内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前秦国内情况的好转和实力的增强，苻坚开始迈出统一天下的步伐。

天下大乱之时，豪杰枭雄拉起数千人马便能纵横州县，因为大家的力量半斤八两，都在低水平上徘徊，谁都吞并不了谁。可一旦遇到统治坚固、兵强马壮的政权，这些草台班子不是四散解体就是缴械投降。

前秦衰弱的时候，割据各地的小政权不少。王猛大治秦国，小的割据政权自忖混不下去了，纷纷主动投降。匈奴刘氏部、乌桓独孤部、鲜卑拓跋部等就先后降服前秦。367年，西部羌族叛乱，前凉君主张天锡想浑水摸鱼，出兵扩大地盘，结果王猛亲自率兵平叛。王猛年轻的时候最喜欢读的就是兵书，行走各地也常常设想如果自己是指挥官，在本地该如何布阵攻守，所以王猛不仅是治国的丞相，更是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主帅。张天锡偷鸡不成蚀把米，和叛乱的羌族一起被王猛杀得大败。王猛斩首前凉官兵一万七千级，张天锡缩回河西走廊，奉表向前秦称臣。前秦的外部形势大为好转。

话说苻坚的皇位是从堂兄苻生手里夺来的。苻坚为人宽厚，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好品格，但在政治上不一定是好事。苻生被杀后，他的弟弟晋公苻柳、赵公苻双、魏公苻廋（sōu）、燕公苻武四人分别镇守地方。他们四人镇守的都是要冲，直接掌握军队，威胁着苻坚的统

治。王猛力劝苻坚除去苻柳等人。苻坚念及堂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没有采纳。

王猛在西北与张天锡作战的时候，苻柳在重镇蒲坂起兵反叛，苻双、苻廋、苻武三人也宣布叛乱。四位公爵同时起兵，气势很大，扬言要一举攻下长安，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第二年（368）春，王猛从容率军前来讨伐。苻柳以割让要地陕城（今河南三门峡）给前燕为筹码，向前燕借兵。当时前燕由慕容评掌权。慕容评才能平庸，主动放弃了这么一个借前秦内讧获利的良机，回复道：“我等智略，非太宰（指慕容恪）之比，能闭关保境足矣，平秦不是我等之事。”苻廋则写信向慕容垂和皇甫真等明白人求救，说苻坚、王猛都是人中俊杰，前燕君臣不早日取之，只怕日后追悔莫及。慕容垂知道苻廋所言极是，可惜他在前燕自身难保，哪里还能左右出兵大事？

苻柳主动迎战，王猛高挂免战牌。他以为王猛怯战，对王猛掉以轻心，留下儿子守城，自己亲率精锐偷袭长安。王猛侦知情报，暗中派邓羌设伏，将苻柳精锐杀得丢盔弃甲，只剩数百骑逃回蒲坂。苻柳主力损失殆尽，无力坚守。城破后，苻柳被杀。其他三位公爵也被各个击破，陆续被杀。苻廋被俘后，苻坚亲自审问他为什么造反。苻廋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弟兄都谋逆造反了，臣怕受连累而死，索性一起造反。”苻坚赐他自尽，没有株连其他人，连苻廋的儿子也被赦免了。这也是苻坚宽厚的一种体现。

四公爵叛乱被平定后，前秦内外肃清。苻坚、王猛开始四出攻伐敌国，而头号敌人就是东方的前燕。

前燕的基础比前秦好得多，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却远远落在了前秦的后面。这里面除了苻坚和王猛治国有方的原因外，另一大原因是前燕内讧。慕容家族的第二代子孙慕容皝、慕容翰内讧过，第三代则内讧得更过分，导致一代枭雄慕容垂被排挤去了前秦。而掌权的慕容评等人才能平庸，国内民族和经济矛盾重重，人心不稳，士气

涣散。前秦正想着如何吞并前燕，南方的桓温又开始北伐了。这就给前秦创造了机会。

369年，桓温北伐的主要目标是前燕，进展非常顺利，七月就攻至枋头，燕都邺城震动。前燕皇帝慕容暕求救于前秦，答应割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西领土给前秦。前秦的多数大臣目光短浅，反对救援前燕，对前燕败于桓温幸灾乐祸。王猛则认为前秦和前燕唇亡齿寒，如果坐视桓温消灭前燕，则前秦大事不妙。他向苻坚建议先出兵与前燕击退晋军，然后乘前燕战后虚弱、缺乏防备再吞并它。苻坚采纳王猛的意见，出兵联合前燕与东晋北伐军作战。九月，燕秦联军大败晋兵，桓温败归南方。战后，前燕毁约，不愿割地给前秦。王猛要的就是一个借口，前秦借此大举讨伐前燕。

370年，秦军包围秦燕交界处的重镇洛阳。洛阳燕军斗志全无，开城门投降。370年夏，王猛统帅杨安等将领，率兵六万大举伐燕。前燕慕容评率兵三十万迎战。面对着五倍于己的强敌，王猛采取四处出击的战略，掌握了主动权，一举攻下太行山口的要塞壶关。杨安则北上进攻晋阳。晋阳有重兵把守，杨安连攻两月没有攻克，王猛率军驰援。他见晋阳城墙高大坚固，于是改变策略，督促士卒连夜挖通地道，输送壮士数百人潜入城中。约定时间，城内伏兵鼓噪而出，杀尽守门兵丁，打开城门迎大部队入城。偷袭成功，秦军迅速占领晋阳，俘虏前燕王公和官兵无数，动摇了前燕原本就不坚定的抵抗之心。

慕容评的主力裹足不前，王猛不给慕容评喘息的机会，率得胜之师迅速南下，逼慕容评进行主力决战。慕容评判断秦军孤军深入，不能持久，想拖垮秦军。谁知王猛一心要速战速决，挑选五千精锐骑兵偷袭燕军辎重，放火烧了个精光。这把火瓦解了燕军的士气，连坐守邺城的慕容暕都看不下去了，派人严责慕容评。慕容评平日巧取豪夺、贪赃枉法，聚敛了大量财富。慕容暕严令他將财富散发给士兵，鼓舞士气，然后迫令他出战。外有圣旨逼战，内无隔夜粮草，慕容评想不决战都不行了，仓促决战的结果就是燕军大败。慕容评只带少数

亲随逃回邺城，而王猛长驱东进，包围了邺城。

当年十一月，苻坚以投降的慕容垂为前锋，亲率十万精兵与王猛会师，准备对邺城发动最后攻势。慕容暉、慕容评弃城逃走，大臣开门投降。秦兵占领邺城后，追上慕容暉将其俘获。慕容评逃到高句丽，被高句丽捆绑起来送给了前秦。至此，前燕灭亡。

灭亡前燕后，前秦用兵西方。当初大败张天锡时，前秦俘虏了前凉官兵五千人。如今，王猛将这些俘虏全部放回凉州，并捎给张天锡一封亲笔信。在信中，王猛分析了天下形势：前秦已经基本统一北方，铁骑数以十万计，而前凉割据河西一隅，早已元气大伤。王猛为张天锡的利益考虑，劝他纳土归降。张天锡本是小国之君，就怕遇到独步天下的大国，如今偏偏就遇到了蓬勃兴旺的前秦。他寝食不宁，翻来覆去了几天，觉得王猛的建议是最现实的方法。于是向前秦投降，前凉灭亡。

前秦和平获得了河西之地。在此基础上，382年，苻坚又命将军吕光率军经营西域。吕光攻破焉耆、龟兹等三十六国，剿获大量珍宝和马匹，自东汉以后再次将中原王朝的统治延伸到了西域。

在西南方向，前秦也有“意外收获”。在西部，前秦和东晋原本没有直接对峙，中间隔着一个杨氏仇池政权。仇池杨氏原本也是氏族的一个分支，早在蜀汉和曹魏争斗时期就游离在蜀魏之间，西晋末期占据现在甘肃南部和四川北部一隅，割地为王。其国甚小，不包括在十六国之内。前秦强盛后，于371年灭仇池。屏障一去，东晋的梁、益二州就直接与前秦对峙了。

与前秦相比，东晋梁、益两州的情况不太乐观。桓温擅权引起了东晋内斗。梁州（主要在今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和益州（四川大部）远离东晋政治核心，朝廷无暇顾及这一地区。和前秦军队的生龙活虎相比，对峙的晋军长期武备不修、城池破败。东晋梁州刺史杨亮守土有责，

终日满脸愁容，不知如何是好。杨亮认为原仇池地区是南北拉锯的屏障，关系汉中存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出击。于是，在373年主动对前秦发动进攻，试图夺取仇池地区。前秦的梁州刺史杨安反击，打败晋军。

晋军冒险行动失败后，引发了恶劣的连锁反应。梁州各郡县长官闻风而逃，引得前秦军队杀入梁州。苻坚敏锐地把握住机会，将这个边界小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加派兵力分路南下，志在夺取巴蜀。其中一支秦军进攻汉中。杨亮纠集残军和本地少数民族军队再战，再败，汉中失守。梁州被前秦占领。另一支秦军直扑四川的北部天险剑阁。剑阁由晋梓潼太守（今四川绵阳）周虓（xiāo）防守。周虓文人出身不懂军事，只知道防守郡城，竟然没有派兵扼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导致前秦军队顺利通过天险，包围梓潼。兵临城下，周虓首先想到的是一家老小的安危，竟然率军放弃城池，保护老母幼子夺路向湖北逃去，途中为秦军所俘，周虓投降。

东晋在川北形势急剧恶化，益州的东晋官吏也闻风而逃，秦军兵不血刃开进成都。东晋朝廷令荆州军队救援四川，不想荆州军队胆怯，拖延不前，等到秦军占领四川全境后，终于把救援的任务给拖黄了。反倒是四川军民不满前秦的统治，各地骚乱，起义不断。前秦邓羌、杨安等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真正把四川稳定下来。

至此，前秦基本统一了北方，并占领长江上游地区，疆域达到十六国的极盛。十分天下，秦居其七，剩下的三分在战栗发抖的东晋手中。

就在前秦统一北方的前夜，建元十一年（375）六月，王猛病倒了。

苻坚和王猛的关系，真如鱼水。王猛比苻坚大十三岁，苻坚一直以长辈之礼尊敬王猛。王猛病后，苻坚亲自为他祈祷，并派侍臣遍祷名山大川。七月，王猛病情还是转重，弥留之际对前来探望的苻坚留下遗言：“晋朝虽然僻处江南，却是华夏正统，目前上下安和。臣死之后，陛下千万不可图谋伐晋。鲜卑、西羌等归降贵族终怀二心，是我们的仇敌，迟早要成为祸害，应该逐渐铲除，以利于国家。”王猛还嘱咐其子以十头牛耕田务农，其余一无所求。

前秦上下听到噩耗，哭声震野，三日不绝。苻坚三次临棺祭奠，都恸哭到不能自己。他对太子苻宏说：“上天不让我统一天下，怎么这么快就夺去我的王猛啊！”前秦按照汉朝安葬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最高规格，隆重地安葬了王猛，谥王猛为武侯。这个谥号和蜀汉给诸葛亮的谥号一样，都是国家柱石、勤政无私的意思。

苻坚的成功的确是在王猛的精心辅佐下才取得的，王猛死后，苻坚的许多政治弱点便开始放大。

首先，苻坚为政最大的纰漏就是待敌过于宽松，厚待投降和被俘的各割据政权统治者。前凉还没投降的时候，苻坚就为张天锡造好了府邸，等着他入住。张天锡投降后，苻坚立即任命他为尚书，封归义侯，没有丝毫防备。

却说这个张天锡在前秦崩溃后又投奔东晋，因为张家割据凉州始终以晋臣自居，东晋朝廷将张天锡树立为政治花瓶。然而张天锡在“祖国”东晋的处境和生活质量都不太好，远不如在前秦时。不过他总算是十六国亡国之君中唯一一位得以善终的。

又比如前燕灭亡后，慕容等皇室成员都在长安担任了新职，其中慕容暉受封新兴侯，全家人依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慕容暉的母亲

死了，苻坚竟然以燕国皇后之礼安葬；入宫做了苻坚妃子的燕国清河公主很得苻坚的宠爱，“宠冠后庭”。羌族姚氏政权进攻前秦失败，姚萔不得不率部投降，苻坚也允许他继续统领旧部，还予以安置。其他政权亡国宗室的待遇也大抵如此。

害人之心的确不可有，对被俘或者投降的敌人也应该慈悲为怀，这都没错，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但苻坚为人过于宽厚，一点儿都不防备身边的旧敌，还让他们出任官职掌握军队，这就埋下了日后帝国崩解的隐患。

其次，苻坚在民族政策上处理失误。氏族在五大胡族中人少力弱，要统治广大的北方地区实属不易。为了巩固统治，苻坚采取迁徙氏人分镇四方的政策。他消灭其他割据政权后，将被征服的鲜卑、乌桓、羌等民族十万户徙至关中，一来充实京畿地区，二来也便于控制。同时，苻坚将关中氏族十五万户移至关东，安置在各个要镇，以此来加强对新征服区的控制。这一进一出，本意是好的，但客观上分散了原本就薄弱的氏族势力。苻坚所能依靠的本民族力量本来就有限，如今又被分散了，一旦遇到反叛就难以集中力量。在前秦国势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隐患不会暴露出来，和前一个隐患一起潜伏着。国势一旦衰微，两大矛盾一起爆发，就会要了前秦的性命。

最可怕的是，没有了王猛的辅佐，苻坚开始“圣心独断”，383年，一意孤行，倾全国之力南征，终于爆发了淝水之战。

现在，我们把北方的局势暂且放到一边，把目光投向南方，将时间拉回到几十年前，看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政局发展和社会变迁，看看南方和北方是如何在淝水之战中迎头相撞的。

陶侃与江南骚乱

—

北方和四川陷入混乱的同时，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某些人也在蠢蠢欲动，图谋独立。与北方因为皇室内讧和少数民族入侵造成的分裂不同，南方的分裂倾向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南方第一次滑向分裂边缘是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即北方八王之乱高潮之时。为了镇压四川李氏兄弟领导的流民起义，荆州（今湖北湖南大部）官府强征青壮年入伍去四川作战。百姓们都不愿意去，官府却只知道一味催逼。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张昌趁机纠合那些不愿远戍的百姓，再笼络南下荆州要饭的北方流民，揭竿而起。张昌顺利地打败荆州官兵，占领了江夏郡，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

有记载说张昌是“义阳蛮”，认为他是少数民族。张昌的军队装束很奇怪，将士们都头戴红帽，拿马尾当胡子挂在脸上，很有少数民族特色。但张昌即便真的是少数民族，也是汉化很深的少数民族后裔。他的祖父在州县为吏，张昌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完全是汉族式的。他改名李辰，鼓吹“会有圣人出来为民之主”，然后找到做过县吏的丘沈，让他改名为刘尼，诈称汉室后裔，立为皇帝。张昌自己做相国，正式开朝建国了！

趁南方空虚，张昌政权四方攻略，扩大地盘。他亲自北上，进攻襄樊和宛城，杀死司马懿的孙子新野王司马歆；部将陈贞向南下攻陷武陵、零陵、长沙、武昌（今湖北鄂州）、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另

一个部将石冰东进，在长江下游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至此，张昌政权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许多州县，俨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割据政权。

南方糜烂，眼看将不为朝廷所有，西晋王朝紧急任命年长而干练的大臣刘弘为荆州刺史，全权负责镇压张昌。

刘弘主要干了两件事：第一是与民为善，消除百姓对朝廷的不满情绪；第二是破格提拔了庐江浔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陶侃，这件事深刻影响了东晋早期的历史。

陶侃，出身寒门，少年丧父，家境至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非常坚强，对陶侃管教很严，日夜纺织甚至割发卖钱培养儿子，希望儿子能够有所作为。陶侃从小严肃勤勉，自强不息，好结交朋友。尽管能力出众、名声在外，却因为出身低贱，只能出任一些杂役闲差。他先是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过县主簿，又去洛阳四处求官，受到侮辱，后来补任荆州南部的武冈县令。此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了，他自觉命运不济，加上与太守关系紧张，便弃官回家；此后还当过郡里的小中正。

刘弘知人善任，平地一声雷，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大都护，领兵攻打张昌。陶侃连战连胜，张昌败亡，荆州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刘弘非常高兴，对陶侃说：“我从前在羊公（羊祜）手下做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会做到他当时的官职。现在看来，你会做我的后任。”陶侃时年已经四十五岁，刚崭露头角，算是高龄了。

张昌余部石冰还在江东一带发展。西晋建立后，原先东吴的世家大族纷纷在江东占地自守，保存了强大的实力。如今他们纷纷起兵，自发与石冰作战。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江东大族中的“强宗”。周氏代表周玘（qǐ）联合另外两个大族贺循、甘卓一齐起兵，攻杀石冰委派的官吏和军队，迫使石冰向北发展，进攻淮南重镇寿春。

镇守寿春的征东将军刘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陶侃的同乡陈敏和陶侃一样廉洁能干，可惜出身低微，在郡吏位置上沉浮。当时，陈敏恰好在寿春运粮。他自告奋勇，组织运粮兵，再整合从刘准手里要来的部分正规军，迎战石冰。陈敏指挥得当，作战勇敢，镇压了石冰的军队，朝廷任命他做广陵相。

如果说张昌、石冰的造反还属于传统农民起义的范畴，那么，南方接下来的又一场大乱则是有着明确政治意图、影响广泛的“独立运动”。

立下大功的陈敏本身也是个野心家，能干又有地盘。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用陈敏做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不看好司马越，借口回江东扩充军队，于当年十二月攻占历阳（今安徽和县），公开反晋，派兄弟陈恢与钱端南取江州（今江西、福建、鄂南），兄弟陈斌东取长江下游各郡。西晋官吏望风而逃。

陈敏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割据江南，恢复东吴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东吴的建立者孙坚父子就是趁北方大乱，夺取江东各郡为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陈敏对南方各地以“恢复故国”相号召，网罗江东的豪杰、名士，并予以礼待。西晋统一后对南方的歧视导致南方各个阶层，尤其是在新王朝仕途不顺的士人阶层，普遍对东吴政权有所留恋，倾向趁北方大乱重新独立。

大族甘卓主动向陈敏示好，把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并称“江南三俊”，在洛阳很不顺利，如今欣然接受了陈敏政权右将军的任命；贺循、周玘两人虽然装病观望，没有加入反叛队伍，但也没有起兵镇压，默认了陈敏对江南各地的占领。江东既定，陈敏自封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建立了“楚”政权，加九锡，为称帝做准备。

陈敏安抚了江东地区，只是恢复了东吴一半的领土，上游的荆州

还在刘弘的控制下。陈敏既以复国相号召又要保障江东安全，计划集中精锐攻取荆州后再登基称帝。陈敏西进的第一关就是江夏郡，而江夏太守恰好是陶侃。考虑到陶侃和陈敏是庐江老乡，荆州许多人担心陶侃不可靠。荆州刺史刘弘用人不疑，坚决不调离陶侃。陶侃自己也很担心，又不愿意放弃与陈敏鏖战再立新功的机会，就把一子一侄送到刘弘处作人质。刘弘不接受，说：“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陶侃大受感动。

江夏一战，陶侃胜，陈敏败。楚政权的攻势被遏止了。

陈敏的失败并不致命，主力尚存。但失败引起的人心浮动却给他的政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前，江东官民支持陈敏立国，心里多少缺乏底气。陈敏凯歌高奏，会提高大家的信心，而江夏的失败一下子又让大家信心全无。楚政权内部离心倾向又增强了。

永嘉元年（307）二月，原本观望的大族周玘策动陈敏的部将钱广在建邺举兵造反，并诈称陈敏已经被杀。陈敏发兵赶赴秦淮河，把镇压钱广的任务交给了亲家甘卓。顾荣也开始转向反对陈敏，赶来劝甘卓说：“如果陈敏能够立国江东，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到底。但你看现在的局势，他有成功的希望吗？陈敏才能平常，政令反复，子弟骄纵，败局已定。我们如果再接受他的官爵，事败之日我们的头颅就会被送往洛阳，上书‘逆贼顾荣、甘卓之首’，遗臭万年，岂不可耻！”甘卓于是装病，派人接女儿回家，并毁坏秦淮河上的朱雀桥和渡船，宣布讨陈。

陈敏亲自带领一万多兵马和甘卓隔秦淮河对峙。甘卓这边的将士大喊：“我辈为了相信顾丹杨、周安丰（陈敏任顾荣做丹杨内史、周玘做安丰太守）才愿意替陈公出力。现在二公都不跟随他了，你们还跟着他做什么！”陈敏的部下面面相觑，犹豫不前。顾荣走到阵前，拿着白羽扇向对岸挥动。将士们一看果然是顾荣，才相信陈敏已经失去了世家大族的支持，纷纷溃散了。由此可见，江南世家大族们有多么大的号

召力。陈敏见大势已去，单骑逃走，在长江边被杀。陈敏的兄弟和部将也纷纷被地方人士所杀。江东各地很快“反正”，重新“效忠”西晋朝廷。

陈敏死去刚刚半年，琅琊王司马睿来到了建邺。

二

司马睿也是抱着在江南建国的目而来，但是他的起点实在不高。单单从地盘上来说，司马睿占据的仅是扬州一隅。当时长江中下游从上到下依次为荆州、江州、扬州，大致对应现在的两湖、皖赣和江浙。荆州、江州都听命于洛阳朝廷，已有都督或刺史。没有广袤的土地，没有稳固的上游，司马睿想在扬州下游立国是非常困难的。

江州刺史华轶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党羽，差不多和司马睿同时来到南方。他在江州恩威并施，与江州豪杰士人交好，收揽南方逃亡来的官民，史载“得江表之欢心”，丝毫不比司马睿逊色。华轶借口“洛京尚存”，不听从司马睿的指挥，不过华轶本来就是朝廷命官，和司马睿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尽管同属一个派系，司马睿却和华轶势同水火。永嘉五年（311），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西征，统甘卓、周访等人逆江而上，企图武力吞并华轶的势力。

江夏之战后，荆州刺史刘弘病故，陶侃也因为母亲病故辞官服丧去了。一晃几年过去，陶侃丧期满后，投奔了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任命陶侃督护江州诸军事，华轶也需要借重陶侃的声望和能力，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防备下游。担任江州刺史参军的是陶侃的侄子陶臻。华轶与司马睿矛盾公开后，陶臻认为司马睿会战胜华轶，装病辞官，劝说陶侃：“华轶有忧天下之志，可惜才不足，且与

琅琊王不平，恐怕在劫难逃。”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气愤地将陶臻抓起来送给华轶。陶臻中途偷偷跑到建邺投奔了司马睿。

为了争取陶侃，司马睿任命陶侃为奋威将军，给予“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的待遇。当时朝廷政令不通，藩镇长官各行其是，人事变动向朝廷上表，不管朝廷有没有收到或者同意不同意，都算是既成事实了。陶侃权衡再三，倒向了司马睿阵营，结果导致华轶在王敦等人的进攻面前，兵败身亡。事后陶侃升为龙骧将军，实授武昌太守。

司马睿争夺江州的同时，西边的荆、湘两州（拆分荆州南部为湘州）陷入了杜弢（tāo）之乱。这是继张昌之乱、陈敏之乱后的第三次南方大乱，再次几乎分裂了南方。

四川大乱后，大批巴蜀居民东迁避难，有好几万人进入荆湘二州。流民常和本地人发生摩擦，又受官府歧视，就推四川人李骧（与成汉政权李雄的叔父同名同姓）为首起义。当时的荆州刺史王澄，是王衍、王戎、王敦等人的族兄弟，是个能说会道却不知军务的公子哥儿。流民起义最初规模很小，遭到各地方官府的镇压，李骧不得不向王澄投降。这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但王澄画蛇添足，假意答应流民投降，暗中乘其不备偷袭起义军，并株连百姓，屠杀了八千多名流民。流民更加怨恨，于永嘉五年（311）正月再次推举成都人杜弢为首，在湘州起义。

杜弢领导起义，完全是局势所迫。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晋朝的县令，本人是地方秀才，那时的秀才一州才能推举一人，也是个人才，因避四川战乱才迁居荆州。李骧领导第一次流民起义时，杜弢是醴（lǐ）陵县令，率军镇压起义。如今杜弢却被流民推举为起义的领导人，真是命运多变。他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发兵进攻长沙、零陵、桂阳、武昌等郡。王澄和杜弢作战，屡次败北，却满不在乎。后来原新野王司马歆帐下牙门将聚众起兵，自称楚公；原荆州刺史参军王冲叛变，自称荆州刺史。王澄这个荆州刺史成了空头

司令，仓皇顺江东下，逃亡建邺。司马睿很客气地将他调任为军咨祭酒这样的闲职，任命河南世族周顗为新的荆州刺史。周顗到了荆州，对杜弢之乱束手无策。在江州的王敦于是派遣陶侃、周访、甘卓等进入荆州镇压杜弢。

建兴元年（313），杜弢率军进攻周顗驻地，陶侃前往救援。流民武装擅长远途奔袭和流动作战，不善于硬碰硬的阵地战。杜弢充分发挥这一特点，主动放弃周顗，想趁陶侃大军在荆州的机会奔袭陶侃的大本营武昌。陶侃听说杜弢撤围后，估计他会乘虚去袭击武昌，立即撤军，抢在杜弢前返回，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杜弢的流民武装第一次遭到重创，大败逃向长沙。陶侃派参军王贡到王敦处报捷。王敦喜出望外：“若无陶侯，荆州将非国家所有！”他向司马睿推荐陶侃为荆州刺史。陶侃以卑微的出身，在极端重视家世的晋朝，用短短十年时间升任藩镇首脑，创造了一个奇迹。

陶侃有点飘飘然，而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来临了。胡亢造反时，命原南蛮司马杜曾为竟陵太守。杜曾勇冠三军，身穿甲冑还能在水中游泳，见胡亢猜忌暴虐，连杀部将数人，担心大祸临头，在当年（313）暗中联合王冲杀掉胡亢，并吞了荆州方向的乱军武装。陶侃派去报捷的参军王贡返回时，路过竟陵，不知道是立功心切还是胆大妄为，以陶侃的名义联络杜曾，说服杜曾和王冲火拼，杜曾轻易杀死了王冲。陶侃得知变故，召王贡询问。王贡怕陶侃责怪，不敢去，竟然和杜曾合作偷袭陶侃。陶侃大败，连所乘的大船都被叛军钩住，侥幸跳上一只小舟才得以逃脱。陶侃因这次惨败被革职，但荆州前线实在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将领了，王敦于是让陶侃以平民身份执掌荆州刺史职权。

陶侃面对的敌人，分别是北边荆州的杜曾乱军和南边湘州的杜弢流民。陶侃先北后南，先集中军队讨伐杜弢。他和周访联合，屡战屡胜杜弢，因军功很快恢复了官职。杜弢的流民武装在几年征战中，损失惨重，后续乏力，杜弢于是托旧识南平太守应詹出面斡旋，希望能

投降朝廷，保全性命。杜弢本不愿造反，写的降书言辞恳切优美，司马睿同意了，派使者去受降，还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然而前线众将贪功，仍不断地向流民进攻。杜弢气愤不过，杀掉受降使者，坚持造反到底。直到建兴三年（315）八月，陶侃才击溃流民武装，平定湘州。王贡投降，杜弢逃亡，不知所终。

陶侃镇压杜弢后，乘胜北上讨伐杜曾。杜曾不敢恋战，收拢军队北上，围攻宛城。镇守宛城的是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的荀崧（sōng）。荀崧无兵无粮，形势岌岌可危，想向襄城求救又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年方十三岁的女儿荀灌自告奋勇，率领几十名勇士，在夜幕掩护下缒出城墙，突围而去。她边打边走，最终摆脱追兵，到达襄城求援。同时，荀灌还以父亲的名义，向周访求援。各支援兵到达，杜曾解围而去。这便是“荀灌娘突围求救”的历史佳话。

杜曾和杜弢不同，勇而无谋，没有远略，并不难平定，只需给陶侃等人一些时间。这个时候，官军内部矛盾开始滋生，延误了整个荆州局势。陶侃之前的胜利，离不开王敦的幕后支持。随着陶侃军功鼎盛，声名鹊起，王敦左右的钱凤等人妒忌起来，开始向王敦进谗。王敦对陶侃的信任大打折扣，也产生了猜忌的心理。他召陶侃相见，要解除陶侃的职务。陶侃的部将都劝他不要去见王敦。陶侃还是坚持前往，果然被王敦扣留，后被调出任广州刺史。广州远在南粤，在西晋人眼中是极偏远之地，陶侃的这项任命等于流放。

王敦再任命堂兄弟王廙（yì）为新的荆州刺史。荆州诸将怨恨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竟想杀陶侃。不想，陶侃过来正色对他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说完，坦然自若地去上厕所了。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统兵在外，如果杀害陶侃恐怕再激起周访兵变。王敦这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

陶侃连夜出发，赶赴广州。在广州，陶侃平定了南粤的骚乱，做

了十年的刺史。每天早晨，他都搬一百块砖到室外，晚上再搬回室内。旁人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陶侃说：“我方致力中原，生活太安逸恐怕以后不堪事，所以坚持锻炼。”这便是“陶侃运甓”的故事，当时陶侃已经是花甲老人。

陶侃被排挤走后，荆州将领郑攀、马隽等人为陶侃鸣不平，遭到王敦训斥，便率领军队叛变，加入杜曾乱军。而远在长安的晋愍帝任命的新荆州刺史是一个名叫第五猗的人，恰好赶到荆州赴任。杜曾、郑攀等乱军就拥戴第五猗为刺史，与司马睿势力的荆州刺史王廙作战。局势更复杂了。

建武元年（317），杜曾连战得胜，大军向江陵挺进。司马睿命周访迎战。周访是陶侃的同乡兼亲家，之前和陶侃并肩作战多年，如今领兵八千，在沌阳（今汉阳西）和杜曾乱军激战。从清晨起激战到傍晚，周访军队渐渐不支。周访挑选八百名精兵，亲自敬酒，鼓励大家死战，先静候不动，听到鼓声再行动。杜曾大军涌到周访中军阵前三十步时，周访亲自击鼓，敢死队奋勇出击，大破杜曾，扭转了战况。周访连夜乘胜追击，把杜曾大军打得溃不成军。战后，周访因功升任梁州刺史，担起了镇压杜曾的主要责任。太兴二年（319），周访最终攻杀杜曾，俘虏第五猗。

如何处理第五猗，是个难题。第五猗是晋愍帝任命的官员，在法律上是正牌刺史。周访向王敦求情，希望不要杀第五猗。王敦不听，照杀不误。因为当时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称帝，在王敦眼中，司马睿才是晋室的正宗。

第四章 跷跷板上的东晋

司马睿：这皇帝当得太难了

—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混在森林深处的小灌木则是最安全的，有树荫可以遮蔽又不需要承担风险。西晋末年，皇室内讧，多少皇亲贵胄身首异处、血流满地，司马炎一系的近支子弟更是损失殆尽。而作为皇室远支疏宗的琅琊王司马睿幸存了下来，并发展壮大，在西晋灭亡、北方沦陷以后建国江南，开创了东晋王朝。

琅琊王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晋惠帝、晋怀帝同一辈分。司马睿在皇室中的地位很低。他的爷爷司马伷（zhòu）是司马懿的小妾伏夫人所生（八王之乱中的汝南王司马亮也是伏夫人所生），是庶出的少子，被封为琅琊王。琅琊大约在今天山东临沂地区，是诸葛亮的老家。司马伷就娶了诸葛亮的族孙女为妻。当时社会上流传“牛继马后”，司马懿正在篡夺曹魏政权，认为这是在预示牛氏将取代司马家族，于是对朝廷中的牛氏大臣起了疑心。恰好有个大将叫牛金，不幸被司马懿给毒死了。想不到，“牛继马后”的预言应在琅琊王这一支血脉上，第三代琅琊王司马觐的王妃夏侯氏私通小吏牛氏，生司马睿。后来司马睿

成了东晋皇帝，不正是“牛继马后”吗？司马睿的身世之谜虽然对皇室不敬，却被正经八百地记录在了《晋书》中。

司马睿十五岁承袭了琅琊王的爵位，整个少年时代和大半个青年时代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他既没有血缘优势，又无权无兵，是一系列政治活动的看客。如果说他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身，一直安然无恙。八王之乱前夕，司马睿“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

到永兴元年（304），政治斗争愈发尖锐，司马睿终是被牵涉其中，不能再独善其身。当时晋惠帝被挟持到邺城，司马睿也跟着去了。东安王司马繇劝掌权的成都王司马颖对晋惠帝客气优待，司马颖不仅不听，还把他杀了。司马睿是司马繇的亲侄子，怕遭牵连，赶紧化装逃走。成都王司马颖下令一切关口、渡口都不准贵人通过。司马睿到达黄河渡口时，就被拦住了。情况紧急，幸亏有一个叫宋典的随从急中生智，拿马鞭朝司马睿身上一拂，笑道：“舍长（指看管房子的小吏），官府把你当作达官显贵拘留了，看来你很有贵相啊！”守渡口的官兵信以为真，就把司马睿等人放行了。

司马睿逃亡后，坚定地站到了东海王司马越的阵营。永兴二年（305）司马越授意司马睿去守下邳（pī），并派自己的参军王导给司马睿当助手。王导出身琅琊王氏，是世家大族的子弟，眼光独到，看到天下已乱，决心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友开创新局面，而他找到的这个盟友便是司马睿，他看中了司马睿的低调和没有历史包袱的清白背景。司马睿的封地是王导的老家，他也因此对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史称王导“倾心推奉”，司马睿“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司马睿跟着司马越在洛阳，王导不断劝他脱离洛阳，借口回封国而去东方开辟新局面。于是司马睿决定出镇下邳，王导也跟他一起，两人的搭档生涯正式开始了。王导和琅琊王司马睿同龄，当年都是三十岁。

中原之乱愈加激烈，王导和堂兄弟王敦、王旷（王羲之的父亲） 三

人关在小屋子里，嘀咕了半天，觉得中原局面混乱，无可作为，不如去相对安定的南方东吴古地开辟新局面。于是，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独当一面。司马睿很赞成，向司马越申请移镇南方。朝廷中的王氏兄弟王衍、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二人被司马睿和王导做通了工作，都鼓动司马越同意司马睿的请求。司马越也想给自己在南方安排一个后路，万一北方不济还可以去东南地区栖身，就答应了。没想到司马越很快身死，生前安排的后路成了司马睿的飞来横财。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和王导拉上一众人马，搬到了建邺。

司马睿前往东南，名义上是移镇，其实类似逃亡，带动了北方官民的南逃浪潮，史称“永嘉南渡”。

二

司马睿到建邺时，距离陈敏覆灭才过去半年光景。南方局势也不是一潭静水，世家大族和一般百姓在观望，就看司马睿如何作为。司马睿到建邺大半个月了，竟然没有一个江东士人前来拜访。

建邺是东吴的故都，不是谁坐在这里都能得到东南地区的支持的。西晋平吴后，江南童谣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局缩肉”是对司马皇室的蔑称；“横目”就是一个“四”字，“数横目”就说西晋寿命只有四十年左右；四十年后“中国当败吴当复”。而从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到307年司马睿南下，已经四十年了，恰好天下大乱，很多东南百姓就认为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又有民谣说：“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这个说得更明白，意思是东吴灭亡三十年后将会复国。东吴是280年灭亡的，三十年后就是310年，离司马睿到建邺还差三年。当年陈敏反叛，在东南能迅速

掀起大风大浪，和民心反晋思吴有很大关系。琅琊王司马睿要想在东南站稳脚跟，必须安抚本地人民的对立情绪，首要便是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

西晋王朝分崩离析，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在此长久立足？铁打的州县流水的官，说不定过几年司马睿就会被人撤了，说不定连西晋王朝都不存在了！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这是吴人对北方人的一种蔑称。

东南人心不附，王导着急了。对于他们这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南方土著排斥司马睿就是间接地排斥包括王家在内的南下的北方士人们。司马睿在南方站不住脚，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脚。

于是在南下建邺的一个多月后的三月三日“修禊节”，王导在秦淮河边导演了这么一幕：

司马睿坐在奢华的肩舆之上，在皇家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而来。王导、王敦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其后。整个队伍威严肃穆又不失豪华热闹，将西晋王朝的泱泱皇室风范展现给了当时在江边过节的江南世人。江东的纪瞻、顾荣等著名大族都在江边搭着席位，占着地盘过节。目睹这一幕，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皇室骨肉相残之后竟然还能保持这么威严的阵势；原来司马睿在北方的地位这么高，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支持；原来司马睿等人还知道南方的节日，主动参加，与民同乐。震撼之余，南方士人纷纷拜倒在路旁。司马睿落座后，江东各大族的代表人物也纷纷上前拜见。司马睿、王导等人专门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闻、礼仪、赏赐来说事，那些世代居住在江东的世家大族听得晕头转向，回家后更是纷纷感叹，司马睿这批人不可小瞧啊！

紧接着，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后接到了司马睿的聘书。司马睿一下子征辟了一百六十个幕僚，许诺高官厚爵。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遇到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任用贺循为吴国内史，将东南核心的吴郡托付给本地人治理。纪瞻、周玕、张闿（kǎi）等江东世族也都被委以重任。东吴灭亡后，江东士人的仕途变得很不顺畅。如今司马睿大施恩惠，迅速将士人团结在了身边。史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在这件事中，王导发挥了重要作用。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世族桓彝（yí）南渡过江之初，看到司马睿势力微弱，担忧地对同样南渡的汝南世族周顗说：“我们因为中原大乱才到此间来求生存，不料官府如此微弱，怎么能维持下去！”后来桓彝见到了王导，交谈之后对周顗说：“我刚才见了管仲，再也不担忧了。”这个桓彝只是一个一晃而过的配角，而他的儿子桓温和孙子桓玄，却在之后掀起了惊涛骇浪。

王导在建邺协助司马睿收拾人心，王敦则领兵在外四处攻城略地扩充地盘，扬州、江州、荆州、广州、交州纷纷归附司马睿，南下的其他北方世族共同出力稳固南方政局，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对于北方世族来说，他们内部肯定存在争权夺利和党同伐异，但在北有强敌、南有土著的不利情况下，拥戴司马睿，同心协力在江南一隅打开局面，是维持各自门第和利益最现实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在永嘉南渡之初的几年里，北方世族空前团结。这种团结仅此一回，当局面稳固后，北方世族很快起了内讧，触发了多次内战。

在此空前团结期间，北方世族在江南渐渐站住脚跟，稳定了下来，而土著的江东世族则受到挤压，不再是南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力量。

西晋末期，义兴周氏、吴兴沈氏领衔江东世族，号为强宗；紧随其后的是吴郡四大家张、朱、陆、顾。北方世族初来，都不敢直接和

他们对抗，纷纷避开现在的苏南和太湖流域，深入浙江、江西一带圈地占田，发展势力；其后有会稽的孔、魏、虞、谢四家。这些家族的实力强大，张昌之乱中，石冰侵略江南、陈敏反叛主要是被江东世族，特别是义兴周家起兵平定的。石冰、陈敏之外，有个叫钱璜的人伙同孙皓的儿子孙充，再次企图恢复东吴政权。义兴周家的周玘组织家族力量，配合乡里民兵再次平定了这次叛乱，史称周家“三定江南”。可见江东世族当时力量之强大。

但是江东世族在东吴灭亡后，就没有了统一的组织者，相互之间也没有进行必要的思想沟通，形不成合力。比如义兴周氏往往是有事就组织军队，打完仗后便解散部队，主要目的是保卫乡土，维护家族利益。始终没有一个强权人物成功领导江东世族与西晋朝廷对抗。

也许是为了稳定多次骚乱后的江南，在永嘉南渡初期，江东世族并没有反抗北方世族的南下，坐视他们逐渐站稳脚跟。等到北方世族开始挤压土著势力的发展空间时，江东世族们才开始后悔。周玘被司马睿怀柔任命为吴兴太守，他联络一部分人计划要杀死北方官员，改用南方人士。机密泄露后，司马睿不敢公开镇压，先调周玘为南郡太守，等他离开吴兴后突然改任他为军咨祭酒，不再让周玘掌握实权。周玘最后忧愤而死，临终对儿子周勰（xié）说：“杀我的是诸伧子，能报此仇，才好算我的儿子。”司马睿明知周玘造反，仍然谥他为“忠烈”。周勰继承父志，联络族人阴谋起兵反晋。叔父周札不愿意造反，向司马睿告密。司马睿还是不敢公开镇压，利用周家内部矛盾，采取暗杀手段平息了纷乱。周勰却没有受到惩处，司马睿待之如初，只是日后不再对江东世族委以实权。可见直至此时，江东世族的势力还是强大得让朝廷不敢小觑。

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北方世族在使用笼络策略之余，还采取了分化方法让江东世族自相削弱。王敦亲近吴兴沈家，以沈充为心腹和谋主，后来派沈充带兵消灭了义兴周家。沈充依靠王敦势力做大，一度私铸钱币，还参与了王敦之乱。王敦造反被平定后，沈充被部下所

杀，吴兴沈家转衰。周、沈两家内耗衰落，标志着江东世族力量的下滑。在整个南朝时期，江东世族的实力都处于北方世族之下。

话说司马睿在南方算是安定下来了，北方却出了大麻烦。316年，匈奴人攻陷长安，晋愍帝司马邺投降。司马睿成为仅存的、握有实权的藩镇宗室。残存的晋朝州县，如北方并州的刘琨，南方扬州、荆州、江州的王导与王敦等人纷纷向司马睿劝进，希望他延续晋室血脉。第二年，司马睿在建康（为了避晋愍帝的名讳，建邺改称建康）称晋王，改元建武作为缓冲，东晋开始了。建武二年（318）三月，晋愍帝司马邺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王导赶紧劝说司马睿继承帝位。晋王司马睿顺理成章称帝，史称晋元帝。

据说司马睿刚到建邺的时候，大家一同吃一回猪肉都是奢侈的享受。最好的猪脖颈肉自然是司马睿独享，其他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吃，那块肉因此被称为“禁脔”。十年后，南渡的北方官民完全改变了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司马睿和王导的搭档关系也就升级为了司马睿当皇帝，王导当丞相的政治结构。至此，王导让司马睿势力在南方扎下了根，也让琅琊王家和北方世族在南方扎下了根，奠定了富贵百年的基业。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北伐

—

祖逖（tì），范阳道县（今河北涞水）人，出身官宦世家，性情豁达，争强好胜，喜欢耍手腕，到了十四五岁还大字不识。父亲早死，哥哥们很为祖逖担心，怕他日后破坏官宦世家的名声，或者干脆就当了江洋大盗。尽管家人忧心忡忡，祖逖却很受乡党宗族的好评，因为他轻财好侠，慷慨助人，每次看到有困难的人都大把大把地散发谷帛接济，却假称是哥哥们的意思。

祖逖有成为一代枭雄的潜质。“枭雄”是一个中性词，既可以指那些为朝廷荡平群寇、藩镇一方的重臣大将，也可以指那些流寇四方、涂炭生灵的叛臣大盗。祖逖会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幸亏祖逖长大后心性改变，开始博览群书，加之其记忆力超群，古今军政都能了然于胸，凡是见过祖逖的人，都称他有赞世之才。

祖逖开始当官，不过都不是正经八百治民办公的官职，而是些参军之类的职务，频繁进出各个王爷和权臣的幕府。他长于处理重要或者棘手的事务，而不善于坐在衙门里埋头文山案牍。可惜王爷们都忙于内讧争斗，没能给他施展才能的舞台。所以祖逖的前四十多年都湮没在庸碌之徒中，没能露出锋芒。

祖逖担任司州主簿时，刘琨也担任司州主簿。刘琨比祖逖小五岁，两人都有匡扶国家之心，感情很好，住在一起同被而眠。两人都是俊杰，常常谈论时政，有时通宵达旦，都认为晋朝将“四海鼎沸，

豪杰并起”。想到动荡的前景，二人互相勉励，约定“相避于中原”。一天凌晨，荒野鸡鸣，祖逖醒来，踢踢刘琨说：“这不是恶声。”于是，两人天没亮就出来舞剑，锻炼身体。“闻鸡起舞”的典故由此而来。刘琨实际能力要弱于祖逖，但因为是汉朝宗室后裔，名冠一时，升迁得比祖逖快，后来成了西晋在北方的支柱。

八王之乱进入高潮时，祖逖率领亲党数百家从河北向江淮地区逃难。途中，祖逖把所乘的车马让给同行的老弱病残，自己徒步前进，还把药物、衣粮都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百姓们见祖逖有权略、重义气，公推祖逖为“行主”。所谓“行主”，本质上就是北方流民的领袖。天下大乱，人口流动频繁，形成多股流民潮，很容易组织起来。流民组织有领袖，有武装，迁徙到某地定居后常常建造堡垒自守，平时耕种周围土地，有事就收缩回堡垒。这些流民堡垒遍布江淮地区，少的能拉起几百人的武装，多的能拼凑数千人的军队。各个政权分别委以流民领袖县令、太守乃至刺史的职务，笼络流民武装，不至于与己为敌。

八王之乱时，多支北方流民武装南下，在江淮地区建立了许多流民武装堡垒，称为坞堡，流民领袖被称为坞主。其中大的武装南下占领城池，比如祖逖的这支武装就进驻泗口，此外还有苏峻、郗鉴等武装入驻徐州、扬州等地。司马睿就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以为笼络之策。

祖逖进一步带着队伍南下丹徒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在这里，祖逖招揽勇士为宾客义徒，待之如子弟。当时扬州突然大旱，出现饥荒，南下流民多盗窃，攻剽富室。颇有侠气的祖逖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遇到有流民为官府捕获，便想尽办法解救。因此，祖逖在南下流民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祖逖因为朝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北方流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因此驱逐胡族恢复故土的愿望非常强烈。整个东晋时期，南方北

伐复国的呼声也很高。祖逖虽然不断向南走，却沿途一直散播调转枪头打回北方的言论，号召南方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北伐。刚在江南站稳脚跟，祖逖就上奏司马睿，鼓吹北伐：“晋室之乱，并非朝廷无道、百姓怨叛造成的，而是由于藩王争权、自相诛杀，导致戎狄乘隙毒流中原。如今，百姓遭受残酷杀戮，人人有奋击反抗之志。大王如果让我统兵北伐，则郡国豪杰必争相来投，沈弱之士欣然拥护，不久国耻可雪。”通过这份奏折可以看出，祖逖对西晋王朝覆灭很不甘心，认为是少数民族武装趁朝廷内乱侥幸取胜，现在有民心可用，只要南方同仇敌忾，定能光复故土。

司马睿、王导等人肯定清楚南方的北伐呼声，但他们并不热衷北伐，因为对于南渡的司马睿政权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在南方扎根，巩固统治。和江州、荆州军方争夺地盘，争取江东世族的支持，调节南下世族的内部矛盾，样样都比北伐重要得多。

换个角度分析，夺回北方故土对司马睿等人的不利之处更明显。首先，司马睿的名望很低，万一哪个重臣大将北伐成功了，名声大涨功高震主，对司马睿有什么好处呢？其次，司马睿是皇室较远的一宗，万一北伐找到几位皇室血统更近更高的宗室，司马睿往哪里放呢？所以司马睿、王导力主集中军力、物力、财力去扩充领土，稳定南方，而不愿意分兵北伐。但是北伐的理由很充分，具有不容辩驳的道德力量，司马睿和王导又不便公开反对。他们能做的就是口头赞赏，暗地里设置种种障碍，盼望北伐不要成功。

对待北伐的这种“政治第一位”的指导思想和“阳奉阴违”的做法，由司马睿和王导首创，被之后的东晋历代朝廷所继承。

接到祖逖自请北伐的奏折后，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豫州（今河南地区）大部分在石勒手里，司马睿给祖逖的职位是虚的，土地需要祖逖自己去夺回。那么司马睿又给了祖逖多少北伐军需呢？一千人份的军饷，三千匹布，没有一兵一将，没有任何铠甲和

武器。王导向祖逖解释说，我们现在很困难，你就勉为其难，自行招募军队北伐吧。

317年，祖逖率领百余家跟随自己的北方流民渡江北上，勇敢地开始了悲壮的北伐。渡到长江中流，祖逖敲击着船桨立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他辞色壮烈，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悲凉，旁人闻之慨叹不已。“中流击楫”的典故由此而来，如今已成了立志奋发图强、实践理想抱负的代名词。渡过长江后，祖逖在江阴停留了几天，冶铸兵器的同时，招募北伐的志愿军。他得到了流民的支持，迅速组织起两千余人的粗糙军队，继续前进。

永嘉南渡后的豫州实际掌握在各支流民武装手中。西晋政府之前笼络坞主，命张平为豫州刺史、樊雅为谯郡太守，他们是两支最强大的流民武装，此外还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几支队伍，各有数百到几千人马，各自为政。祖逖来到后，采取拉拢一派打击一派的方法，大大削弱了流民武装。他先是引诱谢浮进攻张平，张平被杀。樊雅大惊，在某天夜里突袭祖逖，攻破了北伐军的营垒。樊雅拔戟大呼，亲自冲向祖逖的营帐。北伐军大乱，祖逖在危急时刻表现出了枭雄本色，命左右列阵防守，从容指挥部下反击，击破了樊雅。樊雅失败后，联合张平余众继续与祖逖作战；祖逖则联合自封陈留太守的坞主陈川与之对抗。陈川派遣部将李头率兵增援祖逖，双方联军攻克谯城。战斗中李头勇敢向前、战功赫赫，战后祖逖得到了樊雅的坐骑骏马，李头很想要却不敢说，祖逖知晓后主动将马送上门去。李头感念祖逖的恩遇，叹息道：“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陈川知道后，大怒，这不是吃里爬外嘛！他竟然因此杀死了李头，李头的部下四百人逃奔祖逖。陈川更生气了，与祖逖决裂，派兵劫掠豫州诸郡，争抢人口车马。祖逖指挥军队制止了陈川部队的抢劫活动，陆续剿灭抢劫的兵丁，将赃物尽量归还原主，严明纪律，不让北伐官兵留有私产。

陈川自忖战胜不了祖逖，向石勒投降。祖逖闻讯，率众讨伐陈川，石勒派石虎领兵五万救援陈川。祖逖北伐正式进入与外族作战的

阶段。这是永嘉南渡以来，晋朝军队第一次与外族军队正面作战。祖逖兵少，追求巧胜，屡次埋伏石虎，取得小胜。双方相守四旬，北伐军的粮草接济不上——他们离江南基地越来越远，军需运输困难，而司马睿政权本身就没给予多少军需支援。祖逖知道后赵政权的经济基础不行，石虎的军需也很困难，就看敌我双方谁先支持不住了。

他想出一条计策来，用布囊盛土做出米袋的模样，派千余人佯装运粮，途中令几个人装出疲惫的样子掉队在路旁休息。后赵军队看到后，上前进攻，那几个人赶紧放下米袋逃跑。偏偏这几个人运的米袋装的是真米，石虎检查截获的米袋，误以为北方军粮草充足，顿时对战斗前景失去了信心。石勒得知前线缺粮，派将军刘夜堂赶了上千头驴运粮支援石虎。祖逖在洹水伏击刘夜堂，劫获后赵军粮。石虎终于丧失了坚持的胆气，主动撤军，而北伐军推进到了雍丘（今河南杞县）。

此后，祖逖和石勒在雍丘僵持了起来。祖逖多次主动进攻，让后赵的屯戍防不胜防。北伐军的侦察兵常常俘虏后赵领土内的濮阳人，祖逖款待他们后再遣归故里。这些人回去后感念祖逖的恩德，陆续率乡里投奔北伐军，前前后后有五百家投奔祖逖。石勒曾经抽调精骑万人进攻祖逖，希望有所斩获，结果反被祖逖所败，此后陷入被动防守态势，再未主动进攻。

北伐形势一片大好，归附者甚多。当日黄河南北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流民武装相互攻击，祖逖遣使为他们和解，晓以民族大义和切身祸福，最后这些流民武装都接受了祖逖的指挥。黄河北岸有许多堡垒的坞主的儿子在后赵政权当人质，因此不能旗帜鲜明地投靠祖逖。祖逖也悉听尊便，默许他们的“两属”状态，有时还派遣小股部队佯攻这些堡垒，让后赵知道他们没有投靠北伐军。坞主们对祖逖的细心考虑感恩戴德，更加倾向北伐军，后赵政权有什么计划和阴谋事先都偷偷报告祖逖。北伐军的优势更加明显了。

由于祖逖指挥得当，手腕灵活高超，“黄河以南尽为晋土”。

二

北伐的胜利让东晋复国大业现出了一丝曙光。祖逖收复了河南，当时的山西北部 and 河北北部一带也还在晋朝残余势力手中。在领土格局上，晋朝力量对河北的石勒政权和关中的刘曜政权形成了夹击的态势。

先坚守河北北部的是西晋任命的幽州刺史王浚，此人利令智昏，自以为掌握幽州，天高皇帝远，自不量力，妄想割据，最后被石勒吞灭，遗臭万年。坚守山西北部的就是当年和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刘琨，时任并州刺史。当时，刘渊在并州建国，司马腾带领山西军民东出“乞活”，并州十室九空。他在黄河边上组织了几百士卒边打边走，穿越匈奴的领土才赶到晋阳（今山西太原）上任。刘琨有爱国之心，在晋阳惨淡经营，与刘聪、石勒两派不断拉锯作战。晋愍帝遥授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把北方的乱局托付给了他。遗憾的是，刘琨志大才疏，富贵惯了，生性豪奢，又误信谗言，始终不能团结并州军民组建的强力军队，最终还是被石勒赶出了并州。

段氏鲜卑倾向晋朝，刘琨向北投靠了鲜卑，并和段匹磾（dī）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发表檄文号召各族拥戴晋朝。317年，刘琨派妻侄温峤（qiáo）到建康报告北方情形，并劝司马睿即位做皇帝。临别，刘琨对温峤说：“晋祚虽衰，天命未改，我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温峤后来果然在江南举足轻重，盛誉一时。

刘琨听到老友祖逖北伐成就斐然，高兴地致信祖逖：“我夜间都枕着兵器睡觉等天亮，一心期待消灭敌人，如今你跑到我前面去

了。”他时刻准备杀敌，但天不佑他，第二年被背信弃义的段匹磾杀害，时年四十八岁。他的死意味着晋朝势力在华北地区全军覆没。

刘琨死后半个世纪，桓温北伐遇到一个擅长手工的老妇，原来是刘琨的婢女。老婢一见到桓温，潸然而泣。桓温问其故，老婢回答：“桓公酷似刘司空。”桓温十分高兴，出外整理衣冠，再呼老婢进来详细询问。老婢又说：“桓公和刘司空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意思是桓温还是比不上刘琨。桓温于是褰冠解带，昏然而睡，不高兴了好几日。可见刘琨身后声望之高。

却说祖逖北伐初胜后，立志将河南建设为根据地。他的豫州刺史开始名实相符，自己为政俭朴节约，廉洁自律，不蓄私产，劝督农桑，恢复农业生产，亲自率领子弟耕耘砍柴，又收葬枯骨，为之祭祀。乱后初定的豫州百姓纷纷拥戴祖逖。祖逖曾大设宴席，豫州耆老流涕放歌：“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如此声望，司马睿不得不提升祖逖为镇西将军。

石勒处于劣势，不敢窥兵河南。他采取务实的通好政策，派人修缮了成皋县祖逖母亲的墓地，写信给祖逖要求相互通使、交市。石勒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且被朝廷视为蛮夷，祖逖自然不能与之通使交好。这虽然是形式问题，却关系政治大局。但交市通商有利于南北百姓，也有利于河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祖逖耍了个手腕，对石勒的来使置之不理，但对南北自发的通商交往也不加制止，听任互市。河南百姓在互市中获利十倍，民富而政府强，很快河南就公私丰赡，北伐军越发强盛。祖逖满怀信心地要“推锋越河，扫清冀朔”。

面对声望倍增、军队强盛的祖逖，司马睿不能不心里发酸，手心冒汗。太兴四年（321），晋元帝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戴渊出身东南寒门，必须依赖司马睿来获取权势，所以效忠司马睿。这就在祖逖的豫州刺史上面加了

一道紧箍咒。祖逖认为这是朝廷对他不信任，派来监督他的，祖逖猜对了一半。祖逖没有猜到的是，司马睿派戴渊到河南还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要分割琅琊王家权势、防范荆州王敦。几年来祖逖过分关注北伐，对东晋王朝的政治格局缺乏了解，自然不清楚司马睿的第二个目的。祖逖见戴渊是南方人，虽有才望但并不热衷北伐。河南收复后形势大好，如果拖延过久不再接再厉，一旦民心泄气，石勒缓过劲来，北伐难度将大为增加。可北伐已经不是自己说了算，祖逖只能快快不乐。

戴渊出镇河南，王敦的反应最强烈，表露出与朝廷公开决裂的态势。祖逖担心朝廷将起内讧，更加拖累北伐大业，忧虑过度而发病。

在病中，祖逖还在筹划北伐事宜。他营缮了武牢城，该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计划建成向北向西进军的据点；筑垒于河南，巩固战果，以备北伐失利时坚守。可工事还没修完，祖逖就在雍丘病逝，时年五十六岁。豫州百姓若丧考妣，为之立祠；朝廷追封祖逖为车骑将军。据说王敦久怀逆志，畏惧祖逖的北伐军才不敢与朝廷决裂，听到祖逖死讯后便开始肆意作乱。

祖逖原本可以在东晋获得丝毫不逊于刘琨的声望，可惜接替他的祖约在日后率领这支流民武装参加了叛乱，又投降了石勒，祖家被族诛，也间接损害了祖逖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祖逖作为无私的爱国者和无畏的战士，越来越得到后人的尊崇。

王与马不敢共天下

—

西晋末年，八王兵戎相见，天下大乱。山东琅琊国临沂（今山东临沂）的王家决定举族迁徙到相对安定的东南地区去。王家的王导即将渡过淮河的时候，担心前途，找到大占卜家郭璞算命。郭璞给他算了一卦，说：“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于是王家高高兴兴地南下了，果真如郭璞所言，王家在南方繁衍生息，成为南朝第一大名门望族。

王家的举族迁徙，只是著名的永嘉南渡的一个缩影而已。

在永嘉南渡中，许多北方的名门望族、朝野大臣带着族人，裹着金银细软，吆喝着家丁下人和家禽家畜，逃过淮河，来到了长江下游沿岸。这股乱哄哄的移民潮，给东南地区带来了近百万的新人口。琅琊王氏除了王导外，王廙、王含、王舒、王彬等兄弟和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等子侄辈，统统搬迁到了原东吴旧都建邺。王家在秦淮河边一条叫乌衣巷的街道里聚族而居。来自陈郡的谢家紧随而来，也搬到了巷子里，和王家做起了邻居。

此时的王家，还只是晋朝若干二流家族之一，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并不紧密。琅琊王家最大的骄傲是家族道德凛然，家风高尚。王导的曾祖母朱氏是曾祖父的续弦，对王导的伯祖父王祥和祖父王览极尽虐待之能事。王祥两兄弟无怨无悔，真心侍奉后母。寒冬腊月，朱氏深夜要吃鱼，逼王祥去捉活鱼。王祥跑到河边，开始凿厚厚的冰层，准

备捕鱼。不料冰面自动裂开，两条鲜活的鲤鱼蹦到王祥脚下，这就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故事。为了防止朱氏毒死王祥，每次饭前王览都替兄弟尝毒，他的故事则进入了《二十四悌》。兄弟俩的道德故事感天动地，惊动了以道德作为选拔官员标准的东汉政府。东汉政府多次征辟两兄弟做官，都被兄弟二人拒绝了。直到年老了，王祥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出任了曹魏王朝的徐州别驾。这是琅琊王氏家族步入政坛的开始。

可见王家的政治根基并不深，但他们一来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政治冤家和宿敌，二来树立了超高的道德标准，把握了官场升迁的利器。王祥、王览两人先后担任了朝廷重臣，官越当越大。等到甘露五年（260），司马昭发动政变，杀死小皇帝曹髦的时候，图谋篡位的司马家族已经不得不考虑王家的意见了。当时小皇帝的尸体还没有入殓，司马昭一再催促王祥来商量后事。王祥很聪明，来了之后先抱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一场，自责救驾来迟，可又赞同司马昭的后事安排。在这里，王祥给家人树立了既重视道德说教，又注重政治实效的好榜样。

王祥死前对王览说：你的后人会大红大紫的。果然如他所言，王览的孙子辈都飞黄腾达了。先是王衍担任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王衍平日里不干正事，整天拿着一把拂尘夸夸其谈，信口雌黄。暗地里，王衍也意识到了危险，早设计了王家“狡兔三窟”的退路，得到了祖父辈的真传。王家政治上崛起的时期，正值西晋八王之乱。王衍后来被石勒抓住，压在墙下，但是给王导、王敦等人留下了进一步博取荣华富贵的扎实基础。

王导是东晋王朝和琅琊王家的关键人物。他继承了王家与人为善、为政务实的作风。在王朝南迁、万事草创的东晋初期，王导的这一性格和执政思想，适应了形势的需要。一个初建的王朝最需要什么？安定。这种安定既包括政治军事上的，也包括人心上的。南北世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中原少数民族对南方的觊觎，都威胁着东晋的安全。王导觉得，内乱也好，北伐也好，都会给脆弱得经不起折腾的新王朝带来致命的危险。最好的对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出乱子就好。所以王导的执政核心就一个字：静——调和南北世族的关系，在政策上清静无为。

王导经常大摆筵席，款待宾客。邻居谢家的小孩子谢安在若干年后依然对王导谈笑风生的形象和王家气氛和洽的酒席留有深刻的印象。一次，南方名士刘真长来拜访王导。时值盛夏，王导正把肥胖的肚子贴在棋盘上降暑。他看到刘真长来，忙自嘲自己的不雅动作，说：“何乃洵？”洵是南方方言中冷的意思，整句话就是“真凉快”的意思。刘真长出来后，旁人问他：“王公这个人怎么样啊？”他感叹：“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听到他在说吴语。”小小的一句吴语，一下子就拉近了政府和南方世族的距离。

还有一次，众人在长江边的新亭观赏江南美景。周顗感叹道：“风景没什么不同，但却只能看到长江，看不到黄河了啊！”想起国破南逃，在座的许多人都落下泪来。王导见状愀然变色：“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学作楚囚，相对哭泣！”王导其实是不赞成北伐的，但他能用一句口号振奋人心，扭转士气，不愧有政治家的风度。

朝廷刚成立的时候，国库空虚，只有练布数千端。王导灵机一动，做了一套宽大的布衣服，穿在身上出去走了一圈。结果，朝野官员和建康的士人认定这是服装界的新风尚，纷纷购买练布做衣服。国

库中的练布很快就以“一端一金”的高价销售一空。府库充裕了，王导在士人中的号召力也得到了验证。

正是因为王导有这样的号召力，他的思想和言行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王导“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执政风格，把“静”和“无为”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东晋的政局和人心得到了稳定，但在政坛上的进取心和事业心也受到了压抑。对世家大族来说，平静安定的统治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世族势力在南朝恶性膨胀，大家族、大人物们以清谈玄学为风尚，耻于干具体政务。这种思想转变，多少是由王导推动的。

司马睿登基之日，感慨万分，对王导的辅助和拥立之功深深感激。在登基大典上，他竟然在朝堂之上、百官之前，拍拍龙椅的空处，招呼王导“升御床共坐”。当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导连忙推辞。司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辞恳切。王导眼看再僵持下去，登基大典要泡汤了，只好跪地启奏：“如果天上的太阳和地下的万物一样升列高位，苍生到底要仰望谁呢？”司马睿一想，原来皇帝是天上的太阳，天的确不能有二日，这才不再坚持要王导同坐。

民间用一个俗语形象地形容这一幕：王与马，共天下。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萧何。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兵强马壮外，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的人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王导主观上不敢与司马睿共坐龙椅，但要说王家和司马家共享天下，也并不过分。

等司马睿坐稳了龙椅，慢慢开始享受到独一无二的太阳的感觉

后，开始对“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产生了酸酸的感觉，王家势力的膨胀终于侵犯到了皇权独尊的敏感神经。司马睿开始暗中限制并削弱王家的势力，他开始重用琅琊王时的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这二人没什么本事，但对“尊马抑王”一事不遗余力，不断出头打压王家的势力。

王导既与人为善又很务实，面对皇权的打压和疏远，他采取了谦抑自守的对策，退居家中静观时局变化。司马睿一时找不到理由，也不想进一步把王导怎么样。可王导忍得了，他的堂兄弟王敦忍不了。王敦和王导虽是堂兄弟，性格却截然不同。王导主静，王敦好动。王敦放荡不羁，性情外露，对王家受到打压愤慨难平，并把怒气表现了出来。鉴于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各州的政权和军队，司马睿派刘、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图钳制王敦的势力。这一下，王敦干脆造反了，招呼兄长王含等人带上大军，顺江而下，冲向建康找司马睿等人算账。

对王导来说，司马睿的打压不是什么大问题，王敦的造反却带来了棘手的大麻烦。造反是诛灭满门的重罪。王导赶紧给领军冲在前面的王含写信，劝他罢手。可王敦、王含等人坚持造反。王导只得选择坚定地站在司马睿一边，反对王敦等人造反。王导认为东晋初建，安定是最大的王朝利益，王家还不具备推翻东晋、出头当皇帝的实力，必须依靠东晋政权，才能保持权势。所以，王导从琅琊王氏的安全和最高利益出发，坚定地与王敦划清界限，拥戴司马睿。听说刘隗和刁协已经在劝司马睿诛杀王导和王家的所有成员了，王导赶紧带上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每天跪到宫门外候罪。

王家的遭遇得到了许多朝臣的同情，王导平日经营的人情关系在关键时刻起作用了。尚书仆射周顗就认为：“皇帝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但大臣（指王敦）怎么可以举兵造反？”他决定进宫保王导等人。周顗来到宫门口，王导情急之下冲着他大呼：“伯仁（周顗

的字)，我一家老小百余口性命都交到你手上了！”周顗是来帮王家的，却不能把它外露出来，让司马睿觉得自己就是来当说客的——这是说服的技巧。所以周顗看都不看王导，从他身边径直进宫去了。在宫中，周顗竭力向司马睿担保王导的忠诚，言辞恳切。本来，劝完皇帝，周顗可以出来安慰王导了。可周顗是个酒鬼，在宫中喝得酩酊大醉才出来。王导在宫外跪了一天，又向周顗呼救。大醉的周顗还在伪装，这次不但不搭理王导，还转头对随从说：“我要杀尽乱臣贼子，换取金印，挂在手肘后！”在这种情况下，换了谁都会对周顗产生误会。王导对周顗恨之入骨，不知道他在力保自己，更不知道他回家后还上书力证王家无罪。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王导跪地请罪：“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马睿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

王家的危机解决了，不想王敦的军队攻占了建康。刘隗和刁协一个逃亡北方，一个被杀。王敦把持了朝政，官员进退操于其手。王敦因为周声望很高，想让他出任三司，特地跑来征询王导的意见。王导没说话。王敦就想降低周顗的官位，王导还是沉默。既然周顗不能用，王敦说：“那就只有杀掉了。”王导依然不说话，看着王敦下令斩杀了周顗。后来王导从文书中得知真相，大哭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王敦的叛乱，并没有给东晋王朝造成太大的伤害，只有少数人死于战乱，朝野官员基本各安其位。司马睿依然做他的皇帝，只是王敦不愿意见他。继续当丞相的王导就在王敦和司马睿之间充当沟通的桥梁，努力维持着朝廷的稳定。对于王敦进一步擅权逼宫的做法，王导坚决抵制。王敦起初也没有自己做皇帝的想法，不久退兵长江中游，局势进一步降温。不想，王敦退兵后身体越来越差，在周边宵小的蛊惑下，重新发兵进攻建康，这次他摆出了倾覆朝廷的态势。王导再次坚决站在司马睿一边，主动挂帅，提兵与王敦叛军作战。王敦随即病

死，兄长王含、继子王应被杀，叛乱被彻底平定。

王导对策得当，让琅琊王家非但没有受到牵连，还因讨伐王敦有功被加官晋爵。王导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升湘州刺史，王彬任度支尚书。王家跨过这道坎，保持住了天下第一望族的地位。

三

王敦之乱后，王导作为世家大族的代表和朝廷的稳定中坚，继续掌握朝政。

王导的老搭档司马睿在王敦第一次叛乱后不久郁闷而死，王导等人拥立太子司马绍即位。司马绍当了三年皇帝，也死了。王导等人又拥戴五岁的皇太子司马衍即位。

司马绍临死前，考虑到继承人年幼，留下遗诏，让太保王导录尚书事，与自己的小舅子中书令庾亮一同辅政。司马衍即位后，司马绍的皇后庾氏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庾亮仗着庾太后的势力，很快就把实权集中到了自己家族手中。尽管王导是三朝元老，皇帝对他下诏书都是用敬语，但王导离实权越来越远，见惯了荣辱浮沉的王导淡然处之。庾亮是个有很多想法的年轻人，雄心勃勃。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擅权，对王导不利，劝他多加防备。王导说：“他若逼我，我就一身布衣服，回家养老去，有什么可怕的呢？”

后来苏峻起兵叛乱，建康遭焚，朝廷一度考虑迁都，有人建议迁都豫章，有人要求南迁会稽。王导则哪儿都不去，坚持定都建康。许多朝臣对照王导的恬淡无争，引为榜样。之后尽管东晋屡次出现政治变动，朝廷始终保持了大致稳定，变动也没有波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王导的“静”和“无争”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朝廷一有动静，政治

一有裂缝，他就上前和稀泥。

东晋朝臣给晚年的王导起了一个雅号：糊涂宰相。原因是王导每年考察官员的时候，都流于形式，考察的结果总是你好他好大家好。有人提出意见，王导就说，害国之鱼我们都能容忍，何必每年纠缠于那些小鱼小虾呢？的确，王导的一生对威胁王朝利益的大问题都采取了拖延、打太极的对策，选择让时间去消化它们，根本就没必要在每年的官员考核上较真儿。他晚年常说：“现在说我糊涂，只怕将来有人还要怀念我的糊涂呢！”

咸康五年（339），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王导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格局。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司马家族的东晋王朝稳定了，琅琊王氏才有遮风挡雨的地盘。结果王导辅助司马家族为王家赢得了一块远远超过了遮风挡雨之用的大地盘，风光无限，都可以和皇帝“排排坐分果果”了。好在王导是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恭敬自律，没有反称司马睿“你真是我的刘邦啊”，更没有跑上去坐在龙椅上拍拍司马睿的肩膀套近乎，所以琅琊王家才能在东晋初期根基日渐深入，繁衍昌盛。

王敦“过豪死”的血腥悲歌

—

西晋末期，豫章郡（今南昌）曾经发生一桩震惊一时的凶杀案：扬州刺史王敦杀害了途经豫章去建邺的堂兄、曾任荆州刺史的王澄。

事情是王澄挑起的。他在荆州当地头蛇习惯了，加上性格桀骜不驯，又比王敦出道早，所以在豫章盛气凌人，对王敦很不客气，多有谩骂之语。王敦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同样傲慢，竟然对堂兄弟起了杀心。可是王澄功夫不错，随身带有玉枕自卫，还有卫士二十人，如何下手呢？

知情者是这样描述的：王敦先招待王澄身边的卫士痛饮，将他们灌醉，然后向王澄借玉枕“欣赏”。拿到玉枕之后，王敦脸色突变，随即诬陷王澄叛乱，要将他就地正法。王澄发觉上当，马上扑过来和王敦拼命。王敦被他撕掉了衣带，成功逃脱。激烈打斗中，王澄爬上房梁，对王敦破口大骂，可惜寡不敌众，被王敦带人杀死。这桩血案将王敦的豪杰性格暴露无遗。

王敦性格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首先，他出身世家大族，拥有很高的政治起点和宝贵的政治财富。王敦耳濡目染，不仅做事稳重、言行成熟，而且性格豪迈爽快，言谈睿智。其次，当时社会清谈洒脱的风气，同样对王敦影响深刻。王敦从小就是个潇洒的公子哥，放荡不羁，豪侠仗义，自尊心强，睚眦必报，是那种一眼就能从人堆里看出来的焦点人物。长大后，王敦名列清谈名士之列。在讲述魏晋

士人豪爽洒脱风范的《世说新语》一书中，他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

按照现在的心理分析，王敦是个无畏的破坏者，不为世俗和他人所约束，勇往直前。因此日后司马睿可以用他来打地盘、定天下。可另一方面，王敦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建设者。他破坏了旧的东西后提不出自己的东西去树立新的规范，因此待日后王敦位极人臣、出将入相的时候，却再没有什么作为。寂寞的他只能继续破坏下去，最后导致了人生悲剧。

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召集当时的名流和世家子弟，讨论伎艺。在座的人都畅所欲言，争着在司马炎面前表现自己，只有王敦一副与己无关、满脸不屑的样子。司马炎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就问他会有什么。王敦回答说会打鼓，司马炎就给了他一面鼓。王敦卷起袖子，离开座位，“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当时是满座皆惊，司马炎很喜欢这个相貌不凡、举止雄豪的孩子，就把女儿襄城公主嫁给了他。

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王敦，家族内外还有不少人把他看作“问题少年”。太子洗马潘滔评价王敦“处仲（王敦的字）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意思是说王敦的样子不是一般人，不是害人，就是被别人害死。王恺和石崇比富，王恺宴请宾客时都让美女陪酒，如果客人不饮就杀掉陪酒侍女。王敦去他家作客的时候，坚决不喝酒，陪酒的美女悲声哀求，王敦都傲然不视。先后三个侍女都被杀了，王敦一直无动于衷。石家的厕所里有十多个婢女充当服务员，她们穿着华丽的衣服，捧着甲煎粉、沉香等东西，服侍宾客上厕所，宾客出来前还给他换上新衣服。客人一般都不好意思在石家上厕所。王敦却大方地接受婢女们的服侍，脱衣穿衣，喷香抹粉，神色傲然。婢女们私下里议论：“这个客人日后一定做贼！”

贾南风专权时，陷害太子，将其幽禁在许昌。她下令：太子离京时官属不得相送。时任太子舍人的王敦和太子洗马的江统、潘滔等人

不畏强权，公开前往相送。从青州刺史任上调回洛阳担任中书监时，王敦将襄城公主的侍婢都分发给将士，又分发金银财宝给部众后才回到洛阳。可见特立独行的王敦身上也有令人称赞的一面。

二

王敦这样的人很适合乱世。

八王之乱时，王敦投靠了东海王司马越，转任管辖江东的扬州刺史，在南渡风潮中来到建邺。司马睿移镇建邺，短期招他为军咨祭酒，很快复任扬州刺史，负责讨伐南方的异己力量。在东晋建立前后的这段时间，王敦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勇往直前，纵横长江中下游各州；知人善任，重用陶侃等人，数载苦战，肃清了境内的乱匪。因为他掌握军队，能力不俗，更因为王家对东晋王朝的拥立之功，王敦在东晋初年成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被封为汉安侯，控制着长江中游地区，成为东晋最大的实权人物。他和王导，一个在外，一个在内，是朝廷的中流砥柱。

东晋和南朝时期，朝廷的重心是扬州（今江浙）和荆州（今两湖）。两地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又都能制造兵器军械。其中首都建康在扬州，扬州就成了朝廷的中枢；而荆州处于上游，虎视扬州，给建康的朝廷施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如果镇守荆州的大臣再拥兵自重，飞扬跋扈，朝廷和荆州的矛盾就难以避免了。奇怪的是，尽管朝廷对荆州刺史的人选慎之又慎，镇守荆州的大臣不是不听调遣干脆是野心家。

东晋建立后，王敦出镇武昌，总管长江中游军事和政务。他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王导的清静无为和朝廷的安然无事，让王敦“淡”出

了心理问题，他根本无法适应处理公文往来的平淡生活。同时王敦身边聚集了一批别有用心的部属，比如钱凤和沈充等寒门出身的士人，都希望借助王敦的政治飞跃实现各自的政治梦想。不安分的权臣身边容易聚集奸佞小人，就像有裂缝的鸡蛋容易招来苍蝇一样，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小规律。同时王含、王廙等同族也聚拢在王敦身边，恭维他、怂恿他，王敦开始骄横专擅起来。

司马睿对王家的猜忌，也推动了王敦的造反。王家势力太强大了，司马睿提拔一批寒族来制约王家的势力。在司马睿的授意下，御史中丞刘隗和尚书左仆射刁协全力抑制王氏势力，暗中做军事部署。戴渊镇守合肥，刘隗镇守泗口，预防王敦顺江东下。皇叔司马承担任湘州刺史，在南边监视王敦。王敦对此愤愤不平，常常在酒后手持玉如意，边击痰盂边吟诵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最后把痰盂都打出了缺口。

终于，王敦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上书指责司马睿，为王导抱不平。奏疏送到建康后，先到了王导手中，老好人王导把它退给了王敦。王敦不甘心，第二次直接给司马睿上书。司马睿看完王敦的上书，更加相信他要发兵造反了。

王敦毕竟是名门之后，先客气地给刘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以国家大义劝说刘隗和自己联手，共扶朝政。“圣上信重阁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您戮力王室，共静海内。如果大家同心，帝业得以兴隆，否则，天下永无望矣！”可刘隗是个得志小人，粗鲁地回信说像他这样的朝廷股肱之臣，是不会和王敦同流合污的，他要效忠皇室，做个大忠臣。这分明是把王敦推到了对立面，他忘记了王敦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王敦果然大怒，决心给刘隗一个去地狱做忠臣的机会。于是，王敦就这么造反了。王敦在武昌兴兵东进，举起的大旗是“清君侧”。他说司马睿宠信奸臣，弄得民不聊生，他这才出兵清除奸贼、拯救百

姓。党羽沈充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叛军迅速推进到建康附近。司马睿派出的刁协、戴渊、刘隗等人都不是王敦的对手。早在王敦起兵之初，刘隗和刁协就劝司马睿尽诛王氏全族。司马睿离不开王家的支持，没有答应，刘隗等人“始有惧色”。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最高层间的权力游戏，刘隗这样的初学者注定是牺牲品。三个月后，建康石头城的守将、义兴周家的周札给王敦打开了城门，叛军兵不血刃入城。王敦胜利了！

城破后，刁协和刘隗向北逃亡。刁协年老，随从又逃散了，结果被杀死在长江边；刘隗逃亡北方，最后投靠了石勒。司马承坚守湘州百余日，兵败被俘，在押送建康途中遇害。

王敦攻入石头城后，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放纵士卒劫掠，由此亦可见他破多于立。司马睿陷入狼狈的境地，身边一度只剩下一个护卫将领和两个侍中。防虎反为虎所伤，司马睿事到如今反而看开了：“王敦没有忘记社稷宗庙，则天下尚可共安；如果想要我的龙椅，早点说嘛，我自己会回琅琊去，何必骚扰百姓？”王敦的性格决定社稷宗庙在他心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他又不想尊奉司马睿这个打压王家的皇帝。但司马睿和王敦两个人，谁都不能彻底离开谁。司马睿固然需要世族支持他的政权，各个世家大族也需要司马睿这块招牌来遮风挡雨。各大家族还接受不了王敦替换司马睿登基称帝，王敦也没有南面称君的准备。因此，他没有废黜司马睿，更没有对他动刀子，而是保留了司马睿政权。

司马睿派公卿百官去石头城拜见王敦。王敦丝毫不改豪杰本色、名士风范，坐在上座，先戏问手下败将戴渊：“之前打仗，你输了。当时还有余力吗？”戴渊坦言：“哪里还有余力，真的是力量不足！”王敦问他：“天下会怎么看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戴渊暗中顶了一句：“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意思是说，只有真正理解你内心的人才知道怎么回事，从表面来看是乱臣贼子所为。王敦哈哈一笑，夸戴渊是“能言之人”。王敦又对周说：“伯仁，你对不起我！”周不卑不亢

地说：“王公举兵，下官亲率六军，没有成功抵挡住贵军，致使朝廷军队落败。在这一点上，我对不起你！”

既然是清君侧，就要杀死几个奸臣。王敦最后挑选了周顗、戴渊杀鸡儆猴，并在朝廷里安插了若干党羽。从法律上来说，王敦所做的真的仅仅是“清君侧”，没有丝毫违法谋逆之处。司马睿下诏大赦，赦免参与叛乱诸人的罪过，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晋爵武昌郡公。王敦对停留在朝廷处理烦琐的政务没有兴趣，于是打道回武昌，遥控建康。

王敦的这一次叛乱，轻率地置王家于族诛的危险边缘，在家族内部遭到了反对。王导战前劝说王敦、王含罢兵，战后努力做王敦和司马睿沟通的桥梁，尽量让事件平安结束。另一个堂兄弟王彬在王敦杀周顗时，公开去和周顗哭别，哭得悲切异常。王彬见王敦时，并没有一丝悲痛之情。王敦不解，王彬回答：“我哭周顗是情不自禁。”对于王敦，王彬痛批他不义，批得声泪俱下。王敦当场大怒，扬言要杀掉王彬。王导连忙做和事佬，拉王彬跪下谢罪。王彬却说：“我脚有病，在天子面前都不下跪，更别说你了！”王敦差点气背过去，逼问：“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王彬依然不卑不亢地看着他。王敦毕竟厚道，对同族人很客气，没有把王彬怎么样。

王敦的豪杰性格决定了他做不了政治家。他不屑于花时间去学习烦琐的政治技巧、营造各种人脉关系，更没时间像兄弟王导那样参与实际事务。他起兵反对司马睿，实属仓促之举，并没有成熟的设想，更谈不上详细的善后措施了。他的成功只是反证了刘隗等人的无能，证明了离开王敦等实力人物支持的司马睿政权是多么的虚弱，根本不能说明王敦的强大和正确。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又没有奋斗目标之后，王敦迅速腐化堕落。

史载“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他没有收敛张扬的个性，更没有学会稳重地处理好各方面的

关系，而是疯狂享受着从各地搜刮来的珍宝财富和支配人事调动的乐趣。更糟糕的是，王敦宠信沈充和钱凤，听任他们二人胡作非为。这两个人出身土豪，也不是政治家，得势后“大起营府，侵入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把所有得罪他们的人都整死了。朝野上下、官僚百姓都希望做尽坏事的沈、钱等人早点死去，顺带也希望王敦集团早点失败才好。

司马睿经过王敦的打击后，得了一场大病，很快就油枯灯灭。素来为王敦不喜欢的太子司马绍即位，史称晋明帝。晋明帝憋着一口气，立志铲除王敦，王敦也看晋明帝不顺眼。江南很快爆发了第二次王敦之乱，但不久王敦也因病去世了。

王敦最后的命运很悲惨，葬入坟墓还被挖出戮尸，脑袋被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王敦是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人物，是一代豪杰，弄不好还能做个开国皇帝或者割据君主。但他被过于放荡不羁的个性及安定团结的东晋政治大环境埋葬了。

王敦之后的乱臣贼子，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他那样的豪爽、率性、不羁和惊天动地。王敦因此成为许多雄心勃勃或者蠢蠢欲动的豪杰志士的标杆和榜样。后来人曾说：“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这句话可以看作对王敦豪杰一生的莫大评价。

“混血皇帝”司马绍

—

司马睿忧愤而死后，即位的司马绍是整个东晋时期唯一一个还算得上强势和振作的皇帝。

司马绍是司马睿的庶长子，据说其生母荀氏是燕赵地区的鲜卑人，出身微贱，当婢女时得到司马睿的宠爱生下了司马绍。司马绍长得不像一般的汉族人，他体格健壮，而且胡须发黄。讨厌司马绍的王敦因此叫他“黄须鲜卑儿”。司马睿的虞皇后没有生育，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司马绍成了皇太子。

司马绍从小聪慧过人，小时候司马睿常常抱他坐在膝盖上玩耍。一次，司马睿问他：“太阳与长安相比，哪个更远些？”司马绍回答：“太阳远，没听说有人从日边来，只听说有人从长安来。”司马睿很惊喜，觉得儿子的逻辑推理能力很强。第二天，司马睿宴请群臣，就想在大家面前炫耀一下儿子的聪明，当众重新问司马绍：“太阳与长安相比，哪个更远些？”不料司马绍一本正经地回答：“太阳近！”司马睿大惊，怎么才过了一天答案就不一样了？他就问司马绍：“为什么呢？”司马绍抬头看看天空，从容说道：“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不过，考虑到司马绍的生母荀氏出身低微，司马睿一度想废掉司马绍改立宠妃郑夫人的儿子司马昱为太子。他的提议遭到了大臣们的集体反对，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司马绍的个人表现无懈可击。他礼贤下士，雅好文辞，和文士、大臣们的关系很好。王导、庾亮、温峤等

大臣与司马绍的关系密切。司马绍曾和王导辩论，王导竟然辩不过司马绍。朝野臣工都喜欢司马绍，而不了解司马昱。第二是东晋朝廷刚刚建立，世族们都要求稳定，不想出现废立太子这样的波动来。

稳定的要求压倒了一切。朝野上下都说废长立幼于理于伦不合，都称赞司马绍聪亮英断，是一位好太子。周顗、王导等大臣更是言辞恳切，为司马绍苦保太子之位。只有刁协支持司马睿改易太子，想从中牟利。司马睿狠狠心，孤注一掷要废司马绍立司马昱。他怕大臣们不奉诏，就想出一个歪主意。

司马睿召王导、周顗入宫，等二人来了就派人请他们到东厢少歇。司马睿计划把王导、周顗软禁在东厢，让刁协趁机将废立太子的诏书向大臣颁布，给群龙无首的大臣们一个措手不及。等生米做成了熟饭，王导、周顗等人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司马睿连诏书都写好了，就等王导、周顗两人中计。周顗嗜酒，常常喝得迷迷瞪瞪的，进宫这天正好迷糊着，拔腿就要向东厢房走去，王导却一把拨开使者，径直走到司马睿面前，问道：“不知陛下因何召见臣等？”司马睿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半天后从怀中取出一张黄纸诏，撕得粉碎，扬手扔掉。司马绍的太子位就这么保住了。这时候，周顗惭愧地慨叹：“我常自以为胜过王导，今天才知道我不如他！”

没当上太子的司马昱是司马睿的小儿子，半个多世纪后又被权臣桓温重新搬出来，拥戴为皇帝，史称简文帝。这是后话了。

王敦第一次叛乱时，在占领建康后，没有废黜皇帝司马睿，却要废黜司马绍这个太子。一方面，王敦想以此立威；另一方面，王敦不希望强健聪明的司马绍日后当皇帝，怕对自己不利。于是王敦召集大家，想以“不孝”的罪名废掉司马绍。他述说了许多司马绍不孝的“罪状”，说：“这些都是温峤所说。温峤常在东宫，后来担任我的司马，

对司马绍一清二楚。”不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威严地喝问他：“皇太子是什么样的人？”温峤回答：“小人没法估量君子。”王敦声色俱厉，愤怒地重问温峤：“太子怎么能算是君子呢？”温峤还是说：“太子才识广博、学问精深，确实不是我这样认识肤浅的人所能评价的。太子能按照礼法侍奉双亲，似乎可称为孝。”顿时，王敦理屈词穷，废太子之事只好作罢。

322年，二十四岁的司马绍顺利即位称帝，史称晋明帝。也许是鲜卑血统起了作用，司马绍一改元帝时代庸碌无为的作风，锐意进取，全心全意巩固统治、加强皇权。他的当务之急就是铲除上游的王敦集团。

二

对遥控朝廷的王敦来说，司马绍登基无疑是一个噩耗。王敦凭借强大的实力优势，决定给司马绍来个下马威。太宁元年（323），王敦讽谏朝廷征召自己，并率大军东移，进驻姑孰湖城（今安徽芜湖）。司马绍还没有力量与王敦直接对抗，便以退为进，亲手写诏赐予王敦加黄钺、班剑武士各二十人，可以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并派侍中阮孚设牛酒犒劳王敦。在这个回合里，司马绍身处弱势，不卑不亢，王敦就是有篡位之心也没有篡位的借口。对于司马绍的犒劳，王敦称病不受。

暂时稳住了王敦，司马绍还需要组建自己的势力。他于登基前娶世族女子庾氏，登基后以庾氏为皇后，提拔妻弟庾亮为中书监，与王导分权。那在军事上怎么制约王敦呢？司马绍直接指挥的是建康附近的宿卫六军，由纪瞻统辖。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时候，宿卫六军溃不成军，根本无法指望他们来镇压王敦。纪瞻也知道自己的部队不中用，

就向司马绍推荐了流民首领郗鉴。

郗鉴是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出身世族家庭，中原大乱时被家乡百姓推为首领避难于峯山（山东邹城境内），抵抗石勒军队的进攻。他固守峯山三年，成为山东地区硕果仅存的晋朝据点，被司马睿遥授为兖州刺史。三年后，郗鉴实在抵挡不了石勒的进攻，率民众南迁，沿途将武装发展为数万人，成为江淮主要的流民武装之一。

晋朝君臣在危难时刻想到郗鉴，是因为他是“同类人”：首先他出身世族，这点在东晋时期很重要；其次，郗鉴和其他流民领袖不同，并非武人，而以儒雅著称，饱读诗书，和朝臣们有共同语言；第三，郗鉴在西晋朝廷做过官，和司马越走得比较近，和司马绍一系是同道中人。司马绍马上引之为外援，任命郗鉴为安西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率部镇守合肥，给予他统辖各部流民部队的权力。说个题外话，这个郗鉴后来把女儿嫁给了书圣王羲之，女婿比老丈人要有名得多。

王敦得知郗鉴镇守合肥，忌惮这支流民武装，便想出了明升暗降的招数，上表朝廷推荐郗鉴任尚书令。尚书令掌握朝政政令中枢，是实际上的宰相，可惜不统军，郗鉴如果担任此职就失去了对本部流民的指挥权。司马绍尚未具备和王敦翻脸的实力，不得不召郗鉴入京就职。郗鉴上任途中经过姑孰，被王敦扣留。党羽劝王敦杀掉郗鉴，王敦没有听，软禁了郗鉴几个月后，最终放他去了建康。

王敦开始留意铲除司马绍所倚重的大臣，以防司马绍成了气候。温峤是司马绍倚重的另一位大臣，担任中书令。王敦就要求调温峤到自己幕府担任左司马，司马绍还是只能答应。温峤来到王敦身边后，虚与委蛇，身在曹营心在汉。

王敦对幕僚沈充、钱凤几乎言听计从。沈充是吴兴沈氏子弟，企图依靠王敦来提升家族权势，前往东南地区推行王敦的政策。他听命

于王敦，杀戮义兴周氏，蓄养力量，准备配合王敦夺权。长期在王敦身边的就是钱凤。温峤假意和钱凤交好。钱凤出身寒门，也希望仰仗温峤提升名望。温峤逢人就称赞：“钱世仪（钱凤的字）精神满腹。”钱凤大喜，和温峤成了好朋友，在王敦面前力保温峤。温峤在王敦身边担任左司马有惊无险。

适逢丹阳尹出缺。丹阳尹虽是一郡太守，但因为辖区内有首都建康和长江要害，地位相当重要。温峤有意竞争丹阳尹，借机逃离王敦，就对王敦说：“丹阳是咽喉之地，朝廷任命的人不会和明公一心。明公宜自选其才。”王敦觉得有理，就问温峤：“谁能够胜任？”温峤马上推荐了钱凤。钱凤以为是温峤抬举自己，投桃报李，推举温峤担任丹阳尹。温峤佯装推辞，王敦不听，奏请温峤出任丹阳尹，为他设宴饯别，暗中嘱咐他窥察朝廷动静。

温峤担心走后钱凤回味过来制止自己上任，在宴会上给钱凤敬酒的时候佯装酒醉，用手板击落钱凤的头巾，变脸斥责：“钱凤，你是什么人，我温峤祝酒你胆敢不喝？”王敦以为温峤醉了，把双方劝解开。温峤在向王敦道别时涕泪横流，三次出门三次返回，无限眷恋。第二天，钱凤果然想明白了，提醒王敦：“温峤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并且与庾亮有深交，不能信任。”王敦反而责备钱凤：“温峤昨天醉了才斥责你，你怎么能转身就诋毁他呢！”温峤安然回到建康，把王敦的虚实和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司马绍。王敦知道受骗，勃然大怒，大骂温峤。

王敦喜欢侄儿王允之，留他在身边。一天，王允之在王敦的床上休息，听到王敦在外面和部下讨论篡权的计划。王敦突然想起床上还有王允之，赶紧过来查探。王允之早有准备，倒头假睡，还抠出口水沾染被褥床单，让王敦相信自己已熟睡多时，骗过了王敦。后来王允之回家告诉了父亲王舒，王舒和王导商量后上报给司马绍。所以，王敦的篡位计划在家族内部都没有得到支持，且早在司马绍的掌握之中。

324年，王敦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人将死的时候，头脑都特别清醒。王敦意识到自己和王家的力量都不能推翻东晋王朝，而在无力推翻朝廷的情况下做与朝廷不和的权臣是没有前途的。王敦没有儿子，兄长王含把儿子王应过继给他。病重的王敦很明白王应的年纪还太小，担心自己死后王应掌控不了部队。他给部属设计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解散军队，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中策是退兵武昌，屯兵自卫，同时和朝廷和睦共处；下策是趁自己还活着，集中全力推翻朝廷，万一侥幸就能开创一个新王朝。钱凤和沈充等人要的是当开国元勋，要的是荣华富贵，一致认为王敦的下策是上策，决定挟着王敦的余威，兴兵作乱。

王敦身不由己，便由着下面的人造反。他自命为扬州牧，并大肆任命党羽为朝官和地方官吏。更是假传圣旨拜王应为武卫将军，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让沈充在江东起兵响应。司马绍于是正式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理当迎战，无奈身体每况愈下，只好委派王含率领水陆大军，气势汹汹地杀向建康。第二次王敦之乱爆发。

战争开始后，司马绍着戎装跨骏马，仅带两名随从去王敦大营，仔细侦察营中虚实。当时王敦正卧床观书，累了以后打盹，迷迷糊糊中梦见太阳在营垒上空盘旋。他心中一动，醒来惊呼：“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马上派出轻骑搜索营垒附近。王敦部下士兵也发现有晋军探子侦查，觉得司马绍不是常人，向上报告。司马绍三人很快就被王敦的骑兵追上了。

情况紧急，司马绍看到路边有个老太太，就把御用的七宝鞭递给她，嘱咐说如果有骑兵追来就拿鞭子给他们看，然后又用冷水把马粪浇透才骑马再逃。一会儿，追兵赶到，看到老太太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黄胡须的骑马人经过。老太太说看到了，跑过去很久了，说完把七宝鞭拿给追兵看。七宝鞭镶金嵌玉，引起追兵围观，追兵又发现马粪已冷，相信司马绍已经跑远，放弃追赶，快快而还。

司马绍回到建康，郗鉴建议朝廷征召苏峻、祖约等人入卫京师。司马绍采纳了。苏峻、祖约等人觉得王敦胜算不大，纷纷出兵饮马长江，护卫建康。在军力对比上，王敦并不占优势。讽刺的是，王导是政府军方面的大都督，总督各军与王敦作战（这也算是司马绍的过人之处）。王导是个头脑很清醒、很务实的政治家，知道王敦病重且失去了人心，就坚定地站在了司马绍的一边。他扬言王敦已死，带着建康的王氏家族子弟为王敦发丧，让大家以为王敦真的死了。政府军士气大振，叛军气焰受挫。司马绍适时下诏细数王敦之罪，表示除了要治罪王敦和钱凤，“余众一无所问”。

王敦见诏暴怒，病势更加沉重，不能统兵打仗，命令王含起兵。324年秋七月，王含率水陆大军五万杀向建康，攻至长江南岸。温峤则焚烧秦淮河上的浮桥，率军固守北岸。司马绍意气风发，要带兵应战。郗鉴拉住他，建议坚守建康，以逸待劳，等王敦军队锐气过后再联合援兵痛击。司马绍还是组织勇士，夜渡秦淮河偷袭王含大营，大败之。王敦听到王含失利的消息，哀叹：“我兄长就是个老婢；门户衰败，大势去矣！”他用最后的力量起身，要亲赴前线，无奈病入膏肓，挣扎起来后马上又躺倒在地。临终前，王敦叮嘱王应：“我死后秘不发丧，一定要把建康打下来！”说完，阖眼而逝，时年五十九岁。

嗣子王应果然不给王敦发丧，只是草草将他埋在营帐中，然后自己去花天酒地了。纸包不住火，几天后大军不见指挥和命令，面对晋军的攻势节节败退，渐渐知道王敦真的死了，于是兵败如山倒。王含、王应和钱凤仓皇西逃。另一个党羽沈充正从东边向建康进攻，无奈大势已去，逃亡途中被旧将所杀，首级被传给了朝廷。钱凤逃到江州，被地方太守所杀。王含、王应抛弃王敦亲手带起来的军队，一路逃到荆州投靠族人、荆州刺史王舒。王舒不是王敦那样的豪杰，也不是王含那样志大才疏的小人，做出了最平稳的选择：大义灭亲。他把王含父子俩痛殴一顿后扔进长江喂鱼去了。

王敦势力烟消云散。

平定王敦之乱是晋明帝司马绍最大的政绩。战后，他果真没有株连他人，冻结了对王敦党羽的追究。王敦之乱在战争期间并没有造成大的破坏，战后又没有株连杀戮导致社会动荡，整个南方付出的成本比较少。司马绍处理得当，得到了世家大族和百姓的支持。之后，司马绍一度宠爱美人宋祎（huī）。宋祎国色天香，善吹笛，是石崇爱妾绿珠的弟子。宋祎没有名分，且司马绍的宠爱有些过分，群臣纷纷进谏，要求驱逐宋祎。司马绍也能忍痛割爱，竟然问群臣谁想要宋祎。大臣们面面相觑，最后吏部尚书阮遥斗胆提出了申请，司马绍还真把宋祎送给了他。

太宁三年（325）秋，晋明帝司马绍病死，只有二十七岁。太子司马衍即位为帝，史称晋成帝。

有枪就是草头王

—

苏峻是山东掖县人，出身一方世族，担任过郡主簿。北方大乱时，苏峻聚拢了家乡百姓结垒自守，后来在永嘉南渡的大潮中率部众泛海南行来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因此苏峻也算是南下的北方世族之一，不同的是，苏峻的势力没有体现在官爵和封山占泽上，而体现在始终掌握一支流民武装上。晋元帝司马睿时期，朝廷与北方胡族政权对峙，全赖苏峻这样南下的流民武装领袖。苏峻先后担任东晋淮陵内史和兰陵相，既是朝廷命官，又是所统流民的首领。

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时候，司马睿招苏峻带领部队南渡长江“勤王”，苏峻没有从命，而是率部在江北观望。对他来说，谁当皇帝并不重要，司马睿和王敦没有什么区别。王敦第二次叛乱的时候，晋明帝司马绍又招苏峻率部“勤王”。这次苏峻带着部队来了，因为他看到王敦不得人心，勤王有利可图。果然王敦败亡后，苏峻因为立有战功，被提升为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封邵陵公。此时苏峻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东晋朝廷视他为江北重镇，希望他能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事实是苏峻自恃实力不断强大，逐渐骄横起来，并心怀异志，招纳亡命之徒，隐匿罪犯和流亡户口以扩充部队。

太宁三年（325）晋明帝司马绍英年早逝，五岁的晋成帝即位。国舅庾亮内靠庾太后，外得世族支持，以外戚身份辅政。苏峻原以为晋明帝会命他为顾命大臣，掌握政权，不想被庾亮横抢了过去，愤愤

不平。庾亮觉察到了苏峻勒兵江北对朝廷的巨大威胁和苏峻的不满情绪，力排众议，征苏峻到朝廷担任大司农，意图通过明升暗降的方式剥夺苏峻的军权。苏峻多次拖延不赴任，又请求去青州荒凉郡县任职，都被庾亮拒绝。庾亮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催促苏峻上任，最终在咸和三年（328）逼反了苏峻。

庾亮为朝廷利益考虑，有心办成几件事情，可惜不讲方式方法，结果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综合庾亮一生的事迹来看，他有心光复晋室皇权，却不知道他所效忠的晋朝皇帝本来就是世家大族们裱糊的一座简易房，用来遮风挡雨而已，没有几个人会出钱出力加固和装饰房子，加上个人能力有限，就更不得人心了。庾亮一辈子干的事情，削弱强化皇权也好，支持北伐也好，都没有成功。

这不，苏峻就以讨庾亮为名，起兵反晋了。他不仅自己造反，还邀请了同为南下世族兼流民武装领袖的祖约一起造反。

祖约是祖逖的弟弟，在西晋担任过成皋县令，永嘉末期随哥哥祖逖南下。和哥哥热衷北伐不同，祖约主要在司马睿身边做掾属。祖逖死后，祖约接任了哥哥的豫州刺史，统领哥哥留下的武装力量。任命之初，祖约同父异母的哥哥、光禄大夫祖纳就秘密向司马睿进言：“我弟弟祖约内怀陵上之心，可以使用他，却不能让他独掌一面，不然恐怕会作乱。”司马睿没有采纳，时人也以为祖纳和祖约因是异母兄弟，嫉妒祖约富贵，才有此言。事实证明祖约的确不是做一方藩镇的料，上任后没有驭下之才，导致祖逖留下的部队军心浮动，战斗力大减。王敦叛乱时，祖约率部“勤王”占领寿阳（今安徽寿县），驱逐了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事后因功封镇西将军，驻屯寿阳，为朝廷的北部屏障。

庾亮执政后，祖约也忌恨晋明帝没有让他担任顾命大臣，对庾亮不满。他不仅多次向朝廷申请开府，遭到庾亮拒绝，连同他向朝廷申办的许多事情，也遭到了庾亮的否决。祖约身处前线，曾遭到后赵军

队猛烈进攻，屡次向朝廷请求增援，结果连一个援兵的影子都没看到。后赵退兵后，朝廷却商议要在南边挖涂塘遏制北方骑兵的进攻，祖约见本部兵马被划在战壕之外，以为朝廷要抛弃自己，于是顿生反叛之心。

接到苏峻的造反邀请后，祖约马上响应，派侄子、祖逖的儿子、沛郡内史祖涣和女婿、淮南太守许柳率领本部兵马和苏峻会师。两军会合，带上韩晃、张健等将领，浩浩荡荡向建康杀去。

苏峻和祖约的武装主力是北方逃难的流民，他们久经磨难，战斗力远强于南方未经疆场的政府军。加之庾亮指挥频频出错：先是不听劝告，没有布置坚守江北；忠心耿耿的江州刺史温峤请求带兵勤王，庾亮又不准，对温峤说：“我更担心荆州的陶侃造反，你的任务是监视陶侃，不准越过雷池（今安徽望江县境）一步。”

苏峻反叛进展顺利，屡次战胜晋军，乘风渡过长江，很快占领了建康城外的蒋山。这是五月间的事情。庾亮亲自领兵在建康南门布阵，不料军队士气崩溃，官兵不断抛弃武器逃散。庾亮只好与几个兄弟上船逃往浔阳（今江西九江）。苏峻抓住晋成帝司马衍，逼他迁居石头城（今南京城西）。司徒王导极力争辩，苏峻不听。司马衍哭着登车而行，在一片恸哭声中成了苏峻的人质。

流民武装的缺点这时候暴露了出来，那就是破坏性极强。他们在山上放火，火借风势烧向都市，将建康的台省、诸营、寺署烧为灰烬。建康大乱，流民武装顺利攻陷宫城，苏峻纵兵大掠。东晋朝廷积蓄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等，都被乱军抢劫一空。流民武装还驱役百官，包括著名世族、光禄勋王彬在内的百官都被当成苦力捶挞，强迫他们到蒋山做搬运工。乱军抢劫百姓，往往将士人和女子抢得赤身裸体，可怜的百姓只能用茅草遮盖身体，连茅草都找不到的就只能坐在地上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建康内外、长江南北。苏峻和流民武装迅速失去了百姓的支持，遭到了江南上上下下

下的反对。

苏峻也做了一些政治建设工作。他劫持了晋成帝，矫诏大赦，除了庾亮兄弟不在赦免范围外，其他人都赦免无罪，希望以此来笼络人心。他自封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封远在寿阳的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封许柳、祖涣等人为太守或将军；又派韩晃、张健、管商等部将攻略长江下游各地。

庾亮逃到浔阳投靠江州刺史温峤。温峤有救国赴难之心，无奈有心无力。江州是个小州，温峤又兵少将寡，不熟悉军事，无力平定苏峻之乱。于是，温峤邀请荆州刺史陶侃出兵同赴国难。

二

终于又轮到陶侃上场了。

陶侃在广州刺史的任上，遇到了王敦两次作乱，虽然两次他都明确表示拥护朝廷，并且实际介入，但没有直接与王敦兵戎相对。然而在王敦之乱平定后，司马绍却任命陶侃回任极端重要的荆州刺史一职，还让陶侃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等于将长江中游的军政都交付给了陶侃。这是对陶侃莫大的信任，更是司马绍的精心安排。司马绍致力于加强皇权，采取的手段主要是在世家大族和大臣内部制造权利均势。所以，他提拔庾亮来制约王导，在世族内部制造均势；提拔江东士族，在南下世族和江东士族间搞平衡。司马绍任命陶侃主持荆州，固然看重陶侃的辉煌经历和崇高声望，更有在寒门地主和世家大族之间、在各大藩镇之间制造均势的打算。同时，司马绍也任命应詹为江州刺史。应詹既是讨伐王敦的功臣，又与陶侃同在刘弘麾下做过官，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庾亮主政后，把削藩的刀子也伸到了手握重兵的陶侃头上。应詹死了，庾亮就派出身老世族且和自己关系深厚的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应詹死前给陶侃写信，希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大约是看出了陶侃对朝廷的不满情绪。陶侃也和苏峻、祖约一样，以为自己能被晋明帝指定为顾命大臣，结果发现上台的是庾亮，自然对庾亮不满。苏峻之乱是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陶侃也有种在一旁看热闹的心理。接到温峤的出兵邀请后，陶侃答复说：“我是个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干预朝政。”温峤多次劝说，陶侃就是不答应。

苏峻这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杀害了陶侃的儿子陶瞻。陶侃晚年丧子，悲痛万分，马上戎服上阵，集结部队，日夜兼程东下讨伐苏峻去了。

荆州大军先到江州。江州官民都以为陶侃要诛杀庾亮，一为泄私愤，二为谢天下。庾亮有知错能改的优点，主动跑到陶侃面前谢罪，谦虚地承认错误，请求陶侃处分。要知道，庾亮出身北方世族豪门，从小就名声在外，是名士翘楚，竟然主动向寒门小吏出身的陶侃谢罪。陶侃大为意外，惊呼：“庾元规（庾亮的字）乃拜陶士行（陶侃的字）邪！”既然庾亮引咎自责，陶侃也就与他冰释前嫌了。于是陶侃与庾亮、温峤合兵一处，准备收复建康。

东晋的重点一为扬州，一为荆州。扬州已是苏峻和流民武装的天下，只有同样兵多将精、久经沙场的陶侃和荆州军才有可能与苏峻一战。因此庾亮和温峤主动推举陶侃为盟主，号令天下讨伐苏峻。苏峻得知陶侃起兵后，分兵抵抗。庾亮率军冲在最前面，但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很快将庾亮的部队打败。庾亮撤退回来向陶侃谢罪，陶侃答：“古人三败后胜，君侯才败了两回，当今事急，不宜数耳。”诸将知道后，都不以失败为意，继续催军奋战。

却说北方南下的流民武装除了苏峻、祖约两支外，还有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的郗鉴一支。郗鉴拥戴皇室，率本部兵马勤王，向陶侃

提出要扼守京口（今江苏镇江），阻碍苏峻从建康向东边州县的侵蚀，得到了陶侃的同意。郗鉴于是自广陵渡江占领京口，对苏峻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之前，长江边上的建康和东边苏南、浙江州县的联系缺乏畅通的渠道，郗鉴经营京口后，使之成为建康与东方联系的枢纽。京口开始崛起。

战争初期，苏峻的部队东西抄掠，胜多败少，又有北方的祖约遥相呼应，占据优势。勤王诸军胜少败多，不免气馁。温峤的江州军又缺粮，影响了士气，全靠陶侃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劝慰众人不要轻举妄动，要做长期战斗的准备，又分粮草接济温峤，渡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

咸和三年（328）七月，祖约被后赵军攻击，溃败至历阳。九月，晋军烧毁了苏峻大军在句容、湖熟的军需积累，流民武装开始缺衣少粮，战争局势开始逆转。陶侃率军队急攻石头城，触发了决战。苏峻和儿子苏硕、部将匡孝率领八千人迎战。苏峻派苏硕和匡孝带领数十骑进攻晋将赵胤，竟然大败赵胤。这个只能算是特例的小胜利冲昏了苏峻的头脑，他看到赵胤的部队大败而逃，大喊：“匡孝能败敌，我反倒不如他吗！”于是苏峻以主帅之躯撒下大部队，也率领数名骑兵向北突击晋军。晋军大喜过望，大批大批地向苏峻几个人涌来，苏峻见无法取胜，准备逃回，不想坐骑失足跌倒。陶侃的部将彭世、李千等望见，用长矛投射，苏峻坠落马下，被晋军追上并斩首，落得刚割肢体、骨骼焚烧的下场。苏峻就这么戏剧性地死了，勤王三军将士都高呼万岁。

苏峻死后，建康的余部推举其弟苏逸为主帅，选择闭城自守。其子苏硕在战场上搜索苏峻的尸骨，一无所获，大怒之下挖掘庾亮父母的墓地，剖棺焚尸。苏峻散布各地的部将不是投降就是逃亡，武装呈崩溃之势，只有部将韩晃知道苏峻死讯后还引兵向建康收缩，企图负隅顽抗。

咸和四年（329）正月，历阳被攻破，祖约北逃后赵。二月，晋军攻破石头城，苏逸被杀，晋成帝脱险，这意味着苏峻之乱基本平定。余部韩晃、张健等在吴兴等地顽抗了一些年月，最后在晋军和世族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从军事角度说，苏峻之乱的结束标志着东晋初期叱咤风云的流民武装的消亡。之前，流民武装是南方军事力量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战斗力很强；之后，南方军事力量转弱，基本为政府武装，流民武装成了没有领袖控制的半独立武装。

三

苏峻之乱也被称为“苏峻、祖约之乱”，因为祖约也参与了叛乱，算得上流民武装的二号人物。可惜祖约的能力实在太差，没有给苏峻帮上什么忙，参加叛乱几乎就是自取灭亡。

祖约派侄子、女婿率主力参与苏峻叛乱后，自己的大本营竟然被颍川人陈光的少量军队攻破。侥幸得很，祖约有名随从名叫阎秃，长得和祖约很像，陈光误以为阎秃就是祖约，反而放跑了祖约。祖约翻墙逃亡，纠集部队反攻陈光，陈光投奔石勒。祖约的许多部将对主帅大失所望，纷纷暗中勾结石勒，约为内应。石勒便趁火打劫，南下进攻祖约。部队溃败，祖约逃奔历阳。南逃后，他还想有所作为，便派侄子祖涣进攻皖城，希望能占领新地盘，结果祖涣被晋军打败，空耗军力。等到晋军进攻历阳时，祖约无力再战，连夜北逃，余部投降晋军。河南的这支流民武装至此也烟消云散了。

祖约率领数百人投靠石勒，石勒看不起祖约的为人，长期不见他。石勒的谋士程遐说：“天下初定，应当显明逆顺，忠君报国者该

赏，背叛不臣者该惩，这样天下才能归伏大王。祖约这样的人不应该收留，况且祖约来到我们这以后大引宾客，抢夺乡里先人田地，民怨已大。”于是石勒设计，举办宴席欢迎祖约及其子弟。宴会当日，石勒本人装病不来，只有程遐出面招待祖约及其子弟。祖约敏感地知道这是鸿门宴，可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大醉而归，抱着外孙痛哭流涕。果然，祖约和亲属百余人在会后遭到屠杀，妇女伎妾都被后赵罚没。

祖逖组建武装的时候，有个奴仆名叫王安，是羯族人。祖逖非但没有歧视王安，还待之甚厚。北伐时祖逖对王安说：“石勒是你同族，你去投奔他吧。我这也不在乎少你一人。”他给了王安厚资，让他回到同胞那里。王安在石勒部下，渐积军功成为将军，祖氏被族诛时，王安也在场。他偷偷把祖逖年仅十岁的庶子祖道重藏了起来，把他安顿在佛寺中。后赵灭亡后，祖道重南归东晋，祖逖家族才得以延续血脉。

苏峻之乱平定后，陶侃因功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仍兼荆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刘胤因功升任江州刺史，在咸和五年（330）被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延续和稀泥的方法，放认郭默的罪行，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陶侃指责王导的纵容，迅速起兵江州，将郭默斩首，自己兼任了江州刺史。实际上，王导默认郭默夺权，未尝没有笼络郭默而约束陶侃的意思。王导一贯在中庸的政策表象下尽可能地实现平衡，来维护中央朝廷的稳定，这是他比庾亮高明的地方。而陶侃刚正强硬，表面是雷厉风行地惩办杀人夺权的郭默，实际上也未尝没有争夺江州的意图。占领江州后，陶侃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权力煊赫不亚于当年的王敦，人们开始担心陶侃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王敦。经过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后，朝廷力量大为削弱，可以依靠的勤王藩镇屈指可数，如果陶侃叛乱了，怎么办？

私下里还真有人怂恿陶侃起兵，谋取更大的荣华富贵。陶侃一介武人，也对朝廷的一些弊政多加指责，让建康的衮衮诸公慌张了一阵

子。不过陶侃始终没有造反，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患病，上表请求辞职，并且主动派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不等朝廷同意就离开了荆州任所。离开前，陶侃将军资、器仗、牛马、舟船都造册登记，封闭仓库，等着朝廷派人接收。没几天，陶侃就在前往长沙的途中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东晋朝野松了一口气，都对陶侃充满敬意。

纵观两晋南北朝，陶侃可能是最尽忠职守、大公无私的将领。在举国清谈、享乐主义横行的社会中，陶侃终身勤于公事，恭而近礼，整天端坐处理政事。他掌握东晋一半领土的政务和军事，事情头绪很多，但没有遗忘疏漏一件；远近所来书信公文，无不亲笔回信。陶侃办起事来笔无停滞，从不让前来办事的人在门前等待过久。在他之后，东晋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忠臣干将。

东晋北伐：我就是意思意思

—

陶侃死后，东晋的军权被外戚庾氏掌握。庾亮经历过苏峻、祖约之乱后，掌握了荆州军权，胸中的雄心壮志又开始蠢蠢欲动。他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选择襄阳方向为主攻点，组织军队准备收复河南。《晋书》评价庾亮“智小谋大，才高识寡”，大致说他不是干大事的料。其实这样的用词已经很委婉了。庾亮的缺点是不明世事、不通人情。

东晋是在各大世族支持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皇室和世族势力的均衡、斗争推动着王朝的发展。收复中原必将破坏这种均衡，引起上至皇室下至世族势力的阻挠破坏，祖逖就是前车之鉴。庾亮高调地北伐，失败了会耗费东晋的实力，成功了会抬高庾氏势力，打压其他世族。很多史学家相信，庾氏力主北伐发自私心，目的是借北伐揽权充实家族的根基。庾亮本来就掌握了地方军权，内部又有庾太后的支持，已经遭到其他人的嫉妒了，如今更是成了大家的眼中钉。

庾亮在襄阳意气风发，全力组织北伐军。北伐的道德力量很强，其他世族不方便公开反对，就暗中捣乱。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庾亮向各地征调军需粮草，结果所得寥寥。其他人不给庾亮军队，也不给他粮秣，结果整件北伐大事就成了庾亮在荆州的“地方行为”。不巧的是，庾亮北伐的时机也不对。北方的后赵政权相当强大，庾亮的北伐仅局限在现在的河南南部地区，还屡战屡败。荆州军败了，朝野的冷

嘲热讽蜂拥而至。庾亮壮志难抒，郁郁而终，在340年正月病逝。兄弟庾翼继任荆州刺史，庾冰在朝中配合。庾氏依然掌握朝廷实权，继续推动北伐。

342年，二十二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病死。他五岁即位，由母后和舅氏（庾亮、庾翼）主政，经历祖约和苏峻之乱，虽然在位十八年，却一无所成。庾冰、庾翼力排众议，拥立晋成帝的同母弟弟司马岳即位，史称晋康帝。司马岳兄终弟继，表露了庾氏的私心。因为司马岳是庾氏的外甥，他的即位可以方便庾氏继续专权。不幸的是，司马岳在即位的第三年（344）也死了，年仅二十三岁。

庾冰、庾翼出于私心，继续反对司马岳的儿子即位，主张拥立长君。他们推出司马睿的幼子、曾经和司马绍争夺皇位的会稽王司马昱为新君人选。司马昱为晋成帝、晋康帝的叔叔，按说没有机会登基，一旦登基自然会感激庾氏，再次方便庾氏掌权。以宰相何充为代表的其他世族势力强烈反对，司马岳又不是没有儿子，为什么要搬出皇叔来即位呢？晋康帝临终前，也赞成何充的主张，立两岁的儿子司马聃为皇太子。晋康帝一死，何充等人就抢着发布“遗诏”，拥戴司马聃登基，史称晋穆帝。庾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不方便再干政了，而庾氏兄弟在皇位更替上输了一仗，威望和势力大减。

一个政治人物的作为要以权力的巩固为基础。如今，庾氏的权力根基被削弱，他们推动的北伐事业也就成了强弩之末。

晋穆帝即位后，庾冰在朝中不像以往那样顺畅了，遭到了其他大族的排挤，不久便去世了。荆州的庾翼被孤立，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到防备朝廷上去。他离开北伐前线襄阳，委托亲信和儿子留守，自己回到夏口，处理与朝廷和其他世族的关系。在夏口，庾翼还不忘修缮军器囤积粮草，为北伐做准备。他的精神是好的，但所处境境却越来越不顺利。永和元年（345）夏，庾翼在夏口去世。庾翼的死，标志着庾氏发动的东晋第二波北伐浪潮的落下。

庾翼临终上奏由儿子庾爰之代理荆州刺史。庾氏试图将荆州固定为自家势力范围，令其他世族的人嗤之以鼻。朝中根本没有人支持庾爰之。荆州为国家重镇，朝臣一致声称荆州刺史不能为世袭职位。丞相何充就认为：“荆楚，国之西门，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他推荐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其他大臣纷纷点头，只要不是庾家的人就行。于是桓温在永和元年（345）出任荆州刺史，取代庾氏获得了长江中游的兵权。

二

事实证明，何充推荐的桓温并不是好的人选。

桓温是桓彝的儿子，“少有壮志”，以本朝初期名臣刘琨、陶侃为榜样。桓彝在苏峻之乱中遇害，江播是杀父帮凶。父亲死时，桓温才十五岁，就枕戈泣血，扬言要复仇。桓温十八岁那年，江播病死了，江彪三兄弟为父亲发丧。为了防备桓温来寻仇，江彪三人都刀不离手。桓温还是混在吊唁的宾客中进了江宅，当堂手刃江彪，并追杀他的两个弟弟。东晋朝廷对世族子弟的仇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处分桓温。这件事最终让桓温获得了巨大的声望，晋明帝还把大女儿南康长公主嫁给了他。桓温成了驸马，于咸康七年（341）出任琅琊太守，很快升任徐州刺史，职位超过了父亲。

桓温和一般的世族子弟不一样。一般人是清谈为主，吹得天花乱坠，也不管能不能实现，桓温则是有胆略有能力，敢作敢为。他期待建立功业，更希望为家族博取荣华富贵。这样的人物，给他适当的权力和地位能让他为朝廷建功立业，而一旦授予他过大的权力和过高的地位，则难免会助长他的不臣之心。

桓温上任荆州刺史后，就打出了“统一天下”的旗号。那些峨冠博带的朝堂大夫起初不以为意，觉得这就是桓温新官上任三把火，折腾一下而已。不想，桓温到任的第二年（346）就孤注一掷，率军逆江而上进攻成汉政权。朝野还没缓过神来，前方就传来了桓温平定蜀地、汉王李势投降的战报。这下，东晋朝廷不得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桓温俨然在荆州称雄了！朝廷原本是为了去除庾氏割据而任命桓温，不料桓温成了新的“庾氏”。可是，桓温功勋卓著，又不得不赏。东晋朝廷只好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是高升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一方面却对桓温暗中限制，不给他兵不给他粮，明确不让桓温北伐。

桓温把北伐的旗帜摇得呼呼作响，给朝廷诸公施加了很大压力。永和五年（349），后赵的石虎死了，北方大乱。大批北方百姓南迁投奔东晋，后赵的寿春守将也投降了东晋。民间北伐的呼声高涨。桓温抓住时机大造舆论，还主动进屯安陆。如果东晋朝廷不北伐，他就准备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支持北伐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朝廷又不愿意让桓温把北伐的首功抢走，于是由建康方面出面组织了一次北伐。

这是东晋朝廷出面组织的第一次北伐。北伐军的兵力很少，只有三万人（桓温带甲十万），可见朝廷并非真心要收复中原。北伐的统帅是晋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póu）。褚裒虽是一代名士，但当大都督打仗却很外行。当时中原的形势很混乱，大批民众携家带眷南下。褚裒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组织南下的百姓，让他们做向导，直捣后赵的巢穴邺城。可惜褚裒指挥的北伐军却以接应南下民众为主，纠缠着南北边界各个城池的得失。结果让处于劣势的后赵从容组织了军队反扑。代陂一战，北上接应民众的东晋部队全军覆没。褚裒忙从彭城退到广陵。寿春的东晋将领听说统帅失败，竟然吓得烧掉军需毁掉城池南逃了。

北伐就此失败。南迁的百姓境况悲惨，要么被东晋北伐军掳掠到

江南做了奴役，要么被后赵政权掠回北方，要么在淮河两岸陷入绝境而死。褚裒败退后，惭愧不已，很快在京口（今镇江）郁郁而终。

褚裒死了，东晋朝廷还是需要把北伐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找谁来主持北伐、对抗桓温呢？褚裒生前推荐了殷浩，朝廷便征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上书推辞，朝廷就继续征召他，一直持续了四个月，殷浩才答应上任。

殷浩也是当时的名士，精通《周易》《老子》，善于玄言，名望极高。一般人都把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殷浩一再推辞官职，反而让他名望越来越高。他的名言是“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朝廷一再给他官做，庾亮、庾翼北伐时也征召他，殷浩全都拒绝。他称疾不起，屏居墓所，将近十年之久。桓温灭蜀后，威势高涨，朝廷忌惮他。当时在朝堂上主政的是司马昱，他想借助殷浩的盛名对抗桓温，就树立殷浩为扬州强藩，与荆州的桓温抗衡。

殷浩任职前也高喊北伐口号，说得头头是道。他上任的时候恰逢冉闵称帝，北方混乱加剧，正是北伐的好时机。朝廷就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主持北伐。殷浩也意气风发，向朝廷汇报了北征许昌、洛阳的计划，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北伐团队。

探究殷浩的关键措施，无非两条：第一条是引诱前秦的大臣和将领，招降纳叛，希望能够乘虚而入；第二条是利用投降东晋的胡族力量，主要是羌族姚襄的力量，让他们当炮灰打前阵。前秦苻健一度杀戮大臣，侄子苻眉自洛阳西奔，殷浩误以为前秦内部乱得一塌糊涂了，上奏请求进屯洛阳，修复西晋皇室园陵。他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甚至请求卸任扬州刺史，专镇洛阳。

后来证明前秦并没有内乱，相反却是投降东晋的将领张遇降而复

叛，打败了谢尚的晋军。殷浩主要依靠姚襄的羌族军队，却不信任姚襄，老想吞并这支部队。殷浩将姚襄部队迁徙驻地，又派人监视。姚襄也不是真心投降，一度杀害友军壮大自己，殷浩也不能制止。在进军途中，姚襄叛变，在山桑这个地方伏击了东晋大军。殷浩原本就没想利用自身力量实打实地北伐，听说姚襄造反了，吓得抛弃辎重南撤。北伐军的器械物资都被姚襄所掠。撤退途中，东晋大军逃亡的逃亡、投降的投降，损失惨重，殷浩北伐也以惨败告终。

客观地说，北伐的失败并非殷浩一个人的错，根子在东晋朝野压根就不是真心北伐，并没有动员主力、投入血本。但北伐失败的责任必须有人来承担，纸上谈兵的殷浩就成了替罪羊。尤其是桓温，早就想搬掉殷浩这块碍脚石了，连续上书痛斥殷浩误国，要求严惩。朝廷只好废殷浩为庶人，押往浙中安置。

殷浩狼狈下台后，恢复了名士做派。他口无怨言，每天都对着空气写“咄咄怪事”四个字。后来桓温掌权了，想招殷浩担任尚书令，写信告诉他。殷浩喜出望外，想回信接受并表示感谢。为了写一封完美的回信，不留下任何差错，殷浩修改了无数遍，把信装进了信封又拆开修改，前后拆封数十次。谁料，最后信封中空空如也，他竟然忘记塞入信件，发了个空函给桓温。桓温大怒，殷浩复出也就告吹了。由此可见，殷浩并非什么淡泊名利的名士，而的确是个醉心名利又空谈误国的假名士。永和十二年（356），殷浩死在了贬所。

三

褚裒、殷浩先后失败，东晋再也没有理由压制一直叫嚷着要北伐的桓温了，索性将北伐重任授予他。至此，桓温掌握了北伐主动权。

永和十年（354），桓温第一次北伐，兵分两路，他亲率四万余步骑出湖北，命令梁州方面出秦岭。桓温在蓝田、白鹿原连续击破氏族苻健的军队，推进到长安郊区的霸上，苻健据守长安城。第一次北伐可谓旗开得胜，政治影响巨大。关中百姓“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一些老年人感极而泣：“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官军！”

桓温的成功也反衬出之前东晋历次北伐战略的不当。首先是缺乏协同作战。之前的北伐不是从东边渡淮河向河南、山东，就是在西边出湖北，从来没有东西联合作战，因为东西的扬州、荆州属于不同的世族势力范围。其次，既然没有协同作战，自然也就不能整合军队和物资了。如果褚裒、殷浩等人的军队能够和桓温的荆州军队联合起来，相信成效会更大。

说到整合资源，桓温北伐依靠的仅仅是荆州的物资，经过两场恶战，推进到长安城郊后，北伐军的后勤供应出现了问题。桓温就在霸上停顿了下来，一边等待后方的军需运达，一边抢收关中地区的春麦作为军粮。关于桓温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还有其他的解释。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桓温这时候已经有了谋逆自立的野心。他想借北伐揽权立威，并非是真心收复失地；第二个说法是桓温看到前秦在关中的统治并不稳定，想在霸上坐等前秦内乱，然后乘虚而入。而从全局来看，桓温驻足不前很可能是以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遗憾的是，前秦并没有内乱，北伐军在抢收春粮上也输给了秦军。秦军收走了粮草，对北伐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桓温粮秣不继，被迫撤返襄阳。第一次北伐失败。

永和十二年（356），桓温第二次北伐。北伐的目标是叛晋的姚襄势力。叛晋后，姚襄一度游离在前秦和前燕之间，盘踞在河南洛阳、许昌等地。桓温北上击败姚襄，收复了河南地区。其中西晋首都洛阳光复，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桓温大做政治文章，建议“还都洛阳”，并建议南迁的世家大族们返乡。他这么做是有私心的。洛阳在

桓温的控制之下，让朝廷和达官显贵们都迁徙到洛阳来，不是重演“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旧戏吗？

建康的达官贵人们激烈反对桓温的建议，但“还都”的建议又是一面不能驳倒的道德旗帜，达官显贵们就从其他方面入手。首先，他们质问桓温能否守得住洛阳？如果等朝廷迁入洛阳，洛阳却失守了，不是要再来一次“永嘉之乱”吗？其次，他们说百姓南迁已经半个世纪了，早已在南方安家生根，强迫南迁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就在东晋朝臣相互猜忌扯皮之际，前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进攻河南。许昌、汝南、陈郡等地失守。洛阳守将陈佑以救许昌为名南逃，留沈劲的五百人守城。沈劲是王敦死党沈充之子，沈充背负叛逆的恶名，沈劲引为终身憾事，如今以区区五百人坚守洛阳非但不怨天尤人，反而觉得是以身殉国、挽回家族名声的良机。洛阳很快被前燕攻占，沈劲全军覆没，被俘遇害。慕容恪知道实情后，很后悔杀死了沈劲。至此，桓温第二次北伐的成果全部丧失了。

其间，东晋经历了一次皇位变革。361年，晋穆帝司马聃病逝。堂兄司马丕即位为新皇帝。司马丕不是晋成帝的长子，原本早就有希望称帝了，结果因为庾氏专权而被闲置。他苦等晋康帝、晋穆帝两个皇帝都死了，才坐上本属于他的龙椅，司马丕就是晋哀帝。桓温因为功勋卓著，被晋哀帝加封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桓温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让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桓冲任江州刺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至此，桓温成了东晋最大的实力派。除了长江最下游的部分郡县外，中下游军政大权都落入桓氏之手。

晋哀帝司马丕登基后，醉心黄老之术，服药求长生，却吃错药中了毒，死于365年，年仅二十五岁。大臣们拥立其弟司马奕为新皇帝，史称晋废帝。

369年，手握大权的桓温为了树立更高的威望，率五万人北伐前燕。开始很顺利，军队一路势如破竹。经过金城时，桓温见到自己担任琅琊太守时种的柳树已经长成老树，感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已老，桓温也年过半百。他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当北伐军推进到枋头（今河南浚县境内）时，桓温又逡巡不前。可能是桓温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胜利的信心。当时前燕军队并不弱，并且前秦已经出兵增援前燕，两国联军对付桓温。而北伐军又遇到了老问题：后勤跟不上来。这并不是因为东晋国力衰落，而是朝廷并没有收复失地的真心，加上其他世家大族不愿意桓温建立大功，一家独大，所以朝廷没有为桓温全力提供后勤保证。桓温的北伐军在前线很快就没有粮食吃了，又得知前秦援兵将至，只好烧船弃甲，撤退回国。北伐军撤退途中，缺粮少水，只能凿井而饮，又不断遭到前燕的伏击，最后只有万余人逃回南方。

惨败后，桓温把责任推卸给负责后勤的袁真，袁真不满而在寿春造反。桓温进攻寿春，直到371年才攻克。当时袁真已死，拒守城池的袁瑾被杀。尽管找了替罪羊，桓温的威望仍然大减。桓温便想用废立皇帝的办法来立威。371年，桓温废司马奕为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帝。司马昱就是简文帝。他原本可以成为东晋的第二个皇帝，结果在晚年才成了东晋的第八个皇帝。他的雄心壮志早已消磨光了，在位就是个傀儡，一切朝政由大司马桓温独断。

长期手握大权，桓温也厌倦了“北伐—失利—再北伐”的老路，有了更大的“追求”。他抚枕而叹：“人生在世，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桓温开始以王敦为榜样，二人处境也惊人的相似，王敦曾经和皇位一步之遥，而桓温的手已可以摸到龙椅了。

先拿灭蜀练练手

—

成汉的开国君主李雄将国家推向了安定繁荣的顶峰，算得上一代明君。遗憾的是，一代明君也有失误的地方。

李雄在接班人问题上犯了错误。李雄个性与人为善，是个好人。他的大哥李荡也是雄心勃勃、智勇双全的人才，可惜在缔造政权最艰难的时刻阵亡了。李雄认为是因为李荡的不幸才有了他称雄称帝的幸运，自己的皇位原本应该是李荡的。后来军阀杨难敌投奔李雄，不久又叛乱。李雄派侄子李琰、李稚征讨杨难敌，两人因为轻敌中了埋伏，都战死了。李琰、李稚是李荡的儿子。李雄很悲痛，几日吃不下饭去，一说起这事就痛哭流涕，深深自责，觉得更对不起故去的哥哥李荡了。所以，李雄比较倾向于死后将皇位传给李荡的儿子。

李雄在征战途中伤痕累累，头部的伤口有一次化脓。他自己的十个儿子当了皇子后，生活奢侈淫逸，对父亲的病情看得很淡，并没有真正关心过父亲。结果，李雄和儿子们的感情也很淡。反倒是李荡的儿子李班日夜照料在旁，还用口给李雄吸脓。李班这个孩子也是与人为善的人，在性情上与李雄相似。李雄就不顾群臣的反对，一意孤行立李班为太子。

大臣们从现实出发，认为各位皇子都已成年，盘踞各处，如果舍弃十位皇子传位给侄子，必然引发内乱。李雄说：“我在起兵之初，本不觊觎帝王之业。值天下丧乱，群情义举，诸君推逼我为帝。王朝

的基业，功由先帝，我大哥是嫡长子，本应登基，不幸薨于戎战。李班是嫡长子之子，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叔叔李骧与司徒王达都反对：“传位以嫡，本身就是为了防止皇位篡夺，不可不慎。历史上有许多不传位给儿子导致内乱的先例。愿陛下思之。”李雄一意孤行，固执地传位李班。李骧是皇叔，地位崇高，也劝不了李雄，只能退出来悲伤流涕：“本国的大乱就要开始了！”

334年，李雄病逝，李班即位。李骧的担心马上得到了验证。李班宽厚老实，疏于防范，或者压根就没把人往坏处想。可李雄的儿子李越对李班即位极为不满，赶回成都奔丧时和兄弟李期联手，就在灵堂上杀掉了李班。李期登基。

李期称帝后，成汉朝政日坏。国家承平日久，李雄的子孙们位居要职，贪图享受，早就把俭朴勤政的作风抛诸脑后。李雄与民为善、勇于纳谏、君臣携手的风格荡然无存，李期本身就是懒惰的庸才，又任人唯亲，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庸庸碌碌，坐享俸禄而已。国家形势很快便江河日下。

李期本人无才无德，却猜忌声望高、地位重要的宗室成员。汉王李寿是李骧的小儿子，按辈分是李期的堂叔，历任要职，镇守在外。李期对李寿很疑忌，派人监视李寿，还将李寿的义弟毒死。李寿十分恐惧，于338年率军进攻成都，公然造反。李寿的儿子李势当时在成都当校尉，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迎父亲进城。

李期没料到李寿真的造反，而且转眼就杀到了眼前，不得不安抚李寿。李寿要求“清君侧”，李期就杀掉了李越和自己的那帮大臣，自断了臂膀。几天后，李期便被废黜为邛都县公，遭到软禁。不久后自尽，时年二十五岁，在位四年。

李寿起兵时，歃血盟誓，说起兵夺权后要向晋称藩。这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外部支持，洗刷自己造反夺权罪过的幌子。他都没想到夺权

会那么容易，如今真的成了一国之主，李寿就开始犹豫了：是真的向东晋称藩呢，还是自己披上龙袍过过皇帝瘾？他决定用占卜决定命运。他占了一卦，卜者解读说李寿有几年皇帝的命。亲信任调马上鼓动说：“做一天皇帝就很了不起了，何况几年！”另一个亲信解思明不以为然，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了百世诸侯（如果向东晋称藩，封侯是少不了的）！”李寿下了决心，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一天皇帝能做就做一天皇帝。抱着“过把瘾就死”的心理，李寿称帝，改国号为汉，开始骄奢淫逸的皇帝生涯。

他一心享乐，大兴土木，夺人妻女；喜怒无常，又喜杀戮，滥施淫威，致使上下离心，民怨沸腾。343年，李寿病逝，足足过了五年的皇帝瘾。儿子李势即位，风格和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什么事情都务求奢侈，根本不管百姓死活。百姓们不满，李势就滥用严刑峻法，予以压制。

统治者的内讧仍在继续。李势没有儿子，弟弟李广就请求立自己为皇太弟。李势不知道怎么想的，坚决不答应。李广转而去求大臣马当和解思明前去劝说。马当和解思明二人是老臣了，朝政之所以没有彻底崩盘全靠他们支撑着。两人从政权长远利益考虑，一再劝说李势立弟弟为继承人。李势听不进去，怀疑李广和两名大臣谋权篡位，痛下杀手，捕杀了李广、马当和解思明。短时间内连续的内讧，严重削弱了成汉的实力。

成汉王朝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稍有变故就会轰然倒塌。

二

四川地区处长江正上游，对中下游产生君临态势。四川水军出三

峡，顺江而下，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两湖地区。所以建国中下游的东晋王朝和成汉相比，在军事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建国开始，东晋内部就存在伐蜀的倡议。庾亮当权后，就开始筹划西征，但最终没有成行。

东晋一直没有伐蜀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四川易守难攻，比如担心北方政权乘虚南下，最重要的原因是东晋政权建立在各个世家大族的支持上，内部维持着微弱的均势。如果有人伐蜀成功，那可就立了盖世武功，势力增长，势必破坏均势，影响政权稳定。所以大家宁愿成汉政权盘踞上游威胁自己，也不愿意看到有人伐蜀成功。

永和二年（346），实权人物桓温再次提议伐蜀。他的目的恰恰是其他世族最担心的：通过对外战争提升声望和实力，为掌权乃至篡位做准备。

此时伐蜀具备有利条件，那就是成汉自身虚弱。但桓温的部属们提出了更多的不利条件，比如顾虑后赵大军南下、朝廷不同意不支持，等等。江夏相袁乔力排众议，认为江防已固，可以腾出手来做点事情了。后赵军力强盛，成汉虚弱不堪，进攻成汉比进攻后赵划算。至于朝廷的羁绊，袁乔认为方略大事不必取得“一致同意”再施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乔的意见说到了桓温的心里去了，他下定决心，给朝廷上表要求西征，不等朝廷回复就在当年十一月率领自己任命的益州刺史周抚西征成汉，袁乔率两千人为前锋。

桓温的战表到了建康，朝廷果然不同意，可人家已经出发，你再反对也没有用了。朝堂上的大小官员们干脆议论起桓温此行能否成功，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桓温失败了，大家幸灾乐祸；成功了，大家的苦日子就来了。多数人觉得成汉地形险阻，路途又远，桓温兵力薄弱，取胜希望不大。刘惔却认为桓温必胜，众人问他根据何在。他说：“从桓温的赌博表现上可以推断出来。他的赌博手段极精，非胜券在握绝不出手。我担心的是，灭蜀之后，朝廷都要受控于他

了。”大臣们听说此言，不禁忧心忡忡起来。

347年春，桓温大军至青衣（今四川青衣江）。李势命右卫将军李福、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咎（zǎn）坚率大军拒晋军。

成汉将领内部就作战方针出现了分歧。李福和李权想设下埋伏待晋军到来，而咎坚想正面迎敌，把桓温消灭在陌生的环境里。分歧的结果是分裂，咎坚带上本部兵马，和李福、李权分道扬镳，向东搜索前进，摩拳擦掌要和桓温较量一下。不知道是情报工作没有做好，还是四川地区过于广袤，咎坚的军队竟然没有遇到晋军。桓温和他走的不是同一条路，避开了咎坚的阻拦，很快推进到成都南面。三月，晋军攻克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地区）。李福、李权得报后，迅速向彭模杀来。

下一步怎么办？是坚守彭模迎战李福、李权，还是放弃此处攻占别处？有人提议趁成汉主力没有到达，分兵攻城略地，在成都周边来个天女散花。袁乔坚决反对：“我们孤军悬在万里之外，兵少将寡，分兵容易被各个击破，必须同心协力，奋勇一搏。”他提议大军轻装简行，只带三天粮草，直取成都。桓温采纳了这个冒险的计划，留参军孙盛、周楚率老弱残兵守彭模，亲自率领步兵轻装向成都进军。

成汉得报，由李福攻彭模断晋军退路，李权向成都收缩阻拦桓温。这个计划很好，可惜李势的倒行逆施早已惹得天怒人怨，军心民心涣散不可收拾了。虽然坚守彭模的晋军都是老弱病残，李福竟然大败而逃。李权的部队三战三败，一路败退回成都。听说成都情况不妙，东边的咎坚这才停止搜索，赶回来增援。在成都南郊，咎坚的部队终于遇到了晋军。可惜部队的士气实在低落，看到晋军杀气腾腾的样子就不战自溃，跑得只剩咎坚这个光杆司令了。

三支部队全都瓦解了，李势孤注一掷，武装成都城中所有的守军与桓温决战。双方在成都笮桥（今成都西南南河上）激战。战斗中，晋军

不利，伤亡激增，流矢几次从桓温身边擦过。官兵们产生了退缩情绪，桓温决定收兵再战。在这关键时刻，晋军的鼓吏误鸣前进鼓，袁乔乘势督率士卒力战，扭转了战局。蜀军产生了畏缩情绪，纷纷撤退回城。

对于这个蹊跷的敲错鼓事件，还有不同的说法：不是鼓吏敲错了，而是袁乔见桓温有意收兵，故意在给鼓吏传达命令的时候把“收兵”说成了“进军”，于是战场上响起了进军鼓。不管原因是什么，战场上拼的往往是“最后五分钟”的坚持，其实成汉军队的勇气逊色于晋军，终究是要失败的。晋军意外得胜后，乘胜追击，火烧城门，攻占成都。

李势连夜逃走，往北逃到葭萌关，开始思考下一步如何选择：收拢残军败将，与桓温顽抗，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逃到中原向后赵政权投降，又担心没有好果子吃。这时候，他想起当年父亲李寿占卜问命运的事情来，解思明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了百世诸侯”，归顺东晋做个寓公不失为现实的选择。于是，李势向桓温请降，成汉灭亡。桓温奏报朝廷，东晋将李势迁到建康，封为“归义侯”。李势在四川胡作非为，结果因为主动投降而在江南得以善终。

灭蜀后，桓温凯旋回荆州，留周抚收拾残局。周抚的益州刺史原本是虚的，如今终于坐实，工作起来很卖力。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消灭各地的成汉残余势力，使蜀地全部并入东晋。桓温灭蜀，仅在领土上就使东晋增加了一小半的面积，功勋卓著。

第五章 旧时王谢堂前燕

陈郡谢家兴衰史

—

在东晋南朝，与琅琊王家齐名的陈郡谢家起点很低。凡是名门望族都喜欢给自己列谱系，谢家后人发达了，祖先向上只能推到曹魏时期的典农中郎将谢纘（zuǎn），谢家发迹之晚可见一斑。谢纘的这个典农中郎将相当于太守级别，是负责屯田事务的，不属于正牌的地方官职，政治地位一般。谢纘的儿子谢衡入晋后在国子监谋事，相继做了博士、国子祭酒，终于散骑常侍，算是坐了一辈子清水衙门的冷板凳。谢衡耐得住清贫，努力钻研业务，成为一代大儒。在“本朝历史从何时算起”、一夫多妻家庭的儿子是否应该为非亲生母亲服丧等问题上，谢衡提出了许多理论意见，可惜都没被采纳，但被史官忠实记录了下来，让后人能够得知陈郡谢氏的早期作为。

谢衡守着一肚子学问，没能飞黄腾达，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因为他精通的是儒家学问，而当时社会盛行玄学。这好比现代社会，大家都追捧金融、管理等显学，谢衡则醉心哲学、宗教一样，虽然著作等身也难以在大学里掌握话语权。

西晋经历短暂的统一后，陷入了八王之乱，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普遍追求玄而又玄的清谈，大谈宇宙人生，将儒家礼法视为迂腐的俗务，谢衡的不得意由此注定。所以谢衡的儿子谢鲲长大成年后，毅然抛弃家学转学玄学，钻研《老子》和《易经》，大谈特谈云彩和人心的关系。谢鲲的能力用对了地方，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二十岁就跻身“名士”行列。

有的人醉心玄学是逃避乱世，有的人是附庸风雅，将玄学作为敲门砖。谢鲲由儒入玄，不敢说没有功利的目的，但就玄学功力来说，他完全是第一等的。真正的玄学大师是精通世故又看破世事，能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用心灵指导言行。表面的清谈和悖理不羁是掩藏内在深刻和豁达的迷雾。谢鲲不修威仪，整天唱歌鼓琴。邻居高家有个漂亮的女儿，常常在窗前织布，看得谢鲲心痒不已。谢鲲没有“检讨肮脏的思想”，而是公然去窗前向邻家女子表明爱意。郎有情来妾无意，谢鲲的率真被邻家女子看作轻浮的挑逗，拿起织梭就向他扔去，谢鲲的两颗牙齿被砸掉了。时人笑话说：“任达不已，幼舆（谢鲲的字）折齿。”谢鲲听了也不生气。人家不接受那就算了，我继续逍遥率性的生活。牙齿掉了没关系，又不影响我长啸高歌。

谢鲲的表现引起了大臣和名士们的瞩目，其中就包括王衍、嵇绍等大人物。很快，谢鲲被东海王司马越征辟为掾吏。可惜官运不佳，因为小故被除名。长沙王司马乂看不起谢鲲，曾把他抓起来要加以鞭挞。谢鲲主动解衣，接受惩罚，没有一点儿害怕的神情，司马乂只好放了他。谢鲲也没有欢喜之色，一切都平淡自如。谢鲲屡受挫折和屈辱，反而名气更大了。士族名士们都替他感到可惜。谢鲲没有一个字的牢骚，天天唱歌鼓琴，优哉游哉。

谢鲲对名利可以宠辱不惊，对人生和家庭责任则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鼓琴高歌间，谢鲲意识到了国家大乱，北方终将沦陷。所以当东海王司马越不久再次征辟他出任参军一职时，谢鲲托病辞职，举家迁往南方。他最先来到豫章（今江西北部），传说该地有座空亭，闹

鬼，发生过多次杀人事件，谢鲲毅然搬到院落中居住。拂晓，有个黄衣人呼唤着谢鲲的名字，叫开门。谢鲲愴（dàn）然无惧色，从门旁的窗子伸手把黄衣人用力拉了过来，挥刀砍断了他的肩胛，落了一块皮肉。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块鹿皮。谢鲲循着血迹，找到并消灭了鹿怪，该地从此再无妖怪。谢家一搬再搬，最后选定建康城里秦淮河畔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安家，成为乌衣巷里谢家的第一代主人。

谢鲲避祸豫章，被大名士、大将军王敦征辟为长史，有了固定的政治舞台。

王澄也是不修边幅、率性而为的名士，与谢鲲惺惺相惜，常常感叹只有和谢长史才有话说。而谢鲲也不为功名所累，说话也不看着王敦，平静而真诚地对待工作。可怕的是，谢王二人气质相同，政治观点却是相反的。王敦有不臣之心，企图叛乱擅权。谢鲲渐渐知道王敦这个人不是匡扶社稷的同道中人，开始不屑政事，集会时候从容议论，巧妙讽谏王敦，平日主要优游山林，与一帮名士纵酒高歌。王敦鉴于谢鲲名高望重，一直以礼相待。

王敦最终走上了叛乱的道路。他对谢鲲说：“刘隗这个奸贼，危害社稷，我要消灭君侧之恶，匡主济时，怎么样？”谢鲲回答：“刘隗的确是个祸害，但只是城狐社鼠而已。”意思是杀鸡焉用宰牛刀，用不着王大将军去打刘小老鼠。王敦骂了声“庸才”，也不问谢鲲愿不愿意，就任命他为豫章太守，借助他的才望，拉着他一起兵逼建康，谢鲲被迫成为叛军一员。叛军进展顺利，王敦攻下要塞石头城后，狂傲地感叹：“我以后不能再和大家一起造福地方了。”意思是自己要掌国家大权了。谢鲲又泼了回冷水：“怎么会呢？只要你愿意，每天都可以。”

攻下建康后，王敦问谢鲲形势和人情如何。谢鲲回答：“明公之举虽欲存社稷，但普通人未必了解您的苦心。”谢鲲还跑去皇宫拜见了司马睿，又建议王敦任用周、戴若思等原来的大臣。王敦不听，逮

捕了周、戴二人要杀头。参军王峤劝阻，王敦连王峤也要一起杀。部属畏惧不敢说话。只有谢鲲说：“明公办大事都没有杀戮一人，现在王峤提了不当的建议就要被杀，是不是用刑太过？”王敦这才赦免了王峤。

最终，王敦在世族势力的联合抵制下退出建康。谢鲲劝他撤退后进宫拜见皇帝一次。王敦闹情绪，不愿进宫，以安全无法保证为由推脱。谢鲲再劝他，说自己入觐皇上，发现宫中秩序穆然，不会有危险，如果王敦入朝自己愿意侍从。王敦没被劝动，不朝而去。

撤退后，许多人为谢鲲的安全担心。王敦对谢鲲的确不满意，感到厌烦，打发他去豫章实任太守。谢鲲为政清廉，得到百姓的拥戴，可惜没多久就死在了任上，时年四十三岁。半年后，王敦败亡。谢鲲早死，省去了许多麻烦。更因为谢鲲在王敦叛乱期间，说了很多对朝廷有利的话，努力劝谏王敦，所以并没有被视作叛党乱匪受到处理。相反，东晋王朝追赠谢鲲为太常，追谥“康”。

至此，陈郡终于混出了有头有脸的人物。从谢鲲开始，谢家辉煌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二

一个家族在崛起时期，必然要求子孙一代超过一代。谢鲲死时，儿子谢尚才十岁出头。谢尚从小就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趋势，成名比父亲早。谢尚刚会走路，父亲谢鲲曾带他一起迎来送往。一次有客人夸奖谢尚是“当代颜回”。颜回是孔门最出色的学生，声望巨高无比。谢尚马上应声答了句：“这里没有孔子，哪里来的颜回！”一句话既表达了谦逊之情，又轻松幽默，让宾客感叹不已。

在技艺方面，谢尚精通音律，擅长舞蹈和书法，史称“博综众艺”。谢尚最擅长的是“鸛鹄（qú yù）舞”，跳得很好，好到丞相王导曾当众要求谢尚起舞，让在座的大小臣工为他击掌为节。谢尚在桓温手下当官时，桓温知道他善于弹箏，结果谢尚理弦抚箏，因歌秋风，意气甚道，让同样多才多艺的大名士桓温为之赞叹。

谢尚为家族博取功名利禄的利器并不是唱歌跳舞或者弹琴，而是清谈玄学。他继承了父亲的清玄风范，并且理论化，写了一篇《谈赋》，专门侃清谈，认为清谈内容“若有若无”，追求“辞简心虚”的效果。这里的“心虚”不是做了坏事害怕的意思，而是内心豁达、超然物外的意思。成年的谢尚“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一副典型玄学家名士派头。

他一表人才，服饰华丽。王敦的小妾宋玮在王敦败亡后辗转归了谢尚。谢尚曾问宋玮：自己与王大将军比，如何？宋玮回答道，王敦和谢尚相比就如同乡下人与贵人一样。宋玮的意见代表了大众的看法，社会普遍认为谢尚“妖冶”——这词现在用在男人身上是个灾难，在东晋时则是莫大的荣耀。

王导特别看重谢尚，将他比作王家长辈、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

有了如此之高的声望和如此地位的粉丝，谢尚的仕途一帆风顺。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仕靠上级征辟，年轻人都抓紧机会“养望”，即培养声望，让大家知道自己。谢尚的声望这么高，年纪轻轻就被大将军桓温征辟为官。更大的机遇还在后面，谢尚的外甥女褚蒜子成为东晋的皇后，后成为皇太后。谢尚外面有声望，朝中有后台，政治地位开始直线上升，刚过而立之年就被任命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后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开始威震一方。

东晋玄学名士大多是绣花枕头大草包，谢尚一介清谈客，能做好守土有责的大将吗？当时镇守武昌的安西将军庾翼就看不起谢尚，认

为谢尚这样的清谈书生适合在安逸和平的环境中耍嘴皮子，身逢乱世只能添乱。谢尚知道地位提高、身份转变对自己是个挑战，数次虚心地向庾翼咨谋军事。

一次，谢尚和庾翼一起射箭。庾翼不屑地对谢尚说：“你如果能射中靶心，我就送你一支军乐队。”谢尚拉弓射箭，正中靶心。庾翼很佩服，真的把自己的军乐队送给了谢尚。在驻扎地，谢尚为政清简，不惊扰军民。刚上任时，郡府拍马屁，用四十匹布给谢尚造了一顶乌布帐。谢尚下令拆除布帐，给军士们制作衣物被褥，一下子就在军队中赢得了声誉。

大司马桓温专政，发动北伐。谢尚任安西将军，率军从淮南进攻河南，作为一支偏师。进军之初很顺利，前秦的张遇率军投降。可能是谢尚的名士派头和张遇的军旅作风格格不入，使得两人关系破裂。张遇降而复叛，还占据许昌与谢尚军队为敌。谢尚大军进攻，竟然被张遇杀得大败，损兵折将逃回东晋。按律，谢尚罪行很大，够不上砍头标准也得罢官为民。结果在外甥女皇后的干预下，谢尚仅仅是降为建威将军而已，依然在前线领兵。他的运气也实在好，北方战乱不止，政权更替频繁，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传国玉玺竟然流落到了谢尚的手中。谢尚极为重视，派铁骑三百夜以继日将玉玺送到建康。东晋王朝在建康延续晋朝国号，依然以中华正朔自居。但是东晋皇帝并没有发号施令的玉玺，被天下讽刺为“白板天子”。谢尚及时送来传国玉玺，解决了王朝的法统难题，功劳远远超过败军南逃的罪过，因此地位再次提升。东晋王朝实授谢尚豫州刺史，把淮南地区的防务委托给了他。

淮南地处东晋王朝的核心，在东南地区和战乱中的中原大地之间，连接旧都洛阳和新都建康，是南北拉锯的东部主战场。战争最容易让前线将领掌握实权，将领的地位往往随着战事水涨船高。谢尚占据并经营淮南，有了固定的地盘，承担了保卫王朝安全的重任，在东晋朝廷的地位也就不可代替了。大司马桓温步王敦后尘，有篡位夺权

的野心。桓家控制了长江中游，子弟掌握了荆州、江州、扬州等要地，控制了大部分国土。谢家控制的豫州在军事要地之外，又多了一层抗衡政治野心家的重要意义。谢尚成了东晋政治角力的关键人物。

残酷的权力现实和沉重的政治责任并没有影响谢尚洒脱的生活态度。淮南首府寿阳城内大路旁，人们经常看到一个中年人坐在酒楼门口的胡床上，穿着紫罗襦，抱着琵琶弹奏《大道曲》。歌声高亢，歌手陶醉，往来路人不是以为他是酒楼揽客的艺人，就是视之为行为艺术家。没有人知道他是盘踞淮南的镇西将军谢尚。

谢尚和桓温的关系也很奇妙。按说他们是相互制衡的政治对手，却惺惺相惜，不像敌人，倒是知心朋友。谢尚在桓温手下当官的时候，桓温就很欣赏他。桓温北伐成功，收复洛阳后，还上书请求让谢尚都督新收复领土，出镇洛阳。谢尚对桓温也没有恶语相向。

也许是生活过于洒脱，缺乏规律，谢尚的身体每况愈下。镇守洛阳的事情，谢尚就以疾病在身推辞了。这不是他不愿意离开老巢，而是真的病得不行了。朝廷得知谢尚病重，提升他为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召他回建康养病。谢尚没能回去，死在了历阳，时年五十岁。

谢尚之前，陈郡谢家只是一户普通士族，是他让家族展露在了闪光灯的照耀之下。但在老牌大世族看来，陈郡谢家还是暴发户，他们称之为“新出门户”。从一个趣闻可以看出陈郡谢家当时的地位。谢尚暴得大名，想和世家大族攀亲，就替堂弟谢石向诸葛家族提亲。这个诸葛家族就是诸葛亮他们家，早在三国时期就是名门大家了，后来随着司马睿南渡，算是“中朝显贵”，在南方地位尊显。诸葛家的掌门人诸葛恢一向以名望凌人。一次，丞相王导和他谈起名门望族的排名先后，说：“人们都说王葛，为什么不说葛王呢？”诸葛恢毫不留情面地回答：“譬如说驴马，不说马驴，驴难道胜过马吗！”诸葛家的气焰可见一斑。

现在诸葛恢见陈郡谢家来提亲，断然回绝：“我们这样的人家，都是有固定的世代姻亲的，我的女儿已经有人家了，可不能再和谢家结亲。”谢家讨了个没趣，谢石却对诸葛家的女儿念念不忘。等到诸葛恢死后，诸葛氏家道中落，谢家地位飞升，谢石这才娶到诸葛恢的小女儿诸葛文熊。

三

谢尚去世，豫州地盘不能落入桓温的手中。朝廷的看法是继续让谢家子弟都督淮南军事，作为王朝的方镇屏藩，他们选择的继承人选是谢奕。

谢奕为人放达，也是玄学中人，是从桓温的幕府开始政治生涯的。他和桓温虽然是上下级，言谈举止却像是老朋友。谢奕随便戴块头巾，就跑到桓温家里做客，长啸吟唱，一点儿都不把自己当外人。桓温常说：“谢奕是我的方外司马。”谢奕酗酒，还逼着桓温陪酒。桓温酒量不行，不胜其烦，最后发展到看到醉醺醺的谢奕就跑到老婆房间里躲藏起来。桓温是驸马爷，老婆是南康公主。因为桓温工作很忙，南康公主难得见到丈夫，所以很感激谢奕，说：“如果没有谢奕这个放荡司马，我怎么能见到驸马呢！”谢奕找不到桓温，就在桓温府上随便拉人一起喝酒。年轻人跑得快，最后被谢奕抓住陪酒的都是老兵。谢奕就自嘲说：“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东晋人以当兵为耻，谢奕将桓温比作老兵，桓温为人豪放，也不生气，任由谢奕胡闹。谢奕和桓温保持了密切的感情。现在，谢奕突然被破格提拔为与桓温抗衡的藩镇，两人念及感情，依然相安无事。

谢奕在豫州刺史任上只有一年，就死了。谢奕二弟谢据早死，三弟谢安本该出任豫州刺史，却把机会让给了四弟谢万。

朝廷任命谢万出掌淮南，在世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谢万过于洒脱，狂妄自大，常年不理政事——这是玄学氛围要求的。怎么看他都不像是前线主帅的材料。谢安的好朋友王羲之曾经自问自答：“某人和谢安、谢万相比，谁更好？如果是谢安遇到这个问题，肯定与人为善，说自己不如某人；如果是谢万，则会因为听到这个问题，和某人怒目相争。”王羲之听到谢万的任命后，特地写信给谢万，要他收束情绪，勤勉政事。谢万根本没听进去。

桓温和谢万关系一般，却支持谢万出任豫州刺史，因为他等着谢万犯大错好收拾谢家的势力。果然上任第二年，谢万就受命与徐州方向的郗昙兵分两路，北伐前燕。谢万把北伐当作郊游，一路饮酒唱歌，一点儿端庄办事的样子都没有，更谈不上和将士们同仇敌忾、同甘共苦了。三哥谢安千里迢迢写信劝他说：“你现在是主帅，不是可以任性生活隐士，应该懂得率军打仗，要多和将领们交流，让大家和你同心协力。”谢万一想，交流不就是吃饭喝酒嘛，于是大摆宴席，招待众将。宴会开始，谢万自顾自吃喝得很高兴，突然觉得应该说几句话。憋了半天，谢万终于对众将说：“诸位都是劲卒。”他不想想，各位将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叫大家是兵勇，在将领们听来就是讽刺和贬低了。这个饭局目的没达到，反而把部将都得罪光了。

战争开始，徐州方向主将郗昙病倒，率军暂退。谢万误以为友军败了，慌忙下令后撤。豫州军队趁机一哄而散，众将各自组织撤退，结果北伐不战而败，前燕反攻占领了东晋大片土地。晋军喘息稳定后，竟然找不到主帅了。原来谢万逃得最快，早早就躲到大后方去了，成了光杆将军。事后追究责任，谢万是罪魁祸首，被废为庶民。

这个处理结果还是给陈郡谢家留了面子的，没要了谢万的性命。然而谢家在淮南名声坏了，待不下去了，朝廷也不可能再让谢家子弟出掌淮南军政大权了。陈郡谢家几代人努力的成果，轰然倒塌，付诸流水。谢万挥霍了祖父兄长几代人的奋斗成果，谢家只能从头再来了。

谢安：看我东山再起

—

陈郡谢家经过谢万的惨痛失败后，一蹶不振。家族能否复兴，天下人都把目光投到了隐居东山的谢家老三谢安的头上。

谢安身上有那个时代搏击政坛的雄厚资本：卓越的声望。谢安四岁的时候，桓温的老爸桓彝见到谢安就喜欢不已，赞叹这个孩子“风神秀彻”，日后肯定能扬名立万。桓彝日后也“扬名立万”了，不过是因为子孙两代都谋逆不轨的缘故，这也是后话了。幼小的谢安能得到大人物的赞扬，立即扬名。谢安还曾拜访过晚年的王导，王大丞相对这个邻家后辈也大为赞赏，让谢安的名声又上了一个台阶。别人是拼命博名养望，谢安小小年纪就名扬江左，仕途前景可谓一帆风顺。就在美妙前程即将开启的时候，谢安却做出了惊人的选择：隐居东山，纵情山水。

东山在今天的绍兴，当时的绍兴是东晋名人隐士避世的大本营，谢安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同道中人，还参加了名垂千古的兰亭集会。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兰亭，谢安留下了两首诗作：“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契兹言执，寄傲林丘。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殤。”完全是一副醉情山水、与世无争的样子。

两晋南朝的多数隐士，满口玄学，名声很大也不参与政治，实际

上是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口中说说虚幻的宇宙人生还行，真的把内政、军事、外交摆在他们面前，玄学名气越大可能办事的结果越糟糕。谢安则属于少数稳重而超脱，有能力处理好政务却不愿意从政的人。

一次，谢安与王羲之、孙绰等人出海游玩。海上突起大浪，波涛汹涌，船只有倾覆的危险。王羲之和孙绰被吓坏了，风度全无，船头船尾跑来跑去，惊慌失措，抓住人就问怎么办。谢安平静地说，大家再这么慌乱瞎闹，船没被海浪掀翻反而可能被船上的人跑翻了，到时候大家都别想回去了。王羲之等人很惭愧，佩服谢安的沉稳平静。谢安有条不紊地处理返航的事，和大家一起平安上岸。他临危不乱，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真正领悟了玄学虚中有定的真谛。事后，王羲之等人对谢安钦佩不已。王羲之公开说：“安石（谢安的字）有镇国气度，我们应该举他出仕。”大名士刘惔则说：“如果安石不出山，我们就聚集天下的名士一起来推举他。”于是天下名士高呼：“斯人不出，若苍生何？”仿佛谢安不出来做官，朝廷乱局势必难以收拾。

问题是官场对谢安狂抛橄榄枝，谢安他就是不接。司徒、亲王、吏部等反复征辟谢安走出东山来当官，更不用说那些当了官的名士来招揽谢安进入幕府，他统统拒绝了。朝廷觉得谢安可能是不愿意接受虚职，竟然拿出掌管全国官员考核升迁的吏部郎实职来授予谢安，谢安依然拒绝了。一直到四十岁，谢安都在东山中与花鸟鱼虫为伴。朝廷屡次被拒，感到特别没面子，干脆宣布对谢安“禁锢终身”。不想从反面对谢安的声望“火上浇油”，谢安越是隐居不出，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期望就越高。

魏晋多名士，而谢安可能是魏晋名士中最潇洒风流的一位。《晋书·谢安传》说时人比谢安为王导，但是谢安“文雅过之”。两人都能力出众，都沉稳持重，但王导在潇洒超脱和文人气上明显逊于谢安。就连王导的五世孙王俭多年后依然承认：“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一人而已。”

如果说谢安的东山隐居生活是完美的，那就错了。谢安的心中还有隐痛，那就是责任之痛。

谢夫人刘氏试探丈夫说，一辈子当隐士也不错。谢安无奈地说，我可能不会一辈子当隐士。因为在谢安的心中有强烈的责任感，有对国家社稷的责任，更有对陈郡谢家势力发展的责任。他默默关注着东晋王朝的政治走向和家族子弟们的仕途命运。

谢安不想当官，所以把家族的淮南地盘让给了弟弟谢万。但振兴家族的责任感让他一直在幕后辅助谢万，出主意想办法。谢万当吴兴太守时，谢安一度在郡衙里督促弟弟从政。谢万懒散惯了，早上不能及时起床办公，谢安就每天早上叩屏风催弟弟赶紧起床。谢万后来镇守一方，恶性不改。谢安亲自拜访谢万的部将，替弟弟抚慰众人，也拜托他们协助谢万工作。谢万日后狼狈得只剩下光杆司令，部队没有哗变，其中就有谢安在谢万部队中苦心经营的结果。

等到谢万被废，谢家势力落入低谷，东晋王朝北伐失败，在与北方的对抗中处于下风，谢安看到国事危难，家族衰败，不得不决心告别东山，踏足官场。四十一岁的时候，谢安在家人的催促和众人的瞩目下，走出了东山。

谢安出仕的时机特别不好。一来他年过不惑，别人不好给这么大年纪的“新人”安排位置；二来朝廷的禁锢令依然生效，一般的官员不敢征辟他为官。巧合的是，依然是野心家桓温给了谢安第一份工作——担任他幕府中的一个小职员。谢安在一片哗然和嘲笑中接受了。放着之前清闲显要的好官不做，一大把年纪了，来和年轻人抢小职

位，怎么能不成为大家的笑柄？谢安默默忍受了嘲笑和不解。他知道闲适的隐居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前方是险恶的政治旋涡，每一个旋涡都可能要了自己甚至家族的性命。玄学视政治为俗务，但真正看透俗世的玄学名士，应该是超越世俗的，一旦操持起俗务来也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谢安就是真正的玄学名士。

桓温接纳谢安的心态很复杂，有同情，也有帮一把的意思。谢安出山前后，桓温不断抓权，排斥其他世族，渐渐露出了谋求篡位的狐狸尾巴。东晋君臣都对他敬畏三分，谢安在他手下办事，又要寻求仕途发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的做法是站在朝廷一边又不和桓温翻脸，处理好本职工作又不乱掺和事儿，借着桓温这条大船，凭着能力和名声逐步得到提升。

371年，桓温废黜司马奕为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帝，并族诛了陈郡殷氏、颍川庾氏两家，操纵了东晋实权，声势如日中天。桓温的做法侵害了其他世家大族的利益。已经跳到朝中为官的谢安坚定地和其他两大世族——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站在一边，反对桓氏篡权，改朝换代。他们拉拢一批中小世族，形成共同抵制桓温的联盟。而谢安也在这个大趋势下，趁机与各个世家大族联姻，壮大本族力量。从此，谢家子女婚嫁基本不出大世族家庭，谢安开始编织盘根错节的权势网络。

简文帝司马昱当了不到两年的皇帝，也死了。桓温一度授意司马昱立下遗诏，将天下传给自己。谢安赶紧联合王坦之、王彪之等人逼简文帝改写遗诏，将政权传给儿子司马曜。王、谢两家抓紧时间，将生米煮成熟饭，在373年拥戴司马曜即位。司马曜就是孝武帝，之后在位二十四年，是东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桓温得知即将到手的江山落空了，勃然大怒，率军入京“朝觐”新皇帝。桓温引兵入朝，朝野盛传此来是“诛王谢，移晋鼎”，一日数惊。

东晋朝廷没有力量阻挡桓温的军事威胁，司马曜只能下令王坦之、谢安等率领百官到新亭迎接桓温。事前，王坦之手忙脚乱地跑来找谢安问计。谢安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害怕，但平静地说：“大晋存亡，就看这一回啦。”世事本无定论，政事也一样，到时候随机应变吧。

历史上有名的“新亭风波”就此上演。一方是气势汹汹、大兵压境的桓温，一方是王坦之和谢安等朝臣，所争的就是东晋王朝的江山社稷。你把它说成“鸿门宴”也好，说成关羽的“单刀会”也罢，反正桓温在新亭摆出了吓人的阵仗，大军环列，刀甲鲜明，官兵们对朝臣们怒目而视。更可怕的是，桓温拉起了许多帟帐，不用风吹起帟角，肉眼都能看到帟后密密麻麻的持械武士。朝廷上的王公大臣们平日里威风凛凛，可在武士巨阵面前却威风扫地。文武百官跪拜在道路两旁，甚至连抬头看一眼桓温的勇气都没有。领头的王坦之惊得汗流浹背，紧张得连手板都拿倒了。

朝臣中只有谢安面对层层重兵，用他那带有浓厚口音的“洛阳普通话”像模像样地夸奖了一番桓温的部队。史书上称“洛阳普通话”为“洛生咏”，特点是音质浑厚，给了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很大的震慑力。震慑冲击波过后，谢安再从容地质问桓温：“有道诸侯训练甲士替朝廷防守四方，现在明公在幕后埋伏武士，唱的又是哪出戏啊？”桓温预想了许多结局，就是没料到谢安会这么直接这么坦然。好在桓温也是名士，心胸也很豁达潇洒，虽然受了谢安当头一棒，立马调整了情绪，撤去了埋伏的武士，客气地接待起谢安来。

桓温那潇洒脱俗的劲头也被谢安的镇静洒脱勾引了出来，拉着谢安就高谈阔论起来，把其他人都晾在一边。桓温的一生都在追求权力和沉溺玄学之间徘徊，犹豫不决，错过了许多揽权的机会。谢家子弟与桓温明明不是一伙人，却因为风范独特得到了桓温的提携。谢安兄弟的最初舞台都是桓温提供的。如今，桓温又因为谢安的阻挠，放弃了逼宫夺权的计划，和谢安一场长谈之后竟然撤军了。

从此，桓温和皇帝宝座永远告别了。而谢安独得大功，几乎成了再造社稷的功臣，更因为临危不惧的名士风范，地位迅速跃升。王坦之原来名望在谢安之上，从新亭回来后声望就落在了谢安之后。

谢安的无畏稳定了东晋王朝的局势，但桓温的野心依然，还在上游做着皇帝梦。撤军后，桓温大病一场，借口生病搬到建康附近的姑孰养病，派人暗示朝廷授他九锡。九锡是皇帝独享的礼器，霸占九锡礼器几乎成了历代权臣篡位前的冲刺动作。随着病情越来越重，桓温求九锡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直接授意文臣袁宏起草加授九锡的诏令。袁宏赶紧写好，按照程序将诏令草稿拿给中枢重臣谢安看，要谢安的批准。谢安看完，摇摇头，对袁宏说需要修改。袁宏修改后再拿给谢安看。谢安还是不满意，两人单单在程序上就这样往来了几十天，诏令迟迟不能定稿。袁宏也算是一代文豪，后来生气了，不解地问谢安为什么老不满意。谢安说了一句：拖着好，拖久了问题就解决了。袁宏一下子就明白了。果然，拖到373年的夏天，桓温没等到诏令就病死了。谢安不动声色，不费力就给东晋王朝消除了一大祸患。

司马曜的皇位是谢安等人拥立的，又是谢安巩固的，桓温死后就让谢安登上了相位。谢安顺顺当当地位极人臣，连带着陈郡谢家不仅收复了政治失地还大获其利，和各大老牌世族相比，大家都不相上下、平起平坐了。史称“东山再起”。

三

谢安是个比桓温更能令人接受的权臣。桓温死后，谢安并没有党同伐异，大开清洗桓家势力之门，而是仿佛没事发生一样。桓温的弟弟桓冲继承了哥哥的荆州地盘。别人提醒他要和谢安争权。桓冲承认自己名望能力都在谢安之下，甘居地方藩镇，没有异心。东晋朝廷在

王敦、桓温之乱后一度出现了团结稳定的局面。俗语说：“关中丞相唯王猛，江南万民望谢安。”谢安统治时期相对平稳安定。

桓温死后的十年，东晋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前秦。前秦逐渐强盛起来后，陆陆续续对东晋发动骚扰。东起徐州、西到襄阳，秦军和晋军小规模战争不断。北方初定后，苻坚调整部署，开始将东晋作为下一个重点打击目标。他选中的突破口是荆州北部的襄阳。襄阳扼守汉水和江汉平原的要冲，东吴时期就是长江防线的重要据点。曹魏和东吴就在此长期对峙，东晋自然不敢怠慢，集中重兵派遣名将把守。苻坚想通过进攻襄阳，动摇东晋的长江防线，四两拨千斤。

谢安和桓冲选择的襄阳守将名叫朱序。朱序父亲朱焘曾任东晋的梁州、益州刺史，朱序本人曾长途奔袭、擒拿欲割据蜀地自立的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他有出身，有能力，有功绩，官拜征虏将军，镇守襄阳。到任之后，朱序学起了名士风度，喝酒下棋，对防务放任不管。他认为襄阳有汉水天险和坚固的城池在，固若金汤。即使太元三年（378）年初，种种迹象都表明前秦大兵将要压境了，朱序还是不慌不忙地和名士文人们交游唱和。

朱序的老母亲韩氏，随丈夫和儿子久经疆场，粗通军事且居安思危。她听到军情警报，见儿子无动于衷，就亲自带着仆妇下人巡视襄阳城墙。她发现襄阳西北角城墙已经倾圮，墙砖松脱，外墙上杂草丛生，心急如焚，想迅速修复。可惜人手不够，韩氏就派几个管家去城中晓以大义，招募妇女修城。城中百姓一来担心前秦军队杀掠，二来为韩氏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效力修城。有近两百名妇女响应韩氏号召，应募前来。韩氏就带着她们在原来西北角城墙的内侧重筑一道斜城。这段城墙二十余丈长，与旧的西北角城墙成三角形。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襄阳“夫人城”。

378年新年刚过，前秦苻坚即以儿子苻丕为统帅，率领降将慕容垂、姚萇等人和十万秦军南下，直冲襄阳而去。秦军为得胜之师，人

多势众，一路上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地。朱序对汉江天险盲目信任，没有在江边设防，秦军精锐骑兵游马渡江，直逼襄阳城下，大军陆续渡过江来，将襄阳城围得水泄不通。朱序这时才慌忙调军守城。襄阳危急。

秦军开始攻城，年久失修的西北角最先被攻破。苻丕高兴地督促兵士突入城区，却发现前面有一座崭新的斜城矗立在面前。城墙上滚木炮石火把，倾斜下来，秦兵猝不及防，人仰马翻，败退而去。襄阳军民同仇敌忾，挡住了十万秦军的猛攻。谢安接到边警，派荆州的桓冲率领七万大军增援襄阳。桓冲和荆州各将害怕秦军，只敢在战场之外“声援”襄阳，不敢真正上前与秦军鏖战。襄阳孤城，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坚守了将近一年时间。

苻丕统率大军围困襄阳城，劳师动众，遭到了内部的反对。前秦御史中丞李柔上表苻坚，要求将苻丕按军法从事。苻坚迫于压力，派使者到前线重责苻丕，同时赐剑一把，严令如果第二年春天再不攻克襄阳，就让苻丕等人以剑自裁。苻丕和慕容垂、姚萇等人在重压之下，督率秦军加紧围攻襄阳。朱序和军民们陷入了绝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连379年的春节都是在生与死的厮杀中度过的。三月，襄阳城的北门突然大开，朱序手下的督护李伯护失去信心，叛国投敌，开城引秦军杀入城中。朱序被秦兵活捉，母亲韩氏不知所终。苻坚接到捷报，下令杀了投降的李伯护，却很欣赏朱序，不仅赦免了他，还任命朱序为尚书。苻坚向来宽厚，对欣赏的人不论出身和历史背景，一概予以重用。

襄阳失守，东晋的防御形势出现了一个缺口。前秦忙于内部整肃，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谢安尽量将襄阳失守的影响降到最低点，既没有大肆宣扬，也没有在国内整军备战。南北之间出现了大战之前的片刻沉默。

淝水之战原来是场心理战

—

苻坚登基后一直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随着前秦的强大，他统一天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逐个削平群雄后，苻坚的敌人只剩下南方的东晋了。

382年，苻坚召见群臣，专门讨论南征东晋的问题。苻坚的态度很明确：“朕继承大位将近三十年了。四方大致平定，只有东南一角还在大秦治理之外。大秦有雄兵百万，朕准备御驾亲征。”话题一挑开，前秦朝野就炸开了锅。除了少数几个人附和，多数大臣都反对伐晋。事情久议不决，耽搁了下来。怀有二心的前燕宗室慕容垂和羌族将军姚萇希望苻坚伐晋失败，以便自己有机可乘谋求复国，所以竭力怂恿苻坚南伐，请求苻坚“圣心独断”。

苻坚真的甩开大臣，只和弟弟苻融商量要不要出兵。不想苻融明确反对伐晋。他举出了伐晋的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东晋毕竟是天下正朔；二是东晋内部基本平稳，无隙可乘；三是前秦征战多年，士卒疲惫，百姓厌战。要命的是鲜卑、羌、羯等被征服的民族并未诚心臣服，可能会趁前秦大兵南征时造反。然而苻坚根本听不进去。苻融搬出王猛来，劝谏道：“难道丞相王猛的临终遗言，您忘记了吗？”王猛临终告诫苻坚不要贪图东晋，可惜现在苻坚满脑子都是统一天下，把王猛的遗言放到了一边。爱妾张夫人、太子苻宏也劝苻坚不要伐晋，苻坚都听不进去。苻坚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之前的历次征战他都没

有输过，如今兵强马壮，明显强过东晋，为什么不能南征呢？

东晋太元八年（383）七月，苻坚下诏攻晋。他自信满满地在诏书中提前封赏东晋君臣，封孝武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封丞相谢安为吏部尚书，封荆州的桓冲为侍中。苻坚乐观地认为东晋君臣投降的日子“势还不远”，所以体贴地在长安开始为三人建造府邸。

为了组织大军，高门富豪子弟和精通武艺的青壮年都被授以羽林郎，苻坚一共得到了三万多名军官。这批军官指挥的是苻坚从北方逢十抽一强征来的平民。北方各郡县可遭了殃了，不仅被抽走了十分之一的劳力，公私马匹也全部充公，还要承担前线的粮秣供给。最后，苻坚汇集了一支九十七万人的大军，狂傲地宣称只要大军将马鞭投江，就能阻断长江流水。

这么庞大的军队，根本集结不起来。苻坚将他们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四川、荆州和淮南三个方向进攻。前秦的主力集中在淮南方向，由苻融率二十五万人为前锋，苻坚亲率大军断后。秦军行进像苻坚预料的一样顺利，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渡过了淮河，顺利攻占了淮南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苻坚大喜，亲自来到前线，和苻融会合。秦军前锋在寿阳打得轰轰烈烈的时候，秦军的大部队还在陆续从长安、洛阳等后方城池动身出发。

如果前秦百万大军攻过淮河，东晋则危矣！建康全城震动，百姓惊恐不安。东晋王朝文恬武嬉，时间久了，早已丧失了勇气。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谢安。孝武帝任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全权负责抵抗前秦。

谢安也不知道如何抵抗前秦大军，但他知道临危不惧、坦然应对的道理。平静应对总比惊慌失措要好。侄子谢玄已经被安排在前线统兵了，谢安给谢玄加了“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的头衔，作为前锋抵挡敌人进攻的步伐。谢安又任命弟弟、

征虏将军谢石，儿子、辅国将军谢琰等率领大军与谢玄会合。晋军总兵力为八万人。除此之外，谢安没有进一步举动。

丞相如此作为，显然不能安抚建康的人心，除了个别人自欺欺人说谢丞相肯定胸有成竹，其他人都认为东晋王朝要完蛋了。荆州的桓冲实在看不下去，要挑选三千精锐派往京城，交给谢安调遣，以备朝廷逃跑。谢安谢绝了，说国家存亡不在于几千士兵，倒是荆州是上游重镇，更需要精兵加强防守。谢安还给桓冲传话说，一切他自有安排，桓冲好好守住长江中游就可以了。桓冲急得对幕僚叹道：“谢安一介文人宰相，没有大将之才，他尽派些没有经过风浪的年轻子弟抵御强敌。这下可好，我辈都将陷入敌手了！”就连被任命为前线主将的侄子谢玄，也心虚得很，跑回来问谢安怎么办。谢安一如既往地坦然，平静地说：“到时候会有旨意的。”谢玄不敢再亲自来问，却托部下张玄来找谢安。谢安也不回答，带着张玄来到别墅。别墅里亲朋毕集，谢安拉着张玄下围棋，谢安的棋技比张玄要差，但当天张玄心里恐惧，竟然输给了谢安。

史载谢安在大战中只是“指授将帅，各当其任”而已。事实上，毫无军事经验的谢安这么做是正确的，总比既不懂也要瞎指挥强。这符合他“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的一贯执政思路。淝水之战前后，谢安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甚至连夜游玩，也装出一切如常的样子。东晋的各个世家大族，为了切身利益，暂时放弃了争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时间久了，东晋的人心竟然稳定了下来，官民都屏气凝神地关注着前线战事。

二

谢安最看好谢玄这个侄子，将家族的兴盛传承都寄托在了谢玄身

上。

谢玄小时候一副娇贵美男子的模样，喜欢穿着华丽的衣服，腰上别着别致的丝巾，手里拿着漂亮的紫罗香囊把玩。谢安担心谢玄的成长，就把他叫到面前来说，伯伯和你打赌玩，好不好？谢玄欣然答应，没几下就中了谢安的圈套，输了。谢安说，我要拿走你的紫罗香囊作为赌注。谢玄满不在乎地将香囊给了伯伯。谢安拿着香囊看了一眼，就扔到火炉里烧掉了。小谢玄看到眼里，心里明白了，这是伯伯不赞成自己的纨绔作风，于是下决心痛改前非。

有一次，谢安问子侄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其他人的回答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要学好，做有能力有道德有声望的人。只有谢玄仔细思考后回答说要像“芝兰玉树”一样自由茁壮地成长，庇护一家门庭！谢安很欣赏谢玄的回答，认为他有独立的思想和强烈的责任感。

谢玄进入仕途之时，东晋王朝面临前秦的侵略，朝廷寻求良将镇御北方。谢安就推举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去前线打仗。中书郎郗超平日里和谢玄的关系不好，听到任命后叹息说：“谢安举贤不避亲，看来是看好谢玄的能力。谢玄这次去必定不负推举，有一番作为。”其他人都以为不然，觉得富贵人家的英俊公子去前线，能镀镀金就不错了，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谢安不顾非议，坚持重用侄子谢玄，谢玄也不负重托。江北的京口、广陵是北方南渡流民的集中地。这些流民在南方的生活并不如意，对北方政权有着刻骨的仇恨，战斗力强。谢玄就挑选流民中的骁勇之士组建部队。彭城（今江苏徐州）刘牢之等人勇敢又有胆略，纷纷投军。谢玄就以刘牢之为参军，训练了一支精锐部队。他率部队多次阻拦了前秦对彭城等地的骚扰，战无不捷，威震敌胆。东晋称京口、广陵等地为北府，所以谢玄的部队得名北府兵。这支部队逐渐成为东晋王朝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刘牢之、刘裕等人逐步崛起。尤其是刘裕，原本是一个在赌场输得一无所有的赌徒，走投无路当了兵，竟然靠着军功一步步掌握军队，最后推翻了东晋王朝，建立了宋朝。谢玄可谓是刘裕的政治恩人。而北府兵随着形势发展，逐渐摆脱谢家势力的影响，成为左右南朝政局的独立力量，呼风唤雨近百年，也完全超乎了谢安、谢玄等人的预料。这些都是后话了。在组建初期，北府兵还是服从朝廷的精兵。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南方军队柔弱，无法与北方少数民族铁骑对阵。后来南北大战，一代枭雄苻坚远远看到北府兵的阵势就对身边的北方将领说：“谁说南方没有劲旅，我看对面就有一支强敌。”

接受抵抗前秦百万大军的重任后，谢玄明白王朝和家族的命运都在此一搏，没有退路了。前秦军队正长驱直入，谢玄冷静抓住前秦军队盘子太大、全面出击、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步伐的弱点，集中北府兵精锐五千人交由将领刘牢之率领北上，目的是抓住秦军的弱点予以痛击，争取有所斩获。前秦梁成的部队前突到淮河南边、寿阳东边的洛涧，呈现孤军之势。刘牢之猛攻梁成的部队。梁成猝不及防，在交战中被杀。秦军步骑争相后撤，结果在淮河边争抢着渡河，乱成一团。刘牢之纵兵扫荡，生擒敌将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东晋开战大捷，谢石下令水陆并进，暂时遏止了秦军推进的势头。

前秦虽败，但依然掌握着战场上的优势。苻坚亲自来到寿阳，大军在淝水（淮河的一条支流，在今安徽寿县东南）北岸安营扎寨，对南岸的东晋部队虎视眈眈。这一天，苻坚站在寿阳城头，望见郊外的晋军“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开始意识到南征的决策可能草率了些，心中隐约泛起忧虑来。

苻坚想充分利用本军的优势，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派随军的东晋降将朱序去游说谢玄，企图说动谢玄投降秦军。不想朱序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正想找个机会报效故国呢。见到谢玄后，非但没有劝降，反而把前秦军队的弱点和盘托出。前秦大军号称百万，但真正效忠苻坚的氏族部队比例很小，而且大部队还没有到达前线。针对前秦虽然

兵强马壮，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朱序建议谢玄、谢石等人：“等到百万秦军都到达前线，要想战胜他们就困难了。趁秦军尚未集结完毕，宜速战速决。如果能够打败秦军的前锋，可能会撼动大局。”谢玄等人赞同朱序的判断，只要给前秦军队一次重创，就可能激发矛盾引发前秦的内讧，打倒这只纸老虎。

于是谢玄主动向前秦下战书，说：“你们远涉我国国境，却临水为阵，明摆着不想速战速决。现在，请你们稍微向后撤退，让我军将士有渡河周转回旋的地方。到时，我要和你们一见高下！”前秦将领认为不应该撤军让东晋军队渡河，我众彼寡，迟早会把谢玄等人拖死。苻坚则乐观地认为：“我们暂且退军，让敌人渡河。等他们还没列好阵势，我们的数十万铁骑就突然杀过去，把敌人逼进淝水里杀死，不是更好吗？”苻融附和哥哥的意见，赞同趁晋军渡河过半的时候进行突袭。

第二天，晋军如约开始渡河。苻融组织部队后撤。前秦大军的人心本来就是散的，队伍很不好带。上头说是战术性撤退，下级却一下子相信前锋部队失败了。更有甚者，后面的部队见前面尘土飞扬，纷纷后撤，巴不得早点儿回家的降卒和壮丁们想当然地以为失败了，扭头就跑。回到秦军营中的朱序趁机大喊：“打败了，我们打败了！”军心瞬间涣散，各怀鬼胎的将领们纷纷拉起队伍逃跑。后方大军还在源源不断向前行军，前方大军突然向后涌，挤成一团，乱成一锅粥。苻坚、苻融等人根本制止不了。谢玄压根儿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好事，率精锐八千强渡淝水，也不列阵了，追着前秦的败军就猛杀猛砍。百万大军“奇迹”般地一败涂地。

苻融被乱军杀死，苻坚中了流矢，仓皇北逃。他曾自负地相信能投鞭断江，现在前秦大军自相踩踏溺水而死的尸体真的堵塞了淝水，淝水因此断流多时。逃跑的路上，前秦大军丢盔弃甲，日夜逃命，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东晋追兵来了，结果沿途又饿死冻死了十之七八的官兵。这就是“淝水之战”。此战，东晋取得了辉煌胜利，杀敌数十万

人，缴获仪服、器械、军资、珍宝等堆积如山，其中包括苻坚的座车，另有牛马、驴骡、骆驼十万余头。谢玄战后乘胜开拓中原，基本收复了黄河南岸地区，同时也带动四川、汉中等地投降了东晋。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军还一度逼近黄河以北的邺城。前线晋军快马向谢安报捷，谢安正在和客人下围棋，看完捷报平静地放到床上，面不改色继续下棋。倒是客人问怎么回事，谢安慢慢答道：“晚辈们在前方打败了贼军而已。”坚持下完棋，谢安回到内室，终于抑制不住狂喜的心情，过门槛的时候连鞋被碰坏了都没有发觉。这实在是一场赢得过于蹊跷、过于辉煌的胜利。司马曜因为任内的这一胜战而得谥“武帝”。

三

在淝水大战中，八万晋军大败前秦百万大军，不仅使国家转危为安，而且促使前秦崩溃，北方大乱，局势朝着有利于南方的方向发展。东晋朝廷表彰功臣，封谢安为庐陵郡公，谢石为南康公，谢玄为康乐公，谢琰为望蔡公。陈郡谢家一门四公，从此尊贵无比，成为东晋顶尖的名门望族。

谢氏家族的强大势力，迅速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司马曜担心谢安成为第二个桓温。私下安排皇弟司马道子开始揽权。谢安修身那么多年，非常清楚盛极而衰、月盈则亏的道理。刚好东晋乘胜收复失地，前方事务繁重，385年，谢安主动要求离京出镇广陵，以督促前线为名，行避祸之实。在广陵，谢安生了一场大病，只好申请回京养病。朝廷高规格地派遣侍中慰劳。夏末，谢安在建康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得以善终。死后极尽哀荣，朝廷追赐太傅，史称谢太傅。千年之后，北宋宰相、大文豪王安石登会稽东山，还因为自己的名和谢安的字都是安石而沾沾自喜。

在前线主持战事的谢玄堪称东晋第一功臣。朝廷专门遣殿中将军慰劳谢玄，升他为前将军、假节，赐钱百万，彩帛千匹。只可惜长期的奔波行军和风餐露宿的作战，极大地损害了谢玄的身体。淝水大捷后，谢玄的身体每况愈下。太元十二年（387），朝廷调任他为左将军、会稽内史，让他去气候温良的绍兴地区养病。谢家从此丧失了对北府军的控制权。第二年，谢玄病死在会稽，终年四十五岁。朝廷追封谢玄为车骑将军，谥号“献武”。

淝水之战后封为望蔡公的谢琰是谢安的儿子。淝水大战的胜利让谢琰染上了骄傲狂妄的毛病。孙恩在浙东起义，朝廷派遣徐州刺史谢琰前往镇压。史载谢琰到浙东后，无绥抚之能，又不整军备战。部将进谏说强贼就在海边，不能松懈，应该做好准备。谢琰不以为然，说苻坚百万大军都在淮南被我们谢家人给打败了，何况孙恩那样只会骚扰海边的流寇。隆安四年（400），孙恩趁谢琰不作防备，集中军队偷袭，谢琰兵败逃亡，被部下杀害。其子谢肇和谢峻同时遇害。

谢琰的小儿子谢混从小就有美誉，但走的是文学路线，善于写诗。谢混的诗歌清新浅显，不流俗，对东晋诗风的转移有一定影响。谢混历任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多少延续了祖父谢安的声望。不幸的是他卷入了东晋末年的政治漩涡。谢混与大将军刘毅关系密切，而刘毅则在与权臣刘裕的党争中失败。东晋末年，谢混被准备篡位的刘裕杀害。谢混的死与社会大环境变迁有关，留待后文细说。

朱序在淝水之战后返回东晋，被朝廷安置在中原前线，长期参与对胡族政权的作战，十年后病逝。

复国是永恒的目标

—

淝水之战后，苻坚仓皇而逃，前秦主力尽失。这就为慕容家族的复国梦想提供了可能。

淝水之战前，慕容垂在前秦的处境非常好。他虽然是前燕的皇族，却不是俘虏，而是主动投靠的人才。苻坚很看好慕容垂，而慕容垂又在灭亡前燕的战争中立了大功，所以淝水之战前慕容垂担任冠军将军，指挥军队，算是掌握着实权。淝水之战动议之时，以慕容垂的眼光和智慧，很可能看到了前秦尚未具有灭亡东晋的实力，可是他热情支持苻坚的南征计划，其中不能说慕容垂没有自私的想法。攻打东晋，慕容垂率本部兵马三万人随军南征，幸运的是，他的部队还没上前线，秦军就在淝水一战中惨败了。我们有理由猜测，慕容垂可能是在故意拖延避战，观望以保存实力。

原先被前秦消灭的皇族的各个割据政权纷纷揭竿而起，图谋恢复自家王朝。受到厚待的慕容家族原本就对复国念念不忘，自然加入了华北重燃的狼烟中——后人时常据此批判慕容家族忘恩负义，满肚子的狼子野心。而慕容家族中，最有希望扛起复国大旗的就是掌握军队的慕容垂。

复兴鲜卑王朝的曙光照耀在了慕容垂的身上。慕容垂的军队在淝水之战中保存实力，是战后前秦国内唯一完整的部队。战败的光杆皇帝苻坚跑到了慕容垂的军中避难。是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杀了

苻坚取而代之，还是礼送出境，光明正大地与之一决雌雄呢？当时聚拢在慕容垂周围的一帮前燕旧臣都劝慕容垂立大功者不拘小节，应乘机取代前秦。

慕容垂的作为则光明磊落，充满帝王气度。他回顾了自己落难前燕时，无所置身，苻坚盛情款待，授权其掌兵的恩德。前秦实权人物王猛曾力劝苻坚杀掉慕容垂，因为王猛觉得慕容垂有帝王之相，会是前秦的大敌，而苻坚仍然以国士之礼厚待他。“此恩何可忘也！”慕容垂慷慨陈词，说服众人，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苻坚，一路护驾他返回长安。

到长安边的浍池，慕容垂请求苻坚允许自己到华北去安抚“轻相煽动”的百姓。华北是前燕旧地，慕容垂的意图也很明显，但苻坚爽快地答应了。谋士权翼力劝苻坚不要放走慕容垂，苻坚坚守诺言，虽然觉得有理也没有收回成命。权翼无奈，私自在黄河桥边设下埋伏，打算袭击慕容垂。慕容垂早有提防，在无人处偷渡黄河，逃过了一劫。慕容垂在乱中独身东出河南，聚拢鲜卑旧部，招兵买马，部队一下子发展到二十万人。384年，慕容垂在河南荥阳称燕王，标志着鲜卑族复国成功。两年后，他自立为帝，定都河北中山。鲜卑垂建立的王朝史称后燕，以别于曾经驱逐他的前燕。

此时，历经磨难的慕容垂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他建立的后燕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里牢固占据关东地区，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后燕与西边的后秦政权东西对峙，历史回复到了之前秦燕对峙的局面。

前燕灭亡后，作为皇帝的慕容和弟弟慕容泓、慕容冲被带往长安，受到苻坚的优待。苻坚见前燕清河公主肤白漂亮，娶她为妃，又见慕容冲年少帅气，把他召进宫来充作侍童。他和慕容冲姐弟朝夕相处，同床共枕。慕容冲姐弟共事苻坚，引得长安城中百姓唱道：“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王猛觉得不成体统，极力进谏。苻坚虚心纳谏，将慕容冲遣送出宫，等他长大一些以后又任命他为平阳太守。

慕容暉、慕容泓、慕容冲三兄弟都满怀先辈创业复国的激情，对苻坚伪装应付，伺机而动。前秦兵败后，慕容泓率先招揽鲜卑部众，扯起了反旗。慕容冲也起兵投奔慕容泓。兄弟俩很快聚拢了数万人，与前秦残部在关中展开血战。

慕容泓遣使苻坚，要求“分王天下”。苻坚大怒，叫来慕容责问。慕容暉叩头至流血，哀求恕罪。苻坚赦免了他。转身，慕容暉就暗中派人到慕容泓那里，支持弟弟复国，还告诉慕容泓：“一旦听到我的死讯，你就即位接着干。”

前燕灭亡后，大批鲜卑人被迁徙到关中。关中的鲜卑人思念复国，支持慕容暉、慕容泓、慕容冲三兄弟。应该说慕容泓和慕容冲的复国起点比慕容垂要高得多，可惜他们在复国途中继续将内讧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慕容泓不久在部下骚乱中遇害，而慕容冲就是幕后黑手。之后，慕容冲整合关中的鲜卑势力，复用燕国旗帜，史称西燕。西燕建国后的主要目标就是进攻长安，俘虏苻坚。

苻坚困守长安，悲伤于慕容家族背信弃义，把慕容暉叫到跟前大骂：“你们家族兄弟子侄布列上将，当时虽称是灭国，其实我待你们像归家一样。现在慕容垂、慕容冲、慕容泓各个称兵，你们家族真是人面兽心，枉亏我以国土待你们。”慕容暉伏地哭泣，表白忠心。苻坚宽厚惯了，将慕容暉叫来责备就表示他没有杀心。慕容暉总算蒙混过关了。苻坚又派人送了一件锦袍给慕容冲，希望慕容冲念及过去的恩情。当年，苻坚和慕容冲姐弟同床共枕，在他看来是恩情，在慕容

冲看来却是耻辱。因此，慕容冲答道：“我以天下为任，怎能受这一袍小惠！如果苻坚束手就擒，我对待苻家不会比他当年待我们家差。”苻坚闻报，后悔不及：“悔不用王猛和苻融之言，使白虏敢猖狂如此！”（鲜卑人皮肤白皙，苻坚因此称之为“白虏”）

长安城里，慕容暉时刻不闲，以儿子成婚为名邀请苻坚参加。苻坚答应了。术士王嘉认为慕容暉杀苻坚的计划不会成功，预测“会天大雨，不得杀羊”。当夜，长安果然大雨滂沱。苻坚因此察觉了慕容暉的阴谋，这才下了杀心，杀了慕容暉父子及其宗族。长安城内残存的数千鲜卑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斩除。苻坚厚待亡国宗室却遭背叛，成了后代帝王不断提及的教训，也导致了后代亡国宗室罕有保全性命者。

城外，慕容冲率军猛攻长安。苻坚不敌，留下太子苻宏守长安，自己率部逃往五将山，结果被部将姚萇所杀。苻宏弃城而逃，投降东晋。慕容冲杀进长安，屠城作为报复。占领关中后，慕容冲计划以长安为都城，长期经营。但鲜卑部众都希望迁回河北、辽东老家，反对留居关中。慕容冲旋即在兵变中被杀。西燕帝国的四十万军民大举东归。途中内乱频仍，慕容永最终夺取西燕的政权。因为慕容垂已在东方建立了后燕帝国，慕容永不敢再往东走，就转向北边，占据了山西南部一带。

第二年，慕容垂以不两立之势对西燕发动进攻。394年，西燕都城长子城被攻破，慕容永被杀，西燕灭亡。西燕融入了后燕。

慕容鲜卑经过这么多的变故，原本实力就有限，现在更不能支撑起统治整个中国北部的庞大帝国。后燕帝国随即遭遇到了同种同源的辽西鲜卑拓跋部的挑战。

拓跋鲜卑占据后燕的西北方向，对慕容垂形成压迫态势。“大燕国”的实力在历次争斗中已严重透支，只能兵出险招，寄希望于取得

一场对拓跋部的主力决战的胜利。慕容垂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重创拓跋部落，也希望即将即位的太子慕容宝能够一战立威。

395年，他以慕容宝为元帅，率大兵攻魏。拓跋部的杰出领袖拓跋珪故意示弱，拓跋部众赶着牲畜牛羊渡过黄河，西迁一千多里，佯装远逃他乡，实则是诱敌深入。慕容宝迫切要扬名立威，跟随拓跋部西进，追至河套地区。在这里，后燕大军渡河为暴风所阻，和拓跋部隔河对峙。拓跋珪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慕容宝的后方，截断了后燕大军与朝廷的联系。

几个月来，慕容宝都得不到国都中山的消息。他出发时，父皇慕容垂已染病在床，如今他连父皇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心里焦急。在古代，太子不知道父皇的生死，是很危险的事情，搞不好皇位就被人夺去了，甚至还有性命危险。拓跋珪就利用慕容宝的这个心理，逼被俘的后燕往来使者隔河叫喊：“慕容垂已死，你们还不早点回去！”后燕大军不辨真伪，士气大为衰退。慕容宝决定退兵，退兵前他烧毁了黄河沿岸所有的船只，以为这样就能够阻止拓跋部主力的追击。谁知，到十一月初，天气严寒，黄河结了厚厚的坚冰，拓跋珪率精锐骑兵从容过河，追击燕军。后燕大军在岱海（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被拓跋部追上。拓跋珪选择在后燕大军毫无准备的凌晨发动突袭，大破后燕军队。后燕官兵惊慌失措，四窜逃跑，自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上万人，还有四五万人束手就擒。慕容宝仅以身免。拓跋珪把被俘的燕军全部活埋。

次年（396）初春，已是七十一岁的慕容垂进行了人生的最后一战。他御驾亲征，征调残余的燕国军队，组成西征复仇的重兵。燕军旗开得胜，慕容垂阵斩拓跋勇将拓跋虔。拓跋珪这回真的是避其主力，坚壁清野，不与燕军作战。慕容垂最后掳掠拓跋部三万余户东归。后燕大军过参合坡时，见去年燕兵的尸骨堆积如山，全军哭声震天。慕容垂气恨难当，呕血病倒，死于撤军途中。他一死，后燕失去了主心骨，迅速衰败。拓跋鲜卑开始步步紧逼。

慕容垂死后，拓跋珪频繁组织反攻，最后将后燕重镇中山和邺城包围。即位的慕容宝打不过，只好放弃了都城中山，打算逃回祖宗龙兴的辽东龙城，退守祖宗故地。拓跋部攻占河北各地，后燕被截为南北两部分。留守南边邺城的是皇叔、慕容垂的弟弟慕容德。慕容德坚持了半年后，率领域中的四万户鲜卑人突围南逃，来到河南徙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自称燕王，史称南燕。第二年（399），拓跋部紧随而来，滑台失守。慕容德又辗转夺取了青、兖两州，入据广固，于400年称皇帝，建立了南燕帝国。这是第四个燕国。

五年后，年老的慕容德也死在了异乡，死前指定由逃难而来的侄子慕容超即位。慕容超在早前流过浪、要过饭、做过奴婢，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在乱世中随波逐流、颠沛流离的经历。当他逃到南燕的时候，叔叔慕容德喜出望外。慕容家族经过这么多的变故，嫡系的皇族不多了。慕容超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君主。可惜一个没有经过血与火洗礼的贵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来得过于容易的富贵让慕容超迅速迷失了自己。他不修内政，喜好游猎，还诛杀功臣，为了满足享受，他增加赋役，很快使南燕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409年，东晋刘裕率师北伐，次年二月就攻下广固，将城池夷为平地。慕容超被俘杀，南燕灭亡。

慕容德叔侄能以区区逃难的四万民户，在异乡延续燕朝国祚，也难能可贵。

说完南边，再说北逃的慕容宝。在他返回祖居辽东的途中，长子慕容会阴谋叛乱夺位。慕容宝诛杀了长子，不久却被他的亲家杀死。另一个儿子慕容盛杀死岳父，报了杀父之仇，自立为后燕主，返回旧都龙城。三年后，慕容盛也被手下杀死。这时慕容宝的幼弟慕容熙即位。这位慕容熙也是内政不修的昏君，行事荒唐。407年，被他迫害的将领冯跋潜入龙城，攻杀慕容熙，后燕亡。

冯跋是胡化的汉人，出生在河北。他的父亲冯安曾任西燕将军。

西燕亡，冯跋随家人东迁到后燕，于后燕慕容宝在位时被任命为禁卫军将领。冯跋和弟弟冯弘曾因小事获罪于慕容熙。慕容熙想杀掉冯跋兄弟，两兄弟只好逃匿深山之中。后来慕容熙的皇后死了，慕容熙举办了盛大的葬礼来表达自己的哀伤。结果在葬礼中，慕容熙被潜入龙城的冯跋兄弟杀死。冯跋推出慕容家的养子、实际上是高句丽人的高云为燕王，改元正始。这就是燕朝系列的最后一个国家：北燕。北燕的疆域以辽东为主，在强盛时期曾经拥有河北、东北大部。

高云作为傀儡，任命冯跋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邑公，把军国大事全都托付给冯跋兄弟处理，自己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享福。谁料福没享好，高云自己被宠臣离班、桃仁砍了脑袋。冯跋平定叛乱后，干脆自己从幕后走向幕前，在众人的推举下即天王位，改元太平。

冯氏的王朝继续沿用大燕的旗号，但已经不是慕容家的故国了。冯跋是个不错的君主，他勤于政事，革除后燕苛政，奖励农桑，轻薄徭役，因此国家安定。虽然当时外有拓跋部建立的强大的北魏相侵，北燕依然维持了二十二年的安定。除以州郡治民之外，北燕还以太子领大单于，置前后左右四辅，推行胡、汉分治政策。冯跋、冯弘都曾派遣使者到江南。当时的南朝称北燕为“黄龙国”。

北燕太平二十二年（430），冯跋病重，命太子冯翼摄理国家大事。不想，冯氏的燕国也走到了内讧的边缘。冯跋的宋夫人在冯跋病重期间，图谋立自己的儿子为新君。宋夫人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可能还调动了军队。皇弟冯弘不愿意了，率领军队进宫平变。冯跋在惊惧中去世，冯弘即位。经过这么一闹，北燕最后的国运也消失了。强大的北魏连年进攻，采取掠徙北燕民户的蚕食政策。北燕的地盘越来越小，冯弘不得不转而依靠高句丽的保护。436年四月，北魏发动灭亡北燕之战。五月，冯弘在高句丽军队的保护下，率龙城百姓东渡辽水，投奔高句丽。北魏占领龙城，北燕亡。

自337年起至410年止，兴起辽东的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五个燕国，纵横疆场七十余年。其中最可贵、最让人难忘的无疑是整个家族对王朝国祚延续的执着坚持和顽强追求。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就以慕容家族的历史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口口声声“兴复大燕”的姑苏慕容家族。许多读者也将“慕容”和“复国”紧密联系了起来。

该后秦上场了

—

乱世和枭雄是一对孪生兄弟。乱世出枭雄，野心勃勃的强权人物总认为时局越乱越好。淝水之战后，前秦元气丧失、矛盾迭起，北方很快回归了分裂状态，又涌起了一批枭雄霸主。许多割据政权在前秦的废墟上建国，除了慕容家族的燕国外，最主要的就是后秦了。

我们知道，前秦是由从关中迁徙到关东的氐族一部建立的。当年后赵从关中迁徙氐族人以充实关东的同时，还迁徙了陇西羌族。羌族首领姚弋仲率部东徙，在石虎时期参与了镇压反赵的起义。后赵灭亡后，这支羌族人为了避免东方迭起的战乱，南下投降了东晋。姚弋仲在战乱中死后，由儿子姚襄带领部众。东晋用他们来镇守淮河，防备北方的胡族。姚襄就在淮南召集流亡人士，屯兵储粮，引起了东晋的猜疑。姚襄最终叛晋，西进企图谋取关中。他不幸赶上了蒸蒸日上的前秦势力，在与苻坚的战争中被擒斩。其弟姚萇率羌族余部投降了前秦。

姚萇的这支羌族力量算是融入了前秦的阵营中。苻坚依然任命姚萇统领部族，参与了在西北、四川和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淝水之战时，苻坚任命姚萇为龙骧将军，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并勉励姚萇说：“龙骧将军是朕登基前的官职，从来不轻易授予他人，卿其勉之！”始终怀有二心的姚萇果然接受苻坚的勉励，一心在这个职位上“追求进步”。

淝水之战败后的第二年（384），前秦爆发内乱。先是慕容家族起兵。苻坚派儿子苻觚率军五万讨伐慕容泓，姚萔为司马辅助他。战前，姚萔说：“鲜卑人一心回到东方的故乡去，我们可以因势利导驱逐他们出关中，不可以当面迎战。鼯鼠的尾巴被人抓住了，还能反噬他人，更何况是一心夺路回乡的大军了。”他建议秦军在慕容鲜卑的后面鸣鼓追击，任由鲜卑人退出关外。应该说，姚萔的建议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可惜苻觚好大喜功，一心追求所谓的战功，领兵截击，结果败死。皇子阵亡，姚萔害怕了，派人向苻坚谢罪。苻坚盛怒之下，杀了姚萔的使者。姚萔更害怕了，逃奔渭北。北地、新平、安定的十余万户羌人推举姚萔为领袖，在乱世中求生存图强盛。姚萔也走上了叛乱的道路。

当时慕容垂在关东叛乱，慕容泓、慕容冲等人在关中与苻坚相攻。姚萔的势力最弱，他采取了韬光养晦、坐山观虎斗的策略，遣使向慕容冲求和，把儿子姚崇送去当人质，换取鲜卑族和羌族的和睦共处。姚萔趁机攻占北地，缮甲厉兵，耕作积粟，以观时变。

苻坚对姚萔的叛乱很愤怒，当年夏天亲自率领步骑两万人进攻姚萔。苻坚打败了姚萔，还截断了羌族人的运水之路。姚萔军中有人都渴死了，情况非常危急。关键时刻，天降大雨，羌族军营中积水三尺，军心大振。苻坚刚要进食，看到大雨无心再吃，说道：“天其无心，何故降泽贼营！”恰好慕容冲乘虚进逼长安，苻坚便放过姚萔，撤守长安去了。

姚萔听到慕容冲攻打长安的消息，和部众讨论发展战略。部下都认为应该南下占领关中核心地区。姚萔却认为苻坚和慕容冲正在南边打得不可开交，南下不是好时机。他预测前秦将被慕容鲜卑打败，而慕容鲜卑迟早会东归，关中地区迟早会是自己的天下。于是姚萔移兵岭北，在前秦和慕容鲜卑都没有关注的关中北部、西部地区攻城略地，兵不血刃占领了大片土地。西到安定、南至秦岭的各个州城，都投降了羌族。

我们再来看慕容冲和苻坚在长安的拉锯战。鲜卑人围攻长安，苻坚亲自督战杀敌，身上中了好几支箭，血流满身也不退后。无奈围城日久，城中乏粮。苻坚向来宽厚，这时候还拿出皇宫中最后的口粮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大臣们把肉塞进嘴里舍不得咽下，含回家吐出来给妻子儿女吃。

战火连绵数月，百姓死亡无数，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长安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最后，苻坚迷信讖言“帝出五将久长得”，留太子苻宏守城，自己带着一支部队逃到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

五将山已经是姚萔的天下了。姚萔派兵包围苻坚的孤军。秦兵溃散，苻坚被俘，被带到姚萔跟前。姚萔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大骂：“国玺已送晋朝，怎能送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叛贼！”姚萔让苻坚禅位给他，苻坚骂得更厉害了：“禅代是圣贤之事。你姚萔什么东西，敢自比古圣先贤！”姚萔羞愤难当，派人把苻坚缢死在新平佛寺。统一北方的一代枭雄就这么死了，虚岁四十八。这是385年的事情。

苻坚逃跑后，慕容冲攻入长安。前秦文武百官数百人逃出来，投降了姚萔。鲜卑军在长安烧杀抢掠，之后便浩浩荡荡东出。长安成了一座空城，被姚萔接收。386年，姚萔在长安即皇帝位，国号依然是秦。历史上称之为后秦。

二

后秦建立后，与关东的后燕相互对峙。北方在前秦和前燕对峙的局面之后，重新出现了后秦和后燕对峙的局面。除了这两大割据政

权；西边还有后凉、西秦等政权；北方有拓跋部鲜卑的魏政权和匈奴人的大夏政权，山西则是前秦残余，慕容冲则执着于攻长安，后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山西。

苻坚的死讯传出后，困守山西的苻丕在晋阳即位，举起了前秦的旗帜。大旗没有扛多久，东出的鲜卑人在慕容永的率领下避开正东的慕容垂，向东北进入了山西，与苻丕代表的前秦残余力量迎头相撞。慕容永大败苻丕。苻丕带着几千残兵败将，南渡黄河，竟然想袭击东晋占领的洛阳，结果被晋军杀死。消息传到陇西，苻坚的族孙、狄道（今甘肃临洮）长苻登在另外一支前秦残余势力的拥戴下即位为帝，继续挥舞着前秦的旗帜。

此时的关中，大部为姚萇的后秦占领，苻登只占领了陇西的部分地区，依然与后秦连年征战。苻登等人对前秦的辉煌念念不忘，又对姚萇的弑君深恶痛绝，攻打起来特别顽强凶悍。后秦一时之间竟然不能取胜，关中地区的局势一度呈胶着状态。

野心家魏揭飞在前秦担任过镇东将军，苻坚死后，投降姚萇，如今自称大将军、冲天王，背叛姚萇。后秦的镇军将军雷恶地也反叛后秦响应他。两人联合进攻后秦。姚萇亲自平叛，阵斩魏揭飞及将士万余人。雷恶地先逃跑，后投降。姚萇待之如初，让雷恶地心悦诚服，后来常对人说：“我自言智勇所施，足为一时之杰。校数诸雄，像我这样的人，都应跨据一方、兽啸千里。姚公用智力降服我这样的人，是吾分也。”

姚萇之所以能在乱世中建立后秦，看来不是浪得虚名。还有一个突显姚萇过人之处。前秦兖州刺史强金槌在新平据守，投降了后秦。姚萇准备率数百骑进入强金槌的城池。群臣慌忙劝阻，都说这么做太危险了。姚萇说：“强金槌已经背叛苻登，如果再与我们为敌，他就四处为敌了！况且强金槌怀德初附，我们不信任他，何以御物！”他带着少数人马就进入了新平。强金槌的部下果然有人提议趁

机袭击姚萇，遭到了强金槌的坚决阻止

不过姚萇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迷信。苻坚对他有恩却被他杀死，姚萇内心对苻坚有愧，日常总觉得苻坚阴魂不散。姚萇曾经在军中立苻坚像祈祷，把杀害苻坚的责任都推给部下，表白“新平之祸非臣罪也”。那么自己现在称帝，又为什么和前秦势力连年作战呢？姚萇对着苻坚的像争辩道：“苻登是你的远房亲戚，还想着要复仇，我的哥哥姚襄被你杀死，我哪里敢忘记我的兄弟呢？”

姚萇还认为“陛下命臣以龙骧建邺”，就是在遵照苻坚的意思称帝的啊！诡辩了一大通后，姚萇祈祷苻坚的魂灵：“今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计臣过也。”苻登在城楼上看到姚萇的表演，勃然大怒，冲着姚萇大喊：“为臣弑君还立像求福，有用吗？弑君贼姚萇快快出来，我要与你决斗！”姚萇自然是不敢出战。后来，后秦军作战不利，姚萇每夜都从噩梦中惊醒。他认定是苻坚的魂灵作怪，竟然将当初擒杀苻坚的有功之臣斩首，希望求得平安。

人杀了，姚萇每晚还是不得安宁。他总是梦见苻坚率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人突入营中，要杀自己。一次，姚萇梦见自己为了躲避鬼魂，在皇宫中到处奔跑，大喊捉鬼。侍卫们赶来护驾，其中一个人迎着姚萇“刺鬼”，不小心刺中姚萇的阴部，拔出来后流了满地的血。群鬼欢呼说：“正中姚萇的死处！”姚萇顿时惊醒，从此患了阴肿。医生刺破他的肿处，真如梦境中的情形般出血如注。姚萇病情迅速加重，变得疯疯癫癫，时常大呼：“陛下，杀您的是我的哥哥姚襄，不是臣，请不要冤枉臣。”

床榻之上，姚萇叫来太子姚兴，开始布置后事：“你要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建初八年（393），姚萇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他一共做了八年后秦皇帝。

苻登听说姚萇的死讯，大喜：“姚兴小儿，不难对付。我折根拐杖就能鞭打他。”于是他倾其所有，纠集前秦的所有力量东进，以争夺关中。后秦虽然遭遇国丧，新君姚兴年轻，但同仇敌忾，出动精兵强将迎战。苻登根本不是对手，率军节节败退，又被后秦军队堵塞了水源，官兵争水不得，渴死了十分之二三的人。苻登集合最后力量突围失败后，前秦军队连夜溃散。苻登单人匹马逃回。

东进之初，苻登留弟弟苻广、太子苻崇守老巢。苻广、苻崇听说苻登大溃败，吓得弃城而逃。苻登逃回来后，无所依归，收集若干氏族部众逃入马毛山。姚兴的追兵很快就打到了。苻登向陇西鲜卑卑躬屈膝，求得了两万援兵，与姚兴在马毛山南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场前秦与后秦的最后一战中，苻登阵亡，时年五十二岁。

苻登死后，太子苻崇逃到湟中（今青海西宁一带）称帝，延续了前秦的国脉。可青海一带是陇西鲜卑的地盘，后者不允许氏族苻氏在自己的地盘上称王称霸，于是攻打苻崇，拔掉了前秦最后的旗帜。苻崇死在了湟中。他的儿子（苻登的孙子、苻坚的同族玄孙）苻宣逃奔，依附于仇池杨氏。仇池杨氏后来投降了东晋，苻宣顺带也归降了东晋。东晋朝廷还任命苻宣担任过平北将军。东晋“平北”的愿望是好的，可惜始终没有实现，任命曾经统一北方的前秦皇孙苻宣出任这个职位，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从此，前秦皇室的子孙世代居住江南，繁衍生息。

其实江南曾经还有另外一支前秦皇室的血脉，不过后来中断了。那就是苻坚的太子苻宏。苻坚从长安逃到五将山不久，苻宏守不住长安，也学父皇弃城出逃。他一路向西逃到武都，再向南逃，最后投降

了东晋。苻宏的身份比苻宣重要多了，是货真价实的前秦太子。东晋很重视他，任命他为辅国将军，还委托其带领荆州前线军队。可惜的是，苻宏在东晋复杂的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加入了桓玄阵营。桓玄叛乱失败后，苻宏在湘州被杀。苻坚的嫡系血脉没能流传下来。

我们再看后秦。姚兴彻底铲除前秦势力后，继续开疆拓土。后秦的西边是陇西鲜卑建立的西秦，面对后秦，西秦根本不是对手，很快败亡。西秦再往西是后凉政权。前秦大将吕光奉苻坚之命进军西域，迫降三十多国后凯旋，到达姑臧（今甘肃武威）的时候，吕光得知前秦分崩离析，中原大乱，索性就地割据，占据河西，建立了后凉政权。如今后秦大军压境，后凉政权也很快败亡。后秦的北方是拓跋氏鲜卑和赫连氏匈奴，双方时战时和。后秦的东边是强大的后燕政权，中间的山西地区夹着西燕政权。西燕被慕容垂攻灭，姚兴趁其败亡轻松攻取了河东。后秦的南边与东晋抗衡。东晋在淝水之战胜利后，大举推进到黄河以南。弘始元年（399），后秦大规模出兵进攻东晋，一举攻陷洛阳。晋军不敌，撤出淮河和汉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后秦统治疆域迅速扩大，西至河西走廊，南到秦岭淮河，东到现在的山东西部。

姚兴时期，后秦进入鼎盛。关中地区部分恢复了前秦王猛时期的景象。姚兴比较注意选才纳谏，释放自卖为奴的人，前期执法比较简约，与民方便，提倡儒学，长安儒生数目逐渐恢复到万人以上。

后秦社会的一大现象是佛教开始兴起。姚兴广建寺院，尊奉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为国师。鸠摩罗什原本是苻坚命令吕光从西域迎接而来的，可惜吕光中途在河西独自割据，就留鸠摩罗什也在河西住了十七年。姚兴平定河西后，邀请鸠摩罗什来长安讲学译经，还支持法显和尚赴印度等国取经访问。法显历经艰辛，遍游印度后，从海路返回了东晋管辖下的青州。在政府支持下，后秦境内佛教大兴，长安成为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后秦对佛教的支持与传播，对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姚兴晚年，后秦由盛转衰。原因大抵有二。第一，后秦毕竟建立在有限的、饱经战乱的土地上，羌族本身实力就比较弱小，国库很快空虚，军队很快疲乏。姚兴的对策是加税。他大幅度加重税赋，奴役百姓。第二个原因是姚兴的诸子不和。太子姚泓懦弱。皇子姚弼最受姚兴宠爱，行为骄横，在416年谋反篡位，事败被杀。同年，姚兴在忧虑中病死，太子姚泓即位。

乱政父子兵

—

东晋中期，民间有谶语说：“晋祚尽昌明。”从字面上看，晋朝的国运遇到“昌明”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就结束了。

当时简文帝司马昱还是藩王，他的一个妾李氏正怀有身孕。李氏在梦中见到一个神人，对方告诉他：“你将会生下一名男孩，以‘昌明’为字。”李氏醒后觉得很诧异。后来她果然生下一个男孩，产完后东方刚好露出鱼肚白来。李氏信了那个梦，就将儿子取名为司马曜，字昌明。司马昱因王妃王氏及世子均亡，其他诸姬也并无生育，十分着急，唯恐无后。如今有了儿子，司马昱最初喜出望外，直到想起了那句谶语，才幡然醒悟，痛哭流涕。难道东晋要亡在自己的这个儿子身上吗？后来，司马昱阴差阳错地被桓温拥立为了皇帝。再后来，司马曜即位，成了孝武帝。

司马曜刚办完父亲简文帝的丧事，就遇到了宫廷政变。一伙拥戴晋废帝司马奕的人突然杀入皇宫，声称奉司马奕回宫复位。这伙人最终被禁卫军镇压。年仅十岁的司马曜刚成为宫廷的主人，就经历了血腥的一幕，不是什么好兆头。果然他遭遇了桓温的逼宫，又遇到前秦百万大军的南征，屡次命悬一线。好在有以谢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力量支撑着，保持东晋朝廷微妙的平衡。

作为东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司马曜毫无作为，像是个旁观者。长大后，他最大的特长和爱好是酗酒，常作长夜之饮。地震、水

灾、旱灾接踵而来，朝政日坏；而在皇宫里，司马曜清醒的日子越来越少，天天醉得不成人形。司马曜的酗酒，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逃避。东晋时期，皇权衰微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王朝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南北世族支持的结果。晚年，司马曜看到长星划过天际，举杯邀请说：“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可见，司马曜本人都对东晋王朝的命运感到悲观。正是因为悲观，也因为无能为力，司马曜干脆逃避到酒乡中去，听任朝野大臣争斗。这又反过来加速了皇位的衰微。

司马曜执政初期，朝政全靠谢安主持。谢安死后，司马曜的同母弟弟司马道子领徐州、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军事，掌握实权。此后，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将近二十年。人们可能认为司马道子老成持重，或者是年纪大资历深，其实司马道子年纪非常小，掌权时刚好二十出头，完全是个毛头小子。

司马道子为政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恣意妄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政事，掌权前没有人教过他，掌权后没有人敢教他，他就只能由着自己的心思来了。谢安主政时期，司马道子是个清谈高手，喜欢结交宾客，还一度因为“恬淡”受到过谢安的夸奖。如今，司马道子把清谈和请客的做派扩大化，营造园林，大宴宾客，亲近僧尼，沉迷于酒色之中。在朝政处理上，司马道子重用王国宝、赵牙、茹千秋等奸佞小人，大搞朋党政治，只要是经常在自己宴会上出现的、听自己话的就重用，反之就闲置或打压。他的这些党羽，卖官贩爵，横行无道，很快就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司马道子最重用的是王国宝，而王国宝最擅长的就是捞钱，“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间”。原本王国宝出身太原王家，又是谢安的女婿，家世很好，可惜个人品行恶劣。谢安在世时就很不喜欢这个女婿，故意压制他，不让他担任达官要职。谢安还没死，王国宝就到处诋毁岳父。司马道子掌权后，王国宝的堂妹嫁给了司马道子为妻，两人很快在酒桌上找到了共同语言，沆瀣一气。王国宝迅速升

为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几乎与司马道子共掌朝政。

戏子赵牙因为擅长表演，为司马道子所喜欢，就被擢升为太守。他在建康用公款为司马道子建造了一所大宅院，“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估计是造得太好了，名声在外，惊动了皇帝。司马曜曾御临弟弟的新府邸参观，见面积辽阔、室宇宏丽，惊叹之余对司马道子说：“你府内的假山高耸入云，的确壮观，不过山上修饰太过，要注意啊。你可要向天下人树立俭素的好榜样啊。”司马道子闻言，连忙称是。皇帝走后，赵牙说：“幸亏皇上不知道这座山本身就是人工堆积起来的，不然可能要责怪王爷了。”

在司马道子、王国宝等人的治理下，东晋百姓“殆无三日之休，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鰥寡不敢嫁娶”，真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司马曜对弟弟司马道子的胡作非为是知道的，但一直压抑着对弟弟的不满。直到有一次两人一起酗酒，司马道子恃宠乘酒，对司马曜不够礼敬，司马曜大怒。兄弟至此失和。司马曜几次想废黜司马道子，都遭到了母亲李氏的阻止。而中书郎徐邈又引用开国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与弟弟司马攸兄弟相残的往事劝说司马曜，司马曜终于还是被亲情所束缚，放弃了废黜司马道子的念头，任由司马道子继续乱政。

二

396年冬季的某一天，司马曜又喝醉了。醉眼惺忪中，他看到张贵人陪在身边。张贵人正受司马曜的宠爱，可惜年近三十，不如青春少女靓丽清秀了。司马曜就开玩笑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也该被废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后妃最怕遭到废黜，在冷宫中孤独地过完被软禁的余生。张贵人越想越凄凉，越想越害怕，由怕生恨，竟然对司马曜下了杀心。司马曜开玩笑后就昏沉沉睡去，张贵人熬到

夜幕降临，狠狠地用被褥捂死了司马曜（一说被勒死）。东晋的孝武帝就这么死了，时年三十五岁。

司马道子并没有深究哥哥的死，凶手张贵人也去向不明，司马道子扶立侄子司马德宗为新皇帝。司马德宗就是晋安帝。

非常不幸的是，上天给了晋朝两个白痴皇帝，一个是引发八王之乱的司马衷，一个就是晋安帝司马德宗。《晋书》毫不避讳地写道：“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也就是说，司马德宗从小到大连完整的话都不会说，连四季变化和冷热饥饱都分辨不清，生活完全靠他人料理，处理朝政的能力就不言自明了。

司马德宗即位，最大的受益者是司马道子这个叔叔。司马德宗登基初期，因为年幼，司马道子辅政，从而操纵了实权；司马德宗成年后，司马道子表面还政于帝，但实权仍操于亲信王国宝等人之手。司马德宗完全是个傀儡。

尚书仆射王国宝和建威将军王绪这个时期想“干点儿实事”了。他们觉得，朝廷有名无实，政令上下不通，真正能够控制的地盘也就是建康附近的几个郡县，西有荆州强藩，北有中原大将把守，东边是强大的扬州刺史辖区。这些官职往往被势力强大的世家大族子弟控制着。王国宝等人决心“削藩”，打压地方势力，为朝廷揽权揽财，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司马道子听到王国宝的主意后，表示赞成。于是，这帮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

削藩要想成功，一要有强大的实力，尤其是有军队作为后盾；二是主持削藩之人必须有高超的手腕、坚强的意志和不俗的能力。这两点司马道子都不具备，削藩必然会失败。最先对朝廷削藩不满的是青、兖二州刺史王恭。

王恭也出身太原王家，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王氏的兄长，在

辈分上是司马德宗的舅舅。王恭是东晋名士，曾有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因为出身好，王恭起家便为著作郎，可他还感叹：“不当宰相，我的才志不足以施展！”司马曜时期，王恭为前将军，出任兖、青二州刺史，负责江北的防御。他指挥着战斗力非常强的北府兵，这也是淝水之战的主力部队。397年（司马德宗刚登基的隆安元年）四月，王恭以清君侧、除王国宝为名，向都城建康进军，挑起内战。

桓温的儿子桓玄在荆州怂恿荆州刺史殷仲堪响应王恭。殷仲堪是著名的孝子，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殷仲堪衣不解带地伺候。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半路出家学医，究其精妙，煎药的时候瞎了一只眼睛。“独眼龙”的形象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当了刺史后，殷仲堪自然以忠君自诩，此时却也起兵，顺江而下，进攻建康。建康陷入了包围之中。

司马道子露出了纸老虎的本质来，一见刀兵就慌了神。他不敢迎战，能想到的只是赐死王国宝、诛杀王绪，然后请求王恭、殷仲堪退兵。王国宝死有余辜，被司马道子勒令自尽却有些出乎朝野意外。他死后，王恭等人没了起兵的借口，只好偃旗息鼓。

经过这么一战，司马道子也意识到自身力量薄弱。不久他任用王愉为江州刺史，希望广植势力来制约不是一条心的王恭等藩镇。隆安二年（398），司马道子又划出豫州管辖下的四个郡，转归江州管辖，来壮大王愉的力量。结果豫州刺史、庾亮的孙子庾楷对辖区缩小强烈不满，愤而起兵，声称讨伐谯王司马尚之、江州刺史王愉。司马尚之是皇室旁支，继王国宝之后，为司马道子所倚重。

庾楷起兵后，王恭也第二次率北府兵造反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太守杨佺期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桓玄也顺江而下。建康又陷入了藩镇军队的重围中。诸镇推王恭为盟主。

这一次，司马道子没有替罪羊可以杀，慌乱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的儿子司马元显刚十六岁，却比父亲有胆略。他主动请求迎战诸藩镇。无奈之下，司马道子只好任命儿子为征讨都督，率王珣、谢琰等出战。司马元显人小鬼大，清醒地看出诸藩镇中最强大的是王恭，而王恭之所以强大全靠北府兵。因此司马元显决定策反北府兵的首领刘牢之。

刘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在谢玄创建北府兵时即参军，之后身经百战，尤其是在淝水之战中作为尖兵立下了赫赫战功。淝水之战后，东晋趁势收复失地，刘牢之一度渡过黄河进攻到邺城。他长期指挥北府兵，在军中有崇高的威望。而作为北府兵统帅的王恭，只是一个清谈的名士而已，为政讲求清静无为，自然不去亲近底下的将士，也不注意将士们的操练和思想变化。他又自恃高贵，醉心佛道，故意疏远将士，结果在北府兵中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司马元显派人用重利引诱刘牢之，刘牢之心动了。王恭指挥军队向建康进军，北府兵消极怠工，竟然输给了司马元显的乌合之众。王恭撤回回城，刘牢之的女婿高雅之紧闭城门，不放他进来。王恭只好与弟弟王履逃奔曲阿。因为坐着清谈的时间太长，王恭久不骑马，髀上生疮，竟然骑不了马。曲阿人殷确，曾在王恭手下干过参军，用船载着王恭，把他藏在苇席下面，打算走水路去投奔桓玄。不料途中被人告发，王恭被捕，押送到京师。

司马道子本想留王恭一条性命，听说殷仲堪、桓玄等人的荆州军已至建康城外的石头城，怕王恭在城内生变，下令将之斩首。王恭临刑前倒是展现了名士的风度，他“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无惧容”，说：“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

王恭死后，庾楷也被司马元显打败，投奔荆州军而来。荆州来的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三人，剩下孤军一支，惧怕朝廷讨伐，不得不

向朝廷求和。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正害怕荆州军，闻讯马上应允，安抚殷仲堪仍任荆州刺史，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第二次朝廷和藩镇之战，也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桓玄、殷仲堪、杨佺期虽然退兵了，但早已与朝廷离心离德。为了自保，三个刺史在浔阳正式结盟。桓玄因其家世显贵被推为盟主。中央和藩镇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因为三人的结盟而强化了。

建康城中，司马道子度过了一场危机，又开始纵情酒色。崭露头角的司马元显自以为是，大肆揽权，把脑筋动到了父亲的头上。一日，司马道子醉酒不起，司马元显入宫禀告白痴皇帝司马德宗，请求解除父亲的司徒及扬州刺史之职，提升父亲为太傅；请求任命自己为扬州刺史。司马德宗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按照司马元显的意思颁布诏书。司马道子醒来，发现自己被儿子夺走了实权，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他索性更加纵情酒色，把摊子交给了司马元显打理。

起义是成是败，还得看老大的能力

—

司马元显年少得志，非常想有所作为，但他的实力却很薄弱。在上游三刺史的重兵压迫下，司马元显能指挥的生力军只有倒戈而来的北府军，他想要建立一支嫡系部队，便动起了征兵练兵的念头来。

建康朝廷表面上拥有秦岭淮河以南的广袤地区，实际能够控制的领土少得可怜。中原各郡县和北伐拉锯，控制不了；中游的荆州、湘州和江州长期被荆州军盘踞；四川和两广地区远水解不了近渴。剩下就只有长江下游的扬州了。所以我们看到，权臣要控制朝廷往往兼任扬州刺史。司马元显为了把扬州抓到手里，还不惜暗算他父亲司马道子。实际上扬州也不是全境都受朝廷控制，建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治山阴，今浙江绍兴）、临海（治章安，今浙江临海）、永嘉（治永宁，今浙江永嘉）、东阳（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新安（治始新，今浙江淳安）、吴（治吴，今江苏吴县）、吴兴（治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义兴（治阳羨，今江苏宜兴县）八郡。这八郡也是众多世家大族集中之处，他们控制着数量甚巨的土地、人口，逃避朝廷的赋税和兵役。朝廷的赋税、兵役只能加在八郡的普通百姓头上。

司马元显知道八郡百姓已被压榨得一穷二白了，从中招募不了多少士兵，便把目光转移到了世家大族们控制的人口身上。这些人口，既包括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也包括依附他们的门生故旧、食客、佃农和家丁家将。司马睿时期的征西将军戴渊，其部下就有由戴氏家族

控制的人口改编而成的一万人的军队。戴家只是江南的世家大族之一，他们能控制这么多人口，其他家族也不逊色。399年，司马元显下令：征发江南诸郡免奴为客者（已经脱离奴隶身份却还依附他人的人口）当兵，号称“乐属”。征兵令激起了普遍的不满。世家大族们不满，因为朝廷要征发他们的依附人口；被征发的老百姓更加不满，因为他们被强迫去当兵当炮灰。结果司马元显兵没有征来多少，倒是把江南的百姓都给得罪了。

民心骚动。野心家乘虚而起。江南民间盛行五斗米教，信众很多。去年王恭起兵的时候，五斗米教首领孙泰以反王恭之名，聚拢信众起义。孙泰起义规模很小，被朝廷镇压了，孙泰父子全部被杀。孙泰的侄子孙恩侥幸逃脱，躲藏在海岛上，继任为五斗米教的首领。在海岛上躲藏了一年，孙恩见民怨沸腾，于399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在东晋朝廷的柴火堆上点燃了第一把火。

对征兵令不满的百姓和五斗米教的信众纷纷参加孙恩的队伍。八郡遭受朝廷的剥削最重，一般百姓也积累着反朝廷、同情起义军的情绪。孙恩率军很快攻破会稽郡。会稽是江南重镇，是王、谢等世家大族的根据地。会稽被攻破，震动了朝廷，天下局势大变，东晋地方官心惊胆寒。百姓奔走相告，各地都有人攻杀官吏、响应孙恩的起义。没几天，孙恩的部队人数超过了十万。

警报传到建康，司马道子惊慌失措，终日在庙中祈祷。司马元显慌忙派遣谢琰、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南下镇压。

在很短的时间内，孙恩就兵强马壮，又占领重镇会稽，但却没有扩大战果，而是率领党徒在诸郡烧杀抢掠，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东晋朝廷从初期的惊慌中反应过来后，从北向南压迫起义军。孙恩也没有组织北方各地的百姓反抗晋军，很快，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兵锋抵达浙江岸边。起义百姓纷纷逃往会稽。

孙恩显示出了可笑的短视。旗开得胜时，他向信徒们承诺“我们马上要到建康坐天下了”；听说北府兵来了，孙恩立即收缩了大目标，说：“就算我只割据浙东，总也能做勾践第二！”北府兵渡过浙江后，孙恩说：“我并不觉得逃跑是丢人的事情。”当谢琰、刘牢之兵临会稽城下时，孙恩根本不做抵抗，掳掠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

东晋朝廷在形式上收复了全部失地。海岛上的孙恩却也保有不可小觑的军力，不断骚扰浙东各郡县。

二

获胜的谢琰镇守会稽。谢琰自恃在淝水之战有大破苻坚大军的战功，将孙恩视为“小贼”，根本不放在心上，因此会稽守备松懈。

孙恩在海岛上一直窥伺时机。400年，孙恩登陆突袭，连破余姚、上虞等县，进攻会稽。谢琰仓促率兵迎战，兵败后被部下所杀。谢琰的死，从微观上来看是朝廷和孙恩力量角逐的一次反复，从宏观上来看则标志着门阀士族力量从此丧失了军队实权，因为谢琰死后，再也没有世族子弟担任重要的军队职位。一来是世族子弟不屑于领兵打仗这种“俗事”，二来是长期养尊处优的世族子弟们也没能力领兵打仗——这点从王恭骑不了马就能看出来。

世族子弟不行了，朝廷只能依靠寒门人士了。当年年底，刘牢之负责东征孙恩，率领北府兵寻找孙恩决战。孙恩不敢接战，再次主动退入海岛。刘牢之屯兵上虞等处，监视孙恩。

朝廷镇压孙恩的军事行动，让一个中年军官开始为人瞩目。他就是刘牢之派去卫戍句章城（今浙江宁波南鄞江南岸）的刘裕。刘裕是刘牢之的部将，曾受命率数十人侦察义军的行动。侦察途中，刘裕遭遇起

义军数千人的包围。他没有丝毫胆怯与犹豫，勇敢地率领侦察小分队投入战斗。结果所有随从都战死了，刘裕也坠落到水中。部分起义军到岸边，想下去捉拿刘裕，刘裕挥舞长刀砍杀了好几个人，重新登岸大叫着与人决斗。最后，起义军不再与他纠缠，过路而去了。刘裕奇迹般地生还，并报告了起义军的动向。

刘裕作战勇猛，冲锋陷阵，让同伴和长官刮目相看。但他不仅勇猛凶悍，而且还带兵有方，在部队的声望越来越高。句章城很小，刘裕部下的士兵只有数百人。每次都是刘裕身先士卒，被坚执锐，每战都冲锋陷阵，击破敌军，使得小小的句章城成了朝廷在沿海的坚固堡垒。东征的其他官军毫无军纪，到处劫掠，生灵涂炭。只有刘裕治军整肃，法纪严明。百姓们都愿意投奔刘裕，以寻求保护。因为讨乱有功和刘牢之的赏识，刘裕战后被朝廷封为建武将军，领下邳太守。

隆安五年（401）二月，孙恩第三次登陆掠战。他亲率大军进攻句章，却迟迟攻不下来，反而遭到刘牢之的反击，不得不退走入海。三月，孙恩攻海盐，依然攻不下来。这回是刘裕带兵来救援海盐，孙恩主动退兵，北上进攻沪渎（今上海）。沪渎被孙恩攻克，包括吴国内史袁崧在内的四千官兵被杀。孙恩部队士气大振，六月，乘胜逆长江而上，又攻克丹徒。至此，孙恩部队再次迅速膨胀，拥众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军旗遮天蔽日。

丹徒离建康很近。朝廷守卫建康的兵力非常薄弱。司马元显一边戒严，一边急调浙江的北府兵入卫京师。停驻海盐的刘裕，率不满千人的小部队长途驰援建康。短视的孙恩这时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没有抓住建康空虚的良机，派出精兵进攻建康，而是坐在高高的楼船上，指挥十几万人的大部队一起进军。楼船有几层楼高，非常笨重，又是逆江而上，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很快就被刘裕的部队在镇江追上。

孙恩仗着人多势众，这回敢和刘裕正面交战了。他率部队登陆，

抢占镇江的蒜山，阻击刘裕。刘裕不顾劳累，率军毅然猛攻蒜山。孙恩的起义军本为乌合之众，在刘裕大军的猛烈攻势下，很快溃散。孙恩退至船上，放弃陆路，全力从水路进逼建康。刘裕在岸上随行监视。起义军的楼船实在太慢了，又花了好几天才到达建康郊外的白石垒。眼看建康就在眼前了，可惜刘牢之率领的大部队也赶到了。孙恩毕竟心虚，不敢决战，于是放弃攻打建康，分兵袭取北岸的广陵（今江苏扬州），再率主力北上进攻郁洲（今江苏云台山一带的海岛），打败高雅之率领的晋军。不过这只是孙恩起义军的回光返照而已，之后再次退入大海。

海上毕竟生活不便，依赖陆地补充给养，所以孙恩盘踞海上一段时间后总得登陆劫掠。402年，孙恩从海上南下，入寇临海郡。不想临海的晋军勇敢迎战，击败了孙恩。孙恩穷困不堪，对前途丧失信心，投海自杀。

三

孙恩死后，余众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盘踞在浙江东南沿海。卢循虽然出身世族，但门第不高，南渡又较晚，因此在东晋遭到排挤。他起兵同样带有浓厚的私心。朝廷就对卢循施以怀柔，任命他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希望招安起义军的余部。卢循接受了任命，可依然率领部队在今天浙江金华、温州一带劫掠。朝廷痛下决心，派刘裕南征，力求斩草除根。卢循在刘裕的追击下，入海而逃。

卢循率众向南逃亡，越过福建，来到了广东沿海。404年，卢循攻陷番禺（今广州），造成大乱。东晋朝廷考虑到广州偏远，鞭长莫及，在第二年顺水推舟任命卢循做广州刺史。如果卢循和起义军能够在南海一隅安定下来，不作乱，尊奉朝廷，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

方法。卢循也有这个意思。他自己做了广州刺史，成了一方藩镇，又任命姐夫徐道覆做始兴（今广东韶关）相，扼守南岭，大有关起门来安居岭南的意思。

可是徐道覆却不甘寂寞，一心要卷土重来。在广东的五六年时间里，徐道覆暗中操练兵马、打造军械，怂恿卢循北伐。相对应的是，东晋的实权逐渐落入刘裕的手中。刘裕掌权后的主要精力在北方，发动了多次北伐。徐道覆见刘裕远征在外，大军一时难以返回，觉得是东山再起的良机，便不征求卢循的意见，在义熙六年（410）二月从始兴北伐。卢循阻止不及，不得不参与行动。卢徐兵分两路，卢循攻长沙，徐道覆进入江西。

卢循的部队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在广东新招募的“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战斗力很强，加上休养操练多年，开战后势如破竹。东晋地方官闻风逃窜。江州刺史何无忌领兵迎敌，阵亡。卢循和徐道覆联军，逼近建康。建康人心惶惶。刘裕正在北伐南燕的前线，闻讯担心建康有失，只带几十名随从轻装返回建康指挥御敌。

刘裕赶到建康后，考虑到北伐的将士尚未返回而且刚刚经历大战，劳顿多病，因此主张消极防守。镇守姑孰（今安徽当涂县）的豫州刺史刘毅本是刘裕创业期的盟友，后来地位落在了刘裕的后面，渐渐与之不睦。他力主出兵迎击卢徐大军，企图借战功压过刘裕，进而夺权。刘裕从大局出发写信劝阻，又派人去面劝他暂缓出兵。刘毅铁了心要出兵，带上两万精兵和全副家当迎敌，结果在桑落洲一战被卢循杀得落花流水。几百艘大船和堆积如山的辎重都成了起义军的战利品。他本人历尽艰辛，才逃回建康。

刘毅这一败，大大损耗了东晋的有生力量。剩下建康的几千守军，要对抗十几万起义军。形势危如累卵。刘裕悬出重赏，招募建康百姓当兵，又动员民众修治石头城，集中兵力扼守石头城。敌我力量对比依然悬殊。

当年五月中旬，起义军包围建康，秦淮河入江口都出现了卢循的士兵。徐道覆主张烧毁舟舰，登陆猛攻建康各个城门，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起义军占有优势，再破釜沉舟，也不失为鼓舞士气的妙计。如此重要关头，卢循还对前途没有信心，怕烧了船战败了就无路可逃了，留着船还能留条后路。他主张暂缓攻城，采取围城的方式，寄希望于建康主动投降。卢循借口说：“从大势看来，建康不日自会溃乱。”他分兵攻掠周边各县。徐道覆无可奈何，悲叹道：“我终为卢公所误，大事将不成；我若能为英雄效劳，天下可定也！”起义军没有集中兵力对建康城发动猛烈攻势，零星的挑战都被刘裕遏制了。刘裕也勒令部将不准出城挑战，凡是违令出战失利的都被他斩首。建康城最终守住了。而卢循在建康周边的攻掠收获不大。相持到七月，起义军士气疲乏，卢循主动退到浔阳休整。

刘裕并没有追击卢循，而是派沈田子等带兵数千，从海路南下偷袭起义军的老巢广州。卢循北伐倾巢而出，留守广州的兵力微乎其微，很快被消灭。沈田子的数千晋军竟然攻占了广州，让起义军无家可归。消息传到长江前线，起义军军心动摇。战争形势大变。

十月中旬，刘裕从建康出师，主动与起义军决战。卢循接连失利，徐道覆企图西进占领荆州，又在江陵为荆州刺史刘道规所败。年末，卢循、徐道覆带着几千残部退回岭南。

义熙七年（411），刘裕派兵平定岭南。二月，徐道覆在始兴战败被杀。卢循反攻广州又为沈田子所败，逃往交州，在今天的越南河内附近被东晋的交州守军打败。卢循走投无路，毒死家人，然后学孙恩那样投水而死。他的死，标志着孙恩起义的最终结束。

孙恩首义的江南农民起义时间跨越了十余年，纵横半个中国，席卷数十万百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起义重创了本已衰微的东晋朝廷，为实权人物的上台铺设了基础。这里说的实权人物，除了上文说的刘牢之、刘裕，还有作为长江三刺史联盟盟主的

桓玄。

第六章 除了战乱，还是战乱

桓玄：篡国虎父无犬子

—

孙恩起义的导火索是司马元显的大征兵。他征兵的目的，是对付长江上游的三刺史联盟。

在这三个刺史中，江州刺史桓玄值得大书特书。桓玄是大权臣桓温的小儿子。桓温眼看就要逼宫篡位成功，最后还是被谢安给拖死了。桓温死后，年幼的桓玄继承了南郡公的爵位。此时的桓家虽然还保留着不俗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但和桓温在世时已不能同日而语了。桓玄七岁的时候，荆州文武百官聚集在叔父桓冲家。桓冲摸着桓玄的小脑袋，无限感叹地说道：“这些人，之前都是你家的部属、幕僚啊。”桓玄竟然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泪流满面，顿时惊动了满堂宾客。

东晋朝廷没有追究桓家逼宫篡位的罪行，但对桓氏子弟非常防备，桓玄兄弟的仕途非常不顺。桓玄直到二十三岁那年（391）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而一般的世族子弟年满二十岁就能位列朝堂了。几年后，桓玄出京担任义兴太守。他郁郁不得志，登高远望震泽，叹

道：“父为九州岛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干脆弃官回到封国南郡（今湖北江陵），将对朝廷的不满和重振父业的野心埋藏在心底。

397年，王恭第一次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桓玄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浑水摸鱼的机会。当时的荆州刺史殷仲堪在司马道子和王恭之间摇摆不定。桓玄就去劝他：“听说朝廷要征召刺史大人入京担任中书令了，不知道消息是否准确？”这话一下子就点中了殷仲堪害怕司马道子削藩、夺去手中实权的心理。殷仲堪于是决心参与王恭起兵，并分兵给桓玄率领，以之为前锋。

这次起兵以司马道子杀王国宝当替罪羊，王恭主动罢兵结束。桓玄断定司马道子懦弱无能，在第二年（398）向朝廷求授广州刺史的官职。司马道子本就将桓玄看作潜在威胁，希望他走得越远越好，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不想，桓玄只是刺探而已，他接受了广州刺史的任命却不赴番禺去上任，而是继续逗留在荆州等地。桓玄在荆州拉帮结派，聚拢力量，行为豪纵，俨然是荆州真正的主人。官民都忌惮他。荆州刺史殷仲堪的亲党劝殷仲堪除掉桓玄，殷仲堪优柔寡断，迟迟不敢动手。很快，王恭第二次起兵。殷仲堪、桓玄和南郡太守杨佺期联合出兵。荆州内部的矛盾就暂时被冷冻起来了。

这次起兵的结果是王恭被杀，殷仲堪等三人得到安抚，都被任命为刺史。三位刺史在浔阳结盟以求自保。桓玄因为家族声望和历史的缘故，被推为盟主。做了盟主后，桓玄更加骄纵。三人内部矛盾凸显。

雍州刺史杨佺期为人骄悍，在与前秦的战斗中积累军功不断得到提升，算不上官场正途，因此被世族子弟所轻视。但他常常自诩家世华胄，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豪门（他是弘农人，自称是弘农杨氏一员）。桓玄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他，每次都直呼杨佺期为“寒士”，处处压他一头。杨佺期咽不下这口气，早在三人筑坛定盟的时候就计划偷袭桓玄，干掉他。殷仲堪担心杨佺期勇武，恐怕他消灭桓玄后就要夺自己的荆州

地盘，苦苦劝杨佺期不要鲁莽行事。杨佺期这才隐忍不发。三人结盟后，各归辖区。殷仲堪回江陵当他的荆州刺史，杨佺期去襄阳镇守。桓玄知道了杨佺期怨恨自己，又想吞并杨氏地盘，就屯兵夏口（今武汉）。三个盟友各怀鬼胎，相互防备着。

司马元显了解三人的嫌隙，要诱发三人火并坐收渔利，就将杨佺期管辖的四个郡划拨给桓玄。杨佺期和桓玄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不久荆州发大水，殷仲堪全力赈灾，拿出老本抚恤灾民，荆州仓廩面临空竭。桓玄乘人之危，发兵讨伐殷仲堪。江陵是桓玄的封地，哥哥桓伟还留在江陵。桓玄密报桓伟，让他做内应。桓伟遽遽不知所为，竟然把信件拿去“请教”殷仲堪。殷仲堪劫持桓伟为人质，让他写信给桓玄。桓伟在信中可怜巴巴地恳求桓玄撤兵。桓玄却对部下说：“殷仲堪为人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老是考虑妻儿家室。我哥哥肯定没有危险。”继续督率大军，步步进逼江陵。殷仲堪派兵迎战，被桓玄接连打败。桓玄推进到距离江陵只有二十里的地方。

在桓玄进攻江陵之前，殷仲堪向杨佺期求救。杨佺期担心江陵物资短缺、缺衣少食，难以持久，拒绝了殷仲堪的求救。殷仲堪就写信骗杨佺期说江陵储备丰厚，物资和军需都没有问题。杨佺期信以为真，和哥哥杨广一起从襄阳增援江陵。桓玄很重视杨佺期部队的锐气，避其锋芒，全军暂且退后。杨佺期围追其后，桓玄突然调转枪头迎战。经过一番苦战，杨佺期溃败，逃奔襄阳。桓玄派将军冯该追击。杨佺期、杨广兄弟分头出逃，但还是被俘虏了，送到了桓玄面前，双双被砍了脑袋。

困守江陵的殷仲堪得知杨佺期的死讯，勇气丧尽，带上数百人弃城北上，要投奔后秦的姚兴，途中被冯该俘虏。桓玄下令杀死殷仲堪。此前，桓玄在进军江陵的途中，假传圣旨给梁州刺史郭铨，说朝廷已经将郭铨划归自己指挥。糊涂的郭铨莫名其妙地交出了权力，服从桓玄的指挥，做了征讨荆州的前锋。这些都是隆安三年（399）的

事情。

三刺史联盟仅仅维持了一年时间，桓玄就消灭了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佺期二人的势力，尽占长江中游一带。次年（400），朝廷不得已，根据桓玄的请求，任命他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为后将军，兼任荆、江两州刺史。至此，桓玄恢复了父亲桓温时期的势力范围。

二

东晋朝廷虽然由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相继专权，但能够管辖的仅仅是江南八郡而已。江北则由北府兵刘牢之、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分割。江南爆发了孙恩起义，朝廷对其一度失去控制。总之朝廷是四处树敌，捉襟见肘，处置乏力。而桓玄则是当时东晋最大的实权人物，掌握着东晋超过一半的领土（他自称三分天下有其二）。桓玄本就有野心，如今更是大造舆论，说什么“国运转移”，还屡次在辖区内制造祥瑞“进献”给朝廷，名为宣示个人功绩，实为公然示威。

照此发展下去，桓玄迟早要重蹈其父桓温逼宫篡位的覆辙。长痛不如短痛，元兴元年（402）正月，血气方刚的司马元显要求朝廷下诏讨伐桓玄。他自任征讨大都督，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为了拉拢刘牢之，司马元显剥夺桓玄的江州刺史官职，转授给刘牢之。

桓玄没想到朝廷这么快就公开讨伐自己。他之前敢高调示威，是觉得扬州饥馑，孙恩未灭，司马元显没有能力讨伐自己。桓玄盘算着趁机蓄力养众，等力量更强大些再和朝廷摊牌。听说司马元显讨伐自己，桓玄一开始感到害怕，想放弃东部郡县，退保大本营江陵。长史

卞范之劝他说：“桓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司马元显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刘牢之是个反复小人。您如果兵临京师，示以威赏，敌人必然土崩瓦解。如今为什么要引敌入境主动示弱呢？”桓玄有了信心，留哥哥桓伟守江陵，召集兵马顺江而下进驻浔阳。到了浔阳，桓玄移檄建康，公布司马元显的罪状，反过来声称要讨伐司马元显。

这回轮到司马元显害怕了。他也就是一时意气用事，并没有消灭桓玄的周密计划，也没有想到桓玄有如此强硬的态度。他本来已经上了船，大军准备开拔了，看到檄文后却迟迟不敢动身。仗还没开打，司马元显就在气势上输了。

另一方，桓玄一边顺江而下，一边还在心里打鼓。他怀疑部众敢不敢与朝廷大军作战，会不会取胜。等过了浔阳，还没有见到司马元显的一兵一卒，桓玄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部队的士气也高涨起来。桓玄兵抵姑孰，派遣部下击破了倾向朝廷的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和豫州刺史司马尚之。

司马元显没主意了，派使者向刘牢之询问战事。刘牢之也害怕。他一来担心桓玄威名鼎盛，手下有大批精兵强将，取胜的希望不大；二来，刘牢之担心即便平定桓玄了，自己也会功高震主，必定不能为司马元显所容。所以刘牢之犹豫不决，消极怠工，磨磨蹭蹭地带着北府兵进驻建康西南的溧洲，就止步不前了。

桓玄适时地派其族舅何穆来当说客，劝刘牢之说：“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殫，猎犬烹。文种被勾践逼死，白起被秦昭襄王赐死，韩信被刘邦杀死，这些都是前车之鉴。那些英雄霸王之主，还不敢信其功臣，况且是愚昧平庸之流！盘古开天地以来，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以见容于暗世者，有谁呢？现在你的情况是，战败了则家族不保，战胜了也难逃满门抄斩的命运，你想怎么办？倒不如幡然醒悟，与桓公联手，保有富贵。身与金石等固，名与天壤无穷，比起手足异处，身名俱灭，为天下人耻笑，你选哪个？”刘牢之听了，觉得何穆

所言有理，要派使者去向桓玄请降。

外甥何无忌和部将刘裕苦苦劝谏，觉得桓玄不可靠，刘牢之都听不进去。儿子刘敬宣也劝阻说：“今国家衰危，父亲和桓玄是天下最有实力的两个人。桓玄借家族优势，据有全楚，割朝廷三分之二领土，威望已成，父亲恐怕难以与他共存。父亲如果投靠他，只怕董卓之变，就在今天了。”刘牢之怒道：“你说的这些我难道不知道？今日，我是可能打败桓玄，但平定桓玄之后，我又怎么和司马元显相处呢？”最终，刘牢之还是派刘敬宣至桓玄营中请降。

桓玄大喜，热情款待刘敬宣。他接受了刘牢之的投诚，但对北府兵早有处置的意见。那就是要分化、杀戮北府兵，不能让它继续存在。荆州将领们都知道桓玄的心意，在招待刘敬宣的席上莫不相视而笑，笑话刘牢之的愚昧和短视。刘敬宣却被蒙在鼓里。

刘牢之率北府兵投降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桓玄大军沿江而下，进至新亭。司马元显弃船退入建康城中，桓玄军队轻松登陆。司马元显退无可退，硬着头皮整军在宣阳门外列阵迎战。无奈军心已乱，晋军不战自溃。司马元显单枪匹马逃回城中，身后只有一个谋士跟随。他逃到家里，问父亲司马道子怎么办。司马道子只是对着他哭泣，也拿不出任何主意。很难想象，东晋朝廷竟然被这对父子操纵了二十年。桓玄兵不血刃进入建康，抓住司马元显，将他和之前被俘的司马尚之一起杀死。司马元显当时才二十岁而已。司马道子被放逐到安成郡，很快就被毒死，也才三十九岁。

桓玄控制白痴皇帝司马德宗，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派遣家人、亲信占据要津，控制了东晋朝野。

桓玄掌权后，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削弱与镇压北府兵。他任命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剥夺了他的军权。刘牢之恍然大悟：“一转眼，桓玄就夺我兵权，祸将至矣！”儿子刘敬宣劝刘牢之趁着军权还没有交出去，袭击待在建康丞相府中的桓玄。关键时刻，刘牢之显示出了低劣的政治素质，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刘牢之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而是计划带着北府兵渡过长江，与在江北的女婿高雅之联合据守北岸，和桓玄相持。

刘牢之召集北府兵将领商议去留，不想大家对他的主张都默不作声。参军刘袭打破沉默说：“事不可者莫大于反，将军往年反王充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说完，刘袭快步离开，将领们纷纷走散。刘牢之的主张没有得到部下的支持。他事先已安排儿子刘敬宣到京口安置家眷，如今见儿子失期，以为他遭遇不测。众叛亲离之下，刘牢之自缢而死。不一会儿，刘敬宣赶了回来，见父亲已死，也不敢哭喊，急忙投奔高雅之而去。北府兵将士将刘牢之安葬在丹徒。桓玄仍然不依不饶，下令斫棺斩尸，把刘牢之的尸体抛暴于大街上。一代名将，落得如此下场。

除去心腹大患刘牢之后，桓玄再矫诏任命自己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完全掌控了国政。对群龙无首的北府兵，桓玄举起了血腥的屠刀，接连杀害了高素、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孙无终等北府旧将。刘敬宣、高雅之和冀州刺史刘轨（刘袭的哥哥）起兵自保，被桓玄打败。三人北逃，投降了南燕的慕容德。

剩下的北府兵将领人人自危。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去找刘裕，询问：“我们怎么办？”刘裕相当镇定地回答：“你可随我回京口。桓玄如果能效忠朝廷，我们就服从他，听他指挥。如果桓玄有篡国谋权的举动，我们就对付他。现在正是桓玄树立威势、施展拳脚的时候，肯定

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果然，桓玄铲除了一批北府兵将领后，并没有对剩下的人斩尽杀绝，而是希望他们为己所用。他派堂兄桓修镇守丹徒，任命刘裕为中兵参军。其他北府将领依然在位。这说明桓玄想杀一派拉拢一派，收编利用北府兵。而刘裕在刘牢之之后，无形中成了北府将领的中坚力量。

元兴二年（403）二月，桓玄矫诏自任大将军。大将军之职，几乎是奸臣谋权篡位之前必经的一道官阶。桓玄篡位的意图已经很清楚了。同年九月，他又加授相国，封楚王，封地有十郡，并加九锡，准备篡位了。

篡位之前，桓玄环视天下，最不放心的还是北府兵的残余力量。于是，他派堂兄桓谦前去刺探刘裕对自己篡位称帝的态度。桓谦屏退众人，问刘裕：“楚王勋德隆重，四海归怀。朝廷各位公卿大臣都是希望皇帝禅位给楚王。不知道刘将军意下如何？”刘裕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楚王是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桓氏家族，世代都是朝廷的功臣支柱。晋室微弱已经很长时间了，早已失去民心。现在楚王是众望所归，乘运禅代，有何不可！”桓谦听完，大喜过望：“刘将军说可以，那就真的是可以了！”他马不停蹄地回到建康。桓玄得报，以为自己得到了刘裕为代表的北府旧将的支持，再没什么可忌惮的了。

元兴二年（403）十二月，又一幕“禅让”大剧上演。白痴的晋安帝司马德宗献出国玺，禅位于桓玄。桓玄经过一番辞谢表演后，粉墨登场称帝，国号楚。历史上将这个政权称为桓楚。

篡位后，桓玄贬司马德宗为平固王，迁居浚阳。

关于新朝的年号，桓玄一开始下诏，定年号为建始。右丞王悠之指出八王之乱时，篡位的赵王司马伦用过建始这个“伪号”。桓玄就改年号为永始，结果这个年号又曾经是王莽刚执政时西汉末年的年号，还是很吉利。桓玄用它的本意可能是希望自己的楚政权保持朝气，

永远欣欣向荣，事情的发展能如他所愿吗？

桓楚：注定短命的伪政权

—

桓楚政权的建立，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桓玄接手的是经过朝廷权臣、外藩强将和孙恩起义军轮番蹂躏过的乱局，百姓困苦，朝政混乱，事情千头万绪。可从反面来说，屡经动乱之后，人心思归一统，呼唤有人出来收拾乱局。这就为桓玄施展拳脚、建立功业提供了舆论基础。只要他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哪怕就是比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好那么一点点的政绩来，人心都会倾向他的。桓玄面临的问题，尽管棘手，却很容易出成绩。

桓玄入主中枢的初期，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晋书》也承认他“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起码建康附近得到了治理。

然而没过多久，桓玄就暴露出拙劣的品行来，让人大失所望。

不客气地讲，桓玄到现在为止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力突出，而是对手实在太无能，而他的家世基础又着实很强。至于桓玄本人，“本无资力，而好为大言”。做个指点江山的文人谈客绰绰有余，可要治国平天下，他就是个绣花枕头了。

桓玄即位后，没有全盘拨乱反正的计划，更不知道如何着手建设，做的都是些无关紧要或者沽名钓誉的事儿。比如，桓玄好施行小惠以笼络人心。他亲自审讯囚犯时，不管罪是轻是重，大多都给释放

了；对于拦御驾喊冤的人，也都给予救济，对罪犯和申冤者反映的问题则不闻不问。在政务处理方面，桓玄继承了先前烦琐苛刻的风格，又喜欢炫耀自己。有官员将诏书中“春搜”字误缮为“春蒐”，桓玄就把经办人员全都降级或免职，来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

桓玄在富贵乡里长大，喜欢奇珍异宝，珠玉不离手。他不仅追求享受，还百般搜求宝物。当了皇帝后，桓玄搜求宝物的能力大增。民间有的书法名画或佳园美宅，桓玄都要占为己有。百姓不给，桓玄就威逼强夺，与强盗无异。他还派遣官吏四处求宝，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给他输送宝物。很快，“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

巧取豪夺的目的是享受，但桓玄在享受过程中却暴露了惊人的无能和懦弱。他把搜集来的奇珍异宝和名贵书画都放入轻舸中。别人劝他没必要把宝贝都藏在小船里，桓玄说：“这些书画服玩应该时刻放在身边，万一遇到兵凶战危，损失了多可惜啊，所以我把它们事先放在船上，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方便运输。”堂堂九五之尊，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如何方便携带宝贝逃亡。大臣们不禁暗中发笑。桓玄又喜欢游玩打猎、兴筑宫殿，篡位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夜以继日。亲哥哥桓伟死了，下葬的当天，桓玄白天哭灵晚上继续游乐，身边的人都看不下去。

没过几个月，桓玄就因为“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导致朝野失望，人心思变。

既然朝野都对桓玄失去了信心，那么谁来推翻他呢？

最佳人选就是那些跨州连郡的世家大族们了。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安逸享受，世家大族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已经腐朽堕落，变得庸碌无能了。孙恩起义时，江南诸郡大饥。腐朽的世族子弟，很多穿着精美的丝绸，怀抱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迁徙他乡或者寻找草根充饥的本领都没有，根本不能指望

由他们来推翻桓楚政权。

能够与桓玄争夺天下的人选在民间、在军队里。

具体地说，没有被桓玄斩草除根的北府兵旧部对桓玄心怀怨恨，其中的中坚将领刘裕琢磨着如何推翻篡位的桓玄。

桓玄也一直提防着以刘裕为首的北府兵将领。桓楚建立后，他征召刘裕进京朝见。永始二年（404）二月，刘裕随同徐、兖二州刺史安成王桓修入朝。桓玄见过刘裕后，对司徒王谧说：“我昨天见到刘裕了。此人风骨不凡，是天下人杰啊。”于是桓玄每次游玩集会，都对刘裕优礼有加，厚加赠赐。桓玄的妻子刘氏善于识人。她提醒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怕是不甘于居他人之下的野心家，应该早些处置他。”桓玄不同意，说：“我正要平定中原，非刘裕不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等到关陇平定以后，再处置也不迟。”之后他对刘裕更加优待赏赐，希望刘裕能够为己所用。

刘裕是不会效忠已经失去人心的桓玄的。他自己也是个枭雄，很快寻找机会离开建康，返回江北。永始二年（404）二月二十七日，刘裕推说打猎，和何无忌纠合了一百多人的小分队。次日早晨，京口城门刚开，何无忌身穿传诏书的服装，诈称朝廷使者，当先进城，一百多人跟着一拥而入。守将桓修大概连真假还没有弄清楚，便被砍了脑袋。同日，京口对岸由桓弘驻防的广陵也发生了政变。刘毅、孟昶和刘裕的弟弟刘道规带几十名壮士冲入桓弘府中，将正在吃粥的桓弘杀死。考虑到兵力薄弱难以坚守广陵，刘毅随即率众渡江，与刘裕在京口会合，队伍壮大到大约一千七百人。

这支不起眼的小部队誓言推翻桓楚伪政权。当时刘毅、何无忌都是平民百姓，而刘裕顶着桓楚政权的建武将军、彭城内史的官职，因此刘毅、何无忌就推刘裕为盟主，号召天下反桓。

起义之初，事情繁杂。刘裕急需一位处理事务的主簿，协助自

己。刘毅就推荐了刘穆之，说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刘穆之是莒县（今属山东）人，出身平民，博览群书，精明能干，做过地方小官，当时正闲居京口。刘裕听说过刘穆之的文才，立刻派人去请。巧了，刘穆之听到城中军队喧闹，出来打探，遇到来请他的使者，就跟着去见刘裕。两人一见，惊喜地发现志同道合，顿生相见恨晚之感。刘穆之欣然同意担任刘裕的主簿，担负起刘裕谋主兼秘书长的角色，一上任就将起义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刘裕十分满意。从此，刘裕和刘穆之开始了“刘备和诸葛亮”般的亲密合作。

二

刘裕整顿完毕后，主动进攻建康。桓玄仓促部署应对。他主要有两个对策：第一是赦免扬、豫、徐、兖、青、冀六州的百姓，收揽人心；第二是任命桓谦为征讨都督，派皇甫之、皇甫敷两人分别率军北上迎战刘裕。

三月，刘裕和皇甫之在江乘（今江苏南京一带）遭遇。皇甫之是桓玄的骁将，带领的部队也是身经百战的精兵。这一场仗打得异常惨烈。刘裕手执长刀，大呼着冲入敌阵。在他的带领下，起义军奋勇前进，阵斩了皇甫之。刘裕进军到罗落桥的时候，皇甫敷率另一支数千人的部队恭候迎战。刘裕和一同起兵的檀凭之分别率领一支部队，冲向敌阵。檀凭之血战阵亡，其众退散。刘裕率军拼死奋击，越战越勇，最后攻破皇甫敷的部队，将皇甫敷斩首。

起兵之初，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共建大谋。有相面高手说，刘裕等人日后会大福大贵，只有檀凭之没有富贵相。刘裕对何无忌等人说：“我等同舟共济，日后命运不会有偏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檀凭之之也不会例外。”因此大家都不相信那个相面术士的话。如今檀凭之战死，刘裕在悲痛之余，开始相信术士的预言，对讨伐桓玄充满了信心。

皇甫之、皇甫敷接连被杀，桓玄大惊，召集大臣讨论。一上来桓玄就问：“朕会失败吗？”曹靖之回答：“如今神怒人怨，臣恐怕前途不

妙。”桓玄说：“百姓或许怨恨我，神灵为什么也发怒呢？”曹靖之回答：“您把晋朝宗庙移到江滨，让它漂泊失所。大楚的祭奠，只祭奠了先皇（指桓温），连祖父（指桓彝）都没有祭奠，上天当然要发怒了。”桓玄追问：“那你之前怎么不劝谏我？”曹靖之回答：“您身边的人都奉承您为千古圣君，粉饰现在是尧舜之世，我哪敢多言！”桓玄后悔莫及，又恨又怕。

后悔归后悔，桓玄还得硬着头皮迎战刘裕。他一面找术士诅咒刘裕，一面收拢两万军队，派遣桓谦、何澹之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准备战斗。刘裕推进到覆舟山东，让将士们饱餐一顿后，抛弃余粮，以破釜沉舟之势对桓军发动攻势。他选派年老羸弱的人在蒋山上分张旗帜，然后指挥部队分道进攻。桓军的侦察兵看到后，以为刘裕军队人数众多（其实才几千人马），回去报告桓玄：“裕军四塞，不知多少。”桓玄更担心了，加派庾颐之带领建康城内的精兵增援前线。

决战正式开始，刘裕、刘毅等将领身先士卒，直前冲击。将士人人死战，喊声惊天动地。刘裕见东北风急，就沿途放火焚烧，烟尘涨天。建康城内都能听到城外鏖战的声音，看到漫天的烟尘。桓军士气低落，结果桓谦等诸军被击溃，纷纷后逃。城内，桓玄集合亲信数千人，扬言要出城与刘裕决一死战，暗地里带着儿子桓升、侄子桓浚等出建康西掖门，到达石头城，坐上事先准备好的小船，向长江上游逃去。

建康落入刘裕手中，周边郡县也纷纷反正。起兵不满一个月，刘裕就成了胜利者。可是更大的麻烦随即而来：推翻了桓玄以后，政权怎么办？建康不能一日无主，起义军和反正的地区不能群龙无主。刘裕的选择很少。他可以自己称王称帝，可是他是以讨伐桓玄篡位起兵的，如今自行登台掌权，和桓玄有何区别？又如何安抚天下？况且，和刘裕合作起兵的刘毅、何无忌等人也不会支持他称帝。所以刘裕还是需要把东晋朝廷的牌子给抬出来，在东晋的旗帜下发号施令。问题在于晋安帝司马德宗已被桓玄软禁在浔阳了，尚在桓玄控制的范围之内。怎么办？刘裕决定找一个皇室成员出来，暂代朝政。

桓玄篡位后，司马皇室的子弟都被桓玄贬居外地了。原来的武陵王司马遵被贬为彭泽侯，被勒令到彭泽（今江西九江彭泽）居住。巧的是，司马遵出发时船坏了，他就在建康停留了下来。司马遵人既在建康，思想又极端反桓。右将军桓伊曾去拜访他，司马遵说：“我家的门不为桓氏开！”左右劝他说：“桓伊虽然姓桓，但和桓温是疏宗，您和他相见无妨。”司马遵说：“我听到别人姓木字边，就想杀了他，更何况他姓桓了！”这样的人，桓玄篡位后没有除掉，是一大疏忽。如今，司马遵成了刘裕搬出来号召天下的理想人选。于是，刘裕等人推举司马遵为大将军，搬入皇宫居住，代行大权。刘裕等人通过司马遵迁转百官，将他所下的命令称制书。司马遵大赦天下，但是和桓玄同族的子弟不在赦免行列。

三

前线的战争还在继续，桓军屡次战败，桓玄不得不退出建康，到浔阳挟持了晋安帝司马德宗，继续向西逃回江陵。对于自己的惨败，桓玄心里接受不了，常常整天不吃不喝的——当然了，撤退途中供给不好，左右送给桓玄吃的都是粗饭，他也咽不下去。桓玄担心兵败如山倒，决心继续以大楚皇帝自居，要和刘裕争夺天下。

西撤后，桓玄唯恐政令不通、法令不肃，于是施行严刑峻法来整肃内部，部众反而愈加离心。逃亡途中，桓玄开始编辑记载帝王日常言行的起居注，说到被刘裕打败的内容，他自称经略指授算无遗策。既然桓玄神机妙算了，为什么还失败了呢？桓玄就痛骂诸将不听指挥，以致失败，认为建康失守非战之罪，而是下面的人执行不力。

四月，司马遵在建康就任大将军，发兵讨伐桓玄。桓玄也在荆州重整部队，以投降的前秦太子苻宏为前锋，东下与刘毅率领的晋军决战。桓玄的军队始终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刘毅的部队只有几千人。桓玄发扬畏战的一贯传统，在御船旁边系着一条小船，装着宝物和给养，一看情况不妙随时准备开溜。下面的将士看到皇帝都是这样的心理，哪里还有斗志。加上刘毅又成功乘风纵火，一场火攻将桓玄的荆

州兵杀得大败。桓玄不但不思收拢败兵再战，反而烧掉辎重，连夜逃回江陵。

部将冯该劝桓玄在江陵准备最后的决战。桓玄完全没有勇气，计划逃亡汉中投靠梁州刺史桓希。他不顾个别忠心将士的劝阻，连晋安帝也不要了，要率部弃城北逃。江陵城中顿时大乱，指挥混乱，政令不通。桓玄带少数几个人乘马出城，出城门的时候遇刺。刺客没有刺中桓玄，却导致桓玄的手下相互猜疑，起了内讧。最后，桓玄狼狈地和几个亲人逃到船上，逆江泛舟而去。

桓玄跑后，部分忠于晋室的官员将晋安帝司马德宗迎入南郡府舍，等候晋军的到来。

之前，东晋益州刺史毛璩的弟弟毛璠死了，他派其孙毛佑之、参军费悦带着两百人出三峡送葬回江陵。毛璩的侄子毛子修是桓玄的屯骑校尉，有心杀桓玄，就劝诱桓玄入蜀。桓玄同意了，在枚回洲遇到了毛佑之和费悦一帮人。毛佑之等人里应外合，对桓玄发动突袭。一时间箭如雨下，桓玄平时宠幸的近臣丁仙期、万盖等人用身体护着桓玄，各中数十箭而死。桓玄也中箭了，儿子桓升在旁帮他拔出箭来。益州督护冯迁抽刀，跳上桓玄的大船。桓玄一边拔下头上的玉饰递给冯迁，一边喝问：“你何人？敢杀天子！”冯迁说：“我是在杀天子之叛贼而已！”手起刀落，杀死了桓玄，时年三十六岁。桓玄的儿子桓升被抓，他向乱军大喊“我是豫章王”，可他的豫章王是桓楚政权封的，保护不了他。桓升和父亲一同丧命。桓玄的脑袋被送到建康，悬挂在大街上示众。围观百姓莫不叫好，可见桓玄多么不得人心，桓玄政权的速亡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桓玄之乱并没有彻底结束。桓家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桓玄死后，被其侄桓振谥为武悼皇帝。桓振、桓谦、苻宏等人在荆州一带顽抗。桓振还一度重新攻陷江陵，再次俘虏晋安帝。东晋花了几年时间终于诛杀桓振等人，讨平叛军。直到406年晋安帝才回归建

康，司马遵奉还政权，改拜太保。桓氏子孙部分投降后秦，部分逃入苗中成为南蛮，在东晋绝迹。

刘裕：穷人当兵有前途

—

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着重了解一下刘裕的成长和发迹经历。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绥里（今江苏徐州）人，曾祖刘混随晋室南迁，后来迁居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家是极其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

但是《宋书》为刘裕列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家族世系：

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琊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为皇考。

说刘裕是西汉刘邦的弟弟楚王的后裔。在他的祖先中，封侯拜将是很常见的事情。《宋书》列出的这一串家族世系基本上是瞎说。它只能证明南朝宋时期的皇室是多么在意自己的家庭血缘，因此不遗余力地往自己脸上贴金。

退一步说，即使世系存在，也只能说明刘裕虽然是西汉楚元王刘

交的后裔，但刘家早已经败落了。根据《宋书》的记载，到刘裕的父亲刘翘的时候，刘家已经家道衰落。刘翘的一生，仅做过郡功曹，一个郡守属吏。但就连这个职位也极可能是虚构的。因为郡功曹也算是地方上的士绅大官了，家里多少也有些家底。但是从刘裕日后赤贫的生活来说，他的父亲刘翘怎么可能不给儿子留下家产，怎么就眼看着儿子缺衣少食呢？因此，刘翘本人极可能只是官府的一名底层衙役，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底层农民。

根据《宋书·武帝本纪》推断，刘裕生于兴宁元年三月壬寅夜，即363年4月16日。出生时，母亲在生产中死了，父亲刘翘因为家境实在贫寒，难以养活儿子，就想将刘裕抛弃。就在刘裕即将成为弃婴的时候，与刘裕同郡的同族刘怀敬的母亲听说了这事，忙赶过来阻止了刘翘，并承诺自己会抚养这个可怜的婴儿。当时这位可敬的母亲自己的儿子刘怀敬尚未满月，就毅然断了刘怀敬的奶水去哺乳并非亲生的刘裕。刘裕对刘怀敬一家终生感激，在成为皇帝后，封并无亲属关系的刘怀敬的儿子为王。

关于刘裕的乳名寄奴，这里还有一个传说。中药中也有一味中草药叫刘寄奴，这个名字是因刘裕而起的。刘裕年少的时候，一天傍晚外出打猎，用箭射中一条大蟒蛇，但那条蛇一闪就不见了。刘裕觉得很奇怪，就想去寻找那条受伤的蛇，无奈天色已晚，只好作罢。第二天，他又来到原处寻找，当搜索到一条小河边时，听到密林深处有杵臼声。刘裕顺着声音寻去，只见两个小童在捣药。两人边捣药边说话。

其中一个说：“我们大王伤势不轻，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射伤我们大王！”

另一个说：“是昨天被刘寄奴射伤的。”

“大王有那么大的本领，为什么不杀了刘寄奴报仇呢？”

“不能杀，刘寄奴将来是要做皇帝的。这是大王说的。”

刘裕听得好奇，就大吼一声，跳将出来。两个小童吓得急忙逃窜，没了踪影。刘裕见两人留下药臼和草药，就试着用这种草药疗外伤，竟然有特效。后来刘裕驰骋疆场也都带着这种草药。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他用那种草药治愈了多少受伤的将士都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这种草药的名字。因为这药是刘裕最先发现的，就以刘裕的乳名寄奴来命名。

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刘裕喜欢钻研医药却是真的。他曾广泛收集民间方药，编辑了《杂戎狄方》一卷，可惜现已散佚。

当然了，刘裕小时候肯定不知道自己当皇帝，也没有人认为这个贫苦人家的小孩能当皇帝。在人生的早期，人们通常都是以家境来判断一个人的前途的，而刘裕就属于那种因为贫穷而不被人看好的孩子。刘裕在贫困的环境中逐渐长大，“雄杰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风骨奇伟，不事廉隅小节”，前半句话是史书中惯用的修饰溢美之词，只能说明刘裕长得比较高大而已，后半句话才是重点。刘裕在老家不从事生产，不像出身相同的普通百姓家子弟一样做点儿“正事”。他认识了几个字，但进不了官府，为了糊口，只好零星地从事被士人和官府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做些编席卖鞋之类的小买卖。由于家境贫寒又毫无背景，刘裕经常受人欺负。

刘裕还有一个一般人家难以接受的坏毛病：喜欢赌博。他的运气很不好，经常输得除了随身衣物就一无所有了。最后，刘裕因为赌博，欠了有钱有势的刁逵三万钱。刘裕自然还不起赌债，结果就被刁逵找人抓了过去，缚在马桩上，受尽了侮辱。当时的大世族王谧到刁逵家中拜访，偶然见到刘裕，觉得这个年轻人日后会表现不俗，就替刘裕还了债。刁逵得了钱，又看在王谧的面子上，这才放了刘裕。王谧对刘裕说：“卿当为一代英雄。”王谧不看重身份和地位，主动与刘

裕交往，让刘裕感动不已。

总之，年少时期的刘裕是一个出身不好、行为有所不端、名声也不佳的孩子。

二

刘裕觉得再这样瞎混下去，一生就毁了，于是决定去做穷人还能做的一件事情：当兵。

东晋之前实行的是世兵制：一些家族世代当兵，垄断当兵的资格，其他平民没有资格当兵。这些世家子弟的素质越来越低，当兵只是吃军饷而已，国家的军事力量逐渐下降。最后连首都建康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叛乱者动辄兵临都城，威胁朝廷。

在这种背景下，谢玄在江北招募贫苦流民入伍，建立了北府兵。广陵、京口及其附近的贫苦百姓和从北方南下的流民构成了北府兵的主力。这支新军的战斗力非常强大，逐渐成为稳定东晋政局的主力。淝水之战的惊人胜利就是北府兵取得的。北府兵逐渐不受世族子弟控制，从上到下都由非世族出身的普通人掌握，成为完全的庶族军队。刘裕入伍之后，稳步得到提升，最初担任将领孙无终的司马，后来转入刘牢之手下做军事参谋。

刘裕真正崭露头角是在镇压孙恩起义的战争中。此后，刘裕长期在外对起义军作战，每次领兵都只有几千人，却屡建奇功。他在北府兵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为朝廷所倚重。天下太平之时，治政功绩是一个人最大的政治资本；但到了乱世，军事实力是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职业军人出身的刘裕就有幸生活这样的乱世中，他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以至于桓玄在篡位之前都不得不征询刘裕的意见。男

怕入错行，看来刘裕是入对了行。

自立为帝后，桓玄征召刘裕来京，做深入的试探。新王朝对刘裕分外优待，礼遇有加。桓玄以为优待刘裕就可以，可是他大错特错了。常年的军事和政治争斗，开阔了刘裕的眼界，锻炼了他的政治智慧，让刘裕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武夫。刘裕虚情假意地支持桓玄称帝，内心早就图谋推翻他。但是考虑到自己根基尚浅，实力不够，同时也想让桓玄逆天之意称帝，自去根基，再图谋推翻他，所以才韬光养晦，蒙蔽桓玄。

当时多数世家大族都是反对桓玄代晋自立的，但是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早已失去了实际权力和纵横天下的志向。相反，刘裕却将反对桓玄的计划付诸实施，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实力。刘裕不仅身经百战，政治和军事经验丰富，还继刘牢之之后成了北府兵事实上的领袖。反桓的力量逐渐汇聚到刘裕身边。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不以出身为标准，而以能力为考量的政治时代的到来。

以刘裕为盟主的反桓同盟建立后，刘裕发起了攻打桓玄的战斗。刘裕总是身先士卒，将士们无不死战，连续打了几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后，刘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打败桓玄后，朝野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的功绩。朝廷封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徐青二州刺史。刘裕就此成为南方声望最高、实力最强的人物。他名声在外，就连北方的姚兴也颇为忌惮。刘裕上台后，向姚兴讨要后秦趁东晋大乱攻略的河南地区。姚兴竟然同意了，将部分之前侵占的东晋土地归还了刘裕。

继桓玄之后，刘裕成了建康的主人，却没有留在建康专断朝政，而是接任徐青二州刺史，主动出镇外地。他推司马遵出来维持局面。当时，反正的桓楚司徒王谧（之前救过刘裕）与众人商议，准备推举刘裕统辖扬州。长期以来，东晋朝廷只能直接管辖扬州一地，要把持朝政必须兼任扬州刺史。刘裕坚决辞谢，把扬州刺史让给了王谧。

刘裕这么做可能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他根基不足，尤其是他出身贫寒，可能适应不了建康的政坛深水，想先常驻丹徒，以便继续积累政治威望；其次是刘裕起家于江北，政治基础在今天的江苏南部一带，因此他选择丹徒作为根据地；最后，刘裕将盟友刘毅、孟昶等留在建康作为内应，可以遥控朝政。

义熙三年（407）十二月王谧去世，不利于刘裕的情况出现了。原来的盟友刘毅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之前刘毅和刘裕共同行动，同甘共苦，地位和权力都在刘裕之后。如今富贵了，刘毅开始不满于之前的权力关系，想和刘裕争夺实权了。他聚集一帮人，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或者退一步让刘裕兼任扬州刺史，但不让刘裕入建康，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这是典型的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商议后，刘毅等人毕竟心虚，不敢突然袭击式地发布任命，而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的意见。

皮沈到了丹徒，先去见了与自己有交情的刘穆之，向刘穆之透露了自己的来意。刘穆之自然知道让刘裕长驻丹徒的坏处，那就是对首都这个政治中心的疏远。他暗自庆幸皮沈先来寻找自己通报情况。表面上他不动声色，假装起身上厕所，却迅速写了张条子派人送交刘裕。纸条中写道：“皮沈所言，切不可应允。”皮沈告别刘穆之后，就去见刘裕。刘裕听完皮沈的陈述后，没有表达意见，只是吩咐下人好好安顿朝堂使节。之后，他迅速将刘穆之招来商议。

刘穆之向刘裕介绍了情况后说：“晋朝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已经很久了，天命已经转移。将军您兴复皇家，功高德勋，民望所归。之前您谦让官职，出守外地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您的威望更高，政治资源更丰富了，如果再一味谦让，难道就甘心于永远做一个老守疆土的地方将领吗？

“刘毅、孟昶等人都是与您一起从布衣开始起家的。当年大家倡

导大义，争取富贵。因为举事有先有后，官职有高有低，所以推举您做盟主。力量的差别是暂时的，政治上的服从也是会有变化的，但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服从您。现在您长期领兵在外，他们在朝内占据高位，大家的力量相当，地位也差不多，已经到相互吞并和排挤的时候了。

“在政治斗争中，扬州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平定桓玄之乱后，您没有兼任扬州刺史的职位，而是交给了王谧，那不过是实力不济时的权宜之计。现在您决不可以再拱手让出扬州了。如果对手同时占领扬州和朝堂，我们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形势一旦不利，如果再想逆转回来，就困难了。如果我们落到那样的境地，不仅将优势拱手相送，而且前途难测。

“现在既然朝廷征询您的意见，您就应该明确表示反对这两个方案。因为将军您不能公开地向朝廷要求担任扬州刺史的职位，所以您只能这么说：‘扬州是国家根本所在，地位重要。挑选扬州刺史事关重大，我不能在外地空发议论，要详细了解情况。我计划近日前往京城，与各位一起交换意见。’等您到了都城，京里的一帮人就不敢越过您随便安排扬州刺史的人选了。”

刘裕听从刘穆之的建议，没有理会皮沈，而是直接前往建康。刘毅等人偷袭不成，反而引虎入家门。结果真的如刘穆之所分析的那样，朝廷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仍兼任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至此，刘裕算是名副其实的权臣了。

从412年开始，刘裕掌握东晋朝廷大权，整顿朝政，确实有了一番作为。东晋朝廷已经糜烂很久了，经过司马道子父子的蹂躏，情况更加糟糕。桓玄虽然打算进行整顿，却也毫无成果。刘裕在刘穆之的协助下，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朝政清理和政策矫正。像作战时一样，刘裕以身作则，树立勤政榜样，同时以威行严法管束朝臣，使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谨慎地奉行职守。刘裕入朝不到一个月，建康的官风民俗就大为改观。

同时，刘裕开始暴露出不臣之心，表现在他经常矫晋安帝的诏书给州县长官下命令上，也表现在他开始严厉镇压异己力量上。尚书左仆射王愉的儿子王绥，因为出生于江左冠族、世代公卿的王家，再加上自己很小就获得了名望，对刘裕很不服气，讥笑他地位卑贱。刘裕毫不犹豫地将他杀死。当时东晋世家大族的势力经过之前的动乱大为削弱，加上世族子弟自身不学无术，沉溺于享受之中，在刘裕的进攻面前，完全败下阵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刘裕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形象来。因为出身的缘故，刘裕识不了几个字，也没读过几本书，是个半文盲。后来因为行政的关系，他逐渐认识了一些字，可以读懂文告，也能亲自写些简短的命令和文告了。在东晋官场上，文学谈吐和书法水平是官员相互交往、评价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一些世家大族，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缺乏系统文学教育的寒族子弟。即使刘裕贵为朝廷主政大臣，也难免有一些世家大族在背后讥笑他的书法和谈吐。

刘穆之提醒刘裕要注意自己的言谈和书法，这不仅事关刘裕个人的尊严，也直接关系到政治斗争的前途。刘裕这时已经对刘穆之推心置腹，几乎是言听计从。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尽力淡化自己的军人色彩。但自己的那一手烂字却怎么都提高不了，加上生性不喜读书习字，让刘裕苦恼不已。

刘穆之出主意说：“写字虽然是小事，但对于有志天下的人来

说，不能不多加留意。将军您可以坚持一直写大字，一个字写成一尺大也无妨。大字能够掩藏拙处，而且有气势。”刘裕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之后刘裕的文告字写得硕大无比，一张纸只有六七个字，贴得满墙都是。远远看来，他的文告显得气势非凡，和身份很是相配。

说到刘裕执政，不得不说刘穆之的成功辅佐。刘穆之对内是刘裕的行政管家，对外是刘裕在朝廷的主要助手，他不仅给刘裕做政策咨询，还亲自处理朝政和军事。他非常有能力，处理问题快如流水，文件和事情在他的手里从来没有堆积迟滞的。刘裕成名后，各色人物从四面八方涌来，朝野内外事务千头万绪，一时间让刘裕难以适应。而刘穆之从容不迫地将千头万绪的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

通常的情况是，刘穆之眼睛看着文件资料，手里起草批阅意见，耳朵听着情况汇报，嘴里当场答复下属的询问，应对自如，没有出错。刘穆之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掌握消息比较全面，闾里言谗、途陌细事，不论大小，他都知道一些。他把这些信息一一告诉刘裕，刘裕就能明白民间的实情。刘裕常常将民间消息挂在嘴边，以表示自己关爱百姓。

刘穆之出身寒门，没有家庭基础可以依傍。得志之前，一度窘迫到在岳父家里混饭吃，受人奚落。随着地位的提高，刘穆之沾染了一个毛病，就是讲究吃喝的排场。他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桌上必须有足够十个人吃的饭食，而且从来不单独进餐，不是招待宾客，就是需要歌舞助兴。这可能是刘穆之发达后对早年窘迫的一种心理弥补。对于自己的毛病，刘穆之向刘裕坦白说：“我出身贫穷微贱的家庭，之前维持生计都很艰难。现在位居高位，我虽然心中想着要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还是过于丰厚了些。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对不起您的了。”

从京口讨伐桓玄开始出任刘裕的主簿，到义熙十二年（416）年底去世，刘穆之与刘裕合作了十三年时间。这十三年对他二人来说，

也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最辉煌的时期。刘穆之凭借聪明勤勉，支持刘裕南征北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刘裕则奠定了日后新王朝的基业。刘穆之死后，刘裕再也没有取得先前那样的辉煌战绩。刘裕评价刘穆之“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刘宋王朝建立后，刘穆之被追封为南康郡公，谥文宣公。

一百年后再见两京

—

刘裕的权力是建立在北府兵的支持上的，是依靠讨伐桓玄积累起来的。在起兵过程中，北府兵的刘毅、何无忌之推举刘裕为主，他们二人也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军队。尤其是刘毅，长期处于北府兵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官爵仅次于刘裕，具有取代刘裕的能力。而他也对屈居第二的现实不满足，加上文雅有学问，得到世家大族们的支持，内心深处想和刘裕一决雌雄。桓楚政权覆灭后，刘毅与刘裕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

一开始是刘毅推荐大世族谢混担任扬州刺史，目的在于把刘裕挤出朝廷，做个“守藩之将”。刘穆之洞穿了刘毅等人的心思，叫刘裕抓住扬州刺史不放。刘裕把扬州刺史这一职位抓到手之后，又常驻首都建康，让刘毅等人措手不及。接着，刘毅挑拨离间刘裕和刘穆之的关系，经常对刘裕说刘穆之持权太重。不想，刘毅越挑拨，刘裕越加信任刘穆之。

刘裕在刘穆之的辅佐下，发动了讨伐南燕的战争，并节节胜利，不想广州的卢循乘虚北上进攻建康。时任江州刺史的何无忌之领兵迎战阵亡，震惊朝野。刘毅时任豫州刺史，镇守姑孰，手上有兵有船，一心想镇压卢循的起义军来建立大功，以期盖过刘裕，于是整军迎战。

刘裕从前线匆匆赶回建康，考虑到北伐军队刚刚南归，将士疲劳，又多伤病，船只也需修理，于是竭力主张慎重行事。他先写信劝

阻刘毅，又派刘毅的堂弟刘藩前去劝他暂缓出兵，要求大家一同行动。刘毅见刘裕一再阻止自己出战，以为刘裕是想阻止他立大功，斗志反而更强。他对刘藩说：“以往我不过是把功劳让给了刘裕，你们就认为我真的不如他。今天，我要让天下看看我的本事！”最终，刘毅率领精兵两万与卢循交战，在桑落洲一战大败，损失了堆积如山的辎重，所部兵马所剩无几。他本人也历尽艰辛，逃回建康。

卢循起义被平定后，刘毅担任了江州都督，不久接替病重的刘道规担任荆州刺史。刘毅就此掌握了极其重要的荆州地区，在荆州网罗党羽，壮大力量。反对刘裕的力量聚集在刘毅身边，他依然是可以与刘裕一决雌雄的实权人物。

刘毅身体不好，没多久就病重了。在党羽的撺掇下，刘毅向朝廷请求由其堂弟刘藩继任荆州刺史。之前，东晋朝廷对荆州的实权人物都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不会驳回继任的请求。这一回，主政的刘裕也答应了。因为刘藩正担任兖州刺史，去荆州上任需要经过建康。刘裕就以司马德宗的名义征召刘藩入京。

刘藩到了建康后，刘裕马上宣称发现了以刘毅、刘藩和尚书仆射谢混为首的“反叛集团”图谋不轨。他以朝廷的名义赐死刘藩和谢混，并出兵讨伐刘毅。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建康封锁消息，不让刘毅知道刘藩和谢混的死讯，逆江而上的讨伐军也伪装成刘藩的部队，宣称是新的荆州刺史赴任。讨伐军一路走到江陵附近，荆州都没有防范。讨伐军趁机对江陵发动突袭，刘毅兵败，自缢而死。刘裕总算除掉了最危险的内部敌人。

刘裕讨伐刘毅时，诸葛长民驻守建康。诸葛长民是反桓起义时的重要人物，也是刘毅、何无忌等人之后硕果仅存的北府兵重要人物。听到刘毅的死讯后，诸葛长民很害怕，说：“昔年醢（hǎi）彭越，今年杀韩信。祸其至矣！”其弟辅国将军诸葛黎民就劝他造反。诸葛长民犹豫不决，暗中写信给冀州刺史刘敬宣，要和他一起造反。

刘敬宣是北府兵元老刘牢之的儿子，父亲被桓玄逼死后，他逃到了南燕。在南燕，刘敬宣和高雅之等人阴谋发动政变，想推翻鲜卑人的统治，失败后逃归东晋，被刘裕收留。刘敬宣不但拒绝了和诸葛长民一起造反的提议，还向刘裕告了密。刘裕赶紧命讨伐荆州的军队返回建康。

413年，刘裕回到建康，找来诸葛长民，大摆宴席，和诸葛长民笑谈如常。两人开怀痛饮，诸葛长民渐渐失去了警惕，喝得酩酊大醉时，被刘裕事先埋伏的武士从背后用绳子勒死。在对付政敌时，刘裕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酷。诸葛长民被勒死的时候，刘裕端坐原处饮酒如常。诸葛长民死后，刘裕又派人诛杀诸葛家族。诸葛黎民一贯骁勇，面对围兵格斗至死。至此，昔日的盟友和潜在的政敌都被消灭了，刘裕成了唯一的强权人物。

桓玄篡位之时，益州刺史毛璩（qú）出兵讨伐桓玄。不想四川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去打仗，推举四川人谯（qiáo）纵为首领，杀死毛璩割据。谯纵建立了继成汉之后的第二个四川割据政权。谯纵一边向北方的后秦称臣，被后秦封为蜀王，一边频繁入侵东晋的荆州地区。荆州首府江陵常常处于谯纵政权和后秦的两面夹击之中。卢循起义军进攻建康，荆州方面没有一兵一卒增援，就是因为被谯纵牵制住了。荆州一度在建康隔绝音信，情况危急，全靠刺史刘道规安抚部众，荆州才没有落入谯纵政权的手中。刘裕消灭刘毅的同年（412），就开始对四川用兵。他选择资历浅但能力强的朱龄石做元帅，任益州刺史，领兵攻蜀。谯纵本就是趁东晋内乱（先是桓玄，后是卢循）侥幸立国的，势力薄弱，在晋军攻击下节节败退。413年七月，谯纵自缢而亡，四川重新进入东晋版图。刘裕又立下一件大功。

消灭桓玄后，刘裕最大的功绩还有北伐。他陆续消灭了南燕和后秦两大胡族政权，取得了“光复两京”的辉煌胜利。

北伐始终是东晋政治的重要内容，棘手而炫目。一般人将北伐视为树威揽权的手段——事实上也是如此。保守的朝廷不希望大臣动议北伐，只有不安分的权臣才有实力真正将北伐付诸实施。刘裕权势日渐巩固，为了更上一层楼，北伐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义熙五年（409），南燕的慕容超成了刘裕北伐的第一个目标。

南燕是后燕分裂后的偏安政权，力量薄弱。末代君主慕容超又轻浮好动，嫌太乐伎人数太少，在当年二月发兵攻击东晋淮北的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掳去大量人口。慕容超从中挑选了男女两千五百人给太乐训教，以供自己享乐，却不想引来了亡国之祸。

刘裕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伐燕。朝野又是一片反对声。反对归反对，实际上没有人能阻止刘裕。四月，刘裕就率领北府兵浩浩荡荡地从水路北上了，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后改走陆路。和桓温等人北伐纯粹为了立威不同，刘裕还有扩大疆域的目的，所以他北上途中遇到险要之处都筑城留兵防守，目的就是要长久守住这些地区。

南燕主要的盘踞地区是现在的山东。北伐军进入山东后，刘裕必须经过地形险峻的大岨（xiàn）山。大岨山两旁是高山峭壁，中间有一条小道通过，万一燕军在山上埋伏怎么办？刘裕坚持全军快速从山下过山，胸有成竹地认为：“慕容超心贪，既想掳获，又爱惜禾苗，以为我军孤军深入，不能持久，绝不会守险，也不会清野。我敢为诸君担保，不会有什么危险。”话虽这么说，但刘裕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北伐军的将士们心惊胆战地通过大岨山的窄道，直到全军安然走过了大岨山，不见燕兵，才开始欢呼雀跃。刘裕举手指天，也非常高兴。

大岨山是南燕可以依赖的最重要的天险，慕容超并不加利用。他

天真地以为东晋军队深入北伐，无非是刘裕为了立功，不能持久，所以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坐等刘裕上门。沿途既没有派军扼守险要，也没有抢割粮食、坚壁清野。刘裕率领北伐军越过大岷山后，人人抱定死战之心，又利用沿途南燕的粮草解决军需问题，进展神速。

慕容超见大岷山没有阻挡刘裕大军的步伐，就寄希望于鲜卑骑兵的武力优势，企图用骑兵扫荡晋军的步兵。六月，南北两军在山东临朐大战。刘裕扬长避短，用四千辆车子围住步兵，分左右两翼徐徐推进。南燕骑兵被车辆阻碍，横冲直撞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两军正僵持着，参军胡藩向刘裕献计：趁燕军悉数出战迎战，晋军可以乘机袭取防守空虚的临朐。刘裕采纳了建议，命胡藩带一支奇兵绕过燕军，轻松攻取临朐。燕军主力闻讯大乱，为刘裕打败。慕容超仓皇逃回首都广固城固守。随后，刘裕将广固团团围住，并不攻城，先着手安抚人民，就地筹集军需。

广固城被围两个月，已成困守态势。慕容超派尚书郎张纲到长安向后秦的姚兴求救。姚兴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南燕灭亡了，后秦就要承受所有东晋的军队压力。可要出兵救燕，姚兴有心无力。不救不行，救又不能，姚兴耍了个花招，派使者到刘裕军中恫吓：“大秦已经派十万雄兵进驻洛阳，请晋军南撤。若晋军不撤，大秦将长驱东进，联燕灭晋。”刘裕看穿了姚兴的把戏，断然回答：“我本想在灭燕之后休兵三年，然后进取关中灭秦。如今姚兴自己送上门来，再好不过。你回去让他快点过来吧！”后秦使者吓得赶紧溜走了。

刘穆之听说后秦使者到了，赶紧过来，慢了一步，后秦使者跑了。刘裕把对话告诉了他，刘穆之不满道：“此事重大，应该慎重考虑，怎么能如此答复？只能激怒后秦，广固没有攻克，羌族骑兵已到，如何对付？”刘裕笑道：“兵贵神速。姚兴如果真想救援慕容超，就不会事先派遣使者通知。我看他是无力出兵，恐吓而已！”事实证明，在东晋和南燕交战期间，后秦一直按兵不动。

南燕派往后秦的使者张纲回来时被晋军抓住。刘裕让张纲站在楼车（一种攻城器械）上面，向广固城喊话：“刘勃勃大破秦军，后秦无兵相救！”南燕军民没有了外援，斗志更加低落了。义熙六年（410）正月，被围超过半年的广固城大门洞开，部分丧失信心的官员开城迎接晋军入城。慕容超突围时被擒，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灭亡，这是被东晋灭亡的第一个北方王朝。

南燕灭亡后，西边的后秦成了刘裕的下一个目标。他并没有像恐吓后秦使者那样立刻率领得胜之师进攻后秦，而是在等待机会。后秦疆域虽广，但内部始终有匈奴刘勃勃建立的夏政权的侵蚀，有生力量正在被不断削弱。义熙十二年（416）二月，后秦君主姚兴去世，即位的姚泓软弱无力，国内其他民族频繁暴动。刘裕等待的时机来了，他留刘穆之在建康，总摄朝野政事，自己第二次亲率北府兵北伐，志在灭秦。

三

灭秦之战进展得很顺利。后秦在河南地区的抵抗很微弱，当年十月，晋军前锋进逼洛阳，守将姚洸投降。洛阳是东汉、曹魏和西晋的旧都，它的光复，政治意义重大。在危急时刻，后秦内部不仅没有做到同仇敌忾，反而加速上演同室操戈的悲剧。先是姚泓的弟弟、太原公姚懿在蒲坂（今山西永济）造反，要抢夺帝位，接着是宗室、齐公姚恢在岭北起兵，率安定（今甘肃泾川）镇户三万八千人进攻长安，也要抢夺帝位。这两人的造反都没有成功，却导致后秦内忧外患更加严重，不能集中全力对抗刘裕，形势越来越不妙。

第二年（417）正月，刘裕率水军从彭城（今江苏徐州）出发，王镇恶、檀道济等率别部进逼潼关。东晋对后秦开始了总攻。潼关是关

中的门户，后秦守军死守关隘，阻挡了晋军的前进。刘裕闻讯，督率水军加速逆黄河西进，增援王镇恶等人。一旦晋军云集，后秦的处境更加不妙。

姚泓想到了向黄河北岸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求援。北魏灭亡后燕，截断慕容鲜卑为南北两段后，占有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能力也可能援助后秦。如果北魏能出兵截击逆黄河而上的刘裕水军，后秦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北魏是否出兵，成了决定晋秦之战结果的关键因素。

姚泓派使者以唇亡齿寒的理由求救于北魏，要求北魏出兵；刘裕也派使者向北魏“假道”，要求北魏中立。北魏内部意见分歧，一派主张截击刘裕的水军，理由不仅有北魏和后秦唇亡齿寒的关系，更有人怀疑刘裕表面伐秦实际是想攻魏；另一派倒不怀疑刘裕想攻魏，而是认为刘裕伐秦志在必得，如果北魏出兵介入晋秦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引火烧身。北府兵久经疆场，之前灭亡了同是鲜卑政权的南燕政权，北魏的鲜卑军队能战胜北府兵吗？北魏占领华北大部时间不久，要处理的内政很多，北方又在与柔然交战，实在不想和晋军硬碰硬地决战。最后，北魏明元帝做了折中，集合十万大军部署在黄河北岸，监视晋军行进。

在战场上，折中看似明哲保身，其实是最危险的选择。不战不和，反而堵断了媾和的道路，又让自己对战争缺乏准备。刘裕发现北岸的魏军后，就立刻在战与和之间做出了选择：战！逆流西进必须排除魏军的威胁，必须通过血战，让北魏看到晋军灭秦的决心和能力。

四月，七百名北府兵乘坐一百辆战车，主动登陆北岸。这些车辆组成半圆形的阵势，两头的车辆紧靠河岸，中间的车辆离岸一百多步。这阵名叫却月阵。魏军大约有三万名，见北府兵人数这么少，就包围过来。他们不知道这一小股晋军为什么主动挑衅，力量悬殊，难道是来送死吗？

就在魏军徘徊不前的时候，朱超石率领两千人携带大弩一百张登陆。每辆车增兵二十人，在车辕上竖起盾牌，掩护却月阵。每辆车都配备一张大弩。魏军判断晋军是要在北岸建立据点，于是开始进攻却月阵。三万魏军一波波地冲来，又一波波地倒在弓箭面前。尸体越积越多，魏军最终还是逼近车前。晋军的大弩发射不及，朱超石就下令将长矛截断，留下三四尺长，一人执矛，一人在后面用大锤锤矛，让一根根断矛成了一枚枚巨箭，呼啸而出。由于魏军蜂拥密集，一矛射出常常刺穿三四人。魏军死伤惨重，留下更多的尸体后溃退而去。朱超石乘机追击，又杀伤了不少魏军。此战，晋军以极小的代价重创监视的魏军，魏军丧失了阻挠晋军西进的勇气，纷纷远离逆黄河西进的晋军。战场上又恢复为晋军和后秦的对决。

为了突破潼关天险，七月，沈田子、傅弘之率领一千多人的小部队从南边的武关进入关中，很快推进到现在的陕西蓝田。这支部队只是刘裕的疑兵而已，却让姚泓大为紧张。原本姚泓纠集了数万兵马准备增援潼关。现在，他怕大军东出后被沈田子偷袭了后方，于是决定先带着后秦的主力军消灭沈田子等人。沈田子的小部队处境异常危险。沈田子只能险中求生，乘姚泓立足未定，率领一千多人主动向秦军冲锋。秦军毫无防备，竟然被沈田子一阵冲杀打乱了阵脚，伤亡过万。姚泓狼狈逃往霸上，连自己的御驾都成了沈田子的战利品。后秦增援潼关的生力军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溃散了，真的是天不佑秦。

正面攻击潼关的刘裕、王镇恶意外听到沈田子所部的捷报，乘机猛攻潼关。晋军水军乘艨艟小船从黄河突入渭水。艨艟，三国时期就是南方水军的主要装备，船体低矮，从上面看艨艟全部被遮盖住，行进起来像是横冲直撞的大乌龟。关中的秦兵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船，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士气更加低落，接连溃败。

八月底，突入关中的晋军与后秦最后的主力军在渭桥（今咸阳东北）决战。秦军大败，姚泓单骑逃回长安宫中。王镇恶尾追而来，长安城已经无兵可调，无人愿守了。姚泓万般无奈，准备投降。他十一

岁的儿子姚佛念不愿投降，登上宫墙投地而死。姚泓率其他家人至王镇恶营前投降，其堂弟姚赞等人也纷纷投降。除姚泓外，刘裕将后秦宗室全部处决。后秦灭亡。

九月，刘裕率北府军进入长安。长安是之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它的光复，在政治意义上绝不在洛阳之下。至此，两京光复，刘裕似乎扭转了五胡乱华以来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弱势。长安自316年被匈奴攻陷后，已经一百多年没有见到汉家军队了。史载长安光复后，三秦父老“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刘裕的声望如日中天。他祭扫西晋皇陵，把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等送往建康。姚泓被押送建康斩首。

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为晋收复，形势对刘裕很有利。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有四股力量：南燕、后秦、北魏、赫连勃勃。南燕和后秦先后覆灭，北魏刚刚被刘裕打败，赫连勃勃还在陕北游荡，刘裕完全可能扩大战果，恢复更多的故土。可惜，他志在南归代晋。刘裕的北伐还是没有摆脱立威扬名的窠臼。而经过多次血战的南方官兵们也欲南归，很少有人愿意留在北方从事政权建设；刘穆之又在这时病故。刘裕担心后方不稳，于十二月率军离开长安，匆匆南下。关中百姓沿途痛哭，请求晋军不要撤退。但刘裕“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

北部的赫连勃勃乘虚而入，加上留守关中的东晋诸将又自相残杀，关中很快为匈奴人占领。刘裕灭秦，为赫连勃勃做了嫁衣。回到建康后，刘裕在朝廷的地位显赫无比。他接受了“相国、宋公、九锡之命”，开始为篡晋做准备。

从刘勃勃到赫连勃勃

—

自从匈奴汉国和前赵覆灭，匈奴民族长期没能再建立割据王朝，在五胡十六国中处于被其他民族奴役的地位。匈奴铁弗部落在相当于如今内蒙古和河套地区的地域游牧，酋长也以刘为姓，接受过匈奴汉国和前赵的封爵，南方的匈奴王朝覆灭后，铁弗部落继续在草原上游牧。刘卫辰担任部落酋长的时候，这支匈奴的力量已经相当可观。强邻拓跋鲜卑与之鏖战，拓跋珪在391年大破该部匈奴，刘卫辰父子被杀，部众星散。

不过，拓跋珪没能斩草除根。刘卫辰的小儿子刘勃勃在混乱中逃脱，投奔叱干部。酋长叱干他斗伏不敢收留刘勃勃，派人把他送交拓跋鲜卑。叱干他斗伏的侄儿叱干阿利劝阻无能，就中途救下刘勃勃，送交后秦的高平公没奕于。没奕于算是刘勃勃的第一个大恩人，不仅收留了他，将他养大成人，还招他做了女婿。

刘勃勃作为一个孤儿，在其他民族的阵营中孤独成长。再加上外部弱肉强食的大背景，使刘勃勃的人格出现了偏差。一方面，刘勃勃这个孩子看待世界没有温情，人对事都冷酷无情。一旦他执掌了千军万马，如此性格就恶化为了残酷暴戾。另一方面，无依无靠的刘勃勃必须依靠智慧在乱世中生存下去，这使他智商很高，可惜不是聪明而是狡黠。这些性格在一个体格强健、野心勃勃的青年人身上汇聚，让刘勃勃成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晋书》说他长大后“身長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辯慧，美风仪”。后秦皇帝姚兴很欣赏刘勃勃，深加礼敬，任命他为将军，一些军国大事都找他商量，宠遇并不比勋旧大臣差。但是姚兴的弟弟姚邕（yōng）觉得刘勃勃是个危险人物，劝姚兴要防着点：“勃勃天性不仁，难以亲近。陛下宠遇太甚，臣窃惑之。”

姚兴固执地认为刘勃勃有济世之才，可以用来平定天下，别人越反对，他反而越看重刘勃勃，搜罗河套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部落和其父刘卫辰的残部三万人，交给刘勃勃指挥，还想让他协助岳父没奕于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同时防备拓跋鲜卑。姚邕再次劝止，指出让刘勃勃领兵很危险。姚兴反驳弟弟：“你怎么知道刘勃勃的性情不能领兵？”姚邕说：“刘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过分宠信他，恐怕终为边害。”姚兴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还是提拔刘勃勃为安北将军，封五原公，还将朔方（今陕西延安）拨给他驻扎。姚兴可谓是刘勃勃的第二个大恩人，他信任刘勃勃，让他成了一方藩镇。

刘勃勃从此有了纵横天下的资本。他很快就走上了扩军自肥、烧杀抢掠的道路。刘勃勃一上任，就抢劫了河西鲜卑献给姚兴的八千匹骏马，用来壮大自己。接着他又带上三万人马，假装去高平川打猎，对抚养自己长大的岳父没奕于发动突然袭击，竟然将岳父杀死，吞并了高平的部队。刘勃勃的部队一下子扩展到数万人，不过这都是通过忘恩负义杀戮亲人实现的。407年，刘勃勃觉得自己羽毛已满，正式脱离后秦自立。他宣称匈奴是夏朝的苗裔，定国号为夏，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这是十六国后期的又一个匈奴割据政权。

夏国建国以后，仅有高平、朔方一隅。不过匈奴骑兵剽悍强劲、机动性强，部将们都对战胜后秦有信心，主张建都高平，与后秦争夺关中。刘勃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建都高平，将陷入与后秦漫长的拉锯战，敌众我寡，争夺一城一地，不具备优势。刘勃勃的思路是利用匈奴骑兵风驰的优势，对庞大的后秦展开出其不意的骚扰，敌前我后，敌进我退，等后秦疲于奔命时再集中优势力量歼灭后秦的有生力

量。

他自信用此战术，不出十年，岭北、河东将尽为匈奴所有。刘勃勃的战略其实是对历史上游牧民族赖以取胜的军事思想的总结，类似于后世的运动战。没有根据地、飘忽不定的行动也让匈奴夏国长期游荡在关中北部、陇西一带，没有固定的国家形式，和一般的王朝有别。

刘勃勃的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以区区几万之众不断骚扰后秦北方州县，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后秦防不胜防，北方各城干脆大白天都紧闭城门。姚兴这才悔不该不听姚邕的话，可惜没有后悔药吃。刘勃勃的骚扰贯穿至后秦灭亡，极大制约了后秦的行动，消耗了后秦的国力。刘勃勃的日子过得却非常滋润，四处劫掠让他得到了充分的供给，不愁军队的吃穿用度，很是潇洒。

刘勃勃残暴的性格在战争中完全暴露了出来，对西北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匈奴夏国每次击败敌人，杀伤动辄过万，占领的城池被抢劫一空，百姓中精壮的人就补充到部队中去，其余的则遭到杀戮或者活埋。《晋书》中留下了诸如“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赏”“杀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将士五千人，毁城而去”等血淋淋的记载。刘勃勃的战绩虽然辉煌，却因残暴未能赢得丝毫民心，这也是夏国不能真正建国立业，传之长远的根本原因。

在刘勃勃的游战杀戮过程中，西北的南凉政权基本上可算是被刘勃勃消灭的。当初刘勃勃独立建国，向南凉君主秃发傉（nù）檀求婚。南凉是西北最强大的割据政权，秃发傉檀哪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名不见经传的后秦叛将刘勃勃，断然拒绝。刘勃勃大怒，亲率两万骑兵杀入南凉，抢掠三百余里，驱掠两万七千人口、牛马羊数十万凯旋。秃发傉檀要率众追击，部将焦朗劝阻道：“刘勃勃天姿雄鹜，军队强悍，我们不能轻敌。现在匈奴人满载而归，遇到追兵会各自为战，保全战利品，我军难与争锋，不如抢到他们前头去结营阻击。”秃发傉

檀和其他将领则认为刘勃勃的部队是到处游荡的乌合之众，拿着那么多战利品，肯定不会死战，大军临之必土崩瓦解，因此发动南凉的主力，追击刘勃勃。

事实证明，焦朗对游荡骑兵的判断是正确的。速度是他们的优势，财富是他们的目的，两者是不可分的。抢掠的财富丝毫不会降低他们的速度，反而会激发他们保卫财富的坚强斗志。果然，刘勃勃听说南凉追兵赶来，回头迎战。尽管在战斗中刘勃勃被秃发傉檀安排的神箭手射中左臂，还是坚持率军大败追兵，反过来追回去八十余里路，杀伤南凉士兵万余人，斩南凉大将十余人。刘勃勃将敌人的尸体垒起来筑为京观，取名“髑髅台”。南凉经此一败，伤了元气，从此落后于邻国北凉和西秦。没几年，秃发傉檀投降西秦，南凉灭亡。

经过数年的游荡作战，形势朝着有利于刘勃勃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投降后，刘勃勃以他为谋臣。夏政权开始建立完备的规章制度，寻求固定下来。于是，刘勃勃决定建造都城。413年，刘勃勃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选中一块“临广泽而带清流”、水草肥美的地方（今陕西靖边县以北约五十公里）营造都城。

为了建造这座都城，十万各族百姓花费了数年时间。刘勃勃任命叱干阿利为负责人。叱干阿利主要采取夯筑的方式建造城池，先将土蒸一遍，增加坚实度。夯完一段城墙，阿利就验收一段。验收的标准是用锥子扎，如果能扎进去一寸深就认定这段城墙不合格，要推倒重来。而筑造这段墙的民工也会被杀死，尸体混在泥土里当建筑材料用。叱干阿利如此残暴，却深得刘勃勃赏识，很认同他的管理方法。结果，整座都城虽然没有钢筋巨石，却造得异常坚固。一直到北宋时期还是夏州的治所，是北宋和西夏作战的堡垒之一。

都城的装饰和储备的物资，也是追求刚硬。叱干阿利用铜铸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等装饰物，外表涂以黄金，排列在都城宫殿中。叱干阿利同时负责督造兵器。造的弓箭射不穿铠甲，便斩弓

箭匠；射穿了，便斩铠甲匠。他监制的“百炼钢刀”，锋利无比；制造的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背上有铭文：“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铭文豪气冲天，对自己的质量自信满满。为了追求高品质、高标准，工匠制造时稍有不合即遭杀身之祸。“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整座都城可以说是建筑在百姓的尸骨上的。

刘勃勃认为：“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这座都城得名“统万城”。城市开始建筑的第一年，刘勃勃改姓赫连。原来的刘姓来源于西汉和亲的公主，现在刘勃勃声称子从母姓不合于礼，帝王是天的儿子，“其徽赫与天连”，所以改姓赫连。刘勃勃就变为了赫连勃勃大王。原来铁弗部落中同姓却非直裔的匈奴人则改称铁伐氏，意思是坚硬如铁锐可伐人。赫连勃勃的狂傲气焰可见一斑。

夏政权也开始占领一些领土。赫连勃勃废除州县制度，代之以城堡、军镇。某地的百姓就是某城或者某镇的军人，军民不分，以军政代替民政。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在赫连勃勃的刀逼鞭打之下终于建立了。

二

赫连勃勃最大的机遇是刘裕北伐。义熙十三年（417），刘裕北伐关中，姚泓投降，后秦灭亡。赫连勃勃的战争机器在西北高原虎视眈眈，却没有南下冲入战团。

赫连勃勃的判断是后秦必然灭亡，但刘裕不会长久盘踞关中。他认为刘裕北伐不是为了光复失地，而是立威，迟早会返回南方。赫连勃勃决定趁刘裕南返再南下关中，于是他一方面与刘裕北伐军通使友

好，一方面秣马厉兵，等待时机。后秦投降后，西北许多郡县都投降了赫连勃勃。夏政权的实力得以飞速增长。

赫连勃勃的判断完全正确，年末刘裕就离开长安南返，留十三岁的儿子刘义真守备长安。夏政权随即对争夺关中的策略进行讨论。王买德提出了一个关门打狗的方案，即匈奴骑兵利用速度优势，寻找占领青泥关、上洛、潼关等要塞，截断关中晋军退却的道路，然后发布檄文，号召关中各族百姓讨伐刘义真。赫连勃勃依照这个方案执行，命儿子赫连璜、赫连昌和王买德等人进占各个要点，自率大军向长安杀去。

留守关中的晋军面临被包围的噩运。不过客观来说，刘裕还是有心守住关中的。他留在关中的兵力并不弱，大多是跟随自己征战北府精兵；辅助刘义真的沈田子、王镇恶等人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赫连勃勃想吞并关中，并非易事。在最初的接触中，晋军两次打败匈奴骑兵，迫使正面的夏军采取守势。

遗憾的是，刘裕一走，留守的晋军将领起了内讧。先是沈田子杀了王镇恶，接着是刘义真长史王修杀了沈田子。晋军最精锐的两员大将就这么白白死了。十三岁的刘义真又听左右说：“王镇恶要反，所以沈田子要杀他。王修又杀沈田子，可见王修也要造反。”就轻率地下令杀死王修。结果将自己置于无将可派的境地，晋军被动地困守各座城池。长安城人心恐慌。刘义真为了保住长安，又命令晋军向长安收缩，将兵力都挤在城里，关上城门死守。赫连勃勃顺利占领咸阳，关中其他地区纷纷投降夏政权。

刘裕得到关中败绩的消息，召回刘义真，派大将朱龄石代替他镇守长安。

义熙十四年（418）十一月，朱龄石到达长安，刘义真率领大部晋军向东逃窜。刘裕命令他轻装而行，迅速逃离关中。可是晋军官兵

带着大批辎重、家眷，沿途又烧杀抢掠，毫无纪律，一天都走不了十里路。部将傅弘之劝刘义真丢弃辎重，轻装快进，刘义真不听。很快赫连率三万匈奴骑兵追上了逃亡的晋军。傅弘之断后，掩护刘义真逃跑。晋军边走边打，至天黑全军覆没，傅弘之等人被俘。刘义真因为跑在最前面，天黑后匈奴骑兵停止追击，才幸免于难。虽然捡了条性命，刘义真也落得个孤身一人伏在草丛里不敢吱声的下场。后来听到参军段宏在叫他的名字，到处寻找他，刘义真才从草丛里钻出来，和段宏两个人逃回南方。

刘义真的惨败，使刘裕丧失了多年依靠的北府精锐，连累南方政权的军事力量也被削弱。本来刘裕光复两京，关中汉族百姓对他还有很高的期待。结果他迅速离开长安南归，已经让部分百姓失望了。如今刘义真率领晋军大肆掳掠，又全军覆没，更是让关中的汉人对刘裕和晋军失去了信心。民心不再思晋，很多百姓还恨透了军纪败坏的晋军。困守长安的朱龄石处境就很尴尬了。他兵力薄弱，又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面对步步紧逼的赫连勃勃，无奈地烧毁长安宫殿，向潼关退却。赫连勃勃进占长安，一路追击，消灭了关中的最后一支晋军。朱龄石被俘，和之前被俘的傅弘之等人最后死在长安。洛阳则被拓跋鲜卑占领。刘裕北伐光复两京的战果，至此全部丧失。刘裕灭后秦，赫连勃勃成了最大的胜利者。

完全占领关中后，赫连勃勃在霸上即皇帝位。夏政权东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对峙，南与东晋对峙，成了三分天下的割据王朝，达到势力的顶峰。群臣要求定都长安，赫连勃勃认为长安离北魏太近，不肯迁都。统万城刚刚建成，赫连勃勃便退回统万城，以它为都城。

赫连勃勃的夏政权建立得有点特殊，主要是靠匈奴人的军事强权勃兴的，又抓住了刘裕北伐的失误得以占领关中。大凡建立在军事强权基础上的政权，都长久不了。赫连勃勃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政权达到顶峰后，没有整顿内政，励精图治，反而变本加厉地展开了残暴杀戮。

他常常站在统万城上，旁边放着弓和剑，看哪个行人不顺眼，就亲手杀了他。对于看不顺眼的大臣，赫连勃勃毁其目；觉得取笑自己的大臣，则决其唇；如果有大臣敢进谏，赫连勃勃就说他诽谤，先截断他的舌头再砍脑袋。占领长安后，赫连勃勃召见隐士韦祖思。韦祖思心里害怕，表现得毕恭毕敬。赫连勃勃却发怒了：“你见姚兴不拜，见了我为什么拜？我还没死，你就不把我看作帝王，我死之后，不知你在笔头上要把我糟蹋到什么地步！”就把他杀了。人们最怕喜怒无常的暴君，很快“夷夏嚣然，人无生赖”，赫连勃勃的统治弄得天怒人怨。

奇怪的是，赫连勃勃竟然能够善终，一直到刘宋元嘉二年（425）才逝世。他死的时候，夏政权已经危机重重，呈现末世景象：内部因为不修内政，国穷民困；外部则受到北魏政权的步步挤压。赫连勃勃死后，儿子赫连昌嗣位，第二年长安被北魏攻破，第三年统万城也被北魏攻破，第四年赫连昌成了魏军的俘虏。赫连勃勃的小儿子赫连定即位，负隅顽抗。431年，赫连定被吐谷浑俘虏，夏亡。

别把责任都推给大环境

—

吴隐之是东晋后期著名的廉吏。在社会推崇奢华、官员普遍贪污的魏晋时代，吴隐之的存在是一个异类，证明为政廉洁与否，与环境的关系不大，关键在于个人操守。

吴隐之是濮阳郡鄆城人，《晋书》在他的本传一开始就大书其青少年时代与众不同：生活俭朴、崇尚廉洁，个人品德高尚。比如吴隐之每天进餐仅食豆羹，决不享用非分之粮，也不谋求来历不明的财物——吴家生活尚可，也算不上富裕。十多岁时，吴隐之的父亲死了，他和哥哥吴坦之异常悲痛。之后，吴隐之对母亲极为孝顺。吴家和韩康伯为邻，韩康伯的母亲常常教育韩康伯：“你日后如果要选拔官吏，应该举荐像吴隐之这样的人。”这说明吴隐之从小就符合朝野的道德标准，是品学兼优的好青年。后来，韩康伯做了吏部尚书，主管官员选拔，举荐吴隐之出任辅国将军功曹，后转任征虏将军参军。大将袁真起兵反抗桓温失败后，吴隐之的哥哥吴坦之是袁真的功曹，按律要受牵连遭祸。吴隐之拜见桓温，请求代兄领罪，桓温很感动，最终放过了吴坦之。吴隐之因此得到桓温的赏识，担任了尚书郎。

随着地位的上升，吴隐之罕见地保持了廉洁的品性。上级谢石（就是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那位）听说吴隐之的女儿出嫁，派人前来帮忙。来人到了吴家，看不到一点儿喜庆的样子，看不到一个宾客，也看不到一件嫁妆，只看到吴家的丫鬟牵着狗到大街去卖。原来吴隐之

打算用卖狗的钱来置办女儿的嫁妆。后来吴隐之升任晋陵太守。别人把做地方官当作捞钱自肥的好时机，吴隐之却甘于贫困。在任期间，他的妻子自担柴草，全家人冬月没有被子盖，吴隐之没有换洗的衣服，脱下衣服清洗就只得披着棉絮。这哪里是太守，完全与贫民无异。对比魏晋时期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斗富大赛的新闻，吴隐之绝对算得上天下第一廉吏。

任何时代都是需要廉吏的，哪怕朝政黑暗腐败到极点。因为贪腐从根本上侵犯了朝廷的正当利益，将国家的财富划为私有，对国家的政策阳奉阴违。过分的贪腐会损害国家财力、公信力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而影响天下安全。推出几位廉吏，让他们处理棘手的问题，就成了朝廷对抗贪腐的利器。

出于这样的考虑，吴隐之在隆安年间（397—402）被朝廷提升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出镇南粤，成为封疆大吏。

广州环山绕海，出产珍品异物，比如象牙、珍珠和名贵药材。那里天高皇帝远，地方官贪腐的难度很小，收益却很大。只要从广州带走一箱宝物就足够几代人享用。但一般的世族子弟都不愿意去广州任职，除了家教和道德感的因素外，主要是岭南地区瘴疫流行，被视为畏途。结果，去广州当官的都是在北方仕途无望，又贫寒贪婪的人，到任后多以敛财为己任，视朝廷法度为虚无。朝廷要革除广州的弊端，吴隐之就是最好的人选。

话说距离广州首府番禺二十里地的石门有一汪泉水，叫贪泉。谁喝了贪泉的水，就会变得贪得无厌。吴隐之来到这里，却要喝贪泉的水。家人和随从们拼命阻拦：朝廷正对刺史大人寄予厚望呢，可不能变得贪婪啊！吴隐之却自信地说：“人心中如果没有贪欲，就不会有可贪的东西。人们往往越过南岭就失去了廉洁的心，我知道原因了。”言下之意是贪污的本质在于贪欲，没有贪欲就没有贪污。

他舀来贪泉水喝了下去，还赋诗一首：“古人传说这泉水，舀来喝了贪千金。试让伯夷叔齐饮，始终不变廉洁心。”伯夷、叔齐二人是商朝末期人，周朝建立后不食周黍而死，被古人视为抱节守志的楷模。如果人人都有伯夷、叔齐那般意志，哪里还有贪腐现象？吴隐之不仅饮贪泉之水，还盛了几坛子水带着上任。一路上，家人和随从叫苦不迭。广州百姓看到穿着朴素的吴隐之一行，又看那坛坛贪泉之水，也叫苦不迭。

上任后，吴隐之廉洁奉公，依然过着以稻米、蔬菜和鱼干为食，以粗布衣衫为衣的俭朴日子。他把刺史官署备的帷帐器皿都交给府库，有人说他做作、沽名钓誉。吴隐之一笑了之，始终保持公私分明、不贪不沾的生活。有下属给他送鱼，事先剔除鱼骨留下肉，吴隐之察觉了他们的用意，竟将下属除名。在他的整个任期中，吴隐之喝着贪泉的水，坚守着廉洁的操守。

吴隐之最后遇到了卢循起义军的进攻。卢循起义军在江浙遭遇重挫后，侵入岭南，吴隐之督率将士坚守城池达百余天。最后，长子吴旷之战死，起义军攻入番禺城内，放火焚烧了民居。吴隐之携带家小逃出，打算撤回建康，结果被卢循俘虏。刘裕专门给卢循去信，索要吴隐之。吴隐之被卢循放回。归途中，吴隐之一家人除了上任时携带的物件外，只多了妻子买的一斤沉香，此外没有任何资产。吴隐之认为沉香来路不明，妻子解释说是在市面上购买的，打算拿到北方变卖赚取差价，吴隐之夺过沉香就扔到水里。可以说吴隐之在岭南富庶之地主政多年，没有谋得任何私利。

回到朝廷后，吴隐之担任了中领军，掌握中央军队实权，日子过得却更加清贫了。京官不像地方官有专门的府邸，吴隐之的家是数亩小宅地，篱笆墙垣倾斜败坏，围着六间茅屋，连妻子儿女都容纳不下，更不用说仆人奴婢了。刘裕赠给他牛马金钱，又给他建造府邸，吴隐之都坚辞不受。他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的俸禄。每月初领到俸禄，除了留部分用作全家人必要的吃穿用度外，吴隐之把其余的都分

散救济亲族。有时吴家窘迫到极点，一天的饭全家人要两天吃。吴隐之穿着常年不变的布衣，冬天的时候要披棉被御寒。义熙八年（412），吴隐之上书退休，第二年去世。

吴隐之没有留下太多的政绩，政治能力也有欠缺的地方，但他身处贪腐奢侈的社会中能够终身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本身就是莫大的成绩。

二

一提到魏晋，如果混乱是头号关键词，那么贪腐可能就是第二个关键词了。即便是这样，社会上依然有清廉的气息。《世说新语》提到东晋初期，临川太守周镇卸任回建康，还没上岸，丞相王导就去看他。当时是夏天，一场暴雨突然降临南方，周镇的船又狭又小还漏雨，王导根本找不到坐的地方。王导感叹道：“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周镇很快被派往经济中心吴兴任太守。

范宣也是著名的廉吏，豫章人韩某要送他一百匹绢，范宣不接受；韩某减为五十匹，范宣还是不接受；如此递减，最后减至一匹，范宣还是不接受。最后，韩某和范宣同车而行，韩某撕下两丈布来送给范宣，说：“你总不能让妻子没有衣服穿。”范宣这才笑着接受了。

之前的荆州刺史殷仲堪也有廉洁的表现。在任时遇到荆州水灾，殷仲堪每餐只吃五盘菜，也没有特别的菜肴，饭粒落到席子上，他都捡起来吃掉。这和之前相比，已是大为俭朴了。在众多实权人物中，殷仲堪比较廉洁。他常常对子弟说：“不要因为我出任封疆大吏，就认为我会舍弃操守。甘于清贫是每个士人的本分，怎么能够平步青云后就抛弃最根本的品德和操守呢！你们要记住这个道理。”这句话道

出了廉洁之人能出淤泥而不染的根本原因。

个人言行取决于内心品德和操守，与大环境没有太大关系。那些把个人罪行都归咎于大环境的人，都是在为自己推脱。

第七章 魏晋风华

桃花源只是传说

—

义熙十四年（418）的一个清晨，柴桑乡间的一位老农叩响了陶渊明家的柴门。他带酒来与陶渊明同饮，陶渊明欣然接受。透过从房顶和四壁漏处照进来的晨曦，老农看到陶渊明家徒四壁，无以为继，就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矮房破屋、衣衫褴褛，这样的生活不适合你陶渊明。世间之人都浑浑噩噩，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呢？陶渊明回答道：“深感老父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他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几年后，即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陶渊明的草舍探访。此时的陶渊明又病又饿，已经卧床不起多日了。檀道济见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现在是太平盛世，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何必自我折磨呢？陶渊明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表明自己的志向不在当官上。檀道济无奈，送给陶渊明许多粮食和肉，结果被陶

渊明“挥而去之”。

在东晋南朝，陶渊明是个孤独寂寞的隐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树立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虽然是儒家思想，但掌权者真正奉行的始终是法家思想，尤其是在九州动乱、朝廷衰微的背景下，各派人物将现实主义政治发扬光大，法家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比如司马睿送给太子司马绍的图书礼物，不是《诗经》《论语》或者《尚书》，而是《韩非子》。

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反叛，玄学盛行，社会上以清谈为乐。玄学为许多人提供了躲避残酷现实、保持独立人格的可能。而陶渊明抛弃了这一切，不信奉任何思想学派，只奉行简单、平淡、真实的隐居生活。他沉默少言，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喜欢喝酒，就尽情喝酒；喜欢读书和写作，却不以精通某家学问或者追求什么为目的。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晋书》在陶潜传记开篇不久就引用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陶渊明的自传。如果说陶渊明的人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坚守率真、独立的人性。所以他不为务实的东晋政治所吸纳，也不为当时宗法家或宗玄学的士人所理解。

率真、独立的人性在复杂的现实中难以保持，所以陶渊明在后半生远离尘嚣，躬耕自资。他写了一篇《桃花源记》，来描绘他理想中

那平淡、简单的生活图景：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白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从此，桃花源，一个若有若无的仙境，成了中国文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代名词。千百年来，一代代后来者，或苦苦追寻或刻意营造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更有一代代崇拜者，力图证明桃花源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陶渊明的虚构。

二

陶渊明（刘宋建立后改名陶潜），字元亮，是东晋名臣陶侃的曾孙。在他出生时，陶家已经败落。陶渊明九岁丧父，与母亲、妹妹三人寄宿在外祖父孟嘉家里，艰难度日。

孟嘉是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陶渊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外祖父不求虚名的率真个性，也继承了外祖父酗酒的嗜好。孟家藏书很多，给陶渊明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历史上没有记载陶渊明的老师是谁，他很可能是自学成才。这就使得陶渊明的人格无拘无束地

蔓延生长，开出了求真淡定的花朵。

在其他人热衷“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士人从小钻研进取的两晋时代，陶渊明自由选择学习了儒家的六经，遍览了文、史、哲以及神话等闲书与异书。结果，两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扎下了根。一是多数学问都倡导的入世思想，陶渊明也有兼济天下、抚慰苍生的志向抱负，渴望施展才华做出一番功业来；二是清正独立的人格根深蒂固，陶渊明正邪分明，去伪存真，不阿谀、不谄媚、不说假话、不干坏事。他要按照“正确的思路”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这样，陶渊明就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独立、正直又有抱负的读书人都会遭遇的难题。现实不会让你顺利地施展才华实现抱负，而是给你设置种种障碍。读书人要想成事，必须妥协让步，要么委曲求全曲线践志，要么丧失独立性在现实中随波逐流，总之，不会让你既保持清正独立的人格又实现理想抱负。如果你不愿意妥协，则轻者在现实中被摔打得头破血流，重者被扫地出门无处容身。

陶渊明就属于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那类人。

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他已经二十九岁了。东晋门阀制度森严，世族能够二十为官，寒门却只能三十试吏。曾祖父的成功并没有让陶渊明摆脱寒门的身份，他入仕即遭人轻视。同时陶渊明对官场冗繁无聊的生活也很不适应，对官吏脱离百姓民生的工作不以为然，很快就辞职回乡了。之后江州又召他出任主簿，他也辞谢了。

隆安四年（400），陶渊明觉得荆州刺史桓玄有所作为，跟随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主动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不想桓玄的“有所作为”是篡夺东晋的天下，陶渊明不愿意同流合污做乱臣贼子，便在第二年借母亲去世之机，挂冠而去。

元兴元年（402），桓玄叛乱，攻入建康，第二年篡位称帝。陶

渊明对桓玄称帝深恨在心，思考如何报国，得知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人起兵讨桓，便马上离家，一路乔装，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给刘裕。陶渊明对此举很是得意，认为做了一件对国家百姓有利的事情。他看到刘裕主政后革新政治，作风不俗，便留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刘裕以身作则整顿朝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事业的归宿，和刘裕走得很近。然而很快，陶渊明便失望地发现刘裕的这些作为其实是在为篡位称帝做准备，于是在义熙元年（405）去职。

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令。此前的陶渊明断断续续出任了多个低级官职，都干不长，没有积蓄又酗酒，家庭生活开始出现困难。东晋的官吏有“职份田”，到任耕种，卸任归还。陶渊明到任后想在职份田上全种上酿酒用的秫谷，说：“让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不同意，要种上可以吃饭换钱的粳米。夫妻争吵的结果是一顷五十亩田种秫谷，五十亩种粳米。随着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陶渊明酗酒也越来越厉害。

不过没有等到种下去的秫谷成熟，陶渊明又挂冠而去。原来追求简单真实的陶渊明上任后，有事办事，没事休息，从不和上级、同僚“联络感情”。一日，浔阳郡遣督邮来到县里，属吏告诉陶渊明应该束带正装去见。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授印去职。陶渊明在彭泽任县令仅八十一天，却为他赢得了“陶彭泽”的雅号。

卸任后，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结束，此后再未出仕。在这十三年中，陶渊明一心报国利民，辗转为官又失望而辗转辞职，最后绝望地发现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他那清正独立的人格留下空间。他只能选择隐居。陶渊明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405年，陶渊明挂冠而去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县令，却多了一位开创文派、刷新思想的大师。

陶渊明辞官回到乡里，过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生活。夫人翟氏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计。

陶渊明很享受纯朴、简单的乡村生活，乡间没有复杂的权力纠纷，乡民也不会尔虞我诈、党同伐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些平凡的乡间景象，在陶渊明笔下格外亲切温暖。陶渊明一家成了普通百姓，生活压力自然比做官的时候要重许多。四十多岁的陶渊明拿起锄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动，希望能有好的收成，真正体会到了普通百姓的辛苦。

他和一起劳动的乡亲们“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日常琐事和收成好坏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东晋对百姓的剥削是很重的，尤其是大量户口荫庇在世族豪门名下，像陶渊明这样的自耕农承担了越来越重的税赋。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裕人家的田地跨州连郡，穷人家无立锥之地；富裕人家山珍海味，穷人家连米饭、稀粥都不能保证，菜肴只是粗盐腌菜而已。

归隐之初，陶渊明的生活尚可，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喜爱菊花，宅边院前遍植菊花；继续嗜酒，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饮必醉。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自便。”在最初的几年里，陶渊明劳作虽然辛苦，但还能自由地爬山、写诗、喝酒，并洒脱地处理来自官场的打扰。

江州刺史王弘崇拜陶渊明，主动上门拜访，陶渊明称病不见。王弘派人侦察，得知陶渊明将游览庐山，就叫陶渊明的故人庞通之等人赍酒在半道上拦住他。陶渊明遇到了酒，欣然引酌野亭，忘记了登山。王弘适时出来相见，欢宴了一整天。陶渊明没有鞋，王弘马上让左右给他编一双鞋。左右要量陶渊明的脚，他就坐在那里伸出脚来让别人量。王弘邀请陶渊明去江州，问他怎么去。陶渊明确说：“我素有脚疾，以前是坐蓝舆的，现在也能走回去。”王弘就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把陶渊明抬到江州。面对王弘这样的权贵，陶渊明谈笑自若，丝毫没有羡慕、趋附权贵的意思，得到了时人的赞扬。

陶渊明的《饮酒》诗可以对他归隐的早期生活做一个总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义熙四年（408）夏天，陶渊明那闪耀着夺目文化光辉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焚毁一空。陶家不得不迁至其他村子重新安家，此后家境每况愈下。为了养家糊口，陶渊明的劳动强度骤然加大，可即便他终年辛劳，还是生活窘迫。如逢收成好，陶家尚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一旦遇上灾年则陷入“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的困境。最后，陶渊明可能是把宅地给卖了，全家寄居在船上。现实是如此残酷，世外桃源般的归隐生活即便能够存在一时，也不能存在一世。

到了晚年，陶渊明的生活难以为继了。据说他的儿子都是痴呆，一家人的生活始终依靠年迈的陶渊明。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乞讨和借贷。有的朋友会主动周济他，有的就需要陶渊明亲自上门乞借了。政治的打击也接踵而来，420年，刘裕篡夺了东晋的天下，建立了刘宋王朝。那个陶渊明曾经寄托忠诚和梦想，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王朝不复存在了。永初三年（422），年近花甲的陶渊明在生活上已近绝境，他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他长期饿着肚子，求一把菽麦都

不可得。

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陶渊明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朝廷的征召，拒绝再次踏入官场，哪怕是领取一份清闲的俸禄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对困窘的生活际遇淡然置之，仍然坚持写诗，继续歌唱自然，品味田园，钟情理想中的桃花源。老朋友颜延之在刘宋景平元年（423）出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找他喝酒。临别，颜延之留下两万钱接济老友生活，陶渊明全部送到酒家换取久违的美酒。越是贫病交加，现实打击越重，陶渊明就越离不开酒精。

元嘉四年（427），陶渊明的身体不行了。九月中旬，陶渊明在清醒时给自己写了《挽歌》组诗。在第二首诗中，他自嘲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设想了死后“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蟪蛄，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的情景。在第三首诗中，陶渊明确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平淡地迎接死亡的到来。冬天，陶渊明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南北朝不为人重视，却在几百年后获得了空前的赞誉和如潮的掌声。

南朝梁代刘勰的文论《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南朝梁代钟嵘《诗品》也只是将陶诗列为中品。唐宋之后，读书人才开始发现几百年前的陶渊明是那么的有代表性，那么前瞻地预示了文人的困境。他用生命营造出来的“桃花源”意境是那么美，能给人暂时的逃避和休憩，能给人无限美好的想象。于是，不管是入仕还是没有入仕，不管是得意还是失意，士人们纷纷附庸陶渊明，解读他的田园诗。因为没有文人能够跨越现实和理想的巨大鸿沟，没有文人能从中找到两全其美之道，陶渊明的探索已然最佳选择了，所以陶渊明始终拥有稳固的拥护者。

诗仙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和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

腰”遥相呼应。当年李白意气风发从川来，满心扬名天下，结果接连受到打击，不得不醉情山水、诗文和美酒，最终在古江州附近赴水捞月而去；王维二十岁高中状元，名扬四海，本想成就伟业，结果在中下级官僚序列中徘徊，最后归隐终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词人辛弃疾壮怀激烈，少年戎马南北，中年久离前线，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终将陶渊明引为知己，在《念奴娇》中盛赞“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陶渊明成了众多文人的典范，成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符号。

魏晋风骨留给我们的光

—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却也是知识分子性情张扬、风范永存的盛世。

知识分子的张扬与活跃，似乎与王朝权威的稳固程度成反比。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巩固、皇权显赫的时代，知识分子循规蹈矩，没有太出彩之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清末民初等大动乱时期，知识分子东奔西走，或呐喊鼓吹，或叩问内心，反而留下了不朽的绚烂篇章。

对个人内心压制最重的并非学问高低、家境贫富、眼界宽窄，而是政治权力，肇源于朝堂之上的权威。中国古代王朝要维持统治，总要推行统一的思想说教，便在客观上剥夺了知识分子海阔天空进行思考的可能。强大的中央权威配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垄断，让社会尽量保持一个声音。

魏晋时代，先是三国分立，然后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恰恰是中央权威最低落的时期，为知识分子的张扬活跃提供了可能。这个时期，虽然儒学在官方的支持下，仍以经学的形式延续着，但受到了玄学和西域传入的佛学的挑战。人们的思想开始多元化。知识分子自由思考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实政治的黑暗。从曹魏初年开始，忠孝仁义的说教只停留在人们的口耳之间，就连说教者本人都不信奉。魏晋都以“禅让”形式登基，统治阶层贪腐堕落，朝政黑暗，哪有忠孝道德可

言？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反抗，老庄思想和玄学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后人往往以“魏晋风骨”或者“魏晋风流”“魏晋风度”等来形容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进而指代那个思想活跃、自由奔放的年代。我们可以从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的关系角度入手，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二

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要思想自由，难以避开的问题就是要和政治权威保持距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知识分子要生存，毕竟人的一生很难逃避官府的骚扰。但是，人们可以在思想上和政治权威保持平行，不阿谀不攀附，保持人格上的独立。

从东汉末年开，正直的知识分子就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管宁和华歆，年轻时同席读书。一次，有乘坐官车的显赫人物从门外经过，管宁岿然不动，照样读书，华歆则丢下书本跑去观看。管宁于是割断席子，对华歆说：“你不是我志趣相投的朋友。”果然后来华歆成了逼汉献帝禅位的曹魏开国大臣，为世人所鄙夷。而管宁隐居辽东，教书育人，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赞同。只有与权威拉开距离，知识分子才能客观地看待政治，观察社会，自由地思考。

思想和权威的平行姿态，逐渐塑造了一批刚正、耿直的魏晋文人，他们做到了对权力不卑不亢，敢于坚持自我、维护自身的利益。

东吴末年，吴主孙皓暴戾无常，动辄大开杀戮。一次在朝堂大会上，孙皓突然问大臣诸葛靓：“卿字仲思，为何所思？”诸葛靓正色

说：“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此而已。”这里说的忠孝、诚信都是正直高尚的人应该具备的，可惜孙皓并不具备。诸葛靓敢于当面指出孙皓的缺点，可谓胆大。诸葛靓是曹魏叛将诸葛诞的儿子。诸葛诞割据扬州反对司马家族篡位，派诸葛靓入吴求援，失败后诸葛靓就留在了东吴。

东吴灭亡后，诸葛靓迁徙到洛阳居住，拒绝晋朝的委任，一直不出来当官。他因为与晋室有仇，常常背洛水而坐。其实，他和晋武帝司马炎是发小，感情很深，如果想当官，机会是很多的。后来，司马炎想见见诸葛靓这个老朋友，就通过诸葛太妃来招呼诸葛靓进宫。诸葛太妃是诸葛靓的姐妹，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伋。诸葛靓入宫，和诸葛太妃相见，司马炎突然闯了进来，拉着诸葛靓饮酒叙旧。酒酣，司马炎问道：“你还记得我俩当年竹马之好吗？”对一般人来说，皇帝亲口提及当年的情谊，是多大的恩典啊！诸葛靓却说：“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

吞炭漆身说的是战国刺客豫让的故事。豫让受知于智伯。韩赵魏三家合力攻杀智伯，豫让为报知遇之恩，矢志复仇，于是漆身毁容、吞炭改变声音，伺机刺杀赵襄子，事败而死。诸葛靓念念不忘司马家的杀父之仇，说完这话涕泪交加，悲恸不已。司马炎脸上无光，赶紧退场。出宫后，诸葛靓都以见到司马炎为耻辱和人生的污点。

这是对待皇帝的例子，还有许多对待权臣的例子。东晋王导征召王述做属官。议事的时候，王导每次讲完话，下级官员纷纷争着赞扬王导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表示要贯彻落实好王导的意思，现场充满阿谀奉承。王述职位低微，只能坐在末尾，却说：“丞相又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正确呢？”这样的认识，想必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王述那样的勇气。

琅琊王家的王含担任庐江太守期间，以贪浊闻名，名声败坏。其弟王敦是掌握天下一半兵权的枭雄，为哥哥王含护短，一次当众

说：“家兄在庐江政绩卓著，庐江官民交口称颂家兄！”王敦的主簿何充马上正色说：“我就是庐江人，听到的事情恰恰相反！”此语一出，在座的人都为何充捏了一把汗。何充神态自若，没有丝毫惧意。

最幽默的一个段子是裴楷创造的。名士裴楷是西晋的大臣。晋武帝司马炎一次在朝堂上自信满满地问：天下人怎么评论我啊？裴楷马上回答：“陛下肯定不能与尧舜相比，因为朝中有贾充这样的人在！”贾充是司马炎的宠臣，当时的太子妃、后来的皇后贾南风的父亲，更是天下皆知的佞臣。裴楷的正直和胆量可见一斑。

梁王、赵王是皇帝的近亲，煊赫一时，封地富庶。裴楷每年都向两位王爷借钱，且金额巨大，动辄几百万。借到钱后，裴楷都用来救济贫寒的亲戚故友，绝口不提还钱的事情。有人笑他：“你怎么能靠骗钱来施恩惠呢？”裴楷则说：“我这是在劫富济贫啊。”梁王和赵王都拿他没办法。

三

魏晋文人对政治权威的超脱，便利了个性无拘无束地发展。自由的思想海阔天空地驰骋，再配合老庄学说的自然无为，文人们言行、生活纷纷回归了从容、淡定、自然的原始。魏晋可能是文人在思想上最放松、自然的时期——有人说南宋是文人的天堂，可能在生活的安定上南宋时期超过了魏晋，但在思想自由度上南宋绝对逊于魏晋。魏晋文人的头脑中去掉了许多枷锁，身上少了许多约束，人际关系也趋向自然。

东晋时，王徽之担任桓冲的参军，桓冲死后，王徽之转赴建康任黄门侍郎。他在建康郊区遇到了从建康启程赴江州去当刺史的桓伊。

王徽之早就听说桓伊善吹笛，“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只是没有听过。他马上停船吩咐下人去传话：“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下人吓了一跳：桓伊出身桓氏望族，是淝水之战的大功臣，又是新任的江州刺史，家族门第并不逊于王徽之的琅琊王家，但声望、地位远高于王徽之。你让他为你吹笛，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啊？下人硬着头皮去传话了。谁想，桓伊听说有人想听笛，随即叫停车驾，下车，布置胡床，拿出笛子吹了起来。据说吹的是《梅花三弄》。吹罢，桓伊上车而去，王徽之继续行船，客主不交一言。

魏晋时期的家庭关系也比较直接、自然，不像后世那般烦琐多礼。晋武帝时期，参与灭吴的王浑，出身太原王氏，娶了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钟琰为妻。一次，王浑与钟氏共坐，看到儿子王济从庭前经过。王浑欣慰地对妻子说：“我们生下了这样的儿子，足慰人意！”钟琰却笑道：“如果我当初嫁给了你弟弟王伦，生下的儿子肯定比我们儿子更优秀！”此话一出，夫妻俩并没有反目，还是相敬如宾。

荀彧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和妻子感情深厚。冬天，妻子发烧生病了，荀彧就跑到庭院中把自己冻冰了，然后回到房内用身体给妻子降温。妻子死了，荀彧悲哀过度，不久也死了。荀彧生前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深爱妻子：“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意思是自己的妻子是大美人，自己更看重女子的外貌而非品德。古代历史讲求“妇德”，给妇女加上层层枷锁，用所谓的“德”来抹杀女性本身的风韵魅力，束缚妇女追求美貌的权利。裴楷评价道：“荀彧这句话是情之所至所说的，并非盛德之言，希望后人不要理解错了这句话。”

对于厌恶的人和事，魏晋时期的人也不需要虚伪地掩饰，可以爱憎分明地表达出来。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中书令。惯例是，监与令同车往来。和峤性情文雅、正直，对荀勖的谄谀奉承非常厌恶。每次公车来了，和峤就抢先上车，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不让荀勖上车。荀勖只能再找车。历朝历代的人，做到了达

官显贵的，几乎修炼得都很圆滑，不要说跟厌恶的人同车而行，就是和敌人称兄道弟也大有人在。只有在魏晋，道不同，不同车而行。从此开始，晋朝对朝廷的监、令各给专车。

魏晋文人天性自然，敢作敢为。王粲生前最喜欢听驴叫，在他的葬礼上，司马昭对吊唁的人说：“王粲最好驴鸣，我们可各作一声以送之。”来客纷纷响应，大家都学驴叫来给王粲送行。

四

与个人风骨相伴随的是那个时代宽容的社会氛围。人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魏晋风骨带动了社会氛围的宽容，还是宽容促成了文人的自由、正直和洒脱。

西晋时曾任尚书令的乐广看到当时清谈风气兴起，人人谈玄学，还有的人以任放为达，甚至裸体见人，虽然不认同不支持，但也没有利用权力进行打压。乐广留下了一句名言，足可以反映魏晋时期的宽容。他说：“名教中自有吸引人的乐趣，何必去追求放达和裸露呢？”人各有志，有人爱熊掌鱼翅，有人爱青菜萝卜，不必强求统一。嵇康在玄学中得到快乐，乐广在名教中获得乐趣，那么就各干各的吧。尽管魏晋时期也出现过杀害嵇康之类扼杀思想自由、破坏社会宽容的恶性事件，但魏晋文人的思想并非完全的不自由，镇压毕竟是少数，是小概率的事件。

司马昭杀害嵇康后不久就后悔了，杀戮一个对政权没有直接危害的清谈者，却激起了文人集团和政权的直接对立，得不偿失。同样，王导、王敦等大权在握的人，对公然顶撞、出言不逊的王述与何充等人，心里肯定不舒服，可也能做到默然以对，不去打击报复。因此，

魏晋社会总体非常宽容，政治权力很少打压思想自由。

体现社会宽容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睿。司马睿庆祝皇子诞生，大赐群臣。大臣殷洪领了赏，谢主隆恩，然后谦虚了一句：“皇子诞育，普天同庆。微臣在这件事情上没什么功劳，愧受厚赏。”司马睿笑着回答：“生皇子这种事情，怎么能让爱卿立下功劳呢？”一来一往，殷洪无意，司马睿幽默。便是在开明盛世，这样的段子也极少会在君臣之间出现吧？

魏晋时期，文人的绝妙表现还有很多，留下了无数闪光的言行。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广招文学之士，搜罗材料，润色整饰，编撰了《世说新语》。这本书为后人保留了魏晋风骨的绝佳素材。其自由、正直、宽容的魅力，吸引着后来者不断翻看这本书。书中的文人盛事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没有出现，在之后的隋唐两宋元明清更不可能出现了，正因为独特，才具有重要的欣赏和参考价值。

行政区划上的较量

—

两晋衔接期间，大批官民逃难到南方去，南方的司马睿势力百废待兴，问题重重。作为对诸多问题的回应，东晋王朝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政区制度：侨置郡县。

侨置郡县的起因很复杂。北方大乱，大批老百姓携家带小，举家甚至全族往南方逃难。逃难百姓的规模很大，北方各州都有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口迁出，涌向南方。在两晋衔接期间，估计南逃的人口占北方登记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如何安置众多背井离乡的百姓，成了摆在司马睿等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我们知道，中国人是最重乡土观念的。古代人多数一辈子都生活在本乡本土，流动性很小。他们的经济收入、人际网络、悲欢离合和祖宗坟墓都在故乡，如果没有实在扛不过去的困难是不会离乡逃难的。而一旦难民潮涌动起来，问题就层出不穷。逃难的百姓等于抛弃了家产和收入，与过去的经济和社会网络一刀两断了，他们靠什么生活？逃难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吃穿的问题？遇到困难，比如生病、兵火，找谁依靠？逃难过程中，难民如何处理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引发纷争。

两晋衔接期间的战乱有两大势力，除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就是各地风起云涌的流民武装——王弥、石勒等人的主要武装力量其实就是北方的汉族难民。司马睿之所以能在南方站稳脚跟，很大一个原

因就是依靠王敦、陶侃等人镇压了南方的多支流民武装，稳定了局势。可南渡的难民越来越多，总不能全部镇压吧！

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朝廷不妥善处理好流民问题，流民群体中的枭雄、大族，甚至个别野心家，就会抢先把流民组织起来，为自己所用。难民流动的时候，遇到问题和纠纷需要强有力的人物出来主持解决。这些人物一般是原来居住地的豪门大族，也有部分是能力出众的强人。他们就成了流民组织的领袖。东晋初期的祖逖、苏峻等人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他们一旦拥有了组织，就会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这一点也是朝廷不乐意看到的。

因此东晋王朝采取的方法是专门划出南方的土地来，安置流民。安置的目的是，即便不能让流民在南方安居乐业，最起码能让流民有饭吃，不揭竿而起。最初简单的安置行动，后来掺杂进了朝廷和贵族高官们的政治目的，于是发展为侨置州县。

朝廷有什么政治目的呢？东晋王朝以天下正统自居，却偏居一隅，失去了对天下主要领土的控制，地位非常尴尬。司马家族唯一可以炫耀的就是王朝正朔，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天下共主。但这个标准太主观了，匈奴人刘渊就说他是汉朝的外甥，他的祖先也曾是天下共主；赫连勃勃更绝，说他是夏朝大禹的后裔，他的祖先统治天下比任何人都早。因此，客观的领土大小，尤其是谁占领着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原、两京，就成了评判谁是天下正统的重要标准。

先后占领中原的两赵、两秦、燕国等统统不承认东晋是天下正朔，蔑称东晋是“司马家儿”“岛夷”“南国”。东晋因此要延续天下共主的架子，起码在形式上要维系对失地的“统治”，就想到了在安置北方南下流民的同时，“恢复”北方的政权形式：有北方的百姓、有政权形式，还可以对北方领土宣示主权。于是，东晋划出一块南方的土地安置幽州流民，就恢复幽州的郡县名称；安置山东流民，就用原来的山东郡县来称呼本地。这些州、郡、县因为不是本土，所以被称为侨

州、侨郡、侨县。

对于北方政权新立或改名的州、郡、县，南方绝不侨置，或者沿用旧名，以表明对北方政权的否定。

除了宣示正统和主权外，侨置州县还可以和北方政权争夺人口。北方政权一般得不到汉族百姓的认可。当汉人知道南方有同乡重建了故乡的郡县，那里有乡音、乡俗和故乡的街巷里弄时，他们很自然愿意逃离北方政权的统治，投奔东晋侨置的州县。侨置州县在实践中吸引了人民持续南渡，增强了东晋的实力，弱化了北方政权的力量。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人口可是决定国力的关键因素，重要性并不亚于领土。在这个较量中，东晋占据着优势。

高官显贵们又有什么政治目的呢？东晋朝廷的掌权阶层是北方南渡的世族豪门。他们以门第相互标榜，门第和政治地位直接挂钩：出身豪门的子弟垄断高官，普通人家的子弟只能在中低级职位上徘徊。而地望是表明门第贵贱的主要标准。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

南渡的北方豪门起初也很尴尬，比如，琅琊王氏失去了“琅琊”还算是琅琊的王氏吗？陈郡谢氏离开了“陈郡”又如何保证家族的门第纯洁？因为郡望和政治利益紧密相关，南渡世族们还以沦陷的旧地名自称。安置流民的同时，恢复旧式的政权，符合南渡世族的利益。他们热衷推动侨置州县的建立。

凡此种种，就是东晋侨置州县的特殊背景。司马睿南迁时，琅琊百姓随司马睿过江的有一千多家。太兴三年（320），司马睿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流民。咸康元年（335），晋成帝司马衍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琅琊王氏就

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琊郡也侨立临沂县（还是在江乘界内）。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

二

口子一开，“一时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至数百”。东晋在名义上还拥有对天下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侨置州县制度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利弊并存。

首先，州县的侨置和流民人口的多少直接相关。北方百姓南逃的大致情况是离江南比较近的黄河南岸百姓南迁比较多、黄河以北和西北地区的百姓逃到江南的不多。侨置之初，东晋设置了各州政权，后来因为幽州（今河北北部、京津一带）、冀州（今河北大部 and 河南北部一带）流寓江南的人口较少，便废除了这两个侨州。而兖州、豫州、徐州诸州（都在今河南、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南渡的流民较多，州级建制始终存在。具体到郡县，情况也类似，流民较多的地区，侨置体系比较完备。

其次，侨置州县的名称、隶属关系越来越复杂。南北都有琅琊郡，怎么区别呢？最常用的方法是在南方的琅琊郡前加一个“南”字，以示区别，比如“南琅琊”“南徐州”等。后来东晋北伐，一度收复了青、兖、徐、豫、司、雍等州，就在新收复郡县上加“北”字，以示区别。侨置的西北、四川地区的郡县，则互加“东”“西”以示区别，比如“东冯翊”“东弘农”等。这还算是侨置州县最简单的冠名法。至于一郡一县百姓侨寄数处，分别设置州县；又比如郡县沦陷，于是侨置，后经收复，又再沦陷，反复侨置；再比如北方州县因为百姓逃难已经被取消、合并或重新组成，原郡县无处可觅，南方侨置郡县依然存在，等等。州县名字只能越来越复杂。

隶属关系就更复杂了。侨置郡县分散在原来南方各郡县内部，往往是南方某地侨置了东南西北数个地名，所以不可能像原来那样隶属，于是就出现了有的侨置郡县隶属南方州郡管辖，有的南方郡县属于侨置州县管辖；有的侨置郡县虽然还照搬原来的隶属关系，但管辖的郡县分处多块飞地；有的侨置州郡下辖郡县，并非原来郡县，而是其他州郡侨置的。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标准举个例子：“南山东省”管辖“南青岛”“南威海”“南泰安”“东宝鸡”四个地方，其中“南青岛”位于江西，“南威海”“南泰安”和“东宝鸡”位于福建，而“南山东省”的治所却在江苏。而朝廷又要把浙江的嘉兴、湖州两个南方原来的政区划归“南山东省”管辖。这是不是人为制造了行政区划的混乱？然而，出于政治和现实利益的考虑，侨置政区日渐纷乱又是迫不得已的。

于是，侨置郡县和南方州县、侨置流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日渐激烈。侨置州县的本意是借土寄寓。南方郡县的土地被拆分，自然心有不忍。随着行政区划日渐纷乱复杂，侨州郡县分割南方州郡县实土越来越严重，部分南方郡县还改隶于侨州郡。部分北方强盛世族“反客为主”，甚至裁撤南方郡县来侨置自己的乡土故郡。这些难免引发了南方郡县的反感。

为了安置和吸引流民，东晋对侨置郡县的百姓另行登记，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不算正式编户，不承担国家调役。如此一来，南方土著人口则要承担越来越重的税赋和徭役，于是土著和侨人的关系也开始恶化。随着土著居民的躲避和世家大族侵吞人口，朝廷能控制的户籍人口越来越少。因此东晋出现了多次“土断”：清查户口，将侨人改变为编户，承担国家赋役。流民在南方定居多年，事实上和土著居民的差别越来越少，所以土断成果不错。东晋朝廷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财阜国丰”。土著居民和侨人的关系也得到了调和。但因为部分侨人的反对和世家大族的阻挠，也因为陆续有新的北方流民南下，东晋历次土断都不彻底。之后的南朝还是要面对侨人和土著居民的户籍问题。

最后，侨置州县制度为南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遭到了北方的激烈反对。北方人南渡，带来了北方相对高级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的灌溉、蓄水、防洪、运河等水利工程不断修筑，土地也不断得到开发，江南的经济实力趋向强盛。这为隋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转移到江南奠定了基础。相对来说，南方的强盛就是北方的衰落。北方政权对东晋南朝自恃正统、侨置州郡县、吸引百姓的做法极为反感。

《魏书·韩显宗传》记载：“显宗上言：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谓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韩显宗的上书，指出了南方政权打肿脸充胖子、政区纷乱复杂等问题，也验证了侨置州县的客观效果对北方影响很大。北方政权也在边界地区侨置南方州县，想吸引南方百姓北逃，可惜效果很不理想。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口大致上是从北向南移动的。

侨置州县越来越多，造成政区繁杂，导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隋朝统一南北后，开始重新划定政区，大举并省州县，并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这才彻底根除掉侨置州县问题。

三

最后说一下魏晋时期各国的疆域问题。

首先，各国疆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经常变化，我们只能指出它们大致的疆域所在，而做不到精确的表述。

三国时期，曹魏和吴蜀基本上沿着淮河、秦岭一线对峙，其中曹魏在中部突入到现在的湖北中部一带；而东吴和蜀汉基本沿着现在的

三峡、贵州东部、广西西部一带对峙。

东晋和北方对峙时期，南北分界线变化无常，极是复杂，大致上是沿着淮河、秦岭一线南北移动，最南移动到长江沿线，最北推进到现在的黄河北岸。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历代，比较稳定的疆域范围，北抵淮南、江北，东及东海，南达南海兼有交趾。比较特殊的是巴蜀和汉中地区，先是被成汉占领，后为东晋收复；后来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继为东晋叛乱的地方官谯纵割据，到东晋末年被重新收复。

南方疆域最大的时期是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时期。刘裕平南燕、灭后秦，收复山东、关中等地，使得东晋疆域北抵黄河，西到陇西，范围之大，不仅居东晋之首，而且为东晋南朝二百七十余年间所仅见。不过这一盛况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关中很快沦陷，河南、淮北也逐渐为北魏所侵夺。到南朝时，南方疆域又恢复到东晋原有的版图。

其次，在军事对峙上，北方占据优势，南方基本采取守势。从东吴到东晋，再到之后的宋、齐、梁、陈都是如此。南朝对北方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发挥水师和水战的优势，对抗北方骑兵。当年的赤壁大战，南方就是这样取胜的。在经济和武备方面，南方均弱于北方，因此南方政权高度重视防守，高筑墙、广积粮，修建了一系列军事重镇。寿阳、合肥、历阳、广陵、京口、襄阳、樊城、武昌、浔阳等城市的兴起，都是出于军事的需要，驻扎着南方军队的主力。

比较特殊的还是四川地区。四川地区在地势上处于江南和两湖的上游，俯视后者，更要命的是它分割了南方的长江天险。所以灭南方者必先夺取四川，比如西晋灭吴；守南方者必先寻求保全四川，比如东晋历次都是先收复四川，才能北伐成功。

魏晋人怎么过日子

魏晋时期的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东西？魏晋时代社会风俗如何，他们过春节吗？魏晋人的生活负担如何？他们读书写字吗，又用什么写字呢？

这些都涉及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讨论魏晋人的生活，必须分清两个断层：因为南北分裂局面的存在，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生活是不同的；又因为社会分等级，贫富差距巨大，贵族和普通百姓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

贵族们引领了魏晋豪奢的社会风气。几万钱吃一顿饭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杀一头牛就为了尝一口牛心的味道，熏衣粉面走路都需要佣人扶持，这些都是典型的贵族生活场景。魏晋盛行厚葬，富人陪葬品丰厚，客观上也助长了盗墓的风气。乱世中枭雄特别喜欢盗掘魏晋坟墓，不知道魏晋贵族们知道后做何感想。石崇的斗富、王济的金沟，后人大可以批评他们的浪费，批评他们豪奢误国。魏晋贵族阶层发展为门阀世族后，都非常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日常言行务求文雅，喜欢玄学清谈和诗文唱和，其中固然有矫情和寄生的成分在，但客观上推动了魏晋文化的发展。琅琊王氏子弟王筠曾说：“世传安平崔氏、汝南应氏等家族相继以文采著称，可他们不过传了二三世而已，不像我们王家，七代以来人人有文集，文化昌盛。”王家七代人的文集肯定有水分在其中，可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门阀世族对文化教

育的重视。比如颜之推就提醒世族子弟们不要放松学习：“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的观念颇具代表性，世族们认为文化层次的高低也是区别豪族和寒门的一大标准，文化教育维持门第的一大利器。

魏晋的世族子弟都具备相当的文化层次，使得书声在乱世中朗朗不绝。玄学的发展带动了思想的活跃和进步，这也得感谢世族文化。如果不是衣食无忧，谁还会整天清谈？尽管清谈于时局和现实无补，谈话者却谈出了境界，活出了精神。比如同样是酗酒，刘伶喝醉了就能说出“死便掘地以埋”的话来。而同样是喝水，晋代的士人就知道把水烧开了然后加上南方的茶叶泡茶喝。喝茶开始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南方的制茶业也因此发展。

世族子弟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读书、会客、清谈、酗酒、喝茶，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之有天壤之别，够得上“悲惨”标准。

门阀世族的富庶豪奢并不代表魏晋整个时代的富裕，事实上魏晋因为战乱，总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贫困时期。两汉已经相当发达的货币贸易退化为了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战乱直接影响到商业，使之衰落，土地荒芜，百姓困苦，以实物交换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兴起，成为魏晋时期经济形态的主流。用来当作货币的实物，以谷米麦粟等农产品以及绢布绫绵等布帛为主。也就是说，魏晋时期的普通人不知道货币为何物。他们计算家产和税负的标准是：张三的家产值几头牛？李四的田地今年能收多少石麦子？我到秋天应该交给官府多少匹绢？

建安九年（204），曹操正式颁布以实物纳租缴税的法令，为魏晋南北朝的租税制度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的男子，从十六岁到六十岁为正丁，都需要交纳赋税，两端的年龄为次丁，部分项目可以减半。女子出嫁者为丁，没有出嫁以二十岁为界限，都要像正丁一样缴税服役。而两晋的税赋项目特别繁多，非常苛刻。最要命的是，税赋没有成文的规定。凡是军国大事所需物品，或者是地方上出产的特

产，都可能成为朝廷征收的对象。也就是说，老百姓生活在没有压迫标准的环境中，随时都可能被官府盘剥压榨。

普遍的贫困导致了贸易的萎缩，依赖贸易成长起来的城市规模都不大。北方最主要的城市是洛阳。洛阳作为魏晋的都城，虽然多次被战乱毁坏，但因为是黄河北贸易以及西域和中原贸易的主要场所，很快得到了恢复，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最大的都市。南方最大的都市是建康，因为它既是东吴、东晋和南朝四代的首都，又坐落在江南经济区域的中心。其他比较大的都市，多数是军事重镇，因为驻军或者屯田而发展起来的。典型的如南北拉锯地带的襄阳、寿阳、广陵等城市。又如山东的广固，建立的时间很短，山东各地因为遭战乱，被反复扫荡，已成一片废墟，但广固竟然迅速崛起为山东的大都市，而人口则始终只有几万人。由此可见战乱和贫困制约了魏晋时期城市的发展。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口极少，几乎都是军人、官吏、贵族和为他们服务的奴仆、工匠等。

有限的贸易集市也被官府牢牢把握。贪官污吏争相担任司市的官职，从中营私舞弊，常常向老百姓强买强卖，甚至抢劫货物。大富豪石崇就是靠抢劫商户发达起来的。

老百姓不堪负担，或卖妻卖儿，或逃入江湖山谷，采草叶为食。编户大量逃亡，朝廷控制的人口持续减少，在编百姓负担越来越重。

如果一个人是汉族人，他是生在北方比较幸福，还是生在南方比较惬意？

南方百姓负担非常重，且社会层级越来越僵化，门阀世族垄断政权，社会流动性很差。但好处是南方的政权相对北方来说要稳定得多，上层的争权夺利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下层老百姓的生活。

北方百姓的负担比南方同胞要轻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政权更迭拉锯频繁，官府统治相对薄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北方政权普通不

信任汉族人，军队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不武装汉族人，这就让多数汉族人不用服兵役了。当然，生活在北方最大的坏处是战争太频繁，生命得不到保障。北方出现了许多汉族人的坞堡，大家聚集在本地豪族或者强力人物周围，建立武装村落集中生活，在堡垒周围耕种，遇到战乱就自我武装起来自卫。坞堡的武装效果很明显，少数民族政权对这些自卫村落相对客气，不时还笼络坞堡的头面人物做官。

生活在北方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因为反复战乱，北方政权取得了大量无主的荒地和弃田，没收为国有，奖励或者分配给流民耕作。南方的自耕农数量大大小于北方，因为南方土地归属比较固定。即便是政府划出来安置流民的侨置州县，土地也是国有，只是出租给流民耕种而已。

南北在饮食上也很不同。北方人的粮食以豆麦为主，多用来做饼；南方人则以大米为主，多用来做米饭或者粥。不论南北，平民基本没有佐餐菜肴，能以盐泡菜佐餐就不错了。肉食在魏晋普通人家的餐桌上极为罕见。北方畜牧业比南方发达，北方人的肉食比南方人多，以牛羊为主。南方人的肉食以鹅鸭鸡鱼为主，另外猪也成了南方人的肉食对象之一。

南北方在穿戴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大致是北方胡化严重，南方基本保留汉族的峨冠博带。不过南北方的布料多数都是麻布。在日常用品中，低矮的胡床出现，开始改变汉族人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纸张也在魏晋得到大发展，麻纸的产量很高。到南北朝时期，纸张代替了竹简，成为日常文书的主要工具。

总之，不论是生活在南方还是北方，除了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阶层外，老百姓的生活是既贫苦又悲惨的。

魏晋风俗的鲜明特点是节日增多，人们在节日庆祝上增加了浓厚的喜庆、快乐和自我陶醉的情感。毕竟现实社会太残酷了，战争和贫困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人们开始在现实之外寻找寄托。节日就成了百姓寻找精神寄托的载体之一。节日可以为人提供精神放纵和寻找快乐的机会。庆祝节日时的短暂欢娱，可以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平衡，求得心理上的补偿。一年之中，春节是南北方最隆重的节日，祭神、敬天等活动始终不变。接着就是元宵节，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三月三日江南要过上巳节，除了祭祀祈求驱灾避祸之外，陆续发展出河畔嬉戏、男女相会、江边洗濯、赏花观水等活动。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过修禊节。接着就是清明、端午、乞巧、重阳、腊日、除夕等。这些节日发展到魏晋时期，被加入了许多内容，有的干脆转变了节日方向。

比如魏晋时男子加冠礼开始用音乐伴奏。又比如魏晋时期开始盛行抓周礼，婴孩满周岁的时候由长者给他戴长命锁或平安符等，祈求宝宝长命百岁，此生幸福，并且摆出许多物件让婴孩去选，以此来预测他的前途和性情。再比如滥觞于史前的雉仪，原本是四季驱邪逐疫的仪式，到魏晋时发展为雉戏，仪式中加入了娱乐成分，出现了乐人扮演的神主、神兽等角色。

最典型的喜庆例子就是端午节真正成为一个节日。魏晋以前，五月初五这一天被视为带着神秘恐怖气氛的日子。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恶日，相传这天邪佞当道，五毒并出。东晋末年的名将王镇恶就是因为是五月初五生的，家人竟然不想要这个孩子，要把他送入。所以，五月初五当天，人们都要避邪、驱毒，并没有与屈原联系起来，更没有娱乐和喜庆色彩。

魏晋时期，五月初五开始被称为端午。梁宗懌（lǐn）《荆楚岁时记》记述魏晋端午节的习俗：“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

忌盖屋……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于户上，以禳毒气……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鹁鸽，教之语。”可见当时端午已经发展出丰富的习俗，包括：踏百草、采艾叶做成人形悬于门户以禳除毒气、用菖蒲做菖蒲酒、龙舟竞渡、采药等。这些习俗由避邪、驱毒发展而来，又明显加入了游玩娱乐色彩。当时还有抓八哥幼鸟教它说话以供娱乐的活动。

在南方，流民们离乡背土，反而更加珍惜汉族的传统节日，将它们完整保存并留传了下来。而北方的传统节日和一些习俗，却没有像南方这般保留完好。大量少数民族的习俗开始进入北方人的日常生活。

魏晋历史年表

注：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之前，魏、蜀、吴三国年号并用；280年以后都是两晋的年号。

帝王纪年 公元纪年 历史事件

魏黄初元年 220年 正月，曹操死，曹丕袭爵，嗣为丞相。十月，曹丕称帝，是为魏文帝。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汉亡。建国号魏，都洛阳。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九品中正制。

蜀章武元年 221年 刘备称帝，是为汉昭烈帝。国号汉，世称蜀，都成都，以诸葛亮为丞相。刘备率兵东进，攻孙权。夷陵之战爆发。孙权接受魏国封号，称吴王于武昌。

蜀章武三年 223年 刘备死，太子刘禅即位，是为蜀后主。诸葛亮辅政，遣邓芝使吴修好，共抗曹军。南北对峙格局固定。

魏黄初五年 224年 魏文帝曹丕攻吴，至广陵，临江而还。

魏黄初七年 226年 魏文帝曹丕死，太子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

蜀建兴六年 228年 诸葛亮兵出祁山攻魏，魏国破蜀军先锋马谡于街亭。此后两国在西边战事不断。

吴黄龙元年 229年 吴王孙权称帝，是为吴大帝。国号吴，迁都建业。

吴黄龙二年 230年 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过海达夷洲。

蜀建兴十二年 234年 诸葛亮卒于五丈原，司马懿取得对蜀战争的巨大胜利。

魏景初二年 238年 司马懿攻辽东，杀公孙渊于襄平。

魏景初三年 239年 魏明帝曹叡死，齐王芳即帝位，太尉司马懿、宗室曹爽辅政。

魏正始元年 240年 玄学开始产生，以何晏、王弼的“正始学派”为代表。

魏正始九年 248年 嵇康寓居山阳竹林，吸引志同道合者清谈。竹林七贤形成。

魏嘉平元年 249年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杀曹爽、何晏，遂专魏政。

魏嘉平三年 251年 魏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于淮南起兵反司马懿，兵败被擒自杀。

吴太元二年 252年 孙权死，太子孙亮即位。

吴建兴二年 253年 吴孙峻杀诸葛恪，任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专吴朝政。

魏嘉平六年 254年 司马师废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

魏正元二年 255年 魏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起兵讨司马师，失败

被杀。

魏甘露二年 257年 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次年失败被杀。

吴太平三年 258年 吴丞相孙綝废孙亮为会稽王，立孙休，是为吴景帝。孙休杀孙綝。

魏甘露五年 260年 曹髦率军讨司马昭失败被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是为魏元帝。

魏景元四年 263年 司马昭命邓艾、钟会攻蜀，后主刘禅降，蜀亡。

吴永安七年 264年 吴景帝孙休死，孙皓立。

泰始元年 265年 八月，司马昭死，子司马炎即晋王位。十二月，废魏主称帝，是为晋武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司马炎大封宗室诸王。

泰始二年 266年 晋罢农官，所统悉属郡县。至此，曹魏屯田前后七十年。

泰始八年 272年 夏天，东吴镇守西陵的步阐投降晋朝。晋吴展开西陵战役，东吴大将陆抗顶住了晋军的进攻。

咸宁五年 279年 西晋以贾充为大都督，大举分道伐吴。

太康元年 280年 晋灭吴，统一全国。西晋颁布户调式，包括占田课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户调按九品混通的原则征收。从太康元年到太康十年的十年被艳称为“太康繁荣”。

永熙元年 290年 晋武帝司马炎死，晋惠帝司马衷立，立贾充之女贾南风为皇后。晋武帝杨皇后父杨骏辅政。西晋以刘渊为匈奴五部大

都督。

元康元年 291年 贾南风杀杨骏，又杀汝南王司马亮及楚王司马玮；八王之乱开始。

元康六年 296年 氐人齐万年起兵于关中。

元康八年 298年 关中连年饥荒，巴豪酋李特率流民入蜀。

元康九年 299年 江统著《徙戎论》，提出将氐、羌等族徙离关中。

永康元年 300年 赵王司马伦杀贾南风。

永康二年 301年 张轨据河西，求为凉州刺史。赵王伦废惠帝自立，齐王司马冏等起兵杀伦，惠帝复位。司马冏专政。四川流民起义大爆发。流民推李特为首，起兵于绵竹，进攻成都。

太安二年 303年 李特入成都，旋为益州刺史罗尚所杀。李雄再攻下成都。张昌、石冰起义爆发。五月，张昌起义于安陆，占据江夏，攻襄阳，别帅石冰东进。

永安元年 304年 李雄称成都王，建成汉。匈奴刘渊在左国城即汉王位，建国号曰汉。十六国开始。河间王司马颙逼晋惠帝西迁长安。

永兴二年 305年 右将军陈敏于历阳起兵造反，建立楚政权，一度得到江南世族支持。陈敏叛乱持续到307年才为陶侃所败。

永兴三年 306年 东海王司马越挟晋惠帝还洛阳。晋惠帝中毒而死，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并州饥荒，诸将率吏民就食冀州，号为“乞活军”。

永嘉元年 307年 琅琊王司马睿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和王导等人迁徙建邺。此后大批中原官民迁徙南方，史称“永嘉南

渡”。

永嘉四年 310年 刘渊死，太子刘和即位。刘聪杀刘和自立。

永嘉五年 311年 荆湘流民推杜弢为首，据长沙起义。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西征，和各方争夺长江中游。刘曜攻下洛阳，杀吏民三万余人，挟晋怀帝至平阳，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七年 313年 刘聪杀怀帝，秦王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

建兴四年 316年 刘曜进兵关中，愍帝降，被送至平阳，西晋亡。

建武元年 317年 琅琊王司马睿即晋王位，史称东晋。祖逖北伐，陆续恢复河南地区。

太兴元年 318年 晋王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建都建康。刘聪病死，太子刘粲即位，旋为靳准所杀，汉亡。刘曜发兵攻靳准，自立为皇帝。

太兴二年 319年 刘曜徙都长安，改国号赵，史称前赵。石勒自称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周访最终平定荆州。司马睿势力基本控制了南方。

太兴四年 321年 祖逖病逝，北伐事业中断。

永昌元年 322年 王敦起兵武昌，攻入建康，还屯武昌，遥制朝政。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晋明帝司马绍即位。

太宁二年 324年 晋明帝司马绍下令讨伐王敦，王敦以兄王含为元帅攻建康，王敦病死，兵众溃散。

太宁三年 325年 晋明帝司马绍病死，只有二十七岁。太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晋成帝。外戚庾亮掌权。

咸和三年 328年 苏峻、祖约之乱爆发。

咸和四年 329年 后赵出兵攻占上邽，杀太子刘熙，前赵亡。

咸和五年 330年 东晋始行度田收租制，亩税三升。后赵石勒称帝。

咸和八年 333年 夏，石勒病死，太子石弘即位。石虎掌握后赵实权，第二年废石弘，自称天王。

咸康元年 335年 后赵迁都于邺。

咸康三年 337年 鲜卑慕容皝称燕王，建燕国，史称前燕。

咸康四年 338年 鲜卑拓跋什翼犍继代王位，建代，定法律。成国李寿自立，改国号为汉。

咸康七年 341年 晋诏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

咸康八年 342年 晋成帝司马衍病死，同母弟弟司马岳即位，是为晋康帝。

建元二年 344年 晋康帝司马岳死，其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

永和元年 345年 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取代庾氏获得长江中游的兵权。

永和三年 347年 桓温灭成汉。

永和五年 349年 后赵石虎死。北方大乱。后赵谪戍凉州的东宫卫士十余万人在关中起义。辽东慕容鲜卑大举进攻后赵，开始觊觎中原。

永和六年 350年 冉闵灭后赵，自立为帝，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华北民族大仇杀。

永和七年 351年 苻健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永和八年 352年 前燕慕容俊灭冉魏，遂在蓟称帝。

永和十年 354年 桓温北伐前秦，军至霸上，逼近长安，后主动退兵。

永和十二年 356年 桓温第二次北伐，入洛阳，留兵戍守而还。

升平元年 357年 前秦苻坚通过政变上台，称大秦天王，汉人王猛辅政。前燕迁都于邺。

升平四年 360年 前燕慕容俊病死，太子慕容暉即位。

升平五年 361年 桓温派兵破燕军，取许昌。晋穆帝司马聃病逝，堂兄司马丕即位，是为晋哀帝。

兴宁二年 364年 东晋核查户口，令所在土断。

兴宁三年 365年 晋哀帝司马丕中毒而死，其弟司马奕即位，是为晋废帝。

太和四年 369年 桓温率军五万北伐前燕，至枋头粮尽，撤退，大败。

太和五年 370年 前秦灭前燕。

咸安元年 371年 桓温废黜司马奕为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宁康元年 373年 简文帝死，谢安联合王坦之、王彪之等人拥戴司马曜即位，是为孝武帝。桓温引兵入朝，在新亭为谢安阻止。夏天，篡位失败的桓温病死。

太元元年 376年 前秦灭前凉、灭代。晋废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在役者免。

太元二年 377年 东晋谢玄建北府兵。

太元八年 383年 晋秦淝水之战，前秦大败，内部分崩。

太元九年 384年 鲜卑慕容垂称燕王，后燕开始。慕容泓称济北王，建立西燕。羌族姚萇在渭北起兵，称万年秦王，史称后秦。

太元十年 385年 西燕慕容冲称帝，入长安。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筑勇士城为都，史称西秦。后燕慕容垂定都中山。前秦苻坚被后秦姚萇缢死在新平佛寺。谢安死，司马道子父子开始先后在东晋专政。

太元十一年 386年 鲜卑拓跋珪称代王，都盛乐，改称魏，北魏开始。后秦姚萇入长安，称帝。吕光称凉州牧、酒泉公，都姑臧，后凉开始。

太元十九年 394年 后燕慕容垂攻破长子，杀慕容永，西燕亡。前秦苻登为后秦姚兴所杀，前秦亡。

太元二十年 395年 北魏在参合陂大败后燕。

晋太元二十一年 396年 孝武帝司马曜遇害，司马道子扶持司马德宗为帝，是为安帝。后燕慕容垂御驾亲征北魏，中途而亡。

隆安元年 397年 东晋王恭第一次起兵，得到荆州等地响应。鲜卑秃发乌孤称西平王，筑廉川堡为都，南凉开始。

隆安二年 398年 王恭第二次起兵，北府兵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参与王恭起兵的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三人结盟自保，桓玄被推为盟主。慕容德自立为燕王，史称南燕。鲜卑族拓跋珪迁都平城，称帝，是为魏道武帝。

隆安三年 399年 东晋征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引起反抗，孙恩起义爆发。名僧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往天竺求经。

隆安四年 400年 桓玄出任都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后将军，兼任荆江两州刺史。李晟自称凉公，都敦煌，西凉开始。

隆安五年 401年 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州牧，史称北凉。后秦姚兴迎名僧鸠摩罗什至长安。孙恩起义军逼近东晋首都建康，被刘裕等人所败。

元兴元年 402年 正月，司马元显讨伐桓玄。北府兵刘牢之倒戈，桓玄攻破建康，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势力被铲除。桓玄杀刘牢之。孙恩攻临海，败死。妹夫卢循继统其众。

元兴二年 403年 桓玄废晋安帝，自称帝，国号楚。后凉降于后秦。

元兴三年 404年 刘裕自京口起兵讨桓玄，桓玄挟安帝还江陵，后败死。卢循攻陷番禺，第二年接受东晋的任命，出任广州刺史。

义熙元年 405年 刘毅破江陵，迎晋安帝还建康。陶渊明挂冠而去，开始隐居生活。

义熙三年 407年 刘裕入朝，开始专断东晋朝政。赫连勃勃称大夏天王，夏政权开始。后燕将领冯跋杀君主慕容熙，后燕亡，北燕建立。

义熙五年 409年 刘裕北伐南燕，围广固。

义熙六年 410年 刘裕破广固，南燕亡。卢循、徐道覆北进，攻长沙、豫章等郡，进逼建康，为刘裕所败。

义熙七年 411年 卢循败死。至此，孙恩、卢循起义遂告结束。

义熙八年 412年 刘裕消灭刘毅。东晋以朱龄石为元帅，领兵进攻割据四川的谯纵。法显航海回国，次年至建康，著有《佛国记》。

义熙九年 413年 刘裕主持“义熙土断”。七月，谯纵自缢而亡，四川重新进入东晋版图。

义熙十年 414年 西秦袭取乐都，南凉亡。

义熙十二年 416年 二月，后秦姚兴去世，姚泓即位。刘裕北伐后秦。

义熙十三年 417年 刘裕北伐入长安，姚泓投降，后秦亡。刘裕留兵驻守长安，自回南方争权。

义熙十四年 418年 赫连勃勃攻陷长安，称帝。

刘宋永初元年 420年 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

十六国兴亡表

国名	创建人	民族	公元年代	灭于何国
汉、前赵	刘渊	匈奴	304—329	后赵
成汉	李雄	巴氐	304—347	东晋
前凉	张寔	汉	317—376	前秦
后赵	石勒	羯	319—351	冉魏
冉魏	冉闵	汉	350—352	前燕
前燕	慕容皝	鲜卑	337—370	前秦
前秦	苻洪	氐	350—394	后秦
后秦	姚苌	羌	384—417	东晋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384—407	北燕
西燕	慕容泓	鲜卑	384—394	后燕
西秦	乞伏国仁	鲜卑	385—431	夏
后凉	吕光	氐	386—403	后秦
南凉	秃髮乌孤	鲜卑	397—414	西秦
南燕	慕容德	鲜卑	398—410	东晋
西凉	李暠	汉	400—421	北凉
夏	赫连勃勃	匈奴	407—431	吐谷浑
北燕	冯跋	汉	407—436	北魏
北凉	沮渠蒙逊	匈奴	397—439	北魏

南北朝

帝国黎明前的
生存启示录

——
张程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北朝：帝国黎明前的生存启示录 / 张程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1

ISBN 978-7-201-16757-2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 - 南北朝时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3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9003号

南北朝：帝国黎明前的生存启示录

NANBEICHAO: DIGUO LIMING QIAN DE SHENG CUN QISHILU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刘庆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总 策 划 赵 易

策划编辑 韩 笑

责任编辑 金晓芸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制版印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379千字

版次印次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自序 大分裂时代下的绝望与希望

身逢乱世，如何生存？南北朝可能是最大的案例库、最好的试验场。

一个北方老百姓，不是牺牲在鲜卑人的铁骑之下，就是辛苦劳作的成果为乱兵劫掠一空——北朝早期不发官俸、各军自筹粮饷。

一位江南的农夫，不是筚路蓝缕开发荒凉的处女地，就是寄身于豪门世族的庄园，耕耘、采摘，制作庄园主的种种所需。

南北朝自刘裕代东晋建立刘宋（420）始，至隋朝灭陈统一全国（589）而终。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因为南北方政权大致沿着江淮与秦岭一线对峙而得名。南朝有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个朝代；北朝前期由北魏统一，北魏后分裂为东魏、西魏，二者又各自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南方四个朝代和北方五个政权长期维持均势。

每个个体，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是大分裂时代的蝼蚁。

南北朝延续了魏晋的混乱，如果要追溯源头，种子在西晋末年戎狄大批涌入黄河流域时就已经种下。北朝基本是少数民族的天下，五个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

近一百七十年间，中国从南北对峙、北方分裂走向大一统的盛世，期间难以确数的皇冠落地，权贵身首异处、血肉横飞；烽火硝烟

起了又散，散了又起，多少生灵涂炭；几代人背井离乡，走向希望和危险并存的未知地域。北方游牧民族跳下马背，来到黄河岸边置地耕耘，中原汉族百姓则携家带口，深入长江以南的蛮荒之地，继续向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读书人则梦想实现个人价值、继而国泰民安，而最高统治者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天下一统的追求。美好的梦想，是乱世中最耀眼的光，虽然一再遭到残酷现实的打击，却支撑了当时无数人的人生，让他们能够冲出动乱，挺立在严冬之中，并且穿透千年尘埃，闪耀到了今日。

汉族、鲜卑族和其他众多民族在争斗杀伐中不断融合。从服饰语言到思想观念，最终都在熔炉一般的中原大地锻造成相同的身影。南北朝，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破坏的同时进行建设。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汉化，是这个潮流的关键词。他的汉化是全面的、彻底的、激进的改革，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如今，显赫一时的匈奴、鲜卑等民族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看似无迹可寻，但他们的历史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如今中华儿女身上流淌的基因之一。

脱胎于魏晋的世家大族，到南北朝时膨胀为门阀豪强。门阀势力的不可侵犯，是身逢南北朝的人必须面对的另一个现实。南北朝是一个在社会结构上“试错”的时期。世袭门阀在南北朝稳固发展，世家大族垄断政权、霸占肥田良产。政治保障经济，并且公权力世袭化，传子及孙。出身打倒一切，将能力、品德、功绩等踩在脚下。世族子弟不劳而获，富贵一生；寒门之后终日奔波劳累，为生计发愁。中国社会的等级开始固化，冻结了社会的流动性。

南北朝的门阀制度表面上登峰造极，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清要显贵的官职都被世族子弟占据，实职实权却渐渐流入寒族子弟的手中。后期，出身卑微的人才越来越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实现飞黄腾达。世族门阀势力的衰弱已成事实，这个制度也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得以创建，公开选才取代了门阀世袭。科举制是中国的又一大发明，可算是在南北朝门阀制度“试错”之

后的正确创举，保障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各阶层间相对的公平公正。

人始终是历史最活跃的要素，是历史的创造者。无数的蝼蚁也能塑造历史的新面相。

无论是在枪林箭雨中博取荣华富贵的赳赳武夫，还是凭借兢兢业业而掌握实权的刀笔小吏，抑或是幸运地躲进桃花源的编户小民，他们都缓慢却持续地塑造着历史，为新的大一统的到来积蓄能量。

目录

自序 大分裂时代下的绝望与希望

第一章 拓跋家族强盛史

主角是这样炼成的

统一不能只靠拳头

最后一个史官

千古一后冯太后

到洛阳去，到汉人的地方去

挡我汉化者死

第二章 刘宋王朝

草根皇帝奋斗史

权力场中的君臣际会

元嘉之治，不过如此

战场有风险，北伐需谨慎

皇族大逃杀

骨肉相残何时休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第三章 南齐精神病家族

七夕夜弑君事件

刘宋王朝的背水一战

书呆子斗不过实干家

爷爷夺了孙子的皇位

终极怪胎到底是谁之过

防卫过当的萧衍

第四章 南北拉锯战

盛极而衰，谁都不能例外

躲不过的南北拉锯战

战火过后，没有赢家
成也太后，亡也太后
内忧外患的北魏，终于分裂了

第五章 小人物大变局

六镇起义：大动乱中的小人物
河阴之变是如何酿成的
龙椅前的尔朱荣
战神传说
小皇帝手刃大权臣
高欢异军突起
一次逃亡导致的帝国分裂

第六章 北魏分裂殃及南梁

两魏争锋，神仙打架
战争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癫狂高洋与傀儡羔羊
傀儡皇帝不是好当的
“佛门天子”
昭明太子之死
八百残兵能做什么
是侯景太厉害，还是南梁太窝囊

第七章 天下分久必合

在权力面前，亲情又算什么
自己挖坑埋自己
如何看待陈朝的篡国
北齐为什么会失败
又是统一
又是政变
金陵王气黯然收

第八章 南北朝的边角料

王羲之父子

谢灵运之死

旧时王谢堂前燕

佛教是如何在中国站稳脚跟的

南北朝官场里的“临时工”

南北朝历史年表

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示意图

第一章 拓跋家族强盛史

主角是这样炼成的

—

谈到南北朝，首先要来认识一下它的主角拓跋部落。

拓跋部和魏晋时期建立五个燕国的主角慕容部一样，都属于鲜卑族，都发源于东北地区。和慕容鲜卑的“少年得志”不同，拓跋鲜卑在历史上长期“跑龙套”，直到南北朝时期才熬出头。

拓跋鲜卑作为中国的古老民族，可能发源于现在东北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附近的地区，后来南迁。拓跋部的迁徙，不是渐进的、松散的，而是所有部落人民集体性地彻底迁走，因此事后难以确定他们最初的居住地。等拓跋部发达后，《魏书》上说他们祖上发源于大鲜卑山，在山上凿有石室作为祖宗之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tāo）还曾派人去祖宗发源地祭祀，《魏书》还抄录了祭祀的祝文。

后人对拓跋部的发源地始终有争论，直到1980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嘎仙洞内发现的石刻铭文，与《魏书》所记载的祝文完全相同，才证明嘎仙洞就是拓跋部落的祖宗之

庙，而大鲜卑山就是现在的大兴安岭。当时，拓跋部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组织形式。

南方温润的气候和丰饶的物产，对远处大兴安岭的拓跋部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东汉时期，恰好占据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被东汉打败西迁，空出了一大片无主的土地。拓跋部趁机向南、向西迁移，逐步占领并消化了原来匈奴人的领地。到东汉桓、灵二帝的时候，拓跋部已经在现在的辽河西部地区开始了游牧生活。此后，他们沿着阴山脉继续向西南迁徙，进入内蒙古南部地区。

随着越来越靠近中原地区，拓跋部开始进入传统史书的视野。不过他们仅仅被当作可有可无的配角，出现在朝贡表演和边地轶闻之中。拓跋部的人民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喜欢剃掉头顶的部分头发，再把周边的头发编成小辫子垂下来，所以他们被东汉人称为“索头鲜卑”。

拓跋部的游牧生活过得比较滋润，部族人口不断增长，其中也吸收了部分匈奴残部。他们保留着氏族社会的特点，加上不断迁徙而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部凝聚力特别强。到了三国时期，拓跋部出现了一个杰出的领袖，名叫拓跋力微。他担任大酋长时，带着部落大规模南下，最后迁居到盛乐（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拓跋力微施行强权统治，部落中有首领不服号令或者仅仅是没有按时参加部落集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拓跋力微并没有组建明确的政权形式，更没有编练固定的军队，还是有事的时候就召集部落，没事的时候听任部落四散游牧。

拓跋力微先是臣服于三国中的曹魏，后来又是西晋的属臣。拓跋部和中原王朝展开了积极的交往，用北方的皮毛、牲畜交换中原的粮食、布匹和金钱。魏晋为了笼络拓跋部，不时给予其丰厚的赏赐，使拓跋部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拓跋力微还派儿子拓跋沙漠汗去洛阳当质子，结果拓跋沙漠汗被严重汉化，几十年后返回草原时已俨然是一副

汉族贵族的做派了。拓跋贵族们接受不了这样的拓跋沙漠汗，又担心拓跋力微传位给他，就设下埋伏将拓跋沙漠汗暗杀了。

据说拓跋力微活了一百多岁。北魏建国后，追谥他为神元皇帝，庙号始祖。

这应该是一个民族在童年时期编造的神话。拓跋鲜卑类似的神话还有他们在迁徙过程中经历的“九难八阻”，以及如何在上天的帮助下战胜诸多困难，等等。神话迭出，恰恰说明了一个民族还没有发展成熟。

拓跋力微死后，拓跋部出现了短暂的动荡，最后他的孙子拓跋猗卢重新统一了部落。拓跋猗卢很有祖父的风范，并且将祖父的强权统治发扬光大。他屠杀了任何胆敢挑战自己权威的部落贵族和百姓，进一步打破了部落内部的民主传统，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当时，中原大乱，强大的拓跋部自然成了北方各派争取和利用的对象。拓跋猗卢支持的是西晋的残余势力，和刘琨势力一起四处出击，并由刘琨出面争取，西晋在愍帝建兴三年（315）封拓跋猗卢为代王。拓跋部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政权名称和形式，拓跋猗卢也彻底从一个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变成了割据势力的君主。

拓跋猗卢死后，拓跋部又经历了短暂的动荡，直到东晋咸康四年（338），拓跋猗卢的侄孙拓跋什翼犍（jiān）成为新一任代王。

根据史书的描绘，拓跋什翼犍天生就有君王像。他“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長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如果拓跋什翼犍真长成这样，的确不是“凡人”。拓跋什翼犍的经历也很传奇。他从小被当作质子送往后赵，居住在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多年，汉化程度比较深。拓跋什翼犍学会了不少汉族的政治话语和手腕，比凶悍的同胞们更懂得收买人心。比如有一次在作战中他被射瞎了一只眼睛，后来抓住了射箭的敌人，大臣们提议将射箭的

人活活割死，拓跋什翼犍说：“各为其主，何罪之有？”于是将其释放了。

在政治上，拓跋什翼犍对拓跋部落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如果说拓跋猗卢为拓跋鲜卑描绘了政权的蓝图，那么拓跋什翼犍则实现了这个蓝图。他设官分职，颁布法律，组建国家机构，正式建立了代国。拓跋人建国过程中，汉族人帮了大忙。拓跋什翼犍以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帮助自己建立法制。经过一番努力后，拓跋部实力大涨，统治区域东到辽宁，西到甘肃一带，南距阴山，北尽沙漠，面积达几百万平方公里。拓跋部的军队有多少人呢？史书说拓跋什翼犍“带甲四十万”，这就过于夸张了。如果拓跋什翼犍真的有四十万武装，早就可以争夺天下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四十万人可能是拓跋部能够动员的所有青壮年的总数。那时候，青壮年在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军人，部落有事都得跨马横刀出征。

拓跋什翼犍还想走得更远，让部落定居下来。他计划在盛乐等地筑造城池。可是，以他母亲为代表的贵族们表示反对。理由是，一旦定居下来就可能遭到敌人的包围，到时候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还不如游牧来得安全自在。拓跋什翼犍觉得也有道理，最终放弃了筑城定居的计划。

初生的代国四处征战，到处掳掠，日子过得挺滋润。可惜拓跋什翼犍的运气实在不好，遇到了更强大的敌人——前秦。前秦在苻坚的率领下，逐一消灭北方割据力量，势力如日中天。苻坚不能容忍代国的存在，于376年率领五十万秦军大举北伐拓跋部。拓跋什翼犍硬着头皮应战，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仓皇向蒙古高原逃亡。沿途因为缺乏粮草，拓跋部死伤惨重。屋漏偏逢连夜雨。拓跋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寔（shí）君又听信谗言，先杀诸弟，后杀拓跋什翼犍，拓跋什翼犍死时五十七岁。苻坚捕杀了拓跋寔君，将拓跋鲜卑的残余百姓分别划归到匈奴刘库仁、刘卫辰两部治理。代国正式灭亡。

如果是一般的部落，遭到如此重创，在历史舞台上的戏基本上就算唱完了。可拓跋部不是一般的部落。他们在常年的迁徙和游牧中强化了内部凝聚力，如今即便亡国了，相互之间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心谋划着复国。同时，他们要感谢时代动荡，乱世中隐藏着大把的机会。

383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惨败，被它征服的北方各族纷纷复国。386年，散落的拓跋部一致推举拓跋什翼犍的嫡孙、十六岁的拓跋珪（guī）为代王，正式复国。拓跋珪移居盛乐，不久改国号为魏。为了与三国时的曹魏相区别，历史上将拓跋珪建立的魏国称为北魏。

拓跋珪称魏王后，陆续击败周围部落，兼并刘卫辰等匈奴部落，势力日益强大。其中，刘卫辰的儿子刘勃勃逃脱拓跋人的追杀，后来改名赫连勃勃，建立了夏国。不过这也是后话了。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是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拓跋珪和后燕皇帝慕容垂有亲戚关系。他的爷爷拓跋什翼犍曾向前燕的慕容皝求婚，迎娶了慕容皝的妹妹。按照辈分来说，拓跋珪是慕容垂的外甥。北魏起初作为后燕的附庸，也向后燕称臣。慕容垂很关照拓跋珪这个小外甥，客观上他也需要在北方有个盟友安定边境，牵制其他部落。所以，北魏和后燕很快进入了蜜月期。拓跋珪得以全心全意在北方作战，有的时候兵力不够还向舅舅慕容垂求援。慕容垂也很爽快地出兵相助。

但是拓跋珪并不甘心做后燕的附庸，所以当慕容垂封他做西单于、上谷王时，他没有接受。又过了两年，他的羽毛愈加丰满，对后燕的态度也便有了变化。388年，拓跋珪派堂弟拓跋仪出使后燕首都

中山。慕容垂问他，魏王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朝贺。拓跋珪回答说，北魏和后燕的先世都是晋朝臣子，两国应该世代结为兄弟，并委婉地提出了地位平等的主张。一心荡平天下的慕容垂对此很是不快。

此时的慕容垂已经六十三岁了，拓跋珪等人看到“燕主衰老，太子暗弱”，判断后燕强盛不了多久，暗暗有了兼并后燕之心。

后燕不久发动了灭亡西燕的战役。西燕向拓跋珪求援，拓跋珪出兵援助。结果，西燕灭亡得太快，北魏军队都没赶上与后燕交锋。但如此一来，北魏和后燕就处于敌对状态了。慕容垂灭掉西燕后，决定要远征北魏。395年，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主帅，率领后燕主力大举进攻北魏。拓跋珪避其锋芒，坚壁清野，带着军队和百姓隐藏在黄河南岸的河套地区。害得慕容宝在黄河以北游荡了几个月，硬是找不到敌人战斗。初冬很快就到了，慕容宝失去战斗意志，又风闻父亲慕容垂在后方病危，仓促决定撤退。为了防止北魏军队追击，慕容宝撤退前留了一手。他烧毁了黄河上的所有渡船，以为这样北魏军队就无法追击了。不想，拓跋珪挑选了两万精兵，亲自披挂上阵，踩着黄河的薄冰尾随而去。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北魏追兵在参合陂包围了还在睡梦中的后燕大军，一场决战变成了屠杀。慕容宝仅带少数人仓皇逃命。北魏大获全胜，仅战后俘虏的燕军就有四五万人。拓跋珪残忍地将这些俘虏全部活埋了。

这场战斗扭转了北魏和后燕的力量对比。慕容垂郁郁而终，拓跋珪趁热打铁，大口吞噬后燕的领土。396年，北魏占领了并州（今山西地区），并越过太行山进入冀州（今河北地区）。拓跋珪亲临阵前，率军包围了中山城。后燕已到生死关头，慕容家却还在起内讧。即位的慕容宝要求辽东龙城（今辽宁朝阳）的军队南下增援。不想龙城方面希望慕容宝早死，可以争夺帝位。最后无奈之下，慕容宝放弃中山，带领精干军队北逃。其实，中山城内的多数百姓都有亲友在参合陂被魏军杀害或者活埋，抵抗意志很强。他们在慕容宝逃跑后，又坚持抵抗了半年。后来因为弹尽粮绝，被北魏攻克。这回，拓跋珪吸取教训，

没有大开杀戒，还救死扶伤，以收揽人心。

自此，后燕被截为两段。慕容宝北逃后，势力融入北燕。南边的后燕势力以困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慕容德为核心。慕容德在北魏的逼迫下，南逃山东，建立南燕政权。后燕大部被北魏吞并。398年，拓跋珪称帝，即道武帝，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

拓跋珪不仅建立了赫赫武功，在文治上也颇多建树。攻占并州后，拓跋珪仿照汉族政治制度建立台、省等官署，又在地方上设置刺史、太守等官职。这些官职都由三个人同时担任，一人是拓跋宗室，一人是鲜卑贵族，还有一人是鲜卑平民或者汉族人。当时地方上治安不好，地方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抓强盗、保境安民。北魏规定有能力稳定一县治安的县令可以兼任两个县的县令，稳定两个县治安的县令可以兼任三个县的县令，如果能持续三年稳定三个县的治安就可以直接升任太守。而能够治理多个郡的太守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提升，最后成为刺史。由此可见，当时北魏的统治还不稳定，政权组织也很粗糙，保留着许多原始的习俗，但毕竟走出了质变的一步。

拓跋珪很重视生产，立国不久就让拓跋仪组织屯田。占领华北大部后，拓跋珪强迫上百万各族百姓迁移到平城。他们当中有的“计口受田”，租种国有土地，做了国家的农奴；有的被分配到作坊从事手工业，为官府和贵族生产商品；有的被划定为“营户”，世代代当兵；有的被赏赐给鲜卑贵族当奴婢。北魏规定鲜卑贵族可以拥有二百名奴婢，达官显贵们实际拥有的奴婢都数以千计。这些移民被称为“新民”，低人一等，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情况比奴隶好不到哪里去。普通拓跋部落的人民有人身自由，可以从事各种职业，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单一职业：当兵打仗。他们中的少数人在战争中劫掠致富，不过多数人始终一贫如洗。这部分人在战斗间隙四处游荡，没有固定的职业，又被称为“游手”。这部分人大约占拓跋部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平城为核心的地区，过去就是拓跋部游牧的地区，如今成了北魏的根据地和政治中心。北魏着力经营这一地区，然后再辐射到四周去。他们把平城周围叫作畿内，环绕畿内一千多里的地方，叫作近畿。这一地区以外的地区，分别叫作方和维，一共有四方和四维，组成八部，由八部大人管理。所谓八部大人和之前拓跋部的部落酋长不同，不是民主推举而是由拓跋珪任命的，不负责领兵打仗而是监督百姓耕种纳税。拓跋珪用征收赋税的多少来考核八部大人。双方的关系已经完全不是部落内部大小酋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君臣关系了。

鲜卑贵族也接受了这种上下关系的变化，原因是他们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切实的好处。定居农耕的收获远比游牧要轻松，收获也多。战争的不断胜利给他们带来了无数的战利品，还分配了众多的奴婢。或者可以这样说，拓跋珪用物质利益换取了鲜卑贵族们的政治权力，北魏膨胀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淹没了贵族们的失落感。

政权在不断稳固，北魏和汉族的关系也得到改善。不少汉族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北魏政权。拓跋珪曾问博士李先：“天下有什么好东西对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于是拓跋珪下令征集书籍，送到平城。自然，这些都是讲授儒家学说和汉族政治的图书。

华北的世家大族们已经接受了新的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投靠蛮夷”找个借口，同时也为了增强拓跋鲜卑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汉族读书人经过“仔细研究”，发现鲜卑族拓跋部原来是黄帝后裔。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黄帝娶妻嫫祖，生子昌意，昌意的小儿子嫫（kǔn）被封到北方。黄帝以土得王，而北方习俗将土称为拓，将后称为跋，所以黄帝的这一支后裔就以拓跋为姓了。这个说法很合拓跋贵族们的胃口，被欣然接受。既然大家都是黄帝后代，那么拓跋鲜卑统治中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拓跋珪创建了北魏王朝，文治武功都很了得，但性格残暴。地位

越高，拓跋珪就越不自信，老觉得有人觊觎皇位，于是更加残暴地镇压部下。堂兄弟拓跋遵、拓跋仪等人先后被推上了断头台，还有不少人被满门诛杀。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有谋反的真凭实据，多数人都是死于拓跋珪的猜疑。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北魏朝廷人人自危。天赐六年（409）十月，拓跋珪猜疑自己的嫔妃贺夫人，准备杀掉她。贺夫人所生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惶恐不安，抢先动手，杀掉了拓跋珪。拓跋珪当时只有三十九岁。

在拓跋部之前的历史上，首领死后都引起了动荡。但是，拓跋珪被杀后，北魏并没有陷入之前的循环。这要归功于其政权的稳固，它已经迅速从类似部落联盟的阶段飞跃到封建政权的阶段了。

拓跋珪死时，十七岁的长子拓跋嗣正在外地。拓跋鲜卑有个传统，就是皇子被挑选为继承人后，生母要自尽。拓跋珪要立拓跋嗣为太子时，就逼其生母刘贵人自尽了。拓跋嗣知道后悲伤不已，日夜哀号。拓跋珪听了，要怒责他。拓跋嗣不得不逃出平城，流亡在外。拓跋绍杀了父皇后，平城的贵族们却不拥戴他。大家都希望由拓跋珪的长子拓跋嗣即位。于是，拓跋嗣在宫中卫士的支持下顺利地杀入皇宫，砍死弟弟拓跋绍，于同年（409）即位。拓跋嗣就是北魏明元帝，庙号太宗。

拓跋嗣是一个平稳的过渡型皇帝。他喜欢汉学，尤其喜欢学习历史。在位十五年，拓跋嗣继续推进父亲的制度建设。在对外征伐上，拓跋嗣抓住南朝宋刘裕病死的良机南征，和南朝在河南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时南朝力量还相当强大，拓跋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才打败了宋朝军队，占领了河南和山东等地，将南北边界线由黄河推向淮北一带。这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对南方战争的第一场胜利。由于长途征战劳顿，拓跋嗣回到平城不久就病死了，年仅三十二岁。他留下了一个蓬勃向上的新帝国。

至此，北魏成了一个令天下人不可小觑的重要角色，终于从一个

龙套蜕变为耀眼的主角。

统一不能只靠拳头

—

拓跋嗣死后，即位的是其子拓跋焘。拓跋焘当时只有十六岁，和爷爷拓跋珪、父亲拓跋嗣一样，拓跋焘将北魏王朝推上了更高的台阶。

拓跋焘的运气很好，接手的是一个北方最强大的帝国。然而再强大，也只是若干个北方割据政权中的一个。

前秦灭亡后，北方经过多年的相互吞并，还有北魏、北凉、北燕、夏和西秦几大政权。其中北魏占领现在的山西、河北大部，以及河南、山东的一部分，势力最强大。和北魏有世仇的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占据陕西大部地区，也就是古代的关中地区，势力仅次于北魏。北燕是后燕的残余（后燕的另一支残余南燕在刘裕北伐时灭亡），占领现在京津地区和辽东一带。西秦、北凉是现在甘肃与青海一带的割据政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拓跋焘即位后，就把统一北方作为奋斗目标。

统一要用拳头说话，为了磨砺一双硬拳头，拓跋焘非常重视军队建设。

长期的游牧射猎生活使拓跋鲜卑人有着健壮的体魄和高超的骑射能力。北魏军队战斗力很强，尤其是骑兵，算得上是北魏克敌制胜的法宝。有了硬件优势，拓跋焘又在软件建设上下功夫。他常从普通士

兵中提拔将官，激励士兵们英勇作战，对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将士，或加官晋爵，或赏赐人口、牲畜及金钱、古玩、丝绸等物品。对违犯军纪的官兵，拓跋焘严惩不贷，即便是亲贵重臣也毫不留情。临淮公丘堆是老资格的鲜卑贵族，三朝老臣，贵为太仆，在和夏国作战的时候，丘堆听到前线兵败的传言后临阵脱逃，拓跋焘毫不犹豫地将丘堆斩首；扶风公拓跋处真等八人则因为偷盗军用物资，也被斩首。

拓跋焘严格治军，首先做到了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每次征战，他不但御驾亲征，还身先士卒。比如始光四年（427），拓跋焘亲自带上三万轻骑突袭夏国的都城统万。途中，他与官兵们一样，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并参加了统万城下的恶战。战斗中，拓跋焘的坐骑力竭，把主人带倒坠地。拓跋焘换马后继续战斗，杀死夏军十多人，后来身中流矢还血战不已。看到拓跋焘玩命地冲锋在前，北魏官兵们也都英勇杀敌，“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当然，拓跋焘不是一味穷兵黩武的武夫，知道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他忙于征战的同时也不放松经济生产。北魏统治民族和百姓众多，拓跋焘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性，治理百姓却不强迫百姓改俗易姓，追求生产效益却不强求整齐划一。他因地制宜，既发展鲜卑等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又尊重汉族的农耕和商贸。难能可贵的是，拓跋焘还派出使者用太牢大礼祭祀孔子，真正做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很快，北魏兵强马壮，将其他割据政权远远甩在了后面。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先消灭谁呢？

以长孙蒿、长孙翰、奚斤等为代表的鲜卑武将们主张先进攻柔然。新兴的游牧民族柔然不断侵扰北魏北方边界，日益成为北魏的大患。同样出身游牧民族的鲜卑武将们渴望和柔然一决雌雄，掳掠牲畜来补充军需。大臣刘瓘等则主张先打北燕，因为北燕最弱小。做事情先易后难，也算是人之常情。太常卿崔浩反其道而行，认为应该先进

攻最强大的大夏政权，理由是大夏政权残暴无道，已经失去了人心，看似强大其实不难战胜。拓跋焘毅然接受崔浩的主张，亲自领军渡过黄河，袭击夏国首都统万城，擂响了统一的锣鼓。

北魏对大夏的征战一开始并不顺利。拓跋焘亲自出马也没能攻破统万城，只掳获牛马十多万，赫连氏匈奴还有相当强大的军队。为了消灭夏军的有生力量，拓跋焘在始光四年（427）再次进攻统万。这一次，他只带一支小部队佯攻城池，然后假装不敌撤退，想引诱夏军离开统万城追击。而拓跋焘早在城外的山谷中埋伏了主力，就等夏军出城。但夏国的赫连昌看到北魏军队“战败”了，担心是拓跋焘的诱敌之策，并没有出城追击。崔浩向拓跋焘献计，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说魏军粮草已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赫连昌听了假消息终于上当，亲自带兵出城追击，一下就中了拓跋焘的计。训练有素、严阵以待的北魏主力军给了夏军致命打击。就是在这次激战中，拓跋焘坠马又身中流矢，仍然血战不停，鼓舞士气消灭了夏军的主力。

赫连昌放弃统万城，狼狈逃往了现在的甘肃一带；夏军残余则逃回了统万城。拓跋焘带少数随从混在夏军的败军中冲进城——估计是想来个釜底抽薪。匈奴人觉察到有魏军混入城中，便把城门全都关上，四处搜捕。拓跋焘和随从闯入宫里，拿到女人的裙子，化了装，翻城出去，最终脱险。第二天，他指挥大军猛攻统万城，最终占领这座夏国的都城，匈奴部的王公、大臣、将校、奴婢都成了俘虏。经此一战，夏国败局已定。

战后拓跋焘巡视统万城，看到当年赫连勃勃驱赶无数血肉之躯、花费几十年修成的都城，感叹道：“夏国国土不大、人口不多，却滥用民力修建这样的都城，哪有不亡的道理？”

在南边，魏军占领了长安。夏国仍在挣扎，在西部和北魏打起了持久战。神（jiā）元年（428），魏军在陇西俘获赫连昌。赫连定在

平凉即位称帝，继续抵抗魏军，他一度击败北魏军队，夺回长安。但两年后，北魏还是攻克长安，平定了关中地区。赫连定向西逃窜，竟然还在431年迫使乞伏暮末投降，灭亡了西秦。但是，北魏大军接踵而来，赫连定畏惧魏军，不敢接战，向青海一带继续逃窜。同年六月，赫连定被吐谷浑所俘。夏国灭亡。

夏国灭亡的第二年（432），北魏再接再厉进攻北燕，包围其都城龙城。北燕皇帝冯弘连战连败，在太延二年（436）自己放火烧毁了宫殿、城池，逃往高丽，后为高丽人所杀。北燕灭亡。

至此，十六国政权中就只剩下一个北凉了。凉主沮渠蒙逊对自身实力本来就没有信心，不断依附于中原强者。谁强大，他就向谁称臣，以求苟延残喘。刘裕灭后秦的时候，沮渠蒙逊担心自己地盘不保，非常恐慌。他看到汉族大臣刘祥奏事时面有喜色，骂道：“你听到刘裕入关，竟敢这样高兴！”就把他杀了。他先向东晋、刘宋称臣，北魏崛起后又向北魏称臣。433年，沮渠蒙逊死了。六年后（439），拓跋焘御驾亲征北凉，包围其首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即位的凉主沮渠牧犍联合柔然人，守城不降，寄希望于柔然入侵可以迫使北魏撤军。没想到柔然不成器，只能骚扰一下北魏边境，撼动不了全局。拓跋焘一心一意要灭北凉，抓紧攻城。沮渠牧犍困守孤城一个半月，最终山穷水尽而降。北凉灭亡，十六国结束。

北凉虽小，消灭它的意义却很大。首先，北凉占据着中原地区和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北魏灭北凉后，通西域更为方便，西域各国纷纷臣服北魏，使得后者的影响力剧增。其次，从晋末张轨割据河西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河西地区相对安定。避居河西的中原人士很多，其中有许多读书人，世代诗书相传。北凉灭亡后，北魏将这些文人迁到平城，他们对北魏王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此，拓跋焘基本统一了北方。时隔多年以后，统一的光芒重新照耀北方大地。南北朝对峙局面正式形成。

必须指出的是，拓跋焘对北方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政权非常脆弱。

北方分裂了上百年，数十个政权相互厮杀，留下了各种矛盾。拓跋焘剪灭其他割据政权，只是消除了表面统一的障碍，而深层次的民族问题、财政问题等才是更要命、更难解决的。

拓跋焘面临的深层次的矛盾主要有：柔然入侵、基层统治、财政收入和南方威胁四大问题。

柔然是继鲜卑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在鲜卑人南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空出来的塞北草原被柔然占领。到北魏初期，柔然已经占领了东起朝鲜半岛、西到西域、北达西伯利亚、南至长城的广袤土地，成为中原王朝新的心腹大患。拓跋焘刚即位，柔然就不给他面子出兵侵扰。拓跋焘亲自迎战，结果被柔然骑兵包围了整整五十重。全赖北魏将士拼死杀敌，拓跋焘才脱险逃出。

北魏王朝对柔然的政策遵循稳中求变的原则，在北方各地建立军镇，以守住现有疆域为前提，瞅准时机积极出击。拓跋焘对柔然发动了不下十次征战。北魏组织敢死队，将士们都只带有限天数的粮食深入敌后，抱着不成功就成仁的决心，给了柔然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在北魏神二年（429），拓跋焘大败柔然，取得了战略意义的胜利。

北魏俘获柔然军民数十万人、牛羊上百万头，将他们南迁，安置在边界南北。柔然余部北遁，逃到了漠北地区。原先依附于柔然的高车（北方游牧民族，据说因所乘之车轮子高大而得名）等部落改弦易辙，投靠北魏。柔然元气大伤，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侵扰北魏这项“非常有

前途”的事业。

北魏对柔然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朝野有许多人因此反对主动出击柔然，认为柔然地处荒远，即便得到土地也不能耕种，俘虏的人口也不能直接驱使，主张建立军镇以防守为主。拓跋焘在崔浩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屡次出击柔然，虽然没能根除柔然的势力，但基本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免除了内政外交的一大后顾之忧。

北方犬牙交错地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羯、屠等民族。割据战争往往伴随着民族仇杀，导致北方各民族关系非常紧张，这给基层的治理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和其他镇压异族的十六国政权一样，北魏也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尊崇鲜卑族人，强迁其他民族以加强控制，对反抗的异族力量大开杀戒。许多异族百姓被北魏王朝罚做各种府营杂户，供各衙门驱使奴役，甚至被迫从军当炮灰。拓跋焘用兵关中和陇西的时候，为筹措军需，对关中百姓横征暴敛。因此，表面统一后的北魏王朝民族矛盾激烈，尤其关中地区最厉害。

关中百姓的反抗屡有发生，北魏只能控制长安、杏城等重要军镇，没能实现有效统治。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匈奴别部的卢水胡百姓在盖吴的领导下起义。关中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进逼长安。关东、河南、山西等地的老百姓闻讯，也纷纷响应，占领弘农等地，进逼潼关。一时间，烽火燃遍北魏王朝的半壁江山。拓跋焘不敢怠慢，紧急抽调军队镇压。连新归附的高车部落的骑兵都奉命从内蒙古地区南下作战，可见拓跋焘抽调军队范围之广，也可以看出盖吴起义对北魏政权的冲击之大。

遗憾的是，盖吴起义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起义军四处活动，但没能攻克长安、潼关等战略要地，也没能构建起确定的防线。这就让拓跋焘有充分的时间调兵遣将。他先调兵赶赴长安

固守，又派兵屯守渭北，严令务必阻止关中局势进一步恶化。拓跋焘自领主力清剿山西、河南一带的起义。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拓跋焘成功隔断了关中和关东起义军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关东的起义。二月，拓跋焘马不停蹄渡过黄河，杀向关中。盖吴闻讯北撤，在杏城（在今陕西黄陵县）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八月，盖吴遇害，年仅二十多岁。有人说他是被亲属出卖，也有人说他是被叛军杀害。但是之后，不断有起义军打着盖吴的旗号继续作战。北魏又花费了两年时间，才使关中局势彻底稳定下来。

在镇压过程中，拓跋焘残酷杀戮响应起义的百姓。为震慑人心，屠城也在所不惜。之后一段时间，各族百姓屈服于暴力，起义浪潮逐渐衰落。大起义的爆发，让拓跋焘意识到国家财政的窘迫。赫赫武功离不开物质基础，常年征战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北方百姓捉襟见肘，北魏的横征暴敛是关中各族起义的重要原因。可拓跋焘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国家掌握的户口很有限，分摊给每个人的赋税自然就重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增加户口，只有增加了赋税征收的对象才能增加收入。

当时北方大量的户口被贵族官僚、据守一隅的坞堡主及寺庙僧侣等控制。乱世中，人们依附于强者，为强者劳作服务，并不对国家产生贡献。官僚贵族依靠特权占有奴婢，拓跋焘一时无法剥夺。坞堡主们各据一方，拥有武装，拓跋焘也无法骤然得手。于是，寺庙僧侣就落入了拓跋焘的算盘之中。

佛寺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不长，毕竟佛教传入中国也没多久。但是抚慰人心的佛教理论遇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如同火苗遇到硫磺，越烧越旺，信众也越来越多。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初也接受了佛教，把它当作思想武器麻痹人民。从拓跋珪开始，北魏统治者大多礼敬沙门。寺庙规模日渐扩展，最后发展成了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和百姓的庄园经济。许多信众信仰神佛超过了信仰朝廷，奉献寺庙而不服

从衙门，官府和寺庙之间产生了矛盾。而拓跋焘当时恰好需要大批的物质支持，使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一些佛教僧侣和信徒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影响，追求特权，更让官府看不惯。

于是，拓跋焘一改之前对佛教的尊崇，强制将寺庙经济纳入朝廷的控制。在讨伐北凉的时候，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他下令五十岁以下的和尚全部还俗，参军作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正式下令“禁佛”。他在诏书中指责佛教信众假借神佛荒诞之说，影响朝廷政治，威胁皇权。规定上自王公下至平民，将私养的和尚及巫师，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府，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和尚身死，主人抄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而来到长安。一次，他的侍从到一座寺院，发现其中藏有大批武器，就报告了拓跋焘。经搜查，官兵又发现了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不少密室等。拓跋焘勃然大怒，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将“禁佛”发展为“灭佛”。他发布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佛像及佛经一律击破焚烧，和尚无论长幼一律活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灭佛”。中国北方的灭佛运动进入高潮，北魏境内难觅佛教僧侣踪迹，北方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

且不说灭佛背后的思想纠葛，仅仅从物质收益上来说，拓跋焘经此一举获得了不少物资和人口，缓解了北魏朝廷收入窘迫的困境。但是，人口被官僚贵族和坞堡主藏匿的主要弊端，拓跋焘终其一生都没能解决。

拓跋焘面临的第四大问题是来自南方的威胁。早在拓跋焘全力剪灭割据群雄的时候，南方的刘宋王朝就很有“想法”，想趁北方内战坐收渔翁之利。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宋文帝刘义隆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元嘉北伐”，很有气吞河山、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宋军一开始也取得了部分成绩，但很快就在拓跋焘的御驾亲征下一败涂地。当年年底，拓跋焘就带着北魏官兵饮马长江，对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形成威胁，刘义隆的北伐变成了拓跋焘的南征。最

终，南北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淮南一带达成了均势。

这是北魏王朝军力最强盛的时期，策马扬鞭驰骋在长江北岸的拓跋焘也达到了赫赫武功的巅峰。

三

拓跋焘做事亲力亲为，经常领兵在外，留太子拓跋晃在首都平城监国，主持政府事务。拓跋晃长大了，身边自然聚集了一批人辅佐他。但是拓跋焘又不放心放手让太子去做，而是信任太监宗爱，放任宗爱在平城宫中胡作非为。拓跋晃集团又不时限制宗爱，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正平二年（452）的时候，宗爱向拓跋焘进谗言，诬陷太子身边的辅佐大臣们行为不轨。拓跋焘不辨真伪，就处死了他们。太子拓跋晃大为惊恐，担心父皇接下来就要对自己开刀了，竟然惊惧而死，年仅二十四岁。事后查明，太子及其身边的人都没有什么不轨行为。拓跋焘追悔莫及，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下号啕大哭。

这下子，轮到宗爱害怕了。他害怕拓跋焘治自己的诬陷之罪，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宗爱趁拓跋焘熟睡之时，将他杀死在床上。北魏的一代雄主，面对数万敌军铁骑面不改色、驰骋南北浴血百战的拓跋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了亲信太监的手中，时年四十五岁。

北魏史书对拓跋焘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世祖（拓跋焘的庙号）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这等于是将拓跋焘看作是开创北魏百年基业的领袖。就是被拓跋焘打得

够呛的刘宋王朝，也对他做了很高的评价，说拓跋焘“英图武略，事
驾前古”。

最后一个史官

—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即450年7月5日，都城平城的大街上碾过一辆囚车。透过扬起的尘土，百姓们看到囚车中押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说：“这不是司徒崔浩大人吗？”

是的，这个死囚正是已经七十岁的崔浩，太武帝拓跋焘亲自下达了对他的死刑令。

年迈的崔浩显然被眼前可怕的场景吓坏了，惊恐得不发一言。他狼狈地被押上刑场，几十名鲜卑族士兵还解下裤子，朝着他的身子撒尿。崔浩吓得嗷嗷大叫起来，叫声之大连场外的行人都听得到。不久，叫声戛然而止，一个服务了三朝鲜卑皇帝的汉族重臣，脑袋已经滚落在地……

崔浩，出身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家族。作为北方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在晋末的大动乱中没有随大溜南迁，而是选择留在了北方。为了笼络北方的汉族百姓，之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纷纷延揽滞留北方的世族子弟入仕。清河崔氏门第高、声望隆，自然是重点“统战对象”。

崔浩的曾祖父崔悦、祖父崔潜就分别在后赵、前燕做官。父亲崔宏先是在前秦做官，前秦灭亡后颠沛流离。崔宏一度有意投奔东晋，一路向南跑去，结果在泰山被乱军扣留。之后，崔宏被后燕政府任

用。拓跋鲜卑兴起，大肆进攻后燕的河北州县。崔宏当时担任高阳内史，在大兵压境后弃官而逃。拓跋珪久闻清河崔氏的名声，派骑兵追赶，硬是追上了崔宏，拉他入北魏做官。

崔宏的经历简直是北方大族的一部磨难史。患难生活让他养成了低调谨慎的作风。崔宏在北魏朝廷不树敌，也不攀附权贵。拓跋珪晚年动辄斥责大臣，崔宏却安然无事，最后荣封白马公，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崔浩就是白马公崔宏的儿子。他没有经历过父亲那样的磨难，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长大的。崔浩从小博览群书，喜好文学，二十岁就入仕，在拓跋珪身边做官。拓跋珪死后，即位的拓跋嗣很信任他，赐爵武城子，常常让他为自己讲授经书。崔浩得宠，能够和拓跋嗣同车出行，参与军国机密，引来鲜卑贵族的羡慕。拓跋嗣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长孙箴、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这六个辅政大臣除了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拓跋嗣死后，崔浩很快遭到鲜卑贵族排挤，被罢免职务。但拓跋焘在处理行政和征战过程中，日益觉得需要一个精通汉族制度、善于谋划的大臣，他离不开崔浩。崔浩在进攻柔然、灭亡大夏、征服河西和处理与南朝关系等问题上，给拓跋焘出了很多好主意。北魏政府仿行汉族礼仪制度，崔浩也起了重要作用。《魏书》就说：“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看来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一次，拓跋焘接见归附的几百名高车酋长，指着崔浩说：“你们看看他，身材瘦小，拉不开弓，提不起枪，但肚子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这些胜仗，都有他指点的功劳。”拓跋焘还下令各位尚书有不能定夺的军国大计，先问问崔浩，然后再施行。除了政治上信任，拓跋焘在生活上也很亲近崔浩。他不时到崔浩家中请教问题，事先也不打招呼。仓促之间，崔浩接待皇帝难免手忙脚乱，只能用家常菜招待皇帝。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同样，崔浩也被允许可以进入皇宫的任何地方，包括拓跋焘的卧室。

皇帝对大臣信任到这样程度，古今罕见。那么，既然崔浩掌握了朝廷大权，拓跋焘又无比亲信他，他怎么就被斩首示众了呢？

这得从当时北魏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崔浩张扬耿直的作风两方面来说。

二

还记得拓跋焘灭佛吗？在旁边怂恿他下灭佛令最起劲儿的，就是官至司徒的崔浩。

崔浩这么做，有消灭膨胀的佛教势力以增加国家财富的“公心”，也有“私心”。他本人笃信道教，和当时北方道教领袖寇谦之关系密切，还把寇谦之引荐给拓跋焘。而当时北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一般鲜卑百姓，佛教信徒不计其数。因为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后，长期被视为胡教。鲜卑族人自认为是胡人，既然是胡人就应该信仰胡教。崔浩则对中原土生土长的道教情有独钟，坚定灭佛。灭佛风潮兴起后，大批鲜卑贵族心有不甘，他们不敢反对拓跋焘，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崔浩。

事实上，寇谦之提醒过崔浩，说他高调而坚定地灭佛会得罪很多人。崔浩就是不听。他生长在官宦人家，没有经历过父辈的磨难，入仕后基本算是一帆风顺，不知道做人从政要谨小慎微的道理，相反，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事雷厉风行，很少顾及同僚们的想法。加上君臣关系融洽，官位正隆，崔浩内心的两大缺点就被放大了：一个是读书人的高调和虚荣，一个是世家子弟的优越感。我们来看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发酵，最终将崔浩送上断头台的。

太原王氏是和清河崔氏并列的北方头等世族门第，于西晋末年南

渡。东晋末年，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从江南归附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门第，想把女儿嫁给他。有人怀疑王慧龙并不是王家人，精通世族谱学的崔浩亲自前去验证，他看到王慧龙的鼻子生得很大，不禁赞叹道：“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原来太原王氏有个生理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王慧龙通过崔浩的“鉴定”后，受到了北方官民的推崇。崔浩还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王慧龙长得俊美。他不知道，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朝廷中高调称赞汉族的世族子弟是一个忌讳。果然，司徒长孙嵩听了很不高兴，跑去向拓跋焘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矮化祖国”“蔑视鲜卑”的行为。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一顿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自责归自责，崔浩并没有真正从心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故态重萌。

神四年（431），北魏征召一批汉族的世族子弟做官。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崔浩就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计划由朝廷出面划分世族门第的高低，作为区分政治待遇的标准，有几分要恢复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味道。这个计划显然对汉族世族掌握政权有利，但同样是世族出身又是崔浩亲戚的卢玄（范阳卢氏）劝他说：“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现在朝堂上对这件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个人？”崔浩听不进去，公开提出了这个计划，还进一步提出分藩封镇，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当然了，崔浩心目中裂土封到各地的诸侯对象多数是汉族的世族子弟。鲜卑族权贵们自然对这样的政策怀恨在心：这不是要夺我们的权，让汉族人掌权专政吗？

拓跋焘伐凉时，留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自恃拓跋焘的宠信，专制朝权，惹得太子不满。更严重的是，崔浩推荐了冀、定、相、幽、并各州数十名汉族世族人士，拟任命为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说官员任用要一步步来，不能马上就提拔为太守，再说了朝廷里还有很

多优秀人才等着任用呢。应该说，拓跋晃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崔浩固执己见，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结果得罪了更多的鲜卑官员。中书侍郎高允见状，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

所有的不满和矛盾，最终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史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一直到太武帝的时候，鲜卑民族和北魏王朝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所以，拓跋焘就让崔浩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国史修撰的工作，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协助。这是一件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事，拓跋焘很重视，专门召集修撰班子成员开会说：国史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把这个要求理解为实事求是，所以采集了鲜卑民族的资料，不避忌讳，编写了北魏的国史《国记》，内容涉及鲜卑先辈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

崔浩这么做，没有什么大错。毕竟拓跋焘要求“实录”，况且国史修撰的目的是为了留下准确的资料，教育后代统治者，算是“内参读物”。如果内容过滤得干干净净、大唱赞歌，那还算什么内参？这个时候，崔浩身上文人的虚荣和张扬就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将《国记》局限为内部参考读物，而是将它大肆宣扬，因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参与修撰工作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想拍崔浩的马屁，就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来宣传这一文化盛事。同时刊刻的还有崔浩所注的五经。之前，崔浩曾注释过《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周易》等书。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多“学术图书”的注述，书的质量可想而知。闵湛、郗标二人巧言令色，将崔浩那些质量粗糙的作品抬得很高，说之前儒家学者注释的五经都没有崔浩作品的质量高，不仅要把这些作品和《国记》一道刊刻出来，而且上书建议收集北魏境内的五经旧注，以

崔浩的注释为标准。

高允知道了，很担心。他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的建议，恐怕会酿为崔家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连累。”

但是，崔浩昏了头，竟然对闵湛、郗标二人的马屁照单全收，下令将《国记》刊刻出来。

三

不久，在平城天坛东三里处出现了一片碑林。整片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刻印着《国记》和崔浩所注释的“五经”，用工三百万人才完成，不愧是一个浩大的“文化盛举”。

麻烦立刻就来了！《国记》如果仅限在小范围内传阅，即便少数鲜卑权贵对秉笔直书的内容不满，也找不出攻击崔浩的借口来，毕竟崔浩记载的是事实。可现在，崔浩将客观但不光彩的鲜卑早期历史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所避讳，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鲜卑贵族就找到了攻击崔浩的借口。

大批鲜卑贵族怒不可遏——他们的确非常愤怒，先后到拓跋焘面前告状，控诉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没有想到崔浩膨胀到这种地步，竟然私自在通衢广场之上公开“内部读物”。他也怒不可遏，迅速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他们的罪状。

拓跋焘很生气，情况很严重。

一向不赞同崔浩做法的高允也参与了《国记》的修撰工作，名字也在要逮捕查办的黑名单上。太子拓跋晃是高允的学生，决心救他。

拓跋焘正在气头上，拓跋晃不敢去为老师求情，就把高允召进宫里保护起来，第二天早晨才带着他去见拓跋焘。一路上，拓跋晃叮嘱高允：“一会儿不管陛下询问什么，老师都只能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不明就里，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拓跋晃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是拉着高允见了拓跋焘。拓跋晃抢先说道：“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但一切都由崔浩做主。请饶了他的性命。”拓跋焘召高允上前问道：“《国记》是不是崔浩一人所作？”高允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各人分工情况，坦率承认自己编撰的部分比崔浩多。拓跋晃见状，在一旁急得直瞪眼，高允却不为所动，毫不避讳地说了实情。果然，拓跋焘大怒，说：“如此说来，你的罪行比崔浩还重，我怎能饶你性命！”拓跋晃连忙替高允掩饰：“高允地位低贱，见了陛下早就吓昏了，说的都是胡话。儿臣仔细问过了，《国记》都是崔浩一人所作。”拓跋焘再问高允：“的确是这样吗？”高允坦然说了一番道理：“臣才学粗劣，蒙陛下不弃，委以编修国史的重任。但是在修史过程中冒犯天威，罪应灭族。太子殿下念臣曾经为他授课，想救我一命，其实事先并没有问过臣修史的情况。臣说的是实话，不敢说谎。”听他说完，拓跋晃眼睛一闭，心想：完了！不想，拓跋焘很欣赏高允的耿直、坦率，对他免予治罪。

崔浩就没有高允这样幸运了。崔浩被带进宫，遭到了严厉审问。他一介书生，年已古稀，早就吓得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更不用说自我辩护了。负责审案的鲜卑贵族们自然给他重重定罪。

拓跋焘拿到最后的案卷，又一次大发雷霆，命令高允起草诏书，要将参与修史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其中大多数是汉族的世家大族。高允奉诏后，心如刀绞，迟迟写不出一个字来。他手里的笔，可关系着北方数十家世族的几千条人命啊！太监几次来催诏书，高允实在扛不住了，就请求觐见拓跋焘后再写。见到拓跋焘，高允说：“如果崔浩犯有别的罪，臣就知道了。单单就触犯忌讳来说，崔浩罪不至死啊。”拓跋焘大怒，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拉下去砍头。又

是一旁的太子拓跋晃百般求情，甚至跪地叩头替高允求饶。拓跋焘这才慢慢压制了怒气，觉得定的罪确实太重了，同意赦免大多数人的族人，只处罚罪犯本人。拓跋焘指着高允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

高允不仅又一次逃过了鬼门关，而且还拯救了很多。他最后活到了九十八岁才死，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最终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遭到屠戮的除了清河崔氏满门和参与修史的官吏外，还有和清河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及河东柳氏等。崔浩身前竭力壮大汉族世族在北魏朝野的势力，如今却连累这股势力遭到了血腥的屠灭。

因为崔浩一案牵连人数很多，北方汉族世族为之胆寒，很多人怀疑是北魏朝廷借崔浩修史一案来镇压汉族势力。进而有人认为崔浩“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汉族谋利，被拓跋焘发觉了才借修史一事斩首。还有人挖掘出了崔浩密谋光复的证据。比如神瑞二年（415），北魏粮食歉收，有大臣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借口鲜卑人去河北容易水土不服、发生疾病死伤而反对，又借口邺城离北方边界遥远，如果大夏、柔然入侵救援困难，坚持定都平城。他是不是不想让鲜卑蛮族入居中华大地呢？又比如刘裕北伐后秦的时候，崔浩竭力反对北魏出兵夹击汉族军队，而对北魏讨伐其他少数民族无不全力支持，但只要涉及南征或者与汉族军队作战，崔浩总是反对，这是不是也是崔浩“心怀故国”的证据呢？当然了，这样的解释揣摩的色彩较重。说崔浩是深藏在北魏内部的汉族间谍，缺乏铁证。

相反，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和北魏朝廷的制度建设方面，功勋卓著，说他是北魏的开国元勋也不为过。在处决崔浩不久，拓跋焘就后悔了，感叹崔浩“死得可惜”。

从某种意义上说，崔浩是最后一位敢于直书国史的人物，从他以

后的史臣们出于种种考虑，都是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无一敢再直书帝王其人其事。

千古一后冯太后

—

北魏历史上，出现了两位太后。前一位太后励精图治，推动国家走向了强盛，后一位太后败坏朝政，将国家推向了崩溃与分裂的边缘，可谓是“成也太后，亡也太后”。

第一位太后姓冯，是个汉族女子。一个汉人怎么成了鲜卑人的太后呢？

冯太后身世坎坷，祖父冯宏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末代皇帝。北燕被太武帝拓跋焘灭亡，冯宏带着家人跑到高丽，后来在高丽被杀。冯氏家族又纷纷逃回中原，投降北魏。北魏为了表示宽容，接纳了这些亡国皇室的后裔。其中冯宏的一个女儿还被拓跋焘纳入后宫，封为左昭仪。冯宏的儿子冯朗被封为西域郡公，当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后来因为某宗案子受到牵连被杀。冯朗留下一个幼女，孤苦无依，姑姑冯昭仪就将她接到宫中，亲自抚育。这个小女孩就是日后的冯太后。

冯昭仪对小侄女倾注了无私的关爱，使她在北魏后宫平安成长，并耳濡目染了诸多的政治风暴，无形中培养了其政治才干。当她从幼年长成少女的时候，正值北魏宫廷权力纷争白热化的阶段。

北魏正平二年（452）三月，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杀害。宗爱将弑君的罪行掩盖得很好，开始插手皇权更替，决心扶立便于控制的新皇帝。太子拓跋晃已死，拓跋晃之子拓跋浚是皇位的第一继承

人，当时才十二岁。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定及侍中薛提三人认为主少国疑，新皇帝还是找年纪大的人来做比较好。三人属意拓跋焘的第三子秦王拓跋翰，并将拓跋翰叫到宫中，准备登基。期间，薛提突然变卦，觉得舍弃血统最近的皇孙拓跋濬，改立秦王，怕引发动乱。这一犹豫就被宗爱利用了。宗爱和秦王拓跋翰关系一般，与拓跋焘第五子吴王拓跋余私交很好。他也在同时策划拥立拓跋余为新皇帝。宗爱先假传皇后诏令，召兰延、和定、薛提三人入内宫，将他们杀掉，又将秦王拓跋翰骗入密室杀害，然后拥立拓跋余为新皇帝。

拓跋余暴得皇位，喜出望外之余知恩图报，任命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封冯翊王。没过几天，拓跋余就后悔了。因为天下的实权都被宗爱夺走，自己成了傀儡皇帝。于是，拓跋余谋划削夺宗爱的权力。宗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偷偷把拓跋余杀害了。

这一回弑君，宗爱做得不隐蔽，被禁卫军官刘尼知道了。刘尼赶紧告诉了尚书源贺、陆丽等人。几人联手，捉拿宗爱。宗爱就是一个太监，并没有多大实力，哪里是大臣们联手后的对手，很快就成了刀下之鬼。朝臣们重新迎立皇孙拓跋濬为帝，史称文成帝。

文成帝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最大的举措之一是结束了灭佛令，重新推崇佛法。拓跋濬的爷爷拓跋焘执行了严厉的灭佛令，但民间信仰依然坚定，佛教广泛传播。拓跋焘执政末期，官员对灭佛令的执行渐渐松懈。兴安元年（452）年底，文成帝正式允许各州县建立佛寺，承认和尚剃度出家。拓跋濬本人似乎也信仰佛教，他不仅亲手为高僧剃发，还在僧侣的建议下，选定了首都平城西北约三十里的武州山南麓，开凿石窟，在窟中雕刻石佛像。这就是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的缘起。

拓跋濬做的第二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是在太安二年（456）立十五岁的冯氏为皇后。冯氏之所以能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极可能是得

到了姑姑冯昭仪的帮助。北魏朝廷选皇后的规定是，先挑选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候选人要完成“手铸金人”的考验。这很可能是类似铸造玩偶的手工艺活动，是挑选过程中关键的一道程序，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如果候选人不能铸造成功，便被淘汰。而冯氏手铸金人一次成功，顺利打败其他竞争者，后人理由相信，姑姑冯昭仪长期的宫廷生活经历对侄女冯氏的胜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立后的同时，拓跋濬立年仅三岁的拓跋弘为皇太子，当夜依据制度赐太子生母自尽。

早在道武帝时期，北魏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制定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即皇子被立为太子后，其生母要被赐死。道武帝拓跋珪立儿子拓跋嗣为太子，就杀其生母，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拓跋嗣说：“昔日汉武帝要立太子刘弗陵，杀了他的生母，是不让妇人参与国政，防止外戚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拓跋嗣即位后，虽然怀念生母，但还是将立子杀母定为祖宗家法流传了下来。

冯氏没有生育，这是她的不幸，但她也因此免于被杀戮的命运。

和平六年（465）五月十一日，文成帝拓跋濬在平城驾崩。按照北魏风俗要焚烧文成帝生前的衣物用器等，文武百官和后宫嫔妃要到现场哭泣哀悼。正当百官和后宫嫔妃痛哭的时候，皇后冯氏忽然扑火自焚。众人赶紧将她拉了出来。此事可见冯氏的刚硬和勇敢。

五月十二日，太子拓跋弘即位，史称献文帝。冯皇后则升格为冯太后。

事实证明，北魏子贵母死的家法并不能防止皇权旁落。拓跋濬死后，冯太后很快就独揽朝政，掌握了北魏实权。

当时，献文帝拓跋弘年幼，车骑大将军乙浑欲趁机揽权。他矫诏杀害大臣，自称丞相，位居诸王之上，摆出一副专断独行的样子来。他忘记了，冯太后可是敢往火堆里跳的人。冯太后对乙浑的行为假装不闻不问，暗中调大臣入京，突袭乙浑，将他杀死。接着，又以皇帝年幼、防止奸臣揽权为名，宣布临朝称制，掌控了朝政大权。

这是冯太后第一次临朝主政，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原因是献文帝拓跋弘天资聪明、刚毅果断，几年后又生下了皇子拓跋宏（父子名字同音），冯太后临朝的理由不充分了，于是归政献文帝，由他决断朝事。

冯太后名为太后，其实还不到三十岁，加上结束临朝后无事可做，熬不住寂寞，看到大臣李奕风流倜傥，就和他“亲密接触”，成双入对。引得朝野议论纷纷。

拓跋弘血气方刚，得知后怒不可遏，完全不能容忍李奕和嫡母的不正当关系。巧的是，李奕的弟弟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收受贿赂，被人检举。拓跋弘就抓住这件事情不放，高举反腐大旗，大开连坐之门，诛杀了李奕、李敷全家。冯太后遭到情感和颜面的双重打击，对拓跋弘心生怨恨。于是，母子失和。

献文帝拓跋弘钟爱黄老之学，对佛经手不释卷，视富贵为粪土，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治理的朝廷处于乱世，后宫又母子失和，不免心烦意乱，竟然萌发了退位归隐的想法，要把皇位让给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大臣们被拓跋弘的这个念头给吓坏了，纷纷反对说：禅位给皇叔紊乱宗祀，万不可行，如果皇上一定要禅位，也要禅位给皇太子。拓跋弘也不含糊，在皇兴五年（471）八月禅位给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弘做了太上皇，冯太后则升格为太皇太后。

拓跋宏即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

拓跋弘这个太上皇只有十八岁，心中还有大展宏图的念想。他虽然禅位，但依然对朝政有决定性的影响，每天还像之前一样处理政务，赏罚严明。五年后的一天，二十三岁的拓跋弘“暴亡”，是冯太后派人在他的酒中下了毒。原来拓跋弘禅让之后，和冯太后的关系非但没有好转，还进一步疏远。皇位更替后，孝文帝拓跋宏年幼，冯太后本想再一次揽权，不料拓跋弘把着实权不放，激起了冯太后的杀心。毒死拓跋弘后，冯太后揽权道路上的巨石就算去除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障碍，就只可能是十岁出头的孝文帝拓跋宏了。

对于孙子，冯太后的心态很纠结。一方面，为了大权独揽，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北魏因为遭冯太后猜忌而被覆灭者十余家。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的家族因为是可能替代冯太后的外戚，而被族诛。孝文帝拓跋宏聪慧过人，对祖母表现得非常顺从。有宦官在冯太后面前搬弄是非，说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盛怒之下就痛打了拓跋宏一顿。拓跋宏默然接受，并不申辩。但是冯太后还是担心他日后对自己不利，想要废掉孝文帝。浓厚的猜忌心甚至让冯太后做出如下举动：在寒冬腊月、冰冻刺骨之时，把只穿单衣的拓跋宏关到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这已经不是想废黜拓跋宏的帝位，而是想要他的命。大臣李冲、拓跋丕、穆泰等人纷纷劝阻冯太后，她才改变主意。孝文帝拓跋宏因此对李冲异常尊重，皇帝对王公重臣一般都直呼其名，但是拓跋宏见到李冲，则称呼他“李中书”。

废帝的念头一旦消除，冯太后就开始用心教导拓跋宏，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代圣君。冯太后亲自写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拓跋宏的学习资料，悉心教导孙子治理天下的原则、方法。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维新，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或“孝文帝改革”。实际上在太和十四年（490）之前，冯太后才是北魏的实际执

政者。她开启了一系列改革的序幕，还亲自策划、推行了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因为出身汉族，冯太后启动的改革带有鲜明的汉族特色。

三

以上这些描述可能让人觉得冯太后是一个多疑猜忌、杀戮心很重的女强人。史料中的冯太后也是“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刑罚，决之俄顷”。但她还有知人善用、生性俭素、仁慈和善的另一面。

冯太后对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往往加以笼络，注意培养、选拔贤能之士为己所用。李奕被杀后，冯太后又挑选了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作为新宠。其中她最宠爱王睿和李冲。

王睿本是以天文卜筮为生的江湖中人，长得伟岸英俊。冯太后因事接见王睿后就喜欢上了他，床第欢愉之后立刻破格提拔王睿为给事中。此后，王睿青云直上，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为太原公。王睿内参机密、外预政事，恩宠日隆。但是他不是一个只会献媚的佞臣，而有相当的胆略和才干。太和二年（478），冯太后和孝文帝率百官、宫人去虎圈赏虎，有只吊睛大老虎偷跑出来，眼看就要冲到御座跟前了。帝、后左右的卫士和宫人全都吓跑了，唯独王睿一人挥舞画戟，站在冯太后和孝文帝面前阻挡老虎，把老虎吓走了。最后，王睿升为尚书令，封中山王，在四十八岁时病逝。

李冲出身高贵，是敦煌公李宝之子，文雅大度、交游广阔，声誉很高。他虽然也因为床第原因得到提拔，升任中书令，晋爵陇西公，但他也才干出众，对北魏政治多有贡献。比如影响深远的三长制就是他开创的。

冯太后宠爱王睿、李冲等人，对他们多有赏赐。比如李冲原本家贫，冯太后就暗中将珍宝财物送到李家去，李冲很快成为富室。但冯太后自己日常生活俭素，不好奢华。她吃得十分简单，穿着打扮也很随意。冯太后一改北魏宫廷之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将食谱减少了十之八九，平日就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杜绝铺张浪费。她平日穿戴的都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不用锦绣华丽的饰物。冯太后在朝政上也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就下令取消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鸟。

但是由于冯太后好佛，北魏因敬佛而花费钱财巨亿，投入了成百上千的黄金，美玉珍宝更是成斗成斗地装嵌在佛堂佛像上。北魏时期的佛像形制恢宏，至今还多有遗物。

在日常琐事上，铁腕的冯太后也多有仁慈和善的表现。一次，冯太后身体不适，要服用中药。负责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而且粥里竟然还蠕动着一条数寸长的爬虫。冯太后发现后，只是用汤匙轻轻一搅，把虫子挑了出来。一旁的拓跋宏见状，很是恼火，痛骂那厨子，要砍他的脑袋。冯太后却笑着摆摆手，将早已吓得七魂出窍的厨子释放了。

冯太后个性严明，对身边的宦官恩威并施，宠信有加，但也不放纵自流。左右宫人有小过错，她就大加鞭挞，少的几十下，多的数百下。可事情过后，冯太后心中不存芥蒂，对受惩罚者待之如初，许多人还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以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对拓跋宏的控制极严。一直到冯太后死前，拓跋宏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何人，可见冯太后的控制程度。孝文帝拓跋宏生性至孝，事无巨细都先禀明冯太后再做定夺。他长期生活在冯太后的高压下，却心态平和，不怨恨祖母揽权强硬，而是看到了祖母对国家发展有功的一面。他对祖母推行的诸多改革打心眼里赞同，终身奉行，还进一步深化推进。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逝，时年四十九

岁。拓跋宏哀痛至极，五天五夜浆水不进，给祖母上谥文明太皇太后，历史上因此称冯太后为文明太后。

冯太后生前，安排两个亲侄女嫁给了孙子拓跋宏。拓跋宏先立妹妹为皇后，封姐姐为昭仪。冯昭仪和冯皇后同父异母，因为母亲出身微贱所以入宫要晚于其妹，但是长得漂亮妩媚，很受拓跋宏的宠幸。她不满于做昭仪，与妹妹争宠。冯昭仪在拓跋宏面前百般构毁皇后，后者毫无还手之力，最后被废为庶人，被罚去寺庙做尼姑，后又被赐死。冯昭仪如愿以偿，做了皇后。

拓跋宏在祖母死后操心政事，常年征战在外，冯皇后不甘寂寞，竟然与中官高菩萨通奸。一次拓跋宏南征，后方谣传孝文帝在汝南病重，冯皇后竟公然与高菩萨行淫。拓跋宏接到告发后，惊愕异常，返回洛阳将相关人等羁押刑讯。拓跋宏亲自审讯冯皇后，现场只留一个卫士，还用棉絮塞住卫士的双耳，可见他也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当冯皇后自陈淫乱本末后，拓跋宏召唤宗室彭城王、北海王等人，说：“昔是汝嫂，今为路人，但入勿避！”考虑到冯皇后是祖母的侄女，天性孝顺的拓跋宏没有马上明令废掉冯皇后，临终之时，才嘱托两个兄弟赐死冯皇后。冯皇后不肯服毒，两个王爷揪住她把毒药强灌了进去。

到洛阳去，到汉人的地方去

说回由冯太后主导的王朝改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削弱潜在的政敌，冯太后决定从人事和吏治整顿两方面寻找突破口。

冯氏规定地方官员只要治绩突出，任满一年就升迁一级，而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过去，拓跋鲜卑的赋税制度混乱，地方上州郡与县争收租调。现在朝廷严令只能由县级政权征收，削弱了州郡的财权。如此一来，朝廷（其实就是冯太后）加强了对地方官的控制，而地方反抗中央的资本被大为削弱。

冯太后的人事改革还有许多清明的地方。比如北魏一改鲜卑民族的掠夺本质，在朝廷执行班禄制。鲜卑贵族原来是没有薪水的，要用钱的时候就到地方财政上拿，或者公然敲诈勒索、索取贿赂。现在冯太后申明任何官员在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者，处死。考虑到许多官员都拖家带口，俸禄可能不够，朝廷又规定地方官可以按官职高低领取一定数量的俸田，耕种收获，补贴家用。这些俸田不准买卖，官员离职时移交下任。后来其他政权觉得俸田制不错，纷纷效仿。冯太后也算是为中国官僚体系提供了一项原创制度。

有一项改革可能在冯太后心中并不是重点，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均田制。

作为汉人的冯太后对农业结构的基本理解是地主与雇农的合作。

长期战乱制造了大批的无地农民，也让北魏朝廷掌握了大量的无主土地。于是朝廷颁布均田令，根据百姓家庭的不同情况，授予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所授田地有露田、桑田之别。其中露田种植谷物，不准买卖，得田百姓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等经济作物，不需交还国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

均田制的推行对于“不习农桑”的鲜卑经济来说是一大进步。它的本质是国有经济，以国家掌握的土地和人口为基础。战争导致百姓脱离田地，背井离乡。国家掌握着大片无主土地，但缺乏人口。原先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姓不是成了游民就是依附豪强地主，成了后者的荫户。因此，北魏又和地方豪强、宗主展开了对人口的争夺。冯太后在国内推行三长制，抑制地方豪强荫庇户口。朝廷调查人口，规定每五家为邻，设立一个邻长。每五个邻为一里，设立一个里长。每五里为一个党，设立党长。三长协助官府管理人口、征收赋税，大大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保证了均田制需要的人口。

与均田制相适应，朝廷又调整了租调制，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均田制和租调制相结合产生的成功，使它日后漂洋过海，为日本等国所效仿。这些后事大大出乎了当初改革者的预料。

这些改革带有突出的汉族色彩，都是以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但是年幼的拓跋宏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他受到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严密监视，终日战战兢兢，生怕惹怒太皇太后，招来被废的厄运，甚至是杀身之祸。拓跋宏在大权旁落、担惊受怕的环境中长大，如果说他有什么突出之处，就是他成功地处理好了和冯太后的关系，并且养成了沉稳老练的性格，深谙政治。而改革的倡议者和主持人冯太后虽然缺乏崇高的目标和响亮的口号，却在南北朝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只是冯太后精于权谋却疏于政治，长于战术却短于战略。她仅仅

揭开了一次伟大改革的幕布，却没有能力让它成为一场辉煌的大戏。

二

490年，冯太后病逝，拓跋宏将老人家风光大葬，然后从权力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年轻的拓跋宏接受的政治遗产非常复杂。祖母启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却没有解决帝国的深层次问题：北魏王朝与作为政治根基的汉民族依然存在隔阂。中原各地反抗鲜卑统治的造反事件层出不穷，一道道镇压的命令不断从平城发往各地。拓跋宏对祖母的改革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政策方针本身的认同，更是因为冯太后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班子。拓跋丕、穆泰、陆睿等冯太后的老臣把持朝政，依然在分割皇权。拓跋宏通过对冯太后的高度尊崇，以全面继承祖母的政策来压制来自这部分人的潜在政治威胁。

最让拓跋宏头疼的是，带有汉族色彩的改革引起了鲜卑民族内部的不满。

鲜卑贵族是在马上得的天下，王朝建立后也始终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本性。他们居住在祖宗经营多年的首都平城，自豪且自信。他们感谢祖先留下的富贵生活，也愿意为捍卫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冯太后通过自己的权威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推行了许多改革，却丝毫没有触及鲜卑民族的精神层面，拓跋鲜卑依然保持着保守的面貌。当年酋长拓跋力微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在晋朝当质子后返回晋北，他用弹弓打鸟，这个很寻常的行为竟然引起了部落贵族的恐慌。因为在拓跋鲜卑的历史上，都是用弓来射箭，再用箭来射鸟，从来没有人用弹弓打鸟。于是，惶恐的贵族们认为拓跋沙漠汗已经被南方汉族人的风俗习

气给“污染”了，担心他日后继承大位，会改变鲜卑旧俗，进而对部落贵族们不利。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建议拓跋力微杀死儿子，再挑选本分朴实的人为继承人。这些保守的鲜卑贵族对已经开始的改革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冯太后死了，这种情绪可能会寻找途径爆发出来。

从小接受正规儒家教育的拓跋宏显然不是旧式贵族的同路人。

只有继续冯太后开启的改革、仿效中原先进的政治文化，才能破解鲜卑族落后保守的面貌，才能突破王朝发展的瓶颈。

拓跋宏如今需要突破旧贵族的包围，找到一种既可以巩固和扩大皇权又能够推进改革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拓跋宏想到的方法就是迁都。平城是拓跋鲜卑的老根据地，为北魏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埋葬着本民族的列祖列宗，靠近本民族熟悉的草原。但是平城越来越满足不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经济需求，北魏王朝不得不定期从中原各地征调物资和人口来支撑首都的正常运转。随着北魏立国时间越来越长，汉族人成为王朝人口的多数，成为王朝政治的根基，但鲜卑人显然和他们缺乏沟通，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坚定支持。

且不说平城气候恶劣、环境恶化、经济薄弱，也不说平城远离中原腹心地区，不利于王朝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就只说平城笼罩着的浓厚的游牧民族气息和保守的思想氛围就让拓跋宏受不了。当时，柔然的军队不断进犯北魏云中地区，威胁到了平城的安危，拓跋宏经常要处理相关军务。他觉得如果自己再继续和柔然这样后起的游牧民族纠缠下去，北魏就永远摆脱不了游牧民族这个圈子了。现在的北魏王朝已经不是游牧王朝了，需要一次飞跃。那就是迁都。至于迁到什么地方呢？拓跋宏认为：“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崑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计划迁都到中原腹地洛阳去。

洛阳是东周、曹魏和西晋王朝的首都，中原汉族人口聚集，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政治文化氛围，同时也是经济中心。迁都洛阳，不仅可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还可以接受汉族政治遗产的滋养以争取汉族主体的支持。至于平城的旧贵族们，就让他们和游牧后辈柔然人去纠缠较量吧！拓跋宏认定自己给北魏王朝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路径。

三

太和十七年（493），拓跋宏突然嚷嚷着要南伐宋朝，统一全国。

皇帝的行动还很快，在明堂上当众命令太常卿王谌亲自去做龟卜，看看南伐是否吉利。

王谌是九卿之一的太常卿，本不应该由他亲自占卜，可拓跋宏下诏要王谌亲自去做，顿时让群臣感觉到了皇帝对南伐一事的重视。没有人料到，在诏书下达之前，拓跋宏就偷偷把王谌叫到一边面授机宜。没多久，王谌就呈上来一个大利于出兵的“革”兆。当年商朝汤武伐夏前占卜就得了一个“革”卦。

鲜卑人迷信占卜。拓跋宏见此，高兴地宣布：“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吉卦。我们要择日兴兵，南伐宋朝。”群臣知道皇帝要来的真的了。可讨伐南方统一全国是大事，关系到王朝兴衰，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准备好的，更不能儿戏，但是占卜的结果却是有利于出兵的吉卦。大臣们一下子蒙了，都低着头不敢说话。

任城王拓跋澄仗着自己是拓跋宏的叔叔，出来说：“《易经》说‘革’是更改的意思。将欲应天顺人，变革君臣的地位，所以汤武得到‘革’卦是吉卦。但是陛下拥有天下，已经好几代了。现如占卜出

征，只能说是‘伐叛’，不能说是‘革命’。因此，占卜得到‘革’卦，并非君人之卦，并不吉利。”有几个大臣见有人挑头反对南伐，待拓跋澄话落，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拓跋宏厉声反驳说：“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拓跋澄也和侄子杠上了，说：“陛下龙兴已久，怎么能和虎变相提并论！”拓跋宏没成想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气得脸都变了色，厉声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难道想破坏士气，阻碍国家南伐吗！”拓跋澄也不示弱，答道：“社稷的确是陛下的社稷，但臣是社稷的臣子，既然参与政事以备皇上垂问，就不能不竭尽所能，畅所欲言。”拓跋宏早就下定了迁都洛阳的心思，现在提南伐只是找个借口而已。想不到南伐刚提出来，就遭到了拓跋澄的坚决阻挠，拓跋宏心里一下子就烦躁不安起来。拓跋宏毕竟是拓跋宏，很快就从不快情绪中解脱出来，认识到两人都只是将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而已，对方也不见得就是个老顽固。拓跋澄反对南伐，是为国着想。既然为国着想，就不会反对迁都。打定主意后，拓跋宏不再提南伐，而是立刻转移了话题。等到退朝，皇帝车驾还宫后，拓跋宏立刻召拓跋澄来见面。

拓跋澄还没走上台阶，拓跋宏就远远地对他说：“我们再不谈什么革卦了，刚才在明堂之上，我是怕众人争相发言，阻我大计，所以厉色震慑群臣。我现在叫你来，是希望你能了解我的真意。”接着，他把名为南伐、实为迁都的计划单独告诉了拓跋澄。拓跋澄原本是担心年轻的拓跋宏一时兴起，对南宋发动冲动的讨伐伤害国家元气。现在他终于知道了拓跋宏为国家发展着想的真实意图，立即表示支持，说：“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拓跋澄也认为洛阳地处中心，迁都有利于对全国加强统治，是件大好事。

有了叔叔的支持，拓跋宏的心放宽了一些，但还是心存担忧：“北人恋本，突然听到朝廷要迁都，不能不惊扰。”拓跋澄坚定地说：“迁都大事，本来就是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只要陛下圣心

独断，其他人亦何能为也。”拓跋宏受到鼓舞，高兴地说：“如果迁都能成，任城王就是我的张良啊。”

拓跋宏决心甩开群臣，开始“南伐”的准备。他先加封拓跋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再和出身汉族的尚书李冲等人秘密部署。拓跋宏任命李冲负责选拔勇士南征，命令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发民夫，招募兵丁。夏末，拓跋宏参拜了冯太后的永固陵后告别平城，率领大批文臣、武将和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往南去了。

地下的冯太后不知道，自己的孙子从此将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了寒冷的晋北。

平城也想不到，自己从此再也没能成为任何一个政权的首都。

四

拓跋宏率领着大军，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南征途中的洛阳。

来到洛阳前后，河南一带阴雨连绵，让长途跋涉、全副武装的将士们苦不堪言。拓跋宏于是下令全军在洛阳休息待命。

当时，天还下着雨，拓跋宏就兴致勃勃地带着群臣参观了城内残存的汉家宫殿。洛阳从西晋末年开始屡经战乱，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恢宏景象，但是曹魏和西晋各代皇帝对这座城市的长期经营留下了众多的遗迹。满目荒凉的殿址断壁残垣、杂草丛生。拓跋宏触景生情，对左右大臣说：“西晋不修功德，致使宗庙社稷毁于一旦，宫殿荒废至此，朕实在感到痛心。”说完，拓跋宏潸然泪下，吟诵起了《诗经·黍离》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

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熟知历史，担心北魏王朝重蹈西晋的覆辙。其他王朝是在洛阳走到了末日，而对北魏来说，只有留在洛阳才能迎来新生。

为了实现自己的真实目的，拓跋宏披甲上马，拔剑出城，下令全军继续南进。当时，连绵的秋雨已经下了一个月，河南地区道路泥泞，士兵前行困难，士气低落。随行的大臣和将领们原本就对草率的南伐缺乏信心，现在在洛阳的生活又苦不堪言，偏偏遇到皇帝督促上路，纷纷出来劝阻拓跋宏。群臣拦着拓跋宏的马，尚书李冲（他其实是个托儿）指出此次南伐本来就没有取得朝野的一致意见，现在皇上又催促进攻，群臣恳请他收回成命。他的话得到了许多大臣的认同，但拓跋宏紧握缰绳，毅然决然地要继续南伐。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最后哭着劝谏拓跋宏不要南伐了。拓跋宏这时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严肃地说：“此次朝廷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贻笑大方。既然停止南伐，不如就将国都迁到洛阳。”

大臣们听了，面面相觑。拓跋宏终于同意停止南伐了，但是提出了迁都的新要求。谁都不敢抢先发表意见。拓跋宏紧接着说：“诸位不要犹豫了。同意迁都的人站到左边，不同意的人站到右边。”在内心，多数文武官员是不赞成迁都的。但眼前的雨水和危险的南伐是最紧迫的问题，迁都可以停止南伐，因此多数官员只好表示拥护迁都，往左边站了。安定王拓跋休等少数人站到了右边，反对迁都。少数服从多数，南安王拓跋祯代表多数大臣说：“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

拓跋宏精湛的演技环环相扣，到现在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洛阳城残破，拓跋宏先驻蹕在西北角的金墉城（今河南洛阳附近）

。

迁都一事在程序上确定后，拓跋宏给拓跋澄下了一道诏书：“迁

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末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在拓跋宏的心中，所谓的革卦完全应验在了迁都洛阳这件事情上，它完全可以和商汤伐夏相提并论。

拓跋澄回到平城后，宣布了迁都的决定。留守平城的文武大臣闻言无不惊骇失色。他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贵族大臣们虽然不愿意迁都，但一下子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在拓跋澄援引今古，耐心地一个一个地做思想工作，才没有让平城发生大骚乱。

第二年（494）年初，拓跋宏亲自回平城安排迁都事宜。他在大殿上正式宣布迁都。留守平城的鲜卑元勋显贵借机向拓跋宏发难，反对迁都。

燕州刺史穆熊说：“国家北有柔然的危险，南有南齐政权没有臣服，西有吐谷浑的骚扰，东有高句丽的隐患，四方不定，尚待统一。在这个时候迁都，时机不对。况且征讨四方，需要大量战马，平城有马而洛阳没有马，迁都怎能取胜呢？”拓跋宏反驳说：“北方出产马匹，朝廷只要在北方设立牧场，何必担心无马？平城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所以要迁都中原。”尚书于果反对说：“臣也承认地地比不过伊洛，但本朝自先帝以来世代久居平城，百姓已安，一旦南迁，众人未必乐意。”老资格的宗室拓跋丕也反对说：“去年，陛下亲率六军南征，到了洛阳后派任城王回平城宣旨，命臣等讨论迁都大计。臣等初奉恩旨，心中惶惑。迁都大事，应当讯问卜筮，审定是否大吉，然后定夺。”拓跋宏耐心地回答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人的认识超过占卜的力量，我们没有什么疑问，占卜又有什么用呢？帝王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哪能常居一地！本朝远足，世代居于塞外荒漠，平文皇帝开始南下草原，昭成皇帝营建盛乐新城，道武皇帝才迁都平城，朕为什么就不能迁都洛阳呢？”至此，拓跋宏从细节、心理和理论上全盘驳斥了反对迁都的言论。保守大臣们争辩不过，哑口无言。有的人干脆痛哭流涕，表示誓死不离开平城。拓跋宏依旧强

行下诏迁都洛阳。至此，北魏的国家机构南迁的事情算是定了下来。

拓跋宏于是祭拜太庙，告诉列祖列宗要迁都河南的事情，再把祖庙的神主牌位迁往洛阳。平城的王公大臣及后宫一同南迁，许多百姓也扶老携幼开始前往洛阳。整个迁都行动直到第二年的下半年才大致完成。

浩大的北魏迁都工作从谋划到最终完成一共持续了三年之久。

挡我汉化者死

—

迁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拓跋宏的目的是推动整个鲜卑民族的汉化，迁都洛阳为拓跋宏大刀阔斧地深入改革提供了契机。

与祖母冯太后一样，拓跋宏的深入改革也是先从政府人事开始的。

拓跋宏到洛阳不久，南方的大士族王肃就从江南逃奔北方，来到邺城。王肃是东晋大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尤其精通政治，熟知汉族政治思想和制度。拓跋宏听说王肃在邺城，亲自召见。王肃头脑敏捷，对答如流，态度不卑不亢，对国家大事和发展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非常切合拓跋宏的思路。拓跋宏倾心与王肃交谈多日，有时谈至深夜也不觉得疲惫。拓跋宏向汉族靠拢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正需要王肃这样的人才。拓跋宏放心地对王肃委以重任，亲切地呼他为王生。之后北魏王朝的礼乐改革、移风易俗和制度制定，多数是由王肃主持的。在改革的旗帜下，大量有真才实学的汉人得到了重用。而对于反对改革或者思想保守的贵族大臣，拓跋宏通过人事调整，将他们逐步清理出了政治核心。如拓跋宏任命反对迁都的冯太后的亲信拓跋丕留守平城，就是剥夺了他的实权；又如将原本显赫的陆睿由镇北大将军调整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削弱了他的军权。

人事上的改革相对简单，社会改革的难度则大得多。迁都洛阳后，大批鲜卑人南下中原，来到汉族核心地区。这些鲜卑人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穿夹领小袖，与汉族人显得格格不入。多数的鲜卑人不会说汉语，就是在朝堂之上，鲜卑族和汉族的官员之间也不能直接交流。为此，朝廷和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的翻译。习俗与语言的冲突还是其次的，最大的问题是大量鲜卑人来到洛阳，居无定所，又不擅耕种，缺少粮食。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前，南迁的鲜卑人难免人心恋旧，对迁都颇有微词。

拓跋宏很快就将改革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风俗和思想领域。他下令官民禁穿胡服，服装一律依汉制。此令一出，引起了鲜卑人的巨大反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服装、语言及风俗等是与民族心理紧密相连的，是各民族相互认同和区别的主要特征。接到命令的多数鲜卑人没有执行，依然我行我素。留守平城的太傅拓跋丕就公然拒不换装。

太和十九年（495）年初，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的哥哥，又是拓跋宏的岳父，按礼拓跋宏要参加他的葬礼。于是拓跋丕联合陆睿等人上书，请求拓跋宏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当时，朝廷刚刚搬迁到洛阳，百废待兴，如果皇帝公开返回平城参加葬礼，无疑给反对迁都的人增加了口实，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迁都带来的不便。拓跋宏一眼就看出了拓跋丕等人的心思，斥责他们“陷君不义”，下诏将拓跋丕降为并州刺史，调离平城，其他官员相应降职。至于冯熙的葬礼，拓跋宏下令将他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不久，拓跋宏的一个堂兄在洛阳病故了，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堂兄的夫人早死，已经葬在平城，那么这位堂兄是否要葬回平城呢？依礼，拓跋宏应该让人家夫妻团聚，但拓跋宏却借机规定：从平城地区迁移到洛阳的人死后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已死且葬在代地的，妻子死后可以归葬；如果妻子已死且葬在代地的，丈夫死在洛阳后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拓跋宏还干脆将所有南迁官民的籍贯

都改为河南洛阳。

类似的改革很多，比如让鲜卑人学习汉语。拓跋宏首先在朝堂上做起，规定：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堂上不讲汉语的，一律免官；三十岁以上的官员不强求，但也要慢慢学。又比如下令鲜卑人将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拓跋宏率先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因此拓跋宏就变成了元宏。其他的，比如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大孤氏改为陆氏。

语言和姓氏等是一个民族的鲜明特征，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拓跋宏要求在短时间内告别以往的民族特征，尽量减少民族间的差异，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整场改革行动更多的是依靠拓跋宏的皇帝权威去强力推行的。一次，拓跋宏出去巡视的时候看到许多鲜卑妇女还穿着胡服，回来后就责备相关官员没有落实改革措施，进行了处罚。

为了让皇族起表率作用，拓跋宏下令北方四个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与各个高门大族联姻，与汉族大家的关系错综复杂，拓跋宏娶了他的女儿为妃。拓跋宏的六个弟弟已经娶妻，也在哥哥的要求下再婚，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

有一次，拓跋宏在洛阳街道上看到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上，全副鲜卑打扮。回到宫中，拓跋宏就召见群臣，公开责备了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查不严，落实政策不力。拓跋澄自我辩解说汉化政策贯彻落实得不错，只有少数人还固执于鲜卑服饰和语言。拓跋宏尖锐地反驳说：“难道要多数人都保留鲜卑服饰，讲鲜卑话，才能算你督查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他气鼓鼓地转向史官，命令将这次争吵如实记载在国史上。可见，拓跋宏推动汉化政策是如何雷厉风行。

迁都和汉化改革，是拓跋宏眼中国家正确发展的道路。为此，他

不近人情而又孤独地前行着。

二

不客气地说，拓跋宏的改革是对鲜卑族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否定。

这样的改革必然遭到本民族保守势力的反对。拓跋宏推行的力度越大，意愿越坚决，反对派设置的阻力就越大。

拓跋宏对反对改革势力的做法只有一个：强力镇压。

拓跋宏很早就立长子元恂为太子。太和十七年（493），元恂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在拓跋宏动身去洛阳“南伐”的前夕，被立为太子。之后，元恂跟随父亲来到了洛阳。拓跋宏出外征巡时，元恂就留守都城，主持庙祀。父子关系还是和睦的。

元恂年纪轻轻，却长得很胖。一到夏天，就浑身流汗，很不舒服。迁都洛阳后，元恂对河南的气候很不适应，老是想念平城相对凉爽的气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他的这种思想是纯真的，是不带任何政治因素的。

496年，拓跋宏巡幸嵩山，留元恂在洛阳主持政务。

出巡途中，拓跋宏接到了皇后的紧急报告，说元恂要逃回平城去，还亲手杀死了苦苦劝他留在洛阳的中庶子高道悦。领军元俨为了防止变乱，赶紧关闭宫门，才阻止了太子的出逃。接到报告的拓跋宏中止了出巡，匆匆返回洛阳。

经过初步审讯，元恂出逃的经过非常清楚，他自己也供认不讳。元恂因此被捕。拓跋宏将儿子的出逃上升到了政治事故的高度。这也

难怪，拓跋宏长期在改革和反改革的漩涡之中挣扎斗争。他独自推动改革的车轮向前行进，每一次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元恂逃到哪里避暑不好，偏偏要选择平城。平城是拓跋宏要舍弃的鲜卑民族落后保守的象征，元恂要逃回去，这不是公开和自己唱对台戏，反对改革吗？这样的太子还怎么能托付大任？

拓跋宏迅速废黜了元恂的太子位，当众斥骂他的罪过，还亲自杖责儿子。后来打累了，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替他杖责了元恂百余下。元恂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顿打下来，遍体鳞伤，足足一个月躺在床上难以动身。拓跋宏还恶狠狠地说：“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之后，废太子元恂被软禁在河阳，由兵丁看守，每日只有粗食过活。残酷的政治斗争让拓跋宏丧失了理性。

其实，真正反对迁都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元丕、穆泰、陆睿等人。

穆泰出身鲜卑贵族世家，祖父穆崇对拓跋珪有救命之恩，任太尉，封安邑公，父亲穆真是冯太后的姐夫。穆泰本人又娶了章武长公主，既是功臣之后，又是皇亲国戚，先后担任尚书右仆射、定州刺史、征北将军等职。穆泰对拓跋宏也有“救命之恩”。最初的时候，大权独揽的冯太后曾将拓跋宏幽禁，计划废黜。穆泰劝谏冯太后不要随意废立皇帝，保全了拓跋宏的皇位。拓跋宏亲政后，对穆泰很感激，君臣关系一度非常亲近。但是在拓跋宏推动迁都和汉化改革后，穆泰毅然站在了反对立场上。

太子元恂要逃回平城的那个夏天，穆泰正在定州刺史的任上。他对逐渐深入的改革难以接受，借口不适应定州的气候奏请转任恒州刺史（治所就是平城）。当时的恒州刺史是思想同样保守的陆睿。拓跋宏于是决定让穆泰、陆睿二人对调一下职位。

穆泰在回平城的路上，不满和失落的情绪让他做出了割据平城叛

乱的决定。等他到恒州时，陆睿还未起程，穆泰就煽动陆睿共同起兵。两人一拍即合，并联络了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元思誉等人参与。其中元隆、元超、元业三人是元丕的儿子。这简直是一次保守势力的大集合。他们秘密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新主，要与拓跋宏分庭抗礼。

元颐对起事缺乏信心。推举他的人刚走，他就派人快马向拓跋宏告密。拓跋宏立即派任城王元澄率领大军讨伐，元澄先派治书侍御李焕潜入平城了解情况。李焕在平城展开了成功的攻心统战工作，将叛乱分子各个击破，很快瓦解了叛军的士气。穆泰自度必败，一不做，二不休，亲自带领百余人围攻李焕的住处。结果没有打下来，穆泰只好单枪匹马逃跑，最终被擒。元澄的大军迅速进城，将叛乱分子一一抓获。

事后，拓跋宏亲临平城，审问罪犯，穆泰等多人被斩首。陆睿是老臣，冯太后曾赐他铁券金书，答应许他不死。拓跋宏便没有将陆睿斩首，而是赐死。平城发生兵变时，元丕已经八十岁了，并不在城内，更没有参与兵变。但他的儿子曾将密谋告诉过父亲，元丕没有发表意见。事后，元丕被认为“心颇然之”，应该连坐受死。但拓跋宏念他在冯太后当年要废黜自己时曾和穆泰一起固谏，加上元丕也有免死诏书，因此只是将他削爵为民。乐陵王元思誉、穆熊等也被削爵为民。

平城兵变未遂，拓跋宏沉重打击了反对势力，也让他加深了对反对势力的警惕和仇视。

平城的兵变平息后不到四个月，拓跋宏下达了对废太子元恂的处决令。

废太子元恂在河阳每日忍饥挨饿，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他每天

礼佛诵经，还经常书写学佛心得。太和二十一年（497）四月，中尉李彪告发元恂与左右谋逆。拓跋宏随即派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元禧用“椒酒”赐死元恂。元恂死后，粗棺常服，被葬于河阳城。

元恂死后的第二年，御史台令龙文观违法当死。可能是为了开脱自己，龙文观交代说，他曾经接触过废太子元恂，说元恂被拘押时，写了很多书信。龙文观不知道元恂所写内容，供认中尉李彪和侍御史贾尚很清楚。为了查明此事，廷尉收审贾尚。当时李彪已被免官回到老家，廷尉奏请拓跋宏将李彪收赴洛阳。拓跋宏非但不准，还赦免了李彪，并指示不再追查龙文观交代的这条线索。贾尚随即被无罪释放，回家后没几天就“暴病”而死了。

这是一件令人疑惑重重的无头案。元恂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拓跋宏为什么不让追查下去？拓跋宏明显偏袒李彪，而对元恂的死漠不关心。最大的可能性是元恂写了一些对李彪不利的文字，招致后者的诬告。而拓跋宏刚刚经过平城兵变的“考验”，多疑烦躁。他本来就对废太子不放心，刚好借李彪的诬告置儿子于死地。事后，拓跋宏也知道其中有猫腻，但他维权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

元恂是无辜的，是一场孤独艰难改革的牺牲品。

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跋宏才是北魏王朝真正的开国君主。

北魏出自代国，拓跋宏的先辈们利用西晋末年的乱世建立了割据政权。像它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五胡乱华时期很多，尽管北魏实力稍强，但也没有真正得到中原百姓的认同。而拓跋宏实现了让北魏从一个北方蛮夷政权到全国政权的飞跃，他的迁都和改革让北魏融入了

中原。

南朝名将陈庆之观察北魏后，向南方人感叹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可见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北魏已不再是割据的蛮夷政权了。

这要归功于拓跋宏，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汉化程度最深的改革。正因为程度之深，导致了本民族内部的强烈反对。在拓跋宏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能打破民族间的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及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拓跋宏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拓跋宏尽管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单从一些数据上来看，他改革的效果也非常明显。西晋鼎盛太康年间，朝廷“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到北魏正光元年（520），朝廷控制的人口就超过了五百万户，是西晋太康时期的两倍多。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多寡是国力强盛的核心标准。

洛阳城从西晋末年起，经历多场战火，拓跋宏到来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几乎就是一片废墟。经过拓跋宏的营建和北魏之后几十年的经营，洛阳迅速恢复为中原重镇，规模宏大，市井繁荣。整个洛阳“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

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

四方人士汇聚洛阳。城南四里的洛水之上，有一座浮桥叫永桥。北魏在桥南建造了整齐的建筑群，招待各方来客。从南方投奔而来的“吴人”先居住在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洛阳人将归正里叫作“吴人坊”。南齐建安王萧宝夤（yín）来投降的时候，北魏就在归正里给他安排了府邸。后来萧宝夤娶了北魏公主，耻于居住在城外，得到允许后移居城内。后来，南梁的西丰侯萧正德来投降，也先住金陵馆，后来在归正里找到了房子。从北方投靠来的“北夷”先被安排在燕然馆，三年后赐宅归德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酋长还派遣儿子入侍北魏朝廷。因为忍受不了黄河流域的炎热，这些人秋来春去，在当时被称为“雁臣”。从东方依附而来的“东夷”先住在扶桑馆，之后再赐宅慕化里。而从西方依附而来的“西夷”则入住崦嵫（yān zī）馆，之后再赐宅慕义里。仅这些附化之民，就超过了一万户。

改革成功后的北魏国力强盛，四方百姓归附。拓跋宏也以天下共主自居，不断发动对南朝的征伐。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初一，拓跋宏于南征途中逝世，年仅三十三岁，史称孝文帝——北魏皇帝都不长寿。

第二章 刘宋王朝

草根皇帝奋斗史

—

了解完了北朝的主角北魏，我们再来看看南朝的主角：刘宋王朝。

东晋朝廷是建立在司马皇室和各世家大族的势力均衡上的。司马家族的权威和声望并不崇高——这也是东晋权臣迭出的重要原因，世家大族更多的只是将朝廷作为认可自身权益的招牌而已。长期以来，皇室形同傀儡，全赖地方藩镇和世族相互厮杀，谁都没有能力独霸大权，司马家族才能维持微弱的统治。桓玄一度推翻司马家族自立，更是让司马皇室名声扫地。东晋末年，军政大权完全操于权臣刘裕之手。刘裕势力日增，无人能敌。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刘裕篡晋自立只是时间的问题。

司马皇室对刘裕的步步紧逼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在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因为痴傻，对刘裕的篡逆之心毫无察觉，但是他的弟弟司马德文却不是傻瓜，他很清楚自家的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司马德文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儿子，最早被封为琅琊王，在朝堂担任地位

崇高的虚职。他和哥哥的感情很好。司马德宗被桓玄废掉的时候，司马德文就陪伴着哥哥居住在浔阳，桓玄败死后，又一起迁到江陵。

桓玄死后，部将桓振继续叛乱，夺回了晋安帝司马德宗。当时桓振跃马奋戈，冲到司马德宗面前要为主子的死讨个说法。他瞪着眼睛对司马德宗说：“臣桓氏一家有什么辜负国家的地方，要遭到朝廷的屠灭之祸？”司马德文当时正在榻上陪伴瑟瑟发抖的白痴哥哥，见事情紧急，下床对桓振说：“这难道是我们兄弟的意思吗？”这句话说得桓振无言以对。的确，司马德宗是个天下皆知的白痴，连话都不会说，更不用说谋划屠杀桓氏家族了，而桓玄是被刘裕打败的，桓氏一家是在建康被杀的，与这对可怜的兄弟有什么关系。这句话也说出了司马德文兄弟的无奈，也恰好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身为皇室成员，他们对朝廷大事根本做不了主，却要在乱世中因为血统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418年，刘裕急于篡位，密令党羽中书侍郎王韶之买通司马德宗左右侍从，要伺机除掉晋安帝司马德宗。司马德文知道刘裕有杀害哥哥的企图，加上司马德宗这个人不能辨饥寒，没有自理自卫能力，因此他便坚持天天随侍于司马德宗左右，这让王韶之等人一时无法下手。年底，司马德文突患急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王韶之乘机入后宫东堂，指挥皇帝侍从用散衣结成带子，将司马德宗活活勒死。司马德宗时年三十七岁，在位二十二年。还在府中医治的司马德文突然听到宫中传出皇帝暴病驾崩的噩耗，痛哭失声。他哭的不仅是兄长，还有东晋的国运。

杀死司马德宗后，刘裕本想自己登基，但之前社会上有图谶盛传“昌明（晋孝武帝司马曜）之后有二帝”。刘裕觉得人心对晋朝还有依恋，时机尚不成熟，决定再等一两年。他指使党羽伪造遗诏，于418年改立司马德文为皇帝，次年改年号为元熙。

元熙元年正月，司马德文为了表彰刘裕的“策立之功”，下诏封刘

裕为宋王，将徐州的海陵、东海、北谯、北梁，豫州的新蔡，兖州的北陈留，司州的陈郡、汝南、颍川、荥阳共十个郡增划为宋王封地。到了十二月，司马德文又不得不允许刘裕佩戴十二旒的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虞宫县。与司马德文的祖先司马昭一样，刘裕控制朝堂，封宋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各有爵命。

419年就这么平淡地过去了，转眼到了420年。

刘裕觉得受禅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自己也已经五十八岁了。一生征战的刘裕遍体鳞伤，身体情况并不好，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在生命的时间长跑中输给新皇帝司马德文。因此他急于在有生之年称帝，但是下面的大臣们却没有再出现刘穆之那样知道他心意的人。也许他们觉得主子刚扶立了新皇帝不到一年，不会马上受禅登基。或许还有人以为他要做第二个曹操或司马昭。

刘裕处于很想受禅又难以启齿的尴尬中。于是他想了个方法，在宋国首都寿阳召集群臣宴饮。席间，刘裕感叹说：“桓玄篡位的时候晋室鼎命发生移动。我首倡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名就，也接受了皇上的九锡之礼。现在，我已是迟暮之年，身份尊贵至此，生怕物极必反，不能久安。因此我计划奉还爵位，归老京师。”刘裕这番话的表面意思是回顾一生的成就，感叹自己年老迟暮，计划退休养老，实际上是希望群臣向他劝进。正如刘裕担心的，自己已经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很容易物极必反。他想再进一步，不仅是自保的手段，也是胸中之志的体现。可惜大臣们都只理解了刘裕讲话表面的意思，纷纷争相拍马屁，盛赞宋王的功德。刘裕也就和大家嘻嘻哈哈，等天晚了，宴会也就散了。

参加宴会的中书令傅亮在回家的途中，突然灵光闪现。他猛然意

识到，这不是刘裕的称帝暗示吗？傅亮连忙折回宋王府，求见刘裕。当时宋王府的宫门已经关闭，傅亮也不顾礼节，叩门请见。傅亮见到刘裕后真的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憋了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臣请求暂时回建康。”刘裕马上就理解了傅亮的意思，没有多余的话，直接问道：“你需要多少人马相送？”傅亮说：“数十人就足够了。”刘裕马上布置人员，跟着傅亮去建康办事，听从他的指挥。傅亮得到刘裕的首肯后，马上告辞出府。

几天后，傅亮带着草拟好的禅位诏书入宫去见司马德文，让他誊抄一份。登基不到一年的司马德文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经过片刻的惊讶，司马德文欣然允诺。他边抄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篡位的时候晋朝其实已经亡国了。多亏刘公出兵平定，才恢复晋朝。我们司马家族得以继续君临天下近二十年全靠刘公之力。今日禅位之事，我心甘情愿，没有什么可怨恨的。”司马德文抄誉完诏书，交给傅亮，然后主动携后妃等眷属搬出宫去。傅亮马上宣布了司马德文禅让的消息。

刘裕得知这个意料之中的消息后，依照惯例上表推辞。但是司马德文早已经自去了帝号，搬进原来的琅琊王官邸居住。也就是说，在那几天，天下已经没有了皇帝。刘裕送上去的让表自然也没有了呈送对象。相反，以陈留王曹虔嗣（曹奂的后代）为首的建康贵族官员和宋国的群臣二百七十人向刘裕上表劝进。刘裕还是不答应即位。

依照之前的惯例，权臣还要三请。这回，太史令骆达呈上了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更加恳切地恭请刘裕登基。刘裕终于答应。六月，刘裕在建康南郊登上受禅台，接受皇帝位，并举办柴燎告天仪式。

刘裕定新王朝国号为宋，他就是宋武帝。傅亮因为有佐命辅立的大功被封为建城县公，食邑二千户，并且入值中书省，专门负责诏

命，权重一时。司马德文则被降封为零陵王，迁居秣陵县城，由冠军将军刘遵考带兵监管。《宋书》记载新朝给司马德文的待遇是：“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勿称诏。”也就是说，宋朝以零陵一个郡的物产来供养司马德文。司马德文不仅保持皇帝的待遇和礼仪不变，而且在与皇帝的来往中可以不用称臣，在封国之内奉行晋朝正朔。

遗憾的是，史载：“有其文而不备其礼。”逊帝的待遇是新朝给的，真正执行到什么程度，自然是由新王朝来决定。之前禅位的刘协 and 曹奂的待遇都还不错，但是司马德文就没有前辈那么幸福了。刘裕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司马德文继续活在世上。

刘裕常年征战，养成了置对手于死地的习惯。对他来说，让一个逊位的、明显要比自己活得长的逊帝活在身边，简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万一天下还有人对逊帝心存感情怎么办？万一在自己百年之后，逊帝复辟怎么办？只是因为之前的禅让先例规定了逊帝的一系列优待条件，刘裕才不得不做做样子。

刘裕不仅派兵监视司马德文的一举一动，而且派人时刻寻找机会实施暗杀。司马德文的皇后姓褚，褚皇后的哥哥褚秀之、褚淡之是晋朝的太常卿和侍中，在妹夫落难后迅速投靠刘裕，协助监视帝、后。褚皇后在司马德文禅让之时已经怀孕，在司马德文逊位后生下一个儿子。刘裕怕这个婴儿日后对刘家不利，下达了暗杀令。褚秀之兄弟便残忍地将自己刚出生的外甥杀死。经过这件事之后，司马德文夫妇心惊胆战，日夜生活在惊恐之中。夫妇俩整天共处一室，一切饮食都由褚皇后亲自动手。刘裕及其爪牙一时无法下手。

永初元年（420）九月，刘裕命令琅琊侍中、司马德文原来的侍从张伟携带毒酒一瓶前去毒杀司马德文。张伟不忍心谋害旧主，又害怕对刘裕无法交代，在路上饮毒酒自杀了。

刘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遣褚秀之兄弟出马。兄弟二人假意去探望褚皇后，士兵悄悄地跟随在他们身后。褚皇后听说兄长来了，暂时离开丈夫出门相迎。士兵们乘机越墙跳入室内，将毒酒放在司马德文面前，逼他饮下。

司马德文摇头拒绝说：“佛曰‘人凡自杀，转世不能再投人胎’。”

见他不从，几个兵士一拥而上，将司马德文按在床上，用被子将他捂死，然后跳墙而去。司马德文死时三十六岁。消息传出后，刘裕率文武百官哭悼了三天，追谥司马德文为恭皇帝，葬冲平陵（今江苏江宁县蒋山西南）。

司马德文死后，刘裕命司马元瑜继承零陵王爵位——零陵国一直传国到南齐。之后，刘裕对司马皇室痛下杀手，几乎夷平了全族，开了后世受禅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的先河。

尽管刘裕在禅让一事上开了一个坏头，但他通过南征北战结束了江南在东晋后期的动荡局面，并开启了宋朝早期的安康盛世。

二

刘裕的登基是大势所趋，是自然的政治结果。

多年来，东晋王朝名存实亡，完全丧失了制约地方，尤其是手握实权的军阀的能力。在野心勃勃的造反者面前，东晋的最后几代皇帝只能逆来顺受，毫无抵抗之力。而刘裕不仅拥有军队，而且代表着他所在阶层的利益。东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力量已经大大衰弱，刘裕所代表的寒门地主逐渐掌握实权，他所代表阶级的百姓自然期望出现一个寒门皇帝。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东晋末期的乱政和动荡已经让

普通百姓对司马家族丧失了信任。失去了民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君临天下的道德基础。而刘裕作为事实上的主政者，他的功绩和能力有目共睹。人心已经倾向了刘裕一边。

刘裕的崛起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以个人出身为考核标准的门阀政治的瓦解，和一个新的平民政治时代的到来。

刘裕的成功也是军权对皇权的胜利，是军权对皇权的第一次完全颠覆。刘裕通过控制军队建立功勋，最终获得天下。之后的南北朝权臣都出身于军队将领，都是依靠控制的军队谋取政权。这在之后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作为从社会底层跃起的皇帝，刘裕即位后做得很出色。

魏晋之后，皇室、官府、世家无不崇尚奢华，但孤寒出身的刘裕从小就知道稼穡艰辛。他平时清简寡欲，事事严整有度，车马不加装饰，后宫不奏音乐，内府不藏财宝，甚至连床脚上的金钉也令人取下，换上铁钉。女儿出嫁，嫁妆绝无锦绣金玉；日常回到家里，马上脱掉公服，只穿普通衣衫，脚上就穿一双连齿木屐；住处用土屏风、布灯笼、麻绳拂。他喜欢逍遥散步，每次只带几个随从，从不要任何仪仗。

刘裕对珠玉车马、丝竹女宠十分节制。一次，长史殷仲文上奏朝廷应该备齐音乐，刘裕以没有闲暇且不会欣赏为由推脱了。殷仲文再劝刘裕经常听听自然会懂得欣赏，刘裕直接回答说：“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刘裕患有热病和刀伤，需要睡在冷物上。于是宁州就进献了光彩艳丽、价逾百金的琥珍枕。刘裕听说琥珀可以疗伤，便令人捣碎分发给将士。刘裕平定关中的时候，得到了姚兴家族的女儿。刘裕一度非常宠爱她，并因此荒废了政事。谢晦劝他，刘裕就马上将这个女子遣走，恢复了勤政的生活。

刘裕不仅内外奉禁，处处节俭，还能不忘穷时。为了警诫后人，

他在宫中悬挂了当年做工时使用过的农具和补缀多层的破棉袄。侍中袁（zhī）盛上奏称赞皇帝节俭朴素。刘裕回答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意思是老农夫过上我这样的生活，还觉得过分呢。后来，刘裕的孙子宋孝武帝刘骏看见这些东西，批评祖父是乡巴佬。

执政期间，刘裕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豪强兼并、减轻人民负担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与民生息。可惜的是，刘裕只做了两年多皇帝就驾崩了，时年六十岁。不过他还是开启了一个小康世界的大门，在宋武帝刘裕和其子宋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南方出现了难得的安定局面，史称“元嘉之治”。

权力场中的君臣际会

—

宋武帝刘裕是个奉献型的皇帝。他戎马一生，打下江山，还来不及享受就驾崩了，把大好河山留给了子孙。

谁让刘裕出身草根呢？他的起点太低了，好不容易奋斗到顶点当皇帝时已经五十八岁，在古代这是彻彻底底的高龄。刘裕永初三年（422）五月病死，长子刘义符即位，当时只有十七岁，史称少帝。

刘裕有子七人，按长幼排序分别是：刘义符、刘义真、刘义隆、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宣、刘义季。刘裕年过四旬才有了第一个儿子，他担心刘义符还小，不能治理好一个新成立的王朝，临终前指定了四个顾命大臣辅佐儿子。这四个人分别是司空徐羨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和镇北将军檀道济。

徐羨之，和刘裕一样出身草根，没正经念过书，但是把握全局、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他在刘裕初起时就进了刘裕的幕府，开始是做刘穆之的副手，刘穆之死后成了刘裕的大管家，称得上是刘宋王朝的元老重臣。由徐羨之来领衔顾命大臣队伍，朝野上下都没有意见。

傅亮，我们在上一节已经熟悉了。他是替刘裕向司马家族逼宫的关键人物，在刘宋王朝建立的关键时刻立下大功。所以刘裕把他也安排进了顾命队伍。

谢晦，长于谋略，在刘裕北伐中原收复两京的行动计划中，十策有九策是谢晦出的主意。同时，他在四人中出身最好，是著名的陈郡谢氏的成员，让他当顾命大臣，也是在拉拢江南世家大族的势力。

檀道济，是北府兵的旧将。北府兵是刘裕发家的基础，是他南征北战的私家军。可惜在北伐战争中先胜后败，北府兵精锐损失殆尽，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毛修之、朱龄石等名将相继陨落。檀道济是仅存的重要将领，指挥着北府兵余部。

这样一个顾命大臣班子，不仅能力出众，兼顾各方利益，而且成员绝对效忠刘宋皇室，是一个成功的、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导班子。但问题就出在这个班子太强势，把朝政权力抓得太紧，反而让皇帝成了摆设。

宋少帝刘义符也实在是不成器。他即位后，不理朝政，嬉戏无度，让朝野上下失望。史书说他居丧无礼，又好为游狎之事，在给父皇刘裕守孝期间就不遵丧礼，召集乐工伶官歌唱奏乐取乐。还在宫中华林园开办市场，亲自开店沽酒叫卖。后来觉得做买卖不过瘾，又开读聚土，挖人工湖、造龙船，和随从们一起呼喊号子拉船取乐。朝臣谏阻，刘义符根本就不听。

既然小皇帝不听劝，徐羨之等人也没客气，直接替老皇帝刘裕教训了刘义符。方法很简单——废帝！

要废帝就先要想好立哪位为新皇。按照长幼顺序，应该拥立刘裕的第二个儿子庐陵王刘义真。这个刘义真就是当年刘裕留在长安镇守关中的那个小孩子，北方大败后侥幸从长安逃了回来。大难不死后，刘义真比较排斥军事，反而与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人交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刘义真扬言如果自己当了皇帝，要任命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让僧人慧琳做西豫州都督——这西豫州都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指挥宋朝精锐军队镇守南北交战前线，权势之大、责任

之重，可想而知。说者也许无心，听到传言的徐羨之等人就担心了：一旦刘义真成了新皇帝，我们权位不保啊！于是决定放弃刘义真，并找机会铲除掉。恰好刘义符、刘义真两兄弟关系不好，徐羨之等人就告发刘义真“潜怀异图”，以皇帝的名义废刘义真为庶人，安排在新安郡软禁。

再选下去就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远在荆州刺史任上的宜都王刘义隆。徐羨之觉得这个小孩子没什么问题，决定以刘义隆取代刘义符。

废帝计划开始了！首先得准备军队，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底气。谢晦是领军将军，手上有兵。他借口自家府舍房屋破败，要翻新修理，让家人都搬出去，调集了一拨将士进府，名义上修房子，实际上准备动刀子。之后，就是在班子内部统一思想认识。在建康的徐羨之、傅亮和谢晦三个人都意见一致，关键是镇北将军檀道济在外地统兵，不知道他的心意如何。檀道济名声在外，又统率着北府兵，他的立场如何关系到废帝行动能否成功。于是，徐羨之把檀道济叫到建康来，告诉了他废帝计划。檀道济起初不赞成，但是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也同意参与废帝行动。

行动的前一天晚上，檀道济和谢晦一起夜宿领军府。两人同居一室，世家出身的谢晦紧张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行伍出身的檀道济睡得又快又沉。谢晦自叹不如。

第二天清晨，檀道济率领尖兵打前阵，徐羨之等人带着大部队跟进，冲向皇宫。当天值日的中书舍人已经被买通，警卫们都木然不动，看着一行人鱼贯进入皇宫。前一天，宋少帝刘义符在华林园玩到很晚，睡在龙船上。乱哄哄的政变队伍把刘义符惊醒了。他看到全副武装的将士冲杀过来，知道不妙，赶紧指挥左右随从抵抗。一场小规模的战斗爆发了，政变将士杀死了两名皇宫随从，刘义符手指被砍伤，疼得嗷嗷大叫起来，最终束手就擒。徐羨之等人没收了刘义符的

皇帝玺绶，扶着他走出皇宫，先安排他在东宫居住，很快就送往吴郡软禁。刘义符前脚刚走，徐羨之等人就担心将来遭到报复，随即派人去吴郡刺杀刘义符。刘义符暂居在吴县金昌亭，看到杀手吓得拔腿就跑。杀手用门栓将刘义符打倒，再补上一刀，将其杀死。同时，徐羨之等人还派人去新安郡杀死了刘义真。兄弟俩死的时候，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正是走向成熟的大好年纪。

宋少帝刘义符被废的理由是嬉戏胡闹。不过，和之后孝武帝、前废帝、宋明帝、后废帝等人的荒唐行径相比，刘义符的行为太小儿科了，充其量也就是小孩子的不懂事瞎胡闹而已。刘义符被废得实在是有些“冤”。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二

刘义符被废后，傅亮率一行人逆江而上，到江陵奉迎宜都王刘义隆到建康即位。

刘义隆并不知晓徐羨之他们的废帝计划，如今听傅亮说大哥刘义符被大臣们从龙椅上赶下来，而且已经死了，二哥刘义真也死了。他无比震惊。不知道傅亮是如何向刘义隆解释的，但刘义隆确信两位哥哥是被谋杀的。他悲从心来，当着迎接他登基的人就号啕大哭。过了许久，刘义隆又拉住傅亮详细询问大哥、二哥遭废和遇害的详细情况，一边问一边悲号呜咽。他哭得如此伤心，以至于部下、侍从们都低下头，不敢仰视。傅亮不知如何解释，汗流浹背，呆若木鸡。他知道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自己和徐羨之等人的行为都是弑君。一颗苍凉、恐惧的种子开始在傅亮的心底扎根、发芽。

好在，刘义隆没有过分纠缠两位哥哥的死，同意继任皇帝，改号

元嘉，史称宋文帝。

刘义隆在心底对两位哥哥的死耿耿于怀，更对徐羨之等人拥有轻易废杀、更立皇帝的能力如鲠在喉。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没有帝王会允许大臣们对皇权构成威胁，更不用说能够弑君换帝了。刘义隆的皇位是徐羨之政变集团“赐予”的，他是两位哥哥之死的最终受益者，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他要惩治徐羨之等人。但刘义隆深知徐羨之等人盘踞朝野，掌握大权，不是能轻易铲除的，所以对徐羨之等人采取了迷惑和安抚的策略。他登基后并没有动徐羨之等人，而是给他们加官晋爵，由他们继续掌权。

宋文帝刘义隆比宋少帝刘义符要合格得多，他学习认真、工作勤奋、待人谦虚，很符合明君圣主的标准，也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可。随着刘义隆的成年，徐羨之四人已经没有理由继续辅政了。

元嘉二年（425），徐羨之与傅亮上表，要把实权归还给刘义隆。刘义隆开始还不同意，推辞了三次。徐羨之两人就连续请求了三次。最后刘义隆才同意。徐羨之逊位，退居私第。

归政前，徐羨之的侄子徐佩之、侍中程道惠、吴兴太守王韶之等人都苦苦劝他不要放弃实权。徐羨之没有听从，不过他也留了一手。刘义隆当皇帝前是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南方政权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州府。两地人口密集、经济繁荣，是王朝赋税和兵源的主要来源。首都建康隶属扬州，扬州处于长江下游，以江陵为首府的荆州在它的上游，对建康形成逼迫之势。所以，荆州的军事重要性更胜扬州。历任荆州刺史的不是朝廷重臣、权臣就是皇族子弟。东晋以来，叛乱者也多次以荆州为割据地和建康的朝廷对抗，比如王敦、桓玄、刘毅。荆州刺史的人选非常重要。刘义隆当皇帝后，荆州刺史就出缺了。徐羨之不等刘义隆动身，便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徐羨之退位后，谢晦还在荆州拥有重兵。他们一派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

刘义隆亲政后，不露声色，暗中抓紧积蓄力量。他任命自己当荆州刺史时的亲信到彦之为中领军，掌握首都的军队，还努力争取世族豪门的支持。默默等待时机成熟。

元嘉三年（426）正月的一天，正是南方最冷的时节。建康城里阴冷刺骨，街上少有行人。皇宫里传出诏书，宣召徐羨之、傅亮二人进宫。傅亮接到诏书，乘车就向皇宫赶去。走到宫门口的时候，傅亮遇到了谢晦的弟弟谢朏。谢朏是当天皇宫值班的黄门郎。他拦住傅亮，轻声对他说：“殿内有异，皇上可能要处分大臣。”傅亮心中的隐忧终于爆发了。他慌忙借口嫂子病重，让人传话申请暂时回家。不等刘义隆回复，傅亮就夺了一匹马，向城外跑去。

傅亮逃命前，不忘派人通知徐羨之。徐羨之正乘车前往皇宫途中，听到警报也赶紧驱车向城外跑去。出城后，徐羨之可能觉得车辆目标太大了，舍车步行。在这个南方寒冬的早晨，已经六十三岁的徐羨之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了新林。刘义隆知道徐羨之、傅亮两个人都没来，便派到彦之和大臣王华带兵追捕。徐羨之后有追兵，又前路茫然，最后逃入一个陶灶中，拔剑自刭而死。

傅亮出城后，也茫然不知所去。冥冥中，他知道自己犯的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想到自己为权位奔波一生，到头来落得如此结果，傅亮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他骑马来到哥哥傅迪的墓前。在之后的时辰里，傅亮就待在墓地，直到追兵将他逮捕。在被押解回城的途中，刘义隆派人送来了诛杀傅亮的诏书，还给傅亮带了一句话：“我想起了当日你在江陵无言以对但还算坦诚的表现，决定只杀你一人，不株连你的家人。”傅亮被杀，时年五十三岁。

刘义隆旗开得胜后，立即公布徐羨之、傅亮、谢晦杀害宋少帝和庐陵王的罪行，宣布捕杀三人。谢晦不在建康，他的儿子谢世休和弟弟谢朏等家人受到株连，同时遇害。

四个顾命大臣中还剩下领兵在外的谢晦和檀道济。刘义隆决定对他们区别对待、分化合并。檀道济是废帝弑君行为的胁从，并不是主谋，加上他掌握北府兵，刘义隆还要仰仗他去打败谢晦，所以对其安抚利用。他将檀道济从广陵召回建康，开诚布公地说：“废立之事，你未参与谋划，我不加追究。”檀道济心中的一块石头顿时落地，不禁对刘义隆感恩戴德。接着，刘义隆说：“如今谢晦割据荆州，抗表犯上，不知你有何良策？”檀道济马上分析：“谢晦老练干达，富有谋略，但他未曾亲临疆场，军事非其所长。若陛下信任，请让我率兵征讨他。我可一战擒之。”刘义隆大喜。

谢晦至此被彻底孤立。诛杀徐羨之的第二个月，刘义隆就迅速组织大军，宣布御驾亲征荆州，以到彦之为先锋，檀道济随后，率水师溯长江西上。

谢晦得知刘义隆亲征，留下另一个弟弟谢遁带领一万士兵留守江陵，亲率水师两万人，以长史庾登之为参军，顺江而下迎战。出师要有名，不然对军心和民心不利。战前，谢晦很高调地上表刘义隆，盛赞徐羨之、傅亮等人忠贞为国，不幸为“奸臣”所害。谢晦不敢说幕后凶手就是皇帝刘义隆，把当时主政的王弘、王华和王昙首等人指为奸臣，高举“清君侧”的大旗。刘宋王朝第一次内战就此爆发。

谢晦和到彦之两军在现在的长江湖南岳阳段相遇。谢晦行军打仗全靠长史庾登之。庾登之率军占领了巴陵（今湖南岳阳），开局有利，却不敢对到彦之发起主动进攻。适逢连日大雨，庾登之每天待在船中，不发一令。谢晦催他进兵，庾登之借口要等天晴后发动火攻，一味拖延战机。过了半个月，阴雨散去，天空放晴，庾登之没了借口，不得已主动进攻。到彦之部队的战斗力很弱，将士怯懦无能，弃营而逃。首战失利后，部将建议到彦之退守夏口（今湖北武昌）。到彦之担心刘义隆谴责，坚持屯守巴陵前线，并派人敦促檀道济部前来会师。檀道济率领北府兵很快抵达前线。宋军走出战败阴影，士气大振。

谢晦首战告捷，高兴地向刘义隆上表，先夸耀自己旗开得胜的“辉煌战果”，然后以此为筹码要求和谈。表文刚送走，探子就来报说檀道济率北府兵已与到彦之会师，宋军水师已遍布长江江面。谢晦大吃一惊。他原以为檀道济是弑君的同谋，肯定不会被刘义隆赦免，应该会站在自己这边，结果发现檀道济不仅被赦免，还率军前来讨伐自己！谢晦深知论领兵打仗自己远不及檀道济，惶恐起来，越想越害怕，几乎手足无措。

双方很快又打了一仗。谢晦的部队刚有战败的迹象，但谢晦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这一点儿失败在他内心扩大为全局的惨败，拔腿就逃奔江陵，导致全军大乱，四处奔散。谢晦逃到江陵后，见部众散尽，难以坚守，带着弟、侄等七人出城北逃。一行人逃到安陆（今湖北大悟）被擒，押送建康斩首。

刘裕留下的顾命大臣集团势力就此灰飞烟灭。这不仅意味着刘义隆铲除了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力量，也宣告他以全新的姿态闪亮登场，准备大干一番了。这一年他十九岁。

元嘉之治，不过如此

—

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刘宋王朝立国的时间最长，共六十年。其中，宋文帝刘义隆一个人就在位三十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不过整个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但是年长而无功。论成就，刘义隆还是南朝皇帝中的第一。

刘义隆亲政后，能有一番作为，离不开世族豪门的支持。整个东晋及南朝时期，世族豪门将官职当作家族遗产世代相传，关系盘根错节，势力雄厚。从世族豪门的眼光来看，他们总觉得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是个只知道冲锋陷阵的持刀莽夫，不太能合得来。而到了刘义隆，他不仅博涉经史，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而且谈吐温文尔雅，受到了世族们的欢迎。刘义隆清洗徐羨之、傅亮等人的行动，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元嘉前期，刘义隆更是将朝政委托给王弘、王华、王昙首等世族子弟，政权得以稳定发展了十几年。

王弘、王华、王昙首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琅琊王氏的子孙。其中王弘是东晋缔造者王导的嫡曾孙，对刘裕王朝出身草根的缔造者们不太热情。刘裕还没篡位的时候，在一次宴会上半是感慨半是矫情地说：“我一介布衣，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出乎意料。”傅亮等亲信马上出来拍马屁，盛赞刘裕的功德，说他是众望所归，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应当的、正常的。王弘却淡淡地说：“这就是命啊，求之不得，

推之不去。”他的话反映了当时世族豪门普遍对刘裕抱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他的这句话，被“时论”，即世族们控制的舆论称颂为“简洁、直率”。刘裕、傅亮等人虽然听着刺耳，但也无可奈何。

但是对刘义隆，也许是隔了一代人，世族们感觉他已经褪去了草莽之气，便认可了他的高贵身份，转而亲近、支持他。不少大世族在刘义隆还没发达前，就进入了他的幕府。徐羨之集团废杀宋少帝、迎接刘义隆去建康登基的时候，有人担心此行凶多吉少，反对刘义隆登基。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当时在刘义隆幕府之中，却坚定劝说刘义隆早日去登基。之后，世族们又支持刘义隆清除徐羨之集团。同属于琅琊王氏的王华还带着追兵捕杀了徐羨之。在内战中，谢晦敢打出“清君侧”的旗帜，要求诛杀王弘、王华、王昙首三人，也不是无凭无据。

大功告成后，刘义隆大宴群臣，向王弘兄弟等人举杯劝酒，还抚摸着御床（当时人们以榻为床，坐在上面）说：“如果没有爱卿兄弟，这张床哪能有今日。”

幸运的是，琅琊王氏众位兄弟虽然在蜜罐中长大，却没有沾染上骄奢淫逸、懦弱无能的富贵病，反而能力出众、生活简朴、操心国事。王弘主政的基本思路就是保持稳定，不要出事。因此，他一方面建议刘义隆澄清吏治，严惩贪腐，一方面要与民为善，减轻百姓负担。东晋时期，男子年满十三岁要服半役，年满十六岁要服全役。王弘认为天下太平，并已禁止大兴土木，奏请将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提议被刘义隆采纳。百姓们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王弘很懂为臣之道，知道月盈则亏、盛极而衰的道理，在主政的巅峰时期懂得谦让，主动引进宗室、彭城王刘义康共同执政。王弘等人逐渐隐退，把刘义康推到了前台。元嘉中期以后，王弘、王华、王昙首相继逝世，实权转移到了刘义康的手中。

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子，比刘义隆小两岁。刘义康和文雅的三哥不同，他不喜欢读书，知识浅薄，率性而为，主持朝政后独揽大权，权势显赫。好在刘义康办事勤勉、自强不息，政务没有出乱子。刘义隆重视亲情，对浅陋任性的四弟并不猜忌，所以两人关系还算融洽。刘义康又调自己当彭城王时的长史刘湛到中央当自己的助手。刘湛不尚浮华，也很有实干精神，协助刘义康把朝政处理得不错。国家得以继续发展。

天下承平日久，刘义康浅陋骄纵的小毛病恶化成了大问题。他独揽朝野内外大权，在自己的王府中决策朝廷大事。每天一早，彭城王府门口停的车子常有数百辆之多。渐渐地，刘义康在刘义隆面前也越来越随便，混乱了君臣之别。各地献给皇帝的贡品，刘义康把上等货送进彭城王府，把次等货留给刘义隆使用。有一次，刘义隆嫌宫中的柑子形态、滋味都差，刘义康就说：“今年送上来的柑子，有一些还不错。”他随即派人到王府拿来上等柑子和刘义隆分享。刘义隆看到四弟享受的柑子比皇宫里的大得多、好得多，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在前期心胸还比较开阔，知道自己这个四弟不读书、没脑子，也知道刘义康没有谋反之心，拿着柑子笑笑而已，并不深究。刘义康也拿起柑子剥开了吃，还吃得挺美，一点儿都没意识到潜伏的危险。

刘义康入朝前担任荆州刺史，入朝后荆州刺史出缺。刘义隆就任命江夏王刘义恭继任。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刘义隆小六岁。在兄弟当中，刘义恭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讲究节俭，其他兄弟都不敢向父亲讨要什么好东西，即便开口要了刘裕也不会给。但是刘义恭要什么，刘裕就给什么。刘义恭出任荆州刺史的时候才十七岁，刘义隆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语重心长地提醒五弟：昨日父皇打江山不容易，今日兄弟几个守江山更不容易，所以要礼贤下士，要经常接见下属，工作要勤奋，生活要节俭，不能大兴土木，不能草率断案等。刘义隆的谆谆教诲事无巨细，细致到要求五弟

每个月的零花钱不能超过三十万钱。

刘义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这么要求弟弟，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他继承了父亲俭朴的生活习惯和勤恳的工作态度。

刘义隆上台后，继承并深化了父亲与民生息的政策。除了上述提高百姓服役年龄的政令外，还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扩大税赋征收面，减轻户籍百姓的负担。对于百姓拖欠政府的陈年旧账，一律免除。刘义隆派官员视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间疾苦。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刘义隆每年三次亲自在华林园堂审理案件，直接为老百姓主持公道。

在刘义隆统治的元嘉年间，南方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书记载：“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后世称为“元嘉之治”。

在纷繁破败的南北朝时期，与其说元嘉之治是盛世，不如说它更像一个“治世”。与其说是经济的繁荣，不如说是经济的恢复。现实是，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很穷苦，南朝在南北方的实力对抗中依然处于劣势。元嘉之治持续的时间很短，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没有创建出能够深刻影响历史的制度。只能说南方社会沿着之前的道路继续前进，刘义隆等人没有给发展设置障碍，给了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最终也没能走得更远。

二

说完元嘉之治的内政，再来看看它的外交。

得益于刘裕北伐成功，东晋收复了关中地区和黄河以南几乎所有的领土。刘裕时期，刘宋王朝依然保有现在黄河以南的河南省大部地区和山东省大部地区。尽管它对这一大片土地的控制并不严密，可相对于之前南北方沿着淮河对峙的情形，刘宋的战略形势已经大为改观。

刘宋通过先控制战略要点，再将这些点连成线，最终实现面的占领。在河南，刘宋主要防守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滑台（今河南滑县）、碣磬（qiāo áo，今山东茌平县）四个重镇；山东的历城（今山东济南）、淄博、东阳（今山东青州）等城市也是宋军防守的重点。这些点连起来就是刘宋的北方防线，保障黄河以南地区。

刘裕驾崩后，北魏觉得有机可乘，在永初三年（422）兵分两路越过黄河：一路攻陷滑台、洛阳，进逼虎牢；一路向东攻陷临淄，进逼东阳。宋军在东阳、虎牢两地顽强抵抗。中原局势岌岌可危，檀道济率军北上增援北方防线。北方军队战斗力强，行动迅猛，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檀道济到达彭城（今江苏徐州）后，无奈承认自己无力分兵兼顾虎牢和东阳，只能集中力量救援一处的友军。两难之下，考虑到彭城离东阳比较近，檀道济决定救援东阳。

宋军出发了，但是战斗却没有打响。因为围攻东阳的北魏军队爆发了疾病，半数以上的官兵都患了病，不得不在檀道济援军即将到达东阳的时候主动烧营撤走。檀道济到了东阳，本想乘胜追击，不料粮草接济不上，只能无奈放弃。在河南，虎牢的宋军困守孤城苦战两百天。魏军最终攻下了虎牢，兵力损失很大，无力继续战斗。战斗就此停歇下来。南方丢失了多数重镇，防守局势恶化。

刘义隆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一心要找机会收复失地。

元嘉六年（429），机会来了！当时北魏与大夏、柔然的战争不断，黄河中下游魏军兵力空虚。于是刘义隆写信要求北魏太武帝拓跋

焘归还河南各地，声称不给就要用武力夺取。拓跋焘对刘义隆的要求付之一笑。你说还就还啊？拓跋焘才没那么傻呢。要想收复失地，凭拳头说话吧！

元嘉七年（430）三月，北魏因为北方战事再次削减黄河以南的屯兵。刘义隆派遣使者出使北魏，告知北魏宋军即将北伐，目的是收复黄河以南的失地，还明确说此战“不关河北”。宋军五万人在刘义隆亲信将领到彦之的率领下，走水路逼向各镇。北魏在碣磬、滑台、虎牢、洛阳四镇守军薄弱，且无力增援，主动弃城退往黄河北岸。到彦之轻易收复四镇，重新恢复了先前的北方防线，又派出先头部队向西进逼潼关，觊觎关中地区。如此大好形势，宋军上下欢欣鼓舞。殊不知，几万宋军沿着黄河分散，防线绵延两千里，连重要城市都只能分摊到几千人防守，犯了兵家大忌。

北魏就等着宋军漏出破绽。十月，黄河开始结冰，鲜卑骑兵可以长驱南下，加上魏军陆续在河北集结完毕，一声号令之下，魏军开始渡河反攻。鲜卑骑兵像一把尖刀，瞬间将宋军的防线撕得粉碎。洛阳、虎牢迅速失陷，分散各处的宋军相继奔散。到彦之在滑台附近，得悉城池失守、诸军溃散，竟然吓得下令全军焚舟弃甲，狼狈地逃往彭城。

刘义隆见亲信将领实在不成器，只好派遣并不是亲信的将领去收拾残局。他任命檀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率众北上。元嘉八年（431）初，檀道济率军在山东地区与魏军激战，几乎是每日一战，胜多败少，扭转了宋军溃败的局面。两军形成了对峙状态。遗憾的是，檀道济部队粮尽，只得从历城南退。有宋军官兵投降北魏，将宋军粮尽退兵的实情告诉了魏军，魏军马上追击。

檀道济为迷惑魏军，令人用沙子冒充粮食，并在最上层覆盖真的谷米，然后带领官兵公然在晚上高声地测重、统计“存粮”。追兵看到这一幕，以为宋军粮草充足，反认为投降告密的宋军是奸细，将降兵

全部杀掉。檀道济又命将士们披甲穿戴整齐，自己穿着白服乘舆车，列队缓缓出城南返。魏军担心有伏兵，不敢追击。檀道济安全将全军带回南方，留下了“唱筹量沙”的典故。

刘义隆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此战不仅没有收复失地，还略有损失。但是檀道济在魏军的围攻中全军而退，威名大振。刘义隆嘉奖老将军智勇双全，提升他为司空。

三

檀道济功名赫赫，统率着身经百战的部队。他的亲信部将都勇猛无敌，几个儿子又才气非凡，让人既羡慕又嫉妒。檀道济下朝回家，从者如云，仪仗威武，老百姓看到他威风凛凛的样子，不禁说：“说不定这又是一个司马懿啊。”自古武将功高震主、力强惹祸，檀道济不幸犯了大忌。朝廷对他产生了疑畏之心。宋文帝刘义隆本就不信任檀道济，加上自己身体羸弱，登基后疾病不断，更不放心让檀道济留在身边，就命他去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

元嘉十二年（435），刘义隆忽然病重。刘湛就对刘义康说：“一旦皇上驾崩，就没有人能控制得了檀道济了。”刘义康便矫诏召檀道济入朝。

檀道济准备入京，夫人拉住他说：“皇上无故召你入朝，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檀道济不听，赶赴建康。他到的时候，刘义隆已病情好转，便慰劳了他几句，放他回寻阳。檀道济在长江边准备上船时，一群白鸟聚集在船篷上悲鸣。原来是刘义隆病情突然加重，刘义康派追兵赶来，将来不及登船的檀道济逮捕。他矫诏杀死檀道济及其子弟八人，还捕杀了被人们比作关羽、张飞的檀道济的部将薛彤、高进之

二人。檀道济临死之前，目光如炬，愤怒地摘下巾帻掷在地上，厉声说：“你们这是自毁长城！”死讯传出，南方官兵寒心、百姓震惊。宋文帝刘义隆心中虽有不忍，但也默认了四弟的做法。

倒是消息传到北魏后，鲜卑官兵欣喜若狂，都说：“檀道济已死，江南再无可惧怕之人。”魏军自此频频南侵。

檀道济死后，刘义隆继续养病，政权被彭城王刘义康把持。刘义康日渐仰仗谋主刘湛，放权让他去干。刘湛开始权倾朝野，但是他的权力来自刘义康的“私相授受”，并没有合法依据。刘湛想从幕后走到前台，排挤掉名义上的丞相——尚书仆射殷景仁，取而代之。他不断地在刘义康面前说殷景仁的坏话，在政务上一味和殷景仁作对。

殷景仁久经宦海，他觉得不能和刘湛正面交锋，就称疾解职，连续向宋文帝刘义隆上表请辞。刘义隆不是傻瓜，早就注意到了刘义康、刘湛的举动。朝政已经把持在这两个人手里，刘义隆需要殷景仁作为外援。之前刘义康等人老在自己面前说殷景仁的坏话，刘义隆左耳进右耳出。现在，他没有批准殷景仁的辞职申请，而是让殷景仁在家好好养病，还派人嘘寒问暖，以示尊崇。

刘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干脆派人装作强盗去劫杀殷景仁。刘湛觉得即便刘义隆知道了实情，也会照顾到兄弟感情，不会对自己和刘义康怎么样。劫杀的计划还没实施，刘义隆就听到了风声，他命人在皇宫边上给殷景仁安排了住所，让殷景仁就住在自己身边。殷景仁搬过来之后，刘义隆秘密地和他交换意见，每日两人住所之间文件政令的往来达十几乃至数十次之多。朝政无论大小，刘义隆都征询殷景仁的意见。两人暗中嘀咕商议什么，宫女太监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刘湛了。

麻痹大意的刘湛祸在眼前，还不知道悔改。他见刘义隆多病，为了常保富贵，竟然与亲信商量，打算等刘义隆一死便以“天下艰难，

宜立长君”为由，拥立刘义康即位。

不得不说，刘湛实在不是搞阴谋诡计的料。政变计划还在谋划之中，连刘义康这个主角都还不知道，刘义隆就再一次听到了风声。刘义隆讲究兄弟感情是有限度的，刘湛的所作所为已经越界，超出了刘义隆的容忍范围。

元嘉十七年（440）十月初三，宋文帝刘义隆让彭城王刘义康在中书省住宿，处理政务，似乎他的身体又一次不行了，需要四弟来主政。这天白天，已经卧床“养病”五年之久、从来没有出过门的殷景仁忽然命令家人拂拭衣冠，摆出要出门的样子。家里人都很迷惑，不知道老头子要干什么。

当夜，刘义隆突然驾临华林园，召殷景仁进宫。殷景仁因卧床太久，腿脚不方便，刘义隆就赐他坐在小床上，授权他主持今夜的行动——杀刘湛，废刘义康！

刘义康、刘湛全无准备，且被分隔两处，毫无还手之力。刘湛被闯入的官兵轻松逮捕。有人向他出示了刘义隆的诏书，诏书上罗列了他的种种罪状，最后的判决是立即处死。刘湛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党羽。刘义隆对四弟刘义康还算客气，将四弟软禁在中书省十多天，最后贬他为江州刺史，送往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上任”。刘义康来向二哥辞行，刘义隆只是对他恸哭，什么话也说不出。

刘义隆成功收回实权。殷景仁接替刘义康的职位，但没过多久就死了。

刘义康在江州名为刺史，实际上就是囚犯，政事全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底，有人告发太子詹事范晔、孔熙先等人密谋拥立刘义康。刘义隆处死范晔等人，将刘义康及其子女废为庶人，徙往安成郡正式软禁。在安成郡，刘义康开始静下心来好好读书。一次，他读《汉书》，看到淮南王刘长谋逆被汉武帝诛杀的

事，感叹道：“前代骨肉相残的事，现在要落到我的身上了。”他早年不读书，不知历史兴替和为臣之道，现在知道为时晚矣。

元嘉二十八年（451）北魏大军南侵，南方局势动荡。刘义隆担心再有人把刘义康捧出来作乱，便遣人给刘义康送去毒药赐死。刘义康也和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一样信佛，说：“佛说自杀者来世不复得人身，我不能这么死。”不肯服药自杀。好在刘宋王朝的臣子在处理这种事情上很有经验，照搬杀死司马德文的先例，找了条被子将刘义康捂死了。刘义康时年四十三岁。

刘义康的一生，为朝廷做过贡献，也有功绩，但不知谦恭进退，自谋败局。可他确实没有要取代二哥刘义隆的意思。刘义隆听到刘义康死讯后，感叹了一番，下令以侯礼安葬他。刘义隆此举，开了刘宋皇室骨肉相残的先例。

战场有风险，北伐需谨慎

刘义隆“赐死”刘义康的背景是北魏大军南侵，南方局势动荡。这事发生在元嘉二十八年（451），对南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而事情的起因，则是一年前的“元嘉北伐”。

元嘉后期，国家太平无事，府库渐渐充实。美中不足的是，北魏始终对南方构成威胁，且霸占着河南、山东等地。南北双方在边界摩擦不断。刘义隆可能觉得自己文治有余，武功不足。而打败北魏收复中原无疑是建功立业最好的途径，他对北伐中原的兴趣越来越大。

过惯了平安日子的大臣们，也怂恿刘义隆北伐。这些怂恿的大臣几乎都是文官，没有武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人纯属是要拍马屁，比如御史中丞袁淑，他发现刘义隆有学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意思，就奉承说：“陛下席卷赵魏之后，一定要封禅泰山。臣生逢盛世，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愿意写一篇《封禅书》献给陛下。”刘义隆听了很高兴，似乎觉得自己可以和汉武帝相提并论了。第二类人是真心要北伐中原，觉得南方有能力打败北魏，比如彭城太守王玄谟。王玄谟出身于著名的世族太原王氏，没有打过一场仗却喜欢谈论军事。他对刘义隆大谈北伐计划，畅想胜利前景。刘义隆特别喜欢听王玄谟的空谈，听得入神时还对左右说：“王玄谟的话，令人有封狼居胥的憧憬（这里指的是汉武帝时，霍去病大破匈奴，封狼居胥山而还的事件）。”结果，刘宋朝野弥漫着一股激烈而乐观的战争气氛。

元嘉二十七年（450），机会似乎来了！拓跋焘诛杀大臣崔浩的消息传来，北魏内部出现不稳迹象；柔然又千里迢迢派遣使节来到建康，表示愿意配合宋军北伐；春夏之交，南方水量充沛，河道通畅，便利军队、粮草运输——似乎天时地利都倾向南方。于是，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大臣在六月鼓动刘义隆出兵。

以沈庆之为代表的军队将领们反对北伐。沈庆之，吴兴（今浙江德清）人，出身贫寒，年轻从军，因在镇压内部反叛和少数民族起义中立下赫赫战功而跻身高级将领行列，当时已经六十四岁了。他对刘义隆列举出两条反对的理由：第一，军事优势在北方，南方步兵对阵北方骑兵天生就处于劣势；第二，当年檀道济、到彦之北伐都失利而返。沈庆之点名道姓说：“王玄谟等人的能力都弱于檀道济、到彦之二人，现在的军队也不比当年强盛，仓促北伐恐怕会再一次失利。”

刘义隆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思考北伐问题，对老将军的意见不以为然，回复说：第一，小丑窃据中原，我们是正统王朝，有责任收复中原。第二，之前北伐失利是因为檀道济“养寇自资”、到彦之私自撤退。第三，魏军的优势在骑兵，但现在夏水浩瀚，河道通畅，我们用水军恰好可以扬长避短。只要宋军在冬天河流结冰前收复各个重镇，构筑钢铁防线，就等着魏军自投罗网吧！

沈庆之坚持己见，刘义隆就让徐湛之、江湛来和沈庆之辩论。沈庆之说：“治国譬如治家，耕地要问农夫，纺织要问婢女。陛下现在要讨伐敌国，只和白面书生商量，怎么能成功呢！”沈庆之的话说得很重，刘义隆听了哈哈大笑，认为沈庆之是年纪大了乱发脾气而已，既没采纳也不怪罪。北伐大事，最终由刘义隆敲定了。

这次北伐，刘义隆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几乎倾尽了全国之力。由于兵力不够，朝廷征发青、冀、徐、豫、南兖、北兖六州的壮丁。每户有三名壮丁的抽一人从军，有五名壮丁的抽两人从军，又出钱招募

有武艺的壮士出征。由于军费不足，朝廷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发动臣民捐献金帛，又向富豪巨室和富裕的僧尼借贷。

北伐的部署是这样的：主力放在东路，由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水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指挥。东路目标是收复山东、河南。西路由柳元景、薛安都等率领，从襄阳北上，进攻关中地区，受雍州刺史、刘义隆的儿子随王刘诞指挥。东西两路之前还有刘康祖、臧质等人率领的小股部队，作为策应之用。

史称元嘉北伐的大行动就此拉开序幕。

二

元嘉北伐开头很顺利，因为北魏没有料到刘宋会倾国而出，被打得措手不及。

礅礅的北魏守将弃城而走，宋军留沈庆之守城，王玄谟继续率主力进攻滑台。

王玄谟率领的主力兵源充足、军械精良，但王玄谟是个庸才，压根就不是打仗的料。滑台被宋军围得水泄不通，魏军坚守不降。城中茅屋很多，部将建议用火攻，王玄谟却说：火攻会烧毁房屋、伤亡百姓，即便我们攻下了也只是得到一片焦土，有害无利。所以，王玄谟坚决不同意火攻。中原人民看到宋军来到，纷纷携带武器投军，有的还成组织地前来参军。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人之多，民心可用。但王玄谟不用义兵首领，把投军的壮士们当作新兵分散补充到自己的亲信部队中。同时，王玄谟非但不抚恤中原百姓，还要他们每家缴纳一匹布。宋军的种种逆行，让中原人民大失所望，甚至将部分百姓推到了魏军一边。结果，小小一座滑台城，宋军主力困于坚城之下，攻打

两个月还没有打下来。九月，天气转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集结了六十万大军南下，御驾亲征，第一站就直驱滑台，来和王玄谟过招。拓跋焘是何等人物，是带着虎狼之师在枪林箭雨中厮杀长大的，别说是王玄谟，整个南方又有谁是他的对手？宋军得知北魏援兵南下的消息，部将们都劝王玄谟抓紧最后一点儿时间，在拓跋焘赶到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滑台，避免遭到魏军内外夹击。王玄谟不听，仍旧不紧不慢地攻城。拓跋焘即将到来，部将们再次劝王玄谟赶紧建立车营，将战车连接在一起排列在军营外围，作为防御屏障。王玄谟还是不听。

终于，拓跋焘率军来到滑台，他也是几乎倾国而出。魏军击鼓之声震天动地，王玄谟这时候急得六神无主。部将请示如何迎战，王玄谟磨叽了大半天，才挤出一个字：走！王玄谟下令撤退，却不做任何组织，导致宋军主力四散溃败，几乎流失殆尽。魏军随后追击，杀死宋军一万余人，缴获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元嘉之治二十多年积累的精品军械，几乎都成了北魏的战利品。

王玄谟撤退中途遇到沈庆之率军前来接应，才收拢了部分残军败将。此次巨大失败，王玄谟罪责难逃。战后，东路主帅萧斌要杀王玄谟。不料沈庆之主动站出来为王玄谟说好话，认为拓跋焘是当世雄才，谁遇到他都没有获胜的把握，又说阵前杀戮大将会引起军心混乱。王玄谟这才得以保全性命。

此处交代一下王玄谟之后的经历。王玄谟虽然能力平庸，败军祸国，但个性耿直，做事认真。此战之后他仕途坎坷，被免官又被起用，因生性刚直，和同僚、上司的关系不好。晚年，王玄谟刚正不阿，对孝武帝、宋明帝的倒行逆施多有劝谏。直到宋明帝时才去世，享八十一岁高寿。

滑台大败后，宋军转入被动防御，不断放弃城池，步步后撤。赖有沈庆之这样的老将维持，东路宋军才没有出现全局性的大逃亡。

滑台大败的消息传到西路的时候，西路宋军正在陕城（今河南陕县西南）与魏军激战。之前，西路宋军进展也不错。这路宋军中不少将领是北方人，熟悉关中情况，比如大将薛安都就曾在北魏担任雍州、秦州都统，几年前因为谋反失败才逃奔宋朝。而北魏占领关中不久，统治并不稳定，各族人民纷纷起兵响应宋军。弘农等重镇被宋军攻克，宋军进围陕城。陕城一战，大将薛安都杀得性起，丢掉头盔，脱去铠甲，再去掉坐骑的护具，怒目挺矛，单骑冲向敌阵。手中的长矛打断了，薛安都就换一根再冲杀。两军恶战两天，宋军大胜，攻克陕城，斩魏军三千余人，俘虏两千余人。宋军把俘虏、投降的北魏士兵全部释放，又乘胜攻克潼关。关中豪杰闻风而起，派人与宋军接洽。西路北伐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王玄谟大败、拓跋焘南下的消息逆转了西路的胜利。东路败后，刘义隆认为柳元景、薛安都等不宜孤军深入，下诏班师。西路宋军含泪放弃城池，退回襄阳。元嘉北伐以失败告终。

但是战争不是单方面的失败就可以结束的，要取决于战胜方的意志。宋军虽然战败，但战场并没有沉寂。拓跋焘不是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软柿子，他态度强硬，寸土必争，抓住宋军后撤的良机扩大战果。

在滑台大败王玄谟后，拓跋焘将大军分为两路，长驱南下。

第一路由永昌王拓跋仁率领，从洛阳向寿阳（今安徽寿县）进军，一路攻占悬瓠（hù）、项城。宋军防守寿阳的将领是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刘铄是刘义隆的儿子，年轻无经验。刘义隆怕寿阳有失，急招刘康祖回援。刘康祖这支偏师在寿阳城外几十里地与拓跋仁大军遭遇。刘康祖手下只有八千人，部将提议绕道走山路以地利削弱鲜卑骑兵的冲击，刘康祖不听，组成车营，等待魏军的进攻。临战前，刘康祖下令“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以必死之心迎战。魏军倚仗人多势众，分为三波，从四面轮番进攻宋军，企图用疲劳战术消灭刘康祖。刘康祖指挥部属顽强顶住。后来，天上刮起了西北风，拓跋仁趁

势火烧车营。宋军拼死抵抗，最终在熊熊烈火中失败。刘康祖身受十多处伤，仍奔走呼号，最后颈部中箭而死，部下八千人全军覆没。此战可算是元嘉北伐中最惨烈的一战。战后，拓跋仁进抵寿阳，刘铄闭门不出。好在宋军在寿阳经营多年，城坚粮足，魏军是骑兵，没有攻城的经验，只好在城郊大肆烧杀抢掠一番后，继续南下。刘铄也不敢追击，只求守住寿阳。

第二路由拓跋焘亲自统率，进攻彭城。镇守彭城的是刘义隆的五弟江夏王刘义恭和刘义隆的又一个儿子武陵王刘骏。刘义恭听到魏兵将至，就要弃城逃走。城内其他人都不同意。长史张畅说：“王爷绝对不能走，您一走就群龙无首，非输不可了。”刘骏则说：“叔叔要走，悉听尊便，侄子决心与彭城共存亡。”刘义恭羞红了脸，留了下来，和大家一起守城。彭城也是宋军经营多年的重镇，城池坚固，魏军攻打了几夭，彭城岿然不动。拓跋焘主动放弃，绕开彭城继续南下。攻城本非魏军的长项，拓跋焘扬长避短，发挥骑兵行动迅猛的特点，一心深入江南。刘义恭、刘骏叔侄俩也不敢追击。

拓跋焘渡过淮河后，遇到了宋朝辅国将军臧质的部队。臧质和刘康祖一样，也是此次北伐的偏师。刘义隆听到彭城告急后，命令臧质率领部下万人救援。两军相遇，臧质的一万步兵哪里是几十万鲜卑骑兵的对手，一触即溃。臧质只带着残部七百人逃向附近的盱眙（今江苏盱眙）。

盱眙原本驻扎了三千宋军。因为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太守沈璞早就开始准备防守，想接纳臧质残部。但城内官绅不同意，担心接纳臧质会把拓跋焘主力吸引过来，得不偿失。沈璞力排众议，将臧质的七百人接入盱眙城，还将全城的防务交给臧质指挥。臧质出身东晋外戚家庭，长得相当有特点，高颧骨突下巴，秃顶卷发。盱眙官绅百姓看着这个败军之将，不知道他的奇怪相貌能否有助于退敌。好在虚惊一场，拓跋焘再次擦城而过，绕开盱眙，马不停蹄向南冲去。

年底，各路魏军在长江北岸会师。人们在长江南岸就能看到拓跋焘那耀眼的皇帝车驾。拓跋焘在北岸耀武扬威了一番后，选择在瓜步（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建起了行宫。魏军在江北忙于劫掠杀戮，各地的刘宋官员要么望尘奔溃，要么望风而降。兵力薄弱的江南裸露在鲜卑铁器的刀锋之下，刘宋王朝面临着立朝以来最大的威胁。建康城内空前紧张，朝廷紧急征发壮丁从军。建康所在的丹阳郡辖区内王公子弟以下全部男子一律从军。宋军沿江慌忙布防。刘义隆临江登高瞭望，看到魏军旌旗摇曳，面露忧色，叹息道：“如果檀道济还在，岂能让胡马至此！”此时距离檀道济冤死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三

就在刘宋朝野认为局势危如累卵，人心惶惶之时，历史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之前，拓跋焘不攻城、不啃硬骨头，一心尽快冲杀到长江边上。现在他饮马长江了，可接下去怎么办呢？拓跋焘很清楚，鲜卑骑兵连寿阳、彭城这样的城池都没有能力攻下，更不用说城墙更加坚固又有滚滚长江防护的建康城了。拓跋焘头脑很清醒，知道魏军的攻势已经达到极限了，决定见好就收。

拓跋焘下令魏军在江北劫掠以后，满载北归。第二年（451），浩浩荡荡凯旋的魏军又一次经过盱眙城。魏军无意停留，原本擦肩而过就是了，可拓跋焘突然想喝酒，就派人去盱眙索要美酒。宋军守将臧质撒了一泡尿，用坛子封好给拓跋焘送去。拓跋焘勃然大怒，也不回国了，驱动大军进攻盱眙。数十万魏军一夜之间就围着盱眙城造了一道长堤，又挖土运石填平了流向盱眙的水源，彻底切断了盱眙的水陆通道。盱眙军民一觉醒来，发现城池被围得水泄不通。经过一阵短暂的惊慌后，盱眙军民迅速准备迎战。盱眙之战就此打响。

盱眙为了这一战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器械充足，士气鼎盛。魏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士卒伤亡严重。拓跋焘这个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他满不在乎地给臧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驱赶攻城的士兵，都不是我们鲜卑人。攻打盱眙城东北的是丁零与胡人，攻打南边的是三秦的氏族、羌族。你们帮我多杀一点儿丁零人，我们就能减少常山、赵郡（在今河北）的盗贼；帮我多杀一点儿胡人，正好减少并州的叛军；如果氏族、羌族都死了，关中的反贼也就没有了。所以，你杀的士兵越多，对我越有利。”

拓跋焘可能是想通过这封信告诉臧质自己会不惜伤亡攻下盱眙，但这封对士卒伤亡满不在乎的亲笔信被臧质利用。臧质将拓跋焘的“御笔”展示给攻城的魏军士卒看，大声宣布：“你们的皇帝用心险恶，根本不把你们当人看，你们不要为他卖命了！”臧质又写了许多传单，发给攻城的少数民族士兵，号召他们倒戈一击，凡是斩拓跋焘首级者，封万户侯，赏赐布、绢各一万匹。拓跋焘见状，暴跳如雷，下令做一张铁床，在上面扎满铁刺，发誓要踏平盱眙，活捉臧质钉在铁床上。

魏军在拓跋焘的驱使下掀起了一波波更猛烈的进攻。他们造了钩车来钩城楼，城内宋军就用大绳系住钩车，数百人呼喊着一一起牵拉，使车不能退后。到夜晚，宋军把士兵装在大桶里坠下城墙，截下车上的铁钩，缴获钩车。魏军又造了冲车攻城。无奈城墙坚固，冲车每次冲击都只能冲落几斗土，难以奏效。魏军最后只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肉搏上阵，搭云梯登城。一波波的魏军像潮水一般涌上前去，又像潮水一样退下来，在盱眙城下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尸体，死尸堆积得与城墙一样高。就这么猛攻了整整一个月，盱眙城还牢固控制在宋军手里。南方的春天来了，魏军水土不服，伤病员越来越多。更糟糕的是，刘义隆派遣宋军水师从东海进入淮河，命令彭城的宋军南下，会师截断魏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南北夹击，拓跋焘在二月烧毁攻城器械，主动退走。宋军不敢拦截，仅出动少数水师佯攻，逼迫魏军速

撤。

盱眙之战，宋军大获全胜。刘义隆对这场意外的胜利大喜过望，对守城有功的臧质大加赏赐，提升他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负责中部边界军务。

持续了近两年的南北激战就此结束。南方在领土方面的损失不大，但国力遭受巨大损耗。魏军进出南方，大肆烧杀抢掠，仅掳掠而走的江北百姓就数以十万计，宋朝伤亡的军民更是无法计算，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城镇残破、废墟累累。“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之前二十多年治世积累的物质成果几乎荡然一空。北魏方面同样伤亡惨重，损失鲜卑精锐数以万计，它和南朝一样都是输家，只是损失略小而已。

当然，很多政治事件的成败是不能用简单的物质得失来计算的。拓跋焘对刘宋的胜利，使北魏的统一更为巩固。这个成果比劫掠的物资更加重要。而刘义隆志得意满的心态被惨败击得粉碎，受到巨大的精神创伤，没两年就驾崩了。

皇族大逃杀

—

被拓跋焘打得大败后，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宋文帝刘义隆频繁病重。然而，每一回他都能在大臣们提心吊胆的时候奇迹般地康复。如此反复多次，让一个人很着急，这个人就是太子刘劭。

刘劭是袁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在父亲病重、康复的循环中已年近三十，他渴望早日即位，可龙椅摆在眼前就是坐不上去。

刘劭快要抓狂了，干脆找了同父异母的二弟始兴王刘浚商量，如何让父皇早死。刘浚给太子大哥出了一个馊主意：找个女巫在东宫里作法诅咒。刘劭觉得这个法子还不错，就找了女巫，制作了巫毒娃娃，还堂而皇之地埋在东宫院子里。很快，刘义隆知道了两个儿子干的好事，龙颜大怒。这时候，刘义隆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毛病暴露了出来。他舍不得废太子，也不责备刘浚，只是下令抓捕作法的女巫。有关部门搜捕了多日，找不到人。有人向刘义隆告密说：女巫被太子藏在东宫保护起来了。

刘劭此举，无疑是火上浇油。刘义隆出离愤怒，道：“刘劭这个逆子，竟然咒我死，还不知悔改，和我对抗到底！我要废了他。”既然决心要废太子，又不能当机立断，而是召徐湛之、江湛、王僧绰三位大臣入宫商议。王僧绰一听，赶紧说：“如果陛下下定决心要废黜太子，请立即发布命令，以免消息泄漏，发生什么变故。”关键时刻，刘义隆动摇了，不肯颁布诏书，表示要再考虑考虑。可是，不等

刘义隆考虑清楚，消息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出去。刘浚的生母潘淑妃赶紧派人通知刘浚，刘浚又急报太子。

自古被废的太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刘劭惊恐万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父皇提议要废太子的第二天清晨，突袭杀入了皇宫。宋文帝刘义隆在寝宫中被乱军砍死，享年四十六岁。徐湛之、江湛、王僧绰三人也被杀死。这是元嘉三十年（453）的事情。

刘劭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龙椅，宣布即位为帝，改元太初。

刘劭杀父自立，已经失去了即位的合法性。天下人都可以指责他，名正言顺地讨伐他，更不用说敌人了。他虽然登基了，但四方州县、封建大吏都没有效忠、祝贺的表示。他的叔叔、兄弟们也都对他侧目而视。

刘劭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除了照例加官晋爵后，刘劭也开始搞些小动作，一心想除去对皇位有威胁的人。他心中的头号敌人，就是三弟——恰好领兵在外打仗的武陵王刘骏。

刘骏当时担任江州刺史，正统率各路军队在长江中游剿灭反叛的少数民族。刘劭、刘浚弑父后，三弟刘骏递补成为继承皇位的合法人选。而且刘骏掌握军队，也最有能力起兵造反。刘劭秘密写信给和刘骏一起作战的老将军沈庆之，要他杀掉刘骏。沈庆之有军队、有经验，他的动向就成了决定时局的关键。

沈庆之接到刘劭的密信后，跑去求见刘骏。刘骏听说大哥二哥谋杀了父皇后，非常担心篡位的大哥派人来杀自己。所以他听说大将沈庆之求见，害怕是大哥派来的刺客，吓得称病不见。沈庆之就硬冲进去，走到刘骏面前，把刘劭的密信递给他看。刘骏战战兢兢地看完，吓得泪流满面，乞求沈庆之让他到屋内和母亲诀别。谁料到，沈庆之刚毅地说：“臣受先帝厚恩，一心图报。今日之事，只能起兵推翻篡位的刘劭。殿下不用怀疑臣。”刘骏这才缓过神来。事到如今，起兵

讨逆不仅是刘骏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自保的唯一选择。他起身拜谢沈庆之，说：“家国安危，在于将军！”

在沈庆之的主持下，武陵王刘骏领衔举起了讨逆大旗。沈庆之集合江州和本部兵马，力排众议，迅速顺江而下，进攻建康。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和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兖冀二州刺史萧思话、宣城太守王僧达等地方实力派纷纷起兵响应刘骏。讨逆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几乎无人与之敌。刘骏很快兵在建康城下，在新亭（今南京附近）称帝，改元孝建，史称孝武帝。

刘浚只能搜罗建康的军队负隅顽抗，无奈众叛亲离，组建的乌合之众被讨逆军击溃。参加讨逆的将军薛安都率本部官兵为前锋，最先攻入宫殿，活捉刘浚，薛安都因功获封男爵。篡位的刘劭则和全家一起被杀。始兴王刘浚企图逃跑，中途被抓，也遭到屠杀。

刘宋王朝的第二次内战以讨逆方的胜利、弑君方的失败而圆满结束。一切看起来很“正义”、很“成功”。但是从之后的发展来看，刘骏是一个很糟糕的新皇帝人选。

二

刘骏的毛病很多，最突出的就是好色。

刘骏好色，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只要看到有感觉的女性，不管亲疏贵贱，都召入宫里临幸。其中许多女性是宗室女眷，也就是刘骏的亲戚。最可怕的是，刘骏不仅留宿生母宫中，还在公开场合与生母亲昵。南方史书对此多有隐晦，但《魏书》忠实记载了这一幕。刘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正史记载与生母乱伦的皇帝。

刘骏肆无忌惮的乱伦终于惹出了大麻烦。刘骏的六叔刘义宣镇守荆州，盘踞多年，兵强马壮。他的四个女儿留在建康。刘骏看到四个堂妹长得如花似玉，竟然将她们纳入宫中。丑闻传到荆州，刘义宣义愤填膺，发誓要推翻刘骏。他先是联系了江州刺史臧质。臧质灭刘劭有功，调任江州刺史，居功自傲，骄横专行。刘骏之前计划要剥夺他的兵权，所以臧质也对刘骏不满。两人又一起联系了对刘骏胡作非为不满的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孝建元年（454），四人推刘义宣为首，一同起兵讨伐刘骏。刘骏派遣沈庆之、王玄谟、柳元景、薛安都等人迎战。这是刘宋王朝第三次大内战。

战斗打响后，造反的兖州刺史徐遗宝进攻重镇彭城失败，丧失信心，弃军投奔豫州刺史鲁爽。鲁爽没有分兵去攻城略地，而是率军从寿阳直趋历阳（今安徽和县），与臧质合兵。两人会师后，水陆并进，直指建康。刘骏以薛安都为前锋去阻挡鲁爽。两军接触，薛安都击斩鲁爽的前锋，堵住了鲁爽前进的势头。沈庆之赶到军前督战，两军大战爆发。薛安都跃马大呼，单骑直入敌阵，直冲敌将鲁爽，一枪将他杀死。鲁爽系出将门，平素勇武异常，号称万人敌，却在薛安都的冲锋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时人都将此战和当日关羽斩颜良相提并论。鲁爽死后，部队哗然大溃。沈庆之、薛安都等乘胜追杀，一举攻克寿阳。徐遗宝逃出，途中被杀。宋军集中兵力，专心对付刘义宣、臧质两军。

沈庆之派人将鲁爽的首级送给刘义宣。刘义宣、臧质看到鲁爽首级后，万分惊骇。站在刘骏一边的太傅刘义恭又使离间计，派人送书信给刘义宣，说臧质“少无美行”，如果你们俩反叛成功，恐怕你就是他的下一个池中之物。刘义宣不禁对臧质疑忌起来。

战争还在继续，刘义宣军大败。宋军借助风势放火，叛军的船舰都被烧毁。臧质找刘义宣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发现刘义宣对自己的疑忌，惊惶失措，抛弃部队逃往寻阳。其部或降或散。一支宋军追到寻阳，臧质焚烧府舍，带着姬妾逃入南湖躲避，饥饿难耐时就采摘莲子

充饥。宋军追兵搜查南湖，臧质用荷叶盖在头上，沉到水里，只把鼻孔露出水面呼吸。即使这样，臧质还是在六月被人发现，先中了一箭，然后被乱刃砍死。刘义宣也很快失败，他自己和十六个儿子全部被刘骏处斩。以前刘骏和刘义宣的四个女儿还偷偷摸摸乱伦，如今干脆将她们改换姓名，册封为嫔妃。

除了好色，刘骏的猜忌心也很重。别的帝王猜忌大臣，刘骏主要是猜忌叔伯和兄弟，而且一猜忌就是刀光剑影。他不惜骨肉相残，在刘宋宗室内部掀起了阵阵腥风血雨。除了屠杀叔叔刘义宣一家外，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武昌王刘浑、海陵王刘休茂等兄弟也先后遭到杀害。南平王刘铄是他四弟，从小最受父皇刘义隆的宠爱，看不起这个兄长。刘骏当皇帝不久，就派人下毒杀死了刘铄。十弟武昌王刘浑从小顽劣成性，十几岁就当上了雍州刺史。在雍州，刘浑自称楚王，立年号，备百官，被人告发。这也就是一个无知少年瞎胡闹，最终也被刘骏逼迫自杀。刘宋皇室原本枝繁叶茂，刘宋广封宗室的目的是为了藩护皇帝，不想成了皇帝发泄猜忌心的目标，成了频繁内战的缘由。

刘骏的六弟竟陵王刘诞之前忠诚地站在他这一边，在讨伐刘劭和平定刘义宣等战争中都立有功勋，逐渐占据高位。刘诞的府第建筑精巧、园林优美，冠绝一时，他经常在府中大会宾客，和文人武将们应酬，因此遭到刘骏的猜忌。孝建二年（455），刘骏让刘诞担任南徐州刺史，将他赶出建康，赴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任。之后，他又嫌京口距离首都太近，在大明元年（457）调任刘诞为南兖州刺史，调往广陵（今江苏扬州）。刘诞不是傻子，知道刘骏猜忌自己，也开始积蓄实力以防不测。他借口防备北魏入侵，大力修治城防，积聚粮草军械，积极训练军队。刘骏更不放心了，授意有关大臣告发竟陵王刘诞谋反，下令将他降爵、削职。刘诞不愿束手就擒，举兵造反。他完全是被刘骏逼反的。

刘诞造反，东部局势不稳。刘骏下令内外戒严，挑选将领出征。

老将沈庆之已经退休，获封始兴公在家养老。刘骏请他出来担任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主持讨伐刘诞。沈庆之只好率军东进。刘诞备战多年，又实行坚壁清野战术，焚烧广陵外城的民房将居民迁入城中闭门自守。在重重围困之中，刘诞制作了许多传单，用一切方法投送城外，宣称自己无罪，并宣扬刘骏秽乱宫廷的种种丑行。刘骏大怒，下令斩杀刘诞心腹的亲族上千人。他急欲攻下广陵，连发诏书督促沈庆之攻城。

为了早日得到捷报，刘骏命沈庆之在广陵城西南修筑烽火台，如果破城就点燃烽火，以便自己能早些得知消息。重压之下，沈庆之不得不督率将士，日夜攻打。造楼车、填沟堑、筑土山，可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毫无进展。刘骏大怒，命大臣弹劾沈庆之，再下诏不予追究，催逼沈庆之攻战。沈庆之不顾年迈，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冲在前线，终于攻破广陵。刘诞被杀，传首建康，其母亲、妻子在城破时自杀。刘骏认为广陵全城附逆，下令屠城，经沈庆之苦苦劝阻，最终改为男子五尺以上一律屠杀、女子赏赐军队。这暴露了刘骏的第三个恶性：残忍嗜杀。屠杀广陵男子后，刘骏还将尸骨筑为京观，用来炫耀。

镇压多次反抗后，刘骏越发肆无忌惮。他宠爱一个昆仑奴，这个昆仑奴长得高大强壮，刘骏就让他拿着棍子侍立在身边，对哪个大臣稍微不满就命昆仑奴上前殴打。刘骏还日益骄侈，外加战乱不断，导致国库空虚，刘骏就想出了一个敛财的方法：赌博。每次遇到地方刺史、太守等高官卸职还都的时候，刘骏都召他们来赌博，规定大臣们只能输不能赢，而且金额巨大。这就变相逼迫地方官员们贪污腐败、搜刮地方，最后这些赃款很大部分都进了刘骏的腰包。

大明六年（462），刘骏宠爱的殷淑仪病死了——殷淑仪其实是刘义宣的女儿、刘骏的堂妹，冒姓殷。刘骏十分伤心，将她的丧事大操大办，并要求朝野大臣都去坟前哭泣，谁哭得不伤心轻则责罚、重则免官。刘骏自己哀伤过度，身体每况愈下，从此很少理政。两年

后，刘骏病死。这样的皇帝竟然得以善终，实在令人唏嘘。

骨肉相残何时休

—

孝武帝刘骏一生广纳后宫，子女成群，所生皇子多达二十八个。他死后，十六岁的长子刘子业登基。人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很快发现刘子业和父亲刘骏一样好色、嗜杀、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蔡公主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女儿、刘子业的亲姑姑，已经嫁给宁朔将军何迈为妻。刘子业看上了新蔡公主，将姑姑纳入后宫封为夫人，对外谎称新蔡公主已死，还杀了一名宫女冒充新蔡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平日里，他还命令宫女赤身裸体在宫中奔跑嬉戏，自己站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观看，如有人不愿意，就被拉出去砍头。

大臣戴法兴在刘骏时期深受信任，主持中枢公文处理和政令传达。他对刘子业的行为多有劝谏，刘子业嫌戴法兴多嘴，将他莫名杀死。同样，刘子业还把屠刀伸向皇室内部，将自己的叔祖江夏王刘义恭，以及自己的两个弟弟始平王刘子鸾和南海王刘子师都杀死了。一时间朝野震动不安，人心惶惶。

江夏王刘义恭的死需要拎出来专门述说。话说大将柳元景、颜师伯等人心怀恐惧，不知道刘子业哪日就要杀自己。他们就密谋废杀刘子业，拥戴刘义恭称帝。几个人日夜谋划，但犹豫不决。柳元景觉得应该争取到军界元老、三朝重臣沈庆之的支持，就上门去做沈庆之的工作。沈庆之与刘义恭的关系一般。颜师伯当时掌握实权，对沈庆之

这样的老前辈不以为然，曾公开说：“沈公，就是一介武夫、一个爪牙，哪能干预政事呢！”沈庆之因此对颜师伯极为不满，对拥立刘义恭的计划不赞成，还向刘子业告发了此事。

于是，刘子业亲自率兵杀死刘义恭及其四子。他将叔祖刘义恭斩断四肢，分切肠胃，挖出眼睛，浸在蜜里，取名“鬼目粽”。又杀了柳元景和他的八个儿子、六个弟弟及诸位侄子。颜师伯和他的六个儿子同样没能幸免。

沈庆之去告发柳元景等人，没料到自己会成为刘子业下一个杀戮的目标。

刚开始，沈庆之因告发颜、柳有功，与刘子业的关系不错。但是老将军也看不惯刘子业的胡作非为，说了几句劝谏的话，刘子业就不高兴了。沈庆之惧祸，赶紧闭门谢客，以求自保。一些人仍然希望沈庆之能够主持推翻刘子业荒唐统治的事业。吏部尚书蔡兴宗就对沈庆之说：“现在皇上的所作所为，人伦尽丧，根本没有希望改正。他忌惮的人就是您，老百姓能依赖的人也只有您。沈公威名天下所服，在如今人心惶惶之际举兵起义，谁不响应！如果沈公犹豫不决，坐观成败，灾祸早晚要降临的。”沈庆之也承认现在局势危急，但他退休在家，早已没有军队，所以不愿意领头，选择听天由命。蔡兴宗苦苦再劝：“当今有心起义的人，都不是想邀功求富贵的小人，只是为了自保啊！领兵的将帅，只要听到有人首先发难，肯定会群起响应。沈公领兵几十年，旧日部将门生遍布朝野，受您恩惠的人也很多，何患没有军队！况且尽管您不愿意出面，保不准有人打着您的名义起事，到时候您也免不了附从之祸。”沈庆之还是下不了决心，一味推辞。青州刺史沈文秀是沈庆之的侄子，率领部下驻扎在建康城外，也劝沈庆之：“皇上狂暴如此，祸乱不久将至。天下人心思变，如今借助众力推翻暴君，易如反掌。机会难得，不可失也。”沈文秀劝了叔叔好多次，沈庆之始终不同意。没几天，宁朔将军何迈谋反失败，被刘子业诛杀，牵连到沈庆之。刘子业派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送药赐死沈庆

之。沈庆之不肯服毒，沈攸之就用被子捂死了亲叔叔。沈庆之死时八十岁。

杀死亲叔叔的沈攸之，相貌丑陋，小时候父亲去世，家境贫寒。元嘉二十七年（450），朝廷大肆拉壮丁北伐，沈攸之应征入伍，此后随沈庆之征讨。沈攸之作战勇敢，参加了讨伐刘劭、征讨刘诞的战役。在讨伐刘劭的战斗中，沈攸之勇猛奋战，屡建战功，多次身受重伤，在广陵之战中还被箭射穿了骨头。他内心有很强的名利观念，且自视很高，但叔叔沈庆之让他从普通士兵做起，并没有给予特殊照顾。当刘骏看到沈攸之善战，要对他大加赏赐时，沈庆之还出面阻挡，沈攸之由此对叔叔怀恨在心。刘子业登基后，沈攸之马上献媚，帮助小皇帝诛戮大臣，和宗越、谭金等人成为刘子业的宠臣。沈攸之因为杀叔叔沈庆之有功，升为右军将军。

二

刘宋王朝大封宗室，让皇子皇孙们顶着王爷的尊衔在地方上担任实职，控制一地的军政大权，形成藩镇。刘裕的本意可能是吸收曹魏抑制宗室，导致皇室力量薄弱的教训。他本人雄才大略，能够控制那么多的宗室藩镇。传到儿子刘义隆，刘义隆就显得有点儿力不从心了，转而对兄弟猜忌起来，所以才有了赐死刘义康的先例。到了刘骏时期，皇帝和宗室藩镇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猜忌和提防的猫鼠游戏。大封宗室制度设立的本意完全被颠倒了过来。

刘子业即位后，叔叔湘东王刘彧（yù）、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都镇守一方。刘子业不放心，把他们召回建康，关在宫中当作木桩给自己练习拳脚，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把三个叔叔关在竹笼里。三位王爷都长得很胖，刘子业给他们一一过秤，最重的刘彧获得“猪

王”的绰号；刘休仁其次，被称为“杀王”；刘休佑第三，被称为“贼王”。刘子业对三人任意侮辱，每次出宫都把他们关在竹笼里随行，招摇过市。

三个叔叔中，刘子业对刘彧最提防。有民谣说：“湘中出天子。”刘彧恰恰是湘东王。刘子业对他猜忌最重，侮辱最多。既然叫刘彧“猪王”，刘子业觉得刘彧的生活就得向猪的生活靠拢。他命人挖了一个土坑，在坑里灌上泥水，把刘彧扒得赤条条地扔到泥水坑里，然后用木槽盛上猪食，强迫刘彧像猪一样趴在木槽里吃食。每次看到“猪王”哽咽着吃猪食的样子，刘子业都笑得前仰后合。

刘彧不堪其辱，没几天就拼命反抗，不愿当猪了。刘子业二话不说，命人把刘彧五花大绑，像挑猪一样用棍子挑着四肢，抬到御膳房。刘子业吩咐御厨：“杀猪！”建安王刘休仁这天恰好被允许在竹笼外放风，看到这一幕，悄悄跟到了御膳房。他想救下哥哥刘彧，急中生智，装作嬉皮笑脸地对刘子业说：“皇上不该杀这头猪！”刘子业奇怪地问为什么。刘休仁说：“皇上的生日快到了，到时候再杀，取猪肝猪肺！”刘子业想想有道理，继续将刘彧关押。刘彧不断遭受刘子业的凌辱，好几次都命悬一线，全靠刘休仁装疯卖傻、取巧逢迎，才一次次逃过鬼门关。

修理完三个叔叔，刘子业又对镇守地方的兄弟们猜忌起来。其中最让他不安的是担任江州刺史的晋安王刘子勋。刘子勋当时只有十岁，还是孩子，政务都委托长史邓琬，有什么值得猜忌的呢？原本，宋文帝刘义隆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孝武帝刘骏也排行老三，刘子勋很不幸在刘子业几个兄弟中也是老三。单单因为这个排行，刘子业就要三弟的命。

刚好建康内部发生了宁朔将军何迈谋反的事件。何迈其实是刘子业的姑父，他的妻子新蔡公主被刘子业纳入后宫乱伦后，何迈既恼怒又担心受祸。他密谋在刘子业出巡时发动政变，迎立刘子勋为皇帝。

事情败露，何迈被杀。刘子业广开株连之门，先杀了老将沈庆之，再派人去江州赐死刘子勋。江州长史邓琬闻讯，义愤填膺地表示：“我本江南寒士，承蒙先帝厚恩，以爱子相托。如今昏君当道，邪恶残暴，致使社稷危急。我当置性命于度外，以死来报效先帝。”他立刻统一江州内部意见，决定起兵反抗，拥立刘子勋为新皇帝。景和元年（465）十一月，晋安王刘子勋在众人的拥戴下自寻阳起兵，向各处州县发布讨伐刘子业的檄文。

听到刘子勋造反的消息，刘子业非常兴奋，马上决定御驾亲征。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个玩耍和杀戮的大好时机。

出发前，刘子业对留在建康的刘彧、刘休仁、刘休佑不放心，决心杀了他们免得夜长梦多，刘彧等人危在旦夕。江东寒士阮佃夫是刘彧的心腹，也是刘彧长子刘昱的老师。阮佃夫为主人的处境焦虑异常，联合刘彧的另一个亲信李道儿，决定拼死一搏，杀掉刘子业，救出刘彧。阮佃夫、李道儿还联合了皇帝的近臣寿寂之、太监钱兰生等十几人，大家都有诛杀暴君的意思。一天晚上，刘子业在华林园“射鬼”。刘子业杀人太多，老觉得皇宫中有女鬼纠缠自己，巫师们就建议他射鬼。射鬼的时候，刘子业屏退侍卫，只留巫师和彩女们跳舞、射箭。阮佃夫等人觉得机不可失，决定当晚行动。寿寂之带头闯入华林园，刘子业看到寿寂之持刀恶狠狠地走过来，知道情况不妙，慌忙向他射了一箭，没有射中。刘子业掉头就跑，被寿寂之追上，一刀劈死。

刘子业死时十七岁，在位仅一年多，史称前废帝。“废”字比一般的恶谥更糟糕，意味着这个皇帝一无是处。为什么加一个“前”字呢？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和刘子业一样糟糕的坏皇帝：后废帝刘昱。

杀死刘子业后，政变集团把刘彧解救出来，拥戴他为新皇帝。这场政变，后人多认为刘彧不仅知情，而且是幕后主使。但《宋书》则明确记载直到事情发生后，“上（指刘彧）未知所为”。建安王刘休仁跑

到刘彧跟前，主动称臣，把刘彧奉迎到龙椅上坐定，再召见王公大臣。由于事起仓促，刘彧连鞋子都没穿，光脚走到宫殿，还戴着一般人戴的乌帽。等他坐定了，刘休仁发现穿戴不妥，才叫奴仆们找了顶白帽给刘彧戴上，又慌忙布置了羽仪礼器。刘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史称宋明帝。

《宋书》说之前的任何暴君和刘子业相比都相形见绌，罪行比不上刘子业的万分之一。任何人只要犯了刘子业罪行的其中之一，就足以玷污宗庙、辱没社稷，而刘子业居然把所有罪恶集于一身！

政变发生后，太皇太后（刘义隆的皇后）颁布诏书追认了诛杀行为的合法性，并历数刘子业的斑斑罪恶，痛斥孙子刘子业恶贯满盈，行同禽兽，连上古的暴君夏桀、商纣王都比不上他，简直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暴君！这也许是历史上对皇帝最恶劣的评价，表达了老奶奶对孙子极端的失望和愤怒。人们对刘子业持一边倒的谴责痛斥态度，《宋书》最终对刘子业的死也持欢呼的态度：“其得亡亦为幸矣！”

不过客观地说，将所有罪责都推给刘子业也是有失公允。刘家出身草莽，没有家学底子可言，更没有系统的教育方法。许多皇子刚会说话，就被封王授官，去镇守地方了。这等于是在孩子正需要教育的黄金时期，把他们放养了。刘宋皇室对皇子教育的失败，加上之前所说的大封宗室，两者结合导致皇帝无道、骨肉相残的种种悲剧。

宋明帝刘彧在即位诏书中痛斥刘子业“人面兽心”“反道败德”“毒流下国”“实开辟所未有，书契所未闻”。那么，他又将如何表现呢？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

刘彧即位后，首先面临的是巩固皇位的问题。

天下普遍认为，刘子业有罪该杀，但刘彧以叔叔的身份夺了侄子辈的皇位，也是不对。而且之前，晋安王刘子勋已经起兵讨伐刘子业，得到了天下的响应。刘子勋是刘骏的儿子，在继承序列上比刘彧更有资格当皇帝。刘彧登基后，尝试和刘子勋谈判，提升侄子为车骑将军，希望他能罢兵修好。但是邓琬等人不接受，并在泰始二年（466）正月在寻阳为刘子勋举行了登基仪式。刘子勋称帝，改元永嘉，设置百官，成立了和建康对峙的中央政府。

更让刘彧尴尬的是，他虽然占据着首都，更早称帝，但天下大多数州县却承认刘子勋为新皇帝，不承认他。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实力派都宣布效忠寻阳的朝廷，还派兵响应刘子勋；湘州、广州、梁州等地也向刘子勋表示效忠；东边的会稽、吴等地也效忠刘子勋，并且起兵反对刘彧。刘彧能控制的，只有首都建康和周边丹阳、淮南等几个郡的地方。

刘彧心态很好。他本来就没想到能当皇帝，现在也不在意将皇位让给刘子勋。铁杆兄弟刘休仁拉住刘彧，不让他让位，鼓励他奋战一场再决定进退不迟。

于是，刘彧在泰始二年（466）正月下令内外戒严，以司徒建安

王刘休仁为都督、王玄谟为江州刺史，发兵讨伐刘子勋。刘彧即位后，原本依附刘子业的沈攸之遭到冷遇。沈攸之告发昔日同伴宗越、谭金等人“谋反”，得到了刘彧的好感，重新被任用。这次，沈攸之也在讨伐将领之列。他确实有才，而且从军多年，经验丰富，屡败刘子勋的部队。而刘子勋称帝后，以邓琬为丞相。邓琬虽有热血却无谋略，且拉帮结派、贪图享受。面对节节推进的沈攸之等人，邓琬惶恐无计，在内乱中被杀。沈攸之攻入寻阳，擒斩十一岁的刘子勋。刘休仁再分别派遣将领进攻荆、郢、雍、湘等州，相继铲除支持刘子勋的势力。

在东部，刘彧起用将军吴喜。吴喜在东部郡县有为政宽松的好名声，得到百姓的支持，很快扭转了局势，平定了响应刘子勋的势力。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等人见刘子勋死后，也宣布效忠刘彧。南方重归一统，刘彧没费几个月时间就坐稳了皇位。

危机解除，刘彧身上好色、猜忌和残暴等“家族病”迅速显现了出来！

他把后妃、公主和命妇聚集到宫中欢宴。喝到半醉的时候，命令所有女性裸露身体，相互戏谑。后妃、公主与命妇都不敢违抗刘彧的命令。

刘彧猜忌成性，对宗室极不信任，继续大开杀戒。杀人之多，不仅令刘骏望尘莫及，就是连刘子业也自叹不如。刘彧是刘义隆的儿子，便将当时还活在南方的十二个兄弟全部无端杀害，只留下一个平庸无能的桂阳王刘休范；刘彧是刘骏的弟弟，于是又把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一口气全部杀死。需要指出的是，刘彧杀害的这些兄弟、侄子，不是单单杀他们一人，而是满门抄斩，包括生母、妻妾、子女。刘休仁和刘彧一起被刘子业关过竹笼，因为他的多次搭救，刘彧才没被刘子业当作猪给杀掉。刘彧称帝后，刘休仁忙前忙后，帮哥哥巩固皇位。对这个有大恩于自己的弟弟，刘彧也不放心，最后还是把刘休

仁召入皇宫，强灌毒药害死了。将军吴喜平定东部郡县，功勋卓著，也被刘彧无端杀害。

大规模屠杀亲人、功臣后，刘彧信任阮佃夫、沈攸之等人，放手让他们处理军政事务。

阮佃夫救主有功，刘彧称帝后被封侯、赐官，掌握朝廷实权。阮佃夫本是刘彧的家庭教师，没有成熟的政治构想，掌权后也提出不了什么政策措施，就知道行贿受贿。凡事没钱不行，而且钱送少了也不行。甚至连老家的侄子来找他解决工作问题，也被逼行贿。

大凡一个人从社会底层突然跃升到顶端，大权独揽，多半会追求享受，用骄奢淫逸来弥补、麻醉自己。阮佃夫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住宅园林，赛过宫廷，家中堆满珠玉锦绣，蓄养女伎数十人，才貌冠绝当时。为了泛舟游玩，阮佃夫从家中向东挖掘人工河，长达十里，泛舟河上，命女伎弹奏作乐。阮家的厨房中水陆珍馐齐备，临时操办招待数十名宾客的宴席，一眨眼的工夫就能办完。阮佃夫生活豪奢，为京城中人仿效。同时，阮佃夫暴得大权，对权力一点儿都不珍惜，滥封仆从为官。阮家拉车的人都是虎贲中郎将，马旁的随从都是员外郎。朝士无论贵贱，都奉承巴结阮佃夫。阮佃夫自我膨胀，自大到极点，一般人根本就不搭理，能进入他房间谈话的只有一两个人而已。

朝政黑暗、刘彧多疑，曾经支持刘子勋的薛安都等人惶恐不已。果然，刘彧惦记着薛安都。薛安都表示效忠后，刘彧派张永、沈攸之领重兵北上“迎”他。薛安都知道大祸临头，派使者向北魏投降，表示愿意献出徐州的土地和军队，并协助北魏进攻刘宋。

薛安都是一员虎将，而且天上掉下这么大一块馅饼，在北魏朝堂引起了一阵骚动。很多人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觉得薛安都开始是北魏的大臣，中途投降刘宋与北魏为敌，现在又主动投降，如此反复，未必可信。最后，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圣心独断，接受了薛安都

的投降，授薛安都为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赐爵河东公，对投降的宋军大规模封赏，就连薛安都的儿子都一律封侯。从此，本是刘宋北方长城的薛安都及部下都铁了心效忠北魏，与南方为敌。同时，大批魏军进入彭城，接收徐州等地。泰始三年（467）正月，薛安都的降军联合北魏援军，击败张永、沈攸之的宋军。薛安都继而引魏军攻破历城，崔道固投降；攻克东阳，俘虏沈文秀。刘宋王朝受到致命打击，外部局势迅速恶化。

元嘉北伐之后，宋军虽然失败，但北方重镇彭城、历城、东阳等都控制在宋军手中。南北边界保持在离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如今因为薛安都的投降，刘宋在淮北的四州及豫州、淮西等郡县先后沦陷，相当于丢失了现在山东、河南的大片地区和江苏、安徽的北部。南北边界被推移到淮河一线。南方在对北方战争中更加处于劣势，之后一退再退，直至灭亡。

刘彧逼反薛安都，导致北方领土沦陷，是影响南北朝时期双边关系的重大事件。

刘彧统治后期，好鬼神，多忌讳，制定言语或文书中回避祸、败、凶、丧及疑似语句的规定数百上千条，大臣中谁违反了规定必加罪戮。宫中关于生活方面的禁忌也特别多：移床、粉刷墙壁都要先祭土地神，派文人撰写文辞祝策，搞得像朝廷大祭一样。刘彧年纪越大，越残忍，越喜欢虐杀。左右忤逆了他的意思，往往被斫（zhuó）刳（kū）断截。结果自然是“内外常虑犯触，人不自保”，活脱脱是刘子业时期恐怖时光的再现。

刘子业只是荒唐了一年多，刘彧却胡作非为了十多年，把南方搞得乌七八糟。薛安都叛变后，淮河南北战斗不断，导致府藏空竭，一度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但是刘彧依然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不断追加苛捐杂税，盘剥百姓。百姓困苦不堪，州县骚动。后世普遍认为刘彧时期政治黑暗、皇室削弱，“宋氏之业，自此衰矣”。

刘宋宗室子孙众多。刘彧却长久没有儿子。

荒唐的本性让刘彧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方法来。他看到亲信李道儿生了很多儿子，就将宠妾陈妙登赏赐给李道儿。等到陈妙登怀孕后，刘彧赶紧又将陈妙登接回来。陈妙登就这样生下了儿子，取名刘昱。刘彧将刘昱当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并册立为太子。后来，刘彧找了个借口将李道儿赐死。不过，社会上始终风传刘昱是李道儿的儿子。刘昱也听到了那些传言，成年后还常常自称“李将军”，一点儿都不为父母避讳。尝到有儿子的甜头后，刘彧派人秘密将诸王怀孕的姬妾接进宫里，让她们在宫中生产。如果孕妇生下来的是男孩，就杀了母亲留下孩子，让宠姬冒充孩子的母亲。通过这样的手段，刘彧一共“有”了十二个儿子。其中有多少是刘彧亲生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泰豫元年（472），刘彧病死，年仅十岁的太子刘昱即位。

临终前，刘彧指定袁粲、褚渊二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儿子。袁粲是老官僚了，历经数朝逐步升迁而来。褚渊在仕途上的成功，则主要仰仗两个优势：第一，他父亲褚湛之娶了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始安公主，褚渊自己娶了宋文帝刘义隆的女儿南郡公主，和刘宋皇室亲上加亲；第二，刘彧还是湘东王的时候，褚渊就和他关系密切。

两位顾命大臣都有些力不从心，觉得有必要再拉几个人一起干。袁粲提名了刘秉。刘秉是刘裕的侄孙，当时刘宋宗室能干的人不多，刘秉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来的宗室成员之一，就被袁粲调到中央。褚渊见袁粲拉了一个人进班子，也提名了一个人：萧道成。萧道成出身将军世家，是个职业军人。褚渊早年路遇萧道成，就对人說：“此非常

人也。”认为萧道成“材貌非常，将来不可测也”。于是，刘秉担任了尚书左仆射，参与政事；萧道成担任右卫将军、卫尉，负责首都军事。

宋朝皇帝继刘义隆之后，一个不如一个。天下人忍耐着一个胡作非为的皇帝，觉得天底下不可能有比他更坏的皇帝了，等这个皇帝死的时候都松了一口气，结果发现即位的皇帝比上一任更坏，更不是东西。如此反复，不断刷新人们忍耐的底线。

新即位的刘昱虽然年纪很小，但荒唐胡闹、残忍无道的程度，一点儿都不输祖辈。他在五六岁就被立为太子，在东宫的时候刘昱从不好好学习，喜欢嬉戏，特别喜欢学猴子爬油漆竿。那些竿子离地面有丈余高，刘昱爬到顶端再滑下来，老师们都管不了他。稍微长大些后，刘昱喜怒无常。左右有不顺他意思的人，动手就打，习以为常。

刘昱的爱好主要有两个：出宫游玩和无故杀人。刘昱喜欢穿件小衣衫，带着几个随从出宫，不管郊野还是市井，哪里有趣就往哪里凑。陈太妃开始的时候还时常乘着车跟随他。但刘昱一出宫就似蛟龙入海，转瞬间将母亲甩得无影无踪。陈太妃越来越力不从心，对宝贝儿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刘昱常常是夜里从承明门出去，次日凌晨回来，或者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每次在外面，刘昱困了就投宿客栈，有的时候甚至找个路边空地睡一觉。他交往的对象不是卖柴养马的商贩，就是拉车担货的少年。遇到被人呵斥辱骂，刘昱就淡然一笑；遇见婚丧嫁娶，刘昱就冲入人群高歌饮酒取乐。官吏见了，都习以为常。

刘昱如果仅仅是喜欢民间，倒还有与民同乐、不拘小节的味道。遗憾的是，他总是携带钳凿斧锯，发明了击脑、椎阴、剖心等刑罚。通常情况下，刘昱每日都杀数十人，有些人则是刘昱亲自用长矛刺穿的。一次，刘昱闻到一个叫孙超的大臣口中有蒜味。为了证明他吃过大蒜，刘昱让左右抓牢孙超，亲手剖腹查探他肚子里有没有大蒜头。建康城传闻大臣孙勃聚敛了许多金银财宝，刘昱就发动了一次夺宝行

动，带着人马劫掠孙勃。抢劫开始了，刘昱挥刀冲锋在前，头一个冲入孙家，一伙人杀掉了孙勃。刘昱记得小的时候被孙勃管教过，竟然脔割尸体解恨。

从即位第四年起，刘昱觉得各地反叛力量都被镇压下去，天下太平了，于是每天都出去胡闹。最后发展到手执长矛大棒，凡是遇到男女行人及犬马牛驴就立即扑杀的程度，致使百姓惊恐，道无行人。刘昱杀人成瘾，如果一日不杀人就闷闷不乐。父亲的正妻老太后多次训斥自己，刘昱烦了，竟然令太医煮毒酒要鸩杀老太后。左右侍从慌忙劝他说：“如果太后死了，陛下您就得以儿子的身份参加各种各样烦琐的丧礼仪式，我们也没时间陪陛下出宫游玩了。”刘昱一想也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却说阮佃夫在刘彧死后没能成为顾命大臣，内心失落。虽然依旧身居高位，但他的不满和怨恨越积越多。阮佃夫看到刘昱嗜杀成性，朝野人人自危，就联合将军申宗伯、朱幼、于天宝等人密谋杀死刘昱，拥立其弟刘準，通过废长立幼来夺取大权。这是阮佃夫第二次密谋政变了，他制订了详细的政变计划，拟定趁刘昱去江乘射雉的时候发难。政变的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好，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刘昱当日临时改变路线，没有去江乘，害得阮佃夫的计划无法施行。同谋的于天宝心理素质差，见状吓得告发同谋以求自保。刘昱在杀人方面很在行，迅速将阮佃夫捕获处死，并封存了他搜刮的不义之财。

三

刘昱即位的第二年（474），桂阳王、江州刺史刘休范在江州起兵反叛。

刘休范就是那个刘彧觉得平庸无能懒得杀的兄弟。作为硕果仅存的皇叔，刘休范自以为德高望重，对自己没能进入顾命大臣班子非常不满，因此起兵谋反。他亲率两万大军从寻阳出发，昼夜兼程杀向建康。朝廷派出萧道成率军迎战。两军在新亭相遇。

刘彧没有看错刘休范，他的确无能。萧道成使了一个小小的诈降计就把他解决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萧道成指使部将张敬儿、黄回前去敌军诈降。刘休范轻易相信了二人，当晚还备了酒宴招待他们。酒过三巡，张敬儿借敬酒之机，从刘休范腰间抽出配刀，手起刀落，将刘休范斩首，然后取下头颅疾驰而去。刘休范一死，叛军很快被击溃。

平定刘休范之乱后，袁粲、褚渊、刘秉、萧道成四人轮值，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号称“四贵”。这四贵的排名，萧道成最末。他资历最浅、职位最低，在战后给褚渊、袁粲的书信中还自称“下官”，说自己“志不及远”。他和褚渊关系亲近，袁粲则和刘秉关系亲近，班子内部隐约分成了两派。

桂阳王刘休范死后，刘义隆诸子全都死了，孙子辈中以建平王刘景素年龄最长。刘景素勤学好文，招揽人才，声望不错。朝野曾流传刘景素“宜当神器”。之前刘景素就被朝廷忌惮，因此他更加注意结交人才，积蓄力量以防不测。刘休范死后，刘景素内心惊恐，举兵自卫。兵败后被满门抄斩。之后，刘宋宗室中再也找不出像样的人才了。刘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原本人才济济，却在刀光剑影和骨肉相残中凋敝殆尽。时人流传：“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说的就是皇室内讧导致的人丁衰败。

之后，萧道成篡位，将刘宋宗室不论长幼一律杀死。刘裕的子孙只剩下逃往北魏的刘昶(chǎng)。刘昶是刘义隆的儿子，封义阳王，任徐州刺史。景和元年(465)，前废帝刘子业诬陷刘昶谋反，下诏讨伐。刘昶闻讯只好造反，被打败后，仅带数十骑连夜逃奔北

魏。在北魏，刘昶生活得远比在南方好，不仅娶了公主当了驸马，还获封丹阳王。刘宋宗室遭到杀戮后，刘昶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在北方延续刘家的血脉。

第三章 南齐精神病家族

七夕夜弑君事件

—

元徽五年（477）盛夏的一天中午，建康城酷热难耐。中领军萧道成体态过胖，解衣袒腹，在家里堂中纳凉、睡午觉。

突然，门口出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衣着华丽，容貌形态不像一般人家的子弟，但行为猥琐，对着萧家大门张头探脑，分明又是一群市井无赖。尤其是领头的年轻人，十三四岁光景，特别显眼，招人怀疑。这群人的确不是一般人，而是当朝皇帝刘昱和他们的一帮侍卫。这天，好动荒唐的刘昱出宫游玩，经过萧道成的领军府，突然想进去戏弄一下这位老将军。

领军府有警卫认识皇帝，要行礼迎接，刘昱示意警卫不要惊动他人。他带着一行侍卫轻手轻脚地直入萧家正堂。刘昱一眼看到酣睡的胖子将军，好奇地揭开帐子欣赏起袒胸露肚的萧道成来，只见萧道成的肚子硕大滚圆，肚脐像鸡蛋一般大，刘昱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惊醒了萧道成。萧道成睁眼见是小皇帝亲临府邸，以为出了

什么大事，急忙起身要穿衣行礼。刘昱摇摇手说：“你的肚子是个很好的箭靶子，正好让我试试箭法。”

萧道成惊讶得还没回过神来，刘昱就命令左右架起萧道成站到几步开外的地方，说要用他的腹部当箭靶，肚脐眼当靶心练习箭法，还有模有样地拿起弓箭，摆出射箭的姿势。

萧道成吓得魂飞魄散，慌忙用手捂住肚脐，大声申辩说：“老臣无罪，为何要射杀我？”

刘昱也不搭理，拉满弦就要放箭。千钧一发之际，随从的皇家卫队长王天恩进言道：“萧领军的肚子真是一个好靶子，可以供皇上练习射技。但是如果一箭下去将萧领军射死了，以后皇上就没有这么好的靶子了。皇上不如将箭头拔去，用秃箭射。”

刘昱想想觉得有道理，于是拔掉箭头，张弓就射。那一箭正中萧道成的肚脐眼，痛得他嗷嗷大叫，小皇帝刘昱却哈哈大笑。王天恩等人连忙拍马屁说：“陛下神射无双，一箭中的。”刘昱更加开心了，玩得尽兴后扔下敢怒不敢言的萧道成扬长而去。

回去的路上，刘昱想起刚才萧道成的神态又发起怒来。回到宫中，刘昱咬牙切齿地叫唤：“明天就去杀了萧道成。”他还磨起剑来，一副明天要亲力亲为的架势。宫中有人将这番话告诉了他的生母陈太妃，陈太妃匆忙赶过来制止儿子。她骂道：“萧道成统领禁军，是国家的功臣。你杀了他，谁还为国家出力啊！”刘昱挺怕母亲的，琢磨她教训得有道理，也就把杀萧道成的事情搁到一边去了。

萧道成，元嘉四年（427）出生于职业军人家庭，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峄城）人，祖先在西晋末年南迁，寓居武进（今江苏丹阳）。父亲萧承之历经战争，因战功一步步升迁为刘宋王朝的右军将军。萧道成年幼的时候曾经学习儒学，但在他十四岁那年发生了彭城王刘义康被废黜事件，父亲的部队要移防豫章，萧道成只好放弃学业，正式参军

跟随父亲去了江西。萧道成先后历经大小数十战，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官职逐步提升。泰始四年（468），他正式成为南兖州刺史，先是镇守广陵，后来移镇淮阴，成为南方对北魏作战的前线指挥官。

不知道是恶作剧，还是有心陷害，建康城一度出现了“萧道成当为天子”的流言。刘彧原本就觉得萧道成相貌出众，不是久居人下之人，听到民间流言后更加怀疑前线的萧道成有野心，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他决定试探一下萧道成，于是千里迢迢派遣使者送给萧道成一壶酒。萧道成戎装出迎使者，谢过天恩后，毫不怀疑地仰面喝下御酒。听完使者的回报，刘彧判断萧道成不会造反，于是放过了他。

当时的萧道成还是一位忠心的前线将领，无奈猜忌成性的刘彧老是怀疑他，弄得他非常郁闷。萧道成曾经写过一首《群鹤咏》，全诗只有四句：“八风舞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云间志，为君苑中禽。”他用鹤的迎风高飞、当空鸣叫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宏才大略。遗憾的是，因为受到朝堂的约束，难以真正展翅高飞，无奈成为君王的观赏动物。可见，虽然职位得到升迁，但萧道成的心情并不愉悦。

泰始七年（471），宋明帝刘彧病重，派人召萧道成入京。前线部将都觉得此行凶多吉少，为萧道成担心。萧道成清醒地分析道：“诸位都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当今皇上诛杀兄弟，而太子稚弱。皇上病重，正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既想寻找辅政大臣，又不想威胁到太子的地位。皇上召我，我正应该迅速应召，如果迟迟不去，反而是自取其祸啊。”接下去，萧道成又讲了一段大逆不道的话，充分暴露了他心中已经萌发的不臣之心。他说：“皇室骨肉相害，非灵长之运。国家祸难将起，各位要和我一起出力同心啊。”

事实证明萧道成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一到建康，他就被拜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加邑二百户。不久，刘彧驾崩，立下遗诏，任命萧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他很快掌握了刘宋朝堂禁卫军的兵

权，为日后的政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禁卫军权是中国古代宫廷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古代君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也常常在乱世中脱离君王的控制，甚至成为颠覆君权的工具。禁卫将军控制禁卫军权，从而专断朝政，多有废立篡弑之举。登基之初，新皇帝就会让亲信将领担任禁卫将军，以控制禁卫军权，巩固统治。南朝时候政治不稳，昏主迭出，禁卫军权对朝政影响更大。刘裕打败桓玄初期就亲自担任指挥禁卫军的领军将军，牢固掌握建康的禁卫军权。这是刘裕控制京师、整顿朝政的势力基础。刘裕开了这个头，以后的宫廷政变和朝政变迁或多或少都有禁卫军的影响，为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命题。

话说荒唐的刘昱虽然放弃了杀萧道成的想法，但萧道成内心却极度不安。谁能保证自己哪天不会被这个莽撞无理的小皇帝杀掉呢？萧道成为了自保，觉得只有推翻刘昱才行。他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正常途径废立皇帝。他找到四贵中的袁粲、褚渊，提议废黜刘昱。领衔四贵的袁粲不同意，说：“皇上还在幼年，有些错误将来会改正的。废立皇帝是大事，不是每一代都可以执行的。纵使废立皇帝成功，我们这些做大臣的最终也没有好下场。”褚渊默然不语。他也觉得刘昱荒唐无道，推翻他未尝不是好事，同时又觉得袁粲的意见也有道理。不过在内心，褚渊是支持萧道成的。

正常途径走不通，萧道成就密谋通过“非正常途径”废掉刘昱。他四处联络同道力量，首先寻找的就是禁卫军内部的人，比如禁卫军越骑校尉王敬则、刘昱贴身随从陈奉伯等人，伺机行事。

元徽五年（477）七月初七，七夕节，刘昱在白天的行程非常混乱。虽然《宋书》和《南齐书》记录了不同的版本，但都显示他在外面疯玩，夜深才回到宫中。

当晚，刘昱是在仁寿殿东的阿毡屋中就寝。临睡前，他突然记起今天是七夕节。于是对随从杨玉夫说：“今天晚上织女渡河与牛郎相会，我要看看织女的模样。等织女出来了，你叫醒我。如果看不到织女，我明天就杀了你。”

杨玉夫大惊失色。他如何能够让刘昱看到织女？杨玉夫马上想到了之前得罪刘昱的人被残杀、被肢解的血腥场面。他知道同伴陈奉伯等人平日里与禁卫军校尉王敬则等人互通消息，有过密谋。为了自卫，他不得不铤而走险了。于是去找陈奉伯，将事情起因和自己要杀小皇帝自卫的计划和盘托出，以寻求陈奉伯的帮助。陈奉伯一面联络王敬则，一面和杨玉夫联络了更多的刘昱侍卫、随从，准备共同起事。结果，刘昱平日的随从共二十五人聚集起来，一致决定弑君。

事不宜迟，杨玉夫带了几个人来到刘昱休息的毡房外，只听鼾声阵阵。众人突入毡房之中，取出刘昱的防身刀，将熟睡中的十六岁小皇帝杀死。杨玉夫将刘昱的头颅割下，又假传圣旨，宣禁卫军校尉王敬则入内，商议后事。

大家商议的结果是利用小皇帝平日的生活习惯，假扮刘昱出宫去，将萧道成引进宫来主持大事。于是，王敬则领头，杨玉夫假扮刘昱，陈奉伯提着刘昱的脑袋，向宫外走去。刘昱之前经常深更半夜出宫，宫廷一千人等一见是小皇帝的贴身随从和禁军校尉陪同“皇帝”出宫，没有丝毫的怀疑。刘昱每次出门，门卫和士兵们惧怕他的喜怒无常，都不敢正视他。这天也是一样，宫人只知道慌忙打开承明门，看都没看清到底是不是刘昱本人出宫，就放走了一行人。

来到领军府外，王敬则称带了皇帝的首级，请萧道成入宫主持大

事。因为整件事萧道成毫不知情，现在深夜突然有人说杀了皇帝，请他入宫，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萧道成的最初判断就觉得这极可能是刘昱对自己的考验或者是另一场恶作剧，因此下令家人紧闭大门，不要放人进来。

王敬则无奈，急中生智，将刘昱的人头从门上抛了进去。萧道成忙命人将脑袋上的污血洗去，亲自查看，果然是刘昱的首级。他大呼一口气，这才下令打开府门。萧道成听完王敬则的报告后，迅速决定入宫。他全身戎装，率左右数十人，由王敬则、杨玉夫等人引路向宫中奔去。这一次，他们声称是皇帝回宫，让宫中开门。宫廷内照样没有丝毫怀疑，打开了宫门。

承明门刚一打开，萧道成就骑着常骑的赤马当先冲入。宫中见放进来的是全副武装的萧道成及其侍卫，大惊失色。萧道成所骑的赤马高大威猛，也许是头次进入深宫的缘故，扬蹄嘶叫起来，竟然镇住了不知所措的宫人们。萧道成日后登基，封这匹赤马为龙骧将军，民间则称它为赤龙骧，可见确非寻常马匹。王敬则等人趁机高举着刘昱的脑袋大喊：“昏君已死，萧领军入宫主持大事！”殿内一片惊怖，片刻后都高呼起万岁来——可见刘昱是多么的不得人心。萧道成随即下令自己控制的禁卫军陆续包围皇宫内外，连夜控制了整个局势。

大事稍定后，萧道成派人召集袁粲、褚渊、刘秉三位大臣入宫，商议废立事宜。褚渊原本就赞同萧道成，入宫知道真相后果断地站在萧道成这一边。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两人原本就和萧道成不睦，且权力地位与萧道成相当，现在见萧道成一夜间接了大局，袁、刘二人不愿意萧道成独霸朝政，又不满自己对皇帝猝死等事毫无所知，心生怨恨。天色渐渐明亮起来，四贵在殿庭前的槐树下集议。萧道成保持一副戎装，先对刘秉说：“刘大人您是国家重戚（刘秉是宗室成员），今日之事，应该由您主持。”刘秉没有想到萧道成会来这一手，慌乱地推辞了。萧道成又让袁粲主持废立之事，袁粲也不敢接受。这时，早就候在一旁的王敬则拔刀在手，威吓说：“天下事都应该归萧公

管，谁敢说一个‘不’字，就吃我一刀！”他拿起一顶白纱帽替萧道成戴上，推举萧道成马上去召集大臣主政，喊道：“今天谁敢再动！事情须趁热办！”

萧道成见王敬则如此支持自己，心中高兴，表面上却板着脸冲着他喝道：“你懂得什么，休得胡说！”袁粲就想开口，又被王敬则喝住。这时，褚渊出面说话了：“今日，非萧公不能了事！”于是萧道成当仁不让地宣布，备法驾去东城迎立刘彧第三子、刘昱的弟弟、年仅十一岁的刘準为新皇帝。袁、刘二人在大局将定的时候又后悔了，想发表意见，但是萧道成布置的士兵用长刀组成了刀墙，阻隔在袁粲、刘秉等人面前。两人大惊失色，快快而归。

皇太后天明后知道了消息，异常震惊，但是木已成舟，只好接受既成事实。太后下令说：“刘昱穷凶极暴，自取毁灭。但是将他废为庶人，我又有所不忍。可特追封为苍梧郡王。”因此，刘昱在历史上被称为“苍梧王”或者“后废帝”——与之前的刘子业并列。

刘準登基后，改号昇明，史称宋顺帝。萧道成因为有扶立之功，进位为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萧道成坚决推辞，只接受了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但在不久之后兼管了南徐州、豫州、司州三州。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不仅没有被追究弑君的罪责，还被封赏爵邑。

之前四贵的排名颠倒了过来，成了萧道成、褚渊、袁粲、刘秉。实际上，萧道成主持废立，又军权在手，后面三人都不能与他抗衡。萧道成独掌刘宋王朝的大政，成了七夕政变的最大受益者。

刘宋王朝的背水一战

—

萧道成势力掌握刘宋实权后，朝野还潜伏着反对他的强大力量。两股力量的消长，决定着南朝政治的走向。

原本是四贵之首的袁粲在刘宋王朝做官几十年，又受宋明帝刘彧的临终顾命委托，对刘宋王朝多少有感情。他眼看着当年提携起来的萧道成凌驾到自己头上来了，心里本来就不好受，眼下对萧道成架空刘宋王朝并意图逐步篡位的行径更是看不下去。于是，以袁粲为核心，聚集了一股反对萧道成的势力。《宋书》说袁粲是“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称赞了他对刘宋王朝的忠心。就是日后的萧齐王朝，也对袁粲的忠心表示了赞赏。

四贵之一的刘秉首先参加了进来。前湘州刺史王蕴是太后的外甥，和萧道成一向不对付，也参加了进来。此外，将军黄回、任侯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人，或是因为忠于刘宋王朝，或是因为反对萧道成，先后聚集到了袁粲周围。

在建康之外，反对萧道成的最重要人物是荆州刺史沈攸之。袁粲集团的人都在建康，人数虽然不少，但不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实力有限。而沈攸之长期盘踞地方，是真正有能力和萧道成较量的实力派。

沈攸之投靠刘彧后，以英勇奋战和献媚奉承博得了刘彧的好感。泰始五年（469），刘彧任命沈攸之为郢（yǐng）州刺史（治所在今武

汉）。从此，沈攸之长期盘踞在长江中游，扩充势力。沈攸之精通政务，但横征暴敛，重点发展武备，他为政苛暴，有时还鞭打士大夫，谁不服从自己就当面辱骂。总之，沈攸之在辖区内实现了一元化的强势领导，导致士民畏惮，令行禁止。刘昱即位后，沈攸之的地位继续提升，调任荆州刺史，并且都督荆、襄、雍、益、梁、宁、南北秦等八州诸军事，真正成了长江中游一霸。

沈攸之自以才略过人、功勋卓著，开始有不臣之举。他调任荆州的时候，挑选郢州的精锐部队和精良器械，携带赴任。到荆州后，沈攸之以讨蛮为名，大举扩充部队，加紧训练，始终保持临战状态。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沈攸之在荆州也推行重赋聚敛政策，就连给朝廷的赋税贡物也敢截留，他一心制造武器，最后养马两千多匹，拥有战舰近千艘。沈攸之还很重视人才建设，经过荆州的很多士子、商旅被他羁留。同时，他藏匿亡命的勇士，对于逃亡的部下，沈攸之不论远近一律穷追，务求捕获。最终，沈攸之发展到独断专行，不遵从建康号令的地步。作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沈攸之的谋逆迹象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萧道成还不想和沈攸之闹僵。刘昱死后，萧道成以宋顺帝的名义提升沈攸之为车骑大将军，依然担任荆州刺史，以安抚他的情绪。

可沈攸之根本看不上什么车骑大将军。他自认为功劳、能力和实力都超过萧道成，不甘心居于萧道成之下，继续听从朝廷的指挥。况且萧道成还有“弑君”的巨大嫌疑，所以沈攸之在昇明元年（477）的十二月以萧道成杀君另立为名，举兵反叛。此时，他已经蓄养了十万大军。一批批军队相继从荆州顺江而下，直指建康。

建康又一次震动不安。好在萧道成经历多次内战，已经对这种上下游的内战见怪不怪。他从容安排亲信镇抚东部各郡县，任命将军黄回为郢州刺史，督率军队反击沈攸之。

沈攸之起兵前，派人秘密联系建康内部的袁粲集团寻求合作。袁粲等人也跃跃欲试，想和沈攸之内外呼应，推翻萧道成。袁粲向褚渊透露了一些风声，希望他能够合作，如果不愿合作起码也要保持中立。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褚渊经过权衡，还是选择站到萧道成一边。恰好萧道成也来咨询褚渊的意见，褚渊就提醒萧道成：“沈攸之发难，事必无成。萧公倒是要防备内部。”萧道成觉得很有道理，请袁粲率一支部队驻屯建康城郊的石头城，名为防备沈攸之，实际上是将袁粲调出城去。

萧道成还亲自去拜访袁粲，袁粲称病不见。部下认为袁粲此举不妥，袁粲没有底气地说：“萧道成见面如果借口皇上年幼、时局艰难，劫持我去朝堂值班，我连推辞的理由都没有。一旦我跟他走了，可能就回不来了。”袁粲保持了极强的警惕心，抓紧制订从内部推翻萧道成的计划。

当时，萧道成入屯朝堂，主持讨伐沈攸之的全面工作。刘秉的族弟领军将军刘韞在门下省值班；卜伯兴是直阁将军，能接近朝堂；黄回则率领一支军队驻扎在新亭备战。这些人都是袁粲集团的成员，萧道成对他们疏于防范，为袁粲发动政变提供了便利。袁粲很快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假冒太后的命令，由刘韞、卜伯兴率宿卫部队进攻朝堂，抓捕萧道成；黄回率领本部兵马从城外向城内进攻；刘秉、任候伯等集团成员来到石头城和袁粲会合，众人以石头城为大本营，以石头城的驻军为预备队。

这是一个很周密、很稳妥的政变计划。政变集团集结了朝廷内外反对萧道成的所有力量和忠于皇室的最后力量——如果政变成功，则刘宋王朝延续统治；一旦失败，刘宋王朝面对图谋篡位的萧道成就将毫无还手之力。因此，这也是刘宋王朝的背水一战。

一个王朝到了末期，就好似病入膏肓的病人，找不到一块健康无恙的肌体。刘宋王朝国运将尽，虽然有坚守图存的忠臣，但缺少有胆魄、有担当的能臣。袁粲等人的计划是不错的，但因为执行者素质太低，最终在仓促间走向了失败。

原本计划集团成员夜晚在石头城会合，天亮时一同举兵。可刘秉一向胆小怕事，天还没有黑就内心骚动起来，坐立不安，喝个水都捧着杯子发抖，洒了自己一身。他住在丹阳郡，等不到太阳落山就用车载着金银细软和家眷向石头城赶去，后面还跟着门客、部下数百人。这样的架势连大街都堵塞了，还何谈保密。刘秉的反常情况立刻被萧道成知晓了，他不禁想：刘秉为什么要慌张地弃家而逃？他又为什么跑去石头城？难道他和袁粲有什么预谋？萧道成马上警觉起来，命令心腹王敬则当天参加值班，与卜伯兴一起指挥禁卫军。这就等于分了卜伯兴的兵权，让他成了一枚死棋。

另一边，袁粲看到刘秉带着一大家子人慌慌张张地跑到石头城来，顿足大叫：“你这么早来，把整件事都暴露出来了！”刘秉傻乎乎地回答：“我们同生共死，见到袁大人我死也甘心了。”

袁粲集团的计划还有一个疏漏，或者说它是萧道成的过人之处：早前袁粲带兵镇守石头城的时候，萧道成安插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人一同前行。这三个人名义上是袁粲的部将，其实是萧道成安排在石头城的眼线。

此时，城外的王蕴也听说了刘秉提前举家逃奔石头城的消息，感叹道：“事败矣！”王蕴还没引起萧道成的怀疑，之前还奉萧道成的命令去招募兵勇。此时，王蕴带着自己招募的数百新兵，狼狈地奔向石头城，希望和袁粲会合，继续按计划实施政变。王蕴这一小股部队赶

到石头城南门的时候，天色已经大暗。倾向萧道成的薛渊等将领闭门不开，还向王蕴的部队射箭攻击。王蕴误以为石头城已经被萧道成占领、袁粲已经失败，转身逃命去了。他的部队也随即四散而尽。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萧道成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派王敬则带兵捕杀了王蕴、卜伯兴，又加派王僧静带部队去石头城协助薛渊等人。萧道成的援兵很快就赶到了石头城，和薛渊等人合兵一处，在城内与袁粲的部队厮杀起来。袁粲和刘秉率领重兵把守府邸东门，没想到萧道成的军队从西门攻了进来。袁粲、刘秉慌忙折返回府内。府内漆黑一片，袁粲举着蜡烛照明。王僧静远远看到他，埋伏在暗处悄悄走近，准备生擒他。袁粲的儿子突然感觉有危险，挺身护在袁粲前面。王僧静举刀砍去，将袁粲的儿子一刀砍死。袁粲抱着儿子大哭，紧接着被王僧静杀死，死时五十八岁。余党四散一空。

袁粲死后，刘秉趁乱逃出城去，在城外被擒，与两个儿子一起被杀。任候伯等政变集团成员在当天夜里坐着轻舸如约赶赴石头城会合，听说袁粲失败的消息后，赶紧往回走，最后还是被捕杀。按照计划，黄回要率领新亭驻军向建康进攻。听说袁粲败亡后，他按兵不动，装作没有参与政变的样子。萧道成侦知黄回也参与了政变，可还需要仰仗他与沈攸之作战，佯装不知，却暗中提防着他。

镇压了内部政变后，萧道成得以全心全意对付沈攸之。

沈攸之在战争初期优势明显：备战多年，兵强马壮，敌人萧道成又陷于内患。他派出多路兵马，顺江而下，很快到达郢城郊外。此城城池矮小，又没有重兵把守，沈攸之本不应该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此浪费时间，如果想取胜，关键是尽快进攻建康。但是据守郢城的宋将柳世隆不仅主动出兵袭击沈攸之，还派人在城楼上肆意辱骂他。沈攸之被激怒，改变长驱东进的计划，命令各路军队围攻郢城。叛军昼夜攻打，逐渐攻陷了外城，筑起长堤围困内城。柳世隆拼命死守，坚持了三十余日，打退沈攸之的多次进攻。时间很快到了昇明二年

（478）的二月。沈攸之开始具有的优势在郢城下荡然无存：军队伤亡增多，士气低落，而萧道成也在解决内患后开始向上游进军了。

叛军开始逃散，而且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向被围的柳世隆投降。沈攸之为政，一味用强权聚拢，部下并非真心拥护，到最后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溃散，连将领都陆续离开。沈攸之被柳世隆打得一败再败，最后落魄到只剩数十骑跟随。撤退沿途他收容散兵约两万人，勉强组织了一支队伍，想退守江陵。走到距离江陵百余里的时候，才得知江陵已被萧道成派张敬儿占领，好不容易聚拢的士兵马上一哄而散。沈攸之穷途末路，只好和三儿子沈文和逃至华容界（今湖北监利）。父子俩走投无路，找了片树林上吊自杀了。

沈攸之死后，黄回以为萧道成没有怀疑自己，又自视功劳很大，逐渐放松了警惕。一次，萧道成派人召他回来商量军务。黄回放心地跟着来人去了，一到地方就被伏兵砍下了脑袋。至此，萧道成大获全胜。刘宋王朝的背水一战以失败告终，再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萧道成篡取刘宋江山了。

三

在镇压了反对势力后，朝廷封萧道成为太尉。萧道成抓紧内政建设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形象。

年轻的时候，萧道成曾经立下过“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的宏愿。一次，他与族弟萧顺之登上武进的金牛台，见枯骨横道，萧道成说：“宋文帝之后才几年时间啊，怎么又出现了这样的惨况？”当时他凛然的表情让萧顺之为之动容。元嘉之治结束后，南朝上流阶层奢侈成风，百姓也不事节俭。萧道成主政后，罢御府，清理

宫殿和官府的饰玩，禁止民间的华伪杂物。他以节俭勤政入手，积蓄国力，减轻百姓负担，推动刘宋王朝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随着萧道成威望的增长，昇明二年（478）九月，宋顺帝封萧道成假黄钺（yuè）、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给予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待遇。萧道成坚决推辞，朝廷屡次下诏敦劝，他才接受了黄钺，但是辞去了过高的特殊待遇。第二年，朝廷再次重申前命，萧道成“被迫”接受。他的接受是一个特殊的信号，朝廷马上又封萧道成为相国，总百揆，划出十个郡来设立齐国，封他为齐公，位在诸侯王之上。依照惯例，萧道成退让了三次，朝廷和公卿敦劝请求多次之后，他才接受。

齐国建立后，褚渊公开向萧道成表示，自己愿意学当年曹魏的司徒何曾，放着司徒不做，愿意做晋国的丞相。褚渊也不愿意在刘宋当官，而愿意去萧道成的齐国为官。萧道成婉言谢绝。褚渊的愿望没有实现，但透露出来强烈的政治信号：刘宋不行了，投靠萧齐才是正道！

局势豁然开朗。接下来就该轮到小皇帝刘準主动禅让了。但是刘準还是一个十二岁的贪玩小孩，根本不知道禅让是怎么回事。而皇太后、太妃等人又装聋作哑，不吱声。萧道成不可能真的杀入宫中去抢夺宝座。局势似乎停顿了。

最后还是禁卫军起了作用。昇明三年（479）的一个春天，禁卫军官兵在王敬则的率领下涌入宫中，大喊“齐王当继大位”的口号，横冲直撞，逼刘準逊位。刘準当时正在一个小房间里玩捉迷藏，被外面一吓，不肯出来。禁卫军才不管这些，据说是将刀架在皇太后的脖子上，逼皇太后亲手把小皇帝从某个房间的角落里拽出来。之后，官兵又架着刘準完成了“禅让之礼”。

刘準坐在车上，被人急速带往宫外，在惊吓过度的情况下反而不

哭了。他问王敬则：“你们要杀我吗？”王敬则回答说：“你不能住在宫中了，要搬到别的地方住。你家祖先取司马家的天下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刘準哭泣道：“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家眷听到小皇帝的这句话，哭成一片。

依照惯例，萧道成在接到刘準禅位的消息后还要推辞三次，萧道成都一一做了，宋朝从刘準到王公贵族又诚恳坚定地请求了三次。其中兼太史令、将作匠陈文建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到那时为止的禅让历史的一个小结。他说：“后汉从建武到建安二十五年经过一百九十六年禅位给魏；魏从黄初到咸熙二年经过四十六年禅位给晋；晋从太始到元熙二年经过一百五十六年禅位给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已经有六十年了。占卜的结果是‘六’，预示着天命六终六受。请齐王顺天时，应符瑞，登基称帝。”萧道成这才同意受禅。

昇明三年（479）四月甲午，萧道成在建康南郊即皇帝位，设坛柴燎告天。新朝国号齐，史称南齐。

萧道成即位后封刘準为汝阴王，在汝阴郡建国，全食一郡，位在三公之上。刘準搬离建康，在曲阿县（今丹阳市）建宫居住。南齐规定刘準是新朝的宾客，在封国内行宋朝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但就是在当年五月的一天，曲阿县汝阴王府门外马蹄声杂乱。奉命监视刘準的军队以为有人想劫持刘準复辟，自作主张将十三岁的刘準杀害。从四月逊位到五月被杀，刘準离开皇位后只活了不到一个月。萧道成听到消息后，非但没有吃惊反而十分高兴。五个月后，萧道成封刘胤继承刘準为汝阴王，奉宋祀。汝阴国传国至南陈。

萧道成登基的时候，宋朝诸王都降封为公。这些皇室成员是在宋朝残酷的骨肉相残后幸存下来的。在刘準被杀后，萧道成将残存的刘宋宗室不论年纪大小，一律幽杀。

书呆子斗不过实干家

—

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萧道成建立的南齐是最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二十四年。它乏善可陈，似乎没有什么亮点。整个南齐沿着乱世固有的轨道在滑行：篡夺别人的王朝，最后自己的王朝也被别人篡夺；皇帝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替；知道骨肉相残的危害却继续上演同室操戈的悲剧；朝野关系紧张导致地方藩镇接连造反；对北魏保持消极防御，不断挨打……

开国的齐高帝萧道成很想有所作为，可是没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措施来。萧道成所做的，完全是前朝刘裕、刘义隆等人所谓善政的翻版。比如萧道成力图改变奢侈的社会风气，下令禁止民间制造、销售奢侈品，不得用金银制作金箔、银箔，不准用金银装饰马匹车辆。为此，萧道成以身作则，从皇宫做起，将后宫器物一律改用铁装饰，帐子、宫人穿的鞋子都改用素布，华盖上的金花爪改用铁回钉。这些政策好是好，可惜没有新意，效果也不明显——世族豪门根本就不搭理朝廷的禁令，朝廷也奈何不了他们。

又比如萧道成想给百姓休养生息的宽松环境。当时有权势的人普遍占山封水、兼并土地，萧道成明令禁止，又以身作则，宣布皇室和诸侯王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可惜，萧道成的禁令没有配套的强制惩罚措施，在现实中成了一纸空文，根本不能杜绝土地兼并。

相反，萧道成为增加政府赋税而进行的“校籍”，即清理户籍政

策，还引起了轩然大波。南北朝时期户籍管理混乱，大批百姓托庇在世族权贵门下躲避赋税，又有世族豪门不断扩大荫庇的人口，为己所用。在南朝，还存在普通地主编造先辈官爵、冒充世族骗取各种特权的问题。萧道成下令以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的登记记录为准，整理户籍。校籍工作严重侵犯了世族豪门乃至普通地主的利益，加上执行过程中弊端百出，有关部门和官员将整理工作当作敲诈勒索的良机，诬陷贫苦百姓户籍造假来巧取豪夺，最终弄得天怒人怨。校籍不当，引发了浙东唐寓之起义。萧道成死后不久，其子萧贲（zé）就宣布停止整理户籍，维持校籍之前的状况，才稳定了局面。

和建立刘宋王朝的刘裕一样，萧道成在位时间也很短，只有四年，驾崩时五十六岁。长子萧贲即位。临终前，萧道成回顾一生成败，语重心长地告诫萧贲：“宋朝如果不是骨肉相残，我们家哪能取而代之。你必须引以为戒！”

萧贲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告诫，在位期间尽力维护皇室团结，没有妄杀亲属。萧道成生前最不放心四皇子长沙王萧晃。萧晃有勇无谋、好勇斗狠，萧道成怕他惹出麻烦，导致兄弟兵戎相见。几年后，萧晃卸任南徐州刺史，携带可武装数百人的军械回京。按照规定，亲王在京，身边武装侍卫以四十人为上限。有关部门发觉萧晃违制携带兵器，就报告了萧贲。萧贲大发雷霆，要惩办四弟。另一个弟弟豫章王萧嶷苦劝萧贲。萧贲最终下令将多余的兵器都扔进长江了事，并没有惩罚萧晃。如果放在刘宋时期，萧晃完全可能被抄家灭门。

萧贲时期，南齐只发生过一例宗室亲王被杀的事件。萧贲的第四个儿子巴东王萧子响也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王爷。他出任荆州刺史，身边聚集了一批和他一样头脑简单又贪图荣华富贵的家伙。萧子响在任上私自制造服装，准备和山区少数民族交换武器。这原本是一件小事，但因为处置不当，导致了一场动乱。先是荆州的官员向朝廷举报，萧贲命令查究，萧子响知道后，怪地方官监视催逼，一怒之下杀死了举报的官员，致使事态扩大。接着，萧贲派人带几百名武士

前往荆州查办。到此为止，他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只觉得萧子响不再适合担任荆州刺史这个关键职位，想把他带回建康。但是带队的使节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到荆州后态度傲慢。萧子响主动认错服软，还送上饮食犒劳建康来的武士，不想被对方全部倒入长江。萧子响暴怒，集合几千人与来使作战，并将对方打败。这一下，事件变质为动乱。萧贲派将军萧顺之带兵讨伐。萧子响主动投降，被萧顺之用绳子勒死。萧子响成了萧贲时期唯一一个被杀的宗室成员，而且人们普遍认为错在萧子响。

不过，萧贲很快就后悔逼死了儿子。有关部门奏请将萧子响剔除出皇族，萧贲没有答应，只是追贬萧子响为鱼复侯，并以礼相葬。至于杀死萧子响的将军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如今又讨伐有功，满心以为能得到封赏。不料，萧贲根本没有奖赏他，还对他杀死儿子的事情耿耿于怀。萧顺之吓得郁郁寡欢，没几年就死了。

除了维护皇室内部的亲睦外，萧贲在其他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萧贲即位时已经四十二岁，他此前在刘宋王朝历任县令、太守等职，横跨中央地方、文武各界。二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使他知道真实的国情民意，形成了自己的执政思路和风格。而南齐得以建立，充满了戏剧性，就在几年前他还以为自己会在刘宋王朝的宦海中终老一生，又怎会预料到最后竟然当了皇帝！所有这一切使得萧贲执政思路清晰、刚毅果断，同时又雷厉风行、专断独裁。

《南齐书·武帝纪》概括萧贲“刚毅有断，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可见他继承了萧道成俭朴的作风和富民强国的思路，关心百姓疾苦。同时，为了保证有一个安定发展的环境，萧贲与北魏通好，南北边界安定了十几年。萧道成篡位和在位期间，成年的萧贲都参与其事，自认为与父亲“同创大业”，登基前就颇为刚愎自用。散骑常侍荀伯玉曾把太子自负和任用亲信的行为报告萧道成，萧道成因此责罚过萧贲，还将他任

用的亲信斩首。萧贲即位后就杀了荀伯玉。五兵尚书垣崇祖和荀伯玉一向关系密切，且屡破魏兵，萧贲觉得是个威胁，也将他杀死了。车骑将军张敬儿是萧道成的老部下，一路舍命拼杀，才有了今天的身份地位。遗憾的是，张敬儿在政治上极端幼稚，像个孩子一样向别人宣扬自己经常做梦，不是梦见自己全身发光发热，就是梦见老家的树长得同天一般高。这些梦境通常预示做梦的人“贵不可言”，传到萧贲耳中后，便认为张敬儿有野心，也把他杀了。

萧贲一共在位十一年，年号永明，几乎占了南齐历史一半的时间。期间国泰民安，没有出什么乱子，被一些人称为“永明治世”。所谓的治世，要看和什么时段来比，如果和之前刘宋末年及之后的南齐末年相比，完全没问题。但若是和之前东汉的光武中兴及之后隋朝的开皇盛世相比，则完全不值一提，就连刘宋前期的元嘉之治也比不上。

二

萧贲一生最大的痛也许是品尝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苦：太子萧长懋（mào）死在了自己的前面。

萧长懋是萧贲的长子，遗传了家族肥胖的体形，一直体弱多病，又是个“宅男”，喜欢待在宫中不愿意出去，加上沾染了酗酒的恶习，饮酒可至数斗，三十六岁就死了，死后被追谥为文惠，史称文惠太子。史书对萧长懋的记载很少，却很不客气，说他“善制珍玩之物”，把孔雀毛织成裘，“器物服饰多有僭越”。萧长懋还公然违背祖父的禁令兼并东田建造“小苑”——名字是小苑，估计是别墅群。

萧长懋生前和同母的二弟竟陵王萧子良关系亲密。兄弟二人都是

佛教信徒，一起切磋佛经，还建造了“六疾馆”照顾穷人，大做慈善。他死后，儿子萧昭业就由二弟萧子良代为抚养。

萧赜痛失长子后，开始思考将皇位传给谁。主要候选人有两个：次子萧子良和太子的长子萧昭业。萧昭业眉目如画，容止优雅，写得一手好隶书，很讨萧赜的喜欢，萧赜于是决定传位给孙子，立萧昭业为皇太孙。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竟陵王萧子良。他是永明文学的主持人，同时也是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虔诚信徒和慷慨支持者。

永明时期社会安定，文学繁荣。萧子良好结儒士，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友，其中以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等最知名，这些人号称“竟陵八友”。萧子良就组织文人抄写五经和百家著述，还编成《四部要略》千卷。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文坛盛事。此外，萧子良崇尚佛学，召集僧人讲佛论法，热心操办佛事，不惜屈尊亲自在活动期间打杂。这些事发生在南方佛教大兴的背景之中，萧子良的崇佛又助推了佛教的进一步兴盛。

和后世许多权贵借信佛礼佛沽名钓誉不同，萧子良是表里如一，真心信佛。他居家修行，奉戒极严。有人提出“食蚶蛎不算食肉”的观点，遭到萧子良的怒斥。对于当时宣扬无神论的范缜，萧子良更是极为不满，组织力量围攻他。王琰攻击范缜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反击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见驳不倒范缜，派王融劝他不要再讲《神灭论》了，以免妨碍前途，还许诺只要范缜放弃无神论，就让他做中书侍郎。范缜笑道：“我如果肯卖论求官，早已做到尚书令、左右仆射了，何止中书侍郎呢！”值得肯定的是，尽管在思想上萧子良和范缜势如水火，但在现实生活中范缜依然是

竟陵王府的座上客，范缜依然有宣传、辩论的自由，他在朝廷的

官位也一直保留着。萧子良的心胸可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南朝社会相当宽容，思想还算活跃。

萧子良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将佛教的慈悲和善念体现在了为官行政上。他体恤百姓，遇到灾荒带头上奏朝廷宽减役税、开仓赈济，深受百姓爱戴。朝野存在一股拥护萧子良即位的力量。

以上是萧子良作为文坛领袖和佛教信徒的一面，他还有图谋皇位、争权夺利的一面。

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萧赜病重，命萧子良进殿服侍医药。萧子良不分日夜，留在殿内服侍父皇，还将王融、萧衍、范云等党羽带进了宫中。一时间，萧子良一派的人围绕在萧赜的身边，占据了最高权力交接之时的便利条件。外界也在揣测，齐武帝有没有要废皇太孙萧昭业改立萧子良的意思。

萧赜喜欢萧子良，但最终没想把皇位传给他。萧赜草拟的遗诏是将皇位传给皇太孙萧昭业，让竟陵王萧子良和西昌侯萧鸾一同辅政。萧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萧赜的堂弟。他少年丧父，由叔叔萧道成一手抚养，萧道成对他视同己出。萧鸾在二十岁时就去外地担任县令，之后摸爬滚打几十年，阅历丰富，以严格果敢闻名，和萧赜颇为相似。萧道成当皇帝后，任命萧鸾为侍中，封西昌侯。萧赜即位后，萧鸾先后任尚书仆射、尚书令，是个拥有实权的人物。

遗诏写得明明白白，萧子良呆若木鸡，一旁的王融却不甘心，假造了一份传位萧子良的遗诏。他用竟陵王府的卫士换下了病房内外的侍卫，亲自戎装上阵，守着弥留之际的萧赜，不让他人靠近，就等萧赜驾崩后拿出篡改的遗诏。

皇太孙萧昭业听说祖父萧赜病危，匆匆赶来。王融率卫士凶神恶煞地宣布：皇上有旨，无论何人，不得擅入宫门一步。萧昭业辩解说自己是皇太孙，身份特殊，要求入宫服侍祖父。王融任凭他百般辩

解，就是不放行。无奈，萧昭业只好快快而归。

朝堂上，百官都预备好了丧服，就等王融宣布遗诏。萧子良即位的事情似乎板上钉钉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留之际的萧贇回光返照，突然苏醒过来，开始神志清醒地发号施令起来。他见皇太孙不在身边，知道情况有变，急忙叫来亲信的近侍太监，让他去召萧昭业率甲士入宫。传完这个命令，萧贇就死了。王融还想挣扎，命令竟陵王府的卫士把守宫门，和萧子良商议对策。事到如今，萧子良一派还有成功的机会。他们可以一不做，二不休，提前发布假遗诏，推出萧子良，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可是萧子良、王融等人谈文写字是好手，搞阴谋诡计却不在行，商量来商量去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捂着萧贇的死讯秘不发丧。

外头的大臣们都知道皇上突然召皇太孙进宫，而且是带甲士进宫，一时议论纷纷。高度的政治敏锐感让萧鸾意识到宫中情况有变。他匆忙就向堂兄的寝宫赶去。门口卫士不让他进宫，萧鸾假传圣旨：“皇上召我入宫，我看谁敢拦我？”卫士顿时被蒙住了，萧鸾于是硬闯了进去，发现堂兄萧贇已经死了。他马上跑出寝宫，公开宣布皇上驾崩，然后率人拥戴萧昭业登殿接受群臣跪拜，同时派人将萧子良搀扶出宫。至此，大局已定。

在整个过程中，萧子良消极犹豫，没有和王融配合，最终被排挤出局。王融则被逮捕。几天后，萧昭业以“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的罪名将他诛杀，丝毫不提伪造遗诏、谋立他人的问题。王融出身著名的琅琊王氏，死时二十七岁。

竟陵王萧子良表面上仍受尊重，是两位辅政大臣之一。但萧昭业也好，萧鸾也好，都对他不放心，联合起来排挤他，将他进位太傅，剥夺了实权。萧子良也怕被追究，积郁在胸，第二年（494）四月便郁郁而死，时年三十五岁。

爷爷夺了孙子的皇位

—

萧贲经过艰苦权衡，之所以舍弃萧子良，传位萧昭业，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孙子聪慧勤勉、品行优良，对他寄予厚望。事实证明，萧贲完全看走了眼。

这也不能怪萧贲。权力社会盛产两面派、伪君子，而萧昭业就是其中的高手。齐武帝发丧当天，萧昭业把葬车送出皇宫的大门后就推说自己有病不去墓地了。一回宫，他就迫不及待地召集乐工大奏胡曲、大演歌舞，乐声响彻宫廷内外。宫外的送葬队伍听得一清二楚，躺在灵柩中的齐武帝萧贲想必也听到了。

送葬的三朝老臣王敬则问身边的将军萧坦之：“现在就高歌快舞，是不是太早了点儿？”

萧坦之幽默地回答：“这声音正是宫中的哭声啊！”

没有即位之前，萧昭业接待宾客诚恳周到，行止谈吐为时人称赞。父亲文惠太子逝世的时候，萧昭业号啕大哭，不能自己，等回到房中就欢笑如常，寻欢作乐。做了皇太孙后，萧昭业表面上对祖父恭敬孝顺，暗地里安排女巫诅咒祖父快死。祖父病重，萧昭业给妃子何氏传了张纸条，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喜”字，周围还绕上三十六个小“喜”字。可见，他所有的诚恳、谦恭和孝顺都是矫饰，即位之后便本性毕露。

父亲文惠太子在世的时候，对萧昭业的起居用度都有严格规定，萧昭业的日子过得俭朴有序。即位后，萧昭业任意挥霍国库积蓄，肆意赏赐，动不动就是数十上百万钱。他每次见到钱都说：“我往日要用你的时候，连一文钱都得不到，今日还不能好好用用你吗？”一年之后，南齐国库积蓄的数亿钱币就被他挥霍一空。萧昭业又打开皇宫的仓库，和皇后宠姬等人参观，任由宦官和亲信随心所欲地领取物品，还将珍藏的宝器击破打碎，以此取乐。萧昭业还喜欢斗鸡，不惜用数千钱买一只鸡。他还和祖父、父亲的宠姬私通，她们名义上都是萧昭业的祖母和母亲，刘宋末期皇帝乱伦的遗风再次兴起。总之，萧昭业毫无一国之君的姿态。

朝政都交给叔祖萧鸾打理。萧昭业疑心萧鸾有异志，找中书令何胤密谋杀萧鸾。何胤一介文臣，不敢参与。萧昭业见没有人支持自己，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萧昭业放下了屠刀，萧鸾的一颗心却提到嗓子眼。伴君如伴虎，何况是陪伴一只疯疯癫癫的老虎。萧鸾决定先下手为强，干掉萧昭业，取而代之。

萧鸾先是环顾四方，看还有没有拥护萧昭业的力量。他觉得荆州刺史萧子隆和豫州刺史崔慧景二人既效忠皇室，又有能力起兵与自己对抗，所以要先除掉这两个人。镇西咨议参军萧衍就给萧鸾出主意，将随王萧子隆免职召还京师，明升暗降为侍中、抚军将军，剥夺他的实权。接着，萧衍又自告奋勇，要求率兵戍守寿阳，夺取了崔慧景的兵权。萧鸾一一照搬，任命萧衍为宁朔将军，领兵北上。如此一来，萧鸾就去除了地方上可能反对自己的势力，而萧衍也获得了实权。

在中央，有能力阻挡萧鸾的关键人物是卫尉萧谌和征南咨议参军萧坦之。萧谌、萧坦之都和皇室有亲缘关系，被齐武帝萧赜所信任。萧谌长期负责皇宫的宿卫，朝廷机密也都会告知他。萧坦之曾任东宫的直阁将军，是萧昭业的亲信。要想推翻萧昭业，必须要对付这两个

人。萧鸾还在谋划对付他们的方法，没想到他二人见萧昭业狂纵猜忌，无药可救，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主动来投靠掌权的萧鸾。萧鸾将推翻萧昭业的计划一说，二人马上应允参与。

于是，在萧昭业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朝野已秘密地结成了推翻他的阴谋集团。

萧鸾开始剪除萧昭业亲近的小人。他先后列举了萧昭业多名亲信的罪状，奏请将他们处死。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只有在清除直阁将军周奉叔的时候遇到一点儿困难。周奉叔领兵护卫萧昭业，很有勇力，常常带领二十人，身佩单刀，出入宫禁。他刀不离身，常常威胁他人：“周郎刀不识君。”不过周奉叔有勇无谋，既然难以直接铲除，萧鸾就绕了道弯子。他指使萧谡、萧坦之奏请萧昭业，提升周奉叔为青州刺史。周奉叔高高兴兴带着队伍赴任去了。萧鸾马上用假圣旨召他回尚书省。周奉叔刚一迈进尚书省，就被埋伏的武士殴杀。然后，萧鸾启奏萧昭业，说周奉叔侮慢朝廷，罪该当死。萧昭业不知就里，也就批准了。如此这般，萧昭业身边的亲信越来越少。

一看时机成熟，萧鸾开始行动了，他派萧谡、萧坦之等人诛杀了萧昭业最后的几个亲信，亲自披挂戎装，率兵从尚书省攻入皇宫。萧鸾毕竟第一次搞政变，难免紧张，途中鞋掉了三次。萧谡带一支队伍直奔萧昭业所在的宫殿，宫殿门口的宿卫将士张弓持盾，要上前厮杀。萧谡高喊：“我所取自有人，你们不须动！”卫士们见负责宫廷宿卫的最高长官这么说，有的被震慑住了，有的以为他是奉命入宫抓人，都闪到一旁，看着队伍冲入了宫殿。殿中的萧昭业远远看见萧谡领兵持剑奔来，知道是大臣反叛。他自觉逃跑无望，又不愿受辱，爆发出一股血性来，拔出佩刀就向脖子抹去。求生的本能加上紧张让萧昭业的手哆嗦得厉害，他自刎未成，鲜血流了一身，倒地哀号。萧谡派人用帛给萧昭业粗粗包扎了一下，把他抬出殿外。萧鸾知道后，觉得留着萧昭业无用，杀了反而干净。于是，武士们在宫中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将萧昭业乱刀砍死了。

萧昭业死时二十一岁，在位仅一年。事后，萧鸾以皇太后令来追认政变的合法性，加之萧昭业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所以萧鸾等人的弑君行为被完美掩盖。这是隆昌元年（494）的事情。

二

萧鸾推翻萧昭业后，完全可以自己当皇帝，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立文惠太子萧长懋的次子，也就是萧昭业的弟弟新安王萧昭文为帝。萧昭文被萧鸾扶上皇位时只有十四岁，无论大事小事都不能做主，完全仰仗萧鸾。他封萧鸾为宣城王，起居饮食都要征求萧鸾的同意。萧鸾对萧昭文控制得也很严。一次，萧昭文想吃蒸鱼，掌管宫廷膳食的太官令竟然回答没有萧鸾的命令不能给。

萧鸾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呢？他做什么事情都求稳，没有绝对的胜算不出手。尽管把皇帝紧紧地捏在手里，萧鸾依然对自身实力不自信。齐高帝、齐武帝子孙众多，而萧鸾近亲稀疏，且在位为官的很少。所以，萧鸾一方面大力扶持近亲，一方面开始迫害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萧道成临终前最担心的骨肉相残的悲剧再次上演。

被萧鸾以萧昭文的名义诛杀的宗室亲王有：南兖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南平王萧锐、晋熙王萧、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桂阳王萧铄、衡阳王萧钧、江夏王萧锋、建安王萧子真、巴陵王萧子伦等。南齐曾在宗室诸王身边设置典签的官职，本意是监督诸王，防止他们谋反或者祸害百姓。如今，典签官被赋予实权，可以禁锢诸王，充当了萧鸾诛杀宗室的工具。

杀了一圈之后，萧鸾觉得天底下应该没人有能力阻挡自己称帝了。

于是在当年（494）十一月，即位才四个月的萧昭文被萧鸾废黜为海陵王。之后，萧鸾又宣称萧昭文身体有病，多次派御医给他“看病”，看了几次后萧昭文就一命呜呼了。这一次，萧鸾依然用皇太后的诏书来追认自己行动的合法性。不过因为实在是找不出萧昭文的过错来，诏书只能笼统地批评他“嗣主幼冲，庶政多昧”。接着诏书宣布皇太后主动让步，请萧鸾即位。萧鸾登基，史称齐明帝。从辈分上说，萧鸾是萧昭文的爷爷，萧鸾此举等于夺了孙子的天下。

萧鸾也是个伪情矫饰的两面派。他即位后，大张旗鼓地崇尚节俭，停止边地向中央的进献，将皇家园林新林苑及文惠太子的东田都归还百姓，又将齐武帝的舆辇舟乘上的金银都剔取下来充实库房，就连生日时大臣敬献的金银礼物都被他命人打碎，但内宫私宴却金玉满堂，华丽非常。远房宗亲萧颖胄就批评他说：“陛下要是还想砸东西，就砸你宫里的宝贝吧。”

除了做表面功夫，萧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巩固政权上。他得位不正，总觉得有人要推翻自己——这似乎是一切篡位者的通病。而最有嫌疑的就是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了。于是，萧鸾任用典签官，以监视诸王。当时，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还有十人封王。每次诸王入朝参拜完毕，萧鸾回到后宫都叹息道：“我儿子、侄子们的年纪都不大，萧道成他们家的子孙却日益长大！”于是，他有了杀光齐高帝、齐武帝子孙的想法。萧鸾找侄子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商议如何行事。萧遥光认为这事不能急，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

萧遥光有足疾，萧鸾恩准他可以坐车进出皇宫。每次萧遥光入宫，萧鸾都屏退旁人，和他密谋许久。等萧遥光走后，再让人摆上香火，呜咽流涕。第二天，必定有一位宗室亲王被诛杀。骨肉相残的名单越来越长，增加了河东王萧铉、临贺王萧子岳、西阳王萧子文、永阳王萧子峻、南康王萧子琳、衡阳王萧子珉、湘东王萧子建、南郡王萧子夏、桂阳王萧昭粲、巴陵王萧昭秀等。未封王的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也遭到迫害，他们这一支血脉几乎被屠杀殆尽。萧铉等人死

后，萧鸾再指使公卿弹劾他们的罪状，奏请诛杀，萧鸾下诏不许，公卿们再奏，萧鸾这才答应，摆出一副迫不得已大义灭亲的姿态来。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相如何，就像举朝在做游戏。萧鸾日益倚重萧遥光，诛赏诸事都和他商议。萧遥光的行政能力很强，将屠杀行动安排得井井有条。萧鸾的身体很不好，常常突然病倒。在萧鸾不能主事的时候，萧遥光就替他发布杀人命令。整个南朝时期，萧鸾在短短几年中创造了杀戮宗室亲王最多的记录，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动荡，连小规模兵变都没有发生。这和萧鸾、萧遥光的“措施得当”不无关系。

之前，萧鸾派茹法亮持毒酒去赐死齐武帝第十三子巴陵王萧子伦的时候，萧子伦端正衣冠接受诏书，对茹法亮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从前高皇帝（萧道成）残灭刘氏（刘宋宗室子弟），今日之事，理固宜然。”他坦然饮下毒酒而死。当年，萧道成将刘宋宗室不论长幼一律幽杀，肯定想不到十几年后自己的子孙也会面临同样的噩运。萧子伦将此解释为因果报应。

萧鸾也怕因果报应，加上身体不好，登基后就躲入深宫，长期深居简出。越是这样，他的身体就越不好。萧鸾还不愿让他人知道病情，封锁消息，坚持正常处理政务。他相当崇信道教与神仙方术，先是希望能借助法术治愈病情，失败后不得不求助于医术。一次，萧鸾特地下诏向各地官府征求银鱼以为药剂，外界这才知道萧鸾患病。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萧鸾猜忌多疑到了极点，对大臣们多有诛戮。比如他往南走就派人说皇帝要西行，往东走就对外宣布要去北边。谁惹他猜忌，就有性命之忧。又比如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是萧道成的老部下，五朝老臣，盛名在外。萧鸾怀疑他要趁自己病重造反，派人去东方镇压反叛之人。王敬则大怒，说：“东方各郡县有谁在反叛，这明显是冲着我来！”他被逼起兵造反。东方百姓纷纷响应，拿起农具就加入了他的队伍，很快王敬则就拥有了一支十余万人的大军，向建康杀去。

萧鸾杀死王敬则在建康和外地的所有儿子，派兵平叛。王敬则悲痛不已，坐在轿子上边恸哭一边指挥军队前进。大军进展顺利，都能遥望到建康城了。在和官兵的决战中，王敬则大军起初大胜，不想萧鸾官兵在败退回营的时候，因为营门未开，前无退路，只好返身死战。恰好王敬则大军后方又遭到骑兵的突袭，占部队大部分比例的百姓都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正常的兵器，打不了硬仗，纷纷逃散。王敬则大败，逃跑不及，被官兵所杀，时年七十多岁。这是永泰元年（498）的事情。

王敬则败亡之时，萧鸾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不久便死了，时年四十七岁，在位五年。

萧鸾的长子萧宝义有残疾，难当大任，所以萧鸾册立次子萧宝卷为太子。萧鸾死后，萧宝卷即位，时年十六岁。

萧鸾遗命由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尚书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太尉陈显达等人辅佐萧宝卷。八个辅政大臣中，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不久退休，淡出政坛，太尉陈显达外任江州刺史。剩下的六人轮流入朝值班，掌握实权，被称为“六贵”。时任雍州刺史萧衍不无忧虑地说：“一国三公尚且国家不稳，如今朝廷有六贵同时当权，如何才能避免动乱呢？”

终极怪胎到底是谁之过

—

齐明帝萧鸾将杀戮宗室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即位的儿子萧宝卷则将荒淫变态推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萧宝卷生母早亡，由其他嫔妃抚养长大。他从小孤僻任性，且有口吃的毛病，与他人交流沟通存在障碍。这样的孩子如果埋头读书，没准儿还能在学问上有所专长。但是萧宝卷极不爱读书，加上无人管教，整天就是玩闹。即位前，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东宫和侍卫们一起挖洞捉老鼠，为此通宵达旦、乐在其中。

当了皇帝后，萧宝卷被带去主持父皇的葬礼。他一看到大殿上摆放的乌黑锃亮的大棺材，很不高兴，大喊：“这东西太讨厌了，快快把它埋掉！”那可是他父亲的灵柩，而且天子葬礼十分严肃，有一整套烦琐的规程。见小皇帝要破坏礼制，以辅政大臣尚书令徐孝嗣为首的大臣们据理力争，萧宝卷这才快快不乐地收回成命，无奈地继续葬礼的流程。紧接着问题又产生了，萧宝卷在葬礼上东张西望，就是不哭。他还觉得满堂哭得死去活来的大臣们非常好笑。其中太中大夫羊阐号恸大哭，不断叩首，不小心把帽子碰掉了。羊阐秃头，帽子一掉，露出了光头。萧宝卷见状捧腹大笑，一边笑一边说：“这个大秃鹩也来这里乱叫。”

正式上任后，萧宝卷保持着特有的作息习惯：抓老鼠抓到清晨才就寝，午后三时起床。可皇帝是要上朝的，是要处理政务的，萧宝卷

根本没放在心上。这可苦了那些大臣们。因为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会出来接见和处理公务，他们只能等在大殿上不敢走，一个个饿得眼冒金星。后来，大臣们直接上奏。一批批奏章送入宫中，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

除了昼夜颠倒抓老鼠，萧宝卷又发展出了新爱好：出宫游玩。他不分昼夜，想什么时候出宫就什么时候出去，一个月有二十多天不在宫中。萧宝卷的游玩不是走马观花似地游山玩水，而是看到什么好东西就拿，大到参天大树、妙龄女郎，小到钱币、玉佩，一律纳入囊中。他常常带人闯入富裕人家，将家产抢尽。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也可能是小时候的交流障碍让他不愿与人接触，萧宝卷出宫时不愿意被人看见，也不愿意看到别人。于是，他看到谁就要上去杀人灭口。为此，朝中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当萧宝卷要出门的时候，就有人在他要去的方向事先击鼓，警告人们：“皇帝要来了，大家快跑啊！”人们听到鼓声，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根本顾不上家产。萧宝卷出宫的时间不定、游踪不明，百姓可就遭殃了。他们轻易不敢回家，常常露宿野外，或者穿着单衣在寒冬中流落江边，甚至有人几天几夜不敢回家，最后冻死或饿死在外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是常事。

有一次，一个妇女临产，无法走开。萧宝卷很好奇腹中胎儿的性别，等不及孕妇生产，就命人剖腹查看是男胎还是女胎。又有一次，有个和尚生了病，跑不动了，就躲在草丛之中希望能逃过萧宝卷的眼睛。萧宝卷发现他后，命令随行的所有人向和尚射箭，将他乱箭射死。还有一次，几个人抬着一个病人去求医，突然听到警示的鼓声，吓得魂飞魄散，扔下病人一哄而散。负责清道的官吏看到那个病人匍匐在地上走不了路，竟把他推入水中活活淹死。

这些还算是个别现象。更坏的情况是，萧宝卷喜怒无常、行踪不定，常常毫无预兆地突然出宫游玩，或者先出东门突然又转向了南门，惊得大半个城的百姓逃得一千二净。萧宝卷身边的侍卫、太监们

往往借陪伴萧宝卷出游为名，入室搜索财物。好不容易等萧宝卷回宫了，百姓回来看到的却是被抢劫一空的房产。没折腾多久，繁华一时的建康城工商歇业，铺存屋空，道无行人，内外数十里杳无人迹。建康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死城。

建康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以后，萧宝卷游玩的兴致大减。不过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乐衷玩耍和追求享乐的步伐，萧宝卷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兴趣：投身火热的建筑行业！巧合的是，建康后宫失火被焚，重建工作为萧宝卷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一口气建造了仙华、神仙、玉寿三座豪华宫殿，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多么的奢靡。萧宝卷造宫殿，贯彻两个指导思想：第一是追求速度，什么都要求快；第二是追求漂亮，装饰要漂亮，庭院要漂亮，一切看起来都要赏心悦目。为了赶工期，官吏们不惜破门入户，强行将百姓家的假山、树木、花草移植到宫殿中。不惜直接拆卸豪门、寺庙上的装饰物件移到宫廷中，甚至不惜刮下文物古玩上的金箔饰品来装饰新宫殿的器皿。为了营造宫廷花草茂盛的景象，官吏们往往割下草皮和花卉的茎叶，直接铺满庭院。花草搁置一天就枯萎了，官吏们不得不天天去割花草，夜夜重新铺设。萧宝卷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非但不生气，而且还指点下面的人干脆用颜料将庭院泼洒上颜色，再点缀上花草。

庭院造好后，萧宝卷将它们献给了一个女人：潘妃。

潘妃名叫潘玉儿，出身市井，被萧宝卷选入宫廷做了妃子。萧宝卷专宠潘妃，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臣民们时常看到潘妃坐在豪华的车驾上，在皇家仪仗的引导下，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建康城中。而萧宝卷骑着马，像个随从似的跟在后头，随时听从潘妃的吩咐。萧宝卷还有受虐倾向。潘妃一生气就用木棍劈头盖脸地打他，萧宝卷身为皇帝，既不龙颜大怒，也不辩解，更不还手，乖乖地让潘妃打。后来，萧宝卷被潘妃打得次数多了，也有点儿吃不消了，就偷偷示意手下将潘妃身边的粗木棍都换成光滑的细木棍。

萧宝卷为了让潘妃重温市井旧梦，又在宫苑之中仿造了市场一条街，让太监们杀猪宰羊、宫女们沽酒卖肉，潘妃就当市场管理员。萧宝卷担任潘妃的副手，做她的小跟班。“市场”里出现什么争执吵闹，都由潘妃来裁决。萧宝卷特别喜欢潘妃的一双小脚，总爱拿在手里抚摸，还凿金为莲花，贴在地上，让潘妃在上面行走，美其名曰“步步生莲花”。

种种荒诞举动，很快让朝野失望，有些人还想劝谏一下萧宝卷。一次萧宝卷的坐骑受惊狂嘶，有人趁机进谏：“臣曾经梦到先皇，先皇对皇帝终日出宫游荡不施战备很不高兴。”萧宝卷听后，愤怒地拔出佩刀要寻找父亲的鬼魂算账。先皇的灵魂自然不会与他纠缠，找不到撒气对象的萧宝卷就用草缚了一个父亲的形象，将其斩首，把头悬挂在宫门口，昭示全城。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进谏了，大家对萧宝卷唯有摇头叹息。

二

萧宝卷的老爸萧鸾留给宝贝儿子的临终遗言是：“做事不可在人后。”意思是做皇帝要果断刚强，该出手时就出手。不爱学习的萧宝卷偏偏把这句话学到了心里，而且学以致用，看哪个大臣不顺眼，或者捕风捉影觉得哪个大臣有问题，就大刑伺候、大开杀戒。

辅政大臣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六贵，在齐明帝死后还把持着朝廷实权。他们六个人内部相安无事，只是看着萧宝卷的行为不成体统，越来越出格，不禁恐惧起来。六贵中的江祐、江祀两兄弟是萧宝卷的表叔，深知萧宝卷荒唐的本性，很担心成为他的刀下冤魂，所以动了推翻萧宝卷、另立他人的念头。

江氏兄弟找到其他四贵，把企图废立的意思一说，惊喜地发现大家都有此意。但是就打倒萧宝卷之后由谁来继任皇帝的问题，六贵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江祐中意江夏王萧宝玄，他是齐明帝的第三子，也是萧宝卷的弟弟，尚书令徐孝嗣表示赞同，原因很简单：萧宝玄是自己的女婿。但是，六贵为首的始安王萧遥光是萧宝卷的堂兄，自恃血脉高贵，年纪又大，想自己当皇帝。他就暗示江氏兄弟和刘暄推举自己。于是，到底是推举萧宝玄还是萧遥光，政变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

萧宝玄年轻不懂事，萧遥光年长有经验，江祀倾向推举后者，也劝哥哥江祐拥立萧遥光。六贵排名末尾的刘暄是齐明帝皇后的弟弟、萧宝卷的舅舅，对废黜政变这件事情不太热心。他担心如果拥立萧遥光，自己的国舅身份不保，倾向推举萧宝玄，明确反对萧遥光。萧遥光对刘暄的态度很恼火。为了压制内部反对自己的声音，也为了消灭最坚定的反对者，萧遥光暗中收买杀手去刺杀刘暄。刘暄府邸周围开始出现一些可疑人物，他们身怀利刃、目光阴冷，吓得刘暄心里直发毛。怎么办？为了保命，刘暄索性跑入宫中，把六贵的政变阴谋向萧宝卷和盘托出。

这就为萧宝卷向六贵开刀提供了借口。

萧宝卷早就对六贵之中的江氏兄弟不满。江氏兄弟自恃是萧宝卷的表叔，对萧宝卷的不少荒唐行为多有劝谏，同时抑制萧宝卷身边的佞臣违法乱纪，招致萧宝卷和亲信们的嫉恨。刘暄告密后，萧宝卷得知江氏兄弟是废立阴谋的主谋，马上派人收捕了江氏兄弟。江氏兄弟被带到中书省斩首。杀了两位表叔后，萧宝卷没有立刻追究其他人，而是大肆庆祝消灭了两个碍眼的老东西。他和亲信近侍们在殿堂内鼓叫欢呼，跑马为戏，足足高兴了几天几夜。突然有一天，萧宝卷想起了什么，问近侍：“江祐常不让我在宫内跑马，如果他今天还活着，我怎能这样快活？江祐的亲戚中还有谁活着？”嫉恨江氏兄弟的亲信马上回答：“江祐的弟弟江祥还关在牢里。”萧宝卷立即下圣旨，

赐死江祥。

闻知江氏兄弟被杀，大臣们大惊失色。六贵中的其他人更是惶恐不安。刘暄虽然是告密者，得知后也扑倒在地，爬起来以后连问仆人：“逮捕我的人到了吗？”他徘徊良久，回到屋内坐定，悲叹道：“倒不是我为江氏兄弟悲伤，我是在替自己悲伤啊！”和刘暄一样，大臣们似乎都预感自己死期不远了。

这么多人中，有意取代萧宝卷自立的萧遥光最是害怕。江氏兄弟被杀了，萧遥光就开始“生病”，请了长期病假在府邸深居简出，不上朝，也不工作。他还进一步装疯卖傻，整日痛哭，给人一种痛不欲生或者方寸大乱的感觉。暗地里，萧遥光深知自己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只能和萧宝卷拼个鱼死网破。他抓紧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政变。

萧遥光的弟弟萧遥欣担任荆州刺史，是他最大的后援。萧遥光秘密派人去联络弟弟，让萧遥欣火速率军顺江而下，兄弟俩一起造反。萧遥欣很赞同哥哥的主张，立即着手动员军队。谁知就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的时候，萧遥欣突然暴病身亡了！运气更差的是：萧遥光另一个担任豫州刺史的弟弟萧遥昌也在政变前死了！豫州刺史的重要性虽然远逊于荆州刺史，但毕竟可以引为外援。接连失去两个弟弟后，萧遥光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造反了。好在萧遥欣死后，荆州的亲信部下不辞劳苦，组织了送葬队伍将灵柩运到了建康城，就停留在始安王府；萧遥昌死后，豫州的部下也都听命于萧遥光。这两批人，数目都不小。萧遥光于是开始组织这些人参与政变。

计划赶不上变化。萧遥光之前为了避祸，想调任司徒的闲职。申请递上去后，萧宝卷突然同意了，召萧遥光入宫进行“任前谈话”。萧遥光哪里敢去，怕走着进去被人抬着出来，决定提前起事。永元元年（499）八月十二日下午，萧遥光召集两个弟弟的部下来东府集合。萧遥光的起事非常仓促。一方面府邸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党羽，拿着刀枪，乱成一团，吓得建康城里的老百姓纷纷躲避。个别胆子大的

人好奇地探听消息，不知道始安王要干什么？另一方面，萧遥光连造反的口号都没想好，整个行动师出无名。本来“讨伐暴君”是个不错的口号，应该可以激起官民的响应。可惜，萧遥光没有采纳，而是以“讨伐刘暄”为名——他恨死了刘暄，宣布起事，并向朝臣、将领们发出号召。

天很快就暗了。除了派出数百人攻破监狱释放囚犯外，萧遥光没有其他行动。骁骑将军垣历生接到他的起事号召，赶过来响应。他见状劝萧遥光抓紧时间，连夜进攻皇宫擒拿萧宝卷。垣历生主动请缨指挥作战，对萧遥光说：“您只要坐着车随后跟进即可，攻破皇宫易如反掌。”现实情况的确如垣历生所言，萧遥光宣布起事后，萧宝卷还在皇宫中醉生梦死，没有任何平叛的举措，建康城中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忠于萧宝卷，更没有官兵来镇压萧遥光。如果萧遥光能抓住时机，擒贼先擒王，政变胜算还是很大的。然而，萧遥光犹豫了半天，始终下不了出击的决心。一直犹豫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早已全副戎装的萧遥光依旧是东看看西看看，准备车仗、登上城垣、赏赐亲信而已。尽管垣历生反复劝他出兵，萧遥光就是不肯。他寄希望于皇宫内发生内讧，幻想萧宝卷会被他人杀掉。

萧遥光起事后，派人去刺杀平常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右将军萧坦之。萧坦之听说萧遥光造反后，警惕性很高，来不及穿衣光着身子就跳墙逃走，奔赴皇宫向萧宝卷报告去了。萧遥光心胸实在狭窄，又不懂轻重，总是在关键时刻将可以团结的对象推向敌人的阵营，刘暄如此，萧坦之也是如此。次日黎明，萧宝卷宣布建康戒严，命尚书令徐孝嗣防卫宫城，萧坦之率军讨伐萧遥光。萧坦之成功组织起建康城没有响应萧遥光的官兵，很快将叛军团团围住，日夜攻打。

萧遥光顿时陷入了困境。他平日不积德行善，人缘很差。人品的好坏在关键时刻能有巨大的作用。萧遥光在齐明帝时期助纣为虐，主持屠戮齐高帝、齐武帝子孙，在亲贵当中很不得人心。加上他对待部下严苛暴虐，党羽的内部凝聚力也不强。在官兵的猛攻面前，叛军渐

渐溃散。垣历生看萧遥光大势已去，也投降了官兵。四天后，造反被镇压。萧遥光狼狈地在王府中找了间房子，关紧门窗，躲到床底下，希望能逃过官兵的搜查。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自然行不通，萧遥光很快就被从床下拖出来砍掉了脑袋。

萧遥光和萧宝卷有过一段美好的共同记忆。萧宝卷童年时期，经常和堂兄少年萧遥光厮混，两个人吃住在一起，手拉手一起蹦蹦跳跳——说不定还一起通宵达旦抓过老鼠。兄弟俩感情很深，萧宝卷昵称萧遥光为安兄。萧遥光被满门抄斩后，萧宝卷再一次登上童年时和萧遥光一起玩耍的土山，美好记忆像洪水一般冲开了他情感的闸门。萧宝卷遥望萧遥光被杀之处，悲伤地连声呼唤“安兄，安兄”，黯然泪下。

这偶然一次的真情流露并不能阻碍萧宝卷继续荒淫残暴下去。在平定萧遥光叛乱二十多天后，萧宝卷就派人杀掉了平叛有功的萧坦之。不久，萧宝卷开始犹豫要不要杀掉刘暄。他问左右亲信：“刘暄是我的亲舅舅，总不至于谋反吧？”一个侍卫说：“先帝和武帝还是堂兄弟呢。先帝受武帝厚恩，最后还不是夺了武帝的天下，灭了武帝的子孙？兄弟如此，舅舅又怎么可以相信呢？”这个侍卫的回答袒露着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让萧宝卷最终下令诛灭了刘暄全族。之后，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也先后被杀。沈文季之前借口年迈多病长期请假在家，已经不理朝政。老先生本想借此落个善终，到头来不但自己身首异地，还连累家人血流成河。

至此，六贵全部被萧宝卷清洗了。

这是南北朝历史上，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一个时期。后人读这一时期的史书，往往有血迹斑斑之感。我们将此归咎为萧宝卷的昏庸残暴也好，指责六贵内部的争权夺利也好，都逃不开一个幕后因素：权力斗争。正如沈文季在家养病避祸的时候，子侄们劝他说：“您既然做了尚书左仆射，就不可能全身而退！”

一旦进入了权力场，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它把人都异化成了冷酷嗜血的恶魔。皇宫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权力斗争的起始点和矛盾汇聚地，自然成为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地方。越靠近它的人，受到的侵蚀和异化越严重。皇帝在权力旋涡的中心长大，受到的伤害也是最大最重的。而南朝又是政局不稳、矛盾激烈的乱世，综合起来考虑，似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南朝时期荒唐皇帝迭出了。

防卫过当的萧衍

—

皇帝和大臣的理想关系是和睦相处，一起治理好国家。但是在皇权不稳的乱世，再遇到暴君或者昏君，君臣关系就恶化为了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无论孰强孰弱，最终结果总是以腥风血雨、两败俱伤收场。

萧宝卷屠戮六贵后，又杀害了早早退休想求得善终的辅政大臣沈文秀，在君臣斗争中取得了明显优势，显示出强大的实力。南齐的大臣们纷纷寻找自卫的方法，想要逃脱他的魔爪。

既是太尉又担任江州刺史的陈显达觉得自己是最迫切需要自卫的人，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顾命大臣。看着昔日同僚一个个被推上断头台，陈显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将会是下一个冤魂。

陈显达出身贫寒，从军将近五十年，一路从士兵拼杀到将军。在一次战争中还被飞矢射穿了左眼。和六贵比起来，陈显达为人谦恭、厚道，注意和方方面面的人搞好关系。和同是辅政大臣的“老好人”沈文秀比起来，陈显达深知仕途是一条不归路，没有办法回头，也不可能全身而退，所以他始终把持着部分实权，以防不测。齐明帝临终将他列名辅政大臣，陈显达非但不高兴，反而忧虑万分——之前南朝的辅政大臣几乎没有善终的。和六贵的揽权与沈文秀的撒手不同，陈显达主动要求离开建康外任，以退为进。不久，萧宝卷让陈显达以太尉之尊兼任江州刺史，陈显达高高兴兴地去上任了。

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陈显达跟随过张永、沈攸之、萧道成、萧鸾等多位“老板”，幸运地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站对了队”，踏着他人的肩膀甚至是鲜血不断前进。每次升迁，陈显达都有惭愧和畏惧之心。

他常常叮嘱子孙：“我出身寒门，能有今天的荣华地位完全超乎意料，你们切勿以富贵凌人！”当时南朝人热衷以牛拉车的比赛，贵族们以拥有快牛而骄傲。陈显达的儿子就拥有天下四大快牛中的一头，而且还在家里召开快牛聚会。陈显达见儿子这么露富，大发雷霆。

按照陈显达的级别，可以有盛大的车仗、众多的随扈，但他平时乘坐的车驾腐朽了也不修理，选用的随从都是瘦小单薄的人。一次宫廷侍宴，陈显达酒后向齐明帝萧鸾乞借枕头一用。萧鸾马上命人给陈显达拿来一个枕头。陈显达抚枕说道：“臣已经年老，富贵已足，就少个枕头去死了，所以求陛下将枕头赐予我。”这句话说得杀人无数的萧鸾都心有不忍，忙说：“公醉矣。”

就这么一个稳重精明的老将军，面对萧宝卷的荒唐也觉得无所适从。很快江州就出现谣言，说朝廷要派兵袭击江州。这个谣言可能是江州官员因为恐惧而产生的幻觉，也可能是陈显达制造的，因为他要为起兵造反预热舆论。永元元年（499）十一月，陈显达在寻阳举兵造反。

陈显达有着远比其他造反者丰富的军事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战略：趁萧宝卷准备不足，突袭建康！陈显达顺江而下，在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打败官兵，于十二月兵临建康城下，都城震恐。胜利在望，陈显达不免急躁，企图率领精锐猛攻宫城，一战定乾坤。他顺利攻入外城，但在禁宫门口遭到了禁军的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陈显达身边只带了数百步兵，而禁军越聚越多。陈显达英姿不减当年，挥矛如飞，无奈最终寡不敌众，突袭计划失败。陈显达在撤退城外时被杀，时年七十三岁。萧宝卷下令将陈显达满门抄斩。

陈显达死了，但恐惧情绪在地方藩镇中进一步蔓延，领兵将领人人自危。豫州刺史裴叔业在南北边界领兵，想谋反自卫，又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就派人到襄阳找雍州刺史萧衍串联。裴叔业对萧衍说，我们一道起兵造反，再向北魏称臣，请北魏出兵相助，这样成功了可以推翻萧宝卷，失败了还可以被北魏封个河南公。萧衍不赞成，他觉得裴叔业想得太乐观了，你投降北魏了就得做北魏的臣子，北魏不是傻子，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萧衍主张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发兵直取建康。裴叔业不听萧衍的劝告，于永元二年（500）正月率部投降北魏。果然如萧衍所说，北魏迅速收编了裴叔业的军队和地盘，却不愿为他去消灭萧宝卷。

南北边界又向南推移了几个郡。

二

裴叔业串联的雍正刺史萧衍是个需要大书特书的人物。

萧衍，时年三十六岁，是萧顺之的儿子，萧道成的族侄，虽然和萧宝卷血缘疏远，但论辈分是萧宝卷的父辈。萧衍年轻的时候文才出众，与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等文士交游，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入仕后，萧衍从参军做起，在对北方的战争中逐步升迁，在齐明帝萧鸾末期成为雍州刺史，驻守襄阳。

萧衍历经刘宋、南齐的变故和南齐内部的政治变迁，对所谓的君臣伦理看得很淡漠。萧宝卷胡作非为，萧衍就在襄阳积蓄力量，以备不测。他暗地招募骁勇之士，储备军事物资，积极筹备起兵的准备工作。萧衍的哥哥萧懿担任益州刺史，被萧宝卷解除职务召回建康，途经襄阳。萧衍拦住哥哥，不让他去，萧懿不听。萧衍进一步对哥哥萧

懿说，南齐内有连年灾乱，外有北方强敌虎视眈眈，已经是内忧外患，而小皇帝萧宝卷只顾专权，胡作非为，国家大乱将至。萧衍劝哥哥一起积蓄力量，寻找机会终结南齐取而代之。萧懿大怒，将弟弟痛骂一顿，要萧衍好好“反省”错误，自己毅然踏上了前往建康的道路。萧衍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踏上险途。但是他的野心不是哥哥的几句责骂就能够打消的，相反萧衍担心哥哥此去会招来大祸，因此加快了备战步伐。他以防备北魏为名，大造器械，暗中砍伐了许多竹木沉于檀溪中，以备造船之用。

另一边，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后，萧宝卷命令崔慧景率军北上讨伐。崔慧景是三朝老臣，陈显达的老部下兼战友，之前在建康城中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如今受命领兵出城，他大喜过望。崔慧景虎跃山林，又领兵在手，马上密谋造反。

离建康不远处的京口，由萧宝卷的三弟江夏王萧宝玄坐镇把守，他是去年被萧宝卷屠杀的尚书令徐孝嗣的女婿。徐孝嗣被族诛后，萧宝玄的妻子也被株连杀害。萧宝卷可能觉得对不起三弟，就把自己的两个嫔妃送给了他。可如此一来，萧宝玄更恨萧宝卷了，一心密谋反叛。

萧宝玄看崔慧景带兵北伐，写信劝他造反，两人一拍即合。崔慧景领军走到广陵，正式宣布造反，遣使奉萧宝玄为主。全军掉头反攻，一路攻克石头城、白下、新亭，包围建康。萧宝玄也派人率领军队随后参战，他自己乘八扛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来到建康。

萧宝玄入住东城，很多老百姓听说江夏王来了，都来投靠他。局势一时间对叛军非常有利。崔慧景觉得胜利在望，便开始轻敌。部将建议发火箭烧掉城楼，等城崩后就可直入城里。崔慧景担心这样入城后又要重新造楼，太浪费，拒绝采纳。他又喜好佛理，醉心清谈，战斗间隙竟然还去寺庙和宾客高谈玄言。主帅如此，将士们的攻势大为减弱，迟迟不能攻占全城。

萧衍的哥哥萧懿在赶赴建康途中，听到战乱的消息。他不像绝大多数官员那样观望，而是立刻组织军队，带兵驰援建康，并在一天黎明时分攻入建康。崔慧景谈了一夜玄学，毫无准备，结果被杀得一败涂地。崔慧景被杀，萧宝玄藏匿了起来。

官兵搜集了朝野官员投靠萧宝玄、崔慧景的信件，萧宝卷下令全部烧掉，还说：“江夏王尚且如此，怎么能罪及他人呢？”萧宝玄误以为萧宝卷要宽大处理，躲藏了几天后就来自首。萧宝卷召他入后堂，用步鄣裹着他，命令随从、侍卫数十人敲鼓吹号驰绕其外，冲着萧宝玄喊：“前几天你围城的时候，我就像这样。”没几天，萧宝卷也把萧宝玄杀了。

这一次拯救萧宝卷，完全是萧懿的功劳，萧懿是乱世中少有的忠臣。在平灭崔慧景之乱后，他获封尚书令，掌握朝政。萧衍得到兄长入援建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劝他，得胜之后要么随即废黜昏君，要么率兵出屯外地避祸，千万不可以留在建康。但萧懿忠于齐室，断然拒绝了弟弟的好意。

萧衍的预感很准确，很快萧宝卷就对萧懿动了杀心。宫廷中的一帮小人也一再怂恿萧宝卷不要将朝政委托给萧懿。有好心人在长江边准备小船，劝他逃往襄阳萧衍处。萧懿事先知道危险的来临，却大义凛然地说：“哪有尚书令逃离朝廷的？人生谁能无死，我不走。”结果，他在宫中从容接过萧宝卷赐的毒药自杀。自杀前，萧懿还对萧宝卷说：“我弟弟萧衍现在驻兵襄阳。听到我的死讯，可能会做出对朝廷不利的举动来。我替朝廷担忧啊。”萧宝卷觉得有道理，斩草要除根，萧懿的兄弟不能留，于是下令将萧懿族诛。好在萧家兄弟们不都像萧懿一样愚忠，得知危险后早早躲藏了起来。除一人被捕遇害外，萧懿其余的兄弟子侄都避匿在百姓家里。老百姓们恨死了萧宝卷，不仅没有人告发，还给予萧家子弟很好的保护。

对于雍州刺史萧衍，萧宝卷认定他手握重兵，是个祸害，就派前

将军郑植去襄阳行刺萧衍。郑植的弟弟郑绍寂正好担任萧衍的部属，郑植便快马加鞭以探亲的名义前往雍州。当时萧懿的死讯还没有传到襄阳，加上郑植官职很高，萧衍按惯例要宴请郑植。郑植怀揣利刃，决定在宴席上杀掉萧衍。郑绍寂觉察到了哥哥的阴谋，在宴会举行前将郑植的来意告诉了萧衍。萧衍得知后，还是照常举行宴会，亲自款待郑植。

宴席开始后，萧衍突然问郑植：“郑将军受皇命来杀我，今天的这酒席可是下手的好机会啊！”

郑植也不是普通人物，心中虽然大惊，但面不改色，矢口否认。

萧衍哈哈一笑，又像没事一样继续觥筹交错起来。郑植怀里的利刃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宴会散后，萧衍邀请郑植参观襄阳城的军备。郑植同是行伍中人，发现整座城池固若金汤，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他对萧衍的治军能力大为叹服，同时也折服于萧衍坦荡的气度，便放弃了行刺的念头，并把萧懿的死讯和萧宝卷的阴谋和盘托出。

摆在萧衍面前的情况是：哥哥萧懿被杀，皇帝又派刺客来刺杀自己，除了起兵造反已经别无选择。永元二年（500）十一月，萧衍在襄阳正式起兵讨伐萧宝卷。

萧衍随即与右军将军萧颖胄联合，以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名，立即起兵。由于早有储备，萧衍用藏在檀溪的竹木在十几天内就建造了三千艘战舰，又在百姓中招募甲士三万人，装备骏马五千匹，迅速组建了规模可观的军队。大军迅速沿汉江南下，进入长江后顺江直取建康。萧宝卷早就失去人心，萧衍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官吏非走即降。

萧宝卷命令紧邻雍州的行荆州府事、右军将军萧颖胄率军迎战。萧颖胄和萧衍一样，年纪相仿，也和南齐皇室有着很疏远的血缘关

系，更重要的是，他也对萧宝卷的胡作非为感到恐惧。萧颖胄一看萧衍大军的势头，直接宣布和萧衍一起讨伐萧宝卷。为了增加正义性，萧衍在萧颖胄等人的支持下，再推南康王萧宝融为名义上的主帅。萧宝融是齐明帝萧鸾第八子、萧宝卷的弟弟，当时担任荆州刺史。永元三年（501）三月，萧衍、萧颖胄等人拥立萧宝融即位，与萧宝卷分庭抗礼。萧宝融就是齐和帝。

三

萧衍大军很快就包围了建康城，建康城中的萧宝卷依然若无其事，继续着他的荒诞生活。

之前，萧宝卷经历了三次兵变，都化险为夷，所以也没把这次兵变放在心上。萧衍率军攻入建康外城，萧宝卷就退到宫城里躲了起来。此时，宫城中还有七万军队，坚守也不是不可能。可萧宝卷并不做指挥谋划，而是继续保持昼伏夜出的作息习惯，兴致来了就穿着大红袍登上城楼眺望观赏城外的敌兵。为了体验一回御驾亲征的感觉，萧宝卷开始热衷在宫中玩打仗的游戏。他身着戎服，以金银做铠甲，遍插羽毛并用宝石装饰，给座骑马匹也穿上了银制的铠甲，然后“闪亮登场”。宫廷卫士、太监们则拿着金玉做的兵器，在萧宝卷的指挥下互相乱打——不用说，每一回萧宝卷都能高奏凯歌。

尽管对打仗游戏一掷千金，萧宝卷对将士们却极其吝啬。萧衍大军已攻打到城外，太监跪在地上请求他赏赐将士激励士气，萧宝卷则说：“难道反贼就只捉我一个人吗？为什么偏偏向我要赏赐？”宫廷后堂放着数百张大木片，将士们想拿去加固城防，萧宝卷却舍不得，想留着做宫殿的大门，竟下令不给。正经事上舍不得花钱，摆花架子他倒有闲情逸致。他催促御府赶制三百人的仪仗，准备在萧衍退兵后给

庆功的仪仗队用，又拿出大量的金银宝物装饰仪仗铠甲。

皇帝身边的宠臣近侍们在生死关头还不忘进谗言，他们将接连战败的责任推卸给前线作战的将领们。萧宝卷一想：“原来打败仗都是将领们不用心造成的，我说我最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于是，他准备拿负责建康城防的征虏将军王珍国开刀，以儆效尤。王珍国害怕了，赶紧派人送给萧衍一个明镜，表明归顺心迹。他又密谋串通了宫内的宦官和侍卫，打算先下手为强。准备齐全后，王珍国在一天深夜率领士兵冲入了萧宝卷的寝宫。

这一夜，萧宝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享乐到了深夜，刚刚睡下，就被军队的喧哗声惊醒，连忙从北门溜出。太监黄泰平追上他，举刀砍伤了萧宝卷的膝盖。萧宝卷摔倒在地，骂道：“奴才要造反吗？”另一名太监张齐不由分说一刀砍下了他的头。萧宝卷时年十九岁。王珍国提上萧宝卷的首级，大开城门，迎萧衍大军入城。

唐代诗人李商隐专门有《齐宫词》一诗慨叹这一幕：“永寿兵来夜不扃（jiōng），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这里“永寿”代指齐宫，“金莲”代指潘妃，“夜不扃”是夜里未关宫门，说的是宫中有内应。“九子铃”原是建康庄严寺的铃，之前被萧宝卷剥取下来装饰了新宫。萧宝卷死后，萧衍以皇太后命追废他为东昏侯。宠妃潘玉儿则被萧衍赐给部将田安。潘玉儿坚决不肯“下匹非类”，自缢而亡。

萧衍此次起兵，可以说是自卫，但杀死萧宝卷后，萧衍就开始独揽大权，让齐和帝萧宝融封自己为大司马、中书监、录尚书事，预备篡位。萧衍坚决不让还在江陵的萧宝融进建康。第二年，他升迁为相国，晋封梁王。为了彻底搁置萧宝融，萧衍捧出了宣德太后王宝明，让宣德太后临朝，使很多事情可以合法地绕开萧宝融直接处理。

王宝明是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妻、萧昭业之母。她并不得萧长懋的

宠爱，萧长懋为其他宫人做华丽衣裳和首饰的时候，王宝明用的却是旧帷帐与旧钗。萧昭业即位后，王宝明被尊为皇太后。萧鸾篡位后，将王宝明逐出宫居住。萧衍就把她迎回宫来搞了个不伦不类的称制，便于自己篡位。

亲信们给萧衍找出了一批祥瑞，包括南充州队主陈文兴在桓城内凿井的时候挖到的玉镂麒麟、金镂玉璧、水精环各二枚。建康令羊瞻解也报告说在县城的桐下里出现了凤凰。宣德太后下诏说符瑞的出现都是相国萧衍的功劳，命人将所有祥瑞都送去了相国府。荆州地区则出现了“行中水，为天子”的传言，为新朝新君大造舆论。

之前都是异姓篡位，萧衍和南齐皇室同姓，还有血缘关系，对于篡夺江山心存疑虑。最后是亲信沈约的劝说坚定了萧衍篡位的决心。沈约劝说：“今日不同往日，不可以用淳朴的古风来要求当今社会了。士大夫们攀龙附凤，都有建功立业的心思。现在连幼儿牧童都知道齐朝国祚已终。明公您正应当承其运。天文讖记都证明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即使出现一些劫数，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沈约这段冠冕堂皇的说辞，彻底打消了萧衍心中的君臣大义和忠孝礼仪，最终下定了篡位的决心。

沈约于是写信给远在京陵的中领军夏侯祥，要他逼齐和帝写禅让诏书。禅让诏书送到建康后，萧衍迅速表示谦让。另一个亲信范云带领一百一十七位大臣上书称臣，恭请萧衍登基称帝。太史令再三陈述天文符讖证明即位是合乎天意的。萧衍勉强接受众人的请求，于中兴二年（502）四月正式在建康称帝，建立梁朝，史称南梁。

萧衍即位后，封萧宝融为巴陵王，迁居姑孰（今安徽当涂），全食一郡。依照惯例，萧宝融享有天子仪仗，在封国内奉行南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都用南齐典故。梁朝规定巴陵王排在宋朝禅位的汝阴王之上，南齐宗室诸王都降为公爵。

最初，萧衍计划在南海郡建立巴陵国，让萧宝融在巴陵自生自灭，又担心萧宝融在巴陵成为反对势力的旗帜。于是他假惺惺地询问范云的意见，范云低头不语。萧衍又问沈约，沈约说：“魏武帝曹操说‘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意思是不能为了虚名，而心存妇人之仁，应该当机立断，了结逊帝。

几天后，萧衍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送给萧宝融一大块生金，让他吞金自杀。萧宝融大笑说：“我死不需金，醇酒足矣。”郑伯禽就弄来一大坛美酒，让萧宝融畅饮。萧宝融狂饮后醉得不省人事。郑伯禽轻松地掐死了他。萧宝融时年十五岁。从被去掉帝号到被郑伯禽掐死，前后不过七天，萧宝融是禅位后存活时间最短的逊帝。

萧宝融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对整个南齐皇室来说，萧衍篡位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在萧鸾、萧宝卷时代，宗室诸王在皇室内乱和战乱中被屠杀殆尽。相比其他暴君，萧衍只是在篡位前杀了湘东王萧宝暕兄弟，后来又杀掉齐明帝其他的儿子，即位后并没有对其他人进行大杀戮。相反，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终于可以在南梁堂堂正正做人，不用再整天担惊受怕了。

萧鸾的大儿子、萧宝卷的大哥萧宝义年幼就有残疾，不能说话，不能见人，因此没有被立为太子，也没有参与政治。他因祸得福，在之后的历次杀戮中幸存了下来，并在萧宝融遇害后继承了巴陵王爵位，奉南齐正朔。巴陵国传国至南陈。

第四章 南北拉锯战

盛极而衰，谁都不能例外

—

南方齐、梁两朝交替的时候，北方正是北魏宣武帝在位之时。

宣武帝名叫元恪（kè），是孝文帝拓跋宏的次子。元恪的即位，有很大的偶然性，先是大哥因为反对父亲的汉化政策被诛杀，之后孝文帝又在南征的途中突然死亡。元恪是在一片混乱中被群臣拥立为新皇帝的。

拥戴元恪的大功臣就是彭城王元勰（xié）。他和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晚年最信任的两个宗室。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坚定支持汉化政策；元勰是孝文帝的弟弟，也是孝文帝南征时的得力助手。太和二十二年（498），孝文帝在南征途中病重，元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掌握了实权。第二年，孝文帝在弥留之际，想将政权托付给元勰。他对元勰说：“嗣子幼弱，社稷就只能倚重你了。”元勰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愿意在政治上涉入太深。他苦苦推辞，说自古以来不管是托孤的重臣，还是大权在握的权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他举例说：“昔周公大圣，成王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孝文帝说服不

了弟弟，叹息几声，不再勉强他。元勰还主动求退，孝文帝就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

孝文帝随即驾崩，元勰主持了南征军队的撤回，还坚定地拥戴侄子元恪登基即位。之后，他主动处于退休状态，都没去定州办过公。

元勰辞让后，孝文帝指定了六个顾命大臣：广阳王元嘉、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及两个汉族大臣王肃、宋弁（biàn）。其中，元嘉是太武帝的孙子，是皇室中的长辈、老好人，他在顾命大臣班子里的象征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宋弁进入班子没几天就去世了。所以，真正主事的是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王肃。

这四个人之间，矛盾重重。元禧和元详是亲兄弟，都是孝文帝的弟弟，自然抱成了一团。王肃是归降的南齐大臣，在孝文帝时期深受信任，提出了不少汉化的主张，在北魏朝野的根基却很浅。孝文帝死后，王肃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立刻受到了鲜卑贵族的排挤。任城王元澄是个忠厚长者，但他对只动动嘴皮子、没几年就和自己并列为顾命大臣的王肃很不服气。恰好此时有一个投降的南齐人诬告王肃是奸细，一直和南方暗通情报。元澄不核实情况，就草率地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不等皇帝诏令就软禁了王肃。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咸阳王元禧等人很快查明王肃并未谋反。元禧对功勋卓著、资历深厚的堂叔原本就心存畏惧，如今抓住元澄陷害王肃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让宣武帝元恪罢了元澄的官，将他外贬为雍州刺史，赶出了京城。事件的另一主角王肃也被外贬为扬州刺史，镇守寿阳。王肃在寿阳郁郁寡欢，于景明二年（501）去世。

至此，元禧和元详两兄弟掌握了北魏的实权。这二人才能平庸，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贡献，却热衷享乐。景明二年初，元禧派家奴找

到领军将军于烈，要调他手下的羽林军官兵充当自己的仪仗队。于烈直摇头，说这是“违制”的行为。皇帝的侍卫官兵怎么能去给一个王爷当仪仗队呢？元禧不甘心，第二次派人找到于烈，态度强硬地说：“我是天子的叔父，我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倔强得很，就是不同意。元禧大怒，调于烈任恒州刺史。于烈干脆请了长期病假，闭门不出。

表面上看，元禧赢了。殊不知，于烈虽然官职小，却在羽林军系统中有不小的势力。他早早就安排了儿子于忠掌握宣武帝的宿卫亲兵，长期跟随宣武帝左右。被元禧修理后，于烈授意儿子劝宣武帝亲政。皇帝一旦亲政，就不需要顾命大臣了，元禧自然就失权了。

宣武帝元恪已满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期盼大展拳脚的年龄。他也觉得顾命大臣碍手碍脚，想要亲政。北海王元详和元禧意见不合，看到皇帝有亲政的念头，选择跳出来揭发元禧“专横不法”，希望给侄子留个好印象，争取亲政后自己能“失权”但不“失势”。

于是有一天，请了长期病假的于烈突然全副武装，带上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在京城元勰、元禧、元详三位王爷进宫。元禧措手不及，只得乖乖被押解入宫。宣武帝元恪宣布亲政，调整了三位叔叔的官职。元勰被客客气气地解除职务，反正他也一心求退，所以叔侄双方都没有意见；元禧“升任”太保，明升暗降被剥夺了实权，元禧敢怒不敢言；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元恪对他的主动揭发很满意，重用了他。一场权力之争，和平地谢幕了。

二

元恪亲政后，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他拒绝鲜卑遗老们返回平城故

里的建议，扩建了新都洛阳，继续父亲孝文帝的汉化事业。在对外政策上，元恪趁南齐末帝萧宝卷统治荒唐造成国家动乱之时，频繁南伐。北魏陆续占领了扬州、荆州等重要城镇，疆域进一步扩大，拉开对南方的军事优势。但元恪也在对梁作战中两次惨败，导致北魏军队元气大伤。

《魏书》称赞元恪“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喜怒不形于色、在朝堂上沉默不语，这些特点说好可好，说坏可坏。皇帝的确要端着架子，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有很多皇帝沉默不语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大臣们的争论没有准确的判断。元恪就属于后者。他对军事、历史、政治都能说上话，但对人心善恶、对政治的微观操作了解甚少，这就造成了元恪虽然能留下不少冠冕堂皇的诏书，却很少有切实的政绩。

再来看看元恪身边的人：北海王元详做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又信任左右亲随茹皓、赵修等人。这几个人都不是好东西：元详能力平庸，整天不干正事，就知道贪污受贿，聚敛钱财；茹皓、赵修等人暴得富贵，头脑发热，仗着元恪的宠信在外面弄权用事。如此一来，北魏在他统治时期开始走下坡路。

咸阳王元禧失势后，也不消停。自古权臣失势，免不了要抄家灭族。元禧很担心自己的命运。原来聚集在他身边的一帮人，本想仗着元禧谋取荣华富贵，如今看主子失势了，就怂恿他孤注一掷，起事造反。元禧的亲信常常向他传递一些“宫中的消息”，今天说皇帝如何不喜欢他，明天说哪个大臣主张诛杀他。元禧为了自保，联络小舅子李伯尚、氏王杨集始等人商议造反。当年（501）五月，宣武帝元恪到洛阳郊区的北邙打猎。元禧乘机紧闭城门，派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在政变的节骨眼上，一帮人却在具体细节上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元禧当断不断，竟然决定暂不起事，让大伙先散了，“从长计议”。参与谋反的杨集始见状，觉得如此造反绝不可能成功，一出元禧的家门，就跑到北邙向元恪自首了。元恪闻讯，立刻调动兵马前去围捕元禧。

元禧身边并无军队，被于烈派几个卫士就轻易逮捕了。元恪亲自审问后，责令元禧自杀，并诛杀参与谋反者十多人。咸阳王长子元通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元禧造反，对宣武帝元恪的刺激很大。元恪心想：“亲叔叔都会谋反，我还能相信谁呢？”他亲政前就对宗室诸王没有好感，如今更加疑忌宗室，转而进一步依靠亲信赵修等人，同时提拔母系外戚作为新的依靠力量——父亲的亲属不能相信了，就只能信任母亲的亲属了。

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原籍勃海蓍（tiáo）县（今河北景县），遵照鲜卑族“子贵母死”的传统，在儿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就被迫自杀了。她的兄弟亲属散落民间，默默无闻。元恪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现在，元恪在民间找到了母亲的两个兄弟高肇、高显和一个侄儿高猛，将他们都封为公爵。其中高肇被封为渤海郡公，最受元恪倚重。

高家的兄弟子侄三人，之前都是帝国底层的小百姓，如今突然被召入连想都不敢想的皇宫大内，一则惊恐万状，二则不知礼节，闹出了不少笑话。可在元恪看来，这却是母系外戚纯朴敦厚的优点。宣武帝非常倚重高肇，让他“数日之间，富贵赫弈”，变成了朝廷的大红人，从底层一跃成为顶端权贵。高肇知道高家在北魏朝廷没有根基，本家又人丁稀少，于是勾结朋党、招降纳叛以壮大实力。对于主动依附投靠的人，高肇竭力拉拢、保举；和高家过不去的人，高肇则百般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外，高肇还进一步败坏风气，大把大把捞钱。咸阳王元禧伏诛后，王府的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大多入了高氏的私囊。

当时，宣武帝的头号亲信是散骑常侍赵修，朝廷的实际主政者是北海王元详。高肇决心扳倒二人，取而代之，让势力更加壮大。

赵修出身卑微，是元恪当太子时期的侍卫。元恪非常信任赵修，登基后一路将他提拔到散骑常侍的高位。赵修在家中宴会，元恪都会亲自参加，还招呼许多王公贵族一同前往。赵修小人得志，顿时忘乎所以。他仗着皇帝的宠信，在外面胡作非为，欺负同僚。父亲下葬时，赵修毫不悲痛，还与宾客在送葬路上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取乐。对于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人，高肇对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他大义凛然地揭发赵修的罪行。赵修早已犯了众怒，大家见高肇挑头，纷纷跟进，争先恐后地控诉赵修的罪状。宣武帝就是想袒护赵修都不行了。景明四年（503），宣武帝元恪不得不把赵修公开审问，判决鞭打一百下，发配敦煌充军。高肇是要取赵修性命的，因此安排了五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轮流鞭打赵修，实际打了三百鞭。不想，赵修出身侍卫，身体素质过硬，吃了三百鞭竟然没死，但也伤痕累累了。高肇又让人把赵修绑在马后，赶马飞跑。可怜赵修重伤得不到休息，又被马拖着跑了几十里路，最终血肉模糊，死了。

几个月后，高肇又告发北海王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反。元恪已经不信任宗室亲王了，而茹皓等四人都是元详推荐到元恪身边的。他把两者联系起来一想，越来越觉得高肇的告发有道理。元恪迅速抓捕茹皓等四人，第二天就把他们处死了，还派羽林军将元详押往华林园软禁。元恪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如何处置。大家的处理意见是将北海王元详废为庶人，严加圈禁。元恪很可能还是想留元详一条性命，不想，北海王府的几个家奴策划劫狱，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连累元详被杀。

元详“谋反”事件，让宣武帝元恪进一步猜忌宗室诸王。高肇猜透元恪的心理，劝他加强防范。元恪派禁军驻守各王府邸，名为保护，实际上将各位王爷当作囚犯看守起来。彭城王元勰劝谏元恪，说国家分封诸王就是为了让诸王拱卫皇室，如今形同囚禁，怎么让诸王发挥作用？万一皇上出事，谁来保护？可惜，元恪不听。元勰心中苦闷，干脆自我封闭，不与人来往了。

宗室诸王集体失势后，元恪自然更加倚重外戚高氏，高肇的气焰日渐嚣张。他出任了尚书令，主持朝政，又娶了元恪的姑姑高平公主为妻，还送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不久，于皇后暴亡，高贵人就升格当了皇后，很多人怀疑是高肇下的毒手。至此，高肇阴谋得逞，成了北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三

元恪暗于识人，不擅微观实践，却有很高的佛学修养。他喜欢在宫中召集名僧，亲自讲经论道。皇帝醉心佛法，方便了高肇在外面任意胡为。为了显示才能，高肇特别喜欢“改革创新”。他修改了大多数的先朝旧制，又不能制定成功的新制度，造成了政务的混乱。其中，对现任官僚和贵戚的勋位、封秩，高肇都进行了削减，造成官场怨气沸腾。无形中，高肇将自己置于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

永平元年（508）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的叔叔、彭城王元勰的弟弟）在信都称帝，公开造反。因为宣武帝曾经逼死了他所爱的女子，又强迫他迎娶高氏；他还对高肇的大权独揽很不满，担心朝政被败坏。朝廷镇压的大军很快就到达冀州。可惜元愉的实力太弱小，只抵抗了一个月，就在逃亡途中被擒。在元愉被押解送往洛阳的半路上，高肇派人把他杀害了。

元愉造反事件，被高肇利用来向彭城王元勰开刀。元勰才华出众，声誉很好，是北魏军民公认的贤王。之前，孝文帝有意让他主政，元勰主动推辞，更被传为美谈。高肇觉得元勰对自己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之前多次诬告元勰，元恪都不相信——毕竟，元勰对元恪有拥立的大功。这一次，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潘僧固被裹挟参加了元愉造反。高肇又一次诬告元勰，说元勰不仅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少

数民族，参与谋反。高肇还收买元勰旧部魏偃、高祖珍做证人，一起诬告元勰。在种种似是而非的证据面前，宣武帝元恪判断错误，无奈地接受了又一个叔叔谋反的“事实”。

于是，元恪设下酒席，召高阳王元雍、彭城王元勰、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四位皇叔，以及广阳王元嘉和高肇赴宴。散席之后，元恪安排各位王爷分别择地休息，然后派人带着武士给元勰送去毒酒，逼他自杀。元勰不肯喝，力辩清白，大喊有人诬告，再三要求和告发者对质。来人不肯传达，拔刀相威胁。元勰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最后饮毒酒自杀。来人担心元勰不死，又命武士补了一刀。天亮以后，元勰的尸体被一床被子包裹着，送回了彭城王府。宣武帝对外宣布彭城王“醉酒而亡”，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赐彭城王谥号“武宣”，企图掩人耳目。

高肇又一次阴谋得逞，升官当了车骑大将军、司徒。如果按照这个状况发展下去，高肇加速蚕食北魏的实权，说不定会成为第二个王莽。不过，朝野百官早已对他心怀怨恨，特别是元勰遇害后，军民们普遍同情元勰，认为高肇“屈杀贤王”，是幕后黑手。鲜卑贵戚们更是对高肇恨之入骨。

延昌四年（515）正月，宣武帝元恪突然病故，享年三十三岁。太子元诩即位，年仅六岁。

元恪一死，宗室诸王和不满高肇的大臣们立即策划反击。依附高肇的官吏也纷纷倒戈。前一年的十月，高肇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进攻益州，刚好不在洛阳。于忠当时担任领军将军，之前他被高肇修理过，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如今，他调动羽林军，控制局势，又与侍中崔光等人商议，请出高阳王元雍、任城王元澄主持朝政。

新领导班子用新皇帝的名义，召高肇回京。高肇得知洛阳的变

故，深感不妙。这时候，他不学无术的缺点就暴露了出来，竟然想不出摆脱危局的方法，只得乖乖回京。高肇进宫后对着元恪的灵柩痛哭哀号，等高肇哭完先帝，高阳王元雍和于忠事先埋伏的十多个武士就把他拉出去杀了。高肇专权之祸，终于解除。

元恪虽然平庸，但至少无大过错，带着北魏缓慢前行就好。无奈高肇就像是一支催化剂，引着大家走上了下坡路。他的揽权胡为，加剧了北魏朝野的贪腐之风；他的改制乱为，恶化了北魏帝国的政治运作；他的诬告陷害，打开了北魏内部倾轧的大门。这些加上同期北魏对南梁作战的两次大败，使得整个帝国由盛而衰，不复孝文帝时期的强盛。

躲不过的南北拉锯战

—

南北方边界大致上一直向南移动，从刘宋王朝初期的以黄河为界，南移到南梁前期的以淮河为界。双方主要围绕淮河一线的军事重镇展开混战。这些重镇从东往西分别是淮阴、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寿阳和义阳（今河南信阳）四处。此外，西边的南郑（今陕西汉中）是南方保护巴蜀大地的屏障，南北双方在此也展开拉锯。

南方的淮河防线在南齐末期动摇。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驻扎寿阳的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怕遭荒唐皇帝萧宝卷杀害，率军割地，向北魏上表归降。天下掉下一个硕大无比的馅饼，北魏朝野欣喜若狂。为防夜长梦多，彭城王元勰和重臣王肃亲自领了十万大军去接收寿阳。途中，他们嫌步兵前进速度太慢，派出一千羽林骑兵火速赶往寿阳。果然，南齐已经派出崔慧景、萧懿、陈伯之等军前往收复。不想，大将崔慧景收复寿阳是假，借机脱离萧宝卷是真，他带着部队出了建康就宣布造反。于是，北魏顺利接收寿阳，还打败陈伯之等军，进而攻占了合肥。南方的淮河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北魏军队依托寿阳，不时对南方发动攻击，让新建立的南梁很是头疼。

梁朝建立后，北魏兴起了一股讨伐南方的声音，其中叫的最响亮的是两个投降的南方人。

第一个人是萧宝夤，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萧宝夤出身高贵，是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是南齐宗室中少数几个才能卓越的王爷。他的哥哥萧宝卷在位时，荒唐胡为，底下就有人几次谋立萧宝夤取代萧宝卷。计划没有成功，萧宝卷对弟弟萧宝夤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萧衍攻占建康后，起初并没有为难萧宝夤，还封他为鄱阳王。不久，萧衍陆续诛杀南齐诸王。萧宝夤被萧衍的军士监守，随时可能遇害。一天半夜，萧宝夤带着几个亲随偷偷挖开院墙逃跑了。他换上底层百姓的衣服，穿着草鞋，徒步赶往长江边。他们在江边准备好了小船，萧宝夤爬到船上时，双脚已经磨得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天明以后，萧衍发觉萧宝夤逃跑，派出官兵在江边四处搜索。萧宝夤装作钓鱼的人，任凭小船随波逐流，在江面上漂了十余里，骗过了追兵。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走小路、躲山涧、骑毛驴，昼伏夜行，终于到达北魏控制下的寿阳。此段经历，堪比现代好莱坞大片的情节。

镇守寿阳的北魏任城王元澄知道萧宝夤是块宝，忙以礼相待。萧宝夤因为亡国，不饮酒，不吃肉，寡言少语，十分悲痛，还身着丧服。元澄就率领北魏官僚前往赴吊——之前北魏都称南齐为“岛夷”或者“齐逆”，如今觉得齐国有利用价值了，又佯装悲痛前来吊唁。第二年，萧宝夤来到京城洛阳。宣武帝对他礼遇有加，萧宝夤上朝时伏地痛哭，诉说南齐亡国之痛，请求北魏出兵讨伐萧衍。北魏内部对南征有分歧，宣武帝没有当面答应。萧宝夤就再三苦求，即使遇有狂风暴雨也从间断地上朝请求。

第二个坚定要求南伐的人是陈伯之，此人的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

如果说萧宝夤是出于亡国之恨要求南征，那么陈伯之则是想借南征来向北魏王朝表忠心。因为他是个投降的南梁将领。

陈伯之本是南齐的豫州刺史，被萧宝卷派去镇守寻阳，抵抗萧

衍。萧衍派人劝他投降。陈伯之在萧宝卷和萧衍之间观望，首鼠两端。直到建康大势已去，陈伯之才正式向萧衍投降。萧衍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征南将军、江州刺史。

陈伯之出身贫寒，大字不识一个，处理公文都需要幕僚为他念字、讲解，养着一群亲信帮助处理政务。这些人中难免有人会借机假公济私、损人利己。萧衍知道后，很担心。一来，陈伯之不是嫡系，君臣之间终究隔着一层东西；二来，江州官吏坏事做得太多了，激起民怨，就不妙了。所以，萧衍派人去取代陈伯之，算是“敲打”一下他。

陈伯之及其亲信却将此事看得很重，认定萧衍要动手了。于是，陈伯之召集文武官员，拿出事先伪造的萧宝夤的书信，说要和萧宝夤一起反梁复齐。他筑起祭坛，歃血为盟，并号令州内各郡起兵。江州所属的豫章郡太守不愿跟从陈伯之造反，率本郡军民抗命。陈伯之决定先出兵攻下豫章，以绝后顾之忧，再顺江而下进攻建康。不想，陈伯之一时间攻打不下豫章，萧衍却已经派出大军逆江而上，逼近陈伯之的老巢寻阳了。陈伯之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带着亲信和部队一万多人北上投降了北魏。

宣武帝元恪也为萧宝夤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于是下令南征。他封萧宝夤为齐王，任命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率领一万兵马进驻寿阳；又任命陈伯之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兵阳石（今安徽霍邱东南），做好南征的准备。景明四年（503）秋，北魏大举南征，其中东路以任城王元澄为主帅，率领萧宝夤、陈伯之等部进攻钟离；西路以镇南将军元英为主帅，进攻义阳。这个元英是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的孙子，父亲南安王元桢因为参与了穆泰谋反，被削夺了王爵。作为谋反宗室的后代，元英顶着巨大的压力，一心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他在孝文帝时期就东征西讨，勇冠三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宣武帝将西线托付给了他。

北魏进军顺利，东路的元澄分兵出击，成功占领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颍川（今安徽寿县西）、大岷（xiàn，今安徽含山东北）、焦城（今河南中牟西南）、淮陵（今江苏盱眙西）等八座城池，以主力围攻重镇钟离。西路的元英则将义阳团团围住。

南梁将军姜庆此时成功施展了一招“围魏救赵”，差点儿扭转了战局。

东线魏军分兵出击，导致后方寿阳兵力空虚。姜庆率领偏师，深入敌后，一举攻克寿阳外城。元澄老巢有被端的危险，如果真是那样，东路魏军可能被梁军南北包抄，陷入大包围之中。可是姜庆的兵力有限，无力再进攻内城，在外城停顿了下来。此时魏军留在寿阳内城还有相当可观的兵力，主要是裴叔业投降时的南齐部队和北魏接收的部队。但这些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

紧要关头，元澄的母亲孟太妃毅然站了出来主持大局。她临危不惧，指挥将领严守内城，并对全城官兵不分新旧、民族一视同仁，赏罚分明，激励大家共同守城。孟太妃还亲自登城检视，冒着矢石指挥作战。北魏官兵士气大振。附近的萧宝夤的军队也及时赶来增援。攻入寿阳的姜庆部队反而陷入了包围圈，激战一日，落荒而逃。

梁军分兵御敌。在东路，萧衍派冠军将军张惠绍救援钟离。张惠绍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的一个沙洲）一带遭到北魏平远将军刘思祖的拦截，一败涂地。张惠绍等十余名将领被擒。到了第二年春夏之交，淮河流域降雨增加，水位暴涨，攻打钟离的魏军无法驻扎，只好撤还寿阳。东路梁军侥幸摆脱了危局。

在西路，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率兵三万救援义阳。元英获知梁军行踪后，派将军元逞等人在樊城（今湖北襄阳一带）阻击王僧炳的梁军前锋。两军交战，梁军大败，战死、被俘的有四千多人，其余人作鸟兽散。曹景宗听说前锋挫败，裹足不前，只在外线

游弋不敢靠近义阳。义阳城内，梁朝的司州刺史蔡道恭率领不满五千的守城官兵，已经坚持了大半年的时间，打退了魏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魏军死伤不计其数，元英开始打退堂鼓了。谁知，蔡道恭突然病逝。元英下令猛攻义阳。南梁守军弹尽粮绝，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建康方面的援军身上。这个援军自然不是曹景宗的部队，而是萧衍新派出的宁朔将军马仙琕的部队。

马仙琕是南方名将，被时人看作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张飞。可惜的是，马仙琕勇猛有余，谋略不足，一味贪功冒进。元英在义阳城东埋伏主力，再派小股军队出阵向马仙琕示弱。马仙琕以为魏军不堪一击，直扑元英。元英佯败，率部北退，引诱梁军钻入包围圈后忽然掉转马头，发出信号。只见漫山遍野的魏军同时杀出，向梁军涌来。马仙琕虽然拼死抵抗，无奈准备不足，军心涣散，大败而逃。内外交困的义阳守军见状，失去了抵抗意志，开城投降。周边梁朝关隘的守军闻讯纷纷弃地而逃。梁朝在淮河防线的西段完全崩溃，失去了现在所有河南地区的领土，不得不在湖北地区组织第二道防线。

义阳大捷，宣武帝元恪大喜过望，封元英为中山王，并在义阳设立郢州，与东面的寿阳呼应，在淮南地区形成一对钳子。淮河防线的重镇就只剩东面的钟离还在南梁的控制之下了。这是504年的事情。一年后，本是裴叔业旧部、镇守汉中的夏侯道迁向北魏投降。北魏迈过秦岭，攻占了梁州十四郡（今陕南地区）。梁朝统治下的四川（当时称益州）也岌岌可危。

二

梁武帝萧衍刚当上皇帝两三年，就遭遇一连串的败仗，领土接连丧失，他自然是不甘心的。

天监四年（505）十月，萧衍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为主帅，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统领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淮南北），大举北伐。这是自刘宋元嘉北伐之后的又一次强势北伐，萧衍几乎动员了南方所有的精兵强将，总兵力达数十万之多，旌旗招展，气势恢宏。

萧衍的北伐计划气势宏大：第一步，攻克重镇寿阳；第二步，兵分两路，一路出徐州，平定中原，一路出义阳，夺取关中；第三步，各路大军会师洛阳，生擒元恪；第四步，扫荡河北，统一天下！

但是战斗现实总比军事计划要复杂、要困难。战士们再怎么流血厮杀，也跟不上帝王在沙盘上的推演。梁军此次北伐，开局就相当不利。作为前锋的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外围的梁城（今安徽寿县东）时，就被陈伯之打败。

陈伯之是投降北魏的南方人，估计留在南方的同僚、熟人比较多。这些人了解陈伯之的性格，就建议萧宏招降陈伯之。萧宏就让机要秘书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丘迟是南齐、南梁时期的一个笔杆子，投入萧衍的幕府，南齐末年朝野臣工一应劝进文书均为丘迟所作。他写给陈伯之的劝降书信，声情并茂、入情入理，堪称美文，后人取名为《与陈伯之书》列入文学史册。

此信写于天监五年（506）三月，开头先大夸陈伯之：“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几乎将陈伯之捧上了天。接着，丘迟笔锋一转，说将军如此神武，为什么“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为什么要当北方蛮夷的走狗呢？估计陈伯之军人的荣誉感一下子被刺激了起来。

紧接着，丘迟主动为陈伯之之前的投降行为辩护，说陈伯之降魏是受小人的蛊惑，将他的责任推卸掉了。丘迟说，“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梁武帝萧衍宽厚大度，

既往不咎，只要陈伯之迷途知返，皇上“重恩不重刑”，不会怪罪的。为了防止陈伯之犹豫，丘迟还举了前人朱鲋、张绣迷途知返修成善果的例子。

再接着，丘迟展开了亲情攻势，告诉陈伯之：将军祖坟、住宅都完好无损，留在南梁的亲戚安居、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述”。陈伯之在南方生活了几十年，根基在南方，不可能对此没有留恋。丘迟又抓紧时机大谈南方的和谐局面和光明前景：“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暗示陈伯之要建功立业、扬名立万，还是要回到南方来。

最后，丘迟动情地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这几句话着实煽情。“将军独无情哉！”丘迟建议陈伯之道，“早励良图，自求多福。”

陈伯之接到书信，让手下念给他听。后人无从知晓陈伯之的具体感受，反正他一听完书信，就率领能够控制的八千军队向梁军投降了。陈伯之投降后，萧衍果然既往不咎，还封他为侯，不过剥夺了他的军队，再也不让他带兵了。

梁军轻松扳回一局，乘胜在五月到七月间两线并进，先后拿下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梁城、合肥、霍丘（今安徽霍邱）、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十几座城池，士气高涨。在这一系列胜利中，值得一提的是，豫州刺史韦叡率军攻克了淮河防线东段重镇合肥。

韦叡参战时已经六十岁，他之前宦海沉浮几十年，一直没有得到施展拳脚的机会。官场上有多少人将年华都耗费在冗繁的行政事务中，韦叡毕竟幸运地在晚年得到了奔赴沙场的机会。据说，他当时的身体已经很差，不能骑马横枪，只能由兵士抬着上阵指挥。在攻打合肥外围的军镇小岷时，韦叡带着一支军队侦察敌军的围栅。敌营中忽

然杀出数百人。部下都建议撤回去披挂整齐，再来迎敌。韦叡却下令立刻迎战。他解释说：“小岷城池小，城中只有两千多守兵。按理说，他们应该闭门坚守，如今却主动冲出几百人，必然是城中的精锐。如果我们能够打败这支精兵，小岷就会不战自败了。”部下们半信半疑，韦叡正色说：“朝廷符节在我手中，绝非摆设，众军不得违命！大家力战，必能克敌！”在韦叡的指挥下，梁军官兵奋勇争先，果然把出城的魏军杀得一塌糊涂。韦叡率部队乘势猛攻城池，不到半天就攻克了小岷。

北魏派将军杨灵胤领军五万赶赴合肥增援。韦叡部下认为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建议韦叡向朝廷请求增兵。韦叡笑道：“敌我已经刀兵相见，现在我们再求增兵，于事无补。就算援兵从后方赶到，敌人的援兵也会源源不断而来，我们还是得不到优势。”他主动进攻，打败魏兵，又在合肥城外的淝水上修建高堰大坝，积蓄河水，不断抬高水位，准备水灌合肥。韦叡还在岸边筑新城守卫堰坝。魏军也不示弱，乘梁军立足不稳攻陷了新城，杀到堰坝前要将其凿毁。

情况危急！韦叡亲自上阵，带领守堰官兵击退魏兵，然后指挥大型战船驶入淝水，居高临下围攻合肥。当时水位已经和城墙一般高了，梁军在船上万弩齐发，将督战的北魏守将杜元伦射死。魏军心理崩溃，弃城而逃。韦叡顺利占领合肥。

到此为止，梁军捷报频传，似乎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南方此次北伐能够大功告成吗？

战火过后，没有赢家

—

北魏对南梁的大举北伐不敢怠慢。宣武帝元恪任命在西线有突出表现的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负责东线军事。元英点兵十多万，浩浩荡荡前去增援寿阳。

南北方主力汇聚在寿阳附近，决战在即。狭路相逢勇者胜，决定恶战胜负的往往是参战者的勇气。遗憾的是，南方主帅、临川王萧宏是个绣花枕头，胆小得很。他能当主帅，完全是因为哥哥梁武帝萧衍最信任他。其实，萧宏并无军事经验，他的“特长”是贪污敛财，即便是在北伐途中也不忘克扣军款、贩运私货。当他听说对手是身经百战、取得义阳大捷的元英时，吓得寝食难安，毫无获胜的信心。

思前想后，萧宏觉得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撤军。他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议撤退。面对一片大好的形势，来参会的将领们满心以为主帅叫大家是来商量作战计划的，没料到会议只有一项议题：如何撤退！

柳惔、裴邃、马仙琕等人不同意，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军旗开得胜，攻守态势有利于我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撤退？”“魏军连败，又远道而来，攻破他们并不困难。”一些将领甚至以死相要挟，坚决不同意退兵。军事会议最终不欢而散。众怒难违，萧宏不再提撤军，可也不许军队进攻寿阳，并发出明令：“人马有前行者，斩！”

官兵士气旺盛，不想统帅泼来一大盆冷水，梁军上下顿时泄了

气。

北魏主帅元英则顾忌梁军数量众多、挟新胜之威，且有韦叟、马仙琕等名将指挥，也不敢轻举妄动，下令全军静观其变。南北两军在洛口附近对峙了起来。

半个月后，九月底的一天夜晚，洛口地区突降暴雨，水位暴涨。洪水漫进了梁军的部分营房。驻扎的梁军骚动起来。本就畏敌如虎、整天胆战心惊的萧宏以为魏军趁着夜幕和洪水突袭来了，吓得魂飞魄散，只带了几个贴身侍从，跳上马就向南弃军而逃。等将领们四处寻找不到萧宏踪迹的时候，才得知实情，大为震惊。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各部官兵也四散奔逃。以由洪水引发的一场骚动为源头，主帅萧宏逃跑为导火索，梁军上演了一场混乱的大逃亡。途中，光是自相践踏就死了近五万人。元英得知梁军自动崩溃，起初还不相信，核实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刻向梁军发起全面反攻。梁军被杀得落花流水，战死和被俘的士兵又有几万人。

魏军轻松获胜，实在要感谢萧宏。后来，因为萧宏貌美而柔懦，北魏官兵就“亲切”地称呼他为“萧娘”。萧宏逃回后方后，竟然陆续升迁太尉、骠骑大将军等职，领扬州刺史二十余年。他在任期间极尽搜刮聚敛之能，敛得赃物存了上百间库房。其所作所为连侄子豫章王萧综都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钱愚论》嘲讽他。不过，梁武帝萧衍见这个弟弟虽然无能，却没有政治野心，亦不加罪。

梁朝的北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溃败了。正在淮阳、义阳等地奋力攻城的偏师闻讯，被迫后撤，先前占领的宿预、梁城等军镇也纷纷弃守。梁军主力沿着淮水向东南方向撤退，淮河防线几乎形同虚设。好在混乱之中，还有一些梁军将领相对冷静。镇守梁城的将军昌义之听说主力溃退后，判断魏军会乘胜进攻重镇钟离。于是，昌义之主动放弃梁城，带领三千守军进驻钟离。果然，元英随即指挥北魏大军兵临城下，将钟离围了个水泄不通。

钟离成了南梁淮河防线上的最后一个据点。为了保卫南朝社稷，钟离不能丢！梁武帝萧衍深知钟离保卫战的重要性，考虑到前线梁军处于绝对劣势，萧衍派将军曹景宗率领二十万援军从建康救援钟离，又下令驻守合肥的韦叟前往增援。南北方的主力决战不经意间又转移到了钟离。

天监六年（507）二月，韦、曹二部在钟离城下会师。此时，魏军已经围攻钟离城四个多月了。昌义之以三千士兵拼死抵挡百倍于己的敌人，成功地守住了钟离城。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梁军将士的英勇，杀得魏军的尸体堆得差不多和城墙一般高；另一方面要归功于这段时间淮河流域断断续续在下雨，淮河和雨水给钟离城罩上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期间，洛阳的宣武帝元恪一度担心师久兵疲，下诏元英退兵。元英反复上表，坚决要求攻克钟离。元恪就不再勉强，督促元英早日凯旋。

梁军老将韦叟来到钟离城下后，指挥部队迅速登陆邵阳洲，逼近魏军营垒，连夜挖长沟、搭鹿角，造了一座甲明枪亮的梁军大营。第二天，元英醒来，愕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座敌军营垒。他改变计划，决定先消灭梁朝援军，再攻钟离城。元英派出猛将杨大眼，率领铁骑，气势汹汹地杀向韦叟的部队。杨大眼是出了名的氏族勇将，在战场上以视死如归的冲锋作战而闻名。韦叟则不慌不忙地将两千辆战车结集在外围，排成车阵。每辆战车上都安排了一只强弩。等杨大眼的骑兵靠近，梁军强弩一齐连发，杀得魏军人仰马翻。杨大眼的骑兵伤亡惨重，败下阵来。几天后，淮水因连天降雨暴涨，梁军出动水师沿淮而上。梁军在水战方面是内行，他们的大船体积巨大，和营垒一般高，里面载满士兵，同时又有许多小船，里面装满浇了油的干草，准备火攻。魏军在淮河两岸都扎下营垒，以淮河中的邵阳洲为支点，南北各搭建桥梁相连接。梁军放火烧桥，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到邵阳洲和两岸的魏军营垒。被分割为几段的魏军陷入火海之中，梁军士兵又下船登陆，猛杀狂砍。魏军乱成一团，桥梁和营垒塌毁，官兵四散而

逃。烧死、淹死、踩死、砍死的魏军超过了二十万人，淮河两岸沿途一百多里到处可见魏军的尸体。主帅元英单骑逃往梁城。

钟离保卫战以梁朝完胜告终。这是继刘裕北伐告捷之后，南朝又一场辉煌的胜利。战后，曹景宗因功受封公爵，韦叟因功晋爵为侯。

同时，钟离之败是北魏对南朝作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惨败。虽然没有像淝水之战一样引发北魏的崩溃，却也造成魏军精锐损失大半，帝国元气大伤，朝野哗然。损兵折将的元英，支援不力的萧宝夤，按律当斩。但考虑到二人之前的军功，最终被赦免死罪，双双削爵罢官为民。

二

惨败后，北魏没有能力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了，于是寻找局部进行突破。

永平四年（511），海边发生了有利于北方的突发性事件。边界军镇、南梁的朐山城发生内乱，守将被民众王万寿所杀。王万寿向北魏称臣，并向北魏的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想都没想，派兵占领了朐山。梁朝闻讯，迅速反攻朐山。

朐山紧挨着郁洲（在今连云港，当时只是海上一座岛屿）。南朝失去了对今河北、山东地区的控制后，在郁洲侨置了青、冀两州，在名义上保留对北方的统治。卢昶过分看重郁洲的重要性，进而高估朐山的重要性，认为巩固了朐山，就可以攻克郁洲，进而彻底消除南朝对北方的统治——其实，南朝只是在一座海岛上虚搭了两个州政府的架子而已。此时，北魏方面对朐山的重要性判断失误。徐州刺史卢昶出身著名世族范阳卢氏，在写文章方面很有一套，对军事战略却一窍不通。

卢昶上奏宣武帝元恪，要求重兵争夺朐山。元恪听从了卢昶的意见，陆续派出多支军队，总兵力累计超过十万，力图守住朐山。

魏军统帅卢昶手握重兵，却不能突破梁军对朐山的包围，甚至连粮草也运送不进朐山。结果，梁军在马仙琕的指挥下，从容不迫地围攻朐山城。十二月天降大雪，雪花漫天飞舞，困守朐山的魏军弹尽粮绝，主动投降。卢昶见朐山丢失，扭头就跑，十万魏军随之溃散。当时大雪封路、天寒地冻，很多北魏士兵沿途因伤冻减员，马仙琕指挥梁军随后追杀，最终只有一万多魏军逃回后方。朐山之败是钟离之后北魏又一大惨败，所剩不多的精锐又一次横尸海滨。而卢昶逃回后，和萧宏一样继续当官，继续写文章。

不知道是受两次大捷的鼓舞，还是雄心尚在，萧衍在三年后的天监十三年（514）决定反攻。有个投降的魏人，名叫王足，向萧衍献策，说淮河下游的浮山（今安徽五河一带）的地势很适合修筑大坝，可以在此处抬高淮水灌注寿阳。萧衍欣然采纳，决定拦淮修筑浮山堰，希望可以除掉寿阳这个心头之患。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梁朝从徐、扬二州大肆征发民工，每四户出一人参加工程。施工环境恶劣，监工催促又急，民工们不断因为劳累、饥饿、疾病而死。工地上随处可见尸体和奄奄一息的百姓。此段淮河泥土松软，堵塞河道很不容易，经常是砂石填下去就被水流冲走了。官府就想用铁器堵塞河道，从后方征用了上千万斤的铁器，效果也不理想；又想到伐树做木笼，装上石头填埋河道，为此几乎砍光了淮南的树木。

浮山堰搞得北魏很紧张，派遣李平到寿阳负责迎战，又起用萧宝夤专门破坏浮山堰。萧宝夤想到的方法就是去进攻工地，结果被重兵以待的梁军击退。眼看堰坝将淮水抬得越来越高，北魏有意派遣大军增援。前线统帅李平不以为然，上奏说：“所谓的浮山堰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工程，终究要垮掉。我们根本不用派兵，就等着看南朝出洋相吧。”北魏朝廷采纳了李平的建议，只是在寿阳城附近的八公山上建筑城池，防备寿阳一旦被淹后可以转移军民，并不做其他准备。

天监十五年（516）夏，被寄予厚望的浮山堰终于建成。堰坝总长约四千五百米，高约四十八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大坝。大坝抬高了上游水位，形成了一个方圆几百里的人工湖，相当壮观。寿阳城果然被水围困，北魏军民被迫弃城爬上八公山躲避。

梁武帝萧衍的计划看似成功了。不过，梁军如何去占领汪洋之中的寿阳城，占领后又有何用呢？

更糟糕的是，浮山堰腰斩了奔流的淮河，上游一片汪洋，人工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水位持续上涨，很快就和堰顶相平了——萧衍造大坝的时候，忘记还有泄洪这码事了！

眼看着大坝要决堤了，驻守的梁军慌成一团。有人看到八公山上的水位也在不断上涨，利用魏军怕淹的心理四处散布说：“梁军不怕打仗，就怕有人把水泄掉。”魏军一听，果然开始在人工湖边上挖渠泄水。可是，魏军泄洪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淮河上游来水的速度，浮山堰的险情日益严重。四个月以后，516年的秋天，人工湖洪水泛滥，浮山堰轰然坍塌。堰垮之时，声响如雷，三百里内都可以听到。寿阳被洪水淹没，此段淮河及其下游的城镇、村落几乎无一幸免，全部没入水底，数以十万计的百姓被奔腾的洪水冲入大海。

壮志满怀的浮山堰工程以一幕幕人间悲剧收场。

洪水退后，在八公山上躲避的魏军不慌不忙地回到寿阳城。对他们而言，只是出去躲了四个月洪水而已。但是梁朝军民损失惨重。萧衍为北伐征发的将士、军需全部付诸洪水，顷刻间输得一塌糊涂。从此，他再也不轻言北伐，也北伐不起了。

在南梁专注修建浮山堰期间，宣武帝元恪在西边也有大动作。他利用梁军主力集中东线，巴蜀地区守备空虚之机，于延昌三年（514）底任命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军十五万攻打巴蜀。元恪本有把握在四川有所斩获，不想大军还在路上，他自己就在延昌

四年（515）的正月病逝了。之后，北魏统治层忙于诛杀高肇，西征一事不了了之。其实，经过之前两次惨败的北魏，确实也没有力量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了。

战场无赢家。无论胜负，各方都要付出人力和物质的沉重代价。互有胜负、持续拉锯的北魏和南梁更是如此。5世纪末和6世纪初的连年鏖战，消耗了南北双方巨大的能量，加上各自内部争斗接踵而来，双方把注意力都收回朝堂之上。直至北魏灭亡，南北双方沿着淮河一线保持了十多年的短暂和平。客观上，当时的南北双方谁都不具备统一的实力。均势的天平，以淮河为支点，基本保持着平衡。

于是，双方任由淮河南北上百里的拉锯地带荒芜，杂草丛生，虎狼出没……

三

这一次休战，似乎也象征着南北争雄阶段的结束。元英、韦叟、马仙琕、曹景宗等人没有等到下一次战争的开始，就陆续去世了。之后的南北战争，再也没有出现5世纪那样在战场上猛将辈出的盛况。

其中，值得一书的是萧宝夤。他年少亡国寓居他人屋檐之下，个性低调稳重，其日常生活称得上简单枯燥：不食酒肉，决不嬉笑，不着华服，惨淡见人。萧宝夤对故国南齐念念不忘，志在复国，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敬重。梁武帝萧衍曾手诏劝降萧宝夤，他不为所动。北魏朝廷对萧宝夤也相当不错，还将公主下嫁给他。萧宝夤屡次请求边任，北魏就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将东线托付给他。萧宝夤在任上，勤于政事，官声不错。北魏末年，起义频繁，局势动荡。羌族人莫折大提在关中地区自称秦王，屡败官军。莫折大提死去，第四子莫折念生

自称天子，继续扩张势力，渗透到陇东、雍州等地。萧宝夤是当时北魏朝廷少数可用的将才之一。朝廷任命他为大都督，率军西征。萧宝夤在关中与莫折大军英勇作战多年，遏制了莫折念生势力的壮大。北魏能够保全关中，主要倚赖萧宝夤之力。

孝昌二年（526），北魏加封萧宝夤为假大将军、尚书令，将军政两方面的顶端职位都给了他，以示笼络。不想，萧宝夤看到北魏境内烽烟四起，动乱日益蔓延，朝廷衰落不堪，对北魏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同时内心开始萌生了割据自立的想法。北魏朝廷对他也不是真正的信任，加派御史中尉酈道元为关中大使，监视萧宝夤。萧宝夤委屈不满又很恐惧，认定酈道元是来暗算自己的。

一些部下怂恿他在乱世中割据，说：“大王本是皇室贵胄（南齐的皇室），天下所归，割据称帝也是合理合情的事情。”还有人编造民谣说：“鸾生十子九子殂，一子不殂关中乱。”（萧宝夤是萧鸾之子）于是，萧宝夤听信劝告，准备造反。他秘密派部将攻杀酈道元。酈道元刚走到今陕西临潼附近的驿站，就遭到围攻，最后率小部队力战而死。之后，萧宝夤正式称帝，设立百官，遣将四处攻城略地，意图割据关中。一时间，南齐政权似乎要在遥远的长安复活了。可惜，萧宝夤的实力太弱，外有北魏朝廷派军自东向西进剿，内有起义军和陕西郡县抗命。萧宝夤派部将侯终德攻打陕北，侯终德战斗失利后投降北魏，回师反攻萧宝夤。萧宝夤慌乱中迎战，被侯终德打败，只好带着妻子和部下百余骑逃跑，投奔起义军万俟丑奴部。丑奴任命他为太傅。

永安三年（530），万俟丑奴部被魏军剿灭。丑奴和萧宝夤都成了阶下囚，被押送京城洛阳。北魏庄帝下诏将萧宝夤在京城大街上示众，任由军民围观，三天后赐死。

成也太后，亡也太后

—

延昌四年（515），只有六岁的北魏孝明帝元诰登基。显然，朝廷又要出现皇权旁落、内讧不断的局面了。

北魏版的故事一开头比较特殊。之前，外戚高肇擅权，搞得朝野天怒人怨，成了众矢之的。皇位更替之时，高肇偏偏不在洛阳，被派去攻打四川了。大臣们很快结成了反高同盟。朝中做主的是中书监崔光 and 领军将军于忠。他们请出被高肇监视居住的宗室们，壮大力量。任城王元澄、高阳王元雍、清河王元怱、广平王元怀等人都参与决策。大家很快就将高肇送上了西天，开始拨乱反正。

元诰的生母胡氏在元恪期间遭到高肇的无情打压。高肇的女儿高皇后不能生育，在后宫一直想置胡氏于死地。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群臣先是尊她为皇太妃，又很快升她为皇太后，请她临朝听政。

胡太后是陇西安定人，祖辈曾在后秦、大夏当官，到父亲胡国珍一代，胡家只是普通人家。胡氏年轻时一度入佛寺为尼，后因为美貌之名传至宫廷，被召入后宫封为低级嫔妃。鲜卑民族入主中原后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对汉武帝预防后宫专权而赐死太子生母的残酷做法非常欣赏，并且明定为宫廷制度。此后，北魏的妃子们都生活在矛盾之中。她们既希望生育儿子，因为那是她们将来地位的基础，同时又担心生出的孩子日后被选立为太子，因为那样母亲就要被迫服毒，再也享受不到荣华富贵了。胡氏却非常希望生育皇子，没有表现出一丝

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是她这种“冒死生子”的气魄得到了宣武帝元恪的好感，元恪在高皇后的高压下亲近胡氏，二人生下了元诩。元诩是元恪唯一的儿子，元恪计划立他为太子。按律，胡氏应该先被处死。但元恪非常喜爱胡氏，赦免了她。从此以后，中国宫廷“子贵母亡”的做法就成为历史。

当时有传言说元恪的前皇后于氏和其他皇子都被高皇后谋害了，元恪虽半信半疑，但为了留下血脉，对元诩格外爱护。他亲自照料儿子的生活，既不让高皇后过问，也不让胡氏插手，挑选外面忠实可靠又有经验的保姆将元诩抚养成人。

如今，元诩顺利登基了。北魏帝国先辈担心的太后掌权的局面还是出现了。朝臣们很快就发现，刚刚抛头露面的胡太后并非恪守妇道的一介女流，而是深谙政坛、手腕高超的权力玩家。推翻高肇的势力后，朝政由崔光、于忠主持。崔光是个明哲保身的老官僚，于忠则行为粗暴，手握实权。他把持政令，又负责宫廷宿卫，权力极大，重大决策几乎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宗室王爷们被软禁多年刚被放出来，即便对于忠不满，也无力抗衡。结果，于忠表面上尊贵无比，人见人怕，实际上已经被孤立了起来。胡太后瞅准机会，乘于忠疏于防范之时，当众解除他侍中和领军将军的职务，外放为冀州刺史。一鸣惊人后，胡太后不等朝臣们看明白她的招式，迅速任命妹夫元叉为侍中、领军将军，并提拔身边宦官刘腾担任卫将军，掌握实权。她见清河王元怿英俊潇洒，便和元怿勾搭成奸，引元怿为外援控制朝政。元怿背上了“男宠”之名，却不影响他精明勤政的作风，他很好地协助胡太后掌控了朝政。北魏进入了胡太后当权时代。

胡太后接手的的是一个国势不断下滑、各种矛盾开始显现的帝国。她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对拯救颓势没有尺寸之功，却一心享受。

胡太后佞佛。也许是早年做过尼姑的缘故，胡太后深信佛教可以赎罪。她大把大把地投资佛寺、助长寺院势力的扩充，希望以此来赎

罪孽、积功德。胡太后在洛阳主持兴建了永宁寺、太上公寺等佛教工程。其中永宁寺规模宏大，寺中有一座木结构的佛塔，高九层，一百丈，离京城百里之遥都能看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塔四面窗扉上缀满金钉，有风的夜晚，钟铃和鸣，声传十余里。又铸丈八金佛像一尊，中等金佛像十尊，玉佛像两尊。佛刹上有金宝瓶，瓶下有容露盘三十重，周围皆垂以金铎。该寺有僧房多达千间，僧人过万。胡太后还热衷参加佛教活动，大小佛事有空必到，每次都少不了施舍，钱数动辄数以万计。上行下效，地方官府也纷纷兴建佛寺，资助佛事。不用说，这些大小工程和活动，都是官府出钱。

官府因佛事而大兴土木、征发无度，百姓疲于徭役之苦，市场上金银价格攀升，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影响了国库和官府的行政能力，官民都心生不满。任城王元澄看不下去了，就劝侄孙媳妇胡太后，说春秋时楚灵王兴建章华宫导致国力衰落，秦朝亡于阿房宫，希望她以史为鉴。元澄辈分高、功劳大、资历老，胡太后惹不起，对他优答礼遇，但就是不采纳意见。时间长了，元澄也懒得说了，干脆闭门不出，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神龟二年（519），元澄病逝。胡太后加以殊礼，备九锡，以帝王之礼安葬了这位经历四朝的老王爷。她亲自送灵柩到郊外，停舆悲哭，哀动左右。千余官员参加葬礼，莫不唏嘘。这一系列哀荣过后，北魏再也没有出现像元澄那代人一样忠勇能干的人物，也再没有人敢于直言劝谏了。

就在元澄病逝的这一年，朝廷采纳征西将军张彝之子张仲瑀的建议，宣布改革人事制度，武人不得担任清要的官职。北魏以武力兴国，之初文武官职划分并不明确，官员在文武官职之间调动很自然。汉化之后，“文武分治”开始固定，文官序列开始压过武将序列。官职开始分“清浊”，文官职位比较清要，发展前途广阔，而武将职位升转调任不易。渐渐地，朝野出现重文轻武的趋势。张仲瑀的建议，就是在制度上将对武将的歧视固定化。消息传出，洛阳城中驻扎的羽林、虎贲将士们（都属于禁卫军）一片哗然。他们在街上定期集会，张贴告

示，宣称要杀张氏全家。张彝父子认为是武士们虚声恫吓，不以为意。二月二十日，近千名羽林、虎贲在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前大闹大骂，指名要找张仲瑀之兄张始均。尚书省的大小官吏吓得紧闭大门，不敢进出，同时也没有其他官吏赶来处理这场群体性事件。事情越闹越大，将士们开始用砖瓦石块砸尚书省大门，砸了好一会儿后又向张家奔去。他们一路上拾取柴草，收集木棒石块，冲到张家就四处打砸，点燃火堆要烧房子。征西将军张彝被拖到堂下，任意打骂，张始均已爬墙逃到外面，见状返回向乱党叩头，哀求将士们饶过父亲性命，竟被抓起来丢到火里活活烧死。始作俑者张仲瑀被打得身受重伤，侥幸逃脱，张彝则被打得奄奄一息，两天后不治身亡。事后，胡太后只将为为首的八人斩首了事，其余人等一概不问，充分暴露出姑息徇情的作风。更恶劣的是，胡太后取消了已经颁布的禁止武人任清要官职的制度，下诏大赦，宣布准许武官参选。

在这场禁卫军的闹剧中，朝廷有关部门毫无作为，事后胡太后的轻描淡写，更是对闹事者的屈从，最终使得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不仅洛阳的禁卫军不念胡太后的好，还让有识之士捕捉到了天下将乱的征兆。

事件发生时，一个叫作高欢的北方军镇信使，因传递文件恰好滞留洛阳，目睹了整场事件。他断定天下将乱，返回军镇后散尽钱财以结交朋友。亲朋好友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高欢回答：“我在洛阳看到禁卫官兵焚烧将军宅邸，朝廷怕出事而不闻不问。为政如此，政府的前途可想而知。天下都要乱了，财物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在高欢结交的朋友中，多数是和他一样的低级军官，比如司马子如、孙腾、侯景等人，而就是这些人将在此后掀起惊涛骇浪。

事变的第二年（520），洛阳就爆发了内讧。掌权的元叉、刘腾发动政变，杀死清河王元怱，幽禁了胡太后。

昔日的亲密伙伴和亲戚，怎么就刀兵相见了呢？原来，胡太后越来越喜欢元怱这个美男子，日益倚重，使得元叉、刘腾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元怱很有才干，平日常常批评元叉、刘腾违法乱纪的行为。元叉、刘腾二人因此恨上了元怱，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指使他人告发有人要拥立清河王元怱做皇帝，可是胡太后压根就不信这样的诬告。元叉、刘腾知道只要胡太后在就扳不倒元怱，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十一岁的小皇帝元诩，将胡太后和元怱一块扳倒。

二人先买通了负责皇帝食物的主食中黄门，由他向元诩“自首”：“清河王收买小人，要毒死陛下。”元诩信以为真。他慢慢长大，开始对元怱和母亲的丑事看不下去，知道元怱要害自己后更是气愤。元叉、刘腾趁机靠近小皇帝，为他出谋划策，教他如何如何。七月的一天，元叉突然请出孝明帝元诩升殿召见群臣，刘腾则关上后宫大门把胡太后软禁。清河王元怱随着大臣们进宫，立即被抓了起来。刘腾拿出诏书，宣布元怱谋反。当晚，元怱即被杀害。元叉、刘腾又假造胡太后诏书，说她因病不能理事，还政给皇帝。群臣在错愕之余，都不敢反对。元叉、刘腾戏剧性地登台掌权了。

此后几年，大小政事都由元叉与刘腾二人决定。元叉及其父亲京兆王元继贪财好货，一味敛财。刺史、太守、县令、县长，绝大部分官职都可以用钱购买。北魏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对老百姓的压迫也到了极点。而刘腾想干事，有权谋，就以太监之身出任司空，每天对中央各部门发号施令。整个朝廷唯他马首是瞻。在宫廷内，刘腾十分注意被囚禁的胡太后。内宫宫门紧闭，钥匙由刘腾亲自掌握，即便是皇帝元诩也不能进去看母亲。胡太后终日幽居深宫，很少有人过问，甚至有时缺衣少食，生活在饥寒之中。

正光四年（523），刘腾死了。刘腾死后，对胡太后的囚禁开始松弛。小皇帝元诩可以去探望胡太后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北方六镇起义爆发，天下局势开始动荡。朝野对元叉等人的专权、贪腐纷纷表示不满。这些因素都便利胡太后东山再起。正光五年（524）的秋天，胡太后趁着儿子和群臣来探望自己，发脾气说：“你们不准我们母子往来，防我像防贼一样，我待在这里做什么！我决意出家，去嵩山当尼姑。”说着，她就动手剪起了头发。元诩和大臣们叩头劝阻，胡太后反而闹得更凶了。元叉见状，居然不疑心，答应胡太后可以与元诩自由往来。胡太后因此留元诩在身边住了好几天，逐渐挽回了好感，把小皇帝拉到自己这一边。

正光六年（525）二月，胡太后和孝明帝元诩出游洛水。途中，高阳王元雍邀请太后和皇上到他家中。三人秘密商定共同对付元叉。元叉兼任领军将军一职，指挥着禁卫军，让政敌忌惮三分。好在元叉政治迟钝又麻痹大意，胡太后选了个机会对元叉说：“你既忠于朝廷，操心国事，为什么不解除领军一职，集中精力辅政呢？”元叉听了这话，还是不起疑心，竟然乖乖请求卸任领军将军。胡太后求之不得，当然恩准。兵权一没，胡太后马上动了手。四月初二，胡太后宣布重新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官爵，免掉元叉一切官职。有人随即上书为清河王元怱申冤，又有人告发元叉勾结六镇、阴谋造反，结果元叉被赐死，其父元继被废黜。胡太后过了四五年苦日子后，重操权柄。她此时面临的局面，比上一次掌权时更恶劣、更危急。北方六镇起义导致的造反活动愈演愈烈，南方梁朝趁火打劫，连年骚扰边界，攻克了北魏寿阳等数十座军镇。胡太后非但不奋发图强、收拾残局，反而加倍贪图享受。

胡太后似乎是要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爱上了化妆打扮，纵情声色，蓄养男宠。她之前就与父亲胡国珍的属员郑俨相好，再次临朝后任命

郑俨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又让他出任尝食典御一职，经常留

在宫里淫乱。中书舍人徐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小人，看到郑俨得势，就委身投靠。郑俨见他才有才有谋，遇事可以商量，也真心与他结为一党。郑俨很快升到中书令、车骑将军。而徐纥则升为黄门侍郎，仍兼舍人，实际把持了帝国政令。

在朝堂上胡太后自欺欺人，闻喜不听忧。上下官僚就都向胡太后汇报北魏境内是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对日益壮大的造反队伍，他们轻描淡写地说是少数盗贼骚动，很快就会被地方官吏肃清。胡太后就生活在虚假的保温箱、无菌室中，浑然不知其所作所为助长了造反者的气焰、恶化了局势。

胡太后、郑俨、徐纥等人对一些日常性的政务也没有正确的理解，举止失措。比如胡太后对“文武分治”趋势无动于衷，对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也没有任何预期，自然谈不上改正了。结果，作为王朝支柱的军队和胡太后离心离德。又比如胡太后等人轻视世家大族，侵犯他们的既得利益，招致豪门大族的愤怒。胡太后为儿子元诩选妃，北方的大家族，如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瓚等，都送女儿参选。这些大家闺秀都入选了，可是只被封为低级嫔妃，即世妇，让各大豪门颜面尽失。

正史很不客气地说胡太后掌权期间，“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婪。郑俨污乱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政治黑暗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

内忧外患的北魏，终于分裂了

—

时隔一百多年后，洛阳城中又出现了炫富大赛，这次的主角换成了北魏的统治阶层。

高阳王元雍是孝文帝拓跋宏的弟弟，长期位列宰辅，财富堪比皇帝。高阳王王府的园林和皇帝的宫殿差不多，“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元雍家中“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传说中的蛇珠，是稀世之物）照日，罗衣从风”。他身边常随虎贲甲士百人，打着用鸟羽装饰的伞，“出则随从唱道，仪仗成行，铙歌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霄尽月”，称得上是“贵极人臣，富兼山海”“自汉晋以来，诸王奢侈，未之有也”。元雍吃一顿饭，就得花数万钱，相当于一般官宦家庭一年的伙食费。

而如此多的钱财，都是高阳王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来的。具体的揽财手段后人不得而知，但看看与他同时期的河间王元琛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窥得当时北魏统治阶级的胡作非为，足以让后人“大开眼界”。

元琛在担任定州刺史时，就以贪婪闻名，任满回京时大车小车载着金银珠宝往家里拉，轰动一时。胡太后知道了，说他：“元琛在定州做官，就差没把中山宫搬回来了，其余没有弄不到手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再用！”于是把他废置在家。后来，元琛拿出一部分钱行贿刘腾，又做了秦州刺史。秦州近西域，元琛在任上政绩全无，却遣使向

西域求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此外，元琛还有能跑七百里的良马十余匹。他有功夫给每匹马都取名字，就是没时间操心政务。

元琛回到洛阳，看到大家都在羡慕元雍的富有，很不服气，暗中与元雍比富。他高调地在家里陈列不可胜数的金银珠宝，其中金瓶、银瓮百余口。在喜爱的马身上他也下足了功夫，辔头用金，食槽用银。他还发挥自己在秦州做官的优势，摆满中原没有的西域珍品。河间王府的华美就更不用说了，窗户上装饰着用黄金做的飞龙、美玉做的凤凰，房前遍栽各种果树，条枝入檐，人们坐在楼上就能摘食。总之是怎么奢华怎么做。

元琛时常邀请宗室贵族和大臣到家里做客，宴会使用的器皿都是从异域买来的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每一件都工艺精致，华丽非常。他还喜欢请宾客参观家里堆满金银绸缎的府库，炫耀令人眼花缭乱的羊毛毯、蜀锦、珠玕、越葛等，四方珍品应有尽有。

一次，章武王元融应邀到元琛府上做客。元琛对元融说：“我不恨没看到石崇的富有，只恨石崇没看到我的富有。”元融也是巨富，可依然在元琛家里大受刺激。他把自己的动产、不动产算来算去，都比不上元琛的财产多，元融为此气得三天三夜起不了床。京兆王元继去探望他，安慰道：“章武王，你的财富并不比元琛少多少，就不要妒忌他了。”元融说：“我之前以为在北魏富豪排行榜上我能排第二名，仅次于元雍，没想到元琛也在我前面，我只能居第三，真是气死我了！”

斗富行为恶化了朝廷风气。官吏们一心向“钱”看，变着法子敛财。正始三年（506），吏部尚书元晖公开标价卖官：太守大郡两千匹绢，次郡一千匹绢，下郡五百匹绢；其他官职也按等级不同，售价不同。元修义做吏部尚书时，上党太守出缺，中散大夫高居向皇帝请求补缺，皇帝答应了。但元修义已经把上党太守卖给别人了，就是不让高居去上任。高居急得在公堂上大喊：“有贼！”有人问他：“光天化

日，哪儿来的贼？”高居指着元修义说：“就是坐在堂上的人。皇上已答应我担任上党太守，但因为他收受了别人的贿赂，就不听皇上命令，不让我上任，这难道不是白日行劫吗？”

卖官鬻爵严重冲击了官场的正常秩序，加上官多职少，大量人员升职无望，甚至有当官资格却补不上缺。为解决矛盾，崔亮担任吏部尚书时，奏请“停年格”，即不问官员才能，一律按照资历来决定当官和升官的先后，凡有空缺职位，不问贤愚，择资历老的人优先叙用。这种机械又不负责任的人事改革，竟然得到了上下的一致称赞——毕竟在当时这是最客观，也相对公平的方法。

贵族官僚在斗富，北魏的普通百姓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赤贫生活。此外，他们还要供官府驱使劳动，致使妻离子散，终年得不到休息。愤怒在百姓心底堆积，一旦遇到合适的契机就会喷发出来！

二

北魏的外敌，除了南朝，还有北方的柔然。

柔然最强盛的时候，势力东起大兴安岭，南到黄河河套和山西北部，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北至今贝加尔湖，大致上囊括了现在的蒙古高原、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柔然拥有“风驰鸟赴，倏来忽往”的骑兵队伍，威震漠北，几乎年年侵扰北魏边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基之初，柔然曾南下侵略，将拓跋焘包围了五十多重。还是在太武帝时期，北魏取得了对柔然战争的多次胜利，使柔然元气大伤，对北魏的威胁降低。拓跋焘将柔然称为蠕蠕，嘲讽柔然智力低下，是不会思考的虫子，还下令全国军民都对柔然改称。

此后，柔然虽然开始没落，但还保留了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对北魏的威胁依然存在。为防御柔然、拱卫京都平城，北魏积极防御，修筑长城，在东起河北、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延绵两千余里的边境线上设置军镇，调兵遣将驻守。北魏设立了六大军镇，称为六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

初期，北魏朝野非常重视六镇。六镇的将领均从北魏贵族豪强，甚至是宗室子弟中挑选，官兵也是鲜卑族的精锐。他们地位崇高，待遇优厚，经常得到朝廷的封赏和恩赐。六镇将领被视为“国之肺腑”，升迁的机会也比内地的同僚多，如果不愿意继续任职随时可以返回首都当京官。士兵们被视为国家精锐，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在一片尚武的风气中可以耀武扬威地驰骋四方。女子们都以能嫁给六镇的边将和士兵为荣。

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柔然对洛阳的威胁大幅下降，而大规模汉化后，国家崇文轻武，六镇官兵的待遇完全逆转。过去在疆场上的英勇斩杀不再被人称道，汉族的诗书礼乐和朝堂上的权力斗争变成了游戏的核心规则。在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六镇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不断降低，将士们也被抛弃了。同样是拓跋族宗室和鲜卑贵族的他们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一般军官也被排斥在“清流”之外，他们的升迁和待遇远远落后于内地的同族和同僚。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希望能升迁到内地去。当时其他地区都奉行州县制，只有六镇还保留着“镇”的特殊行政区划，被视为另类。洛阳的贵族们更是态度十分傲慢，将边将看作鄙陋的粗俗军人，而一般人也将去六镇视作畏途。

至于将士们，特权没有了，优厚待遇也没有了，连吃穿都失去了保障，只好转而聚敛钱财。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的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辛辛苦苦一整年，收入也是微不足道。更可悲的是，许多士兵拖家带口，常年滞留边镇，生活困难却得不到改善，

基本与流放无异。运气好的士兵，从军一辈子可以做到军主，其他人就只能老死边关。鲜卑精壮之人和汉族地主子弟自然不愿意再去边镇当兵，朝廷就把犯官、囚犯、流民等人发配到六镇去补充缺额，最后后者成了六镇军官和士兵的主要构成。

值得欣慰的是，六镇的军队因为战斗频仍、行政特殊，汉化潮流并没有涌动到这一区域。相反，六镇的汉人却被胡化了，不读书也不耕种，选择跨马横刀，还改姓鲜卑姓氏。官兵们则保留了草原民族骁勇善战的作风，战斗力较强。

几十年间，六镇官兵从天堂跌入地狱，从光荣的国家栋梁变为了羞耻的监狱苦役。被背叛、被忽视的怨恨和迫切希望改善处境的思想，充斥在六镇之中。

北魏内部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汉化区域，面积广大，以农耕文化为主，统治内的鲜卑人经过汉化提高了文明程度，可也沾染了汉族柔弱、内斗和中庸等特性；一个是以六镇为核心的北方区域，面积狭长，笼罩在汉化区域的北方，以草原文化为主。两个区域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交流越来越少。可怕的是，双方相互仇视，隔阂日益深重，这是非常危险的。内地和六镇的对立又和北魏内部早已有之的“文武分治”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洛阳的禁卫官兵虽然境遇比六镇官兵要好许多，但也日益被边缘化，和文官集团及朝廷离心离德，使得他们在感情上更倾向边镇官兵。

任城王元澄就向胡太后指出：北方边将的地位越来越轻，恐怕对御敌固边不利，进而危及社稷，请朝廷严格挑选边将，整顿六镇军队。大臣李崇则进一步指出：应取消六镇军民一体的特殊政区，像内地一样划分为州县，同时进行汉化改革，与内地一视同仁。胡太后将这些意见一律束之高阁，不闻不问。

第五章 小人物大变局

六镇起义：大动乱中的小人物

—

北魏末期的一项人事任命，激发了一场掏空帝国的大起义。

宣武帝时期将领于忠有个弟弟于景，在武卫将军任上秘密筹划推翻专权的元叉，事情败露后元叉留了于景一条性命，只是将他调任怀荒镇去守边关。于景一肚子不满，将怨气发泄到了官兵身上。六镇官兵的待遇每况愈下，已经怨声载道，于景一来，怀荒的“干群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正光四年（523），柔然攻掠边境，于景组织怀荒镇军民抵抗。官兵们一直吃不饱肚子，此时就请求于景发粮，让大伙填饱肚子有力气打仗。于景用一贯的粗暴态度断然拒绝，愤恨的官兵们一哄而上，将于景杀死，然后干脆宣布造反。

怀荒镇的造反是一起突发性群体事件，事前缺乏组织，事后没有计划，也没有继续什么大动作。但是它激发了六镇官兵埋藏已久的怒吼，在怀荒镇造反以后，其他北方边关纷纷揭竿而起。不仅沃野、高平、怀朔、柔玄各军镇造反，秦州（今甘肃天水）、营州（今辽宁朝阳）等地方州县也旗帜变换。就连北魏南方边界的北荆、西荆、西郢（今

河南地区）三个州也出现了内战烽火。几个月时间，怀荒的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的熊熊烈焰。

这些造反组织的首领不是称帝就是称王，著名的有：秦州的羌族兵士莫折大提起兵称王，死后他的儿子莫折念生进而称帝，统治关中地区。孝昌元年（525），柔玄镇士兵杜洛周在上谷（今北京延庆）起兵，队伍发展迅速，很快拥兵近十万，使得长城东段脱离了北魏的控制。其中实力最强、对北魏威胁最大的是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是姓，拔陵是名）的队伍。沃野镇的官兵在破六韩拔陵的率领下杀死镇将，起兵造反，年号真王，得到长城中西部各镇军民的响应。破六韩拔陵不满足于在边关割据，很快整军向东、向南前进，摆出一副要与北魏争夺天下的态势。他的军队很快东进到怀朔、武川两镇。前者虽然很快被攻克，但军队在后者的推进上并不顺利。

武川镇还有一些不愿意附和造反的官兵。他们有的人是依然忠于北魏朝廷，有的人是不看好造反的前途，有的人是想过安稳的日子，只要日子还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他们都不想动刀动枪，拿命去赌虚无缥缈的蓝图。这样的人在武川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当其他各镇都起义了，武川却没有动静。破六韩拔陵的部将卫可孤很快兵临武川城下。城里很多军民逃跑了，剩下的人就商议抵抗，形成了以军主（队长）贺拔度拔和低级军官（一说士兵）宇文肱二人为核心的骨干力量。

贺拔度拔是敕勒族人，世代在武川镇当兵。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贺拔胜和贺拔岳，都勇猛过人，能左右开弓。其中小儿子贺拔岳尤其出色，贺拔度拔早年曾勒紧裤腰带支持小儿子去洛阳太学读过书，贺拔岳称得上是文武双全。

宇文肱是鲜卑族宇文部落的人。宇文部落被拓跋部落打败后，很多人被安置在北方边镇从军。宇文肱家也是世代在武川镇当兵，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宇文颢、宇文连、宇文洛生和宇文泰。巧的是，宇

文家的四个儿子也都勇猛过人。宇文肱最喜欢的是小儿子宇文泰。宇文泰，小名黑獭，出生于507年，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也不得不和父兄们一道持刀搭弓，上阵迎敌。

敌我实力相差悬殊，贺拔度拔、宇文肱等人觉得困守武川镇只会坐以待毙，只有出其不意对破六韩拔陵的部队发动突袭才有可能侥幸取胜。于是两个人带上儿子和少数人，埋伏在卫可孤的必经之路上。突袭开始了！贺拔家的小儿子贺拔岳一箭就射中卫可孤的肩膀，宇文肱带着儿子冲杀过去，将卫可孤杀死。虽然旗开得胜，无奈敌军人数实在太多，贺拔度拔、宇文肱等人很快就陷入了重围。宇文顼看到父亲宇文肱被敌兵层层围困，奋勇杀入重围，所向披靡，一连杀死了数十名敌兵，救出父亲。不幸的是，宇文顼在撤退时，精疲力竭，被敌人追上杀死。突袭失败，武川还是被起义军占领了。

宇文肱、贺拔度拔摆脱敌人后，会合一处，商议出路。他们决定原地休整，同时派贺拔度拔的次子贺拔胜赶往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向驻扎在该处的北魏官军通报袭杀卫可孤的消息，同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贺拔胜刚走，一队造反的敕勒族骑兵席卷而来。贺拔度拔、宇文肱这支残军猝不及防，贺拔度拔战死，其余人马失散。贺拔度拔的另两个儿子贺拔允、贺拔岳南下五原，追赶贺拔胜去了。宇文肱则带着三个儿子向东逃，前往河北讨生活……

二

北魏对破六韩拔陵的壮大忧心忡忡，调兵遣将要把他消灭掉。正光五年（524），临淮王元彧、安北将军李叔仁先后被破六韩拔陵打败。政府军非但没能消灭起义军，反而给起义军送去了大批军械、兵源，把造反者喂养得越来越大。三朝老臣李崇之前提出过将六镇改为

州县的建议，朝廷如今赶紧照办，并宣布军民、将领待遇与内地相同。可起义已经发生，造反者不会因为这个迟到的改革而束手投降。朝廷又加派李崇去征讨起义军。可怜李崇已经七十岁，虽然有心杀敌，可也无力上阵，所能做的就是勉强阻挡起义军南下而已。不久，广阳王元渊上表弹劾李崇军中长史诈增功级、盗没军资，李崇因负有领导之责而被免去官爵。朝廷改派元渊率领主力，进驻五原。

在关中地区，北魏朝廷信任降将萧宝夤，授权他征讨四方。孝昌元年（525），萧宝夤在马嵬（今陕西兴平西）大破莫折念生。但是北魏军队军纪太差，大肆掳掠城池，还抓居民来当奴婢，把老百姓都逼到造反者的阵营去了。莫折念生虽然战场失利，却在人心上大获全胜。在安定，萧宝夤和造反的万俟丑奴的部队又打了一仗。这一仗，魏军已经打胜了，却因为急于掳掠，自乱了阵脚，遭到起义军反扑，最终大败而逃。魏军勇将崔延伯在此战中阵亡。崔延伯英勇无敌，萧宝夤将他倚为左膀右臂。他死后，魏军士气大受打击。

关中两军拉锯时，接任魏军主帅的广阳王元渊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他主动联络宿敌柔然，和柔然君主阿那瑰结成了镇压六镇起义的联盟。北魏设置六镇，本为防范柔然，如今却和柔然结盟来进攻六镇，真是讽刺。柔然出兵十万，在从武川到沃野的广阔战线上对起义军发动进攻。破六韩拔陵面临阿那瑰和元渊的南北夹击，抵挡不住。二十多万人的起义军遭到元渊包围而投降。主力失败，破六韩拔陵不知所踪。

这场胜利大大缓解了北魏的危急境况。朝廷收复多处重镇，为防止军民降而复叛，将几十万人口迁徙到内地，安置在现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这些百姓就被称为“降户”。他们都是六镇贫苦的百姓和士兵，刚刚经历了一场动乱的洗礼，如今又不得不背井离乡，被逼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官府只负责迁徙降户，却不提供安置和帮助，造成降户们在河北衣食无着，寄人篱下，陷入赤贫境地。原本，起义只是在六镇边关爆发，范围有限，北魏此举无异于将六镇的怒火引到

了华北。降户们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不满势力迅速相融合，到处播撒反叛的种子。元渊眼睁睁地看着朝廷移民，悲愤地感叹，几年征战成果就要付之东流了！

果然，第二年（526）降户鲜于修礼（丁零族人，原为怀朔镇兵）率流民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兵。河北各地的降户马上响应，在河北游荡多时的宇文肱父子四人也参加了起义。原本没被彻底镇压的杜洛周在北方死灰复燃，和鲜于修礼南北呼应。

鲜于修礼率军进攻定州。魏军都督杨津闻讯，抢先进入定州抵抗。针对起义军多是乌合之众的特点，杨津等他们冲到城下后，突然大开城门，主动出击。起义军始料不及，被冲杀得七零八落，溃散而逃。宇文肱和次子宇文连不幸死在定州城下。宇文洛生、宇文泰两兄弟则忍着悲痛随大军南撤到了呼沱河畔（今河北正定一带）。北魏朝廷加派扬州刺史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北上，想趁机彻底解决鲜于修礼，结果被打得稀里哗啦。魏军成了起义军的运输队，送来了大批军械、粮草。起义军败中求胜，迅速扩大为十万人的队伍。

鲜于修礼的队伍壮大起来后，内部矛盾也爆发了。部将元洪业想要降魏，杀死了鲜于修礼。另一个部将葛荣原本是怀朔镇的镇将，出身鲜卑贵族，按说应该附和元洪业，却不愿意投降，杀了元洪业，被起义部众推为新领袖。

葛荣的军事能力远在士兵出身的鲜于修礼等人之上。他继任领袖后，整顿起义军，提升战斗力，和政府军展开了激战，接连斩杀章武王元融、广阳王元渊、河间王元琛，声势大涨。其中，元渊之前镇压了破六韩拔陵，在六镇降户中威望很高。他的死，大大激励了降户们的士气。葛荣乘胜称帝，建立了齐国。六镇余众、底层百姓不断归附，起义军日益增多，号称有百万之众。当时已经降附杜洛周的高欢，就南下投靠了葛荣。日后在政坛上叱咤一时的高欢集团、宇文集团的许多人，当时都汇聚在葛荣的队伍中。不过葛荣起义军毫无纪律

和长远规划可言，占领一地后不从事建设，却到处屠杀掳掠，甚至上演了屠城的惨剧。他们劫掠一地后，就裹胁着物资、粮食前往下一个地方，如此作为，注定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固定政权。

在关中，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万俟丑奴被各路起义军推举为新首领。万俟丑奴的部队气势高涨，将魏军压缩在少数据点。萧宝夤迷茫无所出路，索性在长安称帝，在北方复辟了南齐。关中的局势急转直下。

三

隐藏在六镇大动荡中的年轻人高欢，值得格外关注。透过他的经历，后人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六镇起义前后的历史。

高欢于495年生于怀朔镇。发迹后，他声称怀朔高家出自渤海高氏，是北方汉族豪门之后，并攀附西晋玄菟太守高隐为六世祖、北魏右将军高湖为三世祖，这极可能是高欢自我贴金的谎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动荡不安，世家大族们的谱牒管理不严，亲属迁徙频繁，因此经常出现冒认现象。为了在乱世立足，各大家族同姓之间特别团结。他们对家世血缘也不严格讲求，甚至出现同姓之人萍水相逢就认亲的举动。渤海高氏应该很欢迎高欢这样的风云人物“认祖归宗”。

可事实上，高欢只是一个怎么看都像是鲜卑人的怀朔镇草民，生活在帝国的最底层。在他使用“高欢”这个名字之前，人们都叫他的鲜卑名字“贺六浑”。祖辈的福荫一点儿都没有惠及他。高欢日后解释说，祖父、北魏侍御史高谧因犯法被迁居到怀朔镇，所以高家长期居住边陲，沾染了胡人聚居区的习俗，从语言到生活习惯逐渐与鲜卑人没有什么差别了。高谧生子高树，高树生下了高欢。

日后被迫封为文穆皇帝的高树其实生活非常潦倒，正史的说法是“不事生产”，除了似乎短暂当过底层士兵就没有其他的经历可查了。他连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都无法提供给儿子。高欢年幼时，生母韩氏去世，高家的生活更加混乱。幸亏高欢的姐姐已经嫁给了镇上的狱官尉景，高树就把高欢送给女儿、女婿抚养，高欢就是在姐夫家长大的。摆在他面前最现实、最稳妥的职业就是当兵，扛枪吃粮。当时，六镇士兵都被要求自备武装。高欢想当骑兵，当骑兵就要自带马匹、装甲。可是姐夫家很穷，除了一杆长矛其他都提供不起，高欢就只好扛着长矛入伍，当了一名看守城墙的无名小卒。

高欢长得一表人才，唇红齿白，高颧骨，尤其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这样的帅哥杵在城墙上非常醒目。一天，怀朔富户娄家的小姐娄昭君路过，看到城墙之上的高欢，一见钟情，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这才是我要嫁的丈夫！”女有情男有意，两人很快谈婚论嫁起来。可惜，娄家的长辈实在看不出士兵高欢有什么前途，就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彩礼要求，想逼退高欢。娄昭君就暗地里偷出家里的金银财物，搬到高欢家。高欢转手送回娄家，当作彩礼。二人终结良缘，谱写了一曲千古佳话。娄昭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内助，她顾全大局，为了丈夫的事业能够委曲求全。娄昭君是高欢的发妻，高欢日后发达后也应该立她为正室。但高欢为了与柔然缓和关系，需要娶柔然公主为妻。高欢觉得过意不去，犹豫着要不要这么做。娄昭君知道后，以丈夫事业为重，主动劝高欢不要迟疑。高欢娶柔然公主为正妻后，娄昭君主动腾出正室，让高欢成婚。

娶妻成家后，高欢在娄家的支持下置办了马匹、装备，在怀朔镇当上了一名队主，不久又升为函使，负责在怀朔和洛阳之间往来传递信函。也就是在这个职位上，高欢目睹了洛阳禁卫军的骚乱事件，判定北魏将乱，早早做起了结交豪杰、迎接乱世的准备。在他结交的同乡和底层官兵中，最有名的就是几十年后把江南搅得一塌糊涂的侯景。侯景比高欢小八岁，是世居怀朔已经鲜卑化的羯族人，从小顽劣

不羁，没人敢惹，但是和高欢能对上脾气。侯景身高不满七尺，而且左脚生有肉瘤，连路都走不稳，但却擅长骑射，体力过人，因此被军队特招入伍，逐步提升为功曹史、外兵史等小官职，算是高欢的同事。高欢、侯景等人是六镇中的不安定分子。和大多数为生活而挣扎又温良内敛、排斥动乱的同胞不同，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大动荡是巨大的机遇。

但是在风暴来临之前，高欢只能继续待在社会底层，做一名贫困低微的小军官。一次，高欢去洛阳公干。洛阳令史麻祥送给他一块肉吃。高欢谢过之后，坐下就吃了起来。麻祥认为高欢胆敢坐在自己面前吃肉，而不是谦卑地站着吃，是轻慢自己，竟然把高欢捆绑起来，鞭笞了四十下，可见当时六镇官兵地位之低。高欢背无完肤，踉踉跄跄地回到怀朔，伤口都流脓溃烂了，娄昭君心疼地昼夜服侍。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看低高欢，时任怀朔的镇将段长对高欢说：“你有康济时世的才能！我老了，活不到你发达的时候了。希望你日后富贵了，多多照顾我的儿孙啊。”段长的这番话可能对很多年轻军官都说过，也可能是对高欢特别欣赏，但是高欢将它看作是对自己的高度评价和巨大鼓励，一生不忘。高欢掌国后，追封段长为司空，并提拔段长的儿子段宁为官。期间，高欢做了六年函使，常年奔忙在北方各地，进出洛阳，逐渐开阔了眼界。

六镇起义爆发后，怀朔镇没有出现叱咤一时的领袖人物。当地的起义形势不太火热，高欢就和同伴尉景、段荣、孙腾、侯景等人在孝昌元年（525）投到杜洛周麾下。他们不是为了讨生活，而是为了寻找飞黄腾达的机会。可是，高欢发现杜洛周并不是一个能够称王称霸的领导。既然领导没能耐，高欢就琢磨着取而代之，夺权自己干。杜洛周提前发觉了夺权计划，派兵捕杀高欢等人。高欢只好拖家带口地逃亡。他骑着家里唯一的一匹马，娄昭君抱着儿子和女儿骑在牛上，跟在后面。后有追兵，牛又跑不快，高欢心焦地骑一段路，就停马等妻儿跟上来。小儿子高澄途中几次落牛，高欢心急如焚，最后搭弓要

射死儿子，吓得娄昭君在牛上大喊大叫。高欢弓都拉开了，随后逃亡的段荣及时赶到，将高澄救起，和高欢一家一同脱身。

离开杜洛周后，高欢等人投奔如日中天的葛荣。但是高欢认为葛荣也不是能成大事的领袖，毅然脱离，带着一帮人西投尔朱荣。

尔朱荣是羯族人，和十六国后赵的石勒是同族。尔朱荣的部落投降拓跋鲜卑较早，被安置在秀容（今山西忻州），就在此繁衍生息。尔朱荣家族世代为酋长，稳步积累实力，到北魏末年已经发展得牛马漫山遍野，要依照毛色不同放牧在不同山区的地步了。六镇起义带动华北地方动乱不止，尔朱荣趁机散家财“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组织起数千人的骑兵队伍与起义军为敌。短短几年中，尔朱荣成了北魏朝廷稳定山西地区的主要依靠力量。朝廷虽然对尔朱荣有戒心，但不得不任命他为大都督，负责山西事务。尔朱荣就以晋阳（山西太原）为老巢，建立了根据地。

高欢的旧相识刘贵早已投入尔朱荣麾下，竭力向他推荐高欢。不过尔朱荣看到高欢时，正是高欢两经流亡、形容憔悴的时候。尔朱荣对高欢的“尊容”大失所望，没有重用他，只是安排他干些杂活。一次，尔朱荣在马厩里看到一匹暴烈的劣马，想测测高欢的本事，就叫他去修剪马鬃。不想，高欢是驯马高手，很快就把劣马驯服并将马鬃修剪得特别漂亮，完成任务后高欢还对尔朱荣说：“驭人同养马是一样的道理。”

尔朱荣对他刮目相看，拉他谈论时事。两人越谈越投机，从中午一直聊到半夜才停歇。高欢建议尔朱荣：“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宠臣专权，朝政不行。明公雄才武略，乘时清帝侧，霸业举鞭可成。”高欢建议尔朱荣乘朝政大乱的时候起兵，推翻北魏朝廷自立，这个建议正中尔朱荣下怀。从此尔朱荣十分看重高欢，让他参与军政大事。而高欢一众，也将前途绑到了尔朱荣的战车上。

河阴之变是如何酿成的

—

胡太后第二次临朝后，和儿子元诩的关系很快恶化。元诩年纪越来越大，不甘心做有名无实的君主，又对母亲淫乱宫廷很厌恶。他想培养亲信，可胡太后不希望儿子有所作为，找个机会将儿子的亲信都杀死了。

武泰元年（528），元诩的妃子生下一个女儿。胡太后竟然宣称生的是一位皇子，还大赦天下。元诩那时已经十八岁，对母后伤害帝国的种种行径痛心疾首。现在，他再也不能忍受。元诩计划驱逐朝廷中的奸佞，限制母亲。可是环顾朝廷，元诩都没有可以信任的大臣。缺乏经验的元诩竟然选择借助外藩将领来清除母亲的势力。

被选中的外藩将领就是晋阳大将尔朱荣。如前所述，尔朱荣是在镇压六镇起义过程中崛起的地方实力派。经过两三年的征战，尔朱荣基本镇压了今山西地区的起义，成为黄河以北最强大并且忠于朝廷的地方势力。尔朱荣的军队人数不满一万人，但个个能骑善射，又有高欢、贺拔兄弟等干将指挥，真所谓是精兵强将。胡太后对他也有所忌惮，虽然任命他为大都督，但把他的力量局限在山西地区。尔朱荣曾上表，主动要求去河北镇压六镇起义，胡太后没有答应——这一点可能让元诩觉得尔朱荣会站在自己一边。而接到元诩向洛阳进兵的密令后，尔朱荣马上整军南下。当尔朱荣大军到达上党时，元诩却犹豫起来，命令他就地驻扎。

元诩优柔寡断之间，消息早已经泄露。胡太后联合情夫，残忍地将亲生儿子元诩毒死，年仅十八岁。胡太后此举不仅残忍，而且也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麻烦。皇帝暴亡，朝野都知道是谁干的。胡太后执掌朝政的法律依据就是因为她是皇帝的生母。元诩死时还没有儿子，这就为胡太后继续执掌朝政设置了障碍。按理，元诩死后，不久前向天下宣布降生的“皇子”应该即位为新皇帝。事到如今，胡太后不得不宣布所谓皇子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女儿身。她选择元诩的侄子、年仅三岁的元钊为新皇帝，想平息来自北方的进攻。胡太后将尔朱荣想得也太简单了。尔朱荣早在起兵之时，就想做第二个董卓了。皇帝的死只是给他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而已。他根本就不承认洛阳的新政府，反而通告天下要追查元诩的死因。

尔朱荣的精兵很快逼近黄河北岸，洛阳掌权的徐纥等人不以为意，认为：“尔朱荣是马邑小胡，人才卑劣，自不量力来冒犯天颜，简直是自取灭亡。我们只要发动禁卫将士，就足以一战。尔朱荣不远千里挥兵南下，兵老师疲，我们不用做什么准备，以逸待劳就能打败他们。”胡太后采纳了情夫的意见，派遣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派遣郑俨的族兄弟郑季明、郑先护二人驻守黄河河桥，派遣武卫将军费穆驻守黄河渡口小平津，采取守势。

尔朱荣想做董卓第二，却比董卓有头脑得多。他深知，要想在政坛上有大作为，政治永远比军事重要。四月十一日，尔朱荣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拥立元诩的叔叔、长乐王元子攸登基称帝，和洛阳的元钊对峙。这是一招好棋，一下子让尔朱荣从叛乱者跃升为“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正义之师。

其实早在起兵之初，尔朱荣就开始物色政治上的盟友。他派侄子尔朱天光潜入洛阳。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在朝中任直阁将军。直阁将军属于近卫军官，胡太后竟然让尔朱荣的堂弟出现在朝堂之上，可见政治敏感全无。是尔朱世隆向尔朱天光推荐的长乐王元子攸。原因有二：第一，元子攸是彭城王元勰的第三子，受到胡太后一党的排

挤，和胡太后等人有矛盾。第二，元子攸长期担任禁卫军将领，在朝廷中有相当的根基。不仅有一帮禁卫军官兵支持他，清流世族和文官集团也拥戴他，元子攸是个不错的人选。他既有当新皇帝的资格，又可以让尔朱荣集团争取到洛阳禁卫军和世家大族们的支持。

于是尔朱天光秘密会见了元子攸，将尔朱荣的橄榄枝传递了过去。元子攸欣然应允，带着家眷跟着尔朱天光逃出了洛阳。

尔朱荣有心改立新君，但人选还不确定。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择立君主有一个传统：将所有的候选人铸铜像，请示天意，如果铜像铸成说明此人受命于天，可立为君；如果铸像不成，则上天不认可此人。尔朱荣挑选了六位王爷作为候选人，一一铸像，只有元子攸的铜像一举成功，尔朱荣这才拥立他为皇帝。元子攸就是孝庄帝，他封尔朱荣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等，晋爵太原王。

孝庄帝登基后，局势就明朗了。胡太后立的小皇帝元钊原本就不为朝野所接受，人们普遍觉得他即位没有合法性。听说元子攸登基后，原本就与胡太后离心离德的洛阳禁卫军官兵、清流入官和世家大族，纷纷争相出迎，向新皇帝表示效忠。早在元子攸登基的当天，镇守黄河的郑先护、费穆等人就主动归附，导致洛阳门户大开，大都督李神轨不战而退。消息传到洛阳，禁卫官兵四处溃散。仗不用打了，尔朱荣兵不血刃就提前锁定了胜局。

尔朱荣能大获全胜，在洛阳的族弟尔朱世隆等人自不用说，洛阳禁卫军的倒戈也起了决定性作用。领军将军元鸢是禁卫军的最高长官，暗中投靠了尔朱荣。尔朱荣起兵前后，密探细作频繁往来于晋阳和洛阳之间，胡太后等人都被蒙在鼓里。

胜负已定后，郑俨和徐纥两个男宠跑得比谁都快。郑俨逃归乡里，想在地方起兵，结果被部下所杀；徐纥逃到江南归降萧衍，因为好慕权利、奴颜媚骨，为时人所斥。众叛亲离的胡太后在绝望中要重

新出家为尼，还强迫宫中所有嫔妃随自己一起削发出家。她逃入佛寺，寄希望于佛祖。洛阳的皇室贵族和文武百官群龙无首，第二天就拿着皇帝玺绶、摆出皇帝法驾，公开出城去迎接新皇帝元子攸。北魏朝野承认了元子攸，也就承认了尔朱荣造反的胜利果实。到此为止，尔朱荣起兵得以平静收场，但平静之中酝酿着波澜。

二

尔朱荣年轻时，作为人质在洛阳待过一段时间。武卫将军费穆当时就和尔朱荣认识，如今归降尔朱荣，两人久别重逢，都很高兴。

费穆不知是为了表忠心，还是发泄因为“文武分治”导致的对文官集团的不满，给尔朱荣出了一个残忍的主意：“您的兵马不到万人，如今轻易长驱直入洛阳，没有战胜之威，恐怕不能长久服众。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旦知道您的虚实，必然会产生轻侮之心。如果不‘大行诛罚’，树立亲信，恐怕等你北归之后洛阳就会发生变故。到时候，您就前功尽弃了。”费穆所说的百官“轻侮之心”指的是文官集团对军官们的轻视，尔朱荣久居军阵，自然感同身受。他对费穆的意见很认同。面对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胜利，尔朱荣老觉得不踏实，对自身实力不自信。

于是尔朱荣私下对部将说：“洛阳人物繁盛，骄侈成性，不除掉他们恐怕难以控制。我想趁着百官出迎新皇帝之时，‘悉诛之’，如何？”尔朱荣已经把费穆的“大行诛罚”发展为“悉诛百官”了。部将慕容绍宗反对说：“我们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太后无道，失去了民心。主公以正义之师入洛阳，突然要诛杀百官，不是良策。”尔朱荣没有采纳慕容绍宗的意见，还是决心通过大开杀戒来立威。

元子攸登基的第三天，尔朱荣以“祭天”为名，命令洛阳百官到河阴行宫的西北集合参加。官员们陆续赶到河阴。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大臣们越聚越多，既没有人出面组织，也谈不上任何祭天的准备工作，反而有骑兵横刀立马、气势汹汹地围绕着群臣。

宣称已经出家的胡太后被从寺庙中搜了出来，连同她立的幼帝元钊一道被尔朱荣的骑兵押送到了河阴。胡太后看到杀气腾腾的尔朱荣，“多所陈说”，试图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尔朱荣没听几句就拂袖而去，下令把帝后扔到黄河里去。于是士兵们把胡太后和元钊装入竹笼，溺死在了黄河里。

接着，尔朱荣把宗室诸王集合起来，开始训话。他大声追问王爷们“天下丧乱”“明帝卒崩”的原因，诸位王爷无言以对。尔朱荣直言：“这都是你们贪腐暴虐，不相匡弼导致的恶果！”随即，他挥手示意屠杀在场的所有王公。高阳王兼丞相元雍（炫富的那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元恒芝、东平王元略、广平王元悌、常山王元邵、北平王元超、任城王元彝、赵郡王元毓、中山王元叔仁、齐郡王元温等人遇害。其中，东平王元略还是尔朱荣的内侄。元略平日自诩为皇亲国戚，又是清流大臣，对赳赳武夫的姑父尔朱荣很轻慢，所以虽然是尔朱荣的近亲，也遭到无情杀戮。

宗室王公被杀，引起了云集大臣们的恐慌，场面出现了骚动。尔朱荣又指挥外围的骑兵，对手无寸铁的文武百官展开了屠杀。顿时，河阴的土地上尸体相陈，血流成河。遇害的官员人数在两千人左右，超过京官人数的一半，且都是有资格参与迎驾和祭天仪式的高级官员。被乱兵杀害的大臣，不仅有素来为武人厌恶的众多世家大族子弟和奉行“文武分治”、鄙视虐待武人的文官，还有很多追随元子攸、对尔朱荣有功的大臣。一时间，刀劈斧砍，乱箭交加，上至权贵，下至清官，不分忠奸，无一幸免。河阴之地，血流成河。史称“河阴之变”。

有一百多位“祭天”迟到的大臣，被骑兵包围起来。在士兵们举刀正要杀戮、大臣们伏地求饶的时候，有将领高喊：“你们谁能写禅文，可以饶他一命。”所谓的禅文，自然是让北魏皇帝禅让天下给别人。当时在包围圈中的陇西李神俊、顿丘李谐、太原温子升等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名声在外，但不愿当乱臣贼子，耻于从命，趴在地上不吭声。御史赵元则很怕死，连忙爬出来说自己能写禅文。于是尔朱荣的将士授意他写了一篇北魏国运已绝、尔朱荣堪当大任的文章。

在屠杀之前，尔朱荣有选择地保留了一批大臣，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大开杀戒。元顺是个耿直忠心的大臣，在万马齐喑的大环境中多次死谏。尔朱荣很赞赏他的品格，事先派人传话给他：“大人留在洛阳办公，不必去祭天。”一些曾经对外地官兵有恩或者为武人鸣不平的官员，事先也得到了关照。江阳王元继对尔朱荣之前多方照顾和提携，被告知留在洛阳；大臣山伟曾经建议提高北方将士的待遇，被尔朱荣的士兵们认为是好人，屠杀当天也特意被安排留在洛阳值班。

还有一个容易被遗漏的史实是：部分大臣参与了对同僚的屠杀。这些人主要是不掌权的疏远宗室和洛阳的禁卫军将领。由于宗室繁衍及朝廷对宗室成员的恩赏随着血缘的疏远而递减，越来越多的“皇亲贵胄”被排除出权贵行列。那些血脉疏远的元氏宗室生活并不如意，备感失落和嫉妒。最终，他们加入尔朱氏的阵营，参与骨肉残杀。宗室元禹早在尔朱荣起兵前就投入其麾下，参与了大屠杀的酝酿和实施；并州刺史元天穆也是宗室，老早就和尔朱荣结为异姓兄弟，元天穆年纪大，尔朱荣称他为兄，但在政治上元天穆紧跟尔朱荣。尔朱荣起兵后，并州的政务就全权委托给了元天穆。此外，领军将军元鸢也是宗室，投靠尔朱荣后，在大屠杀当天还和尔朱荣一同登上高冢俯瞰血淋淋的屠杀现场。

在不远处行宫中的孝庄帝元子攸在这场屠杀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和尔朱荣一样，元子攸也是轻而易举获得胜利，当上了皇帝。他同样不自信，害怕日后被人推翻，所以赞同用杀戮来立威——他也有仇家，也有杀心。然而元子攸万万没想到，一场有限的诛罚，却恶化成了一场残忍的大屠杀，而且连忠于自己的大臣也被尔朱荣杀了，元子攸始料莫及，追悔万分。元子攸知道：用血腥屠杀来立威，非但对帝王的威望不利，反而会动摇人心，危及政治的根本。

当声声惨叫传来时，元子攸和哥哥彭城王元劼及弟弟霸城王元子正一起走出帐外，正要看个究竟。迎面走来二三十个持刀武士。元子攸强装镇定，喝问来者。冲过来的武士借口护驾，几个人抱起元子攸就往帐里走，将他紧紧看管起来。剩下的人乱刀齐下，将彭城王、霸城王杀死，这些武士也是尔朱荣派来的。至此，元子攸命悬一线，就看尔朱荣的意思了。

眼看着王朝很可能要灭亡在自己手中，元子攸恨自己助纣为虐，又担心自身安危。他不是一个懦弱无能、束手等死的人，于是写了一道诏书，买通武士传递给尔朱荣。元子攸在诏书中屈身说自己对帝位无所留恋，如果尔朱荣再紧紧相逼就将帝位传给尔朱荣，如果尔朱荣想保存北魏社稷就听任尔朱荣掌权。同时，元子攸又搬出“天意”“天命”来，提醒尔朱荣之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天意使然，不要逆天而为。这番话柔中带刚，以退为进，把球踢给了尔朱荣。

清洗了大臣，草拟了禅让诏书，皇帝元子攸也服软了，尔朱荣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会不会灭亡北魏呢？

龙椅前的尔朱荣

—

尔朱荣屠戮群臣的本意是立威，要杀死一批老人换上亲信，可随着鲜血越流越多，他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北魏的中央政府在河阴之变中基本上被全部摧毁了。面对唾手而得的洛阳，尔朱荣心想：为什么我不自己当皇帝呢？他的部下已经在高呼：“元氏既灭，尔朱氏兴！”都督高欢更是公开劝尔朱荣称帝。

尔朱荣决定为自己铸铜像，看看天意如何。第一次，没成功；尔朱荣又铸了一次，还是没成功；尔朱荣寄希望于第三次，依然没成功。尔朱荣还是想当皇帝，就第四次铸铜像，还是失败了。“难道天意不让我当皇帝”，尔朱荣不甘心，又让平日最信任的阴阳术士占卜吉凶。结果，占辞说：“今时人事未可。”铸铜像不成，占卜又不吉，尔朱荣灰心丧气了。部将贺拔岳于是从容劝谏说，天不亡魏，主公登基还为时尚早，不如先尊立元子攸。

在尔朱荣称帝问题上，以高欢为首的怀朔集团和以贺拔岳为首的武川集团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虽然都栖身尔朱荣麾下，但都想独霸一方，追逐更大的利益。高欢等人路子野，一直唯恐天下不乱，怂恿尔朱荣登基是想把已经够乱的局势搅和得更乱，方便自己浑水摸鱼；贺拔岳等人走的是中规中矩的路子，希望尔朱荣能平稳发展壮大，自己随着尔朱荣的发达而发达，然后再想独立或者称霸的事情。这两人此时就已经暴露出了性格和战略上的差异，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尔朱荣在贺拔岳等人的劝说下，决心退回来，继续当北魏的“忠臣”。贺拔岳趁热打铁，马上指出高欢劝尔朱荣当皇帝，居心叵测，应该杀高欢以谢天下。高欢那一帮伙计和其他将领赶紧替高欢说话：“高欢是个粗人，言语难免不周全。如今四方多事，正是用人的时候，请主公放过高欢这一回，以观后效。”尔朱荣顺水推舟，放过了高欢。

打定主意后，尔朱荣来到元子攸的营帐，“叩首请死”。元子攸自然不会让他死，相反，他热泪盈眶地扶起尔朱荣，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尔朱荣就再一次自我批判，说了许多效忠朝廷、死而后已的话。最后，君臣皆大欢喜，约定“起驾回宫”。但是屠杀给元子攸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创伤，难以抚平，他和尔朱荣的政治同盟已经终结了。

走到洛阳背面的邙山，尔朱荣看着洛阳城阙，心虚起来。城中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人被杀，笼罩在一片愁云凄雨之中。悲痛的气氛让尔朱荣心怀畏惧，不敢上前。投靠的禁卫军武卫将军泛礼苦苦相劝，尔朱荣这才答应入城。入城后，尔朱荣及其部队连进入宫殿都全副武装、骑马进出——可见他们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尔朱荣部队怕洛阳官民，洛阳百姓更怕涌进来的胡骑。大屠杀消息传来，人们惊骇万分。铁骑入城后更是谣言四起，有的说尔朱荣要迁都晋阳，有的说胡骑要大掠洛阳城，还有的说朝廷要强迫洛阳百姓迁往北方。只有少数百姓闭门不出，多数人选择离城而逃。侥幸躲过大屠杀的文武官员更是如惊弓之鸟，携家带口地逃亡。那个受到尔朱荣尊重的元顺，事先得到通知留在洛阳，但听到大屠杀的消息后还是吓得离城而逃，在途中被乱军所杀。“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贵室豪家，并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洛阳城的人口很快只剩下一二成。

元子攸回宫，发现官衙和宫殿都空空如也。皇帝进宫时，只有值班的散骑常侍山伟一个人跪拜迎接。

河阴之变的消息传到外地，郢州刺史元显、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彧、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元志等宗室吓得魂飞魄散，一溜烟地都向南方的梁朝投降。他们不是携家带口逃亡南方，就是割据辖区、率领军队集体倒戈。梁武帝萧衍一下子收获颇丰，笑得合不拢嘴。而北魏对南朝的防线全线崩溃，已没有成型的防卫可言。

尔朱荣急需恢复洛阳的秩序、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并镇压北方越燃越旺的起义烈火和南方梁军的侵扰。大屠杀的善后工作千头万绪，繁重异常！

二

既然要保存北魏王朝，就要聚集在元子攸的旗帜下，维护朝廷的权威。尔朱荣入洛阳后，在明光殿主动就河阴之变请罪，发誓对朝廷没有二心。元子攸当然没有治尔朱荣的罪，拉着他的手说自己从不曾起疑心。

接着，尔朱荣调整了中央官员。江阳王元继升为太师、司州牧，居百僚之首；尔朱荣的死党元天穆受封上党王，实际负责行政。尔朱荣还拉了李延实、杨椿则进入中枢要津，这两人都是元子攸的亲信。此外，北海王元颢之前领兵在河北镇压起义，尔朱荣想继续重用他。不想，元颢已成惊弓之鸟，没几天就弃军南逃，投降萧衍去了。此后，尔朱荣只好无奈地亲自领兵去镇压河北起义。将军长孙稚在南方边界领军，尔朱荣就将南方事务继续委托给他。

骨干确定后，具体办事的中下级官员比较难找。大屠杀之后，官员缺额实在太多，而大多数幸存者对尔朱荣政权避犹不及，宁愿隐居、出家也不愿出来当官。尔朱荣找不到足够的人选，只好将秀容部

落的大批军官任命为京官，填补河阴屠杀留下的官缺。跟随他起兵的官兵们，无不加官晋爵。尔朱荣又让元子攸下诏，让地方官员访求人才，凡有在德行、文艺、政事任何一方面有所长者都可推荐为官。推荐三人以上的县令、太守、刺史可得奖赏，完不成任务的要降官。如此一来，不少行伍士卒和乡间豪强都被拉上朝堂，得到高位。“起家为公卿牧守者，不可胜数。”正常的人事制度和升迁、先前的门第才学等都被抛弃了，世家大族和门阀清流们更加耻于和尔朱荣等人为伍。

元子攸对狗尾续貂、拉人当官的行为很厌恶。一次，尔朱荣举荐了一大批武士担任河南诸州的地方官，元子攸没有批准，双方闹得不太愉快。元天穆劝元子攸说：“大将军有大功，就是将全天下的官属都替换一遍，恐怕陛下也无法违抗。如今，大将军只是推荐数人而已，陛下何必生气？”元子攸想想也对，谁让自己是无权无势的傀儡皇帝呢？

对于河阴的遇害者，尔朱荣大肆追赠，对其家庭进行安抚。尔朱荣上书，将无上王追尊帝号，遇害的诸王、刺史都赠三司，其余三品以上官员都追赠尚书令或者尚书仆射，五品以上官员都追赠地方刺史，六品及其以下（包括少数遇难的百姓、仆人）都追赠太守。死者无后的，都允许家族过继，由过继之人袭封官爵。

经过这番大刀阔斧的整顿，洛阳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北魏的国家机器也慢慢恢复运转。

洛阳稳定后，尔朱荣返回晋阳，遥控北魏朝政。一方面，他在洛阳还是感到心虚，有危机感；另一方面，河北的葛荣势力迅速扩张，需要尔朱荣倾注全部心力镇压。

一年前（527），葛荣率军打破信都（今河北冀州），围攻邺城。元子攸即位后，葛荣又一次围攻邺城。这一次，起义军号称百万，创

除其中不少随军移动的流民，有战斗力的将士也有十万人。

尔朱荣能调动的只有侯景等部的七千骑兵，他毅然率领这支小部队东进救邺。为了赶速度，尔朱荣下令每人都备副马，两匹马轮着骑，急速向邺城杀去。葛荣侦察到尔朱荣的兵力后，自认为胜券在握，对部下说：“多带长绳，等尔朱荣到了把他们绑起来就行了。”他将百万大军在邺城城下列阵数十里，企图仗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将尔朱荣的部队围歼。可惜，起义军人数太多，列阵范围过大，葛荣事实上并不能指挥全部部队，只能调动少数亲信部队。而起义军缺乏训练，松松垮垮，大敌当前还乱糟糟的。尔朱荣把部队分成若干股，每股几百名骑兵，在山谷间到处扬尘鼓噪，产生马蹄阵阵、尘土飞扬的效果，使起义军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人、将从何处进攻。在气势上，尔朱荣就先胜一筹。他又下令本次作战不以斩首多少计功，只以最后结果论功。秀容骑兵每人带一根棒子，见人就打，不准下马斩敌首级，而是以冲垮敌军为目的，避免对方发挥出数量优势来。

决战开始了，尔朱荣身先士卒，带头冲入敌阵。侯景领着数千铁骑紧随其后，左冲右突，来往猛击，竟将几十万起义军冲散。起义军乱不成形，葛荣紧急聚拢亲信部队，试图扭转败局。可惜，尔朱荣抢先集中所有骑兵，向葛荣围攻过来。葛荣力不能敌，被侯景生擒。侯景因此崭露头角，战后被封濮阳郡公，出任定州刺史。主帅被擒，起义军全线崩溃，全部投降。葛荣被押到洛阳，在“献俘仪式”后被斩首。他的死，标志着六镇起义最大的一股烈火被扑灭。元子攸为此改年号为永安。

尔朱荣大胜后，又面临着如何处理俘虏的问题。投降的起义军将近一百万人，而尔朱荣的部队只有七千人，不可能看守、不可能杀戮，连押送遣散都成问题。弄不好，俘虏们会再次起义。尔朱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先高调下令将起义军就地遣散，任由他们携带亲属、财物四散回家，去处一概不问。于是，俘虏们大喜，一朝散尽。暗地里，尔朱荣在百里之外埋伏了官兵，堵住了各条路口。俘虏们络绎不

绝而来，来一群被尔朱荣的官兵截住一群，集中起来安置。尔朱荣挑选其中的精壮，对原来的首领量才录用，把降兵编入自己军队。如此一来，尔朱荣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俘虏难题，还几何倍数地壮大了部队。

浩浩荡荡的降兵队伍中，就有宇文泰。宇文泰正好二十出头，身材健壮，属于优质兵源。尔朱荣将这些降兵带回根据地晋阳，编入骨干队伍。巧合的是，宇文泰被编入了贺拔岳的麾下。宇文、贺拔两户武川的旧交，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又奇迹般地会合到了一起。

北方刚安定了一些，南方又裂开了一个大窟窿。北魏宗室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和部分大臣投降梁朝后，梁朝决定以敌制敌，扶植这些人回北方“复国”——当然是梁朝的藩属国。邺城大战后的第二个月，梁武帝萧衍以北海王元颢为魏王，派将军陈庆之护送他北伐争夺北方。第二年（529），梁朝军队在中原腹地连战连捷，四月，元颢在睢阳城南称帝。五月，梁军攻克洛阳东部重镇荥阳。元子攸慌忙渡过黄河逃到上党，洛阳随即被元颢占领。元颢进入洛阳，改元建武。局势万分危急，尔朱荣果断到上党勤王，劝说元子攸摆出返回洛阳的姿态。尔朱荣在十几天时间里聚集军队，在黄河北岸对梁军构成巨大压力。黄河决战，尔朱荣战胜梁朝军队。元颢被迫逃亡，在临颖（今河南漯河市北）被县卒江丰斩首。元子攸重新回到洛阳。尔朱荣又立了“再造朝廷”的大功。

关东基本安定后，尔朱荣着眼尚在沸腾的关中。尔朱荣任命侄子尔朱天光为统帅，以贺拔岳为左大都督，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西进讨伐万俟丑奴。时任步兵校尉的宇文泰跟随贺拔岳进入关中。尔朱天光等人很快清剿了万俟丑奴的叛乱。尔朱天光留镇关中，贺拔岳和侯莫陈悦则分别做了泾州刺史和渭州刺史。宇文泰因为奋勇杀敌军功不小，升为征西将军，代理原州事务。

随着一连串的胜利接踵而来，尔朱荣牢固控制了北魏政权。镇压

了葛荣起义后，元子攸封尔朱荣为大丞相、太师、太原王，封邑由二万户增加到十万户。打退梁军后，元子攸加封他为天柱大将军，封邑又增至二十万户。尔朱荣依旧盘踞在晋阳，不时派人往来洛阳。每次尔朱荣的使节到洛阳，不论身份贵贱，朝廷权贵见之莫不倾靡。尔朱荣的权势达到顶峰。

尔朱荣再次萌发了篡国称帝的心思。但北魏内乱不断，民怨沸腾，限制了尔朱荣野心的实现。尔朱荣在战场上连战连捷，在内政和经济建设上却罕有建树。北魏经受多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但尔朱荣一味穷兵黩武，不事生产，弄得是民不聊生，人心惶惶。

他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其弟尔朱仲远坐镇徐州，在东南一带作恶多端，杀人如麻。为了捞取不义之财，尔朱仲远常常诬陷达官显贵和豪门大族谋反，横加残害。他抄没他人府邸，将男子杀害后投入河流，私吞其家产。因此家破人亡的人家，不可胜数。徐州百姓和地方官恨他入骨，将他比作豺狼。尔朱家的其他人也都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干扰朝政。久经动乱的北方大地，黑暗非但没有散去，反而更加深重。尔朱荣权势是稳固了，声望却依旧在低位徘徊。

想必尔朱荣自己也明白实情，所以迟迟没有篡位。

战神传说

—

南北朝中期，南方的梁朝出了一位不得不说的“百战战神”。他身经百战，以一敌十、以一敌百甚至是以一敌千，从来都是以处在绝对劣势的兵力取得辉煌的胜利。这位战神贯穿了梁朝和北魏的恩恩怨怨，也影响了北魏末期的历史。在他死后，对他战绩的称颂和追思伴随着质疑的声音，延续了上千年。

他，就是陈庆之。

陈庆之，义兴国山（今江苏宜兴市）人，出生于普通人家，属于庶族子弟。南朝极端讲求门第，一个庶族子弟要想在政治上飞黄腾达难于上青天，就连进入仕途也是困难重重。陈庆之就面临着入仕无门的困境。好在他有一门吃饭的手艺：下围棋。巧的是，大臣萧衍是铁杆围棋粉丝，于是陈庆之就在萧衍身边找到了一份工作：陪下棋。更巧的是，萧衍后来夺权当了皇帝，建立了梁朝，陈庆之顺带着进了皇宫成了皇帝身边的人。萧衍任命他做了宫中的主书，即管理文书的小官。陈庆之总算是实现了自己入仕的梦想，不过他的工作内容不变，还是陪萧衍下棋。

萧衍很喜欢陈庆之。倒不是因为他发现了陈庆之有什么杰出的才能，而是陈庆之是萧衍众多“棋友”中最能熬夜的人。萧衍这个人嗜棋到了通宵达旦的程度，陪他下棋的人必须要随叫随到，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能休息，而且还要很投入、很认真地输棋。一般人做不到这一

点，不是时间久了昏昏欲睡，就是一不小心赢了萧衍。只有陈庆之例外，他可以做到几天几夜不睡觉，只要萧衍还要下棋，就能随时投入战斗。所以萧衍很信任陈庆之。

可惜的是，皇帝的欣赏和信任并没有给陈庆之带来任何实质的好处。陈庆之的出身基本决定了他的前途。即便是萧衍褒奖他的诏书，开头也写道：“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萧衍还是把他当作身边可以说上话、可以相信的陪客而已。

陈庆之身体素质也有问题。他十分文弱，力气很小，拉弓射出去的箭连纸张都穿不透，骑马也很困难。这样的身体素质放在世族子弟身上，可能不会影响仕途，该统兵的继续统兵，该当将军的还是当将军。但对要真刀真枪杀出政绩来的庶族寒门来说，陈庆之这样的体格就惨了，连上战场杀敌立功升迁的可能性都没了。他似乎只能在宫中陪萧衍下棋，了此一生。事实上，陈庆之从青年陪到中年，从满头黑发陪到头发花白，一晃就过去了二十年。

不过，关注陈庆之的人往往忽视了围棋的重要作用。下棋和办事，甚至和做人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棋下好了，很多道理也就明白了。陈庆之二十年的陪棋经历，其实也是个人的修炼过程。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与其埋怨社会的不公和下棋的无聊，还不如将它当作一种磨砺。陈庆之就一边潜心修炼，一边等待机会的到来。

525年，陈庆之终于得到了一次表现的机会，已经四十二岁的他生平第一次要领兵打仗去了。

这一年，北魏的徐州刺史元法僧纳土归降，请南朝前来接收。能够不战而得之地，萧衍很高兴，决定派官兵去接收。他要在派遣的将领中掺入自己信任的人，于是就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随同大部队去接收徐州。这个“武威将军”属于杂号将军，是南北朝时期众多滥封的将军名号之一，在军队序列中只算是中等偏上的军衔。尽管地位

不高，不过对陈庆之来说，却是质的改变——他终于获得了施展真正才华的舞台！

二

遗憾的是，接收徐州的行动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陈庆之的第一次带兵和平收场，并没有打成仗。自然，陈庆之也没有任何可以发挥才能的机会。

但很快，陈庆之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萧衍派儿子豫章王萧综接管徐州。考虑到陈庆之有接收徐州的经验，就任命他为宣猛将军，领兵两千护送儿子去上任。萧衍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所以没有配备更多的军队和将领，让陈庆之一个人挑大梁。他可能想：不就是赴任嘛，又安全又轻松，让小陈去，绰绰有余！

萧衍看错了。北魏对徐州这块战略要地叛降南朝非常在意，不能坐视南朝派王子和部队接管。北魏宗室元延明、元彧奉命领兵两万，前来“迎接”萧综赴任。他们抢先在陟口一带扎下营寨，以逸待劳，准备痛击梁军。两千人对两万人，而且是毫无经验、看似文弱的陈庆之对北魏铁骑，梁朝还能接管徐州吗？

结果是，陈庆之“棋”开得胜，以少胜多，将两万魏军杀得溃不成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简单的一个字：打！正面进攻。

关于战斗，人们往往附加了许多累赘的东西，比如各种战略战术、各种策略和小动作，却忘记了决定战斗胜负最原始的要素：勇敢。正面的、勇猛的、漠视死亡的厮杀永远是影响战斗结果的关键因

素，其他的都是浮云。对于勇猛的军队来说，各种计策能够锦上添花；对于懦弱的军队来说，再多的策略和伎俩也不能给他们带来胜利。去繁就简，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有用的。陈庆之深谙此理，得知前方有敌人后，督促军队逼近敌人，发动正面猛攻。在一通鼓之间，陈庆之的两千人马竟然击溃了两万魏军，取得了难得的胜利。

胜负已定，梁军顺利接管徐州。不想，陈庆之护送的豫章王萧综却叛变了！原来，萧综的母亲吴氏原是南齐末代皇帝萧宝卷的嫔妃，萧衍篡位后才跟了萧衍。和萧衍在一起七个月后，吴氏就生了萧综。萧综和其他人一样，怀疑自己是萧宝卷的孩子。据说，萧综曾经悄悄挖开萧宝卷的坟墓，把自己的血滴在萧宝卷的骨头上，血渗了进去。萧综确信自己就是萧宝卷的骨肉，觉得自己现在是认贼作父，连夜就带了几个亲信投奔魏军大帐去了。主帅临阵投敌，梁军阵脚大乱。陈庆之只好斩关后退。

虽说接管徐州行动失败，陈庆之却一战成名，让南北双方都刮目相看。

两年后（527），陈庆之参加了梁军的一次大行动：进攻南北方拉锯的据点涡阳（今安徽蒙城）。他依然当不了主帅，而是众多跟随主帅曹仲宗出征的部将之一。萧衍发现陈庆之的军事才能后，就放他去前线历练。出于信任，萧衍给了陈庆之象征皇帝亲临的“节”，可以假节代行部分皇帝职权。所以陈庆之的角色类似于部将兼监军。

北魏很重视这场战斗，派遣宗室元昭等人领军数万迎战，先头部队赶到驼涧。两军相遇了，如何对战？陈庆之建议正面猛攻，同事韦放认为敌人的先头部队都是精锐，不易取胜，反对正面进攻。陈庆之坚持自己的风格，宁愿带本部人马进攻。他率领的人马有多少呢？两百人。陈庆之带领部属二百人，连夜奔袭驼涧，在夜幕中一举击败北魏的先头部队。正面交锋似乎从来是北朝铁骑的专利，当北魏主力听到先头部队被夜袭的梁军正面击溃后，全军震动，士气跌落。

南北两军在涡阳附近打了近一年，战斗上百次，未分胜负。魏军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执行堡垒战术，一座一座地建堡垒，步步逼近。他们一共造了十三座堡垒，成半圆形，对梁军形成了夹击之势。主帅曹仲宗、将领韦放二人见状，没有了信心，准备撤退。部队都做好撤退准备了，只见陈庆之持节堵在大营门口，说：“全军官兵在此鏖战一年，耗费了无数粮草军需。诸军并无斗志，都想要退缩，这难道是要建功立业的样子，简直是为了聚集抢掠。我听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敌人部队会合了我们再和他们大战。我有密敕在此，如果谁要班师，就请他来以身试法吧。”陈庆之想置之死地而后生是真，所谓的密敕很可能是假的，吓唬众人而已。但是曹、韦等人被吓住了，不敢撤退，听从了陈庆之的指挥。陈庆之当即组织精兵强将，突袭北魏的营垒。他的打法一如既往的简单，就是一座接着一座地去进攻堡垒。陈庆之领兵一连攻破了四垒，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杀得魏军心惊胆寒。涡阳城的守军见状投降。梁军乘胜发动全面强攻，魏军其余九个堡垒也纷纷溃败，魏军的尸首淤塞了淮水的支流。梁军大获全胜，陈庆之声誉日隆。

三

陈庆之最辉煌灿烂的时刻，发生在又一个两年之后。那一年（529），萧衍不经意地发动了一次潦草的北伐，陈庆之抓住了机遇，登上了战神的巅峰。

事情的起因是大通二年（528）北魏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北魏宗室在河阴之变中遭到尔朱荣大肆屠杀。一些侥幸脱逃的宗室成员仓皇逃奔梁朝，其中就包括北海王元颢。他们向萧衍称臣，乞求梁朝出兵平定北魏内乱。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萧衍大喜过望，封元颢为魏

王，计划派兵助他收复领土，建造一个南朝的藩属。

派谁去呢？陈庆之。派多少人去呢？七千人。

萧衍派陈庆之只带七千人护送元颢北伐，只能说明萧衍并没有对元颢一行抱有多大的信心，反正是天上掉下来的横财，能收多少就是多少。派出了陈庆之的七千人队伍后，萧衍就算是把元颢给敷衍过去了。不想，他又一次小看了陈庆之。

陈庆之把这支小小的队伍指挥得出神入化，屡战屡捷。

河阴之变后，北魏内讧不断，边境守卫力量削弱。中大通元年（529）四月，陈庆之乘虚攻占河南荥城，进军重镇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有北魏的七万守军（梁朝方面的数据），以逸待劳，还修筑了九座营垒以滞缓梁军的进攻。陈庆之发挥敢闯敢干的精神，指挥部队毫不畏惧地猛攻营垒。战斗从清晨开始，到中午的时候，梁军就已经攻陷了三座魏军营垒，杀得其他北魏守军丧失斗志、举众投降。陈庆之成功占领睢阳。元颢旋即在睢阳登基称帝，史称北魏建武帝。

北魏的元晖业率领两万士兵占据考城（在今河南兰考），阻挡陈庆之继续前进。考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陈庆之就指挥官兵强渡护城河，逼近城墙修筑土垒，越上城池击败守军。此战，陈庆之生擒元晖业，还缴获大批粮草车架。胜利之后，陈庆之挥师西进洛阳，沿途不少州县闻风归降。北魏在黄河中流的统治根基松动了。这都是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情。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召集军队保卫首都洛阳。北魏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等率羽林军数万守荥阳（在今郑州西部）、虎牢等地。这支军队是河南魏军的精锐，正面阻挡了陈庆之前进的步伐。陈庆之督促部队猛攻，无奈北魏羽林军装备精良，荥阳城的城墙又很坚固，梁军攻之不克。

北魏上党王元天穆统率着鲜卑主力，正在北方镇压内乱，听说河南危急，派将军尔朱吐没儿领骑兵五千、鲁安率步骑九千驰援荥阳，又派出尔朱世隆、王黑率骑兵一万进据虎牢。元天穆自己督率十数万鲜卑主力随后南返，计划合围陈庆之这支小部队，将其消灭在荥阳附近。

一旦合围成功，陈庆之将陷入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梁军将士都很害怕。陈庆之眼看就要陷入一盘死棋，破解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攻陷荥阳城！陈庆之解鞍秣马，向大家做了一番战前动员：“我们北伐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你们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和北魏军队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魏军气势汹汹地来报仇了。我们才七千人，敌人超过三十万。我们不能有侥幸图存之心，只能奋力死战。我们步兵在大平原上无法和鲜卑骑兵对抗，只有在他们到来之前踏平荥阳！”梁军将士们都激起了死里求生的心来，于是陈庆之亲自擂鼓，全军呐喊着杀向荥阳。勇士宋景休、鱼天愍首先登上城墙，梁军相继而入，只一通鼓梁军便悉数登城。北魏主帅杨昱被俘，三十多名将领被杀，北魏在荥阳储备的牛马谷帛数量众多，都成了陈庆之的战利品。

荥阳失陷，魏军失去了合围梁军的支撑点。元天穆不甘心失败，带着数万大军兵临荥阳城下。他没想到，荥阳城城门大开！陈庆之压根就没想守城，挑选三千名精骑出城背水一战。此战，三千梁军以必死之心奋勇杀敌，杀得魏军节节败退。魏将鲁安在阵前投降，元天穆等人只带少数残兵败将逃生。陈庆之乘胜追击，带着这三千人马进军虎牢关。虎牢关自古便是天下雄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守将尔朱世隆有数千守军，竟不敢迎战，弃城而逃。

自此，洛阳门户洞开，无险可守。元子攸为避梁军锋芒，被迫撤至山西长子。洛阳守将元彧、元延明等人向陈庆之投降。梁军护卫着元颢进入洛阳，受到北魏降将们的欢迎。外围的元天穆等人反扑，先后攻克大梁、睢阳，魏将费穆围攻虎牢关。洛阳告急。陈庆之回师迎

战，元天穆等人怯战，率军北渡黄河，费穆则在虎牢关投降。陈庆之顺利收复大梁、睢阳，洛阳之危尽解。元颢就在洛阳改元大赦，建立了称藩梁朝的傀儡政权。他封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增邑万户。

至此，陈庆之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以区区七千之众从长江边上打到黄河边上，一路所向披靡，历经四十余战，攻破城池三十多座，杀死、俘虏或迫降敌将数百人，击溃或歼灭敌人数以十万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因为陈庆之和部下皆穿白袍，所以洛阳城中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陈庆之由此被称为“白袍将军”。

四

战争是一项综合事业，英雄个人离开了背后的支持就维持不了不败的神话。如果陈庆之效力于蒸蒸日上的政权，他可能还会是常胜将军，遗憾的是，他效忠的梁朝隐患重重、军事力量薄弱，这就注定了他的北伐更多是“一个人的战斗”。

更糟糕的是，陈庆之护送的北魏建武帝元颢是个典型的昏君。元颢先是懦弱怯战，让陈庆之在前面北伐，自己躲在后面观望。占领洛阳后，他一头扎入后宫，醉生梦死，荒废政务。陈庆之是元颢傀儡政权的顶梁柱，但元颢君臣却嫉妒他的辉煌战绩，那些降将们老在元颢耳朵边说陈庆之的坏话。陈庆之眼看北方魏军不断云集黄河北岸伺机反扑，让元颢向南梁请求援兵。元颢怕陈庆之势力继续增长，又怕永远当南朝的傀儡，竟然向萧衍上奏说北方局势稳定，无须增兵。结果，梁朝没有派一兵一卒增援洛阳。实际上，元颢的小朝廷虽然占据了洛阳，政令却只能到达洛阳周边的少数地方，多数地区依然在元子

攸的统治之下。洛阳城内人心不稳，暗流涌动。

在北魏那边，接连的失败让他们痛下决心，由尔朱荣倾全国之兵，号称百万，大举向洛阳扑来。洛阳周边州县在重兵威胁下，纷纷反叛。陈庆之毅然率领孤军，主动要求到黄河以北去防守洛阳的门户北中郎城。北中郎城成了洛阳在黄河北岸的唯一据点，承受了尔朱荣大军的轮番进攻。三天中，魏军进攻这座小城十一次，都被陈庆之击退。

尔朱荣心生退意。有个名叫刘灵助者的部下，擅长天文，对尔朱荣说：“不出十日，河南大定。”尔朱荣知道这个“天意”后信心大增，调整思路，决定绕过北中郎城直取洛阳。魏军伐木造筏，主力渡过黄河去洛阳擒拿元颢。元颢哪里是打仗的料，拔腿就弃城而逃。尔朱荣攻陷洛阳。元颢逃到临颖后，被县卒江丰斩杀。依然坚守北中郎城的陈庆之就变成了滞留敌后的孤军，处境危险。没有了后方，没有了主帅，陈庆之的部队便东撤准备返回建康。魏军尾随追击。撤退途中，碰巧嵩高山洪水泛滥，梁军前有洪水，后有追兵，将士死散，全军覆灭。陈庆之化装成和尚，孤身潜回建康。

南归后，陈庆之虽败犹荣。鉴于北伐的辉煌战绩，萧衍任命陈庆之为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邑一千五百户。

成就名将之誉的陈庆之此后不用再陪萧衍下棋了。萧衍真正认识到了陈庆之的能力，好钢用在刀刃上，将他配置在南北征战的前线。陈庆之北上淮河流域，都督沿淮诸州梁军。他在任上消灭了自称天子作乱的妖僧僧强和土豪蔡伯龙等人，平定北徐州的叛乱。中大通二年（530），陈庆之围攻中原悬瓠（hù，今河南汝南），大破魏军。大同二年（536）十月，东魏定州刺史侯景率七万人南侵，陈庆之率领部下不足万人抵挡。萧衍闻讯，急调援军驰援。援军出发不久，前线传来消息：魏军已经被歼灭，侯景只身逃跑。除了打仗，陈庆之还在任上展开屯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几年时间让前线梁军粮食充实。行政

上，他还精简机构，将虚置的州简化为郡。

大同五年（539）十月，陈庆之去世，时年五十六岁。因其忠于职守，战功卓著，政绩斐然，梁朝追赠陈庆之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

关于陈庆之，最可琢磨的就是他北伐的赫赫战功。《梁书》记载陈庆之自述“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南史》则升格为陈庆之破“贼众四十余万”。如果记载属实，陈庆之能够取得如此悬殊的胜利，令人惊叹。后人多有怀疑陈庆之的战绩，认为陈庆之和南方的史书虚夸了战功。实际情况如何呢？

纵观陈庆之北伐时的南北格局，南方梁军固然虚弱，但北魏也内外交困，变乱四起。刚刚发生的河阴之变让洛阳方圆百里内兵力空虚、士气低落。这给陈庆之的北伐创造了良机。梁军北伐后，魏军主力并未在前线。比如尔朱荣所部在镇压葛荣暴动，之后屯兵河北，元天穆所部在济南镇压邢杲暴动。陈庆之消灭的敌人都是河南的小股魏军，北魏主力并未受损。既然是小股魏军，人数就不可能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了。梁军对战果的汇报多少存在虚夸，陈庆之消灭的魏军可能还包括裹胁的北魏百姓。据今人考证，北魏总兵力在二十万左右。那么陈庆之北伐击溃、歼灭的魏军数目在几万左右，比较可信。

不管陈庆之的战神传说是否存在虚夸、虚夸了多少，这都无损于陈庆之勇敢善战的精神。对于他英勇奋战、一扫南朝柔弱气息的壮举，当时的人和后人都应该给予称许。

小皇帝手刃大权臣

—

元子攸虽然被迫赋予尔朱荣全权，但早已看出尔朱荣取代北魏自己登基的野心。河阴之变血流遍野的惨状和尔朱家族飞扬跋扈的言行，更是加深了元子攸杀尔朱荣自保的决心。

元子攸的皇后是尔朱荣的女儿。这不是一段美满的婚姻。尔朱皇后性情刚硬，且喜欢争风吃醋。元子攸被皇后闹得没办法了，就让在洛阳的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开导侄女。堂叔没说几句，尔朱皇后就说：“皇帝宝座是我们家给他的。今天他却这样对我！我父亲如果做了皇帝，现在就由不得他来教训我了。”尔朱世隆听了这话先是沉默不语，之后叹气说：“大哥本来想自己做皇帝的，那我可就是亲王了。”尔朱世隆和尔朱皇后的对话传到元子攸耳朵里，自然是更加坚定了他诛灭尔朱家族自保的决心。

但元子攸毕竟只是个傀儡。北魏的皇室贵族和大臣们在河阴之变中几乎被屠杀殆尽，洛阳周围又被尔朱荣的人看得紧紧的。元子攸寻找不到勤王的力量，所以只能亲自动手刺杀尔朱荣了。君王刺杀臣子自保，也算是无奈之举了。站在元子攸一边的大臣有城阳王元徽和大臣杨侃、李彧、元罗等少数几人。中书舍人温子升参与密谋，向元子攸分析了历史上杀权臣的成败得失，包括王允杀董卓、高贵乡公杀司马昭等案例，告诫元子攸不要操之过急。但是元子攸心硬如铁，感叹道：“即便和尔朱荣同归于尽我也愿意，更何况未必一定死！我宁可

像高贵乡公（曹髦）那样死，也不要像常道乡公（曹奂）那样生！”

永安三年（530），尔朱皇后即将生育。远在晋阳的尔朱荣前来洛阳朝见，主要是照顾女儿尔朱皇后的生产。元子攸与亲信大臣紧张密谋，准备刺杀尔朱荣。但是大家又担心尔朱荣在洛阳的势力太强，刺杀不易，迟疑未决。久在洛阳的尔朱世隆感觉到了正在酝酿的刺杀密谋，他自己写了一张“天子与杨侃等人密谋杀天柱大将军”的纸条贴在自家门口。纸条迅速发酵为一个轰动事件，并传递到了尔朱荣那里。被实力迷惑了双眼的尔朱荣完全不把皇帝的阴谋放在心里，哈哈大笑说：“世隆真是胆小如鼠。谁敢杀我？”他笑着将纸条撕掉了。

在心底，尔朱荣对元子攸也充满疑虑。一次，尔朱荣径直问元子攸：“外面传言陛下想谋害我！”元子攸平静地回答：“也有人告发你准备杀我，我该不该相信呢？”尔朱荣被元子攸这么一反问，反而放心了。

元子攸害怕计划泄露，决定提前动手。九月十八日，元子攸邀请尔朱荣及其心腹元天穆入宫吃饭，同时命杨侃等十几个人埋伏在明光殿东。不知道什么原因，尔朱荣和元天穆在宴会中途就起身告辞。待杨侃等人从宫外赶上殿来的时候，尔朱荣、元天穆已经走出大殿了，元子攸一方失去了动手的宝贵时机。二十一日，尔朱荣又进宫，但只稍作停留，元子攸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当天尔朱荣出宫后到陈留王家饮酒大醉。之后连续多日，他都称病不出。

元子攸越来越着急了，于是在二十五日那天决心孤注一掷。他先在明光殿东厢设下伏兵，然后声称皇后生下皇子。宫中鼓乐齐鸣，开始庆祝皇子诞生。元徽受命飞马赶到尔朱荣处报告喜讯。这时尔朱荣正在和元天穆赌博。因为女儿怀孕并没有满月，尔朱荣对女儿的提前生产心存疑惑。元徽搬出鲜卑族豪放恣纵的习俗，假装得意忘形地摘下尔朱荣的帽子，又是欢呼又是跳舞，闹得王府里一片欢笑声。同时元子攸大规模派出文武百官，向尔朱荣道贺，并催促尔朱荣进宫。

尔朱荣于是放松戒备，跟着大家一起兴奋起来，叫上元天穆一起进宫。两人进宫时正遇到负责起草诏令的温子升拿着刚写好的大赦令往外走。这些大赦令是元子攸准备在杀死尔朱荣后对天下公布的。尔朱荣高兴之余和温子升擦肩而过。如果他当时查看一下温子升手里拿着的大赦令，结果可能就完全相反了。

元子攸端坐在龙椅上，等待着尔朱荣和元天穆的到来，紧张得脸色都变了。近侍忙提醒说：“陛下脸色不对！”元子攸赶紧喝了几口酒，才算镇静下来。元徽先进殿，向大家行礼。以此为信号，光禄卿鲁安等人手持佩刀，从东厢门闯入，向随后的尔朱荣扑去。尔朱荣也是一代枭雄，迅速反应过来，快步向文弱的元子攸扑过去。他试图劫持皇帝，扭转形势。元子攸早有预料，在膝上横着一把刀。他等尔朱荣近前，飞快地抽出利刃，一刀就刺入尔朱荣的腹部。尔朱荣痛叫倒地，鲁安等人一拥而上将尔朱荣与元天穆乱刀砍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皇帝手刃权臣的流血事件。跟随入宫的尔朱荣长子尔朱菩提、尔朱阳者等三十人也被伏兵杀死。《北史》对这场政变的描写只有短短的一句：“戊戌，帝杀荣、天穆于明光殿，及荣子菩提。”尔朱荣时年三十八岁。

从河阴之变后掌权，到被乱刀砍死，尔朱荣在权力巅峰停留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他的高压下，尔朱氏生前，朝野百官对河阴惨剧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河阴死难者的墓志都讳言其事，只称墓主人“暴薨”“暴卒”“薨于位”“终于其第”，最为激烈者也不过说是“横罹乱兵”。当尔朱荣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洛阳城顿时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内外喜叫，声满京城”。河阴死难者家族相互吊贺。人们对尔朱荣积蓄已久的愤怒都发泄出来了。

尔朱荣固然有残酷的一面，但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贡献也是不能被抹杀的。元子攸在诏告天下的诏书中，虽指斥了尔朱荣“河阴之役，安忍无亲”“王公卿士，一朝涂地”的罪行，也肯定了他匡扶帝室的功业，他不仅诛灭了祸国的胡太后集团，也指挥平定了华北各地的叛

乱战事，对维持北魏末期的统治功劳甚大。但后世几乎都将尔朱荣定性为祸国权奸，就连脱身尔朱荣集团的高欢、宇文泰等人也忙不迭地和他划清界限。“委身尔朱”“尔朱余孽”等成了攻击政敌的弹药。

二

元子攸对刺杀事件做了周密的部署。为了消除政治动荡，他事先准备了大赦令和免死铁券，计划宽恕尔朱荣的余党。作为常年居于宫殿的皇帝，元子攸以为凭着这些契约和凭证就能稳定政局，实现亲政。然而，他想得太简单了。

宫中噩耗传出的时候，尔朱荣的妻子和警惕性很高的尔朱世隆趁乱逃出了洛阳，在郊区召集尔朱家族的武装力量，准备攻城。元子攸发出大赦令和免死铁券，想制止尔朱氏的反抗，但效果极小。尔朱世隆等人对朝廷的大赦令和铁券嗤之以鼻，他们对使节说：“天柱大将军对皇帝有拥戴之功，对天下有再造之德，却无故遇害。这些白纸和铁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尔朱荣死后，留守晋阳的侄子尔朱兆闻讯立即率军南下洛阳。徐州方面的尔朱仲远也点起兵马，杀向洛阳兴师问罪。他们和尔朱世隆合军后，一起猛攻洛阳。洛阳外城很快被攻破，元子攸跑上内城城墙向尔朱势力的官兵们喊话，重申罪在尔朱荣一人，其余人一律宽大。但叛军们对此根本就不信。权力斗争从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尔朱兆等人起兵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替尔朱荣报仇，更是为了争夺尔朱荣的权力遗产。很快，洛阳被完全攻陷，元子攸被劫持到晋阳。

尔朱兆绞死了元子攸。元子攸死前，被允许到三级寺的佛殿去最后礼拜一下佛祖。跪在三宝佛前，元子攸再三祈祷：“下次再投生为

人，决不要再当帝王了！”他又随口作了一首五言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后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此举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前任皇帝或者碍眼的皇帝往往都被杀死在寺庙之中。寺庙本应该是修道养德、供人避难的场所，却成了北朝时期皇帝的屠杀场。元子攸遇害距离他刺杀尔朱荣只隔了三个月。元子攸的左右大臣也都被尔朱兆杀死。

之前，尔朱世隆、尔朱兆等人在洛阳郊区会师，为了与洛阳朝廷相抗拒，也为了取得政治优势，他们临时拉上长广王元晔，推举他为新皇帝取代元子攸。元晔大赦所部，定年号为建明。事后，因为元晔是北魏皇室的疏远宗室，缺乏名望，尔朱家族决定扶立新君。这次，他们选择了元恭。

元恭在前朝长期处于政治边缘，托病居于龙花佛寺，很少与外人交游通信，声望很高。有人向元子攸打小报告说元恭城府很深，“将有异图”。民间又传说龙花佛寺有天子气，元子攸害怕起来。元恭闻讯逃匿到上洛地区。朝廷还是找到了元恭，将他押送到洛阳。元恭就装聋作哑，佯装智商有问题，想逃过一劫。有人说元恭是装哑，元子攸有所怀疑，派人深夜抢劫元恭，并拔刀佯装要杀他，元恭仍然不出一声。元子攸这才相信，放过了元恭。元恭被拘禁多日后，因查无实据而被释放。元子攸死后，尔朱家族认为元恭有过人气量，意图扶立他为新帝。他们派人试探元恭的意思，同时也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哑巴。装哑八年之久的元恭听说要让自己当皇帝，大喜过望，喊道：“天何言哉！”

于是北魏的第一场禅让大礼开始了。“元晔至邙南，世隆等奉帝东郭外，行禅让礼。太尉尔朱度律奉路车，进玺绂。服袞冕，百官侍卫，入自建春、云龙门。”在位仅四个月的元晔乖乖地将皇位禅让给了元恭，元恭就是节闵帝。

这虽然是皇室内部的权力转移，但主导它的却是尔朱家族。只要尔朱家族愿意，他们完全可以实现异姓之间的权力转移。元恭登基后，封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颍川王、并州刺史，封尔朱仲远为大将军、彭城王、徐州刺史，封尔朱天光为大将军、陇西王、雍州刺史。三人各霸一方：尔朱兆在北，兼有并州、汾州；尔朱仲远在东南，据守徐、兖二州；尔朱天光在西，专制关中。尔朱世隆为太保、尚书令、乐平王，居中把持朝政。尔朱家族的权势依然一时无二。

高欢异军突起

—

盛极必衰。尔朱家族的强盛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埋葬尔朱家族、推翻北魏的人物早已经稳步壮大起来。这个人就是高欢，他已经在尔朱阵营内部摩拳擦掌多时。

一次，尔朱荣忽然问左右：“哪天我死了，谁能够做军中统帅呢？”左右都回答说：“尔朱兆将军可以做统帅。”尔朱荣不以为然地说：“尔朱兆虽然勇猛善斗，但只能做统领几千兵马的部将，不适合做统帅。我死后，能代我统军的，只有贺六浑这个小子。”话虽这么说，尔朱荣却不愿意将大权转移到外姓手中。他欣赏高欢的才能，但也提防着高欢夺权。尔朱荣将高欢远调为晋州刺史，还告诫负责山西地区的尔朱兆不可轻视高欢，说：“将来夺权者必是贺六浑这小子。”

元子攸诛杀尔朱荣，尔朱兆发兵洛阳报仇，并没有让高欢参与。尔朱兆擒拿皇帝并不费力，但当黄河河套以西一带的“贼帅”纥豆陵步蕃偷袭秀容时，他却抵敌不过，不得不向高欢求救。幕僚都劝高欢别理会尔朱兆，高欢却认为此时尔朱兆头脑简单，不会有别的想法，坦然出兵相救。高欢与尔朱兆合作迎敌，杀死了纥豆陵步蕃。尔朱兆很感激，与高欢起誓，结为兄弟。

尔朱兆负责现在山西地区各州，又继承了尔朱荣的地位，实力远在高欢之上。他正为流入并州的葛荣叛军余部大伤脑筋。数十万葛荣叛军战败投降后，继续游荡在华北各地。其中有二十多万人被尔朱荣

迁徙到并州。这些人出身六镇官兵，反抗性和组织性都很强，两三年间发生过几十次大小不等的造反。尔朱兆疲于镇压，就向高欢请教如何处置。高欢趁机建议，对六镇流民不能靠杀，应该挑选可靠将领统领他们，这样就容易管理。尔朱兆赞道：“好主意！那派谁去管理六镇流民呢？”在座的贺拔允插话说：“高欢最合适了！”这个贺拔允出身武川镇，是贺拔岳的哥哥。武川镇的贺拔家族、宇文家族和怀朔镇的高欢、侯景等人关系紧张。奇怪的是，贺拔允和高欢却保持了不错的私交。听到贺拔允推荐自己，高欢心中暗喜，却佯装发火，对着贺拔允的嘴巴就是一拳，打断了他的一颗牙齿。高欢骂道：“天柱大将军在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鹰犬；现在天柱大将军不在了，天下事都由大王做主，贺拔允胆敢胡说，该杀！”尔朱兆听了这话满心舒服，也很感动，当场拍板由高欢统率六镇流民。几个人抱头痛饮，一副情深义重的样子。

等尔朱兆喝醉了，高欢寻机跑到帐外，立即宣布：“我受命统领六镇镇兵。凡是原六镇官兵，一律到汾水东岸集中听令。”六镇流民多年来群龙无首，四处飘零，又受尔朱势力的欺负，大部分人生活得很不如意，对尔朱兆离心离德。他们知道高欢当过怀朔的镇兵，有勇有谋，都愿意逃离尔朱兆追随高欢。于是一批批人呼啦啦地跑去集合了。高欢很快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队伍。

山西此前连年受灾、饥馑遍地，六镇流民更是只能抓田鼠吃，个个饿得面黄肌瘦。高欢觉得在山西没有前途，希望到太行山以东粮食丰富的地方去。他指使刘贵向尔朱兆提出“就食山东”的要求，愚蠢的尔朱兆又一次爽快地答应了。长史慕容绍宗看出高欢有野心，劝尔朱兆说：“如今天下大乱，高欢雄才盖世，让他率领重兵在外，无异于将猛虎放归山林。一旦高欢心怀异志，就无法制服了！”尔朱兆天真地说：“我和高欢昨天刚结为弟兄，他不会有异心的。”慕容绍宗冷冷地说：“亲兄弟尚且骨肉相残，何况是结义弟兄！”可尔朱兆还是不听，目送高欢带着六镇士兵缓缓东进。

途中，高欢杀死了部队中亲近尔朱氏的军官，又抢劫了尔朱兆采购的马匹。同时，他严肃军纪，约束六镇官兵不要像之前那样杀人抢劫，要求他们做到与百姓秋毫不犯。过麦地时，高欢带头下马穿行。河北百姓见此，倾向支持高欢。普泰元年（531）二月，高欢到达信都附近。当地豪强高乾兄弟、封隆之等人乘北魏朝廷力量衰微，驱逐朝廷命官，占据州县当起了地头蛇。他们支持高欢入主河北，高欢就在信都驻军，将势力向河北各地扩散。

给高欢送上第一块地盘的高乾是货真价实的渤海高氏子弟，与高欢“同宗”。高家是冀州大户，势力广博。高乾兄弟四人，其中三弟高敖曹武功极佳，最为人称道。北魏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汉族人文弱，不堪作战，所以北方武装以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人即便有当兵的，也不占军队的多数。但是高敖曹挑选冀州的汉人，编练了一支三千人的纯汉族武装。人们将他和他的部队比作项羽和江东子弟兵。高欢接收了这支部队，但是对它的战斗力半信半疑。

经过一番准备，高欢觉得羽翼丰满，可以开辟自己的一片天了。为了调动部队情绪，高欢先造谣说尔朱兆要把六镇遗民分配给契胡做奴仆，引起部下们的骚动。接着，高欢又假造尔朱兆发来的兵符，要征发一万名士兵去山西作战。他执行“命令”，按部就班地编组队伍，规定了出征日期，然后让孙腾、尉景出面请求迟五天再走。五天满期后，孙腾等再一次请求延期五天，让冀州的官兵酝酿足了情绪。又过了五天，高欢大张旗鼓地集中部队，准备开拔。官兵们无不泪流满面，哭声惊天动地。

高欢也流着眼泪和大家告别，同时不忘进一步挑拨官兵的情绪，说：“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失乡客，现在都是一家人。我没想到尔朱氏要征发我们去打仗，去给尔朱氏当炮灰是死路一条，被分配给契胡当奴仆也是死路一条，可误了出征日期也没有生路，如何是好呢？”官兵的情绪激愤起来，有人高喊：“反了，反了，造反吧！”高欢便道：“看来只能反了，但必须推一个人做主。”官兵们都说愿意拥高欢

为主。高欢却满口推辞道：“我可不行。你们中很多人都跟随过葛荣，葛荣尽管有百万之众，终究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法度，军队强横残暴，这样造反是不行的。如果你们一定要以我为主，必须改正之前的错误。第一，不能欺负汉人；第二，不能违背军令，一切听我号令。如果大家做不到，我就不干，否则又免不了失败的结局。”现场造反的情绪很高，官兵既有造反的决心，又觉得高欢说得很有道理，齐声说愿意听命。于是，高欢杀牛煮饭，犒赏三军，正式宣布讨伐尔朱氏。这是531年六月的事情。

高欢上书元恭，痛陈尔朱氏屠杀天下、杀戮先帝、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大罪——其实，脱身尔朱阵营的高欢也是“共犯”。坐镇朝廷的尔朱世隆封锁了高欢的上书和起兵的消息。于是，高欢就以朝廷为奸臣把持、不知真伪为借口，在信都拥立章武王元融的儿子渤海太守元朗为新皇帝，年号中兴。

二

尔朱家族对高欢的造反深恶痛绝，迅速决定联手想将他扼杀掉。

尔朱氏的实力远在高欢之上，除了尔朱世隆控制朝廷，力量稍弱外，尔朱兆占据晋阳和秀容，独霸山西；尔朱天光占有关中和陇西，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甘肃；尔朱仲远驻军东南，有徐兖二州地盘。他们四人商定到邺城附近集合，号称有二十万之众。高欢率军迎敌，部下战马不满两千，步兵不满三万。双方军队战力相差悬殊，如果不发生奇迹，高欢绝不是尔朱家族的对手。

所有的奇迹都是人创造的，关键在于主人公会不会。高欢准确判断尔朱家族在尔朱荣死后，并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各部之间并不团

结。于是他决定先离间尔朱仲远和尔朱兆。高欢派人到处散布流言，说“世隆、仲远兄弟要谋害尔朱兆”“尔朱兆和高欢同谋，要杀仲远”等，弄得他们互相猜疑，不能协同前进。其中，尔朱兆的军队推进最快，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与高欢的部队首先接触。高欢列阵迎战，把牛驴联结起来堵塞归路，向全军传达背水一战、非胜即死的决心。战前，高敖曹慷慨请缨，高欢就将他的纯汉族军队安排在侧翼。

战斗开始了。尔朱兆仗着人多势众，首先进攻高欢的中军。尔朱兆一心要抓住高欢这个叛徒，督促部下发动一波波猛攻。高欢抵挡不住，大部队开始出现溃败迹象。就在这时，侧翼的高敖曹带着三千汉族步兵拦腰对尔朱兆发动猛烈的突袭。尔朱兆没料到几千步兵会主动进攻骑兵，毫无防备。他一心督促军队前进，致使队伍拉得很长、首尾难以呼应。高敖曹拦腰一击，将尔朱兆主力杀得猝不及防，混乱不堪。高欢的中军回过头来反攻。尔朱兆大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往晋阳。高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尔朱仲远听说尔朱兆战败后，竟然引兵而逃。高欢从容指挥军队，于次年（532）正月攻克河北重镇邺城。

决战之前，逗留在尔朱阵营中的大将斛斯椿和贺拔胜就议论：“天下皆怨毒尔朱，而吾等为之用，亡无日矣。”他们都希望尔朱兆战败。一看尔朱兆出现失败迹象，贺拔胜就在阵前向高欢投降。斛斯椿做得更绝，他带领本部兵马，快马加鞭赶回洛阳。四月，斛斯椿杀尔朱世隆，生擒尔朱天光，作为见面礼送给高欢，向高欢投降。尔朱仲远闻讯，继续发挥逃跑的特长，一路逃到江南向萧衍投降了。

四月，高欢带着自己拥立的皇帝元朗到达洛阳城郊的邙山，尔朱氏所立的皇帝元恭派人慰劳。高欢一下子面临手头有两个皇帝的问题。

高欢这时也觉得自己所立为帝的元朗枝属疏远，有意重新迎立元恭。他派魏兰根去招降洛阳，同时观察皇帝元恭的为人。魏兰根观察后觉得元恭智商高、声望好，恐怕日后难以挟制，就向高欢毁谤元恭。左右将领也劝高欢说元恭是尔朱氏所立，劝高欢废掉他。高欢于是将元恭废掉，幽禁在崇训佛寺中。元恭侥幸做了一年多皇帝后，又重新回到了寺庙。失位后，元恭赋诗一首：“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样的诗句只能让我们后人感叹落魄皇子皇孙荒凉凄惨的心情，感叹“可怜生在帝王家”的无奈。

高欢与左右亲信商议，决定挑选一个与北魏皇室血缘较近的新皇帝。最初大家青睐的人选是汝南王元悦。元悦被招来开始准备登基的时候，高欢又在即将登基的前一天晚上改变了主意。当时北魏的皇室成员四散逃避，各个王爷难见踪影，寻找新皇帝竟然成了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时有个宗室王爷元修正躲藏在洛阳城西，住在和他关系不错的散骑侍郎王思政的家里。元修是广平王元怀的第三个儿子，能力尚可，历封汝阳县公、平阳王，是朝廷的侍中、尚书左仆射。也许他躲藏的地方被人告发了，高欢决定立元修为新皇帝。元修在王家躲藏了五十天左右，突然见到王思政引着斛斯椿等人，带着四百兵马来找他，吓得面如死灰。他问王思政：“你把我出卖了吗？”王思政摇头说没有。元修又颤巍巍地问他：“能保我性命吗？”王思政无奈地回答：“世事变化无常，王爷，我也不知道啊。”元修就这样被凶神恶煞般的骑兵拥夹在中间，带到了高欢的毡帐中。

高欢见了元修泪下沾襟，下拜陈述事由。元修这才知道原来是拉自己来做皇帝的。他赶紧跪下回拜高欢，连说自己德才浅薄，不敢称帝。高欢也不多说话，随即出去了。陆续有人将服饰呈送进来，并请元修沐浴更衣。为了防止元修逃跑，高欢全军夜里严密警备。天亮的时候，文武百官都前来朝见。废帝元朗早按照高欢的意思写了禅位诏

书。高欢让斛斯椿捧着劝进表前来劝进。斛斯椿进入帷门后，不敢向前。元修就让王思政取来表文，说：“看吧，我现在不得不登基称帝了。”于是在洛阳东郭之外，北魏王朝又进行了一场禅让典礼。没做几天皇帝的元朗将皇位禅让给了元修。元修就这样成了北魏的末代皇帝，史称魏孝武帝。

五月，避居佛寺的元恭被高欢毒死，年仅三十五岁。高欢又杀死了曾经为帝的安定王元朗和东海王元晔。连曾经作为候选人的汝南王元悦也被高欢下令杀死。在这点上，高欢比尔朱氏做得更过。

之前，尔朱天光要带兵去剿灭高欢。贺拔岳劝他固守关中，尔朱天光不听，留下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自己领军东出和尔朱兆合兵。他一走，贺拔岳料定尔朱氏必败，找来宇文泰商量对策。宇文泰建议：“尔朱氏必败，我们干脆也造反吧！”他说服关中三巨头之一的侯莫陈悦出兵。侯莫陈悦和贺拔岳一同攻下长安，活捉了尔朱显寿。贺拔岳轻而易举取得关中，表面上向高欢归顺，实际上割据关中自守。他对宇文泰倍加器重，事无巨细都交由宇文泰处理。

533年的正月，高欢领兵袭破秀容，尔朱兆逃到荒山上自缢而死。尔朱兆的长史慕容绍宗携余众归降，高欢认为他忠义，非但没有因为他从前向尔朱兆进言要杀自己而记恨，反而对他优礼有加。尔朱势力彻底灭亡，高欢在形式上统一了北魏，继承了尔朱氏的地位。他逼元修迎娶自己的女儿为皇后，升格成了国丈。高欢城府很深，言行严肃，对于军国大事独断专行。无论是元修，还是一般大臣，都猜不透高欢的决策和悲喜。北魏朝廷才出狼窝，又入虎口。

一次逃亡导致的帝国分裂

北魏孝武帝元修与前几任傀儡皇帝不同，他有想法、有能力，不愿意重蹈前几任皇帝的覆辙，一开始就有除去高欢的决心。

高欢铲除尔朱势力后，觉得尔朱荣的根据地晋阳城不错，就留在了晋阳，将它作为大本营来经营，客观上放松了对洛阳的控制。当时洛阳城里有一批大臣、降将并不是真心降服高欢，很快聚集在了元修周围。南阳王元宝炬和将军元毗、王思政、斛斯椿等人纷纷劝说元修除掉高欢。其中斛斯椿本是尔朱荣的部将，因率部投降高欢后诛杀尔朱家族有功，被允许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兵权。元修就以斛斯椿为领军将军，与王思政共同统率近卫军，作为心腹，还调整了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的人事。这样，军谋朝政都掌握在斛斯椿的手里，他重新安排了宫内侍卫，挑选数百名骁勇武士担任元修的近卫军。元修还多次以出猎为名，与斛斯椿排兵布阵，互相密谋。

仅仅依靠洛阳的这些人还不足以推翻高欢，元修继续寻找同盟者。他主攻两个方向：一个是寻找地方实力派军阀作为外援，一个是从高欢阵营的内部拉拢人手。

元修准确判断出武川的贺拔家族可以和高欢一决高下，就想倚靠贺拔兄弟。贺拔胜投降高欢后留在洛阳，元修就任命他为荊州刺史，把他作为南方的依靠。还暗中派人与拥兵关中的贺拔岳联络，准备引关中的军队夹击高欢。

司空高乾是高欢起兵之初的主要盟友，他们兄弟几个是高欢重点依靠的力量。元修就想笼络他为己用。一次元修在华林园赐宴，散席后单独留下高乾，大夸高乾“奕世忠良”，要与高乾结拜为兄弟。因为事出仓促，皇帝又殷勤相劝，高乾只好和元修结为异姓兄弟，事后也没有告诉高欢。慢慢地，高乾看到元修和斛斯椿、王思政等人常常密谋，又派人联系贺拔岳，任命贺拔胜为荆州刺史，明显是在树党自强。他担心元修要对高欢不利，洛阳城“祸难将作，必及于我”，便逃到晋阳向高欢报警。

高乾不谈洛阳的时事，而是劝高欢干脆逼元修禅位，夺取北魏的天下。高欢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赶紧用袖子掩住高乾的嘴说：“不要乱说！我还需要仰仗司空大人在洛阳帮我多留意时局。”高欢这么说，反而让高乾心中有愧，更加不安起来。接着，高欢屡次向元修推荐高乾担任侍中，主持朝政。元修恨高乾站在高欢一边，将高乾的奏折置之不理。高乾夹在两人中间，双方都惹不起，干脆就自求外任徐州刺史，想躲到外地去。元修见状，既怕高乾泄漏自己的秘密，又恨高乾不为自己所用，就明白告诉高欢：“朕曾经和高乾立下盟约，进退与共。如今高乾反复两端，实属可恶。”高欢对高乾背着自己和元修勾勾搭搭也很厌恶，干脆将高乾秘密劝自己篡位的事情转告了元修。自此，高乾被双方都抛弃了，只剩死路一条。元修将他囚禁起来，派人痛责他前后反复无常。高乾申辩道：“臣以身奉国，义尽忠贞，是陛下要对付高欢，却借口我反复无常。欲加之罪，其无辞乎？”结果高乾被赐死，时年三十七岁。

在洛阳的高敖曹看到哥哥被杀，逃往晋阳向高欢哭诉。高欢装出惊愕的样子，将责任全都推到元修身上，好好抚慰了高敖曹一番。高敖曹更加死心塌地地站在高欢一边。其他部将也因为元修枉杀高乾，而对元修更加疏远乃至仇视。元修想从高欢身边挖墙脚的企图落空了。

却说关中的贺拔岳接到元修递出的橄榄枝后，犹豫不定。于是派

宇文泰去晋阳见高欢，查看虚实。

宇文泰和高欢的见面，是一次英雄与英雄惺惺相惜的会面。宇文泰看到了一个有志于天下的英雄；高欢则看到一个相貌非凡、精神抖擞的年轻将领。高欢想留下宇文泰为自己效力，不愿宇文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但是宇文泰也是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他不想离开事业已有起色的关中，更不想只做高欢的部将，因此宇文泰坚持要回去。高欢犹豫再三，最后松了口。宇文泰刚走，高欢就后悔了，想要杀掉宇文泰以绝后患。可是宇文泰已经抓住机会，快马加鞭返回关中了。高欢的追兵一路赶到关口也未追上宇文泰。高欢的直觉是对的，最后消灭高欢后代的就是宇文家族。

返回关中后，宇文泰告诉贺拔岳，高欢是有意荡平天下的枭雄，站在他的一边无异于与虎谋皮，不如借助元修的力量与高欢抗衡。于是贺拔岳选择了元修。

高欢自然要对付贺拔岳。永熙二年（533），高欢要调贺拔岳做冀州刺史。贺拔岳不愿离开关中老窝，谢绝了任命。一计不成，高欢又生一计。贺拔岳这个“关中王”只是形式上的，关中和陇西还有一些地头蛇不服从他的指挥，尤其是地位仅次于贺拔岳的侯莫陈悦。侯莫陈悦是个有勇无谋的赳赳武夫，见利忘义。高欢便诱惑他，只要他杀了贺拔岳，就让他取而代之。侯莫陈悦欣然答应。

灵州刺史曹泥不服从贺拔岳。永熙三年（534），贺拔岳招呼侯莫陈悦会师高平（今宁夏固原），计划一起讨伐曹泥。侯莫陈悦就计划趁贺拔岳来找自己商讨军机的时候下手。他先诱贺拔岳进入营帐，坐论兵事，途中再借口腹痛，起身退出。马上，侯莫陈悦的女婿元洪景就带人冲入营帐，将贺拔岳砍死。

贺拔岳死后，他的部队异常震惊，开始出现四处奔散的迹象。侯莫陈悦派人安慰说：“我只杀贺拔岳一人，其他人不用怕。”可是除了

这句话，侯莫陈悦没有再采取其他的措施，他既没有收编贺拔岳的军队，也没有动员自己的军队戒备，而是带上部队离开高平，向陇西行进。

许多忠诚于贺拔岳的将领，率部聚集在平凉，谋划向侯莫陈悦复仇。将军赵贵提议大家推举宇文泰为新统帅，得到了一致赞成。当时宇文泰担任夏州刺史，镇抚赫连勃勃大夏国的故地。将军杜朔周星夜奔往夏州，转告急情。宇文泰闻讯，点起帐下轻骑，连夜驰赴平凉。宇文泰走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时，遇到了高欢派来招抚贺拔岳部众的侯景。宇文泰严词叱问侯景为何而来，申明关中之事内部解决，不需要外人插手。侯景也是一代枭雄，竟然被宇文泰的强硬态势所震慑，不敢继续前进，中途返回晋阳。宇文泰顺利排除干扰，和贺拔岳余部会合。他率领部众进入高平城，进行短期整顿，稳定下来，然后迅速挥师进攻侯莫陈悦。

侯莫陈悦不敢应战，逃到秦州，企图占据山水之险抵抗。一说他自从杀害贺拔岳以后，神情恍惚，常常梦见贺拔岳来找自己。在睡梦中，贺拔岳问他：“我的兄弟，你要到哪里去，让我找得好苦啊！”被鬼魂这么一搅，侯莫陈悦哪里还有心思迎战，早就内心恐惧，斗志全无了。部下官兵也纷纷叛降宇文泰。宇文泰统率复仇之师，一举击败侯莫陈悦。侯莫陈悦弃军而逃，后为追兵所迫，在野外自缢而死。

宇文泰随后挥师东进，占领长安，以此为大本营着力经营西部。他和高欢一样，也主要依靠六镇余众，尤其是依靠武川镇的力量。宇文泰原来就反对高欢，经过贺拔岳遇刺事件后，他和关中的将领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高欢了。孝武帝元修就任命宇文泰为关西大都督，把他作为新的倚靠对象。

永熙三年（534），就在关中-陇西大乱之时，孝武帝元修对高欢忍无可忍，决定御驾亲征，讨伐晋阳的高欢。

为了杀高欢一个措手不及，他先下诏洛阳戒严，抽调河南诸州兵马，在洛阳近郊进行大阅兵，声称要南伐梁国，实际上是北伐高欢。为了麻痹高欢，他还密诏给高欢说要带兵攻打关西的宇文泰和荆州的贺拔胜。

高欢是什么人，能看不透元修的把戏？他马上回复朝廷说，这些小事无须皇上御驾亲征，让我高欢来代劳就可以了。高欢调集五路兵马共计二十二万人出发南下，“助援”元修征讨。同时他还上表极言斛斯椿等人的罪恶，祭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狼烟滚滚，高欢大军直奔洛阳而来！

元修在洛阳搜罗的那些兵马，肯定不是高欢二十二万铁骑的对手。中军将军王思政劝元修避开高欢兵锋，前往关中依附宇文泰的军队。东郡太守裴侠是个明白人，对王思政说：“宇文泰为三军信服，位处关中形胜之地，已握权柄，怎会轻易让权于我们？如果去投靠他，无异于避汤而入火！”王思政觉得很有道理，但南去荆州又离梁国太近，就问该怎么办。裴侠说：“与高欢相战有立至之忧，西奔到宇文泰处有将来之虑，先往关右一带驻军观察一下再做决定。”元修觉得有理，决定对高欢采取防御措施，观察形势再决定进退。

元修下诏宣示高欢的罪恶，公开与他决裂。在诏书中，元修高呼：“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意思是即便赤手空拳，也要和高欢拼个鱼死网破。实际上，元修早已经铺设好了逃跑的后路：他提升宇文泰为关西大行台、尚书左仆射，还将妹妹冯翊公主许配给宇文泰为妻。

高欢大军很快就兵临黄河北岸，两军隔水相持。斛斯椿请求率领

两千兵马连夜渡过黄河，趁高欢大军远道而来，立脚未稳进行偷袭。元修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准备批准。但是黄门侍郎杨宽劝谏说：“皇上在紧急关头将兵权给别人，恐生他变。万一斛斯椿渡河偷袭成功，那可是灭掉一个高欢又生出第二个高欢啊。”元修觉得这话更有道理，马上下令斛斯椿停止发兵。斛斯椿叹息道：“皇上不用我计，真是天意不兴魏室。”

宇文泰听到两军隔黄河对峙的消息后，对左右讲：“高欢数日内急行军八九百里，疲军迎敌，是兵家大忌，正好乘其疲惫奇袭。当今皇上以万乘之尊御驾亲征，不主动出击渡河决战，反而沿河据守，很是失策。而且长河万里，只要一个地方被突破，必败无疑。”他判断元修必败，下令部队做好迎接皇帝西迁的准备。

客观来说，元修在实力上处于绝对劣势，当面对阵取胜希望不大，只能出奇计。高欢大军急行八九百里迎战，早成了一支疲军。元修乘其疲惫奇袭，还有可能扭转战局。但他从防止权臣再现的角度出发，拒绝抢先发动决战，反而沿河据守，造成了最大的战略失误。

元修见取胜艰难，就带着南阳王宝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斛斯椿和五千骑兵宿于瀋（chán）西杨王别舍。他和王思政的想法一样，决心投靠关中宇文势力。在当地，元修发现了上百头牛，命令全杀了来犒赏军士。军队从元修的举动中发觉皇帝有逃亡的心思，纷纷开始逃散。一夜间，元修周围的军队逃跑了超过一半人。就连清河王和广阳王两位王爷也都逃回洛阳去了。元修失去了抵抗的勇气，第二天便弃军西逃。除了少数亲随，大臣中只有武卫将军独孤信追随元修左右。这位独孤信的忠诚日后得到了历史的回报，他的女儿成了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宇文泰已经派遣都督骆超、李贤各带领数百骑兵东进接纳元修等人。两方在崤中相遇，元修在李贤的保护下最终抵达了长安。

高欢自晋阳发兵后给元修上了四十多封奏表，都没有得到答复。

他判断元修极可能逃入关中依靠了宇文泰，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毕竟元修代表着北魏的法统所在，一旦皇帝逃亡，高欢就免不了在历史上落下逐君出逃的过错，同时把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政治优势白白奉送给了敌人。情急之下，高欢亲自挑选了一支轻骑西进追赶元修。沿途，陕州守将见高欢亲自前来，望风而逃。高欢继续追到潼关，发现元修已经被宇文泰接走了，只好先东还洛阳。洛阳周边那些群龙无首的军队纷纷败降。

南边的荆州刺史贺拔胜之前也动员军队，想到洛阳“勤王”。中途听说元修已经失败了，就想带兵西入关中，和宇文泰合兵一处。高欢派兵占领华阴，堵住了贺拔胜西进的道路。贺拔胜只好退回荆州，又被侯景打败，无奈之下南逃，投降梁朝去了。梁武帝萧衍对北方降将不分阵营，一律以礼相待，非常客气。贺拔胜在南梁生活优越，却日夜思念北方，遇到南飞的秋雁都不舍发弓。两年后（536），贺拔胜得梁武帝许可，辗转奔赴长安。他加入宇文泰阵营，要向高欢讨还弟弟贺拔岳的血债。

不久，高欢第二次亲自率军进攻潼关，斩宇文部的行台华长瑜，进而占领华州，但还是没能夺回元修。元修在长安站稳脚跟后，向天下宣示高欢的罪恶，号召天下勤王杀贼。高欢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十月，他在洛阳推清河王元亶的儿子，即年仅十一岁的元善见为新皇帝。高欢换上一个新皇帝，否定了原来皇帝的合法性。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推卸元修的一切指责，无视长安的一切命令了。同时，高欢还可以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唯一不妥的是：北魏出现了两个皇帝！

高欢没觉得两个皇帝有什么不妥，反正在他统治的关东和河北地区还是只有一个皇帝。逃亡的元修既不被他承认，又处在本就不听自己号令的长安，高欢眼不见心不烦。唯一让高欢觉得不妥的是：洛阳原本邻近梁国，如今又在关中文武泰军队的威胁之下，很不安全。高欢就带着元善见迁都邺城。从此，北魏分为东西两部：关中以长安为

首都的政权被称为西魏，关东以邺城为首都的政权被称为东魏。双方大致以南北走向的黄河为界，在现在的山西南部 and 河南西部地区展开厮杀。

第六章 北魏分裂殃及南梁

两魏争锋，神仙打架

—

北魏分裂后，东强西弱。东魏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且经济基础好过千疮百孔的西魏，自然国力要强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是，高欢继承了六镇起义的多数余众，而宇文泰周围只聚集了少数六镇官兵。这是东强西弱的军事原因——当时，六镇官兵战斗力最强。

高欢的部队以鲜卑人为主，汉族人很少。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鲜卑官兵普遍歧视汉族人。东魏大将高敖曹是汉族人，英勇善战。高欢发号施令的时候，一般用鲜卑语，但只要高敖曹在场就改用汉语。高欢如此敬重高敖曹，底下官兵也就很忌惮他。一次议事，有人报告说治河的汉族民工淹死了不少。在座的鲜卑族将领刘贵随口就说：“汉人的性命不值一文，随他死！”高敖曹闻言大怒，拔刀就向刘贵砍去。刘贵落荒而逃。高敖曹还不罢休，随之鸣鼓起兵，集合部队要进攻刘贵。同僚们好生相劝，高敖曹才罢手。

高欢深知属下鲜卑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矛盾。他两方面都不得罪，将民族矛盾压制得很好。他对鲜卑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你们耕作，女人为你们纺织，上缴粟帛赋税让你们衣食无忧，你们

为什么还要欺凌他们呢？”遇到汉人，高欢又说：“鲜卑人是你们雇佣的兵客。你们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东西吃，他们替你们防盗击贼，保你们安宁度日。你们为什么还要恨他们呢？”一次，汉族大臣杜弼请求高欢消除内贼。高欢就问内贼是什么人。杜弼直言是那些掠夺百姓的鲜卑贵族。高欢默不作声，而是下令营中将士搭弓上箭、高举大刀、夹道而立，形成一片刀山箭林。然后，他命令杜弼到里面来回走动一趟。杜弼一介书生，哪里见过此等场面，吓得浑身哆嗦、汗流浹背，不敢往前走。于是高欢就对杜弼说：“现在他们只是搭箭不射、举刀不砍，你就被吓得失魂落魄了。诸位鲜卑将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百死一生，又怎么说？他们之中或许有人犯了贪污冒抢的过错，但与他们平时的战功相比，怎能相提并论！”杜弼跪地顿首，为自己的冒失谢罪。可见，在高欢看来，汉族人和鲜卑人各有所长，自己的统治离不开任何一方。可他对双方矛盾采取的“遮盖子”的做法，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帮助。

高欢拥有实力优势，很想平定关中，完成北方的统一。机会很快就来了。536年（东魏天平三年，西魏大统二年）年末，关中大饥，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高欢抓住机会，于十二月出兵进攻西魏，挑起了两魏之间的第一次决战。

高欢派遣高敖曹攻上洛（今陕西商州）、窦泰攻潼关，亲自领兵于次年（537）正月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南）造三座浮桥，准备抢渡黄河。宇文泰的部队人少，不足以分兵抵抗，部将们就建议集中主力先进攻北边的高欢大军。但是，冬天北方天寒地冻，黄河多处结冰，高欢如果真想进攻，直接涉冰渡河就行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搭建浮桥。因此宇文泰判断高欢此举是佯攻，是想掩护南边窦泰这支偏师。于是，决定先集中兵力击退窦泰。部将们都不以为然，认为高欢近在眼前，不做防备，反而掉头进攻窦泰，很可能遭到高欢和窦泰的两面夹击。宇文泰力排众议，坚持先打窦泰。果然，窦泰没有料到西魏大军如此重视自己，竟然集合兵马掩杀过来。他猝不及防，仓促列阵迎

战，被宇文泰打得大败。部下死伤殆尽，窦泰自杀身亡。高欢听到窦泰兵败后，失去信心，下令毁掉浮桥撤军。西魏军队乘势追击，东魏军队连战连败。战事异常惨烈，东魏大将薛孤延负责殿后，一连砍坏了十五把钢刀，才保护高欢一行人安全脱险。高敖曹闻讯，也主动撤兵。这第一战，以高欢的失败告终。

胜利的宇文泰，日子也不好过。正值大饥荒，士兵们都吃不上饭。同年八月，为了抢夺粮食，宇文泰主动出兵河南。两魏之间爆发了第二次大战。

宇文泰顺利攻克了恒农（即弘农，今河南灵宝），得到了此处的粮仓。高欢点起二十万大军，亲自来会宇文泰。宇文泰赶紧带上粮食，退回关中。闰九月，高欢领兵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北部。在南边，东魏大将高敖曹率兵三万把恒农团团围住。宇文泰手头只有不到一万的兵马，又面临着南北夹击的困境。

高欢志在必得，督率大军迅速向关中腹地进军。宇文泰驻扎在渭水南岸，用抢来的粮食让手下官兵恢复体力，同时征召诸州兵马。高欢的军队行进很快。西魏诸将认为实力悬殊，建议宇文泰按兵不动，等兵马陆续会合、大家休息好之后再迎战。宇文泰认为：“如果高欢逼近长安附近，民心必定降服于他。到时候，我们再想打败他就难了。现在高欢新到关中，我们还有机会击败他。”于是宇文泰硬着头皮带领又饿又少的军队渡过渭河，向东北方向进军迎敌。两军在沙苑（今山西大荔南）相遇。

战前，宇文泰派手下将领达奚武带兵化装成东魏军士，傍晚混入高欢营内，将东魏军中一切部署都查明了。东魏方面对宇文泰的实力也一清二楚。大将侯景建议高欢不必与宇文泰交战，只要僵持着，等到敌方军民饿死大半，宇文泰不死也要投降。侯景还建议高欢趁宇文泰主力都在沙苑，分兵多处之时，占领关中其他地区。当时宇文泰的军队只有三天的军粮，迫切需要速战速决。侯景的建议不失为明智之

举，但是高欢没有采纳。高欢寄希望于在沙苑彻底消灭宇文泰，轻松收复整个关中。等敌人饿死的主意，在他看来太费时了。

宇文泰在沙苑以东十里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埋伏精兵，然后背水列阵，等着高欢主动进攻。东魏将军斛律羌举再次建议高欢分出一支精兵偷袭长安，给宇文泰来个釜底抽薪。当时高欢完全具备这样的实力，也有机会，但他对自身实力过于自信，还是嫌此举多余，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即将开始的沙苑之战上。不过高欢看到渭河边上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芦苇丛，心生疑虑，下令放火烧掉渭曲芦苇。关键时刻，侯景站出来说：“我们应该生擒宇文泰宣示百姓。如果他躲在芦苇丛中，就会被烧成焦炭，那么我们胜利之后，宇文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不会有人相信我们大胜了。”高欢踌躇之间，大将彭乐大声叫嚷道：“我军人多势众，以百敌一，还怕打不赢吗？”这句话让高欢信心满满，下令全线进攻。

东魏官兵看到渭河边只有屈指可数的西魏官兵，个个贪功冒进，还没排列队形就争相进攻，松松垮垮地散成一片。两军相交，宇文泰亲自擂鼓，埋伏在芦苇丛中的官兵奋起而出。大将李弼率领铁骑横击东魏主力，将高欢大军截成两段。西魏将军李标、耿贵技高胆大，铠甲袍裳全被敌人鲜血染得透红。东魏将领也不甘落后，大将彭乐杀入西魏阵中，肠子被敌人的长矛扎得流出来了，他就用手把肠子塞回肚子，抡枪再战。无奈东魏大军队伍散乱，各自为战，逐渐遭到西魏军队有组织的围剿。在远处观战的高欢看到自家军队渐渐处于下风，想集结兵力后再战。派出去召集军队的军官很快回来禀报，找不到成建制的军队，将不知兵，兵不见将，没人应答。高欢知道大势已去，又不甘心二十万大军就如此溃败，是战是退犹豫不决。大将斛律金劝他：“众心离散，不可复用，不如立即退回黄河以东，整军再战。”他怕再打下去，东魏军队会全军覆没。高欢紧紧握住马鞍，连声叹息，就是不说话。斛律金情急之下，狠狠鞭打高欢的坐骑。坐骑惊起，驮着高欢往回就跑。东魏官兵见状，纷纷向东逃去。

高欢之前压根没做撤退准备，到了黄河边上，既没有船，更没有桥。随从找了一匹高大的骆驼让高欢骑到黄河之中，再换乘大船狼狈渡河去。回到山西一统计，东魏此战丧失官兵超过八万人，丢弃铠仗十八万件，元气大伤。沙苑之战中，高欢离长安是那么近，沙苑之战后，高欢离长安越来越远，东西争锋的主战场从河西和关中转移动到了河东（山西南部）和河南。东魏再也不能随意侵入关中。

沙苑之战的胜利出乎宇文泰的意料。他俘虏了数以万计的东魏官兵，只挑选了其中精壮的两万名，补充西魏军队，其余数万人都赶回东边去了。一方面是关中粮食奇缺，宇文泰养不起那么多人，另一方面是宇文泰原本兵微将寡，收编、消化两万人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作为西魏军队核心的武川镇兵不过数千人，宇文泰击败侯莫陈悦后，敌将李弼率万人投降，跟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河南军队也有近万人，三股力量合起来不到三万人。之后因为连年征战和饥荒，到沙苑大战前宇文泰能集合的士兵不过一万人。战后，通过收编俘虏、招募汉族百姓等措施，西魏军队人数开始增多。到大统八年（542）年初，宇文泰正式建立六军，才有了大约十万人——这个数额依然远远低于东魏的高欢大军。

沙苑败绩传到河南，高敖曹主动撤去恒农之围，退军洛阳。宇文泰乘胜追击，高敖曹又放弃洛阳，撤到黄河之北。西魏收复洛阳，河南大部分郡县纷纷改旗易帜，归降西魏。这些都算是沙苑之战的衍生战果。宇文泰兴奋地带着西魏新皇帝元宝炬回洛阳祭扫先帝陵庙。因为这场大胜，大大巩固了偏居一隅的西魏政权，也巩固了宇文泰在朝中的主宰地位。

高欢并不服输。大败后的第二年（538），他任命老伙计侯景为河南方面的主将，集结军队，着手收复河南州郡。侯景顺利夺回洛阳，烧毁了洛阳的大部分民居官寺。洛阳在东魏迁都邺城之时，高欢就带走了洛阳的绝大多数百姓及宫殿庙宇，仅存的一些建筑如今又在熊熊火焰中成为一片废墟瓦砾。宇文泰闻讯，亲自领兵迎战侯景。东西之间的第三次决战，就在洛阳郊区展开了。

听说宇文泰亲自前来，侯景乘夜从洛阳后撤。宇文泰因为之前两战皆胜，滋生了骄傲轻敌的心理，以为侯景是怯战逃跑，轻率地带领部下轻骑追到黄河边上。此时，侯景军队已经占据了优势地形：北据河桥、南依邙山，甲冑鲜明，就等宇文泰前来厮杀了。混战开始后，宇文泰的战马中流矢惊起，把宇文泰摔到地上。东魏士兵围杀上来，宇文泰的大多数随从都吓得逃跑了。情况紧急！将军李穆连忙下马，用马鞭抽打趴在地上的宇文泰，假装叫骂：“你这个糊涂兵，你们主帅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就你趴在这里？”围上来的东魏士兵听李穆的口气，就以为宇文泰不是什么重要角色，纷纷扭头散去追杀更重要的目标。李穆扶宇文泰上马，双双西逃。

西魏大军陆续赶到，加入了混战。两军在黄河岸边杀得硝烟四起，战区越来越大，从河桥蔓延到邙山，又燃烧到洛阳城下。此战因此被称为“河桥-邙山之战”或者“河阴之战”。双方官兵杀得兴起，逐渐失去了联络，各自为战。

东魏大将高敖曹一向轻视宇文泰，又自视甚高，树起硕大无比的旌旗，上面写着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又摆出贵重的伞盖，耀武扬威地杀到阵前。如此高调，岂能不招人瞩目？西魏官兵认定这是个大角色，一窝蜂地围攻高敖曹而来。越是西魏的精兵悍将，越不放弃这等立功良机，杀得就越英勇。可怜的高敖曹成了活靶子，很快就全军覆没，自己又遭西魏精锐追击，孤身一骑跑向河阳城。

驻守河阳的是高欢的侄子高永乐，一向和高敖曹不和，下令关闭

城门不让高敖曹进城。高敖曹向城上大声呼救，央求守军放下绳来，没人搭理。他只好挥刀猛砍城门，想劈个洞出来钻入城中。无奈城门太厚，砍了很久也砍不开。眼看大队追兵杀到，高敖曹知道性命不保，反而镇定下来。他转身昂首向追兵冲杀而去，一边跑一边大叫：“来！与汝开国公！”意思是杀了高敖曹，就能从宇文泰那里获封开国公作为赏赐。

据说杀死高敖曹的是一名普通西魏士兵。宇文泰并没有封他为公爵，而是赏他布帛一万匹。估计西魏财政拮据，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布帛，就来了个“分期付款”，每年赏给这名士兵若干匹布。直到南北朝结束，这名士兵及其后代都还没领完赏赐。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两军从早到晚鏖战，团团厮杀在一起。傍晚时分，战场上气雾四塞，一片阴暗。各自为政的将领们都不知道谁胜谁负。西魏大将独孤信、赵贵等人感觉东魏的官兵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混乱之中又不知宇文泰和皇帝的消息（当时来洛阳扫墓的皇帝元宝炬还没撤回），以为本方已经落败。于是两人率部撤退，西魏其他将领见状，纷纷指挥部队边战边退。在后方观战的宇文泰见本方官兵后撤，也烧营逃走。东魏军队在后面掩杀。如此一来，战局真的对西魏不利了。

西魏大臣王思政出身文人，当时也在洛阳前线。众人无组织撤退之时，王思政却带领身边的人主动阻击东魏追兵。他跳下马来，手持长矛，左挑右刺，连杀数人。敌军越聚越多，王思政等人陷入重围。左右之人无一幸免，王思政也重伤昏厥，被埋在尸体堆中。当时因为天黑，敌军又急着追击，所以没有仔细打扫战场。加上王思政当时破衣烂甲，躺在那里一点儿都不像将帅，所以首级没被敌人割去领赏。后来，下属在尸体堆中好不容易把王思政扒出来，拉回营帐抢救，王思政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西魏军队陆续撤退到恒农，才缓过劲儿来，站稳了脚跟。宇文泰

损失兵马过万，决心退兵回长安休整。王思政的表现给宇文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刮目相看。所以宇文泰留王思政守恒农，负责河南事宜。

恒农以东的河南郡县又纷纷投降东魏。东魏重新占领洛阳，高欢索性将这片废墟夷为平地。洛阳自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彻底成了一个历史地名，一个政治标记。此战，东魏虽然夺回了大片土地，可也伤亡惨重。高欢痛失一代名将高敖曹。高敖曹虽然在东魏人缘极差，对高欢却是忠心耿耿，鞍前马后，出力不小。他死后，高欢追赠高敖曹为太师、大司马、太尉。见死不救的高永乐，被打了一百军棍。

此后四五年时间，河南地区安静多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决战。在河阴之战的那年冬天，西魏发动突袭，再占洛阳。这个战果仅仅具有宣传意义，连胜利都算不上。东魏都懒得出兵收复。真正有影响力的行为是王思政修筑了玉壁城（在今山西稷山）。此城地处黄河北岸，周边地势险要、深谷纵横，易守难攻。西魏以此作为据点，控制河东地区，间接威胁高欢的大本营晋阳。之后，玉壁成了西魏前进的重镇，也成了东魏必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战争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

频繁战争让宇文泰头疼死了。

每一次大战都是对宇文泰统治地位的挑战。不仅战场的胜负关系着他的生死，战场之外的因素也决定着他的成败。沙苑之战是在弹尽粮绝之前的侥幸取胜，河桥-邙山之战更是差点儿要了他的命。河南前线的败报传到关中，关中不服宇文泰统治的官民和之前收编安置的俘虏揭竿而起，要推翻宇文泰。有一支叛军甚至攻占了长安的子城。幸亏宇文泰大军及时赶了回来，将叛乱火苗一一扑灭。

宇文泰深深认识到：打仗就是打钱粮，就是拼后方！无奈的是，关中原本就落后于东方，宇文泰控制的人口少、领土小，经济基础更比不上高欢。怎么办？硬件比不过，只能拼软件，争取向管理要生产力、向改革要胜利。可是，一场成功的改革谈何容易？

一天，宇文泰和公卿大臣去昆明池观鱼，途中经过城郊一处西汉时的仓地。宇文泰就询问此地的来历，左右大臣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来。宇文泰正唉声叹气的时候，有人推荐了一个小官——著作郎苏绰。宇文泰把苏绰召来一问，苏绰将仓地的来历讲得头头是道，顺带着涉及西汉的历史、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宇文泰越听越有兴趣，就进一步向苏绰请教天文地理、天下兴亡的知识，苏绰都一一道来，其中不时闪现出真知灼见。宇文泰干脆和苏绰并马而行，边走边谈。到了昆明池，宇文泰根本无心钓鱼，马上带着苏绰返回城中。两人彻

夜长谈，宇文泰向苏绰咨询治国之道。

苏绰是关中武功人，出身豪门世家，祖先从三国时代起历任高官显贵。他从小继承家学渊源，博古通今，名声在外，可惜在鲜卑族的统治下一直默默无闻。镇兵出身的宇文泰没读过书，之前并不重视苏绰这样的汉族知识分子。经过这次长谈，宇文泰完全折服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让宇文泰顿时发现了一座丰富的政治宝库，开阔了眼界，隐约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苏绰著作郎的官职，还是尚书仆射周惠达举荐的。第二天，宇文泰遇到周惠达，大喊：“苏绰真是奇士！我要把国政都交给他。”于是苏绰平地一声雷，出任了宇文泰的左丞，掌管机密，实际主持西魏的改革。

大统七年（541），苏绰在宇文泰的支持下起草诏书，以皇帝名义颁布施行。诏书分别从治心、教化、地利、贤良、狱讼、赋役六个方面出发，主张进行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改革。改革的措施分为两方面。一是改革现存的弊病，改变之前西魏政坛近乎无法无天的原始状态。在政治上，颁布《大统式》作为统一的法律，规范官制，裁减冗员。宇文泰主张不苛不暴、法不阿贵，官吏犯法一视同仁。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州县，结果被赐死。在经济上，恢复了之前惨遭破坏的均田制，使那些因土地兼并、天灾人祸和连年战乱而背井离乡的流民重新与土地结合了起来。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取代征兵打仗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考核目标，因此地方官吏纷纷重视农桑生产。此外，西魏还大力发展屯田。关中经济很快有了起色，稳步发展。

改革举措的第二个方面是因时因地，建立新制度。宇文泰恢复鲜卑族的旧姓，让改姓汉姓的少数民族改回原姓，希望以此摆脱汉人柔弱奢华的毛病，保持战斗力。宇文泰仿照鲜卑旧俗，将军队分为八部，各部设柱国大将军统帅；士兵另编军籍，作为职业军人，不从事耕种，也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称为府兵。统率府兵的八名柱国大将军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和侯莫陈

崇。宇文泰地位最高，统率其他柱国大将军。元欣是西魏宗室、孝文帝的侄子，基本上只是挂个虚职，指挥不动军队，实际管事打仗的是剩下的六位柱国。每位柱国都督两名大将军，一共有达奚武、李远、杨忠等十二名大将军。府兵制的创立，表面上看是倒退到鲜卑族早期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它仅仅是组织形式的“鲜卑化”而已，各柱国大将军也好，底下各级军官也好，都是中央直接任命，士兵对军官也没有依附关系。府兵完全是朝廷的军队。鉴于少数民族人数少，宇文泰大量吸引普通汉族百姓当兵。整编后的西魏军队有超过一半人是汉族人。这些汉族人不是改姓鲜卑姓氏，就是冒充少数民族，用“胡俗”来培养战斗力。

又比如宇文泰仿照周礼，革新官制，以周朝的继承者自居。这项改革对汉族人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一个鲜卑族的政权以汉族盛世周期的继承者自居，一下子拉近了自己和广大汉族人民的距离。很多北方汉族的地主和知识分子，逐渐放下了对西魏的排斥，转而与它合作。西魏抬出周朝来，还使得自己在和东魏、南朝争夺天下正统时占据了历史优势。

宇文泰在改革中的表现也不错。他虽然对制度革新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但放手让别人去做，同时唯贤是举，只要是德才兼备的人，哪怕出身微贱也大胆任用。西魏吏治较为清明，宇文泰的周围也聚拢了不同背景的有用之才。比如西魏大将李弼原是侯莫陈悦的部下，后兵败投降。宇文泰对他予以重用，提拔为八柱国大将军之一。两人坦诚相见，毫无戒备。

主持这场改革的除了苏绰，还有出身范阳卢氏的大臣卢辩。孝武帝元修西逃入关时，远在邺城任太学博士的卢辩闻讯，离家追随，单人匹马跟到关中。在西魏，他逐步升到尚书令。卢辩长于典章制度，这场改革的制度也大多由他制定。

西魏内部改革之时，外部战火一直没有熄灭。

543年（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新任东魏的北豫州刺史。高欢的长子高澄是个专横的色鬼，看到高仲密的妻子李氏貌美，一见面就想强占人家，扑上去就乱扯衣带。李氏宁死不从，拼命挣脱，衣不蔽体地跑去向高仲密哭诉。高仲密冲冠一怒为红颜，向西魏献地投降。宇文泰喜出望外，亲自带兵来接应高仲密。西魏顺利接收北豫州，占领虎牢关等战略要地，包围了黄河南边的河桥城。高欢也带上十万官兵，自黄河北岸渡河，抢占邙山，摆出决战的阵势。

两军势均力敌，谁都不敢抢先发动进攻，一连对峙了好几天。

宇文泰兵出奇招，在一天深夜，指挥主力悄悄向邙山奔去，想突袭高欢。东魏的侦察兵发现了偷袭而来的敌人，火速告诉高欢。高欢整兵备战。于是西魏的偷袭变成了黎明时分的两军混战。东魏大将彭乐带领数千骑兵，突击杀入西魏北军，所向披靡，一直深入西魏腹心。彭乐最初追随杜洛周起兵造反，后来投靠尔朱荣，中途突然投降葛荣，又转过来归附尔朱荣，之后才投靠的高欢，政治态度反复无常。东魏这边有人看不到彭乐的影子，就跑去对高欢说：“彭乐这小子又反水了！”高欢勃然大怒：“彭乐太反复无常了！”正发怒间，彭乐遣使告捷。他一举俘获包括西魏临洮王元柬等五个王爷在内的重要俘虏四十八人。高欢立即传令鸣鼓进军，东魏军沿路掩杀，斩首三万余级。西魏大败。彭乐追击宇文泰，紧咬不放。宇文泰狼狈地策马狂奔，还扭头向彭乐哀求：“彭将军，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你杀了我，明天你还有用吗？不如马上还营，把我丢弃的金银宝物一并取走。”彭乐一介武夫，轻易相信了宇文泰的话，折回去

捡拾战利品，整理了一大袋金银珠宝放在马上向高欢复命。高欢问他为什么没追杀到宇文泰。彭乐如实相告，最后还声明：“我并不是因为他的话才放了他的。”高欢再一次震怒，当场勒令彭乐跪下，亲手抓着他的头往地上撞。这还不解恨，高欢几次举刀要砍彭乐的脑袋，可最终没砍下去。彭乐哀求高欢给他五千人马，再去追捕宇文泰。高欢长叹一声：“晚了！”最后他赏赐给彭乐三千匹绢。

第二天，两军重整旗鼓，再次大战。宇文泰兵分三军，合击东魏军。刚好有一名东魏的小兵犯了军法，为了避祸投降西魏。他向宇文泰指明了高欢的确切位置。宇文泰马上集合精锐将士猛攻高欢所在。很快，高欢身边的将士几乎悉数被歼灭。高欢带上几个亲随，策马逃跑，没跑几步，他的坐骑就被射死了。部将赫连阳顺下马，把马让给高欢，自己殿后掩护。很快，西魏追兵又杀到高欢背后。部将尉兴庆对高欢说：“大王快走，我腰间尚有百箭，足以射杀百人，保护您撤走。”高欢感动地说：“如果你能生还，我任命你为怀州刺史。如果你战死，你的儿子就是刺史！”尉兴庆说：“我儿子太小了，希望大王让我兄长做刺史。”高欢一口答应下来。尉兴庆殿后，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西魏士兵乱刀砍杀。

有东魏降兵为了邀功，把高欢逃跑的方向报告了宇文泰。宇文泰组织一支敢死队，人人轻装快马，一心追杀高欢。他任命大都督贺拔胜为队长。贺拔胜有个弟弟，就是贺拔岳，当初被元修任命为荆州刺史。高欢唆使他人杀了贺拔岳，和贺拔胜有了杀弟之仇。高欢派侯景进攻贺拔胜，又和他结下了战场之仇。元修逃到关中后，高欢将留在东魏的贺拔家族的大哥贺拔允也杀了。贺拔允和高欢关系不错，是支持高欢的，想不到也遭到不测。至此，贺拔胜和高欢又多了杀兄之仇。三仇合并，贺拔胜与高欢不共戴天，因此是追杀高欢的最佳人选。他很快就在混战之中，发现了正仓皇逃命的高欢的影子，飞马执槊，带上十三骑追杀而去。贺拔胜一口气追了数里，好几次槊尖都要刺到高欢的后背了。他情绪激动，大喊：“贺六浑（高欢的鲜卑名），我

今天一定要宰了你！”高欢害怕得几乎全身都趴在马背上了。仿佛有上天保佑，危如累卵之际，高欢随从扭身射了一箭，正好射死了贺拔胜的坐骑。等贺拔胜起身，找到马匹想再追，高欢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贺拔胜顿足痛惜：“我今天竟然忘了带弓箭，真是天意啊！”

高欢所部虽然失败了，但东魏其他部队并没有战败。相反，西魏赵贵等部抵敌不住，开始退却。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东魏军队冲杀过来，宇文泰率军逃跑。幸好有独孤信等人收集溃散的官兵，从后面掩击东魏追兵，西魏军队才得以脱险。此战，西魏失败，失去了包括虎牢关在内的北豫州等地。宇文泰不得不退兵河南西部。

高欢率军进入陕州，部下封子绘等劝高欢乘胜西进，彻底消灭宇文泰，一统两魏。但多数将领战斗意志不强，反对继续用兵。事实上，东西两魏实力相当，宇文泰军队的主力也相对完好，高欢权衡之下，下令撤军。高欢率主力回晋阳，任命侯景为司空，全权负责河南军政。侯景俘获了叛徒高仲密的妻儿，将他们送至邺城。由于高乾、高敖曹都是高欢功臣，高仲密的弟弟高季式听说兄长起兵后马上自首，因此高欢并没有将高家连座族诛，只杀高仲密一家。临刑前，色狼高澄去见将被处死的高仲密的妻子李氏，问：“今日如何？”李氏默然，只好被高澄纳为妾室。高欢又杀掉了贺拔胜留在东魏的所有儿子，以报战场上的追击之仇。贺拔胜在关中得知，吐血而亡。

邙山之战后，宇文泰不得不扩大招兵范围，补充战场损耗。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地方豪强纷纷组织乡兵自保。宇文泰把这些乡兵武装都收编为正规军，任命当地豪强或者有名望的人物为统领。如此扩军，遭遇到的阻力很少，不仅加强了西魏王朝的军事力量，又削弱了地方势力。扩充的新军，主要是汉族人，宇文泰部队中汉族人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同样，新任命的将领中，汉族人的比例也不断提高。以武川镇军人为核心的六镇武装和关陇汉族地主势力，因为历次整编和扩充，日益联合了起来。

东魏高欢已经年过五旬，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再会一会宇文泰——如果能歼灭宇文泰就更好了。

546年（东魏武定四年、西魏大统十二年）十月，高欢召集东魏十万精兵，围攻西魏位于汾河下游的重要据点玉壁城。此城由大将王思政筑造，但王思政已经调离，推荐韦孝宽守城。玉壁城中的西魏守军不过数千人。高欢对攻下此城信心十足。他的目的是以玉壁为引子，吸引宇文泰出兵增援，然后在河东来次新的决战。但是玉壁城地势险要、防守坚固，韦孝宽对守城信心满满，并没有向关中请求增援，宇文泰也相当放心，不派一兵一卒。从一开始，高欢的目标就落空了。

这次一厢情愿的决战，变成了十万大军的攻城战。高欢指挥官兵昼夜攻城，毫不懈怠；韦孝宽目不交睫，认真守城。一时硬攻不下，高欢转而智取。第一招是“断水”。玉壁守军之前从汾河汲水饮用，高欢就派人改掘河道，断了韦孝宽的取水之路。韦孝宽便下令在城内凿井取水，城中人马安然无恙。第二招是“造山”。高欢在城南造起土山，山比城高，想居高临下攻入城去。韦孝宽就在原先城墙的两个城楼之间绑缚木柱，搭成木桥，高于土山。西魏守军反过来居高临下，向土山上的东魏士兵投石掷火。东魏官兵不能近前。高欢派人威胁韦孝宽：“即使韦孝宽搭桥上与天齐，我也会穿地入城取你人头！”于是，高欢使出第三招“钻地”。东魏军士挖掘地道，计划挖入城中。韦孝宽就沿着城墙挖出一条深沟，一等挖地道的东魏士兵跌入长沟，就地擒杀。守军还在长沟内堆满木柴，只要有地道暴露洞口，就派人往洞里填塞柴草，放入火把点燃，往地道内鼓气。地道中的东魏士兵不是被烧焦就是被熏死。高欢还有第四招“烧墙”。高欢继续派人挖掘地

道二十条，不挖穿城墙了，而是挖到城墙下面就用木柱支撑住，再以猛火燃烧，等地道内的柱子崩塌，好多段城墙也随之塌毁。这一招起初很奏效，玉壁城墙坍塌了多处。韦孝宽迅速在城崩处树立起大木栅，用尖槊弓弩防守住，东魏官兵还是不能攻入。

高欢接连失败，就开始用心理战。东魏官兵对城中大喊：“城中有能斩韦孝宽者，拜太尉，封开国公，赏帛万匹！”并向城内发射悬赏令。韦孝宽就在悬赏令背面亲笔书写“能斩高欢者也按此赏”，射回城外。高欢把韦孝宽留在东魏的侄子绑在城下，逼韦孝宽投降。韦孝宽看着侄子在面前被杀，也坚持不降。守军大受感动，誓死和韦孝宽共生死。

十万东魏大军苦攻玉壁五十多天，伤亡及病倒人数超过三分之二。韦孝宽岿然不动。高欢精疲力竭，一病不起。一天夜里，有大星坠于营中。古人认为，天降陨石就是将星坠落。高欢害怕这个天象落实到自己身上，主动撤围而走。

大军困于小城之下，已经引起了东魏内部的种种猜测。军中讹传韦孝宽用大弩射杀了高丞相。韦孝宽听说后，趁机派人四处高喊：“劲弩一发，凶身自殒。”撤退中的东魏大军开始军心不稳。高欢不顾病重，露天召集诸将宴饮。宴会上，大家情绪低落。大将斛律金唱起《敕勒歌》缓和气氛：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高欢触景生情。他仿佛回到了壮阔苍茫的怀朔镇、回到了雄姿英发的早年，一生的奋斗历程依次在面前闪过……高欢亲自和唱，哀感

流泪。武定五年（547）正月朔日，恰逢日食，高欢病死，时年五十二岁。

高欢死后，东西两魏之间长期没有再爆发新的决战。两边都把征战的目标对准了南方的梁朝。东魏的目标是南北方传统的战场：淮南江北。因为南梁的内乱，东魏斩获颇丰。不过，西魏在巴蜀地区的收获更大。

大统十八年（553），宇文泰派遣尉迟迥进军四川，占领了现在的陕南、四川、重庆等地。一年前，南梁大乱。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绎为了平定国内骚乱，称臣于西魏。西魏与萧绎订立盟约割占土地：西魏以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南），梁以安陆为界；梁元帝萧绎送人质去长安。

然而等南梁内部安定后，萧绎对屈辱性的盟约反悔了。他以称帝后不便向西魏称臣为理由，坚持南北方平等相待，并且要求西魏把之前侵占的陕南、四川、重庆和湖北北部等地区归还南梁。宇文泰大怒。恰巧萧绎的侄子萧詧（chá）向宇文泰借兵进攻萧绎。于是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底，宇文泰派步骑五万攻陷江陵。梁元帝萧绎被处死，魏军洗劫了江陵城，驱赶十余万百姓返回关中。萧詧在空城中被扶持为傀儡。西魏进一步占领湖北其他地区。至此，宇文泰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中游。

癫狂高洋与傀儡羔羊

—

高欢新立的孝静帝元善见是北魏孝文帝的曾孙。高欢和左右详细商议立元善见为皇帝的时候，认为洛阳虽然有位置上的优势，但是土地狭小，久经丧乱，城池残破，不适合作为首都；而且元修和宇文泰在长安居高临下，对洛阳构成威胁，因此，高欢等人选择邺城为新的首都。元善见就在邺城东北登基称帝，改元天平，成为东魏的开国皇帝，也是唯一的皇帝。元善见年幼，高欢继续主政，掌握军国大权。

高欢的统治相对平稳，高氏家族继续窃取权力。当时南梁虽然有北伐，但与东魏的关系仍以外交通使为主。高欢害怕北方士大夫视梁朝为正朔所在而投奔江南，也无意南向扩张疆土。为了抵抗柔然对分裂的魏国的侵略，高欢迎娶了柔然公主，对柔然奉行结交和好政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关中宇文泰的作战中。随着连年战争和关中的恢复，东魏和西魏逐渐形成了均势。高欢的平稳统治为儿子的篡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继承他的地位，受封渤海王、大将军，把持朝政。

高澄的才能无法和父亲相比，而且为人残暴猜忌，嗜权如命，导致内部人际关系紧张。比如他任用亲信崔季舒、崔暹（xiān）监督百官，对父亲留下来的大臣很不客气。结果，东魏内部怨气重重，和高欢一道起兵的大将侯景干脆就割据叛变，先后投降了西魏和南梁。

不过，高澄的运气实在是好。群臣虽然有怨气，但都被他的专横残暴所压制了。侯景叛变导致河南地区脱离东魏，却因为侯景首鼠两端、决策失算，东魏很轻松地就收复了河南大部分地区。意外的惊喜则是，高澄把“瘟神”侯景赶到南梁之后，南梁内部大乱，淮南江北各州郡的刺史、太守纷纷向东魏献城归降。高澄派人南下纳降，兵不血刃地接收了淮水以南的二十三州。这其中包括钟离、寿阳、合肥、淮阴等重要军镇，南北方的国境几乎推进到了长江北岸。高澄举手之间就完成了之前北方历代统治者耗费千军万马都没有实现的目标。

同时，高澄虽然没有在对西魏的战争上有大的进展，却攻占了西魏在河南的重要据点颍州。颍州治所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由西魏大将军王思政镇守。王思政是孝武帝元修时的老臣了，对西魏忠心耿耿，起初将城池守卫得很好。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刘丰生等都死在这里。高澄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兵临长社城下，采用水攻，将长社城淹成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城墙多处崩陷，储粮被淹，王思政不得已向高澄投降。高澄也不杀他，以礼相待。王思政几年后病死在北齐。长社陷落后，宇文泰放弃了河南的其他各州。高澄又轻松捡了个大便宜。

高澄因“功”使声望达到顶峰，被加封为齐王、相国，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礼。

元善见是个自幼聪明、文武双全的君主。他“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狮子以逾墙，射无不中”。意思是说这位皇帝长得很漂亮，喜欢文学，而且还能挟带着石狮子翻墙，射箭百发百中，这在历代皇帝中还真算得上是才能出众的。朝廷宴会的时候，元善见老是命令群臣赋诗，自己从容沉雅，颇有北魏孝文帝的遗风。但元善见始终是一个傀儡，未能亲政。杰出>的才干是多少代朝臣对君主的期望，但对于傀儡君主来说，它就变成负面因素了。高澄将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调任中书、黄门侍郎，监察皇宫的动静。因此元善见的大小举动都被崔季舒侦知，再告诉高澄。

元善见一次在邺城东部打猎，驱马驰骋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等人在后面紧紧追赶，高呼：“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意思是说皇帝不能跑得太快了，大将军知道了会发怒的。

高欢生前虽然专权，但对皇帝的表面功夫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他对孝静帝元善见毕恭毕敬，君臣之间倒也相安无事。但高澄一点儿表面文章都不做，在元善见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专横跋扈。一次，高澄和元善见一起饮酒。高澄举觞对元善见说：“高澄祝陛下长命百岁。”元善见听了，可能比较感慨，就不高兴地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怎么能受用这样的话！”高澄发怒了：“朕，朕，狗脚朕！”高澄说完还不解气，让崔季舒上去打了元善见三拳。当众殴打了元善见后，高澄奋衣而去。第二天，高澄让崔季舒去慰藉元善见。元善见也不得不表示辞谢，还赐给崔季舒绢。崔季舒哪里敢接受，就先跑去报告高澄，问自己是否能够接受。高澄让崔季舒取其中的一段。元善见就束了百匹绢给崔季舒。

元善见不堪忧辱，常常在宫中咏同时代南方大诗人谢灵运的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志义动君子。”

这是南方谢灵运遭地方官员弹劾后借古讽今、立志雪耻的诗。大臣荀济听闻后，知道元善见的心意，就与华山王元大器和元瑾等大臣密谋于宫中。他们三个人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在宫中以造假山为掩护，挖地道出宫。估计他们是想将元善见弄到城外去，再集结天下兵马做进一步打算。荀济计划的地道一直向北城方向挖进，到千秋门的时候，守门者察觉到地下有响动，赶紧跑去报告高澄。高澄领兵入宫，责问元善见：“陛下为什么要造反？我高家父子两代功存社稷，有什么地方辜负了陛下吗？”高澄当即下令捕杀宫中的妃嫔。元善见正色说：“自古只听说大臣反皇帝的，不曾听说还有皇帝反大臣的。大臣们造反，关我何事？我不惜生命，何况妃嫔！你如果打定主意要造反弑君的话，你就动手吧！”高澄见元善见来硬的，只好下床叩头谢罪。元善见见高澄服软了，就摆宴招待。高澄在宫中酣饮，到深夜

才出去。三天后，高澄还是将元善见幽禁在含章堂，而元大器、元瑾等人都在闹市中被当众烹死。

元善见在含章堂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不知道自己身死何时。一切似乎都明朗了，高澄马上就要篡位称帝了。

二

万万没想到，先传来的却是高澄的死讯。549年，高澄在家里被厨师刺死。

凶手是一个叫兰京的南方人。东魏在与南梁的战争中，南梁将领兰钦的儿子兰京被北方俘虏，高澄让兰京在家中配厨。兰钦请求赎回儿子，兰京本人也向高澄申诉，均被高澄拒绝。高澄还让监厨苍头薛丰洛杖责兰京，并警告他说：“再申诉，就杀了你。”兰京不是软柿子，秘密联结了六个人阴谋作乱。

当时高澄正准备接受魏禅，与陈元康、崔季舒聚集在北城东柏堂里密谋最后的步骤。太史向高澄警告说天象突变，一个月之内有动乱，提醒高澄注意。这天，兰京进东柏堂端菜。高澄不让兰京进来，对旁人说：“昨天晚上，我梦见这个奴才要杀我。”过了一会儿，高澄又说：“我要先杀了这个奴才。”兰京听了，把刀放在菜盘下，冒险进食。高澄见了，发怒说：“我并没有叫吃的，你为什么进来？”兰京拔出刀，恶狠狠地说：“我来杀你！”高澄急忙逃跑，伤了脚，躲入床下。兰京的同伙涌入堂里，掀去床板，将高澄乱刀砍死，高澄时年二十九岁。

高澄遇刺身亡，事出仓促。高家亲信连忙报告高澄的二弟高洋。高洋闻讯，神色不变，亲自斩杀了兰京及其同党，同时收殓哥哥，却

秘不发丧。高洋只是对外宣称家奴造反，大将军高澄受了一些轻伤，并无大碍。当时洛阳周边因为局势不明，出现骚动迹象，听到高洋发布的消息后才稍微安定下来。高洋再以东魏立皇太子为由，大赦天下。等待洛阳周边安定后，高洋紧急奔赴晋阳，接收军队，掌握权力。这时，高洋才向天下宣布了哥哥高澄的死讯。

听到高洋接替高澄的职位后，元善见天真地认为：“上天佑我，魏室可以复兴了。”

元善见轻视高洋是有原因的。高洋长相猥琐，皮肤黝黑，满身鱼鳞纹，平日窝在角落里少言寡语，和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大哥高澄相比，简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不仅高澄以为他没有什么能耐，连诸位大臣也看不起他。即使是高洋的生母娄昭君也忧虑地对他说：“你爸爸是龙，你大哥是老虎，才有了我们家如今的地位。现在轮到你了，你行吗？”

事实随即粉碎了元善见的幻想与外界的偏见。

高洋那是韬光养晦、城府深厚而已。在诸多的子女中，高欢最看好的，恰恰是二儿子高洋。一次，高欢拿出一团乱丝，叫几个儿子解开。当兄弟们解得手忙脚乱时，高洋拔出刀就砍，还说：“乱的该斩！”高欢很欣赏高洋的作风。还有一次，高欢叫高澄、高洋各带一队士兵行军，按照命令大将彭乐率领骑兵佯攻他们，想测算一下兄弟二人的胆略。高澄表现得惊慌失措，高洋却不慌不忙指挥部下迎敌。彭乐连忙说明来意。高洋不相信，将彭乐捆绑起来，押到父亲面前才把事情弄清楚。经过这些考验后，高欢生前虽然以长子高澄为继承人，但同时培养次子高洋。

高澄即位后，高洋担心遭兄长排挤陷害，刻意保持低调。他每次退朝回府就闭门静坐，整天不开口。有时，高洋在家里跑跑跳跳，夫人问他做什么，他只说玩玩而已。其实高洋是不想自己安逸下来，在

保持活跃的身体和精神。

在处理高澄被刺事件时，高洋从容自若、手段高超，让旁人大吃一惊。在晋阳，高洋大会文武大臣，期间神采飞扬、言辞敏锐，与昔日木讷安静的样子判若两人，令人刮目相看，全场都被震慑了。掌权后，对大哥高澄的政令，高洋几乎全部修改或废除。高隆之、司马子如趁机弹劾高澄亲信崔暹与崔季舒的过失，高洋将二人各打两百鞭，发配边疆。他很快就树立了权威，原本对高澄有怨气的大臣们，纷纷聚集到高洋的周围。

但是随着权势的迅速稳定，高洋却突然性情大变，很快堕落成了一个癫狂病人。他的行为越来越放纵，有时整天整夜唱歌舞蹈；有时披头散发，穿着胡服；有时骑驴、骑牛、骑骆驼、骑象，从不加鞍绳，随便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大臣的府第、贫民居住区，他自由出入，累了就在街上或坐或卧。高洋似乎寒暑不分，在冬天的严寒中裸露身体狂奔。

更可怕的是，高洋开始嗜血，杀人成性。他制造了许多杀人工具，有大锅子、长锯、锉刀、碓等，一一陈列在朝堂里。高洋喜欢喝酒，而且一喝醉就要杀人取乐。他经常从早到晚地喝酒，也就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甚至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盛怒之下。后来人们摸到主子的秉性，就预先将监狱中的死囚提到高洋住处，供高洋不时杀人之用。但是高洋杀的人太多了，官府的死囚不够用，亲信们就把拘留所里正在审讯中的犯人或者刚拘捕的嫌疑人拉来备用，史称“供御囚”。高洋出巡时，这些可怜的供御囚也跟在后面。官府定了一个奇怪的规矩：一个人只要做供御囚三个月而不死，即判无罪释放。

高洋幼年时，丞相高隆之对这个癫狂孩子不太看好，也就不甚礼遇。高洋登基后记起前恨来，下令将高隆之杀掉。之后高洋还不解恨，就把高隆之的二十多个儿子唤到面前表演集体屠杀。群刀齐下，

人头落地。高洋这才解恨。

丞相李暹病故后，高洋去李暹家祭吊。他问李暹妻子：“夫人是否思念丈夫？”李暹妻子回答：“结发夫妻，怎么能不想念啊？”谁知高洋说：“既然想他，就前去陪他吧！”说完，高洋抽出配刀，砍下她的头扔进了阴沟里。

高洋宠爱的薛贵嫔是妓女出身。一天高洋想起来薛贵嫔的过去不干净，就不顾夫妻情谊，将她杀掉了，但事后又想起她的美来。于是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在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欣赏。参加宴会的大臣贵族无不大惊失色。高洋思念更深，将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了一面琵琶。他抱着琵琶一边弹一边唱：“佳人难再得。”最后，高洋又为薛贵嫔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跟随在棺材后面，蓬头垢面，大声号哭。

高洋还有两个弟弟，永安王高浚和上党王高涣，经常劝说哥哥注意自己的行为。高洋烦了，就将这两个弟弟关到地窖的铁笼里。高洋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高浚和高涣既悲伤又害怕，颤抖着唱出歌来。高洋听得泪流满面，突然拿起长矛向笼中猛刺，还命令卫士们一起刺。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最终高洋命人堆上柴火将两人活活烧死了。高洋在执政的后期，老担心自己死后政权不稳，于是就把魏国元姓皇族全部屠杀。婴儿们被抛向空中，用铁矛承接，一一刺穿。但是在他死后，高氏亲属争权夺利，依旧难逃骨肉相残的厄运。

三

这是这么一个癫狂病人，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完成了逼宫禅让的过

程。

武定八年（550），元善见晋升太原公高洋为丞相、齐王，都督中外各军事。这时，徐之才、宋景业等人纷纷劝高洋称帝，宣称应该在五月受禅即帝位。高洋早有此意，于是从晋阳来到邺城，进行最后的准备。文武百官见局势如此，没有敢反对的。五月，元善见再任命高洋为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又以齐国太妃为王太后，王妃为王后。

五月初八，襄城王元昶、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侍郎赵彦深等人要求入朝奏事。元善见在昭阳殿召见他们，君臣间进行了东魏朝廷最后一场辩论。

张亮说：“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明仁德，深受老百姓爱戴，请陛下效法尧、舜，将帝位禅让给他。”元善见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只能在程序问题上拖延时间，说：“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准备制书吧。”中书郎崔劼、裴让之说道：“不劳陛下，我们已经写好了。”侍中杨愔献上制书，让元善见按照内容抄写一份。元善见只得照办。

元善见抄完后问：“你们将如何安排我呢？”杨愔回答说：“在邺城北城有所别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车驾，侍卫会带你过去的。”元善见慢慢地走下御座，走出东廊。这位文才出众的皇帝边走边咏范蔚宗的《后汉书赞》：“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元善见走到宫门处，相关官员请他上车出发。元善见留恋地说：“古人想念遗簪弊履。我想和六宫告别，可以吗？”尚书令高隆之说：“现在的天下还是你的天下，何况后宫呢？”元善见就与夫人贵嫔诀别，大家无不唏嘘流泪。赵国李嫔吟咏陈思王曹植的诗：“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皇后等人哭声震天。

直长赵德准备了一辆老牛车，等候在东上阁。元善见上车后，赵德竟然也赶上车来，坐在元善见旁边。像赵德这样的低级别的官员，

按礼是根本没有资格与皇帝同车的。元善见用手肘碰碰赵德，说：“我畏天顺人，授位给相国。你是什么奴才啊，竟然也敢逼我！”赵德坚持不下去。元善见只得与他同车走出云龙门，王公百僚整理衣冠跪在路边给皇帝送行。元善见极其感慨，说：“今天的我还比不上山阳郡公和常道乡公呢。”大臣们也都觉得很悲凉，很多人都流下泪来。

五月初十，齐王高洋在邺城南郊举行受禅典礼。当天，邺城出现赤雀，人们将赤雀献到郊所。高洋升坛，柴燎告天，正式接受皇位。事毕后，高洋进入皇宫太极前殿，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天保，国号齐，史称北齐。新皇帝大赏天下之民，百官进两大阶，六州缘边职人进三大阶。北魏孝庄帝以后，百官都不领俸禄，现在高洋又重新给百官发工资了。东魏只经历元善见一个皇帝，享国十六年。东魏全境进入北齐的统治，高洋终于成功篡权夺位。

高洋给逊帝规定了相当可观的优待条件。封元善见为中山王，食邑一万户；上书不称臣，答不称诏；出行可以使用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奉绢三万匹，钱一千万，粟二万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顷，园一所。元善见继续延续魏室正朔，在中山国立魏国宗庙。元善见的皇后被封为太原公主，各个儿子被封为县公，食邑各一千户。

高洋出巡的时候，常常让元善见伴随左右，以示恩宠，但元善见一家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过去北魏的各位皇帝即使禅让退位了，也没能得到善终，这些皇帝通常都会被新皇帝毒死。元善见的妻子为了防止毒物，每次吃饭前都为他吃东西试毒，尽力保护着丈夫。但是高洋还是找到机会，于551年下毒毒死了元善见。元善见年仅二十八岁，被追谥为孝静皇帝，葬在邺西漳北。

现在邯郸西南六十五公里处的磁县还保留着元善见的陵墓——天子冢。天子冢并不豪华，坟墓为封土形式，高约五十米，直径约一百

二十米。墓顶建有玉皇大殿和娘娘庙、观音庙。前后有台阶。至今，天子冢还是旅游景点。但是奇怪的是，一百零九级台阶与地面呈五十度角，游人登阶的时候，会发出叮咚的水声。当地人便说这是天子冢下的元善见不甘冤死的哀号之声。其实这何尝不是元善见一人的冤号，魏朝末期的元子攸、元晔、元恭、元朗、元善见，哪个皇帝不是冤死的？

傀儡皇帝不是好当的

—

说完东魏，我们来看看西魏。西魏的国运在宇文家族的羽翼庇护下又延续了二十四年。

落荒而逃的元修在宇文泰派出的军队护卫下，轻骑向长安而来。宇文泰礼数非常周到，备齐仪卫出城迎接，君臣在东阳驿相见。宇文泰免冠，哭泣着向元修谢罪：“臣不能遏制奸臣欺凌皇上，导致皇上驾车西行，是我的罪过。请皇上将我交给有关部门惩处。”这一刻，厌恶了高欢专权和蛮横的元修感觉一定非常好。他回答说：“你的忠节，整个朝野都知道。我因为德行不够，才被奸臣所乘。今天我们君臣相见，我非常欣慰。你不用谢罪。”宇文泰于是陪护元修进入了长安。

北魏朝廷西逃到关中后，百业待兴。宇文泰建立了西魏朝廷的雏形，还抵御住了高欢军队对皇帝的争夺。特殊的形势导致军国大政都由宇文泰专断，宇文泰以大将军、雍州刺史的职务兼尚书令，并晋封略阳郡公。朝廷还解除了尚书仆射的官制，加强专权。元修在洛阳的时候曾将冯翊长公主许配给宇文泰。婚事还没举办，元修就西逃了。现在在长安，元修为宇文泰举行了皇室婚礼，正式拜他做驸马都尉。

一个月后，高欢亲自领兵来争夺皇帝元修。高欢军队突袭攻陷了潼关，进军到华阴地区。宇文泰整军驻扎在霸上迎敌，迫使高欢留下薛瑾守潼关后撤回东方。宇文泰进军讨伐薛瑾，俘虏七千人回到长

安。元修晋升宇文泰为丞相。

当年十月，元善见即位，迁都邺城。北魏正式分裂。宇文泰度过了与高欢战争的最初困难时期，西魏朝廷得以初建，元修也给予了宇文泰充分的信任。

隆重的场面、恢宏的长安和重建的朝廷，这一切都使元修以为他成了一位真正的皇帝，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但他忽视了自从胡太后之乱后，北魏皇权已经旁落了数十年，他又怎么可能仅凭一次简单的西逃就将一切修复如初呢？皇权的丧失也存在惯性，一旦丧失超过一定期限，就不可能再次复兴。它就像过时的衣物，只有等待被新潮流取代的命运。

元修对宇文泰的期待也是错误的。他最愚蠢的地方就是将复兴北魏和夺回皇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宇文泰的身上。可他为何不想一想，宇文泰又凭什么一心一意做北魏中兴的功臣呢？宇文泰本身就是有志于天下的军阀，他与高欢是同一种人。而且宇文泰比高欢年轻，不像高欢那样宽厚。高欢虽然专权，但起码不干涉元修的私生活。元修的私生活混乱，长期与几位姐妹同居。宇文泰非常厌恶元修这一点，将他的几个姐妹全部驱逐出宫，并杀掉了其中的明月公主。元修暴跳如雷，要么弯弓搭箭，要么顿足捶案，大骂宇文泰。宇文泰就加强对皇宫的监视，防止元修再干蠢事。

满怀希望的元修一下子又陷入了绝望之中。他恍然觉得自己才出狼穴，又入虎口。

元修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做事从不分析前因后果，不仅过分夸大自身的实力，而且常以一时的好恶为出发点。即使处于被监视中，元修也一再扬言要除去宇文泰。结果几天后，元修就要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了，他能够感觉到黑暗中阴谋的矛头正指向自己的心脏。

元修从洛阳西逃后的第五个月，闰十二月癸巳，大臣潘弥向元修上奏说：“皇上在今天要小心有急兵。”这天晚上，元修在逍遥园举行宴会。他触景生情，对侍臣们说：“此处仿佛是洛阳的华林园，我不禁满怀凄怨。”元修命人牵来自己的坐骑波斯骊马，让南阳王驾马。不料南阳王在就要攀上马鞍的时候，掉在地上摔死了。元修受到极大的惊吓。

天色已晚，元修起驾回宫。到了宫殿后门，那匹波斯骊马硬是不向前走。元修使劲地鞭打坐骑，波斯骊马才步入宫中。元修看看天色，对潘弥说：“今天不会有其他事情了吧？”潘弥说：“到下半夜，如果没有事情，那就大吉了。”回到宫中，元修喝了一点儿酒。正是这酒要了元修的命，宇文泰已事先让人在酒中下了毒药。元修当即死去，年仅二十五岁。

元修不是个讨人喜欢的皇帝，死后被草殡于草堂佛寺。十多年后，才被葬入云陵。西魏给元修定的谥号是孝武，但东魏不予承认，坚持将元修称为出帝，意思是出逃的皇帝。

二

在元修之后即位的皇帝是元宝炬。元宝炬是孝文帝拓跋宏的第三子京兆王元愉的儿子。因父亲造反失败自缢，母亲受株连被杀，元宝炬的早年生活非常悲惨。他与兄弟和妹妹被囚禁在宗正寺长达七年，没有自由，更没有皇室身份。北魏末年，皇室成员凋零，元宝炬开始异军突起。他对高欢及其手下的骄横跋扈十分厌恶，公开扬言：“这些镇兵，怎么敢如此大胆！”因此孝武帝元修很器重元宝炬，任命他为太尉，并带他一起入关。

元修死后，多数大臣推举元修的侄子广平王元赞为新皇帝。濮阳王元顺劝宇文泰不要效仿高欢立幼主揽权，不如反其道行之，拥立一个平和老实的长君，以此把高欢给比下去。宇文泰于是推举元宝炬为新皇帝。元宝炬再三退让，实在没办法才不得不即位，改元大统。

元宝炬可谓是古代历史上的模范傀儡。他非常清楚宇文家族取代魏室的趋势，采取了无条件合作的策略，以求自保。在他统治时期，朝廷大权进一步落入宇文家族手中。

历史上的政治傀儡很多，他们的对策无非三种。激烈反抗，如曹髦、元修；消极罢工，对操纵者不理不睬，不配合，也是一种反抗。这两种态度常常使幕前和幕后之间爆发矛盾冲突，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当然更受伤的还是傀儡一方。元宝炬采取的是第三条道路，即积极、全面地配合操纵者的政治运作，忠实地做好傀儡。这样做的目的其实特别现实：保存性命。实权操纵者也最喜欢这样的傀儡，往往不威胁他们的性命。最终的结果其实是双赢。

元宝炬有一次登逍遥宫远望嵯峨山，感慨地对左右说：“望到这座山，不禁让人有脱屣归隐的意思。如果我满五十岁了，我就将政权交给太子，自己在山中采摘饵药，不再像现在这样一日万机了。”虽然元宝炬最后没有活到五十岁，但毕竟是正常死亡，基本实现了目的。他的结局远比元子攸、元晔、元恭、元朗、元善见等亲戚好得多。

元宝炬的命运和忍耐可以从他的婚姻中窥见一斑。

东西魏对立的时候，中原地区面临着北方柔然的严重威胁。东西魏都对柔然曲意逢迎以求自保。东魏把公主嫁给柔然统治者进行和亲，西魏宇文泰便要元宝炬娶柔然长公主为皇后。当时元宝炬已经有了乙弗氏皇后，两人非常恩爱。乙弗皇后生性节俭，平日穿旧衣、吃蔬菜，从不配饰珠玉罗绮，为人仁恕且没有嫉妒心，深得元宝炬之心。但是宇文泰的命令又是不能拒绝的，元宝炬只好迎娶了柔然的长

公主，立为皇后。他废掉了乙弗氏皇后，将她打入冷宫。元宝炬新婚后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柔然公主非常不满，她是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将自己婚姻的不幸归结为乙弗氏的存在。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元宝炬再次做出牺牲，将乙弗氏贬到秦州出家为尼。

元宝炬虽然将乙弗氏贬到边远的地方，但对她的爱意并没有丝毫减弱，相反是更加思念。两人还多次秘密通信传情。柔然长公主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向娘家哭诉自己的不幸。接下来的情节是柔然国出兵大举进攻西魏，出兵的名义就是诛杀乙弗氏。元宝炬感叹，爱情遇到政治怎么会如何艰难。但是一个女子和百万大军比起来，自然是后者更加重要。元宝炬于是忍痛派遣使者去秦州，敕令乙弗氏自尽。乙弗氏冷静地对使者说：“愿皇帝享千万岁，天下百姓康宁，我死而无恨。”随后走进卧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仅三十一岁。

元宝炬与乙弗氏的爱情最终还是战胜了政治风云。元宝炬死后，人们将他和乙弗氏合葬在一起，成全了他们的爱情传奇。两人的合葬墓穴就在今天的陕西永陵。

虽然元宝炬的个人生活不幸，但是西魏在他在位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东西方的国力竞争中，西魏由弱变强，取得了优势。国力蒸蒸日上，还开疆拓土，疆域扩大到四川和湖北一带。宇文泰为西魏灭亡东魏，直至最后为隋朝统一开启了大门。这其中，也应该有元宝炬的一份功劳。

大统十七年（551）三月，四十五岁的元宝炬驾崩于乾安殿，没能实现自己五十岁退隐的计划。一个月后，元宝炬被葬在永陵，谥号文皇帝。“文”是一个非常好的谥号，用以表彰元宝炬的文治成绩。在他死的前两年，东边的元善见禅位给了高洋。宇文泰并不急于登基，因此魏室得以在长安延续。

元宝炬的长子元钦在父亲死后，继承了皇位，却没有继承父亲对

傀儡角色的理解。他犯了一个傀儡最致命的错误：争夺权力。当时大权操于宇文泰之手，元氏皇权名存实亡，不少皇室宗亲对此忧愤不已。尚书元烈密谋杀宇文泰，事泄被杀。元钦对元烈之死愤愤不平，对宇文泰口出怨言，还密谋刺杀他。淮安王元育、广平王元赞等人常常劝谏元钦，甚至哭着请元钦注意言行，以免给皇室带来危害。血气方刚的元钦哪里肯听。三年后，对政敌毫不手软的宇文泰断然废掉了元钦。元钦在历史上被称为废帝。

元钦值得一说的是他的“一夫一妻制”。元钦即位后，立宇文泰的女儿为皇后。他虽然对宇文泰不满，却对宇文泰的女儿很喜欢。而宇文泰之女，“志操明秀”，品行端庄，和元钦十分相爱。为此元钦不置嫔御，专宠宇文皇后一人。元钦被废后仅两个月，就被宇文泰毒杀。皇后宇文氏悲伤过度，很快也死了，被认为是“忠于魏室”，其实说她忠于爱情则更加确切。

三

宇文泰挑选的新皇帝是元宝炬的第四个儿子——被封为齐王的元廓。

宇文泰显然希望元廓能够成为像他父亲那样合作的皇帝。在即位之初，两人的相处相对融洽。第三年，宇文泰因为身体状况开始恶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在该年的正月，让元廓行周礼，建六官，封自己为太师、冢宰。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宇文泰病逝。至此，西魏短暂历史中的两大主角元宝炬和宇文泰先后谢世。

宇文泰逝世后，十五岁的儿子宇文觉继承了政治遗产，由宇文泰三十五岁的侄儿中山公宇文护辅政。

宇文觉是宇文泰的第三子，母亲就是元修给宇文泰主婚的冯翊公主。宇文觉年幼的时候，善于相面的史元华给他相面，对宇文家说：“贵公子有至贵之相，只可惜他不长命。”宇文泰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挑选宇文觉为世子，不久又拜他为大将军。宇文觉顺理成章地接位。

宇文觉还是小孩，对政治不一定明了。但是辅政的堂哥宇文护却是野心勃勃的成年人。宇文护在辅政之初就极力推动宇文觉取代西魏。宇文觉接位后的第三个月，宇文护强迫元廓将岐阳等地封给宇文觉，封宇文觉为周公。几天后，元廓就下了禅位给宇文觉的诏书。又一个皇帝承认自己德行不够，主动禅位给大臣。

元廓先是派大宗伯赵贵拿着诏书去拜会宇文觉，接着隆重召开朝会，正式派遣户部中大夫、济北公元迪捧着皇帝玺绶去宇文家。宇文觉按照亲信们教导的那样，先是坚持推辞不肯接受。闻讯而来的公卿百官连忙集体劝进，声称宇文家取代魏室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事情，恳请十五岁的宇文觉接受帝位。在宇文护的监视下，百官们的劝进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恳切感人。太史还信誓旦旦地说天下出现了祥瑞，正是改朝换代、新皇帝君临天下的恰当时机。于是宇文觉接受了禅让诏书。

元廓非常知趣，在颁布禅让诏书后主动离开了皇宫。听到宇文觉接受的消息后，元廓在大司马府宣布逊位。

恭帝三年（556）十二月，宇文觉登受禅台，举行柴燎告天仪式，百官云集，沿途接受新皇帝的接见。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历了不止一次这样的仪式，对程序已经非常熟悉了。宇文家族二十四年的牢固统治几乎让所有人都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两位主角宇文泰和元宝炬因为逝世缺席了禅让仪式，而分别由他们年幼的儿子代表。宇文觉在这一天称天王，定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北周追尊宇文泰为文王。

逊帝元廓被封为宋公。第二个月，就被宇文护杀死，谥号恭。到了唐朝天宝七年（748），唐玄宗有感于拓跋部纵横中原的历史，在民间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第十代孙元伯明。元伯明被封为韩国公，延续魏室宗脉。韩国公一直传国到唐末。在古代禅让历史上经常扮演弱势一角的北魏拓跋家族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佛门天子”

—

当北方血雨腥风、动荡不宁的时候，南方保持着惊人的平静。和北方皇帝走马灯般地更换不同，南方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处于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梁武帝萧衍。

萧衍在位四十八年，超过整个南朝历史的四分之一，不仅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他的皇位是从同姓的南齐手中篡夺而来的。萧衍的前半生压根没想到自己能当皇帝，所以当纷扰初定、天下传到他手中后，萧衍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受禅当日，萧衍坐上皇帝的辇车，便对陪乘的老伙计侍中范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朕之今日，所谓慄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意思是我恐惧的心情就好比是用坏掉的绳索来驾驭六匹马。范云反应极快，当下回道：“愿陛下日慎一日。”皇帝已经当上了，辞职是不行了，只能加倍小心，边走边看了。所以，萧衍登基之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勤于政务。他不分冬夏春秋，坚持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南方的冬天有时极冷，萧衍的手指都冻裂了，还手不释卷，认真履行皇帝职责。

萧衍为政，有两大特点。一是宽。南梁改革刑律，强调“明慎用刑”，逐步将一些古老的肉刑，如劓鼻、刺字等废除，并改革各项滥刑和苛捐杂税。南梁的刑法相比各朝而言，很宽恤。这对老百姓有好处，可也产生了各种弊端，主要是官僚贵族们犯罪后惩罚过轻，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种纵容。二是俭。萧衍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节俭皇帝。他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盖两年，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每天常常只吃一顿饭，有时候干脆就喝点儿粥充饥。南梁社会风气在萧衍的带动下有了很大的改善。

萧衍最初的宰辅大臣是老伙计范云和沈约。他们三人早年都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座上宾，是竟陵八友中的三位。范云和沈约非常恪守朋友之义，尽心辅助萧衍。萧衍纳东昏侯萧宝卷的一个妃子为内室，宠爱有加，一度妨碍政务的处理。范云就进谏说：“当年汉高祖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灭秦后入关中却能做到不取秋毫、不幸妇女。如今明公刚平定天下，海内正对您翘首以待，您怎么可以被女色所拖累呢？”范云竟然自作主张，假传圣旨，将那名妃子赐给了将军王茂。事后，萧衍默许了范云的做法。

另一个老伙计沈约在南齐末年积极参与了萧衍的篡位活动，即位诏书就出自他的手。但萧衍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一次，萧衍因事严厉斥责了沈约，骂他：“你说说，你是忠臣吗？”这句话勾起了沈约埋藏很深的的不安。回到家里，沈约大病一场。他经常梦见被萧衍杀死的齐和帝萧宝融来找他算账。齐和帝挥舞着宝剑要割沈约的舌头，责备沈约这些文人误国误民。沈约求助于巫师，问：“作祟的是何方鬼怪？”巫师说：“大人的梦是真的！并非鬼怪作祟。”沈约慌忙办起法场，亲自给玉皇大帝写奏章。奏章大意说：禅代之事，沈约身不由己，请上天放过我！但最后，沈约还是忧惧而卒，为后人留下一部纳入二十四史的《宋书》。

范云和沈约两位老人死后，继起辅政的是徐勉和周舍二人。周舍是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生活俭约，执掌机要部门，二十多年从未有过半点疏漏。徐勉是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公正无私，能力超群。他担任吏部尚书时，一边手不停笔地处理案上堆积的文书，一边接待满堂的宾客，应对如流。皇帝勤俭，再加上用人得当，萧衍统治的前半期（502—520），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

周、徐二人死后，继起执掌机要部门的是中领军朱异。

朱异也很能干，处理起政务来像流水一般，从不让公文积压。不论政务多么繁重，朱异都能迅速做出判断，在短时间内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朱异有两大缺陷。第一，他是个大贪官。朱异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宅邸，台池园囿应有尽有，供家人和宾客游览。这些显然超出了他正常收入所能承受的范畴。朱异家里堆满了四方馈赠的财货，每个月要倒掉十几车吃不完的美味佳肴。朱异的第二个缺点更严重，就是阿谀奉承，以献媚得宠。历朝历代，阿谀奉承的小人不少。这种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人献媚，上面还得有人“安心消受”。恰好，萧衍因为二十年天下无事，经济又相对繁荣，对现实很满足，自我感觉良好，开始志得意满起来。朱异及时抓住了萧衍的心理，对南梁的国政来说，这可不是好事。

二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最大的名声是“佞佛”。

萧衍以佛教为国教，在南方大力推行佛教化运动。南方有佛寺近三千座，僧尼近百万人。天监十八年（519），他在华林园受戒，亲自带发修行，法名冠达。几年之前，萧衍就已经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鱼和肉，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并且在五十岁（514）后断绝房事，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女子。

后人应该相信，萧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早年，他就加入了以信佛著称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圈子，与无神论做坚决斗争。登基后，萧衍以国家之力大造佛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他的杰作，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实际的寺庙数量。

萧衍还是佛教活动的慷慨赞助者，多次举行四部无遮法会。所谓“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就是没有障碍，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萧衍亲自上台讲《涅槃经》和《三慧经》，面对数以万计的百姓滔滔不绝。可见，萧衍对佛经是有一定研究的。针对当时热门的佛教、道教与儒家三者的关系问题，萧衍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三教同源说”，认为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萧衍的“金口玉律”缓和了人们的思想冲突，对佛教的推广大有帮助。从这点来说，萧衍算得上是中国早期佛教史的重要理论家。

此外，萧衍还为佛教制定了很多戒律，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吃素。萧衍身体力行，不沾一丝荤腥，而且还规定和尚和信徒也必须吃素，下令祭祀不能使用牛羊。后来，有官民反映，认为祭祀不用牛羊，对祖先和神灵不敬。萧衍就改为用面粉捏成的牛羊，作为替代品用于祭祀。

一个皇帝，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自然有个人信仰之外的深层意思。南方地区之前屡经动乱，人心不安，萧衍登基后面临着如何安定国家的问题。萧衍认为，安定国家就要禁绝杀戮、收拾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观念、统一上下。恰好刚刚在中国兴起的佛教，能满足这一系列要求。于是萧衍决心“以佛化治国”。

萧衍的考虑不可谓不好，执行得也不可谓不真诚。但是他很快就做过了头，让一桩本可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大规模地建造寺庙和举办法会，都由国家买单，逐渐掏空了国库。大批人口出家或者托庇在佛教势力之下，又削弱了国家的税赋能力。萧衍不仅不反省和补救，还一条道走到黑，上演了多场皇帝出家的闹剧。出家的地点，都是皇宫附近的同泰寺。第一次是普通八年（527）三月八日，萧衍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第二次是大通三年（529）九月十五日，萧衍在同泰寺参加法会，兴之所至，脱下龙袍换上僧衣，出家了。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佛祖祷告，请求赎回皇帝，两天后萧衍还俗。第三次是大同十二年（546）四月十日。这回，群臣花

了两亿钱将其赎回。第四次是太清元年（547）三月三日，萧衍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这些巨款让本就枯竭的国库雪上加霜。而同泰寺则资金雄厚，楼阁台殿富丽堂皇，九级浮屠耸入云表，更有多座黄金筑造的大佛。可惜，花费了南梁无数钱财的寺庙，并没有保佑南梁国运长久。而所谓堂皇的佛寺最后也随着南梁覆灭，在几十年后成了一片废墟。

三

萧衍佞佛至此，每次批准为犯人所定的重罪后都要为之愁眉不展一整天，在内政外交上更是变得柔弱异常。如此一来又如何能抵抗北方强大敌人的侵扰呢？

萧衍对付北方的方针是：少打仗，多招降。

打仗杀人不符合南梁佛教治国的基本国策。况且萧衍对佛光闪耀下南梁的软实力非常自信，相信北方的蛮夷之辈终将被佛法吸引，摆脱黑暗投奔佛光普照的南方。果然，不断有北魏的官民投奔南梁而来，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连宗室亲王和藩镇大将都归降来了——只不过，他们不是被佛法所吸引，而纯粹是因为北魏大乱，到南梁逃命来了。萧衍对南逃的北魏官民，以礼相待，优待有加。对于其中的有用之人，萧衍量材录用，利用他们反攻北方，试图让降将叛兵们替他开疆拓土，做无本的买卖。

普通六年（525）正月，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梁。同时，南梁大将裴邃攻克河南新蔡、郑城等城，河南百姓纷纷响应。而北魏发生了胡太后诛杀元叉的政变，一时无暇应对。萧衍大喜，派次子豫章王萧综去接收彭城，督率前线各军，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萧衍的计划没有问题，他的儿子萧综却有大问题。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是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后宫，被萧衍接收后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所以萧综的父亲极可能是萧宝卷。宫中一直传说萧综的身世疑云，可萧衍并不介意，依然封萧综为豫章王。萧综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传言后，极为震惊！

萧综开始计划复仇，为此勤习武艺，在庭院中铺满沙粒，整天赤足在上面奔跑，练得脚下生风，据说能日行三百里。想伺机刺杀萧衍，但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他还写信给逃往北魏的南齐宗室萧宝夤，称他为“叔父”——这可是他唯一的“亲人”了。萧综多次请求梁武帝准许他带兵镇守边关，以便起兵造反，但一直没得到允许。

如今，萧综终于得到了统率军队的机会。他到彭城不久，就派密使向北魏接洽投降事宜。北魏方面对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非常怀疑，迟迟不做回复。六月初七，萧综等不及了，带上两个亲随连夜跑出彭城，徒步投奔敌营。魏军这才相信。第二天，梁军官兵找不到主帅，上下惊慌。对面魏军高喊：“豫章王已经归降我军，你们还待在那里干什么？”梁军群龙无首，自行溃散。魏军兵不血刃地收复彭城，还追击到宿豫方才收兵。

萧综投降后，北魏任命他为侍中、太尉、丹阳王，将寿阳公主嫁给他。萧综为“父亲”东昏侯萧宝卷举哀发丧，仪式相当隆重。南边的萧衍起初以为儿子是畏战投敌，听到丧礼消息后才知道儿子不认他这个爹了。他大发雷霆，剥夺萧综的封爵，将吴淑媛毒死。萧综在北魏也得不到重用，加上妻子寿阳公主后来被尔朱世隆所害，他颇有看破红尘的意思，弃官出家当了和尚——这点倒是得到了萧衍的“遗传”。萧衍听说萧综在北方混得不好，就派人给他送去小时候穿的衣服，招引他南逃。但萧综不愿意回来。

528年，萧宝夤割据长安造反，在北方恢复了南齐的旗号。萧综闻讯，从洛阳逃往关中，想和“叔父”共图复国大业，结果在黄河渡口

被北魏官吏抓捕，遇害。萧衍知道后，又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恢复了萧综的封爵，还派人把他的灵柩偷回南方，以礼安葬。

回到萧衍对北方的战略上来，他还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普通七年（526）七月，浮山堰旧址发洪水，寿阳城被淹。萧衍趁机派兵进攻寿阳。寿阳北魏守将投降，南梁成功收复淮河流域五十多座城池，边界形势大为改观。又比如河阴之变后，大批北魏宗室王爷归降南梁。萧衍立元颢为傀儡，派陈庆之护送他回洛阳。此举一度让陈庆之收复河南地区。但总体而言，萧衍的收获不大。6世纪的20至40年代，北魏屡次大乱，继而分裂，南梁对北方优势明显。如果遇到雄才大略的君主，措施得当，南方极可能大有作为，甚至灭亡北魏都不一定。可惜，萧衍白白葬送了历史良机。

四

萧衍的为政宽松和佞佛成性，导致南梁朝廷对官僚贵族非常宽容。萧衍对统治阶层收起了大棒，一味喂胡萝卜，对他们误国害民的恶行包庇放纵。

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弃军而逃，导致北伐失败，数以万计的将士无谓牺牲。萧衍却对他不加罪责。后来有人举报萧宏在府邸后院的大房子里私藏军械，萧衍却非去调查不可。他借故到临川王府欢宴，赴宴后又拉着萧宏去后院走走。后院有一百多间大库房，萧宏遮遮掩掩，不让萧衍打开看。萧衍见此，更是坚持打开查看，结果发现里面全部是金银财宝，光是铜钱就装了三十多间，共有三亿余钱。萧衍见不是军械，放心了，拍着萧宏的肩膀说：“阿六，你很会生活啊！”他压根就不问萧宏的钱是怎么来的。萧宏在皇兄的纵容下，越来越荒唐。他竟然和亲侄女，即萧衍的长女永兴公主乱伦。两人怕丑

事泄露，竟然计划弑君自立。事情败露后，永兴公主羞愧自杀。萧衍竟然还不追究萧宏的罪过。萧宏于普通七年（526）正常死亡。萧衍追赠他为大将军，谥为靖惠王，安排厚葬。

萧衍早年长期无子，过继了萧宏的儿子萧正德为嗣子。结果，萧衍在三十七岁时生下了长子萧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生下了萧综、萧纲、萧绩、萧续、萧纶、萧绎、萧纪等。至此，萧衍就没有必要过继萧正德了，他立长子萧统为太子，将萧正德返回萧宏名下。萧正德心生怨恨，叛逃北魏，以南梁前太子自居。无奈，北魏对这样的政治花瓶不感兴趣，萧正德不受重视，又逃回江南。萧衍竟然不惩办萧正德的“叛国”，只是把他骂了一顿，而且一边骂一边抱着萧正德痛哭，果真是“菩萨心肠”。

萧正德继续当他的王爷，还被派到富庶的吴郡当太守。他招揽亡命之徒，公然抢劫，最后发展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结果依旧安然无恙。如此目无法纪却照样享受富贵，其他王公贵族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哪里还会把国家法纪当真？

萧衍的八个儿子都擅长文学，可惜多数都教育不当，品德堪忧。这和萧衍这个父亲的纵容有关。太子萧统是兄弟中才学最出众、人品也最好的，可惜早死；次子萧综叛逃北魏；四子萧绩和五子萧续也都死在萧衍的前面。因此，萧衍晚年事实上只剩四个儿子：三子萧纲、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他立三子萧纲为新太子。

六子萧纶曾经担任徐州刺史、扬州刺史等要职，始终为非作歹，搜刮民脂民膏。下属向萧衍揭发萧纶的斑斑劣迹，被萧纶买凶杀死。萧衍只是处死了杀人的直接凶手，多次对萧纶网开一面。萧纶贪慕皇位，最后谋划弑父。一次，他在父亲萧衍外出的路上埋伏兵士，准备发动政变，因计划泄露而失败；又一次，萧纶给萧衍献上毒酒，结果萧衍把酒转赐给了他人，其他人被毒死了，萧衍又逃过一劫。萧纶这两次弑君行为，都罪证确凿，萧衍依然不处罚。萧纶官照当，逍遥日

子照过。

七子萧绎担任荆州刺史的要职，和五子萧续关系紧张。听说萧续的死讯后，萧绎高兴得手舞足蹈，把鞋子都给磕破了，一点儿都不念手足之情。萧衍分封诸子侄到各地掌权，是想自己有难的时候，子侄们能够出兵援助。但是看萧纶、萧绎和萧正德这些人的样子，像是忠君爱国的人吗？

萧衍一心佞佛，导致南梁国库空虚，纵容犯罪又导致南梁官员腐化堕落、为所欲为。萧衍统治后期，政治黑暗，国家迅速衰落。百姓负担繁重，生活无以为继；官府中政务堆积，冤案累累。真正为国着想、认真处理政务的官员少之又少。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贺琛上奏，指出了一些时弊：一是官员大肆榨取，民不堪命，只得逃亡，国家控制的户口越来越少；二是风俗由俭入奢，官员贪污腐败严重；三是官吏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四是国家连年浪费人力物力，财政拮据。贺琛指出的问题，都是事实，而且言语并不激烈。

但是萧衍已经容忍不了正常的上奏了，在他看来，自己是有道明君，国家在自己治理下尽善尽美，大好局面不容否定。于是萧衍立即颁下圣旨，痛骂贺琛。他先是列举自己的种种壮举，比如已有三十多年不近女色，平生不饮酒，不听音乐，起居不用雕饰之物等。又自述勤勉政务，每天五更天就起来工作，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才吃东西，且一天只吃一餐。这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天下黎民吗？萧衍言下之意，自己是千古难找的圣君。至于贺琛指出的政治黑暗，萧衍要求他指出具体是哪个官员贪腐、具体是哪件事情做得不好。如果贺琛不能一一指出来，就是欺君枉上！

贺琛接到诏书，惊出一身冷汗，赶紧上奏“深刻反省”“认真检讨”，请求萧衍原谅。

昭明太子之死

—

南齐中兴元年（501）九月，萧衍正在京师建康城下鏖战，准备最后的总攻。不久，建康东府城守将徐元瑜就投降了，荆州的敌人萧颖胄暴病而亡。这时，襄阳城传来了儿子萧统诞生的消息。这是三十七岁的萧衍的第一个儿子，他喜出望外，将长子的出世和前两大胜利合称为“三庆”。

中兴二年（502）萧衍逼迫南齐的末代君主萧宝融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改元天监，并于同年十一月将不满一周岁的萧统立为皇太子。

萧衍对太子非常珍视，努力培养。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子太傅，尚书令沈约为太子少傅。沈约是历经三朝的重要人物，耆年硕望，深于世故，政治地位很高，也是公认的文坛领袖。后来年迈的大文豪刘勰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成为萧统最为亲近的文学侍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萧统在刘勰的影响下，对文学理论和作品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从创作和讨论转向了作品收集和评论。萧统日后走上文学之路，可能与沈约、刘勰两位老师有密切关系。

太子萧统于天监五年（506）出宫独处后，在道德品行和能力上都表现得无懈可击。他日夜思念父母，每五日一朝。父子相见后，萧统常常被允许留住内省三五天再回去。他每天准时参加早朝，天还没到五鼓，萧统就守在宫外等待城门打开。有的时候，萧衍要在晚上召

见太子，萧统就穿戴整齐、正襟危坐，随时准备入见，甚至为此坐到天明。南朝的社会风气讲究奢华，一些世家大族竞相攀比。萧统却以身作则，生活非常朴素，不穿华服，膳食也不吃肉。

萧衍晚年大兴佛教，亲自讲经说法。太子萧统也跟着崇信佛教，遍览佛经。萧统此举并不是投父亲所好的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的信佛、学佛。萧统在宫中招揽东南名僧，谈论不绝，常常能挖掘出佛学中的新意。

萧统还聪明好学。天监八年（509）九月，他听讲一遍《孝经》竟然就基本知道了经书的大义，听讲完毕还亲临国子学进一步求知解惑。第二年，九岁的萧统正式入国子学就读。梁武帝萧衍车驾亲临，赏赐国子祭酒以下的教职员工，并正式下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天监十四年（515）正月，萧衍亲自在太极殿给太子行冠礼，对萧统寄予了厚望。

自从萧统懂事开始，萧衍就允许他参与一些朝政。内外臣工和奏事的人也将太子参与决策看作是正常的事情。天监十一年（512），十一岁的萧统在宫内看到一些狱官在忙碌，就问左右随从：“那些穿着皂衣的是什么人啊？”随从回答说：“他们是廷尉的官属。”萧统就把这些官员叫过来问：“你们手中的这些案子，我能审判吗？”这些官员看太子还只是十一岁的孩子，半开玩笑地回答：“可以。”结果萧统拿过案卷真的判了起来，他认为有些罪犯情有可原，将惩罚都从轻处理，改为杖责五十。官员这下子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把情况汇报给萧衍。萧衍笑着追认了儿子的判决结果。从此，凡是萧衍和司法官员对某些案子或者罪犯想从轻处理，就把案子交给太子审判，萧统的判决都非常仁慈。直到有一次，建康县有人诬告他人拐卖人口，真相大白后县令将犯诬告罪的犯人从轻发落，只判决了杖责四十。然后县令将案卷交给萧统，希望萧统能够确认县里的轻判。想不到这一次萧统非但没有从轻发落，反而判了犯人十年劳役。人们这才知道太子虽然仁慈，但也并非无原则的宽纵。

史载“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当他发现奏折中有谬误或者巧辞诡辩的地方，都一一指出，让有关人员慢慢改正，但并未因此弹劾任何一个人。普通年间，朝廷起兵讨伐北魏，战争导致京师建康的谷价飞涨。萧统就下令东宫减膳，改常饌为小食，节约粮食。每当霖雨积雪天气，萧统就派遣心腹左右，周行闾巷，探视贫困家庭的生活，遇到有流落街头的人，就暗地里加以赈济。萧统还收集宫中多余的衣物在寒冬腊月施舍给穷人。如果遇到没被收敛的尸体，萧统就自己掏钱准备棺槨（huì）和丧事。只要事关百姓赋役勤苦的情况，萧统都非常严肃认真地倾听。凡此种种，使萧统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天下皆称仁”。

普通元年（520）四月，慧义殿出现甘露祥瑞，群臣一致认为这是太子至德感动上天的结果，萧衍也肯定了这个解释。可见朝野上下对太子萧统都很满意。

普通七年（526）十一月，太子生母丁贵嫔病重。萧统赶往内省，朝夕服侍母亲，衣不解带。生母死后，萧统“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他痛不欲生，日渐消瘦。父皇萧衍看不下去了，派中书舍人顾协宣旨说：“毁不灭性，圣人之制。因为丧事毁了自己的身体就是不孝。我还在，你怎么能够这样自毁呢！你应该立即压制悲痛，恢复饮食。”萧统这才吃了点儿东西，从此直到母亲入葬，都是麦粥为食。萧衍又传话来说：“听说你吃得太少，身体非常虚弱。我本来并没有什么病，因为你这样折磨自己，胸中也圯（pǐ）塞成疾。因此你应该多吃些稀饭，不要让我再担心了。”这次，尽管父亲苦口婆心地劝逼，萧统还是每天只喝一碗粥，不尝菜果。萧统原本是个胖子，腰带有十围，等办完丁贵嫔的丧事，腰带就降到了五围。萧统入朝，群臣看到他消瘦憔悴的样子，纷纷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可叹的是，历史并没有让萧统沿着理想的轨道顺利地即位称帝，因为我们不能忽视萧统的父亲梁武帝萧衍对太子的期望和态度。

梁武帝萧衍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举动。如果仅仅从才能上来说，萧衍无疑是南朝诸帝中的翘楚。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即使是在繁忙的政治生涯中，萧衍依然能够“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戌夜”。但开国皇帝可不是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的文人骚客可以胜任的，萧衍能够坐上皇位，靠的是赫赫战功和凶狠的政治手腕，对待政敌从不留情。

登基后，萧衍疑心很重，怕旁人染指手中的权杖，便时刻紧盯身边重臣的言行举止。沈约久居相位，又是太子少傅，更是谋划、辅佐萧衍登上皇帝宝座的大功臣。但萧衍并没有完全信任沈约，始终架空沈约，让他的处境既尴尬又危险，最后抑郁得病。天监十二年（513），病中的沈约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有人说是前朝南齐的皇帝变成厉鬼来找他报仇，他就让道士给上天写了一封“奏折”说自己推翻齐朝、参与禅代等事并不是出于本意——言下之意是说这一切都是萧衍干的，自己只是个从犯。沈约想以此来缓解自己的病情，谁知他的所作所为早已被萧衍安插的密探给泄露了。萧衍龙颜大怒，数次命人谴责沈约的所作所为。沈约重病加上害怕，没几天就死了。有关部门按照惯例给沈约的谥号为文，萧衍亲自改谥为隐。“隐”是个恶谥，是评价一个人道德低劣、言行不一的意思。

这件事情让从小就在沈约督导下成长的萧统很震惊。父亲坚决捍卫权力，不惜对任何潜在威胁采取强硬措施，其中就包括血腥镇压。

没有经历过权力争夺和铁血战争，生下来就被立为太子的萧统，是发现饭菜里有蝇虫也不指出，以免厨师受罚的人，他很难理解父亲的做法。

如在处理萧衍的次子、萧统的弟弟萧综的问题上。尽管萧综极可能是萧宝卷的遗腹子，萧衍依然封他为王，还授予军权。萧综不仅和萧衍感情疏远，而且还在前线领兵作战的时候，公开投奔了北魏。萧衍闻讯，剥夺了萧综的封号，并将吴淑媛废成庶人，然后毒死。后来出于招降萧综的需要，萧衍又恢复了他的封号。在太子萧统的世界观中，这些可能都是惊天动地、无法理解的事情。

萧衍对太子的所作所为虽然找不到可以教训或者警告的地方，但从心底是不认同的。萧统并不符合萧衍心目中的帝王形象。料理生母丧事的时候，萧衍就认为太子孝行太过并委婉地提点过他，还要求儿子多看看自己的言行，可惜萧统没有读懂父皇的话。这就为父子之间可能的分歧和决裂埋下了伏笔。

三

中大通元年（529），梁武帝萧衍和太子萧统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

生母丁贵嫔死的时候，萧统派人给母亲找了一块好墓地，当时都已经开始除草和平整土地了。这时，有一个卖地的人想把自己的土地卖给朝廷作为丁贵嫔的墓地，从中获利。因此他就去找了太监俞三副，说只要俞三副能把自己的土地“忽悠”给朝廷，就可以从地价中拿走三分之一的提成。卖地人的报价是三百万。俞三副心动了，秘密启奏萧衍说太子找到的土地并不如自己知道的一块土地风水好。他着重

向皇帝介绍了那块地是如何有利于皇家的运气。萧衍的疑心本来就重，俞三副的话很自然地牵动了他的头脑深处那根对太子不满意神经，马上下令重新买地。萧统没有办法，只好买了俞三副推荐的土地安葬母亲。俞三副也就轻松获得了一百万的好处。

葬礼后，有个真正懂风水的道士对萧统说，丁贵嫔墓地的风水其实并不好。萧统忙问怎么个不好法。道士说这块地不利于长子，也就是不利于太子萧统的运道，如果用东西厌伏也许可以克制。萧统就按照道士的解释，备齐蜡鹅等物品埋在墓侧的长子位上。

东宫有两个宫监鲍邈之、魏雅，原本都是萧统的亲信。但渐渐地魏雅在萧统跟前更得宠，鲍邈之则被疏远了。鲍邈之心中愤恨，就向梁武帝诬告魏雅勾结道士，以压魔术诅咒萧衍，盼着萧衍早点儿死了好让太子即位。为了证明诬告的真实性，鲍邈之就说魏雅和太子在丁贵嫔的墓侧埋下蜡鹅等物诅咒皇帝。在墓地一事上，萧衍原本就对太子有所怀疑，接到举报后忙秘密派人挖开墓地查看，果然发现了蜡鹅等物品。萧衍瞬间就相信了鲍邈之的告发，儿子萧统之前建立起来的美好形象顷刻倒塌。南北朝父子兄弟相残的事情频频发生，难道这样的悲剧要发生在我萧衍身上了吗？即位前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的太子很多，难道我的儿子萧统也是如此内外不一的人吗？萧衍十分震怒，决定深入追究这件事情。事涉太子，追究下去势必动摇萧统的政治地位。一些同情太子的大臣，如徐勉等慌忙劝谏萧衍，坚决反对将此事发展成血腥大案。萧衍不愧为开国君主，很快就平息了冲动，最后只杀掉了那个风水道士。

事情虽然化解了，但萧衍对萧统积累的不满第一次表现了出来，冲塌了他对儿子信任的堤防。

而萧统就好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过着先前仁孝文雅的生活，继续和文人学士们选文。对整件事情，他选择沉默，没有辩白，也没有补救措施。虽然他内心知道自己的太子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但

是他不知道怎么办。忧郁的萧统对于“蜡鹅事件”终生“不能自明”。

就在萧统终日惶恐的时候，长期出镇外地的三弟晋安王萧纲突然被父皇征召入朝。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天，萧统对左右说：“昨天我梦见与晋安王对弈，扰道，我把班剑送给了他。晋安王近日来京，难道是来接替我位置的吗？”班剑并不是普通的佩剑，而是有着严格标准规定、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宝剑。萧统的梦境和担忧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

梁武帝萧衍在对待父子亲情的问题上并不能像处理政治斗争一样快刀斩乱麻。他苦苦思索，如何重新处理与儿子萧统的关系。萧衍思考无果，在中大通元年（529）九月，在同泰寺出家，要做和尚。群臣赶紧凑钱把他从寺庙中赎了回来。最终，萧衍保留了萧统的太子地位，在十一月任命南平郡王萧伟为太子太傅。萧伟是萧衍的弟弟，以本官领太子太傅并加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衔。《南史》说他是“朝廷得失，时有匡正。子侄邪僻，义方训诱”，是个很严厉的皇族。选他为太子太傅，萧衍的用心很明显了，他觉得太子需要加强管教。

中大通二年（530），萧统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

这一年，吴兴郡因为水灾失收，所以诏发上东三郡民丁开渠泄水。萧统上书认为此举弊多，请求暂停，得到了父皇的同意。这一事件表明，现在的萧统只能像普通大臣那样，事后对父皇的决策进行劝谏，而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了。

这一年，萧统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政治场合。因为父亲的猜忌和父子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抑郁成疾，身体状况恶化。

中大通三年（531）的一个春日，久病的萧统乘舟采莲，愉悦身心。结果由于侍从的疏忽，引起船只剧烈颠簸，将萧统晃入了水中。病中的萧统不仅溺水，而且伤到了髌骨。被人救起后，萧统的伤势日

渐严重，最后发展到卧床不起的地步。三月，萧统病重。期间，遇到萧衍来信询问状况，怕父皇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而担心，萧统挣扎着亲手给父亲回信。东宫左右看到太子病情恶化，计划向萧衍报告实际情况，遭到萧统的坚决制止。萧统说：“为什么要让父皇知道我病重呢？”萧统的言行中有孝顺的一面，同时难免夹杂着一丝无奈、幽怨。

熬到四月，萧统在宫中逝世，时年三十岁。得到太子死讯后，萧衍赶到东宫，放声痛哭。萧衍的哭声中既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又有为自己先前对儿子猜忌的懊悔。他的死使朝野一片惊愕惋惜。“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闻丧皆恸哭。”萧衍诏令用皇帝礼节将萧统入殓，封谥号为昭明。萧统因此被尊称为昭明太子。

四

萧统死后，萧衍面临着挑选新继承人的问题。

萧统是病死的，没有被废。因此按照封建宗法，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应该是萧统的儿子。也就是说，皇位应该继续保持在萧统这一支血脉当中。萧统八岁结婚，留下多个儿子。其长子是出镇南徐州的华容公萧欢，在新皇位继承人的候选人中呼声最高。萧衍在确立新继承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拖延起来。他一度准备封萧欢为皇太孙，但蜡鹅往事始终徘徊在脑海中，让他难以释怀。

最后，萧衍选择立三子萧纲为新太子。萧衍解释说：如今天下未安，择嗣须重贤德能力。身逢乱世，权力对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就是政治能力，因此他挑选了年长且政治经验丰富的萧纲。这

从侧面也透露出了萧衍对昭明太子萧统的委婉否定。

从履历上来说，萧统的一生平淡无奇，仁德有余，强硬不足，缺乏刚硬的政治手腕和残酷的政治实践，并不符合父亲对帝王的要求。萧统死后，晚年的萧衍和梁朝遇到了接二连三的挑战，直到出现了几乎血洗萧氏皇族的侯景之乱。萧统如果尚在，能应付这样的挑战吗？

而至今萧统还被人怀念。东南各省，昭明遗迹，处处有之。这主要得益于萧统留下的一部《昭明文选》。

萧统“好士爱文”，当时负有盛名的刘孝绰、殷芸、陆倕、明山宾、王筠等人相继进入了东宫的幕宾行列，得到礼遇。萧统经常与这些天下名士讨论文章诗词，后来在东宫新置学士，负责遴选、编辑浩如烟海的历代作品，力图以一种文章总汇的形式刊印出版。阅读、核对、通稿和校对是既费时又费力的事情。期间，东宫的选文事业因为北伐和多位学士的逝世一度受挫，但萧统始终在坚持高标准的同时保证进度。蜡鹅事件发生后，萧统不想因为自己的地位可能动摇而影响到正在进展中的文化盛事，更担心自己被废会断送选文大事，因此加快编辑工作，将文选“杀青”。一部被后人称为《昭明文选》的宏伟大作正式成书。《昭明文选》共三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八百残兵能做什么

—

但凡志得意满的皇帝，都好大喜功。梁武帝萧衍自信已经将江南治理得国泰民安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原子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太清元年（547）正月，萧衍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州郡长官献地投降，朝野称贺。醒来后，他把梦告诉了大臣，说：“我难得做梦，做了梦必有事实。”善于奉承的朱异马上说：“恭贺陛下，这是天下一统的预兆。”萧衍觉得很有道理，更迫切地希望把中原纳入梁朝的版图。

到了二月，东魏的河南藩镇侯景派人到建康，声称与高澄有怨，愿献出河南十三州降梁。侯景对萧衍信誓旦旦地说：“黄河以南，皆臣所职，纳土归降，易同反掌。”

侯景只说了部分事实，更深层的内容他没有说明。他的确是和高澄不和，但君臣矛盾不至于让他投身他人麾下。侯景归降南梁只是一个幌子，以掩盖他试图借助外力与东魏抗衡、最终自己割据称王的狼子野心。

侯景是怀朔镇的羯族人，年轻时就和高欢混在一起。六镇起义时，侯景先投在尔朱荣麾下，是尔朱荣的先锋大将，曾擒拿过葛荣。尔朱荣败后，侯景又投入高欢部下。在高欢的阵营中，绝大多数不是

鲜卑人就是汉族人，羯族人侯景始终是个另类。更因为侯景平时总是离群独处，喜欢用他那双狡黠的小眼睛四处乱看，凶狠地打量同僚。加上侯景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同僚们都不爱搭理他。在内心深处，侯景不甘屈居人下，想自立为王。高欢是一代枭雄，能够镇住侯景，加上高欢的事业蒸蒸日上，给侯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侯景在高欢时期规规矩矩，屡立战功。

高欢末期，政务大多委托长子高澄处理。侯景对专权的高澄很轻视，直呼他是“鲜卑小儿”。一次，他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我不敢有异心。高王一旦不在了，我不能和鲜卑小儿共事！”司马子如也出身怀朔镇，是和高欢、侯景交往几十年的老伙计了。他连忙捂住侯景的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从河桥-邙山之战开始，侯景就统率十万大军驻扎河南，控制着东到山东、西到河南西境、北到黄河、西到淮河的广大区域，约占东魏领土的三分之一，具备割据称雄的实力。侯景难免蠢蠢欲动起来，而高澄的专横、猜忌则加剧了侯景的叛离。

高澄上台后，为了打击他人，树立权威，重用崔季舒、崔暹监视皇帝和百官，弹劾对自己不满、不敬的人。司马子如、咸阳王元坦、孙腾、高隆之等许多大臣或被降职，或被罢官，或被削爵。侯景也在高澄的“修理名单”里，同样被人弹劾过。这就恶化了两人的关系。

高澄整治侯景除了个性使然外，还有削弱地方势力、巩固对河南统治的考虑在内。高欢病危之时，高澄担心父亲死后无人可以镇住侯景，就假冒父亲的名义，写信召侯景来晋阳，计划杀掉他。但是病重的高欢忘记告诉儿子，侯景曾经和自己有过约定，为了保密，两人的书信都在信封背后涂上暗号。侯景一接到书信，就知道是假的。根据高欢病重的消息，侯景断定高澄是对自己动了杀心，他想不反都不行了！

侯景决心与高澄刀兵相向。他管辖的河南地区，处在高澄、西魏和南梁三方势力的包围之中。为了保证自己在和高澄作战时西魏和南梁不会趁机进攻自己，也为了多两个同盟军，侯景分别向南梁和西魏称臣，宣布“归降”。

侯景带着十万大军、数百里土地，宣布归降南梁。这一大笔飞来横财，把萧衍的脑袋砸得云里雾里的，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冥冥之中，他怀疑侯景归降的真实意图。萧衍召集大臣讨论，说：“我国家金瓯无缺，现在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意外，悔之何及？”一些大臣反对贸然接纳侯景。因为南梁和东魏保持了十多年的和平，如果接纳侯景，必将在两国之间重开战火，胜负难料。当时，高澄也派了使者到南梁首都建康，重申“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提醒南梁不要干涉东魏的“内政”。

朱异揣摩萧衍贪心中原的土地和人口，内心应该会倾向受降，就顺着萧衍的意思说：“若拒绝侯景，恐怕之后再没有人愿意归降了，愿陛下无疑。”萧衍于是驱逐了东魏使者，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接受了侯景归降。他派大将羊鸦仁领兵三万运粮接济侯景——南方安定了几十年，粮草丰富，而河南当了几十年战场，侯景的后勤正空虚。

二

西魏宇文泰也接到了侯景的降表，召集大臣商议是否接纳侯景。多数大臣和侯景打了几十年交道，深知这个人毫无信义可言。大臣王悦反对西魏出兵援助侯景，说：“侯景志向远大，不会甘为人下。况且他能背叛高氏，又如何保证他会效忠我朝呢！”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西魏的河南主将王思政却认为侯景归降是天赐良

机，值得冒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思政不等宇文泰的命令，迅速带领本部兵马开始自西向东接收侯景的辖区。事已至此，宇文泰也不得不命令关中的西魏军队随后跟进，进入河南地区。

这时，树起叛旗的侯景事事不顺，日子开始难过了。辖区内的州郡并没有都追随侯景起兵。他虽然管辖十三州之多，但响应他起兵的只有颍州一地。侯景连蒙带骗，四处出兵，才占领了今天河南大部地区。而他管辖的东部各州都站在高澄一边讨伐他来了。侯景和高澄的讨伐大军打了一仗，惊奇地发现“鲜卑小儿”还挺厉害。对阵失败后，侯景一方被围困在了颍州。

宇文泰派出的李弼、赵贵大军，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兵临颍州城下的。高澄军队看到西魏大军赶到，担心遭到两面夹击，主动撤往河北。颍州解围。西魏也不愿意与东魏发生恶战，没有追击，而且刻意与东魏大军拉开距离。侯景巴不得把西魏军队推到前台去和东魏军队恶战，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于是将颍州让给西魏，主动撤往悬瓠，与萧衍派来接应他的羊鸦仁会师。李弼、赵贵看到侯景和南梁军队合兵一处，知道侯景“一女两嫁”的阴谋，赶紧报告给了宇文泰。宇文泰怎能容许侯景这样耍弄自己，你侯景不是向西魏称臣了吗，我就召你到长安来面圣！侯景当然不会放弃军队和地盘跑到长安去，回复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将宇文泰骂了一顿。至此，他和西魏的关系彻底破裂。宇文泰也不亏，轻松占领了河南西部四州。

侯景从西魏方面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倒赔上了大块地盘，但他却从南梁方面得到了补偿。萧衍比宇文泰容易骗。西魏军队进入河南后，侯景向萧衍解释说：“王师未到，形势危急，我不得已才向关中求援。这是我舍弃一小块地盘为诱饵的权宜之计。臣不安于东魏高氏之下，又岂能容于西魏宇文氏？”萧衍还处在对美好前景的想象中，觉得侯景的解释很有道理，回复说：“将军做得很对，我非常理解。”侯景骗倒萧衍后，考虑到遭受高澄、宇文泰两军的压迫，只好将希望都寄托在南梁身上了。

七月，梁军羊鸦仁部进入悬瓠。飘飘然的萧衍决心以侯景归降为契机，在八月下诏北伐东魏。他任命贞阳侯萧渊明（萧衍哥哥萧懿之子）为主帅，率领主力东进，计划先攻下彭城，再西进与河南地区的侯景、羊鸦仁等会师，之后分头北进，收复河北。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计划，且不说侯景能否保住河南地区，单说计划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南梁根本就派不出可堪使用的将帅来。萧衍的侄子萧渊明当了北伐的主帅，却根本不懂军事，就连正常的军情好坏都判断不出来。他参加军事会议，不会下命令，只会说“临时制宜”，意思就是让部将随机应变，说了等于没说。而梁军众将，陈庆之已死，将才凋零。只有将军羊侃一人深通军事且有实战经验，可以一战，可这羊侃恰恰又是北方投降的将领。其父随薛安都投降北魏，他长大后留在北魏征战多年，因心系故国而叛逃南梁。羊侃起兵之初，新鲜劲儿挺大，给出了很多建议，萧渊明一概不听。渐渐地，羊侃清醒了过来，认定跟着萧渊明混没有前途。于是他率领本部兵马和大部队拉开距离，单独驻扎，以防万一。

梁军进攻彭城，高澄派遣将军慕容绍宗救援。慕容绍宗是前燕皇室后裔，是尔朱荣的远房亲戚。他在尔朱荣时期担任过并州刺史，投降高欢后担任过徐州刺史、青州刺史，经验丰富，能力也强，但并没有得到重用。不是高欢没有发现慕容绍宗这块宝，他是想把慕容绍宗留着给儿子高澄。高欢病重时建议高澄掌权后对慕容绍宗加官晋爵，这样他就会死心塌地地效忠高澄了。高欢还预测侯景极可能造反，建议高澄派慕容绍宗去镇压。于是高澄任命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封燕郡公，负责抵抗梁军和镇压侯景。

高澄的对策是先击退东边的梁军，再向西收拾侯景。慕容绍宗率军在离彭城十八里的寒山与梁军相遇。慕容绍宗先发起进攻。梁军将领们赶紧去找萧渊明请示如何迎敌，不想萧渊明醉得一塌糊涂，根本起不了身，只是迷迷糊糊地说“救援救援”。众将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动，只有胡贵孙奋勇出战。胡部官兵作战英勇，竟然挡住了魏军的

进攻，魏军前锋开始后撤。梁军产生轻敌情绪，追击了几里地。不想，慕容绍宗突然回头再战，又有魏军从两侧包抄过来，将梁军杀得大败，进而连累尚在大营中的梁军主力。寒山一战下来，梁军损失数万人，包括萧渊明、胡贵孙等在内的将帅都成了俘虏。只有羊侃因为和主力拉开距离驻扎，得以全师而退。

寒山大败的消息传到建康，萧衍正在睡午觉。朱异匆忙入宫，让宦官叫醒萧衍。萧衍听到噩耗，大吃一惊，险些从坐床上跌下来。宦官连忙扶住他。萧衍愣了好一会儿，叹道：“难道我要重蹈晋室的覆辙吗？”

东线梁军轻易就败得一塌糊涂，连侯景都看不下去了。他没想到梁军如此不堪一击，更没想到南梁统治层如此昏庸无用。侯景本想借助南梁的力量与高澄抗衡，如今看来高澄难以战胜，侯景又萌生了攻取南梁的念头。避难就易，本来就是人之常情。

但是侯景暂时还不能对南梁有实质举动，因为慕容绍宗率领得胜之师来进攻他了。梁军大败后，侯景率军退守涡阳。他拥兵四万人，战马数千匹，在兵力上对慕容绍宗保持优势。侯景对高澄部下诸将都看不起，唯独忌惮慕容绍宗，所以一开始他就在心理上输了一截。两军对垒，魏军中有将领想主动出击，都被慕容绍宗拦住。他判断侯景后勤虚弱，力求速战，所以就决定和侯景打持久战、消耗战。侯景最怕这一招，才熬了两个月就弹尽粮绝，坚持不下去了。到太清二年（548）正月，侯景再也无力支撑，打算率领大军南逃，去找萧衍要饭吃。慕容绍宗马上展开心理战，对侯部官兵高喊：“你们的家属都在河北得到了妥善安置，你们想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吗？你们如果反正，照旧任用。”侯景部下一下子呼啦啦几乎全走光了。侯景仓皇渡过淮河南逃。羊鸦仁闻讯，也放弃悬瓠南撤。

至此，萧衍不仅没有得到侯景信誓旦旦许诺的河南十三州土地，还搭上了南梁几万将士的生命。

侯景逃到淮河南岸后，身边只有八百名残兵败将，身无分文，后有追兵，前途茫然，可谓落魄至极，也危险至极。

就在侯景紧张徘徊之时，与治所为寿阳的豫州监州事韦黯一向不和的马头戍主刘神茂主动找上门来。他建议侯景袭取寿阳，作为立脚点。侯景明知这是借刀杀人的技法，可他是个冒险家，永远相信风险与机遇并存。于是侯景带着残部直奔寿阳城下，要求韦黯开门接待。韦黯一开始不想接纳侯景，侯景就拿萧衍封给自己的一系列官爵吓唬他，逼着韦黯打开城门。侯景一进城，立即反客为主，占领了寿阳。

尽管有了立足点，侯景内心的恐慌丝毫没有减少。他不知道东魏和南梁的最高统治层将会如何处置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双方幕后交易的一个棋子。虽然萧衍看起来比较好说话，但如今自己还会对他有吸引力吗？摆在眼前的袭占寿阳的举动，又怎么解释呢？思前想后，侯景向萧衍上了一封请罪表，说自己丧地败师，请求处分。

表到朝廷，有大臣认为侯景已经露出跋扈的端倪，建议及早处理。但是萧衍却挥挥手，认为惩处侯景有违慈悲为怀的佛教教义，同时也会断绝北方将领归降的后路，因此非但没有一点儿处罚的意思，还将侯景好好地安慰了一番，并任命侯景做南豫州牧，镇守寿阳。

侯景心中的大石哐当落地，在寿阳安心休整起来。他算是彻底看清了萧衍懦弱、愚蠢的本性。侯景之前的人生都在刀尖上舔血，冒险因子始终流淌在他的血液中。既然难以攻破河北的高澄，是否可以将刀子转向江南的萧衍呢？

北方的高澄也还惦记着侯景。虽然侯景被赶到南方去了，可依然

盘踞在边界上，是个潜在的威胁。好在经过之前的战争，南北形势对高澄非常有利，他可以挟得胜之威，通过谈判获得更大的好处。高澄就让被俘的萧渊明写信给叔叔萧衍，建议双方和谈。萧衍收到侄子来信，边看边哭，看完立即同意讲和，回信给东魏。信使是个糊涂人，竟然选择从寿阳过界，被侯景抓了个正着。侯景很快盘问出了全部详情，大惊，立刻上奏萧衍，反对议和。

侯景说：“高澄刚打了胜仗，就急于求和，背后肯定有隐情。他是担心西魏乘虚进攻。现在，东魏力量在持续衰弱，我们没必要与他通好。”萧衍认为救侄子要紧，对侯景的奏折没有回复。相反，他又派出正式使者去东魏吊唁高欢。侯景更急了，把底牌亮给了萧衍看，写信道：“臣与高氏，势不两立。如今陛下与高氏通好，将置臣于何地？”侯景担心自己被萧衍给卖了。萧衍给侯景回信说，他对侯景不放弃、不抛弃，请侯景放心。侯景哪能就这么放心！他是在欺骗和厮杀中一路走过来的，怎么会相信萧衍的一句话？

侯景伪造了一封高澄的来信，要求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试探萧衍。萧衍不辨真假，欣然接受交换条件，还给高澄写了一封回信，说“贞阳（萧渊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侯景拿到了回信，恶狠狠地说：“我早就料到萧老头的心肠薄得很！”他下定决心要造萧衍的反了。

侯景在寿阳城里开始了大规模扩军。侯景仅有的八百人，显然不够造反使用。他就在城内外强拉青壮年来当兵，又强抢民间女子许配给将士。侯景败退寿阳后，萧衍就向他提供后勤补给。如今，侯景狮子大张口，向萧衍要求大量的军需物资，以备扩军备战。比如侯景向朝廷申请一万匹锦，说要做军袍用。朱异如数发给，只是用青布代替锦而已。侯景又借口武器粗劣、损坏严重，申请派遣建康城的能工巧匠到寿阳直接锻造，朝廷也不拒绝。其实只要稍微想想就能发现疑点，侯景部下的八百人，哪里需要那么多的布匹，又哪里需要专门设点造兵器呢？

在政治上，侯景也开始寻找同盟者。他知道萧正德对伯父不满，一直对差点儿到手的太子宝座耿耿于怀。于是侯景秘密与萧正德联系，表示愿意拥戴他做皇帝。萧正德利令智昏，以为侯景当真拥戴他，高兴地和侯景结盟，准备大干一场。

狂风暴雨即将席卷平静了半个世纪的江南。

是侯景太厉害，还是南梁太窝囊

—

侯景大规模扩军备战，引起了很多地方官员的警觉。警报接二连三地传到建康。

合州（今合肥）刺史鄱阳王萧范多次密报侯景将反，萧衍不相信。

将军羊鸦仁从悬瓠撤退后，受到朝廷训斥，不敢返回朝廷，便带兵留屯淮河一带。侯景在南方举目无亲，就和羊鸦仁一起在河南打过仗，还算是交情，就约他一起造反。羊鸦仁立即把侯景派来的人和拿来的信押解到建康，向萧衍告发。侯景谋反证据确凿，朱异却秉承萧衍的意思说：“侯景只有区区几百残兵，能干什么！”萧衍于是将侯景的使者送回寿阳，对此不闻不问。侯景反咬一口，说羊鸦仁诬告，要求杀羊鸦仁。同时要求扩大辖区，不然就要率兵临江，自己找地盘去。侯景一个败将，如此嚣张，公然要挟朝廷。结果，萧衍却对侯景的使者说：“譬如寻常穷人家，有三五个客人，还相处得好。朕只有一个客人，惹得他生气，这是朕的过失。”他以一贯的慈悲胸怀，没有杀羊鸦仁，也没有同意侯景移防的要求，但对他厚加赏赐。萧衍希望这件事情能够不了了之。太清二年（548）八月初十，侯景准备就绪，正式在寿阳宣布造反。他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以讨伐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号召大家支持自己。侯景要讨伐的这几个人不是贪污成性，就是苛刻出名，惹得民怨深重。侯景这么做，还真能蒙蔽不少人。不过萧衍知道侯景造反

后，满不在乎地说：“侯景有几个兵，能成什么事？我随便拿根棍子就能揍他。”他任命六子邵陵王萧纶为大都督，率领四路大军包抄寿阳，讨伐侯景。

梁军占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且是在内线作战，只要萧纶正常发挥，就应该能歼灭侯景。萧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不慌不忙地集合军队，渡过长江，慢慢向寿阳进军，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侯景的谋士王伟分析道：敌强我弱，兵力过分悬殊，不能和萧纶正面作战，固守寿阳也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获胜，就要冒险，出奇招。王伟建议侯景放弃寿阳，倾尽全力，直取建康。放弃根据地，长途奔袭，其中只要出现一点儿差错，全军都可能变为任人宰割的散兵游勇，这是个正常人都要犹豫再三的险招。然而侯景迅速采纳，并在九月二十五日以打猎为名，率军出了寿阳城。侯景进军神速，八天后占领谯州（今安徽滁州），半个月后占领历阳，很快饮马长江北岸。而萧纶还在慢腾腾地向寿阳进军！

侯景之所以一路犹入无人之境，除了因为萧纶无能外，还因为几十年的和平几乎消磨了南梁上自封疆大吏、下到普通军民的警惕性和战斗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他们毫无应对之力。

历阳失守的消息传到建康，萧衍才开始认真筹划用兵方略。大将羊侃当时在建康担任尚书。萧衍向他咨询，羊侃认为要立即派兵扼守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采石，阻止侯景渡江，同时严令萧纶迅速攻占寿阳（其实，高澄已经乘虚而入占领了寿阳），然后南北夹击侯景，到时候侯景前有长江天险阻隔，后无退路，必败无疑。萧衍再次调兵遣将，派侄子萧正德负责前线军事，又派名将陈庆之的儿子陈昕去镇守采石。

现在该萧正德这个内奸上场发挥了。他一上任就调集几十只大船，准备接应侯景渡江。紧要关头，采石的调防出现了纰漏。将军王质原本率兵三千扼守采石，接到调令后不等陈昕到达就带兵撤走了，

致使采石没有军队防守，加上萧正德派船前来接应，侯景的军队从容渡江，越过采石向江南深处发展。这时，侯景的部队才发展到八千人，只有几百匹马。

建康城中的多数军民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动乱，如今叛军兵临城下，搞得人心惶惶。城外百姓纷纷逃进城内，使得城中秩序大乱。萧衍授权太子萧纲全权负责御敌，同时依靠羊侃参谋军事。

萧纲和羊侃任用萧正德、庾信等人参与城防，希望前者守卫建康南边的正门宣阳门，后者守卫朱雀桥要害。结果，萧正德打开城门，亲自出城迎接侯景军队入城。侯景和萧正德两人在马上相互作揖寒暄，怎么看都像是朋友重逢，不像是敌人。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是当时的文坛宗师，率领一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军队阻挡在侯景面前。此外，还有一条秦淮河奔流在两军中间。

大敌当前，庾信还在津津有味地啃甘蔗，突然对岸射来一阵乱箭，有一支正中庾信身旁的门柱，惊得庾信扔掉甘蔗，扭头就逃。三千部下随之一哄而散。侯景轻松迈过秦淮河，顺利占领了建康外城。而庾信后来逃到了北方，被捧为文学大师，从而官运亨通，还创作了《哀江南赋》等大批作品。

经过几代王朝的建设，当时的建康城规模宏大，城内有三座内城：台城（官衙和皇宫所在地）、东宫（太子居所）和石头城（要塞）。侯景大军迅速占领东宫，杀向台城。石头城的守将是萧纲的儿子萧大春。萧大春见外城失陷、台城危急，弃军逃往京口，石头城驻军便投降了侯景。至此，台城被包围得严严实实。好在羊侃临危不惧，诈称接到飞箭射来的信件，说萧纶率领大军回援，即将到达。台城里才人心稍定。

从起兵寿阳，到此时夺下石头城，侯景只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台城攻防战开始了。

白天，侯景指挥将士猛攻台城。因为东宫紧挨台城，叛军便爬上屋顶，朝城里射箭。夜晚，侯景就在东宫里饮酒作乐。他把东宫几百名歌舞奏乐的女子都分给军士奸淫取乐。叛军还放火烧毁了建康的几处宫署，东宫中极为丰富的藏书也被付之一炬。很快，战火就将建康城破坏得伤痕累累。

叛军火攻台城大门，羊侃就下令在大门上方凿洞，从洞里往外倒水灭火。叛军又用大斧劈门，一扇门眼看就要被劈开了，羊侃就从门的裂缝中伸出长矛刺杀，连杀了两名敌兵，逼得叛军不敢再劈门。侯景造了几百只一丈多长、有六条腿的木头架子，称之为“木驴”。在上面蒙上浸湿的牛皮，下面藏六名士兵。叛军在木驴的掩护下想要破坏城墙。羊侃就下令向城墙根投掷石块，把木驴砸得粉碎，杀伤里面的士兵。

侯景将木驴改造为尖顶结构，且石块也打不坏。羊侃就下令火攻，在火把、箭镞上浇上油、涂上蜡，点火抛下去、射下来，将木驴烧毁。侯景又造了十多丈高的登城楼，推近城墙，以便叛军在楼上向城内射箭。台城守军看见庞然大物般的车子逼近，不知如何是好，恐惧莫名。羊侃却成竹在胸，说这些车子既高大又沉重，而台城四周的壕沟土质疏松，车子到了城边一定会倒。果然，臃肿的登城楼推到壕沟附近，纷纷因重心不稳自己就倒掉了。

十一月初，侯景改用原始的办法，在台城东西两面堆土山，打算将土山堆得和台城城墙一般高，从山上攻进城去。叛军驱赶大批居民运土筑山，谁手脚慢一点儿劈头就打，谁跌倒了就被埋进土地，当作山体的一部分。建康城里一片号哭之声。城内唯一的办法，就是迎着

叛军筑山的方向，也筑造土山，正面将叛军压制下去。城里太子、亲王以下的人都背土夯土，在土山上筑楼。侯景又招募了两千敢死勇士，披上铠甲，登山作战。不幸的是，突然天降大雨，台城里的土山坍塌了。叛军趁机进逼，羊侃下令大家把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如木材、衣服等，都点上火，抛掷出去，构成一阵火焰攻势，硬生生地把叛军打退了。同时，羊侃带人在坍塌处赶筑了一道城墙。台城这才转危为安。

侯景猛攻多日，没有丝毫进展，反而死伤了不少将士。他改变战术，改攻为困，在台城四周筑起营垒，隔断内外联络，准备打持久战。

同时，侯景也不放松心理战、政治战。他向城里射赏格，宣称只要杀了朱异等人他便退兵。台城里也射赏格出去，称有能献侯景首级者，即授侯景所任官职，并赏钱一万万、布绢各一万匹。侯景把羊侃的儿子押到城下，逼羊侃投降。羊侃不为所动，说：“尽管把他杀掉好了！”侯景不放弃，几天后又押羊侃的儿子到阵前。羊侃拿起弓就向儿子射去，还说：“我以为你早已死了，怎么还在！”侯景知道感情要挟对羊侃没用，就把羊侃的儿子放了，之后也没再用这招。

侯景在心理战中惨败，却在政治战中收获很大。十一月初一，他拥戴萧正德即位做皇帝，自己做了丞相。之前，江南的世家大族和达官显贵奴役了大批奴婢和下人。南梁社会长期稳定，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也非常固定，奴仆的待遇很低，普遍怨恨主人。侯景就宣布，凡是家奴投降，一律解除家奴身份。于是建康附近的奴仆们纷纷投靠侯景，加入叛军，人数有数千之多，成了叛军的核心战斗力。侯景挑选了一名朱异的家奴，任命他为仪同三司，让他跨骏马、穿锦袍，到台城下骂朱异：“你做了三十年官，才是个中领军，我刚追随侯王，就已经做到仪同了。”这话对台城内王公大臣们的家奴有巨大的吸引力。上千家奴逃出台城，加入了叛军。侯景对这些翻身奴仆都厚加赏赐和重用。

如此攻防了一个月，战局停滞了下来。侯景担心南梁援军云集，又因为军需粮草告罄，不得不下令抢劫民间粮食、金帛和人口，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叛军公然抢劫，对江南富庶之地破坏严重。

三

困守台城的君臣官兵，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援兵身上。

侯景叛军集中在台城附近，其他地区还在梁朝官府统治之下。只要有人出兵救援台城，就不怕侯景不灭。

最先到达建康的援军是原本计划进攻寿阳的邵陵王萧纶的部队。他慢腾腾地走到半途，后方传来警报，说侯景已经渡过长江了。萧纶慌起来，下令后队改前队、前队改后队，日夜赶奔建康而去。这支政府军的军事素质实在太差，不仅行军速度奇慢，还中途迷了路，直到十一月底才赶到建康城东的蒋山。这时，台城已经被围攻一个月了。萧纶的到来，让侯景很害怕。萧纶的部队毕竟人多势众，而且是南梁的主力军。侯景把抢来的妇女、珍宝都聚拢到石头城，并备好船只，准备战败逃跑。结果两军交锋后，侯景发现自己实在是高估了萧纶军队的战斗力。几个回合打下来，萧纶大败，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他只好东撤，远远地看着建康，就是不敢近前。

比萧纶晚几天，宗室萧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等人也率领援军到达。他们不敢与侯景交战，便在蔡洲驻扎，等待更多的援军到来。

台城内的情况在恶化。羊侃、朱异相继死去。朱异的死倒没什么，但是羊侃的缺位，使得城内失去了抵抗的核心，城中弥漫起紧张的气氛来。侯景则抓紧援军云集前的短暂平静，日夜赶造攻城器械，企图尽快攻下台城。从十二月中旬开始，叛军连续猛攻十多天。幸运

的是，城中一名下级军官吴景精通城墙攻防之术，指挥军民抵抗，保全了台城。但是，城内有军官叛逃侯景，教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台城。侯景照做，最终水漫台城，积水逐渐加深，城内军民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当时天下最有能力救援台城的是萧衍第七子，即镇守重镇荆州的湘东王萧绎。萧衍非常疼爱这个儿子。萧绎小时患了眼病，萧衍亲自指挥治疗，不慎治瞎了儿子的一只眼睛。萧衍非常愧疚，后来又梦见一个独眼菩萨说要投胎帝王之家，他就认为萧绎是菩萨投胎，对他倍加疼爱。萧衍将仅次于扬州的荆州托付给了萧绎，让萧绎坐镇建康的上游，对他寄予了厚望。但是萧绎听说建康失陷、台城危急后，首先想到的是父皇和太子哥哥都危在旦夕。万一他俩同时归天，自己不就能够“高升”一步了吗？所以萧绎对救援一事，很不热心。直到十二月中旬，台城被围将近两个月后，才派儿子萧方等从公安（今湖北公安北）出发，顺江而下。他拨出的援兵，只有一万人。

尽管如此，外地勤王军队还是陆续到达了秦淮河畔。分别有衡州刺史韦粲率领的本部五千兵马，江州刺史萧大心（萧纲的儿子）派将军柳昕率领的两千兵马，司州刺史柳仲礼（韦粲的表弟）率领的步骑一万多人，从淮河南下救援的羊鸦仁率领的三万人。此外会合已经徘徊在建康周边的萧嗣、裴之高等人，到当年的除夕夜，各地勤王的军队已经超过了十万人，远远胜过侯景一万左右的叛军。大家推举柳仲礼做大都督，并推进援军到了秦淮河南岸。

太清三年（549）正月初一，勤王军队和侯景叛军在建康郊区的青塘激战。

勤王军队中最积极的韦粲部队受大雾影响，在行军途中迷路，手忙脚乱地搭建营栅准备固守。侯景瞅准时机，率军猛扑，杀入韦粲大营。韦粲英勇迎战，与儿子、三个兄弟和一个堂弟一同力战而死。柳仲礼得报，赶往增援，缠住侯景死战。柳仲礼是员勇将，部队又人多

势众，斩杀了数百名叛军。叛军多数是强拉来的民夫和解放的奴仆，缺乏训练，稍遇挫折就向后逃窜，结果被挤入秦淮河中，又淹死了一千多人。战场形势开始对侯景不利。柳仲礼和侯景单挑，长矛几乎刺中侯景，但由于在大雾中缺乏防备，柳仲礼不幸被敌将从背后偷袭，肩部中了一刀，在部将的护送下，仓皇逃离战场。这一战，两军打了一个平手。侯景不敢再渡秦淮河，勤王援军也不敢渡河去，双方就隔河对峙着。

之前被侯景大败东撤的邵陵王萧纶收拾残部，在京口会合东部各军，也赶到了秦淮河南岸。这时，萧方等、王僧辩率领的荆州兵，还有远从高州（今广东阳江）赶来的援军也先后到达。援军的声势再次高涨起来。为了让台城知道援军云集的消息，萧嗣的部下李朗用苦肉计，故意违抗军令挨了一顿鞭子，然后投奔侯景，麻痹叛军后跑入台城。城里知道援军源源而来，人心大振。形势变得对梁朝君臣有利。

但是各路援军缺乏统一指挥，大都督柳仲礼为人粗暴，傲慢无礼，不能服众。更严重的是，散布各处的梁朝宗室诸位王、公、侯爷之间，各怀鬼胎，互相猜忌，不仅不能合作，更没人出来说话。因此建康城外的援军虽多，却是各自为政，眼看着台城被围，就是没人上前。多路援军的军纪恶劣，只顾在秦淮河畔掳掠，反而失去了民心。台城遭围近百天，情形越发糟糕。战争爆发时，台城有意识地囤积了四十万斛粮米，但是没有储备燃料、草料及鱼、盐等物资。人光吃大米也不行，于是军民们就开始捉老鼠、麻雀，甚至杀马煮皮革吃。据说，连佞佛的萧衍也不得不吃起了鸡蛋。城中军民死亡了十之八九，尸横盈路，惨不忍睹。

叛军的日子也不好过，侯景也缺粮。他包围着台城，勤王援军又包围着他。侯景原本依靠建康城东的存粮支撑，如今被援军断了路，无法运来。侯景听到荆州兵赶到，心里也发怵。进退不得之时，谋士王伟建议侯景假意求和，抓紧把东城的粮食运进石头城，休整兵马，等对方懈怠后，再一举击破。侯景又一次欣然采纳，派人向台城求

和。

萧衍见侯景议和，大怒：“和不如死！”太子萧纲苦苦哀求父皇允许议和。他眼看着台城将要要不保，自己的太子地位也要动摇，但如果能保住台城，稳定局面，自己还是太子，还有机会当皇帝，于是萧纲力主议和。萧衍犹豫再三，对萧纲说：“你要和，就你去办吧，只是不要为千载之后的人所笑！”大臣傅岐反对议和，指出这是侯景的缓兵之计。但是萧纲固执己见，派人与侯景和谈。二月中旬，双方在台城外会盟。和谈达成，建康城内外平静了下来。

侯景借口种种理由，一会儿是部队要休整，一会儿是朝廷某些大臣对他不友好，要求撤换，但就是不肯渡江北撤，继续包围着台城。他督率部下抓紧抢运粮食，明显是用心险恶。即便如此，原先就不是真心勤王的各路诸侯纷纷懈怠下来。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湘东王萧绎已经集合荆州主力部队，在长江中游驻扎了一个多月，别有用心地等待着台城的消息。愚蠢的萧衍、萧纲父子还发文各地，说和谈成功。萧绎闻讯，准备返回江陵。侯景的叛军喘息已定，又见各路援军纷纷懈怠，立即翻脸突袭台城。三月十二日夜，叛军在城中叛将的接应下，攻破台城。

永安侯萧确抵敌不住，跑进宫里向萧衍报告：“台城失守。”萧衍躺在床上，问：“还能不能打？”萧确回答：“无力再战了。”萧衍长叹一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确，南梁是萧衍打下来的，也即将在萧衍手中灭亡。萧衍能在王朝命悬一线的时候，认识到“自我失之”，还算有自知之明。不过他的“亦复何恨”就是自欺欺人的话了。即便萧衍不留恋治理了将近五十年的江山，但江南百姓却已陷入战火的煎熬之中，富庶的经济亦惨遭破坏，又怎么能说“亦复何恨”呢？这不过是萧衍不负责任的自我安慰罢了。

侯景以区区八百残兵，一路横扫江南，终于在五个月内攻破了南梁。

第七章 天下分久必合

在权力面前，亲情又算什么

—

攻入台城的当天，侯景带着五百甲士去见萧衍。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几十年的帝王生涯让萧衍有了很强的气场，侯景从底层一路厮杀过来，还真没看过萧衍这样的人。萧衍虽然成了俘虏，却不慌不忙地问侯景：“你是哪里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竟然害怕得汗流满面，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一旁的部将任约替他说：“臣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收拾情绪，回答：“千人。”萧衍又问：“攻城时多少？”侯景答：“十万。”萧衍再问：“现在有多少兵马？”侯景顿时胆壮起来：“率土之内，莫非己有。”萧衍毕竟是输了，在这个话题上说不过侯景。但他依然正色告诉侯景：“如果你忠于朝廷，就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答应了。

别过萧衍，侯景告诉身边的亲信，自己征战疆场多年，从没有胆怯过，不知道为什么见到萧衍竟然会感到害怕，莫非“天子威严”真的存在？害怕归害怕，它一点儿都不妨碍侯景的叛军在台城大肆抢劫，

将皇宫抢个精光。

侯景用萧衍的诏书，命令各地援军解散。

有人建议邵陵王萧纶突袭侯景，出其不意，很可能歼灭叛军。萧纶不听。各路援军的大都督柳仲礼接受诏书，准备解散各军。他的父亲柳津一直被围困在台城。之前，柳津登城向儿子高喊：“你的君父遭难，你不能竭力，后人将把你说成何等样人！”柳仲礼自从受伤后，就丧失了战斗的勇气，对父亲的高喊无动于衷。萧衍曾询问柳津退敌之计，老人家伤心地说：“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如何能够平贼！”建康周边各路援军效法柳仲礼、萧纶等人，纷纷撤回。之前，湘东王萧绎命王琳运输大米二十万石支援建康，船到姑孰，听到台城失陷，王琳将大米沉入长江，空船返回荆州。可见萧绎不是真心救援父皇。遗憾的是，怀有这样心思的宗室成员不止一人。

侯景把梁武帝萧衍攥在手里，不知道如何处置，暂时还尊奉他为皇帝。之前被侯景拥戴为皇帝的萧正德，就得不到所有人的承认了。侯景把他拉下龙椅，让他做了侍中、大司马。萧正德这才明白自己只是侯景的一枚棋子，大呼上当，写密信给萧范，约他起兵进攻侯景。结果密信被侯景缉获，萧正德被杀。永安侯萧确坚定反对侯景，之前战斗英勇，反而受到了侯景的赏识，被留在侯景身边。一次出猎的时候，萧确趁侯景身边没人，搭弓就要射杀他。不想弦断了，侯景发觉后，当场杀死了萧确。

侯景派兵日夜看管萧衍。萧衍看到许多武士佩戴兵器，在皇宫中大模大样地进进出出，就问身边侍从怎么回事。侍从回答：“这是侯丞相派来的卫兵。”萧衍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后很生气，把萧衍监管得更严，还断绝了萧衍的饮食。萧衍已经八十六岁了，之前三个多月天天担惊受怕，如今又没吃没喝，很快就忧愤成疾。五月的一天，萧衍在昏迷中醒来，觉得口中发苦，就喊人送蜜水上来。喊了两声都没有人回答，萧衍环顾偌大的宫殿，只有他孤零

零一人，不禁悲从心来，溘然长逝。五月二十六日，侯景拥戴太子萧纲即位，史称简文帝。

占领建康后，侯景迫切需要扩大地盘，保障后勤充裕。他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东南富庶的三吴之地。三吴，指的是现在苏南和浙北地区的吴郡（在今苏州）、吴兴郡（在今湖州）、会稽郡（在今绍兴），该地区水土优越、人烟密集，又是南方世家大族的根据地。从东晋以来，除刘宋泰始二年（466）三吴曾遭受战火外，近一百年没有发生过战事，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侯景派遣部将董绍进攻广陵、于子悦进攻吴郡。他们都只带上了几百名乌合之众，说是行军，不如说是抢粮更为贴切。三吴地区每座城池的守军都比敌人要多，且城坚粮足，如果有心一战，完全可以御敌于家门之外。但是当年年底，三吴就被叛军完全占领了。这是因为统治三吴地区的世家大族们羸弱不堪，根本不能应战，他们不是坐等叛军来抄家灭门，就是开门投降，最后还是落得个身首异地的下场。至此，侯景占领了以建康为核心、以三吴为后方的大片地盘。

侯景的统治极为残暴。他公然提倡烧杀掳掠，告诫众将攻破敌军营垒后要屠城，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的威名。他在石头城立了一座大碓，抓了反对他的人就放在碓里舂死。侯景还禁止人们低声说话，违反的人要株连三族。

富庶的三吴地区惨遭破坏，叛军烧杀劫掠，四处抓人，把很多人当作奴隶贩卖到北方去。侯景败逃寿阳的时候，曾上奏萧衍，要求与王、谢等世家大族通婚。萧衍为难地说：“王、谢门第太高，你考虑考虑朱、张以下的门第吧。”侯景哪里受得了如此重的门第观念，怒道：“总有一天，我要将吴中儿女配给奴隶！”如今，他果然开始报复性地屠戮三吴的世家大族，抄家灭门都不罕见。王、谢等头等门第的大家族，元气大伤，很快凋零。整个三吴地区成了野狼横行于乡间、废墟中躺着枯骨的地狱。

简文帝萧纲虽然如愿当上了皇帝，却是侯景的傀儡。侯景对他看管极严，除了几个特定的人，不让他见其他人。大宝元年（550）十一月，南康王萧会理等人乘侯景不在建康之机，密谋起兵，预备先杀侯景的军师王伟，再占领京师。不幸，保密工作没做好，被侯景发觉，参与者悉数被杀。之前能够接近萧纲的少数几个人，为了避嫌，也都开始远离萧纲。只有武林侯萧咨还照常去找萧纲请示汇报。侯景就怀疑萧咨也在搞阴谋，把他暗杀了。从此，除了侯景和个别宫人，再也没人敢接近萧纲。萧纲几乎与世隔绝。

有能力与侯景相抗衡的是盘踞在长江中上游的几位宗室亲王。从东往西分别是：萧衍第六子邵陵王萧纶，在台城破后退兵郢州（今湖北武昌）；往西到江陵是萧衍第七子，即担任荆州刺史的湘东王萧绎；再往西就到了四川，为萧衍第八子，即担任益州刺史的武陵王萧纪，都督今四川、陕南等地。这三位王爷是亲兄弟。

湖南地区有驻扎长沙的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湖北北部有驻扎襄阳的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这两位王爷也是亲兄弟，分别是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二子和第三子。另外夹在几位王爷之间的还有一个桂阳王信州刺史萧慥（zào），驻扎在今重庆地区。他是萧衍的哥哥萧懿的孙子。这后面三位王爷是前三位王爷的侄子。

六位萧姓王爷都拥兵一方，其中以湘东王萧绎力量最强。荆州本来就是仅次于扬州的第二富庶之地，加上萧衍又给萧绎安上了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的头衔，在名义上，桂阳王、岳阳王、河东王三位侄子都要受萧绎的管辖。萧衍死后，外藩诸王对侯景拥戴的傀儡萧纲并不买账，各行其是，多数人都有心思自立为帝。而骨肉同胞的存在，

就是他们登基称帝的最大障碍。于是诸位王爷忘却了杀父之仇，抛弃了国破之恨，开始自相残杀。

萧绎动作最早，也最凌厉。儿子萧方等撤军江陵，带回了台城失守的消息。萧绎不组织勤王，只是加强江陵城防，防备侯景进攻。萧衍死讯传到江陵后，萧绎既不公开萧衍的死讯，更不承认哥哥萧纲的皇帝身份。他不用萧纲的大宝年号，而是继续沿用父皇萧衍的太清年号。信州刺史萧慥也参与了建康增援，撤军途中经过江陵。有人向萧绎诬告萧慥与岳阳、河东二王勾结，要夺他的地盘。萧绎不辨真假，就把自己的侄子萧慥杀了。

萧绎之前借口勤王，下令管辖的各州出兵出粮。岳阳王萧誉派一名军官领兵前往。萧绎要萧誉亲自带兵去，萧誉不肯去。而萧誉的二哥湘州刺史萧誉则断然反抗萧绎征粮征兵的命令，不肯服从萧绎。两人对萧绎言辞不恭，叔侄三人的关系开始恶化。建康战事停歇后，萧绎决定先拿萧誉开刀，进军湘州首府长沙。湘州之战打得很艰难，从太清三年（549）六月到大宝元年（550）四月，打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萧绎还赔上了长子萧方等的性命。情急之下，萧绎急令大将王僧辩火速进攻长沙。王僧辩认为部队没有集合完毕，请求缓期。萧绎急得拿剑砍王僧辩的左腿，王僧辩顿时昏厥，后又被人抢救了回来。萧绎依然把王僧辩关入大牢，由此可见萧绎这人性情相当暴躁，而且对下严苛。

长沙的萧誉向雍州的三弟萧誉求救。萧誉率众两万攻打江陵，想来个围魏救赵。萧绎窘迫之余，重新请出王僧辩主持军事。王僧辩最初在北魏任职，在萧衍统治前期南逃归附，一直在萧绎身边为官，忠于萧绎。尽管无辜被主公砍了一剑，王僧辩还是为萧绎出谋划策，招降了多名萧誉的部将。萧誉不战而败，狼狈逃回襄阳。王僧辩马不停蹄，南下进攻长沙，杀死了萧誉。

二哥死了，萧誉就成了萧绎的下一个目标。萧誉惶恐不安，向西

魏宇文泰求救，自愿做西魏的附庸。宇文泰看到北齐的高氏趁着侯景之乱在淮河流域拔城掠地，早就心中痒痒，见有南梁王爷归降，大喜，马上立萧詧为梁主，并派大将杨忠（杨坚之父，隋朝建立后追封太祖皇帝）率军进驻襄阳，帮助萧詧防守。萧绎派柳仲礼率军进攻襄阳，被杨忠打败，柳仲礼成了俘虏。魏军为扩大战果，逼向江陵。萧绎不得不和西魏谈判，割汉江以东、以北的土地给西魏，并送一个儿子到长安做人质。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后，萧绎的北方防线暂时稳定了。

解决三个侄子后，萧绎的下一个目标是从建康东撤、驻兵郢州的邵陵王萧纶。萧绎担心他这位六哥兵马强盛对自己不利，派王僧辩领兵开向郢州，想将萧纶“迎”回江陵。萧纶痛心地说：“我志在杀贼，别无他意。七弟疑心我要和他争皇位，处处算计我。我如果和七弟刀兵相见，就是骨肉相残，被千百年后的人嘲笑。”于是，他选择率兵向北开拔，越走人马越少，九月走到齐昌（今湖北黄陂）时部下离散得只有几千人。萧纶万般无奈，归降北齐。北齐封萧纶为梁王，将他扶持为傀儡。萧纶北上河南，第二年二月想向西边拓展地盘，在与西魏军队的战斗中被杨忠杀死。

萧绎的八弟武陵王萧纪在益州，计划率军出三峡，“过问”一下长江中下游的事情。萧绎给他写信，承诺只要萧纪按兵不动，日后和他“分国而治”，重演三国时期东吴和蜀汉的历史。萧纪同意了，固守四川的地盘。这两兄弟，都早早地动了黄袍加身的心思。

至此，湘东王萧绎在长江中游一枝独秀，成了最大的实力派。他在大宝元年（550）四月发布檄文，下令讨伐侯景。说是讨伐，萧绎却迟迟没有动作，反倒是侯景闻讯后抢先逆江而上。叛军由任约、于庆率领，分头进军。七月，任约兵临湓城（在今江西九江）。镇守此处的萧纲之子寻阳王萧大心一触即败，向任约投降。叛军进一步逼近郢州。在南边，于庆则占领了豫章。

萧绎派徐文盛东进与任约对峙。双方对垒，徐文盛连战连捷——

侯景军队的战斗力原本就不强。任约频频向建康告急，侯景先是加派宋子仙率兵援助，又在大宝二年（551）留王伟守建康，亲自领兵前往。侯景和徐文盛正面打了一仗，也败下阵来。

这时候，侯景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胆略显露了出来。他被打败后，并不灰心，而是又想出了一个冒险的计划。当时，萧绎任命十五岁的儿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派鲍泉辅助。这两个人，一个是无知贪玩的少年，一个是懦弱的老官僚，在郢州城里胡作非为，毫无戒备，全靠徐文盛在前线抵抗。侯景派宋子仙、任约领四百骑兵，绕过前线，走陆路偷袭郢州。四月初三晚，天色昏暗，风雨交加，郢州守兵看到夜幕中有一队人马在奔驰，连忙报告。州府中，萧方诸正在和鲍泉玩游戏。他骑在鲍泉的肚皮上，用五色彩线把他的胡子扎成一根根小辫。听到报告，玩得起劲的萧方诸根本没听进去，鲍泉想当然地认为不可能是敌军，很可能是自己人。两人都不当回事儿，没有做任何戒备。结果，四百叛军直冲进郢州，宋子仙一马当先，杀进州衙。萧方诸看到凶神恶煞的宋子仙，屈膝就拜。宋子仙看到床下露出点彩线，喝令士兵搜查，把鲍泉拖了出来，两人都成了刀下之鬼。

偷袭得手，侯景越过徐文盛的军队，顺利进入郢州。前线的徐文盛部队丧失斗志，不战而溃。许多家在郢州的官兵投降了侯景，徐文盛逃回江陵。侯景在郢州短暂逗留后，分兵给宋子仙和任约，分别进攻巴陵、江陵，自率主力殿后。叛军水陆并进，气势凶猛。这是侯景的极盛时期。

三

四月十九日，叛军开始进攻巴陵城。宋子仙一开始没把巴陵放在眼里，攻打了几回，却发现这是个硬骨头，很难攻克。原来，郢州失

守以前萧绎已任命王僧辩为大都督，领兵东征。王僧辩走到巴陵，得知郢州失守，决定扼守巴陵堵击叛军。巴陵告急，萧绎加派胡僧祐、陆法和带兵救援。侯景则亲自领兵进攻巴陵，同时命令任约截击胡僧祐率领的援军。战事一直持续到六月，叛军在巴陵城下被拖了一个多月，伤亡过半，加上疾病横行，侯景元气大伤。不巧，任约在赤亭（今湖南华容附近）被胡僧祐打败，成了俘虏。侯景烧营撤走。

王僧辩乘胜追击，在六月下旬收复郢州，俘虏宋子仙，七月攻克湓城。之前，江西地区的叛军遭到了从广东方向北上勤王的陈霸先部队的猛攻。梁将侯瑱之前投降侯景，驻扎在豫章，如今宣布反正，配合陈霸先进攻于庆部叛军。于庆在陈霸先和侯瑱的夹击下，节节败退，收缩到长江流域，又遭到了顺江而下的王僧辩的猛攻。于庆狼狽而逃。豫章、寻阳等重镇都被收复。最后，侯景只搜集了几千残兵败将，退回建康。

侯景势力衰微，却开始琢磨着代梁称帝，过过当皇帝的瘾。王伟大为赞成，认为侯景称帝可以“示我威权，且绝彼民望”。王伟以为侯景称帝能够收人心，其实侯景早已经失去了人心，称帝只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

侯景阵营完全没有认识到危险已然来临，乱哄哄地开始准备。侯景早就看简文帝萧纲不顺眼了，废他为晋安王，幽禁起来，立豫章王萧栋做新皇帝。萧栋的父亲是昭明太子萧统的长子豫章王萧欢。萧统去世后，梁武帝萧衍一度想立萧欢为皇太孙，但最后没有实施。萧栋就是萧欢的长子。侯景祸乱建康的时候，萧栋这样的小王爷的日子也很难过，要和老婆两个人在庭院里开荒种菜，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一天，几个叛军破门而入，架起萧栋就走。萧栋吓得大哭，连连哀求不要杀他。待被拉到侯景跟前，侯景只是挥挥手，萧栋就当上了新皇帝。而简文帝的太子萧大器、寻阳王萧大心等宗室二十余人被侯景杀死。侯景又命王伟以祝寿的名义去拜访已是晋安王的萧纲。萧纲知道王伟是来要自己性命的，却假装不知情。既然是祝寿，萧纲就拉王伟

饮酒，喝得酩酊大醉，最终被王伟杀害。

侯景拉萧栋当傀儡皇帝，完全是为了装点最后的门面。到了十一月，只做了四个月皇帝的萧栋被废为淮阴王。侯景粉墨登场，做起了皇帝。之前萧纲曾封他为汉王，侯景就定国号为汉。

汉朝伪政权完全是一场闹剧。侯景大封当初跟随他从河南逃到寿阳、再一路打到江南的兄弟们为高官。这些人完全不知礼仪，上朝的时候一哄而上，全无章法。王伟可能是其中唯一的明白人，就对侯景说要立礼仪、定制度，尤其是要先建立新王朝的宗庙。

王伟让侯景赶紧“立七庙”。侯景不懂，问“七庙”是什么。王伟解释说皇帝必须祭七代祖宗，问侯景七代祖宗的名字。侯景想了好一会儿，说：“我只记得我爹叫侯标，不过他死在朔州了，魂灵不会大老远地跑到江南来享受供品的！”这话引得哄堂大笑。有部下说侯景的爷爷叫乙羽周，王伟就随手写下“侯周”作为侯景爷爷的名字，再从两汉、魏晋时期给侯景拉了几个侯姓的名人当祖宗，总算凑足了七个人。新王朝的宗庙就算立起来了。

自己挖坑埋自己

侯景一帮人在建康城粉墨登场，萧绎的讨伐大军则已经逼近建康。

王僧辩和陈霸先会师后，军容强盛，外围叛军望风披靡。讨伐军只于第二年（552）三月在姑孰地区遭到了叛军侯子鉴部的抵抗。侯景战前提醒侯子鉴不要和王僧辩水战，争取在陆地固守。王僧辩故意示弱，招惹侯子鉴下水，将叛军一举击溃。三月中旬，讨伐军战船驶入秦淮河，抵达建康城下。

侯景得到姑孰的败讯后，开始做负隅顽抗的准备。他下令堵塞秦淮河口，又在北岸抢筑城池，准备占领有利地形。陈霸先则勇敢地率领本部兵马渡过河去，在北岸构筑营垒。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抱团建立了营帐。侯景见势不妙，亲自带领步骑一万多人突击梁军营盘。梁军顽强抵抗，阻止了叛军的八轮进攻。最后，侯景急红了眼，带着一百多名骑兵赤膊上阵。他们丢掉长矛，只执短刀猛冲陈霸先部队。陈霸先拼死挡住，侯景耗尽锐气，溃退而去，无力再战。石头城的守将见势不妙，开城投降。侯景认为大势已去，又不敢回台城，站在城下把王伟痛骂了一顿，骂他净给自己出坏主意，然后向东逃去。只有一百多名士兵跟随侯景。侯子鉴、王伟等人则渡江往京口方向逃亡。

梁军收复建康。王僧辩放纵官兵肆意劫掠。士兵们将宫殿糟蹋成一片废墟，为了掩盖罪行在夜晚将宫殿付之一炬。出征时，王僧辩专

门向萧绎请示：收复建康后，如何处置侯景扶持的小皇帝萧栋。萧绎回答：“六门之内，自极兵威！”表面意思是要在建康城内宣扬兵威，实际上就是让王僧辩杀掉萧栋。杀皇帝这事儿，弄不好就会被后人唾骂，王僧辩不愿意做，明确告诉萧绎：“臣不愿意做成济第二。”成济是当年替司马氏杀死曹髦的将领。王僧辩不肯干，萧绎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愿意干的朱买臣。

侯景登基后，萧栋和两个弟弟被监禁起来，终日担惊受怕。梁军收复建康后，狱吏将萧栋兄弟三人释放，两个弟弟如释重负，道：“现在总算可以免于横死了。”萧栋却忧心忡忡地说：“未必！”果然，朱买臣找到萧栋，说是请兄弟三人上船喝酒压惊。兄弟三人上了船，就被朱买臣扔进河里溺死了。

侯景部将侯子鉴逃到广陵，和守将郭元建一起投降了北齐。北齐接手广陵，有了窥探江南的据点。王伟则被人抓获，押到建康，再转送江陵，最终被杀。侯景沿途收拾残兵败将，聚拢了数千人，一个月后被侯瑱率追兵打败。侯景输得只剩一条船和几十个人，他在沪渎（今上海）出海，想逃往北方。

侯景攻克建康后，强占羊侃的女儿做妾，并任命羊侃的儿子羊鹜做都督。羊鹜心态很复杂，既想报仇，又想借侯景的势力飞黄腾达。他随侍侯景左右，骗取他的信任。侯景逃到海上时，羊鹜也在船上。他乘侯景熟睡，联络了其他卫士，让船家改变航向开回长江。侯景一觉醒来，发现回到了江南，大吃一惊。他正要命船家改变航向，羊鹜就拔刀指着侯景说：“今日，要借你的脑袋去换富贵。”羊鹜和其他卫士一起挥刀向侯景砍去。侯景拼命躲过，逃到船舱里。羊鹜提起一矛赶来，一矛将侯景扎死。几个人切开侯景的肚子，塞进盐防止腐烂，将尸体运到建康。王僧辩下令，砍下侯景的脑袋送到江陵，砍下双手送给北齐，其余部分在建康示众。建康军民恨侯景入骨，顷刻之间就把他的尸骨扯得粉碎。

十一月，湘东王萧绎正式在江陵即位，改元承圣。萧绎就是梁元帝。王僧辩因功被封为司徒、侍中、尚书令、永宁郡公，驻建康。陈霸先因功封司空，领扬州刺史，驻京口。萧绎和手下大臣们留恋江陵老根据地，加上建康因战火毁坏严重，朝廷就留驻在了江陵。

不过当时南方有两个皇帝，除了萧绎，还有他的八弟萧纪。萧纪早一步在成都称帝。萧纪不知道侯景已死的消息，以讨伐侯景为名，率领四川兵马顺江而下，来和萧绎争夺天下了。三峡口守将陆法和见蜀军声势浩大，向江陵告急。萧绎无将可用，把监狱里的侯景旧将任约、谢答仁放出来，派他们去抵挡萧纪。同时萧绎不惜以领土为代价，向西魏求救，怂恿西魏进攻四川。宇文泰兴奋地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派尉迟迥进攻四川。四川空虚，兵无斗志，沿途守将非降即逃，魏军很快就包围了成都。萧纪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萧纪惜财如命，金银财宝都随身携带，重达一斤的黄金有上万块。每次作战前，萧纪都把黄金饼摆在营帐的显要位置，说要战后论功行赏，但是从不兑现。官兵们早已和他离心离德，加上大多数人眷顾四川老家，不愿出三峡，逃散了很多。七月中，任约、谢答仁发动进攻，萧纪败得一塌糊涂。萧绎战前下令：对萧纪只要尸体不要活人！梁将樊猛抢先冲到萧纪跟前。萧纪连忙把黄金扔给樊猛，说：“这些金子都给你，放我一条生路吧！”樊猛冷笑道：“杀了你，这些金子照样是我的。”萧纪被杀。

萧纪死后，留守成都的萧（hui）等人投降西魏。四川、陕南等地被并入了西魏的版图。

侯景之乱至此算是彻底结束了。此时的江南一片萧条，南梁国力大为衰弱，勉强维持统治。南北方的边界线步步向长江逼近。北齐占领了淮河到长江的广阔地区，西魏则占领了汉水以北、巴蜀和陕南地区，领土扩大了一倍，成了最大的赢家。

承圣三年（554）三月，梁元帝萧绎向来访的西魏使臣郑重地提出了两点声明：第一，我已经称帝，不再对西魏称臣；第二，要求西魏归还梁、益等州和汉水以北等地。萧绎等于是推翻了之前和西魏达成的所有协议。也许他觉得侯景之乱结束，南方已经安定，自己有实力和西魏平起平坐了。遗憾的是，宇文泰并不这么认为。萧绎政权的实力并没有随着侯景的覆灭而增强，南梁的防守态势依旧漏洞百出。萧绎的要求只是让宇文泰意识到需要另换一个傀儡了。

恰好，襄阳的萧警一再请求宇文泰派军进袭江陵。几年来，萧警完全仰仗魏军的羽翼保护，宇文泰觉得他远比萧绎听话。于是在几个月后，宇文泰派于谨、宇文护和杨忠率军，与萧警会合后，向江陵杀去。

萧绎继承了南梁皇室擅长文学的传统，喜欢阅读和写作，尤其喜欢老子，大敌当前还召集群臣大谈阅读《道德经》的感悟。萧绎既担心魏军来进攻，又自欺欺人，觉得魏军不会来攻打自己。他一会儿下令梁军戒备，一会儿又觉得情报有假，解除戒备。刚刚还派出使者去北方刺探情报，下一刻又轻信大臣的意见，觉得魏军是正常调动。总之，萧绎朝令夕改，令梁军无所适从。魏军很顺利地包围了江陵，开始包抄萧绎的后路。而萧绎还在讲《道德经》，只不过听讲的将领们都满身戎装，穿着铠甲拿着刀枪坐在下面。

江陵即将陷落，有人建议释放江陵监狱中的几千名死囚犯充当兵士，萧绎不准，还下令将死囚悉数杀死。将军谢答仁、朱买臣劝萧绎突围，逃到长江南岸，那里有任约的军队驻守。萧绎却留恋江陵，加上身宽体胖，不愿意逃走。谢答仁又说愿意保他突围，萧绎依旧踌躇

不定。他突然想到谢答仁、任约都是侯景的降将，觉得不能信任，决心死守江陵。他只是下令调远在建康的王僧辩部勤王，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江陵很快就被攻破了。

城破时，萧绎烧毁了所藏的十四万册图书。他认为自己就败在死读书、读死书上，所以拿书撒气。当时印刷术还没有被发明，图书要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保存十分不易。加上萧绎藏书中还有许多孤品善本，他的行为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城破后，魏军又屠杀了聚集在江陵的许多大臣和文人。两相作用，中国文化发展在此刻因人祸倒退了一大步。

对于投降的萧绎，于谨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就转交给了萧警。萧警将七叔百般侮辱后，用土袋子将他活活压死。魏军在江陵立萧警为皇帝，年号大定，划出江陵周围百里之地作为梁朝的领土。魏军以助防为名，留驻江陵，表面上是帮助萧警防御，实际上是监视萧警。萧警地位类似西魏的藩王，上书称臣，奉西魏正朔，连许多国内政策都没有决策权。江陵的南梁政权完全是一个傀儡政权，历史上称之为西梁或后梁。

萧警请魏军进攻江陵的本意，是想借助外力找萧绎报仇，同时也希望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如今，萧警的目标应该说都达到了。但是魏军在江陵俘虏了数万名王公百姓，挑选其中的青壮年分配给官兵做奴婢，老弱全部屠杀。最后，江陵城中只剩下三百多户人口。而萧警的老根据地襄阳，则彻底沦为了西魏的领土。萧警追悔莫及。他既恨领土狭小，又看到城池残毁、财政窘迫，更不愿意整日当西魏占领军下的木偶。萧警终日郁郁寡欢、扼腕叹息，吟诵“老马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梁元帝萧绎死后，南方一时间陷入了分裂。建康周围在王僧辩、陈霸先二人的实际控制下；长江中游的梁朝势力推举湘州刺史王琳为盟主，不承认萧警政权，并出兵试图收复江陵。萧警在位的主要作

为，就是围绕与王琳等人的争斗展开的。在魏军的帮助下，王琳的进攻被萧警挫败，萧警派大将军王操率兵南下，反倒攻取了几个郡。后来，陈霸先在建康建立了陈朝。王琳等人同样不承认陈霸先的政权。为了与陈军作战，王琳向萧警称藩，并请求萧警出兵共同对付陈霸先。萧警同意了，可惜军队还没出发，王琳已经失败。长江中游的南岸地区被陈军占领。因此后梁的领土自始至终只局限在江陵周围的几个县而已。

萧警在位八载，忧愤成疾，郁郁而终。其子萧岿被扶持为新傀儡，年号天保。

三

萧绎在江陵延续梁朝国脉时，令王僧辩镇守建康，陈霸先镇守京口，将长江下游托付给了二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备已经推进到长江北岸的北齐军队。

陈霸先在京口招揽流民，多次应江北百姓的要求渡江进攻，试图收复广陵。虽然都失败了，但陈霸先的名声越来越好。不少乱世豪杰聚集到陈霸先身边，他的军队也得到了壮大。相比之下，王僧辩就保守得多，一心固守建康，没有向江北或其他方向发展。江陵危急，萧绎命王僧辩增援，王僧辩也没有迅速行动。江陵陷落后，王僧辩也不承认萧警政权。当时，萧绎的儿子几乎全部在江陵遇害，只有第九子晋安王萧方智在外担任江州刺史，躲过了劫难。王僧辩急忙去寻阳迎接萧方智。

第二年（555）二月，萧方智来到建康，被王僧辩尊奉为太宰，承制统治天下。而没有让萧方智直接称帝，是王僧辩不自信和保守的

表现，他想观看天下的局势后，再做打算。萧方智年仅十三岁，建康的一切都由王僧辩做主。

当时，南梁各地大员各自为政，互不隶属，既有王琳为主的中游藩镇，也有江东地区半独立的各郡。王僧辩虽然占据建康，拥有萧方智，却不能服众。郢州刺史陆法和以郢州投降北齐，北齐在江北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对建康形成压迫之势。北齐大军护送被俘已八年之久的萧渊明来到江北，写信给王僧辩。信中首先对江陵的沦陷表示沉痛哀悼，然后指出如今南梁内部动荡，需要一个长君主持朝政。因此北齐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派兵“护送”萧渊明到建康即位，要求王僧辩迎接。萧渊明是萧衍的侄子，在血统上缺乏即位的合法性，但他背后有北齐大军。北齐军在江北攻城略地，扩大优势，刀锋直指建康。王僧辩没有信心与北齐交战，不得不展开外交斡旋。

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王僧辩拥戴萧渊明为新皇帝，萧渊明立萧方智为太子，让王僧辩主持朝政。于是萧渊明在刀枪的护卫下渡江，到建康登基做了皇帝，以堂侄萧方智为太子。和江陵的萧警政权一样，这也是一个傀儡政权。只是它听命于北齐，由王僧辩继续掌握实权。

王僧辩的所作所为遭到了陈霸先的激烈反对，王僧辩便以萧渊明的名义任命陈霸先为侍中，将他降职。至此，建康和京口方向的矛盾开始凸显并激化。这里要先重点介绍一下陈霸先这个人。

萧衍即位的第二年，浙江长兴县一户贫寒之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家人给他取了一个很霸道的名字：陈霸先。陈霸先小时候读了许多兵书，头脑灵活，善于钻营。起初，他在乡间做里司，后来又去了首都建康当油库吏。之后，他成为新喻侯萧映的传令员，得到萧映的赏识。后来萧映去广州做刺史也就把陈霸先带到了广州，让他担任中直兵参军。陈霸先在岭南平乱有功，先后被提任为西江督护、交州司马兼领武平太守、振远将军、西江督护兼高要太守。他在岭南招募了最

初的军队，并降伏了杜僧明、周文育等将领。

陈霸先是在侯景叛乱中真正崛起的。太清二年（548），广州刺史元景仲接受侯景的招降。陈霸先毅然起兵讨伐元景仲，推举梁武帝的堂侄萧勃为广州刺史。元景仲兵败自杀。萧勃任命陈霸先为始兴郡（今广东韶关）监事。当时台城已经失守，陈霸先在始兴招揽侯安都等豪杰，积极准备出师。不想，萧勃一心偏安岭南，反对陈霸先北伐，还派人联络南康（今江西赣州）豪强蔡路养，阻挠陈霸先越过南岭。陈霸先则派人到江陵向湘东王萧绎表示效忠。

大宝元年（550），陈霸先越过南岭，击败了蔡路养两万人的军队。在战斗中，蔡路养的内侄萧摩诃，年仅十三岁，单骑出战，无人能敌。陈霸先指挥将领恶战，收降萧摩诃，攻克南康。此后，他又迅速击破侯景在江西地区的军队，收复豫章。萧绎得到这么一支生力军的拥戴，大喜过望，任命陈霸先为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陈霸先虽非萧绎的嫡系部队，但之后一直被当作主力用在第一线。

大宝二年（551）七月，陈霸先军队在湓城与王僧辩军会师。陈霸先此时有官兵三万人、船两千艘、粮五十万石。王僧辩当时缺粮，陈霸先慷慨地和他分享自己的粮草。两人还结拜为异姓兄弟，关系亲密，一起消灭了侯景，又一起镇守下游，抵御北齐。

就在王僧辩迫于压力倾向接受萧渊明时，陈霸先派人到建康反复劝说，王僧辩都不肯听。

当年九月，陈霸先起兵讨伐王僧辩。他采取的是突袭战术，水陆并进，迅速抵达建康城下。将领侯安都选择在一个夜晚登陆，悄悄摸到石头城北。此处的石头城墙体毗邻山地，防备较松，侯安都指挥士兵搭人墙，把自己抛上去。部下如法炮制，突袭得手。陈霸先则带兵从南门杀入城中。王僧辩正在厅堂办事，听到城破时，敌人已经快杀到跟前了。他和儿子王顓（wēi）带上几十个人，就地死战，最终抵

挡不住而逃上门楼。陈霸先扬言要放火烧楼，逼王僧辩父子下楼投降。当夜，王僧辩父子就被绞死了。

陈霸先随即宣布王僧辩的罪状，声明除王僧辩父子兄弟外，他人无涉，以此来安定人心。萧渊明非常识趣，马上宣布退位。十月，陈霸先拥戴萧方智即位，改元绍泰。萧方智就是梁敬帝，以陈霸先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司空。陈霸先掌握实权，成了长江下游最大的实力派。

陈霸先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安抚北齐，毕竟萧渊明是北齐扶持的傀儡。陈霸先让萧渊明担任司徒，通报北齐说王僧辩“阴谋篡位”，所以才被大家推翻，我们已经拥戴新君，但仍对齐称臣，“永为藩国”。然而北齐会相信陈霸先的解释吗？其他地方大员会听从陈霸先的命令吗？

如何看待陈朝的篡国

—

南方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陈霸先的梁朝政令只能传达到建康及其周边地区。北齐占领了淮南，西魏占领了巴蜀和汉水流域，长江中游存在江陵的后梁、湘州的王琳两大政权。其中王琳被中游诸将推为盟主，集结军队，对陈霸先非常不友好。不过最先对陈霸先发动进攻的是江东各郡。

王僧辩的弟弟吴郡太守王僧智得知哥哥的死讯后，联合吴兴太守杜龛（kān）、义兴太守韦载一起反抗陈霸先。陈霸先派遣周文育东征，进展很不顺利，在义兴与叛军僵持不下。陈霸先留下侯安都守建康，亲自领兵去江东镇压叛乱。他劝降了韦载，击退了王僧智，形势一片大好。不想，真正的危险在后方！陈霸先亲自东征后，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和南豫州刺史任约看建康空虚，合兵偷袭，迅速占领了石头城。侯安都退守台城，向陈霸先告急。

当时，江东还有吴兴郡没有收复。不过陈霸先顾不上了，他率众昼夜行军，向建康赶去。

建康的情况还在恶化。徐嗣徽、任约的叛乱不是单独事件，他们事先勾结了北齐。北齐早就对陈霸先攻杀王僧辩而拥立萧方智不满，对虚弱的江南虎视眈眈，如今得到叛军相助，岂能错失良机？齐军迅速在绍泰元年（555）十一月渡江占领姑孰，呼应石头城的徐嗣徽、任约。叛军仗着齐军的支持，猛攻台城。但最终因为陈霸先及时赶

到，亲自带兵上阵，叛军败下阵来。

徐嗣徽、任约大概是怕了陈霸先，留齐军将领柳达摩守石头城，二人前往采石迎接北齐援军。他们打算联合齐军，再杀回建康。

陈霸先抓住这个难得的空隙，一边组织反攻石头城，一边派遣侯安都偷袭徐嗣徽的老巢秦郡。侯安都一举得手，将在秦郡缴获的战利品，包括徐嗣徽的生活用品，派人送还徐嗣徽，徐嗣徽大为震惊。在建康城中，陈霸先猛攻留守的柳达摩部队，连赢了数场。徐嗣徽、任约引导齐兵一万多人返回建康，增援石头城，被侯安都的水军击败。陈霸先再次猛攻石头城，柳达摩心惊胆战，主动求和。

陈霸先虽然赢了几场，但都是战术上的胜利，并没有扭转战场局势。齐军已经登陆江南，又有叛军相助，占据战场优势。因此陈霸先同意与柳达摩和谈，并达成协议：齐军撤出石头城，双方停战；南梁向北齐遣送人质。陈霸先派遣了侄子陈昙朗和梁元帝萧绎的孙子，即萧方等的长子萧庄渡江北上，作为人质。建康军民屡遭战火，迫切希望和平。陈霸先此举赢得了建康内外的一片赞扬声。

可这只是暂时的休战而已。柳达摩率军撤回后，被高洋处死。在高洋看来，战场优势在自己手里，柳达摩自作主张，放弃了石头城这个重要据点，该杀！不过高洋也没有立即重启战火，而是利用休战，调兵遣将，以大将萧轨为大都督，会合徐嗣徽、任约等部叛军，准备发起新一轮的猛攻。

陈霸先也没闲着，抓紧时间处理江东乱局。幸运的是，侄子陈蒨（qiàn）、大将周文育成功攻杀杜龢，收复吴兴郡，又在第二年初攻破会稽郡，杀死不听命令的东扬州刺史张彪。至此，江东地区全部被陈霸先占领，成了他稳固的后方。

与此同时，北齐的大都督萧轨陆续集合了十万大军，待当年（556）春寒刚过，就杀向梁山（今当涂附近长江南岸）。陈霸先派侯安

都在此驻军，阻击齐军。期间，陈霸先还亲临前线犒军。相持到五月中旬，齐军舍弃梁山，从芜湖出发，走旱路向建康推进，月底即推进到建康城下。台城城墙下出现了零星的齐军侦察兵，大战的阴霾再次笼罩建康军民。陈霸先紧急命令梁山的侯安都等军撤回建康，收缩兵力，准备迎接空前激烈的决战。

到了六月，建康被数万齐军合围，梁军逐处应战。齐军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之所以没有发动猛烈的攻城战，主要是因为天气不佳。时值江南雨季，连日大雨倾盆，平地积水丈余。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显然不适应这样的天气。士兵们日夜站在烂泥里，很多人脚上都泡烂了。饮食也成问题，北方人很难在大雨瓢泼的环境中生火做饭，就算做出了东西也吃得很艰难。台城里面梁军的情况虽然也不乐观，但比齐军要好得多。毕竟梁军都是南方人，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况且台城中建筑完好、排水设施齐全，梁军官兵可以避雨休息。一场暴雨，使得实力的天平开始出现倾斜。

六月十一日，天气转晴，意味着决战的时刻来了。陈霸先决定让将士们饱餐一顿。城中缺粮，只剩可怜巴巴的一点儿麦饭。怎么办？总不能将士们饿着肚子决战。幸而陈蒨从江东运往建康的二千斛米、一千只鸭及时到达。陈霸先大喜，把大米和鸭子都给煮了，又割了许多荷叶，每张荷叶里裹上满满的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发给每位将士。饱餐一顿后，梁军官兵士气大振。第二天拂晓，陈霸先赤膊上阵，带领官兵们向齐军发动全面反击。小将萧摩诃隶属侯安都麾下，侯安都激他说：“卿骁勇有名，但是千闻不如一见……”萧摩诃不等他说完，朗声说道：“今日让明公一见。”

梁军以空前的勇猛，杀向齐军营寨。又累又病的齐军硬着头皮迎战。激战中，侯安都落马，萧摩诃大喝着冲杀过去，救下侯安都。侯安都脱险后，率部绕到敌后包抄齐军。齐军官兵前后受敌，四散溃逃。陈霸先指挥大军大举追击，齐军死伤惨重。数以万计的败军蜂拥到江边，可怜后有追兵、前有天堑，船少人多，争相逃命，因为互相

践踏而死或者被江水吞噬的人不计其数。造反的徐嗣徽及其兄弟徐嗣宗被俘，包括大都督萧轨在内的四十六名齐军将领也成了俘虏，只有任约等少数将领侥幸逃脱。逃到长江北岸清点人数，十万大军只剩下两三万人。齐军伤了元气，丧失了南侵的实力。陈霸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高洋希望赎回俘虏，陈霸先不同意，将被俘的萧轨、徐嗣徽等人斩首。十三日，梁军又烧毁齐军遗留的舰船，烈焰冲天。之前的几十年，南梁官民屡次遭北方欺负，只有挨打的份儿，太需要如此辉煌的胜利来振奋人心了。陈霸先威望大涨，高洋恼羞成怒，杀害了充当人质的陈昙朗。

二

南梁最大的危机解除了，原先的内部结构也需要跟着相应调整。

在此过程中，陈霸先发挥了主要作用，朝廷政令所覆盖的所有地区都是他用长矛和鲜血重新打拼下来的。萧方智则更多是在北方入侵者抵抗时，起到证明南方政权存在的象征性作用。陈霸先在起兵早期地位低微，需要扶持一个皇室成员号召南方军民，与外敌作战。但如今，陈霸先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一位虚君了，他一手打下的江山，皇位要自己坐，于是也选择了禅让这一通行的做法。

太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晋爵为陈王，以扬州的会稽、临海、永嘉、建安，南徐州的晋陵、信义，江州的寻阳、豫章、安成、庐陵等二十个郡建立陈国。萧方智允许陈王佩十二旒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三天后，萧方智就禅位于陈。陈霸先没做什么推辞，就大方地接受了。大

臣们也免去了反复敦请的繁杂手续。陈霸先创下了封王之后三天就受禅为帝的纪录。新王朝国号陈，继续定都建康，陈霸先就是陈武帝。中国历史上朝代名和皇帝姓氏重合的，仅此一家。

陈霸先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在江阴郡建国，全食一郡，行梁正朔，车旗服色，如以往逊帝的待遇一样。也和以往一样，陈霸先没有让萧方智继续活多久。永定二年（558），陈霸先派亲信刘师知去杀萧方智。萧方智为躲避士兵绕床而跑，他边跑边哭喊：“我本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要我即位，现在又要杀我，这是为什么啊？”这位十六岁的逊帝最后还是被士兵们乱刀砍死。陈霸先行事没有丝毫掩盖，倒也显得干脆利落。萧方智死后，被迫谥为梁敬帝。萧季卿袭爵江阴王，江阴国传国至陈末。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研究君权的禅代问题，他的一个观察角度就是从政治道德上分析开国君主的人格品性。对于陈霸先，王夫之认为他的政治道德要高于魏、晋、齐、梁等朝的开国君主：“陈高非忠于萧氏，而保中国之遗民，延数十年以待隋之一统，则功亦伟矣哉！”我们不能排除当时陈霸先完全没有私心，但他以敢死之心，东征西讨，客观上使南方免于战火。他的征战基本上是符合南方百姓的愿望的。陈霸先虽然篡夺了梁朝，但是梁朝的最后阶段完全是陈霸先在维持。他的处境就类似于曹操，天下明明是我的天下，却要树原先主人的旗号。与曹操不同的是，陈霸先扯下了这面旗帜，自己光明正大地做起了皇帝。从这一点上来说，陈霸先可谓是南朝各代开国君主中最伟岸正大的。

之前几朝的开国皇帝篡位后，都可以安心享受皇帝的尊荣，从容施政，但对于陈霸先而言，登基称帝远不是终点。陈霸先的皇帝生涯几乎就是一部征战史。陈朝建立之初，只能算是南方地区比较大的割据势力而已。之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与南方的王琳、后梁等势力争斗，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于永定三年（559）去世，葬于万安陵，年五十七岁。

陈霸先辛苦一生，身后遭遇却是南朝各代帝王中最悲惨的。他建立的陈朝在南朝四代中疆土最小、实力最弱，只能在北方的军事高压下偏安于江南一隅，毫无作为。王僧辩的儿子王颁入隋后为隋朝大将，参加了统一南方的战争。陈亡后，王颁纠集父亲旧部，夜掘陈霸先坟墓，破棺焚尸，并将他的骨灰倒于池塘之中。

万安陵现在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西北面。整个陵墓毁坏严重，只留下两只瑞兽——东面为天禄，西面为麒麟——忠诚地守护在荒野中，经历着风吹日晒，慢慢风化。

三

陈霸先死时，敌对势力环绕，内忧外患丛生。皇位的传承就成了一个敏感的难题。

陈霸先的皇后和大臣们商量后，认为国家危难，迫切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长君即位，而不应该固守父死子继的老传统。他们从大局出发，封锁了陈霸先的死讯，招陈霸先的侄子陈蒨还朝。陈蒨算得上是跟着陈霸先创业的元老，之前和周文育在江东平定杜龛的叛乱、消灭张彪的割据，功劳不小。他还担任过会稽太守等实职，陈霸先死时正率军驻在南皖。得到召唤后，陈蒨迅速赶回建康，被拥立为新帝，史称陈文帝。

陈霸先的死讯传开后，王琳集结军队，想趁乱推翻陈朝。陈霸先废萧方智即位后，王琳集团就要求北齐送还人质萧庄，北齐爽快地答应了，王琳于是在郢州拥戴他为皇帝。此时，王琳引兵东下，陈蒨应战。天嘉元年（560），当王琳与陈朝将军侯瑱在芜湖交战时，北周偷袭郢州。王琳腹背受敌，大败，带着萧庄逃亡北齐。北周将势力拓

展到了长江中游南岸。

萧庄投奔北齐后，北齐封他为梁王，试图扶持他复辟梁朝。但不久，北齐就被北周灭亡了。北周手里已经有了一个傀儡后梁，不需要第二个傀儡，便派人暗杀了萧庄。

陈蒨继续向中游进军。侯瑱、侯安都等人力战南下的北周军队，在当年年底收复了湘州等地。岭南的广州刺史萧勃，是陈霸先的老上级，见陈霸先发达了，心里很不舒服。听到陈霸先的死讯后，萧勃举兵不从。陈军挟得胜之威，南下讨伐岭南，萧勃兵败而亡。陈朝至此保有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全部，是南朝时期辖境最小的一个朝代。

陈朝有条件安心施政了。陈蒨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是南朝历代皇帝中少见的有为之君。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国势比较强盛。

天康元年（566），陈蒨病逝，长子陈伯宗即位，史称废帝。

陈伯宗年轻，国事都委托给叔叔安成王陈顼（xū）。陈顼掌握大权，都督中外诸军事，国家大事都决于他手。尚书仆射列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等人发觉陈顼有野心，图谋夺取陈顼大权，计划失败后遭到屠杀。陈顼进一步专权，在光大二年（568）以皇太后的名义废陈伯宗为临海王，自立为帝。陈顼就是陈宣帝，他宣称这是陈霸先的“遗志”。

陈顼是陈蒨的弟弟，颇有哥哥的遗风。他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鼓励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他在位十四年，是陈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期间国家比较安定，政治较为清明。

陈顼时期最大的事件，无疑是太建五年（573）开始的北伐。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北齐国力大减，陈顼起了收复淮南的雄心。他命令吴明彻为都督，领兵十万征讨北齐，齐军应战。陈朝猛将萧摩诃一马

当先，击斩齐军善射者和大力士十余人，齐军大败。陈军收复历阳、合肥、秦州等地，从长江逼近淮河。北齐派南梁降将王琳镇守寿阳，抵抗陈朝。吴明彻采取梁武帝萧衍的方法，拦河筑坝，引水灌城。北齐派出的数十万援军，在距寿阳三十里处扎营，不敢与陈军接战。吴明彻猛攻寿阳，俘虏王琳，送到建康斩首。淮河以南的北齐政权或逃或降，陈朝顺利收复数十城。

终于，南北边界恢复到了梁朝初期的情况，隔淮河对峙。没几年，北齐亡于北周，华北地区剧烈动荡。陈顼进一步萌生了收复淮河以北领土、饮马黄河的雄心。他没有在北周进攻北齐之时“趁火打劫”，却在北周统一北方后才出兵淮北。结果陈军败于周军，非但饮马黄河的宏伟蓝图没有实现，还招惹周军渡过淮河南下，占领了淮南地区。北伐的成果丧失，陈朝国势也遭受重创。长江以北再度沦落敌手。

太建十四年（582）陈顼病逝，传位太子陈叔宝，也就是陈后主。

陈叔宝的弟弟始兴王陈叔陵是个粗鲁残暴的家伙，除了贪恋女色，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盗墓，尤其是好盗挖名人墓葬，窃取不义之财。就连东晋名臣谢安的墓地也惨遭其毒手，陈叔陵还将谢安的棺柩抛弃，霸占土地来安葬自己的母亲。陈叔陵一直有篡位之心，计划在父亲的葬礼上杀了陈叔宝，自立为帝。

陈宣帝的灵柩停在宫中，陈叔宝在灵前大哭。陈叔陵突然拔出刀来砍向哥哥，一刀砍中陈叔宝的脖子。异常幸运的是，不知道是陈叔陵力气太小，还是那把刀太钝，竟然没有深入脖子内部。陈叔宝扑倒在地，陈叔陵正要补上一刀，陈叔宝的生母柳后救子心切，冲上来阻止。陈叔陵又砍倒了柳后。陈叔宝的乳母吴氏抱住陈叔陵胳膊，陈叔宝慌忙爬起来逃了出去。陈叔宝的四弟长沙王陈叔坚将陈叔陵擒住，陈叔陵奋力挣脱，逃出宫门。

陈叔陵一不做，二不休，赦免囚犯，武装起来，又召诸王和诸将，要和陈叔宝拼个你死我活，可惜无人响应。陈叔宝命大将萧摩诃率步骑数百人去讨伐。陈叔陵企图招降萧摩诃，遭到拒绝后知道大势已去，先逼迫妃子张氏及宠妾七人跳井自杀，自己则带上步骑百人想突围投降隋朝，中途被萧摩诃截获。陈叔陵被斩首，诸子赐死，亲信一并伏诛。陈叔宝在平定内乱后，安全即位。他将陈叔陵的王府改成猪圈，并下令将谢安的墓地归还给谢家。

登基后，陈叔宝因为脖颈被砍受伤，在殿中养病，屏去诸姬，只留贵妃张丽华随侍。这段病中经历，让陈叔宝非常宠信张贵妃。陈朝自陈霸先开国以来，很少关心宫廷生活，内廷陈设很简陋。陈叔宝认为后宫过于朴素，开始大兴土木，采选江南美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安乐气象中，陈朝迈向了衰落。

北齐为什么会失败

—

南方梁陈交替期间，北齐的统治者是高洋。高洋的运气很好，父亲高欢给他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家底，在当时西魏、北齐和南梁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北齐的实力最强。虽然在即位初期爆发了侯景的叛乱，但是高洋运筹得当，迅速将侯景这股祸水引到南梁去了。南梁被侯景之乱搅得天翻地覆，高洋乐在心里，跟在侯景身后“接收”了淮南、江北不少的州县。西魏宇文泰也忙着趁火打劫，侵占西南地区。北齐和西魏保持着相对和平，客观上说，双方彼时都还没有吞并对方的能力。此外，高洋还对北方少数民族用兵。当时柔然已经衰落，突厥继起，向南侵略北齐。高洋领兵迎战，痛击了突厥人，迫使他们退回北方。

对外方面唯一让高洋不爽的，就是陈霸先的崛起。陈霸先歼灭北齐南侵的大军，给了北齐实实在在的打击。不过北齐的元气并未受损，高洋统治初期政治清明，政权巩固。北齐领土北到长城，南隔长江与陈朝为界。

政权巩固后，高洋荒淫残暴的恶性就暴露了出来。他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和让人瞠目结舌的“行为艺术”，在之前章节已有论述。当了皇帝后，高洋的癫狂行径不断升级。常山王高演是高洋同父同母的弟弟，见状劝了高洋几句。高洋就把他反绑起来，拿刀搁在他头颈上，问：“谁教会你进谏的？”高演回答：“天下人三缄其口，除臣之外，还

有谁敢说话？”高洋就命人用乱棍痛打高演。高演被打了几十棒，奄奄一息。幸亏高洋酗酒睡着了，底下人见状没再动手，高演才捡回一条命。上行下效，整个北齐变得毫无法治可言，官吏动辄施用酷刑，盘剥百姓。贪污腐败问题也很严重。到了高洋统治晚期，府库蓄积枯竭，已经不能支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了。

高洋时期，北齐的强大是表面的、空虚的。北齐政权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北齐政权建立在六镇鲜卑族和关东汉族豪强的共同支持之上，但鲜卑人和汉族人的矛盾始终存在，同时地方豪强与中央政府之间也存在矛盾。高洋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只能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一会儿打击鲜卑人，重用汉族人杨愔，让他当尚书令，又迎娶赵郡李氏的女子为皇后；一会儿又贬低汉族人抬高鲜卑人，侮辱尚书令杨愔，无端杀害汉族大臣。他也知道任意杀戮并不能长治久安，但始终担心有人威胁高家的统治。

彭城公元韶是北魏宗室的后裔，孝庄帝的侄子。虽然元氏已经禅位，高洋依然担心元氏威胁皇权。他剃去元韶的须髯，强迫元韶像妇女一样粉黛化妆，穿上妇人的衣服做自己的随从。高洋扬言：“我以彭城为嫔御。”以此来侮辱元氏，讽刺元氏微弱。天保十年（559），天降流星，太史官上奏：“今年当除旧布新。”高洋很自然将这一天象和大臣反叛、阴谋推翻自己联系起来。他问元韶：“当年东汉光武帝为什么能够中兴汉朝啊？”元韶早就被高洋折腾得战战兢兢，不能理性思考了。他汗流满面，突然冒出一句：“那是因为王莽篡位的时候，没有把刘家的人斩草除根。”高洋很喜欢这个说法，为了防止被推翻的元氏复辟，决定将元氏家族一网打尽。他将与北魏皇室有关系的二十五个元氏家族满门抄斩。凡是父祖封过王的，或曾经身居高位的，或干脆就因为子弟强壮的，都被斩首。刽子手连婴儿也不放过，把他们抛向天空，用长槊扎死。此次清洗，前后一共杀害了七百二十一人，尸体都被投入漳河。邺城渔民捕到河鱼，常从鱼肚子里剖出人的指甲来。邺城上下，为此长期不敢吃鱼。余下的十九个元氏疏宗家

族，则遭到严厉管束，被禁止当官。始作俑者元韶也在黑名单上。他把肠子都悔青了，在邺城地牢里绝食而死。

北齐境内其他姓元的人家，不少人害怕受到牵连。一个叫作元景安的人，是北魏皇室的疏宗，上奏高洋，申请改姓高氏。堂兄元景皓反对：“做人怎么能自弃本宗，改姓他姓呢？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元景安竟然向高洋告发了堂兄，害得元景皓被杀，家属流配彭城。高洋最后同意了元景安改姓高氏。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典故的来源。

常年暴虐荒唐的生活，损害了高洋的健康。天保十年（559）十月，高洋因酗酒生病而死，才三十一岁。高洋发丧之时，群臣号啕大哭，但都只有声音，没有一滴眼泪。

二

高洋的儿子高殷即位，年仅十五岁，史称孝昭帝。

高洋临终时，对弟弟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我的位子就夺吧，别杀我儿子。”

高洋癫狂了大半辈子，但心底清醒得很。他清楚自己留下的北齐王朝充满了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常常翻涌起腥风血雨来。而高殷这个儿子身上留着一半汉人的血液，从小就在国子监接受儒家教育，文弱得很，高洋评价他“性格懦弱，像汉人的孩子”。为了磨炼儿子的胆量，高洋带着高殷一起做斩首“供御囚”的游戏，逼高殷动手杀人。高殷颤颤巍巍，挥刀砍了好几下都没有砍下死囚的脑袋。高洋气得用马鞭抽打高殷，把儿子吓成了结巴。自己的结巴儿子能否掌控江山，高洋心里没底。

高洋的担心很快变为事实。他死后，之前被暴力掩盖着的鲜卑人和汉族人的矛盾爆发了出来。高殷年少即位，由汉族大臣杨愔、郑颐等人辅政，同时以生母李太后为代表的赵郡李氏开始摄取实权，势力很大。当时，高欢的发妻娄昭君还在世，被尊为太皇太后。她出身边塞的鲜卑家族，对汉人的崛起很警惕，说：“我怎么能受汉族老婆子（指李太后）的摆弄！”鲜卑贵族和大臣纷纷聚集到娄太后身边。娄太后的两个儿子、高殷的两位皇叔高演和高湛是其中的中坚分子。北齐政坛出现了两派针锋相对的势力。

尚书令杨愔决定扳倒高演、高湛，和郑颐等人商量后，决定将两位皇叔外调到地方做刺史，以消除威胁。他们觉得李太后是汉族人，会站在自己一边，就把这事向李太后做了汇报。李太后果然和汉族大臣们是一条战线，但没有一点儿保密意识，把这个阴谋告诉了身边的一个女官。这个女官就是当年高澄强夺的高仲密的妻子李氏，在高澄死后入宫做了女官。李太后想当然地认为李氏和自己同姓，是一个战壕的同志。不想，李氏权衡利弊后，跑去向娄太后告密。娄太后马上叫来高演、高湛，密谋杀掉杨愔等汉族大臣。任命颁布后，高演、高湛二人借口庆祝，摆宴招待大臣们。杨愔等人不知有诈，坦然赴宴，被当场拿下，砍了脑袋。娄太后把李太后、高殷叫过来，训斥了一顿，逼他们将实权转移到高演手上。没过几个月，娄太后又废高殷为济南王，扶持常山王高演登基做了新皇帝。高演就是齐昭帝，这一年是乾明元年（560）。

退位的高殷很快被高演杀死，史称废帝。

第二年（561）高演就死了，为了保住儿子高百年的性命，高演没有传位给他，而是传位给弟弟长广王高湛，高湛就是武成帝。北齐权力斗争激烈，与其让儿子当皇帝，权力和生命都受到篡位者的威胁，倒不如谁愿意当就让谁当去。

高湛接手的帝国，矛盾丛生，国库空虚，已经出现了衰败迹象。

高湛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干脆自暴自弃，甩手不干了。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终日沉湎于美色之中，一心享受。皇帝昏庸无为，朝政更加黑暗，奸佞横行。和士开、穆提婆、高阿那肱等人专权腐化，反而受高湛宠信。奸臣和士开为人猥琐，在取悦高湛方面却很有本事。高湛越来越离不开他，两人之间没有半点君臣的样子。高湛心底还是有治国雄心的，隐隐间为朝政的堕落焦急。和士开就劝他说：“自古帝王都已经化为灰土，明君尧舜和昏君桀纣又有什么区别呢？陛下应该趁年轻力壮，抓紧时间享乐，国事吩咐大臣们去办就行了，陛下不必亲自操劳。”高湛竟然觉得非常有道理，宽心当起了甩手掌柜，把朝政都委托给和士开办理。

和士开三四天才上一次朝，却权倾朝野，党同伐异。还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和胡太后有奸情，引得朝野一片愤慨。高湛睁只眼闭只眼，干脆在河清四年（565）传位太子高纬，当起了太上皇。天统四年（568），高湛因为酒色过度而死，时年三十二岁。

即位的高纬，史称齐后主。他深得父亲高湛的真传，虽然自家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但依然自顾自地荒淫享乐，自称无愁天子。高纬日常生活穷奢极欲，后宫金碧辉煌还嫌不足，把宫殿拆了又造、造了又拆，为了享乐在晚上燃油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宫廷之外卖官鬻爵，高纬则肆意封赏，连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等高官，让宠物像达官显贵那样坐着车辇，由人伺候。他把畜生看得比百姓重，百姓也就不把他当皇帝看。

在高湛死后，和士开虽然还把持着大权，但地位却危险多了。仇家们瞅准高纬不理朝政，凡是上奏的文件一般不看就签字的空子，给和士开下了一个套儿。武平二年（571），大臣王子宣上了一道弹劾和士开的奏章，上面罗列了他的大量罪行，奏请逮捕和士开法办。大臣冯子琮将这道奏章夹在一大堆公文中呈递上去。高纬果然看都不看，一道一道地签字盖章了。走完“合法”手续后，琅琊王高俨、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等人在宫门口埋伏士兵，在和士开上早朝时一拥而

上，将他乱刀砍死。高纬听到风声后，慌忙写了道赦免文书派人赶来救和士开，可惜晚了一步。

一个奸臣的死，并不能拯救滑入黑暗深渊的北齐。和士开死后，朝政没有丝毫起色，反而越来越糟糕。高纬在位十三年，是北齐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而他最大的本领就是陷害忠良。

当时天下三足鼎立，乱世重兵，重兵就得重将。北齐大将斛律光是朔州（今山西朔县）高车族人，擅长骑射，从基层干起，积功历任大将军、太傅、右丞相、左丞相。在与北周近二十年的争战中，斛律光多次参战指挥，连战连捷，曾大败北周名将韦孝宽，算得上是令敌人胆寒的一代名将。韦孝宽和斛律光交战多次都屡战屡败，心里特别憋屈。

战场上打不赢，就从政治上想办法。韦孝宽知道高纬猜忌多疑，又知道斛律光长期在外领兵，在朝堂上并没有多大根基，就使了一招反间计。他派人到处散播斛律光拥兵自重、阴谋篡位的谣言，还派奸细混入邺城到处传唱：“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为一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字，谣言直指斛律光有篡位野心。眼红斛律光的大臣们乘机向高纬进谗言，诬告斛律光谋反。武平三年（572），高纬招斛律光入宫觐见，埋下伏兵，用弓弦残忍地勒死了他，并以谋反大罪将斛律光抄家灭族。斛律光一心为国，为官清廉，抄家的人只看到一些弓箭刀鞘，身无余财。斛律光死后，前线将士为之心寒，士气大为低落。高纬自毁长城，朝野有识之士莫不痛惜。

斛律光的死讯传到北周后，在位的周武帝宇文邕喜出望外，为此宣布大赦，还下诏追封斛律光为上柱国、崇国公。灭亡北齐后，宇文邕还在邺城感慨：“斛律光若在，朕岂能至邺？”

高澄的四子兰陵王高长恭按辈分是高纬的堂叔。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也引起了高纬的猜忌。高长恭为了避祸，刻意保持低调，平

日深居简出，不过问军队事务，可还是被高纬赐酒毒死。如此反复，等大战来临时，北齐已经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将帅了。

只过了二十多年，原本在三足鼎立中最强大的北齐，迅速被宿敌北周超越，就连对南陈的优势也丧失了，成了三国中最弱的一方。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北齐的高氏皇族家庭教育有问题，没教出一个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皇帝来；二是北齐各种矛盾纠结，朝野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来。无论是恢复、发展屡遭战火摧残的经济，还是弥合民族矛盾，北齐都无所作为，白白浪费了高欢奠定的基础。它最终被锐意改革的北周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又是统一

—

基础比北齐差、建国比北齐晚的北周，内部也有许多矛盾，但国家在发展中将这些问题都逐一解决了。

北周的开国君主宇文觉是宇文泰的第三子，即位称天王时只有十五岁，实际权力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矛盾就此产生了。

虽说是堂兄弟，但宇文护的年纪比宇文觉大了二十多岁，几乎就是两代人。宇文护是宇文泰大哥宇文颢的儿子，出生在六镇起义前的武川镇。宇文泰之父宇文肱非常喜欢这个孙子。北方大乱后，宇文颢在与起义军的混战中阵亡，年幼的宇文护随着各位叔叔在北方流荡，先后投奔过葛荣、尔朱荣等阵营。他是在刀光剑影中长大的，随着叔叔宇文泰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曾与于谨、杨忠南征，攻破江陵。宇文泰死时，儿子们都年轻没有经验，就选择侄子宇文护给儿子保驾护航。宇文护在西魏政权中的地位本来不高，在各位柱国大将军之下。柱国大将军于谨权衡后，支持宇文护继承军政实权，担任大司马、封晋国公。宇文护趁热打铁，逼迫西魏恭帝元廓禅位于宇文觉，建立了北周。从这点上说，宇文护不负所托。

宇文护的缺点是作风太过强硬，容易招人忌恨。柱国大将军赵贵、独孤信是宇文泰的同辈人，也算是西魏政权的缔造者，对后来居上的宇文护不太满意。赵贵领衔柱国大将军，想推翻宇文护，找独孤信串联。独孤信拒绝参与，赵贵就此作罢。但此事终究还是被人告

发，宇文护杀死赵贵，又逼独孤信自杀。他通过这样的强硬手段，排挤一批人，换上自己人，独揽了大权。

问题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宇文觉也是个作风强硬的人，而且正值青春叛逆期，不甘心大权旁落。他在身边聚集亲信，密谋杀害宇文护。结果，计划还没实施就泄漏了，宇文觉毫不手软地废黜了只当了几个月天王的宇文觉，不久又毒死了他。

宇文护挑选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yù）做新天王，宇文毓就是北周明帝，做了四年的皇帝。

宇文毓登基前温文儒雅，不想登基之后也变得作风强硬，对宇文护不满。宇文护不得不宣布“归政”，将所有权力都交还给宇文毓，只保留兵权。宇文护的理由是局势还不稳，自己要帮堂弟控制军队、稳定局势，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观察宇文毓的下一步行动。宇文毓以为大权在手，兴冲冲地正式称帝（之前北周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皇帝，称天王），并雄心勃勃地要大展拳脚。宇文护害怕起来，担心宇文毓对自己不利，在武成二年（560）毒死了他。无论是宇文觉还是宇文毓，在位时间都很短，宇文护则忙于揽权和弑君，对北周朝政则无所作为。

宇文护挑选的北周第三任君主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宇文邕（yōng），当时只有十八岁，宇文邕就是北周武帝。

宇文邕沉稳低调，平时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就掷地有声。宇文泰生前很喜欢他，夸奖他：“成吾志者，此儿也。”宇文泰的确没有看走眼。对于专权霸道的宇文护，宇文邕曲意尊崇，让堂兄担任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继续做晋国公。遇到事情，宇文邕都让大臣先请示宇文护。有大臣说宇文护的坏话，宇文邕都加以训斥，甚至通报给宇文护。渐渐地，宇文护对宇文邕放下戒备之心，觉得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

天和七年（572）三月的一天，宇文护觐见皇太后。宇文邕和宇

宇文护两人边走边聊。宇文邕无意中提到皇太后年纪大了，还酗酒，对身体不好，请宇文护一会儿劝太后少喝酒多运动。宇文邕还拿出事先写好的《酒诰》，请宇文护念给皇太后听。宇文护一点儿都没生疑，见到太后照着《酒诰》就认真念了起来。突然宇文邕拿起手里的玉珽（tǐng），从背后狠狠地砸向宇文护。宇文护被一击倒地，却没有死。宇文邕喝令一个带刀近侍上来给宇文护补上一刀。近侍紧张得手脚发软，刀砍下去竟然不见血。宇文邕的弟弟卫王宇文直这时冲了进来，给了宇文护致命一刀。之后，宇文邕又诛杀了宇文护的亲信，顺利亲政。

当时，北周已经建国十五年，之前宇文护都没有什么大动作，致使国家发展缓慢。宇文邕宣布宇文护罪状时，指责他“任情诛暴，肆行威福，朋党相扇，贿货公行”“使户口凋残，征赋劳剧”。宇文邕上台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一方面延续父亲宇文泰的措施，一方面向鲜卑旧俗开刀，释放奴隶，化解内部矛盾。建德元年（572），宇文邕下诏解除在江陵战役中被俘获的南梁奴隶的奴隶身份，释放为平民。这其中还聚集了不少南方的政治、文化精英，宇文邕择才录用。

针对当时佛教势力膨胀，和道教频繁发生矛盾的问题，宇文邕评定儒、佛、道三家的长短，定佛教为末位。建德三年（574）五月，宇文邕又下诏禁止佛教、道教，销毁经像，强令和尚、道士还俗为民。一时间，北周境内灭佛焚经、驱僧破塔风气大盛，佛门宝刹都变更为民宅，两百多万名和尚道士还俗，开始向国家纳税服役。不过宇文邕保留了两教各一百二十人，称通道观学士，专事阐释三教经义。周武帝灭佛是历史上三大灭佛事件之一。此外，宇文邕还禁绝淫祀，凡是与礼典记载不符的，全都废除禁绝。经过这一番兴革发展，北周户口增加，赋税增长，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超越了北齐。

宇文邕一生勤于政事，坚持做两件事情。一是终身厉行节俭，生活极其简朴。他平常穿布衣盖布被，只有十余个妃嫔。宇文护掌权时建造的宫室，都被拆毁，其中的珠玉宝物也被悉数赏赐给贫民。二是

坚持和将士同甘共苦，军务繁忙时也坚持身先士卒。宇文邕重视军队训练，经常亲自到校场阅兵，每年都参加部队的演习。演习时，宇文邕和将士们一起在山谷中行军，辛苦跋涉。他还参加将士们的宴会，每次都执杯向大家敬酒或者亲手赏赐将士们。宇文邕不是一味地讨好官兵，其实他是一个严酷少恩的人，但他不辞辛劳，行事无私果断，在军队中的威望越来越高。每次征战，宇文邕都亲临战阵，还常常带头驰骋冲锋，感动得将士们都愿意为他卖命。

宇文邕的种种表现，都和荒淫无耻的高洋形成鲜明对比，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北周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

宇文邕有心统一天下，首要目标就是消灭宿敌北齐。之前三十余年，宇文势力和高家势力激战多场，双方都伤痕累累，结果谁也灭不了谁。北周朝野普遍认为东西方均势还未打破，反对与北齐决战。

北周建德四年（575），宇文邕力排众议，决定御驾亲征讨伐北齐。周军主力出河南，杀向洛阳。宇文邕以统一为目的，视北齐百姓为自己的子民，严肃军纪，严禁周军进入齐境后伐木、践稼，犯者斩首，因此颇得民心。周军顺利攻占河阴，宇文邕亲自带兵进攻金墉城，不克。北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大军南下救援。不巧宇文邕得了急病，周军只得退兵。

第二年十月，宇文邕集结了一支十四万五千人的大军，再次御驾亲征。这次，周军不再出兵河南，而是渡过黄河进攻晋阳。晋阳是高家的大本营，北齐主力就云集此处。击溃了山西的齐军主力，就等于胜利了一大半。宇文邕本次采取先难后易的战略，行军布阵小心谨

慎，重兵围住了晋阳门户平阳。宇文邕分派各军，守住各处关隘，以阻遏晋阳的齐军南下；占领要害，阻遏河内的齐军北上；另派步骑兵扼守蒲津关，以保证后方的安全；再分出一万兵力攻打平阳周围的城池，分散齐军。

宇文邕派王谊指挥主力进攻平阳城，北齐的海昌王尉相贵据城死守。北方统一战争的第一场决战就在平阳展开了。宇文邕异常重视此战，亲自到城下督战。北齐官员则人心涣散，行台左丞侯子钦首先出城投降，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北城，丧失信心，也向宇文邕投降。北周将领段文振率数十人为先遣人员，在崔景嵩的接应下，首先登上城墙。最终，周军攻破平阳，俘获尉相贵及齐军八千人。周军旗开得胜，迅速占领了平阳周边地区。

平阳大战正酣时，齐后主高纬正和宠妃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打猎。前线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飞来，早晨一封，上午一封，中午又是一封，右丞相高阿那肱都扣下不报。他说：“陛下正享乐，前线小小交兵，都是常事，不用急着奏闻！”晚上，前线信使又送来急报：“平阳失陷。”高阿那肱这才把战事报告给高纬。高纬要赶回去处理，冯淑妃却撒娇要再打一次猎。高纬竟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又和冯淑妃打起猎来。

等到十一月，高纬亲率十万大军南下平阳。齐军军容严整，宇文邕不愿和他们硬碰硬，决定撤军避其锋芒。他留一万军队给梁士彦坚守平阳，将其他军队散布河东各地，以示声援，自己返回长安。宇文邕意图在新占领区采取守势，以逸待劳，让齐军的锐意消磨在坚城要害之中。齐军包围平阳，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久不见外援，守城的将士们难免有些惊慌。梁士彦神态自若，激励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将士们看主帅身先士卒，士气大振，都以一当百，奋勇杀敌，击退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在战斗间隙，梁士彦动员军民乃至妇女，抓紧修缮城墙。齐军改

挖地道攻城，挖塌了一段城墙，齐军乘虚而入。在这紧急关头，高纬突然传令暂停攻城。原来，高纬要和冯淑妃一起观看齐军攻破平阳城的胜利一幕。后方的冯淑妃用最快的速度涂脂抹粉，再赶到前线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等她到的时候，周军早已利用间隙用木板把城墙的缺口堵上了。

宇文邕回到长安，得知平阳危急，马不停蹄就率军返回山西。十二月，宇文邕再一次出现在了平阳城下。各路周军集结而来，大约八万人，近城扎营，东西绵延二十余里。大战临近，宇文邕命齐王宇文宪去查探齐军虚实。宇文宪转了一圈回来后，信心满满地报告宇文邕：“请破之而后食。”宇文邕高兴地说：“如汝言，吾无忧矣！”两人这么一表演，周军士气大振。宇文邕乘马巡视各军。平时的积累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宇文邕能够高声叫出各军主帅的姓名，加以慰勉。遇到熟悉的官兵，宇文邕也都打招呼。将士看到皇帝竟然熟知自己的部队，士气更加高昂。

大决战开始了。应该说当时周齐两军人数、装备、实力都不相上下，但周军士气高涨，齐军渐渐有所不支。高纬带着冯淑妃在后方高岗上观战，冯淑妃远远看到齐军有败退迹象，没心没肺地大喊：“败啦，齐军败啦！”爱妃慌张了，后果很严重。高纬带上冯淑妃慌忙向后撤去。齐军看皇帝带头逃跑，军心大乱，连战皆溃。平阳一战，齐军阵亡上万人，余者仓皇撤走。齐军丢弃的军械甲仗，散落数百里。周军打扫的战利品，堆积得像小山一样。

高纬败逃晋阳，宇文邕乘胜向晋阳进军。高阿那肱率军一万镇守高壁，看到宇文邕率军杀到，望风而逃。介休守将韩建业率军投降。宇文邕迅速杀到晋阳城下。高纬想弃城投奔突厥，随从大臣和侍卫们大多不愿意，四散而走。高纬北逃不成，向东奔首都邺城而去。宇文邕成功攻破晋阳，跟着杀向邺城。

当时北齐还占有河北、山东，元气尚存。邺城的大臣们都劝高纬

重整军备，再与宇文邕决战。将领们请高纬检阅部队，还为他准备好了讲稿，要他对着将士们慷慨流涕，以激励人心。一切准备就绪，高纬也走到了将士们面前，可他突然忘记了将领们教他的词，茫然站了一会儿，哈哈大笑起来。高纬这一笑，笑得随从们先是不知所措，接着也禁不住大笑起来。台下将士们见此，纷纷说：“皇帝这副模样，我们还为他卖命干什么？”人心一下子就散了。高纬无计可施，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禅位。他把皇位让给了八岁的皇太子高恒，自己做了太上皇。邺城保卫战没开打，就失败了。

北齐承光元年（577）正月，宇文邕率军攻破邺城。太上皇高纬在城破的前一天带上小皇帝高恒和一百多个骑兵向东逃去。周军轻易攻入邺城，北齐王公以下官员投降，无人为朝廷“捐躯”。高纬一行人逃到济州，觉得两个皇帝（一个太上皇、一个皇帝）的目标太大，就派人拿着皇帝玺绶到瀛州，要禅位给任城王高湝。不管高湝同意不同意，高纬又逃往青州。可是，宇文邕就是认准了高纬，派遣精兵强将追击到青州。奸臣高阿那肱看高家大势已去，在青州投降，高纬、高恒只得带上十几个人仓皇南逃，想投奔陈朝，途中被周军俘获。二月，周军攻下信都，俘虏任城王高湝、广宁王高孝珩等北齐宗室。北齐王朝算是彻底倾覆了。随后，宇文邕又派军平定了北齐各地的反抗，从此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北方在分裂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再次归于一统。

齐后主高纬被送到长安，先受封侯爵，几个月后被宇文邕扣上“谋反”的大罪，北齐高姓皇子皇孙全被处斩。高纬的宠妃冯淑妃沦落为奴，给人舂米，皇后、公主则流落各地，贫穷无依，落入了社会底层。

然而宇文邕“平突厥，定江南”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吞并北齐的第二年（578），宇文邕计划征讨突厥，不想在出征前夕病逝，年仅三十五岁。当时北周对南陈拥有绝对优势，统一势在必行。宇文邕在迈向天下一统大门的最后一步时倒下了。不过他为隋唐时期的大一统局

面打下了基础。

三

宇文邕在世时，挑选长子宇文赟（yūn）作为继承人。他对一众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对继承人宇文赟动不动就施用体罚，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周武帝严令太子东宫官属每月写一份详细报告，细细禀明太子在这个月的所作所为，还常常警告宇文赟：“自古至今被废的太子数目不少，难道我别的儿子就不堪继任大统吗？”尽管父亲从来没有将更立太子的事情提上日程，但宇文赟始终生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宇文赟原本就是个好酒好色的年轻人，现在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癖好，不仅要坚持每天和大臣们一样，五六点钟就伫立于殿门外等待父皇早朝，严寒酷暑也不例外，还要坚持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说话温文尔雅。如此伪装下来，周武帝对宇文赟的表现大致还是满意的。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像他这样登基之前规规矩矩，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太子。宇文赟和同时期南齐的萧昭业一样，平常因为有老爹的严格管教，不仅言行正常，而且还多有值得称赞的地方。而一旦父亲去世，没有人再拘束他们，他们就会坐在皇位上将天下闹得天翻地覆。

周武帝死的时候，宇文赟刚好二十岁。父亲的棺材还摆放于宫中，没有入殓，宇文赟就原形毕露。他不但丝毫没有悲伤之色，而且还抚摸着脚上的杖痕，恶狠狠地对着父亲的棺材大声叫骂：“死得太晚了！”

宇文赟将父亲的嫔妃、宫女都叫到面前，排队阅视，将长得漂

亮、自己喜欢的都纳入后宫，毫不顾及人伦纲常。从此，宇文赟开始了淫荡荒唐的执政生涯，活生生葬送了父亲奠定的基业。宇文赟在宝座上肆虐了九个月后，觉得做皇帝太麻烦了，于是将帝位传给七岁的儿子宇文阐，宠信郑译等人，通过他们遥控指挥朝政。宇文赟执政时期，北周的大权开始转移到权臣手中。

又是政变

—

日后被追封为隋太祖的杨忠其实出身很苦。

隋朝建立后，朝廷说杨家出身于著名的弘农杨氏，杨忠是汉太尉杨震的第十三世孙。这样显赫的出身已经难以考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杨忠没有享受到这种出身带来的任何好处。杨忠生于北魏六镇的汉族家庭，家境贫寒（一说其父是北魏宁远将军杨祯）。六镇起义时，杨忠没有参加镇兵。他想过平稳安逸的生活，所以就拼命地往南方逃亡。但是跑到北魏南部边境的时候，他实在是无路可去了。不得已，他也参了军，做了一名北魏士兵。

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后，北魏宗室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和部分刺史南逃投降了梁朝。杨忠也莫名其妙地被裹挟在这股南逃的潮流中，到了江南。不久南梁扶持元颢返回中原争夺帝位，杨忠又莫名其妙地随军返回了中原。尔朱荣打败了这股北上的军队，杨忠也就成了俘虏。他的这段早期经历体现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百姓随波逐流、为生存而奋斗的艰辛，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就叫《小兵杨忠的故事》。

尔朱荣并没有屠杀俘虏，反而挑选其中强壮顺眼的编入自己的军队。杨忠就被挑中，编入了将军独孤信的部队。于是杨忠跟随独孤信转战南北。在战争中，杨忠和独孤信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北魏分裂后，杨忠追随独孤信，跟着元修西入关中，投入宇文泰的阵营。独孤

信的部队被派往东南方收复荆州。独孤信以杨忠等人为前锋，一举收复了被东魏占领的荆州。不久东魏大军反攻，独孤信部一败涂地。杨忠便跟着独孤信又一次逃亡江南，在南梁度过了三年游荡的生活，直到西魏通过外交途径将他们赎回去。西魏对从南梁归来的将领们非但没有惩罚，反而还加官晋爵：贺拔胜被封为太师，独孤信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杨忠则被宇文泰看中，直接调入自己帐下听用。

在宇文泰的直接指挥下，杨忠在对突厥、东魏和南梁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宇文泰死后，杨忠又成为帮助宇文觉建立北周政权的铁杆将领，因功受封为柱国、隋国公。杨忠历经了宇文泰、宇文觉、宇文毓、宇文邕四朝，在北周天和三年（568）因病结束征战生活，回到京城长安。皇帝宇文邕和主政的宇文护亲自到杨家探望病情，授予杨忠帝国元勋的荣耀。几天后，杨忠死在家中。

《隋书》对杨忠的记载相当简单：“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但是杨忠的功勋、地位和人际关系，为儿子杨坚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赋予了杨坚较高的政治起点。因为父亲被皇帝赐姓的缘故，杨坚的前半生被称为普六茹坚，小名那罗延。

隋朝的李德林在《天命论》中说杨坚长得很大气，威武雄壮。还将杨坚身上的特征和天命、日月等敏感事物联系在一起，极力论证杨坚的形象注定了他必将成为皇帝。

一代枭雄宇文泰见了杨坚后，感叹说：“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意思是说杨坚这个小孩子长得很好，不像是来自于代地这样的北方边镇。宇文毓即位后还曾经派遣善于相面的赵昭去观察杨坚，看看这个小孩子日后会不会成为奸雄。赵昭回来对宇文毓说：“杨坚不过是当柱国的料。”柱国类似于大将军，意思是说杨坚日后最高也就做到大将军，不会对北周的皇位造成威胁。但是一转身，赵昭就悄悄

对杨坚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意思是说，你以后肯定会登基做皇帝，但是要先经历一场残酷的杀戮才能平定天下。这些话都被记载在《隋书》有关杨坚的传记中。

杨坚十四岁的时候就因父亲的缘故进入政坛，成为京兆尹薛善的功曹。十五岁时，又因为父亲的功勋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高位，被封为成纪县公。第二年，杨坚再次升迁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宇文毓即位后晋升杨坚为右小宫伯，晋封大兴郡公。宇文邕即位后任命不满二十岁的杨坚做了随州刺史的实职。

杨忠的好朋友、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把女儿许配给杨坚。独孤家的女儿就成了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两家联姻，关系更进一步。独孤家族所代表的军队势力也成了杨坚有力的靠山。

当时主政的宇文护看杨坚特别不顺眼，多次想加害他。大将军侯伏、侯寿等则一再袒护杨坚。不久杨忠死了，杨坚袭爵为隋国公。不满宇文护的宇文邕聘杨坚的长女为皇太子妃，给杨坚的地位又上了一层保险。齐王宇文宪对宇文邕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宇文邕说：“此止可为将耳。”意思是说，我只让杨坚做到大将军，不会有事的。内史王轨又对宇文邕说：“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宇文邕见有人说自己长子的坏话，不高兴了：“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意思是，有天命在，能怎么办，能有什么事情？

杨坚听说了这些对话后，心惊胆战起来。他开始韬光养晦，装出一副平庸木讷的样子。可见在早期，杨坚的能力和地位已经引起了朝野中一些人的嫉妒，总想找机会打击杨坚。但有杨氏家族、独孤家族的势力护卫，加上杨家长女又是周武帝太子的王妃，所以这些暗箭终究没有对杨坚构成致命的威胁。

宇文赟即位后，杨坚的长女做了皇后。杨坚升任上柱国、大司

马，参与朝廷大权。宇文赟的昏庸荒淫、倒行逆施，使他很快在群臣中失去威信。对于杨坚，宇文赟一直严加防范。一次，宇文赟单独召见杨坚，事先对左右侍卫说：“如果一会儿杨坚在席上神色有异，就立即杀了他。”杨坚来了后神色自若，与皇帝面对面也毫无异常，左右侍卫们也就没有下手。宇文赟既没有杨坚谋反的真凭实据，又碍于他是自己的岳父，更难下决心除掉杨坚了。

杨坚为了避免皇帝的猜疑，不得不主动放弃权力，计划到地方上去任实职。杨坚将自己的愿望告诉了结交的朋友、皇帝身边的红人、内史上大夫郑译。杨坚说：“我想到外地去镇守藩镇，希望你能在宫中帮我多留意留意。”郑译回答说：“杨公的德望，天下人谁不知道。大家都支持你。现在你想进一步发展，我怎么能不帮忙呢？”580年，宇文赟决定出兵南伐，想调亲信郑译去南边。郑译便向皇帝请示元帅人选。宇文赟就问他的意见。郑译郑重地向皇帝推荐了杨坚。宇文赟对郑译一向信任，而且觉得将杨坚放到外地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就下诏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

二

杨坚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还没有出征，宇文赟就病倒了，而且是日益严重。北周的宫廷之中开始酝酿起宇文赟死后的权力分配来。

《隋书·帝纪第一》记载：“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丁未，发丧。”短短的两行字就概括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巨大政治阴谋。

这段记录透露出宇文赟不久就在宫中死去。内史上大夫郑译、御

正大夫刘昉这两个深受宇文赟信任的大臣暗地里与杨坚关系密切，决定推举杨坚主持新朝的朝政。对于郑译、刘昉两人来说，新皇帝年幼，如果要想保持富贵荣华，必须与新的主政人搞好关系。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扶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大臣主持朝政。于是他们选择了杨坚。而杨坚作为原来的皇后，也就是现在的太后的父亲，自然很容易进出宫廷。于是三人在宫中伪造了一份宇文赟的遗诏，宣布由杨坚辅助新皇，主持朝政，都督中外军事。杨坚、郑译、刘昉三人都害怕掌握实权的宇文家族诸位王爷发难。于是他们封锁了皇帝的死讯，宣布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将要嫁给北方的突厥人，征召各位王爷入长安。等一切都安排定了，三人才宣布皇帝死讯，公布遗诏。

郑译、刘昉两人在这场政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都出身世家，政治起点高，长期在宫廷中活动，亲近宇文赟。宇文赟也将他们视为心腹。这样的宫廷政治人物通常轻浮奸诈，随性妄动。比如刘昉，他是大司农刘孟良的儿子，在宫廷中轻浮狂妄的举动曾使他受到废黜。但宇文赟离不开这样的人，不久又任命他为大都督、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一起主持宫廷事务。

《隋书·刘昉传》对这场宫廷政变有更为详细的描述，告诉我们这并不像《隋书·帝纪第一》所概括得那般简单、平稳。宇文赟快不行的时候，召刘昉和颜之仪进入卧室，嘱咐后事。宇文赟当时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示意两人照顾好儿子宇文阐。刘昉见宇文阐还是个小男孩，承担不了一个乱世王朝的政治重任，于是就想引入自己认识的皇后的父亲，即扬州总管杨坚辅政。刘昉和郑译一谋划，两个人就去找杨坚了。杨坚一开始并不敢参与这场阴谋，刘昉就说：“你想做，就赶紧和我们一起干；如果不做，我刘昉就自己干了。”杨坚这才同意赌一把。

就在刘昉和郑译两个人去找杨坚的时候，另一个在卧室里的大臣颜之仪也没闲着。颜之仪与宦官们的关系比较好，他们打开宫门引入了大将军宇文仲，也想伪造诏书以宇文仲为辅政大臣。他们的动作比

杨坚要快，宇文仲都已经到达皇帝的宝座了，郑译才得到消息，急中生智，带着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柳裘等大臣进入大殿，计划与宇文仲、颜之仪等人展开面对面的较量。色厉内荏的宇文仲和颜之仪等人见大臣们都进来了，满脸惊愕，自乱了阵脚。他们不仅不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还犹犹豫豫地想逃走。这时候杨坚出场了，轻易就将宇文仲、颜之仪等人抓了起来。

之后杨坚等人的政变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郑译等人做了一封假诏书，以宇文赟遗诏的名义宣布：杨坚总管朝政，辅佐刚八岁的宇文阐。杨坚等人又利用假诏书夺取了京城部队的指挥权，稳定了政局。宇文赟时期，政令严苛、刑罚残酷，百姓惊恐，人心浮动。杨坚刚辅政，就清理这些严刑峻法，抚慰百姓，以身作则，躬履节俭。天下百姓也认同了新的执政班子。

杨坚在巩固辅政地位后，开始向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各位宗室王爷展开了攻势。当时宇文赟的弟弟汉王宇文赞在朝廷中和杨坚的地位不相上下，与杨坚同帐而坐。宇文赞的存在不仅使杨坚不能完全施展拳脚，而且也很容易被政敌利用，成为替代杨坚的潜在威胁。《隋书·刘昉传》说刘昉帮助杨坚巧妙地除去了这个政敌。他是怎么做的呢？

刘昉搜罗了许多美女献给宇文赞。宇文赞当时还不到二十岁，高兴地接受了美女，对刘昉也亲近起来。刘昉和宇文赞熟悉之后，就劝说宇文赞：“大王您是先帝的亲弟弟，众望所归。现在孺子当国，怎么能够承担军国大事呢！先帝刚刚驾崩，人心尚未稳固。大王不如先退回宅第，等局势安定后再出来主政，还可能入宫做天子。这才是万全之计啊。”宇文赞实在是太年轻了，缺乏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听刘昉这么一说，竟然觉得非常有道理，便从此深居简出，不与杨坚争夺权力了。杨坚高兴地拜刘昉为下大将军、封黄国公，郑译为沛国公。两人因为有定策之功，一起成为杨坚的心腹。

除去宇文赞，当时在地方掌握实权的近支王爷一共有五位，分别

是：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yōu）。杨坚在政变的时候就害怕这五位王爷联合起兵反对自己，所以才封锁皇帝的死讯，利用假诏书将五王都召回长安，剥夺了他们的实权和军队。五位王爷在杨坚辅政后，很不服气。但他们已经失去实权，无法与杨坚抗衡了，所以五人便通过另一位王爷毕王、雍州牧宇文贤秘密联系外藩将领起兵。

相州总管尉迟迥是北周的重臣宿将，也对杨坚辅政非常不满，在东夏起兵反对新政府。一时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出现骚动。十几天时间里，尉迟迥聚集了近十万的反对力量。宇文胄在荥州、石谿（xùn）在建州、席毗在沛郡、席毗的弟弟席叉罗在兖州响应尉迟迥。尉迟迥还派遣自己的儿子向南方的陈国请援。杨坚果断地命令上柱国、郢国公韦孝宽率领大军讨伐关东的叛乱，很快平定了这场骚动。韦孝宽将尉迟迥的首级送到长安，还讨平了骚乱余党。尉迟迥作乱的时候，郢州总管司马消难割据本州响应，淮南的很多州县都参与了叛乱。杨坚平定尉迟迥后，命令襄州总管王谊讨伐司马消难。司马消难被打败，逃往南陈。荆郢一带的少数民族却乘机作乱，杨坚又命令亳州总管贺若谊讨平这一带。事后查明，这场骚乱有毕王宇文贤和赵陈五位王爷在幕后阴谋作乱的影子。杨坚捉拿宇文贤处斩，但宽恕了赵王五人的罪过，还下诏给予在长安的五位王爷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以安定人心。

镇守四川地区的上柱国、益州总管王谦也是个野心家。他看到幼主在位，杨坚辅政，就以清除权臣、匡复朝廷为借口，发动巴蜀的军队作乱。杨坚开始因为关东和荆州一带的骚乱分了精力，没有马上讨伐四川。王谦的军队屯兵剑阁，乘机攻陷了始州。现在杨坚命令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讨伐王谦，很快就在长安的宫殿里看到了王谦的首级。杨坚看到巴蜀阻险，常常发生叛乱，于是开辟平道，毁掉剑阁险要，防止再次发生动乱。在解除了中央的威胁和地方反对势力后，杨坚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了北周政权。

杨坚的成功让长安的五位王爷坐卧不安。他们兵行险招，在赵王府摆下鸿门宴邀请杨坚参加。五位王爷的面子杨坚还是要给的，加上杨坚也想看看他们想做什么，所以就去赵王府赴宴了。赵王在府里埋伏了甲士预取杨坚的性命，但甲士还没出动，杨坚的随从元胄就有所察觉，找了个借口拉着杨坚跑了出去。赵王阴谋败露，杨坚以谋反罪将主谋的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处死。

经过这次暗杀未遂，杨坚加强了对政权的控制，开始篡位的准备工作。

三

大象二年（580）九月，宇文阐下诏说褒奖“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杨坚道高雅俗，德协幽显，运帷幄之谋，行两观之诛，扫万里之外，对朝廷功勋卓著。诏书还罢免了左、右丞相的官制，任命杨坚为唯一的大丞相。十月，宇文阐又追封杨坚的曾祖父杨烈为柱国、太保、都督徐兖等十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隋国公，上谥号康；追封杨坚的祖父杨祗为柱国、太傅、都督陕蒲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隋国公，上谥号献；追封杨坚的父亲杨忠为上柱国、太师、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诸军事、雍州牧。在完成对杨氏家族世系的追封后，杨坚于同月诛杀陈王宇文纯，一个月后又诛杀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

十二月，北周封杨坚为王爵，位在诸侯王之上。隋王杨坚可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朝廷备九锡之礼，赐予杨坚玺绶、远游冠、相国印、绿绶。北周以中原各州二十郡为隋国，隋国置丞相等上下官员。杨坚一再推让，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于是朝野掀起了对杨坚的歌颂浪潮，恭请隋王接受恩赏。最后杨坚不得不接受王位，但

他只要了中原的十个郡作为封地。之后，北周下诏封杨氏各位先祖为王爵，各位夫人为王妃。

杨坚在通往皇位的赛跑中开始冲刺。现在，连傻子都知道杨坚即将登基称帝了。

北魏的汉化改革虽然促进了民族融合，但是在政治领域，还是鲜卑等少数民族掌握着实权。北魏、北齐和北周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上层贵族排斥汉人，热衷于黄河流域的鲜卑化与胡化。杨家就是因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之前一直被称为普六茹坚。大定元年（581）二月杨坚又下令：“以前赐姓，皆复其旧。”上台后，杨坚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他开始毫不手软地对付反叛旧臣和豪强大吏，清理少数民族贵族队伍。他罢黜了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便有些人对杨家有过这样那样的功绩，提拔有真才实干的人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这不仅遏止了半个多世纪的鲜卑化趋势，而且也意味着长期处于政治劣势的汉族人得以能够真正进入政坛。汉族人士自然支持杨坚执政。

同月，杨坚接受了九锡之礼。几天后，宇文阐又下诏允许杨坚佩带有十二旒的帝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旒头云罕。隋王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这一次杨坚在推让了三次后平稳地接受了。宇文阐又马上下诏，承认周德将尽，天命从宇文家转移到了杨家，自己要依汉魏故事，禅位给杨坚。杨坚依然是再三退让。宇文阐先后派遣太傅、上柱国、杞国公、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等高官贵族敦请杨坚接受帝位。朝廷百官也纷纷劝进，恭请杨坚顺应上天和百姓，登基称帝。杨坚这才点头同意受禅。

于是杨坚在人们的簇拥下，从相国府穿着平常的衣服入宫。在临光殿，宇文阐恭敬地将皇位禅让给杨坚，杨坚更衣即皇帝位。同时朝廷在长安南郊设祭坛，杨坚派遣太傅、上柱国、邓公窦炽柴燎告天。意思是告诉上天，杨坚做了地上的皇帝。同日，杨坚上告太庙，大赦

天下，改元开皇。变更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时期的汉族旧官制。《隋书》记载：禅让当天，京师长安出现了祥云，整个禅让过程让长安城忙碌了一天。

这时的杨坚刚四十岁。因为杨家的爵位是隋王，所以杨坚依惯例将新王朝定名为隋。都城是汉族旧都长安城。

退位的宇文阐还只是个年仅九岁的孩子。杨坚封宇文阐为介国公，食邑一万户，待之以隋朝宾客之礼。介国公的旌旗、车服、礼乐，一应照旧，按照他在位时期的标准配给。宇文阐上书可以不称表，答表可以不称诏。北周的诸王也都降封为公爵。

三个月后，介国公死了。《隋书》对这位小逊帝退位后的生活只记载了两句话：“辛丑，陈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禅，致之介国。”“辛未，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以其族人洛嗣焉。”前一句话透露了介国公的死因。南陈事先不知道北周禅让的确切时间，派遣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两个人出使北周。两位使节到达长安的时候，北周已经不存在了，隋朝刚刚建立。韦鼎和王瑳两个人都是死脑筋，觉得自己是向北周出使的，现在也理当去见介国公。于是两个人就去拜见宇文阐，当作完成使命。宇文阐只是个九岁的孩子，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就接见了南陈皇帝派来的使团。杨坚对这件事极为震怒。没几天宇文阐就死在家里了。杨坚在朝堂上为宇文阐举哀。因为宇文阐没有子嗣，隋朝在宇文家族后人中找人延续了宇文阐这一脉。

我们对照《周书》对宇文阐最后生活的描述，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内容。《周书》中说宇文阐当介国公的食邑是一万户，但是一切待遇“有其文，事竟不行”。意思说介国公空有爵位，实际上隋朝并没有给予他相应的待遇。“隋开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时年九岁，隋志也”，在这句话中，《周书》记载了介国公的死，基本史实与《隋书》一样。但最后加了个小尾巴“隋志也”。意思是说，这是隋朝官方

的说法，《周书》没有做考证，也不敢对真实情况进行调查。

宇文阐被隋朝追谥为静皇帝，葬在恭陵。

金陵王气黯然收

—

杨坚建立隋朝时，陈朝皇帝陈叔宝对他很感兴趣，很想看看这个枭雄的长相。别人都说杨坚“貌异世人”，陈叔宝就更好奇了，安排一个画家作为出使隋朝的副使去北方，任务是把杨坚画下来。使团带回了杨坚的画像，陈叔宝看后，竟然吓得面色苍白，语无伦次起来。他喊道：“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陈叔宝是一个在深宫中被纤纤玉手抚养长大的文人皇帝。他可能是被杨坚那魁梧凶猛的北方大汉形象给吓到了，也可能是被杨坚身上透露出来的凶悍、干练的气质给吓到了。他隐约感觉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克星。

如今，陈叔宝在文学领域的名气比在政治领域要大得多。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整首诗写得非常瑰丽，一点儿乱世的背景色调都没有。陈叔宝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建筑了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整天和妃嫔、狎客们在其中游宴，赋诗赠答。每次宴会开始的时候，妃嫔、近臣和狎客们交杂而坐，饮酒作乐。陈叔宝是文人，在座的也都是文人，对着美景美酒，当场写诗作曲。文思迟缓、写不出来的人和写得不合陈叔宝心意的人都会被罚酒，写得好的诗则谱上新曲子，交给聪慧的宫女们学习、演唱、配舞表演。陈叔宝通常安排上千名宫女演唱那些靡靡之音。除了《玉树后庭花》外，《临春乐》也是经常表演的曲目。

陈叔宝最宠爱两个嫔妃，张贵妃和孔贵嫔。张贵妃名丽华，长得倾国倾城、国色天香，一头秀发拖到地面，光彩照人。而且张丽华很聪明，记忆力很好，能记住连陈叔宝都搞不清楚的大小政务。陈叔宝上朝退朝的时候都离不开张丽华，常常是抱着张丽华坐在自己的膝盖上一起批阅公文。孔贵嫔同样长得很漂亮，陈叔宝夸奖她赛过西施和王昭君。孔贵嫔也很喜欢对政务指指点点。于是大臣们就透过宦官，勾结张贵妃和孔贵嫔，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在众多的大臣中，陈叔宝最喜欢的是尚书顾总，因为顾总的诗写得很好，满纸浮靡之气，没有一句有用的实话。因为趣味相投，顾总成了陈叔宝宴会的常客。好事者争相传抄顾总的那些满纸脂粉气的艳诗，作为混官场的敲门砖。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孔范虽然也写得一手瑰丽文章，但赶不上顾总的水平，只好另辟蹊径，和孔贵嫔结为兄妹，结果也成了陈叔宝的座上客。陈叔宝不喜欢听批评的声音，孔范就一心给他文过饰非，凭着一套拍马屁的本领后来居上，做了丞相。

做文人做久了，陈叔宝也觉得不好玩了，就自己去佛寺卖身为奴，算是去宫外“体验生活”，还美其名曰“褫压妖异”。总之，对于陈叔宝来说，作诗度曲才是正业，而管理国家只是副业，有心思的时候料理一下，没心思的时候就撂到一边去。孔范曾对陈叔宝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统统不过是一介匹夫，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深谋远虑。”陈叔宝深以为然，对带兵将帅很不重视。将领们一有小过失，就会被夺去兵权。因此陈朝边备越来越松弛。

乱世之中，朝廷毕竟离不开军队的支撑。陈叔宝时期，陈朝最著名的将领除了任忠，就是萧摩诃了。萧摩诃是陈朝草创时期涌现出来的老将军，对陈叔宝有拥立大功。陈叔宝即位后，和萧摩诃结为亲家，娶萧家的女儿为皇太子妃。萧摩诃丧偶，续娶了夫人任氏。这个任氏年少美丽，体态容貌都很出众，因为和张丽华结为姊妹，经常出入宫廷。任氏羡慕宫中风流自在的生活，陈叔宝则被她的美色所吸引，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自此，任氏自由出入宫廷，还时常留

宿过夜，和陈叔宝纵情享乐。任氏对萧摩诃解释说自己是被张丽华挽留，夜宿宫中。萧摩诃直肠子，开始还信以为真，后来听到的风言风语越来越多，这才意识到妻子给自己戴了一顶硕大无比的绿帽子。他很生气，又无可奈何，叹道：“我为国家出生入死，功勋卓著，而皇上不顾纲常名分，奸污臣妻，教我有何颜面立于朝廷！”

隋朝建立后，南北方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有人提醒陈叔宝加强军备。陈叔宝却自信地认为：“王气在建康，他人又能怎么样？”孔范附和说：“长江天险，限隔南北。北方的虏军，怎么能过飞渡天堑呢？肯定是那些前线的将领要冒领功劳，妄言事态紧急而已。”陈叔宝觉得孔范的话说到自己心里去了，更加有恃无恐，对日益增多的军事警告毫不在意。

而长安的杨坚从登基第一天开始，就着手准备伐陈。他向高颍征求将帅人选，高颍推荐了贺若弼和韩擒虎。韩擒虎，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人，将门出身，当年四十三岁。韩擒虎小的时候很受宇文泰赏识，在北周历任都督、刺史等职，参加了消灭北齐的战争，也有过与陈朝作战的经验，屡挫陈师。贺若弼，洛阳人，祖先是漠北部落首领，当时三十七岁。贺若弼文武双全，年轻的时候就小有名气，被齐王宇文宪招揽为幕僚。他也参加过与陈朝的战争，攻占过陈朝数十座城池，还担任过隋陈边界上寿州、扬州等地的刺史。杨坚对两人都很满意，随即任命韩擒虎为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总管，贺若弼为吴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总管，把平陈重任托付给了二人。

隋朝要吞并陈朝，困难还不小。隋朝建立之初，只是占领黄河流域、江淮地区和四川的割据政权而已。它的南方是并不弱小的陈朝，北方是非常强大的突厥人。突厥骑兵一直盯着富裕的中原地区，时不时闯进长城以南来抢掠一下。开皇元年（581）九月，杨坚曾经仓促发动过一次伐陈大战，由高颍负责节度诸军。虽然隋军攻占了长江以北的地区，但没有能力突破长江防线南下。而北方的突厥人一看隋朝军队主力南征去了，耀武扬威地杀向中原。刚好此时南方的陈宣帝陈

项被吓死了，陈叔宝即位，求和讨饶。高颀有了台阶下，就以“礼不伐丧”的理由奏请班师。开皇二年（582）二月，杨坚命令高颀等人撤回，草草结束了伐陈战役。

经过这次伐陈战役，杨坚君臣意识到伐陈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拔除许多障碍才能顺利进行。首先，杨坚进行内部整顿，主要是在军事上首置军府，妙选英杰。君臣一心，经过几年励精图治，隋朝的财政收入大为改善，军力显著增强。其次，隋朝需要一个有利的伐陈环境。隋朝夹在突厥和陈朝之间，旁边还有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骚扰，不能集中精力对付陈叔宝。杨坚琢磨着，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比陈叔宝的靡靡之音要难对付得多，因此定下先南后北的策略，对少数民族采取抚慰政策。隋朝加强和吐谷浑的联系，不断派遣友好使团，该夸奖的夸奖，该送礼的送礼，把吐谷浑给稳住了。

突厥铁骑比吐谷浑难对付得多。杨坚即位的第二年，突厥汗国大军就杀入长城作为“贺礼”。开皇三年（583），突厥大军再次杀入长城以南劫掠。这一次，杨坚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在反击突厥的战斗中，有一名河西的戍卒，名叫史万岁，毛遂自荐来到辕门前要求参军去打仗。刚好突厥人派了一名勇士来叫阵挑战，隋军将领就叫史万岁去会会突厥勇士，看看这个史万岁有没有真本事。结果，史万岁上前三两下就把突厥勇士的脑袋给砍了下来。突厥首领见自己千挑万选的勇士被隋朝一名普通的戍卒轻易解决了，大惊失色，从此再也不敢猖狂叫阵单挑了。

史万岁不是一般的戍卒，他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父亲史静是北周的大将。史万岁从小就学习骑射，好读兵书，少年时代跟随父亲参加了北周伐齐的战争，后来又参与平定尉迟迥的反叛。遗憾的是，开皇初年史万岁被牵连进了一桩谋反案，被发配到敦煌当了一名戍卒。杀突厥勇士的时候，史万岁已经三十四岁了，因为表现突出，杨坚不仅免了史万岁的罪，还越级提拔他为车骑将军。

这一回，突厥没有从隋朝掠夺到什么好处。不想，这一次行动竟成了突厥铁骑最后的辉煌。撤军后，突厥陷入了大分裂，“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争权夺利，内讧得“不亦乐乎”。杨坚牢牢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修筑北边防御工事，巩固边防。从开皇元年（581）到开皇七年（587），七年之间隋朝五次修筑长城，在缘边险要筑城，而且越临近伐陈前夕，筑城的时间相隔越近，最频繁的时候两年之中隋朝四度筑城。由此，突厥不再是隋朝伐陈的障碍了。

二

解决了北方问题后，杨坚君臣把目光重新转向了南方。

北周被隋朝取代后，作为北周傀儡政权的西梁又向杨坚称臣。尽管西梁很恭顺，但杨坚也不能容忍一个割据政权的存在。开皇七年（587），杨坚征召西梁皇帝萧琮入朝。萧琮不敢违抗，于是率领群臣二百余人从江陵赶到长安朝见新主子。萧琮前脚刚走，杨坚后脚就派遣军队进驻了江陵城，宣布废掉西梁政权。萧琮一到长安，就被封为莒国公。西梁就此灭亡，存国三十三年。

吞并西梁后，杨坚任命三儿子秦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率领水陆大军十余万进屯汉口，负责长江中游地区的军事行动。同时提拔崭露头角的杨素为信州总管，驻守在永安郡（治所在今湖北新州）。杨素的主要任务是造船，因为突破长江防线需要大量船只。杨素制造的舰有能容战士八百人的“五牙”、每舰能容战士百人的“黄龙”及规模稍小的“平乘”“柁艚”等，准备在上游顺江而下，扫平江南。之前北方王朝吞并南方王朝，即西晋灭东吴时，就是舰队出三峡，顺江而下取得成功的。当然了，在庐州的韩擒虎和驻军吴州的贺若弼两支部队才是

隋军的主力。他们布置在长江下游，直接威胁陈叔宝朝廷的心脏地区。等待他们的是陈朝的主力部队：萧摩诃和任忠的部队。

部署完毕，隋朝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战前准备工作。贺若弼向杨坚献上了取陈十策。杨坚颇为赞赏，赐宝刀一把，让贺若弼放手去干。

贺若弼的策略是：欺骗。首先，他在广陵驻扎隋军一万人，过一两个月时间就派新的部队将原来的军队替代下来。一万人的军队反复调防，闹得动静很大。一开始的时候，江南岸的陈朝军队很紧张，做好了战备，后来看到隋朝每隔一段时间就反复调军，是例行的军队调动，心想“隋军真是有病，整天瞎折腾”，也就没去管它。接着，贺若弼动不动就带上大队人马，到长江边上打猎，旗帜招摇，人马喧闹。对岸的陈朝军队见贺若弼等人打猎打得很带劲，也没有多想，又在心底想“隋朝真是没人了，让这么一个田猎将军来领兵”，之后任由贺若弼往来江岸各地，也不放在心上。贺若弼不仅打猎，还要和陈朝人做生意。南方缺马，贺若弼就用老马和陈朝交换船只。陈朝人不是笨蛋，就把最旧最破的船只换给贺若弼。结果贺若弼买了五六十艘破船，停在江北的军营里。陈朝人以为自己得了大便宜，心想“隋朝人连好船都没有，把几条破船当宝贝，捏在手里”。

至此，贺若弼完全麻痹了陈朝军队的警惕性。陈军已经对北方的军队调动和将领往来熟视无睹了。暗地里，贺若弼在扬子津集结了大量的战船，在渡口堆积了大量的芦苇、枯荻，把战舰遮蔽好。保险起见，隋军的所有战船都涂成和枯荻一样的黄色。即使是陈朝的间谍细作，也没有发觉贺若弼的战备情况。同时贺若弼常常派遣都督来护儿渡江侦察。来护儿是南方人，对长江两岸了若指掌，把敌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大臣高颎则向杨坚建议，在经济上打击陈朝，来个釜底抽薪。

江北地寒，作物成熟比南方要晚；江南土热，自然条件好，水田

早熟。江南田地成熟，正要进入农忙收割季节的时候，隋朝突然扬言要发动大军进攻江南。陈朝赶紧调集军队防守，把农田暂时放在一边。等陈朝大军云集的时候，隋朝又偃旗息鼓，没有动静了。陈朝人刚要回去料理农田，隋朝大军又鼓声大作，陈军只好再次战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农时荒废了，江南一季的收成也错过了。同时陈朝对隋朝所谓大军讨伐的信息也不再相信，以为又是在逗自己玩儿。此外，南方的物资储备不是像北方一样放在地窖里，而是放在竹片和茅草建造的房子里。高颍便根据这种情况，派出大量间谍纵火，烧毁陈朝的官府储备和军事物资。这样反复几年的骚扰，搞得陈朝不堪其扰，身心俱疲财力下降。

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总攻命令下达了。

开皇八年（588）三月，杨坚高调宣布讨伐陈朝，发誓要统一天下。杨坚君臣给陈叔宝罗列了二十条大罪，并抄写成三十万份传单散发江南，下诏说：“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陈叔宝君臣看到传单，心想：隋朝这次又想忽悠我们，让我们白忙一场，我们才不会再上当呢？

十月，杨坚在寿春设置淮南行台省，任命次子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总管灭陈事宜。当时杨广刚满二十岁，不懂军事，所谓的主帅只是名义上的，伐陈的具体事务由左仆射高颍负责，“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颍”。杨坚给前线调集了近五十二万名士兵，制订了分进合击、直指陈朝都城建康的军事计划：晋王杨广由六合出发，秦王杨俊由襄阳顺流而下，杨素的水军从永安东进，韩擒虎由庐江急进，贺若弼从吴州渡江，此外还有荆州刺史刘仁恩、蕲州刺史王世积、青州总管燕荣等人从海陆各地出兵——全军都以灭亡陈朝为目标。

隋朝的伐陈战役是典型的突袭战。

589年的正月初一夜，吴州方向的贺若弼率军趁大雾从广陵秘密渡过长江。将要渡江的时候，贺若弼酹酒发咒说：“我，贺若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翦暴，上天和长江为我作证。如果上天善恶分明，就让我大军得胜归来；如果出师不利，贺若弼葬身江鱼腹中，也死而无恨。”说完，贺若弼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渡江前进，对岸的陈军竟然没有发觉。等隋军安然渡过长江，杀向陈军各据点后，陈军才仓皇组织抵抗。正月初六，贺若弼成功占领京口，俘虏了陈朝的南徐州刺史黄恪和五千陈军。

京口是陈军的仓储重地，贺若弼是轻装渡江袭击，没有带多少辎重，占领京口后利用陈军的储备解决了自身的供应问题。贺若弼下令发给陈军俘虏口粮和遣散费，让他们每个人带上伐陈的传单，各自回乡去做隋朝的义务宣传员。陈朝官兵们捡了条命，都说隋军的好处，高高兴兴地拿着传单散往各地。因为有俘虏的宣传效应，再加上贺若弼所部军令严明，下令有军士敢拿民间一物者立斩不赦，全军与百姓秋毫不犯，所以进展顺利。

庐江方面，韩擒虎嫌大军进攻速度太慢，便撇下主力，率领五百精骑单刀直入，向江南杀去。韩擒虎这一支骑兵趁着夜色渡过长江，袭击了江南岸的重要渡口采石。当时陈军守卫都喝醉了，韩擒虎轻易就占领了重镇采石，继续飞速向建康穿插前进。

隋军煞费苦心对陈朝的欺骗战略取得了圆满成功。陈叔宝君臣依赖的长江天堑就这样被轻易“飞渡”了。

三

各地的军情急报像暴风雪一样涌入陈朝宫廷，形势已经非常紧急

了。

陈叔宝和他的那群文人朋友还是不以为意。仆射袁宪特别着急，奏请陈叔宝发兵抵御，起码也要在首都附近组织抵抗。陈叔宝根本听不进去袁宪的话，对隋军深入州郡告急的现实熟视无睹，每天依旧奏乐饮酒，赋诗歌唱“美好的生活”。他还笑着问左右近臣说：“南北分治以来，北齐曾经三次进攻南朝，北周也出兵了两次，都惨败而去，这是为什么？”孔范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就隔断南北。隋军又怎么能飞渡成功呢？这肯定又是前线将领们想立功想疯了，妄言事急，给自己捞好处。我孔范还觉得自己功劳小、官职低微呢，如果北虏真敢渡江，我就能杀敌做个太尉公了。”陈叔宝对孔范的回答相当满意。当时，有拍马屁的人谣传说隋军的战马不习惯江南的水土，一到南岸后就成批死去。孔范摇头晃脑，叹息说：“可惜了，那些将来都是我们的马，为什么死了啊？”陈叔宝哈哈大笑，跟着孔范一起惋惜起来。建康城的君臣上下从此歌舞纵酒，把前线的告急文书拆都不拆就丢在床底下，继续生活在“天堂”里。

却说贺若弼、韩擒虎两军从东西两个方面快速推进，陈军各部望风而散，隋兵如入无人之境。贺若弼分兵堵住曲阿（今江苏丹阳），防止现在长江三角洲及以南地区的陈军增援，自己率主力进攻建康；韩擒虎则在占领姑孰后，沿着长江逼近建康。不久，建康周边就出现了隋军的前锋部队。

陈叔宝这才害怕起来。他胆子本来就小，对军事一窍不通，慌忙召萧摩诃、任忠等人来商议军事。萧摩诃因为陈叔宝和妻子通奸，根本就没有为朝廷而战的意志，一言不发。当时贺若弼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钟山（今南京紫金山），被陈朝看作是心腹大患。陈朝决定调集诸军在白土冈（今南京东）一带布阵决战。

正月二十日，陈叔宝命令陈军出战，去消灭贺若弼。陈军鲁广达、孔范、萧摩诃、任忠、田瑞、樊毅等部先后逼近白土冈，南北绵

延二十里。贺若弼所部大约有八千甲士，而陈叔宝在建康有十万大军。陈军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陈叔宝仓促命令各部进击，事先没有完整的进攻计划。陈军各部之间缺乏协调，分别发起进攻。田瑞首先率部进攻，被贺若弼军击退。鲁广达等部赶到后也投入战斗。贺若弼抵挡不住，不得不暂时后退。陈军取得了胜利。为了避免陈军追击，贺若弼下令施放烟幕，掩护隋军整顿恢复。在紧张的战斗间隙，贺若弼保持了冷静的思考。他观察到陈军得胜后出现了骄情情绪，同时孔范率领的部队阵列最差、士气低迷。于是贺若弼激励将士以必死的决心向孔范所部发起决战冲锋。孔范就是一个窝囊废，在贺若弼的进攻面前一败涂地，仓皇逃窜。孔范部队的战败导致了陈军的全线溃退。陈军各部缺乏调度，争相逃命，场面失控，有五千多人因为互相挤踏而死。陈朝军队的主力就这样溃散了。贺若弼乘胜追击，率军推进到了乐游苑（今南京玄武湖南侧）。

萧摩诃在乱军中被俘。贺若弼命令刀斧手将他推出斩首。萧摩诃毕竟是一代名将，临刑前神色自若。贺若弼很敬佩，下令免罪松绑，以礼相待，萧摩诃就投降了隋军。

西边的韩擒虎正在进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半天就占领了这座名城；第二天则占领新林（今南京市西南）。韩擒虎在江南百姓中威信很高，许多人昼夜不绝前来韩擒虎军中投降。被贺若弼打败的东边的许多陈军部队也向韩擒虎投降了，其中包括任忠、田瑞等人。陈叔宝听说了韩擒虎的大名，紧急派遣将军蔡征守住朱雀桥（在今南京秦淮河上）。结果派出去的陈军听说对手是韩擒虎，竟然一哄而散。任忠引导着韩擒虎的五百精骑从朱雀门进入了建康城。当时，城内还有部分陈军负隅顽抗。任忠现身说法，劝降说：“老夫都投降了隋朝，你们还怕什么呢？”任忠在陈朝军队中威望很高，他的喊话涣散了陈军的斗志，残存的陈军纷纷缴械投降。韩擒虎以区区五百人长驱直入，一举占领了建康城。

贺若弼没能第一个进入建康城，因为他在玄武门南遭到了顽强的

抵抗。陈将鲁广达率领残存的部队苦战不降，杀死了数百隋军。一直打到日薄西山，陈军越来越少。鲁广达对着陈叔宝的宫阙方向跪地叩首，悲伤恸哭，最后缴械，束手就擒。贺若弼在当天傍晚从北掖门进入建康城。

隋朝大军进入建康城的时候，陈朝的宫廷中依然鼓乐声声，陈叔宝还在那儿喝酒吟诗。

隋军杀入朱雀门的时候，陈朝的大臣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陈叔宝见原来在身边的人都逃跑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仆射袁宪在王朝的最后时刻不离不弃，守在陈叔宝身边。空荡荡的宫殿中，只剩下陈叔宝和袁宪两个人。陈叔宝伤感地说：“朕从来待众臣不薄，今天众人皆弃我去，只有你留了下来。不遇岁寒，焉知松柏？我朝就要灭亡了，并不是朕无德，而是江东衣冠道尽啊。”诚然，大臣道德低劣，没有为国尽忠之心，是陈朝速亡的一大原因。但陈叔宝将王朝湮灭的责任全推到大臣们身上是不公平的，难道他就没有责任吗？

陈叔宝说完，也要找个地方躲藏起来。袁宪劝说道：“皇上是九五之尊，北兵来了，想必也不敢对陛下怎么样。事已至此，陛下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不如整理衣冠，端坐在正殿之上，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去见隋军。”陈叔宝哪有萧衍的气魄，他又一次拒绝了袁宪的劝谏，像无头苍蝇一样，开始在宫廷中找藏身的地方。袁宪还想劝，陈叔宝说：“锋刃之下，哪有儿戏，朕自有办法。”陈叔宝跑到后堂景阳殿，发现了一口深井，突然计上心头。他赶紧去拉来张贵妃、孔贵嫔，三人抱在一起，拉住一根绳子，跳入井中躲藏起来。袁宪一直跟在陈叔宝身边，见皇帝找了这么一个藏身之处，悲伤欲绝，跪地痛哭，最后朝着深井叩首后，逃命去了。袁宪被俘后投降了隋朝，做了昌州刺史，很快就死了，终年七十岁。

韩擒虎的部队冲入皇宫后，到处搜不到陈叔宝。隋兵就抓了几个内侍，逼问陈叔宝藏在什么地方，一个内侍指了指井口。隋朝士兵看井里漆黑一团，叫几声也没人应答，不相信一个皇帝会藏在里面。便找人往下扔了块石头，这才听到下面传来求饶的声音。众军扔下绳子去，喝令陈叔宝拽住绳子上来。大家拉绳子的时候，觉得特别重，有人就打趣说：“别人都说南方人瘦，怎么陈叔宝这么胖啊！”拉上来一看，原来是三个人。看着陈叔宝狼狈的样子，众军笑得前仰后翻。

据说当时张丽华胭脂蹭在了井口，有人就把这口井叫胭脂井。又有人不齿于陈叔宝祸国自取其辱的行为，把它叫作耻辱井。

贺若弼的部队随后进入皇宫。听说韩擒虎捉住了陈叔宝，贺若弼传令将陈叔宝带来看看。陈叔宝来了后，汗流浹背，双腿战栗，向贺若弼求饶不止。贺若弼很实在，安慰说：“你是小国之君，进入我大隋朝后，还能做个归命侯，不需要恐惧！”陈叔宝再三拜谢，心宽了好多，可还是诚惶诚恐，声音发抖。

四

除了江东战场外，隋军在其他各条战线也都进展顺利。

杨素率领舰队出三峡，原本计划进攻两湖地区。陈军在三峡横缀了大铁索，阻碍杨素战舰东下。后来杨素发动夜袭，一举打败陈军的守卫部队，然后率水军东下，一路上舰船遍布江面，旌甲耀日。隋军以破竹之势先后打败各处陈军。一路上，杨素端坐船上，容貌雄伟，两岸的陈国百姓看到他，仿佛看到了江神，心生畏惧。杨素打到巴陵的时候，陈朝的地方政权已经土崩瓦解。最后杨素与秦王杨俊胜利会师。

陈朝南部广袤的岭南地区，处于半自治的状态。隋灭陈的时候，岭南各地奉高凉（今广东阳江西）的冼夫人为主，保境拒守。这位冼夫人是原来高凉太守冯宝的夫人，已经六十多岁，经过了历次的政治风云，威望很高，被岭南人视为“圣母”。陈叔宝被俘后，按照隋朝的意思给冼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冼夫人陈朝已经灭亡，要求她带着岭南各州县投降隋朝。杨坚还派遣韦洸携带着陈叔宝的亲笔信和冼夫人先前进献给陈朝的扶南犀杖，招降冼夫人。冼夫人知道陈朝灭亡的消息后，召集各地和各部落首领数千人集体痛哭了一整天，然后派孙子前去迎接韦洸进入岭南。岭南各地也并入了隋朝的版图，冼夫人因功被封为宋康郡夫人。

建康沦陷后，江东的部分地区拒不投降。正月底二月初，隋军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消灭江东的陈朝残余势力上。隋朝大将宇文述率领三万人，也参加了伐陈的战争。现在，宇文述联合从海上来的燕荣军队，将各地的抵抗势力一一击破。

各地初定，高颍先行进入建康，接收陈朝图籍资料，封锁府库。名义上的主帅杨广早早就听说了张丽华的美貌，在高颍出发前私下拜托说：“您进入建康，一定要找到张丽华，不要伤害她啊。”谁想，高颍一点儿面子都没给杨广，把张丽华叫来后，说：“此等妖妃，岂可留得？昔日姜太公灭纣，蒙面斩妲己，我也要学他。”说完，高颍就把张丽华的脑袋给砍了下来。

除了求色不成外，杨广的其他作为还是可圈可点的。他“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严令军队“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因此天下都称赞他的贤德。杨坚对二儿子也很满意，任命杨广为江南总管，留在南方镇抚各地。杨广奏请宇文述为寿州总管，协助自己统治江南。此后，杨广治理江南十年，期间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

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中国开始迈向大一统的盛世。

隋朝重新统一天下，固然离不开杨坚、高颀等人的贡献，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南北方的长期战乱，主要原因是南北方的民族纷争。而在长期的民族争战中，各民族差异逐渐消失而相互融和，产生了文化认同。

南朝名将陈庆之从黄河败回后感叹：“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可见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北魏也不再是割据的蛮夷政权了。隋朝初年，大文人薛道衡作为聘陈内史出使陈朝，正月里看到鸿雁从南方返回北方，写下了《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这样的文字，一点儿都不比南方继承汉族正统学识的文人们差。

可为什么是由北方的隋朝统一天下，而不是陈朝消灭隋朝呢？

北方王朝统一天下的必然性在于北方一直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实力强于南方。杨坚即位后，隋朝国势蒸蒸日上，而当时陈朝门阀把持政治，土地兼并严重，正处于衰弱时期。北方出了一个隋文帝，南方却是陈后主当政，仅看这两人的表现，我们也能知道应该是谁消灭谁。

南北统一后，高颀带着陈朝的俘虏北归大兴。陈叔宝得到了杨坚的礼遇，生活得相当不错。隋朝每次举办宴会的时候，杨坚怕陈叔宝伤心，规定不能奏吴音。陈叔宝经常参加隋朝达官显贵们的聚会，时间久了，他就奏请杨坚说：“我没有官爵职位，每次参加朝集，都感

到有点儿尴尬，希望能获得一个官号。”杨坚听说陈叔宝主动要求当隋朝的官，感叹说：“陈叔宝这个人没心没肺。”陈叔宝在大兴，依然每天醉酒吟诗，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杨坚就向监护陈叔宝的人问他每次饮酒多少。官员回答说：“陈叔宝与其子弟每日饮酒一石。”杨坚大吃一惊，继而感叹道：“随他去吧，否则叫他如何过日？”

杨坚曾对陈叔宝有过一个评价：“如果陈叔宝能把作诗和喝酒的心思用来治国，又怎会有今天呢？”杨坚要感谢历史赐予他的机遇，仅凭统一天下的功绩，杨坚就能够名垂青史。何况隋唐盛世的大门即将打开，还有更大的机遇等待着他呢！

第八章 南北朝的边角料

王羲之父子

—

据说琅琊王家南迁后信奉道教，给子弟取名都带个“之”字，比如王导等人给子侄辈取名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王晏之、王允之等，孙辈取名王徽之、王献之、王恢之等。这似乎是辨认琅琊王家子弟的一大特征。王导这一辈之后，琅琊王家名声最大的当属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王导之侄、王旷之子。王旷做过淮南太守，曾劝司马睿南迁。虽说是书圣，王羲之小时候一点儿都不聪明，还很笨，连话都说不好。虽然名士周顗（yǐ）曾摸着十三岁的王羲之的脑袋说，孺子可教，前途不可限量，但一般人还是把这看作是周顗判断的失误。王羲之二十岁的时候，太尉郗鉴想和王家攀亲戚，把女儿嫁入王家。王导说，我们家人才济济，你随便挑吧。郗家就真的派人来挑女婿了。回去后，郗鉴问有什么好人选。家人报告说，王家的小伙子都挺好的，精心打扮，相貌堂堂，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个人躺在东边房间的床上，露着肚子啃东西吃呢。郗鉴说，就是他了，我要选那个挺着肚子的小伙子。不用说，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王羲之。虽然郗鉴很自豪地夸王羲之是东床快婿，但多数人心中都不以为然，觉得郗老太尉

也看走了眼。

事实上，王羲之是那种大智若愚、大器晚成型的孩子。一些小时候异常聪慧、高调领跑的孩子往往长大了平庸无奇，而小时候埋头低调学习的孩子，比如王羲之，常常能一鸣惊人。王羲之正常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了不俗的政治素质。王导之后，东晋王朝高层政治纷争不断。老有那么几个人鼓动北伐，想借北伐给自己贴金。殷浩北伐的时候，王羲之写信明确反对，劝阻他。担任地方官时，王羲之更是开仓赈灾，奏请朝廷减免苛捐杂税。

王羲之凭借家族势力担任过江州刺史这个重要官职。在刺史任上干得很不错，朝廷屡次让他来做京官，王羲之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说他傻。王羲之回信说：“我没有庙廊之志。”其他人这么说多数不是虚伪的表演就是待价而沽，王羲之则是表里如一，不想攀爬权力的金字塔。他追求的是人生的品质和理想的修为。听说安徽宣城的风光不错，王羲之就向朝廷请求，希望能去宣城当太守。朝廷原来是想把王羲之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去，没料到王羲之要求当的官越来越小，要去一个小郡当太守，最终没有同意。朝廷的世家高官们更不同意了：你王羲之可是天下第一望族的子弟，去当宣城太守不怕掉价，我们这些同伴还觉得掉价呢？

于是也不征询王羲之本人的意见，朝廷就宣布提升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会稽是东南大郡，是江东世族和南渡大族的聚居地，地位突出。会稽内史的地位自然也很重要。这一回，王羲之高兴地接受了提拔自己的任命，因为他早就听说会稽山水秀美，人文典雅。于是他打点行装来到了顾恺之形容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的会稽。千年之后，我们说王羲之的这个选择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他来到清丽秀美的会稽，做官是次要的，享受是主要的。当时的会稽人文荟萃，有离“东山再起”还有段日子的谢安，有达官贵人都以

得到他撰写的碑文为荣的文人孙绰，有游寓江南、提出“色即为空”大论的名僧支遁，有隐居山林、大谈玄学和山水诗的隐士许询等。王羲之很快就和这些人打成了一片，还组织了一个叫作“兰亭之会”的聚会将他们网罗其中。

永和九年（353），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修禊节。

这一天，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多人齐聚会稽山阴城外的兰亭，洗洗身子，喝喝酒水，清谈闲聊。他们不知道，永和九年暮春的兰亭，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根据王羲之的记载，当日的兰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的风光也相当对得起观众，“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因此虽然聚会上没有丝竹管弦、歌舞助兴，但聚会的文人雅士们一觴一咏，大到宇宙，小到具体花草品类，畅叙幽情。恍惚之间，王羲之感叹上天公平地给予每个人一条生命，每个人都要走完一生，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感悟良多，有的人放浪形骸，都是殊途同归而已。行走之人，不知老之将至，常常是刚刚欣赏的东西转眼就成为陈迹。“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王羲之的结论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若干年后的我们审视今天，就像今天的我们审视昨天一样。其他参会者也纷纷提笔写文，抒发感想，更多的是抒发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

会后，众人把文章收集起来，制成了一本小集子，委托王羲之作序。王羲之当时已经微醉，也不推辞，提笔立马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因为编辑需要而被定名为《兰亭集序》的文章，一气呵成，初正楷后小草，庄中有变，变中有雅，令人赏心悦目，是书法和文章的双重瑰宝。后人有爱事者，认真察看了帖子，发现王羲之在里面没有写两个完全相同的“之”字。据说，王羲之事后对原稿不甚满意，想重写一

份，超越原稿。他聚精会神认真重写了几份，都感觉不如醉酒时写得好。索性不写了，就将写于兰亭并带有修改痕迹的原稿定为作品。

《兰亭集序》之所以成为书法极品，一大原因是王羲之将书法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之前人们是为了写字而写字，王羲之是为了欣赏而写字，为了表达而写字，为了内在的修养而写字、练字、赏字。书法开始在王羲之的手中，从实务超脱成了艺术。这是王羲之的书法境界，也成为中国书法的入门认识。

王羲之是琅琊王家最优秀的书法家，却不是唯一的书法家。官宦世家同时也是文化世家，文化素质高于常人。琅琊王家的前辈王衍、王戎等人都是书法家。二人擅长草书，轻便没有拘束，很符合玄学大家的气质。之后王敦、王导、王廙（yì）、王旷等王羲之的父辈也都写得一手好字。与王家交往的谢家、庾家也出了多位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岳母郗夫人就是有“女中仙笔”美誉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了习书练字的风气，更得益于大家族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优越的生活，让他能将书法从其他事情中独立出来，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也只有琅琊王家这样的门阀世家才能培养出新艺术门类的大师。

王羲之在书法的世界中越走越远，后人用八个字形容他的作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作品被后世奉为神品。比如《兰亭集序》的真迹，人们普遍相信被唐太宗带入了坟墓，今人看到的都是摹刻本。

永和十一年（355）年初，厌倦了官场的王羲之弃官而去，在会稽金庭定居下来。晚年的他耕田种地，教导子弟书画，也去河边放鹅钓鱼，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王羲之的身上完全没有了父辈辗转奔波、指点江山的气度。同样褪去政治光芒和雄心的还有同辈的王胡之等人。王胡之是王廙的儿

子，他们父子俩都是老庄学说的信徒。王胡之的经历和王羲之相似，在山水优美的吴兴当一个生活优裕的太守，心情舒爽，不管朝廷怎么调动他的职位，就是在吴兴太守任上赖着不走。朝廷拿这样的钉子户无计可施。和王羲之一样，王胡之和谢安的关系也不错，两人常有诗歌唱和。王胡之曾向谢安写道：“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纺玄契，废疾高卧。”在他看来，功成名就的姜子牙也好，不食周粟饿死的伯夷、叔齐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状态，他王胡之的理想就是高卧山林，听听风声，抚摩泉水。

琅琊王家在王导、王敦一代人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呼风唤雨的权势，但王家的声望依然存在。东晋王朝建立在东南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保障世家大族利益的制度，王羲之这一代人不需要创业干政就能保持权位。如果王家还像王导、王敦那样掌权掌兵，反而会触动东晋王朝的敏感神经。既然大环境不希望你政治上有所作为，本也不愿干政的王羲之等人便从政坛转身而去，纵情于艺术与山水。

二

那么王家还有没有人留在朝堂呢？有。他就是王彪之。东晋王朝一直将琅琊王家作为朝廷的依靠。是依靠，就得有人在权力中央，领取朝廷的俸禄，也把家族的支持传达给中央，而王彪之就是沟通朝廷和王家的新一代桥梁。

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刚过二十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他须发皆白的主要原因是读书太用功了，尤其对周礼儒学、历朝历代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刻苦钻研。王彪之还有收集文献的习

惯，把相关的学习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后来又把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也收入箱子里，让后人世代相传。王彪之的这个习惯成就了一门学问：王氏青箱学。

早年，王彪之也担任过会稽内史。他严于执法，六亲不认。当地横行乡里的中小世家大族对王彪之恨得牙痒，但又斗不过琅琊王家，不得不收敛气焰。三万多户被世家大族逼得远走他乡的百姓先后回迁。朝廷考虑到王彪之的实际情况，任命他为太常。太常在秦汉是九卿之一，地位很高，但到东晋时期权力已被大大削弱。因为太常主管朝廷的典章制度，可算是朝廷中专业性最高的岗位。王彪之学问深厚，为人严谨庄重，很适合这个岗位。

王彪之出仕之时，桓家势力后来居上，与琅琊王家、陈郡谢家平分秋色。大将军桓温试图控制朝廷，许多世家子弟争相向桓家靠拢，派亲信向桓温表忠心。王彪之是极少数拒绝向桓温献媚的人之一。桓温对他怀恨于心，将王彪之罢官，还将他逮捕入狱。好在琅琊王家势力尚在，借一个大赦让王彪之先降职后调任回京，后升任了尚书仆射。王彪之和谢安、王坦之三个人一起联合起来对付桓温日益膨胀的野心。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时只有十一岁，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王彪之、谢安、王坦之三个人都不同意。桓温和王敦一样，身体不好，遇到挫折就一病不起。临终时，桓温决心最后一搏，向朝廷要求九锡，还让笔杆子袁宏草拟了《九锡文》。袁宏把《九锡文》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讽刺他说：“你这样的大才，怎么写这种文章！”袁宏碰壁后，去找谢安。谢安的政治技巧很高，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而是笑着让袁宏反复修改。袁宏修改了一遍又一遍，谢安都笑说不满意，他只好又去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知道谢安的用意，说：“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马上就要死了，你着什么急啊？”袁宏恍然大悟，对《九锡文》也不再热心了。没多久，桓温被拖死，请九锡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朝廷由谢安、桓冲、王彪之三人辅政。桓家势力大降，谢家势力上升，政令大多出自谢安之手。琅琊王家和陈郡谢家的关系不错，王彪之和谢安的私交也不错。但王彪之对谢安不合礼制的做法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痛打落水狗，要把桓冲排挤出朝廷，表面上恭请皇太后临朝，深层意思是方便谢家操纵实权。王彪之引经据典，认为谢安这么做不合制度，坚决反对。谢安讲排场，对修宫殿等“艺术”有浓厚的兴趣。王彪之坚持要与民生息，反对大兴土木。他立论严谨、义正词严，谢安反驳不了，所以在王彪之在世时都不能放开手脚进行“艺术创作”。

377年，王彪之逝世。他的一生，基本继承了父辈王导、王敦等的衣钵，安分地扮演好王朝支柱的角色，不越位，不退缩。

三

王羲之、王彪之之后，琅琊王家逐渐远离了政治。

王羲之一共有七子一女，这八个子女都在书法上小有成就。王羲之唯一女儿的名字无考，只知她嫁给了浙江余姚的刘畅。她和刘畅有个孙女，嫁入陈郡谢氏，生了一个曾外孙，取名谢灵运。大诗人谢灵运就是王羲之的重外孙。

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有名的是王献之。王献之曾担任吴兴太守，官职终于中书令，但他最大的成就还在书法方面。书史上把他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为“二王”。王家的人书法成就斐然，得益于家庭提供的优越物质基础，更是他们刻苦练习的结果。

王羲之练习书法的时候，吃饭走路的时间都不放过，人们常常看到他用手指在身上划来划去，因此王羲之的衣服换得特别勤。教科书

中经常举两个王羲之练字的例子，鼓励现在的孩子以他为榜样。一个例子是一次王羲之在书房练字忘了吃饭，家人把馒头送过来，王羲之太投入了，摸了一个馒头就蘸着墨吃起来。家人进来收拾的时候，看到满嘴墨黑的王羲之还在啃“墨水馒头”。另一个例子是王羲之洗砚把一池水都给洗黑了。人们把这样的水池称为墨池，现在绍兴、永嘉、庐山等地都争着说王羲之牌墨池在自己的地盘里。

王献之开始练字的时候，问父亲王羲之书法的秘诀是什么。王羲之指着院子中满满的十八口大水缸说，那就是秘诀。王献之练字研磨，把水都给用完了，书法水平果真大进。王献之的书法，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又更加无拘无束。中国书法史上“一笔书”的狂草就是王献之的创举。

王羲之后代中经历最传奇的是王徽之。王徽之也是书法家，但成就逊于父亲和弟弟王献之。他的官也小，只做过参军和黄门侍郎之类的中级官员。因为心思根本不在官场上，他平日里不修边幅，工作时蓬首散带，根本不过问职责内的事情。一次桓温问他，王先生现在是什么职务啊？王徽之挠完痒痒说，看到衙门口马匹进进出出，可能是个管马的衙门。实际上是军府。桓温又问，最近衙门里死了几匹马啊？王徽之冷冷地说，我连衙门里有几匹活马都不知道，哪里知道有几匹死马啊。这么不负责任的回答，竟然让王徽之获得了玄学界的一致好评。上级知道这段奇闻后，脸上挂不住，找王徽之谈话，要求他工作要严肃，要好好上班。王徽之盯着天花板，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谈话结束后，王徽之干脆弃官而去。

相比官场，王徽之更喜欢山阴的乡间生活。一夜，山阴大雪。半夜，王徽之醒来，发现大地白茫茫的一片，自饮自酌起来。彷徨间，王徽之想起了居住在剡县的好友戴逵，连夜叫人备船要去造访。当夜，皎月当空，一叶小舟穿行在浙东的水系之间。王徽之边饮酒，边吟诗，等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终于到达了戴逵府前。奇怪的是，王徽之却叫船夫调头回山阴。船夫问其故，王徽之答：“吾本乘兴而

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要的就是造访的过程和期待的感觉。王徽之的后半生与竹子为伴。浙江丘陵的竹子挺拔茂盛，成林后气象万千，王徽之自评生活不可一日无竹，最后终老于竹林之中。

丞相谢安想和王家联姻，原先挑中的人就是王徽之。听说王徽之“雪夜访戴”一事，谢安反悔了，将侄女谢道韞转嫁给了王徽之的哥哥王凝之。王凝之的成绩不如兄弟，活得也不够潇洒。他最后担任的职务是会稽内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正赶上海匪孙恩起义，起义军围攻会稽。部下建议备战，王凝之却相信道家神祖能够保佑会稽无恙，只是终日闭门祈祷。部下催得急了，王凝之就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结果起义军长驱直入，杀入会稽。王凝之和子女一同遇害。

后世喜欢用王凝之的极端例子，来证明王家势力的衰败，进而论证整个门阀世族势力在南朝的逐渐没落。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东晋与南朝的政治基调是清静无为，不喜欢出事。后人想当然的奋发进取的政治姿态，并不利于世族势力的维持与发展，还可能让他们与王朝政治格格不入，招致危险。因为制度保障世族的利益，所以世族子弟们选择清静，漫天神侃。王家从政坛走向书法和玄学，也是一种必然。起码在整个东晋与南朝，琅琊王家都保持了第一家的地位。

谢灵运之死

—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在淝水之战的推动下，陈郡谢家跻身世族领袖。由东晋后期直至南梁，陈郡谢家一直和琅琊王氏并称“王谢”，是南朝的最高门第。

南朝历代皇帝登基加冕的时候，都喜欢找谢家辈分高的人来当司仪，象征世家大族对新皇帝的支持。虽然之后谢家子弟隐退幕后，不喜欢打理实际政务，但头等门户的光辉始终不落。南梁时，王琮娶了始兴王的女儿繁昌县主为妻。后来始兴王悔婚，要王琮和女儿离婚。王琮的父亲王峻向始兴王求情，始兴王推脱道：“这是皇上的意思，我也不愿如此。”王峻就放狠话说：“臣太祖是谢仁祖（谢尚）的外孙，我们家也不需要借与殿下联姻来提高门户。”好几代之后，谢家外孙的身份都能让人在王爷面前强硬起来，谢家的门户势力可见一斑。

谢家的崇高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或者说这三个方面支撑了谢家的权势。首先，谢家世代为官，而且都是大官。自东晋至南梁（317—557），谢氏共有十二代、一百余人见于史传。其次，谢家聚集了大量资产。如谢安的孙子谢混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时至南朝宋元嘉年间，谢混这一支还有“资财巨万，田园十余所，奴僮数百人”。而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在会稽老家的地产更多，包括两座山、五所果园和数不清的竹林菜圃。最后，谢家子弟大多才华出众，家族重

视文化教育和知识积累。政治世家不管是怎么发家的，发达后都会重视家族教育。文化素养可以提升家族的形象，保障子弟的素质。在崇尚清谈、醉心文艺的南朝，文教更是世族子弟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谢安在家族中隐居时间最长，他早期生活十分清闲，谢家兄弟就把子女留在东山托付给他来教育。不过他教育的内容与政治技巧有关的不多，多数是与文学和做人有关，无意中塑造了陈郡谢家重文学、喜清谈的潇洒家风。后世一直用芝兰玉树来指代谢氏子弟，说的也是谢家子弟自由洒脱的才气、秀气。这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一代文豪谢灵运。

谢灵运是名将谢玄之孙、谢瑛之子。谢瑛资质平庸，只担任过秘书郎，娶了王羲之的外孙女，生下谢灵运。也许是隔代遗传，谢灵运继承了王羲之、谢玄的若干优点，文学成就超过了先辈。

谢灵运的政治起点很高，因为父亲早死，他八岁就世袭了康乐公的爵位，食邑二千户。加冠后，谢灵运出任抚军将军刘毅的参军，从此开始了曲折的仕途，一生颠沛流离。当时政治上层风浪迭起，谢家渐渐远离了实权，虚名为多，只能在政治风波中随波逐流，难有作为。刘毅在与刘裕的权争中兵败自杀，谢灵运堂叔谢混也被诛杀。刘裕却没有追究跟随刘毅、与谢混关系密切的谢灵运，反而起用他为太尉参军，表示拉拢。此后谢灵运在一系列可有可无的小官职位上起起伏伏。不久刘裕取代东晋，当起皇帝，建立了宋朝。新王朝建立后，晋朝的封爵不算数了。刘裕为了表示对前朝世家大族的尊崇，宣布对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五家保留封爵，但爵位下降一级，食邑减少。谢灵运因此由公爵降为康乐县侯，食邑缩为五百户。

谢灵运继承了家族精讲玄学和精通文学的传统，多少有点儿隐逸自娱的性情和豁达宽松的胸怀。官运不佳没关系，谢灵运把精力都花在写诗吟词上。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和蔼倾听者和慷慨支持者。他很欣赏谢灵运的文才，对谢灵运的诗文爱不释

手，对他的洒脱轻浮也很包容，认为自古文人皆如此。刘义真还声称有朝一日要是当了皇帝一定任命谢灵运为宰相。刘裕死后，太子刘义符即位。刘义符年少无才，不久被权臣废黜。按封建宗法，刘义符之后就轮到刘裕次子刘义真即位，但徐羨之等权臣拥戴了刘裕三子刘义隆。权臣们先下诏将刘义真调离京城，接着又以不拘小节、诽谤朝臣的罪名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铲除刘义真的羽翼。安排停当，刘义隆顺利登基坐上了龙椅。

永嘉在今浙江温州，山水旖旎，风光秀丽，是当今的旅游胜地。但在南朝时，永嘉却是乌烟瘴气，闭塞落后得很。那雁荡山是横亘在人前的天险。谢灵运到了任上，也不问政事，整天寻思着怎么征服山山水水，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据说为了登山，谢灵运发明了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这样上下山既省力又稳当，史称谢公屐。

美丽的山山水水净化了谢灵运的心灵。他本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登山多少也有逃避现实、寻求心灵宁静的目的。永嘉的山水让谢灵运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很少有人能够在一生中找到抚慰滋补心灵的内容，谢灵运却在历经不幸之后幸运地找到了，并激发出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仕途失利的谢灵运在文学诗歌上觅得成功。他吟唱山水，书写四季，记录日月，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山水诗。没错，谢灵运就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这里，谢灵运将一个普通的南方庭院有声有色地推到了读者面前。“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在这里，谢灵运和读者分享看到的山色美景。他的诗歌没有两晋时期作品玄思虚幻的色彩，更绝少说教与晦涩。清新美丽、平实易懂的特点，彻底扭转了后世的诗风。钟嵘在《诗品》中说谢灵运的山水诗“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上千年后依然被人传唱。当时永嘉和建康通信不便，但谢灵运一有新作，就会立刻以最快速度被传抄到建康。人们称“谢康乐的大作来了”，争相传阅，成为时尚标志。

谢灵运在永嘉无为而治，纵情名山胜水，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太守的岗位难熬，杵在那里并非自己的心愿。到任两年多后，谢灵运称病辞职，回到上虞东山隐居。

宋文帝刘义隆逐渐长大，也加入到了谢灵运崇拜者的行列之中。在铲除权臣巩固皇权后，刘义隆征召谢灵运回朝廷，先任命他为秘书监，随即升迁为侍中，对他恩宠无比。刘义隆称赞谢灵运的诗和字为“二宝”。谢灵运的春天来了，可身上的文人陋习也开始膨胀爆发。他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名望在外，夸耀说：“天下才共一石（一石等于十斗），三国大才子曹植独占八斗，我占了一斗。剩下的一斗天下人平分。”他盲目乐观，以为位极人臣就能立刻重塑陈郡谢家的辉煌。

谢灵运踊跃向朝廷建议，积极和同僚们商谈政事，刘义隆无一采纳。刘义隆很尊重谢灵运，但那是文艺领域的尊重，不涉及权力。他提拔谢灵运在身边，只是当作文学侍从而已。不料，谢灵运一厢情愿地要介入政治。没过不久，谢灵运也看出了刘义隆的真实意思，意识到在朝廷真正得道的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实干之才。他们的门第和名望都不能和谢灵运相比，但他们得势了。谢灵运第二次选择了辞官。

辞官回乡后，谢灵运守着硕大的庄园，写诗作画，找朋友游玩取乐。他是待不住的人，不时率领数百随从去深山幽谷探险览胜。会稽南边的临海郡在群山峻岭的环抱之中，交通极其不便，据说风景优美但很少有人去过，更没有什么吟诵文章。谢灵运好奇心切，带上五百个家丁家将就出发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是要一览“庐山真面目”。临海太守王秀得到报告说，有几百人开通了天台山和括苍山，奔临海郡城而来。临海很少有人造访，王秀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伙强人，不是来攻打郡城就是来打劫的，下令禁闭城门做好防范。但谢灵运只是来旅游的，却吃了个闭门羹。经过交涉，王秀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谢灵运来临海搞创作了，虚惊一场。谢灵运游兴不减，在临海玩够了，临别时还拉着王秀，邀请他一起继续探索深山老林。王秀可

没有谢灵运那样的闲情逸致，更不敢擅离职守，赶紧推辞了。

居家的谢灵运又惹上了麻烦。他要填湖开田，会稽太守孟不同意。谢灵运说孟不让他开发农田是因为迷信佛教，怕填湖让鱼虾丧生，并嘲笑他说：“得道靠的是天性聪慧，你生在我前，成佛必在我后。”太守孟恨死谢灵运了，告了他一状，说他有“异志”。谢灵运吓得赶紧连夜进京申辩。刘义隆对谢灵运很了解，不仅没有追究，还留他在建康主持典籍编撰。半年之内，谢灵运联合他人编定了图书上万卷。

刘义隆觉得谢灵运这个人可惜了，起用他担任临川内史。到了临川，谢灵运仍旧不理政事，终日游荡。人际关系没搞好，他再次被地方官员弹劾。自认为满腔抱负，非但得不到重用，却多次和那些泥鳅王八纠缠申辩，苍天真是不公啊！谢灵运这次来了气，把告他的人扣押了起来，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满腹牢骚的谢灵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自比张良、鲁仲连。这两位都是要推翻暴秦的人。暴秦是谁，人们第一就联想起本朝来，那么谢灵运是要推翻朝廷了。刘义隆终于忍受不了谢灵运，决心要治他的罪。司徒刘义康亲自派人收捕他，谢灵运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调兵拒捕。结果罪上加罪，被捕后流放广州。

谢灵运依然不改狂放本色，坦荡地到广州去了。不想，刚到广州，新的诏书就到了。朝廷称谢灵运叛逆不道，下令就地正法。谢灵运在广州被当众斩首，年仅四十九岁。同时被朝廷下令杀害的还有刘义真。谢灵运被斩首前叹息道：“真是小狂风雅，中狂讨嫌，大狂送命。”

在谢灵运之后，谢家又出现了一位谢朓。谢灵运与谢朓并称文学史上的“大小谢”。谢朓留下了“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的诗句，风格与谢灵运相近，性情也是洒脱不羁，名声在外，被南齐藩王器重。南齐后期，始安王萧遥光阴谋篡位，谢朓不预其谋，反遭诬陷，下狱冤死。“大小谢”极其类似的悲剧命运何尝不是谢家走向没落的反复宣示。

说到陈郡谢家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连年的战乱和杀戮。孙恩造反时，谢家势力正处于巅峰时期，主持了镇压造反的工作。结果两年中近十位谢家青壮子弟死于战火，好几支血脉遭到灭门。之后桓温的儿子桓玄继承父亲的野心，再次造反作乱，悍然称帝。桓玄一度要占乌衣巷的谢家做兵营，谢安的孙子谢混苦苦哀求。考虑到桓谢两家的先人关系不错，桓玄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两个大劫加上侯景之乱时的杀戮，谢家蒙受了重大损失。其次，新的政治人物和势力的兴起，尤其是寒门势力的崛起冲击了陈郡谢家等老牌世族。政治气候变了，谢家的政治田地不再旱涝保收，后代要想重掌祖辈的权力更是难上加难。后期，陈郡谢家子弟虽然充斥南朝各代，但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已不多见。世族子弟的无所作为，与其在政治上的渐行渐远是有必然联系的。陈郡谢家的衰落仅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陈郡谢家在史书上的最后一个名士是谢安的九世孙谢贞。谢贞一生如浮萍般在乱世中飘荡。侯景叛乱中，谢贞随无数难民被掳掠到长安，后回到南陈，又遇到整天唱着《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人生多舛、国家无望，谢贞苦闷异常，之后母亲去世，他痛哭气绝竟然也死了。也许正是这种看似异常的“孝行”，让谢贞在史书上为家族挣得了最后的赞誉。

谢贞诗歌才华不错，流传下来却只有“风定花犹落”一句。有人说，只凭这一句谢贞就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有人说谢贞这句残诗一语成谶，写出了陈郡谢家和两晋南朝整个贵族门阀的没落。谢贞死后第四年，腐朽的南陈王朝覆灭了，金陵王气黯然消散。

两晋南北朝世族门阀的昌盛时代正式结束，王谢子弟踪迹难寻，旧时堂前的燕子现在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旧时王谢堂前燕

—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官员的录取标准主要就一条：出身。

出身豪门大族的子弟，就算是块木头也能平步青云；出身寒门地主的子弟，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只能位列下僚，终身埋首文山案牍，没有出头之日。这一切的成因都要从九品中正制度说起。

汉朝官员入仕主要靠“征辟”。朝廷觉得哪个人有才华，地方官府或者大官员看到哪个人有能力，都可以直接发文任命他为官。挑选的标准是品德优秀、才学出众。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家族重视家庭教育，“诗书传业”“礼法传家”，子弟都很出色，就世代为官。同时品德和才学的高下，没有统一的测试标准，主要靠乡党的评议。

东汉末期，品评人物优劣的“清议”开始出现，影响了朝廷的征辟。曹魏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默认了当前的现状，又考虑到乱世之中人才四处漂流、乡党评议不尽准确的实际情况，将乡间的评议权力收归政府，设立专门的中正官员去评议辖区人才，将人才分为九等，称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根据品级高低授人官职。

人事任免的权力被中正官员操纵，加上中正官员都由现职官员出任，新挑选的官员自然都是官家子弟。那些世代为官的世族子弟就占

了优势。所以说，陈群等人创议九品中正制之初就是站在世族大家的立场上，与即将称帝的曹丕讨价还价。随着世族官员掌握中正官制，世族子弟充斥上品，最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势族指有权势的家族，包括世代显贵之家和世代为官的望族。入仕的标准简化成了只看家族出身，不问其他。再后来，整个制度异化为纯粹以血缘为标准。

在东晋和南朝，世族子弟二十岁即可入仕，而寒族子弟要三十岁才能从基本办事员干起。世族子弟入仕后，如秘书郎、佐著作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官职，成了世族子弟的专利，上任后能很快转迁高官。我们看南朝的许多人物传记，“起家著作佐郎”“领著作”“掌著作”“掌国史”“修起居注”的记载比比皆是。在这些人中，文字功底扎实、有真才实学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文史之才。而寒族出身的人，即便文采出众也做不了这些清要的官职。南梁时人吴均，是公认的大才子兼史学家，先是“待诏著作”，后来又为梁武帝编《通史》，就因为不是世族出身，一辈子都没当上官。

此外东晋和南朝都明文规定：世族可以荫护部分人口，依附世族的人可以免除赋税徭役；世族可以封山固泽，圈地占地；部分世族还可以拥有私人武装，等等。当官所带来的地位、权力和收益等好处顺带着也落入了世族子弟的囊中，这些好处世代相传，又反过来增强了世家大族的势力。

南方的世家大族为了垄断仕途和即得利益，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

比如“谱学”开始流行。所谓谱学，就是研究家谱的学问。这可是“大学问”，是明确各个家族贵贱高低、防止寒门地主冒充世族的“根本所在”。所以每家世族都很重视编撰家谱，明确谁是自家人。各家之间相互学习，辨别谁才是同类人。官员选拔，各级中正官员不管才能，只翻家谱，凡是高门大户的一律定为上品。担任中正官的人，除

了本身是世族外，还必须对各家世族的祖宗十八代都了然于胸。发展到顶峰时，官场中人都钻研谱学，将各家的谱系名讳等背得滚瓜烂熟，免得交往时张冠李戴或者犯了名讳。谁不精通谱学，便被认为“无能”“不称职”，就会遭到裁撤。

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郡袁氏、鲁郡孔氏、陈留阮氏等是公认的高门贵户。而迟至梁朝，官方谱学的前一百名都没有南方的土著世族。世族也分高低，永嘉之乱时从北方南渡的世族是高门，欺压南方土著世族。南北世族的内部矛盾一直存在。

修了家谱，世族们又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联手杜绝与世族圈子之外的人通婚。王、谢两大世族就经常联姻，吴郡的朱、张、顾、陆是一个婚姻集团，会稽的孔、魏、虞、谢则是另一个婚姻集团。世族子弟其他都风风光光的，但婚姻选择的范围却非常狭窄，门第、辈分和年龄都合适的对象没几个。南齐时期，发生了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的案子，轰动一时。

王源老婆死了，家里又很穷，吴郡富阳人满璋之家境富裕，替子满鸾求娶王源的女儿。满璋之给了五万钱作为聘礼，王源就答应了。五万钱的数目很大，王源不仅操办了女儿的婚事，还用余钱继了弦。不想，当时的世族领袖沈约弹劾王源将世族女子嫁给寒门子弟。王源曾祖父王雅是西晋的尚书右仆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清官显要，他的世族身份没有人怀疑，但是富阳满家却被世族圈子怀疑是寒门地主。

王源解释，据满璋之说富阳满氏是高平世族满宠的后代，满宠在魏明帝时任过太尉，其孙满奋是西晋的司隶校尉。自己又见满璋之担任侍郎，准女婿满鸾担任主簿，才定下这门亲事的。沈约则认为，满璋之的世族门第没有明确根据。满家最显赫的人满奋早在西晋就死了，其后代默默无闻，满璋之的家世显系伪造。因此，沈约弹劾王源“人品庸陋”，与满家联姻是唯利是求，“蔑祖辱亲”。最后，王源被

逐出世族行列，禁锢终身。可见世族和寒门之间的界线泾渭分明。

世族人家更荒唐的是，最后竟然发展到不和非世族的人士交往，甚至想方设法地侮辱主动示好的非世族人士。南齐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出身寒门，却风流儒雅，一副世族子弟的派头。齐武帝萧赜非常欣赏纪僧真，常说：“人生一世，何必计较士庶门户？不要看纪僧真出身寒人，却是许多士大夫所不及的。”纪僧真因此求皇帝给他“抬籍”，以便能进入世族行列。萧赜不能做主，就让纪僧真去找都官尚书江敦（xiào）。江敦出身济阳考城江氏，世代显贵，母亲是宋文帝的公主，自己又娶了宋武帝的公主，门第显贵。纪僧真来江家拜访，江敦倚在榻上养神，不等纪僧真开口就自顾自地吩咐下人：“把我的榻子抬远一些，不要靠近纪大人，人家是士族清流，我高攀不上。”下人们过来抬起榻子就走，把纪僧真晾在一边。纪僧真马上知道抬籍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了，只好灰溜溜地告辞。

宋武帝时，寒门出身的国舅路琼之，锦衣绣服郑重其事地拜访王僧达。王僧达出身琅琊王氏，虽无一官半职但门第高贵。路琼之来后，王僧达冷淡地客套了几句，突然打断路琼之的话问：“过去我家中有一个马夫叫路庆之，不知是你的什么人啊？”路琼之大为尴尬，随即起身告辞。王僧达也不挽留，当即命令仆人将路琼之刚刚坐过的床榻拿去烧掉。路琼之回去后找路太后哭诉，路太后大怒，又向宋武帝哭诉：“我还活着，路家就这么被人欺凌，我死了路家人还不沿街乞食啊！”宋武帝刘裕是一代枭雄，杀人无数，但对这事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说了一句：“琼之年少，没有事情去拜访王僧达干什么啊！活该他受人欺辱。王僧达那样的贵公子，岂可以加罪乎？”

说到南朝的皇帝们，世家大族和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微妙了。世族势力是依附政权产生的，离开了政权他们的世袭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晋室南渡时，北方南下的世族纷纷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是为了保障世袭特权。之后南朝历代禅让，世家大族们都很务实地承认胜利者，主动支持新的王朝，对新皇帝表示效忠，目的也是保障世袭特权。

摆在世家大族面前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南朝皇帝的出身都不高。刘裕就不用说了，齐梁的萧氏虽然算是地主出身，却也不是什么显赫门第，勉强算是寒门，陈霸先则是南方土著出身，以小吏起家。世族们不和新皇帝交往又不行，怎么办？南朝史书特别重视载明人物的家世谱系，凡记世族人物必载其祖先的官阶履历，写得越显赫越好。于是世族们就给新皇帝编撰了一个个显赫的祖先，比如说南齐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并煞有其事地拉扯出了从萧何到萧道成之父二十三代的世系、官位，并一代一代地注明，还将并非一族的萧姓名人也拉扯进来。给非世族的皇帝们编排显赫的谱系，除了有对皇帝的奉承外，世族们的主要目的是证明皇帝也是世族中人，从一个侧面证明世族血统的高贵。最终，他们还是为了保障世袭特权。

南朝皇帝们需要世家大族的支持，因为世族的势力异常强大。新皇帝们不能也不敢取消世族的特权。但另一面，世族势力强大到了威胁皇权的程度，皇帝们又不得不出面对世族进行抑制。皇权和世族权力的斗争在南朝政权发展中始终潜伏着。

南朝主要的赋税徭役来源是户口登记在册的自由农。但长期以来户口政策流于形式，因为世家大族们隐藏了许多人口，以便供自己驱使、剥削。为了安置北方南下的百姓，东晋和南朝都设置了侨州、侨郡、侨县。其中的百姓被称为侨人，不算正式户籍，不承担国家税役。东晋和南朝历代王朝都想整理户籍，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统一受政府管理。东晋时，桓温、刘裕都亲自主持过户口整理工作，以严厉著称，还处置过部分人。但世家大族纷纷反对整理户口，害怕经济利益和依附人口受损。最后，历次户口整理都

不彻底，侨州、侨郡、侨县始终存在。朝廷和世族的利益都受到了照顾，谁都压不倒谁。

皇帝们与世族势力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扶持寒门地主的势力。世族子弟们都拥挤在那些清贵显要、升迁快速的官职上，逐渐不屑于处理实际政务，导致许多负责实际事务的重要岗位落入寒门子弟手中。寒门子弟没有根基，与世族子弟存在矛盾，成了皇帝可以栽培的力量。南朝各代，寒门子弟不是典章机要，就是本身通过军功使地位上升。世家大族对揽权的寒门人士，每以“恩幸”视之，轻蔑之，侮辱之，不与之往来。然而寒门地主力量虽有增长，却不能动摇世族势力的根基。一方面，寒门近臣虽然不乏有才之人，但品德大多低下，文化素质难以与世族相比，他们贪赃枉法、弄权营私，往往较世族更甚。另一方面，他们权重之后，喜欢模仿世族奢侈豪华的风气，极力设法混入世族的行列，比如纪僧真。世族控制着社会的主流生活形态，惹得寒门纷纷向其靠拢。

所以无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暗斗，皇帝们都没有成功，世族势力不断增长。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即覆灭，主要是因为世族彼此之间派系倾轧。顶尖世族之间存在矛盾，南渡世族和本地世族之间也存在矛盾。朝廷才能利用世族内部的矛盾，谋取均衡，维持政权。

三

南方的世族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老套地说，既有南方社会内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变故。

这内部的原因不是寒门地主势力的上升，而是世族自身的逐渐腐化。世族的产生与壮大，重要原因是自身能力强、文化素质高，以及

注意家庭教育。东晋时世族走向鼎盛时期，豪门大户都注重家学相传。顶尖的世族，比如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的家教和子弟的文化素质，都是出了名的优秀。前期的世族都当得起“书香门第”“功勋门第”的称号。但随着权势世袭，现成的地位和利益很快侵蚀了世族子弟。反正不用认真读书、勤奋工作就能坐享其成，为什么还要认真和勤奋呢？久而久之，世族子弟越来越不成器。

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民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是，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的小孩就能当著作郎，只要能在信中写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八九代人都没种过田，稻麦不分，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割，这样的世家大族完全脱离了现实。

南梁时，世族人士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涂脂抹粉，出则车舆，入则扶持，找不到能骑马的人。别人送给世族人士周宏正一匹矮小得只能在果树下走的马做礼物，周宏正这才学会，还常常骑出去，就被圈子里的人评为“放达”。至于有尚书郎敢骑马，则会被圈子里的人弹劾。建康令王复有一回看到马又跳又叫，大惊失色，颤颤巍巍对人说：“这分明是老虎，怎么叫作马呢？”最后侯景叛乱，世族子弟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只能坐着等死。

东晋、南朝政治变得如此松懈、腐败和懦弱，掌权的世族要负主要责任。

外部原因就是侯景之乱开始的一系列变故。侯景之乱间接导致了南梁的灭亡，摧毁了南方的世族结构。侯景刚投降时，备受宠遇。侯景就想向王、谢两家求婚，萧衍劝他说：“王、谢门第太高，你配不上。不妨在南方土著的朱、张以下门第看看。”侯景一个北方武人，竟然被南方的世族文化这么打击。于是他恨上了那些世族豪门，发誓要将世族儿女拉下台来，许配给奴婢。叛乱期间，侯景进入建康后几乎杀绝了王、谢二家，其他世族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同时侯景也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们的经济和社会势力。他还提拔了大量寒门人士甚至奴婢下人，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侯景之乱，西魏两次攻略江陵，使旧世族势力一蹶不振，面目全非，子弟甚至沦为农夫商贩。到陈霸先以胥吏身份登基称帝，南方土著地主抬头，南渡世族势力更加衰落。不久隋朝兴兵伐陈，南陈覆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南方所有的世族，不论南渡的还是土著都随着南方政权一起灰飞烟灭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北方世族的发展和南方不同。就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特权而言，南北世族是一致的，但两者的境遇不同，作风也就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南渡的世族都是盛流名族，他们借着拥戴王室的名义，各自封山占泽，成立庄园，把南方土地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并歧视南方土著家族，引起侨姓与吴姓之间的严重对立。而滞留北方的世族，门第本来就不是最高的。他们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和压迫之下，不得不扎根百姓、结好民众，以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博取其他民族统治者的重视。所以有人说，南方的世族是“借上而凌下”，北方的世族则为“附下以抗上”。

南方的世族养尊处优，心态上变得自私自利，不注重家庭利益。大家族慢慢分裂为小家庭，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分居的占十之六七。他们往往“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甚至有“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的奇观。平时各自享乐，有事时就各奔东西。北方世族就不同了。因为处境艰苦，同族之间凝聚力越来越强，家族组织趋于紧密的大家庭制。在乱世中，他们往往聚族而居。许多大家族还建立坞堡，聚拢流亡百姓，成为自给自足、亦农亦军的社会组织。少数民族政权不敢轻辱，往往吸纳他们进入政权。世族因为无力驱逐异族统治者，只有隐忍与之合作，通过建立功业保全自己，同时通过参与胡族政权的机会，逐渐把汉族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入其中。因此，北方虽然

战乱不休，汉族政治传统却始终没有断绝，反而将异族统治者的传统融化掉，最终将少数民族文化消融在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因为汉族世族屹立不倒，始终具有强健的力量，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北齐和北周，历代王室对世族重视并引为己用。北方世族逐渐接触少数民族政权的权力核心，最终将政权重新夺回。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使少数民族加快了融入汉族的速度，同时许多汉族世族人士也逐渐胡化，被少数民族接受为同族。北魏分裂后，北齐高氏汉化程度浅，政权保持了较多少数民族习气，对黄河中下游的汉族世族人士并不重视。东部汉族世族势力发展不起来。而西部的北周政权因为力量薄弱，特别重视争取关中陇西汉人的支持，所以极力拉拢关中陇西世族。隋唐的建立者杨氏、李氏都是关陇世族人士，他们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宇文家族拉入北周政权内部的。北周政权和汉人逐渐融合，力量由弱变强，最终消灭了北齐和南陈，时隔四百年后重新统一了中国。北周政权也被汉人出身的杨氏、李氏等关陇世族集团篡夺。中国历史也进入了关陇世族掌权的隋唐时代。

佛教是如何在中国站稳脚跟的

—

佛教在两汉时期就从古印度传入了中原地区，但是当时人们对佛教教义不甚了解，仅仅将它当作道教神仙的一种。少数信奉佛教的人也都是官僚集团中的上层人士。在两汉时期，人们出家为僧是非法行为。所以当时佛教还仅仅是社会上的一种边缘思潮，它真正盛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解决了自己教义和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刻矛盾，最终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绵延千年。

为什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流行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东汉末期以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越来越不能解释社会的黑暗面，社会各阶层对儒家学说产生了信任危机。而此时的道教虽然教义不断完善，仪规逐渐形成，但距离成熟的宗教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新兴起的玄学虽然逐步取得了一些思想市场，但它的信仰者基本局限在士大夫当中。时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而佛教恰逢其时，从天而降。

第二个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更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动荡的社会是宗教发展的沃土。当社会中人人都怀着朝不保夕的恐惧和忧虑时，神灵的超自然力量自然就成了人们寄托各种美好愿望的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保全身家性命、保护自己财产的迫切愿望。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佛教。我们翻阅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就会看到里

面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说某个官员因获罪而被判死刑，临刑的时候他默念观世音法号，竟能枷锁自脱。还有的官员在行刑前默念佛号，就在这时皇帝赦免的诏书及时送到了，等等。这些被记入正史的事迹反映了当时官员在动乱之际企图通过信仰佛教来保全身家性命的心理。官僚阶层如此，百姓更是如此。以上两个原因相互作用使得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中迅速泛滥。

两汉时期是不准百姓出家为僧的，魏晋时期的石虎说我本来就是“戎”人，理当尊奉“戎神”，即佛。他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自由出家。出家的禁令解除了以后，大批百姓为了逃避劳役、保全性命，纷纷削发为僧，求得寺院的庇护。

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割据政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横征无度，百姓们出家为僧的比例就高；如果一个政权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尚们还俗的比例就高。那些帝王和达官显贵们自然不愿意出家为僧，但是他们信佛、佞佛，为佛教的泛滥而推波助澜。南朝时期，王、谢等世家大族皈依佛门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即便是在东晋末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还亲自筹措资金数千万，塑造金佛，步行十余里放置在金陵瓦罐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就更出名了，曾三度出家到金陵同泰寺，甘愿做一个寺奴，最后都是梁朝官员出钱将他赎回的。

普通百姓和王公贵族的种种行为，推动了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泛滥成灾。最突出的表现是当时的中国南北方寺院林立，各家寺院收敛钱财、扩充田地，和尚和尼姑数量大增。佛教寺院发展成了庞大的经济体和社会力量。据史料统计，南朝的首都建康有佛寺五六百所，在北魏的前期首都平城有佛寺上百所，北朝寺庙超过了六千四百所。而南北双方合计的寺庙总数估计在三万所以上。当时，仅北魏统治区域就有专业的僧尼两百多万人，到了北周时期，又增加到了三百多万人。

民间的信奉和达官贵族的尊崇，使得佛教艺术也在当时大为发

展。典型的表现就是佛教石窟的大量开凿。今天，我们看到的几大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以及山西天龙寺石窟和甘肃炳灵寺石窟等，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其中最值得说的是敦煌莫高窟。

敦煌自西汉设立郡县以来到西晋末年的数百年之间，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镇，成为华戎交汇的大都会。进入魏晋以后，河西地区先后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400年，李暠割据敦煌称王，建立了西凉。

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敦煌在前凉、西凉、北凉三个割据政权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各个政权都注重治理内政，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同时崇尚儒学，兴办教育，招揽了大批读书人和文化精英。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文化昌盛，敦煌成为文化中心。在当时的敦煌城里，人们能够看到各地前来避难的士人、大师和普通百姓。著名的儒家大师在敦煌开课讲学，往往能够聚集数百甚至上千名学生。在地理上，敦煌是西域进出中原的交通要道，扼守佛教传入中国的咽喉。西域的商品、文化和宗教源源不断地来到敦煌，中原内地前来避难的百姓和儒家文化、生产技术也纷纷传到敦煌，使得敦煌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焦点。

在这里，饱受动乱之苦的中原百姓纷纷拜倒在从西边来的“佛”的脚下，希望能够借此解脱苦难。敦煌由此成了佛教东传的原点和西部地区的传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驻足讲经，并经由敦煌进入中原大地。前秦苻坚的时候，开始有佛教中人在敦煌城郊区的鸣沙山开凿石窟。据说，当时有人看到，鸣沙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尊金佛，于是萌发了开凿佛教石窟表示虔诚的心意。这场浩浩荡荡的石窟造佛运动延续了千百年，最后造就了千古流传的敦煌艺术。

敦煌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灿烂的文化及东西思想的碰撞，全都体现在一件件物品当中，成为一幅幅著名的、美轮美奂的壁画和一个

个淹没在黄沙和谷子堆里的凄美故事。北魏灭亡北凉，统一了北方以后，河西地区的文化、人物和敦煌的佛教迅速进入中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泛滥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时期名僧辈出，翻译大盛，是中国佛教思想的奠基时期。西晋永嘉四年（310），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当时佛图澄已经七十九岁了。据说他在中原主持修建过八百九十三所寺庙，收了将近一万名门徒，他于永和四年（348），在邺城去世，享年一百一十七岁，他的众多门徒中最著名的是释道安。中国僧侣习惯于以“释”为姓，这个做法就起源于释道安。

释道安是冀州常州人，出家之前是饱读儒家经书的书生。十八岁时，他在邺城见到了佛图澄，受到了佛图澄的赏识，之后就一心皈依佛门，弘扬佛法。后赵灭亡后，中原混乱不堪，释道安带着弟子迁徙到南方，在东晋兴宁二年（364）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来到了南方的襄阳。他在襄阳注经、讲经、翻译经文，常常聚集信徒好几百人。

释道安的师傅佛图澄来到中原的时候，可能还用了一些迷惑人耳目的魔术来招揽信徒，到了释道安时期，佛学完全成了一门严肃的学问，他们招揽信徒靠的是传授思想。太元四年（379），前秦军队攻陷襄阳，苻坚将释道安恭恭敬敬地请到了长安。在长安，释道安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佛经事业，而他的弟子慧远则在前秦军队攻占襄阳以后，带领一部分人逃到了九江，后来定居在庐山。

慧远是山西雁门人，他少年时游学于许昌、洛阳，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和黄老道家之术。二十一岁在山西恒山听释道安讲经以后，毅然出家为僧。他在庐山居住了三十多年，弘扬佛法，后来发展成了净土宗。净土宗是当时南方最主要的佛教宗派，庐山成了佛教重地，前往江南和西域的北方僧人往往汇聚庐山。庐山也发出了一封封探讨佛经的信件，和北方同道通信问学。

北方与慧远同时代的著名僧人是鸠摩罗什，西域龟兹人。前秦苻坚命吕光进军西域，班师时将已年届中年的鸠摩罗什请到了凉州。后秦灭后凉后，姚兴又将他迎到长安，并对其敬若神明，命僧人八百余人跟从他学习。鸠摩罗什最大的贡献是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事业。他精通梵文和汉字，在几百名助手的协助下翻译了大批佛经，对佛教经典的汉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这些宣扬西方佛教的僧人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兴起了中国本土僧人去古印度求法的热潮。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在东晋时期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法显和尚。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就进佛寺做了小沙弥，二十岁的时候受戒。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和一些同伴从后秦的首都长安出发，西行求法。求法的道路当中，旅伴时增时减，旅途生活极为艰难。比如从敦煌到鄯善的一段路程，法显就不得不以枯骨为标志，在戈壁荒漠中走了十七天。经过三年的跋涉，法显在元兴元年（402）才越过葱岭，进入北印度。他的足迹遍布西、中、东印度各地，瞻礼佛陀遗迹，学习梵文，收求佛经。在东晋义熙五年（409），法显搭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求法。两年后，他搭乘商船回国，途经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最后流落到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过了一年，他才从爪哇搭乘商船回到广州，途中又遭遇暴风雨，漂流了两个多月，结果到达了青州（今山东即墨）。法显将自己沿途求法的经历写成了《佛国记》一书。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是与唐朝玄奘齐名的人物。

二

在喧嚣的信佛、崇佛浪潮当中，也有许多人对佛教的泛滥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并提出了批评，如北魏官员李暘。他认为，中国的圣人

不信神，不信鬼，而佛教却宣扬天堂、地狱、灵魂等，是地地道道的鬼教。他还上奏北魏皇帝，认为不应该舍弃堂堂正正之教，即儒教，而信鬼教。南朝官员天文学家何承天则根据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认为其宣扬邪说，自相矛盾。他举了一个例子：鹅吃草不杀生，却最终要被人宰杀；燕子杀生，以虫为食，而家家户户却保护燕子。这样看来，杀生者不一定有恶报，为善者却没有善果。何承天根据佛教思想内在的一些矛盾，认为佛教是欺骗老百姓的陷阱，应该遭到仁人志士的舍弃。

南北朝时期，对佛教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范缜。范缜是梁武帝萧衍的老朋友，在梁朝初年的时候曾经做到尚书左丞，后遭人弹劾被流放广州，返回建康后担任官卑职小的中书郎。当时，萧衍崇信佛教，范缜却对当时举朝倾尽财力崇佛、老百姓破家佞佛的行为表示不满，公开发表了《神灭论》。《神灭论》的主要思想就是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一体的、共生的，宣扬人死神灭，没有灵魂。这就否定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佛教的教义是博大精深的，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和神灵而已。范缜就根据这两点强调神形不可分，人死则灵魂消灭。后来上至梁武帝，下至竟陵王都驱使了一批佛教信徒与范缜辩论，结果都被范缜驳得无言以对。这也说明当时南北朝社会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深，并没有领会佛教的真正深义。很多官僚、百姓崇信佛教，大体都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并不意味着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已经深入人心。

佛教泛滥的表面喧嚣，并不能掩盖佛教和当时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对立。

不解决这样的对立，佛教就远谈不上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佛教和中国社会深层的矛盾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说的佛教的精神教义并没被中国人真正接受以外，佛教对当时中国社会还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大量人口皈依佛门，大量金钱流入佛门，导致佛教和政权争夺财力、物力和人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有一些县人口不足万人，而

一些大的寺庙往往拥有数十万的人口。这样就使得佛教的势力超过了地方州县的势力，怎能不引起各级政府的猜忌。

同时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古印度，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无非两种：一种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不问尘世，入了佛门就是脱离红尘。于是许多早期的佛教僧侣住在深山老林中，不问世事。另一种就是古印度的一些王朝，比如孔雀王朝、贵霜王朝，政教合一，世俗的帝王就是佛教的最高教主。但是这两种情况和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不相融。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中央政权绝不能允许有不受政府公权力管辖的特殊人物和事例存在。同时中国也是一个“非宗教”国度，世俗的帝王不可能兼任佛教的最高教主。这就使佛教的教义、组织机构和中国的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矛盾。

在魏晋南北朝早朝，佛教僧侣坚持古印度的惯例，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关心与皇权、官府产生的冲突，干脆就不理会皇权和官场。比如，当时的佛教僧侣看到了达官显贵，既不跪拜也不行礼，常常漠然地擦身而过，这在达官显贵看来就是一种不敬的行为。东晋时期，掌权的大将军桓玄曾经责问南方佛教的领袖人物慧远。他说，僧人看见了官员甚至是看见了至高无上的帝王都不行礼，这是“大不敬”，而这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当中是可以抄家灭门的大罪。但是慧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来回应桓玄的责难。慧远说：僧人出家，积善积德，实际上是孝敬父母，佛教教义有助于推动文化，其实是在协助官府和帝王教化百姓，所以佛教僧侣虽然不拜帝王，但是不能说是不敬。慧远最后说，佛教僧侣是开天人之路的使者，只要帝王不违背天意、顺从天意，佛教僧侣拜佛也就是在拜帝王。慧远的这种辩解，让桓玄无言以对。

在北方也是如此，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经下诏，佛教僧侣在皇帝面

前不得自称贫僧，必须称民或臣，但官府的这些命令并不奏效。魏晋南北朝前期，佛教仍然保持着与世俗政权抗衡的局面，这让世俗的政治人物不能释怀。魏晋末期十六国的西夏赫连勃勃大王就想出了一个歪招，他出门的时候都要身背佛像。于是看到赫连勃勃的佛教僧侣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对着赫连勃勃礼拜，这样赫连勃勃就变相地实现了让佛教僧人敬拜自己的目的。但是佛教僧侣在拜过之后，往往声称他们所拜的是赫连勃勃背着的佛像，而不是赫连勃勃本人。

到了北魏前期，太武帝拓跋焘雄心壮志，要统一中国。他所遭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北方的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垄断了大批人力、财力，并且拓跋焘害怕佛教僧侣藐视王法，不肯臣服于世俗统治，可能妨碍自己大一统的事业，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佛教在北方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佛教泛滥并不是举起一两次屠刀就能解决的。拓跋焘死后，北方佛教卷土重来，并且更盛于灭佛之前。到了北周时期，佛教僧侣竟然达到了三百余万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试图抑制一下佛教，于是就在朝堂上宣布“三教”的顺序为：儒家第一，道教次之，佛教第三。排序一公布，北方佛教徒大为不满，自认为要排在道教之前。于是道教、佛教两派的主要人物当着皇帝的面吵个不休。宇文邕一怒之下，断绝佛、道两教，没收道观和寺院，迫令出家人还俗。实际上当时道教还被允许保留了两处道观，而佛教却完完全全被废，三百万僧侣被押解回乡，成为接受朝廷统治的编户，佛教又一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遭受了两次血的教训以后，佛教虽然没有在中国绝迹，但使很多佛教僧侣开始进行理智思考。他们认识到，在政治权力强盛、习惯于大一统局面的中国社会，佛教只有跟世俗政权妥协，才能在中国生根、生存、繁盛。释道安就说：“不依国主，法事难成。”为了弘法，佛教僧侣不得不低下头开始屈从世俗政权，在教义和组织上做了不少妥协。此后，他们不但见到帝王、官员开始主动行礼，甚至见到一般百姓都虔诚礼拜，无论男女老幼。

更重大的变化是中国的佛教僧侣主动“修正”了佛教的教义，在主张出家、不问世事的同时，佛教高僧们开始认识到，出家人应该服务于社会，遵从世俗政治。他们用释迦牟尼用法力降魔的说法弥合了出家和入世的矛盾。如果这个社会不太平，如果这个社会上还有暴政和不公平的现象，那就存在着佛教教义当中的“魔”，作为出家人，佛教僧侣就有义务去深入社会，去驱除掉这些魔障，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而如何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接受世俗政权的指挥，按照世俗政权的命令去救赎、教化百姓。经过这种调和，佛教就完全变成了世俗政权可以借来缓和矛盾、麻痹普通百姓的一种工具。

这样的妥协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隋唐时期。唐宋以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中，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僧侣不仅和普通百姓、乡村士绅相互往来，甚至公然出入帝王豪门之家，恭恭敬敬地遇人就拜。历朝历代还出了一些国师，帮着帝王出谋划策，深层参与了政治事务。此外官府深深介入了寺院的经济乃至人事安排，就是在普通州县衙门当中也有一些专门的佛官负责给要出家的百姓做证明，给远游的和尚提供度牒。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完完全全被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南北朝官场里的“临时工”

—

南北朝的官制大体沿用魏晋旧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样，都非常动荡混乱。

一个朝代的官制贵在稳定不变，机构清楚、职权明晰，让政务能够畅通执行，让官吏对自己的行为和前途有明确的预期。同时稳定的官制能够适应政治现实、平衡权力结构，所以每个朝代莫不将官制视为首要之务，王朝建立之初就搭建政府架构、任官治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自然也想这么做，无奈苦于政局动荡、矛盾丛生，对明晰官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临时”“随意”就成了这个时期官制最大的特点，官场中出现了不少“临时工”。

南北朝政权都是实权人物通过军事斗争建立的。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正常的官制被破坏，这些强权人物往往用自己的一帮人马组成班底，自成体系，绕开了正常的官制和机构，自由行使职权；又由于局势动荡，军、民、财等不再自成系统，往往为了作战或者揽权的便利就打破制度和常规，因事设制、因人设官，都很常见，因此，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也包括魏晋时期，“临时处置”成了官制的一大特色。

南北朝官制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时起意”，任意增加官额、虚立官名来安置功臣、贵戚和豪门。官爵成了缓解矛盾的工具，比如一些人为了聚拢人才、积累名声而大肆征辟僚属。各朝中普遍衙门多、官员

多，人浮于事。官员多了，事情却办不好，衙门和官员相互扯皮，热衷名位，反而造成统治不稳。

当时的实权人物、领兵大将，都建有自己的幕僚和政权组织，甚至拥有私家军队，他们的政权被称为“霸府”。霸府帮助主人夺取了政权，就扩充为正式政权，其中的幕僚和将领就转化为朝廷的文武百官，私家军队也漂白为政府军。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霸府和正式政府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一些人投靠某个实权人物，进入他的幕府。等幕主建立藩镇或者夺取政权后，这些人自然就成了当权官员。今日他们还是某人的幕僚，明天就成了朝廷的三公九卿。南朝宗室王爷继承皇位、登基为新皇帝后，除了大肆封赏有功的幕僚和私将外，还要将封国内的所有官员都加官晋爵。这也就是南北朝官制的随意之处。

说完南北朝官制的大概情况，下面分北朝和南朝、中央和地方，具体说说官场之乱。

拓跋鲜卑在建立政权初期，保留了浓重的游牧民族色彩，政权简单而粗糙。虽然吸收了汉族士大夫做长史、司马，但底子还是少数民族。一直到道武帝拓跋珪取得并州后，拓跋鲜卑才开始建立正规的政权机构。不用说，他们采纳的是汉族的政治制度，魏晋时期的官制几乎被他们全盘采纳。自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文官，拓跋珪一般都用汉族读书人。汉族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量才录用。北魏早期正是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对于北方的汉族老百姓来说，虽然统治者换成了异族，但统治的架构还是熟悉的模样，多少能减轻些抵触情绪。

然而北魏前期对汉族政治制度的吸收还不深入。比如他们保留少数民族的劫掠色彩，不给官吏工资，客观上逼得当官的人去贪污腐败。另外，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汉族的制度受到了鲜卑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直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期，这个矛盾

才得到根本解决。他施行俸禄制，官吏在俸禄之外受贿就处以死刑。更重要的是，拓跋宏雷厉风行地推行彻底的汉化改革，大力镇压保守的鲜卑贵族，解决了落后民族和先进制度之间的矛盾。拓跋宏之后的北魏王朝，起码从外表上已经和汉族人的政权没有大的区别了。

孝文帝死后，北魏进入内乱时期。此后贪污腐化之风日盛，贵族豪强求官的人太多，吏部不敢得罪，选拔官吏只好按照求官之人的年龄和资历为标准，顺序补官，而不顾候选人的能力、品德等。北魏官吏人数大增，朝廷不堪重负，只好削减百官俸禄，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贪污之风。北魏晚期，朝廷干脆卖官鬻爵，考核提拔也以贿赂的多少为准。不仅是州郡长官，就连县里的小吏也要出钱购买。这就使得只有贪污的人才能平步青云，逼得官吏们去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百姓自然不堪剥削压榨，人心浮动。

偏安的南朝一直是“华夏正朔”，继承了秦汉至魏晋的政治遗风。它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建制度，也不是汉化改革，而是如何在混乱中巩固政权。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中央实力衰落的情况下，压制住强大的地方藩镇，即如何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成了南朝官制考虑的重要问题。鉴于时局困难、战争频仍，南朝不可能采取“强干弱枝”的手段，客观上必须保证地方有相当的军事和财政实力来保卫中央。所以从刘宋王朝开始，朝廷一般任用宗室近亲镇守地方。尤其是荆州、江州等强藩的历任刺史，几乎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问题是，亲兄弟也靠不住啊！刘宋、南齐两代内乱不断，哪一次少了担任地方藩镇的宗室亲王的影子？萧道成灭亡刘宋，告诫子孙：若不是刘家骨肉相残，天下哪会落入我们萧家之手。同样的话，萧衍灭亡南齐后，又和子孙重复了一遍。

梁武帝萧衍鉴于前两代皇室骨肉相残的教训，为政宽纵。他大力推行佛法，同时宽待宗室王公，希望以此来消弭内部矛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问题。结果却导致中央权威丧尽，有实力的宗室亲王蠢蠢欲动。等到侯景之乱时，皇室的内部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及南北方

之间的矛盾搅和在一起，将江南富庶之地摧残得白骨累累。

二

南北朝中央官制的最大特点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逐步确立，代替原来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变得徒有虚名，基本变成闲散职位。

东汉以来，丞相之名变动了多次，或称丞相，或称司徒。南朝继承了丞相多变的名称，且废置不一，没有定员。中枢政务的实权从东汉开始就已默默转移到各个尚书手中，经过三国、魏晋，这个趋势到南北朝的时候已成为定式。尚书省掌握了中枢实权，真正总揽朝政大权的丞相必须加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行。录尚书事负责尚书省的事务，实际上是一个“加官”或者说是“差事”。录尚书事的人有权审阅一切公文，即便是威望极重的权臣，如果没有这个名号，也不能保证权力的集中。所以判断一个南北朝官员是不是真正的丞相，不看他的官衔，而看他有没有录尚书事。

南朝中央朝廷最尊贵的官衔，是继承了西晋时期的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这八个官衔都是一等一的好名字、好官职。但徒有其名，虽然有官署，却没有实际负责的事务，只是用来尊崇士族或者望重之人的荣衔、虚衔而已。八公之下，南北朝还发明了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也是虚衔。所谓“开府”，指开设府第，设官置吏。之前只有“三公”才有开府的待遇。仪同三司，指的是可以摆设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相同的仪仗。

北朝的最高荣衔和南朝略有不同，北齐的中枢最高官是三师（太

师、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下面才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北周则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名称虽然不同，实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虚衔，真正的实权在尚书省里。

南朝时，朝廷改尚书台为尚书省。尚书省最高长官是尚书令，副手是左右尚书仆射。在既没有丞相，也没有录尚书事的时候，尚书令就是事实上的丞相。

不过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防止出现权臣，南北朝的皇帝只将行政权力赋予尚书省，而让身边的中书省参与决策。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监，副手是中书令。中书监、中书令负责草拟诏令、策划国政，分了尚书省的权力。结果，中书省日渐位高权重，成了皇帝新的威胁。于是原本只是皇帝侍从衙门的侍中寺被扩大为门下省，其最高长官侍中随从皇帝左右，参与朝政，随时作为皇帝的顾问。

这样一来，中书省分了尚书省的权力，门下省又限制中书省的权力。朝廷中枢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三足鼎立，分享行政、决策和顾问权力。尚书令与中书监、侍中等一同参与朝政。这隐隐中有了唐宋时期三省长官“参知政事”“参政平章事”的雏形。南朝也有个例外，南陈的国家政务就归中书省，尚书省反而唯命是从。

三省权力扩大，九卿的职权就被侵夺了。和三公一样，南北朝的九卿也只徒具虚名。有的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虚衙门，有的则沦为后勤服务机构。比如光禄卿在秦汉时是皇帝的侍卫长，负责禁卫军权，在西晋时就只有虚名，被排挤到皇宫之外，只在文武官员大规模朝会的时候才来点个卯。北齐时，光禄卿所在的光禄寺成了安排宫廷筵席的衙门。

西魏和北周的中央官制最为特殊。名臣苏绰等人依《周礼》六官制度改革官制，在北周开始实行。北周以天官冢宰总领地官司徒、春

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五官，形成五府总于天官的格局。这样的结构简化了机构，有利于皇帝集权。加上六官只处理日常政务，朝廷大政的决策、审核等都由皇帝授意亲信官员另行处理。不过这个制度存续时间很短，隋朝建立后就被舍弃了。

在中央官制中，御史台是极少数在乱世中保持不变的机构之一。南北朝时，御史台的长官叫作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很重视对官员的监察，便利自己集权。局势越乱，矛盾越激化，皇帝越需要监察机构。所以任凭其他衙门沉浮变换，御史台都稳坐钓鱼台。

三

说完中央官制，继续说说地方官制和军制。

无论南北，地方官制都是州、郡、县三级制。州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行政长官为刺史，下设别驾、诸曹从事等。首都所在的州，刺史称牧。郡的最高长官为太守，下面有郡丞、主簿等。首都所在郡的长官一般称为尹，比如南朝建康所在的丹杨尹、北周长安所在的京兆尹。郡下为县，大县最高长官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下面有县丞、县尉等。县下还有乡和里。

南北朝的行政区划和官制一样混乱。行政区划总的趋势是：辖境日益缩小，数量大为增加。增加州县，就能多安插人员。比如南北方为了笼络聚民自守的坞堡主，就地任命他们为当地的县令、太守。有的时候则是为了防止强藩出现，朝廷将州县越划越小。比如南朝分荆州南部为湘州，拆交州为广州、交州、宁州等。南朝还侨置州县，产生了许多侨州、侨县。

北方则虚分州县。北魏孝明帝元诰以后，豪强、权贵、大族纷纷自立州郡，甚至连只有一百户人家的小城，也称为一州，三四个村子的地盘也立为一郡。刺史、太守、县令等为数众多。北齐文宣帝高洋之时，下令缩减行政区划，省去三个州、一百五十三个郡、五百八十九个县。南朝也有类似的合并州县的举动，但成效不大。

南北朝官制混乱的另一个重灾区是军制。乱世重兵，军队规模扩大，军官群体也日益壮大。军衔自然水涨船高，总趋势是越定越高、越任命越多。

秦汉时期，将军名号是极宝贵、极罕见的，一般授予重要方面的主将、功勋卓著的宿将或者掌管大军的权臣。绝大多数将领也就是中郎将、校尉等。从东汉末年开，将军名号开始贬值，获封将军或者自封将军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南朝，将军已经泛滥成灾。刘宋因为战争频繁，设置了许多将军号，且突破了文武之分，高官要职纷纷兼带将军号。一些压根不统兵的官职，也带上了将军号，只为提高地位而已。至于地方军政首长，大多也封将军号。如果刺史或者太守，没有得到将军封号，就是单车刺史、白板太守，意思是没有实权。这个现象，在南北朝各个政权中都存在。

刘宋将军的尊卑高低，以四征（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安、四平为序，最贵重者为征东将军。特别尊贵的，则加“大”字，如某某大将军，又在一般将军之上。而最大、最贵的则是没有具体名号的大将军，不是授予元勋名臣，就是授予把持朝政的权臣。除此之外的其他将军，比如汉朝、三国时期相当贵重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左右前后四将军等，又比如新出现的镇国将军、安国将军、荡寇将军、鹰扬将军、抚军将军等，都被称为杂号将军，不是授予一般的将领，就是作为官员的兼职。王羲之就因为担任过右军将军，而世称王右军。事实上，王羲之终生都没有领过兵，也没有打过仗。

南齐时期，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重于其他将军。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统率京畿地区的中央军，包括各支皇家卫率和驻屯首都附近的正规军。他们控制了皇宫和首都，且部队装备好、待遇好，优于其他军队，颇为其他将军侧目。南梁时期，军衔更趋混乱。据统计，南梁的将军号竟然有三百六十五个之多。

南北朝还有以军代政的趋势。大变乱时代，常常只有统兵的实权人物才能镇抚地方。所以各个政权也就任命将领们为地方藩镇。这在战时和战后尤其明显，往往是谁攻占了某地，就任命谁为太守、刺史。平时，各朝也以将军为都督，督一郡或数郡，一州或数州，同时兼所在地的刺史或太守，治军又领民。比如刘宋时沈攸之就曾担任荆州刺史，都督荆、襄、雍、益、梁、宁、南北秦等八州诸军事；陈霸先曾为扬、南徐二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有的将军还加了持节的名号，像使节一样拥有节杖，称为持节将军。杨坚就曾为使持节，都督内外诸军事。

这其中又是什么奥妙呢？名称不同，权力不同。拿都督来说，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为次，督诸军为下。持节将军以使持节为上，持节为次，假节为下。持节意味着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但使持节有权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持节有权杀平民，假节只能诛杀触犯军令的人。都督诸军也好，持节也好，本质上也是临时处置，不是正式官职，而是差遣，是“临时工”。但因为有了差遣后位高权重，人人都争着做这样的“临时工”。

南北朝历史年表

帝王纪年 公元纪年 历史事件

宋永初元年 420年 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国号宋，史称刘宋，刘裕就是宋武帝。南朝开始。

宋永初三年，北魏泰常七年 422年 宋武帝刘裕病逝，太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北魏南侵，夺取河南、山东部分地区。

北魏泰常八年 423年 北魏拓跋焘登基，史称太武帝。太武帝信用道士寇谦之，于平城起天师道场，道教大盛。北魏筑长城，东西两千余里，以防柔然。

宋景平二年 424年 宋少帝被大臣们废杀，刘义隆即位，是为宋文帝。

宋元嘉三年 426年 宋文帝诛杀权臣徐羨之、傅亮。谢晦据荆州造反，兵败而死。

北魏神䴥二年 429年 太武帝拓跋焘大败柔然。柔然人南附者数十万人，余部北遁。柔然元气大伤。

宋元嘉七年 430年 刘宋北伐，失利而返。

北魏神䴥四年 431年 大夏灭西秦，北魏攻夏，夏主赫连定西迁，为吐谷浑所俘送魏，夏亡。

北魏太延二年 436年 北魏灭北燕。

北魏太延五年 439年 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北魏基本统一北方，十六国结束。北朝开始。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

北魏太平真君五年 444年 太武帝下诏禁私养沙门、巫觋，不得私立学校。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445年 北方盖吴起义，反抗北魏的民族压迫。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 446年 太武帝纳崔浩言，禁佛教，毁经像、塔寺，坑杀僧人。

北魏太平真君十年 449年 太武帝大破柔然，收入户畜产百余万。柔然从此衰落。

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450年 太武帝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名，杀司徒崔浩。刘宋王朝几乎倾尽全国之力发动元嘉北伐，计划收复黄河以南失地，战败。太武帝率大军南进，扬言渡江，建康大震。魏军到处烧杀，所过之处皆成赤地。

宋元嘉二十八年 451年 正月，魏军北撤，围攻盱眙，宋将臧质坚守。盱眙保卫战打响，魏军战败。

宋元嘉二十九年，北魏正平元年 452年 北魏中常侍宗爱杀太武帝。宋文帝闻魏太武帝死，遣萧思话等攻魏，无功而还。

宋元嘉三十年 453年 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刘骏起兵攻杀刘劭，被拥戴为孝武帝。

宋大明元年 457年 刘宋实行土断，流寓之人编入当地户籍。

宋大明三年 459年 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相忌。刘诞在广陵举兵，孝武帝命沈庆之破城。刘诞被杀。

北魏和平元年 460年 柔然攻高昌，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

始此。云冈石窟大约从本年起开凿，至太和十八年（494）完成。

宋大明六年 462年 祖冲之奏上《大明历》。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其圆周率之精确在世界上为最早。

宋大明八年 464年 宋孝武帝死。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

北魏和平六年，宋泰始元年 465年 魏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年仅十二岁，丞相乙浑专权。前废帝杀戴法兴，又杀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朝野人人自危。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起兵。湘东王刘彧等杀废帝。湘东王即位，是为明帝，改元泰始。

北魏天安元年 466年 冯太后临朝称制，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

北魏皇兴五年，宋泰始七年 471年 北魏献文帝喜佛道，传位于太子拓跋弘。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

宋泰豫元年 472年 宋明帝死。太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

北魏延兴六年 476年 北魏冯太后称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

宋元徽五年 477年 后废帝刘昱被杀，刘準即位，是为宋顺帝。萧道成开始揽权。

齐建元元年 479年 萧道成迫宋顺帝禅位，宋亡。萧道成称帝，国号齐，是为齐高帝。

齐建元四年 482年 齐高帝死，太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

北魏太和八年 484年 北魏开始施行“班禄”，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供百官之禄，另增调外帛二匹。给禄之后，官吏赃满一匹者死。

齐永明三年 485年 南方唐寓之暴动。

北魏太和九年 485年 北魏颁行均田制。

齐永明四年，北魏太和十年 486年 唐寓之攻占钱塘，称帝，国号吴。北魏改宗主督护为三长制。

北魏太和十七年 493年 孝文帝借口南征，率军迁往洛阳。

北魏太和十八年 494年 北魏朝廷正式从平城迁都洛阳。孝文帝诏禁士民胡服，开始大规模汉化改革。洛阳龙门石窟约从本年起开凿。

北魏太和十九年 495年 北魏禁止在朝廷讲鲜卑语，禁止迁洛代人还葬北方。北魏在洛阳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推广汉化教育。

北魏太和二十年 496年 北魏定族姓，改皇室拓跋氏为元氏，其余鲜卑诸姓均改为汉姓。鲜卑八姓与汉四大姓同等。

齐永元二年 500年 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祖冲之去世。

齐永元三年 501年 齐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即位，是为齐和帝。萧衍攻入建康，东昏侯萧宝卷被杀。

梁天监元年 502年 萧衍为梁公、梁王，杀齐明帝诸子。萧衍推翻齐朝称帝，国号梁，是为梁武帝。

北魏景明四年 503年 北魏攻克淮河防线重镇义阳。

梁天监四年 505年 十月，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统领大军北伐。第二年大败而返。

梁天监六年 507年 魏军围攻钟离，钟离保卫战爆发。梁军大胜魏军。范缜发表《神灭论》。

北魏延昌四年 515年 北魏孝明帝元诰立，胡太后临朝称制。

梁天监十五年 516年 梁筑浮山堰城，引淮水灌寿阳。秋，堰坏，沿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漂流入海。

北魏神龟三年 520年 元叉、刘腾发动政变，杀死清河王元怱，幽禁胡太后。

北魏正光四年 523年 北魏怀荒镇民起义。破六韩拔陵率沃野镇兵民起义，杀镇将。六镇起义开始。

北魏正光六年，南梁普通六年 525年 胡太后发动政变，诛杀元叉，重新掌权。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投降南梁。梁军北上，后因主帅萧综叛逃而大败。

梁普通八年 527年 梁武帝萧衍在同泰寺出家为僧，三日后返回。此后二十年，萧衍又三次出家，朝廷用巨金赎回。

北魏武泰元年 528年 胡太后毒杀元诰，并扶持小皇帝元钊。尔朱荣以为元诰报仇为名起兵，杀胡太后及元钊，并在河阴屠戮文武百官，史称“河阴之变”。尔朱荣在邺城大败葛荣，降服百万起义军。葛荣遇害。

北魏永安二年，梁中大通元年 529年 北魏北海王元颢在梁军扶持下称帝。梁军一度攻克洛阳，旋即被尔朱荣大败。元颢被杀。

北魏永安三年 530年 元子攸杀尔朱荣，尔朱荣余党攻陷洛阳，杀元子攸。尔朱家族先拥立元晔为帝，后又逼元晔禅位给元恭。

北魏普泰元年 531年 大将高欢起兵讨尔朱氏，立元朗为帝。

北魏普泰二年 532年 高欢废元恭及元朗，立元修为帝，自为大丞相。元修就是孝武帝。

北魏永熙三年 534年 高欢举兵向洛阳，孝武帝奔关中，依附大将宇文泰。高欢入洛阳，立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东魏迁都于邺。闰十二月，宇文泰毒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都长安。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

西魏大统元年，东魏天平二年 535年 西魏丞相宇文泰定新制二十四条。苏绰制定公文格式及计账、户籍之法。

西魏大统三年，东魏天平四年 537年 宇文泰在沙苑大败高欢，史称“沙苑之战”。

西魏大统四年，东魏元象元年 538年 东魏与西魏在洛阳周边大战，史称“河桥-邙山之战”或者“河阴之战”。

西魏大统七年，东魏兴和三年 541年 西魏宇文泰在苏绰、卢辩等人相助下开始改革。

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 543年 西魏与东魏在河桥、邙山地区再次大战，史称“邙山之战”。

东魏武定五年，西魏大统十三年 547年 东魏高欢死，子高澄嗣位。孝静帝被高澄幽禁。侯景叛乱，试图割据河南，同时“归降”西魏和南梁。南梁出兵支援侯景，西魏出兵蚕食河南州县。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

梁太清二年 548年 南方爆发侯景之乱。侯景于寿阳起兵反梁，渡江直入建康，围台城。

梁太清三年 549年 侯景攻陷台城，梁武帝萧衍死，侯景立萧纲为帝，是为简文帝。陈霸先在岭南起兵，讨伐侯景。

北齐天保元年，西魏大统十六年，梁大宝元年 550年 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为帝，国号齐，都邺，史称北齐。高洋就是齐文宣帝。

西魏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湘东王萧绎发布檄文，讨伐侯景。

梁大宝二年 551年 侯景废简文帝，立萧栋，很快又废萧栋自立，国号汉。

梁承圣元年 552年 王僧辩、陈霸先克建康，侯景东逃。萧绎在江陵即位，是为梁元帝，向西魏称臣。

西魏废帝二年 553年 西魏攻占益州。

西魏恭帝元年 554年 西魏陷江陵，梁元帝萧绎被杀。

梁绍泰元年 555年 萧詧在江陵称帝，称藩西魏，史称后梁。这是西魏的傀儡政权，领土只有江陵附近几个县。北齐强迫王僧辩在建康拥戴萧渊明为帝。陈霸先起兵讨伐，杀死王僧辩。萧渊明退位。陈霸先拥戴萧方智登基，萧方智就是梁敬帝。

西魏恭帝三年，梁太平元年 556年 陈霸先大败南侵的齐军。西魏仿周礼建六官。宇文泰死，世子宇文觉嗣，侄宇文护统理军国事。岁末，宇文护迫魏恭帝禅位给宇文觉，西魏亡。

北周孝闵帝元年，梁太平二年 557年 宇文觉称天王，是为孝闵帝，北周建国。宇文护废宇文觉，立宇文毓为天王，是为明帝。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是为陈武帝。

陈永定三年，北齐天保十年 559年 陈霸先病逝，侄子陈蒨即位，是为陈文帝。高洋病死，长子高殷即位。

北周武成二年，北齐乾明元年 560年 宇文护废明帝，立宇文邕为帝，是为周武帝。高殷被废为济南王，叔叔高演即位，是为孝昭帝。

北齐皇建二年 561年 高演病逝，传位九弟高湛，是为武成帝。

北齐河清三年 564年 北齐颁新律令，又重新颁布均田令。

北齐河清四年 565年 高湛传位于太子高纬，自为太上皇帝。高纬就是齐后主。

陈天康元年 566年 陈文帝逝世，长子陈伯宗即位，是为废帝。

陈光大二年 568年 陈伯宗被废为临海王，叔叔陈顼即位，是为陈宣帝。

北周建德三年 574年 周武帝宇文邕禁佛、道两教，毁弃经像，强令和尚、道士还俗。

北周建德四年 575年 北周大举攻齐，因周武帝急病退兵。

北周建德五年 576年 周武帝率兵再次攻齐，在平阳打垮齐军主力。周军攻破晋阳。

北周建德六年 577年 周军攻破北齐首都邺城。北齐灭亡。

北周建德七年 578年 周武帝死，太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宣帝。

北周大成元年 579年 周宣帝传位于太子宇文阐，是为静帝。

北周大象二年 580年 杨坚总国政，先后平定起兵反抗他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郢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

隋开皇元年 581年 杨坚接受宇文阐禅位，建立隋朝，年号开皇。杨坚就是 隋文帝。隋军伐陈，未能突破长江防线，于第二年撤回。

陈太建十四年 582年 陈宣帝死，陈叔宝即位，是为陈后主。

隋开皇三年 583年 突厥大军杀入长城以南劫掠，遭到隋军反击。

隋开皇七年 587年 杨坚征召西梁皇帝萧琮入朝。西梁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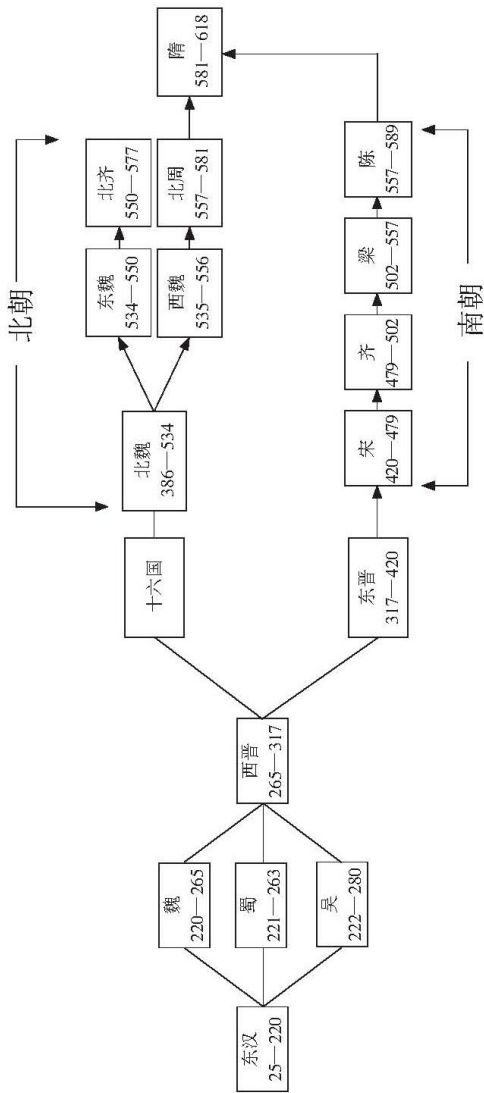
隋开皇八年 588年 三月，隋文帝杨坚任命杨广为主帅伐陈，统一

战争开始。

隋开皇九年 589年 正月，隋军攻破建康，陈叔宝投降。陈朝灭亡。

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示意图

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示意图



隋朝

走向伟大帝国
的开端

张程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朝：走向伟大帝国的开端 / 张程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1

ISBN 978-7-201-16758-9

I. ①隋...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 - 隋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4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8922号

隋朝：走向伟大帝国的开端

SUICHAO: ZOUXIANG WEIDA DIGUO DE KAIDUAN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刘庆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总策划 赵易

策划编辑 晏一群 韩笑

责任编辑 金晓芸

特约编辑 康悦怡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制版印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26千字

版次印次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自序 向伟大冲刺的隋朝

仁寿四年（604），新继位的杨广在洛阳登邙山、观伊阙，惊服于此地的帝王之气。杨广感叹：“龙门在此，自古帝王为何不在这里建都？”尚书仆射苏威回答：“自古非不知，只是等待陛下。”杨广大喜之余，踌躇满志地定下了迁都洛阳的决心，想要把握住上苍赐予的良机。

当隋王朝在六世纪末期横空出世之时，天下都相信它将带领割据混乱四个世纪的神州大地，步入一个和平、统一、富强的治世。

历史将一个天赐良机，送到了大隋王朝的手里。

隋朝的创建者隋文帝杨坚确实是一个幸运儿。“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赵翼语）开皇元年（581）二月，杨坚受北周静帝禅让，建立新王朝，定国号为“隋”。八年后，隋军南下灭亡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统一华夏，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局面。

一个“地广三代，威震八纮”的大隋王朝，超越了之前所有的王朝，具备了名垂千古的先机。

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父子两代人，都一心要把握历史的恩赐，带领王朝向一个伟大的盛世发起冲刺。

父子两代皇帝也都有历史均值之上的素养。隋文帝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进行改革。完善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肇始于隋朝，它是隋文帝巩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中影响深远的一项。统一难，消除威胁统一的深层次因素更难。隋文帝还果断终结了与门阀世族势力相结合的九品中正制，毅然推行科举制，尽可能打破限制，公开透明地选贤任能。科举取士在时人看来或许只是人事制度，却深深塑造了之后的中国社会。科举制保障了社会流动性，中国古代的超稳定结构依赖科举制甚多。

隋炀帝杨广继承父亲的遗志，更加努力地驱动庞大王朝奔向盛世。杨广兴建了大运河，建设驰道，改善水陆交通；修缮长城，大败突厥，降伏林邑，征服吐谷浑，恢复了两汉在西域的影响力。隋朝的大地，万国来朝，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真腊等周边政权纷纷来朝，其中以倭国遣隋使最为著名。以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深受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影响的儒家文化圈的形成，隋朝是重要的发力时期。

“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两代人的励精图治、劝课农桑，使得隋朝前期出现一个史称“开皇盛世”的小高潮。

隋朝的粮仓装满了谷物，隋朝的国库存满了绢帛，直到唐太宗时尚未用完。

“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

“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然而，隋朝终究没能进入盛世，反而在统一天下三十八年后轰然

倒塌。在隋朝废墟上崛起的唐朝，接过了隋朝的接力棒……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每一个王朝有每一个王朝的历史责任。任何朝代统治者的作为，都要和王朝的实际相符合，不能滞后不作为，也不能超前胡乱作为。如果说隋文帝杨坚尚且算是有的放矢，那么隋炀帝就是好大喜功，带领隋朝在“超负荷”的大道上一路狂奔。隋炀帝治下的百姓，还没有从隋文帝时期的负担中缓过神来，又要服役修建宫室、长城和大运河等宏大工程，承担与周边政权的频繁战事，尤其是百万大军连续东征高句丽，对神州大地造成了不可承受的伤害。隋炀帝的“大业”是当时的不可承受之重。

至于隋炀帝本人的奢靡，则是火上浇油。杨广游江都，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浩浩荡荡的队伍，需索州县，骚扰百姓，完全是无谓的浪费。

历经几百年搏杀而融合的华夏民族，曾经寄予隋朝极大的希望，等到的却是失望。

两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个向伟大冲刺的梦想，最终留下“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骂名。

隋朝如同一道流星，划亮了大唐盛世的夜空；又如一朵昙花，短暂而璀璨。

目录

自序 向伟大冲刺的隋朝

第一章 百年乱世出新朝

普六茹一家

无名政变

权臣之路

庆云罩长安

第二章 转瞬而成的统一

隔江犹唱后庭花

金陵失险下江南

二士争功

第三章 开皇盛世

降服突厥

改革决定高度

独孤皇后

盛世当官

第四章 说不清的家事

“美好愿望”

表演政治家

太子争夺战

易储风波

废立太子

第五章 “弑父夺位”之谜

暗流涌动

杨坚之死

大业开国

第六章 王朝的形象工程

皇帝的新衣

大规模北巡

凿通西域

倭国来朝

大运河与江南

第七章 攘外还是安内

东征高句丽

为什么是杨玄感

迟到的捷报杨

第八章 十八路反王

农民大起义

李密来到瓦岗寨

李渊太原起兵

第九章 杨广的穷途末路

又见江都

杨广的头颅

隋亡唐兴

第十章 隋王朝的残余

王朝的弃儿

成王败寇

割据的终结

尾声 隋朝谢幕，盛唐开场

隋朝历史年表

后记

第一章 百年乱世出新朝

普六茹一家

西魏大统三年（537），中国北方的西魏王朝经过与南方的梁朝的外交协商，接收了一批流亡在梁朝的西魏将领。这些将领包括贺拔胜、独孤信等名将。西魏权相宇文泰非但没有惩罚他们，还热情接见，封官晋爵，贺拔胜获封太师，独孤信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衔。“归来”的游子们立即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这批将领名单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色——独孤信的部将杨忠。宇文泰第一眼看到杨忠，就注意到了他那漂亮的髭髯和威猛的体态，再一仔细询问，宇文泰更是吃惊：杨忠不仅相貌不凡，胆量更佳，普通人是提刀射箭去杀野兽，杨忠是左臂夹住野兽腰，右手拔掉野兽的舌头，赤手空拳就能打倒一头猛兽。宇文泰当即拍板：“杨忠调入我的帐下听用。”

如果宇文泰知道正是杨忠的儿子日后篡夺了宇文氏的天下，他很可能会为自己对杨忠的信任和重用感到后悔……

杨忠作为宇文泰的心腹重将，在对突厥、东魏和南梁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宇文家族后来篡夺了西魏的江山，创建了北周王朝，杨忠也就成了北周的开国元勋。

宇文泰特别感激杨忠的忠诚和功劳，决定给杨忠家族赐姓“普六

茹”。

“杨忠”也就变成了“普六茹忠”。姓氏的改变，在汉人看来是一件大事，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数典忘祖”的表现。可在宇文泰看来，这是一个天大的恩赐，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宇文泰赐姓，是他从内心里认同杨忠是自己人，是他的族人。这不是天大的恩赐，是什么？

作为宇文泰的帐下军官，杨忠只能接受这样的恩赐。

在乱世之中，杨忠已经是一个幸运儿了。杨忠出身于阴山脚下的武川镇。北魏王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在北方设置了六大要塞，屯兵把守，称为六镇。武川是其中之一。六镇官兵多是胡汉杂处，在北魏政治格局中逐渐边缘化，每况愈下，六镇也就成了祸乱的策源地。北齐的高氏、北周的宇文氏、隋朝的杨氏、唐朝的李氏，其实都出自六镇的兵家。

杨忠生在武川镇一个胡化的汉人家族，出身低微。尽管正史给杨忠安上了将门世系，但是真假难辨。少年杨忠的日子很苦，年轻时又遇到边镇骚动、北方大乱。一开始，杨忠不想像多数年轻人一样去当兵，而是希望过平稳安逸的生活，所以就拼命地往南方逃亡。但是跑到北魏南部边境的时候，那里也在打仗。杨忠不得已，也参了军，做了北魏政府军的一名士兵。北魏将领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屠杀王公大臣两千余人后，北魏的北海王元颢等宗室和高官南逃投降了梁朝，而杨忠莫名其妙地就被裹挟在这股南逃的人流中，到了江南。不久，南梁扶持元颢返回中原争夺帝位，杨忠又莫名其妙地随军返回了中原。然而尔朱荣打败了这支北上的军队，杨忠做了俘虏。因为身强体壮，杨忠被编入尔朱荣麾下独孤信的部队，继续当兵吃粮。北魏分裂后，杨忠追随独孤信西入关中，投入西魏权臣宇文泰的阵营。后来，独孤信的部队被派去收复东魏的荆州，结果一败涂地，独孤信、杨忠等人只好逃亡江南，这一游荡就是三年，直到被宇文泰交涉并接收回

北方。

宇文泰死后，遗命侄子宇文护辅佐年幼的儿子宇文觉执政。杨忠依然是宇文政权的铁杆将领，并因功受封为柱国、随国公（后改为隋国公）。杨忠一生历经了宇文泰（文帝）、宇文觉（孝闵帝）、宇文毓（明帝）、宇文邕（武帝）四朝，在北周天和三年（568）因病结束征战生涯，回到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杨忠生病，皇帝宇文邕和主政的宇文护亲自到杨家探望，授予杨忠帝国元勋的荣耀。几天后，杨忠死在家中。

《隋书》对杨忠的记载相当简单：“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

杨忠虽然死了，但他留下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杨坚（普六茹坚）。

大统七年（541）六月癸丑夜，杨坚出生在陕西冯翊的般若寺，母亲姓吕。当时，杨忠尚未发迹，乱世里养活一个孩子很难。杨忠很迷信，就把杨坚放在寺庙中，觉得这样可能会好养活一点，还给儿子取了个小名“那罗延”。那罗延是鲜卑语，原义是“金刚不坏”。杨坚果然无病无灾，在寺庙里生活了十二年。

等杨坚大富大贵以后，官方给杨坚的出身和出生造了很多“谣言”，像杨坚诞生的时刻“紫气充庭”，小时候头上长龙角，等等。得到杨坚本人肯定的一个“谣言”说杨坚出身于著名的弘农杨氏（中原地区的世族大家），是汉朝太尉杨震的第十四世孙。这样显赫的出身已经难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起码杨坚的父亲杨忠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出身带来的任何好处。杨忠奋斗一生，留给儿子最大的遗产就是“普六茹”的姓氏。

人一旦出名，是非就多，就很难被他人看清楚。当时的大学问家李德林后来专门写了《天命论》，吹捧杨坚的外貌说：“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钟鼓。手内有王文，及受九锡，王生文加点乃为主，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李德林将杨坚身上的特征和天命、日月等敏感事物联系在一起，极力论证杨坚的形象注定他必将成为皇帝。

实际上，杨坚因为遗传的关系，长得像杨忠一样威猛魁梧——我们看那一时期的雕塑，武将的形象大致如此。一代枭雄宇文泰看到杨坚后，感叹说这个孩子长得很好，不像是来自晋北那样的北方边镇。宇文毓即位后还曾经派遣善于相面的赵昭去观察杨坚，看他日后是否会成为奸雄。赵昭回来对宇文毓说：“杨坚不过是做柱国的料。”柱国类似于大将军，意思是说杨坚日后最高也就做到大将军，不会对北周的皇位造成威胁。但是一转身，赵昭就悄悄对杨坚说：“你以后肯定会登基做皇帝的，但是要先经历一场残酷的杀戮才能平定天下。”

杨坚十四岁的时候，得益于家庭的帮助进入政坛，在都城做了一名功曹。因为父亲的功勋，他在两年时间里就升到了骠骑大将军的高位。宇文毓即位时，他被晋封为大兴郡公。宇文邕登基后，不满二十岁的杨坚又被任命为随州刺史这样的实职。

天和元年（566），杨忠的好朋友、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把年仅十四岁的女儿独孤伽罗许配给杨坚，独孤伽罗就是日后著名的独孤皇后。两家联姻，关系更进一步。独孤信所代表的关陇势力站到了杨坚一边。顺便说一句，这个独孤信非常厉害，分别将三个女儿嫁给了周明帝宇文毓、杨坚和贵族李家。嫁入李家的那个女儿生前没有另外两个姊妹那般荣耀，但她生下了唐高祖李渊。

杨坚进入仕途之初，宇文护主政北周。宇文护不知为什么，看杨

坚特 别不顺眼，多次想加害他。他曾晋升杨坚的职位，想拉拢他为自己所用。 杨坚问父亲怎么办，杨忠只淡淡说了一句：“少说话多做事，要和权臣保持距离，要学会明哲保身。”杨坚照做了，宇文护也无计可施。不久，杨 忠病死，杨坚袭爵为隋国公。建德二年（573），不满宇文护的周武帝宇文邕聘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皇太子妃，给杨坚的地位上了一层保险。

杨忠死后四年，宇文邕诛杀了主政的宇文护，开始亲政。北周的前两任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无所作为，宇文邕却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北周在宇文邕的治理下，逐渐强大。他力排众议，御驾亲征，消灭了北齐王朝。从此，北周拥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

这时，齐王宇文宪劝宇文邕说：“普六茹坚有反相，不会甘心居于人下，应该早日除去这个祸害。”宇文邕说：“我只让他做到大将军，不会有事的。”话虽如此，宇文邕还是对相貌奇特、出身将门的杨坚产生了猜忌之心。内史王轨又劝宇文邕说：“皇太子不像是个好君主，而杨坚却有反相，恐怕日后……”宇文邕见有人说自己接班人的坏话，不高兴地说：“有天命在，能怎么办，能有什么事情？”

这段对话传到杨坚耳朵里，他不免心惊胆战起来。在宇文护主政时，杨坚就学会了韬光养晦，现在继续装出一副平庸木讷的样子，“苦练内功”。再加上雄才大略的宇文邕下不了铲除功臣、亲家的决心，所以尽管不断有人想打击杨坚，但杨氏家族、独孤家族的势力护卫着杨坚基本的地位，加上杨坚又是皇亲国戚，这些明枪暗箭始终不能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

吞并北齐的第二年（578），宇文邕在征讨突厥时暴病而亡，年仅三十五岁。

宇文邕在世时，挑选长子宇文赟作为接班人。他对宇文赟的要求

非常严格，频繁施用体罚，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宇文邕严令太子的属官们每月写一份详细报告，禀明太子在这个月的所作所为。他还常常警告宇文赟：“从古至今，被废的太子数目不少，难道我别的儿子就不堪继任大统吗？”尽管更立太子的事情从来没有被提上日程，但宇文赟始终生活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里。宇文赟原本嗜酒好色，现在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癖好，坚持每天和大臣们一样，五六点钟就伫立于殿门外等待父皇早朝，即使是严寒酷暑也不例外，此外他还坚持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说话温文尔雅。因此宇文邕对宇文赟的表现大致还是满意的。

实际上，宇文赟是个杰出的演员。宇文邕在世时，宇文赟因为有父皇的严格管教，言行不仅正常，而且还多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像他这样登基之前规规矩矩、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太子，一旦老皇帝去世，没有人再拘束他们，他们就会坐在皇位上将天下闹得天翻地覆。

宇文邕早逝的那年，宇文赟刚好二十岁。父亲的棺材还摆放于宫中没有入殓，宇文赟就原形毕露。他不但丝毫没有悲伤之色，而且还抚摸着脚上的杖痕，恶狠狠地对着父亲的棺材大声叫骂：“死得太晚了！”此外宇文赟还将父亲的嫔妃、宫女都叫到面前，排队阅视，凡是长得漂亮、自己喜欢的都纳入后宫，毫不顾及人伦纲常。从此宇文赟开始了淫荡荒唐的执政生涯。

宇文赟不仅胡作非为，还有严重的虐待和暴力倾向。他喜欢把鸡倒悬在车上，听鸡的哀号。他喜欢打人，常常对大臣动粗，打起来不是一下两下地打，而是一百下两百下地打。宇文赟觉得谁有问题、有二心，就把当事人叫到面前来领“天杖”。所谓“天杖”，就是打板子（据说廷杖制度就是宇文赟发明的）。宇文赟喜怒无常，就连最得宠的嫔妃也常常无理地被殴打得遍体鳞伤。结果就造成了，所有人看到他，都重足而立，不敢呼吸。

周宣帝宇文赟在宝座上肆虐了九个月后，觉得做皇帝太麻烦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索性在大成元年（579）二月，才二十一岁的他就禅位给年仅七岁的儿子宇文阐（周静帝），做起了“太上皇”。从此他脱离了具体的事务，一门心思在胡作非为的道路上狂奔到底。禅位后的宇文赟主要通过刘昉、郑译两个人来上传下达，掌握实权。郑译、刘昉二人都是世家子弟出身，祖祖辈辈皆为大官。因为政治起点高，他们才能长期活动在宫廷中，又和宇文赟臭味相投，从小就和宇文赟厮混在一起，因此宇文赟将他们当作心腹。

这样的宫廷政治人物通常都轻浮奸诈，随性妄动。比如刘昉“性轻狡，有奸数”，“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因在宫廷中举止轻浮狂妄，刘昉也曾经受到罢免，但宇文赟离不开这样的角色，不久又任命他为大都督，迁小御正，让他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一起主持宫廷事务。郑译的情况也差不多，先是在宫中欢歌狎饮被宇文邕训斥，后来又擅自把修建皇宫的木材运回自己家造房子，被宇文赟削职为民。郑译虽然不成器，但很对宇文赟的脾胃，加上刘昉多次为郑译求情，宇文赟很快就将郑译叫到后宫中陪吃陪喝陪玩耍，还把郑译当作自己和外面的联络人。

至于岳父杨坚，既荒唐又专制的宇文赟对他早起了疑心。

表面上，宇文赟即位后，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升为皇后，国丈杨坚跟着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看似尊贵无比。实际上，杨坚在暴君宇文赟统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本来还想着女儿是皇后，比其他人多了一道护身符，想不到宇文赟废除了一帝一后制，又册立了四位皇后。这样，北周就同时有五位皇后了。五家外戚之间，难免产生矛盾。宇文赟每次都拿杨家出气，冲着杨坚的女儿大叫：“我一定要族诛了你们杨家！”他好几次召见杨坚，对左右卫士说：“如果一会杨坚在席上神色有所异常，就立即杀了他。”好在杨坚韬光养晦了几十年，已经修炼得稳若泰山了，不管宇文赟说什么，他都神色坦然，这才没有遇害。宇文赟既没有杨坚谋反野心的真凭实

据，又碍于他是自己的岳父大人，更难下决心除掉杨坚了。

那么杨坚到底有没有“不臣之心”呢？北周的时代是君臣相残、朝代更替的乱世，形势瞬息万变。要让一个人，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大臣，对某个王朝忠诚得死心塌地，是不太现实的事情。杨坚不是圣人，对北周王朝没有“愚忠”。他前脚刚从宇文赟的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后脚就对心腹说：“宇文赟这么乱搞，迟早要出事的！我看他的相貌，是个短命相，而各个宗室亲王又散居力弱，不久朝廷就会有大变乱了。”杨坚的这些话语，现实得惊人，哪里是一个“忠臣”应该说的话。

尽管杨坚对北周王朝怀有异心，但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是自己如何在暴君宇文赟手下保命。只有保住了性命和地位，才能谈宏伟蓝图。杨坚觉得不能和宇文赟硬碰硬，不如到地方上去任个实职，既避祸又实惠。于是杨坚就去找皇帝身边的红人、内史上大夫郑译帮忙。两人年轻的时候，是国子监的同窗，有些交情。一天，杨坚伺机把郑译拉到一个小巷里，偷偷拜托他说：“老同学，我的情况你也了解。我很想到外地藩镇任职。你现在是皇上的心腹，希望你帮着留意一下机会。”杨坚是想远离都城长安这个是非之地，找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避风头。郑译宽慰了杨坚几句，把这事满口应承了下来。他说：“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

巧了，不久之后，北周和南陈前方战事紧张，宇文赟想派遣郑译南征。郑译就说自己能力不够，请皇帝挑选一位将帅和他一起指挥打仗。宇文赟便问郑译是否有推荐的人选。郑译回答：“要平定江东，非懿戚重臣无法镇抚前方。皇上可让隋国公前行，担任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宇文赟对郑译一向信任，而且觉得将杨坚放到外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下诏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和郑译发兵会师寿阳，讨伐南陈。对此杨坚十分高兴，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南下。不想就在这个时候，杨坚的足疾犯了，他不得不在家养病，眼巴巴地盼望着双脚赶快康复，可以早日离开危险的漩涡。

这是大象二年（580）间的事情。

无名政变

北周大象二年五月乙未日，也就是580年6月4日，长安城里的隋国公府邸来了几个衣着光鲜亮丽的不速之客，指名道姓说有急事要见隋国公杨坚，而且只见杨坚一个人。杨坚家人有认识他们的，知道为首的是当今皇帝身边的宠臣——御正刘昉与内史郑译，便赶紧去通知杨坚。杨坚当时正患足疾，行动不便，听说现在红得发紫的两位近臣来找，赶忙出来相见。刘昉一点也不寒暄，马上把其他人都轰出去，接着附在杨坚的耳朵边说了几句话，立刻把杨坚吓得差点瘫倒在地上。

刘昉说：“太上皇刚才把我和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叫进卧室，想对我们俩托付后事，可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看太上皇驾崩，就在这一时半会了。我和郑译郑大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引你进宫主持大事。”

原来宇文赟游戏过度，纵酒荒淫，病得越来越重，呈现出“龙驭归天”的趋势。皇帝的死意味着一场新的权力争夺的开始，谁都想在其中捞上一把。即使什么也捞不着，也不能让自己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深受宇文赟信任的两个近臣——内史上大夫郑译和御正下大夫刘昉——尤其紧张。近臣的权力完全得益于他们和皇帝走得近，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近臣的权力基础是最脆弱的，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就会用自己的亲近之人来替代老皇帝身边的人。

郑译和刘昉眼看着宇文赟气若游丝，心里十分着急。如何才能保住已有的权位，或者再前进一步呢？二人一合计，新皇帝宇文阐年幼无知，如果要想保持富贵荣华，必须与新的主政人搞好关系。其中最

简单的方法就是扶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大臣主持朝政。他们思索一番，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个名字——杨坚。一来，杨坚是皇亲国戚、群臣之首；二来，杨坚是两人共同的朋友，关系不错。

那一边，宇文赟快不行了，召刘昉和颜之仪进了卧室。宇文赟当时基本上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示意两人照顾好儿子宇文阐。刘昉出来，赶紧找到郑译，说关键时刻到了，接着两个人便一起上门找了杨坚。

这是赤裸裸地招呼杨坚一起搞政变啊！事发突然，杨坚也难免产生了很多疑问，他不仅觉得刘昉、郑译等人的建议非常不靠谱，而且还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门之灾。当场，他吓得差点瘫倒在地。

事实上，杨坚有如此大的反应，并不奇怪。

杨坚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政治斗争接二连三，几乎一年一小政变，三年一大政变，每次都血流成河，王公大臣早上出门，晚上不一定能回来。政治人物都养成了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习惯。杨坚因为种种原因，屡遭猜忌。《隋书》用“深自晦匿”来形容杨坚早年的经历，也就是深深地把自己的欲望和观点隐藏起来，用一双警惕的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多年在刀尖上行走，让杨坚养成了稳重又敏感多疑的性格。

为了避祸，杨坚曾一心想要离开长安，前段时间刚找了郑译，请他帮忙“运作”了一个扬州总管的职位。就在杨坚的心已经飞到扬州的时候，刘昉、郑译告诉他，宇文赟要死了，而且两个人还要把他推到前台去当首领，发动政变。这完全出乎杨坚的预料，彻彻底底要颠覆杨坚之前的行事风格。他在脑海中把往事一幕幕都过了一遍，又把现在的形势一点点梳理了一遍，再结合自己的情况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地思考了一遍，犹豫良久，才对刘昉等人说：“诸位，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刘昉着急了，他撂下了一句狠话，一下子改变了杨坚的想法。《隋书》记下了这句话：“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刘昉的意思是：“宫廷政变这种事情，你如果要干，就别犹豫，立刻动手；如果你不想干，我就自己上了。”刘昉在政变这件事情上，态度是很坚决的，一门心思要政变夺权。杨坚深埋在心底的权力欲望，被这句话激发出来了。他不甘心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不愿意一辈子都韬光养晦。金子总是想证明自己的光亮。所以杨坚态度突变，答应刘昉、郑译等人，带头发动政变。

杨坚跟着刘昉、郑译跑到宫里面去。刚进宫门，还处于迷糊状态的杨坚迎面碰到了术士来和。杨坚赶紧问：“我此行有无灾障？”来和并不知道宇文赟快要咽气了，但浸染在宫廷之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杨坚一伙人匆匆忙忙闯进宫廷之中，肯定没什么好事。来和是个明白人，不想得罪任何人，忙拱手向杨坚祝贺说：“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就这么一句随口而出的奉承话让杨坚信心倍增，立马冷静了下来。

杨坚以“侍疾”的名义，进入深宫。他见到了图谋政变的所有同党，也就是刘昉、郑译、杨惠、皇甫绩、柳裘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且大家都是宫廷官员，既不掌握军队，在百官当中也没有威望。他们所谓的政变计划，就是等周宣帝宇文赟死后，假传诏书，让杨坚统领天下兵马，掌握实权。杨坚觉得这样的政变太过儿戏，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反抗，成功的概率不大。所以他又有些打退堂鼓了。

当时，刘昉、郑译等人已经开始草拟宇文赟的“遗诏”，见杨坚态度不坚定，御饰大夫（掌管皇帝御用饰物的官员）柳裘对他说：“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柳裘的意思是说，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不善加把握，反而会遭到祸害。杨坚再犹豫不决，后悔就来不及了。从

杨坚进宫那一刻开始，政变就像射出去的箭、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杨坚的妻子独孤伽罗也在丈夫入宫后派人送来口信说：“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独孤伽罗说的也是柳裘的意思，鼓励丈夫政变到底。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独孤伽罗在杨坚的生命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杨坚非常依赖妻子。关键时刻，妻子的鼓励坚定了杨坚政变到底的决心。

刘昉、郑译拟定了一份诏书，要让杨坚总督军队、主持朝政。诏书拟好了，他们找另一个接受宇文赟托付的大臣、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会签。颜之仪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拒绝签署，还义正词严地呵斥杨坚等人：“皇上驾崩，嗣子年幼，辅助朝政的重任理应由宗室大臣承担。公等备受朝恩，应当尽忠报国，怎么能将国家交给他人呢！我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刘昉看颜之仪的态度很坚决，就不再搭理他，代他在诏书上签了字。

那一边，周宣帝宇文赟结束了荒唐的一生。郑译马上宣布所谓的“遗诏”，杨坚受顾命辅佐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文武百官皆受杨坚节度。同时在另外一边，颜之仪也联合一部分宦官，发起了另外一场政变。他们引导北周宗室、大将军宇文仲进宫，准备推举宇文仲辅政。宇文仲抢先进入大殿，都走到龙椅前面了。眼看胜利的果实要被抢走，郑译连忙带着刘昉、杨惠、皇甫绩、柳裘等人冲进来。宇文仲与颜之仪见了郑译等人，很惊愕，在关键时刻犹豫起来。郑译等人和他们理论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宇文仲的心理素质不如杨坚，在这个节骨眼上打起了退堂鼓，想跑出宫去。

看来，宇文仲、颜之仪等人成不了大气候。他们还以为政变是请客吃饭，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结果杨坚以大义凛然的形象出场了，轻易就将宇文仲、颜之仪等人捉了起来，拉下去补上政治理论课了。

杨坚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女儿、皇太后杨丽华。杨丽华不

明就里，在重大关头自然是站在父亲一边。杨坚等人说宇文赟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了杨坚，杨丽华也就信了，按照刘昉、郑译的意思传令，任命隋国公为大丞相，总督全国军事。皇太后的命令，给杨坚等人的政变蒙上了一丝合法的色彩。杨坚赶紧利用太后命令和假诏书夺取了京城部队的指挥权，稳定了政局。

稳住阵脚后，杨坚、刘昉、郑译三人开始瓜分权力了。大家打算由杨坚出任大冢宰，郑译做大司马，刘昉当小冢宰。大冢宰地位崇高，但没有实权，而大司马掌握军队，小冢宰管理司法，地位低于大冢宰，却有实权。

当时担任御正下大夫的李德林，亲近杨坚。李德林听说初步安排后，连忙把杨坚拉出去说：“杨公您应该做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否则无以号令大众。”杨坚猛然醒悟，政变初步成功了，自己为何还要和刘昉、郑译两个人平分权力呢？于是，杨坚单独以诏书的形式宣布以汉王宇文赟（宇文赟的弟弟）为右大丞相，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节制百官。郑译被任命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司马。

郑译、刘昉两人大吃一惊。他们冒险政变，本来想与杨坚共享富贵，谁料尘埃尚未落定，自己先成了人家的僚属。这同室操戈也来得太快了点吧？可是杨坚的权柄和优势地位是他们捧上去的，杨坚又给予了无数的赏赐作为补偿，郑、刘二人不得不接受现实。

杨坚计划把东宫（正阳宫）作为自己的执政府，命令百官来此议事。政变刚刚发生，文武百官基本上都处于观望状态。杨坚就命令司武上士卢贲，带上官兵，召见公卿说：“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大臣们还是窃窃私语，有的还想开溜，但卢贲指挥官兵把百官都看管起来，官员们便不敢动了，乖乖跟着卢贲前往东宫。到了东宫，宫中的

太监反而不让大家进去。卢贲睁大双眼、破口大骂，看守太监害怕了，这才打开宫门。朝廷的衮衮诸公，都是识时务的俊杰，纷纷赶到东宫，祝贺杨坚荣升丞相。

为了防备掌握实权的宇文氏藩王发难，杨坚命令封锁皇帝的死讯，秘不发丧，用宇文赟的名义宣布将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嫁给北方的突厥人“和亲”，征召北周宗室诸王入长安。在外地的宇文家族诸位亲王接到诏书，纷纷赶往京城，离开了地方和军队。预计宇文诸王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杨坚这才公开皇帝的死讯，抛出了一份“遗诏”。遗诏宣布由杨坚总管朝政，辅佐他的外孙、八岁的小皇帝宇文阐。不久，宇文家的各位王爷陆续抵京，都被通知留在京城中料理先帝的丧事。

杨坚的这场宫廷政变，至此才算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杨坚下一步就要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刘昉、郑译两人虽然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但能力和名声都不行；李德林忠心，却是一介文人，缺乏政治手腕。杨坚正为缺少得力的干将发愁，突然想起一个人才——高颎。

高颎这个人精明能干，文韬武略，是典型的军师人选。高颎不仅有才，而且和杨家的关系非常密切。高颎的父亲高宾曾是北齐的大臣，后来逃到北周避祸，做了杨坚的岳父独孤信的僚佐，跟着主子姓了独孤氏。后来，独孤信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家属流放他乡。高颎依然和独孤家族保持联络。杨坚的妻子独孤伽罗因为双方父亲的这层关系，和高颎常有交往。因此，杨、高二人始终保持着联络。杨坚政变上台掌权后，邀请高颎来协助自己。当时高颎说了一句话，让杨坚感动万分。这句话进一步加深了高颎和杨家的关系，开启了高颎日后二十年的荣华富贵。

高颎接到杨坚的邀请后，欣然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

当时杨坚的地位还很不稳固，前途不明，高颍却把自己跟杨坚牢牢捆绑在了一起，甚至做好灭族的打算，也要协助杨坚。杨坚立即提拔高颍为相府司录，从此，高颍成了杨坚的谋主和心腹，而郑译、刘昉等人很快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杨坚疏远。

这场政变，在历史上没有专门的名字，我们姑且称之为“无名政变”。应该说，这是一场非常仓促的临时性政变。别人搞政变，怎么也得准备三五个月，长的甚至精心准备了一两年。杨坚的政变，完全是刘昉、郑译等宫廷近臣临时起意，拉着杨坚就发动了起来。杨坚的胜利来得非常侥幸。如果不是刘昉、郑译两人之前和杨坚有交情，关系不错，再加上杨坚当时地位显赫，这样的好事不会落在他的头上。此外，当时的文武百官是出于身家性命的安全考虑，被迫承认了政变的客观事实，并不是真心拥护杨坚。还有很多人可能是觉得之前周宣帝宇文赟残暴荒唐，在他的统治下完全没有安全感，现在换一个杨坚，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大家都迫于形势，暂时听命于杨坚。

杨坚刚掌权的时候，老同学元谐就告诫他说：“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元谐一针见血地指出，杨坚缺乏强大的势力作为基础，既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又没有自己的政治派系。刘昉、郑译等人都是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推举杨坚来搞政变的，所以杨坚的处境其实很危险，仿佛是面对洪水的一堵土墙，随时可能垮台。

杨坚对自己的实力和眼前的形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客观上，他一上台就面临着北周宗室和地方实权人物的强烈反对。杨坚先是引诱地方上的宇文氏藩王到长安，解除他们的实权，接着调兵遣将扑灭了中原、四川等地起兵讨伐他的藩镇势力，再加上封官赏赐，拉拢了观望的中间派，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地位稳固下来。

权臣之路

杨坚独揽大权，凭的主要是个人高贵的出身和崇高的地位，同时撞上了大运，被刘昉、郑译推了一把，登上了权臣的宝座。

但是出身高贵、地位崇高的人很多，有的人先天条件就比杨坚要好得多。比如汉王宇文赞（当时刚去世的宇文赞的弟弟）——之前在朝廷中和杨坚的地位不相上下，如今名义上是右大丞相，地位比杨坚还高那么一点。宇文赞的存在不仅使杨坚不能完全施展拳脚，而且也很容易成为政敌利用的棋子，对杨坚有潜在威胁。

宇文赞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对付这样的小伙子，刘昉很有办法。他搜罗了许多美女献给宇文赞。宇文赞高兴地接受了美女，对刘昉也亲近起来。刘昉和宇文赞熟悉之后，就劝说宇文赞：“大王您是先帝的亲弟弟，众望所归。现在是孺子当国，怎么能够承担军国大事呢！如今先帝刚刚驾崩，人心尚未稳固。大王不如先退回宅第，等局势安定后再出来主政，还可能入宫做天子。这才是万全之计啊。”宇文赞实在是太年轻了，缺乏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听刘昉这么一说，竟然觉得非常有道理，从此深居简出，不与杨坚争夺权力了。杨坚高兴地拜刘昉为下大将军，封黄国公。

宇文赞傻乎乎地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其他成年的王爷们可不这么想，对杨坚窃取宇文家族的王朝大权恨得咬牙切齿。这样的王爷主要有五位，分别是：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逖。他们是当今皇上宇文阐的叔祖父、汉王宇文赞的叔父，经验丰富，可不像宇文赞那样容易欺骗。杨坚当初就怕这五位王爷联合起兵反对自己，所以利用假诏书将五王都召回长安，剥夺

了他们的实权和军队。五王在杨坚辅政后，都很不服气。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实权，无法与杨坚抗衡了，所以五个人便通过雍州牧、毕王宇文贤秘密联系外藩将领起兵。

外藩的许多将领对杨坚独揽大权也愤愤不平。他们当中许多人也都是世家大族出身，同样是皇亲国戚，而且还握有地方实权。在这些将领中，相州总管尉迟迥的怨气最大。尉迟迥是北周的重臣宿将，母亲是宇文家的公主，本人镇守原来北齐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境内），兵精粮足。杨坚非常担心尉迟迥起兵反对自己，就用给宇文赟办葬礼的名义，召尉迟迥入朝。尉迟迥是宇文家的外甥，来给老皇帝操办葬礼是理所应当的。另一边，杨坚任命了年逾古稀的老将军韦孝宽为新的相州总管，赶赴邺城取代尉迟迥。

尉迟迥被逼上绝路了，不得不在东方起兵造反。他起兵的理由是为北周王朝铲除奸臣（杨坚），支持他的却是一些北齐王朝的遗老遗少——可见北周虽然灭亡北齐、统一了北方，但北方并没有真正融合。北齐残余力量没有死心，尉迟迥的起兵带有明显的割据争霸的性质。一时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出现骚动。十几天时间里，尉迟迥聚集了近十万反对力量。此外，宇文胄在荥州、石琚在建州、席毗在沛郡、席叉罗在兖州响应尉迟迥。尉迟迥还派遣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向南方的陈国请求援兵。

刚好韦孝宽还在赴任途中，杨坚便改任他为行军元帅，继续赶赴邺城，去讨伐尉迟迥。在这次讨伐行动中，许多年轻将领脱颖而出，成了日后的政坛主角，比如宇文述和杨素。

韦孝宽进军到沁水的时候，沁水暴涨，只好隔水与尉迟迥的大军对峙。尉迟迥在东岸布阵二十余里，声势浩大。杨坚担心前线战事不利，要派一个心腹去当监军，以鼓舞官兵的士气。他先让刘昉去当监军，刘昉赶紧推说自己从来没带过军队，完成不了任务；杨坚又让郑译去前线监军平叛，郑译马上说自己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母需要照

顾，离不开身。杨坚笑了。他本来就知道刘昉、郑译是什么货色，根本就没真心打算让他们去做监军。从始至终，杨坚属意的人都是高颎。于是，平地一声雷，高颎没当几天丞相属官，又被提拔为北周大军的监军。

高颎到达前线后，催促官兵在沁水上架桥，准备发起进攻。尉迟迥盘算着，等韦孝宽率领一半的军队渡过河的时候，就发动突然袭击，把北周军队消灭在河滩上。没料到，韦孝宽率军擂鼓齐进，迅速渡过河去，同时高颎马上下令焚桥，逼迫全军背水一战。结果，韦孝宽的军队奋力猛攻，尉迟迥的军队大败而逃。

在战斗中，宇文述冲锋陷阵，俘虏了大量敌军。宇文述的祖先原本是鲜卑族宇文家的奴仆，后来随主人姓了宇文氏。他的父亲宇文盛，因为战功位列北周的上柱国。宇文述的性格“恭谨沉密”，打仗勇猛，一战成名。

尉迟迥大败后，韦孝宽分兵去讨伐响应尉迟迥叛乱的荊州刺史宇文胄。大将杨素领兵，很快就击败了宇文胄。杨素也是个狠角色，每次打仗前总能挑出犯错的部下进行杀戮，有时多达上百人，而营帐里流血满地，杨素仍能谈笑自若；打仗的时候，杨素还会先派一二百人冲锋，如果能冲破敌人的阵营就重赏，如果冲不破就全部斩首示众。一般人会以为杨素是一个凶猛嗜血的莽将，其实杨素最初是以文字才华进入官场的。

杨素生于西魏大统十年（544），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人，好学善文。他才是“真正的”弘农杨氏后裔。周武帝宇文邕曾授意他起草一份诏书，杨素不假思索，当场写成。宇文邕看后非常满意，拍拍杨素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日后不愁没有富贵。”杨素却很狂妄，竟然回答说：“皇上，我无心追逐富贵，将来只怕富贵来追我！”之后，杨素参加攻灭北齐之战，屡立战功，依附杨坚的时候，官职是汴州刺史。

杨坚自诩出身高贵的弘农杨家，八成是冒充的，而杨素才是根正苗红的弘农杨家出身。杨坚因为大话放了出去，收不回来了，日后只能认杨素做了远房亲戚。

正是有宇文述、杨素这样的年轻一代的勇猛将士，垂垂老矣的韦孝宽才能很快就把尉迟迥的首级送到长安，而参与骚乱的余党也陆续被镇压了。大象二年（580）十月，韦孝宽凯旋回京，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长安去世，时年七十二岁。

尉迟迥作乱的时候，郢州总管司马消难割据本州响应，淮南的很多州县都参与了叛乱。不久，司马消难被打败，逃往南陈。荆郢一带乘机作乱的人民，也遭到了镇压。事后查明，这场骚乱有毕王宇文贤和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在幕后阴谋作乱的影子。杨坚只是捉拿宇文贤处斩，宽恕了赵王等五个人的罪过，还下诏给予在长安的五位王爷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以安定人心。

镇守四川地区的上柱国、益州总管王谦也是个野心家。他看到幼主在位，杨坚辅政，就以清除权臣、匡复朝廷为借口，发动巴蜀的军队作乱。杨坚最初因为关东和荆州一带的骚乱分了精力，没有马上讨伐四川。王谦屯兵剑阁，攻城略地，搞得挺精彩。杨坚缓过来以后，马上命令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讨伐王谦。很快，王谦的首级就被送到了长安。杨坚看到巴蜀阻险，常常发生叛乱，于是开辟平道，毁掉剑阁险要，防止再次动乱。

不满杨坚的实权人物被先后镇压，其他大臣对杨坚的态度温和了许多。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是占据山西地区的实权人物，尉迟迥造反的时候想拉拢他一起干。李穆不仅没答应，还发兵协助杨坚攻打尉迟迥。胜利后，李穆说自己年纪大了，主动退休到长安来养老，不久死在了长安。临死前，李穆偷偷给杨坚上表，劝杨坚当皇帝。

再说梁睿，他平定四川后，接替王谦做了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的地

头蛇，可他不去想怎么割据巴蜀，怎么当好地头蛇，整天都在想怎么消除杨坚对自己的猜忌和怀疑。后来他想出来一个方法，终日享受作乐，摆出一副烂泥样，让杨坚相信自己没有二心。当然了，梁睿也上了一道奏章，劝杨坚当皇帝。

眼看杨坚的地位越来越巩固，被困在长安的周室诸王急火攻心。

现在的江山还姓宇文，宇文家的人怎么能不在乎？他们也不闲着，由赵王宇文招牵头，在赵王府摆下鸿门宴邀请杨坚参加，准备除掉杨坚。

五位王爷的面子杨坚还是要给的，加上杨坚也想看看这五位王爷想做什么，所以就去赵王府赴宴了。事先，杨坚也怕被人下毒，所以就自带酒水去了赵王府。

赵王宇文招在寝室招待杨坚，让两个儿子和小舅子等人在左右佩刀环立。同时宇文招在帷席之间暗藏兵器，又在其他房间埋伏了武士，只等找个机会把杨坚给剁成肉酱。杨坚虽然大权在握，但还是大臣。按照规矩，大臣去拜见王爷，是不能带着卫士的。所以杨坚赴宴的时候只带了堂弟杨弘和亲信元胄两个人一同前往，他们名义上是“陪客”，实际上是保镖。

宇文招也不傻，根本就没让元胄和杨弘进入寝室，只允许他们在室外待着。

寝室内的这场饭局，进行得惊心动魄。宇文招亲自拿起佩刀给杨坚切瓜，切好后再用水果刀插瓜递到杨坚面前。杨坚不好拒绝，接过瓜吃了起来。这一连递了好几回，杨坚就吃了好几回。宇文招心想：是时候了，下一回递瓜的时候，直接把刀捅进杨坚的心窝！

门口的元胄看情况不对，冲入室内对杨坚喊：“相府有事，杨公

不可久留！”

宇文招正想把刀捅过去，结果被元胄一声大喊吓了一跳，硬生生把刀给收了回来。他火冒三丈，斥责元胄道：“我和丞相说话，你是什么东西？”

一旁的人也跟着呵斥道：“退下，退下！”

元胄愤怒地瞪大眼睛，鼻子像野兽一样哼出怒气，右手握住刀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宇文招一看这是个拼命三郎，只好放缓语气说：“将军不必多心，我们在此欢饮而已。”说完，宇文招赐酒给元胄喝，但元胄站着不喝。宇文招眉头一皱，装出醉酒恶心要呕吐的样子，起身就要进入后阁。后阁埋伏着许多士兵，宇文招想去叫人进屋来杀死杨坚和元胄。元胄机警得很，猛地上前扶住宇文招，一把将他按坐在席上。宇文招想起身逃走，但力气小，走不了，结果被元胄给劫持住了。宇文招又说自己口干，请元胄去厨房拿点水来，但元胄才不中这么低级的诡计呢，扶着宇文招立于原地不动。

杨坚等人见此，都不知如何是好。正僵持间，外面高声禀告：滕王宇文逌前来“拜访”。

杨坚依礼走出寝室去迎候滕王。乘此机会，元胄放过宇文招，跟着出去。他附在杨坚耳边说：“这里很古怪，丞相请马上离开！”杨坚何尝不想离开，可新来的滕王宇文逌非常客气地拉住他要“再喝几杯”，他只好回到寝室接着“欢饮”。

趁杨坚与滕王寒暄之时，重获自由的宇文招已经示意各处理伏的卫士准备动手了。跟在杨坚后面的元胄听见其他房间有刀剑相碰和盔甲摩擦的声音，顾不上礼仪，冲到杨坚跟前拉着他就走，边走边说：“相府有紧急公务，杨公必须马上离开！”杨坚紧随元胄，慌忙向

大门口奔去。

宇文招见状不妙，操起刀子就向门口扑去。眼看杨坚就要迈出大门，宇文招的刀子闪在杨坚后心了，元胄突然拦住宇文招，用身体挡住大门，说：“赵王太客气了，无须相送。”

在元胄的拼力保护下，杨坚捡了一条命，一路小跑，逃回了丞相府。回去之后，杨坚也不客气，给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安上了“谋反”的罪名，将他们诛杀了。而元胄因为护卫有功，得到了重赏。不过，元胄是个莽夫，勇气可嘉，但“不讲政治”，在杨坚晚年时掺和皇帝家事，在杨广统治时期又口无遮拦，惹是生非，不仅没能参与核心朝政，最后还被满门抄斩。

经过这次未遂暗杀，杨坚也不把野心藏着掖着了，加强了对政权的控制，抓紧准备篡位的工作。大象二年（580）九月，杨坚操控的北周朝廷封杨坚长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同月，宇文阍下诏褒奖“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杨坚道德高尚，能力出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对朝廷功勋卓著。诏书罢免了左、右丞相的官制，任命杨坚为唯一的大丞相。十月，宇文阍又追封杨坚的曾祖父杨烈为柱国、太保、都督徐兖等十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隋国公，上谥号“康”；祖父杨祯为柱国、太傅、都督陕蒲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隋国公，上谥号“献”；父亲杨忠为上柱国、太师、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诸军事、雍州牧。在完成对杨氏家族的世系追封后，杨坚同月诛杀陈王宇文纯，翌月诛杀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

十二月，北周授杨坚相国，总百揆，去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之号，进公爵为王，位在诸侯王之上。隋王杨坚可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绿绶等象征物。北周以中原各州二十郡为隋国，隋国置丞相等上下官员。对此殊荣，杨坚一再推让，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于是，朝野掀起庞大的对

杨坚的歌颂浪潮，恭请他接受恩赏。最后杨坚不得不接受王位，但他只要了中原的十个郡作为封地。之后，北周下诏晋封杨氏各位先祖为王，各位夫人为王妃。

现在，连傻子都知道杨坚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了。

庆云罩长安

杨坚冲刺皇位的道路，并非全部是从阴谋走向诡计，从杀戮走向杀戮的简单重复，他确实的确做出了许多成绩。

这还要归功于荒唐皇帝宇文赟把国家治理得太差了，留给杨坚一个很糟糕的参照物。杨坚只要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相比较之下，就成了“丰功伟绩”。宇文赟在世的时候，刑罚很重，动不动就杀人灭族。杨坚上台后，更改了法律，刑罚大为宽松，立即赢得了一片好评。

更为重要的是，杨坚提高了汉人的地位。西晋分崩离析之后，北方出现的各个王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执政者实行民族隔阂政策，汉人地位低下，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进入权力核心。当杨坚掌权后，他带头改回汉姓，又下令：“以前赐姓，皆复其旧。”至于语言、风俗，完全听任百姓自由。同时，他罢黜了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贵族人员，又提拔智士干才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这不仅遏止了半个多世纪的鲜卑化趋势，而且也意味着长期处于政治劣势的汉人能够真正进入政坛。杨坚很快打下了扎实的民意基础。

大定元年（581）二月初，杨坚接受了九锡之礼。之后，宇文阐又下诏允许杨坚从穿戴到出巡，都享受皇帝的标准，在形式上与皇帝无异。在杨坚心安理得地向皇位靠拢后，宇文阐又下诏承认周德将尽，天命从宇文家转移到了杨家，自己要把皇帝宝座禅让给杨坚。按照禅让的“规矩”，杨坚要再三退让，谦虚一下，同时宇文阐要派遣一批又一批的高官显贵去敦请杨坚接受帝位。于是，朝廷百官纷纷劝进，恭请杨坚顺应上天和百姓的意愿，登基称帝。最后演完了，杨坚

才“勉为其难”地“顺应民意”，去当皇帝。

二月甲子，杨坚在众人的簇拥下，从相国府穿着平常的衣服入宫。在临光殿，宇文闾恭敬地将皇位禅让给杨坚，随后，杨坚更衣即皇帝位。朝廷在长安南郊设祭坛，杨坚派人柴燎告天，向天帝奏报杨坚做了地上的皇帝。因为杨家的爵位是隋王，杨坚依惯例将新王朝定名为“隋”。同日，杨坚上告太庙，改年号“大定”为“开皇”，并大赦天下，变更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时期的汉族旧官制。这就是改朝换代，事情很多，很琐碎。好在南北朝时期改朝换代的事情多了，许多大臣经历了不止一次改朝换代，有经验，有准备，而且朝廷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一切操作起来忙中有序。在接下去的几天，杨坚追尊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长子杨勇为皇太子；以高颍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苏威为吏部尚书兼纳言，李德林为内史令。

在杨坚组织的执政团队中，高颍、苏威和李德林都是一时名士。李德林跟随杨坚的时间最长，应该是最有前途的。可惜他反对铲除北周的宇文诸王，杨坚骂他为书生，不是合格的为官者。因此，李德林升迁缓慢。尽管他从理论上论证了杨坚篡位的“合法性”，将隋朝的建立和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可惜杨坚“外儒内法”，只是将儒家说教作为工具而已，所以并不重视李德林。开皇十九年（599），李德林死在了地方刺史任上。

高颍成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晋封渤海郡公，论地位，朝臣无人能比。杨坚亲昵地称呼高颍为独孤而不叫他的名字，引为首辅。高颍很清醒，知道位高权重并不是好事，会招致同僚的嫉恨，所以奏请将首辅的位子让给苏威。苏威出身世代官僚家庭，苏家在百官中声望很高，苏威的父亲苏绰还是北周政治的设计者。杨坚同意了，准备让苏威接任仆射。几日后，杨坚还是离不开高颍，觉得高颍主动推贤，品德高尚，不仅没让他退位，还给他加了一个左卫大将军的兼职。在这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颍忠心辅佐杨坚，为隋朝在政治、经

济、军事各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隋朝就此正式建立了。从220年曹丕推翻汉朝建立曹魏以来，中国已经分裂了三百六十一年了；如果将黄巾起义爆发作为乱世开始的标志，那么中国已经混乱了将近四百年了。

这一年，杨坚四十岁，历史因为他翻开了新的一页。

《隋书》记载禅让当天，京师长安出现了祥云。全国各地祥瑞频频，喜庆得很。高平飞来了赤雀，太原捕获了苍乌，白雀降临了长安。这些传说中的神鸟非常及时地在杨坚建立新朝的时候出现了，加入到歌功颂德的行列中。长安宣仁门的一对槐树连理，枝条长得蔚为壮观。长安附近的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也献上了一对连理树，被移植到宫廷中。此外，还有白天出现太白星之类的神奇纪录。太常则将朝廷庞大的乐队解散了，放出乐手们，让他们去做普通百姓。

客观地说，这些眼花缭乱的祥瑞，有一部分属于拍马屁，但也不能排除许多人真心的赞美和拥戴。杨坚毕竟出手不凡，给人印象深刻。

再回到周静帝宇文阐，他退位时还只是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

杨坚封宇文阐为介国公，食邑五千户，待之以隋朝宾客之礼。介国公的旌旗、车服、礼乐，一应照旧，按照皇帝的标准配给。宇文阐上书可以不称表，答表可以不称诏。北周的宇文诸王也都降封为公爵——实际上遭到了屠杀。三个月后，介国公也死了。

《隋书》对这位小皇帝退位后的生活只记载了两句话：

辛丑，陈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琰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禅，致之介

国。

辛未，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以其族人洛嗣焉。

前一句话透露了介国公的死因。南陈事先不知道北周禅让的确切时间，派遣散骑常侍韦鼎、王瑳出使北周。两位使节到达长安的时候，北周已经不存在了，隋朝刚刚建立。韦鼎和王瑳二人也够死脑筋的，觉得自己是出使北周王朝的，现在也理当去见介国公。于是这两个人就去拜见宇文阐，当作完成使命。宇文阐不过是个孩童，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没有向杨坚汇报就接见了南陈皇帝派来的使团。杨坚对这件事极为震怒。没几天，宇文阐就死在家中，年仅九岁。随后，杨坚在朝堂上为宇文阐举哀。因为宇文阐没有子嗣，隋朝在宇文家族后人中找人延续了宇文阐这一脉。

对照《周书》对宇文阐最后生活的描述，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内容。《周书》承认宇文阐当介国公的食邑是一万户，但是一切都是空头支票。宇文阐空有公爵之位，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待遇。“隋开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时年九岁，隋志也。”在这里，《周书》表现得非常有意思。它按照《隋书》的口径转载了介国公的死，但加了个小尾巴“隋志也”，意思是说，这是隋朝官方的说法，《周书》没有做考证，也不敢对真实情况进行调查。于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介国公宇文阐是被自己的外公杨坚杀死的。

杨坚的女儿杨丽华是北周的皇太后。杨丽华知道父亲篡位的企图后，内心愤愤不平，可一介女流无力阻止。杨坚称帝后，封女儿杨丽华为乐平公主，并逼她改嫁。杨丽华誓死不从，杨坚也不好死逼。后来，杨丽华随隋朝第二代皇帝杨广巡游河西，途中病死张掖。

隋朝的都城是西汉旧都长安城，但杨坚觉得长安在战乱中破败了，不适合做一个伟大的新王朝的首都，决心在旧长安的东南方修建

一座新城。

杨坚挖掘了一个杰出的设计和建筑人才——宇文恺来负责修建新都。高颎担任监工，宇文恺负责具体施工。他们征发民工，夜以继日地修建了一座长方形的新城。

新的长安城是从图纸上走下来的，经过了严密的规划。城区按照职能分成三个：皇城位于中央偏北的地方，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皇城南面是行政区域，道旁分布着朝廷各官署；其他是居民区和市场。

宇文恺创造出了“里坊制”：南北向大街和东西向大街纵横交错，把全城分为一百一十个方块，形成网格格局。每个方块称为一“里”，交通方便，布局严整，而“坊”是市场区。这种前所未有的设计，为以后各朝代的城市规划所沿用，到现在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有人将这座新城称为“世界第一城”，因为它奠定了城市分区和街区制度，日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也传播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对都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高大的城墙拔地而起，建筑的脚手架还在工地上时，杨坚就迫不及待地迁入了新城。宇文恺不得不先把皇宫建筑装修完毕，当时是开皇三年（583）的春天。

杨坚搬入新城的时候，眼前的城市宏伟壮丽，却空空荡荡，缺少人烟。这就好像当时的隋朝一样，百废待兴。

于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杨坚不停搬迁机构和招揽人口充实新的都城。他是宗教的慷慨资助者，把黄金地段留给京师佛道寺观，南北大街的东面有整整一个坊都是大兴善寺，而它的对面是道教的玄都观。杨坚鼓励人们出资建造佛寺和道观，对那些资助建造的商人赐御制的牌匾。二十年以后，整座城市里有一百多座佛寺和道观。除了兴建宗教建筑，杨坚还命令皇亲国戚、达官显臣带头把府邸搬到新城。

消灭了南陈后，杨坚又将南方的精英共十几万人迁到了新都城之中。但新的都城占地数十平方公里，实在太大了，直到隋朝灭亡的时候，新长安城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荒无人烟，既定工程也尚未竣工。

尽管如此，杨坚在新城里的感觉异常良好。杨坚年少的时候曾被北周王朝封为大兴郡公，所以用封地的名字命名新都城为大兴城。大兴，大大的兴旺，很对一个崭新的王朝的胃口。

第二章 转瞬而成的统一

隔江犹唱后庭花

杨坚在北方当上隋朝的皇帝时，陈叔宝是南方陈朝的皇帝。

陈叔宝对篡位的杨坚很感兴趣，很想看看这个枭雄的长相。别人都说杨坚“貌异世人”，陈叔宝就更好奇了，安排一个画师作为出使隋朝的副使，任务是把杨坚的相貌画下来。陈叔宝这才看到了杨坚的画像。然而，他竟吓得面色苍白，语无伦次地喊道：“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

陈叔宝是南方人，还是一个在深宫中被纤纤玉手抚养大的皇帝。他可能是被杨坚那魁梧、凶猛的北方大汉形象吓到了，也可能是被杨坚身上透露出来的凶悍、干练的气质吓到了。他隐约感觉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克星。

不管怎样，陈叔宝最初的皇帝生活过得非常精彩，每天仿佛都在天堂里面。

陈叔宝还是个很不错的文学青年，在诗歌、音乐等方面造诣颇深。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宫体诗歌《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整首歌词写得非常瑰丽，一点乱世的背景色调都没有。陈叔宝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文人想象力，建筑了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整天和妃嫔、狎客们在其中游宴，赋诗赠答。每次宴会开始的时候，妃嫔、近臣和狎客们交杂而坐，饮酒作乐。陈叔宝是文人，在座的也都是文人，对着美景美酒，便喜欢当场写词作曲。文思迟缓、写不出来的人和写得不合陈叔宝心意的人都会被罚酒，而写得好的词则会被谱上新曲子，交给聪慧的宫女们学习、演唱、配舞表演。陈叔宝喜欢欣赏的都是曼词艳语，通常安排上千名宫女演唱那些靡靡之音。除了《玉树后庭花》，《临春乐》也是宫女经常表演的曲目。

陈叔宝最宠爱两个嫔妃，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孔贵嫔。张贵妃名丽华，长得倾国倾城、国色天香，一头秀美的头发光彩照人。而且张丽华很聪明，记忆力很好，能记住连陈叔宝都搞不清楚的大小政务。陈叔宝上朝、退朝的时候都离不开张丽华，常常是抱着张丽华坐在自己的腿上一起批阅公文。孔贵嫔长得也很漂亮，陈叔宝夸奖她赛过西施和王昭君。孔贵嫔也很喜欢对政务指指点点。于是大臣们就通过宦官，勾结张贵妃和孔贵嫔，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在众多的大臣中，陈叔宝最喜欢的是尚书顾总，因为顾总的诗写得很好，满纸浮靡之气，没有一句有用的实话。陈叔宝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顾总成了皇帝眼前的红人、宴会的常客。好事者争相传抄顾总的那些弥漫脂粉气的艳诗，作为混官场的敲门砖。此外，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孔范也写得一手瑰丽文章，但赶不上顾总的水平，只好另辟蹊径，和孔贵嫔结为兄妹，结果也成了陈叔宝的座上客。陈叔宝不喜欢批评的声音，孔范就一心给他掩饰，凭着一套拍马屁的本领做了

陈朝的丞相。

做文人做久了，陈叔宝也觉得不好玩了，就自己去佛寺卖身为奴，算是去宫外“体验生活”，还美其名曰“禳压妖异”。总之，对于陈叔宝来说，作诗度曲才是正业，而管理国家只是副业，有心思的时候料理一下，没心思的时候就撂到一边去。陈叔宝的皇帝生涯过得很潇洒，这是那种长于深宫、不知百姓疾苦和创业艰辛的皇帝的通病。

孔范曾对陈叔宝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统统不过是一介匹夫，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深谋远虑。”陈叔宝深以为然，对带兵的将帅很不重视，而将领们一有小过失，就会被夺去兵权。结果，陈朝边备越来越松弛。

乱世之中，朝廷毕竟离不开军队的支撑。陈叔宝时期，陈朝最著名的将领除了任忠（任蛮奴），就是萧摩诃了。萧摩诃是陈朝草创时期崛起的老将军，对陈叔宝有拥立大功。陈叔宝即位后，和萧摩诃结为亲家，娶萧家的女儿为皇太子妃。这本是个维护君臣关系的良好开端，却也被陈叔宝的荒淫所影响。萧摩诃丧偶，续娶了夫人任氏。这个任氏年轻美丽，体态容貌都很出众，因为和张丽华结为姊妹，经常进宫串门儿。在宫中，任氏羡慕皇家风流自在的生活，陈叔宝则被她的美色所吸引，两人眉来眼去，竟勾搭成奸。自此，任氏自由出入宫廷，时常留宿过夜，和陈叔宝纵情享乐。后来，风言风语传到萧摩诃耳中，他这才意识到妻子给自己戴了一顶硕大无比的绿帽子。他很生气，又无可奈何，叹道：“我为国家出生入死，功勋卓著，而皇上不顾纲常名分，奸污臣妻，教我有何颜面立于朝廷！”

隋朝建立，南北方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有人提醒陈叔宝加强军备。陈叔宝却自信地认为：“王气在建康（陈朝首都，今南京），他人又能怎么样？”孔范附和说：“长江天险，限隔南北。北方的虜军，怎么能够飞渡天堑呢？肯定是那些前线的将领要冒领功劳，妄言事态紧急而已。”陈叔宝觉得孔范的话说到自己心里去了，长江天险使其更加

有恃无恐，对日益增多的军事警告完全不放在心上。

与贪图享乐的陈叔宝不同，杨坚从登基的第一天开始，就把自己看作全天下的皇帝，立下了吞并陈朝、统一天下的决心。

既然准备伐陈，必然不能缺少人才。他向高颍征求将帅人选，高颍便推荐了韩擒虎和贺若弼。

韩擒虎，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人，将门出身，当时四十三岁。韩擒虎小的时候很受宇文泰赏识，在北周时历任都督、刺史等职，参加了消灭北齐的战争，也有过与陈朝作战的经验，屡挫陈师。贺若弼，洛阳人，祖先是漠北部落首领，当时三十七岁。贺若弼文武双全，年轻的时候就小有名气，被齐王宇文宪招揽为幕僚。他也参加过与陈朝的战争，攻占过陈朝数十座城池，还担任过隋陈边界的寿州、扬州等地的刺史。

杨坚对这两人都很满意，随即任命韩擒虎为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总管，贺若弼为吴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总管，把平陈重任托付给了二人。

实际上，隋朝要吞并陈朝，困难还不小。且不说陈朝地域广大，军队众多，单说隋朝所处的环境就不利。隋朝建立之初，只是占领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和河北、山西、四川的割据政权而已。它的南方是并不弱小的陈朝，北方是非常强大的突厥。突厥骑兵一直盯着富裕的中原地区，时不时闯进长城以南来抢掠一下。开皇元年（581）九月，杨坚曾经仓促发动过一次伐陈大战，由高颍负责节度诸军。虽然隋朝大军在湖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没有能力突破长江防线。而北方的突厥人一看隋朝军队主力南征去了，耀武扬威地杀向中原而来。刚好此时南方的陈宣帝陈頊被吓死了，陈叔宝继位，求和讨饶。高颍有了台阶下，就以“礼不伐丧”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奏请班

师。开皇二年（582）二月，杨坚命令高颎等人撤回，草草结束了伐陈战役。

经过这次失败，杨坚意识到伐陈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拔除许多障碍才能顺利进行。首先，杨坚进行内部整顿，主要是在军事上革新，“首置军府，妙选英杰”。君臣一心，经过几年励精图治，隋朝的财政收入大为改善，军力显著增强。其次，隋朝需要一个有利的伐陈环境。隋朝夹在突厥和陈朝之间，旁边还有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骚扰，不能集中精力对付陈叔宝。杨坚琢磨着，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比陈叔宝的靡靡之音要难对付得多，因此定下先南后北的策略，对少数民族采取抚慰策略。因此，隋朝加强了和吐谷浑的联系，不断派遣友好使团，并送上厚重礼物，把吐谷浑给稳住了。

相比吐谷浑，突厥铁骑就难对付多了。杨坚即位做皇帝的第二年夏天，突厥汗国就派大军杀入长城作为“贺礼”。开皇三年（583）二月，突厥大军再次杀入长城以南劫掠。这一次，杨坚发兵分路和突厥人针锋相对地作战。在反击突厥的战斗中，有一名河西的戍卒，叫作史万岁，来到辕门前毛遂自荐，要求参军打仗。刚好突厥人派了一名勇士叫阵挑战，隋军将领就让史万岁去会会突厥勇士，看看这个史万岁是否有真本事。结果，史万岁两下就把突厥勇士的脑袋给砍了下来。突厥军队见自己千挑万选的勇士被隋朝一名普通的戍卒轻易给解决了，大惊失色，从此再也不敢猖獗地叫阵单挑了。

史万岁可不是一般的戍卒。他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父亲史静是北周的大将。史万岁从小就学习骑射，好读兵书，少年时代随父亲史静参加了北周伐齐的战争，后来又参与平定尉迟迥的反叛。遗憾的是，开皇初年，史万岁被牵连进了一桩谋反案，他被发配到敦煌当了一名戍卒。杀突厥勇士的时候，史万岁已经三十四岁了，因为表现突出，杨坚不仅免了史万岁的罪，还越级提拔他为车骑将军。

这一回，突厥没有从隋朝掠夺到什么好处。不想，这一次行动也

成了突厥铁骑最后的辉煌。撤军后，突厥陷入了大分裂状况，“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争权夺利，内讧得不亦乐乎。杨坚紧紧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加强北边防御工事，巩固边防。从开皇元年（581）至开皇七年（587），七年之间隋朝五次修筑长城、一直在缘边险要筑城，而且越临近伐陈前夕，筑城的时间相隔越近，最频繁的时候，隋朝在两年之中四度筑城。逐渐地，突厥也不再成为隋朝伐陈的障碍了。

解决了北方问题后，杨坚君臣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南方。

当时在湖北地区有一个依附隋朝的傀儡政权：西梁。这个西梁发源于被陈朝推翻的南梁。当年南梁的萧家内乱，遭到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压迫，把富庶的江南丢了。萧家就转向西魏求援。西魏出兵攻打江陵，于555年扶持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詧为皇帝，延续梁朝的血脉。作为西魏的属国，西梁偏居湖北一隅，领土仅有江陵附近数县百里之地。西魏被北周取代后，西梁成为北周的附庸；北周被隋朝取代后，西梁又向杨坚称臣。

尽管西梁很恭顺，杨坚也不能容忍一个割据政权的存在。开皇七年（587）八月，杨坚征召西梁皇帝萧琰入朝。萧琰不敢违抗，于是率领群臣两百余人从江陵赶到长安朝见新主子。萧琰前脚刚走，杨坚派遣的军队后脚就进驻了江陵城，宣布废掉西梁政权。萧琰一到长安，就被封为莒国公，成了大兴城的新住户。西梁就此灭亡，历时三十三年。

荒芜的大兴城中来了一群南方人，平添了许多新鲜色彩。需要提一句的是，西梁公主、萧琰的一个姊妹萧氏长得很漂亮，嫁给了杨坚的二儿子晋王杨广，成了晋王妃。

吞并西梁后，杨坚任命三儿子秦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督率

三十总管，集合水陆大军十余万，进屯汉口，负责长江中游地区的军事行动。同时，他提拔崭露头角的杨素为信州总管，命令杨素驻守在永安郡（治所在今湖北新州）。

杨素的主要任务是造船——突破长江防线需要大量的船只。杨素制造了每舰能容战士八百人的“五牙”、每舰能容战士百人的“黄龙”，以及规模稍小的“平乘”“柁艫”等船舰，准备在长江上游顺江而下，扫平江南。之前北方王朝吞并南方王朝（西晋灭东吴），就是船队出三峡，顺江而下取得成功的。当然，在庐州的韩擒虎和在吴州的贺若弼两支部队才是隋军的主力。他们布置在长江下游，直接威胁陈叔宝小朝廷的心脏地区。韩擒虎、贺若弼面对的是萧摩诃和任忠的部队，是陈朝的主力部队。

部署完毕，隋朝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战前准备。贺若弼向杨坚献上了《取陈十策》。杨坚颇为赞赏，赐宝刀一口，让贺若弼放手去干。

贺若弼的计谋是欺骗策略。首先，他在广陵驻扎隋军一万人，过一两个月时间就派新的部队将原来的军队替换下来。一万人的军队反复调防，闹得动静很大。一开始的时候，长江南岸的陈朝军队很紧张，做好了战备，后来看到隋朝每隔一段时间就反复调军，是例行的军队调动，觉得“隋军真是有病，整天瞎折腾”，也就不去管它了。

接着，贺若弼动不动就带上大队人马，到长江边上打猎，旗帜招摇，人马喧闹。对岸的陈朝军队见贺若弼等人沉迷于打猎，又在心底想“隋朝真是没人了，让这么一个田猎将军来领兵”，之后任由贺若弼往来江岸各地，不放在心上。

贺若弼不仅打猎，还要和陈朝人做生意。南方缺马，贺若弼就用老马和陈朝人交换船只。陈朝人不是笨蛋，就把最旧最破的船只换给贺若弼。结果贺若弼买了五六十艘破船，高调置于江北的军营里。陈朝人以为自己得了大便宜，心想：隋朝人连好船都没有，把几条破船

当宝贝捏在手里。

至此，贺若弼成功麻痹了陈朝军队，陈军已经对北方的军队调动和将领往来熟视无睹了。然而，暗地里，贺若弼在扬子津集结了大量的战船，并在渡口堆积了大量的芦苇、枯荻，堆得像山一样高，把战舰遮蔽得非常好。为了保险起见，隋军的所有战船也都涂成和枯荻一样的黄色。即使是陈朝的间谍细作，也没有发觉贺若弼的战备情况。同时，贺若弼常常派遣都督来护儿渡江侦察。来护儿是南方人，在长江两岸驾轻就熟，把敌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远在大兴的高颍则向杨坚建议，在经济上打击陈朝，来个釜底抽薪。

江北地寒，作物成熟比南方要晚；江南土热，自然条件好，水田早熟。江南田地成熟，就要进入农忙收割季节的时候，隋朝突然扬言要发动大军进攻江南。陈朝赶紧调集军队防守，把农田暂时放在一边。等陈朝大军云集的时候，隋朝又偃旗息鼓，没有动静了。陈朝人刚要料理农田，隋朝大军又鼓声大作，陈军只好再次备战。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农时荒废了，江南一季的收成就错过了。同时，陈朝对隋朝所谓的大军讨伐的信息也不再相信了，以为又是在故弄玄虚。高颍还根据南方不是像北方一样将物资放在地窖里，而是放在竹片和茅草建造的房子里的情况，安排大量间谍纵火，烧毁陈朝的官府储备和军物资。这样反复几年，陈朝不堪其扰。

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总攻命令下达了。

金陵失险下江南

开皇八年（588）三月，杨坚很高调地宣布讨伐陈朝，发誓要统一天下。杨坚给陈叔宝罗列了二十条大罪，命人抄写三十万份传单散发江南，下诏说：“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以上天之灵，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

陈朝君臣看到传单，心想：“隋朝这次又想忽悠我们，让我们白忙一场，我们才不会再上当呢！”因此，陈朝上下一点都没上心。

十月，杨坚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置淮南行台省，任命次子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总管灭陈事宜。左仆射高颎、右仆射王韶（杨广的老师）分别担任晋王府元帅长史、司马，处理军务。当时杨广刚满二十岁，不懂军事，所谓的主帅只是名义上的，伐陈的具体事务由高颎负责，“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

杨坚给前线调集了五十一万八千名士兵，制定了分进合击、直指陈朝都城建康的军事计划：晋王杨广由六合出发，秦王杨俊由襄阳顺流而下，杨素的水军从永安东进，韩擒虎由庐江急进，贺若弼从吴州渡江，此外还有荆州刺史刘思仁、蕲州刺史王世绩、青州总管燕荣等人从海陆各地出兵，各军都以灭亡陈朝为目标。

尽管在政治上很高调，隋朝的伐陈战役在军事上却很低调，是典型的突袭战。

开皇九年（589）的元旦夜，吴州方向的贺若弼率军乘大雾从广陵秘密渡过长江。将要渡江的时候，贺若弼酹酒发誓说：“本人贺若

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翦暴，上天和长江为我作证。如果上天善恶分明，就让我大军得胜归来；如果出师不利，贺若弼葬身江鱼腹中，也死而无恨。”贺若弼说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渡江前进，对岸的陈军竟然没有发觉。等隋军安然渡过长江，杀向陈军各据点后，陈军才仓皇组织抵抗。

正月初六，贺若弼成功占领京口（今江苏镇江），俘虏了陈朝的南徐州刺史黄恪和五千陈军。京口是陈军的仓储重地，贺若弼便轻装渡江袭击，没有带多少辎重，占领京口后，利用陈军的储备解决了自身的供给问题。贺若弼下令发给陈军俘虏口粮和遣散费，让他们每个人带上伐陈的传单，各回乡里去做隋朝的义务宣传员。陈朝官兵们捡了条命，都说隋军的好处，高高兴兴地拿着传单散往各地。因为有俘虏的宣传效应，再加上贺若弼的部队军令如山，下令有军士敢拿民间一物者立斩不赦，全军于百姓秋毫无犯，进展顺利。

庐江方面，韩擒虎嫌大军进攻速度太慢，率领五百精骑撇下主力，单刀直入，杀向江南而去。韩擒虎这一支奇兵趁着夜色渡过长江，袭击了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当时陈军守卫都喝醉了，韩擒虎轻易就占领了重镇采石，继续飞速向建康穿插前进。

隋军煞费苦心对陈朝的欺骗战略取得了圆满成功。陈朝君臣依赖的长江天堑就这样被轻易“飞渡”了。

各州县的军情急报像暴风雪一样袭向陈朝宫廷，形势已经非常紧急了。

陈叔宝和他的那群文人朋友们还是不以为意。仆射袁宪特别着急，奏请陈叔宝发兵抵御，起码也要在都城附近组织抵抗。陈叔宝根本听不进去袁宪的话，对隋军深入州郡、前线告急的现实熟视无睹，

每天依旧奏乐侑酒，赋诗歌唱“美好的生活”。他还笑着问左右近臣道：“南北分治以来，北齐曾经三次进攻南朝，北周也出兵了两次，都惨败而去，这是为什么？”孔范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就隔断南北。隋军又怎么能飞渡成功呢？这肯定又是前线将领们想立功想疯了，妄言事急，给自己捞好处。我孔范还觉得自己功劳小、官职低微呢，如果北虏真敢渡江，我就能杀敌做个太尉公了。”陈叔宝对孔范的回答相当满意。

当时，有拍马屁的人谣传说隋军的战马不习惯江南的水土，一到南岸后就成批死去。孔范摇头晃脑，叹息说：“可惜了，那些将来都是我们的马，为什么死了啊？”陈叔宝哈哈大笑，跟着孔范一起惋惜起来。此后，建康城的君臣上下更加肆无忌惮地狎妓纵酒，把前线的告急文书当作废纸扔了，继续生活在天堂里。

却说贺若弼、韩擒虎两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快速推进，陈军各部望风而散，隋兵如入无人之境。贺若弼分兵堵住曲阿（今江苏丹阳），防止长江三角洲及以南地区的陈军增援建康，然后亲自率主力进攻建康。韩擒虎在占领姑熟后，沿着长江逼近建康。不久，建康周边就出现了隋军的前锋部队。

陈叔宝这才害怕起来。他胆子本来就小，对军事一窍不通，慌忙召萧摩诃、任忠等人商议军事。萧摩诃因为陈叔宝和妻子通奸，根本就没有为朝廷而战的意志，一言不发。当时贺若弼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钟山（今南京紫金山），被陈朝看作是心腹大患。陈朝决定调集诸军在白土冈（今南京城东）一带布阵决战。

贺若弼所部大约有八千甲士，而陈叔宝在建康有十万大军。

正月二十日，陈叔宝命令陈军出战，去消灭贺若弼率领的部队。

陈军鲁广达、孔范、萧摩诃、任忠、田瑞、樊毅等部先后逼近白土冈，南北绵延二十里。陈军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陈叔宝仓

促命令各部进击，事先没有完整的进攻计划，各部之间缺乏协调，分别发起进攻。田瑞首先率部进攻，被贺若弼军击退。鲁广达等部赶到后也投入了战斗，这时贺若弼抵挡不住，不得不暂时后退。陈军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为了避免陈军追击，贺若弼下令施放烟幕，掩护隋军整顿恢复。在紧张的战斗间隙，贺若弼保持了冷静的思考，他观察到陈军各部在得胜后出现了骄情情绪，而孔范率领的部队士气最差。于是，贺若弼督厉将士以必死的决心向孔范所部发起决战冲锋。孔范就是一个窝囊废，在贺若弼的反攻面前一败涂地，仓皇逃窜。孔范部队的战败导致了陈军全线溃退，缺乏调度的陈军各部争相逃命，场面失控，有五千多人因为互相挤踏而死。陈朝军队的主力就这样溃散了。贺若弼率军乘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乐游苑（今南京玄武湖南侧）。

作为陈朝的大将，萧摩诃也在乱军中被俘虏。贺若弼命令刀斧手将他推出斩首，而萧摩诃毕竟是一代名将，临刑前神色自若。贺若弼很是敬佩，下令免罪松绑，以礼相待。于是，萧摩诃投降了隋军。

西边的韩擒虎正在进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半天就占领了这座名城，第二天又占领新林（今南京西南）。韩擒虎在江南百姓中的威信很高，许多人昼夜不绝地前来韩擒虎军中投降，而被贺若弼打败的东边的许多陈军部队也向韩擒虎投降了，其中包括任忠、田瑞等人。

陈叔宝此时也听说了韩擒虎的大名，紧急派遣将军蔡征守住朱雀桥（在今南京秦淮河上）。结果派出去的陈军听说对手是韩擒虎，竟然一哄而散。接着，任忠引导韩擒虎的五百精骑从朱雀门进入了建康城。当时，城内还有部分陈军要负隅顽抗。任忠现身说法，劝降说：“老夫都投降了隋朝，你们还怕什么呢？”任忠在陈朝军队中威望很高，他的喊话瓦解了陈军的斗志，残存的陈军纷纷缴械投降。韩擒虎以区区五百人竟然长驱直入，一举占领了建康城。

不过，贺若弼在玄武门南遭到了顽强的抵抗。陈将鲁广达率领残存的部队苦战不降，杀死了数百隋军。一直打到日薄西山，陈军越来越少，隋军越来越多。局势肉眼可见，鲁广达只能对着陈叔宝的宫阙方向跪地叩首，悲伤恸哭，最后缴械，束手就擒。贺若弼在当天傍晚从北掖门进入建康城。

就这样，隋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建康城。

隋朝大军进入建康城的时候，陈朝的宫廷中依然鼓乐声声，陈叔宝还在那儿喝酒吟诗。待到隋军杀入朱雀门时，陈朝的大臣便逃得无影无踪了。陈叔宝见原来在身边的人都逃跑了，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仆射袁宪在王朝的最后时刻不离不弃，还在陈叔宝身边。空荡荡的朝廷中，只剩下陈叔宝和袁宪两个人了。陈叔宝伤感地说：“朕从来待众臣不薄，今天众人皆弃我而去，只有你留了下来。不遇岁寒，焉知松柏后凋也？我朝就要灭亡了，并不是朕无德，而是江东衣冠道尽啊。”诚然，大臣们道德低劣，没有为国尽忠之心是陈朝速亡的一大原因，但是陈叔宝不理国事、荒淫无度，更是主要原因。

陈叔宝说完，也要找个地方躲藏起来。袁宪劝说道：“皇上是九五之尊，北兵来了，想必也不敢对陛下怎么样。事已至此，陛下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不如整理衣冠，端坐在正殿之上，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的样子，去见隋军。”梁朝时期，北方军阀侯景先降南方，继而叛乱。侯景占领建康的时候，梁武帝萧衍就是端正衣冠，坦然去见乱军的。然而，陈叔宝哪有萧衍那样的气魄，他又一次拒绝了袁宪的劝谏，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宫廷中找藏身的地方。袁宪还想劝，陈叔宝说：“锋刃之下，哪有几戏，朕自有办法！”

陈叔宝跑到后堂景阳殿，发现了一口深井，突然计上心头。他赶

紧找来张贵妃、孔贵嫔，三人抱在一起，拉住一根绳子，跳入井中躲藏起来。袁宪一直跟在陈叔宝身边，见皇帝找到了这么一个藏身之处，悲伤欲绝，跪地痛哭，最后朝着深井叩首，逃命去了。后来，袁宪被俘，投降了隋朝，做了昌州刺史。

而韩擒虎的部队冲入皇宫后，果然到处搜不到陈叔宝。隋兵就捉了几个内侍，逼问陈叔宝藏在哪里，最后，一个内侍指了指井口。隋朝士兵看井里漆黑一团，叫几声没人应答，不相信一个皇帝会藏在里面。有个隋兵往下扔了一块石头，才听到下面传来求饶的声音。于是，众军扔下绳子到井里，喝令陈叔宝拽住绳子上来。大家拉绳子的时候，觉得绳子特别重，有人就打趣说：“别人都说南方人瘦，怎么陈叔宝这么胖啊！”拉上来一看，原来是陈叔宝和张贵妃、孔贵嫔三个人。看着陈叔宝狼狈的样子，众人笑得前仰后翻。

据说当时张丽华的胭脂蹭在井口，有人就称这口井为“胭脂井”。又有人不齿于陈叔宝祸国自取其辱的行为，把它叫作“耻辱井”。

贺若弼率领部队随后进入皇宫，他听说韩擒虎捉住了陈叔宝，传令将陈叔宝带来看看。陈叔宝来了后，诚惶诚恐，汗流浹背，双腿战栗，向贺若弼求饶不止。贺若弼很实在，安慰说：“你是小国之君，进入我大隋后，还能做个归命侯（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被俘后，就被封为‘归命侯’），不需要恐惧！”陈叔宝再三拜谢，心里宽慰许多，可还是战战兢兢，声音发抖。

除了江东战场外，隋军在其他各条战线也都进展顺利。

杨素率领舰队出三峡，原本计划进攻两湖地区，但陈军在三峡横缀了大铁索，阻碍了杨素战舰的东下。后来，杨素发动夜袭，一举打败陈军守卫部队，然后率水军东下，舰船遍布江面，旌甲曜日。隋军以破竹之势先后打败各处陈军。一路上，杨素端坐船上，两岸的陈国

百姓看到他，仿佛看到了江神，心生畏惧。杨素打到巴陵（今湖南岳阳）的时候，陈朝的地方政权已经土崩瓦解了。最后，杨素与秦王杨俊胜利会师。

陈朝南部广袤的岭南地区，处于半自治的状态。隋灭陈的时候，岭南各地奉高凉（今广东阳江）的冼夫人为主，保境据守。这位冼夫人是原来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已经六十多岁了，经过了历次的政治风云，威望很高，被岭南人视为“圣母”。陈叔宝被俘后，按照杨坚的意思给冼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说陈朝已经灭亡了，要求冼夫人带着岭南各州县投降隋朝。接着，杨坚派遣韦洸携带陈叔宝的亲笔信、兵符和冼夫人之前进献给陈朝皇帝的“扶南犀杖”，招降冼夫人。冼夫人知道陈朝灭亡的消息后，召集各地和各部落首领数千人集体痛哭了一整天，然后派孙子冯魂前去迎接韦洸进入岭南。岭南各地也并入了隋朝的版图，冼夫人因功被封为宋康郡夫人。

建康沦陷后，江东的部分地区拒不投降。正月底二月初，隋军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消灭江东的陈朝残余势力上。隋朝大将宇文述率领三万人，也参加了伐陈的战争，一度占领石头城（今南京城西清凉山）。现在，宇文述联合从海上来的燕荣的军队，将各地的抵抗势力逐一击破。

就这样，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中国重新迈向大一统的盛世。

各地初定，高颍作为“接收大员”，先行进入建康，接收陈朝图籍，封锁府库。名义上的主帅杨广早早就听说了张丽华的美貌，在高颍出发前私下拜托说：“您进入建康，一定要找到张丽华，不要伤害她啊。”然而，高颍一点面子都不给杨广，把张丽华叫来后，说：“此等妖妃，岂可留得？昔日姜太公灭纣，蒙面斩妲己，我也要学他。”说完，高颍就将张丽华的脑袋给砍了下来。

杨广不久也到了建康，知道实情后自然对高颎“有意见”了。

除了求色不成外，杨广的其他作为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建康城，杨广公开处死了压下媚上、重赋厚敛、为政苛暴的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等人；又“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严令军队“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因此天下都称赞他的贤德。杨广兄弟五人，经过平陈战役，杨广的声望陡然升高，成为兄弟中名声最大最好的一个。

杨坚对二儿子也很满意，任命杨广为江南总管，留在南方镇抚各地。杨广奏请以宇文述为寿州总管，协助自己统治江南。杨广治理江南十年，其间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从这个方面来说，杨广、宇文述等人功劳不小。

二士争功

陈朝被消灭后，大将贺若弼却高兴不起来。

对于将领来说，攻城擒将是毕生追求的目标。贺若弼虽然消灭了陈朝的主力部队，但是第一个杀进建康城的人是韩擒虎，捉住陈朝皇帝陈叔宝的人也是韩擒虎，而不是他贺若弼。旁人看来，韩擒虎无疑是平陈第一功臣。贺若弼心理不平衡，明明是自己浴血奋战，消灭了陈军主力，韩擒虎只是乘虚摘得了桃子而已，这平陈的首功凭什么就被韩擒虎给占去了呢？

论功行赏，贺若弼自然排在韩擒虎之后。还在建康的时候，贺若弼就和韩擒虎吵了起来。韩擒虎也不示弱，认为是自己谋划得当，孤军深入，才夺取首功的。机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于是，贺若弼、韩擒虎两人各不相让，从吵架发展到相互谩骂，最后严重到要带着各自的部队火并。江南的其他各部隋朝将领赶紧把他们俩拉开，这才没有引发内讧。

贺若弼的父亲是北周名将贺若敦，因为功高自傲，常常口出怨言，被掌握朝政的宇文护逼令自杀。贺若敦自杀前对儿子贺若弼说：“我终生的遗憾就是没能平定江南，你一定要替我完成这一遗愿。”最后，贺若敦总结一生的经验教训传授给贺若弼：“我口无遮拦，才遭此大祸。你千万要记住‘祸从口出’这四个字！”为了让儿子铭记在心，贺若敦临死前还用锥子扎贺若弼的舌头，直到扎出鲜血为止。父亲死后，贺若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谨言慎行，多干事少说话，立下了许多功劳，不断得到升迁，也没有居功自恃。

高频推荐贺若弼为平陈的主要将领后，贺若弼成为经略一方的封疆大吏，这时他的心理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当年，他曾给同级别的寿州总管源雄赋诗一首，说：“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踌躇满志、建功立业的情绪跃然纸上，毫不掩藏。一次，新太子杨广曾叫贺若弼比较杨素、韩擒虎和史万岁三个当代名将的优劣。贺若弼很不客气地表示杨素是猛将而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而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而非大将。杨广就问：“那谁才是大将？”贺若弼说：“这要由殿下选择。”言下之意，贺若弼以大将自许，自视比韩擒虎等三人要厉害。慢慢地，贺若弼把父亲的临终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终于重蹈覆辙。

凯旋后，贺若弼把自己和韩擒虎的“争功官司”打到了杨坚的御座前面。

贺若弼说：“臣在城外钟山死战，大破陈朝精锐，擒其骁将，震扬威武，这才荡平了陈国。韩擒虎一路根本就没有经过恶战，怎么能和臣相比呢？”

韩擒虎也不甘示弱地说：“朝廷的军事计划是让臣与贺若弼同时合势，攻取伪都。贺若弼竟然抢先出兵，贸然进攻，恰好遇到了贼军，还伤亡了许多将士。臣只率领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建康，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臣入城一天了，贺若弼在当天晚上才到达建康的北掖门，还是臣下令给他开的门呢！贺若弼补救过失都来不及了，怎么能和臣相比？”

一个坚持杀敌有功，一个坚持擒贼有功。杨坚也很难判断谁对谁错，只好和稀泥，下诏说：“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二将俱合上勋。”

杨坚将贺若弼封为宋国公，实际封地襄邑三千户，还赏给物八千段，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宝剑、宝带、金瓮、金盘等物品不计其

数。俘虏中有陈叔宝的妹妹，也被赏给贺若弼为妾。韩擒虎也获得了众多物品赏赐，但是韩擒虎抢先进入陈朝皇宫后，没有约束好士卒，导致许多士兵在后宫淫乱打劫，遭到了隋朝其他大臣的弹劾。因此，杨坚就不好给韩擒虎封爵了。

贺若弼的地位比韩擒虎高，心里总算好过了一些。

其实在杨坚心目中，高颀才是灭陈第一功臣。

高颀不仅是隋朝立朝开国的丞相，而且是平陈战役的设计师和前方秘书长，虽然没有直接冲锋陷阵，但大功不可没。

贺若弼、韩擒虎二人在杨坚面前为功劳大小争执不休的时候，杨坚试探地询问高颀：“独孤，你与贺若弼相比，谁的功劳更大啊？”高颀谦虚地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来又在钟山苦战破贼。臣就是一个文吏，焉敢与大将军论功！”杨坚闻后哈哈大笑，对高颀的谦逊非常赞赏。

其实，皇帝就是需要高颀这样的功臣。贺若弼和韩擒虎那样的，都是吃不开的。

高颀因为大功被封为齐国公，赐物九千段，实际封地千乘县一千五百户。杨坚还专门慰劳他说：“公伐陈的时候，有人向朕说公会造反，结果朕把那个人斩首了。你我君臣，志同道合，不是几只苍蝇能够离间的。”高颀听说了，又进行推让。杨坚不允许，专门下诏褒奖他是“竭诚陈力，心迹俱尽”的“天降良辅”。

杨坚和高颀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杨坚巡幸并州的时候，甚至让高颀留守京城，回京后，杨坚把自己的一座行宫赏给高颀作为府邸。高颀的夫人贺拔氏卧病在床的时候，杨坚一批又一批地派人来询问病情，前一批人刚走，后一批人又进门了。杨坚还亲自到高颀家，带来金钱、绢、千里马等各种赏赐。高颀之子高表仁迎娶太子杨勇之

女（大宁公主）为妻后，高颀成为皇亲国戚，身上的光芒达到了巅峰。

与高颀的谦虚低调不同，贺若弼自恃功高，越来越骄横。

贺若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哥哥贺若隆被封为武都郡公，弟弟贺若东被封为万荣郡公，还担任刺史、将军等实职。贺若弼在家聚敛了无数珍玩，婢妾都遍身罗绮，生活奢侈。

开皇十二年（592），杨素被提拔为右仆射，与高颀并列为丞相。贺若弼的心理又开始不平衡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比杨素厉害，现在杨素升任丞相了，自己还是将军。贺若弼藏不住情绪，把内心的不平和嫉妒都写到了脸上。贺若弼轻视包括高颀、杨素在内的所有朝中官员，自以为他是天下第一，结果引起大臣们的公愤，个别大臣甚至公开要求处死贺若弼。当年，贺若弼就被免去官职，打入大狱。

杨坚亲自审问他：“朕用高颀、杨素为丞相，你却每每说他们二人都是饭桶，这是什么意思？”贺若弼回答说：“高颀，是臣的故人；杨素，是臣的表弟。我是知道他们俩的为人，才会说他们是饭桶。”

公卿大臣见贺若弼到这时候了，还嘴硬，纷纷奏请将他处以死刑。

杨坚犹豫了好几天，念贺若弼劳苦功高，免其一死，革职为民。

一年后，杨坚恢复了贺若弼的公爵爵位，但不授予任何实职，闲养了起来。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贺若弼逐渐被人遗忘，一般只在朝廷宴会等公关场合才象征性地出来露露面。

与贺若弼不同，韩擒虎在灭陈之后继续活跃在军界。一次，突厥遣使来朝，杨坚想挫挫突厥人的傲气，就问突厥使者：“你们突厥人听说过朕灭陈朝的事情吗？”使者回答：“听说过。”杨坚于是叫韩擒虎出来站到突厥人面前，介绍说：“这就是前年孤军生擒陈朝皇帝的韩大将军！”韩擒虎很配合，立即双目圆睁，一言不发，怒视使者，吓

得突厥使者低头不敢对视。杨坚很高兴，觉得韩擒虎很适合去前线对付突厥，任命他为凉州总管驻屯在金城（今甘肃兰州），以防备突厥人。

不久，韩擒虎因为身体原因回到长安，杨坚在内殿为他设宴洗尘，并给予相当优厚的待遇。在贺若弼被关进大牢里的那一年（开皇十二年），韩擒虎也病死了，时年五十五岁。二士之争，最终以这种方式落幕。

最后，我们还要花些笔墨，交代一下有关隋朝灭陈的其他事件和其他人物。

隋灭陈，进展很快，并没有触及南方士族豪强的力量，但大量北方来的隋朝官员到南方做官，没有尊重南方的风俗习惯，结果南方的士族豪强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发动了叛乱。隋朝在江南最初的几年统治，都不太稳定。

开皇十年（590），隋朝迁徙陈朝官僚和部分精英去充实新建的大兴城，有人就造谣说隋朝要把南方人都迁移到关中，从而引起群众恐慌，南方士族豪强乘机煽动叛乱。当年年底，高智慧等人在越州（今浙江绍兴）造反，得到现在的浙江大部分和江苏苏州等地的人民响应。这些人举兵攻陷州县，攻杀隋朝官吏，有的自称大都督，有的自称天子，还设置了百官。规模大的有数万人，小的也有数千人，四处呼应，使得隋朝几乎丧失了对原来陈朝江东领土的控制。

形势危急，杨坚封杨素为越国公，负责镇压南方各地的反叛。史万岁、来护儿等人随杨素征讨。

当时，高智慧率部据守浙江（今钱塘江），占领东岸的要害，连营百余里，船舰上千艘，遮盖江面，声势很大。来护儿建议说：“吴人擅长舟楫水战。对岸的都是必死之贼，我们难以与之争锋。杨公可以严阵以待，不与敌人交战。请借我奇兵数千，偷偷渡过江去，攻破贼

军后方，让他们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杨素接受了来护儿的建议，分出轻型战船数百艘归他指挥。果然，来护儿成功偷渡浙江后，率领奇兵突袭高智慧的后方营垒，烧毁了物资军粮，动摇了叛军的军心。杨素乘机从正面发动总攻，大败高智慧军。最后，高智慧逃入东海之中。

接着，杨素分兵镇压各地叛军。来护儿奋勇直追，一口气杀到福建山区。在福建，来护儿招降纳叛，恩威并施，相继消灭了作乱建州的高智慧余党和黟、歙等县的汪文进叛军，福建等地就此平定。杨坚收到捷报后，封来护儿为永宁郡公，还派画工绘了他的画像，挂在宫中观看。

另一个随杨素出征的将领史万岁则率两千军队向西进攻，一路上“踰岭越海，攻陷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此后六七年，史万岁一直在南方平定零星的反隋兵乱。开皇十七年（597），史万岁平定南宁州（今云南）部族首领爨翫的造反，也跻身一线大将军之列。粗略算来，史万岁征战八年，一直从浙江打到了云南，横贯了半个中国，功劳不小。史万岁行军作战的时候总是身先士卒，对部下关怀备至，深得部下拥护，因此他的部队很团结，战斗力很强。

先前，韦洸入岭南招降冼夫人，成功后就留下来镇守岭南了。不久，番禺人王仲宣联络各部族攻打韦洸，响应高智慧等人的反隋行动。冼夫人坚持站在隋朝一边，派孙子冯暄救援韦洸。但冯暄和逆党陈佛智交好，刻意救援不力，冼夫人毅然将他关进大牢，再派另一个孙子冯盎增援，她也亲自领兵作为后应。

当时，隋朝派遣的官员裴矩正准备代表朝廷去岭南巡视。裴矩在北齐、北周、隋朝都当过官，当时快五十岁了，还是不大不小的官，本来以为巡视岭南是挺风光的事情，结果还没去就赶上叛乱，道路不通，被堵在了南康（今江西赣州）。裴矩在南康就地募兵数千人，准备

按计划进入岭南巡视。当时王仲宣分兵围困东衡州，在大庾岭屯兵，隔绝岭南和北方的联络。裴矩率领新兵，一举攻下大庾岭，叛军害怕了，从东衡州解围而逃。裴矩迅速进入岭南，和冼夫人联合增援韦洸。王仲宣叛军在联军的进攻面前，四下逃散。裴矩一举收复二十多州，分别招抚当地的酋长和首领担任刺史、县令，平定了岭南。

叛乱平了，杨坚大喜，追赠冼夫人的先夫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封冼夫人为谯国夫人。裴矩回到大兴复命时，杨坚亲自慰问，嘘寒问暖，还对高颍、杨素等人说：“韦洸率领二万士兵，都不能安定岭南。朕担心是不是朝廷派往岭南的军队太少了。没想到，裴矩以区区三千新卒，一举安定岭南。有这样的干臣，朕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杨坚的一句夸奖，胜过裴矩之前五十年的表现。从此，裴矩时来运转，平步青云。

第三章 开皇盛世

降服突厥

南北朝以来，北方的突厥越来越强大，强大到足可以对中原王朝的生存形成威胁了。

杨坚当了中原的皇帝，突厥成了他不得不解决的棘手问题。

开皇二年（582）五月，突厥大军就杀入长城，烧杀抢掠，作为送给杨坚登基的“见面礼”。突厥人很会玩文字游戏，说自己是北周的兄弟之邦，现在来给北周报仇，讨伐杨坚。

然而，真实情况是突厥人所在的漠北草原新近遭遇了大灾荒，“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大灾荒造成草原赤地千里，民不聊生。而刚当上皇帝的杨坚一反北周、北齐争相讨好突厥的惯例，对其困难不理不睬。突厥人勃然大怒，便发兵来教训杨坚。

这次突厥人因为隋朝的反击没有从南方捞取多大好处，但隋朝还是被动挨打，胜少败多，而杨坚吞并陈朝的宏大计划也受到了影响。

突厥问题的重要性让一个人在政坛崛起，这个人叫作长孙晟。

长孙晟武艺超群，在北周时曾送公主去突厥和亲。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很欣赏长孙晟的武艺，留他在突厥住了一年。这期间，长孙晟充

分了解了突厥的国情，“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一次，长孙晟陪着突厥贵族出游，天空中有两只雕在争肉吃。沙钵略可汗递给长孙晟两支箭，让他表演射箭。长孙晟驰马飞奔，对着纠缠争食的双雕一箭射去，落下两只雕来。沙钵略可汗大喜，让突厥贵族子弟跟着长孙晟学习射箭。于是，长孙晟整天和突厥贵族混在一起，几乎成了半个突厥人。

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声望很高，因此遭到了哥哥沙钵略可汗的猜忌，他便暗中与长孙晟结盟，希望能够借助隋朝的力量帮助自己。

长孙晟回国后，向杨坚“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提出了对付突厥“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利用突厥各部间的矛盾，结交、扶持那些偏远的、弱小的部族，共同对付那些紧迫的威胁和强大的敌人。

杨坚对长孙晟这个“突厥通”很信任，采纳了长孙晟的提议。

突厥的政权形式类似于部族联盟，除了沙钵略可汗这个联盟的大可汗外，还有若干强大的部族可汗。杨坚就派使者结交西域的达头可汗，赐给狼头纛，礼数周全。此外，杨坚在接见突厥使团的时候，故意把达头可汗的使者排在沙钵略可汗的使者前面。沙钵略可汗很自然地中了杨坚的离间计，对达头可汗产生了猜疑。杨坚进一步派长孙晟携带大量钱财，结交奚、契丹等部族，展开“统战工作”，孤立沙钵略可汗。长孙晟自然也去了老朋友处罗侯那里，引诱处罗侯与沙钵略可汗决裂，站到隋朝的一边。

沙钵略可汗成了劣势一方，却依然要发兵教训一下杨坚。很快，突厥大军来势汹汹，结果还未交战，就被长孙晟的一个“谣言”给吓退了。长孙晟散布谣言说臣属于突厥的铁勒部落反叛，出兵袭击突厥牙帐。沙钵略可汗已经对内部团结失去了信心，听信谣言，撤军返回漠

北保护老巢去了。

这次，轮到杨坚出牌了。开皇三年（583），杨坚下诏要反击突厥。

杨坚在诏书中探讨了突厥问题的由来和解决之道。他认为突厥的猖狂，很大程度上是中原割据的结果。各个割据王朝都寻求突厥的支持，“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人西虞，惧周交之厚”，谁都怕突厥倒向敌人一方，结果争相讨好突厥。“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这样势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助长了突厥的实力和骄狂，结果突厥“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于是，杨坚鼓励将士抵抗突厥，以战争制止突厥的杀掠。

当年，隋朝大军兵分八路，出塞讨伐突厥。双方主力在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相遇。沙钵略可汗占据要点，依然轻视隋朝军队的战斗力，结果隋军主力对突厥军营主动发起猛攻，打得沙钵略连自身的金甲都来不及穿戴，在齐腰深的草丛中匍匐逃走。突厥军队大败。这一年，草原又是遍地饥谨，突厥军队的粮食供应都得不到保证，民间疾疫流行，死伤惨重。而隋军在白道川大胜后，又乘胜追击，接连打败突厥各部可汗。可以说，隋朝在开皇三年的反击战，取得了全线胜利。

583年在突厥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强盛的突厥帝国由盛转衰，往日的雄风一去不复返。不久，突厥内讧，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

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给长孙晟的战略提供了绝佳的实施机会。

隋朝不用一兵一卒，而利用突厥的内部矛盾挑拨离间，时而团结这一部分，时而打击那一部分，加速了突厥的衰亡。

开皇四年（584）九月，内忧外患的东突厥沙钵略可汗降低身段，主动向杨坚请求和亲。

沙钵略可汗原本迎娶了北周王朝的千金公主。隋朝替代了北周，千金公主与隋朝有着深仇大恨，当初甚至挑唆沙钵略“为北周报仇”。现在夫家衰落了，她迫不得已，请求改姓杨，还要认杨坚当干爹。

西突厥的达头可汗见沙钵略、千金公主和隋朝眉来眼去，生怕落在他们后面，也赶紧向隋朝请求和亲。

杨坚观察了一下形势，觉得沙钵略可汗的日子确很难过，而达头可汗比较强大，就决定扶持沙钵略可汗对付达头可汗。他同意和亲，认千金公主为隋朝的大义公主，这样就等于是隋朝将公主嫁给了沙钵略可汗。沙钵略大喜，上了一封肉麻的奏章：“隋朝皇帝是岳父，就是我爹；我是皇帝的女婿，就是儿子。两境虽殊，情义是一。现在我们双方重修旧好，希望子子孙孙万世不断。上天为证，决不违背。”杨坚回信说：“既然沙钵略做了隋朝的女婿，那我以后将把你当作儿子来对待了。”从此，隋朝和突厥以翁婿相称。

当然，沙钵略可汗并不是真心臣服。草原上的枭雄的自尊心都很强，他虽然自降为杨坚的女婿，但那是在文字上做做样子，实际上仍以大国统治者自居。长孙晟去向他颁发诏书的时候，沙钵略可汗就拒绝跪接诏书。长孙晟说：“可汗既然做了大隋的女婿，怎么能不敬岳父呢？”最后，沙钵略不得不跪受诏书。接完诏书，沙钵略满脸惭愧，和大臣们抱头痛哭。他们不仅是为可汗脸面尽失而羞愧，更是为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而痛哭。

可是隋朝给予沙钵略的支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沙钵略依然打不过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东边新兴的契丹民族也开始咄咄逼人。东突厥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开皇五年（585）七月，沙钵略实在混不下去了，向隋朝告急，请求率领部族南下，寄居在白道川。这实质上是寻

求隋朝的军事保护。

就在隋朝讨论对策的时候，沙钵略的老婆孩子都被敌人给俘虏了。杨坚意识到东突厥的灭亡将使隋朝失去制约西突厥的重要力量，便同意东突厥南迁白道川。隋朝还出兵救援沙钵略，帮助沙钵略抢回了家人。沙钵略因为隋军才能够有一个栖身之地，不得不彻底投向隋朝的怀抱，连隋朝的女婿也不做了，直接上表称臣。沙钵略还主动把儿子送到大兴城中，作为人质。一年多后，见证突厥从盛到衰的沙钵略可汗死了。

沙钵略临终时，把可汗之位传给了弟弟处罗侯。处罗侯勇猛聪明，深得人心，但沙钵略生前很不喜欢这个弟弟，一直猜忌提防他。如今，沙钵略之所以不传位给儿子而传给了处罗侯，完全是抛弃了私心杂念，希望处罗侯能够复兴突厥。

杨坚听说突厥换可汗了，派长孙晟代表隋朝“册封”新可汗。处罗侯知道一旦接受隋朝的册封，也就是将东突厥进一步置于隋朝的控制之下，东突厥的可汗就成为需要隋朝“任命”的官员了。但他更明白东突厥处境艰难，离不开隋朝的支持，因此不仅安然接受了隋朝的册封，还遣使入朝。从此，隋朝和东突厥之间形成了固定的册封关系。在隋朝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处罗侯杀回漠北，多次打败西突厥。隋朝也通过处罗侯这个代理人间接控制了漠北草原。

可惜，处罗侯在位仅一年，就在与西突厥的战斗中阵亡了。开皇八年（588），东突厥推举雍虞闾为新可汗。隋朝册封他为都蓝可汗，再次巩固了双方的君臣关系。

都蓝可汗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当时东突厥的日子也好过多了，都蓝可汗对隋朝便不像前两代可汗那么恭顺。

突厥有个习俗，就是后世可汗要迎娶前世可汗的遗孀为妻（即“收继婚”）。因此，大义公主（原来的千金公主）又成了都蓝可汗的妻子。大义公主虽然改为杨姓，但亡隋之心不死。刚好当时有个叫作杨钦的隋人犯了罪，逃到漠北，造谣说北周的宗室女婿刘昶要起兵反隋，请大义公主出兵配合。大义公主就去蛊惑都蓝可汗。结果，都蓝可汗还真派兵，几次骚扰隋朝边界。而隋朝直接出兵杀了大义公主，讨回杨钦，算是对都蓝可汗进行警告。

都蓝可汗没了老婆，就向隋朝求亲，刚好东突厥另一位可汗突利也请求隋朝赐婚。对此，杨坚问长孙晟怎么办。长孙晟分析说：“都蓝依附隋朝只是因为和西突厥的达头有矛盾，现在还需要隋朝的帮助。如果翅膀硬了，都蓝可汗肯定会叛隋而去的。而且，如果都蓝迎娶了隋朝真正的公主，那么就会借隋朝的威力压迫达头、突利等可汗，从而变得更加强大，难以控制。而突利是‘亲隋派’处罗侯的儿子，本人也与隋朝亲善。不如将真正的公主许配给突利，让突利率领本部军民南徙。突利兵少民弱，容易控制，可以作为抵御都蓝的力量。”杨坚采纳了长孙晟的意见，决心扶植最弱小的突利可汗，打击都蓝可汗和达头可汗。总之，突厥各部中，谁把头冒出来，隋朝就打谁，直到突厥乖乖听话为止。

开皇十七年（597），突利可汗迎娶了隋朝的安义公主，率众南迁。

都蓝作为东突厥的大可汗，反而没有迎娶到公主，大怒，更加频繁地骚扰隋朝边界。突利可汗每次都给隋军通风报信。隋军严阵以待，都蓝可汗一点好处也没捞到，还白白损耗了不少兵马。

都蓝可汗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在开皇十九年（599）与西突厥的达头可汗握手言和，共同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哪里打得过，结果大败。他和部落失散，兄弟子侄全被杀了，只身逃到隋都大兴哭诉。隋朝官方很给突利面子，不说他是惨败逃来保命，而是用了一个特别文

雅的词：入朝。

突利的失败，就是隋朝对突厥政策的失败。

杨坚当然不甘心失败，加大了对突利的扶持力度，把突利可汗更名为“启民可汗”。当时安义公主已经死了，杨坚又把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做妻子。同时，隋朝在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安置启民可汗。启民可汗一开始的实力实在太小，不足以完成隋朝期望的镇抚任务，于是隋朝就帮助启民可汗收集部众，修建工事，还专门在河套地方辟出牧地给启民可汗游牧。为了防止都蓝和达头把启民可汗扼死在摇篮里，隋朝屯兵两万，日夜保护启民可汗。可以说，启民可汗完全是隋朝一手“制造”出来的东突厥可汗，启民本人也完全听命于隋朝。

隋朝不仅扶持启民，还主动出兵攻击都蓝和达头，将投降和俘获的突厥人都交给启民可汗管辖。突厥属下降附隋朝的部族，隋朝也全部划给启民可汗管辖。东突厥就这样分裂为了南北两部，启民在漠南，都蓝在漠北。

开皇二十年（600）十二月，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北突厥内讧。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企图兼并北突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当时的启民可汗已经小有规模，隋朝就命令启民可汗率部招降北突厥。在隋朝的支持下，启民可汗进展顺利，北突厥属下各部纷纷降附，东突厥重新统一。奚、室韦等东胡族也都依附启民可汗。此后，西突厥和东突厥、隋朝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隋朝要么命令启民可汗反击西突厥，要么和启民组成联军共同还击。突厥问题已经不再是隋朝北方边界的问题了。

隋朝通过启民控制了广大的北方草原，北方边界维持了长期的和平。

突厥问题的解决，功劳最大的是长孙晟。其实长孙晟这个人最大

的本领还不是和突厥打交道，而是“识人”。他选择了一个乘龙快婿——李世民。唐朝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是长孙晟的女儿，长孙无忌是他的儿子。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长孙晟生前一直是很勤勉的隋朝官员，丝毫没有国丈的派头。

改革决定高度

开皇九年（589），隋灭南陈，天下重新统一的那一年，杨坚任命高颍为尚书左仆射，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同掌朝政。

高颍与苏威并称为“开皇名相”。

高颍不仅是隋朝的开国功臣，还是隋朝制度的制定者。在高颍的主持下，隋朝的行政制度、官制、法律等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高颍用他的创造力，不仅为隋朝的发展制定出规矩，还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杨坚有许多重大政务和想法，都习惯交给高颍办理。

苏威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行政经验丰富，直言正谏。一次，杨坚执意要杀一个看不顺眼的人。苏威坚持此人罪不至死，不让杨坚杀。杨坚更加生气了，提着刀就要去亲自动手。苏威硬是挡住暴怒的杨坚的去路，不让他前进。杨坚闪到左边，苏威就遮挡到左边；杨坚跑到右边，苏威也赶紧拦住右边。最后杨坚没办法，拂衣退入后宫。那个倒霉的人则侥幸不死。杨坚冷静下来后，把苏威叫来嘉奖了一番：“公能这么做，朕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因此，杨坚在苏威右仆射的本职之外，还让他兼了大理寺卿和御史大夫的职务，将司法和监察大权交给了他。

在高颍和苏威的辅佐下，杨坚也开启了以政治革新为首的改革进程。开皇元年（581），杨坚刚坐上龙椅，就废除北周官制，开始了政治改革。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央设置了分权制衡的机构，将最高权力分为尚书、门下、内史（中书）、秘书、内侍（宦官）五省。尚书省

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而门下省、内史省和秘书省分别是决策、审查和记录机构。尚书省置尚书令一人（虚职），左右仆射各一人，下面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部、度支部、工部，每部设尚书一人。开皇三年（583），度支部改称民部，都官部改为刑部。一般情况下，左仆射分管吏、礼、兵三部事务，右仆射分管民、刑、工三部事务。这套“五省六部”的制度现代人看起来非常眼熟。这一政治制度在隋朝时开始定型，一直沿袭到清末。尽管其中的名称和具体分工有所更改，但基本框架始终固定不变。

这又是隋朝的一大贡献，也是“杨—高—苏”团队的一大贡献。

中央官制确定了，地方官制是隋朝君臣面临的另外一道难题。隋朝面临的的是一个地方官制混乱、官吏队伍臃肿庞大的局面，地方官制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秦汉时的郡县制在四百年的乱世中演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权力不断扩大。官制也变成了三级，而且除了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员（刺史、太守等）以外，地方官员还可以自己辟置、安插官吏，建立幕僚队伍。州、郡、县地方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员队伍名目繁多，比如典签、州都、郡正、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部郡从事、仓督、市令、光初光曹、光初主簿、县正、功曹、西曹等，不一而足。而在乱世之中，各地的官员更换频繁，最后发展到领导到任，说谁是官，谁就是官了。

为了安排越来越多的官僚，乱世中的各方各派就必须开拓出越来越多的职位。最通行的方法就是把行政区划越划越小，多设置州、郡、县。比如东汉末年，割据荆州南部的刘备为了安排兄弟张飞，硬是在今三峡地区划出了一个“宜都郡”，任命张飞为“宜都太守”。许多地方行政区划是各地官员自行划定的，一旦存在了，中央要将之废除，困难重重。人们很具体地按照地域的大小将州郡县也分为“上中下”三六九等。

此外，许多北方的士族大家和读书人也在乱世中南迁避乱。为了安排这些人，也为了寄托南迁士人的思乡之情，南方的东晋和宋、齐、梁、陈各代执行了“侨州侨郡”制度，在南方“复制”北方州郡。比如豫州（河南大部分）并不在南朝的控制范围内，但是南朝依然设置了“豫州”，相应地也设置了归属于“豫州”的各个郡县和一整套的“州政府”官员。那么，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办公呢？南朝在湖北或者安徽等地划出一块地方来，成立所谓的豫州各郡，任命官员走马上任。这样的结果是，南方的州郡越划越小，机构叠床架屋，错综复杂。

隋朝成立后，杨坚发现有的地方不足百里之地，竟然在上面设置了好几个县；有的地区居民不满一千户，竟然分属于两个郡。最荒唐的是，有的聚落只有三四户百姓，也独立成了一个县。史家常用“十羊九牧”来形容隋朝初期民少官多的局面。

可以想象，改革地方官制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要得罪不少既得利益者。然而，作为乱世的终结者，作为有责任心的君主，杨坚必须继承这份乱世的遗产。

开皇三年（583），杨坚制定了“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对地方官制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顿。

首先，隋朝罢天下诸郡，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州直接管辖县。后来，隋朝又易州为郡，地方官制成为郡县二级。到大业五年（609），隋朝达到极盛的时候，全国有郡一百九十个，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地方官制上的二级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其次，隋朝彻底废除了汉代以来地方长官自行辟署置僚佐的制度。之前，地方官员和自己设置的官吏之间往往形成从属关系，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现在，即使是最小的小官，任命和考核的权力也都收归了中央，由吏部掌管。各级地方官员都要唯中央马首是瞻了。最后，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势力膨胀，贪赃枉法，隋朝创造了许多被后世沿用的制度。比如规定官员任职要回避家乡州县，必须“异地为官”；禁止官员在地方两度

担任同一个职务；规定地方主要官员的任期为三年（后来改为四年），到期必须离任。后来，隋朝又把关注点投到了官员家属身上，规定地方官员不得带父母或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赴任，以免家属干政。

杨坚为了加强对各地官员的控制，规定每年年终各地太守或副手必须进京述职，称为“朝集使”。同时，中央政府不定期地派遣官员巡察地方，检查督促各地的政务。

政治体制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在具体的官员身上。改革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是用人的成功与否。

杨坚对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要侵害到数以万计的贵族官员的利益，多数旧贵族和旧官员不会积极配合杨坚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也需要有大批志同道合者和新型官吏参与其中，那么杨坚从哪里去寻找官场的新鲜血液呢？

隋朝成立时，官场选拔人才采用的是“九品中正制”。中央和地方州县都有专门的“中正官”，负责考核评定各地人才的等级，分为“上中下”各品各级，一共九个级别。不同级别的人才出任不同级别的官职。很自然地，世代高官的家族垄断了“中正官”的职位，给自己家的孩子和亲戚评个特别高的品级，让子孙后代世代为官。于是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当官的标准也就成了比谁家的门第高。

最先对这种近似世袭的选拔标准表示不满的是山东的士族大家们。因为北齐王朝灭亡后，山东各个大家族在北齐朝廷中当的官不算数了，他们比不过关中的北周官员贵族。后来隋朝建立了，杨坚任命的官员也主要是出身关中的贵族、士人和武将。

如此，山东的士人们便想办法寻找当官的门路。原来的北齐王朝

文化比较发达，山东的士人们文字素养普遍比较高，因此他们嚷嚷着要按照才学的高低来选拔官吏。开皇二年（582）年初，杨坚顺应山东士人的要求，命令选拔“贞良有才望者”担任官职。杨坚巧妙地将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在第二年正式取消“九品中正制”，废除了各级中正官的职务。朝廷的吏部接管了中正官的人事权，各级官员改由吏部任命。

为了规范人才选拔制度，杨坚在开皇七年（587）规定每州每年向朝廷保荐三名士人，保荐的标准是文章华美。这些士人集中到京城后，统一参加名为“秀才科”的特别考试。

对中国历史乃至民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科举制度，就此萌芽了。

紧接着，陈朝被隋朝吞并。大量的南方官员和士人“失业”了。他们比北方人更会写文章，才学更好，人数也很多，纷纷要求朝廷扩大每年参加科举的人数，给自己一个机会。开皇十九年（599）七月，杨坚下令凡是京官五品以上，或者总管、刺史，每年都可以向朝廷保荐人才。保荐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志行修谨（有德），一是清平干济（有才）。按照这两条标准保荐的人才分别参加不同的考试，被称为“举人”。这就大大扩展了科举的范围。

后来在大业三年（607）四月，隋朝将举人考试扩展到十科。其中有一科的标准是“文才秀美”，被称为“进士科”。据说这是因为隋炀帝杨广本人喜爱文学，要专门设置考察诗词歌赋的考试，于是创办了进士科。进士科只是诸多考试中的一科，当时的人们不会知道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一科会对后世产生多大的影响。

隋朝就这样埋葬了魏晋以来凭门阀高低做官的人才选拔制度，创造出了科举制度。

那么，隋朝的科举考试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有关隋朝科举的史料极少，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记载，尽量还原当年的考试情境。

开皇晚期，有个叫作杜正玄的举人去参加“秀才科”的考试。考试的内容可能是面试和笔试相结合。吏部尚书询问杜正玄一些国家的制度和治国的方略，杜正玄要响亮地回答出来，同时还要根据询问的专题将见解写成文字，呈送上去。杜正玄投考的秀才科是隋朝所有科举考试门类中最难的，因为秀才科考试的内容非常广泛，什么内容都可能考到。

朝廷选择秀才，看中的是应试者的综合素质，既包括文学素质，更包括行政和管理能力。此外，“明经科”考察的是应试者对经书（往往是某一典籍）的掌握程度，相对死板，比较适合记忆力超强的“书呆子”；“进士科”主要考文才，看一个人吟诗作赋的能力，比较适合陈叔宝那样的文学青年。考试内容不一样，人们对各科的推崇程度也不一样。隋朝的士人们最看重考察综合能力的“秀才科”，其次是“明经科”，最看不起的是“进士科”，认为进士科考的都是奇计淫巧，不实用。

通过各科考试的举人，就可以直接出任官职了，一般是九品或者八品的级别。

隋朝科举考试在大兴举行，周期可能是三年一届，也可能是不定期的。

显而易见，隋朝创办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因为家族门第产生的官职世袭现象，但家庭背景对考试的影响依然比较大。首先，所有的举人都需要官府推荐，这就表明参加科举考试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其次，考试过程中的家族关系和个人信息是公开的。比如考官问某个举人，祖父和父亲是干什么的，回答“我祖父是刺史，我父亲是太守”的举人总比回答“我祖父是士兵，我父亲是佃农”的举人要有优

势。最后，考生们在考场外的“公关活动”是不被禁止的。有钱有势的考生会提前拜访考官，送上一些自己写的或者抄袭的优秀作品，拉近关系（唐朝发展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叫作“行卷”）。尽管给普通士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还是比较欠缺的。

也许是因为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官制的改革是同步的，激烈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在隋朝掀起激烈的反应。原因很简单：如果你对官制改革不满，有意见，那么没关系，请你下岗，反正每年都有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新官员等着替换你的位子。

隋朝君臣还在土地制度和赋税徭役制度上进行改革，推动了隋朝的经济繁荣。

开皇十二年（592），杨坚在全国推行均田法。隋朝的均田法沿用北齐的制度，规定不管奴婢还是普通民众，每丁（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受“永业田”二十亩^[1]，永业田为百姓个人所有，可以继承和自由买卖。另外，国家颁给成年男子露田八十亩，女子露田四十亩。露田归国家所有，受田人到一定年龄后要归还国家。有健壮耕牛的家庭，可以按照每头牛六十亩的标准领取额外的田地（最高不能超过二百四十亩）。均田法的颁布，是对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带有强烈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色彩。好在常年战乱之后，国家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无主土地，天下也有大量的荒地，再加上杨坚向各地派出了大量钦差大臣督办，隋朝的均田法得以在全国推行。

均田法公布后，天下百姓欢呼雀跃。当然，既然拿了国家的田地，就要为国家出力——服徭役。

北朝时期，百姓是十八岁开始受田，同时开始承担赋税徭役，二十岁开始有义务当兵，六十岁以后免力役，六十六岁以后退田，同时免租、调（按户征收的一种赋税，每户每年缴纳定额的丝、麻、绵等物资）。具

体的赋税标准如下：已婚的人每年交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未婚的人减半；夫妇二人合称一床，每年交给朝廷垦租二石，交给地方州县义租五斗，外加绢一匹，绵八两。具体的徭役标准如下：十八岁到五十九岁服徭役，每年服役时间不超过三十日，单位时间里每家只需出一人服役，以保证农时。

北周时期，苏威的父亲苏绰制定了王朝的赋税和徭役标准。他曾对年少的苏威承认自己定的役法过重，还可以减轻。后来苏威继承父业，执掌了隋朝的经济大权，他奏请杨坚减轻赋税徭役，得到杨坚的支持。

开皇三年（583），隋朝将百姓承担赋税徭役的年龄延后到二十一岁，而受田的年龄依然是十八岁。这就让百姓增加了三年稳定的收入。之后，朝廷将百姓每年服役的时间从三十天压缩到二十天，缴纳的绢数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 [2]□。开皇十年（590），规定五十到五十九岁之间的百姓可以纳庸来免除兵役。“庸”就是免役的人交纳绢代替服役，每天的数量为几尺，二十天也不过数丈。总之，苏威的改革使百姓的负担越来越轻。而在宏观上，百姓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作和家庭生产，对国家经济也是有利的。

均田制和租庸制度也被唐朝沿袭，成了又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在理论上，隋朝的赋税和徭役都不算重。

开皇初年，隋朝的户口数目是三百六十余万，灭陈后得到五十万户。为了同豪强和贵戚争夺隐蔽的人口，也为了将流民编入户口，隋朝开展了全国户口检查工作。这项工作难度很大。有钱有势的人家要隐藏奴婢，为自己服役；许多百姓不愿服役纳税，时常涂改年龄牟利。隋朝就进行“貌阅”——原始的人口登记制度，即将每个人的相貌和年龄等情况记录在官府户籍登记簿上，让隐藏人口和逃亡变得非常困难。到了大业五年（609），隋朝登记有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户，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人。（见《隋书·地理志上》）

政治上的改革和经济上的繁荣带动了开皇年间文化的发展。

之前几百年战乱使得大量文化典籍在战火中焚毁、遗失，开皇初年出现了“书荒”。于是，隋朝在成立的第三个年头下诏求书，规定献书一卷赏绢一匹。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时有个叫作刘炫的人，赶紧埋头去找书。可是书哪有那么好找啊，刘炫脑袋一转，想朝廷是下诏求书，没说现写的书不算啊。于是，他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开始写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炫不久就“攒”出了《连山易》《鲁史术》等书，共计一百卷，恭恭敬敬地献给官府。当地官府没有专门的人才来辨别图书的真伪，同时也不愿意打击民间献书的积极性，只好按照一卷书一匹绢的赏格奖励了刘炫。刘炫因此成了一个小财主。如此真真假假，民间古书、异书层出不穷，隋朝社会没几年就图书丰富，图书馆里藏书不绝了。

求书仅是一个开端，杨坚在文化教育方面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把文化教育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但几百年的乱世沉重打击了文教事业，使得社会上“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百姓们不重视道德，你争我夺。为此，杨坚高呼“治国立身，非礼不可”，表示要“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他也承认“积习生常，未能惩革”，发扬文教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杨坚要求全国建立健全文教制度，地方官员大力宣扬朝化，百姓在非役之日和农闲之时，学经习礼，目标是让全天下都“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隋书》不吝篇幅，全文记载了杨坚的这道诏书，并说诏书颁发后不久，天下州县都设置了博士加强文教事业。可惜的是，因为文化和教育乃百年大业，短期内难见成效，

后人无法在短暂的隋朝历史上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耀眼的文教成就。但是隋朝扭转乱世积习、重拾文教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开皇十二年（592），度支官奏称：“天下府库都藏满粮食布匹，无法接纳新的物资。许多物资只能堆积在廊庑之下。”天下富足，仓库难以承载赋税物资的盛况只在此前七百多年的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出现过，那是一个被艳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因此，史家将杨坚统治时期称为“开皇盛世”。

为了储存丰富的物资，杨坚下令赶造新的仓库。当时，隋朝建设的最重要的粮仓是“黎阳仓”。黎阳仓位于隋朝的腹心地区，遗址在今天河南省浚县大伾山北麓。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战略仓库，而且是一座仓城，有城墙、护城河和驻军。仓城之外，还有漕运码头、运粮管道，与黄河水运、大运河漕运密切联系，吸收了隋朝物资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精华成果，聚拢国家血脉。隋唐时代，黎阳仓一直是国家的物资宝库、战略重地。唐末一度废弃，北宋又重新起用，并在废墟上加建新仓。两宋交替之际，该地才彻底废弃。

那么，黎阳仓到底有多大规模，储备了多少物资呢？尘封千年之后，黎阳仓因为“大运河申遗”而重见天日。2011年11月，考古队对文献记载的黎阳仓所在的近十万平方米区域进行钻探调查。经过三次考古勘探，发现黎阳仓仓城平面布局近正方形，东西约二百六十米，南北约二百八十米，总面积约七万八千八百平方米，已探明粮仓中心区仓窖八十四座，占仓城面积的五分之四。仓窖排列规整有序，以经勘探确定的八十四座仓窖的平均容积计算，黎阳仓总储量约三千三百六十万斤 [3]，可供八万人吃一年。限于实际条件和民房叠压，原址还有未勘探区域，实际仓窖数量可能更多。

《隋书》称这一时期“躬节俭，平徭赋，仓廩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最后，还不忘加一句“考

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来给杨坚的脸上“贴金”——当然杨坚也堪此美誉。

如果将盛世定义为对外国际地位崇高、外交环境安全，对内经济发达、社会进步，那么杨坚创造的开皇之治无疑是一个合格的盛世。

[1]. 亩，1亩为0.667公顷。

[2]. 丈，1市丈为3.3333米。

[3]. 斤，1市斤为0.5千克。

独孤皇后

提到“开皇盛世”，不能不说独孤皇后。

独孤皇后是独孤信的女儿（这使得隋朝皇室同之前的北周皇室和之后的李唐皇室都扯上了亲戚关系），在杨坚攀登政治巅峰的过程中帮助很大。杨坚建立隋朝后，将后宫完全交给了独孤皇后。

独孤皇后非常希望能做个好皇后。她吸取乱世中后宫混乱、滋生祸害的历史教训，大力整饬后宫体制：一是提倡简朴。一次，杨坚配药要用到一两胡粉，宫中竟然没有储备胡粉；还有一次，杨坚要找个衣领，宫中也没有多余的储备。二是对宫中女子的装扮和言谈举止都做了严格规定，禁止浓妆华服和议论朝政。三是废除三妃六嫔制度，禁止其他嫔妃亲近杨坚，谁怀孕了就让谁堕胎。杨坚的五个皇子，全部都是这位独孤皇后生的。

可贵的是，独孤皇后也以身作则，严于自律。她平时生活俭朴，衣着朴素。一次，幽州总管殷寿告诉独孤皇后说，突厥商人拿着一盒稀世明珠来隋朝贸易，要价不高，才八百万钱，建议她买下。对于皇家来说，这个价格的确不高，但孤独皇后断然拒绝，说：“如今戎狄屡次侵犯中原，国家多事，将士们征战辛苦，还是留着八百万钱犒赏有功将士吧。”

平日杨坚上朝理政的时候，独孤皇后都和丈夫同车而去。到了朝堂前，独孤皇后就下车在外面等着，看丈夫在朝堂之上和大臣们处理政务。退朝之后，独孤皇后再和杨坚一起回宫，然后和杨坚同桌吃饭，同床睡觉，继续监督丈夫。杨坚处理政务稍有不当的地方，独孤

皇后就出言相劝。令人敬佩的是，独孤皇后这么做不是心血来潮，偶尔为之，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坚持如此。在后宫，她将杨坚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就连杨坚每餐吃什么、吃多少，每天穿什么衣服、怎么穿，她都亲自过问。在外面，她还注视着杨坚每天怎么会见大臣，怎么处理政务。独孤皇后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杨坚能专心致志地处理朝政，没有一点懈怠。

我们不知道杨坚有这么一个老婆，整天几乎没有什么“人身自由”会作何感想。史载杨坚和独孤皇后两人“相顾欢欣”，关系很好。

独孤皇后最可贵的是并没有利用杨坚的政治信任为独孤家族谋取利益。外戚专权是历朝历代的一个大问题，外戚之家往往利用皇后之权获取高官厚禄，而杨坚一朝，“内外亲戚，莫预朝权，昆弟在位，亦无殊宠”。独孤皇后的亲兄弟们只担任普通的将军、刺史职位。独孤皇后的表哥崔长仁当官时触犯王法，按律当斩，杨坚看在皇后的面子上，有意赦免其罪，但独孤皇后认为“国家之事岂可顾私”，坚持将崔长仁处斩。独孤陀是独孤皇后的亲兄弟，他是个酒鬼，酗酒后就为非作歹，为害百姓。独孤皇后特地把这个兄弟叫到皇宫里，严加训斥。没想到独孤陀怀恨在心，回去后用猫鬼诅咒皇后。遭人告发后，独孤陀被判了死刑。独孤皇后为此气得三天吃不下饭，但这一次，她却出面为兄弟求情，请求杨坚赦免其罪。她说：“如果独孤陀是乱政害民，我不会为他说情。但独孤陀是因为诅咒我被判死罪，所以我请求赦免他。”最后，独孤陀被赦免了死罪。

可见，隋朝对外戚势力控制得很好，不能不归功于独孤皇后的自律。朝野上下将独孤皇后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甚至将她和杨坚并称为“二圣”。

独孤皇后的性格中具有矛盾的一面。每次听说大理寺要处决死囚，她便为此流泪，表现得很仁爱。但她会狠毒地逼迫其他怀孕的嫔妃堕胎，警惕地不让其他女人亲近丈夫，嫉妒心极强。

独孤氏十四岁嫁给杨坚时，在新婚之夜逼丈夫杨坚发誓：一辈子只爱她一个人，不纳妾，不滥情。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北周，独孤皇后这么说显得惊世骇俗，充满理想色彩。可是杨坚郑重其事地发了誓，并且做到了，一直陪伴、宠爱独孤皇后直到爱妻去世，成全了一段美好的佳话。

杨坚当了皇帝，独孤皇后形影相随，朝夕管着他。杨坚身边没有其他女人，其他女人也接近不了杨坚。杨坚这么做，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爱独孤皇后爱到了骨子里，要么怕独孤皇后怕到了骨子里。

独孤皇后如果眼睛只盯着杨坚，那是皇帝的家务事，外人不好多嘴。然而独孤皇后将自己超强的嫉妒心“泛滥”到了朝堂之上，“蔓延”到了隋朝的人事工作之中。她要求朝野上下的大臣都以杨坚为榜样，不能纳妾，不许滥情。大臣们哪受得了，纷纷向杨坚诉苦。杨坚就规劝独孤皇后，说如此严格要求未免有些不近人情。终于，独孤皇后松了口，说纳妾可以，但不许和妾室生子。此后，独孤皇后在朝堂外面盯着杨坚办公时，如果知道哪位王公贵戚或者大臣让家里的小妾怀孕了，就劝杨坚不要重用这个人，而且要降官贬爵，严加惩罚。杨坚也都照办，结果弄得满朝文武在私生活方面都谨小慎微。

开皇二十年（600），独孤皇后生病了，卧床休养。几十年来，杨坚终于获得了几天自由。一天，杨坚突然想去御花园里散散心，结果遇到了一位十七八岁的美貌少女。这个少女是旧时叛官尉迟迥的孙女，因罪罚入宫中为婢。这一天晚上，杨坚就没有回去陪伴独孤皇后，而是在外面“临幸”了尉迟氏。杨坚很喜欢这个女孩，留恋良久，第二天早朝都差点迟到了。独孤皇后很快就知道此事，趁杨坚早朝的时候，气势汹汹地去惩罚尉迟氏。她痛骂尉迟氏凭女色诱惑君王，祸国殃民，边骂边打，将一个好好的女孩打得体无完肤，当场就打死了。

杨坚早朝后，还想去找尉迟氏温存，不料得来的竟然是皇后将尉

迟氏痛打至死的噩耗。这对杨坚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惊慌失措，拂袖而起，踉踉跄跄地抓住一匹骏马，狂奔出宫。高颎等大臣见状，赶紧招呼人跟随在后“护驾”。杨坚驰出宫门，也不走大路，跌跌撞撞地跑了二十几里路，最后骑马停在一所寺庙里。他神情恍惚，四处乱走。高颎、杨素等大臣闻讯也都赶到寺庙里，恳请杨坚回宫。杨坚不理不睬，高颎便拽住杨坚的马缰苦谏。半晌，杨坚对高颎吐苦水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据说，汉语中的“自由”一词，出处就在这里。高颎劝他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意思是皇帝要以天下为重。杨坚这才稍微平复了心情，驻马良久，在外面转悠到深夜，才返回宫中。“离家出走”行动半途而废了。

经过这么一闹，独孤皇后认了个错，杨坚夫妇也重归于好了。可独孤皇后的嫉妒心依然旺盛，为此还恨上了高颎。她向心腹说：“高颎与我有世交，想不到他竟然如此藐视我！我堂堂国母，怎能让他轻视？”

恰在此时，高颎也被独孤皇后抓到了把柄。

高颎的妻子贺拔氏死了。独孤皇后就对杨坚说：“高仆射老了，现在死了夫人，陛下可以出面给他再娶一位夫人！”杨坚就张罗着要给高颎找个老伴。高颎哭着谢绝了，说：“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感谢陛下垂哀老臣，但纳室续娶并非臣所愿。”杨坚因此作罢。

谁料不久，高颎的一个爱妾生下了一个男孩。高颎老年得子，同僚们纷纷致贺，杨坚也为老搭档感到高兴。独孤皇后却很不高兴。杨坚问她为什么不悦，独孤皇后说：“陛下难道还能相信高颎吗？之前陛下想为高颎续娶，高颎明明是心存爱妾，却欺骗陛下说是念旧不想再婚。现在他和小妾生子，欺诈阴谋已经败露，陛下还怎么相信他！”杨坚一算时间，高颎和小妾亲密应该是老伴生病期间，于是听信了皇后的话，内心对高颎有了意见。

独孤皇后本来就忌恨高颀，现在更恨高颀与妾室生子，动不动就在杨坚耳边说高颀的坏话，到处宣扬高颀行为不检点。渐渐地，杨坚和高颀的关系也不像早年那么亲密了。

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将杨坚和高颀关系中的裂缝越撕越大，最终导致了两人决裂。

杨坚晚年有些好大喜功，曾经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战前，高颀坚决反对出兵，但是杨坚非但不听，还任命小儿子汉王杨谅为主帅，高颀为监军，辅助杨谅。杨坚知道杨谅年轻，没有经验，事先赋予了高颀“专委军事”的大权。这次战争进展得非常不顺利：陆军刚走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就爆发了传染病；水军出海不远又遭遇了大风，损失了多数战舰。结果，隋朝大败而归，回来的士兵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二。

对于此次战争的失利，杨坚雷霆大怒。独孤皇后乘机诋毁高颀说：“高颀本来就不愿打仗，陛下派遣他出征，他肯定不会卖力。我一开始就知道会出师无功！”而在征战过程中，高颀认为杨坚授予了他征战大权，便事事出头做主，对名义上的主帅杨谅的意见很不尊重，通常予以否决。他总觉得杨谅年轻，考虑不周，却忘记了谨慎为臣的道理，“无自疑之意”。杨谅原本对指手画脚的高颀就非常不满，后来打了败仗，闹得灰头土脸的，就由不满转为怨恨了。回到京城后，杨谅就向父皇和母后哭诉：“儿子我幸亏没被高颀杀掉，才能侥幸回来见到双亲。”杨坚和独孤皇后自然偏信小儿子的话，对高颀更加不满了。

第二件事情是开皇十九年（599）的“王世积案”。王世积是从北周进入隋朝的老臣，立下了不少军功，官拜隋朝的凉州总管。和当时许多跨越了两个朝代的大臣一样，王世积在杨坚篡位之前，很难调适自己的心理。王世积头脑比较简单，他知道高颀是新崛起的掌权人物，就偷偷问高颀：“吾辈俱周之臣子，社稷沦灭，其若之何？”他内

心的纠结、不安，都体现在这句话里了。高颍闻言，并未作出回答，只在心里暗自感慨王世积思想简单，口无遮拦。当然，作为一个厚道人，他也没有举报王世积“心怀旧主”。

事情过了二十年，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官府四处捉捕他，皇甫孝谐投奔王世积，恳求收留。王世积不愿多事，闭门不纳。皇甫孝谐最终被捕，发配桂州。他心中怀恨王世积，就告发王世积“谋反”，说王世积在凉州暗中训练精兵，图谋不轨。这是子虚乌有的诬告，本来是打不倒王世积的。但是，杨广、杨素等人翻出了王世积和高颍的老账，罗织罪名，指使亲信大臣上奏说王世积对本朝不满，囤积兵马，准备谋反，同时指认高颍与王世积交往联系，发泄不满。高颍还接受了王世积赠送的河西宝马。他们把真真假假的信息都混合在一起，利用杨坚的多疑猜忌，让杨坚相信了诬告。最终，王世积遇害。

杨坚对高颍的不满，此时都发泄了出来，他认定高颍有罪。大将贺若弼、兵部尚书柳述等众多官员纷纷出面申辩，为高颍开脱。大家认为高颍即使有罪，也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应该赦免。杨坚更加恼怒，认为高颍平日结交朝野官员，结党营私，下令敢为高颍辩解者一律罢贬。很快，朝野再也没有人敢为高颍说话了。当年八月，杨坚免去高颍尚书左仆射的职务，保留齐国公爵位，让其赋闲回家。

高颍毕竟和杨坚搭档二十多年了，感情很深。当时，与高颍对立的晋王杨广、杨素等人为了不让高颍有任何重起的机会，便暗自谋划了一个计策。没过多久，高颍的部属就上书揭发说：“高颍的儿子高表仁曾经对高颍说：‘司马懿当初托疾不朝，赋闲居家，最后不也利用政变夺取了天下吗？父亲今天遭遇挫折，焉知非福！’”外人不知道高表仁有没有这样宽慰父亲高颍，如果高表仁真的将高颍和篡位夺权的奸臣、西晋缔造者司马懿相提并论，无疑是将落难的父亲向地狱门口推了一把。

杨坚不得不怀疑高颀的忠心，下令囚禁高颀，严加审讯。司法部门很快又奏称有和尚术士对高颀说：“明年国家有大丧。皇上在开皇十七、十八年有大厄，最迟不会躲过开皇十九年。”这简直是在诅咒杨坚！杨坚十分愤怒，对着群臣咆哮说：“帝王之位岂可强求！高颀与儿子谈话，自比晋朝皇帝，安的是什么心啊？”皇帝都给高颀定性了，有关部门只好奏请处斩高颀。最后时刻，杨坚还是念了往日情分，说：“去年杀了虞庆则，今年又杀了王世积，如果再诛杀高颀，天下会怎么看我呢？”于是，高颀被免去了爵位，降为庶民。

早在高颀出任尚书左仆射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就告诫他说：“儿子，你富贵已极，但要当心自己的脑袋，平日里要慎之又慎啊！”高颀也一直担心发生祸变，现在被贬为平民百姓了，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如释重负，一点悔恨的样子都没有。

高颀被斥退后，接替其职位的人是杨素。

杨坚统治时期，隋朝的尚书左右仆射（高颀和杨素被尊称为丞相）人选相对固定。高颀长期担任尚书左仆射，开皇九年（589），苏威出任尚书右仆射，三年后因为用人不当而被罢免，由杨素接任。现在高颀被免职，苏威也宦海沉浮，杨素成了强势的尚书左仆射。

杨素的能力和功绩可能不逊于高颀，但个人品德、操守根本无法与高颀相比。杨素不仅对人严厉苛刻，而且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高手。调任要职后，他总是忙着捞钱，大兴城和其他大都会中到处都有杨家的客栈、磨坊、田宅。杨素还乐衷享受，看不起那些不会享受、只知道低头干活的同僚。他在家中蓄养了成百上千的妓女和侍妾，还有更多的奴仆维护着他那奢侈得像皇宫一样的府邸——不止规模样式仿照皇宫，内部装修也遵循皇家标准。

同时，杨素非常善于伪装，很会在杨坚面前装出艰苦朴素、勤勉

为政、尽忠报国的样子。杨坚至死都认为杨素竭诚尽职，对杨素信任有加。

早在开皇十三年（593），杨坚想在岐州（今陕西凤翔）之北建造一座仁寿宫，作为皇家行宫，便命令杨素督造。为什么选择杨素呢？因为杨素“驭戎严整”，管理军队很有办法，而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督工最有效。当时，著名的建筑专家宇文恺正在担任莱州刺史，也被抽调来负责具体技术。杨素领命后，广征百姓，“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样样求全求好，对民工奴役颇深，管理苛刻，结果逼死和累死了许多百姓。百姓倒毙在工地上，杨素就下令把尸体推进坑里，盖上土石，筑成平地——等于把百姓的身体当作原料了。于是，几万百姓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仁寿宫。

仁寿宫落成后，高颀前往验收巡视，回来后报告杨坚说宫殿绮丽壮观，豪奢过度，而且害死了数万百姓。杨坚听了，就对杨素很不满意。他亲自跑到岐州去看仁寿宫，果然是琼楼玉宇，奢侈无度，于是勃然大怒，斥责杨素是“殫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既浪费了民力财力，又让他在天下人心中留下了坏印象。杨素一听，害怕了。他病急乱投医，拉住了二十五岁的土木监封德彝，请教避祸之道。封德彝是个温文尔雅的秀才，善于出谋划策，他对杨素说：“杨公勿忧，等皇后到了，必有恩诏。”杨素一听就明白了，封德彝是让自己去走“夫人路线”。杨素赶紧哭哭啼啼地找到独孤皇后，摆出了一大套理由：“帝王本来就应该有离宫别馆。现在天下太平，造一座宫殿又何必担心破费呢？”独孤皇后觉得很有道理。第二天，杨坚召杨素来痛斥，一旁的独孤皇后替杨素辩解说：“杨素知道我们夫妇老了，没有娱乐休闲的地方，这才盛饰仁寿宫。他难道不是一个忠孝之人？”杨坚听后，非但没有追究杨素的责任，还赏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他又一次去新宫游览观光，换了一种眼光去看，看得兴高采烈，直夸杨素是忠臣。

杨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他在内心里接受了杨素的

那一套思想观点。此时隋朝已建立多年，杨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勤政之心消失了，开始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了。变成杨素的同路人之后，以节俭著称的杨坚夫妇开始挥金如土，荒于政务，对百姓的呼声也充耳不闻了。也许，他们觉得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天下已经富足安康，享受的时刻到来了。

此后，仁寿宫成了杨坚和独孤皇后经常光临的地方。有的时候，夫妇俩一年来好几次，住下就不想走了，干脆命令把大兴城的政务奏章也转交仁寿宫。每次往返的时候，皇家车骑銮驾，扈从万千，光亮得很。而沿途百姓不仅要提供车驾沿途需要的食品、水、享受的物资，还要跪迎“二圣”。杨坚夫妻的享受变成了扰民的行为。

豪奢享受的时间长了，处理政务的时间就少了，杨坚晚年的统治开始黯淡下来。仁寿元年（600）四月，突厥的达头可汗侵犯边界。隋朝派出了大军分路反击，最后打赢了。杨素作为其中一路的统帅，功劳没有大将史万岁大。史万岁长期对突厥作战，威名在外，被突厥人视作战神，即使夜晚史万岁没有警备，突厥人也不敢偷袭。在突厥人看来，史万岁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这一次突厥军闻其名而逃，不敢接战。史万岁不依不饶，乘势率少数骑兵追击，深入敌后数百里，斩首数千。战后论功行赏，史万岁是战果最大的，这就引起了杨素的嫉妒。除了少数几个人（杨坚、高颎等）外，杨素看不起其他人，容忍不了史万岁的功绩比自己高，就向杨坚谮毁史万岁：“突厥本已投降，这次只是来塞上放牧，根本不是入侵。史万岁为了立功，故意挑起战端，破坏我朝和突厥的关系，现在他又来邀功。”杨坚宠信杨素，就把史万岁和部下的功劳一笔抹杀了。史万岁多次上书申述，杨坚都不予理睬。

从此，杨素更加有恃无恐，凌辱众臣，但他唯独对封德彝有好感。封德彝替杨素解决难题后，被擢升为内史舍人，很快又升迁为侍郎。杨素常常和年轻的封德彝讨论朝廷大事——许多是封德彝那个级别的官员不应该知道的事情，终日不倦。一次，杨素谈到兴头，拍拍

自己坐的榻子说：“封德彝日后肯定会坐我的位子。”

从重用明达世务的高颀转而信赖曲意逢迎的杨素，也可以看出杨坚晚年在统治上的识人不明。其实，这一切都根源于他敏感多疑的个性。多疑是古代皇帝的共性，只是强弱有别。但杨坚是重度患者，《隋书》评价杨坚“天性沉猜”。这样的性格在他执政初期，对国事尚未产生重大影响，而随着天下安定，他对权臣的猜忌便愈深，反而是那些善于逢迎、伪装的大臣更易得到信任。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的性格影响巨大，甚至足以主宰王朝政治的发展。杨坚深深的不安全感、多疑猜忌的个性，直接影响了隋朝的权力交接，进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朝的命运。

盛世当官

难杨坚驾驭臣下充满矛盾性，于是在开皇和仁寿年间，当官成了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对于清廉自守、政绩出色的官员，杨坚不吝重奖。开皇十一年（591），临颖县令刘旷考绩为天下第一，马上被擢升为莒州刺史。五年后，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绩第一，杨坚赏给他帛三百匹，布告天下，把他树立为学习典型。按照惯例，京城内外长官都有公廨钱，用来放债牟利。开皇十四年（594），杨坚下诏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级分给职田，增加百官的收入，同时停止放债扰民。

重奖的另一面是重罚，剥夺官员的地位、财富乃至生命。相比重赏，杨坚使用惩罚的次数更多。杨坚年纪越大，对待臣下越严，一旦发现罪状，必责不贷。他还经常派人侦察朝野百官，监督臣下都按照自己的要求做事。《隋书》说：“上性猜忌……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觐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

开皇初年，杨坚让高颎等人修订了《开皇律》，废除了乱世特有的许多严刑峻法。但是杨坚在他的统治过程中又不断地增加了许多新的严刑峻法，有的简直就是酷刑。比如规定：凡是偷盗边关军粮一升以上者，斩，家人没入官府为奴；凡盗窃一文钱以上者，斩；四人共盗一桶、三人共偷一瓜，全部问斩。过去有些严刑峻法是放在那里威慑百姓的，杨坚则将这些酷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一次早朝，有一名武官未将宝剑佩带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提醒纠正。杨坚知道后将御史斩首了。

一日，蕃客馆（外宾招待所）的几个下人在庭院的地毯上玩耍，而不去清理一旁的马屎。杨坚知道后，将在场的所有人和蕃客馆的主管官员全部斩首。

杨坚为了考验官员的“抗腐拒贪”的决心和能力，往往安排人私底下拿着钱帛“贿赂”官员。如果有人拿了，立斩.....

发展到最后，当杨坚向人询问某些事情，如果旁人不能解释清楚，也会被拉出去斩首。隋朝的朝堂之上，天天响起打人、杀人的哀号之声。尚书左仆射高颎（还在任的时候）、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多次劝谏杨坚，说：“朝堂不是杀人的场所，殿廷也不是判决处罚的地方。”但杨坚就是不听。因为杨坚的残暴，吏部尚书韦世康不等年老体衰，便告病还乡，他觉得在杨坚手下当官实在太恐怖了。

杨坚的表现，显示出他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人。

在隋朝建立初期，杨坚提倡节俭。苏威曾见到宫中以银为幔钩，认为太奢侈，提醒杨坚节俭治国。杨坚于是下令撤掉所有雕饰豪华之物。因为皇帝本人提倡节俭，隋朝前期整个社会以俭为荣。当时的士人平常都穿布帛，饰物都只用铜、铁、骨、角而摒弃了金和玉。但是杨坚晚年喜欢大兴土木，开始追求奢侈享受，完全违背了之前的节俭形象。

杨坚早年也关心百姓疾苦。开皇初期，关中发生大饥荒，杨坚知道百姓用豆粉拌糠当饭吃后，亲自拿着这样的食品在朝堂上遍示群臣，痛哭流涕。之后他下令降低自己的膳食标准，不喝酒，不吃肉。早期出巡的时候，杨坚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会主动让路，还对百姓好言抚慰；遇到难走的道路，杨坚甚至会令左右侍从去扶助负重难行的人。但到了晚年，杨坚爱民之心大减，一再增加百姓赋税，用严刑峻法惩治那些反抗的人，普通百姓往往因为一丝一毫的过错而锒铛入

狱。

杨坚早年还澄清吏治，希望搞好君臣关系。杨坚统治初期，一度礼遇、厚待大臣们，人尽其才。比如他对高颀的重用，对贺若弼的宽容。但是越到晚年，杨坚就越沉迷于个人世界，对臣下越苛刻，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率性举动，结果造成了贤臣去、佞臣留、奸臣做大的局面。许多后人评价杨坚是成在用人，败也用人。

第四章 说不清的家事

“美好愿望”

杨坚长期生活在政治恐惧之中，又是通过仓促政变侥幸上台的，所以严重缺乏安全感，多疑猜忌。这种心理疾病严重影响了隋朝政治。它在杨坚身上的表现，一方面是猜忌、防范乃至杀戮大臣，另一方面则是厚待自己的儿子们，树立藩镇来拱卫皇权。

杨坚篡夺了北周的江山，在篡位过程中他得出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北周的迅速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宗室力量薄弱，关键时刻没有力量保卫皇权，眼睁睁看着江山落入了异姓人的手里。杨坚从中吸取教训，认为上阵父子兵，血缘关系才是最靠得住的。一旦到了危急时刻，皇帝还是离不开宗室诸王来镇压叛乱，保卫自己。所以，杨坚一登基就大封杨姓诸王，并且给予关系亲近的子侄以实权，让他们出镇一方。其中，杨坚重点栽培、寄予厚望的，就是嫡长子杨勇。

杨坚政变夺权后，立刻任命杨勇为洛州总管，向东镇守洛阳，统管原来的北齐之地。很快，杨坚又征召杨勇回京，晋升杨勇为大司马，领内史御正，掌握宫廷宿卫。此外，杨坚在宣布登基的第三天，即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十六日，就册立杨勇为皇太子。杨勇这个皇太子可不是虚职，凡是军国大事，杨坚都让杨勇参与决策，有些事情杨坚干脆就让大臣们禀报太子处理。可见，杨勇这个皇太子是握有实权的，而他当时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册立杨勇几天之后，杨坚又册封其余四个皇子王爵——次子杨广为晋王，三子杨俊为秦王，四子杨秀为越王（同年九月改封为蜀王），五子杨谅为汉王。封王完毕后，杨坚没有让儿子们都歇着，而是给他们配置了助手、幕僚，安排他们镇守地方。其中，晋王杨广曾任并州总管、扬州总管，秦王杨俊历任秦州总管、扬州总管、并州总管，蜀王杨秀任职益州总管，在实践中接受千锤百炼。最小的汉王杨谅因为才六岁，实在不能独当一面，所以开始并没有给他压担子。杨坚的如意算盘是给皇子们军政大权、兵马粮草，并配备官员，创造条件好好锻炼他们，等他们成才后便可以保卫他，让杨家的天下江山永固。

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他和独孤皇后生的。独孤伽罗十四岁嫁给杨坚，夫妻二人感情非常好，在隋朝建立前生了这五个儿子。杨坚“誓无异生之子”，发誓不和其他女子生育儿子。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对此，他本人很自豪，曾经向大臣们炫耀说：“前代的帝王宠幸妃嫔，嫡系和庶出的皇子众多，废立之事由此而出。朕不亲近嫔妃，五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可谓是真兄弟，哪会出现前代那样内宠争斗、孽子夺权的亡国之事！”皇室内部兄弟争位、骨肉相残的悲剧不会在杨家重演。

杨坚的想法是美好的，也花了很多心思培养儿子。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在五个儿子中，杨坚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确立长子杨勇为自己的接班人，重点栽培。他之所以早早地册立太子，是由于内在的不安全感作祟，想通过预立太子来确定新王朝的根基。皇太子制度，中国自古有之。太子也叫“储君”，一个“储”字说明了他的特殊地位：随时准备继位。朝野把太子看作是国家根本、王朝之基。一个朝代如果没有太子，接班人就没有着落，君臣心里都没有底，会担心他人觊觎皇位，祸患横生。有了太子，就可以断了他人的歪思邪念。所以在位的

皇帝不管年纪大小，都会册立嫡长子为太子，如果没有嫡子，就从庶子中挑选太子。这其中，既有古代人家族宗法观念的影响，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太子杨勇不仅是杨坚的嫡长子，而且品行不错，具备一个皇位继承人的基本素质。杨勇容貌俊美，生性好学，写得一手好辞赋，吸引了一批文人学士在身边。而且杨勇贵为太子，却个性宽厚、言行温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为人不矫揉造作，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就做人而言，杨勇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从开皇元年（581）一直到开皇十年（590）左右，杨勇皇太子的地位都是非常稳固的。在这十年时间里，杨勇和父皇杨坚、母后独孤伽罗的关系很融洽，没有产生矛盾。同时杨勇还获得了一大批大臣的支持，其中就包括诸多的政坛重量级人物。当然，杨勇最强大的政治盟友就是尚书左仆射高颎。

高颎在隋文帝时代，地位特殊。杨坚登基前，高颎是他的谋士；杨坚登基后，从开皇元年至开皇十九年（581—599），除了短暂的几个月外，高颎一直担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整整二十年里，高颎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权倾一时。而他坚决支持太子杨勇，还让儿子高表仁娶了杨勇的女儿为妻。当朝宰相公开把自己和太子绑在一起，高调地拥护太子。

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是一方，宰相高颎是第二方，太子杨勇是第三方，他们三方的关系在开皇前十年里非常融洽，相互支持。因此杨勇的太子地位固若金汤，几乎是不可撼动的。当时的大臣，都以和太子杨勇交往为荣。比如灭陈功臣贺若弼，就对人夸口说：“皇太子于己，出口入耳，无所不尽。”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那么，在这个表面看起来如铜墙铁壁一般的平衡三角当中，就没有一点儿的瑕疵吗？还真有一点不太和谐的地方。那就是在物质享受

方面，杨坚和杨勇存在矛盾。

隋文帝杨坚是开国之君，深知“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提倡节俭。杨坚身为九五之尊，生活非常朴素。但是杨勇不一样，他从小生活在锦衣玉食当中，没有体验过苦日子，在他价值观开始定型的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是皇太子了，一切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所以，杨勇并不觉得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生活有什么不对。

杨坚把太子杨勇的奢华生活看在眼里，心生不满。终于有一天，杨坚把杨勇叫了过去，很严肃地给他上了一堂“忆苦思甜”的课，讲了很多诸如物力维艰、勤俭持家之类的话。杨勇听在耳朵里，心里却大不以为然。也许杨勇回到东宫后，把一百人的乐队裁减到了八十人，把平时喝的西域美酒换成了长安本地产的佳酿。这在杨勇看起来就已经是非常俭朴了，但在杨坚看来还是很奢侈、很浪费。在追求物质享受上，杨坚对太子是不满意的。

但是，这个矛盾远远不足以动摇杨勇的太子地位。杨勇更大的危险，来自于他的母后——独孤伽罗。

之前我们说过，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并称“二圣”。独孤皇后的嫉妒心特别强，容不得男子宠爱姬妾。偏偏独孤皇后的大儿子、太子杨勇是一个三妻四妾的人。杨坚和独孤皇后为杨勇迎娶了系出名门的元氏为太子妃。这个元妃出身高贵，生性温婉贤淑，端庄有礼，在独孤皇后看来非常适合将来母仪天下，她从心底喜欢这个儿媳妇。但是杨勇不喜欢既严肃又刻板的太子妃，而喜欢出身工匠家庭的云氏，所以立了云氏为昭训。云昭训不仅相貌秀丽，而且活泼乖巧，很对杨勇的脾胃。杨勇宠爱云昭训，对待云昭训的礼遇超过了正妻元氏。后来，杨勇和云昭训生下了隋文帝杨坚的皇长孙杨俨。杨坚虽然觉得这似乎有些不妥，但还是封杨俨为长宁王。可在独孤皇后看来，自己的长孙竟然是一个侍妾所生，她完全接受不了，进而讨厌起了杨勇这个儿子。

开皇十一年（591）正月，常年失宠的太子妃元氏郁郁而终。她的死属于暴病而亡，第一天传出来太子妃有心疾，第二天就病逝了。独孤皇后怀疑其中有阴谋，为此痛骂了杨勇一顿。太子妃死后，东宫由侍妾云昭训专权。这下子独孤皇后愤怒了，这完全是在挑战她这个皇后的价值观！而且挑战者还是自己的大儿子。

独孤皇后认定是杨勇和云昭训合谋，害死了太子妃元氏。从此以后，独孤皇后就派人监视杨勇，专门观察杨勇的过错。人一旦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另一个人，肯定会挑出他的缺点。慢慢地，独孤皇后发现自己的大儿子罪过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让人忍受。于是她开始给丈夫吹耳边风，鼓动杨坚另选贤能，改立太子。

隋文帝杨坚虽然对独孤皇后的话言听计从，但是改立太子不是一件小事。杨坚对杨勇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只是在心里开始有了负面的印象，而且这个负面印象的影响在日渐扩大，持续发酵。

皇位争夺战的领跑者杨勇开始有危险了。这也暴露出了预立太子制度的缺点。

首先，预立太子制度对皇太子的成长不利。尤其是中国古代的皇太子，往往都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皇帝确立为接班人。他们是顶着“明日天子”的光环接受教育，并且成长起来的。他们过早地失去了正常的孩子应该有的童年和少年，失去了像正常人那样塑造人生观、价值观的机会。此外，年轻的太子们很可能成为骄奢淫逸、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人，因为他们的周围不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就是战战兢兢的庸才。他们想要什么，这个世界都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所以他们不会真切地感受到艰苦朴素、奋斗进取等精神的含义。就比如十多岁就被册立为皇太子的杨勇，他就不知道什么景况叫作“物力维艰”。在后面，我们还会发现，杨勇不知道“以退为进”“韬光养晦”等许多道理。

一句话概括，预立太子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皇太子往往没有健全的人格和正常的情感。

其次，这项制度也让皇太子早早地成为众矢之的，增加了成功继位的风险。皇太子制度虽然明确了皇位的继承顺序，但也把第一继承人早早地推到了各派政治势力面前。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争夺皇位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歇。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太子就成了各派政治势力争相打击的目标，反而不利于太子的顺利登基。

杨勇被册立为皇太子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处在朝野臣民的关注之下。杨勇表现出来的忠厚大度、平易近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应该的，谁让他是太子呢？太子就应该表现出优秀的品格和过人的地方。但是杨勇的任何缺点，都被放大了。独孤皇后为什么对杨勇专宠云昭训的事情出离了愤怒，为什么派人监视杨勇？还不是因为杨勇是太子吗？人在放大镜下最容易出错。太子不好当啊！

相比较杨勇，杨坚的三子杨俊的品行才堪忧。杨俊奢侈无度，好色淫乱。杨坚任命杨俊为并州总管，把山西交给他治理。可杨俊在任上只知道聚敛民财，奢侈享受，还搜罗美女，胡作非为，最后发展到违制建造宫殿的地步。杨俊的王妃崔氏出身名门望族，和婆婆独孤皇后一样嫉妒成性。崔氏看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竟然在水果中下毒要把杨俊毒死。可能是第一次杀人，崔氏的药量放得不够，没有把杨俊毒死，只是毒残了而已。

杨坚知道这桩悲剧后，下诏赐死谋害亲夫的崔氏，同时免去杨俊的官职，拉回京城囚禁起来。这时大臣们纷纷上奏，认为杨坚对儿子的处罚太重了。杨坚却说：“我不仅是五个儿子的父亲，还是天下亿万百姓的父亲。如果对儿子就要法外施恩，还不如为皇帝的儿子专门制定一套法律呢！”

杨俊身子瘫了，官职也没了，躺在床上十分后悔，决定上表谢罪。然而杨坚不仅不安慰瘫痪的儿子，还下了一道严厉的诏书痛骂了杨俊一顿。杨俊羞愧难当，病情加重，很快死了。

至于杨坚的四子杨秀，也是个恶劣之辈。杨秀性情暴躁，为人残酷，曾经生剖死囚，取胆为乐。杨坚一直很讨厌这个儿子，曾对独孤皇后说：“杨秀不得好死！我活着的时候，他不会出什么事情，但等我死了，杨秀肯定会造反。”尽管如此，杨坚仍然让杨秀去统治四川地区。结果杨秀在蜀地“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关起大门做起了小皇帝。

杨坚的五子是汉王杨谅，年纪尚小，我们暂且不表。至于二皇子、晋王杨广，则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好好研究一番。

表演政治家

杨坚和独孤皇后的五个儿子当中，心机最深的要数晋王杨广。

开皇元年（581）二月，杨广和诸位兄弟一起受封，当时他只有十三岁。在获封晋王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童年彻底结束了。那些简单、纯真、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杨广是晋王了，是一个政治人物了，他必须早早地进入新角色。

杨广发现，自家五兄弟相互观察对方的眼光也很自然地在封王的那一刻改变了。尤其是四位弟弟看待哥哥杨勇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改变了。之前，他们是兄弟，可以吵吵闹闹，甚至相互打骂；现在，大哥是太子，弟弟们是王爷，有尊卑贵贱之分，不可以再喧闹打骂了；将来，大哥是皇上，弟弟们是臣子，彼此是君臣而不是兄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自己的生死祸福就掌握在大哥的手中了。这是一道多么深的鸿沟，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前景。就因为杨勇是大哥，一切都似乎注定了。杨广等四个弟弟难免在心中产生疑问：凭什么？

杨勇之所以能被立为太子，得益于中国自古奉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古代宗法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权力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但是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有有资格参与皇位竞争的人难免都会心动，很多矛盾就由此而生。所谓的“同胞亲情”在权力诱惑面前，逐渐被欲望击得粉碎。

杨广在北周天和四年（569）出生于京城长安。史书说杨广“美姿仪，少聪慧”“好学”“善属文”。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杨广和一般人相

比，家庭背景好，智商高，更可贵的是他比一般人还要努力刻苦。

杨广很小的时候，就名声在外。据说他七岁就能写诗，一生文学作品结集五十五卷（流传下来的有严可均《全隋文》收录的文章一百多篇和遼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诗歌四十四首，皆有据可查）。杨广曾写过《季秋观海诗》：

孟轲叙游圣，枚乘说愈疾。

逖听乃前闻，临深验兹日。

浮天迴无岸，含灵固非一。

委输百谷归，朝宗万川溢。

分城碧雾晴，连洲彩云密。

欣同夫子观，深愧玄虚笔。

如果不事先说作者是杨广，很多人都以为这首诗的作者是曹操那样的一代豪杰。杨广还写过一首《春江花月夜》，对景物特点的描绘提炼非常到位，意境优美：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杨广对自己的文学才华相当自负，当了皇帝以后曾对群臣说：“天下人都说朕是承借余绪而有四海，可就是让朕与士大夫们一较高下，也应当由朕来做这个天子。”

那么，杨广真的这么有才吗？

隋朝建立之初，杨广担任并州总管、河北道行台尚书令等，驻守并州八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开皇八年（588）冬，隋朝兴兵讨伐南陈。第二年，隋朝灭亡了南陈，时隔三百年重新统一了中国。杨广是这场战争名义上的统帅，主要出力的是高颎、杨素、韩擒虎、贺若弼等大臣。但杨广在调兵遣将，战后惩办南陈的奸臣、安定江南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当时他只有二十岁，凯旋后因功晋封太尉。从开皇十年（590）开始，杨广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整整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杨广每年回京师朝拜父母一次。

从经历可以看出，杨广在几个兄弟当中功劳最大，政治历练也是最丰富的。他在近二十年的出守藩镇的时间里，锻炼了能力，和许多文臣武将建立了联系，自己麾下也有可供驱使的人才，这就形成了杨广自己的政治力量。

开皇二十年（600）四月，北方边境形势紧张，杨坚调杨广北上抗敌。杨广成功击退了突厥，显示出了他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隋书》评价杨广早期经历说：“炀帝爱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杨广确实办事稳重、个性深沉，“朝野属望”，最有可能对杨勇的太子地位构成威胁。

开皇十七年（597），史万岁远征云南凯旋，途中分别拜访了秦王杨俊和晋王杨广。杨俊亲自接见了史万岁，好奇地向他打听云南的奇闻轶事，索要虏获的奇珍异宝。杨广也亲自接见了史万岁，“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和史万岁谈的都是军国大事，如何安定南方，如何驾驭突厥，等等。杨广和杨俊为人的高低贤愚，一望即知。

杨广在扬州的十年，镇压江南的零星叛乱，稳定社会秩序，推行

朝廷法令，打破南北隔阂，南方稳步走向繁荣昌盛。在政务之外，对于掌权的大臣，杨广都倾心相交。每次朝廷派遣使节到江都，无论对方职位高低，杨广都和颜悦色，以礼相待，临别还赠送厚礼。所以上至朝臣、下至宫中的奴婢，都说晋王仁孝。

事实上，杨广却是个伪君子，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他和大哥杨勇一样，从小锦衣玉食，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常常在府邸里莺歌燕舞，把美女左拥右抱，日夜享乐，和大哥杨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当时很正常，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宗室藩王都是这样。但杨广的不同之处是，他演技高超，用各种表演技巧把奢侈糜烂的生活掩盖起来，把自己装扮成艰苦朴素的楷模。

江南是个好地方，游玩的地方多，财富积累也快，美女如云。杨广到了江南，却能够克制住内心的欲望，十多年来洁身自好，清廉为政，夫妻恩爱，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当然，杨广能牢牢压制住物质、女色和声乐等方面的享受欲望，完全是为了实现内心埋藏的更深、更大的欲望——政治欲望。

杨广前半生过得非常顺利，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比大哥杨勇晚生了一年多。结果杨勇成了太子，自己却只能镇守江南。但凡能力高强、功劳卓著的人，往往会萌生出强烈的政治欲望。杨广的政治欲望就是能够当皇帝，治理江山，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也有资格做到。为此，他首先要取代大哥杨勇的太子地位。

杨广知道，皇子的地位和将来，仰仗于当朝皇帝和皇后的态度。所以他很重视搞好与父皇、母后的关系。杨广知道父皇怕母后，所以决定先讨母后的欢心。独孤皇后最恨男子三妻四妾，要求丈夫感情专一。杨广就投其所好，正式迎娶的姬妾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并且总是在公开场合高调地和正妻萧妃秀恩爱。暗地里，杨广经常和其他

女子交欢，怀孕了一律堕胎，发觉太晚不能堕胎时，他竟然亲手掐死自己和侍妾生的庶出子女。杨广专情的假象，传到独孤皇后那里，反响极好。独孤皇后常常感慨：同样是自己生的两个儿子，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于是，独孤皇后对太子杨勇更加不满意，开始称赞晋王杨广的德行。

取得母后认可，杨广又去取悦父皇杨坚。杨坚提倡俭朴，杨广也投其所好，每次杨坚驾临晋王府或者派使节光临的时候，杨广都要把府邸从里到外重新布置一番，把奢侈华丽的摆设都撤掉，换成朴素的物品，甚至把乐器的弦都弄断了，再在上面洒上尘埃，伪装成很久没用的样子，表现自己不好声妓。杨坚知道后，果然很满意。

一次，杨广打猎的时候遭遇暴雨，随从献给他一件油布雨衣，杨广很严肃地说：“士卒们都在雨里淋着，我怎么能一个人披雨衣呢？”他挥挥手，让随从把雨衣拿下去。杨广镇守江都十载，“每岁一朝”，每次到大兴述职的时候，车马侍从都非常朴素，一点也看得出来是藩王的仪仗。在京师的时候，杨广也拜访朝廷重要官员，礼极卑屈，表现得十分谦虚。这一切都给杨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杨坚觉得晋王杨广为人朴实，谦恭有礼，非常像自己。

杨坚虽然把几个儿子都安排到各地，但始终在暗中观察他们。他有一个非常信任的相面术士，叫作来和。当年杨坚发动政变的时候，曾遇到来和，让他给自己看了一回相。来和说杨坚相貌吉祥，无往不利，很快，当天的政变就以胜利完成，所以杨坚对来和刮目相看。现在，杨坚让来和给五个儿子都看相。来和走了一圈后，回来禀告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杨坚在心里，又对杨广多了一层好感。

隋文帝杨坚对杨广有了良好的印象，加上独孤皇后在一旁不断地夸赞杨广的品德、数落杨勇的缺点，杨坚心里的天平也慢慢发生了倾斜。连续几年，杨坚得到的信息都是杨勇失德，杨广仁孝。

渐渐地，“废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就成了杨坚心中的一个选择项。

太子争夺战

杨坚的心理变化，不自觉地体现在了政治行为上。从开皇十一年（591）起，支持太子杨勇的政治势力开始受到打击。

开皇十二年（592），“卢恺朋党案”爆发。卢恺当时担任礼部尚书，兼理吏部尚书事，主管朝廷的人事选拔，是握有实权的大臣。卢恺是太子杨勇的支持者，他选拔的官员基本上也都是支持杨勇的。当年，隋文帝杨坚认定卢恺党同伐异，罢免了以尚书卢恺为首的一批吏部官员，贬斥到地方去。虽然此事并没有广为株连，在历史上的影响并不大，但透露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杨坚对太子杨勇不满。

过了五年后，即开皇十七年（597），“刘居士案”爆发，更加明确地把太子杨勇牵连进去了。

刘居士是彭国公刘昶的儿子，属于“官二代”。他仗着家庭背景雄厚，在京师内外“聚徒任侠，不遵法度”，劣迹斑斑。一开始，杨坚看在刘昶的面子上没有追究。他觉得年轻人不懂事，只要不闹出大事来，就算了吧。

刘居士一看没人管自己，越来越肆无忌惮，纠集了一批官二代，形成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小团伙。刘居士只要听说哪个公卿子弟膂力雄健，就闯到他家去，先用车轮套住他的脖子，再用棒子打他。如果对方宁死不屈，刘居士就称他为壮士，和他结拜相交。就这样，刘居士结党三百余人，把身手敏捷的编为“饿鹞队”，把身强力壮的编为“蓬转队”。这群世家公子殴打路人，抢夺财物，大兴城里无论贵贱，看到他们都远远躲开。甚至公卿王妃，都不敢惹他们。

刘居士日夜在外面乱搞，却是有官职的，算是朝廷命官。古代皇帝为了拉拢王公大臣、达官显贵，常常授予他们的儿子一些闲职和虚衔，作为一种安抚手段和政治待遇。而这些官二代年纪小，又没什么政治经验，比较适合安排给太子做侍从官员。刘居士的官职就是“太子千牛备身”，担任皇太子杨勇的侍从官员。他的狐朋狗友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杨勇的侍从官员。

然而刘居士一行人在大兴城里横行霸道，就常常亮着自己的官职，有意无意地打着太子杨勇的旗号，旁人的观感就是“太子身边的人横行不法”。

终于，刘居士与党徒的行为超过了杨坚的底线：他们游览汉代的长安城遗址，登上了汉代皇宫未央宫的殿基，但刘居士竟然南向而坐，党徒们前后列队，摆出了君臣朝会的架势。此外，又有人告发刘居士派人暗中勾结突厥，引诱突厥大军南侵。隋文帝杨坚接到举报后，认定刘居士等人阴谋造反和图谋叛国，迅速将包括刘居士父亲刘昶在内的一千人等全部逮捕入狱，并株连了很多。最后，刘居士被斩首，刘昶被赐死。

“刘居士案”对太子杨勇的声望打击很大。应该说杨勇没有管教好身边官员，在此案中负有失察的责任。但是隋文帝杨坚看得并没有这么简单，他早已经在心里讨厌杨勇、倾向杨广了，经过此案后则加重了这种倾向，更加认为杨勇这个太子无法无天，骄横霸道。他反思自己，怎么能把辛辛苦苦创建的王朝事业交付给这样的人呢？

一次，杨坚突然问大臣韦鼎：“你看朕的几个儿子，谁适合接大位啊？”韦鼎吓出一身冷汗。皇太子都已经确立十多年了，皇帝怎么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呢？韦鼎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最后他给了一个模糊的回答：“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即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大家都知道皇帝怕皇后，杨坚对独孤伽罗言听计从，所以韦鼎言外之意是：“皇后娘娘最喜欢谁，万岁爷您就把皇位交给他吧。”杨坚听了，

笑着对韦鼎说：“你这老狐狸。”

这件事情发生后，朝野都知道，太子杨勇已经失去了皇帝的支持与信任，杨坚心中已经有了废立之意，而且明明白白地表露了出来。废立太子是大事，杨坚必须明白宰相高颍的态度。所以他试探高颍说：“晋王妃萧氏，得到神灵启示，说晋王必有天下。你怎么看？”高颍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一点都不绕弯子，长跪在地，回答说：“长幼有序，其可废乎！”高颍坚决反对废立太子，杨坚只好把接下去的话咽了回去。

废立太子最大的政治阻力，可能就是宰相高颍了。独孤皇后是一心要废杨勇立杨广的，知道高颍坚决反对，下决心先扳倒高颍。打倒了高颍，太子杨勇就成了孤家寡人。恰好当时出现了高颍谢绝杨坚续弦的建议，却和爱妾生出儿子的事件。独孤皇后乘机在杨坚耳边说高颍欺君，再加上高颍也被牵连到其他“谋反案”，杨坚从此不再相信高颍，开始疏远冷落他。至此，太子杨勇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

开皇十八年（598）的冬至，天下文武百官朝拜完隋文帝杨坚，集体去东宫朝贺太子。皇太子杨勇在东宫备齐仪仗、鼓乐，穿上正式的法服，南向而坐，接受百官的朝贺。行礼的乐声传到了杨坚的耳朵里，掀起了他内心巨大的波澜。杨坚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了多疑猜忌的个性，即使是儿子也难以幸免。他就在心里想：“朕还没死呢，杨勇就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百官的朝拜。一旦朕驾崩了，杨勇和大臣们又会怎么对待朕呢？”

其实百官冬至朝贺太子，太子受礼，并不算是僭越。这件事可大可小。它之所以刺激了杨坚敏感的神经，主要是皇太子制度在作祟。在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面，皇帝和太子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人，而是一项制度、一个机构、一派政治力量。皇帝代表的是皇权，皇权

是至高无上的，不允许有其他任何挑战。太子代表的是储君，是一派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太子一旦确定，朝廷就为他配置教师、幕僚、属官、卫队，迅速形成一股力量。皇帝和太子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关系，更不是纯粹的父与子的关系，而是两个政治人物的关系，是两派政治势力的关系。皇帝发出的圣旨、太子发出的命令，文武百官都得执行。而一些欠稳重的官员，觉得太子在将来更有指望，便和太子走得比较近。于是，皇帝就感觉受到了侵犯。

再深厚的父子感情，在冷酷的政治现实面前也是脆弱的。汉武帝刘彻和太子刘据的亲情不可谓不深。刘据是刘彻和心爱的卫子夫人的第一个儿子，也是刘彻苦苦等待的皇长子。所以，刘彻在儿子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将其立为太子，给他配备了最好的教师，创造了最好的成长环境。最后怎么样？汉武帝刘彻和太子刘据各自调兵遣将，在长安城里厮杀了几天几夜，直杀得血流成河，父子恩断义绝，阴阳永隔。悲剧的根源就在于皇太子制度本身。

发生在开皇十八年冬至的朝贺太子事件，就击穿了杨坚和杨勇脆弱的父子感情。事件发生后，杨坚马上问大臣：“朕听说冬至节，内外百官集体去东宫朝拜太子，这是什么礼数啊？”

大臣都吓得不敢说话。掌管祭祀礼法的太常寺官员躲不过去，太常少卿辛亶只能如实回答道：“百官去东宫是贺，不得言朝。”

杨坚说：“百官逢年过节，朝贺太子，可以三数十人，零星、自愿前往。为什么有关部门征召文武官员，集合了再去，太子还穿戴法服、设乐相待？东宫如此，殊乖礼制。”接着杨坚下诏说：“君臣有别，礼节也不同，近年以来礼制混乱，因循成俗。皇太子虽然是储君，同时也是臣子。各方官员，正冬朝贺东宫，不合礼制，应该马上立即全面停止。”

从此，杨坚对太子杨勇的恩宠迅速消散。之前，杨坚虽然有废立

之心，但对太子杨勇的表面文章还是做足了，经过冬至朝贺这一事后，杨坚的表面文章也不做了，现在可是连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出皇帝对皇太子不满意了。

不久，杨坚要从各宗室侍卫中挑选强健的人，给自己当侍卫。高颍就奏称，如果把强者都挑选走了，恐怕东宫的宿卫力量太弱。对此，杨坚很不高兴，说道：“朕时常有出行活动，安保力量必须加强，侍卫必须是雄毅之人。太子常年居住东宫，哪里需要强健的武装？之前给东宫配置武装的做法就很不好，甚非朕意。朕对前代的制度和历史很熟悉，你无须照搬之前的做法。”

杨坚不仅否决了高颍的建议，削弱了太子的宿卫力量，而且怀疑高颍是因为和杨勇是儿女亲家，所以向着杨勇。顺带着，杨坚更加疏远高颍。现在，高颍和杨勇都很危险了。

易储风波

太子杨勇的地位岌岌可危，晋王杨广开始蠢蠢欲动。开皇十九年（599），杨广又一次到京师朝拜父母。在从大兴返回扬州之前，杨广去向独孤皇后辞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母子离别，而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政治表演，所以《隋书》把每一句话都详细地记载了下来。

一见到独孤皇后，杨广脸上写满了悲伤，痛苦地说道：“儿臣镇守东南，不能经常看到父皇与母后，臣子之恋，实结于心。一想到辞别母后后，儿臣就不能侍奉左右了，顿时觉得相见遥遥无期。”说完，杨广哽咽流涕，伏地起不来了。

独孤皇后见状也很伤心，说：“你在方镇，我又年老，今日的分别真的是和寻常的离别不同。”说完，她哭了。母子两人相对唏嘘。

杨广成功营造了悲伤的氛围后，继续说道：“儿臣性识愚下，平常恪守兄弟之意，但不知道犯下了什么罪过，失爱于东宫太子。皇兄对我非常生气，多次想杀害我。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怕皇兄诬陷我，给我下毒，不知道自己哪天是死期。”杨广说的纯粹是谎话，没有任何史实证明杨勇要加害二弟杨广。

独孤皇后不辨真伪，她早就在心里把杨勇判了道德死刑，认定杨勇就是逆子了。现在听说杨勇竟然要杀害自己宠爱的二儿子杨广，她气愤地说：“杨勇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我为他迎娶了元家女，希望能兴隆我们杨家基业，杨勇却冷落元氏，从不做夫妻，一门心思宠爱阿云。太子妃元氏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暴亡了，我看是杨勇和那个小狐狸精派人投毒，害死了我的儿媳妇。事已如是，我也不能追究到底，

想不到他竟然把毒手伸向你！我现在还活着，尚且如此，等我死后，你还不成了他的案上鱼肉？现在东宫没有嫡妻，等皇上千秋万岁之后，难道还要让你们兄弟在阿云面前反复叩拜问安？我一想到这儿，就无比心痛！这可怎么办好啊？”独孤皇后的这番情绪发泄，把自己的态度表露无遗。

杨广此行原本就是为了试探独孤皇后对于废立太子的态度，现在他已经得到了需要的答案。他掩饰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再次郑重地向独孤皇后行大礼，欲言又止，伏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呜咽。多么完美的表演啊，看得独孤皇后也悲不自胜。母子两个人在悲伤当中达成了共识：废掉太子杨勇，另立杨广。《隋书》记载：“此别之后，知皇后意移，始构夺宗之计。”杨广加快了夺嫡的步伐。

当时，杨广面临的情况是，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都明确表露出了废黜太子杨勇的意思，但是杨勇毕竟身为太子多年，影响广泛，势力根深蒂固，不是想推翻就能推翻的。杨广需要积蓄自己的力量，自下而上地瓦解杨勇的势力。杨广分析了一下“敌我形势”，发现自己欠缺的就是一个朝堂上的政治盟友，就像太子杨勇和宰相高颎是政治盟友，相互支持一样，杨广身边还没有这样的角色。

杨广把目光扫向朝堂上的诸公，发现有一个人很适合参与自己的“夺嫡大业”。这个人就是在迅速崛起的越国公杨素。杨素从开皇十二年（592）开始出任尚书右仆射，是居于高颎之下的“副宰相”，而且杨素曾与太子杨勇结怨。

物色合适人选后，杨广便召集党羽张衡、宇文述商量如何争取杨素的支持。大家定了一个计划，先由宇文述出马，到大兴去找大理少卿杨约。杨约是杨素的弟弟，兄弟感情很好。待做通杨约的工作后，再谋求与杨素结盟。

宇文述到京师后，多次宴请杨约。宇文述知道杨约贪财，故意在

酒足饭饱之际拿出许多奇珍异宝供杨约欣赏。杨约看到这么多宝贝，爱不释手，心里很想要，又不好意思开口。宇文述就主动提出赌博娱乐，然后故意把所有的珍宝都输给杨约。杨约发了一大笔横财，觉得过意不去，主动回请宇文述。席间，杨约问道：“宇文大人，您和我说实话，这么多奇珍异宝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见杨约这个人也不傻。

宇文述就说：“那些都是晋王之赐，让我送给杨大人赏玩的。”

杨约大吃一惊：“晋王想要我做什么？”

宇文述坦白道：“政治无常，识时务者为俊杰。自古贤人君子，没有不紧跟形势、掌握消息、避祸趋利的！杨大人兄弟二人功名盖世，掌权用事也有好几年了，但你们这么多年来，得罪的人也不在少数。我听说东宫太子有好几回在执政大臣那里碰了钉子，对令兄很不满意。杨氏兄弟现在有皇上的信任，暂时不会有事。皇上一旦驾崩，贵兄弟将如何自保？”宇文述这番话一下子就抓住了杨约的心思。

宇文述继续说道：“当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皇上素有废黜之心，这事你也知道。如果尊兄杨素能请立晋王为太子，就能建立不世之大功，晋王必然会镌铭于骨髓。这样你们兄弟俩就能避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了。”

杨约觉得宇文述说的很有道理，回去之后就去做兄长杨素的思想工作了。他将宇文述的话转述之后，心思缜密、做事稳重的杨素马上就明白晋王杨广的意思，“看来杨广是迫切地想推翻杨勇，取而代之了”。宇文述给杨家兄弟分析的话，从逻辑上讲是没有错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关键点：杨广取代杨勇的可能性有多大？杨素觉得必须分析清楚杨广的胜算概率，自己才能决定站在哪一边。

几天后，杨素入宫侍宴，刚好借此机会刺探独孤皇后的态度。他就假意说晋王杨广孝悌恭俭，很像当今圣上。独孤皇后听了以后，很

感慨地说：“你说的很对。我这个二儿子非常孝顺，听说每次皇上或者我派遣内侍到他那里，他都要在边界迎接。晋王每次谈到远离父母，都会泣不成声。我那二媳妇也很可怜，生活很清苦。我派婢女过去，她贵为王妃，还经常与婢女同寝共食。”说着，独孤皇后的眼角都泛出泪光来了。不过马上， she 就把话锋一转，怒道：“哪里像杨勇那样，就知道和阿云骥在一起，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一想到这，我就更加可怜阿拙（杨广小名），常常担心他被那狠心的哥哥暗杀了。”

杨素是何等聪明之人，听了独孤皇后的话，马上明白了，他附和独孤皇后说了很多“太子不才”的话。独孤皇后没有想到大臣当中，还有这么通自己心意的人，对杨素好感大增，临别前还赏赐了杨素金银珍宝。这次谈话后，杨素坚定地选择了站在晋王杨广的一边，互通消息，准备推翻杨勇。于是晋王杨广、右仆射杨素、独孤皇后三股力量形成了新的铁三角，共同推动废太子杨勇之事。

在这个时候，长期养尊处优的太子杨勇的缺陷就暴露了出来。杨勇虽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父皇和母后的宠信，也感觉到朝堂之上支持自己的力量在衰落，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更没有对威胁自己的杨广等人展开反击。杨勇不知道如何调动自己的支持力量，如何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更不知道主动进攻、以退为进、韬光养晦等政治技巧和斗争策略。他几乎是坐等危险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反对杨勇的铁三角中，杨素最先积极行动起来。他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支持杨勇的尚书左仆射高颎。打倒了高颎，既可以断掉太子杨勇的臂膀，重创杨勇的支持力量，同时自己可以取代高颎的宰相之位，杨素何乐而不为呢？

就在杨广、杨素两人连手的开皇十九年（599），六月爆发了“王

世积案”。此案被杨广和杨素所利用，沉重打击了高颍。最终杨坚将高颍父子削职为民，高颍彻底失去了政治实力。尚书右仆射杨素很快顶替了高颍的地位，升任尚书左仆射。

太子杨勇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环顾四周，自己已经失去了父母的宠信，父皇显露出了废黜太子的明显信号，铁杆支持者高颍不仅失去了宰相地位，还被削职为民，朝堂上也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杨勇也知道，二弟杨广和新宰相杨素正在联合要扳倒自己。杨勇又担心又害怕，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过早的太子生活给杨勇造成的负面作用彻底暴露了出来。杨勇在长期的安逸中并没有掌握充分的政治斗争的技巧，完全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动用自己现有的资源，进行谋篇布局，展开反击。相反，他有不少荒唐的举动。

杨勇为了保住太子之位，主要的对策就是利用封建迷信。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政治骗子，装神弄鬼谋取私利。当时就有一个新丰人，叫作王辅贤，据说搞封建迷信有一套，能占候（视天象变化以附会人事，预言吉凶祸福），蒙骗了不少政治人物。杨勇听说他的名声后，召他过来询问自己的前程。王辅贤掐指一算，说：“白虹贯东宫门，太白袭月，皇太子废退之象也。”杨勇大惊，赶紧问：“大师，我应该怎么办呢？”王辅贤就“指导”杨勇应该如何做，杨勇一一照办，用铜铁造了各种兵器，摆在宫中用来抵御天象。同时，他还在东宫后园中建立庶人村，屋舍很简陋，自己却经常住到里面去，穿粗衣，食粗食，希望能躲过不利的天象。他以为自己穿破衣烂衫，上天就看不出他是太子，就不能把坏运气施加到他头上了。

上天有没有看到杨勇的种种努力，我们不得而知，杨坚倒是看到了太子杨勇的种种不寻常举动。隋文帝杨坚当时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废黜杨勇，他得知东宫有异状，明白杨勇内心非常不安，就派宰相杨素去观察和开导。

杨坚把如此敏感的任务交给杨素，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只见杨素到东宫后，却站在宫门口不进去。杨勇听说父皇派宰相杨素来东宫，整理好服装，在宫中迎接杨素到来。但是杨素就是在宫门口不进去，拖延了很长时间，也不让人通报。杨勇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既不愿意屈尊主动出宫来迎接，也没有想到派人出来询问，只是让局面这么僵持下去。而且时间越长，杨勇的情绪越糟，在心里不断地埋怨杨素。等把杨勇激怒后，杨素这才迈进东宫大门，和太子相见。杨勇自然没有好脸色，两个人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会，就散了。

杨素回到隋文帝杨坚那里，说太子杨勇如今积怨很深，情绪不太对，恐怕会有其他变故，提醒杨坚早做提防。与此同时，独孤皇后一直没有停止对杨勇的监视和窥探。她对侦察到的东宫的大事小事，都戴着有色眼镜朝着负面的方向想，然后将这些负面信息不断地传递给杨坚。

这些信息刺激了杨坚，他不仅疏远杨勇，而且为了预防这个情绪状态不太正常的儿子行为过激，布置了许多防范措施。比如，杨坚亲自安排了许多侦察兵，观察杨勇的动静，遇到情况随时报告给自己；又比如，杨坚命令东宫所有的侍卫，都隶属于各个卫府。隋朝的军队是由皇帝控制的中央军和非直辖于皇帝的地方军组成，其中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军，设立了十二个卫府，每个卫府统辖一个军，每军设置一个大将军。现在，杨坚命令太子身边的所有宿卫武装，在人事关系上要隶属于十二个卫府，就等于是把太子的武装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釜底抽薪，防止杨勇有不轨的行为。

即使如此，杨坚还是不能彻底放心，他把东宫侍卫中勇猛健硕的卫士全都开除了，只给杨勇留下老弱平庸的侍卫。从中可见杨坚、杨勇父子关系之紧张。《隋书》用一句话描述，那就是：“高祖惑于邪议，遂疏忌勇。”

废立太子

开皇二十年（600），杨坚刚好六十岁。在古代，六十岁算得上是高龄了。政治人物一旦年纪大了，疑心往往更重。

《隋书》是这么形容“多疑猜忌重症患者”杨坚的：“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喜怒无常，就已经够可怕的了，问题是杨坚还“不复依准科律”，也就是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完全把“律法”两个字抛到了脑后。杨坚常常认为哪个官员有罪，就下令把他斩首，甚至不惜以皇帝至尊之位亲自监斩。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让晚年的杨坚渐渐失去了理智。

晚年的杨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志得意满，越来越喜欢听好话、享清福。他不愿意听到坏消息和真实的情况，只希望臣民们都歌颂他，齐声高唱“开皇盛世”。既然天下一片太平，杨坚也就觉得自己不用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在政事中，而是醉心于“养生”。

之前，我们谈到杨素主持修建了仁寿宫。仁寿宫，位于今陕西凤翔境内，离京城较远，绝山构殿，决壑为池，环境优美，所以杨坚在仁寿宫完工后，就总往那里跑。从开皇后期开始，杨坚夫妇几乎每年春天一到就前往仁寿宫，一直住到秋高气爽才回到大兴城，然后过完冬再去仁寿宫。他们居住在仁寿宫的时间，比在都城的时间还要长，已经很难离开清静的仁寿宫了。这也意味着杨坚关注政治的精力少了，辨别是非的时间少了，他对都城的实际控制也就减弱了。而杨广在开皇二十年（600）因为要北击突厥的缘故，从遥远的江都返回了北方。他在首都的时间极大地增加了。这就便利了杨广、杨素等人搞些小动作。

随着杨坚年纪越来越大，杨广觉得必须要加快推翻太子杨勇的节奏。意图推翻太子的阴谋集团，觉得必须要给予杨勇最后一击。之前，杨广派遣党羽段达，偷偷去拉拢太子杨勇身边的亲信姬威，给了姬威金银财宝，收买过来作为内奸。东宫的很多消息，就是姬威密告杨素，经过杨素、杨广等人加工后，转化为攻击杨勇的弹药。杨勇备受打击，姬威在其中出了不少功劳。现在，杨广又让段达威胁姬威说：“东宫罪过，皇上都一清二楚，已经草拟了密诏，要废掉杨勇，改立晋王为太子。你如果能投靠晋王，前面有大富贵等着你。”姬威没有多少犹豫，同意充当打手，给太子杨勇致命一击。

开皇二十年九月，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在仁寿宫的休养，返回京城。第二天，杨坚就在大兴殿召集群臣，要公布重大消息。

杨坚首先严肃地对东宫官属说：“仁寿宫离此不远，却让我每次返回京师，沿途都要加强安全保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防得滴水不漏，像是踏进了敌国一般。我因为腹泻，睡觉时不敢脱衣服。昨天夜里想就近上厕所，本来睡在后房，却担心会突发变故，硬是搬回前殿。”杨坚气愤地说：“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们这些人打算坏我国家吗？”

皇帝的这一番话，把东宫官员们吓得不轻，大家面面相觑。在他们还没缓过神的时候，杨坚一声令下，将太子、左庶子等几个东宫主要官员立刻逮捕，交司法部门严刑审讯。

接着杨坚让杨素宣布太子的罪状，杨素就添油加醋地说了起来：“臣之前奉皇上旨意赴京城，令皇太子搜查刘居士余党。太子奉诏，气愤填膺、骨肉飞腾，对臣说：‘居士党羽都已经伏法，让我到哪儿去搜查？你是右仆射，职权很大，自己去搜，干我何事？’太子还说：‘如果大事不遂，我先被诛杀。皇上现在待我，还不如那几个弟弟，没有一事情能让我自由。’太子还感叹：‘我太憋屈了。’”杨勇为人直率，不太会掩饰情绪，他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在杨素添油加

醋的述说下，在气头上的杨坚听起来，就是大逆不道了。

杨坚紧接着杨素的话说：“此儿不堪承嗣久矣。皇后一直劝我废了他，我考虑他是我登基前所生，又是长子，希望他能渐渐改正，故隐忍至今。想不到他变本加厉，越来越荒唐，今天我就要废黜太子，以安天下。”

虽然废黜太子杨勇的传闻流传已久，但是等这一刻真的到来，而且是由皇帝亲自如此激烈地表达出来，大臣们还是惊呆了！杨勇的支持力量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朝堂上还残留着一些支持者。听到皇帝要废太子后，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就勇敢地站了出来，表示反对。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已经明确表达了意见，还能当面反对的，都是值得敬佩的勇士。《隋书》用了八个字来形容勇士元旻的状态：“辞直争强，声色俱厉。”只见他站出来说：“废立是大事，天子无二言，一旦颁布了废太子的诏书，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朝野流传着不少针对太子的谗言，请陛下明察。”

听了元旻的意见，杨坚沉默了，没有回答。杨坚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不会无理地下令把元旻拉出去，也不会剥夺元旻说话的权利。从元旻的反应中，杨坚明白，朝堂之上还有一股支持杨勇的力量，大臣们并没有对废黜杨勇的事情达成共识。那应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关键时刻，太子杨勇平日的亲信、已经被晋王杨广买通的姬威，主动站了出来，说要告发“太子非法”。隋文帝杨坚正好在思考怎么进一步“揭穿”杨勇，为废除太子统一思想，在这节骨眼上看到有人告发太子，马上对姬威说：“太子的那些事儿，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管说出来。”

姬威就半真半假地说了起来：“臣陪伴皇太子多年，皇太子和臣说了很多话。太子意在骄奢，想把从樊川到散关的土地都划为自己的林苑。太子说：‘昔日汉武帝计划建造上林苑，东方朔谏阻了他，汉武

帝反而赏赐东方朔黄金百斤，这多可笑啊！我没有金子赏赐这样的人。如果有人反对，我刚好可以杀了他，杀他上百个人，自然就再也没有人反对我享乐了。”这首先是在揭发太子奢侈无度。

姬威接着就把攻击的矛头转移到了政治领域，说杨勇对当今圣上有诸多不满。原先太子左卫率苏孝慈是历经西魏、北周和隋朝三代的老臣，打过仗，有能力，是太子杨勇属官中的佼佼者，后来杨坚解除了苏孝慈的职务，改任他职，杨勇难免心中不快。姬威的描述是，杨勇“奋髯扬肘”说：“大丈夫会当有一日，终不忘之，决当快意。”这是公开发泄对这一人事任免的不满，含有要秋后算账的意思。

姬威又说，东宫提出了许多需求，但尚书大臣们依法办事，很多都拒绝了。杨勇为此也很生气，说：“仆射以下，我要杀他一两个人，让他们知道怠慢我的后果。”最后，姬威举报杨勇指使巫师占卜吉凶，事后宣扬：“开皇十八年，是皇帝的死忌。这日子快到了。”

姬威的一席话，勾勒出了一个骄奢蛮横、急于登基、不忠不孝的太子形象。杨坚听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伤心地说：“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之前，杨勇亲近女色、觊觎皇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他。想不到他变本加厉，胡作非为。我最近翻阅《齐书》，看到高欢放纵他的儿子，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看得我特别气愤。历史教训就在眼前，我怎么能再犯错误呢？”

姬威的告发，坚定了杨坚废黜太子杨勇的心思。他觉得这样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幸亏及时决策，才没有酿成大祸。于是杨坚下令囚禁太子杨勇及其诸子，逮捕东宫的党羽，严加审讯。

讯问的任务，交给了杨素。杨素是意图推翻杨勇的阴谋集团的核心成员，肯定不会“审查”出好结果。几天之后，有关部门就在杨素的授意下，审查出了一个“以太子杨勇为首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大搞

政治活动，阴谋篡位。其中，左卫大将军元旻负有宿卫的责任，投靠杨勇，曲意逢迎。杨勇通过亲信裴弘和仁寿宫的元旻传递信息，他们往来的信息都密封好，上面题写“勿令人见”。隋文帝杨坚得报，恍然大悟：“怪不得朕在仁寿宫，有什么细微小事，东宫都能知道，比驿马还快。原来有元旻这个家伙在！”于是他马上下令把元旻、裴弘等人都捉起来治罪。

先前，杨勇从仁寿宫参见完父皇母后返回东宫，途中看到一棵枯槐，根干盘错，直径有五六围大。杨勇就对左右说：“这棵树浪费了，可以做什么用呢？”有人回答说：“古槐尤堪取火。”隋朝的卫士都佩带火燧，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自己生火。杨勇就命令工匠把枯槐造成数千枚火燧，准备分赐给左右。审查的时候，这些火燧都还在仓库里。这些都成了罪证。此外，杨素又以东宫养马千匹质问杨勇，杨勇不服，反驳说：“官府蓄养马匹数万匹，我身为太子，有马千匹，就是造反吗？”杨勇的辩解也有道理，但他在遭受审查的时候还如此强硬，实在是不明智。

杨素正好利用杨勇的态度，攻击杨勇执迷不悟、拒不配合审查。杨素又把东宫的器物、服饰翻出来，故意挑选其中雕饰奢华的，陈列在朝堂之上，给文武百官看。杨勇本就生活奢侈，如今杨素又挑选东宫最奢华的器物、服饰，故意暴露杨勇骄奢淫逸的一面。隋文帝杨坚一向号召节俭，看到太子背道而驰，非常愤怒。他派人把这些奢华的物品一一展示给杨勇看，同时责问他为什么这么不检点。独孤皇后也派人责问杨勇，大致是骂他宠爱姬妾、沉迷女色等。

杨勇的表现，始终是不服。他面对杨素主持的审查，不服；面对父皇与母后的责问，还是不服。杨勇坚持自己没有大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双方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无论如何，杨坚都决定废黜太子杨勇。他穿上戎服，在武德殿排列甲兵，召集百官，他站在东面，宗亲王公站在西面。在把杨勇及其

诸子带上殿堂后，杨坚命大臣薛道衡宣读诏书：“太子之位，实为国本，苟非其人，不可虚立。自古以来，都有因为溺爱儿子，把江山托付给不合格的人，导致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悲剧。皇太子杨勇，能力平庸、不仁不孝，又亲近小人，多次生事。朕虽欲爱子，实畏上灵，岂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杨勇及其儿女，都废为庶人。”

读完诏书，杨坚又让薛道衡对杨勇说：“你的罪恶，人神共弃，你想保住太子之位，怎么可能呢？”杨勇已经彻底明白了自身的处境，老老实实地拜了两拜，求饶说：“我本该弃尸都市，告诫世人，幸亏皇上可怜，得以保全性命。”说着，杨勇的眼泪汩汩地下来了，流满了衣襟。杨勇当了二十年的太子，大致上前十年是顺风顺水、地位稳固，但安逸富贵的环境并没有培养出与太子身份相符的素质和心机，结果在后十年的权力争斗中节节败退，导致全军覆没。

杨勇遭到废黜后，被囚禁在东宫。而以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为首的很多人，被看作是废太子杨勇的党羽，遭到清洗。其中，元旻、唐令则等七人是罪魁祸首、核心骨干，都被处斩，妻妾子孙也被没官。车骑将军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洲民章仇太翼（著名术士，原姓章仇，隋炀帝即位后赐姓卢）等四人，被判处杖一百，家属和家产全部没收入官。此外，另有多人被看作杨勇的支持者，遭到处罚。

在追查“太子余党”过程中，大将史万岁也被划到了杨勇一党。原来史万岁一直为本部兵马抗击突厥有功而没有受赏的事情耿耿于怀，在当时的节骨眼上竟写奏章请功。杨坚正烦着，见史万岁来邀功，怒问道：“史万岁现在何处？”当时史万岁正在朝堂候旨，但杨素为了激怒杨坚，故意说道：“史万岁正在朝谒废太子。”杨坚大怒，命人招来史万岁，以“怀诈要功，便是国贼”的罪名，在殿堂上将其当众打死。一代名将就这样陨落了。

史万岁是隋朝前期的重要将领，无论是南征还是北伐，他都立下

了赫赫战功。据说，史万岁在云南征战的时候曾见到诸葛亮纪功碑，背后刻着：“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他毅然推倒纪功碑继续行军。史万岁征战千里，功劳很大，但是不擅长政治，所以官爵一直没有提上去，最后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死后，天下官民，无论是否相识，都为他感到冤惜。

开皇二十年十一月，隋文帝杨坚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十二月，命令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杨坚吸取了教训，一开始就显露出抑制新太子的意思。

杨广从成为太子的那一刻开始，“表演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册立太子典礼上，杨广说原先预备的太子礼服和皇上的龙袍的颜色、样式过于接近，要求更换，并且奏请以后太子的服饰要与皇帝的服饰严格区分开来，与三公、王爷规格相齐。杨坚知道后，自然喜笑颜开。

成为太子后，杨广的日子过得很悠闲，读书、写诗、礼佛是他日常的主要生活。杨广本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江南的时候就对佛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太子生涯基本上就是等待，杨广的满腹才华和大量闲暇时间无法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纂了一部《法华玄宗》的佛学著作（执笔者是东宫学士柳）。这本书规模宏大，足足有二十卷之多。

再看杨勇，他被废了太子之位后，始终觉得自己是冤枉的，频频请求面见父皇申冤。当然，新太子杨广始终加以阻拦，根本不让杨坚知道杨勇的求见。杨勇于是跑到大树上面，大喊大叫，希望杨坚能听到声音，达到面圣申冤的目的。结果杨素却利用他的行为，散播说：“废太子杨勇精神不正常了。”果然，杨坚也判断杨勇发疯了，再也不见他了。

第五章 “弑父夺位”之谜

暗流涌动

杨广当了将近两年的太子后，仁寿二年（602）八月二十四日，独孤皇后病逝，时年五十岁。她被尊称为“文献皇后”。

杨广表现得万分悲痛，拜见父皇杨坚时哀恸气绝，泣不成声，无法站立，但回到东宫后，他的举止马上恢复自然，可见是装的。为了表示事母至孝，他还总是装出茶饭不思的样子。私下里，他却在衣袖里藏了多个竹管，管子里装着精制的猪鱼肉脯，管口用蜡封死。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没人的时候，他就赶紧抽出竹管吃上几口美食，吃完了继续哭丧。

当时，朝野上下并没有因为太子废立一事尘埃落定而安静下来，相反是暗流涌动、争斗不断。借着皇后的丧事，一些为杨勇抱不平的人纷纷上书，给杨勇争取权益。

先是文林郎杨孝政上书说：“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隋文帝杨坚读后很生气，动手打了杨孝政。接着贝州长史裴肃上表，请求仿照前朝的惯例，封废太子为王。这道上表对杨坚的触动很大，杨坚觉得天底下还有一帮人在维护杨勇，这出乎他的意料。他特地征召裴肃入朝，两人面谈了杨勇的问题。虽然杨坚最终没有封杨勇为王，但激起了朝中一批大臣相继发难，更多的人则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尚书左仆射杨素。这引起了杨坚的警觉。

仁寿元年（601）正月，杨素拜为尚书左仆射，日渐独断专行、打击异己，权势膨胀。杨素的很多宗族子弟平步青云，占据朝堂。杨素的所作所为招致了朝臣的不满，杨家势力的扩张也引起了杨坚的注意。皇帝在权力方面都是非常敏感的，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至高无上的皇权。

同情废太子杨勇的大臣梁毗，上书揭露杨素擅权，说：“杨素所私皆非忠说，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杨坚开始还不相信，把梁毗打入监狱，亲自审问。这一审问，改变了杨坚的态度。梁毗说杨素在太子杨勇、蜀王杨秀获罪被废的时候，“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

梁毗的话，刺激了杨坚敏感的神经。他把杨素平时的言行在脑子里回想了一遍，判断杨素的确有专权揽政的嫌疑，于是果断决定“架空”杨素。一方面，杨坚对杨素很客气，礼遇有加，但就是不让他过问具体的政务。尚书省是负责贯彻落实政令的，但一直到杨坚驾崩之前，杨素都不再主持尚书省的政务。另一方面，杨坚剪除杨素的党羽，把和杨素关系亲密的人，比如杨约、薛道衡等人全部外放，不允许杨素扩张势力。

杨素的旁边，站着新太子杨广。两人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经过扳倒宰相高颎、推翻太子杨勇等战役后，杨广、杨素的同盟更加坚固，而且也为他人所知晓。而皇帝最看不得的，就是底下的人结党营私，可能威胁到皇权。杨坚要想从根子上遏制杨素、杨广这一派势力，就要树立一派新力量与之抗衡，毕竟双轮车要比单轮车稳定得多。

在隋文帝杨坚的支持下，以柳述、元岩为代表的权贵势力迅速崛起。柳述是当朝驸马，杨坚的女婿，娶了杨坚最宠爱的五女儿兰陵公主。之前，晋王杨广希望兰陵公主许配给小舅子、晋王妃的弟弟萧

场。杨坚开始答应了，后来又改了主意。因为这件事情，杨广很讨厌柳述。柳述崛起后，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

柳述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仗着特殊的身份、地位，较为骄横。杨素权倾天下，其他大臣都很怕他，但是柳述就不把杨素放在眼里，好几次在杨坚面前揭露杨素的短处。还有几回，柳述的公务处理得不合杨素的心意，杨素派人通知柳述改正，但柳述对来说：“回去告诉杨素，就说我柳述不改。”不用说，杨素也很讨厌柳述。

杨坚提拔的另一个人是元岩，他被任命为黄门侍郎。黄门侍郎是皇帝的近侍官员，负责传递诏令，同时在隋朝又是门下省的副职，掌握中央决策的审批，是非常关键的职位。杨坚用柳述、元岩两个人，勉强可以和太子杨广、尚书左仆射杨素的势力相抗衡。在大臣之间保持力量均势，不让任何一方坐大，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帝王之术”。对此，杨广、杨素两个人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此时的杨坚，在孤独皇后病逝后，压制了大半辈子的欲望和不满都宣泄了出来，开始纵情声色。他大规模扩充后宫的女眷，新设置了三名贵人，将嫔增加到九人，世妇增加到二十七人，御女增加到八十一人。此时的杨坚六十一岁了，年逾花甲，还整天阅尽美色。在众多的嫔妃中，杨坚最宠爱两个人，一个是陈氏，一个是蔡氏。杨坚封陈氏为“宣华夫人”，封蔡氏为“容华夫人”。容华夫人来自北方，风流娇媚，善解人意。宣华夫人则是陈朝的宫廷美女，肌肤润滑，温柔可人。在温柔乡中，杨坚每天都笑逐颜开，然而一旦出了后宫，他就表现得多疑暴戾，罢黜、外贬和杀戮了大批看不顺眼的官员。

杨坚越糊涂，对杨广就越信任。仁寿初年，杨坚命令太子杨广巡抚东南。杨坚去仁寿宫避暑的时候，都令杨广在大兴监国，代理朝政。

随着废立太子之事，宗室内部也不安稳。《隋书》认为杨勇在位日久，杨坚一朝废立太子，“开逆乱之源，长觊觎之望”。杨广取代大哥杨勇，当上了新太子，但是下面的几个弟弟心里就在想：“为什么我不能同样取代二哥，当上新太子呢？”

在隋文帝诸子中，三子秦王杨俊在开皇二十年（600）六月已经去世，年仅三十岁。杨广被立为太子后，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头号人物就是蜀王杨秀。杨秀为杨坚第四子，常年镇守四川地区。四川地势险要，加上杨秀经营多年，实力日渐壮大。他见大哥杨勇被废，二哥杨广当上了新太子，心中很不满。外人可能对杨勇、杨广两人不太了解，但是杨秀是他们的亲弟弟，他对两位哥哥的为人禀性是有大致准确的认识的。当杨广上位后，他便暗中招兵买马，有意要争夺太子之位。杨广察觉后，决定先下手为强，暗中勾结杨素，要栽赃陷害杨秀，置他于死地。

客观上，杨秀本身也劣迹斑斑。除了杨家兄弟“标配”的骄奢淫逸外，杨秀还有许多问题。比如，杨秀建造浑天仪、司南车、记里鼓，穿戴皇帝的服饰，这些都属于僭越的行为；杨秀又和妃嫔出去打猎，以弹丸射人，还捉捕四川当地的居民，阉割后充当宦官。

杨素把这些问题报告给杨坚后，杨秀就没戏可唱了。仁寿二年（602）闰十月，杨秀被召回大兴。杨坚命令杨素等人审问杨秀。杨素和杨广一商量，杨秀的所作所为的确应该受罚，但离彻底打倒在地，在政治上难以翻身，还有一段距离。那怎么办呢？他们决定伪造证据，罗织罪名。

中国古代流行巫蛊厌胜之术，即利用人偶诅咒他人。杨广就偷偷做了一个木偶，上面写着隋文帝杨坚与汉王杨谅的名字，再缚手钉心，枷锁桎梏，写上一段咒语：“请西岳慈父圣母神兵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然后他暗中派人将木偶埋到华山脚下。接着杨素带人去把木偶挖出来，作为杨秀谋害杨坚和杨谅的证

据。此外，杨广又以杨秀的名义伪造檄文，在文中称“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写好后，便模仿杨秀的笔迹抄写一遍，夹入从杨秀家里查抄出来的文集中。杨素根据这些证据，判定杨秀“谋逆”，报告给了隋文帝杨坚。杨坚既吃惊又失望：“天下竟有这样的不肖子！”当年十二月，杨坚废蜀王杨秀为庶人，幽禁于内侍省。

剩下来可能参与皇位竞争的，就只有皇五子——汉王杨谅了。开皇十七年（597）秋，汉王杨谅出任并州总管，杨坚亲自出宫饯送。南北朝以来，并州地位很重要，既是东西两方政权征战的主要地区，又是防御北方突厥人的前线，乃兵家要地。所以，隋朝在并州驻扎了重兵，赋予并州总管巨大权力。杨坚给杨谅划定的管辖范围，“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而且“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杨谅辖域之广，事权之重，势力在所有地方官中是最强的。但是，由于杨谅年纪尚小，出镇地方的时间也还短，所以没有和二哥杨广爆发冲突。杨谅只是借口防御突厥，修军整武，扩充兵马，意图进则争夺天下，退则割据一方。

这一切都表明，隋朝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因为立杨广为新太子而平静，各种矛盾日趋复杂。

杨坚之死

时间很快到了仁寿四年（604），也许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担心，也许是为了避开京城的种种是非，隋文帝杨坚在当年的正月，就早早地张罗着要前往仁寿宫休养。术士章仇太翼（卢太翼）再三劝阻，对杨坚直言相告：“臣不敢说假话，皇上此行恐怕是有去无返。”杨坚大怒，把章仇太翼捉进牢房，准备等自己从仁寿宫回来，证明章仇太翼所言虚妄后，将他斩首示众。

正月二十七日，杨坚动身到达仁寿宫，第二天下诏将大小政务都交由皇太子杨广处理。到了四月，“上不豫（皇帝病重）”的消息传了出来。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等人入阁侍疾，太子杨广也赶到了仁寿宫，入住大宝殿。

杨坚的病一直没有好转。到六月初六，朝廷宣布大赦天下。大家都知道，杨坚的病情很严重了，大赦是为他祈福。七月初一，天象记录“日青无光，八日乃复”，这是非常不吉利的天象。果然，到七月初十，杨坚感觉自己到了弥留之际，便召集王公大臣诀别。到这个时候为止，隋文帝杨坚的病情和活动都是公开的，都有大臣作证。

皇帝病重，最紧张的人莫过于太子了。太子能不能顺利继位登基，现在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之前，太子杨广入住仁寿宫的大宝殿，的确有看望父皇、照料病情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目的应该是掌控父皇病重期间的局势。为了今日的身份、地位，杨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肯定不希望这些努力付诸东流。他很焦虑，很着急，于是亲自给同在仁寿宫侍疾的杨素写了一封信，派人偷偷送去。杨素收到后写了一封回信，派人送回给杨广。

杨广和杨素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杨素派遣的那个传递回信的人，太不靠谱，竟然把回信误送给了隋文帝杨坚！

杨广很有可能在信中询问杨坚到底还能坚持几天，他也很可能在信中询问其间是否会出现变故，和杨素商量如何共同行动。总之，杨坚读后，认识到杨广、杨素两人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共同进退。那么之前的许多政治风波，是不是这两个人在作祟？他们俩背着自己，还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个人在病重的时候往往想得更多，杨坚本来就多疑猜忌，现在在病榻上就更思绪万千了。他见信大怒，气得浑身哆嗦。

这时又有一件事情，火上浇油。就在杨坚拿着信件，思考怎么处置不孝之子杨广和不忠之臣杨素的时候，他晚年宠爱的陈贵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待看到杨坚，又红着脸低下头，扭扭捏捏地缩到一边去了。杨坚问她原因，结果陈贵人流着眼泪说道：“太子无礼。”

这个陈贵人，是南朝陈宣帝的公主、陈后主（陈叔宝）的妹妹，才貌双全，陈朝灭亡后被杨坚收入后宫。独孤皇后在世时，善妒且强势，后宫嫔妃几乎没有人得到皇帝的宠幸，只有陈氏偶尔得到临幸。独孤皇后死后，陈氏晋封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冠于六宫。杨广阴谋夺嫡的时候，经常送金蛇、金驼等东西取媚陈贵人，以及得宠的蔡贵人。陈、蔡二人就成了杨广在后宫的内助，对杨广夺嫡和窥探后宫帮助不小。

但是杨广本性好色，看到才貌双全的陈贵人，难免心猿意马。根据《隋书》的记载，杨广和陈贵人在仁寿宫侍疾的几个月里，时常相见。杨坚截获杨素回信的当天早上，陈贵人出来更衣，遇见了杨广。杨广色心大发，要逼迫陈贵人成全好事。陈贵人奋力反抗，摆脱杨广，逃回了杨坚的寝宫。于是，就出现了前述的那一幕。

杨坚异常愤怒，大叫：“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他对杨广彻底绝望了，叫来侍疾的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命令道：“召我儿！”柳述两人就要出去叫太子杨广，杨坚说道：“叫杨勇来。”或许，杨坚意识到了废太子杨勇是被杨广、杨素等人陷害的，杨勇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毕竟不是阴谋小人，基本品德还是过关的。所以，他在重病之中又起了废杨广、传位杨勇的念头。

柳述、元岩离开杨坚的寝宫，书写了召杨勇的敕书，竟然拿去给杨素看。杨素看到后，大吃一惊，连忙去报告杨广。两个人经过短暂的慌乱后，迅速商定了对策。很快杨素假传圣旨，调动东宫士兵入仁寿宫守卫，由杨广的亲信宇文述、郭衍控制了仁寿宫的内外进出，接着杨广的心腹张衡进入了杨坚的寝宫。张衡进宫后，把陈贵人和其他侍疾的宫人都赶了出去，派人关押在一个房间里。不一会儿，寝宫传出消息，说“皇上驾崩”了。《隋书》对杨坚之死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有两句话：“秋七月乙未，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嘘唏。丁未，崩于大宝殿。”

被关起来的陈贵人和后宫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相顾失色。黄昏时，太子使者拿着一个金盒子进屋，盒上贴着杨广亲笔书写的封条，说是赐给陈贵人的。陈贵人惶恐到了极点，以为是鸩毒，吓得不敢打开。古代宫廷政变中，屠杀后宫灭口的情况太多了，陈贵人觉得自己便是最早的一个牺牲品。太子使者见状，逼陈贵人打开了盒子，结果里面装着几枚同心结。原来，这是杨广在向陈贵人示爱。旁边的宫人见状，欢呼雀跃，互相叫道：“我们不用死了！”陈贵人却高兴不起来，自己名义上是杨广的母辈，况且老皇帝杨坚刚死，自己怎么能马上投入杨广的怀抱。陈贵人坐在那里，不肯致谢，但旁边的宫人逼着陈贵人接过金盒子，谢过使者。当天晚上，杨广就提前把陈贵人给“接管”了。

隋文帝杨坚之死，疑点重重，杨广接下来的诸多举动，更是加深了人们的怀疑。他先是下令秘不发丧，接着伪造了杨坚的诏书，赐死

废太子杨勇。杨勇是被人用衣带勒杀的。杨广登基后，又假惺惺地追封杨勇为房陵王，但是规定其子不得继承爵位。杨勇的长子杨俨，曾担任宫廷侍卫官，后来死在一次随扈出巡的路上，据说也是被杨广毒死的。杨勇的其他儿子则全部被流放岭南，后来杨广命令当地的官府杀害了他们。狠心的杨广将大哥杨勇一家“满门灭绝”了。

此外，杨广下令逮捕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关进监狱。柳、元二人是杨坚晚年倚重的力量，又是杨坚临死前要废杨广、传位杨勇的见证人，杨广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事后，杨广贬二人为平民，将柳述流放到广东龙川（今惠州），将元岩流放到广东南海（今广州）。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是偏僻蛮荒之地。因为柳述是驸马，杨广还逼兰陵公主与柳述断绝关系，改嫁他人。兰陵公主誓死不从，强烈要求与柳述一同流放龙川。但杨广坚决不准，派人软禁了公主。结果，兰陵公主忧愤而死，柳述后来也死于颠沛流离的途中。

上述情形都是正史《隋书》的记载，带有阴谋论的种种要素，隋文帝之死成了一桩著名的历史公案。很多人都认为杨广“弑父夺位”，但具体情形，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黑幕也好，清白也好，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确凿证据。

杨坚在位二十四年，享年六十三岁。《隋书》评价杨坚“鸿恩大德，前古未比”，并没有赞誉过度。隋朝给他上庙号“高祖”，谥号“文”，史称“隋文帝”。

大业开国

仁寿四年（604）八月，杨广护送杨坚的灵柩回到大兴城，正式接管隋朝的天下。杨素拥立有功，继续做他的尚书左仆射。宇文述是杨广的老搭档，又是拥立的重要功臣，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改封许国公。为了装点门面，高颎被起用为太常卿。

杨广很快公布了隋文帝杨坚的遗诏。遗诏有六百多字，首先概括了杨坚的执政过程：“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

接着，遗诏话锋一转，谈到了杨坚的“家事”，谈到了权力交接问题：“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

这段话的意思是皇帝的家事也属国家大事，要把权力交给合格的接班人。杨勇、杨秀这样的人，品格恶劣，为非作歹，如果把国家托付给他们，会祸害天下，所以杨坚废黜了他们。

那么天下要交付给谁呢？“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遗诏的这段话，明确了杨广继位的合法性。这是整个遗诏最核心的内容。此外，遗诏还指示丧礼务从节俭，地方官员

不用奔丧，宜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律令格式，这些都属于官样文章。

南北朝时期，皇权交替的时刻往往祸起萧墙，皇子们相互厮杀争位。杨广的四个兄弟，两死一囚，能对杨广构成威胁的只有最小的弟弟汉王杨谅了。杨谅镇守并州，握有军队，足以拥兵自立，反对杨广继位。

杨坚死后，杨广怕这个弟弟起兵造反，就想学父亲当年矫诏对付宇文家五位王爷的招数，派人持杨坚的玺书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征召杨谅回京。杨广派去执行任务的人是亲信将领屈突通。

隋文帝杨坚生前对杨谅有一个基本认识，曾语气很重地训诫杨谅道：“你要好好地当个藩王，敬依朝命，别轻易信服故旧的话，不要破坏国家法令！你这个小子，一旦没有了我，如果想轻举妄动，你二哥捉你就像捉笼内的小鸡一样！”杨坚警告杨谅要恪守规矩，不可妄动。为了防止小儿子遭人利用卷入不必要的危险，杨坚和杨谅偷偷约定，如果他征召杨谅，会在“敕”字旁边别加一点作为记号。这个暗号只有杨坚、杨谅两个人知道。杨广不知道，他伪造的诏书中当然也没有暗号。

话说杨谅接到伪造的诏书后，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父皇不可能忘记了这么重要的约定，这只能说明父皇已经不在在了，二哥现在掌权。他假传诏书征召我入朝，极不正常，莫非要加害于我？不然他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以自己的名义传旨召见呢？”

发现疑点，杨谅就反复盘问使者屈突通。屈突通并不知道实情，只能闪烁其词。杨谅就让屈突通先回去，自己“随后就到”。然而屈突通回去不久，杨谅的造反大军就到了。杨谅也是个政治欲望很强烈的皇子。早在杨勇被废时，杨谅自以为手握天下精兵，便对最高权力有所企图。后来，他以防备突厥为名，缮治甲兵，营造军械，实力愈发雄厚。

杨谅的造反行为得到了辅助他的陈朝旧将萧摩诃的支持。这个萧摩诃，是个忠义之士。陈朝灭亡后，萧摩诃曾请求贺若弼说：“我现在是囚虏，命在旦夕，只想见见旧主，死无所恨。”贺若弼答应了，安排他去见陈叔宝。萧摩诃见到陈叔宝时，伏地号泣，随即从皇宫旧厨中拿来食物进献给旧主，最后垂泪辞别。看守两人的士兵都被萧摩诃的情谊所感动，自愧不如。隋文帝杨坚知道此事后，感叹道：“萧摩诃真是一位壮士，一般人很难做到他那样。”因此入隋后，萧摩诃的境遇相当不错，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正一品），随汉王杨谅出守并州。生活还过得去，但往日手握重兵、驰骋疆场的威风一去不复返了，萧摩诃常为此而郁闷。恰好汉王杨谅待他非常亲善，两人于是走得很近。杨谅要起兵反对杨广，萧摩诃举双手赞成。

然而，杨谅造反之后，接连犯了几个错误。第一，杨谅起兵的口号是“诛杨素、清君侧”，一下子就模糊了自己的目标，对天下的号召力不够；第二，杨谅起兵缺乏充分的准备，太过仓促；第三，杨谅没有集合军队，直扑京师，而是兵分多路，同时进攻山东、关中两个大方向，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很快杨广就集中精锐的中央军，以杨素为主帅，迅速迎击杨谅。

杨谅和萧摩诃两人起兵，一个是争权，一个是发泄不满，重温往日辉煌。目的不纯，再加上萧老将军的武艺也生疏了，造反者远远不是前来镇压的杨素的对手。仁寿四年（604）八月，萧摩诃在清源（今山西清徐）被杨素俘虏杀死，时年七十三岁。杨谅被捉，押送京师。杨广假惺惺地说自己兄弟所剩不多，饶了杨谅的死罪，除爵为民，开除出皇家族谱，囚禁起来。但是杨广不给杨谅吃饭，活活饿死了他，而杨谅属下的官吏和军民二十多万人都被流放。

杨坚不愧为老皇帝，料事很准。杨谅果然只可以当一个王爷，没有争权夺利的天赋，可惜他没有牢记父亲的训诫。

至此，隋文帝杨坚的五个儿子中，三子杨俊死于疾病和恐惧，长

子杨勇、五子杨谅被杨广所杀，就只剩下隋炀帝杨广和被废为庶人幽禁起来的四子杨秀了。隋末江都之乱时，杨广被乱军缢死，而随行的杨秀也死于乱军之中。他们五兄弟，无一善终，没有一个是正常死亡的。《隋书》评论说：“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祸，未若有隋之酷。”

杨广即位不满四个月，即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一直居住在洛阳的陈朝末代君主陈叔宝死了。

照例，隋朝有关部门奏请追赠陈叔宝为大将军、长城县公。陈叔宝虽是俘虏，可毕竟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来盖棺论定。

对陈叔宝这个人，杨广是很有感情的。早年，杨广是征伐陈朝的军事主帅，陈叔宝名义上是杨广的俘虏。而从内心深处来说，杨广觉得陈叔宝和自己有点相像，都出身高贵，都喜欢文学，都写得一手好诗，都非常感性。但是杨广看不起陈叔宝对政治的荒唐态度。在杨广看来，一个人的价值必须通过政治来体现，政治远高于文学。为了政治，杨广可以抛弃文学，压制一切欲望，想出最肮脏的阴谋诡计来消灭前进途中的障碍。而陈叔宝将文学和欲望放在了政治之上，导致了身败国灭。杨广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从陈叔宝的身上吸取教训。

为了树立一个反面典型，杨广反复斟酌，给陈叔宝确定了一个谥号：炀。

《谥法》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所有谥号中最坏的一个字，是后世对一个皇帝最糟糕的评价。

给陈叔宝“鉴定”完毕后，新年快到了，这时登基的新皇帝也需要

改换年号。杨广又是一阵冥思苦想，敲定了两个字：大业。

“大业”和“大兴”一样，大气、雄浑，寓意吉利而明显。大业，意思是伟大的事业。杨广好不容易才坐上龙椅，胸中有宏图大志需要付诸实践，只有“大业”这个年号才能表达内心的激动和澎湃。

第六章 王朝的形象工程

皇帝的新衣

杨广是一个复杂、难以看透的人。也许是因为杨广是一个感性的人，浑身散发着文人气质，很多事情很难用理性的标尺去条分缕析，而是需要深入他的内心去认识，照着他的逻辑去分析。

隋朝的大臣们很快就发现新皇帝是一个滔滔不绝的政治演说家。每天早朝的时候，杨广牢固把握着话语权，从天文到地理，从内政到外交，他有说不完的话。必须承认，杨广是一个成功的演说家，玉树临风的外表加上激情四射的话语、富有震撼力的肢体语言、逻辑清楚的解释，他的演说并不枯燥，还相当吸引人。许多大臣都被新皇帝崭新的政治理念和充满诱惑的政治蓝图所吸引，相信杨广能够带领天下实现那样的目标。

杨广对国情的基本认识有两点：第一是天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第二是隋朝已经积累了相当强盛的国力。所以他要调动隋朝的实力去解决那些矛盾和隐患。当然了，老皇帝杨坚也在努力解决问题，但在杨广看来，父亲的动作太小、太慢，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问题。闲置国力，任由问题继续存在，那简直就是犯罪。现在，杨广说得最多的词就是“急迫”和“规模”，谈论最多的内容就是外交、军事、财富。

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杨广，雄心勃勃，经常看奏章到深夜，即使

是在颠簸的出巡旅途中也不例外。杨广随时关注政策的执行进展，会在深更半夜把相关官员叫醒来询问政策的落实情况。杨广执政期间，每年都有好几项巨大的国家工程同时进行，而他对工程细节都亲自过问。最能说明杨广的勤奋和精力充沛的例子是这位文人皇帝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亲自主持编纂了图书三十一部，共计一万七千卷。

杨广不是那种办事只有三四天热度的人，多年的政治历练和太子生涯让杨广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对于政治有成熟的看法。基层的政治实践让杨广对官场的“惰性”极为厌恶，他要挑战这些惰性，革新政治。如果说杨坚崇拜汉文帝和汉景帝，创建了类似“文景之治”的“开皇盛世”，那么杨广崇拜的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杨广认为隋朝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自己煞费苦心才获得江山，就为了得到一个操纵权力治理天下的机会。他说：“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意思是天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来引导、治理，而隋朝选择的人就是杨广。

杨广毕竟年轻气盛，似乎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他“招募行人（使者的通称），分使绝域”，派遣使者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风土人情。听说吐谷浑在青海高原放牧的波斯马能生龙驹，能够一日千里，杨坚就放了两千匹雌马去求“龙种”，结果一头龙驹也没有生下来。杨广依然很高兴，因为他至少知道了青海的波斯马生不出龙驹。

大业元年（605），太常少卿裴蕴迎合杨广的喜好，奏请将北朝的周、齐和南朝的梁、陈的乐家子弟编为乐户，让擅长音乐百戏的人轮流到太常寺供奉，在乐府之中研究乐曲、传授乐伎，达成文化盛事。杨广非常赞赏这个建议，准许推行，结果隋朝的声乐人才队伍扩大到了三万余人。这个出主意的裴蕴是陈朝人，他在隋朝灭陈之前暗中投靠了隋朝，成为隋军的内应。陈朝灭亡后，隋文帝杨坚在众多南朝北上的精英分子中特别褒奖了裴蕴，还要越级提拔他。当时的尚书左仆射高颎不清楚内情，开始还不同意提拔裴蕴，可见裴蕴这个人隐藏之深。如今杨广登基改元，裴蕴再一次把握住机会，投其所好，很

快就升迁为民部侍郎。

不过，尽管杨广有些特殊的喜好和好奇心，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雄心大志，一心想要比肩秦皇汉武。他一即位就废除了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又将男子成丁纳税的年纪从二十一岁改为二十二岁，多给予了农民一年休养生息的时间。而随着杨广开始推行心中的宏图伟业，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王朝开展起来。

杨广登基后的第一项国家工程就是营造新都洛阳。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曾经营建了新都大兴。到杨广登基的时候，大兴城还没有完全竣工。但在杨广眼中，父亲的大兴城已经落伍了，满载不了自己的勃勃雄心。他把目光投向东方。之前，尉迟迥和杨谅造反都曾给远在关中长安地区的朝廷措手不及的打击。杨广吸取教训，决定营建洛阳作为新都，以防“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部分大臣同意朝廷应该加强对东方的统治，但反对在已经有都城的情况下再造一个新都。杨广反问，谁规定天下不能有两个都城？结果，杨广的这句话为中国创建了“两都制”。洛阳成了隋朝的“东都”。

国家还没改元，仁寿四年（604）年底，杨广就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开始建造东都洛阳。

洛阳早在商周时期就是东方重镇，威震黄河中下游的诸侯，在东周正式成为都城。后汉、曹魏、北魏继续以洛阳为都，建设成人口百万、住户阜密、通衢繁华的大都市。遗憾的是，这座恢宏的都城在南北朝的连年鏖战中惨遭攻伐，乃至多次被屠城，几乎沦为废墟。

杨广决心恢复洛阳的光芒，他先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命令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这道长堑，在第二年（605）年初就完工了。紧接着杨

广放弃了汉魏洛阳城的故址，在原址以西十八里的地方重新建造都城。他任命宰相杨素担任营建东都的大监，全面负责营建工作，同时命令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具体施工。杨广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来建造洛阳，每月役使工匠超过两百万人，发长江之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输运洛阳。杨广看得重，杨素等人催得也急，结果劳工的劳动强度很大，死亡率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间，装载劳工尸体的大车在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的广大地区内“相望于道”。最后，一座比大兴城更加宏伟的洛阳城在十个月内就完成了。

完工后的东都洛阳城规模巨大，“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是个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周回五十二里”。洛水自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分全城为洛北、洛南两部分。

洛阳城延续了大兴城的分区设计，城郭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城北的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殿堂错落，其中最壮观的是即使在百里之外都能望见的干阳殿。殿庭周围遍种枇杷、海棠、石榴、梧桐等奇花异木。在宫城西南还有占地辽阔、风景优美的上阳宫；宫城南边是皇城，即官府衙门所在地；外郭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居住的地方。

洛阳城西是广大的御花园——西苑。整个西苑周长二百余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西苑有山有海，建筑品类丰富，规模远远超过了洛阳的城郭。杨素、宇文恺等人搜求到的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都放在了那里，杨广看了以后，又下令全国各地州县定期贡献花木鸟兽，以充实园苑。他还命人剪彩绫为叶，编丝绸为花，保持苑内“四季如春”。

洛阳城致命的问题和大兴城一样：没有居民。它是在图纸上规划

出来的又一个首都，就像杨广的玩具，需要主人把居民人偶“放”进城内。城郭筑成的第二个月，杨广下诏迁徙豫州的百姓和数万家富商大贾，充实东都。在大业二年（606）五月、大业三年（607）十月，杨广又分别迁徙江南富户六千余家 and 河北工匠三千余家，充实东都。

杨广迁徙政策的力度很大，洛阳城很快就成了人烟密集的都市。隋朝后期，洛阳鳞次栉比的酒楼和客栈表明这座新都的成功——商业往往是一座城市繁华度的晴雨表。洛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如金、银、珠宝、瓷器、皮毛、丝绸等。来自西域各国和来自东方日本的商人，与洛阳本地的小商小贩一起交易，将这些商品辗转运到世界各地。

随着杨广在洛阳的时间越来越长，长到超过了他在大兴城的时间，洛阳城逐渐发展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每次科举考试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举人都聚集在洛阳。

大规模北巡

杨广的北巡，要追溯到汉王杨谅造反的时候。杨谅起兵反对杨广之前，曾派人联络突厥的启民可汗，企图借助突厥骑兵的力量争夺帝位。还没等启民可汗回话，杨谅的造反行动就失败了。双方联系的事情败露后，杨广一度怀疑启民可汗的忠心，不允许突厥部落在长城以南休养生息，命令他们全都回到塞外，而且不能在长城附近游牧。

启民可汗是仰仗隋朝生存的，他离不开隋朝的支持，于是不得不在大业二年（606）年初亲自跑来求见杨广，解释突厥人的忠诚，希望消除误解。

杨广很乐意享受启民可汗“来朝”的感觉。为了炫耀大隋的繁华，他煞费苦心，把大量已经失业的乐工、舞者和杂耍艺人都重新召集起来（北齐、北周、南齐、南梁、南陈等国的末代君主们留下很多这类人员），准备一场盛大的表演。

启民可汗一行人来到隋朝的朝堂后，杨广先派人引导他们参观了陈列的各种文物珍宝。接着，他们才被引到金碧辉煌的大厅中，刚刚坐定，鼓声响起，演员们装扮成狮子、怪兽、虫鱼、龙龟等跳跃而入，塞满大厅。突厥人目瞪口呆，还没缓过神来，大厅中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鲸鱼模型，背景立刻换成了缤纷的海洋。鲸鱼向空中喷出烟雾，转瞬之间从浓烟里冒出七八丈长的黄龙数条，紧接着又出现神龟驮山、幻人吐火的现象，令人目不暇接。启民可汗等人感觉就是置身天堂之中，而等演出转变成舒缓的歌舞时，惊魂稍定的启民可汗匍匐叩头，请求杨广允许突厥民族归化为隋朝臣民。对此，杨广十分高兴。

启民可汗的来朝让双方都探明了态度。有来无往非君子，杨广在次年（607）四月至九月北巡榆林郡，亲往启民可汗驻地宴请可汗及其部属。

这是杨广第一次大规模远巡。杨广很重视，把排场搞得很大。他将盛大的排场看成是震慑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的锋利武器。结果，杨广创建了一支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仪仗队伍，披金戴银，装备“只求最贵，不求最好”，“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以称上意”。此后，杨广每次出巡，都配备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仪仗队伍，他们衣饰绚丽，前呼后拥，惊天动地。

北狩时，杨广的仪仗队后面还有十多万甲冑鲜明的正规军“护驾”。最后，连杨广都担心这样耀武扬威会把启民可汗等人给惊着了，于是就把隋文帝时期擅长处理突厥事务的大臣长孙晟找出来，让他先去启民可汗部落通知迎驾。

启民可汗很会办事，听了长孙晟的解释后，不仅把属下突厥各部的首领都召集过来，还把依附自己的奚、室韦等数十个部落的首长也都叫过来，一起迎接杨广。

一天，长孙晟在启民可汗的帐篷外看到道旁杂草丛生，就想让启民可汗当着各部酋长的面亲自拔草，整理营垒，恭迎杨广。启民可汗如果能这么做，杨广在北方各族面前该多有面子啊！于是，长孙晟趁和启民可汗及各部酋长闲谈时，指着帐前的杂草说：“那是大香草。”启民可汗傻傻地去闻了以后说：“这草不香。”长孙晟就发话了：“天子出巡驾幸某地，诸侯要亲自洒扫街道，翻整御道，表示至敬之心。我看可汗营帐前杂草丛生，还以为是留着香草迎驾呢！”启民可汗听出长孙晟的弦外之音了，毫不犹豫地拔出佩刀，亲自除草。直属的突厥首领和依附的各部酋长见启民可汗如此，也赶紧拔刀除草、整修道路，唯恐落后。

启民可汗又征发突厥各部的劳力在西起榆林、东达于蓟（涿郡治地）的三千里道路上翻修了御道，恭迎杨广驾临。杨广来了之后，突厥各部毕恭毕敬。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前后敬献马三千匹，杨广赐物一万三千段，宾主尽欢而散。事后，长孙晟也因功升任右骁卫将军。

然而，即便在突厥的地盘上，杨广也要炫耀隋朝的国力。他让宇文恺建造了一个能够容纳数千人的大帐，在里面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席间，大帐中仪仗罗列，歌舞升平，杨广慷慨地向各位客人赐物二十万段。史载：“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方各族君长共推杨广为“圣人可汗”。这一幕标志着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声望达到了巅峰，而启民可汗终其余生，他领导的突厥民族都没有和隋朝发生征战。

杨广此次北狩，还有一件大事是修缮长城。大业三年（607）七月，隋朝征发民工百余万筑长城，次年七月再次征发二十多万民工筑长城。隋朝修缮了原北周王朝北部边境的长城，将它与北齐的长城连接，基本完善了东至东海、西至宁夏之间漫长的防御体系。

杨广北狩期间，朝廷内部则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前任宰相高颀，之前被杨广、杨素联手扳倒，但他在朝野的声望犹存。杨广继位后，起用高颀担任太常卿。早在杨广下诏征集散落民间的声乐人才的时候，高颀就很不以为然，上奏说：“此乐久废，现在征召相关人等，恐怕无识之徒弃本逐末，竞相学习声乐，败坏了风气。”杨广觉得这话说得很刺耳，但念高颀是老臣，就把他的谏言置之不理。后来杨广在北方边界炫耀，又要修缮长城，高颀非常担忧如此奢侈豪举会消耗国力，惊扰百姓。私底下，高颀对同僚、太常丞李懿说：“北周的宇文赟就是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啊。”又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

杨广辗转听到这些话后，无疑是在兴头上被人泼了凉水，他认定高颍是倚老卖老，诽谤朝政，在大业三年（607）七月下诏诛杀了高颍。高颍时年六十七岁，他的几个儿子也都被流放边关服劳役。

高颍是隋朝建立和开皇盛世的关键人物之一。《隋书》评论他：“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颍之力也。”隋朝的许多制度和政策背后都有高颍的影子。高颍被诛后，天下莫不伤惜，后人也普遍为高颍感到冤屈。

高颍一案株连甚广。随杨广北巡并与高颍私下议论朝政的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等人同日被诛杀。其中开皇名将贺若弼死时六十四岁，儿子充军边疆，妻女沦为官婢。

开皇年代的另一个重臣苏威，在大业初期曾复官为尚书右仆射，现在也受到牵连被免官。开皇年代的许多重要人物以这种形式告别历史，真让人感慨世事难料。

那一边，杨广巡视了北方各族，修缮了长城之后，开始从榆林返回洛阳。一路上，他让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护驾，沿途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杨广觉得坐在马上或者车子上不够气派，大业三年八月，命令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观风行殿”。顾名思义，这是一座行走着的宫殿，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宇文恺用不同的车驾、零件组合成了这座巨大的宫殿，下面安放轮轴，后面由民工推着前进。他还建造了周长二千步的“行城”（行走着的城池），“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推移起来，声响震天，撼动大地，又一次震慑住了北方各族军民。他们还以为天上神宫现世，在十里之外望见行殿、行城，就屈膝稽顙，下马步行。临别时，启民可汗奉觞上寿，跪送杨广，突厥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不敢仰视。

第二年三月，杨广再一次北巡。这一次是为了出塞察看长城，杨广由此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亲自视察长城修建工程的帝王。这一次出巡，黄门侍郎裴矩看到杨广喜欢巡视天下和向四邻炫耀的特点，揣摩杨广可能对西域会有兴趣。于是，他在杨广此次北巡期间献上了自己编撰的《西域图记》三卷。

《西域图记》记述了西域四十四国的风土人情、服饰仪形等内容。杨广满怀好奇地阅读了该书，并把裴矩叫到跟前交流。裴矩得以当面向杨广介绍西域的情况，夸口西域诸国奇珍异宝无数，而一直和隋朝过不去的吐谷浑也很容易吞并。

杨广第一次被大臣描绘的美妙情景蛊惑，决心像汉武帝那样凿通西域，于是任命裴矩总管西域事宜。隋朝下一个奋斗的方向转向了西北。

凿通西域

裴矩是隋朝的“西域通”。他在西北任职期间，很注意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氏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绘画各国王公庶人的服饰仪形，还结交了大量胡商。这一切为裴矩规划隋朝的西域政策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大业四年（608），得到杨广支持的裴矩游说铁勒部落进攻吐谷浑。吐谷浑战败，伏允可汗率部退入西平郡（今青海东部），向隋王朝请降。杨广派遣爱将宇文述率兵出屯西平，准备受降。结果伏允可汗看到隋军强盛，在最后关头害怕了，不仅不降，还率众西逃。宇文述在后面紧追，深入青海高原，连续两次大败吐谷浑军队，杀敌数以千计，俘虏王公贵族数以百计，而前来归降的吐谷浑人口超过十万。至此，吐谷浑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的疆域成了隋朝的领土，隋朝在此设立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杨广的偶像汉武帝当年在西汉极盛之时，也只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设置过郡县。杨广凭借强盛的国力将中原王朝的势力渗入青海高原，使隋朝的疆域达到了极盛。此时的隋朝东、南都到达大海，西到且末，北到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裴矩除了挑拨铁勒和吐谷浑相攻外，在张掖的“招商工作”也取得了成功。

裴矩的秘诀是不计成本，完全不考虑商品交易的收益情况，只要西域的客商愿意到河西或者内地贸易就可以了。事先，杨广拨给裴矩一笔巨款，专门用来“补贴”西域的客商。有利可图又没有风险，谁都喜欢开展贸易，于是裴矩很顺利地就吸引了西域十几个国家的商队到

河西和内地贸易。

杨广从榆林巡视回来后，看到吐谷浑的问题被解决了，西域各国和隋朝的商贸热情很高，决定在大业五年（609）三月巡视河西地区。裴矩连忙赶往敦煌打前站。

隋朝的皇帝来了，西域怎么也得出几个国王来“朝拜”一下。裴矩故技重施，派使者许下重利，说服高昌王曲伯雅和伊吾吐屯设（突厥为了守伊吾设置的官员）等人晋见杨广。杨广西巡到燕然山（在今甘肃武威境内）时，高昌王、伊吾吐屯设和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首领已经在路旁守候。这些前来觐见的异族首领们都佩带金玉饰物，穿着华丽的锦缎服装，焚香奏乐，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隋朝官府还命令武威、张掖两地的男女老少都盛装出来捧场。如果有人的衣服或者车马不够鲜亮，郡县官府就要出面教育，教育不成就捉到大牢里去。结果，御营附近数十里地都被汹涌而来的人群和车马给挤满了，人声鼎沸。

杨广把“观风行殿”也给带来了，在上面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古代百戏杂耍名，是中国最早的大型魔术），宴请高昌王、伊吾吐屯设等二十多个国家的首领和高官。西北各族也看到了隋朝的实力与风范，惊叹不已。杨广感觉良好，在西北逗留到十一月，才耐不住风沙返回东都洛阳。

此次西巡，杨广写了一首堪称是边塞诗精华的《饮马长城窟行》：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伊吾吐屯设在朝见杨广的时候，将原来和吐谷浑有争议的几千里土地全都献给了隋朝。隋朝接管这片土地后，派遣将军薛世雄在伊吾筑城屯兵。至此，从东汉末年开始断绝的中原经西域到西方的交通重新打通了，而裴矩受命前去负责东西交通和通商事务。裴矩向西域诸国解释说，隋朝在伊吾筑城的目的是方便和西方各国通商。实际上，杨广给他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在西域展开挑拨离间、政治暗示或者拉拢隋朝支持者的活动。

隋朝进入西域的时间很短，但营造了卓有成效的以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西域各国相继对隋朝称臣纳贡。裴矩安抚怀远有功，凭此跻身隋朝的核心权力圈。

杨广前脚刚回到东都洛阳，西域各国后脚就来“朝贡”和贸易了。

西域来的人很多——有稳赚不赔的生意，谁都会趋之若鹜的。裴矩知道杨广喜欢这样的热闹场面，建议杨广在洛阳举办大规模的歌舞杂技表演，营造出热火朝天的气氛来迎接客商。

杨广于是下令征召各地的奇人异士、歌手舞女到洛阳参加演出。官府还要求洛阳及周边的百姓穿上锦绮衣服、插戴金银珠宝来城中充当游戏的观众，人数多达十几万人。朝野百官的待遇稍微好一点，虽然也被要求衣着华丽充当观众，但可以按照品级次序坐在戏棚里看戏。洛阳是一座新城，杨广仍觉得需要精美装饰，下令街道两旁的店铺设置帐幕，将最丰盛的商品和酒食都摆出来。洛阳城中不能有任何肮脏的地方，再小的细节也不能吝啬金钱去装饰，最后连街头卖菜的小贩都必须用昂贵的龙须席做摆菜的席子。

西域客商来了之后，主管番邦事务的官员带着他们沿街与市民做买卖。事先百姓们都得到了通知，应当如何招手，如何应付客商的问题。而饭馆酒楼得到的命令是，只要看到西域客商就拉他们进去吃饭，直到客商们酒足饭饱为止。为了显示隋朝的富足和百姓的热情好客，官府还严令：西域客商吃饭喝酒后，百姓不能要钱。如果有西域客商饭后坚持付钱，那么百姓就需要以更加坚决的态度说：“中原丰饶，吃饭喝酒一律不收钱。”

许多西域客商看到洛阳店铺鳞次栉比，装饰盛丽，珍宝充裕，隋朝的百姓遍身罗绮，既惊讶又羡慕，赞不绝口。但西域小地方来的商人中也有头脑清醒的人，有客人看到大街上的树木都用高级绸缎包裹树身，就问陪同的隋朝官员：“我们沿途看到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装饰的丝绸布帛给他们做衣服呢？装点城池有什么用呢？”陪同官员愧不能答。

就这样，洛阳城整整热闹了一个月才停止。杨广花费巨资让隋朝在这个月中成了“神仙之国”。有人质疑这么做的价值，杨广对亲信宇文述说：“裴矩很了解我的心意。他常常想我所想，在我说出来之前

就提出来了。如果不是一心为国，裴矩怎能做到这样呢！”

杨广即位以来大手笔频出，开皇十数年来积累的财富很快就见底了。当然，杨广的所作所为也取得了回报，隋朝慑服了突厥和西域各个民族，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而且隋朝在最初的几年继续高奏凯歌，扬帆向海外前进。

大业三年（607），杨广曾派羽骑尉朱宽进军浩瀚的西太平洋，希望征服海洋上的国家和民族。第二年，朱宽再次入海招抚流求国，遭到了流求的拒绝。于是，杨广派军远涉重洋进攻流求，斩杀流求王渴刺兜，俘虏了上万人口返回。

在南方，仁寿末年，隋文帝杨坚曾派大将军刘方为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今越南南部地区）。大业元年（605）正月，隋军进击至海口（江河入海处），林邑国王梵志派兵抵抗。林邑的军队很有特色，他们乘坐大象，呼啸围攻。隋军完全不适应象军，中原士兵和战马都没有见过这些长着两只长牙的巨兽。莫名的恐惧让隋军一接战就人仰马翻，节节后退。

后来，刘方想出了一个方法，在地上挖坑，坑上盖草，然后派兵挑战，把林邑的军队引到地坑群中。林邑的军队横冲直撞，纷纷陷入大坑，乱成一团。这时，隋军再用巨弩射击大象，大象皮厚，没被巨弩射死，但也疼得嗷嗷乱叫，掉头向后跑，结果冲入林邑的军阵，踩死许多林邑士兵，林邑伤亡惨重。刘方这才率领隋朝大军乘胜追击，连战连捷，很快就攻入林邑国都。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隋军胜利了，但由于水土不服，官兵死伤大半，只好在林邑刻石纪功而还。大将军刘方也在半路上病死了。隋军虽然撤走了，林邑国王依然后怕不已，主动上表称臣，归附隋朝。

倭国来朝

倭国，也就是现在的日本，它和隋朝之间隔着朝鲜半岛。直到开皇二十年（600），倭国才第一次遣使入隋。隋文帝杨坚喜出望外，因为之前只在南朝有“倭国”遣使来华的记载，倭国已经有百年没有来中原朝贡了。

借此机会，杨坚派官员向倭王阿辈鸡弥的使节询问倭国民俗。使者说倭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天黑时处理朝政，天亮即停止，把白天交给弟弟太阳管理。杨坚一听，火冒三丈。中国皇帝以“上天之子”自居，而倭国国王自称是上天的弟弟，那岂不成了中国皇帝（也就是杨坚）的叔叔了？杨坚斥之为荒谬之论，训令倭国国王改换称呼。

使者回去后，向摄政的圣德太子汇报出使情况。圣德太子对杨坚要求改名的训令不以为意，倒是隋朝佛教兴盛的情况很感兴趣。他以求佛经佛法为名，第二次遣使入隋，目的还是加强交往。

大业三年（607），杨广当政时期，倭国派小野妹子为使节，鞍作福利为翻译，携带国书出使隋朝。国书是这么说明出使目的的：“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因此，使团中有数十名留学僧，他们是日本首次向中国派出的留学生。

杨广对于海岛小国的倭国能够不畏艰险，翻山越洋前来“朝贡”，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自己威望远播的结果。但看到倭王国书，杨广和父亲杨坚一样，不高兴了。原来国书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杨广不能接受蕞尔小国的国王与自己平起平坐，他

当即命令鸿胪卿（类似于外交部部长）：“以后如果蛮夷的国书狂妄无礼，就不要拿给我看了。”尽管内心不快，杨广还是热情接待了使团，并派遣文林郎、鸿胪卿掌客裴世清为正使，率领十三人的代表团回访。

大业四年（608），裴世清在小野妹子的陪同下到达九州岛。倭王还下令在难波城（今大阪）高句丽馆舍的基础上修建新馆，准备招待裴世清一行。裴世清使团先到达难波，并在皇室的隆重欢迎下进京（今奈良）。倭王多次派遣大臣带领数百人的仪仗，鸣鼓角来迎。裴世清觐见倭王，而圣德太子、诸王和诸大臣都头戴金髻华，身着锦紫绣织及五色绫罗参加会见仪式。

倭王说：“我听闻大隋在我国之西，乃礼仪之邦，所以派人朝贡。我则区区岛国，偏居海隅，不识礼义，孤陋寡闻，以至久不往来。今贵客远来，特意清扫道路，装饰馆会，以待尊使，希望听到来自泱泱大国的文明教化。”

裴世清随即献上礼物和杨广的国书。国书的第一句就是“皇帝问倭王”，一下子将倭王降低到了隋朝藩王的地位，且是上级对下级的口吻。圣德太子当即指出隋朝的国书贬低了倭王，裴世清对他说：“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裴世清又对倭王说：“此乃我朝赐诸侯书式。”圣德太子考虑到倭国需要向隋朝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快快而退，最后没有计较称谓和礼节问题。当裴世清回国时，倭国热情地宴请相送，再一次以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组成使团，护送裴世清归国。

该年年底，裴世清、小野妹子等人到达隋都大兴。小野妹子向隋朝呈上倭王国书。这份国书是圣德太子亲自撰写的，称隋朝皇帝为西皇帝，日本倭王为东天皇。鸿胪寺官员看到这份国书，怕再惹杨广不高兴，就将国书扣了下来，没有交给杨广。

之后，隋朝和倭国关系发展顺利。倭国一共向隋朝派出了四批使团，全面考察了隋朝的政治、经济和佛教情况。其与中国的交往与其他国家不同，带有很强的学以致用色彩。其他国家与中国朝贡，更多看重商贸利润，而倭国看重的则是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它在隋朝留下了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这些留学生和僧人，在隋学习时间很长，有的等唐朝建立了还未归国。倭国和隋朝的友好交往，揭开了其在唐朝时全面照搬中国制度、文化的序幕。

大运河与江南

大运河工程是杨广关注最多，也是隋朝出力最大的国家工程。

杨广总管江南十年，十分喜欢江南风光，而江南水乡也在他的身上镌刻了深深的痕迹。杨广娶了出身南方的妻子萧氏，又学会了吴语方言。杨广还留下了许多描写江南的诗歌，比如《早渡淮诗》：

平淮既淼淼，晓雾复霏霏。

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晖。

晴霞转孤屿，锦帆出长圻。

潮鱼时跃浪，沙禽鸣欲飞。

会待高秋晚，愁因逝水归。

江南的水景在他的笔下惟妙惟肖。又如《江陵女歌》，用平实流畅的语言记叙了一场发生在江南小桥流水上的爱情故事：

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

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

但是，如果把隋朝倾全国之力修建大运河之目的仅归结为杨广热爱江南水乡，希望乘船重温江南美景，或者更具体为方便去扬州看昙花，那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杨广不是醉情山水、不顾一切的纯书生，他修建大运河有更深远的考虑：

大运河在地理上贯通了南北，为南北交通增加了水运这么一个崭新的形式。如果将隋朝的天下比作人体，那么大运河就为人体搭建了一条新的血脉。它的开通方便了全国的政令、物资和人员交流。洛阳城修建的一大目的是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同样地，大运河的修建是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从东吴到南朝，江南产生了许多与中原政治中心对峙的割据政权。

当年杨广就是以平定江南起家的，长期镇守江南，清楚江南的人文、风俗和经济。隋朝之时，江南早已不再是司马迁在世时刀耕火种的原始景象了，而是人口繁盛、市井繁华，在国家赋税中贡献的比例越来越大。大运河将南方的赋税、民工和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几乎就是一条财富之河。后人诗为证：“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唐代诗人皮日休作《汴河怀古二首》诗咏叹大运河，将杨广修河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的确，如此大规模地改造山河，之前只有传说中的大禹进行过，

而杨广留下的大运河不是传说，它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上千年的作用。遗憾的是，皮日休在诗歌中的赞誉是一个“假设句”，他在字里行间对杨广修建大运河一事还是持批评态度的。这也是后人普遍的态度。那么，为什么要批评这样一个出发点并不坏、让后世受益的工程呢？因为和之前诸项工程一样，大运河也是在无数民工的尸体上修建起来的，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有些工程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而大运河是“功在千秋，祸在当代”。

当东都洛阳还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工地时，杨广又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赶赴规划中的运河沿线。大运河工程分成数段，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一段运河叫“通济渠”，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一段有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杨广对此进行了疏通。这两段运河组成了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沟通了洛阳到江南扬州的水路交通。此后，杨广又两次大征民工，开通了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市）的“永济渠”和从江都的长江对岸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这四段运河连接起来就是贯通南北、全长四千里的大运河。现在看到的大运河是元朝政府在隋代运河基础上截弯取直、疏通加工的结果，称为“京杭大运河”。

修治运河的无数民工是看不到运河的辉煌远景的。当时官府督工很急，男人不够，官府把妇女也征发到工地干活。国家同时进行的工程实在太多了，民间此时已经提供不了足够的劳动力。隋朝政府规定百姓每年服徭役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而且每年只能征发一次。现在各地官府不得不打破规定，连续征发民工，而且民工每次服役的时间远远超过一个月。许多人刚刚参加完前一个工程，侥幸生还，马上又被官府逼着去参加下一个工程。民工因为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待遇和非打即骂的监工，更谈不上有任何医疗或者补偿措施，大批地死去。被征发的民工超过一半是死在了运河工地上，而上千里长、

四十步宽的河道在一百七十一天内就修成了。隋朝又创造了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

杨广对大运河期望很高，验收要求异常严格。验收官员们在上游放下测量运河深浅的木鹅，让其顺水漂下。木鹅安装有一丈二尺长的铁脚，如果在某处停住，就表明该处挖得不够深。结果，木鹅在某段运河先后停了百来次，杨广大怒，下令将负责这段运河的官员和民工五万人全部就地活埋。因此，运河沿线的官吏和民工都将缓缓漂流的木鹅看作是阎王的催命符，眼巴巴地盼着它快点离开自己的河段。

运河第一期完工后，杨广在大业元年（605）八月和大业六年（610）三月两次乘船到江都。

杨广巡游江都，每次都浩浩荡荡，旌旗迎风飘摇，舟船绵延二百余里。杨广乘的船叫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下四层。最上一层包括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房，都以金玉装饰，极尽奢华；下层为内侍们使用。皇后乘坐的船称作翔螭舟，除了规模略比龙舟小一点，其中的装饰一样。随从的其他后宫嫔妃，以及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和外藩使臣等人，乘坐的船则名为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五楼、道场、玄坛等，数以千艘。还有号为平乘、青龙、艨艟等小船数千艘，供禁卫军乘坐。此外，又有名为“浮景”的大船七艘，三层高，殿中可击水为乐。

每次巡游，还需动用挽船民工数十万人。此外，运河两岸也有骑兵夹岸相送，同样绵延数百里。而大运河沿途五百里以内的州县，都要向御舟献食。那些州县官员献上来的都不是一般的食品，而是山珍海味，一个比一个好。最后，献食变成了攀比竞赛，各个地方官逼着百姓给御舟置办酒席美食。每次吃饭的时候，杨广面前千奇百怪的南北佳肴都有上百桌之多，根本就吃不完，因而随行的王公大臣甚至太

监宫女都能有幸跟着吃。起程时，大量剩余的美食则被就地掩埋，可谓暴殄天物。

也许前往江都的巡游本身比到达江都以后的活动更具有娱乐性，更吸引人的眼球，杨广在江都的活动反而没有记载（或许他根本就没在那儿干正经事）。反而是江都特产的一种花，因为杨广惹得天怒人怨的大巡游而殃及池鱼，落了一个坏名声。这就是昙花。昙花花期极短，只在深夜时分开放，不等天亮就凋谢了，看过昙花开放的人都盛赞它的冰清玉洁和淡香盈室。据说杨广对昙花的好奇心特别强烈，多次赶赴江都就是为了观看昙花，结果好端端的昙花被后人骂为“亡国之花”。

大业二年（606）四月下旬，杨广第一次巡游结束，从江都回到了洛阳。饱览江南美景的杨广，排场依然很大，遍摆帝王法驾，用他那庞大的仪仗队护卫，队伍绵亘二十余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洛阳城。杨广回朝接见群臣，还命令五品以上的文官武将按制度佩玉戴帻，喜气洋洋地来见自己。七月，杨广的太子杨昭病死了，年仅二十八岁。杨广也只短暂悲伤一下而已，心情很快就调适过来，不久又是莺歌燕舞，无异平日。

这就是皮日休在作品中说的“水殿龙舟事”。晚唐人胡曾的《咏史诗·汴水》则直接将这旷古绝今的巡游看作是亡国征兆：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杨广的智商很高，肯定意识到了大规模的建设运动和不必要的炫耀挥霍了国力，与即位初期宽政爱民的思路背道而驰。但是他依然自负地认为自己的政策方针对国家的发展有利，符合百姓的长远利益。

为了美好的未来，也为了尽快解决现有的问题，老百姓预支沉重的代价是合理的。没有付出哪有收获？杨广紧握令牌，坚信只要挺过最初的困难时期，隋王朝美好的日子就会来临。

统治阶层自然也意识到了最近五六年来政策的消极结果。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此时高颀已死，开皇前期君臣坦荡、齐心协力的局面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杨素在大业二年（606）就死了。杨广身边的执政团队主要有纳言苏威、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内史侍郎虞世基。五人一起参政，人称“五贵”。五贵之中，苏威曾是开皇时期的名士，并不受杨广的信任，在位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其他四个人都是工于心计、邀宠取信的小人。

宇文述是杨广的亲家、老臣，与苏威平起平坐，是杨广的心腹。镇守江南的时候，宇文述就跟着杨广了，之后又为杨广夺嗣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杨广经常将各国贡品或美食赏赐给宇文述，以致往返皇宫和宇文述府邸的使者常常在路上相遇。而宇文述更加谨慎，“善于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卫者咸取则焉”。针对杨广好奇心强的特点，宇文述常常进献奇服异物，讨杨广的欢心，杨广果然更加宠信宇文述。一时间，宇文述权倾朝野。

左卫将军张瑾在公开谈论宇文述时，说了几句宇文述不太爱听的话，宇文述当即瞪眼呵斥张瑾，使得后者害怕得赶紧开溜。朝廷的将军尚且如此，一般臣民见到宇文述更是像绵羊见到猛虎一样。宇文述为人也确有猛虎一般贪婪残暴的性格，知道别人有珍异的宝贝就一定要夺到手。一些富商大贾就投其所好，争相以金银宝物贿赂他，还拜他为“干爹”，结果纷纷得以封官晋爵。最后，宇文述家里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宠妾美女有数百人，家童更是多达上千人。除了皇室，宇文述的荣华富贵在当时无人能比。

至于裴蕴，则是一个奸臣加酷吏。他靠整治乐队得到杨广赏识。为了增加户口（户口多了就可以多征税，多拉壮丁出力），大业五年（609），裴蕴提出在全国再度“貌阅”，搜刮民户。裴蕴因而更得杨广器重，被擢升为御史大夫。当上最高监察长官后，裴蕴一意附会迎合杨广，在审判大小案件之前总是先揣测杨广的心意，因此深得圣宠。大文豪、司隶大夫薛道衡是开皇老臣，写了篇《高祖文皇帝颂》，触发了杨广敏感的神经。裴蕴察觉后，马上弹劾薛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果然得到杨广的授权查办薛道衡。裴蕴实在找不到任何证据，最后竟然以“腹诽私议”（在肚子里说坏话）的罪名诛杀了薛道衡。南宋创造“莫须有”罪名的秦桧和裴蕴比起来，只能算是晚辈了。

杨广统治晚期，天下反抗越来越多，这就更离不开裴蕴了。裴蕴广撒罗网，镇压反抗，动不动就将相关人员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裴蕴掌握御史、刑部、大理寺的实权，又扩充监察人员，监视全国，权势膨胀。断狱轻重全由他一人决定，想收拾谁就收拾谁，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这样的人，可谓名副其实的奸臣、酷吏。

“五贵”中的最后两个，地位逊于前三人。排在第四的是在西域和洛阳怂恿杨广大肆挥霍炫耀的裴矩。裴矩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有一套，也有功劳，但进入朝廷核心后，明哲保身，只知道迎合杨广。

排在第五位的是不怎么抛头露面的虞世基。虞世基负责朝廷机要工作，专司上传下达，杨广的许多诏书就是由他草拟的。隋朝宫廷每天的奏章数以百计，杨广口授的诏书每天也要写满近百张纸，虞世基竟然能够做到没有差错，可见这个人的公文处理能力相当强。但虞世基也是一个明哲保身的懦夫，知道杨广不是轻易能够劝动的人，又看到力行劝谏的张衡、高颎等人的悲惨结果，很害怕。他虽然每天都在杨广身边，但只知道点头称是，取悦杨广。

虞世基在家庭生活方面也一团糟糕。他的继室孙氏，性情骄淫。

虞世基管不了她，任由其奢侈淫靡。后来，孙氏竟然将自己和前夫的儿子夏侯俨带到裴家，一起鬻官卖狱，收取贿赂。裴家最后门庭如市，金宝盈积。但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在恶劣无比的环境中真正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清贫独立，整天看书练习书法，保持了书生本色。

这样的皇帝和这样一帮大臣掌管隋朝的政权，隋朝的前途堪忧了。

第七章 攘外还是安内

东征高句丽

杨广接手隋朝的时候，国家积蓄丰裕，制度富有活力，杨广本人又能力不凡，满怀壮志。这样的局面似乎是一个伟大时代开始的标志。但是四五年后，隋朝的国库就空了，政治气氛混浊不堪，百姓也基本是在各个大工地上疲于奔命，民怨沸腾。

局势危险了，可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如果杨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改弦更张，局势完全有可能好转。杨广也许也想过与民生息，安定国内，但莽撞和好大喜功一旦占据思维主线，个人的改变变得异常困难了。

可以说，杨广的急不可耐的情绪和草率频繁的政策是恶化形势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隋朝在外交政策上的一次重大失败，将王朝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个消耗了隋王朝最后精力的国家是高句丽。高句丽原本是朝鲜半岛中部的国家，趁着中国处在乱世，不断向外扩张，先是攻占了乐浪郡和带方郡，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接着迁都平壤，大败百济，占领了朝鲜半岛中部的汉江流域。国势鼎盛的高句丽还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占领了辽东，开始与中原政权发生摩擦和战争。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给高句丽国王高阳下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诏

书，历数了高句丽的种种不守属国礼节的恶行，并且用隋朝灭亡陈朝的故事来威胁高句丽。高阳接到诏书后曾上表谢罪。高阳死后，他的儿子高元即位，开始时还向隋朝朝贡。可在开皇十八年（598）初春，高元率领上万靺鞨骑兵侵入隋朝的辽西地区，被营州总管韦冲赶走了。

杨坚大怒，让汉王杨谅和高颀等人率领水陆大军三十万讨伐高句丽。这次进军非常不顺利，杨谅率领的陆军刚出山海关就遭遇雨季，道路泥泞，军队供给出现严重困难。军队又爆发了瘟疫，很多士兵染病身亡，勉强走到辽河岸边，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从海上直接进攻平壤的水军被大风大浪吹翻战舰，溺死了十之八九的官兵。隋军没有能力作战了，只好草草撤退。尽管如此，高句丽王高元还是被隋朝的军力震慑住了，主动上表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杨坚见其主动认错，隋朝一时又无力深入高句丽作战，只好将讨伐一事搁置待议。

大业三年（607）八月，杨广在突厥的启民可汗大营中做客。发生在突厥营帐中的一件小事重新点燃了战火，将隋朝和高句丽都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原来杨广做客的时候，高句丽王高元正好派遣了一个使团来找启民可汗。启民可汗当时正在寻求隋朝的支持，不敢隐瞒高句丽使团的到来，就把他们带去见杨广了。这个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杨广：高句丽这个北方敌人竟然私下联络归附隋朝的突厥势力。高句丽人想干什么？联络突厥一起对付隋朝，侵吞隋朝土地吗？

黄门侍郎裴矩在这个节骨眼上进言，给杨广火上浇油：“高句丽的领土是中国古代的孤竹国。周代将它封给了箕子，汉朝划为三个郡直接管辖，晋朝将这个地区归属辽东。如今高句丽成了外国，还一再挑衅我朝，先帝早就想征伐教训他们了。只是因为杨谅无能，师出无

功。陛下怎么能让这个冠带之地继续沦落为蛮貊之乡呢？现在高句丽的使者出使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陛下应该迫令高句丽王高元入朝觐见。”杨广深以为然，告诉高句丽使者：“启民诚心归顺，朕才驾临他的营帐。明年朕将巡视涿郡，你转告高句丽王高元，速来朝见，否则我将和启民率领大军讨伐高句丽。”

然而，杨广的命令如石沉大海，高元一点动身的迹象都没有，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不给杨广面子。杨广龙颜大怒，高呼着要组织大军，踏平高句丽。

这一回，隋朝的大臣们对杨广的命令提出了质疑。大臣们都同意讨伐高句丽，但多数人认为现在并不是出兵的时候。天下多年来苦于兵役和劳役，百姓已经精疲力竭，出现了骚乱迹象。有人开始逃离家乡，躲入穷乡僻壤开荒种地，逃避无休止的徭役。有人甚至自断肢体，逃避徭役，称之为“福手”“福足”。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再行征役，势必使恶劣的局势雪上加霜。

像往常一样，杨广断然拒绝了大臣们的劝谏。大业七年（611）二月，杨广下诏讨伐高句丽，自己巡幸涿郡，命令天下官兵不论远近，都在明年春天到涿郡集中。第二年正月，应征士兵全部集中于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两百万，负责后勤运输的民工几倍于此。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用兵规模。隋朝还通知了北边和西北的许多藩王到涿郡来观阅隋军的雄壮景象。准备就绪后，杨广正式下讨高句丽檄文：

而高丽 [1] 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獫之域……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輶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

杨广决定水陆分兵讨伐高句丽。隋朝的陆军分为二十四队，分批出发，一直走四十天才走完。整支军队规模惊人，仅杨广的御营就绵延八十里地。隋军进入高句丽国内作战时，许多押送军需的民工还行进在河北、山东各地。

当时刚刚修完大运河第一期工程，侥幸活下来的民工本来是可以回家的。现在为了开通水路运送军粮，杨广下令将大运河从洛阳继续挖到涿郡。那些可怜的民工不得不继续转战大运河第二期工程。

隋朝的水军集中在山东沿海。隋朝在东莱（治所在今山东莱州）海口督造战舰三百艘，日夜赶工。民工们昼夜立于水中造船，因为长期浸泡在海水中，腰部以下都长满了蛆，三分之一的人死亡了。

大臣们对天下百姓承受能力的担心成真了。东征高句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大业时期前几年国家工程征役量的总和。中原地区的人力、物力已经无法支撑庞大的战争，官府开始普遍征发妇女服役，同时命令江南的百姓出力、出军粮，北上涿郡服役。后来牛车都被征调完了，官府不得不征调人力小车三十多万辆以运输物资。这些小车由两个人推着前进，只能载米三石。道路遥远，米没送到军营就被车夫吃完了。车夫们没法交差，只好四处逃亡，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极少有人能够安稳从事农耕，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物价飞涨。再加上某些地方出几个贪官污吏，百姓们的生活就完全过不下去了。

民乱旋即爆发，杨广却还沉浸在踏平高句丽的梦想之中。他任命爱将宇文述为扶余道军将，负责陆军。宇文述当时的年纪已经挺大了，杨广特许他带着家眷出征，便于照顾生活起居。杨广向宇文述解释说：“古礼说，七十岁以上的人出征可以带着妇人，宇文公可以带家眷随军。”接着，杨广做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较，说“项籍虞姬”就是先例。杨广挑选的水军统帅是在江南就认识的来护儿。来护儿在地方上政绩出众，杨广继位后，他进入隋朝政权中心，升迁为右翊卫大将

军，晋封荣国公。现在，杨广任命来护儿为平壤道行军总管，率水军由东莱海口横渡黄海，计划从湍水（今朝鲜大同江）进入高句丽，突击高句丽首都平壤。

杨广预料这将是一次胜利的行军，在出征前下令：“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他不希望战果和功劳都被前线将领占去了，牢固掌握着决策权，想体验一下亲自指挥灭亡高句丽的滋味。这就在客观上束缚了前线将领的手脚。杨广甚至考虑到高句丽城池主动投降的情况，下令前线将领要就地安抚接纳，不能纵兵掳掠。而大军刚出发，洛阳的官员就受命开始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大军凯旋后举办献俘仪式。

三月，隋军强渡辽水，在东岸大败高句丽军，乘胜围住了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高句丽军队突围不成，只能固守。隋军猛攻城池，几次就要攻陷了。情况危急的时候，狡猾的高句丽人就声言献城投降。因为杨广之前的训令，所以前线指挥官只好停止进攻，赶紧跑过去报告杨广，询问如何处理。等杨广的命令传回军中，高句丽守军早将城池加固，休整完毕了，根本就不提投降的事情。隋军不得不重新开始攻城。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好多次。高句丽人屡试不爽，每到危险时刻就说“我投降”，隋军眼睁睁看着高句丽守军死里逃生，没有办法。后方的杨广被骗了好多次，还不醒悟，坚持要把所有指挥权集中在手里。

结果，辽东城久攻不破。隋朝大军困于城下，人疲马乏，士气和战斗力大减。

挨到六月中旬，杨广龙颜大怒，亲自跑到辽东城下，把前线将领痛骂了一顿，骂诸将无能，不会打仗。骂完以后，他亲自指挥大部队攻城，同时命令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张瑾、卫文升等将领率九

路大军三十万人绕过辽东城，计划强渡鸭绿江，挺进高句丽腹地，与来护儿的水军会师平壤城下。杨广此举无异于利刃掏心。

宇文述等人很快长途奔袭高句丽后方而去，但他们是在敌人后方作战，没有后勤补给，所以出发前宇文述便命令全军士卒携带百日粮草。这些粮草加上盔甲、衣物、武器等，重达上百斤，压得将士们无法承受。领军的将领们怕物资带少了，更怕士兵们沿途舍弃粮食，下令“遗弃米粟者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士兵们就趁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营帐中挖坑，把过重的粮食掩埋掉。三十万大军走到半路的时候，粮草就所剩无几了。宇文述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提议撤军，但遭到了其他将领的反对。多数人害怕私自撤军会遭到杨广的严厉处罚，宇文述也不禁踌躇起来。三十万奔袭大军裹足不前。

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这时候跑来“投降”，其实是找个理由进入隋军营帐刺探军情。出征前，宇文述与于仲文接到密旨，说只要看到乙支文德这个人就捉起来。两人正准备将其扣押，尚书右丞刘士龙当时在军中，天真地认为乙支文德是来投降的，而且不相信杨广有什么密旨，所以怂恿于仲文放走了乙支文德——大概是想让乙支文德回去搞“统战工作”。

乙支文德一走，于仲文就反悔了，既怕杨广怪罪，又怕乙支文德把隋军的真实情况给透露出去，所以要带领大军去追捕。宇文述不同意。于仲文发怒道：“宇文将军率领十万之众，不能破一小贼，有什么颜面去见皇上！看来我们这一次要无功而返了。”宇文述也生气地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无功？”于仲文说：“大军作战，能否功成名遂要看领军之人。现在将领之间各怀异心，何以赴敌！”宇文述被这话一激，驱赶隋军大部队渡过了鸭绿江。

那一边，乙支文德被任命为高句丽统帅，对隋军采取游击战。高句丽军队在与隋军交战的时候，佯装节节败退。隋军被连续取得的“胜利”所迷惑，渡过萨水（今朝鲜清川江），前进到距离平壤只有三

十里的山地。乙支文德又派人来诈降，说：“我要投降，如果隋军能够班师撤军，我马上将高元绑到天子面前谢罪。”宇文述不相信乙支文德的话，但考虑到孤军深入，连续作战，又没有粮草了，而前方的平壤城墙高大坚固，无力攻破。他假戏真做，以乙支文德答应投降、准备献出高句丽王作为借口，下令全军撤退。

宇文述留了个心眼，为了防止乙支文德追击，命令隋军编成方阵，轮替后退，各阵之间互相警惕。沿途，乙支文德果然不断袭击隋军，隋军且战且退，在七月下旬到达萨水附近。渡河的时候，隋军没法再保持方阵了。乙支文德指挥大军趁隋军只渡了一半，发动总攻。隋军四散溃逃，大将辛世雄战死。宇文述等率领残部仓皇北逃，逃到辽东城时清点人数，仅剩二千七百人，损失超过三十万人。

大势已去，杨广在七月底从辽东撤围回国。

来护儿率领的水军，很早就到达了高句丽沿海，还取得了几次接触战的胜利。但水军等了好几个月时间，陆军都没有挺进到平壤城下。水军部队的粮食开始短缺，军心浮动起来。来护儿决心剑出奇招，挑选精锐武士四万人，直趋平壤城下，冒险决战。高句丽军队出城交战，佯装大败，弃城而逃。来护儿纵兵入城抢掠（估计是抢粮食吃），队伍乱成一团。高句丽大军乘机杀了回来，隋军惨败，来护儿只带着数千残兵逃回海上。杨广率领陆军撤退后，来护儿也跟着撤军了。隋朝第一次讨伐高句丽的战役，以惨败告终。

东征高句丽的失败是杨广政治生涯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广之前的政治实践是节节胜利，凯歌高奏。一生在顺境中长大的他没有培养出政治家必需的抗挫折的能力，在失败的打击前面，他乱了方寸。

第一次讨伐高句丽，杨广准备充分，拥有绝对优势力量，志在必得，结果惨败而归。更难堪的是，有多位藩属首领随杨广观战，杨广本来是想炫耀军功，让他们更加畏服自己，结果是落荒而逃，颜面扫地。杨广每一寸肌肤都要被怒火给烧焦了。撤军后，杨广将宇文述等败军之将全部关入大牢。宇文述毕竟是杨广的亲信，而且他的儿媳是杨广的女儿南阳公主，此时南阳公主也哭哭啼啼地跑去求情，这让杨广不忍诛杀宇文述。最后，杨广将宇文述与于仲文两人除爵为民。倒霉的尚书右丞刘士龙则被拉出来当替罪羊，斩首以谢天下，来对战争失败做一个交代。

前线领军诸将之间也相互指责，最后大家都把责任推到了于仲文身上。杨广也责骂于仲文。于仲文估计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受到强烈刺激，扑通一声倒地不省人事了。同僚们赶紧把他送回家中，但他一回家就死了。

至此，不甘心失败的杨广依旧高呼：“不灭高句丽，誓不甘休！”他很快就宣布，准备再次讨伐高句丽，而且军队数量和物资准备都要超过第一次。第二年正月，隋朝下诏要天下官兵再次集于涿郡。经过第一次大败，隋朝的兵源几乎到了涸泽而渔的窘境，实在难以再征发百万大军了。杨广就命令在征召义务服役的军队之外，募民为骁果（志愿兵），给予各种政治优惠。等百万大军勉强拼凑好了，杨广第二次赶往辽东，御驾亲征。

行前，杨广做了三项人事安排：命令皇孙代王杨侑（故太子杨昭之子）留守西京大兴，由刑部尚书卫文升等人辅佐；宇文述官复原职，再次出任征讨主将，来护儿继续统帅水军出征；留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督运粮草。

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隋军进展顺利。四月底，隋军渡过了辽水，杨广亲率主力围困辽东城，派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分兵进攻新城（今辽宁抚顺北），命宇文述等人再次率军直捣平壤。一千人等正打得大汗淋

漓的时候，后方传来了晴天霹雳：礼部尚书杨玄感造反了！

[1]. 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政权，南北朝时期被称为高丽。现高丽一般指王氏高丽（918—1392）。

为什么是杨玄感

杨玄感是老丞相杨素之子，出身显贵之家，官至礼部尚书，这个被杨广委以重任的人怎么会造反呢？一切都得从头说起。

杨素既是隋朝的开国功臣，又是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登基、平叛的关键功臣。杨广当皇帝后，杨素权倾朝野，无形中对杨广形成了巨大威胁。杨广内心非常忌惮，对杨素“内情甚薄”，表面上礼遇有加，却找借口让杨素多休息，不让他参政议事。太史官说隋地所属的分野将有重大的丧事发生，杨广马上把杨素从越国公改封为楚国公，因为楚地和隋地属同一分野，杨广想借杨素来拦挡丧气。

大业二年（606），杨素病重不起，杨广频繁派遣名医前去诊治，还赏赐许多药品。但暗地里，杨广逼问太医：“杨素什么时候死？”病榻上的杨素不肯吃药，弟弟杨约就劝他要吃药养病。杨素悲哀地说：“我难道还要活下去吗？”杨素死后，杨广对近臣感叹说：“杨素不死，终当灭族。”现在杨素死了，杨广可以放心地给他立碑颂功，赞扬杨素“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是“竭尽诚节”的“茂绩元勋”。

杨素没了，杨广依然提防着杨家。

杨玄感是杨素的长子，长得体貌雄伟，有一副漂亮的须髯。但他小的时候呆头呆脑，有人就怀疑杨玄感的智商不正常。杨素坚定地对众人说：“我这儿子一点都不痴。”长大后，杨玄感文武全才，很快升为二品官，在朝堂上和父亲杨素并列而立。杨坚看到后，给杨玄感降了一等官衔，杨玄感拜谢说：“想不到陛下如此宠爱微臣，在公廷之

上让我有机会敬奉父亲。”转任地方官后，杨玄感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对地方上的大小事务知道得一清二楚，属下官吏不敢有丝毫隐瞒。杨素死的时候，杨玄感正在担任宋州刺史，因为父忧去职。翌年，杨玄感被起用为鸿胪卿，继承了杨素楚国公的爵位，不久又升迁为礼部尚书。

杨玄感和杨素一样，感觉到了杨广的猜忌之心，内心十分恐惧。但杨玄感和消极害怕的父亲不同，采取了积极反抗的态度。再加上显贵的家世、顺畅的仕途，这让杨玄感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念头。他看到朝中遍布父亲的门生故吏，而朝政越来越紊乱，就和几个弟弟阴谋推翻杨广的统治，先拥立秦王杨浩，再取而代之。

大业五年（609）夏，杨玄感跟随杨广出巡吐谷浑。六月初八，行进到大斗拔谷这个地方的时候，山路隘险，风雪晦暝，车驾狼狈混乱，杨玄感就想袭击杨广的行宫，发动政变。叔叔杨慎拉住杨玄感说：“现在的隋朝，民心统一，国内没有大乱，尚不可图也。”杨玄感觉得有理，这才没有动手。

杨玄感知道要起兵首先要有军队，所以四处活动，想谋个军职领一支部队。他找到兵部尚书段文振说：“玄感世荷国恩，宠逾涯分，自非立效边裔，何以塞责！现在地方上不稳，我愿意执鞭行阵，追逐军功。段公负责兵部，能否通融一下？”段文振告诉了杨广，杨广很赞赏杨玄感的态度，对群臣说：“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此言不虚。”于是杨广重赏了杨玄感，开始让他参与部分朝政，有时也交付部分军队。

隋朝处于鼎盛时期，杨玄感不敢贸然动手，当隋朝国势衰落，杨玄感动手的机会就到了。

大业九年（613）春，杨广二征高句丽，命令杨玄感在黎阳督

粮。

这时，杨玄感看到百姓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就和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密谋造反。他计划先让杨广率领的前线大军没有饭吃，饿得他们打败仗，到时候好浑水摸鱼。因此杨玄感截阻后方的粮草，不及时发送前方。杨广派使者逼促，杨玄感就托词“水路多盗贼，不可前后而发”。杨玄感的弟弟武贲郎将杨玄纵、鹰扬郎将杨万硕都在辽东军中打仗，也被杨玄感秘密派人召了回来。

当时，来护儿的水军还聚集在东莱海面，没有按期出发。杨玄感决定抓住这件事情作为起兵的借口。他让家奴伪装成朝廷使者，从东北方向匆匆赶来，谎称：“来护儿造反了！”接着杨玄感就以勤王防贼的名义，关闭黎阳城，正式起兵。

杨玄感在黎阳城内大拉壮丁从军，取帆布为甲，扩充军队，又按照开皇时代的旧制设置属下官吏，同时移书周边郡县，以“讨伐来护儿”为名要求各地派军，集结到黎阳听候调遣。

因为沉重的徭役和兵役，以及连年征战，民不聊生，隋朝的天下已经堆满了干柴和硫磺，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大火。

杨玄感点燃了第一把火。他起兵后，喊出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的口号，极具吸引力，一时间各地从者如流，连远在余杭的江南百姓刘元进都举兵响应。杨玄感起兵还在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导致了大分裂。大批年纪相仿的贵族官僚子弟赶到黎阳“共谋大事”，包括观王杨雄的儿子杨恭道、韩擒虎的儿子韩世谔、虞世基的儿子虞柔、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周罗睺的儿子周仲等四十余人。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人都响应杨玄感起兵。

在众多响应的贵族中，有一个人是杨玄感的刎颈之交：李密。李密的爷爷李耀是北周的邢国公，父亲李宽是隋朝的蒲山郡公，他自己才兼文武，尤其喜欢研究兵书，平日以救世济物为己任。李密年少

时，曾用蒲草做的鞍鞯骑牛，挂一卷汉书在牛角上，边骑牛边看书。牛角挂书，典出于此。杨素正巧路过看见，慢慢走到这个后生后面，问：“哪里来的书生，这么勤奋？”李密认识杨素，下牛参拜。杨素问他读什么，李密回答说是《汉书》的项羽传。杨素惊奇之余，和李密交谈，对他大为赞赏。回家后，杨素对儿子杨玄感等人说：“我看李密的风度，不是你们能比的。”杨玄感因此和李密倾心相交。

李密长大后，继承了蒲山郡公的爵位，散尽家财养客礼贤，结交各界朋友。大业初年，杨广曾授予李密亲卫大都督的职位。李密不喜欢，称病辞官回家休养去了。听说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后，李密马上冲出家门，赶来相助。黎阳城收兵纳贤，力量迅速壮大。

起兵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出乎杨玄感的意料。一开始的时候，他还用“讨伐来护儿”为号召，后来索性撕去伪装，将起兵矛头直接对准杨广。杨玄感还把死去的老皇帝杨坚给搬了出来，说：“先公杨素曾奉高祖文皇帝遗诏，曰：‘好子孙为我辅弼之，恶子孙为我屏蔽之。’”因此，杨玄感有为朝廷驱逐暴君的权力和义务。而杨广即位后的所作所为，显示他就是一个暴君、昏君，所以杨玄感“上禀先旨，下顺民心，废此淫昏，更立明哲”。

这样的政治宣言引起了天下一片赞誉声。

杨玄感的宣言传到前线，辽东战役正在关键时刻。杨广充分发挥隋朝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命令将士每人装土填一个布袋，然后将土袋堆到辽东城前。百万大军，每人堆一袋，很快就铺成了一条宽三十步、和城墙一样高的“鱼梁大道”。隋军真正做到了将辽东城围得水泄不通。天下头号能工巧匠宇文恺已经死了，杨广又挖掘出一个叫作何稠的高手。他为杨广建造了“六合城”，带到辽东来。这是座周围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城上布列甲士，刀枪如林，旗帜飘扬。此外，杨广还造了高于辽东城的楼车参与攻城。隋朝大军日夜俯射辽东城内，打得高句丽人毫无还手之力，哀号震天。

杨玄感造反后，这一切都成了无用功。中原腹心大乱了，征服一座辽东城又有什么用呢？杨广勒令全军前队变为后队，后队转为前锋，反身杀回中原，务必要将杨玄感大卸八块。

隋朝第二次讨伐高句丽的战争就这样草草收场了。高句丽守军一夜之间，发现隋朝大军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开始还以为是杨广使诈，连出城查看消息都不敢，只在城内鼓噪，高喊“追击、追击”。高喊了两天，高句丽人见城外还是没有动静，这才派几千士兵追击，结果追上了若干老弱病残和掉队的散兵游勇。隋朝囤积如山的军需物资和攻城器械，全部成了高句丽人的战利品。

东莱的来护儿忽然听到各处传闻“来护儿造反了”，觉得特别诧异，没几天又听说“杨玄感谋反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来护儿不顾部将们的反对，毅然决定停止进攻高句丽，挥师西进，同时派儿子来弘、来整去见杨广，解释自己没有造反。杨广对来护儿擅自撤军的行为非但没有责怪，还对来弘、来整二人说：“你们父亲擅赴国难，真是个诚臣。”

此时坐拥大军的杨玄感正挥兵围攻洛阳。

辽东前线的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卫将军屈突通和来护儿的部队及时回军，迅速对杨玄感形成了反包围。

杨玄感的谋主是李密，他给老朋友提出了上中下三条进取之策。上策是趁辽东大军仓皇南撤，士气和战斗力低落，主动北上占领幽州，断绝杨广后路，如果正面消灭了杨广，天下就定了大半；中策是趁关中空虚西入长安，控制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到时局势再坏也能够割据地势相对封闭的关中地区，称霸一方；下策是就近进攻东都洛阳，但胜负难测。

杨玄感选择了下策。因为他觉得自己为天下人起兵，如果连近在眼前的洛阳城都不攻克，如何示威？同时隋朝百官的家眷都在东都，占领洛阳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威慑力。于是，杨玄感渡过黄河，全军围攻东都洛阳。

杨广指定留守洛阳的是皇孙越王杨侗（故太子杨昭之子），民部尚书樊子盖等人辅助。

洛阳守军看到杨玄感气势汹汹，不敢接战，全力固守，坐等援军。

洛阳城是百万民工修建的新城，城郭坚固，城内物资齐全。杨玄感的军队一直难以攻克，困在了坚城之下，结果被四处赶来的隋军给反包围了。

杨玄感不仅缺乏战略眼光，而且在用人上也犯了错误。他在征战中俘虏了隋朝著名的文臣、内史舍人韦福嗣，就轻易收为心腹，将军旅机密都和他商量，冷落了李密。韦福嗣不想造反，只是做了俘虏才无奈加入杨玄感一伙。每次商议政事的时候，他都首鼠两端，说话模棱两可。杨玄感要他发挥特长，写讨隋檄文，韦福嗣坚决不肯。

李密劝杨玄感说：“韦福嗣并非我们一路人，心怀观望。杨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李密建议杨玄感将韦福嗣斩首谢众，但杨玄感不同意。李密知道自己不会被杨玄感信任和重用，退出来对亲近的人说：“楚国公造反了，却不想取胜，怎么办？我们迟早要成为俘虏！”后来韦福嗣果然找了一个机会，逃入东都洛阳，重回隋朝阵营——结果被杨广斩首示众。

杨玄感也有优点。他是一员猛将，作战时手拿长矛，身先士卒，锐不可当，军中将他与项羽相提并论。而且杨玄感善于治兵，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效死力。因此杨玄感的军队虽然是短期拼凑而成，但战斗力很强，战无不胜。洛阳的攻防双方僵持之时，镇守大兴的刑部尚书

卫文升组织起两万军队，东出潼关救援洛阳。卫文升救援心切，主动挑战，杨玄感佯败，把卫文升引入埋伏圈，大获其胜。几天后，卫文升再次挑战。激战时，杨玄感让人大呼：“官军捉住杨玄感了。”关中部队不明真相，一下子懈怠下来，结果被杨玄感的骑兵冲杀得七零八散。卫文升只带着八千人退回关中。

尽管取得了一些周边战斗的胜利，但杨玄感与隋朝大军纠缠，没有巩固的后方，粮草和军务供应很快就告罄了。于是杨玄感下了一步险棋，驱赶全部军队与隋朝大军决战。双方在北邙（洛阳北方的邙山）混战，一天内交战十几场。混战中，杨玄感的弟弟杨玄挺被流矢射死，杨玄感这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此时，杨广完全缓过劲来了，从容派遣武贲郎将陈棱进攻黎阳，又派屈突通守住河阳以防止杨玄感北逃，同时让宇文述和来护儿两人率领大军找杨玄感厮杀。

杨玄感意识到继续纠缠下去，自己就要变成瓮中之鳖了。他想起了李密之前的中策，决心跳出隋军的包围圈，进军关中。进军前，杨玄感派人去关中大造舆论，说：“杨玄感已经攻破东都，现在来取关中了。”李密对杨玄感说，进军关中是最后一搏，兵贵神速，切勿与隋军纠缠。杨玄感点头同意，率军冲过潼关，进入关中。杨广当然不会放过他，派宇文述等人率领隋军在后面追赶。

杨玄感开始进军很快，到达弘农的时候，有父老拦住杨玄感说：“弘农城空虚，城中囤积了许多粮食，很容易攻下。占领弘农，进可以绝敌人之食，退可以割地自保。”杨玄感一下子被弘农这块蛋糕给吸引住了，挥军攻城。结果弘农城一点都不好攻，猛攻三天都没有攻破。三天后，宇文述的追兵到了，缠住杨玄感军队，厮杀不放。杨玄感只能且战且行，结果连战连败，力量越拼越小，最后大败，向上洛（今陕西商县）方向逃窜。

八月初，杨玄感逃到了一个叫作葭芦戍的地方。他日夜奔波，已经精疲力竭，迈不动脚步了。杨玄感自知末日来到，对弟弟杨积善

说：“我们失败了。我不能受人戮辱，你杀了我吧。”于是，杨积善抽刀杀死了哥哥，然后自杀。但杨积善自杀的时候力道不够，没死成，被搜索的隋朝官兵俘虏了。追兵割下杨玄感的脑袋，和杨积善一起送给杨广。杨玄感之变就此结束。

杨广下令将杨玄感在东都闹市暴尸三天，然后千刀万剐，最后将骨肉烧成灰，扬灰解恨。杨玄感也被灭族：弟弟杨玄奖是义阳太守，叛乱时想跑去和杨玄感一起干，结果被郡丞周琬玉杀死；弟弟杨万硕从辽东前线开溜，不知道是头脑发昏还是吃不了苦，竟然一路慢腾腾地走，还住在隋朝的传舍中，结果被传舍负责人许华招呼官兵绑得严严实实，押送至涿郡斩首；弟弟杨民行，在大兴担任朝请大夫，在叛乱发生后被就地斩首。几兄弟全被千刀万剐。杨广还不解恨，下诏改杨玄感一家姓氏为“梟”，公布天下。

之后是漫长的追查杨玄感同党的工作。裴蕴是这方面的专家，一共杀了涉案人员三万人，全都诛灭全家，另有六千人被流放。杨玄感起兵初期，为了争取民心，将黎阳的囤粮发放给了周边百姓。事后，凡是领过囤粮的百姓全部被坑杀。结果，杨玄感之变的军事行动很快结束了，但更大的恐怖气氛一直笼罩在相关地区，久久不散。

杨玄感失败后，李密和杨玄感的族叔杨询秘密进入关中地区，躲匿在杨询妻子的娘家，结果还是被邻居告发了。李密被捕后，先是关押在大兴，后来又和同党一起被送往杨广的巡行之地——高阳（今河北定县）。

途中，李密对同党们说：“我们性命危在旦夕，如果到了高阳，下场既悲惨又恐怖。幸亏还在途中，我们不想怎么逃跑，还等什么？”同党均表示同意。有个同党私下里藏了许多金子，李密就让他把金子送给押送的官员，说：“我们就要死了，这些金子拜托你来保管，一部分改善我们几个人的待遇，其余的都送给你。”官员得到了金子，乐得合不拢嘴，不自觉地放松了对李密一行人的看管。

等出了潼关，看管已经非常松了。李密等人得到押送官员的允许，去集市上吃饭喝酒，每次都狂食豪饮，大声喧哗，通宵达旦。押送官员觉得这是几个犯人在做“最后的疯狂”，不以为意。结果到邯郸时，一行人夜宿村中，李密等七人夜里挖墙逃走了！

迟到的捷报杨

玄感之变给杨广提供了一个反省的绝佳机会。杨玄感叛乱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隋朝虽然不乏汹涌的暗流和小规模的骚乱，但维持了表面上的安定；之后的隋朝天下遍地狼烟，暗流涌上明处，小骚乱汇聚成了大动乱，攻陷城邑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此时，镇压叛乱应该成为隋朝的中心工作，但杨广还对东征高句丽的失败念念不忘。他不能允许同一件事情办理两次都没有成功，何况第二次是自己主动撤军，功亏一篑。

大业十年（614）二月，杨广召集百官商讨第三次讨伐高句丽。

连续几天，满朝官员任凭杨广滔滔演讲、威胁许诺，皆沉默不言。群臣知道议事厅外“群盗所在皆满”，局势已经危在旦夕了，隋朝亟须集中精力安抚动乱，但杨广对高句丽志在必取。第二次回军剿灭杨玄感时，杨广就驻蹕高阳，根本就没回洛阳。他将剿灭杨玄感看作是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一个插曲。现在杨广执意要完成未竟的事业，群臣又敢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呢？于是，隋朝决定再次征调全国军队和民工，讨伐高句丽。

这是杨广在三年间第三次讨伐高句丽。

杨广不是石头造的，目睹连年大兴土木、穷兵黩武造成的累累白骨，他也不能不动容。当然他也需要安抚百姓情绪，赢得出兵的支持。本次征讨高句丽前，杨广就派人收葬弃于荒野的征辽将士遗骸，设立道场祭坛超度死者亡灵。这么做的效果并不好，老百姓根本就不买账。隋朝官府很难征调足够的军队和民工，而被强拉到幽州的士兵

和民工们纷纷逃亡。

二月底，杨广来到北平郡卢龙县（今河北抚宁县内），在旷野中设坛祭祀黄帝。杨广主祭，将捉到的逃亡士兵斩首，以人血涂鼓，以示警诫。可百姓们软硬都不吃，逃避兵役徭役的人随处可见。幽州的许多道路上，一边走着被拉往前线的士兵和民工，另一边就是逃亡的百姓。一来一往，蔚为大观。

尽管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准备工作最差，军队数量和军需物资最少，但取得的成果最大。

大将来护儿在辽东大败高句丽军，乘胜进军平壤。高句丽此前连年作战，已经三年没有正常耕作和生产了。粒米不留，举国饥馑，杂草丛中满是来不及收殓的尸骨。高句丽根本就没办法组织防御，只好遣使请降。参与杨玄感叛乱的原兵部侍郎斛斯政，之前逃入高句丽寻求政治避难，现在刚好被作为礼物送回隋朝，给高句丽的乞降增加砝码。隋朝的战争机器也破败不堪了，比高句丽好不到哪儿去。杨广见高句丽举国投降了，在高句丽国内也实在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进攻目标，见好就收，宣布“凯旋回朝”。

隋朝最终还是打赢了高句丽。不过这样的胜利是隋朝用无法计算的物资付出将一个小国给活生生拖垮、拖投降的，两败俱伤，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内容。

事实上，杨广征服高句丽的价值不在于打败了一个敌人，而在于维护了自古以来在东亚地区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裴矩进入唐朝后写了一部《高句丽风俗》。武德八年（625）三月，他和中书侍郎温彦博对唐高祖李渊进言：“辽东之地，周为太师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以高句丽抗礼，四夷必当轻汉。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于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他们回溯十多年前，如果任凭高句丽侵吞领土，

蔑视隋朝的权威，那么势必助长其他周边国家“有样学样”。从长远说，这对中国保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不利。杨广打败了（或者说孤立了）高句丽，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吸引了百济和新罗，稳定了隋朝的东北局势，最后也为唐朝彻底征服高句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唐朝极盛时期，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步入了辉煌。可以说，隋朝又一次为唐朝的辉煌预支了沉重的账单。

杨广之所以胜得如此艰难，是因为他低估了高句丽拼死抵抗的顽强意志，狂妄自大，导致了一系列的军事失误。隋朝为杨广的失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三征高句丽是一个过于艰巨的任务，不应该由隋朝的这一代人来完成。为了对付高句丽，隋朝征发河北百万民工开凿三千里长的永济渠，贯通黄河与涿郡，又在岸旁修筑一百步宽的御道，种上杨柳树。沿河还建有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所。可就是在第一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前夕，大业七年（611）秋，黄河发大水，淹没了两岸三十余郡。杨广熟视无睹，一心要积累物资以对付高句丽，不调拨一兵一卒和一粒粮食救灾。无情僵硬的政策、前所未有的压力严重破坏了隋朝已有的社会结构、税制、府兵制和经济制度，更让王朝失去了民心。

王朝也是有元气的，元气散了，王朝的命运就堪忧了。

征战高句丽胜利了，但杨广还是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命令高句丽使者押解斯政到太庙，说明前后来由。宇文述看着杨广铁青的脸色，揣摩他需要发泄失意愤怒的情绪，上奏称：“斛斯政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人神同忿。如果对他施用寻常的刑罚，哪能惩戒贼臣逆子，请变常法严惩斛斯政。”杨广想出了一个发泄的办法，下令将斛斯政缚于柱上，让贵族百官将他当作活靶子射箭。把斛斯政射成刺猬后，杨广又命令百官操刀割下他的肉，放在锅里煮了吃。在杨广的怒视下，大臣们不得不照做。

做完这一切后，杨广还是心乱如麻。他在大兴没有待上一个月，便率领百官前往东都洛阳。

转眼，大业十一年（615）的新年就到了，按例要举办元旦大朝会。

杨广在洛阳宫殿以盛宴招待百官和藩属使节。事先，杨广征召高句丽王高元入朝。让高元在元旦的时候朝贺自己，杨广觉得内心可能会好受一点。但高元根本就未现身，只派了使者来参加元旦朝会。杨广三年多来奋斗的结果就是要高句丽臣服，而高元的缺席让他觉得一切努力都没有得到回报。杨广拘禁了高句丽使者，并下令整顿军备，扬言要第四次讨伐高句丽。但是杨广也好，大臣也好，都非常清楚隋朝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了。吐谷浑的伏允可汗也看出了隋朝的虚弱，乘机收复青海失地，骚扰西陲，重新成为隋朝的边患。杨广苦笑着，像平常一样大会宾客，像平常一样观赏百兽鱼龙的戏法和盛大的歌舞，也像平常一样颁赏赐物。

喧哗过后，杨广独自在深宫饮酒，半醉半醒之间赋五言诗，其末句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他在心中默念，念着念着，眼泪就下来了，沾湿了整个前襟。

当年的八月，杨广决定再次北巡突厥。

有大臣劝谏杨广不应该在国家多事之秋大兴巡游之事。他们不知道，杨广巡视北方边界是假，真实目的是希望重演大业三年（607）八月在启民可汗营帐中受到四夷首领朝拜，被推为“圣人可汗”的辉煌感觉。

然而六年前，隋朝的铁杆忠臣启民可汗就病逝了。同年，负责对突厥外交的长孙晟也去世了，其子长孙无忌继承爵位。

启民可汗病故后，儿子始毕可汗继位。东突厥经过启民可汗的苦

心经营，势力已相当壮观了。负责王朝外交的裴矩机械地执行“扶弱离强”的策略，认为始毕可汗部众强盛，需要扶持一个弱小的对立面与他竞争，保证隋朝的安全。裴矩就向杨广献策，离间东突厥内部，将隋朝公主嫁给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同时拜叱吉设为南面可汗。结果叱吉设不敢接受隋朝的好意，裴矩的离间策略没有成功，反而把始毕可汗给得罪了。始毕可汗渐渐对隋朝起了怨意。

裴矩却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说：“突厥人本来头脑简单，很容易被离间。但现在东突厥内部有许多狡猾的胡人，教导他们不要中计。我听说史蜀胡悉最奸诈，很受始毕可汗的信任，请皇上允许我诱杀史蜀胡悉。”杨广同意了，裴矩就遣人对臣服于东突厥的胡人说：“隋朝天子在马邑（即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展开优惠贸易，有许多珍宝想和你们交易。只要来了，就能得到厚利。”群胡信以为真，不告诉始毕可汗，就率领部落，赶着牛羊，争先恐后地前来贸易。谁料，等待他们的是裴矩埋伏在马邑的大军。待群胡被杀得干干净净，隋朝这才通知始毕可汗说：“史蜀胡悉忽然带着部落来到我朝边界，说要背弃可汗，请我朝容纳。突厥既是大隋的臣子，这些胡人背叛突厥，我朝就有义务帮忙剿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可汗不是傻子，早知道真实情况了，对隋朝的感情由怨恨转为敌视，从此不再朝会杨广。

裴矩对突厥外交的失败就在于他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利用的。过于现实，往往会将长期的朋友推向对立面。

杨广不知道突厥态度已变，依然出塞北巡，结果在雁门被始毕可汗的数十万骑兵团团围住。当时雁门守军只有一万七千人，形势危急。杨广慨叹道：“如果长孙晟还在，肯定不会让突厥猖狂到这样的地步。”

随行的宇文述建议杨广在数千精锐轻骑的掩护下突围，不过此举遭到了众人反对。大臣苏威说：“我军擅长守城，骑兵作战是突厥人

的特长。陛下是万乘之主，岂宜轻动！”内史侍郎萧瑀认为：“义成公主嫁入突厥，可以派人告之公主，请她相助。同时将士们害怕陛下击退突厥之后，又要四征高句丽。如果皇上能够公开发诏，告谕天下不征高句丽、专讨突厥，则众心皆安，人人奋勇作战了。”虞世基、来护儿、樊子盖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杨广重振精神，下诏停止第四次征讨高句丽的准备工作，亲自慰劳守军，给奋勇杀敌者开出重赏。雁门守军士气大振。同时，杨广下诏各地勤王。

杨广勤王令下，许多日后的枭雄参加了勤王的队伍。

屯卫将军云定兴组织勤王军队北上，许多贵族官僚便将子弟送入军中效力。唐国公李渊那没有成年的二儿子也在其中，他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

战前，云定兴召开会议，商议进军策略。主导的意见是大军要轻装快进，迅速与突厥军队作战，争取救出皇帝。年轻的李世民很以为然，对云定兴说：“我军勤王，必须大张旗鼓才有胜利的希望。”云定兴很奇怪，询问原因。李世民胸有成竹地说：“突厥可汗率骑兵深入内地，围困皇上，采取的是突击战术。突厥人料定我们仓促之间无法救援，现在如果我们大张旗鼓，数十里之间幡旗相续，昼夜鼓声相应，就大大出乎突厥意料之外。突厥肯定会以为我朝四方勤王军队云集而来，突击战术已经失去意义，那时突厥骑兵必然撤围而去。如果我军现在轻装快进，与突厥大军硬碰硬决战，胜负很难预料啊。”云定兴略加思索，肯定了李世民的计划。于是他率军大张旗鼓，稳步推进。结果，始毕可汗还真如李世民预料的那样。这一下，很多人都知道唐国公李渊有个很有军事头脑的儿子。

江都郡丞领江都宫监王世充也招募了上万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赶到晋北勤王。王世充本人出身西域胡人家族，没有显赫的家世，只能

靠自身努力步步升迁。在招待杨广游玩方面，王世充最活跃。当时隋朝各地多有小股骚乱，江南也不能幸免。王世充就率领小股部队，剿灭江南各处的骚乱，从没打过败仗。但是王世充这个人伪善狡诈，表现得勤政清廉，实际上沽名钓誉。在勤王军队中，王世充终日蓬头垢面，拼命催促部队赶赴雁门。一路上，他还悲伤地哭泣，昼夜不解甲，困了就趴在草堆里打盹儿。事后，杨广听到了王世充的“事迹”，非常感动，开始将王世充划入亲信大臣的圈子里。第二年（616），王世充就被升为江都通守。

隋朝各地勤王军队陆续赶到雁门，始毕可汗感觉越来越没有胜利的把握。这时候，与隋朝暗中联络的义成公主也从后方派人来对始毕可汗说，北边依附的少数民族叛乱了，请可汗速回。见此情形，始毕可汗匆匆撤围而去。雁门解围了。

之前被重围时，杨广曾许诺要重赏奋勇杀敌者。现在他把这个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苦守雁门的一万七千将士只有一千五百人得到虚勋封赏，各地勤王人马什么赏赐都没有。

解围后的杨广，情绪坏到了极点。突厥降服、北方恭顺曾经是杨广最显耀、最成功的政绩。在东北和西北接连出现问题的时候，归顺的突厥之地是杨广可以寻找安慰的地方之一。现在连突厥人也反了，而且反得这么彻底，将杨广团团包围在乱军之中。这让杨广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觉得多年的努力非但没有结果，而且使得朝政朝着相反的方向恶性发展。杨广的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城外的每一阵喊杀声似乎都在嘲笑杨广的无能和失败，嘲笑杨广不配当一个合格的帝王。雁门保卫战最艰险的时候，流矢射入城内，击中龙椅，杨广竟然吓得抱住儿子赵王杨杲大哭。号啕的大哭声远达户外，杨广哭得双目红肿。随行的大臣们第一次看到杨广哭泣，一时

不知所措。

在哭声当中，杨广的意志彻底消沉了。

大业十一年（615）九月，杨广车驾南行到达太原，大臣们纷纷劝杨广返回大兴。苏威说：“如今盗贼不止，士马疲敝。愿陛下还京师，深根固本，为社稷之计。”显然，杨广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社稷大事。宇文述察言观色，认定杨广恰恰是想逃避政事，说道：“随从众官的家眷多在东都，请陛下前往洛阳。”杨广答应了，于当年十月抵达洛阳。

这次回到洛阳，杨广开始询问近臣关于各处盗贼的事情，但依然听不进现实之语。宇文述说：“盗贼还很少，不足为虑。”杨广听后，很高兴，又指名让苏威回答。苏威不愿说假话，只好旁敲侧击道：“臣并不负责剿灭盗贼一事，不知道数目多少，只担心盗贼离两京和圣驾越来越近。”杨广问：“怎么说？”苏威说：“他日盗贼占据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境内），现在荥阳、汜水（在河南腹心地区）等处都出现了盗贼。”杨广面露不悦之色，而其他近臣们也不敢再说话。

在一些特定的节日里，百官要向杨广敬献礼物，一般多是珍玩器物。这一年，苏威偏偏进献了一部《尚书》，提醒杨广应该静心读书，仁德为政，再次惹杨广不高兴。后来，杨广又问苏威对征讨高句丽问题的看法。苏威回答说，希望杨广赦免天下的盗贼义军，派他们去讨伐高句丽。杨广见苏威又提起盗贼的事情，颇为生气。此事被擅长讨好杨广的裴蕴察觉，他便指使属下出面检举苏威滥授他人官爵，同时畏怯突厥，请还京师。

于是杨广交代裴蕴查办苏威，很快，案子就审判完成了，苏威被判定有罪。杨广便下诏说苏威勾结朋党，谤讪官员，除名为民。一代名士，终究还是在官场中沉下去了。

杨广消极堕落之后，开始沉迷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娱。

江都的王世充知道杨广好色，秘密进言说江淮多美女，自告奋勇要为杨广选美充实后宫。杨广高兴地同意，但提出一个要求：秘密进行。他让王世充暗中物色美女，挑选那些“姿质端丽合法相”的女子。为了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王世充取官府钱财和入京贡物作为入选美女的聘礼和挑选的费用。选美的规模很大，费用不可胜计，但王世充在账目上做得天衣无缝，不知情者根本看不出来。积累了一批美女后，王世充就通过大运河送入洛阳。

当时，大运河两旁骚乱不止，游荡的武装队伍很多，再加上船工苦于劳役，运送美女的船只常常不能正常到达洛阳，便沉没在淮河和泗水中。沉船事故前后发生了十几起，但王世充总是千方百计地摆平，不让事情败露。杨广收到美女后，看中合心意的，就重赏王世充，如果看不中，就让人带回江都赏赐给王世充了。王世充和杨广的关系日益密切。

杨广对江都的印象越来越好，当时江都的局势还相对稳定，杨广产生了去江都游玩的念头。宇文述最先看出杨广的意思，主动提议巡游江都。杨广很高兴地批准了。大业十二年（616）七月，杨广命令王世充在江都建造龙舟，送至东都洛阳，为第三次巡游江都做准备。之前，杨广曾经造过漂亮的龙舟水殿，但所有的御舟都在杨玄感造反时被焚毁了，现在只能让王世充重新造了。

此事传到大臣耳中，来护儿反对再惊扰天下搞大巡游，出面劝阻杨广说：“本朝寿命将近四十年了，薄赋轻徭，户口滋殖。陛下之前因为高句丽抗命，稍兴军旅。老百姓们无知，受人蛊惑，集聚为群盗，四处作乱。车驾此时游幸，深恐非宜。愿陛下驻驾洛阳，与民休息，再调兵遣将，扫清群盗。陛下如今要去的江都是臣的故乡，臣荷恩深重，不敢专为身谋。”杨广接到老将忠言，感叹良久，又将奏章放下，数日之后才招来护儿相见，说：“公意乃尔，朕复何望！”从

此，来护儿不再进言。

杨广巡游之意已决，留大将屈突通镇守大兴，留越王杨侗镇守洛阳，自己携带后宫、文武百官准备出发。屈突通为人正直，秉公办事，此前虽然没有大捷，但也从来没有吃过败仗。皇孙杨侗也是经常奉命留守东都，办事熟练。所以杨广放心把两京托付给他们。

圣驾待发之时，有个小官员——建节尉任宗上书极力劝谏，当天杨广召见任宗，将他在朝堂之上当众杖杀。奉信郎崔民象又上表说，方今天下盗贼横行，不宜出游，结果杨广命人将崔民象削去两腮和嘴后斩首。圣驾到达梁郡（今河南开封）时，有人拦路上书说：“陛下若去江都，天下将不复为隋朝之天下！”如此狂徒，惊扰圣驾，自然也没有好下场。

出发前，杨广还写了首诗赠给留在东都洛阳宫殿中的宫人：

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杨广承诺告别洛阳的时间不会太长，一年之后自己就会返回中原。谁能料想，他这一去竟是永别。

第八章 十八路反王

农民大起义

杨广连年征战和大兴土木，以及沉重的徭役和兵役，使隋朝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尤其是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时候，黄河以北多数地区已经渺无人烟，一片死寂。暴露在旷野中的尸骨没人收殓，发出恶臭，瘟疫横行。其中山东地区是重灾区。修建洛阳、大运河、驰道，征兵出征、出力，各地都有份儿，山东人民也在所难逃，而在东莱造船、向河北运粮等苦役则只有山东有份儿。此外，

大业七年（611）秋，黄河发大水，淹没了山东、河南等地三十余郡，大灾之后山东又爆发大旱灾和瘟疫，灾情极其严重。然而，隋朝官府都没有救济山东，原本富庶的山东大地顿时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大业七年，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登高大呼，号召反对繁重的兵役和徭役，被人祸天灾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山东百姓闻讯，揭竿而起。隋末农民起义就此爆发。

王薄很有“革命先驱”的样儿，能力出众。他自称“知世郎”，写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百姓响应起义，“……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歌曲朗朗上口，传唱很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一年之内，王薄起义军像滚雪球一样扩大至数万人，活动在山东中部的齐郡（今济南）、济北郡（今茌平境内）一带。

王薄势力发展迅猛，小股隋军望风披靡，一般州县看到王薄的旗号就闭门自守。

真可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隋朝在危急时刻涌现了那么几个忠心耿耿的大臣。

齐郡（今山东济南）郡丞张须陀就是这样的忠臣。他之前随史万岁征战云南，又跟随杨素平定叛乱，是在战场上磨砺出来的将领。更难能可贵的是，张须陀有勇有谋，还擅长抚驭百姓。大业六年，张须陀出任齐郡郡丞时，辖区百姓失业、饥荒遍野，他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下属反对，说没有圣旨，私自放粮罪责不小。张须陀毅然坚持放粮，说皇上远在千里之外，而百姓有倒悬之苦，如果拘泥流程，就会饿殍遍地，局势会火上浇油。最后，齐郡放粮赈灾，稳定了局势，为隋朝在山东地区保留了一块“根据地”。杨广事后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嘉奖了他。

张须陀冷眼旁观起义军，发现王薄的势力发展虽然快，但沾染了浓厚的骄纵情绪，就挑选精锐士卒，出其不意地对王薄起义军发动进攻，竟然一举大败起义军，斩首五千，擒获六畜数以万计。王薄收拢散部，结聚上万人准备渡过黄河去河北发展，又在临邑（今济南城北）遭到张须陀的追击，大败而走。第二年，王薄联合孙宣雅、石祗阇、郝孝德等各部义军，组织了十万人进攻章邱（今山东章丘）。张须陀先派人截击农民军的水运，中断后勤，然后率领两万人主动杀向农民军主力。这一次，张须陀再次大败农民军，俘虏家眷、缴获辎重不计其数。张须陀下令将这些俘虏和战利品暴露在地上，警示山东各地。

杨广后期屡战屡败，手下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将领。张须陀勇猛善战，又善于治军，深得军队拥护，成了隋朝末年的名将、朝廷的山东柱石。杨广接到山东的捷报后，下令褒奖，命人给张须陀画像奏报朝廷。

张须陀得到嘉奖后，更卖力地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他常常身陷重围，受伤多处，仍督军死战，成了隋朝镇压民变最有力的武器。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却说杨广第一次征讨高句丽时，曾经征发了一个民工，叫作窦建德。窦建德此人尚豪侠，为乡里敬重，因此被选为二百人长。窦建德有个同乡，叫作孙安祖。孙安祖被征调当兵时，因为家里刚遭了水灾，就跑去向县令请求免征租税。县令见一个小兵跑来求情，断然拒绝，还把孙安祖凌辱了一番。孙安祖一怒，杀死县令，跑去窦建德处投靠，但窦建德也无力收留。孙安祖心一横，拉起数百个贫穷兄弟逃入高鸡泊（在今山东武城县北），宣布起义。

当地官府开始追查孙安祖造反一事，怀疑窦建德与造反者有来往，于是抱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将窦建德留在老家的家眷全部杀死。窦建德在前线得到消息，无比愤怒，率领部下的两百个民工也起义了。鉴于自身力量太薄弱，窦建德就率部投靠在清河境内活动、自称东海公的高士达。不久，孙安祖在农民内讧中被张金称杀死，其部下数千人转而投靠窦建德。窦建德势力强大起来，手头有了上万条刀枪。

山东地区在王薄首义后，涌现了许多武装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张金称、刘霸道、郝孝德、格谦、孙宣雅等人的起义军，以及发源于山东、转战到外地的武装。比如，章丘人杜伏威的起义军就是转战多地。杜伏威当时年仅十六，盗贼出身，却急公好义、计高胆大，很快聚集了上万人马。他转战淮南，连败隋军，并吞并其他起义军队伍，发展壮大，成为江淮地区最大的一支农民武装。期间，山东人李子通前来投奔。李子通为人豪爽，却不甘于人下，谋划杀害杜伏威自立门户。杜伏威遭到偷袭，受伤后躲在芦苇丛中侥幸生还，后来重整兵马，驱逐了李子通。后者不得不继续向南，前往苏南、浙闽一代发展，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支农民武装。

这些义军名目繁多，不可确数，少则一两百人，多则超过十万

人。他们几乎全是刚放下锄头就拿起刀枪的庄稼汉，造反的目的是为了保命和吃饭，谈不上什么崇高的革命理想，更没有长远的政治规划。而且各个武装力量内部为了粮草和地盘，还相互残杀。但就是这些缺点明显的农民起义军动摇了天下的根本。山东的农民造反后，江宁（今江苏南京）、平原（今山东陵县）、灵武（今宁夏灵武）等地的农民也跟着造反了。

农民起义，引起了隋朝的疯狂镇压。大业十二年（616），隋朝的涿郡通守郭绚率领一万正规军讨伐高士达。高士达无力应对，把兵权转交给了窦建德。窦建德合兵一处，从中挑选了两千精兵迎击郭绚。窦建德先诈称投降，给郭绚写信表示愿意讨伐高士达，将功赎罪。郭绚不知是计，带着军队大摇大摆地来找窦建德合作。窦建德乘其不备，发动突袭，大败隋军。郭绚只带着几个人逃脱。窦建德率兵追赶，在平原境内将郭绚杀死。

另一边，隋朝的太仆卿杨义臣率军杀死了张金称后，也移军来进攻高士达、窦建德一伙。高士达见窦建德轻易消灭了郭绚，以为杨义臣也很好消灭，就向隋军发动主动进攻，结果反而被隋军消灭了，高士达被杀。接着，杨义臣乘胜猛攻窦建德的部队。当时的农民起义军，谈不上训练与纪律，与拿起刀枪的农夫无异，听说领袖高士达败亡，便有了溃散之心。一时间，窦建德部队溃不成军。他本人一路逃到饶阳（今河北饶阳），身边只剩下几百人而已。然而，杨义臣没有把握时机斩草除根，而是急着去消灭其他的农民武装了。

杨义臣刚走，窦建德就率兵返回平原，召集溃散的部众加以整顿，军队迅速增加。窦建德一改之前起义军抓住隋朝官吏与士绅便杀无赦的做法，对官绅以礼相待。此后，一些州县官员开始向窦建德所部献地投降。窦建德的队伍不仅死灰复燃，还发展到了十万多人，兵强马壮，气势兴旺。他自封为将军，俨然成了一方豪强。

大业十三年（617），窦建德转战河北，攻城略地。经过河间（今

河北河间）一战，窦建德歼灭隋朝在河北的主力 and 涿郡留守薛世雄的部队，占领了河北大部分郡县。之后他干脆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设置各级官府组织，建立起与隋朝相对峙的政权。这个政权很有草根特点，无名无号，只有一个土得掉渣的年号“丁丑”。窦建德本人也保持了草根特点，凡是得到战利品，都分发给有功的将士，自己一样不取；贵为首领，却吃蔬菜、粟米饭，妻子穿粗布衣服，不尚豪奢。或许由于这些原因，窦建德政权发展很快。

说完山东，再说河南。

河南人翟让，曾担任东郡的法曹，属于隋朝的基层地方官，因犯下死罪被关进大狱。后来，一个好心的狱吏放了他。翟让成了逃犯，只好在大业七年（611）逃到今河南滑县南边的瓦岗山，建立山寨，率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勇猛好斗，拳脚和马上功夫都很了得。他听说翟让挑头树起了反旗，也叫上一群少年前往瓦岗寨入伙。

这一时期，最早投入瓦岗寨的元勋有曾经当过县衙小吏的邴元真、游走江湖的算卦师傅贾雄、勇猛少年徐世勣和翟让的哥哥翟弘等人。翟让以贾雄为军师，邴元真为书记，徐世勣、单雄信为冲锋陷阵的杀手，组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武装。不过，最初到瓦岗山的起义军大多是济河两岸的渔夫和猎人。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济阴郡离狐的徐世勣。徐世勣年轻果敢，打仗勇猛。但在后世的评书和演义小说中，徐世勣却被演义成一个羽扇纶巾、迂腐矫情的牛鼻子老道。真实的徐世勣更类似于三国赵云那样的人物，不仅善战，而且有谋。他的政治经验远高于同龄人，往往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眼光犀利。他觉得翟让等人待在瓦岗寨打劫，没有什么大的前途，建议瓦岗军前往荥阳、梁郡交界处（今河南东部郑州、商丘一带）抢劫汴河运输，扣留往来的公私船舶以壮大自己。

翟让照计而行，果然抢到大量物资充当军需。瓦岗军很快发展成南北闻名的拥有上万人的大武装。

翟让所部占据地方不大，却是中原要害，对隋朝的威胁最大。

起义之势如火如荼，部分隋朝的地方官、将领看到起义的收益比老实当官大多了，也开始站到了杨广的对立面。身逢乱世，安安稳稳地当个太守、通守，每个月拿几斗米的俸禄，整天忙着镇压反叛，提心吊胆，还不如浑水摸鱼，凭手中的权力和军队参与中原逐鹿，干好了还能称王称霸。这些人从隋朝的官僚体制中走出来，对隋朝的冲击更大，更致命。虎贲郎将罗艺就是这种。

罗艺是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的部将，驻守涿郡。当时许多起义军都将涿郡当作侵掠的目标，但留守涿郡的将领打不过不断涌来的造反者，只有罗艺先后多次破贼，斩杀敌人不计其数。罗艺威势日重，被同僚们嫉妒。再加上他为人严肃，任气纵暴，和上司李景的关系也很不好（史载是为李景所辱）。罗艺忌恨李景，看到涿郡囤积大批征讨高句丽时的军需器仗、仓谷钱粮，心里就产生了别样想法。最终，罗艺非常自然地选择了反隋。

他号召军民的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指着涿郡堆积如山的物资，再让官兵和百姓们看看自己的衣服和生活，很快就激起了军民的愤慨和拥护，轻松地夺取了涿郡的控制权。大业十二年（616），罗艺开仓赈贫，杀害多名不拥护他的地方官，吞并河北北部，自称幽州总管。

自此，有头有脸的起义者都出场了，有关隋末唐初的说书和演义对此有一个专门名词，称“十八路反王”。这十八路反王到底是哪十八个人，历来说法各异。比较通行的版本是：瓦岗寨混世魔王程咬金、大梁王李执、小梁王萧铣、济宁王王溥、江南王沈法兴、海州王高士魁、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可玄、易州王铁木耳、南阳王朱灿、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济南王唐璧、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口北王福克宗

坦、沙漠王罗子都、金提王张称金、川蜀王薛凤池、曹州顺义王孟海公、相州白御王高谈圣。人们还经常说起的几路反王有洛阳王王世充、定阳王刘武周、夏明王窦建德、北平王罗艺，等等。这些口口相传的人物身上有许多虚构的色彩，但基本上能找到历史原型。他们都在隋末的乱局中留下了各自的色彩。

这十八路反王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混世魔王程咬金了。即使对隋朝历史茫然无知的人，也会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有关程咬金的故事众说纷纭，以至于这个人物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的民间文化之中，真假难辨。

程咬金的“民间履历”是这样的：程咬金原本家住济南，幼年丧父，随母逃荒至历城，长大后，程咬金贩卖私盐被捕入狱。在狱内第三年，杨广大赦天下，程咬金被释放出狱。出狱后的程咬金决心找份正当职业，就去卖扫把，结果被尤俊达骗入强盗团伙。他当强盗的第一桩买卖就是拦路抢劫——抢了杨林打算献给杨广的金银珠宝。之前，一般人打着杨林的旗号都平安无事，无人敢抢。可偏偏程咬金是文盲，不认识字，再加上又是新手，没人告诉他道上的规矩，程咬金半路挥舞着斧头把护送官兵打得落荒而逃。这就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典故所在。

程咬金劫了横财，惹出无数事端。杨林严令追查，结果促成了各地三十六个英雄豪杰抱团联合，在山东合兵起义。当时主持结义典礼的就是牛鼻子老道徐世勣。也就是这个徐世勣，想出了夺取瓦岗寨、占山为王的计划。程咬金一马当先，三板斧定瓦岗，被大家拥立为当家人，号称“混世魔王”。之后，程咬金便带着瓦岗军参与中原逐鹿。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十八路反王为了在半路上拦截巡游江都的杨广，被推举为天下义军的盟主。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远没有演义中这么风光。程咬金是济州东阿人，从小勇敢擅斗，是要长矛（不是斧头）的高手。山东大乱的

时候，打着义军旗号的队伍有上百支之多。这些队伍基本上没有政治规划，流动作战，四处抢掠。程咬金最初为了保家护身，在乡里联络豪杰组织起了一支队伍，防备义军。由此，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程咬金是地主出身，或是地方豪强，肯定不是卖扫把的死囚。程咬金起义的时间很晚，而且队伍规模不大，组织也不强，只能算是山东众多造反者中很不起眼的的一个。

到大业十三年（617）时，隋朝全境形成了三支主要的义军：翟让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为首的河北义军，以及杜伏威统率的江淮义军。至于程咬金这种地方自保势力无法维持下去，纷纷选择投靠各大起义军主力。比如，程咬金就率部投奔了瓦岗军，这又反过来助推了主力义军的壮大。

李密来到瓦岗寨

大业十二年（616），李密经过瓦岗军将领王伯当的介绍，来到瓦岗寨入伙。

之前，李密在邯郸逃脱后，先投奔位于平原的郝孝德。郝孝德不清楚李密的身份和价值，对李密一点也不重视。当时各部混战，大家都没饭吃，郝孝德的军队也窘迫到削树皮为食的地步。李密判断郝孝德没有前途，便脱离队伍，继续逃亡。他到达淮阳后，找了一个村子落脚，改名为刘智远，当起了教书先生。可李密压根就不是能静心隐居的人，内在勃勃的野心难以抑制。只教了几个月的书，李密就郁郁不得志，写了一首五言诗：

金凤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涂士，郁陶伤寸心。

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

眺听良多感，徘徊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李密怀才不遇，将满腹的委屈都写了出来，盼望能够像樊哙、萧何一样日后成为开国元勋。李密边写边哭，被很多人看到了。有人觉得他太不正常，密告了淮阳太守赵他。赵他猜测所谓的刘智远可能是某个改名的重要钦犯，组织人力要捉拿李密。李密再次逃亡，去投靠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丘君明收留了李密，但他的侄子丘怀义却向朝廷告密。杨广亲自安排人力，秘密逮捕李密。李密又一次逃脱，丘君明则被捕遇害。亡命天涯之余，李密放眼天下，决定借助某个已经大有规模的武装力量实践满腹经纶，刚好他认识瓦岗军的王伯当。最终，李密和瓦岗军“双向选择”成功。

李密这样有胆有智的世家贵族子弟加入了农民扎堆的瓦岗军，给瓦岗军的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有历史学家认为瓦岗军从此由农民革命武装，转变成了地主武装。事实上，松散的农民武装要想长远发展，必须要有组织、有制度，由内到外进行规范化改造。因此，李密来到瓦岗寨，更准确的意义是他向瓦岗军灌输了一套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将这支部队转化为问鼎天下的强大武装。

在李密的策划下，瓦岗军有了清晰的政治规划，并且迅速壮大。

大业十二年，李密就辅佐翟让攻下了金堤关（今河南荥阳东北），打通了进军洛阳甚至是关中的道路。杨广急了，派遣隋朝最后的名将张须陀镇守军事重镇荥阳，调集军队镇压瓦岗军。翟让久闻张须陀大名，之前多次被他打败过，听说张须陀率兵来剿自己，大惧，想撤军躲避。李密拦住他说：“张须陀勇而无谋，军队骤胜，既骄且狠。这样的人一战可擒。李公只要列阵以待，我保证大破张须陀。”翟让心中稍安，决心一战。

瓦岗军与张须陀的部队正面接战，佯败逃走。张须陀果然自恃勇猛，尾随追击，一直追到荥阳以北的大海寺。大海寺附近森林茂密，李密预先埋伏了数万精兵。张须陀草率追击，这时被强敌团团包围，只能力战，以求突围。他不愧为隋朝的猛将，左右厮杀，硬是从李密

的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逃出了包围圈。但张须陀回头看到包围圈内还有许多部下，又策马重新杀入包围圈救援。如此反复四次，最后张须陀深陷重围，精疲力竭，身边部下所剩无几。他见突围无望，仰天长叹道：“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叹完，张须陀下马肉搏，惨烈而死，终年五十二岁。

大海寺战斗的胜利，不仅让瓦岗军巩固了对荥阳及周边地区的占领，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与大运河的畅通，而且在心理上给隋朝政府沉重的打击。张须陀率领的部队是隋朝最后的精锐主力部队，久经沙场。张须陀的死和部队的覆亡让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张须陀死后，隋朝再无良将矣。

大业十三年（617），李密进一步建议翟让乘杨广停留江都、洛阳守备空虚的良机，夺取洛阳周边的洛口仓（又名兴洛仓）。洛口仓和黎阳仓并列为隋王朝最大的官办粮仓，仓城周围二十多里，共有三千个大粮窖，每窖贮粮八千石。经过计划，李密率领数千精兵，成功占领洛口仓，并开仓济贫。贫苦百姓欢呼雀跃，更加拥护瓦岗军，还踊跃参军，瓦岗军的规模更加大了。

洛口仓就像是棋局上一枚关键的棋子，隋朝失掉了这枚棋子，也就被撼动了全局。此后，东都洛阳不仅失去了战略价值巨大的周边屏障，而且失去了主要的粮食供应，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数次发兵，企图夺回洛口仓，都被李密打败了。

李密连续几个大手笔，大捷不断，对瓦岗军贡献巨大，声望水涨船高。翟让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能力和作用都比不上李密，便将领导权让给了李密。瓦岗群雄也公推李密为新主。李密自称“魏公”，建元“永平”，草创了一个政权。中原地区的中小义军闻讯，纷纷赶来归附。瓦岗军迅速扩张到数十万人，后来居上，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势力

最强大的一支义军。

李密建立政权后，分别夺取了河南、山东等地州县，同时发兵进攻东都洛阳。东都洛阳是隋朝后期事实上的首都，就像皇冠上的明珠，有志于天下的李密对它志在必得。隋朝不敢怠慢，调集中原地区能够调集的残余力量，组织洛阳保卫战。于是，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广大地区中，最大的起义武装和隋王朝残存的主力部队展开了鏖战。

远在江南的杨广爱江都，也爱洛阳。他担心中原隋军力量不够，生怕洛阳失陷，决心抽点东南的隋朝精锐部队，增援洛阳。杨广环顾身边重臣，已经无将可派了，苦恼之间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杨广相当欣赏、关系飞速升温的江都通守王世充。

王世充以搜刮民脂民膏、讨好杨广而进入隋朝权力核心，但他也不是一无所能。他利口善辩，喜好兵法，对隋朝的法律特别感兴趣，而且政治经验丰富。所以杨广考虑再三，把隋朝最后的精锐部队和防守洛阳的重任都托付给了他。

王世充果然不负厚望，率领江淮劲卒五万人，日夜兼程赶赴洛阳。李密率军迎头而上，与王世充战成一团。王世充竟然遏制住了李密旺盛的势头，连挫瓦岗军。两军进入了对峙状态。但战场的主动权还牢固掌握在瓦岗军的手中，瓦岗军依然拥兵数十万，占领中原多数地区。

李密遭到王世充的阻击后，为了振奋士气，打击隋军，公布了洋洋洒洒的《讨杨广檄文》，给杨广列了十大罪状，号召天下推翻隋朝统治。李密给杨广列的十大罪分别是：弑父、乱伦、嗜酒、劳民、滥赋、兴役、征辽、滥诛、卖官、无信。他慷慨高呼：“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况四维不张，三灵总瘳，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灭。”最后，他还说杨广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讨杨广檄文》果然振奋人心，还产生了一个新成语“罄竹难书”，专门形容杨广犯下的重罪。

正当形势一片大好，鼎盛的瓦岗军发生了内讧，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李密出身隋朝的世袭贵族家族，这样的身份很容易得到有意投靠农民军、另谋出路的隋朝官僚势力的认同。随着李密掌控了瓦岗军，大批隋军投降于他，许多隋朝官吏和将领也赶来依附李密。这就在李密的身边形成了一个带有浓厚官僚色彩的势力集团，他们与翟让领导的农民将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双方在处理隋朝降官和俘虏、分配军需和战利品等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这时，翟让的属下王儒信便劝他总领众务，夺回最高领导权。翟让的哥哥翟宽也劝道：“天子只能自己做，怎么能让给他人呢？如果你不想做，我来干。”然而，翟让始终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

李密听到有关翟让集团的传言后，产生了除掉翟让的念头。

一天，翟让带着几百个兄弟到李密那里欢宴。李密摆出好酒好菜，招待得很周到，并将翟让带来的兄弟们分别安置到各个房间里吃饭喝酒。同时李密也调来亲信，严密守住各门。翟让在大厅饮宴，对危险毫无察觉。酒过三巡，李密告诉翟让最近得到一张好弓，想让翟让欣赏一下。弓拿过来后，翟让一看，果然是张好弓，忍不住就拉弓张弦，把玩起来。这时，李密向站在大厅里伺候的亲信蔡建使了一个眼色。蔡建会意，立即抽出佩刀，从头面一刀劈了翟让。顿时鲜血四溅，翟让当即扑倒在地，死了。

大厅中的刺杀行动转瞬而成，在其他房间的翟让亲信们都不知道。接着，李密从容不迫地指挥将士杀入各房，将与翟宽一同来赴宴

的人送入黄泉。徐世勣是最早跟随翟让的武将之一，他在混乱中也被乱刀砍成重伤，奄奄一息。李密及时制止了部下伤害徐世勣，保全了他的性命。随行而来的单雄信等人叩头求饶，也得到了李密的宽恕。

解决完家里的翟让党羽，李密全副戎装，率领数百内军杀入翟让的军营。王伯当、邴元真、单雄信等在营中告知将士们翟让已经死了，劝诸军投降。见此，翟让的部属不敢轻举妄动，都纷纷投降。

李密有政治手腕，治军也很有一套。每次打仗，他都身先士卒，战后得到的金银珠宝也都分给手下将士，在军队中的名声很好。而翟让为人粗暴，头脑简单，他和哥哥翟宽两个人常常侮辱、虐待那些亲近李密的将士。可见，瓦岗军的将士们最终选择李密，接受李密诛杀翟让的现实，不能说与两人的性格秉性没有关系。

李密吞并了翟让的部队后，仍然放手由翟让的老部将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等人率领旧部。而李密的身边，则有程咬金（此时已改名为程知节）、秦叔宝等人。秦叔宝是山东历城人，原本在张须陁帐下南征北战，是隋军的勇将。张须陁败亡后，秦叔宝辗转随同隋军投降了李密。李密挑选了八千名忠诚的勇士，组成了“内军”作为直属部队，防备突发事件。“内军”分为左右两队，分别由程咬金和秦叔宝率领，只听从李密的命令。李密对这支装备精良、勇猛顽强的内军非常满意，常说：“此八千人可当百万。”

李密整合瓦岗军后，继续猛攻洛阳地区。当年杨玄感反隋时，最初的发展情形与李密的瓦岗军类似。李密作为杨玄感的谋主，提出了上、中、下三策，其中的下策就是围攻洛阳。现在李密转换到了杨玄感的位子，令人费解地也选择了围攻洛阳。有谋士建议李密充分发挥瓦岗军兵强马壮而隋朝分崩离析的有利条件，分兵占领江淮、河北等地，或者西入关中，占领隋朝的首都大兴。李密都没有采纳，就要耗在洛阳。

洛阳城不好攻——这一点杨玄感用血的代价证明了，李密偏偏要重蹈覆辙，结果和王世充的部队前后交战上百次。尽管瓦岗军一点一点地压缩了隋军的地盘，但离胜利相当遥远。李密占领洛阳郊区后，修缮了魏晋时期的金墉古城作为大本营，屯兵三十多万，做长久之计。

王世充不敢懈怠，收集中原隋朝军力，到处阻击瓦岗军。瓦岗军牵制并消耗了隋朝残余的有生力量。

洛阳城就像绞肉机一样，把双方的时间和生命都绞了进来。

李渊太原起兵

中原各地纷纷扰扰之时，隋朝最终的取代者此时还偏居山西一隅，他就是隋朝的世袭贵族——唐国公李渊。

李渊家族源于北魏六镇兵家，显贵于西魏时期，也是一个胡汉民族相融合的家庭。和隋朝开创者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一样，李渊的祖父李虎也因功劳卓著，曾被北周王朝赐姓“大野”，所以李渊早年也被叫作“大野渊”。同为北周的军事贵族，李渊和杨坚关系密切，不仅是世交，还是亲戚。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与北周明帝的独孤皇后、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是姊妹关系，都是独孤信的女儿。

李渊七岁时，父亲李昞就逝世了，依靠父辈的祖荫，承袭父爵做了唐国公。因为贵族身份，李渊很早就入仕了。在隋朝建立之初，李渊补为千牛备身。隋文帝杨坚在位时，将李渊看作是与自家有世交的“侄子”，又看作是本家的“外甥”，照顾有加。加上李渊和皇子杨勇、杨广等人年纪相仿，李渊和皇室关系密切，在隋朝早期阶段平步青云。如果此时有人说李渊对朝廷怀有二心，想必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杨广即位后，李渊的官运就不太亨通了。据说是因为他过分喜爱自己养的骏马和猎鹰，不肯献给杨广，所以杨广就给自己这个表亲小鞋穿。后来李渊在妻子窦氏的提醒下，开始积极向杨广进献骏马、猎鹰和玩物，官运立即亨通起来，先后任荥阳太守、楼烦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大业十一年（615），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两年后出任太原留守。虽然算不上是隋朝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但没人否定李渊是朝廷的显贵，是现有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天下烽烟四起时，李渊是以镇压造反者的“正面形象”登上竞技场的。他一开始对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咬牙切齿，希望谋划得当，扑灭起义。

然而李渊长期处在与起义军作战的第一线，非常清楚起义者已经遍布全国，朝廷已经无力镇压。隋朝大势已去，灭亡是迟早的事情了，李渊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他开始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始终坐在隋朝这条船里，跟着杨广一起覆灭。

而接连遭受失败的杨广也变得多疑起来，开始猜忌李渊。杨广一次出巡途中，征召李渊到行宫觐见。李渊称病没有现身，杨广大为不满。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做妃子，杨广不经意地问她：“你舅父为何不来啊？”王氏说舅父生病了。杨广再问：“李渊的病，能让他死吗？”李渊辗转听到此话，更加恐惧，再也不敢轻易去朝见杨广了。此后，他便以纵酒沉湎、纳贿贪污的表象来掩护保全自己。

形势恶化和个人境遇艰难，让李渊反隋的念头得到了深入发展。

此外，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世民从小经历军旅生涯，聪明的名声远播在外。随父亲守太原时，李世民已经是很有政治眼光和宏大志向的年轻将领。天下群雄并起，隋朝官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世民敏锐地预料隋朝国运将尽，正是英雄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充分利用父亲主政太原的有利时机，积极为反隋争霸进行活动。

李世民一边广交英雄豪杰，联络太原县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奔走谋划，一边积极招兵买马，准备起事反隋。当时，刘文静因受李密株连，被捕入狱。李世民以探视为名，与他在狱中拟定了招募兵士、西入关中、创立帝业的起兵计划，并通过裴寂将这个计划转告给了李渊。

根据唐朝的史料记载，是李世民劝李渊定下起兵太原的决心。李

世民第一次劝父亲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太原城外皆为战场。父亲大人如果只满足于现在的身份地位，那么天下到处是寇盗，朝廷又有严刑峻法，我们随时处于危亡之中。不如顺应民心，起兵举义，转祸为福。这就是所谓的‘天授之时’啊。”李渊一听，大惊失色：“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现在就把你捉到官府去！”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李世民也只好作罢。当然，李渊也没有把他扭送官府。

没几天，李世民第二次去劝李渊造反：“现在盗贼日繁，遍于天下，父亲大人受诏讨贼，现在情况又怎么样了呢？您假若能够讨荡群贼，朝廷也会功高不赏，益发身陷危局！父亲如果听从我上次劝您的话，就可以避祸。我说的是万全之策，请父亲大人不要怀疑。”这一回，李渊不像第一次那样坚决拒绝，而是以无可奈何的口吻说：“今日破家亡躯由着你去，化家为国也由着你吧！”

之后，李渊“讨贼不力”，杨广要兴师问罪。李世民乘机第三次规劝李渊：“现在的朝廷是君昏臣乱，父亲尽忠是没有意义的。太原兵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如果以太原的资源举事，何患无成！”在李世民的这次劝说下，李渊终于决定在太原起兵。

当然，这些都是唐朝初期李世民修订的历史的说法，如果李渊没有早存不臣反叛之心，如果李渊没有利用身份暗中进行准备，那么后来的太原起兵最终不会付诸实施。

还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故事，似乎可以说明李渊是自动走上反隋道路的。传说晋阳宫监裴寂和李渊交好，往来甚密。裴寂为了前途，早想投靠新主子了。可他是个太监，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扶立新天子。他看中了李渊的潜力，决定激发李渊反隋。一次，裴寂请李渊饮酒，将他灌醉。之后，他安排杨广留在晋阳宫的妃子和宫女为醉酒的李渊侍寝。李渊清醒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担心不已，于是裴寂劝说李渊举事。《新唐书》正式将这个传说记入了正史，还增加了一些情节，说整件事情其实是李世民和裴寂两人的谋划。事后，裴寂劝说

李渊举事，李渊在大惊之余还是犹豫不决。在关键时刻，李世民出现在谈话中，敦请父亲反隋。最终，李渊思考之后，点头同意了。

大业十三年（617），马邑郡人、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因为和太守王仁恭的侍女私通，先下手为强，以贪污之名杀死了王仁恭，造反起兵，并自称天子。于是，李渊以讨伐刘武周为名，招兵买马。李渊和二儿子李世民，以及亲信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积极募兵，十余天就聚集了超过一万人的军队。但是李渊并不出兵攻击刘武周，还秘密派人召回在河东的长子李建成和三子李元吉。

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都是杨广的亲信，安插在太原监视李渊。两人意识到情况反常，判断李渊极有可能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决定除掉李渊。他们假称将在晋祠举办祈雨仪式，请李渊主持，准备暗中埋伏士兵杀掉李渊。不过，王威、高君雅二人的阴谋被知情人向李渊告发了，李渊决定先除去二人。

大业十三年五月某日，李渊找王威、高君雅两人议事。这时，刘文静领着开阳府的司马胙城刘政会赶来，说有密状呈给李渊。所谓的密状，就是刘政会告发王威、高君雅勾结突厥，图谋不轨。李渊当场认为证据确凿，命令将王、高二人拿下正法。王威、高君雅不甘心束手就擒，召唤亲兵随从拔出兵器拒捕。这时，大殿外涌入李世民早已经埋伏好的铁甲精兵，结果没几个回合，王、高二人就被斩首。当时，突厥趁中原大乱，时常入侵中原，太原城外经常出现游荡的突厥骑兵。李渊为除去王、高二人找的理由非常自然，其他人也找不出确切的反对证据。

除去两个碍手碍脚的同僚后，李渊开始明目张胆地准备起兵。七月，李渊率军三万在太原誓师，正式起兵。

作为从隋朝阵营中脱离出来的高级贵族，李渊一开始就显露出比

一般举事者高明的地方。他不称王不称霸，而是发布了兴兵檄文，宣称自己是替天行道，而不是争权夺利。他斥责杨广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穷兵黩武，致使“荆棘旅于阙廷，豺狼充于道路”，朝政日非，民不聊生。因此，李渊起兵的目的是要废掉昏君，改立明主，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这样的声明为李渊减轻了许多政治阻力。

同时，李渊制定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直取隋朝的心脏——大兴。李渊不像农民军一样，攻城略地，扩充地盘，也不像杨玄感、李密一样，脑袋发热，聚焦在少数大城市。起兵后，李渊采取了灵活正确的战略，一面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突厥可汗派兵马相助，以减轻突厥南下的军事压力，一面招募军队，率师直向大兴行进。

隋西京留守、代王杨侑听说远房亲戚李渊举兵了，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驻守霍邑（今山西霍县），扼守李渊进军关中的道路。大将屈突通则率领骁果数万，驻守河东郡（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与宋老生遥相呼应，以拒李渊。

在所有举兵者中，李渊的人员规模最初只能算是中等。从太原到大兴，沿途有数倍于他的隋朝军队。在进军霍邑的途中，李渊遇到了大麻烦。天气骤变，大雨倾盆，军队又缺粮少衣。更严重的是，后方传来了突厥与同为举兵者的刘武周联合，将乘虚偷袭太原。李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时，李渊的困境被瓦岗军的首领李密知道了。李密给李渊写了一封信，表示要与李渊“合作”，一起攻打天下。实际上，合作是假，吞并是真。李密的意思是：既然前无去路，后退无所，不如直接把队伍并入瓦岗军。面对李密的试探与威胁，李渊装傻，给李密回了一封肉麻的吹捧信：“天下百姓渴望明君圣主已经很久了，那么传说中的救世主，非您莫属。我非常荣幸，与您同姓。我已经老了，您还年轻，希望以后能得到您的关照。”

李密在金墉城里，尽管没有等到李渊带着队伍前来，却见到了拍马屁的信，也很高兴，还拿着信向部下到处显摆道：“看来李渊只是一个无能之辈，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话说回来了，逗留霍邑附近的李渊，遇到的麻烦的确很大。他仓促召集将佐开会，决定撤退，先保住太原。他的大儿子李建成和二儿子李世民就劝说，起兵的前途是光明的，困难是暂时的，如果全军撤回太原，李家最多就只能做一个割据头目。而李家起兵的目的不是割据，而是夺天下。李渊醒悟后马上召回军队，倾注全力猛攻霍邑。不久，后方军粮运到，突厥偷袭太原的消息也被证实是个假情报。

霍邑城池坚固，不是李渊的三万新兵能轻易攻克的。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俩制定了引宋老生出战，再分兵去偷袭城池的作战方案。宋老生中了激将法，率军出来和李渊决战。混战开始没多久，李渊让军士鼓噪高呼“宋老生已经被杀死了”，隋军闻知大将被杀，全都乱了手脚，四处溃散。等隋军退回霍邑城下，城头早已换上了“李”家旗号。此战，霍邑在李渊军队的猛攻面前失陷，宋老生被杀。

李渊占领霍邑后，厚葬了宋老生，对于想回家的关中士兵，则“授予”五品闲散官衔放回。这些举措不同凡响，赢得了许多隋朝阵营之人的好感。那些拿着路费回家的隋军，添油加醋地把李渊的战功和宽容大度传播到了关中各地，变成了李渊部队的“编外宣传队”。

霍邑失守后，大兴变得无险可守，成为李渊的囊中之物。李渊有如今的乐观局面，显然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此时，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正在洛阳与隋朝的主力王世充军激战，关中地区空虚。而河东方向的屈突通部队为了抵御河北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不敢西进攻打李渊的军队，反而帮助李渊挡住了其他觊觎关中的起义军过来抢食。

李渊轻松向前推进，一路上不断瓦解农民起义军和收编地主武装，到大兴郊区时已经拥有二十万军队了。

防守大兴的代王杨侑，不过十二三岁。他是早逝太子杨昭之子、杨广之孙，算起来也是李渊表孙子辈的。

杨侑根本就不懂政事，任由城内留守的几个大臣决定守城策略。

留守京师的刑部尚书卫文升和右卫将军阴世师，坚持要在大兴进行防御战，等待关东和其他地区的隋朝救兵到来。两人挟持着杨侑巡视城防，积极备战。怎奈隋朝国势衰弱已久，即使是首善之区的京师也拼凑不了一支雄壮精干的守军。

李渊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两次发通牒要求杨侑献城投降。杨侑不置可否，但卫文升、阴世师和京兆郡丞骨仪坚持要固守一战。

两方实力悬殊，大兴孤城很快就被李渊的队伍攻破。十月，李渊胜利占领了隋朝名义上的都城。阴世师、骨仪战死。这时李渊早年的政治经历和官场实践为他充分利用京城的价值提供了帮助，一进城，他就号令三军：“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他们严格做到了这一点，连抵抗的卫文升都被放归家中。如此，城内的隋朝贵族、高官和百姓的心理迅速安定下来。

李渊入城后，仿效汉高祖刘邦当年与关中居民的约法三章，也约法十二条，规定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同时废除隋朝的严刑峻法和苛捐杂税，等等。大兴城的人们很快安定下来，转而支持带来了新的秩序和制度的李渊了。

众将皆推李渊为尊。李渊起兵仅仅几个月，就成了囊括关中、占据西京的豪强。

第九章 杨广的穷途末路

又见江都

大业十二年（616）七月，杨广第三次与江都亲密接触。

刚到江都不久，杨广的老臣宇文述就一病不起，病情日益严重。宇文述从北周时期就开始征战，在杨广时期则把持朝政，临死前放心不下的竟是几个儿子。小儿子宇文士及娶了杨广的女儿南阳公主，封尚辇奉御，为人老实，宇文述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另外两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是标准的纨绔子弟，从小生活在特权中，曾在为官时因犯罪被削职为民，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宇文述就向杨广请求说：“臣的长子宇文化及是臣的继承人，希望陛下多多哀怜他。”杨广闻后，潸然泪下。

到了十月，宇文述去世。杨广为之罢朝，追赠司徒、尚书令、十郡太守，谥号“恭”。杨广令黄门侍郎裴矩为宇文述祭祀，鸿胪监护丧事，又任命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为将作少监。然而，后来也正是宇文化及弑杀了杨广，命运可谓奇妙。

不管怎样，对于当时的杨广来说，宇文述的死意味着从他年轻时就一直见证他成长和辉煌的老人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对杨广的辉煌过去有亲身体验，能够详细描述了。

杨广这次三游江都，美丽的昙花仿佛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这不

仅是因为宇文述的亡故，还因为他刚到江都，中原就遍地民变，继而全国大乱。史载：“普天之下，莫非仇讎，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杨广在江都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此时，杨广早已经没有继位之初开创盛世、建功立业的雄心了，他只想保住性命，偏安一隅，继续做他的皇帝。

上天不遂人愿。时间进入大业十三年（617），局势急速恶化。正月，窦建德在河北当起了长乐王。二月，割据朔方郡的梁师都见有人称王了，就勾结东突厥汗国，攻陷陕北诸郡，做起了皇帝，自称“梁帝”。而攻陷洛口仓的李密比较“谦虚”，不称王也不称帝，在中原各路反王的公推之下，做起了“魏公”。四月，陇西的薛举自封“西秦霸王”，攻城略地。有读书人提醒薛举，“霸王”二字太过粗野，薛举觉得有道理，也做起了皇帝，称“秦帝”。再往西，李轨占领河西走廊，自称“凉王”，重新割断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七月，杨广的远房亲戚李渊在太原起兵南下，大大出乎杨广的意料之外。等到十月，李渊占领首都大兴城。很快又传来消息，隋朝的武阳郡丞元宝藏向李密献城投降，李密进而攻陷了黎阳仓。隋王朝的政府囤粮全部成了起义者的军粮。

江南一带也不安宁。杜伏威侵扰江淮各州县，势力日趋强大；李子通游荡在长江下游，威胁江都。在长江中游，西梁后裔、罗川县县令萧铣此时以“光复梁朝”为名，也宣布起事！

萧铣是西梁宣帝萧詧的曾孙，父亲为隋文帝杨坚所杀。萧铣从小孤苦贫困，以卖书为生，与母亲相依为命。杨广念他是萧皇后亲属，以外戚之恩提拔为县令，没想到萧铣也造反了。当时，两湖地区农民起义军纷纷攘攘，苦于缺乏号召力、缺乏领袖，便公推萧铣为主。萧铣在罗川县起事，以梁朝正朔自居，迅速攻陷两湖各地，称帝重建“梁国”，一切规章制度以南北朝时期的梁朝为准。复辟的梁朝占据了北到汉江、南至岭南、东达九江、西至三峡的广大地区，先后以岳

阳、江陵为首都。

噩耗连连，杨广深受打击，再也不愿意看到新的噩耗，也就不再处理政务了。他被迫承认隋朝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之际，杨广经常自我安慰，用荒淫无耻的举动麻痹自己。他在江都行宫中新建了上百间房舍，间间铺陈华丽，选一个美人居住其中。杨广和她们玩“过家家游戏”，带着萧皇后装作客人，每天去不同的美人屋中作客。他昼夜与众姬妾东游西宴，酒杯不离口。有时，杨广戴幞巾、着短衣、持竹杖，装扮成文人模样，步游各宫各院，直到深夜秉烛而归。深夜上床后，杨广也难以安睡，犯上了严重的失眠，即使勉强入睡，梦中也常惊呼有贼，需要宫女像哄孩子那样摇抚、哄着才能入睡。

杨广相貌英俊，是一个美男子。有一次，他拿起镜子，端详半天，回头对萧皇后说：“如此好头颅，谁来砍之？”萧皇后闻言大惊，问皇上何出此言。杨广苦笑着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人间常态，无须悲伤！”表面上杨广把生死祸福都看淡了，私下里他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对萧皇后说：“隋朝国祚已绝，但即使亡国了，我也还能做个长城公（陈叔宝降隋后被封为长城公），你也还能学学沈后（陈叔宝的皇后沈氏在隋朝受到优待）。我们一切顺其自然，及时行乐吧！”

杨广扬言不再处理政务了，但天下越乱，政务就越多。地方州县和前线将领的告急求援文书如雪片一般飞来江都。

所有的坏消息到了掌管奏章和机要的虞世基那里，都被压了下来。杨广有时问起天下剿匪的情况，虞世基只轻描淡写地说：“鼠窃狗盗，不久就会被郡县扑灭，陛下无须担心。”前线将领杨义臣一次奏报说消灭并招降了河北农民军数十万人，虞世基看了，觉得是个好消息，就把奏章呈给了杨广。不想杨广看了以后，叹息道：“我一直不知道造反者的人数，想不到仅河北一地就有数十万之多！”虞世基

一看坏了，忙说：“其中多数是一些小偷小摸之人，数量虽多，未足为虑。反而杨义臣拥兵在外，专权日久，恐怕生变，皇上要多加注意。”杨广信以为真，竟然下诏解散杨义臣的部队，勒令士兵回家务农。结果，那些散兵游勇转眼就加入农民军了，反而助长了起义者的声势。

萧皇后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也劝宫人们不要向杨广说实话。她说：“天下事已至于此，无可救药，多说无益。多说话，只能让皇帝担忧而已！”

杨广的江都生活笼罩在一片虚无之中。一度，他想起用随行同来江都的苏威，让其恢复官职，主持朝政，但裴蕴、虞世基等人赶紧奏称苏威昏耄羸疾，不堪再用。杨广也没有坚持。已经是一介平民的苏威被杨广带来江都，但受到虞世基等人的排斥，情绪日渐消沉下去。祸不单行，苏威的夫人在他随行江都不久之后死于洛阳，儿子苏夔思念母亲，悲伤过度而死。苏威内心的悲苦可以想见。

关于起义军的消息，虞世基总是扣压下来，但是有一个消息，不能不报告杨广。

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十六日，占领大兴城的李渊把俘虏代王杨侑捧了出来，立为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也就是说，杨广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是隋朝的皇帝了！

李渊想当皇帝，但他也清楚自己和皇帝宝座还是有距离的。虽然占领了隋朝的都城，并不意味着占领了天下。占领大兴城后，代王杨侑还躲藏在王府中。李渊便把他抬了出来，尊为名义上的皇帝。于是，杨侑在曾祖父建造的大兴殿即皇帝位，遥尊远在扬州的祖父杨广为太上皇，改元义宁。大业十三年也就变成了义宁元年。

李渊立杨侑为天子是个狠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手中的优质资源，一下子就取消了杨广的正统性，占据了最高的法统地位。他又以

杨侑的名义任命自己为大都督、尚书令兼大丞相，爵位从唐国公晋封为唐王，综理朝廷万机。此外，他的长子李建成被封为唐王世子，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三子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消息传到江都，人心惶惶。原本大家还可以搬出王朝正统聊以自慰，没想到身份顷刻就转变了。

李渊站稳脚跟后，开始扩张地盘，向南攻取四川，向东消灭关中附近的隋朝残余势力。当时，杨广的亲信大将屈突通，受杨广之托率领隋军精锐镇守关中，现在还屯兵关中东部一带。屈突通部队夹在李密、窦建德、李渊三方势力之间，处境窘迫。有部下劝屈突通投降其中一方，屈突通大骂：“我蒙国重恩，历事两主，受朝廷厚禄，怎么能不赴难杀敌？今日之势，唯死而已！”屈突通的家眷都在大兴，成了李渊的俘虏。李渊派屈家的家童去招降屈突通，屈突通当场杀死家童。思前想后，屈突通留下部将桑显和镇守潼关，阻挠李渊东出，自己率主力向洛阳靠近，准备和王世充合兵一处。然而，屈突通刚走，桑显和就献出潼关，投降李渊了。

屈突通的大军失去掩护，完全暴露在李渊追兵的攻击之下。不久，其在稠桑（今河南灵宝北的黄河南岸）被唐军围攻。唐将窦琮派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去劝降。屈突通骂道：“往日，我和你是父子；今日，我和你是仇敌。”边骂边命左右射死儿子。跟随唐军而来的桑显和想出一个办法，冲着屈突通的部队现身说法：“京师已经沦陷了，你们大家都是关中人，想要去哪里？”隋军也不想背井离乡，听闻此言，纷纷扔掉兵器投降。屈突通知道大势已去，下马向江都跪地磕头，号哭道：“臣力屈兵败，不负陛下。天地神明，为我作证。”最终，屈突通被捉住，押送大兴。关中的隋军主力就此覆亡了。

李渊见到屈突通，劈头就问：“为何相见如此之晚？”屈突通哭道：“我不能尽人臣之节，力屈而至，是本朝的耻辱，愧对代王。”李渊对他的忠君行为很赞赏，评价屈突通是“隋室忠臣”，当场释放，封

为蒋国公，任命为兵部尚书，协助秦王李世民行军打仗。最终，屈突通还是转换了阵营。

局势越来越乱，杨广的命令在北方越来越没有效力了。杨广也就无心北还，想在南方长住下来。

杨广是这么想的，即使当不成全天下的皇帝，能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延续隋朝的国祚，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动荡不安，司马睿便放弃了北方领土，在建康建立政权。杨广觉得自己可以效法司马睿，况且现在的江南比司马睿时期要好多了，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口增加了不少，而且比北方安定多了，完全可以支撑一个王朝。

既然决定南迁，便要定下都城。杨广最满意的是长江南岸偏上游的丹阳（今江苏南京）。丹阳虎踞龙盘，是东吴和东晋的古都，王气和地理位置都极佳。于是，杨广提前派人过江在丹阳修建宫殿，准备一建好就搬迁过去。

这时候，有乌鹊在杨广的幄帐外筑巢，宫人怎么驱赶都赶不走。乌鸦总是绕着杨广的房子呱呱直叫。还有人看到长江中突然冒出巨石，漂向江都。而且当时的天象也很不好：荧惑犯太微，日光四散如流血。所有一切似乎都表明上天不同意杨广迁都丹阳、另建朝廷的计划。

可杨广把这一决定当作是人生最后一搏。他已经年近半百，外面局势又乱，他的选择余地已经很小了，如果不搏一搏，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杨广去意已决，江都的近卫士兵们多数是关中人，不愿意再向南逃往丹阳。他们本来就想家，而关中打得越乱，消息越坏，这些离家

千里的小伙子就越想家，盼望着早日回家探望家人。现在看到杨广决心迁都丹阳，近卫官兵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将军窦贤竟然率领所部兵马私自出逃，要回到关中去，很快被杨广急忙调兵追杀了。但暴力镇压制止不了官兵们开小差，逃跑的官兵越来越多，最后连杨广的近身侍卫也有人跑了。

杨广很担心，问裴矩怎么办。裴矩回答说：“圣驾驻留江都已经两年了。近卫官兵多数是在关中招募的骁果勇士，背井离乡。人没有家庭的温暖，心就不能久安。臣建议让士兵们在本地娶妻，建立家庭。这样他们就不会想回家了。”杨广大喜道：“裴矩一向多谋，现在又出了一条奇计。”

隋朝的军制规定官兵不能随军携带家眷，更不能在外服役期间结婚生子。如今是特殊时期，一切都可以改变，杨广命令裴矩负责此事，大张旗鼓地为近卫官兵们娶妻。裴矩就把江都境内的寡妇和没有出嫁的女子，全都聚拢起来，再叫来江都的将帅、士卒，听凭官兵们随意拉人结婚。之前，凡是有官兵奸污妇女、尼姑、女优的，现在也都让双方结婚。这简直是江都周边地区妇女的末日。而生理得到满足的近卫官兵们很高兴，争相说起裴矩的好话：“裴公真是个好人。”

生理问题解决了，并不意味着心理问题也随之消失了，娶了老婆的近卫官兵们还是想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些想家的近卫官兵们最后要了杨广的命。

杨广的头颅

虎贲郎将司马德戡是杨广的宠将，在江都混得不错，但还是想逃回关中。他拉着虎贲郎将元礼和杨广多年的贴身侍卫、直阁裴虔通两人一起密谋西归。三人又辗转拉上了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勋侍杨士览等人同谋，商量怎么才能既避免杨广的追杀，又突破各地起义军的拦截，安全地逃回家去。司马德戡这个小团伙一开始还偷偷摸摸地聚会，后来人越聚越多，上头也没有过问，就堂而皇之地公开议论叛逃的事情了。

有一个宫女听到司马德戡一伙人的商议后，赶去报告萧皇后：“外间有人谋反。”萧皇后说：“你直接报告给皇上。”宫女就跑去向杨广汇报。杨广闻言大怒：“你一个宫女，知道什么国事，到处妖言惑众！”结果这个可怜的宫女被活活打死了。自此以后，宫中再也没人敢说外面的消息了——尽管太监宫女们都知道司马德戡等人的活动进展情况。

司马德戡一伙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在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五日结伴西归。赵行枢和宇文智及的交情很深，而杨士览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两个人就找他密谋，把司马德戡的决定全盘托出。

宇文智及想了想，说：“杨广虽然无道，威力尚在，你们擅自逃走，恐怕也会落得窦贤那样的下场。”

赵行枢二人忙问：“那如何是好？”

宇文智及神秘地说：“隋亡已成定局，方今英雄并起。我看同心西归者已达数万人之多，因行大事，此乃帝王之业也。”说完，他做

了一个拔刀的手势。

赵行枢和杨士览面面相觑，傻了。他们敢成帮结队地开小差，谋划逃亡，但要说杀了杨广，推翻隋朝，他们还真没这个胆。愣了半天，赵行枢才说：“欲行大事，必有一主帅。我等几个，人微言轻，难当重任。看来只有宇文公兄弟，才能担此重任。”他把皮球踢给了宇文智及。

宇文智及暗暗高兴，表面却大惊失色，说：“这等重任，我还没有想过。我先前只是想和你们图谋救命罢了。”赵行枢就劝他答应，劝了良久，宇文智及说要找兄长宇文化及商量一下。赵行枢赶忙跑出来，把宇文智及的意思告诉司马德戡等人。大家觉得这个方法不错，直接干掉杨广，大张旗鼓地率领大部队回关中去，安全系数高，而且也威风。于是，司马德戡一伙人约上宇文智及，一起到宇文化及的住处，要推他为首，发动政变。

宇文化及早有谋反之心，当即答应了。于是，一个以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宇文智及、赵行枢为核心的阴谋团体产生了，这个团体还包括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弟李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等。这份团体名单，几乎囊括了杨广身边各个部门、不同级别的大臣，可见杨广众叛亲离到了何种程度。

接着，司马德戡等人到处散布谣言，说杨广知道关中和其他北方将士们有心叛逃，准备了毒酒，计划借犒军的机会毒死大家，只留南方籍的将士。近卫官兵们本来就人心惶惶，很自然地相信了谣言，恐惧起来。恐惧情绪相互传染，使全军都有了谋反自救的念头。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初十日深夜，司马德戡、宇文智及等人率兵在江都东城放火，宣告起事。

杨广在宫中第一时间看到了火光，隐约听到宫外人声喧嚣，就叫贴身侍卫询问情况。裴虔通这天值班，谎称是城内草坊失火，军民正在救火。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裴虔通就是杨广的侍卫，深受信任。听了裴虔通的谎话后，杨广不再在意火光，睡觉去了。

司马德戡集团逐渐控制了江都城，在五更时分杀入皇宫。皇宫守卫一触即溃，乱军直奔杨广的寝宫而去。杨广知道情况有变，换上普通服装逃到西阁躲藏起来。司马德戡没捉到杨广，拉过一个美人逼问。很快，美人告发了杨广的去处。校尉令狐行达持刀直入西阁，杨广知道自己被发现了，隔着窗子喝问：“你敢弑君？”

令狐行达被吓住了，说：“臣不敢。将士思归，臣等想奉迎陛下西归京师。”

杨广解释说：“朕也一直想回关中，先前因为粮食未到，没能成行，现在朕便和你们一起还于京都。”杨广以退为进，主动示弱，乱军反而不知如何是好。

混乱中，有人牵来一匹马，请杨广上马去见百官。形势如此危急，但杨广看到马鞍敝旧，还要求造反的士兵找来一副新马鞍换上。之后，他才上马，由士兵挟刃牵着缰绳，被押到众将面前。

宇文文化及远远看到手下牵着骑乘高头大马的杨广过来，忙挥手喊道：“你们把这个人拉出来有什么用，杀掉算了。”宇文文化及不愧是宇文述的儿子，政治经验丰富，狠毒，敢干。政变胜利了，要推翻的杨广安然无恙地被拉了出来，如何处置？这是费心费力的麻烦事，还不如直接杀掉算了，简单明快，大家也方便。

一千人等又把杨广押回寝宫。裴虔通等人执刀站在一旁，商量怎么“做”掉杨广。

杨广问：“我有什么罪，你们如此对我？”

造反的军官马文举说：“杨广，你抛弃社稷，四处巡游，不停地骚扰百姓。登基以来，征战无数，骄奢淫逸，害多少百姓死于沟壑之中？如今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生灵涂炭，这都是你的罪过。你不知悔改，继续宠信小人，文过饰非，竟然还敢说自己没罪！”

这顿臭骂让杨广半天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才说道：“我的确有罪，愧对天下百姓，但我并没有亏待你们这些人。你们生活安逸富贵，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今天之事，何人为首？”

司马德戡应声说：“陛下多行不义，天怒人怨，想杀你的何止一人？臣等平日的确受你宠幸，现在这么做确实有负陛下。当今天下大乱，两京失陷，我等欲归无路，求生无门。只好借陛下的脑袋以谢天下，谋得一条生路。”

杨广再次无话可说，突然看到封德彝也站在造反队伍中，苦笑着问：“爱卿是读书人，怎么也掺和这种事？”封德彝羞愧得满脸通红，悄然退了出去。

杨广平日最宠爱幼子赵王杨杲。杨杲当时年仅十二岁，现在也被押到杨广身旁。小孩子没见过真刀真枪和等待审判的景象，吓得号啕大哭。裴虔通心里正烦，随手抽刀将杨杲杀死。小儿子的鲜血溅了杨广一身，他马上泣不成声。

一行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用刀杀死杨广。

杨广却不同意，挣扎道：“你们这群无知小人，诸侯之血入地，田地要大旱三年；天子之首落地，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天子有天子的死法，不能死于锋刃。你们速速去取毒酒来！”杨广这是想留个全尸。杨广此前隐隐感觉到自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准备了一个盛有毒药的小瓶。他把小瓶交给身边姬妾，要求一旦宫中失事，自己帝位不保，姬妾们必须服毒先死，自己随后服毒。但江都兵乱事起仓促，左右姬妾已经逃散，乱军一时找不到毒药。

令狐行达急了，上前就要对杨广动粗。杨广摆摆手，无奈自己解下白练巾，递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招呼军官于弘达上前，一起将丝巾缠到杨广的脖子上，各自用力一绞。杨广顿时气绝身亡，时年四十九岁。

杨广之死，是相当惨烈的。不过历代都没有人同情杨广，反而一致谴责他是咎由自取。《隋书》评价道：

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非仇讎，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

最后还引用《尚书》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以及《左传》的“吉凶由人”“妖不自作”“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作为印证。

杨广死后，萧皇后令宫人拆床板做了大小两副棺材，将杨广和赵王杨杲的尸体收敛。宇文护及将杨广草草埋葬在吴公台下。史载：“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李渊平定江南之后，将杨广改葬雷塘。有人写了“杨广陵”三个字，但杨广的坟墓并没有按照帝王陵墓规制建造和维护，很快荒草萋萋，沦为土丘，鲜有人去凭吊怀古。后人往往称杨广为“暴广”或者干脆就称“逆”，众口一词地痛骂，哪还会去凭吊他？

五代的罗隐是少数去雷塘怀古的名人，赋诗一首评价杨广：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再回到宇文化及、司马德戡等人要发动叛乱的时候，当时江阳县令张惠绍连夜跑去报告了主管司法监察的裴蕴。裴蕴和张惠绍商量，决定伪造诏书征发城中的百姓为军，然后说动硕果仅存的大将——荣国公来护儿——指挥军队镇压宇文化及等乱党，救援杨广。谋议已定，裴蕴派人把计划告诉掌管机要的虞世基。

虞世基是处理公文的高手，却不太清楚政治现实，怀疑造反举报不实，不同意裴蕴等人的计划。这一来一往，裴蕴、虞世基等人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而宇文化及等人早已经率军起事了。很快，裴蕴、虞世基、来护儿等人也被捉了，隋王朝白白丧失了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事后，裴蕴对自己的优柔寡断非常后悔：“和糊涂蛋商量大事，怎能不误事呢？”

江都政变的那个凌晨，裴矩也早早起来准备上朝，途中遇到乱军。裴矩心想：完了，横竖都逃不过死。谁想，造反的官兵们都念着裴矩给他们找老婆的好处，纷纷喊道：“不关裴黄门的事。”裴矩就此躲过一劫。不久，他遇到了宇文化及率领百余骑兵路过，便恭敬地迎拜，宇文化及也很客气地安抚他，命他参与政变后的制度重建和顾问工作。

当时，留在江都的开皇重臣苏威在民间的声望很好，很清廉，而且长期没有参与朝政了，宇文化及专门下令不许伤害苏威。因为苏威“名位素重”，乱军对苏威相当尊敬。苏威就这么侥幸逃过了灾难。

在这场政变中，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秘书监袁充、大将来护儿、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暉、梁公萧巨等大臣被杀。在江都的皇族，包括废蜀王杨秀与诸子、原汉王杨谅独子杨黣、杨广的儿

子齐王杨暕，也都遇害。

杨广长期生活在多疑猜忌之中，对任何人都不信任，都提防戒备。凡是他觉得有可能威胁到权力的宗室成员，都随时带在身边。这是造成江都兵变时，近支皇族受戮众多的原因。

杨广和父亲、兄弟的关系充满了欺诈、表演和杀戮。他继位后，和儿子、近亲的关系也充满提防。他曾册立长子杨昭为皇太子，但两年后，杨昭英年早逝。二皇子、齐王杨暕认为按顺序应该立自己为太子。杨暕继承了杨广的许多特点，比如聪慧过人，又比如骄奢淫逸。他和妻子的姊姊私通，又用迷信方术陷害大哥杨昭的三个儿子，等等。然而，杨昭去世后，杨广却再也没有册立太子，同时对杨暕时刻警诫，派人监视其一举一动。他听说杨暕摆宴饮酒，就猜测他是不是偷偷做了什么事；听说杨暕忧愁憔悴，又想他是不是别有企图。杨广担心杨暕发动政变，便严格限制杨暕身边的人，配备给他的随从都是老弱之人。结果，杨暕整天担惊受怕，唯恐父皇要杀自己。

当乱兵冲进宫廷时，杨广的第一反应是对萧皇后说：“莫非是杨暕作乱！”可见他们父子疏远猜忌到了何种程度。宇文文化及缢杀杨广后，又派人捕杀齐王杨暕。杨暕在睡梦中被乱兵惊醒，第一反应也是父皇派人来逮捕自己。杨暕大叫：“使者且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乱兵才不管这些，把杨暕和他的两个儿子拉到街上杀了。杨暕到死可能都以为是父皇杨广要杀自己，死时三十四岁。

隋亡唐兴

从政治角度讲，隋朝的统治至此就算结束了。接下来的故事都是有关隋朝的零碎后事。

隋朝覆灭后，最大的受益者是李渊。李渊既重视军事征伐，又着意加强宣传工作，整治内政，收揽人心。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李渊那颗冲击最高权位的欲望之心。

以丞相的名义辅助国政，总理一切，这都是之前的权臣们夺取大权的一贯准备步骤。从魏晋时期到隋文帝杨坚代周，都是如此。李渊的特殊之处是他在起兵五个月之后就做到了前人花费数十年才做到的一切。李渊曾概括自己的幸运说：“我虽失意于后主（指杨广），幸未负于先帝（指杨坚）。”在这里，他依然将自己作为隋朝的臣子，得意地炫耀自己才是隋文帝杨坚的继承人。义宁二年（618）正月，隋帝杨侑下诏赐唐王李渊“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待遇，唐王仪仗加前后羽葆、鼓吹。李渊在事实上离皇帝宝座已经很近了。

李渊毕竟是官场老手，面对许多农民造反者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他压住了内心的冲动。

杨广的死讯传到长安，给李渊势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扶立杨侑做皇帝，对抗杨广法统的作用降低了，但另一方面，杨侑又名正言顺地成了天下的君主。只是现在，杨侑的第二方面作用不一定非要由他来承担：他姓之人也可以称帝号令天下。杨广刚死，杨侑晋封李渊为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这又是之前篡位者的一贯步骤。他的封地设置了丞相以下全套政府机构，配备了官员，又立四庙于长安通义

里第。李渊已经开始了新王朝世系的建设工作。在攻入大兴城后，绝大多数臣民就已经默认李渊的统治地位。随着事态越来越明朗，李渊代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江都政变前夕，杨侑就以李渊“功德日隆，天历有归”的理由想禅位给李渊。史料的缺乏让我们无法判断这到底是李渊幕后指使，还是群臣拍马屁的结果，或者是小皇帝本人的意思。当时朝廷大臣都劝李渊顺水推舟接受禅让，但是李渊感到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尽管裴寂等人率群臣两千人三番五次劝谏，李渊都没有答应。

五月初一，杨侑下诏准李渊佩带有十二道旒的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简单地说，就是李渊可以穿戴皇帝的服饰，享受皇帝日常生活中的安全警卫措施，动用皇家仪仗。在古代，不同人的生活器物和行为标准是严格限制的，如果说之前李渊的待遇和天子有一步之遥的话，现在李渊就是个近乎有名有实的天子了，所缺的只是个称号而已。

十几天以后，杨侑又一次要禅位给李渊。他派使节捧着皇帝的宝玺授予李渊，并下禅让诏书。诏书中的意思大概是：“天祸隋国，太上皇在扬州遇刺。我只是个小孩子，遭遇噩耗，心情糜溃，难以理事。唐王扶危拯溺，东征西讨，总九合于一匡，决百胜于千里。天下全靠唐王的维持。现在是人心所向，天命难违。隋朝国运已去，我原本是代王，现在请求遵历代圣贤的例子，回归藩国，禅位唐王。天下臣民，都要改事唐王。”之后的诏书内容是杨侑个人真情实感的流露：“我现在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希望能假手于人平定天下，希望天下臣民都能理解我的心意。”

这一次，李渊决定接受帝位。不过按照惯例，他们还得演一场戏。李渊要以自己道德浅薄，恐怕担当不起治国重任而辞让。百官臣僚要上表劝谏，人数越多，语言越恳切越好。皇帝也要不厌其烦地表现让位的诚意，这样推来推去要表演三次，李渊才能同意。整个过程

要表达的不仅是受禅者李渊的谦虚，更是要表现新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事情。

李渊同意后，在位半年的杨侑立即离开皇宫，宣布逊位，重新住回原来的官邸。几天后，五月二十日，甲子日，李渊登基称帝，史称唐高祖。他改大兴殿为太极殿，即皇帝位。重新被称为代王的杨侑又一次回到皇宫，亲手将皇帝的宝玺交付李渊。因为李渊的封爵是唐王，故改国号为“唐”，仍然定都长安，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大赦天下，百官百姓，赐爵一级。他派人祭告南郊，告诉上天自己做了地上的皇帝。

一切禅让手续，就此完成。唐王朝建立了！

当月，李渊封杨侑为酈国公。与之前的逊帝一样，杨侑没有被允许前往封地，而是闲居长安。第二年八月初一，杨侑薨，年仅十五岁。正史没有记载杨侑的死因，因此野史就认定他是被李渊毒死的。杨侑在位时没有任何建树，主要的举动就是一再给李渊加官晋爵，还多次下诏要求让位。因此给他上谥号就有一定的难度，最后唐朝称杨侑为“恭帝”。杨侑被葬于今天的陕西省乾县阳洪乡乳台村南五百公尺处。他死后，他的族人继承了酈国公封号，一直传到五代时期。

对于杨广，唐朝君臣给他上了一个极坏的谥号，就是杨广本人绞尽脑汁给陈朝末代君主陈叔宝找出来的谥号——炀。因此，杨广史称“隋炀帝”，但痛恨杨广的后人连坏的谥号也不愿意叫，一般用“逆”字称呼他。

第十章 隋王朝的残余

王朝的弃儿

一般王朝覆灭后，幸存的皇室成员往往会振奋祖宗余烈，割据地方，延续国脉。但隋朝的情况比较特殊。

首先，隋朝没有安置强有力的藩王势力。皇帝遇刺后，没有强有力的藩王能够出头重续皇统。其次，江都政变几乎将隋朝近支皇室一网打尽。隋文帝杨坚的四儿子杨秀，在杨坚生前被废为平民，理论上不算是皇室成员了。但杨广即位后，依然把弟弟杨秀带在身边，杜绝内患。宇文化及弑君叛乱后，不敢马上自立，需要推举一位新皇帝。杨秀是江都之内与杨广血缘最近的人，在血统上最有资格继承帝位。宇文化及也有意立杨秀为帝，但遭到了部下的一致反对。结果，杨秀和他的所有儿子也都被杀了。

总之，杨广之后，杨家没有拿得出手的人来复辟隋王朝。

不过杨广死后，天下还是出现了三个以隋朝正朔自居、各自标榜正统的政权。第一个是李渊在关中扶持的代王杨侑（杨广之孙）政权，沿用隋朝旗号。第二个是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推出秦王杨浩（隋文帝三子杨俊的儿子，杨广之侄）为新皇帝，继承了隋朝出巡江都的小朝廷的一班人马。宇文化及把持朝政，任命司马德戡为礼部尚书，裴虔通为光禄大夫、莒国公，裴矩为侍内。第三个是洛阳的越王杨侗（杨广之孙）政权。隋炀帝的死讯传到洛阳后，王世充与留守大臣元文

都、卢楚等人奉越王杨侗为新皇帝，仍称隋朝。杨侗以王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赋予征战讨伐大权。

这三个政权抬出来的都是隋炀帝杨广的晚辈，都是傀儡（越王杨侗的情况稍好一点）。三个可怜的皇子皇孙，仿佛就是隋王朝的三名弃儿。王朝的主船已经在巨浪中沉没，剩下三条小舢板被不怀好意的大浪推着，勉强前行。

江都的近卫官兵们杀死隋炀帝杨广以后，纷纷整装要回老家。宇文化及决定取道徐州，进入山东，然后再西进返回关中。计议停当，宇文化及裹挟着隋朝残余势力，带上隋炀帝的萧皇后等人北上。这是当年四月的事情，而当时江淮地区势力最大的起义军是杜伏威领导的。之前，杜伏威在投奔的士绅支持下建章立制，经略江淮。他的政权只征收极轻的赋税，并且严惩贪腐，得到了江淮百姓的支持。

杜伏威原本可以乘着江都隋军仓皇撤退的有利时机，给予隋军致命的打击，就算不能彻底消灭宇文化及这股隋朝残余势力，至少也能占领江都等地以壮大自己。但杜伏威等人显然没有做好隋朝骤然灭亡的心理准备，不知道如何应对“后杨广时代”的到来。思前想后，杜伏威竟然在八月时向洛阳的越王杨侗小朝廷上表称臣，接受了隋朝的官爵。要说农民军起事，没有清晰的政治规划还真是不行。像杜伏威这样的，不仅白白浪费了天赐良机，还“模糊了斗争视线”，严重挫伤了手下农民兄弟的斗志。

倒是李子通先下手为强，围攻江都。驻守江都的陈棱，兵微将寡，向杜伏威及另一支农民军沈法兴部求援。杜、沈都派兵来救援，却不能通力合作。李子通派人伪装成杜、沈两部兵丁，引诱双方自相残杀。陈棱困守无望，最后投降了李子通。李子通占领江都后，势力大壮，集中力量消灭了沈法兴，占领了东南沿海，自称皇帝，建立了“吴”政权，后迁都余杭（今浙江杭州）。

再说北上的宇文化及等人，他们沿着运河一路平安到达了徐州，舍舟登陆，暂作逗留。

江都政变的核心人物司马德戡这时候率领后军，给宇文化及打掩护。但司马德戡心中很不满：“凭什么你率大军在前面逃命，我就要殿后当炮灰啊？”于是，他联络赵行枢、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人谋划除掉宇文化及。可惜司马德戡把江都政变的那套经验照搬了过来，把一件原本应该秘密进行的事情搞得人人都知道了。结果计划没开始，知情的许弘仁、张恺就向宇文化及告发了司马德戡。

得知司马德戡叛变，宇文化及不动声色地派弟弟宇文士及以游猎为名来到后军。司马德戡还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出营参谒，被逮了个正着。宇文士及接着将司马德戡的党羽也一网打尽，带去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质问司马德戡：“我们相约同心协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现在事情刚刚有些眉目，原本想与你同享富贵，你为什么要造反呢？”司马德戡说：“我杀昏君杨广的本意，是不堪忍受他的暴虐毒害。我们辛辛苦苦拥立了你，想不到你比杨广更坏。怎么能不杀你呢？”宇文化及无颜以对，下令缢杀司马德戡。宇文化及这一支势力刚成立不久，便发生了内讧，可谓出师不利。

稍作整顿后，宇文化及引兵继续北上，留下裴虔通镇守徐州。

宇文化及的队伍人数很多，但缺衣少粮，亟须补充物资。宇文化及决心攻占一个大粮仓，补充休整。隋朝的两大粮仓——洛阳的洛口仓和卫州的黎阳仓——此时都在李密瓦岗军的手里。洛阳，宇文化及是不敢去的。他不愿意去掺和李密和王世充两大势力的混战，于是发兵十余万去进攻黎阳仓。李密不敢怠慢，亲自率领步骑二万，赶去迎战宇文化及。

洛阳的越王政权见李密和宇文化及打起来了，决定调整策略。李

密是造反者，是敌人；宇文化及是逆臣，是杀害先帝的凶手，是更大的敌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洛阳方面的元文都、卢楚等大臣决定先消灭宇文化及，给杨广报仇。刚好当时李密放松了对洛阳的包围，去找宇文化及打架了，这就为双方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提供了可能。元文都等人让杨侗派人授予李密太尉、尚书令的官职，封他为魏国公，并承诺消灭宇文化及后，李密可以入朝辅政。李密可能是出于缓和与洛阳的关系、避免两面受敌的考虑，接受了洛阳的任命，还遣使致谢。

如此，李密也得以专心对付宇文化及。他判断宇文化及是来抢粮的，利在速战，所以决心不与他交锋，就堵在宇文大军前进的道路上，打算拖住他们。果然，宇文化及督军昼夜猛攻黎阳仓，而守仓的瓦岗军大将徐世勣拼命死守，硬是没让十万大军攻下来。

李密估计宇文化及着急了，跑到阵前数落他说：“你的祖上原本是匈奴人的奴仆破野头氏，父兄子弟深受隋室厚恩，富贵累世，你的弟弟还娶了公主为妻，荣华富贵，无人可比。国家多难，你们本应该更加效忠王朝；主上失德，你们本应该冒死劝谏。现在倒好，你们率众造反，躬行杀虐，枉害无辜，必将诛及子孙，为天地所不容！你们还不如速速投降于我，尚可保全家族。”李密深知宇文家的往事，对宇文化及兄弟三人现在的情况分析得透彻，击中了宇文化及的痛处。

宇文化及闻言默然，俯视良久，瞋目大叫：“现在是在和你谈厮杀之事，何必作书生之言？”李密转头对随从说：“宇文化及是个平庸懦弱的人，忽然要图帝王大业，也就是赵高之流，成不了大事。我折根棍杖就能赶跑他。”

宇文化及明白只有得到黎阳的粮草，自己才能转败为胜，于是加紧督军大修攻城器具，昼夜猛攻黎阳仓城。这时，黎阳仓守军与李密率领的精锐部队里应外合，一起把宇文化及的攻城器具都给烧了。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可见宇文化及造了多少器具。

器具烧完了，宇文文化及的粮草也见底了。李密探知后，假装要和他谈和。宇文文化及信以为真，大喜，认为谈和后就可以向李密买粮食了。于是，宇文文化及对越来越少的粮食不加控制，任由士兵们敞开了肚子吃，反而加速了粮草的匮乏。刚好这时李密部下有人犯了罪，逃亡到宇文文化及的阵营，将李密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和盘托出。宇文文化及非常生气，但为今之计，也只能寄望在决战中战胜李密。仓促之间，宇文文化及决定向瓦岗军发动总攻，两军战于童山之下。混战中，李密被流矢射中，坚持作战，最终大败宇文文化及的十万大军。宇文文化及带着残部向北逃往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劫掠沿途州县，而宇文部下的许多隋朝官员、兵将纷纷投降了李密。

当初宇文文化及进攻黎阳的时候，把辎重、老弱都留于东郡，留代理刑部尚书王轨守卫。宇文文化及大败后，王轨献城投降李密。于是，隋朝的基本框架和许多遗老遗少，现在也就归入李密囊中。留在东郡的苏威也随众投降，而李密因苏威德高望重，又主动投降，非常礼遇他。

按照之前李密和洛阳朝廷约定的条件，李密打败宇文文化及就可以入朝辅政了。李密也有引兵西进、前往洛阳的意思，便先派记室参军李俭带着于弘达——绞死杨广的凶手之一，献给越王杨侗，顺便探探洛阳方面的口风。事情进展顺利，杨侗任命李俭为司农少卿，派他回去召李密入朝辅政。

于是，李密意兴风发，喜气洋洋，要去洛阳上任。但他赶到温县的时候，洛阳方面突然传来王世充诛杀元文都、卢楚等人，已经独霸朝政的坏消息。李密知道自己比王世充晚了一步，不得不更快地回到老巢金墉城。

王世充表面上靠窥测隋炀帝杨广颜色，阿谀奉承才获得宠信，看

似是一般佞臣，实际上背地里勾结豪强，聚敛人心，野心日益膨胀。

王世充掌握着洛阳的军队，是拥戴杨侗为帝的核心人物。王世充没想到杨侗还真把自己当皇帝了，不跟他商量，就听信元文都等人的意见，确定了联合李密的策略，而且还承诺让李密入朝辅政。对此，王世充很愤怒：李密来了，自己往哪里摆？

当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后，遣使告捷洛阳，洛阳城内一片欢呼声，王世充却对麾下诸将说：“元文都之辈，刀笔小吏而已。我看现在如果让李密入朝，我们必为李密所管辖。我们人人与李密混战多年，杀其父兄子弟，前后不计其数。大家一旦成为李密的部下，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吗？”部下官兵一下子就被王世充挑拨起来，反对朝廷召李密入洛阳。

元文都知道部队的情绪后，大惊，与卢楚等人商量，认定是王世充使坏，便谋划着把王世充引进宫中，埋伏士兵除掉他。大家定好了谋杀的日期，分头准备去了。不料参与其中的将军段达秘密让女婿张志把整个计划告诉了王世充。

王世充连夜发兵围攻宫城，而元文都则派将军费曜、田世阉等人出宫与王世充交战。费曜的军队不是对手，王世充很快就攻入城内，捉住卢楚，并将其杀死。来到杨侗的寝宫门前，王世充令人叩门进言：“元文都等人想劫持皇上投降李密，段达知道后告诉了臣。臣入宫是诛杀奸臣，不敢谋反。”元文都当时在杨侗身边，闻言，带着杨侗来到干阳殿，招呼卫兵保护。经过一场肉搏，元文都也被乱军杀死了。杨侗只好下令打开大门，迎王世充入殿。

王世充把宫中所有的卫兵都换成自己的人，才敢进入干阳殿。见到杨侗后，他顿首流涕，恳切地说：“元文都品行恶劣，想暗中算计臣，危及国家。事情紧急，臣才出此下策。”杨侗能说什么呢，只有点头。王世充接着暗示杨侗，任命自己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

事，又将自己的哥哥王恠安排为内史令，入居禁中，监管杨侗。

王世充擅权后，重赏将士，加紧打造刀杖器械，洛阳城中士气大振。

当时，王世充面临的问题也和宇文化及一样：没有粮食。李密占着大粮仓，粮草富裕得很，王世充就和李密提议，用布匹交换粮食。李密不同意，但他部下的邴元真等人想从货物贸易中谋取私利，不断来劝李密答应。最后，李密点头同意了。之前东都洛阳缺粮，许多人都失去了信心，不断有人归降李密。每天都有数百人逃出洛阳，投奔瓦岗军。现在洛阳源源不断地获得粮草，人心稳定了下来。李密见每天来归降的人越来越少，非常后悔，随即又下令禁止卖粮食给洛阳。

李密也有他的困难，即地盘内没有武器库，士兵们的装备得不到及时补充与更新。同时李密下达的战斗命令越来越多，给予的赏赐越来越少。为了招降纳叛，李密对前来归降的人很重视，待遇很高，相对冷落了老部下。渐渐地，李密在瓦岗军内的声望下降了，许多将士都开始抱怨他了。

王世充觉得时机成熟，倾城而出，向李密宣战。李密仓皇应战，遭到大败，从金墉城只率万余人逃向洛口仓。他的部将裴行俨在冲杀之中，中流矢坠马。程咬金已经跑远，见状返身前去营救。他连杀数人，逼退了追兵，抱起裴行俨上马撤退。程咬金的战马载不动两个人，跑得特别慢，很快就被王世充军追上。程咬金不忍将裴行俨丢下，迟疑间被一枪刺中，长枪穿胸而过。程咬金忍住剧痛，回身折断长枪，快速将执枪之人斩于马下。如此壮举，吓得追兵纷纷勒马远看，不敢继续追赶。程、裴二人终于安全返回本军。

李密逃入洛口仓，与守军邴元真合兵一处，要和王世充再战。李密与众人商议后，决定等王世充的部队渡洛河之时，半道截击。但李密派出去的侦察骑兵不称职，没有把握住时机通知李密，等瓦岗军整

军出战的时候，王世充全军已经安然渡过洛河了。李密知道没有胜算，主动带军逃跑。最后，邴元真投降，将洛口仓献给了王世充。在李密阵营中的苏威也跟着投降了王世充，回到他的故土洛阳。

经此一战，王世充声威大震。这是武德元年（618）九月间的事情。

成王败寇

李密接连惨败，部众越来越少，便想逃往黎阳据守。当时镇守黎阳的人是徐世勣，有人就对李密说：“当初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差点被砍死，听说内伤到现在还没有治好。您率领败军去黎阳，万一徐世勣居心不良，您就很危险了。”李密一听有理，放弃了北奔黎阳的打算。

瓦岗军的王伯当正率部驻守河阳，李密就渡过黄河来到河阳。

李密此时的情绪很差，对王伯当说：“兵败了！这么多年来，辛苦诸君了。我今日自刎，以谢众人。”部下都哭成一团，不敢正视李密。李密提不起自杀的勇气，又改口说：“感谢诸君一直跟随我，我这就去关中。虽然我没有尺寸之功，心怀愧疚，但投降李渊，诸君还能保住富贵。”部下府掾柳燮表示赞同，说：“昔日刘盆子投降东汉，安享晚年。李公您与唐朝皇室宗族有关联，虽然不是唐朝起义人员，但是在东都洛阳缠住了隋朝的主力部队，为唐公李渊不战而据京师建立了大功。”众人也都表示同意。于是，李密率部西入关中，投降唐朝。李密入关之时，周边尚且聚集了两万精兵和诸多文臣武将，势力不容小觑。这是一支庞大的投降队伍。李渊对李密主动投降，大喜过望，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出城相迎，慰劳再三，封李密为邢国公，拜光禄卿。

李密降唐后，黎阳的徐世勣成为关东瓦岗军残余势力的首领。瓦岗军的残部还控制着南起淮河、北到河北、东起黄河、西至洛阳的广大地盘，部队不下十万人。这些领土和军队都听从徐世勣的指挥。徐世勣面临着重大选择——既可以取代李密成为一方枭雄，也可以将地

盘和军队作为筹码，投靠唐朝换取富贵。他对部下说：“这些人口、土地都是魏国公（李密）的，我奉命把守而已。魏国公现已降唐了，我们也应该降唐。”

有部下就建议徐世勣以自己名义把土地和军队献给李渊，换取更大的荣华富贵。徐世勣拒绝说：“如果我直接给李渊上表纳土归降，就是利用魏国公落败之机为自己邀功，如此行为令君子不齿。我应该先把土地、户籍交给魏国公，由他献上。”于是，徐世勣派人向长安方面投降。

李渊听说徐世勣派人来了，以为是向自己投降，结果发现徐世勣依然是以臣礼向李密上表，李密再拿着徐世勣控制的军队和土地投降。李渊不禁感叹道：“徐世勣真是千古罕见的忠臣与君子！”李渊感动之余，封徐世勣为莱国公，依然掌管东方瓦岗军的残部，并特别赐姓“李”。从此，徐世勣改名为“李世勣”。后来，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去掉了“世”字，他就是唐朝著名的将领李勣。

李渊对留在长安的李密开始很友好，很厚待，还把表妹独孤氏嫁给了他，后来礼数就慢慢淡薄了下去。李密当的光禄卿又是个虚职，没什么实权，平日里难免遭遇其他实权官员的刁难。回想起山东的显赫时光，李密内心不平起来，他私下对王伯当抱怨道：“我占据洛口的时候，曾经想任命崔君贤为光禄卿，不想现在自己当了光禄卿。”

当时，山东瓦岗军旧部出现了不稳迹象，李密便与王伯当共谋逃出关中，自立为王，从头开始。王伯当起初不赞成，但拧不过李密，同意了。于是李密借口要去收抚山东旧部归降李渊，得到李渊同意后，和王伯当等人准备东出潼关，回归关东。武德元年（618）十二月底，李密与王伯当行至途中的熊耳山，遭到唐军埋伏，双双被杀，传首长安。

李密之死成了隋末唐初的一大疑案。有人认为是李密等人中途造

反自立的形迹非常明显，被唐朝地方官府杀死的。有人认为是李渊一直暗中提防李密，听说李密要回山东，将计就计，在途中安排了伏兵，一举杀掉李密及其亲信。

当时李勣还握有重兵，据守黎阳。李渊派人带着李密的脑袋去向李勣说明情况。李勣奏请收葬李密，让旧主子身首合一，全尸安葬。李渊同意了。于是，李勣操办了李密的丧事，三军缟素，办得很风光，并以君礼安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坟高七仞。李密在关东地区影响很大，有一批铁杆粉丝。在李密的葬礼上，有许多人悲伤哭泣，直至呕血。

隋末最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就这样戏剧性地消失了。

却说躲在魏县的宇文化及，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手下将士逃跑得越来越多。宇文化及知道自己必败，叹道：“人生终究当死，岂能不感受一下当皇帝的感觉！”于是，他毒杀了傀儡皇帝杨浩，在魏县即帝位，国号“许”，改元“天寿”。宇文化及麾下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人才，只有一个裴矩。他便任命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封蔡国公。宇文化及这么做完全是赌徒心理使然，破罐子破摔，反正要死了，过把皇帝瘾再死岂不更好。

武德二年（619）正月，李渊派淮安王李神通进攻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完全没有应战的信心，干脆不打，向东逃到山东聊城。李神通尾随宇文化及赶到聊城，开始围攻。

这时，宇文化及病急乱投医了，他给割据幽州的罗艺写了一封信，要招降罗艺。罗艺盘踞幽州多年，比宇文化及强大得多，怎么可能反过来投降穷途末路的宇文化及。罗艺不仅不投降，还奚落了宇文化及一顿：“我是隋朝旧臣，深感朝廷大恩。宇文逆贼颠覆朝堂，令我痛心疾首。”罗艺将宇文化及的使者砍了脑袋，然后宣布为隋炀帝

杨广发丧，大哭三天。

不过，宇文化及的招降工作在山东地区竟然取得了成功。山东农民起义的“元老”王薄接受了宇文化及的招降，率军赶来和宇文化及的部队共同守城。李神通攻城不克，暂且退军。

河北农民军领袖窦建德在武德元年（618）冬至就已经正式建国，定都乐寿，国号“夏”，改元“五凤”。杨广死讯传到河北后，固守的河间等地隋朝官员纷纷投降了窦建德。窦建德都以礼相待，并且高调扬言与宇文化及为仇敌，要为隋复仇。现在宇文化及被围困在聊城，窦建德随即以讨逆为名，发大军去攻聊城。不等宇文化及有所反应，聊城的大门洞开——王薄打开了城门，放窦建德入城。宇文化及和窦建德相比，王薄更喜欢窦建德，毕竟曾经同是革命战友。

窦建德入城后，将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等人全部斩首，将宇文化及和他的儿子宇文承基、宇文承趾押至襄国郡（今河北邢台）斩首。宇文化及的弟弟、隋朝驸马宇文士及反应迅速，城破后抛妻弃子，逃亡济北，又向西投降了唐朝。

宇文化及的许政权灭亡，隋朝的传国玺及卤簿仪仗尽入窦建德之手。窦建德毕竟是以替隋炀帝报仇为由，入城后对残存的隋朝皇室、大臣百官们相当客气。他先去见萧皇后，并穿上素服为隋炀帝杨广哭丧尽哀，然后接见被俘的隋朝官员。

那些隋朝旧臣颠沛流离，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见到传说中河北地区最大的造反者窦建德后，莫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只有杨广的女儿、宇文士及的妻子南阳公主神色自若，见到窦建德时侃侃而谈。说到国破家亡，自己一介女流不能报仇雪耻时，南阳公主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窦建德和其他听众莫不为之动容，陪着流泪。南阳公主和宇文士及生了一个儿子，叫作宇文禅师，年仅十岁。孩子虽小，也算是宇文家的子孙，要为伯伯宇文化及的弑君行为连坐，必须杀

头。窦建德敬重南阳公主，就问她：“宇文文化及弑君，将族灭其宗。公主之子，本应当从坐，如果公主不能割爱，就赦免了孩子。”谁想南阳公主哭诉：“此事何须见问？”她拒绝了窦建德的好意，宇文禅师还是被作为叛贼给杀掉了。

最后，窦建德让隋朝的文武百官和尚有上万人的前近卫官兵自由选择，听其自去。对于愿意留下来的人，窦建德选择其中的优秀人才充实自己的队伍。他任命裴矩为左仆射，负责人事选举，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等等。其他隋朝残余势力的去向大致是三条：回关中老家投靠唐朝，去洛阳投靠王世充，去东突厥（隋朝的义成公主在那里）。无论官兵的去处如何，窦建德都发给路费。同年，窦建德攻克黎阳、齐州、兖州等地，建都洛州。裴矩替他的朝廷“创定朝仪，权设法律”。看到阵营越来越有王朝的样子，窦建德很高兴，继续忙着攻城略地，甚至制定了更加长远的谋划。

宇文文化及死后，王薄也不是真心投靠窦建德，很快就带着队伍和地盘投降了唐朝。李渊任命王薄为齐州总管（驻历城，今山东济南）。从此，王薄这位隋末农民起义军的“革命先驱”忙着在山东地区教训“革命晚辈”们，劝说各个州县的农民军投降唐朝。不听劝的，王薄就和他们兵戎相见。或许是知根知底，王薄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为唐朝拓展了青州、密州、莱州等地盘。

然而，农民起义的早期历史就是一部“江湖的历史”，里面免不了恩怨仇杀。武德五年（622）三月，王薄被仇家刺杀而死。

割据的终结

转过来再说洛阳的王世充，当建立许政权、登基称帝的宇文化及在武德二年（619）被杀后，他也谋划起做皇帝了。

早在李密降唐后，王世充就收降瓦岗军在洛阳附近的余众，回到洛阳升官当了太尉、尚书令。他身边有个亲信道士，叫作桓法嗣。这个道士自言能解图讖，曾拿着一幅《孔子闭房记》的画来找王世充。这画中有一个男子持一杆驱羊，桓法嗣说：“杨（羊），隋姓也。干（杆）一者，王字也。王居杨后，说明相国您要代隋为帝了！”他又取庄子《人间世》《德充符》二篇让王世充看，进一步附会说：“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暗示着相国您的名字。当德被人间，而应符命为天子也。”

王世充心中充满皇帝梦，竟然相信了这么牵强附会的解释，说：“既然天命要我当天子，我也不好推辞了！”他随即以桓法嗣为谏议大夫，同时又捉了许多小鸟，在鸟脖子上系了书帛符命（上面写满“王世充当为天子”之类的话），再放飞出去。有人射中或者网住这些鸟，献给朝廷，就会被赏赐官爵。因此，洛阳的鸟儿有了大难，大家都来打鸟，巴不得捉到有符命的鸟儿，去换取官爵。后来，干脆有人伪造符命，同样能换得官爵。于是洛阳掀起了一股歌颂王世充、拥戴王世充为帝的狂热风潮。这样看来，王世充“众望所归”。

武德二年四月，王世充看预热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就派侄子王行本带毒酒去毒杀傀儡皇帝杨侗。杨侗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恳请临死之前和母亲见上一面。王行本不答应。杨侗无奈，焚香祷告：“愿来世不生于帝王尊贵之家。”祷告完毕，他喝下了毒酒。但王世充准

备的毒酒毒性不够，杨侗喝了以后好长时间都没有死掉。王行本等不及了，干脆拿了条丝帛把杨侗给勒死了。

紧接着，王世充即皇帝位，建元“开明”，国号“郑”，任命段达为司徒。居住在洛阳的苏威因为政治威望高，王世充每次安排人劝进，都把苏威的名字写在前面，表明自己深得隋朝旧臣的支持，苏威也很配合。王世充真当了皇帝，将苏威排列在百官之前，待遇隆重。

洛阳的王世充与河北的窦建德，原本二人关系不错，互相之间有所往来。王世充称帝后，夏王窦建德便断绝了与王世充的联系。原来，窦建德自己也想当皇帝，都已经开始建造天子旌旗和仪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了。窦建德为了壮大声势，还联络了塞外的东突厥力量，借此自重。突厥可汗的妻子义成公主是隋朝宗室之女，她说动可汗向窦建德索要萧皇后和南阳公主。窦建德马上派出一千骑兵护送皇后和公主出塞，同时将宇文文化及的脑袋也捎带上，以结好义成公主。从此，窦建德与突厥南北呼应，兵势更盛。

王世充也好，窦建德也罢，看来越来越强大。其实关东地区连年战乱，早已经是十室九空，无人无粮无兵器。而关中的唐朝势力稳扎稳打，占领西部和巴蜀，重视内政，实力不断上升。东西部之间的实力对比变成了西强东弱，唐朝具备了消灭东方各割据势力的能力。

武德三年（620）七月，李渊派秦王李世民进攻洛阳，正式拉开了消灭隋末割据势力的序幕。

王世充抵挡不了李世民的兵锋，洛阳被围得水泄不通，只好厚着脸皮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汇集王世充外围兵马，号称三十万，救援洛阳。窦建德的夏军和唐军接战，战事胶着，窦建德胜少败多，但尚未决出胜负。有文臣建议窦建德围魏救赵，率领主力渡过黄河占领河东地区，一来可以占领北部空虚领土，同时方便联合突厥力量，共同威胁唐朝关中地区，二来李世民必定会撤军回

援关中，洛阳之围自解。但是，当时李世民采取蚕食战术，不断攻占洛阳周边市镇，切断了王世充军队的后勤供给，王世充确实压力巨大。他重金贿赂窦建德的将领，蛊惑众人在洛阳周边与唐军决战。而窦建德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判断力，否决了围魏救赵之计，停留在原地与唐军鏖战。

武德四年（621）五月，夏军与唐朝大军在虎牢关展开决战。窦建德倾巢而出，旗帜飞扬，军阵连绵超过十里，擂鼓前进。唐军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众将都没有获胜的信心。李世民沉着冷静，拖延接战。结果，夏军的战阵从早晨到中午都没有交战，士兵们饥渴疲惫，开始松懈下来，有人坐地休息，有人去找水解渴。就在窦建德有撤军心思的时候，李世民驱动骑兵发动了决战。夏军猝不及防，纷纷败退。眼看唐军杀到了眼前，窦建德才聚拢兵力试图稳住战线。

最后的决战开始了。唐军中，李勣、程咬金、秦叔宝等名将都参加了虎牢关战役。诸将奋勇杀敌，李世民亲自上阵，冲入厮杀。夏军丧失了斗志，开始崩溃，几乎全军覆没。事后清点，仅唐军俘虏的夏军官兵就有五万人之多。李世民素有仁爱之名，将俘虏全部放归家乡。

窦建德在战场上被长枪刺中，逃脱不成最终被俘。唐军押着窦建德等俘虏来到洛阳城下，展示给王世充看。王世充流着泪与窦建德交谈了几句，几乎支撑不住。下城后，王世充还想从洛阳突围，南下襄阳，可惜将领们都不想再战了。王世充知道自己的戏也唱完了，身穿白衣，打开城门投降唐朝。短暂的郑政权，随之灭亡。

李世民杀了段达等祸害百姓、罪大恶极者，而把王世充、窦建德押赴长安。李渊历数王世充的罪状，王世充回答：“我罪固当死，但秦王曾答应不杀我。”于是李渊赦免他的死罪，将他本人及其家眷迁往四川安置。路上，王世充为仇人所杀。

七月，窦建德在长安被斩首，时年四十九岁。窦建德被俘后，夏国群臣商议要立窦建德的养子为新主子，继续割据争霸。夏国的尚书左仆射齐善行说：“夏王平定河朔，兵马强壮，还是被擒受辱，这难道不是表明天命已经有所归属了吗？我们不如效忠真命天子（指李渊），不要再涂炭生灵了。”一席话说得大家频频点头。于是大臣们打开府库，将财物分给士兵，解散了军队。然后夏国的尚书左仆射齐善行、尚书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窦建德的妻子率领夏国官府和土地降唐。夏国就此灭亡。

洛阳虎牢关战役是一场实打实、硬碰硬的主力决战，是隋末唐初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是隋末起义势力消长的决定性战役，也是唐朝统一过程中的关键性战役。李世民率领唐军一举平定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个政权，奠定了唐朝统一的基础。

至此，隋朝的历史算是彻底结束了，再也没有回潮的可能了。

窦建德失败后，其部将刘黑闥于武德四年七月袭破漳南，重新树起义旗，起兵反唐。第二年正月，刘黑闥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重建了农民政权，声势大振。随后，刘黑闥又攻陷恒州（今河北正定），与唐将李建成、李元吉所率大军对峙交战于魏州。武德六年（623）正月，刘黑闥被叛将诸葛德威执送李建成，次月遇害，余部被唐军击破。

至于江淮的杜伏威，早在武德二年（619）投降了唐朝。杜伏威先担任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封楚王，后来李渊又委任他主宰东南半壁军事。这期间，江南的李子通的势力不断壮大，杜伏威受命率兵渡江，对昔日的仇敌发动屡次进攻。李子通于余杭城下战败被俘，执送长安，杜伏威尽收其地，成为江淮地区最强盛的势力。武德五年（622）七月，李世民乘着打败刘黑闥之机，移师山东，一边围剿山

东零星义军，一边监视杜伏威统领的江淮地区。接着唐王朝令杜伏威入朝，要接管他的地盘。杜伏威选择了入朝，留在长安被任命为太保，当起了寓公。

去长安前，杜伏威留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辅公祐据守江淮地区，将兵权交给了副职王雄诞。杜伏威走后，辅公祐与左游仙等人积极活动，于武德六年八月夺取兵权，称帝于丹阳，自称宋国，树起了反唐大旗。唐王朝派兵水陆俱进，由南、西、北三面进攻辅公祐。经过近半年鏖战，辅公祐兵败遁走至武康，为野人所擒，被杀于丹阳。

武德四年，唐朝分别进攻割据两湖的梁国。萧铣之前分兵四处，兵力过于分散，难以组织与唐军的决战，加上部将异心四起，不断有人献地投降，首都江陵很快陷入唐军重围。萧铣自料大势已去，告祭于太庙后，身穿孝服出城投降，梁亡。

萧铣被护送到长安后，李渊斥责其罪。萧铣回答：“隋失其鹿，英雄竞逐，萧铣无天命护佑，故被陛下擒获。正如田横南面称王，难道对不起汉朝吗？”因为强硬不屈，萧铣被斩于长安，时年三十九岁。在隋末农民起义的首领中，萧铣杀戮最少、安民最多，是被杀的最冤的一位。至此，天下重新归于一统。

千百年来，抛头颅、洒热血推翻旧王朝的农民兄弟们，最终总是成为少数贵族豪强建立新王朝的垫脚石。这一现象令人感叹深思。

尾声 隋朝谢幕，盛唐开场

唐武德四年（621）五月，秦王李世民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东都洛阳。隋朝的老宰相苏威已经八十二岁了，前来求见李世民。十年前，李世民主动拜见苏威，苏威漠然。如今时势迥异，李世民是唐朝的秦王，苏威是前朝的老人、本朝的草民，只好自降身价求见李世民。但苏威还是有所“矜持”，借口年老多病，向秦王府的迎客说明自己是来“看看”秦王的，不能行跪拜大礼。

李世民派人传话给苏威：“您是隋朝的老宰相，国家危难时刻拿不出补救的办法，致使君主遇害、王朝倾覆。后来又依附反贼，见到李密、王世充等伏地跪拜，手舞足蹈。如今既然年老多病，就不需要相见了。”

唐军凯旋回长安后，苏威也流落到了长安，求见老同僚、昔日的下级李渊不成，再次觑着脸求见李世民。李世民还是不见。几天后，年老多病的苏威缺衣少食，无人理睬，凄凉地死在了李唐王朝的首都长安。

临终之时，苏威感觉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长安城。那时的长安叫作大兴，是隋王朝的首都，自己还在当着隋朝的宰相……

新的唐王朝建立了，有一些人却永远是属于已经过去的隋王朝的。

裴矩降唐后官至民部尚书。他一直活到八十岁，历事诸主，均受到礼遇，可谓奇迹。当然裴矩主要是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受到唐朝的重用。他熟悉档案和往事，常常被唐朝皇帝和各部门叫去当顾问，解答一些疑问。同时，裴矩对西域情况很了解（唐朝初期，西域地区的西突厥是朝廷的大患）。他写了《西域图记》，记述了西域四十多个国家的情况和东西交通的路线，此外还写了《开业平陈记》《邺都故事》《高句丽风俗》等书，简直就是半个档案馆。

不过，要想恢复在杨广时期的权力和声望，裴矩是做不到了。他毕竟不是属于唐朝的。裴矩在隋朝是个标准的佞臣和奸臣，但到了唐朝却有犯颜劝谏的举动。李世民刚即位时，想调查朝廷官员贪污受贿的情况，提出蛀虫，于是派人暗中拿着财物去“贿赂”官员，钓鱼执法。有个官员拿了一匹绢，李世民大怒，就要杀了这个官员。

这时候，裴矩进谏了：“此人受贿，是应该治罪。但陛下先以物诱之，现在又要将他就地正法，有故意陷害的嫌疑。陛下这么做，恐非导德齐礼之义。”李世民接受了裴矩的劝谏，并当众表扬了他。那么，为什么一个奸臣到了唐朝就变成了正直之臣呢？关键还是皇帝不同了。什么样的皇帝，带出什么样的大臣。李世民善于纳谏，裴矩才敢于劝谏。贞观元年（627），一生左右逢源的裴矩病逝。

屈突通是较早投降唐朝的隋朝重量级人物。他的起点很好，一投降就在秦王李世民的指挥下作战，成为李世民集团的重要一员。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日清晨，李世民率屈突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宇文士及、程咬金、秦叔宝等亲信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向皇帝宝座迈出了关键一步。“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担心洛阳发生动乱，派屈突通驰赴洛阳镇守东方。

李世民即位后，大封功臣。屈突通有大功，被任命为洛州都督，之后长期镇守洛阳，成为唐初重臣名将。贞观二年（628），屈突通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李世民下诏褒奖，追赠尚书右仆射，定谥号

为“忠”。一个隋朝旧将在唐朝得到了“忠”字的谥号，难能可贵。贞观十七年（643），李世民命画工将二十四名功臣绘图于凌烟阁，和真人一般大小，史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屈突通名列第十二。

另一个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隋朝大臣是虞世南。虞世南是隋朝后期大名鼎鼎的奸臣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基一家人贵比王侯的时候，虞世南一人耐得清苦，终日读书写字。江都政变时，哥哥虞世基被叛军所杀。叛军对虞世南的评价是：“这是个苦读秀才，与乱世无关。”因此，虞世南侥幸活了下来，先后在宇文化及、窦建德手下做事。

李世民俘虏窦建德后，虞世南进入秦王府，给李世民做参军。他从事的工作和哥哥虞世基一样，处理公文档案。虞世南果然是个纯书生，不适合乱世而适合治世。他多年苦练，成了唐朝初年最著名的书法家。李世民不仅喜欢虞世南的书法，而且经常拉他谈论经史。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病逝，终年八十一岁。唐朝追赠他礼部尚书，定谥号为“文懿”。

除了以上三位在唐朝显赫的隋朝旧臣外，多数隋朝大臣在唐朝默默无闻。武德元年（618）年底，隋朝左监门将军罗荣之子罗艺也投降了唐朝。李渊赐姓“李”，封他为燕郡王。此后，罗艺参与了唐朝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贞观元年（627），罗艺起兵反唐，被击败后逃往西北乌氏（在今甘肃泾川县内），为其部下所杀。

此外，在隋朝曾出使日本的文林郎、鸿胪卿掌客裴世清，投降唐朝后被任命为驾部郎中，官位止步于江州刺史。江都政变的重要人物裴虔通在宇文化及行将覆灭之际，以徐州之地纳土归降了唐朝，换来了徐州总管的职位。唐朝稳定后，裴虔通转任辰州刺史，封长蛇男，不久就被追究“杀逆之罪”，除名，发配岭南。裴虔通最后死在了南方。

对于江都政变中的参与者，部分人在隋末乱世中被杀，不少人进入了唐朝，担任军政职务。起初，他们照常供职，还会因为工作出色受到朝廷褒奖。唐朝政局稳定后，意识形态问题重新提上议程，需要给江都政变定性。贞观七年（633）正月，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衅深泉獍。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置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

弑君，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都不能接受。当年江都政变的参与者因为缢杀隋炀帝的举动，在几十年后被定性为“弑逆”，在职者罢官，去世者追贬，并且罪及子孙。自身及其子孙都遭到禁锢，不能入仕。

再说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南阳公主的情况。贞观四年（630），李世民大破东突厥，迎接萧皇后和南阳公主回归中原。

在洛阳，南阳公主遇到了丈夫宇文士及。之前，宇文士及从江都政变中逃离后，辗转多处，最后投靠了唐朝。他跟随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因功被封为郢国公。李渊还将宗室公主嫁给了宇文士及。宇文士及再次做了驸马，成为隋朝和唐朝的“双料驸马”。南阳公主与宇文士及重逢之时，物是人非。尽管双方历经沧桑，感情还在，但身份地位已然天翻地覆。宇文士及是唐朝官场上的一颗处于上升期的新星，又是有妇之夫。南阳公主是前朝公主，本朝的草民。但是宇文士及还是主动提出了复婚，希望破镜重圆。南阳公主断然拒绝，说：“你兄弟杀我父皇，我与你是仇家。我之所以没有手刃你，是因为知道一切都是你那两兄弟谋逆，你事先并不知情罢了。”

宇文士及再三恳求，南阳公主也不答应。联想到南阳公主将儿子宇文禅师都杀了，宇文士及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对南阳公主作揖，告辞而去。从此，两人咫尺天涯，不复相见。传说南阳公主看破红尘，出家为尼。而宇文士及在唐朝历任中书令、殿中监，于贞观十六年（642）病逝。唐朝追赠他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唐太宗李世民陵墓）。

贞观二十一年（647），隋炀帝萧皇后病逝，享年约八十岁。李世民以皇后之礼将她埋葬在杨广身边，定谥号为“愍皇后”。后人常说杨广荒淫无耻，其实杨广和萧皇后的感情非常好，从十几岁结婚开始一直到死，都和萧皇后厮守恩爱。杨广后期的确爱好美色，但并没有冷落萧皇后。

2013年4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一处房地产项目施工时发现了两座古墓，其中一座的墓志写着“隋故炀帝墓志”等字样，墓中出土了铜制的衔环铺首，以及金镶玉腰带。但是这两座墓的占地面积分别只有二三十平方公尺，完全不符合帝陵的规制。当年年底，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组织专家对墓葬的考古发掘进行鉴别。专家最后确认，此处墓葬是隋炀帝杨广墓，是这位好大喜功的传奇帝王的归宿地，而另一座古墓是萧皇后的墓葬。

此前，人们误认为扬州邗江区另一处古迹为隋炀帝陵，这是因为唐代以后隋炀帝陵渐渐荒芜，不为人知。清朝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考证认为一处大土墩为隋炀帝陵，并且出资修复，又嘱托书法家、扬州知府伊秉绶书写墓碑。结果以讹传讹，此处古迹就成了“隋炀帝陵”，还成为扬州著名的旅游景点。2013年春天的这次意外发现，还原了历史真相。

说完隋朝官员和皇室的结局，我们再来看看那些隋末起义之人在唐朝的结局。

李勣（徐世勣）无疑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唐朝建立后，李勣被封为英国公，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出将入相，历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三朝，位高权重，被视为朝廷脊梁。李勣长期掌管军队，国内没有战事，他便负责对外战事，北讨突厥和铁勒，东征高句丽，军功赫赫。

对于功勋卓著的李勣，唐朝统治者也爱护有加。一次，李勣在征途中染上暴疾，医生开出药方说，治疗此病需要胡须灰做药引。李世民听说后，剪下胡须给李勣和药。李世民是皇帝，他的胡须可是“龙须”。龙须一到，李勣的病立马治好了。古人说，胡须毛发受之父母，不能轻弃。李世民为李勣剪须，这是多大的恩宠啊！还有一次，君臣宴饮，李勣喝得酩酊大醉。李世民脱下衣服亲自给李勣盖上，以免他着凉。

李世民临终时，担心太子李治对李勣无恩，将李勣外放边远地方的刺史作为考验。李勣无怨前往，通过了考验。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任命李勣为尚书左仆射，执掌政务。李勣效忠朝廷，为人谨慎，对于李治与武则天的家事不闻不问。武则天掌权后，对李勣继续器重，赏赐有加，如同对待家人一样。因此，许多同期的大臣贬的贬，死的死，李勣在朝中依然岿然不动。正是在李治和武则天时期，李勣率军东征高句丽，占领平壤城，灭亡了高句丽国。唐朝在高句丽故地设置州县，设安东都护府统管。李勣将杨广未竟的事业给完成了，可谓“隋朝的忠臣”。凯旋回朝不久，李勣就病逝了，享年七十六岁。李治亲自为李勣举哀，辍朝七日，追赠太尉，谥曰“贞武”，陪葬昭陵。

李勣的孙子李敬业却没有继承祖辈的谨慎作风和政治智慧，在武则天准备篡夺唐朝天下过程中举兵反抗。李敬业的造反除了那篇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曌檄》外，几乎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很快就被武则天扑灭了。武则天将李敬业家族恢复“徐”氏原姓，满门抄斩。李勣生前肯定不会想到家族会在不久之后被诛。

除了李勣，程咬金、秦叔宝也在唐朝得到重用。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后，程咬金、秦叔宝等将领投降了王世充。武德二年（619）闰二月，王世充率部进攻唐朝谷州（治新安，今属河南），程咬金、秦叔宝随军出征。两军对阵之时，程咬金、秦叔宝等人突然率几十名亲信骑马出阵上百步，然后勒马回头向王世充行礼，说：“承蒙接待，极欲报恩。公性猜贰，傍多扇惑，非我等托身之所，今谨奉辞。”说完，一行人临阵倒戈，投降了唐军。王世充气得七窍生烟，但慑于程、秦二人的威名，不敢追赶。程咬金、秦叔宝降唐，归入秦王李世民的麾下，都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的亲信。后来程咬金封卢国公，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唐高宗李治在位时，程咬金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由于杀降、贪财遭到免职。麟德二年（665），程咬金病逝家中。唐朝追赠骠骑大将军，陪葬昭陵。

秦叔宝，本名秦琼，常年征战让他满身伤痕，在唐朝建立后疾病缠身。秦叔宝对疾病处之坦然，说道：“我从小就参军打仗，参加了二百多役，屡中重疮，前后出血怎么也有几升之多，安得不病乎？”贞观十二年（638），秦叔宝去世，陪葬昭陵，追封胡国公，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秦叔宝是隋唐英雄中传奇色彩仅次于程咬金的角色，他在演义、戏剧及评书中被后人视为“山东好汉”的代表。现在山东一带有不少关于秦叔宝的遗迹，比如秦叔宝卖马槐、秦叔宝府、秦叔宝墓等。此外，秦叔宝与尉迟敬德还是传统民俗中的两大门神。

还要介绍的是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张亮。这对后人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因为在隋末大乱中张亮只是李勣部下的普通军士。张亮随同主将降唐，并由李勣推荐进入李世民幕府，从此飞黄腾达。李世民兄弟相争时，张亮受李世民指派去洛阳，招募敢死队，被李元吉告发下狱。在狱中，张亮遭受严刑拷打，拒不招供，保护了李世民。凭借这一点，张亮成了贞观明星。贞观年间，张亮又揭发了侯君集谋反、随征高句丽，而且在地方行政上卓有成效。但张亮

喜好巫术，与人交恶，在贞观二十年（646）被人告发“阴养死士”图谋谋反，受诛。

唐初统治者都亲身经历了隋末的乱世，对隋朝灭亡有切身体验。

隋朝为什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呢？为什么在开皇盛世之后的十年间，隋朝就分崩离析了呢？唐初的官场和政治理论界都在感叹：“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如何吸取隋朝骤兴骤亡的教训，让唐朝避免重蹈覆辙呢？这是摆在唐朝君臣面前的现实问题。

李渊在武德五年（622）曾责成隋朝旧臣封德彝、大学问家颜师古合修《隋书》。历史需要距离感，当时离隋朝灭亡太近，而封德彝等人也难以完全跳出主观思绪。此次修史没有成果。李世民在贞观三年（629）重申修写隋史的重要性，任命魏徵为《隋书》主编。

魏徵出身于隋末的起义军，先是在元宝藏的义军中工作，后来在李密手下掌管文书。李密败后，瓦岗军的人才多数被李世民笼络走了，但魏徵却效忠于太子李建成。李氏兄弟争位的时候，魏徵鼓吹先下手为强，除掉李世民。但后来李建成却被李世民杀了，李世民很欣赏魏徵，重用为亲信。

魏徵办事很较真，为隋朝归纳出了一系列“身亡国灭”的沉痛教训，比如统治者好大喜功，一意孤行，穷奢极欲，上下相欺，不施德政，滥用刑罚，加重人民的徭役租赋负担等。在具体政策上，魏徵认为隋朝败在两点：一是常年对外征战，二是杨广行幸无度，放弃关中战略要地，远游扬州。隋朝穷兵黩武，政策措施太多，惊天扰民，天下骚动，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因而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关键是抚恤民众，休养民力，让百姓安居乐业。魏徵的研究成果针对性相当强。唐朝初期既接过了隋朝的均田制、地方官制、科举制等一

系列制度，也沿袭了隋朝重视文化、律法、外交等执政思想，同时注重与民休养，即使再大的战事也没有动用超过十万军队。

唐朝首都长安城也是在隋朝的大兴城上修建而成，整座城市沿用了大兴城的旧制，只是不断充实使之更加宏伟壮丽。从李渊开始的历代唐皇，就居住在城市北部中央——尽管他们也经常巡行东都洛阳城，继续实践着当年宇文恺设计这座城市时皇帝“至高无上，南面称王”的思想。而当年的大兴善寺逐步发展为带有鲜明天竺风格的大寺庙，佛教大兴，常常组织有数万人参加的法会。距大兴善寺北约二里、朱雀大街的中段坐落着著名的小雁塔。那原本是隋炀帝杨广的“晋王府”，唐初一度是武则天的儿子李显（中宗）的藩邸，武则天将其改名为小雁塔。

经过不断的发展，长安城最后成为人口不下百万的全国第一大都市。不过，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座伟大的城市是与隋朝同龄的……

隋朝历史年表

帝王纪年 公元纪年 历史事件

开皇元年 581年 二月十四日，隋王杨坚篡夺北周的天下，建隋，是为隋文帝。二月十六日，隋文帝杨坚立长子杨勇为太子。二十五日，封皇子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越王（九月时改封为蜀王），杨谅为汉王。九月，隋文帝杨坚发动伐陈战役，失败。

开皇二年 582年 五月，突厥汗国派大军杀入长城。六月，隋文帝杨坚命大臣高颎、宇文恺等在旧长安城旁兴建新都，命名为大兴（今西安城区）。

开皇三年 583年 三月，隋王朝正式迁都大兴城。四月，隋王朝八路大军北伐突厥汗国，在白道川击败突厥沙钵略可汗。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四月，隋文帝杨坚撤销“郡”建制，保留“州”建制。从此，地方由三级建制变为二级建制。

开皇四年 584年 六月，隋文帝杨坚兴建广通渠运河。秋，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王朝和解。

开皇五年 585年 隋文帝杨坚修筑长城（隋长城，自宁夏灵武至山西朔县）。五月，隋文帝杨坚初置“义仓”。

开皇七年 587年 四月，隋王朝在广陵修筑山阳渎（邗沟）运河。八月，隋文帝杨坚征召西梁帝萧琮至大兴朝见。萧琮叔父萧岩率众投

奔陈朝。杨坚下令废除西梁，西梁王朝结束（555—587）。

开皇八年 588年 十一月，隋文帝杨坚动员大军五十一万八千人，以晋王杨广为元帅，准备总攻陈朝。

开皇九年 589年 正月，隋朝对陈朝展开总攻，隋大将贺若弼、韩擒虎攻陷建康，俘虏陈后主陈叔宝。陈王朝灭亡。二月，隋朝大军扫荡南陈残余势力。江南、岭南诸州郡归降隋朝。南北分裂局面结束。

开皇十年 590年 江南人民因不习惯隋王朝统治，起兵反抗隋政府。十一月，隋文帝杨坚派杨素为元帅，讨平江南民变。隋大将裴矩平定岭南民变。

开皇十二年 592年 杨素、高颀为宰相。

开皇十三年 593年 二月，隋文帝杨坚命杨素兴建仁寿宫。

开皇十七年 597年 二月，隋大将史万岁平定南宁州（今云南地区），南宁州并入隋王朝版图。

开皇十八年 598年 二月初，因高句丽王国攻击辽西，汉王杨谅率水陆大军三十万准备讨伐高句丽。六月，隋军讨伐高句丽失利，至九月下旬撤军。高句丽与隋王朝和解。南宁州蛮夷首领爨翫反叛隋王朝。

开皇十九年 599年 二月，隋王朝三路大军北伐突厥，杨素、高颀等大败突厥军。十月，隋文帝杨坚册封突厥启民可汗，其部众移居河套。十二月，隋王朝再攻击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大乱。

开皇二十年 600年 四月，突厥攻击隋朝边塞地区，隋晋王杨广、汉王杨谅、大将杨素、史万岁等率军迎击，击败突厥军。十月，隋文帝杨坚废太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抵达隋朝。

仁寿元年 601年 突厥步迦可汗率军入侵中原，击败隋军。

仁寿二年 602年 隋大将杨素北攻突厥，击败突厥军。十二月，杨广、杨素诬陷蜀王杨秀谋反，隋文帝杨坚废杨秀为庶人。

仁寿四年 604年 七月，杨坚去世，太子杨广继位称帝，是为隋炀帝。八月，汉王杨谅起兵反抗杨广，兵败被擒，囚禁而死。十一月，隋炀帝杨广兴建东都洛阳新城。

大业元年 605年 二月，杨素为宰相。三月，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至扬州，建行宫四十余座。四月，隋大将刘方讨伐林邑王国（故地在今越南南部），攻陷其首都。八月，隋炀帝杨广出巡，第一次下江都（今江苏扬州）。

大业二年 606年 七月，隋政府兴建洛口仓。

大业三年 607年 东突厥启民可汗来隋朝朝见。四月，州政府改称郡级政府，仍为二级地方官制。四月，隋炀帝杨广第一次北巡，至涿郡（今北京）。隋炀帝杨广派裴矩经略西域。隋王朝派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出使流求。

大业四年 608年 正月，隋政府兴建永济渠运河。四月，日本遣使朝见，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隋炀帝杨广第二次北巡，至五原郡巡视长城。七月，隋炀帝再度修筑长城。隋大将宇文述攻击吐谷浑汗国，隋军攻陷伊吾王国（故地在今新疆哈密），将其并入版图，设立伊吾郡。

大业五年 609年 三月，隋炀帝杨广西巡，重击吐谷浑汗国。青海地区并入隋王朝版图。六月，设立鄯善、西海、且末、河源四郡。隋王朝疆域达到极盛。隋炀帝杨广在张掖接受西北属国朝见。

大业六年 610年 隋炀帝杨广派张镇周、陈棱等率军征讨流求，俘虏一万余人。隋炀帝杨广下诏兴建江南运河（镇江至杭州）。

大业七年 611年 隋炀帝杨广欲使高句丽王高元朝见不成，下诏讨伐高句丽。山东地区开始发生民变，王薄首义，窦建德起兵。隋炀帝杨广第三次北巡至涿郡。

大业八年 612年 正月，隋王朝大军一百一十万集结涿郡，开始讨伐高句丽王国（第一次征高句丽）。六月，隋炀帝杨广包围辽东城，久攻不下。七月，宇文述率领的陆军于渡河时被高句丽军击溃，海军统领来护儿率军攻击平壤，也被击溃。隋军损失惨重。

大业九年 613年 正月，隋炀帝杨广再次召集全国军队于涿郡，第二次征高句丽，攻击辽东城，失败。六月，杨玄感在黎阳兵变，攻击东都洛阳。隋王朝东征军撤退。在政府军的反击下，杨玄感兵败自杀。

大业十年 614年 二月，隋炀帝杨广三度召集军队，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王国。高句丽王高元遣使归降。

大业十一年 615年 八月，隋炀帝杨广四度北巡，被突厥大军包围于雁门郡。九月，突厥解除包围，隋炀帝杨广南返洛阳。

大业十二年 616年 七月，隋炀帝杨广第三次下江都，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自此，杨广一去不返。遍地民变，全国大乱。罗艺割据幽州，自称幽州总管。李密参加了瓦岗军。

大业十三年 617年 正月，窦建德割据河北，自称长乐王。二月，梁师都割据朔方郡，结援东突厥汗国。梁师都攻陷陕北诸郡，称梁帝。二月，刘武周割据山西北部。二月，李密起兵攻陷洛口仓，称魏公，割据河南诸郡，并猛攻隋东都洛阳。四月，薛举占领陇西地区，称西秦霸王，不久又称秦帝。七月，唐公李渊于太原起兵南下。七月，凉王李轨占领河西走廊。九月，王世充与李密洛口对峙。十月，李渊占领首都大兴城。十月，萧铣占领江陵地区，称梁王。十一月十六日，李渊遥尊杨广为太上皇，拥立隋代王杨侗继位称帝，是为西京

恭帝。十二月，秦帝薛举之子薛仁果攻击李渊政权，被李世民击败。李渊派大将李孝恭率军进入四川，招降四川诸郡，四川完全纳入李渊的势力版图。

大业十四年（武德元年）618年 三月初十日深夜，江都政变。翌日凌晨，隋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缢杀隋炀帝杨广。宇文化及立秦王杨浩继任皇帝，率军北返。五月十四日，隋西京恭帝杨侑让位于李渊。二十日，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是为唐高祖。五月，隋东都政府拥立越王杨侗继位为皇帝。九月，王世充击败李密军，掌握东都政府。李密投奔唐政府。宇文化及至魏县毒死皇帝杨浩，称许帝。十二月，李密叛唐政府，为唐军所杀。同年，唐朝开始陆续进攻其他割据政权。

武德二年 619年 二月，夏王窦建德擒杀许帝宇文化及。三月，王世充任隋东都政府相国，封郑王。四月，王世充 取隋王朝东都政府政权，称郑帝。这一年，隋王朝正式结束。唐朝政府陆续受降隋朝残余及其他起义势力。

后记

感谢读者阅读本书！

唐朝诗人张祜某次夜宿金陵渡口的小旅馆，写下了一首《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多愁善感的诗人坐在江边小木楼的窗前，看着对岸的星火，抒发着淡淡的忧思。全诗饱含着一种中国文人特有的感觉，丰富繁杂，穿透了上千年的岁月而蔓延到今天。

在诗人夜宿的小山楼的旁边，京杭大运河静静地流淌着。这条神奇的运河贯穿了南北，也贯穿了一个帝王早期的雄姿英发，中期的潇洒奋斗，以及晚期的彷徨无助与颓废自弃。这个帝王就是隋炀帝杨广。张祜写《题金陵渡》的时候，隋王朝轰然倒塌的余波依然存在。它留下的三省六部制、州县两级制、均田制、大运河、科举制度、长安城、洛阳城，以及隋炀帝倾全国之力营造的东亚国际体系，都为唐王朝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唐王朝是隋王朝的“继承者”，唐高祖、唐太宗父子继承了隋炀帝未竟的事业，带领大唐逐步走向辉煌的巅峰。而短命速亡的隋王朝和草草葬在离金陵百里之处的杨广，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每一个王朝有每一个王朝的历史责任。它不能毫无作为，但也不能脱离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隋王朝就好似一个在短时间内承担了过多的历史责任，结果被重担和“大业”压垮的王朝。对于隋文帝杨坚而言，吞并了陈朝，结束了延续四百年的乱世，缔造了统一王朝，就足

够名垂青史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这代人的责任。对于隋炀帝杨广来说，臣服了突厥铁骑，修缮了长城，巩固了王朝的北方边界，凭此也足够留名后世了。但是杨广好大喜功，继续修运河、通西域、下江南、三征高句丽、大兴土木，结果把“盘”做得越来越大。过重的历史负担，过于频繁的政策措施，完全超过了天下百姓承受的能力和心里。最后崩盘了，天下乱了，王朝覆灭了。这是一个悲剧。

隋朝原本是有希望成为“盛隋”的，结果成了“乱隋”。

隋朝是我们厚重历史遗产的其中一层。作为后人，我们批评隋王朝，同时也要牢记它的功绩。《中国通史：隋唐五代时期》第一章高度评价了隋朝：“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最后我用李商隐的《隋宫》来结束有关隋朝的思绪：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无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宫阙重重的大兴城笼罩在层层烟霞之中，隋朝君王还想选取江都建立奢华的别宫。如果玉玺没有落在李家手里，隋炀帝的豪华龙舟应该已经游遍了天涯海角。可如今，腐草丛中已不见当年萤火虫的影子，运河岸边的杨柳上也只剩下归巢的乌鸦在聒噪不停。如果隋炀帝

在阴间遇到陈后主（谥号也是“炀”），这两个才子会不会探讨一下《玉树后庭花》呢？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又发人深省。我相信张祜当夜在金陵渡口幽思的时候，多少也带有淡淡的历史情愫。

谢谢大家！

张程